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加西亚·马尔克斯
长篇小说全集
Macondo

总　目　录

迷宫中的将军

族长的秋天

爱情和其他魔鬼

恶时辰

霍乱时期的爱情

百年孤独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迷宫中的将军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王永年 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王永年 译

迷宫中的将军

南海出版公司

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89

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宫中的将军/〔哥伦〕马尔克斯著；王永年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1

ISBN 978-7-5442-7437-1

Ⅰ.①迷…　Ⅱ.①马…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709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56

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 1989

©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nd Heir of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迷宫中的将军
致谢

献给

启发我写这本书的阿尔瓦罗·穆蒂斯[1]

---

[1]阿尔瓦罗·穆蒂斯（1923—2013），哥伦比亚诗人、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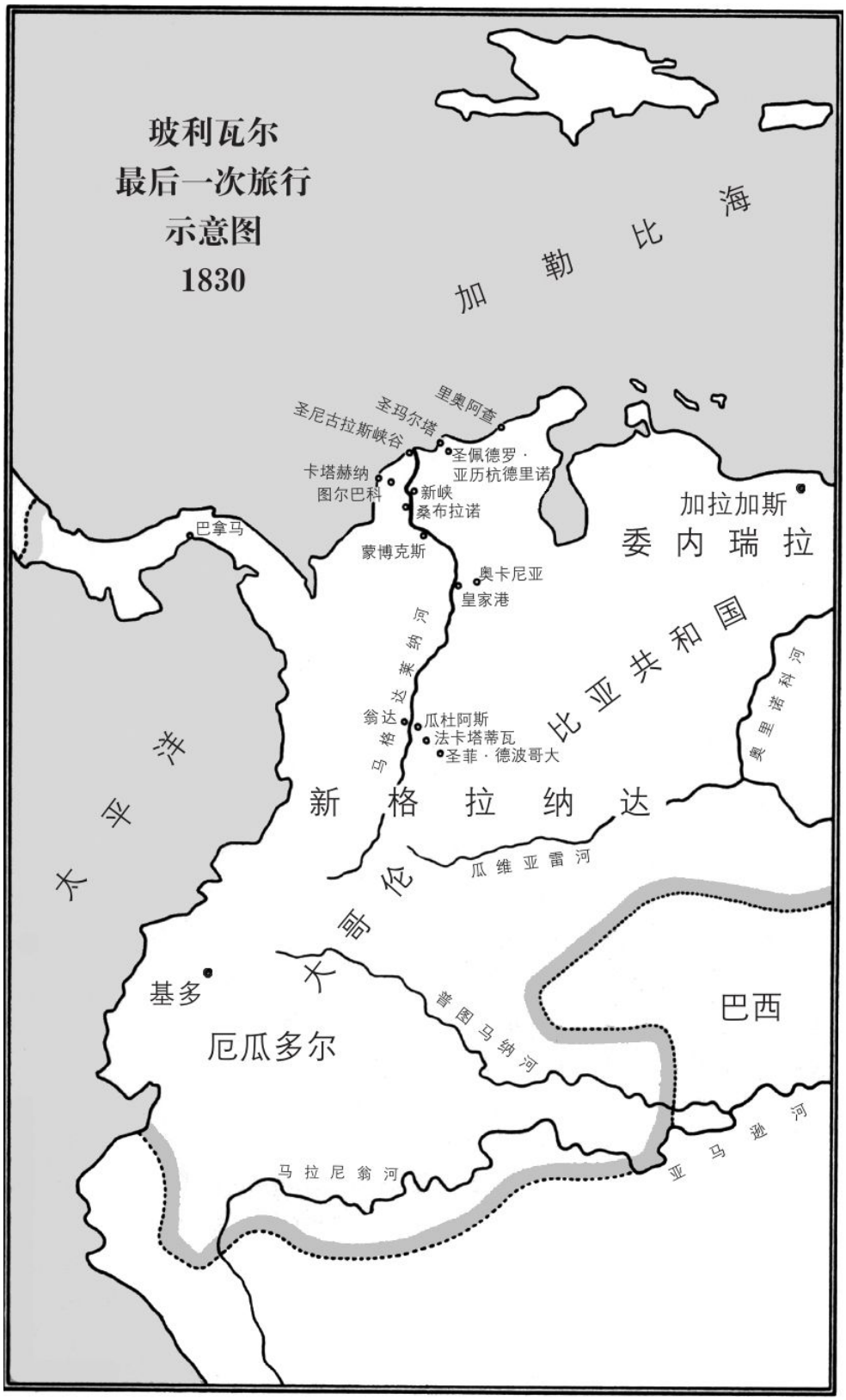
仿佛魔鬼主宰了我一生的际遇。

——致桑坦德[1]的信，一八二三年八月四日

---

[1]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1792—1840），哥伦比亚军人、政治家。此处摘自玻利瓦尔致桑坦德的信。

迷宫中的将军


玻利瓦尔
最后一次旅行
示意图
1830
加勒比海
里奥阿查
圣玛尔塔
圣尼古拉斯峡谷
圣佩德罗·
亚历杭德里诺
卡塔赫纳
图尔巴科
新峡
桑布拉诺
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
巴拿马
蒙博克斯
奥卡尼亚
皇家港
马格达莱纳河
翁达
瓜杜阿斯
法卡塔蒂瓦
圣菲·德波哥大
比亚共和国
奥里诺科河
太平洋
新格拉纳达
瓜维亚雷河
哥伦
大
基多
厄瓜多尔
普图马纳河
巴西
马拉尼翁河
亚马逊河

伺候他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见他光着身子、睁着眼睛泡在浴缸的草药水里，以为他已经淹死了。虽然知道那是他沉思冥想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是躺在水里那副瘫软沉迷的神态简直不像个活人。帕拉西奥斯不敢走近，只是低声按照他的吩咐在五点之前把他叫醒，以便天一亮就动身。将军从迷茫状态中醒过来，在昏暗中看到他总管的湛蓝的眼睛、松鼠色的鬈曲头发和庄严无畏的面容，手里拿着一杯罂粟果壳和树胶的煎剂。将军无力地抓住浴缸的扶手，像海豚似的从草药水里冒出来，衰弱的身体居然还有那股出人意外的冲劲。

“咱们走吧，”他说，“越快越好，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

这句话何塞·帕拉西奥斯在不同场合听了许多遍，但仍不相信是将军的由衷之言，尽管马厩里的马队已准备就绪，随从的军官已开始集合。帕拉西奥斯帮他胡乱地擦干身子，赶紧替他裹上那件御寒斗篷，因为他冻得索索发抖，手里的杯子磕在牙齿上咯咯直响。几个月前，当他穿那条自从利马豪华淫靡的夜晚以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岩羚羊皮裤子时，发现随着体重的减轻，身高也缩短了。甚至赤身裸体时的模样也起了变化，躯干的皮肤苍白，脸和手则由于风吹日晒，黑得像是烤焦了似的。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是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式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然而他果断的举止像是那种没有受到生活严重摧残的人，经常绕着圈子走个不停。他连呷五口就喝光了煎剂，舌头几乎烫出了泡，连蹦带跳在破旧的席子上跑过，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仿佛他喝下去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邻近教堂的钟楼响起五点的钟声。

“三〇年五月八号，星期六，英国人射伤圣女贞德的日子，”总管宣告，“从凌晨三点钟开始，一直在下雨。”

“从十七世纪凌晨三点钟开始下到现在了。”将军晚上失眠，嘴里发苦，没好气地说。然后认真地加了一句：“我没听到鸡叫。”

“这里没有鸡。”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什么都没有，”将军说，“这里是非基督徒的国度。”

他们在圣菲·德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米，四壁空空、大而无当的卧室不时有冷风从关不严实的窗户灌进来，对任何人都不是有益健康的住处。何塞·帕拉西奥斯把肥皂钵和红丝绒盒装的镀金刮脸用具放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在镜子旁边的托架上放好烛台，让将军有足够的亮光，又把炭火盆挪近一些，让他暖暖脚。接着，他掏出经常放在坎肩口袋里的一副银丝边、方镜片的水晶眼镜给将军。将军戴上眼镜，由于天生是个双利手，所以他时而用左手，时而换右手，灵活自如地刮着胡子，几分钟前连杯子都拿不稳，现在运用腕力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全凭手感刮好了脸，因为他尽量避免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容。接着，他拔掉露在鼻孔和耳朵外面的毛，用银柄裹绸的牙刷蘸炭粉擦洗一口整齐的牙齿，修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最后脱掉斗篷，往身上倒了一大瓶古龙水，双手擦遍，搞得筋疲力尽。那天清晨，他的个人卫生工作做得比往常更严酷，仿佛要从二十年徒劳无益的战争和权力的惨痛教训中净化自己的身心。

昨晚，他接待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曼努埃拉·萨恩斯，那个爱他但并不会陪他进行这趟死亡之旅的久经战火磨炼的基多女人。她每次都留下不走，任务是让将军了解外出期间的所有情况，因为长久以

来，将军除她之外谁都不信任。他留下一些东西交给曼努埃拉保管，这些东西除了他用过的纪念意义之外，没有什么价值，还留下几本他最喜爱的书籍，以及两箱私人文件。在前一天简短的正式告别仪式上，将军曾对她说：“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在八年炽烈的爱情生活中，将军对她做过许多敬重的表示，她对这句话也是这么理解的。将军的熟人中间，唯有她相信他这次真的要走了。也唯有她至少有个切实的理由希望他再回来。

将军不指望在动身之前再和曼努埃拉会面。但是房子的女主人堂娜阿玛莉亚想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偷偷地告别。她让曼努埃拉打扮得跟骑手一般从马厩栅门进来，避开当地居民伪善的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早已议论纷纷，堂娜阿玛莉亚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她家的好名声。将军更加谨慎，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别关通往隔壁大厅的门，那是家中仆人进出的必经之门，值勤的副官们在厅里玩纸牌，曼努埃拉走后很久他们还没有结束。

曼努埃拉为他朗读了两小时。她原很年轻，前不久才开始发胖。她抽水手烟斗，擦军人用的马鞭草香水，男人装束，同士兵们打成一片，但她喑哑的声音在昏暗的做爱时刻仍很动人。她坐在有最后一任总督纹章的大扶手椅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朗读；他穿着家常便服，盖着羊驼毛斗篷，仰天躺在床上静听。只能从他呼吸的节奏得知他并没有睡着。那本书是秘鲁人诺埃·卡萨迪利亚斯写的《一八二六年利马消息与流言的教训》，她念到某些段落时做了戏剧性的强调，同作者的文风十分贴切。

在后一个小时里，沉睡的房子里除了她的朗读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但最后一班巡逻队过去后，突然响起许多男人的一阵哄笑，整个

街区的狗受到惊动，吠叫响应。他平静地睁开眼睛，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曼努埃拉把大拇指夹在念到的那页，合上书，搁在膝上。

“是您的朋友们。”她对将军说。

“我没有朋友，”他说，“即使还剩几个，为时也不会太久。”

“他们在外面守夜，防止别人害您。”

将军这才听说全城早已知道的事情：好几起暗害他的阴谋正在酝酿，最后一批支持他的人守着房子警戒防范。门厅和内宅花园的回廊由轻骑兵和投弹手把守，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准备护送将军到卡塔赫纳港口，在那里乘帆船去欧洲。两个士兵打开铺盖卷横睡在卧室正门口，副官们则在卧室旁边的厅里玩纸牌，等曼努埃拉朗读结束，但是士兵们良莠不齐，不少人来路不明，在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担保不出什么事。将军不为坏消息所动，做了一个手势让曼努埃拉继续往下念。

将军一向把死亡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危险。他作战时总是身临第一线，却连划破皮的小伤都没有受过。他在敌人的炮火下行动自若，镇定得近乎荒唐，手下的军官们只得简单地解释为他自信刀枪不入。他屡遭暗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好几次是因为他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才保全性命。他外出时不带警卫，无论在什么地方给他什么吃喝都不提防。只有曼努埃拉明白，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糊涂或者宿命论思想，而是因为他悲哀地确信自己必将孤苦无告、赤身裸体地死在床上，并且不能从公众的感戴中得到安慰。

动身前那个失眠之夜，他唯一打破的惯例是上床之前没有洗热水澡。何塞·帕拉西奥斯早就替他烧好了恢复元气、祛痰止咳的草药汤

水，一直保持着合适的温度，以备他随时洗澡。但他不想洗。他吃了两丸治习惯性便秘的泻药，想在闲话利马的喁喁咻咻的读书声中迷糊睡去。突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发作一阵剧咳，房子仿佛都在震动。隔壁大厅里的军官们中断了牌戏。其中一个爱尔兰人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在卧室门口探头看看是否需要他帮忙，只见将军趴在床沿想把肚子里的东西兜底吐光。曼努埃拉扶着他的头，让他吐在一个小盆里。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卧室的人，他紧张地守在床边直到危象过去。将军满眼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指着梳妆台说：

“全怪那些丧气的花。”他说。

他像往常那样，总是为自己的不幸随便找个怪罪的原因。曼努埃拉比谁都了解他，向何塞·帕拉西奥斯示意把那个插着早上摘来、已经凋谢的晚香玉的花瓶拿走。将军躺回床上，合上眼睛；她用原先的声调继续朗读。她觉得将军已经入睡，便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在他烧得滚烫的额头吻了一下，悄悄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明天早上六点起她将等在通往翁达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同将军最后告别。然后她披上军用斗篷，踮着脚尖离开卧室。这时将军睁开眼，轻声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请威尔逊把她送到家门口。”

曼努埃拉认为她单身一人完全可以走夜路，比一小队长矛手护送更好，但将军的吩咐还是照办。何塞·帕拉西奥斯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到了马厩，马厩环绕着有一眼喷泉的内宅花园，清晨的第一批晚香玉正开始吐放。雨暂时停了，风也不在树间呼啸，但是寒冷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贝尔福德·威尔逊上校一路上重复夜间的口令，

让躺在回廊席子上的哨兵放心。经过大厅窗口时，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房东正在给通宵等候、准备送行的军民朋友分送咖啡。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卧室时发现将军神志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只听得懂一句："谁都不理解。"他发高烧，浑身火烫，不时放几个恶臭的闷屁。第二天，将军记不清自己是在说梦话还是谵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我疯狂的危象"。现在谁都不惊慌了，因为他害这种病已有四年之久，任何医生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次日他又头脑清醒，仿佛从死灰中获得新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裹好毯子，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留一支燃着的蜡烛，离开了房间，没关门，继续守候在隔壁厅里。他知道将军明天一早就会起来，泡在浴缸的草药汤水里，试图恢复梦魇消耗的精力。

惊心动魄的一天已经结束。一支由七百八十九名轻骑兵和投弹手组成的卫戍部队借口要求补发三个月的欠饷发动了哗变。真正原因是这支部队大多数军人来自委内瑞拉，不少人参加过解放四个国家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最近几星期来遭到市民的辱骂和挑衅，他们担心将军出国后自己的命运毫无保障。哗变部队要价七万金比索，结果给了他们一千金比索和旅途用品，解决了冲突，当天下午队伍带了一群妇女儿童和家畜乱哄哄地向委内瑞拉开拔。市民们骂骂咧咧，唆使狗咬他们，朝他们脚下扔燃着的鞭炮，打乱他们的步伐。军鼓和铜乐器压不住喧腾，市民们对敌人的部队也没有这么做过。十一年前，经过三个世纪漫长的西班牙统治，凶恶的总督堂胡安·萨马诺也从这条路仓皇出逃，他乔装成朝圣香客，但他箱子里满是金铸的神像和原坯翡翠，剥制的大嘴鸟和装穆索蝴蝶标本的玻璃盒子。当时不止一人在阳台上为他挥泪，向他扔一枝鲜花，衷心祝愿他一路顺风。

将军借住在陆海军部长的邸宅里，大门不出，秘密参加了解决冲突的谈判，最后派他的内侄和心腹副官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将军送反水部队到委内瑞拉边界，以保证不出新的乱子。他没有看队伍在阳台下经过，但听到了军号和鼓声，以及挤在街上的人群的喧闹和嘈杂的叫喊。他不予理睬，同书记员们处理尚未答复的信件，口授一封给玻利维亚总统堂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大元帅的信，宣称他已交出权力，但对这次国外之行并不明确肯定。“我这辈子再也不写信了。”他结尾说。午睡发汗时，他梦中仿佛听到远处的喧闹，被一连串爆炸声惊醒，那可能是叛军的枪声，也可能是烟火匠们试放爆竹。他问是怎么回事，回答是过节。回答十分简单：“将军，那是庆祝节日。”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向他解释是什么节日。

曼努埃拉夜间来访谈起这件事时，将军才知道是他的政敌，也就是他称之为蛊惑党的那批人干的，他们得到治安当局的默许，上街煽动手工业行会反对将军。那天是星期五赶集的日子，广场上容易引起骚乱。傍晚一场雷电交加、异乎寻常的大雨驱散了捣乱分子。但是损害已经造成。圣巴托洛梅法学院的学生们攻占了最高法院，强行对将军进行公审，他们用刺刀破坏了他的一幅由一位解放军老旗手绘制的真人大小的油画像，然后从阳台上扔到街上。喝玉米酒醉了的暴民们抢劫了皇家大道上的商店和郊区没有及时关门的酒店，在大广场上枪决了一个用塞满锯木屑的布袋扎成的将军，即使没有缀纯金纽扣的蓝色军服，也一眼就能辨出像谁。他们指控将军幕后鼓动军队叛乱，目的是恢复他连续任职十二年之后被议会一致投票决定剥夺掉的权力。指控他想终身担任总统，以便把这职位传给一个欧洲亲王。指控他假装出国，其实是前赴委内瑞拉边境，打算率领叛军卷土重来，夺取政权。公共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攻讦将军的无头告示，支持将军的一些头面人物躲在别人家里，等待事态平息。他的主要政敌弗朗西斯科·德

保拉·桑坦德一派的报纸大肆宣扬说，将军的所谓疾病和出国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令人厌烦，其实只是政治花招，想让人们请求他别走。那天晚上，曼努埃拉·萨恩斯把白天的骚乱详情告诉将军时，临时总统的士兵们正在擦掉大主教邸宅墙上一条用炭涂写的标语：“这家伙既不会走，也不会死。”将军听后叹了一口气。

“局势肯定不妙，”他说，“我比局势更糟，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街区之外的事，却对我说是庆祝节日。”

事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信他会放弃权力，离开祖国。这个城市太小，市民又太喜欢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缠不清，因此不可能不注意到他毫无把握的欧洲之行有两个大破绽：首先，他随从人员众多而没有足够的钱，哪里都去不成；其次，他曾任共和国总统，未经政府许可，一年之内不能出国，何况他连提出申请的表面文章也没有做。他下令收拾行李，故意搞得人人皆知，但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把它看成是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他以前装着要离开，曾下令将整幢房屋拆除，结果却是一个有效的政治花招。军事副官们认为过去一年中他灰心丧气的症状太明显了。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又精神焕发地苏醒过来，带着比原先更大的劲头重新生活。何塞·帕拉西奥斯一直注意各种难以预料的变化，常说：“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他一再提出辞职，已经编进了民间歌谣，最早一次是总统就职演说中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以后几年里，他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要求辞职，谁都说不准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两年前的一次搞得尽人皆知。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晚上，有人企图在政府大楼的卧室里暗杀将军，他侥幸脱险，没穿外套在一座桥下躲藏了六小时。第二天清晨，议会派一个代表团去探

望，只见他身上裹着羊毛毯，两脚泡在一桶热水里，不是由于高烧，而是由于失望，显得萎靡不振。他向代表们宣布阴谋不予调查，不对任何人进行传讯，原定元旦召集的议会立即提前举行会议，选举另一位共和国总统。

“这之后，”他结尾说，“我就离开哥伦比亚，再也不回来了。”

话虽这么说，后来还是进行了调查，严厉审讯了责任者，在大广场枪决了十四个人。原定一月二日召集的制宪议会推迟了十六个月才举行会议，谁也不提辞职之事。但当时的国外来访者、偶尔一起聚会的人和过路的朋友都听他说“我要到人们要我的地方去”。

他病重的公开消息也不是要走的可靠征兆。他有病这一点谁都不怀疑。相反的是，自从他最近在南方作战归来，凡是见他在鲜花扎成的凯旋门下通过的人都吃惊地认为这次他必死无疑。他进城时骑的不是那匹赫赫有名的战马“白鸽”，而是一头用席子代替马披的秃毛母骡，他头发花白，满脸愁云，上衣肮里肮脏，一只袖管脱了线。他英武的风度荡然无存。当天在政府大楼为他举行的沉闷的晚会上，他郁郁寡欢，不知是出于政治诡计还是单纯的疏忽，竟用一个部长的姓名去称呼另一个部长。

他衰朽的模样不足以使人相信他将离去，因为六年来一直传说他身患重病，但他始终照常保持指挥能力。第一次带来将军病重消息的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南方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期间，英国军官偶然在利马北面帕蒂维尔卡的沙漠里见到将军。他在一所临时搭成、权充司令部的小茅舍里看到将军裹着风雨呢斗篷躺在地上，由于忍受不住中午的酷寒，头上包着一块布，身边有几只母鸡啄食什么，他连驱赶的

力气都没有。经过一场语无伦次的艰难的谈话，将军同来访者告别，最后一句戏剧性的话叫人听了心碎：

“把你目睹我临死的情况告诉全世界吧，在这片不是人住的沙滩，鸡都爬到了我身上。”

据说他害的是沙漠毒辣的太阳造成的日射病。又传说他先在瓜亚基尔，后在基多已处于弥留状态，害的是胃热，突出的症状是对外界毫不关心，精神极端冷漠。没人知道这些消息有什么科学根据，因为将军一向反对医生们的见解，他根据多诺斯蒂埃尔的《自我医疗》自己诊断处方。那是一本法国民间验方手册，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随身携带，作为了解和治疗任何身心毛病的绝对权威。

总之，谁的弥留时刻都不如他那么硕果累累。人们以为他快死在帕蒂维尔卡时，他却再度翻越安第斯山脉，在胡宁告捷，以阿亚库乔的最终胜利完成了整个西班牙美洲的解放事业，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在利马受到欢迎，盛况空前绝后，陶醉在荣誉之中。因此，尽管再三宣布他因病将引退出国，官方活动仿佛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人们认为只是显而易见的闹剧重演，不予置信。

将军回来后几天，举行了政府会议，开得不很愉快，结束时他拉住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元帅的胳臂说：“您留一留。”将军把他带到只接待少数贵客的私人办公室，硬要他坐在将军自己的大扶手椅上。

“现在这个座位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您的了。”他对苏克雷说。

将军的亲密战友，阿亚库乔的大元帅，对国家形势了若指掌，但将军在谈正题之前仍对他做了详细介绍。要不了几天就召集制宪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通过新宪法，虽然为时已晚，仍试图重温美洲一体化的金色梦想。秘鲁已被倒退的贵族势力控制，似乎难以挽救。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将军把玻利维亚拖往他自己的方向。委内瑞拉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统治下已于前不久宣布自治。南方长官胡安·何塞·弗洛雷斯将军联合瓜亚基尔和基多，准备成立独立的厄瓜多尔共和国。作为一体化辽阔国家雏形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又将沦为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一千六百万刚刚获得自由生活的美洲人又得听从地方军阀的任意摆布。

“总而言之，”将军总结说，“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

“那是命运的嘲弄，”苏克雷元帅说，“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

将军反应强烈。

“别重复敌人的鬼话，”他说，“尽管有时不幸被他们言中。”

苏克雷元帅道了歉。他聪明、整饬、胆小、迷信，出天花后留下的疤痕并没有减损面貌的温柔。将军很欣赏他，但说他故作谦逊。他是皮钦查、图穆斯拉、塔尔基几大战役的英雄，二十九岁就指挥了光辉的阿亚库乔战役，摧毁了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最后堡垒。除了这些功勋之外，他更受人称颂的是胜而不骄，心地善良，有政治家气质。那时他已辞去了全部职务，不佩戴任何表示军衔的标志。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大氅，老是翻起领子，挡住附近山头刮来的刀割似的寒风。他

对国家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义务是代表基多选区参加制宪议会。当时他三十五岁，体格强健，热恋着索兰达女侯爵堂娜玛莉亚娜·卡塞伦，一个美貌、淘气、稚气未脱的基多姑娘，他们两年前结了婚，有一个六个月的女儿。

将军想不出有谁比苏克雷更适于继他之后担任共和国总统了。他知道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了设置障碍在宪法中塞进了限制总统年龄的规定，苏克雷还差五岁，但他在秘密串联，设法通过一项修正案。

“您接受下来吧，”将军对他说，“我挂一个最高统帅的名，待在政府外围，正如公牛在一群母牛外围打转。”

他神情疲惫，但他的决心使人深信不疑。不过元帅早就知道，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永远不会归他。前不久，当将军初次提出由他担任总统的可能性时，他说他永远不会治理一个制度与方向日趋危险的国家。按照他的想法，整顿的第一步是把军人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他打算向议会提议今后四年中总统之职不能由军队将领担任，用意也许是阻止乌达内塔上台。但是反对这一修正案最激烈的人将会是最有势力的人，也就是军队的将领们。

“我太疲倦了，不能没有方针地工作，”苏克雷说，“此外，阁下同我一样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一个弹压叛乱的人。”

当然，他可以参加制宪议会，如果向他提出，甚至可以接受担任议会主席的荣誉。但是仅此而已。十四年的战争已经教会了他，能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他建立了玻利维亚共和国，把这片未开发的广袤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担任总统期间懂得了权力变幻无常的道理。他

的颖悟使他明白光荣的虚幻。“因此我不能接受，阁下。”他总结说。六月十三号，圣安东尼奥日，他必须赶到基多和他的妻子女儿团聚，不仅在这一年而且要在他有生之年和她们一起庆祝他的命名日。上一个圣诞节他已下定决心在爱的欢愉中为她们而生活。

“我对生活别无他求。”苏克雷说。

将军脸色苍白。“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吃惊了。”他说。他直盯着苏克雷的眼睛：

“这是您最后一句话吗？”

“倒数第二句，”苏克雷说，“最后一句是向阁下知遇之恩表示感谢，永世不忘。”

将军在腿上拍了一掌，让自己从一场迷梦中醒来。

“好吧，”他说，“您替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后的决定。”

当天晚上他吃了一个医生为他治胆汁病的催吐剂，委顿不堪，写了辞呈。一月二十日，制宪议会开幕，他在告别演说中赞扬了议会主席苏克雷元帅，称他为最杰出的将军。赞扬引起会场一片欢呼，但是乌达内塔身旁一个议员附在他耳畔悄悄说：“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将军比您更杰出。”将军的话和那个议员的挑拨像两枚火红的钉子刺进了乌达内塔将军的心。

乌达内塔的不快可以理解。即使他的战功不及苏克雷显赫，他的魅力也不如苏克雷，但没有理由说他不同等杰出。将军本人曾称赞他的镇静坚定，他对将军的忠诚和爱戴也久经考验，将军不敢面对现实时，他是少数敢直言不讳的人之一。将军注意到自己的疏忽，在排印

出来的讲话校样上亲笔把“最杰出的将军”改成“最杰出的将军之一”。这个补救措施并没有消除乌达内塔的怨气。

几天后，在将军同友好议员的一次会议上，乌达内塔指责他伪称准备出国，其实是在秘密活动，企图重新获选。三年前，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在委内瑞拉省武装夺权，首次尝试把它从哥伦比亚分裂出来。于是将军前去加拉加斯，在欢歌和钟声中当众同派斯拥抱表示和解，并且投其所好，为他制定了一个特例制度，允许他随心所欲支配一切。“灾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乌达内塔说。那次纵容不仅毒化了同新格拉纳达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传播了分裂的细菌。如今，乌达内塔总结说，将军能对国家做出的最好贡献就是立即改掉发号施令的恶习，离开这个国家。将军激烈地反驳。乌达内塔心直口快，说得慷慨激昂，在场的人都认为他们看到了一场伟大的老交情的破灭。

将军重申他辞职的决心，指定在议会选出新总统前由堂多明戈·凯塞多担任临时总统。三月一日，他从侧门离开政府大楼，避开应邀前来喝杯香槟酒祝贺他的继任者的宾客。他乘别人的马车前往临时总统借给他暂住的风光旖旎的富恰庄园。他意识到自己成了普通居民，仅仅这一点足以加重催吐剂的损害。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准备文具，在半梦半醒间开始写回忆录。何塞·帕拉西奥斯拿来了足够写四十年回忆的墨水和文具，将军通知他的侄子、书记员费尔南多从下星期一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将军每天那时候头脑最清醒，可以痛思往事。他多次同侄子谈过，要从他记忆所及的最早一件事开头，那是他刚满三岁不久在委内瑞拉圣马特奥庄园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一头长着金牙齿的黑母骡闯进家里，从正厅跑到贮藏室，家里人和奴隶们都在午睡，母骡不慌不忙，见什么就吃什么，把窗帘、地毯、灯具、花

瓶、餐厅刀叉和器皿、祭坛上的神像、衣橱箱子连同里面的衣物，厨房里的坛坛罐罐、门窗连同铰链和插销，以及从门厅到卧室的所有家具统统吃了下去，唯一没有碰的东西是飘浮在空中的他母亲梳妆台的一面椭圆形镜子。

富恰庄园天高云淡，空气清新，他自我感觉良好，不再提回忆录的事，而是利用清晨的时光在草原芳菲的小径上散步。他到后几天，来看望的人得出他已恢复的印象。忠于他的军人朋友们尤其如此，他们要求将军继续担任总统，即使发动政变也在所不惜。将军劝阻他们，理由是使用武力有损他的荣誉，但似乎并不排除议会做出合法决议确认他重任总统的希望。何塞·帕拉西奥斯还是那句老话：“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

曼努埃拉仍旧住在离圣卡洛斯宫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密切注意着街谈巷议。她每星期到富恰去两三次，如有紧急情况去得更勤，每次都带着修道院做的杏仁糖、热甜点和桂皮巧克力，以供下午四点钟的茶点之用。她难得带报纸，因为将军近来对批评十分敏感，一些微不足道的指责都会使他大动肝火。但是她讲述政界的卑鄙、沙龙里的背信弃义和聚会场所的风向征兆，即使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也得耐住性子听她说完，因为她是唯一获得准许说真话的人。无话可说时，他们便处理信件，或者由她念书给他听，再不然就同副官们玩纸牌，不过他们俩总是单独进餐。

他们是八年前在基多庆祝解放的豪华舞会上相识的，当时她已是詹姆斯·索恩医生的妻子，索恩是总督统治末期跻身于利马贵族圈子里的英国医生。她是将军丧偶二十七年来长期保持爱情关系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将军的心腹、文件保管员和最富激情的朗读者，并且是他的参谋部成员，有上校军衔。她曾醋意大发，争吵得凶时差点咬下

他一只耳朵，这已成遥远的往事；可是他们一些最平常的交谈仍旧会导致憎恨的爆发和绸缪缱绻的和解。曼努埃拉并不留下过夜。这一季节傍晚转瞬即逝，她总是赶在天黑之前到家。

在利马的马格达莱纳庄园时，他找出种种借口让她离得远远的，而自己则同出身高贵或者不怎么高贵的夫人们寻欢作乐；在富恰庄园情况完全相反，没有她，将军似乎活不下去。他眺望着她来时的必经之路，不停地问何塞·帕拉西奥斯时间，要帕拉西奥斯挪动椅子的位置，一会儿要把炉火拨旺，一会儿又要灭掉，过一会儿又要重新生火，将军自己闷闷不乐，焦灼烦躁，把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搞得六神无主，看到马车从山冈后面出现，将军才重新有了生气。但是当来访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他显得同样焦躁。午睡时分，他们两人躺在床上，不关门，不脱衣服，也不睡着，不止一次犯了想再做最后一次爱的错误，因为他力不从心，却又不肯认输。

那些天中，他顽固的失眠症显出了紊乱的迹象。他口授信件说了半句话，或者玩牌一局未终时会突然睡着，自己也说不清是睡意的突然侵袭还是短时的昏厥，但他该睡觉时，头脑又特别清晰，十分痛苦。天快亮时，他才迷迷糊糊入睡，但随即又被林间的飒飒风声惊醒。他只好把口授回忆录的计划再推迟一个上午，独自出去散步，有几次到午餐时间才回来。

他出去时不带警卫，不带那两条曾随他上过战场的忠心耿耿的狗，也不骑马，因为他几匹名噪一时的战马都卖给了轻骑兵营，补充旅行的经费。他身披羊驼毛斗篷，脚蹬羊毛衬里的长靴，头戴绿绸睡帽以抵挡草原的寒风，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杨树林中踩着厚软的腐叶一直走到附近的河畔。他在凄怆的柳树下面对着一座木板松动的小桥久久地坐着，凝视着潺潺流水，想当初他曾引用青年时代的老师堂西蒙

·罗德里格斯的修辞譬喻，把流水比作世人的命运。一个警卫始终尾随着他，不让他发觉，他回来时浑身被露水沾湿，脸色苍白，神情茫然，几乎连登上大门台阶的气力都没有了，但眼睛却闪出狂喜的光芒。他形单影只散步的时候心情十分舒畅，暗中跟随的警卫们甚至听到他在树林里像当年获得传奇般的胜利或遭到悲壮的失败时那样唱起士兵的歌曲。最了解他的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兴高采烈，因为连曼努埃拉也不信制宪议会会再次确认他为共和国总统，尽管将军本人曾说它值得赞扬。

选举总统的那天早晨，将军散步时看到一条无主的猎犬在篱笆间同鹌鹑嬉戏。他吹了一声口哨，那条狗霍地站住，竖起耳朵寻找，只见他披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斗篷，戴着佛罗伦萨主教式的软帽，孑然一身站在疾驰的浮云和无垠的平原之间。猎犬在将军身上嗅来嗅去，将军抚弄它的皮毛，它突然闪开，金黄色的眼睛直瞅着将军，疑虑地哼了一声，吓得逃跑了。将军顺着一条小路追赶，跑进一个陌生的郊区，只见一些土路小街，红瓦土砖的房屋，院子里升腾着挤奶的热气。他突然听到一声呵斥：

“独夫！”

牛圈里扔出一捧牛粪，他躲避不及，前胸被打个正着，溅了一脸。他离开总统府以后一直昏昏沉沉，这下才猛然惊醒，原因不是打中他的牛粪，而是那一声大喝。他知道新格拉纳达人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与一个流浪街头、由于穿着一身军制服而出名的疯子同名。那些自诩为自由派的议员之一曾背着将军在议会上这么称呼他，当时只有另外两个议员站起来抗议。但他从没有听人当他面叫这个绰号。他刚拉起斗篷一角擦脸，偷偷尾随他的警卫就从树林里出来，拔剑要惩罚侮辱他的人。将军忽然火冒三丈。

“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道。

军官赶忙立正。

“听从您吩咐，阁下。”

“我不是你的阁下。”将军回答说。

将军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职务和军衔。军官认为亏得将军没有权力给他更重的处分，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深深了解将军脾气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严厉。

那天很不好过。整个上午他像等候曼努埃拉那样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但对谁都不隐瞒这次不是盼她，而是盼望议会的消息。他随时随刻估计会议进行到了什么地步。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已是十点钟时，他说：“那些蛊惑家再怎么聒噪，现在也应该投票表决了。”他沉思好久之后又高声自问：“谁了解乌达内塔那样的人在盘算什么？”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将军心里明白，因为乌达内塔一直逢人便讲他不满的理由和程度。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过时，将军像不经意地问他：“你认为苏克雷会投票选谁？”何塞·帕拉西奥斯同将军一样清楚，苏克雷元帅不可能投票，前几天他受议会委派和圣玛尔塔主教阁下何塞·马利亚·埃斯特维斯一起去了委内瑞拉，协商分裂的条件。何塞·帕拉西奥斯立即回答：“将军，您比谁都清楚。”早晨不愉快的散步之后，将军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将军不论胃口好坏，十一点之前总是坐下来吃一个煮得温热的鸡蛋，喝一杯葡萄酒，或者吃少许干酪，那天别人进餐时，他一直在平台上全神贯注地望着大路，连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打扰他，下午三点敲过，他一跃而起，原来早在曼努埃拉的马车从山冈后面出现之

前他已听到了马蹄声。他跑去迎接，打开车门扶她下来，一看到她脸色就知道带来了什么消息。堂华金·莫斯克拉，波帕扬一个显赫家族的长子，全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他的反应不是愤怒、失望，而是惊讶，因为他本人曾向议会推荐过堂华金·莫斯克拉，自信肯定不会被接受。他陷入沉思，直到吃茶点时才开口："难道我一票都没有？"他问道。一票都没有。后来，一个由拥护他的议员们组成的官方代表团来访时向他解释说，他的支持者商量好让新总统全票当选，免得他像是一场激烈竞争中的败方。他懊丧之余似乎并不欣赏这种给他保留面子的做法。他想到的是，在他首次提出辞职时就接受反而使他面子上好看。

"总而言之，"他叹息说，"那些蛊惑家又赢了，并且一举两得。"

他把代表团送到大门口之前，竭力不流露出自己的愤懑。马车还没有走远，他就发作一阵剧咳，直到傍晚，整个庄园都十分惊慌。官方代表团一个成员说议会的决定非常审慎，挽救了共和国。当时他没有评论。那天晚上，曼努埃拉硬要他喝下一杯肉汤时，他说："任何议会都救不了共和国。"临睡前，他召集了副官和勤杂人员，像前几次半真半假辞职时那样郑重宣告：

"我明天就离开这个国家。"

他不是在第二天，而是四天之后才成行。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平静，口授了一个告别宣言，丝毫没有流露内心的创伤，又回城准备行装。新政府的陆海军部长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把他接到自

己在教育街的邸宅，不单是尽地主之谊，更是为了保护他免受日益嚣张的暗杀他的威胁。

他离开圣菲之前，变卖了剩下的一些值钱东西充实行囊。除了马匹之外，他还卖了一套在波托西富裕时期用的银餐具，造币厂不考虑精细的手工和文物价值，单凭银子的重量作价两千五百比索。结算下来，他一共带走一万七千六百比索六十生太伏，一张由卡塔赫纳国库见票即付八千比索的汇票，议会同意的终身年金，以及分散放在几个箱子里的六百盎司黄金。他出生时以名下的财产而论算得上是美洲豪富，如今只剩这点可怜的余额。

出发的那天早晨，将军已穿好衣服，何塞·帕拉西奥斯归在一起的行李只有两套很旧的内衣，两件替换衬衣，一件双排纽扣的军上衣，据说纽扣是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的藏金打造的，还有一顶绸睡帽和苏克雷元帅从玻利维亚给他带来的红色尖顶帽。他只有几双屋里穿的便鞋和脚上一双漆皮长靴。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行李中除了药箱和少许值钱物品之外，还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意大利将军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的《军事艺术》，那是副官威尔逊的父亲罗伯特·威尔逊爵士送给将军的、原属拿破仑·波拿巴的珍本藏书。其余的东西寥寥无几，一个士兵用的背囊就足以装下。随从们已在大厅等候，将军正要出去时，见到这些东西，说道：

“亲爱的何塞，真难以相信，我们多少荣誉就塞在了一只鞋子里。”

但是七头母骡驮着另外几只装有勋章、黄金餐具和值钱杂物的箱子、十箱私人文件、两箱旧书、至少五箱衣料，还有几箱谁都没有耐心清点的各式各样有用无用的杂物。三年前将军从利马回来时的行李

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马队驮着七十二个大箱子和四百多个小箱子，装的东西不计其数，价值也无从估计。那次留下六百多本书在基多，再没设法取回。

快六点了。连绵不断的小雨暂时停息，但空气仍旧迷蒙阴冷，士兵们驻扎的屋子开始散发军营的气息。轻骑兵和投弹手见到将军从回廊尽头走来便纷纷起立。阴郁的将军由副官们簇拥着，在熹微晨光中呈现绿色，披着斗篷，大檐的帽子使他脸色更灰暗。他把一条浸透古龙水的手帕捂在嘴上，按照安第斯山区古老的迷信，这能防止猛地走到户外时瘴气的侵袭。他身上没有任何军衔绶章，也没有什么表明他当年无上权力的标志，但在嘈杂的侍从军官中间，一种异样威严的光辉使他与众不同。他在内宅花园铺着席子的回廊里缓步朝客厅走去，没有搭理向他立正敬礼的岗哨。进入客厅之前，他把手帕塞在袖管里，如今只有教士们才保存这种习惯，然后脱下帽子交给一个副官。

除了在邸宅通宵等待的人之外，军民宾客一早便络绎来到。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喝咖啡，深色的服装和压低声音的谈话使客厅的气氛阴郁严肃。突然间，低沉的喃喃声中响起一个外交官的尖嗓门：

“这简直像是葬礼。”

话音未落，他忽然闻到背后飘来一阵充斥客厅的古龙水的气味。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转过身，心想那个刚进来的幽灵般的人或许听到了他大不敬的话，感到忐忑不安。但是没有：虽然将军最后一次访欧是二十四年前青年时代的事，但欧洲给他的美好印象远比不快为深。因此，他首先朝外交官走去，对那个受宠若惊的英国人说：

“希望今年秋天海德公园的雾气不太浓重。”

外交官愣了片刻，因为近几天来他听说将军要去的三个不同的地方并没有伦敦。但他随即定下神。

“我们尽量设法让阁下白天黑夜都有阳光。”他说。

当选总统不在场，因为议会是缺席选举的，他从波帕扬前来至少要一个月。代表他的是当选副总统多明戈·凯塞多将军，人们说共和国的任何职务对他都嫌太小，因为他的仪表风度像是国王。将军十分尊敬地招呼他，玩笑地说：

“您可知道我没有出国的许可吗？”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玩笑，但还是引起一阵大笑。凯塞多将军答应在下一个邮班给他送一份正式护照到翁达。

官方送行的有总统代表的弟弟、本城的大主教，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文官穿骑马套裤，军人穿长靴，他们准备把这位被逐的大人物送出几里路。将军吻了大主教的戒指和夫人们的手，文质彬彬地同男士们握手，他是礼仪的绝对行家，不过在这个城市没有用武之地，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不是我显身手的地方。”他绕场一周，走到每个人面前时都招呼致意，说一句从礼宾手册里精心学来的客套话，但对谁都没有正视。他声音尖锐，因发烧而有些嘶哑，多年旅行和战争风云没能改变的加勒比口音在安第斯山区的土腔中间显得分外突出。

招呼完毕，他接过代理总统递给他的一封信，上面有许多新格拉纳达知名人士的签名，感谢他多年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家默不作

声，他虚应当地的形式主义，假装看了一遍，事实上他没戴眼镜，字写得再大也看不清。他装模作样看完后，向送行的人简单说了几句表示感激的话，措辞得体，谁都不能说他根本没有看过信。最后他环视四周，急切地问道：

“乌达内塔没有来？”

代理总统告诉他说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了支持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将军的防范任务，率军跟在哗变部队后面走了。这时有人插嘴说：

“苏克雷也没有来。”

这句别有用心、不问自答的话不能不引起将军注意。他垂眉回避的眼睛这时闪发出灼热的光芒，不针对谁地回答说：

“为了不打扰阿亚库乔的大元帅，没有通知他出发时间。”

将军似乎还不知道苏克雷元帅并未完成委内瑞拉之行的使命，他的祖国没有准许他入境，两天前已经回来。没有人告诉他将军要走，也许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首先知道。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这事的时候正忙忙颠颠地做旅行的最后准备，一晃竟然忘了。当然，苏克雷元帅由于没有接到通知，心中不快的可能也不能排除。

隔壁的餐厅里，桌上已摆好丰盛的早餐：蕉叶玉米粽子、大米灌肠、炒鸡蛋、放在花边布巾上的花式甜面包、芳香扑鼻的又热又稠的巧克力。邸宅的男女主人虽然知道将军早上只喝一杯罂粟果壳和阿拉伯树胶的煎剂，还是推迟了开早饭的时间，希望将军能出席主持。堂

娜阿玛莉亚留出上座的扶手椅，请他入席，但他婉言推辞了，客气地朝大家一笑说：

“我要赶长路，祝各位胃口好。”

他站直准备向代理总统告别，代理总统热烈拥抱了他，相形之下将军的身躯显得多么瘦小，临别时刻又是多么孤单和无能为力。然后他再次同所有的男人握手，吻了夫人们的手。堂娜阿玛莉亚试图挽留他，等到雨过天青再走，尽管她跟将军自己一样清楚地知道这场雨简直会下到世纪末。再说，将军想尽早离开的心情显而易见，要拖住他简直是对他的冒犯。男主人在花园的蒙蒙细雨下陪他走到马厩。男主人伸出手指像是触摸玻璃器皿似的想搀扶他的胳臂，但吃惊地感觉到将军皮肤下面仿佛有一股同他荏弱的身体毫不相称的力量的潜流。等候他的政府、外交使团和军队的代表们大氅已被雨淋透，污泥直到脚踝，准备陪他赶第一天的路程。然而很难分清陪伴他的人中间哪些是出于友情，哪些是为了保护他，哪些只是想亲眼看到他确实离去。

有个西班牙商人被指控盗马，捐献了一百头牲口给政府，作为撤销对他起诉的交换条件，其中最好的一头母骡被挑选出来充当将军的坐骑。将军一只靴子已伸进马夫扶着的马镫，陆海军部长突然招呼说：“阁下。”他一脚踏在马镫上，两手抓住座鞍，停了下来。

“留下来吧，”部长说，“为了祖国的安危，您最后牺牲一次吧。”

“不，埃兰，”将军回答说，“我已经没有可以为之牺牲的祖国了。”

一切就此结束。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将军一去不返了。他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五倍于欧洲面积的广大土地，为了维护它的自由和团结辗转奋战了二十个春秋，直到上星期还牢牢地掌握着治理权力，但在临行时刻，人们甚至不信他会走，使他耿耿于怀。唯一清醒地知道他确实将离去，并且知道他去向的是那个英国外交官，他在给政府的正式报告中写道：“他的时间所剩无几，连到坟墓都很勉强。”

即使对于不像将军那样身患重病的人来说，第一天的行程也极不愉快，因为出发的那个早晨，圣菲街道上隐隐约约的敌对气氛使人情绪低落。蒙蒙细雨中天刚破晓，街上只见到几头失群的母牛，但是空气中都能觉察到敌人们的仇恨。政府做了充分估计，吩咐送行的人走最偏僻的街道，将军仍然看到修道院墙上涂写的辱骂的标语。

何塞·帕拉西奥斯策马在将军身边行进，即使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身上的装束也一成不变：教士式的长大衣、插着黄晶别针的丝领结、山羊皮手套、锦缎坎肩口袋上交叉挂着两只一模一样的怀表的链条。他的马鞍镶有波托西的银饰，踢马刺是黄金打的，在安第斯山区的小村落里他曾不止一次被误认为是总统。然而他对将军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排除了一切混淆。他十分了解、爱戴将军，如今眼看将军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城市而感到痛心；换了以前，光是听到将军到达的消息就会举城若狂，热烈庆祝。三年前，将军在干旱的南方结束了战争，得到了任何当代或者历史上的美洲人从未有过的大量荣誉，胜利归来时，这个城市自发地举行了欢迎仪式，盛况空前。那些日子，老百姓在街上抓住他的马笼头，拦住他向他抱怨公共事业或者税收方面的问题，请求某些恩惠，或者仅仅想接近他的伟大光辉。他像对付国家大事那样重视群众的要求，对每个人的家庭生活、生意买卖和民间疾苦了解的深刻程度使人吃惊，同他说过话的人仿佛在片刻间分享到权力带来的快感。

谁都不会相信他就是当年的那个人，圣菲就是当年他像逃亡者那样偷偷离去、不再回来的那座沉寂的城市。僵化的小街两旁是一模一样的褐色屋顶的房子，僻静的园子里花香扑鼻，居民们过着宁谧的日子，他们矫揉造作的举止和拉迪诺方言掩饰的东西多于表露，将军置

身此地觉得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陌生。当初他还没有到过这个雾气迷蒙、寒风袭人的城市，就选中它作为建立他的光荣事业的基地，因为他对它的偏爱超过任何别的城市，在他的理想中它是他生命的中心和寄托，也是半个世界的首都，现在这一切仿佛成了对他空想的嘲弄。

在结算总账的时刻，对将军的威信扫地最感到意外的是他本人。昨天下午，一伙愤怒的暴民处决了将军的模拟像，政府沿路设了关卡，即使最不危险的地点也派兵把守，防止暴民阻拦，可是一路上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呼喊声：“独—夫！”唯一对将军表示同情的是一个妓女，她在将军经过时说：

“上帝保佑你，幽灵。”

大家装着没听见。将军阴郁地陷入沉思，对周围不闻不问，只顾赶路，来到了壮丽的大草原。在铺石公路开始的十字路口，曼努埃拉·萨恩斯单骑等候着将军一行，远远地挥手做最后的告别。将军也挥手回应，继续赶路。他们两人以后再没有见面。

不久后，小雨停息，天空一片亮蓝色，在剩下的路途中一直可以望见地平线上两座积雪的火山。但这次将军没有流露出他对大自然的激情，对他们一路小跑经过的村落和朝他们挥手招呼的陌生人都不予理会。陪伴他的人觉得最不寻常的是将军对草原上一群群放牧的骏马不加一顾，而他多次说过草原上的马群是他最爱看的景象。

他们在法卡塔蒂瓦镇上度过第一夜，将军和自发伴送他的人告别，带了随从继续上路。随从共五人。除了何塞·帕拉西奥斯以外，还有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战时受伤截除了右臂；爱尔兰副官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上校，是参加过几乎所有欧洲战争的老将

军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儿子；有中尉军衔的副官和书记员费尔南多，他的父亲是将军的哥哥，在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时期死于海难；将军的亲戚和副官安德烈斯·伊巴拉上尉，两年前的九月二十五日将军遭到袭击时，他右臂挨了一刀落了残废；第五个是独立战争中久经考验的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卫队是从委内瑞拉军队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名最骁勇的轻骑兵和投弹手。

何塞·帕拉西奥斯还特地带上在上秘鲁战争中缴获的两条狗。那两条狗漂亮勇敢，圣菲时期在政府大楼守夜，将军遭暗算的那个晚上它们另外两个伙伴被刀捅死。从利马到基多，基多到圣菲，圣菲到加拉加斯，以及回基多和瓜亚基尔的无休无止的旅途中，两条狗始终随着马队前后奔跑，照看驮运的行李。这次从圣菲到卡塔赫纳的路上，它们仍然如此，不过这次行李不多，士兵也可以照看。

将军在法卡塔蒂瓦起身时情绪不佳，但沿着山峦起伏的一条小道下到平原后，气候逐渐温和，阳光也不那么强烈，他的情绪随之好转。随从人员怕他过于劳累，几次请他稍事休息，他却主张不吃午饭，一口气赶到暖和的地带。他常说在马背上有利于思考，行军时他常常日夜不停地骑马，只不过勤换坐骑，以免累垮牲口。他的腿像老骑手那样成罗圈形，走路的姿势像是睡觉也不脱掉马刺的人，肛门周围长了老茧，和理发师的磨刀皮带一般厚，因而得了“铁屁股”的光荣称号。独立战争以来，他骑马跑了一万八千多里[1]，比绕地球两周还多。谁都不怀疑他能在马背上睡觉的传说。

中午过后，峡谷里升起的热气已很明显，他们在一个修道院的回廊里歇歇脚。院长亲自出来接待，一群新入教的本地修女分发刚出炉的玉米面包和快发酵的玉米糙子熬的粥。修道院长见了汗水淋漓、衣着杂乱无章的先头部队，或许因为威尔逊上校年轻漂亮，头发金黄，军服上的绶带比较多，便把他当成级别最高的军官，只顾招呼他一个人，富于女人味儿的恭顺引起了不少调侃。

何塞·帕拉西奥斯乐得将错就错，利用这一机会让将军在修道院的木棉树荫下休息，用羊毛毯裹住他，发汗退烧。他没有进食，也没有入睡，只是迷迷糊糊地听着小修女们在一个年长修女竖琴的伴奏下唱一些不伦不类的情歌。最后，一个小修女端着一顶帽子在回廊里挨个替修道院募捐。弹竖琴的修女在她经过时嘱咐说："别问那个生病的要。"小修女不听，还是走到将军面前。将军看都不看她，苦笑着说："我自己现在也要靠人施舍呢，小妹妹。"威尔逊把自己的一个钱包全给了她，慷慨的程度引起将军善意的取笑："你现在看到光荣的代价了吧，上校。"威尔逊后来说，修道院和以后的路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美洲几个新建共和国的最著名的人物，使他惊讶不已。对于将军本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奇怪的教训。

"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他说。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离瓜杜阿斯镇不远的一个由旧烟厂改建的客栈过夜，瓜杜阿斯为将军准备了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聚会，但将军不愿参加，去受那份活罪。客栈的房子大而无当，阴森森的，周围的植物狰狞可怖，湍急的黑水河向温暖地带的香蕉园倾泻，发出摧枯拉朽的轰响，引起一种奇特的忧伤感。将军熟悉这一带，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就说："假如我布置伏击，我就选这个地点。"以后有好几次他尽量避开走这条路，因为这里使他联想到去基多路上一个险恶的关隘贝

鲁埃科斯，即使最大胆的旅人也竭力避而远之。还有一次，他不顾大家的意见，在两里路以外就扎营歇夜，因为他认为这种凄伤的景色难以忍受。但是这次尽管疲劳发烧，他却觉得这个地方比瓜杜阿斯不幸的朋友们为他准备的带有哀悼意味的盛宴更易于忍受。

客栈老板见他那副狼狈相，建议请附近教区的一个印第安人，据说此人只要闻闻病人衬衣的汗味就能治病，不管离得多远，有没有见到病人。将军取笑客栈老板的轻信，禁止他手下的人同那印第安人打交道。他一向不相信医生，常说医生的买卖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当然更不能指望他把命交给一个教区的巫师。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对医学的蔑视，他不睡在适合他身体状况的卧室里，吩咐把吊床挂在面对峡谷的阳台上，露宿过夜。

除了清晨的那杯煎剂外，他整天没有进食，但出于礼貌，还是同军官们一起坐在饭桌旁。尽管他比谁都更适应艰苦的军旅生活，在吃喝方面和苦行僧相差无几，但他像高雅的欧洲人一样，喜爱并了解酒类和烹饪，第一次旅欧回来之后，他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在餐桌上谈论烹饪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尝了一点炖鹿肉，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想证实客栈主人的介绍和军官的评价：发磷光的鹿肉有股茉莉香气。旅途中他没精打采，很少开口，晚饭时也只说了两句话，但是他在身处逆境、健康情况又很糟的时候仍彬彬有礼地努力使气氛愉快一些，大家都很领情。他再也不谈政治，也不提星期六的事件，他是一个感情受了伤害，多年后仍怨气十足、耿耿于怀的人。

大伙还没有吃完，他道了歉先离开饭桌，穿好睡衣，戴上睡帽，打着寒战，倒在吊床上。夜晚很凉爽，山峦间升起一轮橙黄色的大月亮，但他没有兴致赏玩。待在阳台附近的护卫士兵开始合唱流行的民

歌。他以前做过一个规定，卫队要像尤利乌斯·恺撒的军团那样，在他寝处附近扎营，将军从他们夜间谈天中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他晚上失眠时常常逛到野营宿舍，不止一次同士兵们唱到天亮，歌词是在聚会的热烈气氛下即兴编出来的赞颂或者戏谑。可是那晚的歌声使他心烦，他便吩咐他们住声。河水在岩石间激起的喧闹由于他发烧而显得更响，吵得他简直要发狂。

“婊子养的！”他嚷道，“哪怕能让它停一分钟也好！”

但是不：他无力阻止河水的奔流。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替他在箱里找些药，让他吃了平静一些，然而他拒绝了。帕拉西奥斯首次听到他以后一再重复的话：“我由于吃错了一帖催吐剂丢了权力，现在可不愿意再丢了性命。”几年前，一个医生用含砷的汤药治他的间日热，害得他腹泻不止、几乎送命，他说过类似的话。此后他只接受泻丸，每周数次，治他的顽固性便秘，更严重时就用山扁豆灌肠剂。

午夜过后，何塞·帕拉西奥斯被将军的谵妄搞得疲惫不堪，躺在光砖地上就睡着了。醒来时，一看将军不在吊床上，汗水湿透的睡衣脱在地上。这种情况并不稀罕。将军有个习惯，遇到失眠而屋里又没有别人时，就下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直到天亮。可是那晚叫人担心，因为白天情况已经不好，晚上又凉又潮，露天散步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拿起一条毯子在月光如水的屋子里找他，发现他躺在走廊靠墙的石凳上，仿佛一具安放在棺材上的石像。将军转过身，目光炯炯有神，丝毫没有发过烧的迹象。

“又跟圣胡安·德帕亚拉那个晚上一样，”他说，“可惜的是没有雷娜·玛丽亚·路易莎。”

何塞·帕拉西奥斯很熟悉那段往事。将军指的是一八二〇年一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时他率领了两千名士兵来到委内瑞拉阿普雷高山平原一个荒凉的地方。那时他已经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了十八个省份，把以前由新格拉纳达总督管辖的地区、委内瑞拉特别自治区和基多共和国合并建立了哥伦比亚共和国，自己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的最终目的是把战争引向南方，实现他创立一个疆土从墨西哥延伸到智利合恩角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统一国家的愿望。

但是那晚他面临的军事形势对他的梦想并不有利。行军途中，牲口突然传开一场瘟疫，倒毙的马匹在草原上留下一溜十四里长的恶臭的尸体。不少军官灰心丧气，不听指挥，从掳掠中寻求安慰，有的甚至对将军要枪毙违纪军人的威胁加以嘲笑。两千名士兵光着脚，衣衫褴褛，没有武器，没有粮食，没有御寒的毯子，对战争感到厌倦，不少人病倒，开始大批大批地开小差逃跑。将军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便下令每抓到一个逃兵就给巡逻队十比索奖赏，逃兵不问原因一律处决。

生活使他有理由相信他的厄运并未完结。两年前，他打了败仗，带领残部退到奥里诺科河边的丛林里，下令宰马充饥，以免士兵们吃人肉。根据当时英国军团一个军官的证言，将军一副落魄潦倒的模样，像是个游击队员。他头戴俄罗斯龙骑兵的盔帽，脚穿马夫的草鞋，身上是一件缀有红穗饰、金纽扣的蓝色军服，长矛上挂着一面有骷髅和交叉腿骨的海盗黑旗，上面还有血书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

在圣胡安·德帕亚拉的那个晚上，他的装束不那么落魄，情况却不乐观。那不但反映了他部队的暂时处境，也反映了解放军的整个悲剧：遭到惨败后多次东山再起，但已成强弩之末，在众多胜利的负担

下快给压垮了。而西班牙的堂巴勃罗·莫里略将军拥有制伏爱国者和重建殖民秩序的手段，仍旧控制着委内瑞拉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山里壮大势力。

面临这种形势，将军晚上失眠，光着身子在庄园老宅月光明亮的空旷房间里踱来踱去。前一天病死的马匹大多已在离住处很远的地方焚化，可是腐臭的气味仍难以忍受。经过上周的九死一生，士兵们没有兴致再唱歌了，将军本人看到饿得浑身无力、在打瞌睡的哨兵也不忍干涉。突然间，他在面对蓝色平原的走廊尽头发现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坐在台阶上：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妙龄少女，轮廓仿佛是雕像，全身连脚都裹在一条绣花的大披肩里，正抽着一支大雪茄烟。她见了将军大吃一惊，把食指和大拇指交叉成十字架对着他。

“你是天使还是魔鬼，”她说，“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他说。

将军笑了，月光下闪闪发亮的牙齿使她以后久久不能忘怀。他使出全身气力抱住她不让她动弹，不停地吻她的额头、眼睛、面颊和脖子，终于使她屈服。他解开披肩，倒抽了一口气。她也是一丝不挂，因为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的祖母不让她晚上起来抽烟，把她的衣服全脱光，却不知道她清晨裹了一条披肩偷偷地溜了出来。将军把她抱到吊床上，一直吻她，不给她喘息的机会，她的顺从不是出于情欲，而是由于恐惧。她还是个处女。事毕后，她定下神时才说：

“我是个奴隶，老爷。”

“你现在不是了，”他说，“爱情已经给了你自由。”

早晨，他从羞涩的钱囊中取出一百比索给庄园主人为她赎身，无条件地解放了她。出发之前，他忍不住要当众给她出个难题。当时他在房子的后院，同一群胡乱找了一些没有染上瘟疫的驮马充当坐骑的军官在一起。前一晚，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少将率领一支队伍来到，现在已集合好准备同他们告别。

将军做了简短的告别演讲，把严峻的形势说得缓和一些，他正要动身时见到了刚获得自由的、破了身的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她洗了澡，穿着浆洗干净的奴隶们的花边衬裙和小衬衫，一身莹白，在平原的阳光下显得美丽而容光焕发。他愉快地问她：

“你打算留下来，还是跟我们一起走？”

她妩媚地一笑回答说：

“我留下来，老爷。”

这个回答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大笑。庄园的主人是一开始就支持独立战争的西班牙人，也是将军的老相识，笑得前仰后合，把装着一百比索的皮口袋抛给将军。他在空中接住。

“留给独立事业吧，阁下，”庄园主说，“不管怎么样，那姑娘是自由人了。”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花衬衣，同他那副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表情很相配，他笑得特别高兴。

“您瞧，将军，”他说，“我们身为解放者，当然会遇到这种事情。”

将军点点头，然后朝周围一挥手向大家告别。最后情意绵绵地对雷娜·玛丽亚·路易莎说了再见，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据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忆，以后每逢月圆之夜，将军总是说那晚的情景历历在目，但遗憾的是再没有雷娜·玛丽亚·路易莎奇迹般的出现。那些夜晚总是将军遭到挫折的时候。

早上五点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将军端来煎剂时，见他睁着眼躺在吊床上。他猛地想起身，几乎摔倒，由于使劲太大，引起一阵剧咳。他坐在吊床上，双手捧着头，直到咳嗽停息。然后他开始喝那滚烫的煎剂，刚喝第一口，情绪马上好转。

“我整夜都梦见卡桑德罗。”他说。

他私下里用卡桑德罗这个名字称呼新格拉纳达的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桑坦德是他以前的好朋友，也是他一辈子的死对头，战争开始后担任将军的参谋长，在解放基多和秘鲁以及建立玻利维亚的艰苦岁月中担任哥伦比亚临时总统。由于历史的迫切需要，而不是由于志趣，他成了一个干练勇敢的军人，残酷得有点出奇，但使他保持荣誉的是他在民政方面的长处和高度的学术修养。对独立事业的贡献，他无疑数得上第二；在共和国的法制建设方面，他却首屈一指，他的循规蹈矩和保守精神给了共和国不可磨灭的影响。

将军屡屡想辞职，有一次对桑坦德说他可以放心离开总统职位，因为“我把它留给你，你是另一个我，甚至比我更出色”。出于理智或现实的考虑，将军对桑坦德的信任超过其他任何人。将军给了他“法治典范”的称号。然而赢得这些荣誉的桑坦德两年前由于被指控与加害将军的阴谋有牵连，虽然查无实据，已被放逐到巴黎。

情况是这样的：一八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午夜，十二个平民和二十六个军人冲进圣菲的政府大楼，杀掉总统四条猎犬中的两条，伤了好几名哨兵，用佩刀严重砍伤安德烈斯·伊巴拉上尉的一条胳臂，一枪打死了苏格兰籍上校威廉·弗格逊，弗格逊是英国军团的成员和总统的副官，曾被总统夸奖像恺撒那么勇敢。暴徒们高呼自由万岁、打倒暴君的口号闯到楼上总统的寝室。

暴徒们的借口是三个月前将军为了抹杀桑坦德派在奥卡尼亚国民议会上的胜利，行使了带有明显的独裁性质的特别权力。桑坦德担任六年之久的共和国副总统职位被取消。桑坦德以他特有的风格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我很荣幸地被埋在一八二一年宪法的废墟之下。”当时他三十六岁。他被任命为驻华盛顿的全权公使，但几度推迟赴任行期，也许是等待阴谋的成功。

将军和曼努埃拉·萨恩斯那晚刚开始言归于好。他们在离圣菲两里半路的索阿恰镇上度周末，经过一场比往常激烈的争吵后，分乘两辆马车回来，争吵的起因是大家都在谈论暗害将军的密谋，他却不信，对别人的通风报信置之不理。他在圣卡洛斯宫给对街的曼努埃拉住所捎去几次口信，曼努埃拉就是不来，到了晚上九点钟，接连三次紧急口信，她才穿上防水套鞋，头上包了一条大围巾，在滂沱大雨中过街。她发现何塞·帕拉西奥斯不在屋里，将军一人仰面躺在浴缸的草药香汤里，假如不是常见他那副出神冥思的模样，还会以为他已经死了。将军从脚步声辨出了她，没睁眼睛说：

“快发生叛乱了。”

她没好气地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那敢情好。也许会有十次之多，因为你太重视他人的警告了。”

“我只相信征兆。”他说。

他的参谋长把当晚的口令告诉了阴谋分子，让他们混过政府大楼的警卫，但对将军保证说阴谋已经挫败，将军信以为真，所以有兴致开玩笑。他高高兴兴从浴缸里起来。

“放心吧，”他说，“看来那些浑蛋已经吓破胆啦。”

他光着身体，她宽衣解带，两人刚开始在床上调笑，就听到了最初的喊声、枪声和叛乱分子朝军营开炮的轰响。曼努埃拉赶快帮将军穿上衣服，把自己的套鞋给了他，因为将军唯一的一双靴子送去擦油了，再递给他一把马刀和一支手枪，帮他从阳台逃出去，来不及找防雨工具了。他到了街上，看到一个人影走近，便举着扳起击铁的手枪喝道：“是谁？”是将军的点心师，他听说将军已遭杀害，悲痛地正要回家。点心师决心和将军共生死，陪着他躲在圣阿古斯丁河卡门桥下的荆棘丛里，直到忠于将军的部队平息叛乱。

曼努埃拉·萨恩斯在紧急关头表现了一贯的勇敢和机智，开门放进了暴徒。他们问她总统在哪里，她说在会议厅。他们问她晚上这么冷为什么开着阳台门，她说街上乱哄哄的，打开门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问她床铺为什么有热气，她说她没脱衣服躺在床上等总统。她一面不慌不忙地回答，拖延时间，一面猛抽车夫们抽的最次的雪茄，大口大口地喷烟，掩盖屋子里残存的古龙水的气味。

由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牵头的军事法庭认定桑坦德将军是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判了他死刑。他的敌人们说他死有余辜，不仅因为他

对暗害阴谋应负责任，而且因为他厚颜无耻，居然第一个出现在广场上和将军拥抱，祝贺将军死里逃生。将军在细雨中骑着马，上衣撕破湿透，士兵和郊区赶来的老百姓夹道欢迎，高呼要处死暗杀者。“所有的同谋或轻或重都将受到惩处，”将军写信给苏克雷元帅说，“桑坦德是主犯，但也是最幸运的，因为我的宽厚保护了他。”将军确实行使了他的独断权力，把死刑减为放逐到巴黎。然而因卡塔赫纳的一次未遂军变被关押在圣菲的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没有充分证据定罪却被处决。

何塞·帕拉西奥斯不知将军梦见桑坦德到底是真是假。有一次在瓜亚基尔，将军说梦中见到桑坦德把一本书摊在他滚圆的大肚子上，不是翻着书页阅读，而是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像山羊啃草似的咔嚓咔嚓吃得津津有味。另一次在库库塔，梦见桑坦德身上爬满了蟑螂。还有一次，他在圣菲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大叫大嚷地醒来，说是梦见同桑坦德将军两人一起吃饭，桑坦德嫌眼睛碍事，把眼珠抠出来放在桌上。如今他们在离瓜杜阿斯不远的地方，将军一大早说又梦见了桑坦德，何塞·帕拉西奥斯根本不问他梦中情景，只是用现实来安慰将军。

“他同我们隔着一个海呢。”帕拉西奥斯说。

但将军立即目光炯炯地止住了他。

“现在已不是这样了，”他说，“我敢担保，华金·莫斯克拉那个笨蛋准会让他回来。”

自从上次回国以后，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永远放弃权力对他来说仿佛是个颜面问题。“我宁愿流放或者死掉，不愿把我的光荣交

给圣巴托洛梅学院的那些家伙。”他曾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过。但是解毒剂本身就含有毒素，随着最后决定的日益临近，他越来越肯定只要他一走，准会召回流放的桑坦德将军—那个讼师窝里最出色的毕业生。

“那个家伙确实是个老狐狸。”将军说。

他的热度全退了，自我感觉良好，向何塞·帕拉西奥斯要了纸笔，戴上眼镜，亲手写一封六行的信给曼努埃拉·萨恩斯。他冲动的性格何塞·帕拉西奥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一回却叫他摸不着头脑，只能解释为难以克制的征兆或者突发的灵感。上星期五将军下决心说以后再也不写信了；平常想起要处理未复的信件，口授公告，或者把他失眠时杂乱无章的念头理出一个头绪时，不论几点钟，他总是把书记员叫起来，而现在的做法同他的决心和习惯相矛盾。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那封信显然并不紧急，无非是在他临别嘱咐之外加一句隐晦的话：“你行事要谨慎，不然会害你自己也害我们两个人。”信中的口气大大咧咧，似乎不假思索，最后，将军手里拿着信，出神地在吊床上晃悠。

“伟大的权力存在于爱情不可抗拒的力量中，”他突然叹息说，“这句话是谁说的？”

“没人说过。”何塞·帕拉西奥斯答道。

何塞·帕拉西奥斯不识字，也不愿意学习，简单的理由是他的智力不比毛驴高多少。可是他有个特点，偶然听到一句话都能牢记不忘，将军问的那句话却毫无印象。

“那就是我说的，”将军说，“不过也许是苏克雷元帅说的。”

将军心烦意乱的时候，谁都不如费尔南多得心应手。将军众多的书记员中间，费尔南多虽然不聪敏过人，但最乐于效劳，最有耐心，不论工作时间多么别扭，将军失眠之后脾气多么暴躁，他都毫无怨言。将军会随时把他叫醒，让他朗读一本枯燥乏味的书，或者记下临时想到的紧急事情，第二天却给扔进了废纸篓。将军无数的做爱之夜并没有留下子女（尽管据说他能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他哥哥死后，费尔南多便由他监护。将军大力推荐他去乔治敦的军事学院，该院的拉斐特将军对他的叔父十分钦佩尊敬。后来又上了查洛特维尔的杰弗逊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费尔南多也许不是将军理想的继承者，因为学院的一套使他厌烦，而他更喜欢户外生活，搞些园艺。学业一结束，将军把他召到圣菲，立刻发现了他作为书记员的才能，不仅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英语说写流利，而且因为他有别出心裁的写作技巧，能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高声朗诵时能即兴编出大胆的插曲，把一些沉闷的段落念得有声有色。像将军手下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样，费尔南多也有倒霉的时候，有一次他把雅典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一句话说成是出自罗马演讲家西塞罗之口，他的叔父在一篇讲话中以讹传讹。由于亲戚关系，将军对他的要求比对谁都更严格，不过在惩罚结束之前就原谅了他。

省长华金·波萨达·古铁埃雷斯提前两天出发，沿途通知 将军一行可能歇夜的地点，让地方当局知道将军病情严重。但人们传说省长散播的坏消息和将军出国之事无非是政治花招，星期一下午见到将军到达瓜杜阿斯的人都认为此言不虚。

将军再次表明他是不会垮的。他在欢呼、鞭炮和压过音乐的教堂钟声中从大街进镇，敞开前襟，头上扎着一条吉卜赛人的汗巾，挥动帽子向人们致意，胯下的骡子跑得很欢，冲淡了队伍的庄严气氛。镇

上唯一紧闭窗户的房屋是修女学校，当天下午就传说学校禁止修女们上街欢迎，不过将军劝那些向他提这件事的人别相信修道院的流言蜚语。

前一晚，何塞·帕拉西奥斯把将军发烧汗湿的衬衫送去洗涤。勤务兵把它交给河边的士兵，让他们清晨时在河里洗一下，但临行时谁都不知道衬衫的下落。在去瓜杜阿斯的路上和欢迎期间，何塞·帕拉西奥斯查明是客栈主人拿走了那件没有洗过的衣服让印第安巫师显示他的法力。将军回来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向他汇报了客栈主人的胡作非为，并且告诉他除了身上穿的那件之外，没有别的衬衫了。将军无可奈何地说：

“迷信比爱情更不可救药。”

“奇怪的是从昨晚开始咱们不再发烧了，”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也许那个巫医真有点本领？”

他没有立即回答，在吊床上摇晃着沉思冥想。“我头也没有再痛过，嘴里也不发苦，也没有晕眩的感觉。”最后他在膝盖上拍一巴掌，果断地站起来。

“你别再给我头脑里添乱啦。”他说。

两个仆人把一大锅煮着芳香药草的开水抬进卧室，何塞·帕拉西奥斯替将军准备好晚间的洗澡水，心想将军白天赶路劳累，很快就要上床睡觉。但将军口授了一封给加夫列尔·卡马乔的信，水凉了还没有洗。卡马乔是将军侄女巴伦蒂娜·帕拉西奥斯的丈夫，也是将军在加拉加斯的代理人，负责出售将军从兄长那里继承的阿罗阿铜矿。将军似乎对自己的去向还不清楚，一会儿说等卡马乔的事办完后他就去

库拉索岛，一会儿又请卡马乔写信到伦敦由罗伯特·威尔逊爵士转交，同时寄一个副本给牙买加的麦克斯威尔·希斯洛普先生，即使一封遗失，还有一封可以收到。

在许多人，尤其是将军的秘书和书记员看来，阿罗阿铜矿只是他发高烧时的呓语。他一向不大注意那项产业，也没有委托专人管理。如今他穷途末路，钱不够用了，方才想起那个矿，可是由于产权不清，不能卖给一家英国公司。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葛就此开始，在他去世后两年才解决。在连绵的战事、政治争吵和个人钩心斗角期间，将军每提到“我的诉讼”时，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除了阿罗阿铜矿之外，他没有别的财产官司。他在瓜杜阿斯口授给堂加夫列尔·卡马乔的信，给了他侄子费尔南多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在诉讼解决之前他不会去欧洲。费尔南多同别的军官玩纸牌时谈起此事。

“那么说我们一辈子都去不成了，”威尔逊上校说，“我父亲甚至怀疑那个矿是否存在。”

“你没有见到矿，不能说矿就不存在。”安德烈斯·伊巴拉上尉反驳说。

“确实存在，”卡雷尼奥将军说，“在委内瑞拉省。”

威尔逊不高兴地说：

“那我对委内瑞拉是否存在也发生怀疑了。”

威尔逊无法掩饰他的不快。他认为将军对他并无好感，只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才把他留在侍从队，他父亲在英国议会中为美洲解放竭力辩护，将军特别感激。以前一个法国副官搬弄是非，说将军说过：

“威尔逊还得在困难、逆境和艰苦的学校里锻炼锻炼。”威尔逊上校没有机会核实将军是否说过这种话，不过总认为光凭他参加过的一次战役，他早就从这三个学校毕业了。他二十六岁，八年前在西敏寺和桑德赫斯特结束学习后，老威尔逊派他追随将军。胡宁之役，威尔逊是将军的副官，从楚基萨卡骑骡赶了三百六十里山路，把玻利维亚宪法草案送到拉巴斯的就是他。临行前，将军嘱咐他最迟要在二十一天内赶到拉巴斯。威尔逊立正说：“我保证二十天内赶到，阁下。”事实上他十九天就到了。

他决定随将军一起回欧洲，但越来越相信将军总会找出一个新的理由推延行期。两年多以前，阿罗阿铜矿就已不足以成为借口，现在又旧事重提，真让威尔逊泄气。

口授完那封信之后，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洗澡水重新烧热，但将军仍不洗澡，继续踱来踱去，背诵那首小女孩的诗，声音之响整个屋子里都能听到。接着又背诵他自己写的、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熟悉的诗。他几次经过回廊，军官们在回廊里玩一种当地叫作“脱袍”的西班牙加利西亚的牌戏，他自己以前也玩过。他在每个人背后看一会儿，对牌局的形势发表几句评论，然后继续踱步。

“这种玩法太没有意思了，简直是浪费时间。”他说。

但是他再转回来时，忍不住要伊巴拉上尉起来，让他玩几盘。他牌品不好，斤斤计较，一输就沉不住气，不过反应很快，出牌也狡猾，足以同他手下的军官们一争短长。这次他同卡雷尼奥将军搭档，玩了六盘，全输了。他把牌往桌上一扔。

“这种玩法太差劲，”他说，“谁敢玩三人牌戏？”

三个人入局了。将军连赢三盘，情绪好了一些，开始取笑威尔逊玩这种牌并不高明。威尔逊也不争辩，只是趁他兴奋的时候钻了空子，不再输了。将军紧张起来，抿紧苍白的嘴唇，蓬乱眉毛底下深陷的眼睛露出往时凶狠的神情。他不再说话，一阵剧咳使他思想不能集中。十二点敲过，他叫暂停。

“整个晚上都有股贼风。”他说。

他们把桌子挪到一个避风的地点，但他还是输。附近一个聚会已经结束，但仍有人在吹高音笛，将军派人吩咐他们别吹了，笛声和蟋蟀的鸣叫还是喧闹。他换了座位，椅子上垫一个枕头，坐得高些、舒服些，他喝了一杯椴树花煎剂减轻咳嗽，拿着牌从回廊一头走到另一头，手气依然不好。威尔逊充血的蓝眼睛直盯着他，他看都不看。

“这副牌做了记号。”他说。

“这是您的牌。”威尔逊说。

确实是他的牌，他逐张检查，最后换了一副新牌。威尔逊没给他喘息的机会。蟋蟀鸣声停息了，只有一阵潮湿的微风把热烘烘的盆地气息带进回廊，这时鸡啼了三遍。“这只鸡疯了，”伊巴拉说，“现在刚过两点钟。”将军眼睛盯着手里的牌，粗声粗气地命令说：

“谁都不准离开，妈的！”

大家不作声。卡雷尼奥将军玩得兴趣索然，只有干着急；他想起他一生中最长的一夜，那是两年前在布卡拉曼加等待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结果的那个夜晚。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玩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最后牌友们商量好让将军连赢三盘才完事。卡雷尼奥担心那场戏

在瓜杜阿斯重演，朝威尔逊上校使个眼色要他故意输。威尔逊不理他。后来威尔逊要求暂停五分钟去方便方便，卡雷尼奥跟着他穿过阳台，看到他朝种着天竺葵的花盆撒尿，宣泄怨气。

“威尔逊上校，”卡雷尼奥将军下令说，“立正！”

威尔逊头也不回说：

“等我尿完。”

他不慌不忙撒完尿，转过身把裤子扣好。

“你得开始输，”卡雷尼奥将军吩咐他，“就算是对一个遭到不幸的朋友的照顾吧。”

“我对谁都不愿意干这种带侮辱性的事情。”威尔逊的回答带有讽刺口气。

“这是命令！”卡雷尼奥说。

威尔逊保持立正的姿势，轻蔑地瞅着他。回到牌桌之后，他果真开始输了。将军有所觉察。

“我亲爱的威尔逊，不必打得这么臭，”他说，“不过我们大家也该睡觉了。”

他离开牌桌时像往常一样同大家紧紧握手，表示玩牌并没有伤感情，然后回到自己的寝室。何塞·帕拉西奥斯躺在地下已经睡着了，不过将军进屋时，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将军匆匆脱掉衣服，光着身子

往吊床上一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呼吸也越来越粗。他躺进浴缸时，浑身索索发抖，但不是因为发烧或者发冷，而是因为生气。

“威尔逊太狡猾了。”他说。

那晚是他身体情况最糟糕的夜晚之一。何塞·帕拉西奥斯不顾他的禁止，通知了军官们，必要时去请医生，同时用被单裹住他的身体，让他发汗。他换了好几条湿透的被单，间歇稍有好转，随即又陷入幻听幻视的危象。他几次大喊：“叫那些人别吹笛子啦，妈的！”但谁也无能为力，因为午夜以后笛声就停息了。后来他又找到了害他生病的罪魁祸首。

“我本来好好的，”他说，“全怪那个闻衬衫治病的印第安浑蛋。”

到翁达的最后一程是令人提心吊胆的山路，空气稀薄，将军折腾了一夜，全凭坚强的体魄和毅力才顶住。一开始上路，他就从惯常的位置退下来，和威尔逊上校并辔而行。威尔逊明白将军的意思是要他忘掉牌桌上的不快，便像饲养猎鹰的人那样伸出前臂让将军扶着。两人就这样下坡，威尔逊上校受宠若惊，将军使出最后的气力，呼吸急促，但马上功夫一点也不含糊。最陡峭的一段路走完之后，将军的声音恍同隔世，问道：

“伦敦怎么样啦？”

威尔逊上校望了望几乎升到天顶的太阳，回说：

“不好，将军。”

他并不感到奇怪，用同样的声音又问：

“那是为什么？”

“因为伦敦现在是下午六点钟，一天当中最坏的时候，”威尔逊说，“此外，现在多半在下雨，又脏又黏糊，像池塘里的水，我们那里春天最差劲。”

“莫非您已经克服了怀乡病？”他说。

“恰好相反：是怀乡病压倒了我，”威尔逊说，“我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了。”

“那您到底想不想回去？”

“我不知道，将军，”威尔逊说，“我身不由己。”

他盯着威尔逊的眼睛，诧异地说：

“身不由己的是我。”

他再开口说话时，声音和情绪都变了。“别担心，”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去欧洲，至少好让您父亲再见到您，高兴高兴。”他沉吟了好久，又说：

“亲爱的威尔逊，最后请允许我讲一件事：说您什么都行，可是狡猾同您沾不上边。”

威尔逊上校已经习惯于将军玩牌争吵或者打了胜仗之后的赔礼，不过再一次被将军软化了。美洲最光荣的病人发烫的手像驯鹰似的抓着威尔逊的前臂，继续缓缓行进，这时空气仿佛开始沸腾，一些啄食

尸体的禽鸟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他们不得不像赶苍蝇似的哄赶那些鸟。

在最崎岖的下坡路上，他们遇到了一群印第安人，他们背负的椅子上坐着一批欧洲旅客。快到平地的时候，一个骑手突然风风火火地从后面超过他们。那人戴着红色的尖顶帽，几乎把脸遮没，扬鞭催马，差点没把伊巴拉上尉的骡子惊得滚下坡去。将军朝那骑手喝道：“你瞧着点，浑蛋！”将军一直盯着，直到骑手在第一个拐角消失，但是当他在山下每个转弯处重新出现时，将军仍旧恨恨地望着。

下午两点钟，他们登上最后一座小山，一片闪烁的平原展现在他们眼前，远处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翁达城，一条卡斯蒂利亚式的石桥横在泥泞的大河上，毁于一次地震的城墙和教堂钟楼破败不堪，死气沉沉。将军凝视着山谷，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恨恨地眺望那个戴红帽的骑手，此时他已飞快地过了石桥。将军又突发奇想。

“慈悲的上帝，”他说，“他这么死赶活赶，唯一的解释是给卡桑德罗送信，通知他说我们已经走了。”

---

[1]此处是西班牙里，1里合5572.7米。下文同。

尽管事先已经通知将军抵达时不要组织群众欢迎，仍有一支光鲜的马队在港口迎接，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还准备了一支乐队和三天焰火。将军一行还没有到商业区，一场大雨就打乱了庆祝活动。这场雨下得比往年早，来势凶猛，把铺街石都翻起冲走，贫民区淹了水，气温却毫不减退。在乱哄哄的招呼声中，有人说了一句老掉牙的蠢话：“我们这里太热了，母鸡下的蛋都是熟的。”以后三天里，灾难性的天气没有任何改变。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山那面降下一片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随即下起瓢泼大雨。然后又是骄阳当空，和先前一样毒辣，市民组织的抢修队正清理街上的残砖断瓦，早晨的乌云又开始在山头汇合。不论白天黑夜，室内户外，似乎都可以听到吱吱发响的热气。

将军发着烧，几乎支撑不到官方的欢迎仪式结束。市府大厅里的空气热得要沸腾，他一反常规，坐在扶手椅上讲了话，措辞像主教那般谨小慎微，话说得很慢，很艰难。一个穿着有荷花边的连衣裙、肩后佩着天使翅膀的十岁小女孩背诵了一首赞扬将军光辉事迹的颂歌，急促得喘不过气。但她背错了，接着重背，前后颠倒乱了套，不知如何是好，一双小眼睛惊慌地盯着将军。将军像串通作弊似的朝她一笑，低声提示：

他宝剑的闪光
是他功勋的生动反映。

将军得势的最初几年，一有机会就举行盛大宴会，让客人们吃饱喝足，一醉方休。那个豪华时期使用的刻有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的专用餐具保存了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现在取出来给客人们用。在翁达

的欢迎宴会上，将军同意坐在首席，但只喝了一杯葡萄酒，尝了一口河龟汤，觉得反胃就不碰了。

他很早退席，回到波萨达·古铁埃雷斯上校家中为他准备的房间，但听说圣菲的邮班明天到来，本来不多的睡意顿时全部消失。他惶惶不安，三天没有想的烦恼重新涌上心头，拿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想知道自己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不由他执政的城市怎么样了，没有了他生活有什么变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顶半个世界的美洲简直发了狂。”在翁达的第一晚，他更相信这句话有道理。

将军睡觉一向不用蚊帐，这一晚蚊子的骚扰使他更烦躁不安。他一会儿起来在房间里转着圈子自言自语，一会儿躺在吊床上使劲晃荡，一会儿又裹着毯子捂得大汗淋漓，几乎是大叫大嚷地说胡话。何塞·帕拉西奥斯陪着他，回答他的问题，不用掏坎肩口袋里带链的一对怀表就能告诉他时间是几点几分。将军没有气力自己摇晃时，他就帮着推吊床，同时用一块布巾挥赶蚊子，终于让将军睡了一个多小时。破晓前，将军听到院子里有牲口和人的声息，一惊而起，穿着睡衣出去取信件。

随着马队同来的还有年轻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上尉，他是将军的墨西哥副官，由于最后一刻有些事要处理，滞留在圣菲。他捎来苏克雷元帅的信，信中为没有及时赶到送行深深表示遗憾。还有凯塞多代理总统两天前写的一封信。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拿了星期天的剪报进来，这时天还未大亮，将军眼神不济，请他代为念信。

圣菲的新闻是星期天人们都出城去牧场，许多父母和孩子带着盛放烤乳猪、熏猪肚、大米灌肠、浇上热奶酪的土豆，在动乱以来城里

还未见过的好阳光底下，坐在草地上野餐。五月难逢的好天气驱散了星期六的紧张气氛。圣巴托洛梅学院的学生们又上街搞模拟处决的闹剧，但那些老花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们闹得没趣，傍晚前就散了。星期天把猎枪换成六弦琴、在牧场取暖的人群弹唱班布卡乐曲，下午五点一场阵雨浇散了聚会。

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念到这里插嘴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玷污您的光荣。不管别人怎么说，到了天涯海角阁下仍旧是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我也不怀疑，”将军说，“我一离开，太阳就重新放光，单凭这一点就够了。”

信中唯一让他生气的是共和国代理总统竟然把桑坦德分子称为自由党，仿佛成了正式名称。“我不明白那些蛊惑家有什么权力自称为自由党，”他说，“他们见到什么就偷什么，连这个名称也要盗用。”他从吊床上跳下来，大踏步从屋子一头走到另一头，当着省长的面继续发泄心中的怒火。

“事实上除了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人之外，这里没有什么党派，您比谁都清楚，”他结尾说，“人们也许不信，可是我比谁都更是自由派。”

省长的一个私人使者后来传口信说曼努埃拉没有写信，因为信使得到明确指示，不准接受她的信件。口信是曼努埃拉亲自捎的，当天她就为这禁令向代理总统递交了一份抗议书，一系列的挑衅就从这件事开始，最终导致她的流放和销声匿迹。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很了解

他们之间的不幸爱情，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将军听了这个坏消息反而笑了。

“这些冲突倒符合我那可爱的疯子的性格。”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认为翁达的三天活动安排有欠考虑，很不高兴。最出乎意外的邀请是参观六里路外的圣安娜银矿，出乎意外的是将军接受了邀请，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下了矿井。尤其糟糕的是在回来的路上，将军虽然发烧，头痛欲裂，却下了河，在一个流水较缓的地点游泳。很久以前将军常同人打赌，捆住一条手臂他还能横渡平原湍急的河流，胜过水性最好的人。这次他游了一个半小时，并不吃力，不过见到他嶙峋的肋骨和害佝偻病似的腿脚，人们都不明白像他这样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怎么还能活着。

最后一晚，市政府为他举行盛大舞会，他道歉说由于参观累了，没有参加。下午五点起，他关在卧室里向费尔南多口授给多明戈·凯塞多将军的复信，并让费尔南多念几页利马的风流逸事，他本人还是某些轶事的主角。然后他洗了温水澡，一动不动地躺在吊床上听舞会上随风飘来的音乐。何塞·帕拉西奥斯以为他睡着了，忽然听到他问：

“你记得那支华尔兹吗？”

将军用口哨吹了几节旋律，试图唤醒总管的回忆，但他仍旧想不起来。“那是我们从楚基萨卡到利马的那晚演奏次数最多的曲子。”将军说。何塞·帕拉西奥斯记不得那支乐曲，但永远也忘不了一八二六年二月八日的夜晚。那天上午，利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将军每次祝酒时总是重复一句话：“在秘鲁辽阔的土地上，如今一个

西班牙殖民者都不剩了。”正是那一天，广大美洲的独立已成定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目的是把美洲变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最不平凡、最强盛的国家联盟。他喜庆兴奋的心情同那支华尔兹舞曲联系了起来，一再要求重新演奏，以便同参加招待会的利马每一位夫人都跳个遍。他手下的军官们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光鲜制服，尽体力所及照将军的榜样行事，他们都是跳舞的高手，给他们舞伴留下的印象远比战争的光荣深刻。

在翁达的最后一晚，庆祝晚会以胜利华尔兹开始，他在吊床上等乐曲重新演奏。等了很久都没有，他便一跃而起，穿着参观银矿的那身骑装，不等通报就出现在舞会上。他跳了将近三小时，每换一个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许是想在怀旧的灰烬中重建他往昔的荣耀。全世界望风披靡的那些虚幻的日子已是遥远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和最后一个舞伴一直跳到天明。跳舞是他压倒一切的爱好，没有舞伴时他一个人跳，没有音乐时他吹着口哨跳，为了表示极度高兴，有时还上餐桌跳。翁达的最后一晚，他体力不支，间歇时闻浸透古龙水的手帕提神，但他跳得那么起劲，舞技是那么富于青春活力，无意之中粉碎了他病得要死的传闻。

午夜过后不久，他回去时听说有位妇女在客厅里等他。那个女人漂亮高傲，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她穿着长袖的天鹅绒衣服，脚下是一双十分精致的熟山羊皮靴，头戴一顶有真丝面纱的中世纪妇女的帽子。将军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对她来访的方式和时间感到奇怪。她没开口，先把一个用长项链挂着的盒形胸饰举到他眼前，他惊讶地认了出来。

“米兰达·林赛！”他失声喊道。

“正是我，”她说，“尽管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她的嗓音像大提琴一样低沉热烈，稍稍带一点母语英语的口音，唤起了他难以重复的回忆。他挥手示意，让门口值勤的警卫退下，坐在她面前，挨得很近，两人的膝盖几乎接触，他拉着她的手。

十五年前，他第二次流放到金斯敦，偶然在美国商人麦克斯威尔·希斯洛普家里吃饭时，他们互相认识了。她是伦敦·林赛爵士的独女，伦敦·林赛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退休后在牙买加一家榨糖厂定居，在写一部六卷的谁也不看的回忆录。虽然米兰达长得绝色美丽，但年轻的流放者心情落寞，当时正沉溺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心中另有所爱，对别的女人并不注意。

在她的印象中，他比三十二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瘦削苍白，留的鬓角和胡子像黑白混血儿那般粗硬，头发长及肩头。像当地贵族青年一样，他一身英国式装束，白领巾，不适于当地气候的厚上衣，纽扣孔里插着一枝浪漫的栀子花。他这身打扮在一八一〇年某个放荡的夜晚，被一个风流的妓女误认为是伦敦妓院里的希腊男妓。

说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猛禽一般锐利的声音和滔滔不绝、令人疲惫的谈话。奇怪的是他目光低垂，不正眼看同桌的人，却能引起人们注意。他讲话带有加那利群岛的腔调和口音，马德里方言的文雅词语，出于对两位不懂西班牙语的客人的尊重，那天他还穿插着说一些简单但能听懂的英语。

吃午饭时，除了自己的幻觉之外，他对谁都不注意。他带着学者和演说家的风度讲个没完，说了许多未加修饰的预言式的话，其中不少后来出现在金斯敦一家报纸刊登的划时代的宣言里，也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牙买加宪章》。“使我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团结。”他说。谈到美洲的伟大、资源和人才时，他屡屡重复说：“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类。”林赛父女回家后，父亲问米兰达对这个把岛上的西班牙代理人搞得六神不安的阴谋家有什么看法，她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他自以为是个拿破仑·波拿巴。[1]”

几天后，他接到一封不寻常的信，信里详细地指示他星期六晚上九点单独步行到一个荒僻的地点去同她会面。那一挑战不仅把他的生命而且把美洲的命运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起义失败后，他是当时唯一的后备力量。经过五年多灾多难的独立战争，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和委内瑞拉特别自治区抵挡不住有绥靖者之称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的猛烈攻击，西班牙重新征服了那些地区。凡是识字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绞死，爱国者的指挥部已被消灭。

一代有文化的、美洲出生的白人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散播了独立的种子，其中数他信念最坚定，最不屈不挠，最有远见，并且把政治家的天才和军人的直觉最完美地加以结合。当时他租了一幢有两间屋的房子，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副官，两个已经解放但仍伺候他的小奴隶，还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晚上不带护卫，步行前赴一个不知底细的约会，不但是不必要的冒险，而且是历史性的不明智行为。但是尽管他重视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一个美丽女人的谜比什么都更吸引他。

米兰达只身骑着马在约好的地点等候，让他骑在自己背后走上一条隐蔽的小径。远处海上有闪电和雷声，像是要下雨。昏暗中，一群狗吠叫着在马蹄间窜前窜后，她用英语哄它们，让它们安分。他们在

榨糖厂附近经过，伦敦·林赛爵士就在那里写只有他自己看的回忆录，然后涉水渡过一条乱石小河，进入对岸的松树林，林中深处有一所废弃的小教堂。他们在那里下马，她拉着他的手，穿过幽暗的祈祷室来到圣器室，圣器室破败不堪，墙上插着一支火把取亮，除了两个用斧子砍出来的木墩充当凳子外，没有任何家具。这时候他们才互相看清对方的脸。他只穿一件衬衫，头发像马尾似的用丝带束在颈后，米兰达觉得他比餐桌上年轻漂亮一些。

他没有采取主动，因为他勾引女人的方法没有一定规矩，只不过随机应变，第一步尤其重要。“在爱情的序幕中，任何错误都是不可挽回的。”他常说。那次，他以为一切障碍早已排除，因为采取主动的是她。

他错了。米兰达除了美貌之外，还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尊严，过了好久之后，他明白还是应该由他采取主动。她让他坐下，正如十五年以后在翁达的情况一样，两人面对面坐在斧凿的木墩上，挨得那么近，几乎碰到了膝盖。他握住她的手，把她拉过来，企图吻她。她只让他接近到能觉察呼吸热气的距离，然后扭过脸。

“水到渠自成。”她说。

他后来一再尝试，都被这句话挡住。午夜，雨水开始从屋顶的罅缝漏下来，两人还是手拉手、面对面坐着，他朗诵那几天自己正在打腹稿的一首诗，一首十一音节的八行诗，对仗工整，合辙押韵，糅合着爱情的缠绵和对战争的夸耀。她深受感动，说了三个名字试图猜作者是谁。

“是一个军人写的。”他说。

“战场上的军人还是沙龙里的军人？”她问道。

“两者都是，”他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孤独的军人。”

她想起在希斯洛普先生家吃饭后她对父亲说的话。

“只能是波拿巴了。”她说。

“差不多，”将军说，“不过精神境界的差别很大，因为这首诗的作者不会加冕称帝。”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时传来有关他的新消息，她越来越惊异地自问，当时他是否意识到他那句机智调皮的话竟是他自己生命的预先展示。不过她那晚顾不上想这些，因为要拖住他而又不让他生气，同时在快天亮前他越来越迫切的进攻面前坚守阵地，三全其美几乎不可能，使她穷于应付。她只让他偶尔吻几下，如此而已。

“水到渠自成。”她对他说。

“我今天下午三点钟就搭上海地的邮轮，再也不回来了。”他说。

她迷人地笑出声，戳穿了他的谎话。

“首先，邮轮星期五才启碇，”她说，“其次，你昨天在透纳太太那里订了一个蛋糕，今晚要带到那个在世上最恨我的女人家里去吃饭。”

那个在世上最恨她的女人名叫胡利娅·考比埃，也是流放在牙买加的美丽富有的多米尼加人，据说将军不止一次在她家里过夜。那晚

他们两人准备庆祝她的生日。

“您比我的密探消息更灵通。”他说。

“您怎么没想到我也是您的一个密探呢？”她说。

到了早上六点钟，他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他那时回家发现他的朋友费立克斯·阿梅斯托伊浑身血迹死在吊床上，假如不是那次假幽会，躺在吊床上的应该是他。费立克斯有急信面交，等他回来，困得睡着了；被西班牙人收买的仆人之一以为他是将军，在他身上捅了十一刀杀了他。米兰达事先了解到暗杀计划，但想不出更审慎的办法加以阻止。他想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是她没有回答他的口信。将军在乘一条海盗的轻便船去太子港之前，派何塞·帕拉西奥斯给她送去他母亲的遗物，那个珍贵的盒形胸饰，附了一张没有签名的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我戏剧性的命运已经注定。”

米兰达永远忘不了也不曾理解那个年轻战士的深奥的话。后来他在自由的海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佩蒂翁将军的帮助下回到故土，率领一支由赤脚的平原人组成的起义队伍翻越了安第斯山，在博亚卡桥打败了保皇派军队，第二次并且永远解放了新格拉纳达，然后解放了他的祖国委内瑞拉，最后解放了南方山峦起伏的土地，直到同巴西帝国接壤的地方。旧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后，米兰达和一个英国土地测量员结了婚，她丈夫改了行，移居新格拉纳达，在翁达山谷种植牙买加的甘蔗。前一天她听说她的老相识，金斯敦的流放者，就在离她家三里路的地方参观。她到银矿时，将军已经回了翁达，于是她又骑马赶了半天路才追上他。

他年轻时的鬓角和胡子已经剃掉，头发灰白稀少，一副末路潦倒的模样，如果是在街上根本不敢相认，她惊恐地觉得仿佛在同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谈话。米兰达本来打算避过在街上被认出的危险后，揭开面纱同他交谈，但想到他也会发现岁月在她脸上造成的损害，就不敢那么做。他们寒暄之后，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来请您帮个忙。”

“尽管吩咐。”他说。

“我五个孩子的父亲杀了人，在服长期徒刑。”她说。

“为了荣誉问题？”

“决斗时杀的。”她说，然后立即解释：“为了争风吃醋。”

“想必没有根据吧。”他说。

“有根据。”她说。

如今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连他也包括在内，她求他的只是要他施加影响，结束她丈夫的监禁。他只能实话实说：

“你已看到我病病歪歪，无依无靠，不过为了你，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把伊巴拉上尉找来，摘录了案情，答应尽一切力量争取赦免。当天晚上，他和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将军交换了意见，谈话极其审慎，不留任何书面文字，不过一切都要在了解新政府的情况之后才能

进行。他把米兰达送到大门口，一支由六名解放了的奴隶组成的护卫队在等候，将军吻了她的手告别。

“很愉快的一晚。”她说。

将军忍不住问道：

“今晚还是那天晚上？”

“两晚都是。”她说。

她骑上一匹备用的马，装饰漂亮得像总督的坐骑，疾驰而去，没有回头再看看他。他等在门口，直到她走远看不见了。何塞·帕拉西奥斯早上叫醒他，准备上船航行时，他在梦中也见到了她。

七年前，将军授予德国海军准将约翰·皮·艾尔勃斯一项特权，让他创办汽轮航运。将军本人去奥卡尼亚时，曾试乘汽轮从新峡到皇家港，认为这种运输工具舒适安全。但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认为如果没有独家经营权这笔生意不值得做，桑坦德将军担任副总统时无条件地给了他独家经营权。两年后，国民议会决定将军独揽大权，他取消了这一协议，卓有远见地说：“如果我们给了德国人垄断权，他们最终会转让给美国的。”后来他又宣布全国内河航运一律自由开放。因此当他决定找一艘汽轮航行时，碰到不少拖延和扯皮，显然是报复，真要动身时，不得已只能乘舢板。

从早上五点钟开始，港口就满是骑马和步行的人，都是省长从附近教区匆匆找来的假充过去年代的那种热烈欢送的群众。无数满载妓女的小艇在码头转悠，她们叫喊着挑惹卫队的士兵，士兵们则说些猥

亵的奉承话回答。将军六点钟和官方代表们来到港口。他是从省长家步行来的，嘴上蒙着一块浸透古龙水的手帕。

那天看样子不会出太阳。商业街的店铺一早就开门了，有几家在二十年前一次地震毁坏的房屋之间的空地上露天营业。将军挥动着手帕回应从窗口向他致敬的人，这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见到他虚弱的模样十分吃惊，默默地目送他过去。他穿着衬衫，头戴白色草帽，脚下是唯一的那双惠灵顿式长靴。在教堂门口，堂区神甫站在椅子上准备发表一番演说，卡雷尼奥将军劝阻了他。将军走过去同他握握手。

拐过街角，将军一眼就看出凭他的体力很难登上高坡，但他抓住卡雷尼奥将军的胳臂开始上坡，最后显然支持不住。陪同的人想劝他坐上波萨达·古铁埃雷斯事先为他预备的轿子。

“不，将军，”他惊慌地说，“我求您别让我丢人现眼了。”

他凭意志而不是体力登上山坡，居然还能不用扶持走到山坡下的码头。他在那里对官方代表团的每一人说了一句客气话亲切告别，脸上还露出笑容，不让人注意到在这个五月十五日他不可避免地踏上通向乌有的归途。他把一枚有他的侧面像的金勋章送给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留作纪念，提高声音向他表示感谢，让大家都能听见，还真情毕露地拥抱了他。然后站在船尾挥动帽子告别，没有注视岸边送行的人群中某个特别的人，也不看舢板周围乱哄哄的小艇和像鲱鱼一样在水里游泳的光屁股小孩。他茫然地朝一个方向挥着帽子，直到破败的城墙上方教堂残缺不全的塔楼消失在视线里。然后他进了舢板上的篷子，坐在吊床上，伸直两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帮他脱掉靴子。

“他们现在总该相信我们真走了吧。”他说。

船队由八艘大小不一的舢板组成，其中一艘是为他和侍从们专门准备的，配备了一名舵手和八名划愈疮木桨板的桨手。普通舢板中央有一个堆放货物的棕榈叶盖的篷子，将军的那艘则搭了一个帆布篷，在阴凉处挂一张吊床，篷子里面衬了棉布，外面围上席子，还开了四个窗口通风透光。篷子里还有一张写字或打牌的小桌，一个书架和一个带过滤器的洗脸架。船队的负责人是从马格达莱纳河上最好的水手中间挑选出来的，名叫卡西尔多·桑托斯，以前是射手警备营的上尉，声如洪钟，左眼像海盗似的蒙着一个黑眼罩，对他这次任务的认识有点轻率。

对于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汽轮来说，五月是舒适季节的开始，对舢板来说却不是最好的月份。要命的炎热、惊心动魄的风暴、险恶的水流、晚上毒蛇猛兽的威胁，仿佛凑起来同旅客作对。身体本来不好、特别敏感的人还有一项额外的折磨：由于疏忽，主舢板两侧的架子上挂着发臭的腌肉条和熏干的小嘴鱼。将军一上船就觉察到了，吩咐赶快拿走。桑托斯上尉发现将军不能忍受食品的气味，便把那艘装食物供应、养着鸡和活猪的舢板调到船队末尾。但是从航行第一天起，将军津津有味地连吃两盘新玉米粥之后，就决定不再吃别的东西了。

“这像是费尔南达七世的魔术之手做的。”他说。

确实如此。他近年的私人厨娘，基多的费尔南达·巴里加，瞒着他也在船队上。他不想吃东西时，厨娘硬要他吃，他便把她叫作费尔南达七世。她是个肥胖、好脾气、说话风趣的印第安人，最大的优点不在于烹调技术特别高明，而在于使将军吃得高兴的本能。将军决定把她留在圣菲曼努埃拉·萨恩斯家帮忙，但是何塞·帕拉西奥斯惊慌地通报说航行前夕以来将军没有吃好一顿饭，卡雷尼奥将军便把她从瓜杜阿斯紧急召来。她凌晨赶到翁达，偷偷地上了食物供应船，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露面。将军健康恶化以后，最爱吃的就是新玉米糙粥，见将军高兴，她便提前露面了。

第一天的航行险些成为最后一天。下午两点钟乌云密布，天色黑得像是夜晚，河水汹涌，雷电交作，大地仿佛都在颤抖，桨手们似乎无法阻止船只撞上峭壁。将军在篷子里观看桑托斯上尉大声呼喊，指挥抢险，他的航运才能好像不足以应付当时的混乱。将军先是怀着好奇，后来焦急得无法自制，在最危险的关头他发觉上尉发了一个错误的命令。将军为本能所驱，冒着风雨出去，在惊涛骇浪中纠正了上尉的命令。

“不是那面，不！”他喊道，“右面，右面，妈的！”

在那嘶哑但仍充满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声音之下，桨手们做出了反应，将军不自觉地取代了指挥，直到险情过去。何塞·帕拉西奥斯急忙把一条毯子披在他身上。威尔逊和伊巴拉左右扶持，让他站稳。桑托斯上尉明白自己又一次搞混了左舷右舷，像低声下气的小兵一样退在一边。将军后来去找他，发现他眼神在颤抖。

“请您原谅，上尉。”将军对他说。

但是他自己心情不能平静。那晚，他们停靠在河滩边过夜，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时，将军讲了难以忘怀的航行事故。他讲他的哥哥胡安·文森特，也就是费尔南多的父亲，替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采购了一批武器弹药，从华盛顿回来时如何死于海难。他讲自己横渡涨水的阿劳卡河，坐骑淹死，他的靴子绊在马镫里挣脱不掉，给拖下水，几乎也遇难，幸亏他的向导用刀子割断了马镫的皮索。他讲新格拉纳达独立后不久，在去安戈斯图拉途中，看到奥里诺科的急流中翻了一条船，有个他不认识的军官朝岸边游去。他左右的人告诉他那是苏克雷将军。他生气地反驳说：“根本没有什么苏克雷将军。”那确实是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刚提升为解放军的将军衔，从那时开始他们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我听说过那次见面，”卡雷尼奥将军说，“但不知道翻船的细节。”

“也许你把它同苏克雷第一次失事混淆起来了，当时他遭到莫里略追击，逃出卡塔赫纳，在海上漂流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天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将军说。接着，他有些离题地补充说：“我讲这些事是想让桑托斯理解今天下午我为什么那么不礼貌。”

凌晨，大伙都已进入梦乡，丛林中突然响起一阵催人泪下的、没有乐器伴奏的歌声。将军在吊床上一惊。“那是伊图尔比德。”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暗里说。语音刚落，一声粗暴的呵斥打断了歌声。

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是墨西哥独立战争中一个自封为皇帝、在位只一年多的将军的长子。玻利瓦尔第一次见到阿古斯丁就对他有特殊好感，当时他毕恭毕敬地立正，在他从小就崇拜的人面前激动得手直发抖。那时他二十二岁，他父亲被枪决时他还不满十六岁。他父

亲从国外流放回来，不知道自己已被缺席审判，以叛国罪定了死刑，踏上墨西哥国土不到几小时就在一个尘土飞扬、燠热的小镇上被枪决了。

有三件事一开始就打动了将军。一是阿古斯丁把他父亲在行刑墙前托人交给他的金表和宝石挂在脖子上，让大家知道他很引以为荣。二是他坦率地告诉将军，他父亲为了不被港口卫兵认出，打扮成穷人，但骑马的优美姿势露了馅。三是他唱歌的模样。

墨西哥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不让他参加哥伦比亚军队，认为他的军事锻炼是将军支持的君主复辟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日后可以根据所谓皇储的权利让他当墨西哥皇帝。将军不但接纳了年轻的阿古斯丁，承认了他的军衔，而且让他当了自己的副官，承担了挑起严重外交纠纷的危险。阿古斯丁没有辜负将军的信任，尽管没有过一天幸福的日子，只靠他唱歌的习惯熬过了前途未卜的岁月。

因此，当马格达莱纳河畔的丛林里有人叫他住声的时候，将军从吊床上起来，披了一条毯子，穿过被哨兵火堆照亮的营地，去同他结伴。将军发现他坐在河边，呆呆地望着流水。

“接着唱吧，上尉。”将军劝他说。

将军在他身边坐下，辨出歌词之后，也用微弱的声音唱了起来。将军从没有听过有谁唱得像他那样深情，也记不得有谁唱得那样哀伤，但能带来极大的幸福感。伊图尔比德同乔治敦军校的同学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组成了三重唱，在军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给将军周围带来一丝青春的气息。

阿古斯丁和将军一直唱到丛林中野兽的喧闹吓跑了睡在岸边的鳄鱼，河水像灾变那样回旋翻腾。将军仍旧坐在地上，望着大自然苏醒时可怕的力量发怔，这时天际露出一抹橘黄色，天亮了。他扶着伊图尔比德的肩膀站起来。

“谢谢，上尉，”他说，“有十个像您唱得这样好的人，我们早就拯救了全世界。”

“唉，将军，”伊图尔比德叹息说，“我多么希望我妈妈能听到这句话啊。”

航行的第二天，他们沿途看到管理良好的庄园，漂亮的马匹在蓝色的牧场上自由奔跑，然后开始看到丛林，一成不变的景色紧挨着河岸。两岸的伐木人早先砍下粗大的树木扎成木排准备运到卡塔赫纳出售。木排漂得极慢，在水面上仿佛没有移动，全家大小还有家畜牲口都待在木排上，单薄的棕榈叶盖的篷子挡不住强烈的阳光。河流某些拐弯的地方，已经能看出汽轮船员砍伐树木作为锅炉燃料给森林造成的损害。

“鱼类得学着在地上行走，因为水域快没有了。”将军说。

白天热得难以忍受，猴子和禽鸟的喧嘈吵得人要发狂，不过夜晚倒很安静凉爽。鳄鱼趴在河滩上几小时一动不动，光张开大嘴捕食蝴蝶。荒废的房屋旁边可以看到一些玉米地，瘦得皮包骨头的狗见船队靠近吠叫不已，虽然一个人影都瞧不见，却可以看到捕猿的机关和晾晒的渔网。

经过多年的战争、伤心的执政和乏味的爱情，闲散仿佛成了痛苦的事。将军一早醒来就没精打采，躺在吊床上沉思冥想。回复了凯塞

多代理总统的来信以后，将军的信件都已处理完毕，不过他仍旧口授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消磨时间。费尔南多在最初几天里已经念完了那本利马逸闻，再没有别的能引起将军兴趣的书了。

这是他完整读过的最后一本书。他本来嗜书若命，无论在战斗间歇，或者在做爱后休息时都手不释卷，不过没有系统和方法。不管什么时候，光线如何，他都看书，树下散步时看，赤道阳光下骑在马背上也看，有时坐在马车里经过颠簸的石子路，有时躺在吊床上晃悠，一面口授信件一面看书。利马的一个书商接到他选购书籍的目录，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感到十分惊奇，从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到手相术的书籍无所不有。他年轻时受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影响，爱看浪漫主义的作品，由于他理想主义和狂热的气质，他把自己当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兴趣经久不衰。这些激情的作品决定了他一生的性格。凡是能弄到手的，他都看，他没有特别喜爱的作家，不同时期有许多不同的偏爱。他每到一地的住处，书架总是塞得满满的，最后卧室和走廊的书籍堆积成山，没有归档的文件也越来越多，满坑满谷。他手头的书永远来不及看。当他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就把书留给最可靠的朋友保管，再也不问它们的下落，他的戎马生涯迫使他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留下一条四百多里长的书籍和文件的轨迹。

早在视力衰退之前，将军已经开始让书记员朗读，最后由于嫌眼镜碍事，自己干脆不看书了。但他对于读书的兴趣也随之减退，像往常一样，他找出一个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理由。

“问题是好书越来越少了。”他说。

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航行中，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露出厌烦的迹象，炎热和不便毫不影响他文雅的举止和整齐的穿着，也没有使

他对工作敷衍了事。他比将军小六岁，在将军家一出生就是奴隶，他的非洲妈妈一时糊涂同一个西班牙人生下了他，他从西班牙人那里遗传了胡萝卜色的头发、脸上和手上的雀斑以及淡蓝色的眼睛。同他天生的持重脾气相反，在侍从中间数他的衣服最多，最值钱。他一生追随将军，随他经历了两次流放，在第一线参加全部战役战斗，但从不承认自己有穿军服的权利，一直是平民打扮。

航行最难受的是活动受到限制。一天下午，将军在狭窄的帆布篷里来回踱得不耐烦，吩咐停船，以便在陆地上散散步。在硬结的泥地上，有些像是鸟类的足迹，和鸵鸟一般大，体重至少像牛，桨手们觉得并不稀罕，说这一带常有长着鸡冠和鸡爪的身躯肥大的人出没。将军对于一切异乎寻常的东西都加以嘲笑，当然不信这种说法，但他散步的时间比预定的要长，最后尽管船队负责人和他的几个副官都认为这地点危险并且有害健康，他们还是就地宿营。他一夜没睡，天气闷热，一群群的蚊子仿佛能穿透蚊帐，美洲狮吓人的吼叫使他们整夜处于戒备状态。凌晨两点钟左右，将军走到篝火周围去同守夜的士兵聊天，破晓时，他眺望着被曙光染成金黄色的一大片沼泽地，放弃了使他熬了一夜的幻想。

“好吧，”他说，“我们见不到长鸡爪的朋友就得走了。”

起航时，一条瘦得皮包骨头、一只腿不能动弹的癞皮狗跳上舢板。将军的两条猎犬向它扑去，但那条残废的狗不要命地凶猛自卫，脖子被咬破，浑身血污，仍不认输。将军吩咐留养，何塞·帕拉西奥斯便负责照管它，对于照料收留的野狗，他已经驾轻就熟。

同一天，他们还收留了一个用棍子打了桨手被抛弃在沙岛上的德国人。他上了船，自称是天文学家和植物学家，但没谈几句话就看出

他对天文学和植物学都一窍不通。不过他亲眼见过长鸡爪的人，并且决心要抓一个活的，关在笼子里运到欧洲去展览，就像上个世纪在安达卢西亚沿海港口巡回展出的美洲蜘蛛女一样，肯定会引起轰动。

“不如把我运去吧，”将军对德国人说，“你把我关在笼子里当作有史以来最大的傻瓜展出，保证能赚更多的钱。”

一开始，将军觉得那个德国人像是有趣的小丑，后来他讲起有关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同性恋的下流笑话，将军听不下去了。“咱们应该把他再留在河滩上。”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下午，他们遇到逆流而上的送邮件的小艇，将军运用他说服人的本领，让邮吏打开官方邮袋把他的信交给他。最后还请邮吏把那个德国人带到纳雷港，尽管小艇已经超载，邮吏还是同意了。晚上，费尔南多念信时，将军嘟囔着说：

“那浑小子还想给洪堡脸上抹黑。”

在让德国人登船之前，将军已经在想那个男爵旅行家，琢磨他怎么能在如此艰苦的蛮荒条件下活下来。他在巴黎的时候认识了刚从美洲国家回去的洪堡，洪堡的博学多才和他比女人更俊美的容貌使将军大为惊讶。然而将军不能信服的是洪堡断言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条件已经成熟。他说这话时口气斩钉截铁，而将军当时甚至连空想都没有想过。

“现在缺少的只是领袖人物。”洪堡对他说。

多年后，将军在库斯科把这件事告诉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历史刚证明他就是那个领袖人物，也许他当时正志得意满、俯瞰尘世。这

件事他从没有对第二个人谈起，但是每提起男爵时，将军对他的远见卓识总是推崇备至：

“洪堡使我开了眼。”

这是他第四次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不由得产生了他是在结束一生历程的感觉。第一次是在一八一三年，身为起义军的少校在委内瑞拉战败后被流放到库拉索岛，去卡塔赫纳寻求支援以便继续战斗。当时新格拉纳达分裂成许多部分，各自为政，在西班牙人的凶恶镇压下独立事业失去了号召力，胜利越来越显得渺茫。第三次航行他乘坐一艘汽轮，解放事业已经完成，但是他的美洲一体化的几近偏执的理想开始土崩瓦解。这次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的理想已经破灭，不过在他时常重复的一句概括性的话里还留有痕迹：“只要我们不组织一个统一的美洲政府，我们的敌人就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

他和何塞·帕拉西奥斯一起回忆的许多往事中，最使他激动的是进行马格达莱纳河流域解放战争时的第一次航行。他率领了二十名装备不齐的士兵在二十来天中横扫这一流域，西班牙保皇派一个都不留。何塞·帕拉西奥斯在这次航行的第四天也察觉到情况变化有多大，他们开始看到沿河村落成群结队的妇女在岸边等候船队经过。“寡妇们都来了。”他说。将军探头出去，看到她们穿着黑衣服排在岸边，像是灼热阳光底下沉思的乌鸦，等待施舍，哪怕是一句慰问的话也好。安德烈斯的哥哥迪戈·伊巴拉将军常说玻利瓦尔将军没有子女，却是全国寡妇的父母。他每到一处都有寡妇去找他，他以出自肺腑的亲切安慰给了她们生活的勇气。可是这次在河边村落看到忧伤的妇女们时，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自己。

“如今我们自己也成了寡妇，”他说，“我们是独立战争的孤儿、残废军人和被遗弃的人。”

在抵达蒙博克斯之前，他们只在奥卡尼亚通向马格达莱纳河的皇家港靠岸。委内瑞拉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将军把叛乱的投弹手队伍送到边境，完成了任务，回来加入侍从队，在这里同他们会合。

将军一直待在船上，晚上才上岸到临时营地里去睡觉。他在舢板上接见了凡是想看他的各次战争的寡妇、残废士兵和失去依靠的人。他以惊人清晰的分辨力记起了几乎所有的人。留在那里的人受着苦难的煎熬，另一些为了糊口出去寻找新的战争，还有一些则像解放军无数退役军人那样在各地拦路行劫。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总结了大家的想法：“我们现在有了独立，将军，您倒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在胜利的欢欣中，将军曾教导大家这样同他说话：直言不讳，坚持真理。可是现在真理换了主人。

“独立问题比较简单，打赢仗就能取得，”他对大家说，“把这些人民组成一个国家还得做出更大的牺牲。”

“我们唯一做过的事就是牺牲，将军。”他们说。

“还不够，”将军寸步不让地说，“团结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那天晚上，当他在挂好吊床的棚屋里闲逛时，发现有一个女人回过头来看他。他感到奇怪的是那女人见他赤身裸体并不大惊小怪。他甚至听到那女人哼的歌词：“请你对我说，为爱情而死，永远不会为时太晚。”守卫站在大门口的屋檐下没有睡。

“这里有女人吗？”将军问他。那人自以为明白了将军的用意。

“配得上阁下您的一个都没有。”他说。

“配不上阁下我的呢？”

“也没有，”看守说，“方圆一里路以内没有女人。”

将军确信自己见到一个女人，在房子里到处寻找了很久。他还硬要副官们弄个水落石出。第二天出发也耽误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那个答复：一个也没有。他不再谈这件事。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想起，将军还是咬定见到了那个女人。何塞·帕拉西奥斯比将军多活了很久，有充分的时间回顾他在将军身边生活的日子，连最小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他唯一搞不明白的事情就是那晚在皇家港见到的是梦，谵妄，还是幽灵。

谁也没有再想起那条半路收留的狗，它待在舢板上，伤势逐渐好转，负责喂食的勤务兵偶然想到它还没有名字。他们用碳酸给它洗了澡，撒上婴儿爽身粉，但没能减轻它的疥疮和邋遢的模样。将军在船头乘凉时，何塞·帕拉西奥斯牵了它过来。

“咱们给它起什么名字？”他问道。

将军想都没想，回答说：

“玻利瓦尔。”

---

[1]此句原文为英语。

一得到有一支舢板队靠近的消息，停泊在港口的一艘炮艇立刻开动。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帆布篷的窗口里望见炮艇，弯下腰对闭着眼睛躺在吊床上的将军说：

“将军，我们到了蒙博克斯。”

“上帝之乡。”将军没睁眼说。

他们顺流而下时，河流越来越宽阔肃穆，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热气浓得几乎可以用手触摸。航行的最初几天，将军老是在船头盘桓，观看瞬息万变的黎明和流光溢彩的黄昏景色，如今情绪低落，没有这份兴致了。他不再口授信件，也不听人给他念书，不问同伴们任何问题，似乎对生活毫无兴趣。在最燠热的午睡时间，他蒙着毯子、闭上眼睛躺在吊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怕他没有听见，又招呼一遍，他仍旧不睁开眼睛。

“蒙博克斯不存在，”他说，“我们有时梦到，但是它不存在了。”

“我至少可以证实圣巴巴拉塔楼还存在，”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我从这里已经看到了。”

将军烦恼地睁开眼，在吊床上坐起来，看到中午炫目的阳光下古老陈旧、多灾多难的蒙博克斯的一些房子的屋顶。这个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共和国的混乱中日趋败落，又受到天花流行的再度摧残。河流正是在此时以无可挽回的态势开始改道，这里注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到废弃。每次汛期洪水给石堤造成的损坏，都曾被西班牙殖

民者以伊比利亚半岛式的顽固精神抓紧修复，如今只剩下乱石滩上零落的废墟。

炮艇向舢板靠近，一个仍穿着总督时期旧警察制服的黑人警官把炮筒对准舢板。卡西尔多·桑托斯上尉朝他嚷道：

“别胡来，黑人！”

桨手们停止划船，舢板随水漂流。卫队的投弹手把枪对着炮艇，等候命令。警官仍旧不为所动。

“出示通行证，”他喊道，“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们。”

这时他才看到帆布篷里出来了一个脱了形的人，看到一只枯瘦却带有不容违抗的权威的手，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然后他声音微弱地对警官说：

“长官，您也许不信，不过我没有护照。”

警官不认识他。费尔南多告诉他之后，他什么也没脱就跳进河里游到岸边，赶快跑到城里去报告好消息。炮艇敲着钟送舢板到港口。船队还没有拐最后一个弯，还没有望到整个城市之前，八个教堂的钟全敲响了。

殖民时期，圣克鲁斯·德蒙博克斯是加勒比海岸和内地贸易的桥梁，因而富裕繁荣。美洲刚刮起自由之风时，这个当地贵族的堡垒首先宣布独立。西班牙加以重新征服，将军本人又解放了它。它只有三条同河流平行的街道，宽阔、笔直、尘土飞扬，建筑都是有大窗户的平房，住过两个伯爵，三个侯爵。本城的金银手工业以精致享有盛名，并没有因共和国的动荡而受影响。

将军这次来到时对自己的光荣十分灰心，对世界感到失望，发现港口居然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他，完全出乎意外。他匆匆穿上灯芯绒裤子和长靴，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披上斗篷，脱掉睡帽，戴上他在翁达告别时用的大檐帽。

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葬礼。民政和教会当局、教会团体和神学院的头面人物正衣冠楚楚地在参加棺前弥撒，听到钟声齐鸣以为是失火，顿时一片惊慌。激动万分的警官冲进教堂，在市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向大家宣布：

“总统到了港口！”

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星期一有信使路过，在沿河城镇散播了翁达的传闻，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似是而非的消息使得临时组织的欢迎场面更加热烈，甚至丧家发现大部分吊丧的客人都离开教堂去码头了。葬礼进行了一半，只有一小批至亲好友在爆竹和钟声中护送灵柩到墓地。

五月雨水不多，河水流量很小，到港口码头需要爬上一道满是乱石的河谷。有人想背将军，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自己扶着伊巴拉上尉的胳臂，一步一滑艰难地往上爬，终于不损尊严地到了上面。

他在港口和当局人士一一握手寒暄，从他的身体情况和手的小巧来看，手劲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上次见过他来蒙博克斯城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他的模样衰老得像他的父亲，但他剩下的一点活力还足以拒绝别人的帮助。他不坐人们为他准备的担架，坚持要自己步行到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最后还是不得不骑上市长怕他支持不住事先备好鞍的骡子。

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脸上痘疮涂了龙胆紫的人。天花是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反复流行的地方病，它在爱国军中引起的恐惧超过了西班牙人，因为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战役中，天花在解放军部队中造成很高的死亡率。鉴于天花的危害，将军曾请一位路过的法国自然学家用牲畜痘疮的浆液接种在人身上替当地居民免疫。但这种方法引起的死亡人数也很多，最后谁都不信这种寄托在牛身上的医疗办法，许多母亲宁肯孩子冒染上天花的危险，也不肯让孩子冒接种的危险。可是将军接到的官方汇报使他相信天花的灾祸已被战胜。因此，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群众中有许多脸上出痘抹药的人时，他的反应厌烦多于惊奇。

“只要下级为了讨好，继续向我们撒谎，这种情况就永远改不了。”他说。

他在港口欢迎他的人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快。他简单地介绍了他辞职的经过和圣菲的混乱状态，要求大家一致支持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不是团结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他此去不准备回来了，一方面是身体不好，大家也看得出来，有多种严重疾病，需要休养；更重要的是别人的不幸给他造成了痛苦，他需要平静。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走，也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有意无意地重申他还没有拿到政府发的出国护照。他感谢蒙博克斯人二十年来给他的荣誉，请求他们除了市民的称号之外不要再给他什么头衔了。

群众涌进拉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临时决定的感恩仪式，教堂里还挂着葬礼的绉绸，空气中还有葬礼的花香和熄灭的蜡烛芯味。坐在侍从席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注意到坐在贵宾席的将军很不舒服。市长是个不露感情的混血儿，长着狮鬃一般漂亮的头发，坐在将军旁边倒很自在。班胡梅亚的遗孀费尔南达，她的美貌曾风靡马德里宫廷，把

自己的檀香木扇借给将军，让他抵挡仪式的闷热。将军无奈地扇着，只从香气中得到一些慰藉，最后热得透不过气来。他在市长耳边说：

“老实说我不该受这份罪。”

“人民的敬爱是要付出代价的，阁下。”市长说。

“不幸的是，这不是敬爱，而是凑热闹。”他说。

感恩仪式结束后，他向班胡梅亚的遗孀鞠躬告别，把扇子还给了她。她想再交到他手中。

“请您赏光留着吧，作为对一个十分敬爱您的人的回忆。”她说。

“可悲的是我用以回忆的日子所剩不多了。”将军说。

神甫坚持要打着圣周用的华盖挡太阳，从拉康塞普西翁教堂送他到圣彼得使徒修道院。修道院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回廊外面种着蕨类植物和麝香石竹，后面有一个阳光充足的果园。这几个月由于河那面吹来的风有害健康，即使晚上也不能睡在连拱回廊里，但是大厅旁边的房间有厚实的灰石墙，里面像秋天一样阴凉。

何塞·帕拉西奥斯先去把一切准备就绪。卧室的墙壁粗糙，最近刷过石灰，只有一扇带绿色百叶帘的窗户朝着果园，光线暗淡。何塞·帕拉西奥斯挪动床的位置，让床脚对着窗，将军便可以望到树丛中黄色的番石榴，闻到香味。

将军扶着费尔南多和拉康塞普西翁教堂的神甫来到修道院，神甫也是修道院院长。将军一进门就背靠着墙，对窗台上葫芦瓢里盛放的

番石榴弥漫整个卧室的香气感到意外。他闭上眼睛，靠着墙，吸着使他心碎的旧时熟悉的气味，直到透不过气。然后他仔细查看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仿佛从中都能得到启示。除了带幔帐的床之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到头来，还是有些东西保持了原样！”将军说。

神甫感到吃惊。

“对不起，阁下，”他说，“据我所知，您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从没有见过这幢房子，但是将军继续回忆，提到的事情都被他说中，弄得大家面面相觑。最后，将军以他惯常的玩笑解除大家的不安。

“也许是前世轮回吧，”他说，“说到头，我们刚才还看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在华盖下面行走，在这样的城市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过了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城市变成了泽国。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来消除应酬的疲劳，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仰天和衣躺在床上，闻着番石榴的气味，假装睡着，接着，在倾盆大雨之后的宁静中真的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这点，因为他听到将军用年轻时代的标准发音和清晰的音色说话，这种情况只有梦中才会出现。他说的是加拉加斯，一个沦为废墟、已经和他无缘的城市，墙上贴满了辱骂他的标语，街上大粪横溢。何塞·帕拉西奥斯坐在角落里的扶手椅上，

别人几乎看不见他，他守在这儿是因为不愿意让侍从队以外的人听到将军秘密的梦话。他从半掩的门缝里朝威尔逊上校做个手势，上校便让花园里的值勤士兵走得远些。

“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在加拉加斯谁都不服从我们，”将军在梦中说，“我们得听从别人支配。”

他说了一连串愤懑的抱怨话，那是死亡的风把他破碎的光荣刮走之后的残余。他说了将近一小时的梦呓，走廊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一个傲慢响亮的声音惊醒了他。他发出一个急促的鼾声，没睁眼睛，含混不清地说：

“外面他妈的是什么事？”

原来是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要在规定接见的时间之前强行闯进卧室。卡尔卡莫是解放战争的老将，脾气暴躁，勇敢得接近疯狂。他用佩刀拍打了一个投弹手的中尉，不把威尔逊上校放在眼里，只有神甫非世俗的权力才制服了他，客客气气地把他带进隔壁的办公室。将军听了威尔逊的汇报后生气地嚷道：

“对卡尔卡莫说我死了！就这么说，我死了！”

威尔逊上校到办公室去见那个军人，他为了今天的场合穿了检阅时的军服，胸前佩满了战功勋章。可是那时候他的傲慢已经荡然无存，眼睛里满是泪水。

“不，威尔逊，不用告诉我了，”他说，“我已经听到了。”

将军睁开眼时，发现时钟还停在一点零七分。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了弦，凭记忆拨到准确的时间，接着证实说同他的两个怀表完

全一致。随后，费尔南达·巴里加进来，想让将军吃一盘炒素什锦。将军昨天到现在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但他仍不想吃，只是吩咐把盘子端到办公室去，等会儿一面接见一面吃。与此同时，他忍不住拿了一个放在葫芦瓢里的番石榴。他美滋滋地先闻闻气味，贪馋地咬下一口，像小孩那样快活地咀嚼果肉，细细品尝滋味，然后叹了一口长气慢慢地咽下去。接着，他坐在吊床上，把盛番石榴的葫芦瓢放在两腿中间，一个接一个把番石榴统统吃光，几乎没有换气的时间。何塞·帕拉西奥斯进来时在昏暗中见到他这副吃相惊慌地说：

“咱们这样会死的！”

将军兴致很好地补充说：

“不至于比现在死得更绝。”

三点半正，按照预定时间，将军吩咐来访者两人一组开始进办公室，这样让一人看到他急于接待另一人，便可以快快把他们打发走。尼卡西奥·德尔巴列医生是最早进去的人之一，发现他背朝着窗坐着，窗外可以望到田间房屋和远处水汽蒸腾的沼泽。将军手里端着费尔南达·巴里加给他拿来的那盘食物，但一口未吃，因为他已开始感到番石榴在肚子里作怪。德尔巴列医生后来用一句粗俗的话总结了他晋见的印象：“那个人已经半截入土了。”凡是去见将军的人都有同感，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尽管如此，即使被他的衰弱状况深深打动的人也缺乏怜悯，坚持要他到附近城镇去赞助儿童福利事业，为一些民用工程奠基揭幕，或者看看由于政府工作疏懒而造成的民间生活贫困。

一小时后，番石榴引起的恶心和肠绞痛达到了令人惊慌的程度，虽然他很想满足从一早等到现在的人们的要求，但却不得不中止接见。院子里都是人们带来送给将军的小牛犊、山羊、母鸡和各式各样的野味，挤得水泄不通。卫队的投弹手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幸亏下午第二场大雨使天气凉快一些，大家安静了一些，恢复了正常。

不顾将军明确拒绝，下午四时还是在附近一幢房子里准备了欢迎宴会。将军没有出席，因为番石榴的排气作用使他处于危急状态，直到夜里十一点多。他躺在吊床上痛得死去活来，猛放有番石榴气味的屁，觉得灵魂也要泻掉了。神甫送来当地药剂师配制的药。将军拒绝服用，他说：“我吃错一帖催吐剂丢了权，再吃一帖连命也要丢掉。”他听其自然，直冒冷汗，打着寒战，他没有出席的宴会上隐约传来的优美弦乐声给了他少许安慰。他的水泻慢慢平息，肚子不痛了，这时音乐声也停止了，他觉得仿佛在虚无缥缈中浮沉。

他上次路过蒙博克斯差点成为最后一次。他以个人魅力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取得紧急和解，从加拉加斯回来，但派斯将军远没有放弃分裂的梦想。将军同桑坦德不和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走到了拒绝接受桑坦德信件的极端，因为他不再信任桑坦德的心地和人格了。“请您别费那个劲称呼我为朋友了。”他给桑坦德的信中说。桑坦德仇恨将军的直接借口是将军匆忙之中向加拉加斯人发表了一个公告，没有多加考虑就声称他的全部行动都以加拉加斯的自由与光荣为指导。他回新格拉纳达后，试图在对卡塔赫纳和蒙博克斯的公告中用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加以补救：“加拉加斯给了我生命，你们给了我光荣。”但是这句话有点巧辞补救的味道，不足以平息桑坦德分子的煽动。

将军试图阻止最后灾难的发生，带了一支军队回圣菲，指望路上有别的部队参加，再次开始为一体化而努力。正如他去阻止委内瑞拉分裂时那样，他说那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再细想一下，他就会明白将近二十年来，他生活中没有哪一个时刻不是关键性的。“整个教会，整个军队，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是支持我的。”后来他回想到当时形势时这样写道。虽然有这一切有利条件，他说，当他离开南方向北方进军，或者离开北方向南方进军时，他身后的地区就失去控制，新的内战毁了他的计划，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得到证实。这就是他的命运。

桑坦德派的报刊一有机会就把他军事上的失败归因于他晚上的荒唐行为。在许多旨在贬低他光荣的谎言中，当时在圣菲曾传播的是一八一九年八月七日早上七点指挥博亚卡战役、从而奠定独立基础的不是他，而是桑坦德将军，因为他当时正在顿哈与总督社会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玩得高兴。

不管怎样，提到他晚上的放荡、败坏他名誉的不仅是桑坦德派的报刊。早在胜利之前，就有人说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三次战役败在他手里，因为当时他不在应该在场的地点，而在一个女人的床上。他另一次访问蒙博克斯时，有一队年龄不一、肤色各异的女人招摇过市，在街上留下一股刺鼻的香水气味。她们侧身骑在马上，打着印花缎子的阳伞，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华丽的绸衣。人们纷纷猜测说，这些女人是打前站的将军的姘头。这当然像别的猜测一样是无稽之谈，但谁都不反驳，因为将军的战地后宫是人们茶余酒后的话题之一，他去世后还有许多人津津乐道。

这种歪曲报道的手法并不新奇。将军本人在反西班牙的战争中就用过，当时他吩咐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假消息迷惑西班牙的司令官。共

和国成立之后，将军指责桑坦德利用他控制的报刊干尽坏事，桑坦德以巧妙的讽刺来回答：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阁下。”

“一个坏老师，”将军反驳说，“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编造消息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对人们议论他的话，不论是真是假，都十分敏感，对造谣中伤一直耿耿于怀，临死的时候还力图要澄清。但他在避免授人以柄方面却很不注意。也是在上次路过蒙博克斯的时候，他为了一个女人把光荣豁了出去。

那个女人名叫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是个贵族出身的蒙博克斯人，她穿着方济各会修士的带头罩的长袍，凭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她的口令“上帝之乡”混过了七道岗哨。她浑身皮肤白皙得像是隐隐发光，在黑暗里也可以看到她的胴体。那天晚上，她不寻常的装饰压倒了她本身非凡的美丽，因为她前胸和后背缚着当地金银匠精心制作的一副黄金甲胄。当将军想抱她上吊床时，由于黄金分量太重几乎抱不动。一夜恣肆放纵之后，天亮时她觉得时间快得可怕，请求他让她再待一晚。

那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据将军密探的情报，桑坦德已经布置好一个阴谋意图剥夺将军的权力，分裂哥伦比亚。但那女人还是留了下来，不是一夜，而是十夜，两人玩得非常快活，觉得地老天荒再没有像他们这样真正相爱的了。

她把黄金留给了将军。“当作你的战争的花费吧。”她说。将军顾虑这笔财富是床上得来的，不太光彩，没有变卖，交给了一个朋友

保存。后来就忘了那个女人。他最后一次到蒙博克斯，吃番石榴闹肚子之后，吩咐打开箱子清点财产时，才回想起她的名字和日期。

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黄金甲胄制作精美绝伦，总重三十磅，简直是稀世珍品。此外还有一个箱子，内装二十三把叉、二十四把刀、二十四把大匙、二十三把小匙，几把夹糖块的小钳子，全部是金子打的，另外还有贵重的器具，曾在不同场合下留给别人保管，结果自己也忘了。将军的财产混乱得难以置信，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新的发现，到头来谁也不感到吃惊。他吩咐把那些黄金餐具收在行李里，装有黄金甲胄的箱子归还它的女主人。但是圣彼得使徒修道院院长告诉他，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由于合谋危害国家安全已被流放到意大利。

“肯定是桑坦德那浑蛋干的。”将军吃惊地说。

“不，将军，”神甫说，“是您自己放逐的，由于二八年的争吵。您不清楚被放逐的人中间有她。”

将军便吩咐在搞清情况之前，把那个甲胄箱仍旧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再过问流放的事。因为据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只要他一离开卡塔赫纳海岸，何塞法·萨格拉里奥肯定会随着他被放逐的敌人一起回来。

“卡桑德罗多半已在收拾行李了。”他说。

事实上，许多被放逐的人一听说将军准备去欧洲，纷纷开始回国。但是桑坦德将军考虑问题十分慎重，下的决心令人捉摸不透，是最后回国的人之一。将军辞职的消息使他处于戒备状态，然而他没有回国的表示，也不急于结束他的考察旅行，上一年十月，他到达汉堡

之后就如饥似渴地开始在欧洲国家调查研究。一八三一年三月二日，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商业日报》上看到将军去世的消息。但六个月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准备回国，那时候新政府已经恢复了他的军衔和荣誉，议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离开蒙博克斯之前，将军去拜访了老战友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向他赔礼。那时候才知道卡尔卡莫病得很重，前一天下午为了去看将军才起床。虽然疾病缠身，卡尔卡莫说话声音仍旧十分响亮，得克制自己以免动作过于剧烈，不过他眼睛老是哗哗地淌泪，和情绪毫无关联，得不停地用枕头擦干。

他们一起抱怨各自的疾病，为人们的轻浮、胜利后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一起大骂桑坦德，桑坦德一向是他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话题。将军很少像现在这样说得明确。一八一三年的战役期间，桑坦德拒不服从越过边境二次解放委内瑞拉的命令，洛伦索·卡尔卡莫目睹将军和桑坦德激烈争吵。卡尔卡莫将军一直认为那次争吵是两人暗中不和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激化。

将军却认为那不是伟大友谊的结束，而是开始。认为不和的起因不在于他授予派斯将军的特权，不在于那部不幸的玻利维亚宪法，不在于将军在秘鲁接受的独裁权力，不在于他渴望的哥伦比亚终身总统和议员的职务，也不在于奥卡尼亚国民议会以后他取得的绝对权力。不：造成他们之间日益加剧、以九月二十五日的暗杀到达顶点的严重反感的原因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是桑坦德永远不能接受美洲应成为单一国家的思想，”将军说，“他认为美洲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他瞅着躺在床上的洛伦索·卡尔卡莫，就像躺在一场一开始就打败的战争的最后的沙场上，结束了他的拜访。

“死者已矣，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他说。

洛伦索·卡尔卡莫看他悲哀空虚地站起身，觉察到回忆对将军造成的负担远比岁月为重，正如他自己的情况一样。他双手握住将军的手时，发现两人都在发烧，心想不知谁先去世，一别将成永诀。

“世界毁啦，老西蒙。”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毁掉的是我们，”将军说，“如今只有从头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吧。”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我不行了，”将军说，“我现在就差给扔进垃圾桶了。”

洛伦索·卡尔卡莫送给他装在漂亮的红缎子盒里的一对手枪。他知道将军不喜欢使用火器，在为数不多的私人争斗中宁肯用剑。但是那两把手枪曾用于一次为爱情的决斗，杀了对手，具有特殊意义，将军激动地接受了。几天后，他在图尔巴科接到消息说卡尔卡莫将军已经病逝。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下午重新起航，征兆很好。舢板顺流而下，不用桨手们花大气力，就把板岩的峭壁和海市蜃楼般的河滩抛在后面。现在遇到的木筏比先前多，仿佛也漂得快些。同他们最初见到的木筏不一样的是，这些木筏上盖了梦幻似的小屋子，窗口放着花盆，晾着衣服，还有铁丝编的鸡笼，奶牛，未老先衰的小孩在舢板过去很久之后，还做着告别的姿势。他们在一段缓流的河道借着星光航行了一夜。拂晓时，已到了晨光下的桑布拉诺镇。

港口一株巨大的木棉树下，绰号“大小孩”的堂卡斯图洛·坎比略在等候他们，坎比略家里准备好了木薯大蕉炖肉招待将军。这次邀

请的起因是传说将军第一次来桑布拉诺时，在港口岩石上一家破旧不堪的客栈里吃了午饭，将军说单冲那鲜美的炖肉每年都得来一次。客栈的女主人不敢怠慢显赫的客人，派人去向本镇望族坎比略家借盘子刀叉。将军记不太清当时的情景，他和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肯定海岸附近的木薯大蕉炖肉跟委内瑞拉的炖菜是不是一回事。可是卡雷尼奥将军认为是一样的，并且认为他们确实在港口的客栈吃过，不过不是在解放马格达莱纳河流域期间，而是三年前乘汽轮来这里的时候。将军对自己日益衰退的记忆感到不安，不加申辩地接受了他的证词。

为卫队的投弹手开的午饭摆在坎比略家院子的大杏树下面，长条木板上没有铺桌布，用大蕉叶子代替。在俯视院子的阳台上为将军和他的军官们以及少数几个客人摆了一张桌子，严格按照英国规矩放着豪华的餐具。女主人解释说他们凌晨四点钟才接到蒙博克斯的消息，几乎来不及宰杀他们牧场上饲养得最肥的一头牛。现在总算切成大块大块的，和菜园里的各种果蔬在大锅里炖得正欢。

将军听说事先没有通知就替他准备了饮宴很不高兴，何塞·帕拉西奥斯使出浑身解数，好说歹说，将军才同意下船，饮宴的热烈气氛使他情绪有所好转。他真诚地赞扬宅院的雅致和主人家年轻姑娘的温柔，她们按旧时的规矩腼腆而殷勤地照应主宾席。他尤其赞赏餐具的精致和银刀叉的纯正，那些刀叉上面带有某个由于改朝换代而败落的家族的纹章，不过他还是用自己带来的餐具。

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一个寄居在坎比略家的法国人，此人也参加了午宴，迫不及待地要在高贵的客人面前卖弄他对人间天上一切不解之谜的渊博知识。他在海难中丢失了全部行李，将近一年来带着侍从和仆人占据了半幢房子，等待来自新奥尔良的没有把握的接济。何塞·

帕拉西奥斯听说他名叫迪奥克塞·阿特兰蒂克，但弄不清楚他的身份，在新格拉纳达干什么。如果光着身子、手里拿一支三叉戟，他倒像是海神涅普顿。他的粗俗和邋遢在镇上出了名。同将军共进午餐的机会使他大为兴奋，他洗了澡，修了指甲，五月份的大热天穿得像冬天在巴黎沙龙的打扮，身着法国督政府时期老式的缀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衣和条纹裤子。

寒暄后，他就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开始了百科全书式的讲座。他说他在格兰诺波尔小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经过十四年焚膏继晷的研究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玉米的发源地不是墨西哥，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地区，那里发现了比哥伦布到达安的列斯群岛时期更早的玉米化石。亚洲古国亚述人早已通过实验得出了星体对疾病产生影响的证据。同最近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上说的相反，直到公元前四百年，希腊人才知道猫这种动物。他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偶尔停一会儿腾出嘴来抱怨克里奥约人烹饪文化的落后。

将军坐在他对面，假装吃得比实际吃的多；目光不离开盘子，不理睬他。法国人一开始就企图用法语和将军谈话，将军客气地用法语回答，然后马上讲西班牙语。他那天的耐性连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感到意外，因为席尔瓦了解欧洲人的傲慢独断最使将军恼火。

法国人高声同席上别的客人讲话，但显然只想引起将军的注意。突然，他自陈冒昧，直接问将军：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究竟哪一种政府制度最合适？将军的目光仍不离开盘子，反问他说：

“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波拿巴的榜样不但适合我们，还适合全世界。”法国人说。

“我料到您会有这种看法，”将军并不掩饰讽刺的口气，“欧洲人认为只有欧洲的发明才适用全世界，凡是与之不同的东西都该受到谴责。”

“我一向以为阁下主张用君主制解决问题。”法国人说。

将军第一次抬起眼睛。“那您的看法应该被纠正了，”他说，“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他指指他的副官们说：

“我把伊图尔比德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经常提醒自己。”

“顺便提一句，”法国人说，“当他们枪决那位皇帝的时候，您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欧洲的君主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当时说的话现在仍然一句不改，”将军说，“伊图尔比德那样平凡的人做出那样不平凡的事，使我钦佩；上帝保佑我没有走他的道路，但愿也保佑我免遭他的命运，尽管我知道免不了要像他一样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接着，他企图缓和一下生硬的态度，解释说，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君主制度原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设想。这个想法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的推动下得到了扩散，他本人也想过，披着终身总统外衣的君主制度，不失为竭力争取与维持美洲统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我认为联邦制度也行不通，”他最后说，“联邦制度对我们这些国家过于完美了，它要求的聪明才干远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法国人说，“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将军说，“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那个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趋炎附势的人先反对革命，后来又支持革命，一会儿反对拿破仑，一会儿成了拿破仑的廷臣，晚上拥护共和，早上支持君主制度，朝三暮四，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法国人说。

“作为一个好法国人，康斯坦先生狂热地鼓吹专制利益，”将军说，“与之相反，在这场论争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我本人就曾下令一天之内处决了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拉瓜伊拉医院的伤病员。今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下同样的命令，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根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法国人茫然失措，想插嘴，但将军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他，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梅夜[1]，十小时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两千。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帝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兵在罗马烧杀掳掠，杀了八千居民。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消灭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所有城市的居民；仅仅由于怀疑有人阴谋反对他，在诺夫哥罗德一次进攻中就屠杀了两万居民。

“因此请你们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他结尾说，“别试图教训我们该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在两千年之内都干不好的事情。”

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第一次用喷火的眼睛盯着法国人：

“对不起，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我们的中世纪生活吧！”

他一阵咳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平息之后，愤怒的痕迹也一丝不剩。他转向“大小孩”坎比略，朝他粲然一笑。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他说，“在如此令人难忘的午宴上讲这些唠叨话太不合适了。”

威尔逊上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家，作家认为不值一记。“可怜的将军已经盖棺论定了。”他说。凡是见到将军最后一次旅行的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的陪同人员中甚至有人认为将军不会被载入史册。

过了桑布拉诺之后，沿岸的丛林不那么浓密，城镇的色彩比较鲜明欢快，某些地方街上还有自得其乐的乐师在演奏。将军躺在吊床上想安安静静地睡个午觉，忘掉那个法国人的狂妄，但是不容易。他还是想到那个法国人，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埋怨自己当时没有找到准确的词句和颠扑不破的论点，现在躺在吊床上才想起，可是对手已不在面前。傍晚时，他情绪好一些，嘱咐卡雷尼奥将军让政府想些办法改善那个落难的法国人的命运。

沿岸景色的变化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已经接近海洋，大部分军官兴高采烈地帮桨手们划船，用刺刀当鱼叉捕杀鳄鱼，把轻易的工作搞得

复杂化，像卖苦力似的发泄过剩的精力。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由于母亲家有好几个人害白内障，老是害怕自己遗传这种眼疾而失明，总是尽可能白天睡觉，夜间干活。他摸黑起来，学着成为一个有用的瞎子。将军在野战营地失眠时常常听到他干木匠活的声音：把砍下的树锯成板材，为了不吵人睡觉用布包好锤子，钉成器具。第二天在阳光底下很难相信那些木工细活是黑地里做的。在皇家港的那晚，哨兵还以为有人想摸到将军的吊床那边去，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说出口令才免挨一枪。

航行更为迅速平稳，唯一的倒霉事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一艘汽轮吭哧吭哧迎面驶来，激起的尾浪使舢板摇晃得很危险，掀翻了供应船。汽轮船舷上漆着几个大字：“解放者号”。将军沉思地望着，直到危险过去，汽轮驶远。“解放者。”他自言自语说。接着，像翻过一页书似的，又说：

“想想看，那就是我！”

晚上，他醒着躺在吊床上，桨手们在猜着辨认丛林中的各种声音：卷尾猴、鹦鹉、大王蛇。突然有个桨手莫名其妙地说起坎比略家把英国餐具、波希米亚的玻璃杯和荷兰的桌布埋在院子地下了，怕的是传染痨病。

虽然街谈巷议都说将军害的是痨病，马格达莱纳河一带已经人人皆知，不久即将传遍沿海一带，将军本人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诊断。何塞·帕拉西奥斯觉察到这句话刺痛了将军，因为他的吊床不摇晃了。他想了好久之后说：

“我吃饭时用的是自己的餐具。”

第二天，他们在特纳里菲靠岸，补充翻船损失的给养。将军待在舢板上不暴露身份，但派威尔逊去打听一个姓勒努瓦或者勒努瓦尔的法国商人，他有个名叫阿尼塔的女儿，现在该有二十来岁。特纳里菲查无此人，将军便要威尔逊去瓜伊塔罗、萨拉米纳和埃尔比尼翁几个附近的镇子上再打听，最后才确定传说之事毫无事实根据。

将军的关心可以理解，因为多年来从加拉加斯到利马一直有居心叵测的流言，说他在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途经特纳里菲时，和阿尼塔·勒努瓦之间有段失去理智的、不正当的私情。他牵肠挂肚地想辟谣，可是无能为力。首先，他的父亲胡安·文森特·玻利瓦尔上校也几次受到指控，说他奸污了成年和未成年的女人，还和许多别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不得不受圣马特奥镇的主教的传讯。其次，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将军在特纳里菲只待了两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如此炽烈的爱情。但是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说特纳里菲公墓里有一座竖着安·勒努瓦小姐石碑的坟墓，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有情人们前去凭吊。

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因断臂感到的不适常常引起将军侍从们善意的取笑。他能感到手的动作，指头的触摸，变天时已经截去的骨头的酸痛。他还有足够的幽默感来取笑自己。可是使他不安的是他睡着时有回答别人问话的习惯。他可以同别人进行任何内容的对话，完全丧失清醒时的自制，他会透露清醒时不至于讲出的打算和失望，有一次他在梦中违犯了军事纪律，受到了没有根据的指责。航行的最后一晚，何塞·帕拉西奥斯守在将军的吊床旁边，听到卡雷尼奥在船头说：

“七千八百八十二。”

“你在说什么呀？”何塞·帕拉西奥斯问道。

“星星。”卡雷尼奥说。

将军认为卡雷尼奥一定是在讲梦话，睁开眼睛，在吊床上坐起身来看窗外的夜空。寥廓的天空群星灿烂，没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至少十倍于你的数目。”将军说。

“就是我说的数目，”卡雷尼奥说，“还有两颗在我计算时陨落了。”

将军下了床，看到他仰躺在船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光着的身体上疤痕纵横交错，伸着手臂断肢在数星星。在委内瑞拉的白山战役之后，人们发现他浑身血污，几乎已被肢解，以为他已经死了，就让他躺在泥里。他受了十四处刀伤，其中几处害他丢了胳臂。后来在几次不同的战役中又受过几处伤。但是他人残志不残，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左手，不仅以使用武器凶狠，还以书法漂亮出名。

“连星星也逃不脱毁灭的命运，”卡雷尼奥说，“现在比十八年前少了。”

“你神经出毛病了。”将军说。

“不，”卡雷尼奥说，“我老了，可是我不承认我老了。”

“我比你整整大八岁。”将军说。

“我按每一处伤疤加两岁计算，”卡雷尼奥说，“这样我就是所有人中间年岁最大的。”

“如果这么计算，最老的该是何塞·劳伦西奥，”将军说，“六处枪伤，七处长矛伤，两处箭伤。”

卡雷尼奥觉得这句话不顺耳，反唇相讥说：

“那最年轻的应该是你：连皮都没有刮破过。”

将军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像是谴责的实话，但是出自卡雷尼奥之口一点也不使他生气，因为他们的友情已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将军在他身旁坐下，一起观看河水映出的星星。过了好久之后，卡雷尼奥再说话时，他已深入梦乡了。

“我不承认这次一走生命就结束了。”他说。

“生命并不只以死亡为结束，”将军说，“还有别的方式，甚至某些更光彩的方式。”

卡雷尼奥不愿意承认。

“总该干些什么，”他说，“即使让我们洗个紫香菊浴也好。不仅我们，还有整个解放军。”

将军第二次去巴黎时，还没有听说委内瑞拉民间流行的祛除厄运的紫香菊浴。洪堡的合作者，艾梅·彭普兰博士郑重其事地向他介绍了这种花有科学根据的特效。那一时期，将军还认识了法兰西法院一位德高望重的审判官，他年轻时到过加拉加斯，当时经常参加巴黎的文学沙龙，漂亮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由于洗了这种净化浴，给染成了紫色。

将军对一切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事物，对一切违反他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教导的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都嗤之以鼻。当时他年方二十，新近丧妻，腰缠万金，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迷惑不解，参加了共济会，高声背诵《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中他喜爱的篇章，把卢梭的这两本书长期搁在床头。他拉着老师的手，背着行囊，徒步走遍了半个欧洲。堂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一座小山头望着脚下的罗马城响亮地发出了他对美洲命运的预言。而将军看得更清楚。

“对那些讨厌的西班牙人，只有把他们踢出委内瑞拉。”他说，“我向你宣誓：我要这么做。”

当他到了法定年龄，有权支配他继承的遗产时，他开始过着狂热的时代和他果敢的性格所要求的生活，三个月内花了十五万法郎。他住巴黎最昂贵的旅馆最豪华的房间，有两个穿制服的仆人，一辆由土耳其车夫驾驭、白马拉套的马车，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情妇，不论是在普鲁考普咖啡馆他常占的桌子旁，在蒙马特的舞会上，或是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都带着花枝招展的女人，他还告诉人家他一夜之间在轮盘赌桌输了三千比索。

回加拉加斯之后，他对卢梭仍比对自己的心更亲，热情不减地重读《新爱洛伊丝》，那本书都被磨破了。可是在九月二十五日事件前不久，他已经履行并超过了他在罗马作的誓言，曼努埃拉·萨恩斯第十遍重读《爱弥儿》时，将军打断了她，说那本书讨厌。当时他还说：“一八〇四年的巴黎比任何地方更使我感到厌倦。”然而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命运还没有在紫香菊的预兆性的水里浸染过，他认为自己很幸福，甚至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二十四年后，他遭到失败，病得要死，在马格达莱纳河魔幻般的景色中想得出神，也许在自问有没有勇气抛开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的牛至、鼠尾草和苦橘叶煮的用来分神的洗澡水，采纳卡雷尼奥的劝告，带着他的叫花子似的军队，他的百无一用的光荣，他的痛定思痛的失误以及整个祖国，浸入紫香菊的拯救的海洋。

那一晚万籁俱寂，像在平原上广阔的潮淹区一样，周围几里路远的悄悄谈话声都清晰可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遇到过相似的情景，在日记中写道：“我整夜都听到有鸟飞过。”经过六十九天的航行，哥伦布已经接近陆地。将军也听到鸟飞过的声音。卡雷尼奥入睡时，大概八点，开始有鸟飞过，一小时后，头上飞过的鸟越来越多，鸟翅扇起的风比自然风更大。不久，舢板底下有几条失群的大鱼在映着星光的水里游过，东北方向飘来一阵阵夹着霉臭气味的风。那种奇特的自由感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巨大力量不看也能觉察出来。“慈悲的上帝，”将军叹道，“我们到了。”确实如此。前面就是海，海那面是另一个世界。

---

[1]1572年8月24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在母亲的胁迫下，在巴黎屠杀新教徒，屠杀迅速扩展到全国，导致了法国第二次宗教战争。

就这样，将军又来到图尔巴科，仍旧住在那幢阴凉的房子里，有大的月形拱，落地窗朝着碎石铺就的广场，在隐修院式的院子里他曾见过新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兼总督堂安东尼奥·卡巴列罗－冈戈拉的幽灵，据说月光之夜他在甜橙树下散步，试图减轻他的累累过错和沉重的孽债。同海岸燠热潮湿的气候相反，图尔巴科凉爽宜人，因为它海拔较高，附近小河岸边有许多根须虬结的巨大的月桂树，士兵们就躺在树荫下午睡。

两夜前，他们总算到了沿河航行的终点新峡，由于事先订好的住处和骡子没有准备就绪，只得凑合睡在堆大米口袋和生皮的发臭的篷子里。到达图尔巴科时，将军浑身湿透而且酸痛，困得要命，但又睡不着。

行李还没有卸完，将军到达的消息已经传到仅六里路外的卡塔赫纳，省行政长官和军事司令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做了安排，第二天组织群众欢迎。可是将军没有兴致。他对冒雨在公路上等候的人像老朋友那样热情地招呼，但坦率地请求他们让他独自安静一会儿。

事实上，尽管他竭力掩饰，他的身体情况比情绪更坏，侍从们也注意到他一天不如一天。他疲惫不堪。皮肤从青灰变成了带死气的黄色。他老是发烧，头痛一刻不停。神甫要去请医生，将军反对说：“如果我把医生们当一回事，我早就入土了。”他本想第二天前去卡塔赫纳，可是早晨听说港口没有去欧洲的船只，刚到的邮件中也没有他的护照，于是决定停留三天休息休息。军官们很高兴，不仅为他的健康着想，还因为私下传来的有关委内瑞拉局势的消息对他的情绪也不利。

但是他无法阻止人们不断地燃放爆竹直到火药用尽，近处安置了一个风笛手乐队，一直演奏到深夜。他们还从邻近的马里亚拉巴哈沼泽地请来一群黑人男女，穿着十六世纪欧洲宫廷服装，以非洲舞蹈的风格滑稽地跳西班牙的宫廷舞。将军上次来这里时特别喜欢，看了好几次，这次特意请了来，可是将军一眼都不看。

“叫他们离得远远的。”他说。

卡巴列罗－冈戈拉总督盖了这幢房子，在里面住过三年，屋子里常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声，据说是他的冤魂不散。将军不想再住上次住的房间，因为每晚都梦见一个头发光亮的女人在他脖子上系一条红缎带，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弄醒，直到天亮。因此他吩咐把吊床挂在厅里的铁钩上，睡了一会儿，没做噩梦。外面大雨滂沱，一群小孩趴在临街的窗口看他睡觉。一个小孩悄悄地呼唤：“玻利瓦尔，玻利瓦尔。”他在高烧的迷雾中寻找，小孩问道：

“你喜欢我吗？”

将军颤巍巍地微笑点头，接着他吩咐把整天在房子里乱跑的鸡轰走，让小孩都走开，关上窗户，重新再睡。醒来时外面还在下雨，何塞·帕拉西奥斯准备挂蚊帐。

“我梦见街上的一个小孩在窗外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将军告诉他。

将军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同意喝一杯煎剂，但是没能喝完。他一阵晕眩，又躺在吊床上，迷迷糊糊地沉思，瞅着倒悬在屋顶梁上的一排蝙蝠。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咱们要埋在别人的施舍中啦。”

他一路过来，对沿河一带向他诉说苦处的解放军旧军官和普通士兵十分慷慨，到了图尔巴科时旅费只剩下四分之一。还不知道省政府千疮百孔的金库里有没有钱兑现他那张汇票，或者有没有可能让一个投机倒把的商人贴补。到欧洲之后立即要支付安置费用，他指望英国感恩图报，因为他给了英国不少好处。“英国人是欢迎我的。”他常说。至于如何不失旧日体面地维持生活和最少限度的仆人和侍从，他指望卖掉阿罗阿的矿。话虽这么说，如果真要走的话，他和侍从的船票以及旅途花费必须明天就凑齐，而他手头的钱款还差一大截。不过他在关键时刻能发挥无穷的想象力，他不能坐以待毙。尽管发烧头痛，眼里金星直冒，他强打精神，克服了昏昏沉沉，向费尔南多口授了三封信。

第一封是给苏克雷元帅送行的来信的感情真挚的答复，其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虽然平时遇到那天下午的情况，迫切需要人们同情时他常谈自己的病痛。第二封是给卡塔赫纳的省长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的信，请他兑现那张给省金库的八千比索的汇票。“我很穷，需要这笔钱才能离开。”信中说。请求很见效，不出四天就得到了首肯的答复，费尔南多便去卡塔赫纳取款。第三封信是给哥伦比亚驻伦敦公使、诗人何塞·费尔南德斯·马德里的，请求他支付将军给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开的一张汇票和另一张给英国教授约瑟夫·兰开斯特的汇票，金额是二万比索，为了酬谢他在加拉加斯推行了一种互教互学的新型教育制度。“这件事牵涉到我的信誉。”信中说。他预计到那时候他的诉讼总该解决，矿也该卖掉了。这件事徒劳无功：信到伦敦时，费尔南德斯·马德里公使已经去世。

军官们在内宅回廊里玩牌，大声嚷嚷地争吵，何塞·帕拉西奥斯做个手势让他们安静些，但他们仍旧低声争吵，直到附近教堂敲了十一点的钟。过后不久，街上的风笛声和鼓声停息了，远处的海风带走了下午阵雨后又积聚起来的乌云，一轮皓月挂在甜橙树院上空。

将军傍晚以后一直发烧说胡话，何塞·帕拉西奥斯须臾不离。他给将军熬了一帖惯用的汤剂，用山扁豆液灌了肠，只盼望一个比他有权威的人提出请医生，但谁都不敢。将军在快天亮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小时。

那天，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带了将军在卡塔赫纳的几个好朋友来看将军，其中有玻利瓦尔派的三个有名的胡安：胡安·加西亚·德尔里奥、胡安·德弗朗西斯科·马丁和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将军挣扎着想从吊床上起来，连同大家一一拥抱的气力都没有，使那三人惊骇万分。他们参加制宪议会时见过将军，在这么短时间内见他消瘦成这副模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形销骨立，目光不能盯住一个地方。他准意识到自己呼吸的臭气和热度了，因为他总是隔得远远的、几乎侧着脸说话，但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他身材显然缩短，蒙蒂利亚将军和他拥抱时似乎觉得他只够到自己的腰部。

将军体重本来有八十八磅，临死时至少轻了十磅。据官方记录，他身高一米六五，不过他的医疗档案同军队里的档案不尽一致，在验尸台上测量的结果少了四公分。他的脚和手同身躯相比小得出奇，仿佛也缩小了。何塞·帕拉西奥斯注意到他的裤子后来长了，几乎要束到胸口，衬衫袖子也长了，要卷起袖口。将军注意到客人们的惊奇，承认说他一向穿的法国标准的三十五号靴子自一月份以来就觉得大了。蒙蒂利亚将军一向以在尴尬的情况下机智风趣而闻名，结果也变得伤感了。

“要紧的是，”他说，“阁下在我们心目中不要缩小。”

像往常一样，他说了这句风趣话后自己哈哈大笑。将军报之以老朋友的笑容，把话题扯开。天气好了，露天很适于聊天，但他宁愿坐在吊床上，就在他睡觉的厅里接待来访者。

主要的话题是全国形势。卡塔赫纳的玻利瓦尔分子拒绝承认新宪法和当选的政府官员，借口是桑坦德派的学生对议会施加了不能容忍的压力。然而忠诚的军人们由于将军的命令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支持将军的乡村教士没有机会动员起来。卡塔赫纳一个卫戍区的司令、忠于将军事业的弗朗西斯科·卡蒙纳将军几乎要发动起义，现在仍旧跃跃欲试。将军请蒙蒂利亚把卡蒙纳找来，以便亲自说服他。然后将军没有看谁，但当着所有在场的人给新政府做了一个粗暴的概括：

“莫斯克拉是个胆小鬼，凯塞多趋炎附势，两个人都被圣巴托洛梅法学院的那些小子吓坏了。”

他想说的是总统软弱，副总统是个机会主义者，会随风倒，改换门庭。他还用他脾气最坏时候的尖刻口气说，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当主教的兄弟毫不奇怪。与此相反，他认为新宪法比想象的要好一些，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危险不在于选举失败，而在于桑坦德从巴黎写信鼓动的内战。当选总统在波帕扬发出了种种维护秩序和团结的号召，但迄今没有说过是否接受总统职务。

“他在等凯塞多背黑锅。”将军说。

“莫斯克拉该到圣菲了，”蒙蒂利亚说，“他是星期一离开波帕扬的。”

将军事前不知道，但并不感到意外。“你们瞧，该行动的时候他就像尿泡那样泄气了，”他说，“那家伙当个政府的门房都不够格。”他沉思很久，愁上眉梢。

“真遗憾，”他说，“合适的人是苏克雷。”

“最杰出的将军。”德弗朗西斯科笑着说。

尽管将军竭力阻止扩散，这句话已经全国皆知。

“乌达内塔的名言！”蒙蒂利亚开玩笑说。

将军不理会他们的打岔，半真半假地想了解当地政治的内情，但蒙蒂利亚突然又回到他自己刚才打断的严肃问题上。“对不起，阁下，”他说，“您比谁都了解我是钦佩大元帅的，但他不是合适的人选。”接着，他戏剧性地强调说：

“合适的人是您。”

将军断然否定。

“我已经不存在了。”

他接着谈苏克雷元帅如何拒绝了他请元帅出任哥伦比亚总统的情况。“他具备一切条件能使我们避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将军说，“但他让自己给塞壬的歌声迷住了。”加西亚·德尔里奥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苏克雷完全没有对权力的爱好。将军觉得这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类的漫长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爱好是需要的必然产物。”他说。不管怎样，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共和国最杰出的将军所属的不是他那昙花一现的军队。

“伟大的权力存在于爱情不可抗拒的力量中。”他说，接着补充了这句调皮话：“苏克雷本人说的。”

他在图尔巴科想起苏克雷元帅时，苏克雷已离开圣菲前往基多，他灰心而孤单，但正当壮年，身体健康，声名显赫。他动身前夕办的最后一件事是秘密地去埃及区看了一个有名的女巫，女巫曾在几次战事行动之前向他指点过凶吉，这次从纸牌上看出，即使当时海上风浪较大，对他来说最幸运的还是海路。阿亚库乔大元帅认为娇妻爱女等得心急，走海路太慢，不顾纸牌的明智判断，还是决定走陆路，听其自然。

“所以我们无事可干，”将军结束说，“我们内耗太重，最好的政府也成不了气候。”

他了解当地这些支持他的人。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拥有不少头衔，可是在政治小节上热衷耍小花招，卖官鬻爵，甚至和蒙蒂利亚结盟来反对他。像对其他许多人一样，将军不说服他们决不罢休。他要求他们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得支持政府。他的理由和往常一样也有预言的味道：他去世后，他现在要求大家予以支持的政府肯定会召回桑坦德，桑坦德光荣归来，清除他理想的断砖残瓦，他多年征战、做出无数牺牲才创立的广阔统一的祖国将土崩瓦解，党派四分五裂，他的名字将遭到后世辱骂，他的事业遭到破坏。但只要目前能防止流血，这一切他都无所谓了。“暴乱就像海浪，”他说，“一浪高过一浪，因此我从来就不赞成。”最后他出乎来访者意外地说：

“你们也许不信，这几天我甚至为我们对西班牙人的做法感到遗憾。”

蒙蒂利亚将军和他的朋友们觉得一切就此结束。告辞之前，他们接受将军赠送的有他侧面像的金勋章，不禁有接受遗物之感。他们向门口走去时，加西亚·德尔里奥低声说：

“他脸上已经有了死气。”

由于房屋的回声，将军听到了这句话，一宿不痛快。可是弗朗西斯科·卡蒙纳将军第二天来时，见他气色很好，大为惊奇。将军在甜橙花飘香的院子里，躺在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挂在两株甜橙树间的吊床上，吊床是在邻近的哈辛托镇订制的，用丝线绣了将军的名字。他刚洗了澡，头发往后平梳，穿着蓝色呢上衣，有一种天真的光彩。他缓缓晃悠，向他的侄子费尔南多口授一封语气愤怒的给凯塞多代理总统的信。卡蒙纳将军觉得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久于人世，也许是因为他正在气头上。

卡蒙纳太引人注目，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不被看到，但是将军一面口授信件，指责诽谤他的人背信弃义，一面视若无睹地看着卡蒙纳。口授完毕之后才转向那个矗立在吊床前、直盯着他的大汉，招呼也不打就问道：

“你也认为我是鼓吹暴乱的人吗？”

卡蒙纳将军预料到这次接见不会对他客气，傲慢地反问道：

“将军从哪里得出这个推论？”

“就从这些推论里得出来的。”将军说。

他给卡蒙纳看刚从圣菲邮班收到的剪报，报上再次指责他暗中煽动投弹手部队哗变，企图违反议会决定重新上台。“卑鄙无耻，胡说

八道，”将军说，“我费了大劲号召团结，这些狗娘养的却说我搞阴谋。”卡蒙纳将军看了剪报大失所望。

“我不但相信，”他说，“我还希望它是真的。”

“我早料到了。”将军说。

他没有表示不高兴，只请卡蒙纳稍候片刻，等他把那封再次要求给他豁免让他出国的信口授完。完事后他已经恢复了平静，速度之快同看了剪报顿时冒火的时候一样。他没人搀扶，自己下了床，拉着卡蒙纳将军的胳臂到水池旁边去散步。

一连下了三天雨，终于放晴，阳光像黄金粉末透过枝叶繁茂的甜橙树撒落下来，鸟儿高兴地在甜橙花丛中蹦跳啭鸣。将军凝神听了片刻，几乎像是叹息地说：“幸好鸟还在叫。”然后他旁征博引地向卡蒙纳将军解释，为什么安的列斯群岛的鸟叫四月份比六月份好听，接着，他语气毫无变化，把话题转到自己的事情上。不出十分钟，他已经说服卡蒙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政府的权威。之后，他把卡蒙纳一直送到门口，自己回寝室给曼努埃拉·萨恩斯写信，曼努埃拉还在抱怨政府对她设置通信障碍。

费尔南达·巴里加做了一盘嫩玉米糙粥，端到寝室，他边写信，边喝了粥，当作午饭。午睡时，他请费尔南多把昨晚已经开始读的一本中国植物学书继续念给他听。不一会儿，何塞·帕拉西奥斯煮好一锅牛至药草汤，端到寝室让他洗热水浴，发现费尔南多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膝头是那本打开的书。将军醒着躺在吊床里，伸出食指搁在唇前，示意他别出声。两星期来，他第一次退了烧。

他等着一班又一班的邮件，拖延时间，在图尔巴科待了二十九天。他曾两度来此地，第二次才真正体会到这里有助健康的医疗作用；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从加拉加斯去圣菲阻止桑坦德的分裂计划。小城的气候对他十分合适，原先打算只住两宿，结果逗留了十天。每天都像是庆祝节日，热闹非凡，最后还举行盛大的斗牛，他本来对这种娱乐没有好感，居然亲自上场对付一头小牛，牛角挑飞了他手里的那幅红布，引起人群一阵惊呼。现在是第三次重游旧地，苦难的历程接近尾声，时间的推移加深了他的疑虑，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雨下得更频繁，更凄凉，每天干等，等来的都是坏消息。有一晚，何塞·帕拉西奥斯值夜时清醒地听到他在吊床上叹息说：

“天知道苏克雷在什么地方！”

蒙蒂利亚将军又来过两次，觉得他比第一天好多了。仿佛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劲头，尤其是他一再责怪卡塔赫纳没有履行蒙蒂利亚将军第一次来访时做出的保证，至今没有给新宪法投票，也没有承认新政府。蒙蒂利亚将军临时找了一个借口，说是卡塔赫纳方面在观望，想先知道华金·莫斯克拉是否同意出任总统。

“越早越好。”将军说。

第二次见面时，他更强烈地提出要求，因为他从小就认识蒙蒂利亚，知道蒙蒂利亚推说别人反对，其实是自己不愿意。他们两人不仅有门第和职业的友谊维系，而且可以说是同命运共生死。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冷却，到了不再交谈的程度，因为在同莫里略交战期间，蒙博克斯一役最危急的关头，蒙蒂利亚没有向将军发兵援助，将军指责他瓦解士气，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蒙蒂利亚反应十分激烈，甚至要同将军决斗，但之后还是不计个人恩怨，继续为独立运动服务。

蒙蒂利亚曾在马德里军事学院学数学和哲学，充当国王堂费尔南多七世的卫士，委内瑞拉解放的消息刚一传来，他便回到美洲。他出色地参与到墨西哥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中，在库拉索走私武器，从十七岁第一次在战斗中负伤开始，他就一直是位英勇的战士。一八二一年，他把东起里奥阿查、西至巴拿马沿海地区的西班牙人全部肃清，战胜了兵力和武器均占优势的敌军，攻占卡塔赫纳。然后他做出高姿态，同将军和解：给将军送去了卡塔赫纳城的金钥匙，将军投桃报李，提升他为准将，并下令由他负责沿海政府工作。尽管他时常用幽默感来冲淡他的霸道，但当权期间并不受人爱戴。他的住宅是全城最好的建筑，他在阿瓜斯维伐斯的庄园是全省最令人钦羡的产业之一，老百姓在墙上刷了招贴，问他购置住宅和庄园的钱是哪里来的。但是经过八年孤家寡人式的铁腕统治，他安然不动，并且成了一个狡猾而难以对付的政治家。

将军每次坚持要求，蒙蒂利亚就找一个新的理由答复。但是有一次不加掩饰地说了实话：卡塔赫纳的玻利瓦尔分子决心不宣誓遵守一部妥协的宪法，也不承认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各方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反而存在广泛的分歧。这是典型的本土政治现象，而这些分歧正是巨大的历史悲剧之因。“阁下是最开明的，如果您撒手不管，把我们交给那些以开明为幌子的人，由他们摆布，那么卡塔赫纳人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蒙蒂利亚说。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将军留在国内，防止国家分裂。

“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你让卡蒙纳再来一次，我们一起鼓动他反叛，”将军以他特有的讽刺口气说，“那比卡塔赫纳人因狂妄而挑起内战要少流一些血。”

他同蒙蒂利亚分手之前已经恢复了平静，要求蒙蒂利亚把支持他的主要领导人请到图尔巴科来，摆摆分歧意见。他等待这些人到来期间，卡雷尼奥将军报信说传闻华金·莫斯克拉已经就任总统。将军往自己前额拍了一掌。

“婊子养的！”他嚷道，“即使摆在我面前，我都难以相信。”

当天下午，蒙蒂利亚将军也来向他证实这个消息，那时狂风暴雨，树木连根拔起，城里半数房屋坍塌，将军住处的牲畜圈被冲垮，大水卷走了淹死的牲口。自然灾害也冲淡了那个坏消息带来的震惊。将军的卫队连日来无事可干，腻烦得要命，现在当仁不让，阻止了风暴造成更大的损害。蒙蒂利亚披了一件军用雨衣，指挥抢险。将军裹着毛毯，坐在窗前的摇椅上，呼吸平静，以沉思的眼神望着挟带残砖断瓦的滚滚泥水流。他从小就见惯加勒比地区的自然骤变。然而当士兵们忙于收拾住宅时，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据他记忆所及，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风暴。暴风雨终于平息时，蒙蒂利亚走进客厅，浑身湿漉漉的还在淌水，膝盖以下全是泥浆。将军仍旧一动不动地在思索。

“那么说来，蒙蒂利亚，”他说，“莫斯克拉当了总统，卡塔赫纳仍旧不承认。”

而蒙蒂利亚也不为暴风雨所动。

“如果阁下在卡塔赫纳，事情就好办了。”蒙蒂利亚说。

“那就会有被说成是我插手干预的危险，而我不想担任任何事件的主角。”他说，“而且，在事情解决之前，我就钉在这里不动了。”

当晚，他给莫斯克拉将军写了一封表示妥协的信。“我颇感意外地获悉您接受了国家总统的职位，为此，我替国家和我自己庆幸，”他写道，“但是我现在和今后都为您感到遗憾。”结尾时，他加上一段狡黠的附言：“我还未离开，因为护照没有到手，护照一发下，我肯定会走的。”

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将军星期天来到图尔巴科，加入了将军的侍从队伍。奥利里是不列颠军团的杰出成员，长期充当将军的副官和双语文书。蒙蒂利亚从卡塔赫纳陪他到图尔巴科，兴致极好，两人同将军一起在甜橙树下度过了一个融洽美好的下午。将军和奥利里长谈了他的军务之后，冒出了惯用的口头禅：

“那边是怎么说的？”

“说您要走的消息不确切。”奥利里回答。

“啊哈，”将军说，“为什么？”

“因为曼努埃丽塔[1]留了下来。”

将军以不容置疑的直率反驳说：

“可她一直是留下来的呀！”

奥利里和曼努埃拉·萨恩斯是好朋友，知道将军说的是实话。她确实从未陪同将军辗转各地，当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将军不顾一切地要逃脱正式爱情的羁绊，随便找个借口就把她留下了。“我这辈子再也不堕入情网了，”有一次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帕拉西奥斯是他可以推心置腹与之谈论这类事情的唯一的人，“那仿佛是一

身而有两个灵魂。”曼努埃拉以不可抑制的决心委身于他，也没有尊严的障碍，但是她越想拴住将军，将军就似乎越想摆脱她的锁链。那是一种不停逃避的爱情。他在基多与她厮混了两星期之后，不得不去瓜亚基尔同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会晤，而她却留了下来，自问饭吃了一半就离开的算是哪门子情人。他答应不论在什么地方每天都给她写信，以一颗流血的心向她发誓，他对她的爱比世上其他任何人更深。他确实写了信，有时甚至不是口述而是亲笔写的，只是没有发出。与此同时，他和瓜莱科阿一户阴盛阳衰的人家五个不可分离的女人打得火热，寻找安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那五十六岁的祖母、三十八岁的女儿和三个含苞欲放的孙女之间究竟要挑选哪一个。瓜亚基尔的使命结束后，他山盟海誓，答应与她们永世相爱，很快回来，结果逃脱那五个女人，回到基多，又陷进曼努埃拉·萨恩斯的流沙之中。

第二年年初，他再次扔下她去秘鲁为解放全境扫尾，那是他为毕生理想进行的最后努力。曼努埃拉等了四个月，开始收到他的信，其中不时有亲笔写的，也有将军的私人秘书胡安·何塞·桑塔纳揆情度理的杰作，她立即搭船去利马。她在马格达莱纳行宫找到了将军，那时议会已授予他独裁大权，身边都是新共和国宫廷的美貌放肆的女人。总统府搞得乌烟瘴气，卫队的一个上校半夜被寝室里的淫声浪语吵得睡不着，把铺盖搬了出去。但是曼努埃拉对这种情况深知熟谙。她生在基多，是当地一个富有的西班牙女庄园主同一个有妇之夫的私生女，十八岁时从住读的修道院跳窗出来，跟一个禁卫军军官私奔。但是两年后她在利马同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待人殷勤的詹姆斯·索恩医师结了婚，婚礼上捧着象征处女纯洁的白色橘花。因此，当她回到秘鲁追寻她的欢喜冤家时，她无须向任何人讨教，就在这个是非之地安了家。

奥利里是她在这些爱情争夺战中最好的参谋。曼努埃拉并没有住进马格达莱纳行宫，但可以随心所欲从大门进去，并且接受卫队的敬礼。她狡黠、倔强，美得使人难以抗拒，有权力感和不屈不挠的韧劲。由于丈夫是英国人，她英语流利，能讲一些简单的、让人明白的法语，玩起击弦钢琴时像初学的人那般装腔作势。她写的字歪歪扭扭，句子不忍卒读，拼法错误多得吓人，她提起时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将军指定由她保管文件档案，在身边工作，这一来他们做爱就方便了，随时随地可以云雨一番，那些亚马逊丛林野兽的喧闹也无妨碍，曼努埃拉的魅力慑服了她们。

将军出兵征服尚在西班牙人控制之下的秘鲁艰苦地区时，曼努埃拉没能随参谋部同行。她带着称得上第一夫人规格的大衣箱、档案铁箱、她的一批女奴，未经将军许可，跟着后卫队去追将军，后卫队由哥伦比亚士兵组成，对她的行伍俚语佩服得五体投地。她骑着骡子在陡峭的安第斯山脊赶了三百里路，四个月中间只捞到同将军睡了两晚，其中一晚还是她威胁说要自杀，才吓得将军就范。过了不久，她发现自己不能将他弄到手的期间，他却拈花惹草，同别的女人胡闹。其中一个是野性未驯的十八岁混血儿曼努埃丽塔·马德罗尼奥，她给将军的不眠之夜带来了销魂蚀骨的欢乐。

曼努埃拉从基多回来之后，决定甩掉丈夫，她说索恩是个枯燥乏味的英国人，爱无欢愉，言语乏味，步伐迟缓，起坐拘谨，招呼人时毕恭毕敬，说笑话时自己都不会笑。但是将军劝说她要不惜一切保持她有夫之妇的优越条件，她终于顺从了。

阿亚库乔胜利之后一个月，将军控制了半个美洲，前去日后成为玻利维亚共和国的上秘鲁。那次非但没有带曼努埃拉，临行前甚至郑重其事地向她提出，两人彻底分手为好。“我认为我们无法清白光彩

地结合，”他在给她的信中说，“尽管今后你在丈夫身边会感到孤独，而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形单影只。唯有战胜自我的光荣将成为我们的安慰。”不出三个月，他收到曼努埃拉的信，通知说她将跟丈夫去伦敦。他得知这消息时正在弗朗西斯卡·苏维亚加·德加马拉的床上，那是一个喜欢舞刀弄枪的勇猛的女人，日后担任共和国总统的加马拉元帅的妻子。将军不等当晚第二次交欢，马上坐起来给曼努埃拉写了一封像是作战命令的回信：“你得说心里话，什么地方都别去。”结尾时强调说：“我爱你，坚定不移。”她心花怒放地服从了。

将军的理想从实现之日起就开始分崩离析。玻利维亚刚一成立，秘鲁的体制重建刚一结束，派斯在委内瑞拉的分裂企图和桑坦德在新格拉纳达的政治诡计就令他十万火急地赶回圣菲。这次曼努埃拉花了不少时间才磨得他同意她随行，出发时像是吉卜赛人迁移，十多头骡子驮着衣箱，还有一批千秋万代的女奴，十一只猫，六条狗，三只学会了宫廷淫秽动作的猴子，一头会穿针引线的驯熊，九笼能用三种语言臭骂桑坦德的鹦鹉和金刚鹦鹉。

她到了圣菲，恰好赶上九月二十五日那个晦气的夜晚，救了将军的残命。他们相识五年，可是他显得老态龙钟，疑虑重重，似乎已经过了五十年，曼努埃拉觉得他像是在荒山僻野的迷雾中漫无目的地摸索。不久之后，他将回南方去制止秘鲁对基多和瓜亚基尔的殖民野心，但是一切努力已经没用了。曼努埃拉留在圣菲，没有再追随他的劲头，因为她知道那个老是逃避她的人现在已经山穷水尽。

奥利里在回忆录里说，在图尔巴科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将军一反常态，自发地回忆叙说他的风流韵事。蒙蒂利亚认为那是衰老的明显

症状，多年后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还提起此事。蒙蒂利亚看到将军谈锋很健，无话不说，情不自禁地提了一个亲热的、带有挑惹性的问题。

“只有曼努埃拉忘不了吧？”他问道。

“谁都忘不了，”将军一本正经地说，“不过尤其是曼努埃拉。”

蒙蒂利亚朝奥利里眨眨眼说：

“说老实话，将军，一共有几个？”

将军回避了直接答复。

“比您想象的要少得多。”他说。

将军晚上洗热水浴时，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澄清疑问。“照我算来一共是三十五个，”他说，“当然不包括那些只睡一晚的堂客。”这个数目同将军自己的计算相符，不过他下午不愿说出来罢了。

“奥利里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战士、忠实的朋友，不过他什么都要摘记，”将军解释道，“用文字保留的记忆比什么都更危险。”

第二天，将军单独同奥利里谈了好长时间，了解边境的情况，然后请他去卡塔赫纳，表面上是打听去欧洲的船只航行日期，真正的任务却是刺探当地政治的隐秘细节，随时向他汇报。奥利里差点没有赶上。六月十二日星期六，卡塔赫纳议会宣誓效忠新宪法，承认了当选的政府长官。蒙蒂利亚把这一消息通知给将军时，免不了给他捎一个信：

“我们等您来。”

正等待时，传说将军去世，蒙蒂利亚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没有时间核实这个消息，火烧火燎地赶到图尔巴科，发现将军正同法国伯爵雷治库特共进午餐，精神比任何时候都好。雷治库特来邀请将军搭乘一艘下周抵达卡塔赫纳的英国邮轮，一起去欧洲。那一天过得十分快意。将军希望用精神力量来对付他虚弱的身体状况，谁都不能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一早起身，在挤奶的时候去牲口棚遛了一圈，看望了投弹手的营房，询问他们的生活条件，命令加以切实改善。回来时，在集市小酒店歇了歇脚，喝了咖啡，带走了用过的杯子，免得人家销毁使他难堪。快到住处时，放学的小孩出其不意地在街角围住他，一面拍手，一面有节奏地喊着：“解放者万岁！解放者万岁！”他给弄迷糊了，假如孩子们不主动让路放他过去的话，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雷治库特伯爵事先没有通知已等在他住处，带来的一位妇女，容貌之秀媚、衣着之华丽、气派之高傲，他生平所未见。尽管他们是乘一辆敞篷驴车来的，她却做骑马的打扮。她只透露自己名叫卡米尔，是马提尼克人。伯爵没有做任何补充，不过那天在做客时显而易见地流露出他爱她爱得发狂。

卡米尔的在场使将军恢复了以往的兴致，他吩咐马上准备筵席。伯爵能说地道的西班牙语，但席上的交谈是用卡米尔的母语法文进行的。当她提起她出生在特鲁瓦齐莱时，将军眉飞色舞，憔悴的眼睛顿时闪光。

“啊，”他说，“那是约瑟芬出生的地方。”

她莞尔一笑。

“对不起，将军阁下，谁都会提起拿破仑的情妇，我原指望一个更聪明的评论。”

他显得有点尴尬，于是把话题转到拉帕吉里的榨糖厂，法兰西女皇玛丽·约瑟芬的老家所在地，隔着绵亘几里的甘蔗地，凭禽鸟的喧闹声和蒸馏器暖烘烘的气味，就能辨出。他滔滔不绝，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象。她为将军如此熟悉而感到吃惊。

“事实上我从未到过那里，也没有到过马提尼克岛的任何地方。”他说。

“是吗？”她说。

“我多年来看书准备，”将军说，“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需要这些知识来讨那个岛上最美丽的女人的欢心。”

他穿着印花棉布裤、缎子上衣和红色便鞋，不停地说话，嗓子都哑了，但仍旧娓娓动听。她注意到餐厅里有一股古龙水的幽香。他承认说这是他的偏爱，为此还遭到政敌的攻击，指责他在古龙水上耗费了八千比索的公款。他仍像前一天那么形容憔悴，但疾病给他的严重摧残只能从他极小的食量上看出来。

同男人们一起时，将军的粗话可以说得比最不要脸的盗马贼更难听，但是只要有一位妇女在场，他的举止语言就温文尔雅，几乎到了做作的程度。他亲自开了一瓶上好的博尔戈尼亚葡萄酒，品尝一下，给大家斟上，伯爵毫不难为情地夸奖说像天鹅绒那么醇厚。上咖啡的

时候，伊图尔比德上尉凑在将军耳边说了几句话。将军严肃地听着，然后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开怀大笑。

“各位请听，”他说，“卡塔赫纳来了一个代表团参加我的葬礼。”

他吩咐有请，蒙蒂利亚和随从人员只得硬着头皮进来。副官们召来几个从昨晚开始就在附近一带演奏的风笛手，一群老年男女为客人们跳了昆比亚舞。那种源出非洲的民间舞蹈如此优美，卡米尔惊叹不已，也想学学。谁都知道将军是跳舞好手，饭桌上有人回忆说将军上次在图尔巴科跳过昆比亚舞，精彩得像是舞蹈大师。卡米尔请他跳时，他却谢绝了。“三年是很长的时间。”他笑着说。她稍经指点，独自一人跳了起来。音乐暂停时，突然传来欢呼声和一连串爆炸和火器的射击声。卡米尔吓得玉容失色。

伯爵正经八百地说：

“糟糕，是革命！”

“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革命，”将军笑着说，“不幸的是，那只是在斗鸡。”

他刚喝完咖啡，几乎不假思索地用手挥了一个圆圈，请大家去斗鸡场。

“跟我一起去吧，蒙蒂利亚，看看我死到了什么程度。”他说。

那是下午两点来钟，他带了以雷治库特为首的一大批人到了斗鸡场。但是在那种清一色男人聚集的场合，大家都盯着卡米尔，谁都不注意将军。在一个禁止妇女入内的场所，谁都认为那个光彩照人的妇

女是他众多的相好之一。说她是跟伯爵一起更没有人相信，因为众所周知，将军常常让别人陪着他的秘密情妇，掩人耳目。

第二场搏斗十分激烈。一只赤羽公鸡用力猛踢两下，剜出了对方的眼睛。那只瞎眼公鸡不肯认输。它被激怒得猛扑猛撞，终于弄断对方的脖子，啄食了它的脑袋。

“我从未见过这么血腥的游戏，”卡米尔说，“不过我挺喜欢。”

将军向她解释说，如果用下流的叫喊刺激公鸡，朝天开枪，它们斗得更凶，不过那天下午不让这么干，因为有一位妇女在场，尤其是如此美丽的妇女。他挑惹地瞅着她说：“看来得怪您了。”她高兴地笑了：

“要怪您，阁下，您管理这个国家多年，竟然没有制订一条法律，规定不论有没有妇女在场，男人的表现都应该一样。”

他开始有点失态。

“请您别称呼我阁下，”他说，“那太见外了。”

当晚，何塞·帕拉西奥斯替将军准备好了没了劲儿的草药汤，让他泡在澡缸里之后说：“那个女人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看的。”将军没睁眼说：

“讨厌透了。”

根据一般人的判断，他在斗鸡场露面是有预谋的行动。最近几天，他的病情严重，谁都不怀疑他死亡的谣传，他露了面可以让种种

说法不攻自破。将军的露面也确有成效。从卡塔赫纳发出的邮件将他身体状况良好的消息带往各处，他的支持者们也举办聚会大肆庆祝，但少了几分欢乐，多了些挑衅的意味。

将军甚至骗过了自己的身体，以后几天他精神仍旧很好，居然能再次坐到他副官们的牌桌前同他们玩牌。副官们没完没了地打牌解闷，消磨时间。安德烈斯·伊巴拉年纪最轻，性情开朗，还保持着战争的浪漫感，那几天写信给基多的一个女朋友说："我宁肯在你怀里死去，也不愿过这种没有你在身边的和平日子。"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玩牌，有时潜心琢磨牌张的奥妙，有时大叫大嚷地争吵，无时不受蚊子的骚扰。那几天是雨季，尽管值日的勤务兵一直烧着牛屎马粪，蚊子白天都出来叮人。自从瓜杜阿斯那个倒霉的夜晚之后，将军再没有玩过牌，因为同威尔逊之间的不快给他留下了苦涩的回味，他要从心头抹去。他虽然不玩牌，却在吊床上听他们大叫大嚷，听他们说心里话，在逃避现实、无所作为的和平日子里怀念战争。一晚，他在住处转了几圈，情不自禁地在走廊上站住。他对脸朝着他的人做手势，让他们别出声，走到安德烈斯·伊巴拉背后，两手像鹰爪似的搭在伊巴拉肩上，问道：

"好兄弟，告诉我，您是不是也觉得我面有死色？"

伊巴拉对这种举动习以为常，根本没有回头。

"将军，我可没有那种感觉。"他说。

"那你准是瞎子，或者是骗子。"将军说。

"或者是因为背朝着您。"伊巴拉说。

将军对牌局发生了兴趣，坐下来一起玩。对于大家来说，不仅那一晚，而且在以后的几个晚上，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护照下来之前只能这样干等着。”将军说。但是何塞·帕拉西奥斯再次对他说，尽管有牌消遣，尽管他表示关怀，随同他的军官对这种毫无目的的来回折磨厌烦得要命，不是他所能扭转的。

他比谁都更关心他手下军官的命运，关心他们的日常琐事和前途，但是当问题到了无法补救的地步，他只能自欺自慰。自从同威尔逊发生矛盾，在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期间，他时常抛开自己的痛苦来考虑军官们的事。威尔逊的行为简直难以置信，只有极度失望才能引起如此粗暴的反应。“他和他父亲一样，是了不起的军人，”将军见了他在胡宁的战斗表现时说，“并且比他父亲谦虚。”塔尔基战役之后，苏克雷元帅提升威尔逊为上校，威尔逊不肯接受，是将军强迫他同意的。

无论平时或战时，将军要求大家遵守的不仅是铁一般的纪律，而且是非凡的忠诚。尽管没有正规训练，他们都是合格的军人，长年战斗，几乎没有驻扎的机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追随将军左右进行独立战争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贵族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转战各地，远离家庭妻儿，抛下了一切，客观需要使他们成为政治家和治国人才。除了伊图尔比德和几个欧洲副官之外，其余都是委内瑞拉人，并且几乎都是将军的血亲或盟姻亲属：费尔南多，何塞·劳伦西奥、伊巴拉弟兄、布里塞尼奥·门德斯。阶级和血统的维系使他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的情况不同，他是洛斯利亚诺斯一个叫埃尔蒂纳科的小镇上的接生婆同马格达莱纳河上一个渔夫的儿子。由于父母的关系，他皮肤黝黑，属于低下的黑白混血阶级，但是将军让

他同自己的一个外甥女费莉西亚结了婚。他十六岁志愿应征参加解放军，五十八岁升为司令，几乎经历了独立战争的全过程，身经五十二战，受过各种武器造成的十五次重伤、无数次轻伤。他的黑皮肤给他造成的唯一不快是在一次盛大舞会上邀请当地一位贵族夫人跳舞遭到拒绝。将军当场要求乐队重新演奏那支华尔兹，自己同他跳。

奥利里将军是另一个极端：金黄头发，高大身材，斜纹料子制服更使他显得英俊潇洒。他十八岁时来到委内瑞拉，在红装骑兵队当旗手，参加了独立战争的几乎全部战役，凭军功晋升到现在的级别。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有倒霉的时候。当桑坦德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发生争执，将军派他去寻求和解途径时，他支持了桑坦德。将军十四个月不同他打招呼，让他自生自灭，后来才消了这口怨气。

他们各自都有无可争辩的优点。问题出在将军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他们面前耸立的权力堡垒，他越觉得自己平易近人，仁慈宽容，这个堡垒越是难以逾越。何塞·帕拉西奥斯向他指出军官们情绪低落的那个晚上，他很随和地同军官们玩牌，输得高兴，直到他们感到舒畅。

他们显然没有因以前的挫折而留下心理负担。他们并不介意盘踞在心头的挫败感，即便赢得战争的是他们。他们不计较将军为了避免特权之讥而迟迟不给他们晋升，也不计较背井离乡、浪迹天涯、难得同女人作乐的生活方式。由于国家财政短绌，军饷已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并且往往要拖后三个月，发的还是没有把握兑现的国库券，他们拿到后只能折价卖给投机商，这一点他们也不在乎。正如他们不在乎将军断然离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回响波及全世界，甩下他们任由敌人处置。这一切毫无关系：光荣全属于别人。他们不能忍受的是将

军决定放弃权力以来在他们心里引起的捉摸不定的情绪，尤其是这次没完没了、漫无目的的旅行更难以忍受。

那天晚上，将军特别高兴，洗澡时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他和他的军官们亲密无间。然而军官们的印象是他们激发出的不是将军感激或内疚的心情，反而是信任丧失的萌芽。

对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尤其如此。自从那晚在舢板上谈话以来，他一直显得很孤僻，不自觉地授人以口实，说他同委内瑞拉的分裂派有接触。或者像当时人们所说，他变得离心离德。四年前，将军已经对卡雷尼奥、奥利里、蒙蒂利亚、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桑塔纳等怀有戒心，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想靠军队出风头。像四年前一样，将军现在派人注意卡雷尼奥的行踪，打听所有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想在猜疑的黑暗中发现一丝亮光。

有一晚，将军也不知道自己是睡是醒，听到卡雷尼奥在隔壁房间里说，为了祖国的利益，采取任何手段，甚至背信弃义，都是正当的。将军当即拉着他的胳臂，走到院子里，用只有在紧要关头才使用的亲密口吻和不可抗拒的魅力把他说得服服帖帖。卡雷尼奥说了实话：将军听任自己的事业随波逐流，扔下大家无依无靠，确实使他有怨气。但是他背弃将军的动机是出于忠诚。这样漫无目的地旅行，找不到一线希望，使他感到厌烦，他不能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于是决定逃往委内瑞拉，领导一场维护美洲完整的武装运动。

“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堂堂正正的了。”他最后说。

“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会在委内瑞拉得到更好的待遇吗？”将军问他。

卡雷尼奥不敢肯定。

“嗯，至少那里是祖国。”他说。

“别冒傻气啦，”将军说，“对我们说来，祖国是美洲，到处都一样，无可救药。”

将军不让他再讲下去了。自己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仿佛每句话都是从心底里掏出来的，尽管卡雷尼奥也好，别人也好，谁都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最后，将军拍拍他肩膀，在黑暗中离开了他。

“别胡思乱想啦，卡雷尼奥，”将军说，“这事到此玩完。”

---

[1] 曼努埃拉的昵称。

六月十六日，星期三，将军获悉政府已经确认议会授予他终身年金的决定。他向费尔南多口授一封给莫斯克拉总统的正式信件，说明已接到通知，语气不无讽刺，结尾时模仿帝王以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并化用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的口头禅：“我们有钱了。”二十二日，星期二，他收到出国护照，高举着挥舞说：“我们自由了。”两天后，迷迷糊糊睡了一小时醒过来时，他在吊床上睁开眼睛说：“我们真伤心。”他决定趁天阴凉快，立即前往卡塔赫纳。他唯一的特殊命令是侍从军官一律穿便服，不带武器。他不做任何解释，没有流露任何可供揣测的迹象，也没给大家辞行的时间。他的私人卫队准备就绪后，大家立刻动身，行李由其余的人随后带去。

将军以往旅行时常常半路上停下来了解民间疾苦。他遇到人什么都问：子女多大了，害的是什么病，买卖怎么样，对各种问题有什么看法。这次他只顾赶路，一言不发，没有咳嗽，没有疲劳的迹象，整整一天，除了一杯葡萄酒外，没有进饮食。下午四点钟，波帕山上那座老修道院的轮廓已遥遥在望。那正是祈祷的时候，从公路上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信徒像蚂蚁似的登上陡峭的山脊。稍过不久，又见到那些终古常新的兀鹫群在集市和屠宰场污水沟上空盘旋。看到城墙时，将军向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做个手势。卡雷尼奥策马赶到他身边，伸出壮实的胳臂，让他搭扶着。“我派你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将军低声对他说，“一进城，你帮我打听苏克雷在什么地方。”他像往常那样在卡雷尼奥背上轻轻一拍，分手时说：

“当然，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

蒙蒂利亚带了一大群人在公路上恭候，将军不得不换乘那辆由两头健骡拉的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旧四轮车。太阳快下山了，砍下的红树树枝在城市周围的沼泽里给烤得像是煮开了似的，发出的恶臭不亚于海湾的污水，一个世纪以来，屠宰场排放的血水和废料严重污染了海湾。他们从半月门进城时，一群兀鹫受惊从集市腾空飞散。城里还有惊慌的迹象，因为上午有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咬伤了几个年龄不等的人，其中有一个不该在那一带晃悠的卡斯蒂利亚白种女人。疯狗还咬了奴隶区几个小孩，终于被人们用石块砸死。死狗给吊在学校门口的树上。蒙蒂利亚吩咐把它火化，不仅为了卫生，还为了防止人们拿它来施行非洲巫术。

城里的居民听到紧急公告，纷纷聚集在街上。六月交夏至，下午开始变长，阳光很充足，沿街的阳台上有花环和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妇女，教堂的钟声、军乐队的乐声和礼炮声一直传到海边，但是掩饰不了城里悲惨的气氛。将军坐在那辆破旧的四轮车上，挥舞帽子向人群致意，但是同一八一三年八月胜利开进加拉加斯时相比，这次寒碜的欢迎不由他不感到凄凉。那次他头戴桂冠，坐着一辆由城里最漂亮的六个姑娘拉的敞篷彩车，在热泪盈眶的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正是在那天人们给了他一个光荣不朽的称号：解放者。加拉加斯当时还是殖民省份的偏远城镇，丑陋、灰暗、建筑低矮，但是抚今追昔，阿维拉的下午简直使人心碎。

那次和今天不像是同一个人经历的两件往事。因为那个濒临加勒比海的高傲而英勇的卡塔赫纳城数度充当总督领地的首府，千百次被歌颂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今天面目全非。它经历了九次陆海围困，多次遭到海盗和将军们的洗劫。然而给城市带来最严重破坏的还是独立战争和以后的派系之争。黄金时代的富户都已逃亡。旧时的奴

隶获得无用的自由后茫然失措，被穷苦人占住的王公贵族的邸宅里现在常有比猫还大的耗子窜到街上的垃圾堆。西班牙国王堂腓力二世当初想在埃斯科里亚尔大修道院的瞭望塔上用望远镜看到的要塞圈，如今荆棘丛生，当年龙盘虎踞的气势荡然无存。十七世纪由于贩卖奴隶而蓬勃发展的商业现在只剩下少数破败的店铺。当年的繁荣景象变成了露天垃圾堆的恶臭，说什么都难以使人相信。将军在蒙蒂利亚耳边叹息说：

“这场狗屁独立让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蒙蒂利亚邀请了城里的头面人物，当晚在他位于制造厂街的私邸聚会，那原是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住宅，侯爵在世时经济拮据，侯爵夫人却靠走私面粉和贩卖黑奴发了大财。城里的大户人家那晚像过复活节似的灯光通明，但是将军不存幻想，因为他知道加勒比地区的风俗，无论什么事情，甚至死了一个知名人士，都可以成为庆祝欢闹的理由。事实上那也是一次虚假的庆祝活动。几天前，城里就出现攻讦的传单，反对党唆使他们的团伙扔石块砸玻璃窗，棍棒交加地同警察干架。“幸好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可砸的玻璃窗了。”蒙蒂利亚一向爱说笑话，其实他也清楚，民众的愤怒主要是针对他而不是针对将军。他调动了地方军队加强卫队，在周围戒严，不准向客人透露街上处于战争状态。

雷治库特伯爵那晚去通知将军，英国邮轮已到博卡奇卡要塞的海面上，但是他不准备走了。公开的理由是他不想同一大群妇女挤在邮轮唯一的客舱里共渡远洋。事实是尽管将军在图尔巴科的宴会和斗鸡场上做了非凡的努力来克服他身体的虚弱，伯爵知道他不宜远行。他认为将军的精神状态也许能忍受远洋航行，身体却支持不住。伯爵不

想帮死神的忙。不过这些和其他许多理由都不能使将军在那晚改变决定。

蒙蒂利亚不认输。他早早打发了客人。说是让病人早点休息，但自己留住将军在室内阳台上聊到很晚。一个披着几乎透明的薄纱长袍、娇柔无力的少女用竖琴为他们演奏了七支爱情的浪漫曲。乐曲如此美妙，弹得又如此富于感情，因此在海洋的微风吹走空中的余音之前，两个军人都没有谈话的心思。随着竖琴声浪的起伏，将军坐在摇椅上睡着了，突然他心里一震，声音极低但清晰有韵地唱出最后一支乐曲的全部歌词。最后，他转向演奏竖琴的少女，喃喃向她由衷地表示感谢，但少女已经离去，只有那架挂着凋谢月桂叶环的竖琴。这时他想起一件事。

“有个男人因为正当杀人，现在监禁在翁达。”他说。

蒙蒂利亚还没有说出俏皮话，自己先笑了。

“他的角是什么颜色[1]？”

将军不理睬，只是详细介绍了案情，删去了他自己同米兰达·林赛的一段韵事。蒙蒂利亚有了容易的解决办法。

“他可以要求出于健康原因转到这里服刑，”蒙蒂利亚说，“到了这里后我们再安排特赦。”

“可以这么做吗？”将军问道。

“不可以，”蒙蒂利亚说，“但就这么做。”

将军合上眼睛，对群狗夜间突如其来的乱吠起哄不闻不问，蒙蒂利亚以为他又睡着了。经过冥思苦想之后，他再次睁眼，了结了这件事。

“我同意，”他说，“但是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这时他才注意到以城里为中心向远处沼泽地扩散的狗吠声，沼泽地那边有的狗被训练得不出声，以免暴露它们的主人。蒙蒂利亚将军告诉他，为了防止狂犬病蔓延，他们在药杀街上的野狗。奴隶区被咬的小孩只找到两个。其余的像以往一样，被父母隐藏起来，让他们在自己信奉的神道下死去，或者把他们带到政府鞭长莫及的马里亚巴哈沼泽地逃亡奴隶的窝棚里，试图用巫术救他们的命。

将军从没有取缔那种不幸风俗的打算，但是把狗药死的做法在他看来太不人道。他像爱马爱花一样爱狗。第一次赴欧时，他把两只小狗一直带到维拉克鲁斯。他率领四百名赤脚的委内瑞拉人，翻越安第斯山脉去解放新格拉纳达、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时带了十多条狗，战争期间一直有狗在他身边。最著名的一条狗内华多，从最早的战役开始就跟着他，单打独斗击溃了西班牙军队二十条猛犬的围攻，最后在卡拉博博第一次战役中被长矛刺死。在利马时，曼努埃拉·萨恩斯在马格达莱纳庄园除了养各种各样的许多动物外，还饲养了狗，数量多到简直照顾不过来。有人对将军说，一条狗死后，应该立刻用另一条同样品种、同样名字的狗代替，以为还是死去的那条。将军不同意。他不希望相同，以便回忆起它们不同的特点、它们渴望的眼神和急切的呼吸，并为它们的死去而悲伤。九月二十五日那个倒霉的夜晚，他把被阴谋分子杀掉的两条猎犬也列入袭击牺牲者的名单。这次旅行，他带着剩下的两条狗和那条从河里救出的无关紧要的猎犬。蒙蒂利亚

告诉他第一天就药死了五十多条狗，把他刚才听了竖琴演奏后的愉快心情一扫而光。

蒙蒂利亚深感抱歉，保证说再不弄死野狗了。这个保证使将军平静一些，并非因为他相信能兑现，而是因为他手下军官的好意给了他安慰。美好的夜晚使他心旷神怡。灯火辉煌的院子里茉莉芳香袭人，空气晶莹像是钻石，天上的星星比哪一晚都多。“像是四月的安达卢西亚。”他以前回忆起哥伦布城时，也说过这样的话。风向一转，吹走了声音和香气，只听到城墙外面的涛声。

“将军，”蒙蒂利亚恳求道，“您别走啦。”

“船已经在港口。”他说。

“还有别的船。”蒙蒂利亚说。

“还不是一样，”他反驳道，“总得乘上一艘。”

他毫不让步。蒙蒂利亚多次恳求都碰了壁，别无他法，只能透露他发誓保守到最后一刻的秘密：以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为首的一批玻利瓦尔派军官准备于九月初在圣菲搞政变。出乎蒙蒂利亚意外的是将军并不感到惊奇。

“先前我不知情，”他说，“不过不难料到。”

于是蒙蒂利亚向他披露了军事阴谋的细节，按照委内瑞拉军官们的说法，全国忠于玻利瓦尔的驻军都在酝酿。“不合情理，”他说，“如果乌达内塔真想整顿全局，该和派斯协调，重复过去十五年的历史，从加拉加斯进军直至利马。从利马再到巴塔戈尼亚就如入无人之境了。”但他在上床睡觉之前，没有把门完全关死。

“苏克雷知道吗？”他问道。

“他是反对的。”蒙蒂利亚说。

“当然啦，由于他同乌达内塔不和。”将军说。

“不，”蒙蒂利亚说，“凡是妨碍他去基多的事，他都反对。”

“不管怎么样，该同他商量，”将军说，“同我谈是白费时间。”

这仿佛是他的最后决定。如此坚决，第二天一早就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趁邮轮在海湾时把行李装船，还请船长把船停泊在圣多明戈要塞前面，他从住所的阳台上能够看到。安排得十分具体，由于他没有说谁随同，军官们以为他一个人都不带。威尔逊从一月份开始就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不同任何人商量把行李装了船。

六辆大车装着行李朝海湾码头驶去，即使最不信他会离开的人见到这情景也去向他告别。雷治库特伯爵，这次由卡米尔陪同，是午餐会上的贵宾。卡米尔的头发梳成一个髻，显得更年轻，眼神也不那么冷酷，身穿一件绿色长袍，脚下是同样颜色的便鞋。将军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掩饰见到她的不快。

“对自己的美貌极有把握的夫人才穿绿颜色。”他用西班牙语说。

伯爵马上翻译，卡米尔无拘无束地笑了，房间里顿时洋溢着她口嚼的豆蔻芳香。“咱们今天不再斗嘴了，堂西蒙。”她说。两人都有点变化，因为谁都不敢像第一次那样抬杠，以免刺痛对方。卡米尔把将军冷在一边，自己像蝴蝶似的在一群有教养的、学了法语专门准备

应付这类场合的人中间翩翩周旋。将军去找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聊天。修士是个圣洁的人，当洪堡一八〇〇年路过卡塔赫纳染上天花时，修士救了他的命，因此享有很高威望。唯有修士本人不把它当作了不起的事。“上帝安排有些人得天花死去，有些人不死，男爵只不过属于后者而已。”他总是这么说。将军听说修士能以芦荟为主药治三百多种不同的疾病，上次来这里时就希望见见他。

何塞·帕拉西奥斯从港口带了正式通知回来说，邮轮午饭后驶到邸宅对面，蒙蒂利亚便命令准备检阅欢送。六月午后太阳毒辣，他还下令在将军从圣多明戈要塞乘坐的小艇上搭好布篷。十一点钟，邸宅里摆好了一溜长饭桌，美味佳肴，水陆俱陈，大厅里挤满了应邀和自发前来的客人，闷热得透不过气。突然一阵骚动，卡米尔正莫名其妙时，听到耳旁有一个衰弱无力的声音：“请，夫人。”将军帮她从每盘菜肴里取一点，同时解释名称、烹调方法和起源，然后自己也取了一份，分量之多令他的厨娘大吃一惊。一小时前，她为将军做了远比现在可口的食物，将军却没有下咽。然后，他带着卡米尔挤出寻找座位的人群，来到有热带奇花异葩布置的室内阳台，开门见山地说：

“要是我们在金斯敦会面就太高兴了。”

“那再好不过了，”她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特别喜欢兰岭。”

“独自一人吗？”

“不管同谁一起去，我总是独自一人。”她说。然后又调皮地加了一句：“阁下。”

他笑着说：

“那我通过希斯洛普找你。”

他们就说了这些。他再领着她穿过大厅到原来的地方，像对舞结束时那样弯身告别，把那盘没有碰过的食物放在窗户的托架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了不走的决心，也不知原因何在。政客们正缠着他大谈地区分歧时，他突然转向雷治库特，没头没脑地说：

“您说得对，伯爵先生。我身体这么糟糕，在那么多妇女中间能干什么？”说话声音很高，让大家都能听到。

“对，将军。”伯爵舒了一口气，赶紧又找补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要来，那是一条英国三桅船，不但有好舱房，还有一位好医生。”

“医生比一百个女人更坏事。”将军说。

不管怎样，邮轮没有客舱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船长的一个副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舱房让出来，直到牙买加。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用他那句一贯正确的话说明了确切的情况：“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再说，即使那次想走也走不成，因为邮轮开到圣多明戈要塞接他时搁了浅，损坏严重。

于是他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不继续住在蒙蒂利亚的邸宅。将军虽然认为它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靠近海边，太潮湿，冬季更受不了，因为他夜间盗汗，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有利于他健康的不是高墙四筑、深宅大院的环境。蒙蒂利亚把这理解为他将长期逗留的迹象，急忙设法满足他的要求。

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

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

“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2]。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

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将军阁下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姑娘仍旧不信。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

“你原封不动地走了。”他说。

她咯咯笑着回答：

“跟阁下您睡过一夜的，谁都不可能原封不动。”

她像所有别的女人那样走了。许多女人卷进他的生活，不少只是短短几小时，但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表示过要她们留下来的意思。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

那晚姑娘离去后，他立即起来，同伊图尔比德和别的在院子里围着篝火的军官们待在一起聊天。他让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弹吉他，为伊图尔比德伴奏，一直唱到天明，从他点唱的歌曲上大家都觉察到将军情绪低落。

他第二次访欧归来后，对当时的流行歌曲着了迷，在加拉加斯贵族后裔们的婚礼上，他常常大声歌唱，风度翩翩地跳舞。战争改变了他的爱好。从民间汲取灵感的浪漫歌曲伴随他度过了初恋的惶惑，但如今已被华彩的华尔兹和雄壮的进行曲取而代之。在卡塔赫纳的那个晚上，他再次要听青年时代的歌曲，有几支太老了，伊图尔比德当时还是小孩，记不起来，还得由将军教他。将军越来越忧伤，听众们陆续散去，最后篝火余烬旁只剩下他和伊图尔比德两人。

那一夜很怪，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海风刮来了孤儿的哭声和腐败花木的气味。伊图尔比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能呆呆地瞪着凉透

的篝火灰烬直到天明，眼睛都不眨一下，同样也能不停地唱歌，彻夜不眠。将军用棍子拨着篝火，打破了他的沉思：

“墨西哥有什么消息？”

“我在那边没有亲友，”伊图尔比德说，“我是被流放的。”

“我们这里的人都一样，”将军说，“自从运动开始以来，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在半个世界东奔西颠。你想象不出我现在多么希望在圣马特奥吃一锅嫩肉。”

他的心思确实也飞到调皮捣蛋的童年时代，瞅着行将熄灭的篝火，缄默无声。他再开口时，已经回到了现实。“让人恼火的是，我们不再是西班牙人以后[3]，仍然辗转各地，而那些国家一夜之间就能改换国名，改组政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了。”他说罢又盯着余烬，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用另一种口气问道：

“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您怎么会来这儿？”

伊图尔比德的回答绕了一个大圈。“我们在军事学院学的是纸上谈兵，”他说，“我们把铅铸小兵摆在沙盘上打仗，星期天教官把我们带到附近有牛群放牧、妇女们做完弥撒回来的草场，上校发射一枚炮弹，让我们熟悉一下爆炸声和硝烟气味。你要知道，教官中最负盛名的只是一个残废的英国人，他教我们怎么从马背上摔下来装死。”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

“而您喜欢真刀真枪的战争。”

“我喜欢您指挥的战争，将军。但是我入伍快两年了，还不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的。”

将军不敢正视他。“那您走错了地方，”他说，“这里除了自相残杀外不会有别的战争，这简直像是在杀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暗处提醒他天快亮了。将军用棍子拨散了篝火的余烬，扶着伊图尔比德的手臂站起身说：

“如果我是你，会趁现在还不丢脸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直到死前都经常说波帕山麓的房子不吉利。他们还没有安顿好，海军上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就从委内瑞拉带来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已经不承认分裂主义的政府，一个支持将军的新政党力量逐渐壮大。将军单独接见使者，仔细听他汇报，但并不显得十分热情。“好消息，不过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病人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吩咐好好款待使者，但不做任何答复。

“我认为对祖国没有好处。”他说。

马查多上尉一下去，将军便转向卡雷尼奥问道：“你打听到苏克雷下落没有？”打听到了：五月中旬离开了圣菲，以便及时赶回去同妻女一起过他的命名日。

“去的正是时候，”卡雷尼奥结尾说，“莫斯克拉总统同他在波帕扬的路上相遇。”

“怎么搞的！”将军吃惊地说，“他走陆路？”

“不错，将军。”

“糟啦！”他说。

将军预感情况不妙。当天晚上，他接到消息：六月四日苏克雷元帅经过昏暗的贝鲁埃科斯地区时遭到伏击，被人打冷枪从背后暗杀。蒙蒂利亚来报告这个坏消息时，将军刚洗完澡，不等说完，将军拍了自己额头一掌，肝火大发，把桌上还没有收掉的晚饭餐具全扫到地上。

“婊子养的！”他吼道。

摔破餐具的轰响还在屋子里回荡，将军已经恢复了自制。他倒在安乐椅里嚷道：“是奥万多干的。”一连说了几遍：“是奥万多干的，西班牙人收买的凶手。”他指的是帕斯托司令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将军，驻在新格拉纳达南部边境。这一来，奥万多除掉了将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确保自己可以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总统宝座，以便日后让给桑坦德。阴谋分子之一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从圣菲广场商定暗杀计划的一幢房子里出来时，看到苏克雷元帅披着黑呢大氅，戴着一顶旧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独自一人冒着傍晚寒雾在教堂庭院散步，这时他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将军得悉苏克雷惨死的当晚大口大口地吐血。像在翁达的时候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隐瞒了这件事。上次他趴在浴室地上用海绵擦去了血迹。他两次都保守了秘密，尽管将军没有要他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不能雪上加霜，给大家添上坏消息。

在瓜亚基尔时，将军有一晚意识到自己的未老先衰。以前他头发长及双肩，用丝带在后脑扎成一束，打仗和做爱时比较利索。那晚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面容憔悴忧伤。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你见到我可能不认识了。我四十一岁，但像是六十岁的老人。”当晚他剪去了头发。不久后，他去波托西，为了延缓急速流逝的青春年华，他剃掉了鬓角和胡髭。

苏克雷遭到暗杀之后，再怎么化妆也掩饰不了他的苍老。悲痛笼罩着波帕山麓的房子。军官们不再玩牌，围坐在院里驱散蚊虫的篝火旁，或者躺在集体卧室高低错开的吊床上，聊得很晚，甚至彻夜不眠。

将军点点滴滴表达他的悲愤。他随意找两三个军官，向他们诉说心底的隐痛，谈到深夜。他再次对他们唠叨，由于桑坦德的卑鄙，他的军队几乎瓦解，桑坦德当时代理行使哥伦比亚总统职权，不肯发兵发饷，让他完成秘鲁的解放。

“他生性吝啬，”将军说，“头脑更为简单，目光短浅，囿于殖民时代的边界。”

他又提起那件说过千百次的事：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是对一体化的致命打击，正当要宣布美洲团结的时候，桑坦德自作主张请来了美国。

“那就好比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这仅仅因为美国扬言要指责我们把美洲变为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国家的联盟。我们不胜荣幸！”

他再一次对桑坦德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采取的难以置信的残忍手段表示惊骇。“像臭鱼一样让人恶心。”他说。他第一千次抨击桑坦德向伦敦借款，纵容他朋友的贪污腐败。无论私下交谈或在公开场

合，他每提起这些事就在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政治气氛中加一点油。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那仿佛是世界毁灭的开始。”他说。

他在处理公款方面十分严格，每提起这种事就暴跳如雷。他担任总统时，曾颁布一条法令，公务员凡有贪污盗用十比索以上公款者一律处以死刑。反之，在个人财产方面，他非常慷慨大方，独立战争短短几年里就散去他继承的大部分遗产。他的薪俸都散给了伤残的战士和死亡战士的遗孀。他把继承来的榨糖厂送给侄子们，把加拉加斯的住宅送给几个妹妹，他的土地极大部分早在取缔奴隶制之前就分给了他先解放的奴隶们。他拒绝了利马议会欢庆解放时决定赠送给他的一百万比索。政府拨给他一个在蒙塞拉特的庄园，让他有个体面的住所，而他在辞职前不久送给了一个经济困难的朋友。在阿普雷，他从自己的吊床上起来，把它送给一个发烧的向导，让向导躺着发汗，自己裹了一件军用大氅往地上一躺，继续睡觉。他原想从自己的钱里付给贵格会[4]教育家约瑟夫·兰开斯特的两万银比索并不是他私人的债务，而是应由政府支付的。他爱之若命的马匹经常留给路途中相遇的朋友，即使那匹闻名遐迩的“白鸽”也留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元帅的马厩里。然而一谈到被盗用的贷款，他就激动得失态，什么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

“当然，卡桑德罗九月二十五日离任时很干净，他是装点门面的老手，”将军逢人便说，“可是他的朋友们把英国人以大笔息金借给国家的钱又带回英国，替他放高利贷，利上滚利。”

他整宿整宿地向所有人披露心底的混乱思想。第四天拂晓，当危象似乎不可逆转时，他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身上仍穿着接到噩耗时

的那套衣服，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叫进屋，同他一直谈到雄鸡啼鸣。将军躺在有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躺在旁边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挂起的另一张吊床上。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把和平时期宁静生活的习惯远远抛在身后，几天之内又回到了戎马倥偬、凶吉未卜的战地夜晚。经过那次谈话，将军明确地知道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在图尔巴科表达的烦躁和愿望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多数委内瑞拉军官的共同问题。自从新格拉纳达人和他们反目以来，委内瑞拉军官们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但是为了美洲的一体化，也不惜同室操戈。如果将军下令叫他们到委内瑞拉去打仗，他们肯定争先恐后，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比谁都跑得快。

那几天糟透了。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访者是波兰上校契斯拉夫·纳比埃斯基，弗里德兰战役的英雄和莱比锡惨败的幸存者，他带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介绍信，前几天来到，准备参加哥伦比亚军队。

“您来迟了，”将军对他说，“这里一无所有。”

苏克雷死后，情况比一无所有更糟。将军向纳比埃斯基表明了这一点，纳比埃斯基的旅行日记里也表明了这一点。一百八十年后，一位格拉纳达大诗人发现了日记，核实了历史资料。纳比埃斯基是搭乘香农号来的。船长陪他到将军住所，将军说他想去欧洲，但是两人都看不出将军真有动身的打算。三桅船返航金斯敦之前要去拉瓜伊拉，然后回卡塔赫纳，将军请船长带一封信给替他经管阿罗阿矿业的委内瑞拉律师，希望回来时能捎些钱来。三桅船返回时没有答复，将军显得十分泄气。谁都不敢问他是否动身。

接到的消息没有一条令人欣慰。何塞·帕拉西奥斯尽可能推迟向将军汇报，以免接二连三给他打击。使侍从军官们感到忧虑、为了不

折磨将军而隐瞒的一件事是卫队的轻骑兵和投弹手中间淋病蔓延，久治不愈。起因是在翁达期间有两个女人每天晚上来驻地鬼混，以后士兵们路过每个地方都寻欢作乐，继续传播。最后没有一个士兵没被染上，正规医师和江湖郎中都束手无策。

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了防止将军产生不必要的烦恼而事事留意，结果还是出了纰漏。一晚，一封没有署名的信经过好几个人传递，不知怎么到了躺在吊床上的将军手里。他没戴眼镜，拿得老远看完后，在蜡烛火上烧着，烧剩一角才扔掉。

那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信。她听说将军已经下台并准备去国外，兴冲冲地同丈夫和儿子一起出发去蒙博克斯，星期一路过这里。将军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但整夜显得极为不安，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信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提出和解。她拒绝了将军的要求，按原定日程上路，毫不动摇。她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唯一的理由是同她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和解毫无意义。

那一个星期中还听说曼努埃拉·萨恩斯在圣菲为了争取将军复出，单枪匹马闹得越来越凶。内政部长找她麻烦，要她交出她保存的文件档案。她一口回绝，发动了一系列的挑衅，激怒了政府。她带着两名健壮女奴闹得天翻地覆，散发颂扬将军的传单，擦去公墙上的炭涂标语。她穿着上校制服进出军营，既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也参加军官们的密谋，毫无顾忌。人们纷纷传说她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正策动一次武装叛乱，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

很难相信将军的健康状况还经得起这些坏消息的打击。下午的潮热越来越准时，咳嗽凶得撕心裂肺。一天清晨，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将军大嚷：“操他妈！”将军常用这句话责骂军官们，何塞·帕拉

西奥斯不知是怎么回事，冲进卧室，只见他血流满面。他刮胡子刮破了皮肤，大动肝火倒不是为了这个小事故，而是为了自己的笨拙。威尔逊上校赶紧把药剂师找来替他止血，发现他气急败坏，想给他吃几滴颠茄汁镇定一下。他断然拒绝。

“就让我这么待着，”他对药剂师说，“恼怒对绝望的人有好处。”

他的妹妹玛丽亚·安东尼亚从加拉加斯给他来信。“大家都责怪你不想来收拾混乱局面。”信中说。城镇的教士们坚决拥护他，军队里开小差的现象无法遏制，山上都是武装群众，声称除了他以外谁都不服。“那是一群疯子的喧闹，干革命的人自己都不一致。”他的妹妹说。正当有些人拥戴他之际，全国半数的墙上一夜之间刷上了辱骂他的标语传单。那些无头告示说对他家应该斩草除根，一直消灭到第五代。

委内瑞拉议会在巴伦西亚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彻底分裂的决定，正式宣布只要将军在哥伦比亚土地上就不可能同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达成谅解，事情本身和圣菲正式通知他的方式都使他痛心，因为转达通知的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一个老阴谋分子，他不共戴天的敌人，原先流放国外，被莫斯克拉总统召回并任命为内政部长。“这件事恐怕是我平生的奇耻大辱。”将军说。他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了不同的答复，熬到深夜，但气愤之至，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清早，他从噩梦中惊慌地醒来，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我死的那天，加拉加斯会以丧钟欢庆。”

后来发生的还不止于此。马拉开波省长听到将军的死讯后写道：“我赶紧奉告这件大事，它对自由事业和国家的幸福无疑会有无数好处。邪恶的天才、无政府主义的煽动人和祖国的压迫者已不在人世。”这本来是通知给加拉加斯政府的消息，结果成了全国公告。

在那些多灾多难的日子里，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某个清晨的五点钟向将军宣布了他的生日：“七月二十四日，殉道的童贞女圣克里斯蒂娜日。”他睁开眼睛，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摆脱不掉的厄运。

他一向不过生日，只庆祝命名日。天主教的圣徒祭日表上一共有十一个圣西蒙日，他倒希望以那个帮助基督背十字架的西里奈人命名，但是命运为他安排了另一个西蒙，也就是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讲道的使徒，日子是十月二十八日。有一年，圣菲庆祝他的命名日，有人在聚会上给他戴上一顶桂冠，他笑了笑摘下来，别有用心地戴在桑坦德将军头上，后者不动声色，仿佛当之无愧。但是他的生命不是以名字而是以年岁计数的。对他说来，四十七这个数字有特殊意义，因为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瓜亚基尔时，各方面的坏消息纷至沓来，他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当时他突然有个征兆，感到震颤。一向不相信征兆的他居然感到震颤。预示十分清晰：如果他能活到次年的生日，那就再也死不了。这一神秘的天意启示，支持着他带病延年直到现在。

“四十七岁了，”他喃喃说，“妈的，我还活着！”

他在吊床上坐起来，深信再也没有什么灾难可以加害自己，顿时精神一振，特别高兴。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找来，也就是那些想去委内瑞拉为争取哥伦比亚一体化而打仗的军官们的头头，请门德斯在他生日之际向军官们表示感谢。

“中尉军阶以上的人，”他说，“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都可以报名。”

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首先报名。卡塔赫纳驻军中还有两位将军、四位上校和八位上尉也参加了远征队。然而，当卡雷尼奥提醒将军以前做过许诺时，将军对他说：

“您另有重用。”

出发前两小时，将军决定让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走，因为他觉得长年累月的文牍工作加重了席尔瓦对自己视力的担忧。席尔瓦不太愿意。

“闲散也是战争，一场艰苦的战争，”他说，“因此如果将军没有别的安排，我会留下。”

相反，伊图尔比德、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伊巴拉没有获准。“您要走的话，将是另一个地方。”将军对伊图尔比德说。他对安德烈斯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说是迪戈·伊巴拉将军已经参加了战争，两兄弟都投进去就太多了。费尔南多自己根本没提出要求，因为他知道回答他的还是那句老话：“战争要求一个人全部投入，像你这样双眼和右手有用的人可不能冒险。”那个答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军事荣誉，费尔南多也聊以自慰。

蒙蒂利亚当晚就为获准出发的人提供了配备，并参加了简单的送别仪式，将军同每一个人拥抱，讲一句话。他们分散走不同路线，有的取道牙买加，有的走库拉索，有的走拉瓜伊拉，大家都穿便衣，不带武装或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早在反抗西班牙人的地下斗争中

他们已经有了经验。第二天早晨，波帕山麓的房子成了撤空的军营，将军满怀希望地期待一场新的战争使昔日的荣誉重放光彩。

---

[1]西语俗语，意指伴侣与人通奸。

[2]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混血。

[3]拉美西语各国独立前百姓均为西班牙国王的臣民。

[4]贵格会，公谊会的别称，17世纪基督教新教的一派。

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九月五日上台。制宪议会决定由他执政，当时没有其他有效当局可以使政变合法化，但经起义者要求，圣菲市政府承认在将军就任总统之前由乌达内塔代理。驻扎在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官兵依靠平原小业主和乡镇教士的支持打败了政府军队，起义获得成功。这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也是哥伦比亚人十九世纪里经历的四十九次内战的第一次。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离职出走。乌达内塔取得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派出私人代表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记忆中，将军的健康状况很久以来没有像那几天那样稳定，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之后，头痛和下午的潮热霍然而愈。但他也从未见过将军那么焦急。蒙蒂利亚感到担心，同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商量暗中帮将军一把。修士欣然同意，干得很出色，在等候乌达内塔的使者时陪将军下棋，打发漫长的下午，故意输了让将军高兴。

将军第二次去欧洲时学会了下棋，在秘鲁作战旷日持久，晚上没事就同奥利里将军下，几乎到了高手的水平。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再提高了。“象棋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迷恋，”他常说，“我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消遣。”尽管如此，他制订的公共教育纲领仍把象棋规定为学校应该传授的高尚有益的游戏之一。事实上他自己从未坚持钻研，因为这种慢条斯理的活动不适于他的神经，他的心思要集中于更重要的问题。

将军的吊床挪到了临街的门口，乌达内塔的使者顺着那条尘土飞扬、阳光炙热的大路来时立刻可以望见。塞瓦斯蒂安修士来时看到将

军在吊床上大幅度摇晃。“唉，修士，”将军说，“你不接受输棋的教训。”他坐不安稳，每走一着，修士思索时他就站起来。

“别害我分心，阁下，”修士说，“我下棋可不能像狼吞虎咽似的。”

将军笑了：

“中午大吃大喝，晚上只能粗茶淡饭。”

奥利里不时在桌前站停，查看棋局，替他出出点子。他总是不高兴地拒绝。然而他每次赢了棋就跑到军官们在玩牌的院子里吹嘘自己的胜利。塞瓦斯蒂安修士有一次在下棋时问他，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

“永远没有，”他说，“那是死人的无聊玩意儿。”

等候邮件一向使他焦急，现在简直成了苦难。尤其是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圣菲的邮局往往为了等最新消息推迟发送，让跑驿站的人等得不耐烦。相反的是，小道消息越来越多，传播迅速。将军在邮件到达之前已经听到各种消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做出决定。

九月十七日，当他得知使者快到了，便派卡雷尼奥和奥利里去图尔巴科路上等候。来人是文森特·皮涅雷斯和胡里安·圣马利亚上校。圣菲传说纷纭，说将军病势危笃，两人见将军精神极好，大大出乎意外。将军住处临时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有地方和军队要人出席，即席讲话，为祖国祝酒。最后，将军留下两个使者，单独谈了真实情况。圣马利亚上校性格悲观，讲得有点危言耸听：如果将军不接受总统职位，全国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有了生存才有变革，”他说，“政治局势澄清之后我们才知道祖国是不是存在。”

圣马利亚上校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用武力统一全国，”将军说，“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委内瑞拉。”

从那一刻开始，他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想法：既然敌人不来自外部而是在自己家里，那就从头再来。各地的寡头政府，在新格拉纳达以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为代表，已经对一体化的主张发动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一体化会损害当地豪门家族的特权。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他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下去：“我知道有人取笑我，说我在同一天给同一个人的信里对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说我一会儿同意君主制的设想，一会儿又不同意；说我在别的场合对两件事同时表示赞成。”人们指责他对人对事的判断变化无常；他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却同莫里略握手言欢；同西班牙进行殊死斗争，但积极提倡西班牙精神；他依托海地取得胜利，后来却把它当作非美洲国家，不请它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他加入过共济会，在弥撒上宣读伏尔泰的作品，但又维护教会；一面讨好英国人，一面又打算同法国公主联姻。人们指责他轻浮、伪善，甚至两面三刀，对朋友当面捧场，背后谩骂。“好吧，这一切都确有其事，但都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他说，“我这么做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美洲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

对这一点我从没有矛盾也没有怀疑。”结尾时他说了一句加勒比土话：

“别的事情都去他娘的！”

两天之后，他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的信中说：“我不想接受制宪议会授予我的职权，因为我不想充当造反派的首领，由胜利者通过军事方式任命。”然而当天晚上他向费尔南多口授给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两封信里，语气就没有这么生硬。

第一封信是个正式答复，一开头就显得郑重其事：“尊贵的先生。”鉴于上届政府解散以后共和国所处的混乱废弛状态，他认为政变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可侮。”信中写道。但要他接受总统职位绝对不可能。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是回到圣菲，以普通军人的身份为新政府效力。

另一封是私函，从第一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亲爱的将军。”信中详尽清楚地说明了他犹豫的理由。由于堂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提出辞职，明天还是可以被承认为合法总统，他便成了篡位的人。他重申了公函里说过的意见：在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光明磊落地任命前，他绝不可能执政。

两封信在同一邮班发出，另外还有他要求全国忘掉他的激情、支持新政府的公告原件。但他避免做出任何许诺。“看起来我说了许多，其实都是空的。”他后来说。他还承认有些话是投他人所好。

第二封信最值得注意的是命令的口吻，一个丧失全部权力的人说出这类话实属罕见。他要求提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让他可以率领足够的士兵和装备去西部对付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和何塞·

伊拉里奥·洛佩斯将军，终止那反对中央政府的打打停停的战争。“那两个就是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他坚持说。他还推荐另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方面的事由您料理，”他对乌达内塔说，“从马格达莱纳到委内瑞拉，包括博亚卡，别的事情由我来做。”他准备亲自率领两千名士兵去圣菲，协助重建秩序，巩固新政府。

以后的四十二天中，他再也没有收到乌达内塔的直接来信。在这一个多月里，他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大肆张扬地发布军事命令。轮船来来往往，但他再也不谈去欧洲的事，即使偶尔一提也是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波帕山麓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司令部，那几个月里的军事决定大多是他在吊床上建议或做出的。最后，他不知不觉逐渐参与了军事以外的决定，甚至过问一些小事，例如替他的好朋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谋职，让那个在家里闲不住的何塞·乌克罗斯将军重新服役。

在那些日子里，他一再说那句老话：“我老弱有病，对什么都很淡漠，但人们总是找我麻烦，污蔑我，以怨报德。”然而见到他的人谁都不信。表面上他好像只是谨慎小心地为加强政府做些布置，事实上却是以总司令的权威和权力耐心细致地筹备军事机器，计划用它收复委内瑞拉，然后以委内瑞拉为根据地，重建世界上最大的联邦。

时机是再好没有的。新格拉纳达牢牢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自由党已被击败，桑坦德困在巴黎，厄瓜多尔由弗洛雷斯控制。弗洛雷斯是那个野心勃勃、性格矛盾的委内瑞拉首领，他曾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将军相信，制伏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之后，就能把他争取过来，共襄大业。玻利维亚在圣克鲁斯元帅的牢固统治之下，圣克鲁斯是将军的朋友，前不久还提

出让他担任驻梵蒂冈的大使。因此，当前的目标是一举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

将军的军事计划似乎是趁派斯集中力量防守马拉开波时，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是里奥阿查省九月一日解除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立即表示支持，派了佩德罗·卡鲁霍将军前去协助，卡鲁霍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头目，畏罪潜逃后一直在委内瑞拉庇护之下。

蒙蒂利亚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去通知将军，但是将军已经知道，情绪高涨。因为里奥阿查的倒戈为他提供了借口，可以从另一条战线调动更强大的新的军队攻打马拉开波。

“此外，”他说，“卡鲁霍落到了我们手里。”

当天晚上，他和军官们在屋子里开会，制订精确的战略，描述地形地貌，像挪动棋子似的布置一支支部队，预测敌人可能做出的一切打算。他的军官大多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的，他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能同任何一个军官比学历，但他能设想出全局，连最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他的记忆力惊人，多年前路过的地方有什么障碍都能说出，虽然他远不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在灵感方面，谁都不及他。

天亮时，计划制订完毕，细枝末节都经过考虑，详尽、凶狠，并且十分具体，对马拉开波的总攻安排在十一月底，最坏的打算也在十二月初。那天是星期二，下着雨，早晨八点钟最后的检查业已完成，蒙蒂利亚提醒将军说，计划里似乎还缺少一个新格拉纳达的将军。

“新格拉纳达没有一个像样的将军，”他说，“那些人不是不称职便是骗子。”

蒙蒂利亚赶快换个话题，缓和气氛：

“将军，您本人去哪里？”

“库库塔或者里奥阿查，此刻对我都一样。”他说。

他转身准备退席时，瞥见卡雷尼奥将军紧皱眉头，想起自己的许诺屡次没有兑现。事实是将军千方百计想把卡雷尼奥留在身边，现在不能再让他失望了。将军像往常一样拍拍他肩膀，对他说：

“卡雷尼奥，我说的话是算数的，你也去。”

由两千人组成的远征队从卡塔赫纳起航，挑选的日子仿佛有象征意义：九月二十五日。带队的是马里亚诺·蒙蒂利亚、何塞·费立克斯·布兰科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都身负在圣玛尔塔物色一幢乡间别墅的使命，日后可让将军一面休养，一面密切注视战争的进程。将军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两天之后我将去圣玛尔塔，活动活动身子，摆脱现在的腻烦，让情绪好转。”十月一日，他果然动身。十月二日，他在路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的信中说得比较坦率：“我去圣玛尔塔的目的是以我的影响鼓励那支向马拉开波进军的远征队。”当天，他还给乌达内塔写了一封信：“我去圣玛尔塔是想看看那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同时也想看看能否打破某些左右舆论的敌人的幻想。”直到那时他才披露此行的真实目的：“我要就近观察攻打里奥阿查的作战行动，我要接近马拉开波，接近军队，在某些重要的战役或许能发挥一点影响。”现在他已经不是失败引退、出国流亡的模样，而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

军务紧迫，他们离开卡塔赫纳时非常匆忙。没有时间举行正式告别仪式，事前只通知了少数几个朋友。根据将军的指示，费尔南多和何塞·帕拉西奥斯留下一半行李，交给朋友们和商号保管，以免在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中添上不必要的累赘。留给当地商人堂胡安·帕瓦儒的是十个存放着私人文件的大箱子，委托他运往巴黎，具体地址以后再通知。收据上注明，万一箱子的主人由于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能索回时，帕瓦儒先生应将文件全部销毁。

费尔南多在布希钱庄存放了二百两黄金，那是他最后一刻在叔父的文具中发现的，谁都想不起是哪里来的。寄存在胡安·德弗朗西斯科·马丁那里的是装有三十五枚金勋章的首饰箱，还有两个天鹅绒口袋：一个装着二百九十四枚银制大勋章、六十七枚小勋章和九十六枚中等大小的勋章；另一个装着四十枚金银纪念章，其中几枚铸有将军的头像。还委托马丁保存一个旧葡萄酒木箱，里面是他们从蒙博克斯带来的那套黄金餐具、一些旧床单、两箱书籍、一把钻石镶柄的佩剑和一支坏了的猎枪。在许多旧时留下的小物件中还存有几副不用的眼镜，度数深浅不一，从将军三十九岁发觉刮胡子不方便开始用的轻度老花镜，直到伸直手臂仍看不清时用的远视镜。

何塞·帕拉西奥斯请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保管一个箱子，多年来，他们带着这个箱子辗转各地，却并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将军有个特点，他一时冲动会贪多务得，收集一些用处不大的东西，收罗一些庸庸碌碌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处理，只能带着。一八二六年，他从利马到圣菲时带着那个箱子，九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他回南方进行最后一战时仍旧随身带着。“还没有弄清楚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把它扔下。”将军说。这次来圣菲准备向制宪议会提出辞职时，那只箱子依然在他大大减少的行李之中。他们

在卡塔赫纳替将军造财产总清单时，终于决定把箱子打开，发现里面杂乱无章，全是多年前就以为遗失了的个人物品。其中有四百一十五枚哥伦比亚铸造的金币、一帧乔治·华盛顿将军的肖像和他的一束头发、一个英国国王赠送的金鼻烟壶、一个金匣子（钥匙镶有钻石，匣子里面还有一个小金盒），以及一枚玻利维亚的大金星勋章，镶着许多钻石。何塞·帕拉西奥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寄存在德弗朗西斯科·马丁家，列了清单并做了备注，还要了一张收据。这样一来，行李减少到合理的数量，但是还有三箱可以不带的替换衣服，一箱棉麻桌布，共十条，一箱式样不同的金银餐具，将军不愿留下或卖掉，说是以后招待重要客人时或许用得上。人们多次劝他卖掉这些东西，改善经济状况，但他说这是国家财产，一口拒绝。

他轻装简从，一天路程就到了图尔巴科。第二天出发时天气很好，但还没有到中午，风云突变，他们不得不在一株大树下躲避沼泽地的凄风苦雨，露天过了一夜。将军诉说肝脾疼痛，何塞·帕拉西奥斯按照那本法国医书上的配方给他喝了一剂汤药，但是疼痛加剧，体温升高。次日早晨，他委顿不堪，失去了知觉，只得把他抬到索莱达，镇上一个老朋友堂佩德罗·胡安·比斯瓦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将军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十月份的淫雨天气令他的各种病痛都变本加厉。

索莱达小镇像它名字那么荒僻[1]：距离圣尼古拉斯峡谷两里左右，全镇只有四条街，街旁多半是穷人凄凉的房屋。几年后，它却成为全国最繁荣热闹的城市。比斯瓦尔的房子是将军所能找到的最舒适、最适合他身体状况的住所，有六个阳光充足的安达卢西亚式的阳台和一个安静的院子，可以坐在那株百年木棉树下沉思冥想。从卧室

窗户里可以望到空荡荡的小广场，破败的教堂和棕榈叶屋顶、墙壁刷成牵牛花色的房子。

宁静的户内生活对他并没有帮助。第一晚他昏厥了一次，但不承认这是虚弱的迹象。根据法国医书，他诊断自己的毛病是感冒加剧了黑胆汁病，风寒引起关节炎复发。他一贯反对同时服用治几种疾病的药品，说是有利于某些病的药品却对另一些病有害，合并症状的诊断加深了他这种怪癖的想法。可是他承认，再好的药不吃也治不好病；他老是抱怨没有好大夫，另一方面又不让别人推荐的许多大夫来给自己看病。

威尔逊上校那时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将军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对医生的排斥并非出乎蔑视而是由于头脑清醒。威尔逊说，事实上疾病是将军害怕的唯一敌人，他为了不偏离生活中的最高目标而不愿正视疾病。“关心疾病就像是在船上干活，需要拿出全部精神。”将军曾对他说过。四年前在利马时，奥利里劝将军一面制订玻利维亚宪法，一面接受彻底的医疗，将军的回答斩钉截铁：

“同时进行两场赛跑是不会赢的。”

他似乎深信，不停地运动和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对付疾病的法术。费尔南达·巴里加惯常像喂小孩似的，在他胸前围块布，用汤匙喂他吃东西，他不声不响地张嘴咀嚼，吃完后又张开嘴。然而这些日子，他夺过盘子和汤匙，不用围嘴自己吃东西，让大家知道他不需要别人帮助。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试图做那些一向由仆人、勤务兵和副官代劳的家务事时，不禁感到心酸，有一次见他把大瓶墨水往小瓶里灌，洒了一桌子，觉得难受极了。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即使痛得很凶，他的手从不颤抖，照样每天刮胡子，每星期修指甲。

他在利马的鼎盛时期，曾同一个少女快活了一夜，那姑娘黑黝黝的皮肤上长满一层平伏的汗毛。早晨他刮胡子时，瞅着她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得很香，几乎抵挡不住要同她正式结婚、永远占有她的诱惑。他从脚到头把她全身涂满了肥皂沫，带着情爱的快感用刮胡刀剃去她全身的汗毛，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一直剃到浓浓的眉毛，赤条条像初生婴儿一般光鲜。她以战栗的灵魂激动地问他是不是真心爱她，得到的回答是他毕生薄情地灌输在许多女人心中的那句老话：

“胜过世界上任何别的人。”

在索莱达小镇，他刮胡子时自己做了同样的牺牲。仿佛出于孩子气的冲动，他先割下一束所剩无几的平直的白头发。然后有意识地割下另一束，接着像割草似的乱剃一通，嘶哑的嗓子还在朗诵《阿劳加纳》一诗中他喜爱的章节。何塞·帕拉西奥斯走进卧室，想看看他在同谁讲话，只见他在涂满肥皂沫的脑袋上剃头发。结果剃成一个秃头。

这个驱邪的措施并没有解除他的苦难。他白天戴一顶丝软帽，晚上戴一顶红色的尖顶帽，还挡不住令人沮丧的阵阵寒风。他夜里仍旧起来在月光如水的大屋子里走动，只是不再光着身子，而是裹着一条毯子，因为夜里即使比较热他也会冻得发抖。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毛毯也不够了，丝软帽外面还得套上那顶红色的尖帽子。

军人们的阴谋和政客们的钻营大大地激怒了他，有一天下午他猛拍桌子，说是再也不接见他们了。“对他们说，我害的是痨病，叫他们以后别来。”他嚷道。这一决定十分严格，甚至禁止在他住处穿军服、行军礼。然而没有这一套他又活不下去，他自己下的命令也没有

执行，问候谒见和毫无结果的秘密集会像以前一样持续不断。那时他觉得病情严重，终于同意让医生来看看，条件是不让医生检查，不准问他有关病情的问题，也休想让他吃药。

“光来聊聊天。”他说。

中选的医生再符合他的愿望也没有了。此人名叫埃库勒斯·加斯特尔邦多，是个乐呵呵的老头，身躯肥大，性情温和，脑袋秃得发亮，耐心极好，见到他，病人都会觉得轻松一点。他的难以置信的主张和大胆的治疗方法在沿海一带是出了名的。他让害胆病的人吃巧克力酱拌融化的奶酪，劝别人在饭后困倦的时候做爱，说是可以延年益寿；他不停地抽着用破纸卷的劣等烟，让病人也抽，说是能治百病。病人说他从没有治好过病，但他的能说会道让人高兴。他听了哈哈大笑。

“别的大夫手里的病人死得不比我的少，”他说，“可是我的病人死得高兴。”

他是搭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先生的四轮马车来的。莫里纳雷斯一天要来回几次，带着形形色色的自发的来访者，最后将军不准他们不请自来。他穿一身没有熨过的白麻布衣服，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零食，在雨中迈着大步，手里撑的一把雨伞有好几处脱线，说是挡雨还不如说是招雨。寒暄之后，他首先为那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的臭气道歉。将军一向讨厌烟草的烟雾，不过在医生来前就同意他抽。

“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曼努埃拉抽的烟比你的还臭，躺在床上也抽，当然她喷的烟比你近。”

加斯特尔邦多立即抓住机会问他迫切想知道的事。

“那当然啦，”他说，“她怎么样？”

“谁怎么样？”

“堂娜曼努埃拉。”

将军冷冷地说：

“很好。”

他明显地换了话题，医生哈哈一笑，掩饰他不礼貌的提问。将军当然知道自己的风流韵事没有一件能逃过侍从们的议论。他从不炫耀猎艳的成绩，但是成绩辉煌，引人注目，因此他的卧室秘密几乎无人不知。从利马到加拉加斯一封平信路上要走三个月，有关他艳事的流言蜚语却一日千里。闲话像另一个影子似的紧随着他，他的情妇们永远打上了苦难的印记，不过他仍守口如瓶，保守爱情的秘密。谁都不能从他嘴里打听到同他相好的女人的事，只有和他同谋的何塞·帕拉西奥斯例外。他甚至不愿满足加斯特尔邦多大夫不含恶意的好奇心，即使他和曼努埃拉·萨恩斯的亲密关系已众所周知，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他也避而不谈。

除了那个小插曲外，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同他谈得十分投机。大夫睿智的奇谈怪论使他兴致勃勃，还请他吃带在口袋里的各式各样的小动物形状的糖块、牛奶糖和木薯粉做的小点心，他出于礼貌接受了，并且不知不觉地吃了下去。一天，他抱怨说这些客厅里的小吃只能垫垫饥，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滋养身体。“别担心，阁下，”医生回答说，“从嘴里进去的东西都能长肉，从口里出来的东西都能伤人。”将军觉得这个论点十分有趣，同意和医生一起喝了一大杯葡萄酒、一杯西米露。

医生煞费苦心改善的情绪，却被坏消息泼了冷水。有人告诉他，卡塔赫纳的房东因为怕传染，把他逗留时睡过的小床、褥子和床单，以及他碰过的一切物品统统烧掉了。他便通知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从他留下的钱里面除了交付房租之外还按新东西的价格偿付所有烧毁的物品。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愤懑。

几天后，他听说堂华金·莫斯克拉去美国途中经过这里，但没有来看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到处打听，弄清楚莫斯克拉等船时确实在海岸一带待了一个多星期，拜访过许多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和几个他的敌人，对所有的人表示他对将军的不满，说他忘恩负义。起航前，在登船的小舢板上，他还对送行的人说了他的成见：

“你们要记住，那家伙对谁都没有好感。”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对这类指摘是多么敏感。使他最痛心、最气愤的是有人怀疑他的情义；他会拼命使出他可怕的魅力让怀疑的人认识错误。在他煊赫一时之际，安戈斯图拉的美人德尔菲娜·瓜迪奥拉被他的见异思迁激怒，给他吃了闭门羹。“将军，您是位杰出的人物，比谁都伟大，”她说，“不过在爱情问题上，您不怎么样。”他从厨房窗户爬进屋，同她待了整整三天，直到德尔菲娜相信他的真情实意，为此他几乎打败仗，甚至差点丢掉性命。

那时他已无法找到莫斯克拉本人，只得逢人便讲他的怨恨。他不厌其烦地说，莫斯克拉同意把委内瑞拉放逐他的决定用公函通知他，还有什么资格讲情义。“我为了不让他遭到历史的谴责，没有给他反击，他应当感激才是。”将军嚷道。他重提自己替莫斯克拉做了多少事，帮他达到现在的地位，怎样忍受了他那乡巴佬的自我陶醉和狂

妄。最后，他给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不管莫斯克拉在世界什么地方都要让他知道将军的气恼。

在另一方面，迟迟不来的消息使将军坠入一片无形的迷雾。乌达内塔仍旧没有回信。他派到委内瑞拉的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曾给他寄过一封信，还捎上一些他特别喜欢的牙买加水果，但是信使在海里溺毙。他派到东部边境的胡斯托·布里塞尼奥来信之慢让人沉不住气。乌达内塔的沉默给全国蒙上一层阴影。他在伦敦的通讯员费尔南德斯·马德里之死给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

将军并不知道他虽然没有接到乌达内塔的消息，乌达内塔却同他的侍从军官们经常通信，要他们从将军口里得到一个明确答复。乌达内塔给奥利里的信中写道：“我要确切知道将军是否接受总统职位，还是我们水底捞月，白忙了一辈子。”奥利里和其他侍从军官都想通过平时随意的谈话探探将军的口气，好给乌达内塔答复，但是将军一直回避，滴水不漏。

里奥阿查方面终于来了确切消息，比预计坏得多。曼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按原定计划在十月二十日取下该城未遇抵抗，但第二星期被卡鲁霍消灭了两个侦察连。巴尔德斯向蒙蒂利亚提出辞呈，希望光荣解职，蒙蒂利亚认为他不配。“那个浑蛋吓破了胆。”他说。根据最初的计划，离攻克马拉开波的日期只剩十五天，但如今控制里奥阿查的希望已成泡影。

“妈的！”将军嚷道，“我最优秀的几个将军居然对付不了一场兵营动乱。”

最让他伤心的消息是政府军所到之处，当地居民纷纷逃亡，因为里奥阿查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同乡帕迪亚海军上将是死在将军手里的，把将军和政府军等同了起来。祸不单行，国内别的地方也告急，无政府状态到处蔓延，一片混乱，乌达内塔政府无法控制。

一天，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看到将军在圣菲派来通报最新情况的特使面前破口大骂，再次为愤怒的振作能力感到惊奇。“那个狗屎政府，它不动员百姓和重要人物，却使他们陷于瘫痪，”他嚷着说，“它会第三次垮台，再也爬不起来，因为组成它的人和支持它的群众会被全部消灭。”

医生想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毫无办法，将军骂完政府之后又逐个数落它的参谋部成员。他说华金·巴里加上校，三次大战役的英雄，要多坏有多坏：“甚至搞暗杀。”佩德罗·马格蒂奥将军有参与暗杀苏克雷的嫌疑，将军说他在指挥军队方面是无能之辈。冈萨雷斯将军是他在考卡的心腹，被他一语否定：“这个人的毛病是软弱多疑。”他喘着气倒在摇椅里，让心脏休息一下，二十年来他的心脏就一直有点衰弱。这时他看到加斯特尔邦多大夫吃惊地待在门口，又提高嗓门说：

“总而言之，一个赌博输掉两幢住宅的人，你对他又能有什么指望？”

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莫名其妙。

“您在说谁呀？”他问道。

“乌达内塔，”将军说，“在马拉开波输给一个海军司令，但是在文件上写得像是卖掉的。”

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当然，他们都是桑坦德那个狡诈家伙身边的好人，”他接着说，“他的朋友们盗用英国贷款，以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买下国家债券，然后国家又以百分之百的价格收回。”他声明他并不是因为贪污的危险而反对借债，而是为了及时防止债务威胁花了那么多鲜血才换来的独立。

“我比憎恨西班牙人更憎恨债务，”他说，“因此我警告过桑坦德，如果我们接受了外债，我们为国家做的全部好事都会付诸东流，因为我们要付利息，几个世纪都付不清。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债务最终会打垮我们。”

现政府初创时期，他不但同意乌达内塔尊重战败者生命的决定，并且赞扬说这是战争的新伦理观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目前的敌人以后用我们对付西班牙人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那就是指，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在索莱达小镇凄凉的晚上，他在一封激烈的信中提醒乌达内塔说，在所有的内战中，赢得胜利的总是最凶狠的人。

“相信我，大夫，”他对医生说，“我们只有以对手的鲜血为代价，才能保存我们自己的权威和生命。”

一阵暴怒过去了，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开始时那么突然，将军着手为他刚才侮辱过的军官们作历史性的赦免。“说到底，错的人是我，”他说，“他们只想争取独立，那是眼前具体的东西，并且他们干得很出色！”他向医生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让医生拉他起来，最后叹一口气说：

“而我却在迷梦中摸索，寻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那些日子，他决定了伊图尔比德的去向。十月底，伊图尔比德接到他侨居乔治敦的母亲的来信，告诉他自由派力量在墨西哥的进展使他们家回归祖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从小就有一种彷徨感，现在越来越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一天下午，他搀扶着将军在回廊里散步，将军突然回忆起往事来。

“我对墨西哥只有一个坏印象，”他说，“在维拉克鲁斯，港口司令的两条大猎犬撕碎了我带往西班牙的两只小狗。”

不管怎么样，他说，那是他涉足世界的第一次经历，一直铭刻在他记忆中。一七九九年二月，他初次去欧洲，本来只准备在维拉克鲁斯短暂停留，但由于下一站哈瓦那遭到英国封锁，几乎待了两个月。船期延误使他有时间乘马车到了墨西哥城，在积雪覆盖的火山和光怪陆离的沙漠中间登上海拔将近三千米的高原，同他赴欧前一直居住的阿拉瓜平原的田园风光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月球上的景色大概也是这样的。”他说。墨西哥城新鲜的空气使他吃惊，集市的整洁和绚丽多彩又使他眼花缭乱，集市上出卖食用龙舌兰上的红色蠕虫、犰狳、蚂蟥、蝗虫卵、蚱蜢、黑蚂蚁蛹、山猫、蜜渍水蟑螂、玉米蜂、人工饲养的鬣蜥、响尾蛇、各式各样的禽鸟、小得出奇的狗，还有一种自己会不停跳动的豆子。“凡是会动的东西那边都能吃。”他说。使他感到惊讶的还有贯穿全城的许多条清澈见底的运河，色彩明快的平底船和姹紫嫣红、林林总总的花木。但使他感到压抑的是二月份的短日照、沉默忧郁的印第安人、没完没了的牛毛细雨，他这些感受日后在圣菲、利马、拉巴斯和安第斯山区都重新出现，使他感到沮丧。经人推荐，主教接待了他，拉着他的手去谒见总督。在他眼里，总督比主教更像主教，而总督却没有十分注意这个皮肤黝黑、衣着讲究、身材瘦小、自称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少年。“我说崇拜法国大革命可能招来

杀身之祸，”将军觉得有趣地说，“不过当时我想，对总督应该谈些政治性的问题，我十六岁时知道的政治只有法国大革命。”继续旅行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叔父堂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那是他第一封被收藏的书信。“我写的字糟透了，连自己都看不清，”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可是我跟叔父解释是由于路途劳累。”那封一页半的信上有四十个错别字，其中有两处都把“hijo”写成了“yjo”。[2]

伊图尔比德插不上嘴，他记得的事情不多。他对墨西哥的回忆只有不幸，不幸加重了他与生俱来的忧郁，将军很能理解。

“别留下跟随乌达内塔，”将军劝告他，“也不要全家去美国，美国强大可怕，它自由的神话最终会使我们陷入苦难。”

这句话在犹豫的沼泽中又投下一块疑虑的石子。伊图尔比德说：

“别吓唬我，将军！”

“你不用怕，”将军平静地说，“去墨西哥吧，即使别人要杀你，即使会死在那里也得去。趁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去吧。蹉跎下去就晚了，那时候你会觉得无家可归。你在任何地方都会觉得自己是外人，那比死还难受。”将军直盯着他眼睛，把手掌按在胸口说：

“听我的话吧。”

伊图尔比德在十二月初带着将军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离开，其中一封说他、威尔逊和费尔南多是将军最信赖的人。伊图尔比德在圣菲待到次年四月，去向未定，乌达内塔却被桑坦德分子阴谋推翻下了台。伊图尔比德的母亲坚持不渝，终于让他得到任命，在墨西哥驻华

盛顿的使团当秘书。他后半辈子默默无闻地担任公职，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消息。三十二年后，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法国武力支持下当了墨西哥皇帝，收养了伊图尔比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定为他那昙花一现的王位的继承人。

将军托伊图尔比德带给乌达内塔的第二封信请他把以前的信和今后收到的信统统销毁，以免这段灰暗的日子留下痕迹。乌达内塔没有照办。五年之前，他向桑坦德将军也做过类似的请求：“无论在我生前死后，请您不要公布我的信件，因为写得很潦草杂乱。”桑坦德也没有照办，桑坦德写的信同将军的完全相反，形式和内容都周密严谨，一看就知道写信人想留诸后世。

从在维拉克鲁斯写给他叔父的第一封信到死前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将军至少写过一万封信，有的是亲笔，有的是口授，由书记员代笔，另一些则是书记员根据他的指示自己缮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千多封信和八千多份由他签署的文件。有时候他把书记员搞得晕头转向。有时候又完全相反。有一次，他觉得刚口授完的一封信写得不好，也不重写，只在书记员写的纸上亲笔加了一句：“您准能看出，马特利今天比任何时候更糊涂。”一八一七年，他离开安戈斯图拉去解放全美洲的前夕，一天之内口授了十四份文件安排政府工作。也许就是这件事成了那从未遭到反驳的传说的源起：他经常同时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几封不同的信。

十月份阴雨连绵。将军待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来，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将军见他，吃他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午睡时间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空广场上的雨景，认为他在回顾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

“天哪，”一天下午他叹息说，“不知道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很好，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乌达内塔上台以后，她就音讯杳然。将军没有再给她写信，但是吩咐费尔南多随时将旅行进程告诉她。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八月底收到的，讲了准备军事政变的许多机密情况，为了故意迷惑敌人，文字晦涩，内容错综复杂，叫人琢磨不透其中奥妙。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全心全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扮演了国内第一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不敢碰她，但不阻止手下的部长们同她对着干。曼努埃拉用谩骂的印刷品答复官方报纸的攻击，她骑着马，带着女奴，在皇家大街上散发。她在郊区卵石铺地的小街上咄咄逼人地追逐那些散发反将军传单的人，用更带侮辱性的招贴覆盖那些一早就刷在墙上的侮辱性的标语。

这场官方的战争演变成指名道姓对她个人的攻击。她并不示弱。她在政府中的心腹有一次通报她说，广场上的官方庆祝活动准备搭一个焰火城堡，有将军身穿国王冠袍的模拟像。曼努埃拉带了女奴闯过警卫，纵马冲垮了焰火台。于是市长亲自率领一队士兵想在夜间逮捕她，她手握两支上了膛的短枪在门口等候，经过双方朋友的调解才避免一场更大的事件。

乌达内塔将军上台这件事才能使她平息下来。乌达内塔是她的真朋友，她则是乌达内塔最积极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同秘鲁侵略者作战时，她独自在圣菲，乌达内塔关心她的安全，照顾她的生活，成了

她的可靠朋友。当将军在制宪议会上发表那倒霉的宣言时，曼努埃拉劝说他写信给乌达内塔：“我不忘过去的友情，衷心希望同你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个磊落的提议，军事政变之后，曼努埃拉感恩图报，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十月初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人们也不怀疑。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得对：曼努埃拉过得很好，因为谁都没有她的消息。

在那些淫雨霏霏的日子里，将军抚今追昔，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等谁，为什么要等，悲切之极，竟然在睡眠中哭泣。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细微的抽噎，以为是那条从马格达莱纳河救起的野狗发出的声音，但仔细辨认却是将军。多年来他同将军朝夕相处，只见将军哭过一次，那一次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愤怒。他不知如何是好，把在走廊里值班的伊巴拉上尉叫来，伊巴拉也听到了哭泣声。

“这对他有好处。”伊巴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将军第二天醒得比平时晚一些。隔壁果园里的鸟叫和教堂的钟声都没有把他吵醒，何塞·帕拉西奥斯几次俯身凑近吊床，听听他有没有呼吸。他睁开眼睛时已八点多钟，天气很热。

“十月十六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从吊床里抬起身来，透过窗户注视着那孤寂的、满是灰尘的广场，墙面剥离的教堂，还有几只兀鹫在争抢一条死狗的残骨碎肉。早晨阳光的干烈预示着这将是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天。

“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将军说，“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中一震。他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也听到过这句话，将军同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光着脚站在砖地上，穿着长衬衫，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那是现实生活中一场旧梦的重现。

“咱们不会听到的，”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并且故意强调，“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被枪决的，不是今天下午五点钟，而是十三年前的今天。”

曼努埃尔·皮亚尔将军是来自库拉索岛的彪悍的穆拉托人[3]，三十五岁，军功卓著。当解放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以便遏制莫里略的嚣张气焰时，皮亚尔却向将军的权威挑战。他纠集了全国的黑人、穆拉托人、桑博人和社会底层人民反对加拉加斯以将军为代表的白人贵族阶层。他的声望和救世主似的光彩几乎可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或者保皇派的博韦斯相比，解放军里某些白种军官甚至都对他有了好感。将军好歹劝说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于是下令逮捕了皮亚尔，押解到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将军的势力在那里比较大，有一批亲信的军官，其中好几个日后陪伴他做了马格达莱纳河上的最后一次旅行。由将军指定、包括了皮亚尔的军职朋友的军事法庭做了速决审判。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担任起诉。官方的辩护人声称皮亚尔是反西班牙殖民势力斗争的杰出人物之一，对他颂扬备至，并未夸张。他被认定有私逃、哗变、反叛罪，判死刑，剥夺军衔。人们认为他立有不少汗马功劳，将军不可能批准他的死刑判决，何况当时莫里略又收复了几个省，爱国军士气低落，有散伙的危险。将军受到各种压力，和蔼地听取了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在内的亲密朋友的意

见，但是决心不改。他撤销了剥夺军衔的判决，批准了枪决，并且公开执行。那一夜长得难熬，什么不幸的事都可能发生。十月十六日下午五点钟，枪决在安戈斯图拉大广场酷烈的阳光下执行，而这个城市正是皮亚尔六个月前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的。行刑队长吩咐手下人把兀鹫啄食的一条死狗扔到别处，关闭广场入口，以免有动物钻进来扰乱严肃的处决。他拒绝了皮亚尔要求自己向行刑队下令射击的荣誉，强行把皮亚尔眼睛蒙上，但不能阻止他吻十字架和国旗，向人世告别。

行刑时，将军拒不出场。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一人陪他待在家里，看他在枪响时竭力忍住眼泪。在向士兵们发布的公告中，他说：“昨天是使我心痛的日子。”但是他以后一再重申那是政治需要，结果是挽救了国家，慑服了反叛者，避免了一场内战。不管怎么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粗暴的权力运作，也是最及时的行动，因为立即巩固了他的权威，统一了指挥，铺平了通向光荣的道路。

十三年后，他身在索莱达小镇，似乎还不明白自己成了畸形时代的牺牲品。他继续瞅着广场，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卖水老太婆牵着一头挂满椰子壳的驴子穿过广场，吓得兀鹫一哄而散。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吊床上，自言自语说出了何塞·帕拉西奥斯自从安戈斯图拉那个悲惨的夜晚以来一直想知道的答复。

“我还是会那么做。”他说。

---

[1]镇名soledad在西语中有“偏僻、荒凉”之意。

[2]hijo指儿子，yjo与hijo发音相同。

[3]指白人同黑人的混血。

最大的危险在于行走，倒不是怕他摔跤，而是明显地看出他走路实在吃力。在家里上下楼梯当然会有人扶他，虽然他自己一个人也行。问题是真正需要搀扶的时候，他不让别人这么做。

“谢谢，”他总是这么说，“我自己能行。”

有一天却不行了。他正想独自下楼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我两腿一软不知怎么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告诉一个朋友说。更糟糕的是，他侥幸没有摔死是因为他在楼梯口就昏厥过去，由于身体太轻，没有继续滚下楼。

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上次来将军住所后留下了马车，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赶紧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圣尼古拉斯峡谷，替他在宽街安排了一间敞亮通风的卧室。半路上，他左内眼角开始淌出黏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什么都不理会，有时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其实是在整段整段地背诵他喜爱的诗歌。医生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干眼睛，将军一向注意仪表整饬，现在居然让别人代劳，使医生觉得吃惊。快进城时他才清醒，因为一群惊牛几乎撞上他们的马车，最后把教区神甫的四轮车掀翻。神甫从车上给甩了出去，但随即一跃而起，浑身连头发都沾上白色的尘土，前额和手上满是血。将军惊魂甫定，继续上路，投弹手只得在前面开道，让那些闲逛的行人和光屁股的小孩闪开，他们只想看热闹，根本不知道车上那个形容枯槁的人是谁。

医生把神甫介绍给将军，说早在主教们在讲道台上大肆攻击将军，指控他是淫邪的共济会员，把他逐出教会时，那个神甫就是将军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将军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在看到神甫长袍

上的血迹之后才清醒。神甫请将军施加影响，不准牛在城里乱跑，路上有这么多车辆，不出事故简直不可能。

“别自寻烦恼啦，神甫阁下，”将军连看都没有看他说，“全国都一样。”

上午十一点钟的太阳直勾勾地晒着廓落大街的沙地，整个城市都反射出热气。将军感到欣慰的是不必在那里长住，只要调养一下就可以离开，然后挑一个大风大浪的日子出海航行，因为法国医书上说晕船有利于排除胆汁，清理肠胃。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要等船和坏天气却不那么容易。

将军没有精力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交活动，偶尔接待一些客人，也都是路过该城向他告别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的身体不听从愿望而生气。他借住的房子在十一月份之前还是凉爽舒适的，主人把它布置成了一个宽敞的家庭病房。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是被战争毁掉家产的许多人之一，战争给他留下的只是邮政局长的职务，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薪俸。他为人十分宽厚，将军从上次路过这里开始称呼他大爷。他妻子是个自得其乐、具有强烈母性的女人，整天织花边，卖给从欧洲来的轮船上的人，价钱不坏。但是将军来后，她把时间全用于照顾将军了，甚至同费尔南达·巴里加闹了些小矛盾，因为她相信橄榄油对肺病有好处，要在将军吃的豆子里加橄榄油，而将军出于感激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那几天最使将军烦恼的是泪腺流脓，他情绪大坏，终于同意用母菊浸液滴眼。他参加玩牌，暂时排遣傍晚的愁闷和蚊虫的骚扰。他生平做事难得后悔，但有一次同房东夫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时，

感慨万分地说一项满意的协议比赢得一千次诉讼更可贵，使房东夫妇大为诧异。

“在政治问题上也这样吗？”莫里纳雷斯问道。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将军说，“我们没有同桑坦德妥协，结果大家都受到损害。”

“只要有朋友，就还有希望。”莫里纳雷斯说。

“完全相反，”将军说，“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

莫里纳雷斯太太为了听他们聊天，早就把摇椅挪近了牌桌，这时插嘴说：

“你被当成是名副其实的圣徒。”

“好吧，”他说，“果真是这样，就放掉那个可怜的女人。”

他不再阅读书信文件。如果非写信不可，他就指点一下，让费尔南多代笔，少数几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也不看一遍。早晨他坐在阳台上望着沙漠一般的街道，看那头驮水的驴子、那个卖干鱼的自得其乐的女人、十一点准时放学的小孩，以及长袍上打了不少补丁的神甫在面前走过，神甫在教堂门廊里向他祝福，然后消失在炎热中。下午一点钟，人们都在午睡，他向满是烂芦苇秆的河边走去，吓飞了广场上一群群的兀鹫，偶尔有几个人见他形销骨立、穿着便服还能认出他，向他招呼，他一一回答，终于来到码头对面投弹手驻扎的泥巴苇子墙的棚屋。士兵们闲得发慌，士气低落得让他担心，营房乱七八糟，臭气熏人。但是一个仿佛热得昏昏沉沉的军士长讲了实话，使他目瞪口呆。

“将军阁下，困扰我们的不是士气，”他说，“而是淋病。”

他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当地的医生们用过锰酸钾溶液灌洗，用乳糖溶液缓解疼痛，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把问题提请军官们解决，军官们对于该怎么做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全城已经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看成是传播瘟疫的使者。将军最担心的是军心涣散，发现事实真相后倒不太惊慌，下令绝对隔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问题。

长时间得不到消息，凶吉难卜，使人焦躁不安，这时候圣玛尔塔一个骑马的信使送来了蒙蒂利亚将军晦涩难懂的短笺：“人已经在我们手里，事情办得很顺利。”将军觉得信的内容奇怪，送信的方式又

很特殊，心想一定是头等重要的军务大事，也许同里奥阿查的战役有关。他认为这一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谁都不愿相信。

那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把信件写得含混不清，把军事简报故意搞得错综复杂是很正常的事；当初策划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时行之有效的密码通讯制度由于政府懒散早已废弃。将军老是担心军人欺骗他，蒙蒂利亚也有这种疑虑，这一来问题更为复杂，将军急切地希望解开这封信的谜底，便派何塞·帕拉西奥斯去圣玛尔塔，名义上是采购一些当地市场上没有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捎上几瓶干白葡萄酒和小麦啤酒，真正的目的是弄清楚密信的含义。其实非常简单：蒙蒂利亚想说的是米兰达·林赛的丈夫已经从翁达监狱押解到卡塔赫纳，赦免是指日可待的事。谜底毫无奥妙，将军十分失望，甚至并不为自己替牙买加的救命恩人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高兴。

圣玛尔塔主教在十一月初亲笔给将军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说上周邻镇西恩纳加的居民企图组织一次暴乱，声援里奥阿查，主教出面斡旋才平息了居民的情绪。将军也亲笔写信向主教表示感谢，并且请蒙蒂利亚酌情行事，但是主教迫不及待地向他要债的做法使他很不高兴。

他同埃斯特维斯主教阁下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太和谐。尽管手握虔诚的法杖，主教却是一个激昂的政治家，不过境界不高，他从心底里反对共和国，反对美洲一体化，反对同将军政治思想有关的一切主张。主教是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会议的真实目的是阻挠苏克雷得势，主教心领神会，在那次会议上，无论在选举政府官员或是在争取友好解决同委内瑞拉冲突方面，主教都耍了很多手腕。莫里纳雷斯夫妇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下午四点钟吃点心时，听到将军一句意在言外的话并不感到诧异。

将军说：“在我们的国家，一个主教的斡旋居然能消弭革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什么出息？”

莫里纳雷斯太太用亲热然而坚定的责备口气说：

“即便将军阁下在理，我也不想知道，我们是老派的天主教徒。”

将军立刻修正了自己的话：“您肯定比主教大人虔诚得多，因为他维护西恩纳加的和平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是要团结教徒们同卡塔赫纳打仗。”

“我们这里也反对卡塔赫纳的专制。”莫里纳雷斯先生说。

“我清楚，”将军说，“每一个哥伦比亚人彼此都像是一个敌对的国家。”

将军从索莱达请蒙蒂利亚派一艘小轮船到邻近的萨瓦尼利亚港口，便于他实践用晕船排除胆汁的计划。蒙蒂利亚没有立即照办，因为堂华金·德米耶尔，一个曾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合伙人的西班牙共和党人，早就答应向蒙蒂利亚提供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不定期航行的汽船。德米耶尔当时没有闲着的船只可派，蒙蒂利亚便在十一月中旬派来了一艘事先没有通知而抵达圣玛尔塔的英国商船。将军一接到消息就表示要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我坚决不死在这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行。”他说。接着，他仿佛看到卡米尔在临海一个花团锦簇的阳台上注视着天际，等着他去，激动地舒了一口气说：

“牙买加希望我去。”

他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收拾行李，当天夜里，为了寻找一些非带走不可的文件，熬到很晚。他累极了，一觉睡了三个小时。天亮时，他睁眼躺在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宣告日期的时候，他才清楚自己在哪里。

“我梦到了圣玛尔塔，”他说，“非常清洁的城市，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白房屋，但是海被山挡住了，看不见。”

“那就不是圣玛尔塔，”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是加拉加斯。”

将军做的梦表明他们不会去牙买加。费尔南多一早就在码头上安排旅行的细节，回去时看到他叔父正向威尔逊口授一封给乌达内塔的信，要乌达内塔发一份新的出国护照，因为下台政府的护照没有效力。这是他取消旅行的唯一解释。

但是大家都认为真正的理由在于他上午接到的有关里奥阿查战况的消息，那些消息比先前收到的更糟。从这边的海岸到另一边的海岸，整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内战的幽灵在她的废墟上肆虐，在逆境面前知难而退是将军最厌恶的事。“我们准备做出一切牺牲来拯救里奥阿查。”他说。病人的忧虑比他不可逆转的疾病更使加斯特尔邦多大夫担心。只有他可以同将军谈实话而不伤将军的心。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你还在关心里奥阿查，”他对将军说，“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

将军马上回答：

“世界的命运有赖于里奥阿查。”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计划攻占马拉开波的日期已到，但胜利的影子却没有看到，他的焦急溢于言表。十二月份已经临近，下午的天空像黄晶一般清澈璀璨；现在他担心的不仅是失掉里奥阿查以至整个沿海地带，而是委内瑞拉会组织一支远征军，把他理想的最后一点遗迹一扫而光。

上周以来，天气开始好转，原先阴雨连绵，现在白天晴空如洗，晚上星汉灿烂。将军对良辰美景毫无兴趣，有时躺在吊床上出神，有时无牵无挂地玩牌。不久之后，他们正在玩牌时，一阵带玫瑰香气的海风吹跑了他们手中的纸牌，刮开了窗户的插销。莫里纳雷斯太太为美好季节的先期来临感到兴奋，不禁嚷道：“十二月来了！”威尔逊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关好窗户，免得屋里的东西吹得乱七八糟。只有将军还在沉思冥想。

“已经十二月了，我们毫无进展，”他说，“怪不得人家说宁肯要坏军士长，也不要无能的将军。”

他接着玩牌，一局没完，他把牌搁在一边，吩咐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做好动身的一切准备。威尔逊上校前一天刚把将军的行李再次搬下船，因而给弄得莫名其妙。

“船已经开了。”他说。

将军也清楚。“那条路不对，”他说，“应该去里奥阿查，看看能否使我们杰出的将军们终于决心打几个胜仗。”他离开牌桌之前，认为有责任向房东夫妇解释。

“现在根本不是战争必要与否的问题，”他说，“而是荣誉问题。”

十二月一日，上午八点左右，他登上双桅帆船曼纽尔号。华金·德米耶尔先生把这条船交给他随意使用：兜兜海风排除胆汁，去他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榨糖厂以换换环境，从他的多种疾病和无数痛苦中稍稍康复，或者前往里奥阿查，再作一次拯救美洲的尝试。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一起乘双桅帆船同来的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设法让一艘美国三桅帆船格兰普斯号替曼纽尔号护航，格兰普斯号除了配备多门火炮外，船上还有一位好大夫奈特。但是蒙蒂利亚看到将军病病歪歪的样子，不想仅仅听取奈特博士的意见，还同将军的当地医生商量。

“我认为他根本经受不住这次航行，”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说，“不过还是让他去吧，怎么都比待在这里好。”

大西恩纳加水道缓慢炽热，散发着有害的蒸汽，他们便改走海路，利用那年提前刮起的北方信风。挂着方帆的双桅船为将军准备了一间舱房，船只保养得很好，清洁舒适，行驶时有一种欢快的气氛。

将军兴致勃勃上了船，想待在甲板上观看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它挟带的泥沙使海水呈现灰色，有好几里宽。将军穿着一条旧灯芯绒裤，头戴安第斯软帽，上身是双桅帆船船长送给他的英国海军上装，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吹拂下，他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船上的水手为了让他高兴，捕获了一条大鲨鱼，鱼肚子里除了一些金属小物品外，还有几个骑手用的马刺。他像旅游者那么兴高采烈，终于累了，又陷入沉思。他招呼何塞·帕拉西奥斯过来，附耳说：

“莫里纳雷斯大爷现在准是在烧床垫，把匙子埋掉。”

中午时分，他们在大西恩纳加前面驶过，那是一大片混浊的水面，天上各种飞禽争先恐后地在捕食一群金色的小金枪鱼。沼泽地和海水之间是炙热的硝石平地，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渔民的房舍集成村落，院子里铺晒着他们的捕获物，远处就是那个神秘的西恩纳加小镇，白天都出现幻影，使得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学生怀疑他们老师的叙述是否正确。大西恩纳加的另一边则是内华达山脉常年积雪的峰顶。

双桅船静悄悄地鼓着方帆，几乎是贴着水面飞行，轻捷平稳，没有产生将军希望的用以排除胆汁的晕眩。再往前，当他们经过延伸到海岸的山的一条支脉时，波浪变得汹涌，风势也大了。将军急切地观察那些变化，食肉飞禽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他觉得天旋地转，冷汗湿透了衬衣，泪水模糊了眼睛。蒙蒂利亚和威尔逊不得不扶着他，因为他身体太轻，一个海浪就可能把他从甲板上卷走。下午，帆船驶进平静的圣玛尔塔海湾，他那虚弱的身体里已经没有可以排除的东西，他疲惫不堪地躺在船长的床铺上，奄奄一息，但为了愿望实现而感到陶醉。蒙蒂利亚见到他这副模样惊骇万分，下船前让奈特大夫再看看他，奈特决定用担架把他抬上岸。

在码头上迎候的人寥寥无几，圣玛尔塔人本来就对任何带官方色彩的事情不感兴趣，何况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圣玛尔塔是共和事业最难吸引的城市之一。博亚卡之役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之后，萨马诺总督逃到该城等待西班牙援兵。将军本人曾数次企图解放该城，但直到共和国已经建立之后，蒙蒂利亚才达到目的。除了保皇派的怨恨之外，圣玛尔塔人对卡塔赫纳都有敌对情绪，认为卡塔赫纳是中央政权的宠儿，将军对卡塔赫纳人又特别有好感，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不自知。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的速决处死，

糟糕的是他和皮亚尔将军一样，也是穆拉托人，即使将军的支持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感到不满。做出死刑判决的军事法庭的主席是乌达内塔，他当上总统之后怨气更大。教堂的钟没有按预定计划敲响，没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莫罗要塞上没有鸣放礼炮，说是军火库的火药那天早上受了潮。将军上岸前不久，士兵们忙乎了一阵子，以涂去教堂侧墙上用炭写的标语：“何塞·普鲁登西奥万岁。”少数几个在码头迎候的人接到他到达的官方通知时并不怎么激动。最引人注意的是埃斯特维斯主教没有到场，他是通知名单上第一个重要人物。

堂华金·德米耶尔有生之年一直记得他们薄暮时用担架抬上岸的那个瘦得可怕的人的模样，他身上裹着毛毯，套戴的两顶软帽遮到眉毛，只剩下一口气。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滚烫的手，灼热的呼吸，以及超自然的意志：他下了担架，由副官们扶持着站直身体，挨个儿招呼大家，每个人的头衔和全名都不遗漏。然后他被架上马车，倒在座位上，脑袋无力地靠着，但是眼睛急切地望着车窗外面一去不返的世界。

车队只消穿过马路就到他下榻的旧海关房子。那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由于十二月和风初起，滨海小路上有些周末的气氛。街道宽阔肮脏，有阳台围绕的石砖房屋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保存得更好。居民们搬出家具，全家老小都坐在人行道上，有些人家甚至在街心招待客人。树间的一群群萤火虫发出的萤光照耀着滨海大街，比灯火还明亮。

刚翻修的旧海关房子是全国最古老的建筑，有二百九十九年的历史，前不久经过翻修。将军的卧室安排在二楼，面对海湾，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喜欢待在正厅，那里有挂吊床的铁环。正厅里还有一张粗雕的桃花心木长桌，十六天之后，这里成了他的灵堂。他的经过防腐处

理的尸体躺在这张桌子上，身穿蓝色的将军服，但是八颗纯金的扣子在丧事的混乱中不知被谁揪走了。

只有他本人仿佛没有感到死期已如此迫近。蒙蒂利亚将军晚上九点紧急召来的法国医生亚历山大·普鲁斯珀·雷弗朗不必把脉就知道将军早在几年前就已踏上死亡的道路。根据病人颈项无力、胸部下陷和脸色枯黄的症状，他判断主要原因是肺部损害，之后几天的观察证实了他的想法。他一会儿用西班牙语，一会儿用法语同将军单独交谈，在初步询问中发现病人在歪曲症状、混淆病痛方面有了不起的才能，诊断时他竭力忍住咳嗽和吐痰，憋得透不过气。临床诊断证实了医生视诊的印象。从那晚开始到以后的十五天中，医生发布了三十三份病情公报，认为除了身体的沉痼之外，将军精神上的痛苦也十分严重。

雷弗朗大夫三十四岁，温文尔雅，衣着讲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六年前，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复辟之后，他失望之余来到美洲。他的西班牙文说写都正确流利，然而将军一有机会就炫示法语。医生立即辨出了他的口音。

“阁下有巴黎口音。”他对将军说。

“维维恩街，”将军高兴地说，“您怎么知道？”

“不是夸口，我凭一个人的口音就能猜出他是在巴黎哪个角落里长大的，”医生说，“尽管我本人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很大才离开。”

“诺曼底的干奶酪很好，葡萄酒却不怎么样。”将军说。

“那也许是我们身体健壮的秘密所在。”医生说。

他轻松地触动了将军心中孩子气的一面，赢得了将军的好感。更使将军信任的是他没有另开处方，而是把加斯特尔邦多大夫配制的止咳糖浆亲手喂了一匙给将军喝下，再给了一片安眠药，将军自己希望得到一些睡眠，心甘情愿地吃了。他们海阔天空地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安眠药起了作用，医生踮着脚尖走出房间。蒙蒂利亚将军和另外几个军官送他回家，医生说他打算和衣而睡，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叫他，蒙蒂利亚听了大为惊慌。

雷弗朗和奈特一星期内商谈了好几次，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雷弗朗认为将军以前感冒没有得到很好调理，肺部落下了病根。奈特大夫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在病情的严重性方面，两人都没有分歧。他们想请别的医生会诊来解决矛盾，但是圣玛尔塔的三个以及省里别的医生都拒不应召，也不作解释。于是雷弗朗和奈特大夫商定了一个折中的治疗方案，用镇咳剂治感冒，用金鸡纳霜治疟疾。

病人背着医生，自作主张喝了一杯驴奶，周末情况更趋恶化。他母亲常喝加蜂蜜的温热驴奶，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给他喝以治咳嗽。但是那个偏方的味道，以及它所勾起的亲切而遥远的回忆搅乱了他的胆汁，使他呕吐不止，彻底垮了下来。奈特大夫只得提前动身去牙买加请一位专家。他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位专家，花的时间短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太迟了。

尽管如此，将军的精神状态同他虚弱的身体情况很不相称，他似乎认为正在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只是微不足道的不适。他彻夜失眠，躺

在吊床上望着莫罗要塞灯塔旋转的灯光，忍住呻吟，不透露病痛，眼睛一直盯着他自己曾称之为世上最美的灯火辉煌的海湾。

“我老是看不够，眼睛都酸了。”他说。

他白天竭力显示往常的勤奋，把伊巴拉、威尔逊、费尔南多或者身边最近的人叫来，指示他们代写他已没有耐性口授的信件。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清醒地认识到将军忙于安排后事。那些信件都牵涉到他亲近的人的去向安排，其中几个还不在圣玛尔塔。他不念旧恶，替他以前的秘书何塞·桑塔纳将军谋得一个外交职务，让他新婚后过上舒适的新生活。他经常称赞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心地善良，为卡雷尼奥安排的职位使他日后当上了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他替安德烈斯·伊巴拉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向乌达内塔要了委任状，让他们以后至少有稳定的薪俸。席尔瓦日后成为总司令和陆海军部长，八十二岁去世，晚年得了他特别害怕的白内障，视力减退，经过奔走努力，出示他身上多处伤疤证明他的战功，终于得到残废证明，靠养老金度日。

将军还试图说服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让他回新格拉纳达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事态迅速发展，没有如愿。他立下文书，赠送一笔财产给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便于他在政界腾达。迪戈·伊巴拉将军是他的第一个副官，也是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以“你”相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将军建议他离开委内瑞拉，去一个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临终之前甚至为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求人情，尽管那时候他对布里塞尼奥仍感不快。

他的军官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安排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后半辈子仍旧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包括五年之

后，他们又一次在委内瑞拉聚首，和佩德罗·卡鲁霍司令并肩作战，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进行军事冒险。

那不是政治部署而是将军临终前为他的孤儿们作的安排。他向威尔逊口授致乌达内塔的信中有一句惊人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里奥阿查之事已经无望。”当天下午，将军收到那个捉摸不透的埃斯特维斯主教的信，请他在中央政府斡旋，宣布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为省份，从而结束同卡塔赫纳的历史悠久的分歧。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刚念完信，将军就做了一个泄气的手势说：“那些哥伦比亚人出的主意都是搞分裂。”后来，当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处理未复信件时，表现得更粗暴。

“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谁啊？”他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将军不再说什么。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弦，拨到正确的钟点，将军躺在吊床上，即使能睡一分钟也好。那时他才看到窗外的内华达山，清晰蔚蓝，有如一幅油画，使他想起一生中住过的别的房间。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他说。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第一晚，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大有起色，甚至在榨糖厂兜了一圈，赞扬纯种牛，尝尝糖浆，说了一些炼糖的内行话，使大家十分惊异。蒙蒂利亚将军对这种变化感到奇怪，要雷弗朗大夫讲实话，大夫解释说将军虚假的好转现象是垂危病人常有的。几天内，也许几小时内就可能死亡。蒙蒂利亚听了这个坏消息茫然失措，一拳打在墙上，手都破了。对他说来，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多次对将军说过假话，一直是出于好意或者小的策略考虑。

从那天开始，他出于怜悯而不对将军讲实话，并且吩咐接触将军的人都这么做。

那个星期，八名高级军官由于反政府活动被逐出委内瑞拉，来到圣玛尔塔。其中有几个解放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尼古拉斯·席尔瓦，特立尼达·波托卡雷罗，胡里安·因方特。蒙蒂利亚请求他们非但要向将军隐瞒坏消息，而且要把好消息说得更好，让将军的心病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做得更夸张，把国内形势说得欢欣鼓舞，以至将军的眼里又闪出旧时的光芒。将军重提搁置了一星期的里奥阿查问题，又谈起委内瑞拉，仿佛他的理想马上就能实现。

“我们沿着正确道路从头开始，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他说。接着，他以无可争辩的自信做出结论：“我再踏进阿拉瓜山谷的那天，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都会起来支持我。”

下午，他当着来访军官们的面制订了一个新的军事计划，军官们出于怜悯，热情地帮他出主意。晚上他们不得不继续听他用预言的口气宣布怎么从零开始重建他理想的广阔大国，这次要干得彻底，一劳永逸。有些人以为是在听疯子的胡言乱语，只有蒙蒂利亚敢反驳他们的惊讶。

“注意，”蒙蒂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在卡萨科伊马也以为他说的是胡话。”

谁都忘不了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那天，将军和一小批军官，包括布里塞尼奥·门德斯，为了躲避西班牙军队野外的突然袭击，在卡萨科伊马礁湖的水里泡了一夜。将军半裸身体，发着高烧直打冷战，突然喊叫着宣布他今后要怎么做：首先攻占安戈斯图拉，翻越安第斯山

脉，先解放新格拉纳达，后解放委内瑞拉，建立哥伦比亚共和国，最后征服直至秘鲁的大片南方土地。“然后我们登上钦博拉索山，在覆雪的峰顶插上大美洲共和国的三色旗，那个共和国千秋万代永远团结自由。”他最后说。当时听他说话的人也以为他神志不清，但是不出五年，那个预言不折不扣地逐步实现了。

遗憾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预言只是烦乱的下午的幻象。第一个星期郁积的苦痛迅速汇集形成一阵摧毁一切的狂风。那时候，将军的身体已抽缩得很厉害，衬衫袖子得再卷上一圈，灯芯绒裤管得剪掉一英寸。晚上只在开始时能睡三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不是咳得喘不过气，便是高热谵妄，再不然就不停地打噎，那症状是在圣玛尔塔出现的，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下午别人都在打瞌睡，他望着窗外白雪皑皑的山峰，转移自己对痛苦的注意力。

他曾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土地，但是从未立过一份遗嘱，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遗留给谁。”他常这么说。当他在圣菲准备行装时，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埃兰将军建议他立遗嘱，说是旅人以防万一，都这么做，他一本正经、不开玩笑地说他的近期计划中没有列入死亡。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他却主动要口授遗嘱和最终文告的草稿。谁都不清楚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他备受折磨的心灵的失误。

由于费尔南多生病，将军向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首先口授了一批略显凌乱的评论，表达的内容与其说是愿望，不如说是他的教训：美洲难以治理，干革命的人徒劳无功，这片土地必然会落到一群不知节制的人手里，之后又被形形色色但又没有区别的暴君所控制，还有许多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已经流露的伤心的思想。

他似乎处在临终前的清明状态，一连口授了好几小时，咳嗽剧烈发作时也不中断。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跟不上他的速度，安德烈斯·伊巴拉用左手写字也不能坚持很久。书记员和副官们都疲惫不堪，只有骑兵中尉尼古拉斯·马里亚诺·德帕斯仍在坚持，他用清晰的字体正确地记下口授，纸都写完了。他要人去取纸，但迟迟不来，便继续写在墙上，连墙壁都几乎写满。将军十分感激，把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情场决斗用的两支手枪送给了德帕斯。

他的遗嘱是把遗体运回委内瑞拉，原属拿破仑的两本书由加拉加斯大学保存，给何塞·帕拉西奥斯八千比索报答他的长期服务，留在卡塔赫纳由帕瓦儒先生保管的文件全部销毁，玻利维亚议会颁发给他的一枚勋章归还议会，苏克雷元帅送给他的镶有宝石的金剑还给苏克雷的遗孀，其余财产，包括阿罗阿矿，分给他的两个妹妹和他已故的哥哥的儿子。此外就没有什么财产了，因为还有大小几笔债务要偿还，包括兰开斯特教授那笔令他牵肠挂肚的两万银比索。

将军在例行条款之中特意破格加了一条，为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儿子的模范行为和忠诚向爵士表示感谢。这一荣誉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没有同样对待奥利里将军，奥利里奉将军之命留在卡塔赫纳听从乌达内塔总统调遣，没有及时赶到为将军送终。

他们两人的姓名永远和将军的姓名联系在一起。威尔逊先后任英国驻利马和加拉加斯的事务专员，继续在第一线参加秘鲁和委内瑞拉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奥利里先在金斯敦，后在圣菲居住，长期担任英国领事职务，五十一岁去世。他写了一部长达三十四卷的回忆录，叙述他在美洲时在将军身边的生活。他把自己默默无闻却又硕果累累的晚年归纳为一句话：“解放者已去世，他伟大的事业已湮灭，我在牙买加退隐，致力于整理他的文件，写我的回忆录。”

自从将军立了遗嘱以后，医生把他所掌握的所有姑息疗法全用上了：脚上敷芥子泥，擦脊梁，浑身涂镇痛药膏。针对他的习惯性便秘，医生用了立时见效但作用剧烈的灌肠剂。医生怀疑有脑溢血，进行了发疱治疗来排除淤积在脑袋里的风邪。这种疗法是用刺激性很大的昆虫斑蝥晒干研成粉末，贴在皮肤上产生水疱，吸收身体里的毒气。雷弗朗大夫在垂危的将军身上用了六块发疱膏药，五块贴在后颈，一块贴在小腿肚上。一个半世纪之后，许多医生依然认为直接死因是这些腐蚀性的膏药，引起了排尿紊乱，先是小便失禁，然后疼痛带血，最后膀胱下瘪得贴在骨盆内壁，正如雷弗朗解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样。

将军的嗅觉变得非常敏锐，以至身上带搽剂气味的医生和药剂师奥古斯托·托马辛不得不离得远远的。他让人在房间里喷洒比以往更多的古龙水，继续用那些无用的药草汤洗澡，自己刮胡子，狠命地刷牙，做了非凡的努力抵御死亡的污秽。

十二月的第二周，路易斯·佩鲁·德拉克罗伊上校路过圣玛尔塔。德拉克罗伊是在拿破仑军队服过役的青年人，前不久还是将军的副官。他探望了将军之后马上写信给曼努埃拉·萨恩斯，告知她实情。曼努埃拉一接到信就赶往圣玛尔塔，可是在瓜杜阿斯得到消息说为时已晚。这个消息把她从世上抹去。她消失在自己的影子里，除了将军的两箱文件之外没有别的牵挂。她把箱子存放在圣菲一个可靠的地方，几年后丹尼尔·奥利里按照她的指示领取出来。桑坦德将军上台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她驱逐出境。曼努埃拉以倔强的尊严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先去牙买加，然后过了一段悲惨的流浪生活，终于在派塔落脚。派塔是秘鲁太平洋海岸一个肮脏的港口，各大洋来的捕鲸船都在那里停泊。她做些编织活，抽抽劣等卷烟，排遣被遗忘的

愁闷，在手指关节炎痛许可时制作一些动物糖果卖给水手们换些零钱。她的丈夫索恩先生在利马荒郊遭到歹徒抢劫，身边钱财有限，却被刺死，他遗嘱中留给曼努埃拉的财产相当于她结婚时的嫁妆，但这笔钱从未交到她手上。三次值得纪念的来访对于孤苦伶仃的曼努埃拉是莫大的安慰：一次是将军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们一起回忆了光荣的往事；另一次是在阿根廷抗击罗萨斯独裁政权后回国路过的意大利爱国者吉乌塞比·加里巴迪；第三次是在世界各大洋航行、为《白鲸》一书收集素材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她晚年由于髋骨骨折，躺在吊床上动弹不得，替热恋的青年男女用纸牌算命，为他们出些主意。她五十九岁时死于一场瘟疫，防疫官员烧毁了她的茅屋，将军的一些珍贵文件，包括情书，都付之一炬。据她告诉佩鲁·德拉克罗伊，她保存的将军遗物只有一束头发和一只手套。

佩鲁·德拉克罗伊见到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已处于办丧事的混乱状态。整幢房屋像是一条没有舵的船。军官们没有白天黑夜，困得不行时才睡觉，个个肝火旺盛，雷弗朗大夫请求他们保持安静时，连平时小心谨慎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都对他拔剑相向。他们不论什么时候饿了都要弄些吃的，费尔南达·巴里加即使劲头再足、脾气再好也照顾不过来。最消沉的军官们日夜玩牌，大声嚷嚷，也不怕隔壁房间里垂死的病人听见。一天下午，将军发烧昏睡，有人在平台上扯开嗓子骂娘，说是六块木板、二百二十五枚大钉、六百枚普通小钉、五十枚金黄色小钉、十巴拉[1]马大普兰细布、十巴拉马尼拉纱带、六巴拉黑纱带，多算了十二比索二十三生太伏。

外面在高声唱账，喧哗逐渐平息，整个院子里只听见一连串的品名和价格。雷弗朗大夫在卧室里替蒙蒂利亚将军更换骨折手上的绷

带，两人都明白病人看上去像在打盹，其实很清醒地在听账目。蒙蒂利亚身子探出窗外吼道：

“妈的，你们别嚷嚷啦！”

将军没睁眼，插嘴说：

“随他们去吧。反正现在没有我不能听的账目。”

何塞·帕拉西奥斯了解将军不须细听就知道现在唱的账目同那笔二百五十三比索七雷亚尔三夸尔蒂约的款子有关。那是市政府向一些私人募捐，并从屠宰场和监狱经费里拨一部分凑成的替他办丧事的款子，品名清单则是替他钉棺木和修墓用的材料。那以后，何塞·帕拉西奥斯奉蒙蒂利亚之命不准任何人进入将军卧室，不论对方是什么军阶、头衔和地位，他又制订了看护病人的严格制度，同他自己的死没有差别。

“假如一开始就给我这份权力，这个人准能活到一百岁。”他说。

费尔南达·巴里加想进去。

“那个可怜的孤儿一向喜欢女人，”她说，“死的时候床头不能没有一个妇女，尽管我又老又丑，没有一点用处。”

他们不让她进。于是她坐在窗外祷告，企图禳解垂死者亵渎神灵的胡言乱语。以后她靠政府赈济度日，一直为将军服丧，活了一百零一岁。

星期三傍晚，当邻近的马马托科村的神甫来举行临终仪式时，费尔南达·巴里加在路上撒花瓣，担任领唱。她带领两行身穿粗麻布长袍、头戴花冠的赤脚印第安妇女，她们擎着油灯照亮道路，用印第安语唱丧歌。费尔南达在前面的路上撒了一层花瓣，那情景震撼人心，以至谁都不敢上前拦阻。将军听到他们走进卧室时从床上坐起来，用手臂挡在脸上以免灯火耀眼，大喊着赶他们出去。

“把那些长明灯拿走，简直像是鬼魂游行。”

为了不让阴郁的气氛加速垂危病人的死亡，费尔南多从马马托科请来一个街头乐队，在院里罗望子树下不停地演奏了一天。在音乐的镇静作用下，将军反应很好，几次要求重复他喜爱的对舞舞曲《三色堇》，以前他每到一地就散发这支舞曲的乐谱，民间十分流行。

榨糖厂的奴隶们停止了工作，在藤枝扶疏的窗外久久地瞅着将军。他裹着一条白被单，比死后更憔悴苍白，剃光后刚长出头发茬子的脑袋随着音乐节奏摇晃。一支曲子奏完，他就像在巴黎歌剧院里那样文雅地鼓掌。

在音乐的鼓舞下，他中午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椰蓉饼和炖鸡。饭后，他躺在吊床上要来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说：“我眼睛这么有神，还死不了。”大家已经不指望雷弗朗大夫创造奇迹，现在又产生了希望。然而正当病人看来有好转的时候，却又把萨尔达将军误认为三十八个西班牙军官之一，那三十八个人是博亚卡战役之后，桑坦德未经审判，下令在一天之内枪决的。没多久，他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没有恢复，用剩下一点力气喊着，要乐队走得远远的，别打扰他临终的安宁。恢复平静后，他吩咐威尔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写封信，请他看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分上同乌达内塔将军和解，免得全

国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他所能口授的只是信的开头：“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你写这封信。”

晚上，他同费尔南多聊了很久，第一次就前途问题帮费尔南多出点主意。他们两人合写回忆录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侄子在他身边多年，不妨尝试着单独写，作为消遣练笔，也好让他的子女了解那些光荣与磨难的年代。“如果奥利里不改初衷，他能写出一些东西，”将军说，“但角度不一样。”费尔南多当时二十六岁，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但是除了一些不连贯的札记之外，什么都没写，因为命运使他丧失了记忆，这也是他的大幸。

将军立遗嘱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卧室。在这种庄重神圣的场合，他和别人都一言不发。晚上洗澡时，他请将军更改遗嘱中有关他的条款。

“我们一直很穷，不过什么都不缺。”他说。

“恰巧相反，”将军说，“我们一直很富，但是什么都不够。”

两句迥然不同的话说得都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原是将军母亲的奴隶，按照她的安排，很小开始就伺候将军，从没有正式获得解放。他一直在奴隶和自由人的边缘徘徊，从没有给他关饷，也没有确定身份，他的个人花费包括在将军的私人开支之内。他的吃穿同将军完全一样，但十分简朴。他既无军衔又无残废证明，年纪又不适于重新开始另谋生计，将军不能撒手不管。因此没有商量余地：有关八千比索赠金的条款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不容推却。

“那才公平。”将军结尾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得很干脆：

“公平的是咱们一起死。”

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像将军一样不善理财。将军死后，他在卡塔赫纳靠政府赈济，借酒消愁，想忘掉过去，结果上了瘾。他穷困潦倒，七十六岁时在解放军退役军人的一个肮脏的收容所里死于震颤性谵妄。

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

“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不是这么回事，”雷弗朗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他以临终的洞察力扫视着房间，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借用的最后一张床；破旧的梳妆台，那面朦胧的镜子再也不会照出他的容貌；瓷面剥落的洗脸架，上面的水盆、毛巾和肥皂只能给别人使用了；豁了口的八角挂钟全无心肝地匆匆走向那不可逃避的约会：十二月十七日他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

[1]拉美长度单位，一巴拉合0.8359米。

致谢

多年前，我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谈起他打算写一本有关西蒙·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旅行的书。他提前发表了那本书的一个片断：《最后的面庞》，我读后认为故事相当成熟，文笔和格调十分完美，希望在短期内能看到全书。但是两年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计划已经搁置，不少作家即使对于自己非常喜爱的题材也常有撇在一边的情况，那时我才斗胆请他允许由我来写。那是守候了十年方始下手的猎获。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他。

除了人物的光荣事迹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马格达莱纳河，我自幼就熟悉那条河流。从我有幸出生的加勒比海岸，我一直航行到遥远模糊的波哥大城，尽管从第一次开始波哥大就比任何别的城市更使我有异乡人之感。我求学时期在河上来回经过十一次之多，乘坐的由密西西比河岸造船厂制造的汽船不由人不抚今追昔，任何作家都难以抗拒它那神话般的感召。

另一方面，我并不担心历史依据问题，因为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河旅行是他平生文献记录最少的时期。他一生书写或口授的信件数目逾万，但在那不幸的十四天中只写了三四封，陪伴他的人谁都没有留下书面回忆。可是从第一章开始，我就得偶尔查阅有关他生活方式的资料，一则材料引向另一则，以至第三、第四则材料，穷源溯流，方始罢休。在两年漫长的时间中，我埋首卷帙浩繁的文献，有些资料相互矛盾，不足为凭。我翻遍了从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的三十

四卷回忆录，到最意想不到的剪报等各种材料。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毫无经验，也缺乏方法，这两年日子不很轻松。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我之先已有些人涉猎了那些领域，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叙述一位历史名人的生平势必要受到文献的严格限制，我大胆使用文学手段在小说天地恣肆驰骋，也得到他们提供的方便。但是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一批新老朋友，他们对我提出的疑点不分大小都当作自己的问题，给予极大重视，大者如玻利瓦尔在他显而易见的矛盾中的真实政治思想，小者如他鞋子的尺码。当然，这张致谢的名单也许有不可饶恕的遗漏，如果得到宽容，我将无任感荷。

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欧亨尼奥·古铁雷斯·塞利接到我一份长达数页的问题表之后，替我做了一套卡片档案，非但提供了惊人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在十九世纪的哥伦比亚报刊上给搞混了），而且指点了调查和整理信息的津梁。此外，他同历史学家法维奥·普约合作编写的《玻利瓦尔逐日大事记》仿佛是一张航海图，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有了它便可以在人物所处的时代自由活动。法维奥·普约还从巴黎在电话里念一些有关文件解除我的焦虑，或者通过电报或传真拍发给我，仿佛那些材料是性命攸关的药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我的大小疑问，尤其是与当时政治思想有关的问题。玻利维亚历史学家比尼西奥·罗梅罗·马丁内斯从加拉加斯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玻利瓦尔仿佛难以置信的个人习惯的考证，特别是他的粗话，他的侍从人员的性格和归宿，并且认真校对了文稿的历史论据。他独具慧眼地指出玻利瓦尔不可能像我所写的那样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吃芒果，因为芒果移植美洲是几年之后的事。

巴拿马驻哥伦比亚大使、后出任外交部长的豪尔赫·爱德华多·里特尔几次乘飞机赶来，专门替我送几本世间很少流传的藏书。波哥大的堂弗朗西斯科·德阿夫里斯克塔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玻利瓦尔的参考书目中不倦地为我指点迷津。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在整整一年里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澄清了我的一些疑点，并考证出玻利瓦尔背诵的一些诗句是厄瓜多尔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的作品。我同弗朗西斯科·皮维达尔曾在哈瓦那促膝长谈，形成了我所要写的这本书的一个清晰轮廓。乐于助人的哥伦比亚著名语言学家罗伯托·卡达维德（阿尔格斯）为我调查了某些方言的含义和年代。古巴科学院地理学家格拉德斯通·奥利瓦和天文学家豪尔赫·佩雷斯·多瓦尔应我之请，列出了上一世纪前三十年盈月的日期表。

老友阿尼瓦尔·诺格拉·门多萨从哥伦比亚驻太子港使馆给我寄来了私人文稿的副本，那是他正在撰写的一部有关玻利瓦尔的专著的札记和草稿，他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引用。此外，他在本书初稿中发现了五六处荒唐的破绽和时代错误，如果谬误流传，很可能使读者对这部小说的严谨产生怀疑。

最后，安东尼奥·玻利瓦尔·戈亚内斯，本书主角的一个旁系亲属，也许是墨西哥最后一位传统排字工人，和我一起校对原稿，仔细搜寻不合逻辑、重复、前后矛盾之处，校正错字，推敲语言和书写规则，先后校阅七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纠正了一个尚未出生就赢得战役的军人，一个同已故丈夫一起去欧洲的遗孀，以及玻利瓦尔同苏克雷在波哥大共进的一次午餐，实际上他们当时一个在加拉加斯，另一个却在基多。尽管如此，我觉得后两处不改也无伤大雅，因为诸如此类的蠢话或许能给这部拙劣的作品增添一点不自觉的、甚至是可取的幽默感。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八九年一月，墨西哥城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族长的秋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轩乐 译
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
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轩乐 译

族长的秋天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族长的秋天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轩乐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

ISBN：978754426920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正文

周末，一些兀鹫钻进了总统府的阳台，啄断了金属窗栅，振翅搅乱了屋内凝滞的时光，礼拜一的黎明时分，城市从几个世纪的昏睡中苏醒，一阵温软的微风拂过，伴着伟大的死尸与腐朽的伟大散发出的气息。直到此时我们才敢进去，并且无须像最勇猛的人期望的那样，强攻残败的石砌加固墙，也不必如另一些人建议的那般，用双驾牛车撞掉正门，因为只需一推，曾在这座府邸的英雄时代抵御过威廉·丹皮尔炮火的装甲大门便会转着合页屈从退让。就仿如进入了另一个时代的域界，因为在权力的空阔藏身之处的废窟中，空气更加稀薄，寂静更加古旧，而事物在颓弱的光线下已模糊难辨。我们走在第一个庭院中，那里的铺地细砖败给了杂草来自地下的压力，我们沿路看到逃跑的卫队散乱扔下的装备、丢弃在柜中的武器，以及一张粗木长桌，桌上摆着那场被恐慌打断的礼拜日午宴的残羹剩饭，我们看到幽暗光影间的一排宽敞平房，那里曾是民政办公室的所在，彩色的蘑菇和苍白的百合生长于尚未处理的公文之间，这些案牍的处理流程通常比最荒芜枯燥的生活都要漫长，我们看到庭院中间的洗礼池，曾有不止五代人在这里通过军事圣礼受洗，我们看到院子尽头总督那被改造成车库的旧马棚，继而看到山茶和蝴蝶之间停放着的噪音年代的四轮马车、瘟疫时期的运输车、彗星年代的彩车、有序进步时代的灵车、第一个和平世纪的梦游加长轿车，它们全部漆成了那面旗帜的色彩，在覆满尘土的蜘蛛网下被保存得完好无损。在下一个院落中，于一排铁栅栏后方，生长着一片蒙着月球尘埃的玫瑰花丛，在它雪白枝叶的阴影下，安睡着这座宅子鼎盛时期的麻风病人，他们在遗忘中腐化繁衍得如此猖狂，使这阵阵的玫瑰花香不再留有一丝干净无味的空气罅

隙，它混杂着从花园深处飘来的瘟疫的恶臭，混杂着鸡舍的腥臭，混杂着挤奶棚中母牛与卫兵的粪便和尿液发酵后的骚臭：这挤奶棚早先曾是有兵士守护的殖民地大教堂。迈步穿过令人窒息的杂草，我们看到有盆栽石竹、丛生的印加百合与三角梅相伴的拱廊，那里从前是妾侍们的破落屋舍，从生活垃圾的种类和缝纫机的数量上来看，可能曾有上千个女人带着她们成群的七个月的早产儿居住于此，我们看到厨房里如浴战火般的疮痍、阳光下洗衣池里朽烂的衣裳，以及妾侍与士兵混用的厕所暴露在外的阴沟，在尽头，我们看到几株巴比伦白柳，很久以前，它们带着自己的泥土、带着它们的浆液与细雨，被巨大的海运温室从小亚细亚载送过来移植在这里，在柳树后方，我们看到了民政大楼，它雄伟而哀伤，仍不断有兀鹫从破了洞的百叶窗钻入它体内。我们并不需要像预想的那样费力撞开大门，因为仿佛仅凭声音的推动它就已自动敞开，我们沿灰岩楼梯爬上主层，那石阶上铺就的歌剧院地毯已被母牛的蹄子踏得碎烂不堪，从第一门厅到私人寝室，我们沿路看到多个已成废墟的大小办公室，母牛木然地穿梭其中，咀嚼着天鹅绒窗帘，啃噬着扶手椅的缎面，我们看到破旧的家具与鲜软的牛粪之间散落的圣徒与军人的恢宏画像，看到一个被母牛吃光了的餐厅、一间被母牛的喧杂玷污了的乐室、几张被母牛毁坏了的多米诺骨牌桌以及绿毡被母牛啃秃了的台球桌，我们看到一架扔在角落的鼓风机，它可以仿造来自指南针上任何方向的海风，慰藉府中的人们对那片已经消失的海洋的怀念，我们看到随处悬挂的鸟笼上依然蒙着上礼拜某个夜晚的布罩，我们透过一扇扇窗户看到了这个城市，它仿佛一头伏地酣睡的巨兽，对正开始度过的这个历史性的礼拜一毫无概念，我们看到城市的那一边有广阔无垠的平原伸向天际，那里曾是一片汪洋，而如今只能看到一个个被粗糙的月球尘埃所覆盖的死火山口。在那个只有极少数特权人士才见识过的禁区内，我们第一次闻到了兀鹫寻食的腐肉味道，觉察到了它千年的咳喘和预卜的本能，由它翅膀扇

起的弥漫着腐烂气味的风指引，我们在会客厅看到了母牛被蛆虫蛀蚀后拱顶一般的躯体，在数面全身镜中它们雌性动物的后臀被反复映现，随后我们推开一道旁门，它通向掩于墙后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左脚靴后跟扣有一根金质马刺，他比所有人、比所有陆上的水里的动物都更加年迈，面朝下趴在地上，弯着右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在孤独暴君的漫长生命中，他用这样的姿势睡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当我们把他翻转过来想看看他的脸时才意识到，即便他的面容没被兀鹫啄烂，也无人能将他辨认出来，因为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见过他，尽管他的头像被刻在硬币的两面，被印在邮票上、净化剂的标签上、疝气带和僧侣的披肩上，尽管印着祖国的蛟龙标志、展现他胸裹那面旗帜的肖像的镶框版画无时无处不充斥眼前，也无人能将他辨认出来，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彗星年代就已被认为是失真之作的复制品，我们的父辈所认识的他仅仅源自他们父辈的讲述，正如他们的祖辈曾讲给他们父辈听的那样，我们从小就习惯性地认为他活在那座权力之屋里，因为曾有人在一个节日之夜看到被点亮的彩光球，因为有人说曾在总统专车上看到了那悲伤的双眼、苍白的双唇，看到那隔着帷幔若有所思地向着无人缓缓道别的手，还因为在多年之前的一个礼拜日，一个流浪的盲人，一个只收五分钱就会朗诵被遗忘的诗人鲁文·达里奥的诗句的流浪盲人，被带去了他那儿，回来时美滋滋地揣着一枚货真价实的莫洛克塔金币，那是他为他个人奉上了一场诗歌朗诵会的报酬，流浪汉当然没有看到他，但这并非因为他是个盲人，而是因为自黄热病时期以来，没有任何凡人见过他，然而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我们知道，是因为世界继续运转，生活继续前行，邮件继续送达，是因为在武器广场上覆满尘土的棕榈树下，在萎靡的街灯下，市政乐团仍旧举办着愚蠢的礼拜六华尔兹音乐会，同时不断有年迈的乐手填补死去乐手的空位。近些年来，府中再也听不到人声嘈杂、鸟雀歌唱，装甲大门也永

远合上了，但我们知道民政大楼里仍有人在，因为靠海那侧的窗户晚上会透出导航灯一般的光亮，壮着胆子凑近的人还听到蹄子踩踏的纷乱声响以及围墙里大型动物的喘息，一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看到一头母牛在总统府的阳台上欣赏落日，您想象一下，一头母牛在国家的第一阳台上，这是什么世道，什么狗屎国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母牛不会爬楼梯，更何况是石砌阶梯，上面还铺着地毯，于是围绕为什么会有一头母牛跑到阳台上的问题出现了多种猜测，到最后我们已分不清究竟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还是某天在武器广场上边走边幻想出了一头母牛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的情形，那阳台已有多年没出现过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出现，直到上个礼拜五黎明时分第一批兀鹫的到来，它们离开了贫民医院的屋檐，那个它们先前用来打盹的栖身之所，一波一波地从内陆飞来，从昔日是海今日是尘埃之海的地平线飞来，一整日都在权力之屋上方慢慢回旋，直到一只周身洁白、颈羽鲜红的鸟王抛出无声的命令，于是玻璃的破碎声纷乱起伏，伟大死尸的味道渐渐飘出，而兀鹫从玻璃窗钻进钻出的景象只有在无主之屋中才会出现，因此我们也斗胆进去，在荒凉的圣殿中看到了伟大所残留的废墟，看到了被啄烂的身躯，看到了有着少女肌肤的光滑的手以及它无名指指骨上戴着的权力之戒，他周身长满了细小苔藓与深海寄生虫，以腋下与腹股沟最为密集，他患了疝气的睾丸上裹着帆布带，那部位膨肿硕大犹如阉牛肾脏，但却是兀鹫唯一避而不食的地方，即便那时，我们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死去，因为那是他第二次被发现死在那间办公室里，孤身一人、穿戴齐整，无异于睡梦中的自然死亡，正如多年前巫婆盆中的预卜之水宣称的那样。他们第一次找到他时，他的秋天才刚刚开始，国家还算兴旺，兴旺到他孤身一人在卧室时仍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却仿佛知道自己注定永生般管理着国家，那时的总统府更像个市场，若想在里面迈步前行，需从赤脚勤务兵中破开一条路，他们正在走廊上为运送蔬菜和鸡笼的驴子卸下货物，需从带

着教子的妇女身上跨过，那些孩子饥饿难耐，在台阶上蜷身而睡，等待着政府发慈悲的奇迹，还需避开满嘴秽语的妾侍们泼出来的汩汩污水，她们用新鲜的花代替瓶中过了夜的花，她们清洗地面，在阳台上晾晒地毯，并伴着枯枝敲打毯面的节奏唱着虚妄爱情之歌，这一切的周围，还能听见终身官员因看到母鸡在书房的抽屉中下蛋而发出的大呼小叫和鸟雀纷乱的啾啁，还能看到厕所中妓女和士兵的来来往往以及会客厅里流浪狗的打闹，在那座大门敞开的宫殿里，无人知晓谁是谁而又代表谁，在它非同寻常的混乱里，根本无法确定政府究竟在何处。大宅之主不仅参与到这集会般的灾难中，同时也是它的鼓动者和指挥者，在公鸡打鸣之前，只要他卧室的灯一亮，总统卫队的起床号就会响起，向附近的公爵领区传达新一天到来的通知，后者会将号声传向圣赫洛尼莫基地，基地又会将之传向港口碉堡，而港口碉堡则会连吹六声号角，首先唤醒这座城市，随后唤醒整个国家，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用双手捂住耳朵，试图止息那会儿刚开始困扰他的耳鸣，他一面沉思，一面望着那片变化无常的黄水晶般的海洋上来往船只的光亮，在荣光年代的彼时，那片海还存在于他的窗前。自从将这栋大楼占为己有，每一天，他都会在牛棚中细心查看挤奶的过程，并用手量出三辆总统府木轮大车需为各个城区配送的奶量，当他在厨房里就着木薯饼喝下大杯黑咖啡时，心中并不知晓新日程的疾风会将他拖向何方，他总是留心女仆间的闲谈，在府中只有她们与他用相同的语言，她们严肃的奉承之辞他最为看重，她们的各种心思他最善解读，快到九点时，他会来到自己隐秘院落中的花岗岩浴池，在杏树丛的阴凉下，在泡满药草的热水中不紧不慢地泡澡，直到十一点过后，他才能抑制住清晨的忧虑，才能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意外。之前，在海军陆战队占领时期，他会将自己锁在办公室内，和登陆部队的司令一同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当时不识之无，他用大拇指画押的方式确立了各项法律，签署了各种命令，然而当他们离去，让他

再一次独自面对国家和权力时，他没有再用沉睡的法律来荼毒自己的血液，而是凭鲁莽的口谕和无时无处不在的身躯，以严苛如石的节制沉缓，同时也以他这个年纪不可能拥有的勤奋统治着国家，他被大群的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包围，他们悲苦呼号，乞求他手中治病的盐，颇有学识的政治家和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也将他围绕，共同推举他为地震、交食、闰年以及上帝所犯的其他错误的修正官，他拖着象腿一般的下肢踏着雪，在府中四处走动，用简单的方式处理着国家大事和家中琐事，正如他用同样简单的方式命令着，给我把这扇门拆掉安在那儿，他们拆了，再给我安回去，他们就再安回去，钟楼的钟在十二点的时候不要敲十二下而要敲两下，这样生命能显得更长一些，于是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刻停顿，他的指令被一一执行，只有致命的午休时段例外，那时他会躲在妾侍们的身影间，突然逮住其中一个，不褪她的衣服，不脱自己的衣衫，也不把门关上，于是整个府中都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急迫丈夫的没有灵魂的紧促喘息，听到金质马刺充满欲望的叮当声，听到他如狗一般的呜咽和女人惊恐的叫喊，她虚度着她的欢爱时光，只想摆脱落在她身上的七个月的早产儿们那肮脏而萎靡的目光，滚开，去院子里玩吧，小孩儿不该看这个，那一刻仿佛有天使划过祖国的天空，于是话音止息了，生命停顿了，在那根食指压上双唇的瞬间，所有人都石化了，没有呼吸，安静，将军正干得火热，然而就连最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那个神圣时刻带来的停息，因为他仿佛总是分身两处，晚上七点有人看到他在玩多米诺骨牌，而同时也有人看到他在会客室点燃牛粪驱散蚊虫，在最远处的几个窗口的灯还没有熄灭时，在还能听见总统卧室的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上锁的动静时，在还会传来那副疲累身躯轰然倒在石地面上的声音和那衰弱孩童般的随着涨潮而渐沉的呼吸声时，没有任何人抱有任何幻想，直到晚风的琴声平息了他耳膜间的蝉鸣，泡沫翻滚的宽广海浪席卷了那曾属于总督与海盗的古老城池的街道，直到海水如同

一个可怖的八月的礼拜六那样，从每一扇窗户涌入民政大楼，令龟足长满了镜面，任鲨鱼在会客厅中妄为，直到海面超过了史前海洋的最高高度，海水漫过地面，漫过了时间与空间，只剩他孑然一身趴在他孤寂梦中的月球水面，弯着右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与他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他的军靴、他的金质马刺一同漂浮。第一次死亡前的那些严峻年头里，他之所以能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出现，之所以能在上楼的同时下楼，在海中迷醉的同时在失落的爱欲中残喘，并不是因为像他的谄媚者所说的那样，他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本领，也并非如他的批评者所言的那般，只是群众的幻觉，而是因为他幸运地得到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狗一般的忠诚和周全的服务，他是无意中被发现的完美替身，当时有人向他报告将军阁下，有一辆假冒的总统马车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到处招摇撞骗，生意很火，他们说看到了丧葬般阴影下的忧郁双眼，看到了那苍白的双唇以及敏感新娘的手，那只手戴着缎面手套，向跪在街旁的病人撒着一把把盐，而跟在马车后面的两个假冒的骑兵军官向人们收着治病的硬币，将军，您想想，这是多大的冒犯啊，然而他并没有下令制裁冒名者，而是让人将他秘密地带回总统府，为了避免混淆，还给他头上套了龙舌兰叶编织的口袋，于是他看到了自己在这般境况下的样子并为此饱尝屈辱之感，妈的，如果我是这个人呢，他说，因为我真的好像就是他，只不过他的声音中没有威严，那是他永远都模仿不来的，他也不是没有清晰的掌纹，他的生命线在大拇指根部周围恣意延伸，当时他没有立即将他枪毙并不是因为已经有意把他留作官方替身，而是因为他幻想着自己的命运密码被写在了他的冒名者的手掌上并因此坐立不安。当他彻底相信这个梦的虚无时，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已经不知不觉地逃过了六次刺杀，并习惯了拖着被木槌砸扁的双脚行走，他患上了耳鸣，在冬日清晨疝气会作痛，他还学会了摘戴金质马刺，仿佛皮带绑绳的相互纠缠只是为了拖延会见的时间，他会一边摆弄一边嘟囔，这些佛兰德斯

铁匠造的是他妈的什么扣襻，在这马刺上都不好用，他一改当年在父亲的玻璃窑厂吹瓶子时的饶舌与满嘴戏言，变得阴郁而审慎，他并不在意别人对他说的话，而是专注于探究他们眼中的晦暗，希望参透他们没告诉他的信息，在回答某个问题之前，他一定会先反问对方，您有什么看法，从前贩卖治病奇迹的时候，他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如今却不停奔波，勤奋到近乎自虐的程度，他变得吝啬、贪婪，屈从于突袭式的泄欲，甘愿不要枕头，和衣趴着睡在地上，他摒弃了自己那早熟的狂妄个性，摒弃了遗传来的灵感满溢的吹制瓶子的天赋，他面对着权力最凶猛的风险，比如在不能垒上第二层石块的地方立起奠基石，比如在敌人的地盘上剪彩，比如承受着如此多的被慢火烹煮的梦、如此多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带来的压抑叹息：他在为那么多一闪而过又遥不可及的美人们戴上后冠时，几乎没能碰到她们，但他已经永远地满足了，满足于那个一目了然的命运，那个他正走向的但并不属于他的命运，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贪欲或者信仰，而是因为他用官方替身这个终身职位换取了他的人生，每月象征性地付给他五十比索的工资，令他像帝王一样地生活却无须承受身为帝王的不幸，你还想要什么呢。在一个长风呼啸之夜，他们的身份混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撞见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正面朝大海，在一片茉莉味道的水汽中叹息，于是他带着合理的警觉问他，是不是有人在他的食物中放了乌头，所以他才流离到这儿，中了邪似的魂不守舍，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回答说没有，将军阁下，情况比这还糟，上个礼拜六他为一位狂欢节女王加冕并与她跳了第一曲华尔兹，从此便再也寻不着离开那段记忆的出口了，因为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是那种我配不上的女人，将军阁下，您要是看到了她，但他叹了口气回应说，妈的，当男人对女人念念不忘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他建议强行占有她，他从前就是这样对待众多迷人的后来成为他妾侍的女人的，我找人把她强按在床上，派四个士兵把她的手脚固定住，你就可以用大勺子享用

她了，妈的，把她放倒了享用她，他对他说，甚至连那些一开始会愤怒反抗的最矜持的女人随后都会向你哀求，别这样丢下我，将军阁下，就像正散落种子的悲伤蒲桃，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不想要这么多而想要更多，他要她们爱他，因为她是那种知道那些歌手来自什么地方[1]的女人，您一见到她就能看出来，于是像是指出解脱方式一般，他向他指明了几条通往妾侍房间的夜访小径，他授权与他，让他可以像他本人一样使用她们，突然地迅速地不脱衣服地使用她们，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真挚地沉陷在那摊借来之爱的泥沼中，他相信有了这些爱，自己的渴望就可以被堵塞，然而他的热望是如此强烈，有时甚至令他忘记了借债的条件，他因疏忽而裤链大开，流连于细枝末节而耽误时间，他漫不经心地撞上最吝啬的女人所隐藏的石头[2]，他向她们倾付着自己的喘息，在黑暗中令她们惊喜淫笑，您真坏，将军阁下，她们会对他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贪心，于是从此之后，他们俩和她们之中再没有谁知道哪个孩子是谁的，也没有谁知道是谁生下的，因为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样，都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就这样变成了权力的核心，成了最受爱戴也许也是最令人畏惧的人，而他也得以像在统治的最初阶段那样，把更多时间与心思花在武装力量上，这并不是因为武装力量如我们所认为的，是他权力的支撑与保障，恰恰相反，因为它们是他最可怖的宿敌，所以他让一些官员相信他们被同僚监视着，他调换他们的职位以免有人结党营私，他配给每个营地的十颗子弹中有八颗做了假，向他们发放的火药中混了海滩沙粒，而将优质的军火都储藏于总统府与他咫尺之遥的仓库中，并把那里的钥匙，连同其他每一扇别人无法进入的房门没被复制过的钥匙，拴在同一个铁环上，他被我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沉默的身影保护着，后者是军校出身的炮兵，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同时也是总统卫队司令、

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以及寥寥几个被允许在多米诺骨牌局中赢他的普通人之一，因为他曾在总统的四轮车还有几分钟就要经过行刺点的时候试图拆除甘油炸药装置而失去了右臂。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的保驾与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协助下他感到无比安全，竟开始疏于自我克制，越来越频繁地抛头露面，甚至敢只带一个随从就乘着没有标识的破车在城中闲逛，透过布帘的缝隙窥赏曾被他用法律条文定为全世界最美的那座由金色砖石砌成的傲慢的大教堂，他遥望着那些古老的灰岩大宅，它们拥有已沉睡时代的门廊和面朝大海的向日葵，他看着总督区透着烛芯味道的石墁路面，看着面色苍白的小姐们在阳台上日光下的石竹花与三角梅之间带着挥散不去的优雅勾织着蕾丝，看着比斯开修女们下午三点在有着棋盘纹饰的修道院中练习古钢琴，与当年庆祝彗星第一次经过时的方式一样，他穿过嘈杂的商业迷宫，经过那里致命的音乐、彩票店的旗帜、卖甘蔗汁的小摊、蜥蜴卵穿成的串儿、土耳其人被晒蔫的廉价玩意儿和那个因不从家长之命而变成南蝎的女人的可怖手绢，他穿过那条没有丈夫的女人们聚居的破落小巷，这些女人会在傍晚时分把衣服晾在刻有纹饰的木质阳台上，裸着身子外出购买蓝色的北美乌鱼和粉色的鲷鱼，还会和卖菜的妇女争吵骂娘，他闻到了风携带的腐烂海鲜的气味，看到了街角白鹈鹕日复一日散发的光芒，望见了海湾高岗上色彩凌乱的黑人棚屋，突然，就在那儿，港口，啊，港口，那里的码头铺着吸水木板，那里海军陆战队的装甲舰比真相更长更阴森，一个黑人码头女工面对慌乱的马车躲闪不及，于是看到了那个正用世上最悲伤的眼神望着港口的迟暮老人并因此感受到死亡的触动，是他，她惊呼，硬汉万岁，她喊道，万岁，男人、女人、从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小酒店跑出来的孩子都这样呼喊着，万岁，绊住马腿拦住马车希望能握到那只权力之手的人也呼喊着，他们的行动精准而又出人意料，他差点没来得及推开随从持枪的手，他厉声呵斥道，别那么胆小，中尉，让他们来爱我吧，那

一天以及随后几天人们的狂热爱戴令他极度兴奋，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费尽功夫才打消了他那乘坐四轮敞篷彩车巡游，好让爱国者们都能看到我的全身的念头，真见鬼，他丝毫都不怀疑港口那次突然的热闹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也没有怀疑接下来的那几次是自己的安全部门为了毫无风险地取悦他而策划的，他受着他的秋天来临之前洋溢着爱的和风的哄骗，甚至敢在多年之后再次离开这座城市，重新启动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旧火车，沿着他广阔而沉重的王国的屋脊攀缘而上，从兰花的枝叶与亚马逊凤仙花中破开道路，惊扰了长尾猴群、天堂鸟和卧轨而眠的豹子，一直驶至他荒芜故土冰冷而凄凉的村庄，在那里的车站，乐队演奏着阴郁的旋律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为他敲着丧钟，展示一块块牌匾来欢迎坐于圣三一右侧的无名显贵，散居在乡村教区的印第安人下了山，向他围聚过来，期望见识一下隐藏于总统车厢内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权力，但那些得以靠近的人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望到的只是惊恐的眼眸、颤抖的双唇、在荣光的边缘挥动致意却无人知其所属的手掌，卫队中的某个成员一直试图让他远离窗口，请您小心，将军，祖国需要您，但他却在半梦半醒间回答，别担心，上校，这些人爱我，在高地荒漠的火车上如此，在木舵航船中也是如此，这艘船绕过史前恐龙的残骸，绕过意外遇见的、美人鱼正要在那里分娩的岛屿，绕过令数座巨大城市消失的灾难性日落，在栀子花甜蜜的芬芳和赤道支流中蝾螈的腐烂味道间留下了自动钢琴奏出的华尔兹涟漪，一直开到炎热而荒凉的村落，那里的居民都在河岸翘首张望漆着国家色彩的木船，却只能勉强分辨出一只戴着缎面手套、不知其所属的手在总统寝舱的窗口挥动致意，而他则看到岸边以海芋叶代替旗帜挥舞的人群，看到他们跳入水中，带着活貘，带着巨如象脚的山药和装着长尾林鸮的背篓，期盼为总统的杂烩汤送上食材，他在幽暗如教堂的舱室中慨叹，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船长，看看他们有多爱我。十二月，当加勒比世界变得晶莹起来，他会乘旧车沿峭壁山路

而上，直至悬崖之巅的房子，在那里同这片大陆其他国家的老独裁者以及被废黜的国父玩一下午多米诺骨牌，多年以来，他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如今，他们正在他慈悲的阴影下老去，他们在露台的椅子上幻想着那艘会让他们东山再起的虚幻之舰，他们在他于大海的阳台为他们建的敬养院中孤独自语、渐成死尸，他接待了他们众人，却仿佛只接待了一人，因为他们都在黎明时出现，都在睡衣之外反穿着华丽的军服，都携着一个衣箱，里面装有搜刮民众而得的钱财，还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有放勋章的小盒、贴在旧账簿上的剪报以及一本肖像相册，他们在第一次受他接见时，会像呈上身份证明一样向他展示自己的相册，您看，将军，这是担任中尉时的我，这是就职那天照的，这是执政十六年纪念，这里，将军您看，但他在提供给他们政治避难所时，并没有更多地在意他们，也没有查看身份证件，因为一个垮台的总统仅存的身份证明应该是他的死亡证明，他说着，也带着同样的鄙夷去听那不切实际的简短演说，我暂时接受您高规格的款待，这段时间内公正的人民会清算篡权者的，这庄重的永恒公式实在幼稚可笑，因为不久之后他又会听到篡权者这样说，再之后会听到篡了篡权者权的人这样说，仿佛那些孬种并不知道，在这笔男人的交易里，完蛋了就是完蛋了，他会将他们通通留下，请他们在总统府住几个月，强迫他们玩多米诺骨牌，直到将他们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掏空，随后他扶着我的手臂来到面海的窗口，他令我更因这苦恼的只向一方前行的生活而心痛不已，他用去那里的希望安慰我，瞧，那里，在那座像搁浅在悬崖顶端的远洋轮船的大房子里，我为您留了一个单人间，有明媚阳光、美味佳肴，有大把时间可以让您与其他深陷不幸的伙伴一同忘记烦恼，还有一个海景露台，他喜欢在十二月的午后坐在那里，倒也不是和那群傻瓜玩多米诺骨牌有多快乐，而是因为他会以小人之心享受自己不是他们之中一员的快感，因为他能一边在泥潭中把幸福搅得哗哗作响，一边在映照出他们落魄身影的警示之镜中端详

自己，他独自做着梦，打着鬼主意踮着脚尖跟踪正在黎明的昏暗中打扫民政大楼的温顺的穆拉托女人，他嗅着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公共宿舍的臭气和药店里的发蜡味道，他窥视着，希望能撞到一个落单的好和她在办公室门后像鸡一样做爱，而她们会在黑暗中爆发出淫笑，将军可真坏啊，您可是伟人还这么好色，然而在做爱之后，他会陷入悲伤，会去没人听到的地方唱歌来安慰自己，他会唱，一月的明亮月光，他会唱，看看在你窗下刑场上的我多哀伤，在那些毫无凶兆的十月里，他是如此确信他的人民爱他，甚至会在没有卫队守护的情况下，在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居住的郊区大宅的庭院中，挂上吊床在罗望子树的阴凉下睡午觉，梦到那些流浪的鱼在卧室彩色的水中游动，他会叹息着说，母亲，祖国是最好的发明，却从不等待那个世上唯一敢因他腋下的烂洋葱味儿而斥责他的人的应答，他会走正门返回总统府，因加勒比一月奇迹般的时节、因在晚年的尽头与世界的和解、因与教皇使节重归于好后那些锦葵色的温和午后而倍感兴奋，那使节来访时并不会一味游说他皈依基督，他们会蘸着热巧克力吃着小饼干，而他则会笑到几乎背过气去地叫嚷着，如果上帝真像您说的那样好，让他把我耳朵里嗡嗡叫的屎壳郎拿走吧，他说着解开襟门上的九颗扣子，向他展示非同寻常的疝气，让他给我这东西放放气吧，他对他说，但使者转而开始进行冗长的禁欲主义教化，企望说服他，一切真理，无论出自何人之口，都来自圣灵，华灯初上时，他把他送到门口，带着一副少见的几乎要笑断气的样子，别白费口舌了，神父，他对他说，不管怎样，我做的就是你们希望我做的，都这样了您怎么还想让我信教呢，见鬼。然而这舒缓平和的气氛很快就在一片遥远荒漠的斗鸡场中耗尽了，那天，一只凶残的公鸡将对手的头扯了下来，并在嗜血的观众面前，在一场满是用欢快的音乐赞颂暴力的醉汉的家庭舞会上，将它啄食掉，而他是唯一一个察觉到凶兆的，他感觉它清晰而迫近，于是悄悄命令卫队逮捕了其中一个乐手，那个，正

在吹大号的那个，果不其然，他们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双管霰弹枪，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供认本来计划在散场时趁乱向他开枪，当然，再明显不过了，他解释道，因为我正看着所有人，所有人也在看着我，只有那个吹大号的狗娘养的一眼都不敢看我，可怜的家伙，然而他也清楚，那并非他的最后一劫，之后在民政大楼度过的夜晚中，虽然安全部门已经向他表示，您不必担心，将军阁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他仍焦虑不已，自从在斗鸡场尝过那种预感的折磨后，他便紧紧抓住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仿佛将他当成了自己，让他吃自己的菜肴，让他与自己用同一个勺子一起喝下他的蜂蜜，万一食物被下了毒，最起码两人会一起死，也算是个安慰，他们会像逃荒者一样在被遗忘的房间里走动，走在地毯上，不让别人听出他们鬼鬼祟祟的暹罗象般的脚步声，他们放步漫游在灯塔从窗口射入的断断续续的光亮中，每隔三十秒，那光线都会穿过沉睡的海上一艘艘夜航船的凄郁离愁、穿过燃烧牛粪升腾的烟射进来，用绿色充盈整个房间，他们会花一个又一个下午去赏雨，会在九月那些萧索的黄昏里像老迈的情侣一般细数飞燕，他们与世界那般疏离，以至于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奋力而为的分身法正适得其反地滋养着猜忌：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进入了休眠，尽管警卫人数多了一倍并且不许任何人出入总统府，还是有人躲过了严格的排查，看到了笼中的喑哑鸟雀，看到了在洗礼池饮水的母牛，看到了玫瑰丛中睡着的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每一个人都在正午就期盼着黎明，因为如预卜水盆宣称的那样，他已在睡梦中自然死亡，只不过高层对此秘而不宣，并试图在血腥的非法集会上调停迟来的冲突。虽然无视这些风言风语，但他很清楚有些事将要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于是他打断缓慢进行的多米诺骨牌局，问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局势怎么样，兄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将军阁下，祖国很太平，他从走廊上稀软的牛粪燃起的祭坛之火中、从古老的井水里捕捉着预兆，却找寻不到什么能解释他的焦虑，当热浪消退时，他去

郊区宅院拜访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两人在罗望子树下吹着午后的凉风，她坐在母亲的摇椅上，虽然虚弱却神志清醒，向鸡群和在庭院地面觅食的孔雀撒着玉米粒，而他，坐在漆成白色的柳木安乐椅上，拿帽子扇着风，用朽迈的饥渴眼神追逐着给他端上彩色水果饮料的壮硕的穆拉托女人，解解渴吧，将军阁下，他心里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但愿你知道，我已经不行了，我想走得远远的，无论去哪儿，母亲，我要远离这么多的凌辱，然而即便对母亲，他也没有表露出内心的唏嘘，而是趁华灯初上就返回总统府，从旁门进去，经过走廊时听到哨兵的踏步声，他们如往常一样依次向他致敬，将军阁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他知道那不是真的，他们习惯性地欺骗他，因恐惧而欺瞒他，在那场从斗鸡场的不祥下午开始的毫无定数的危机中，在那场给他的荣光染上苦楚、剥去他由来已久的统治欲望的危机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直到夜很深了他还趴在地上没有睡着，从向着海敞开的窗口传来遥远的鼓声和哀伤的笛声，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穷人的婚礼，他们也会这样欢快地庆祝他的死亡吧，他听到了一艘懒散的航船未经船长许可便在夜间两点起锚离开的动静，听到玫瑰清晨绽放时纸张一般的声响，他热得出汗汗液却冰冷，他无意识地发出叹息，他不曾有一刻心绪平静，凭借原始的本能，他预感到了那个他从郊区宅院迫切回府的下午，那天他在街上撞见了大批骚动的民众，窗子开开合合，燕子在十二月清透的天空中惊惧万分，他微微撩开马车窗帘想窥看发生了什么，他自言自语道，就是这样，母亲，就是这样，看着空中五彩缤纷的气球，他有了一种可怕的解脱感，红色的绿色的气球，忧郁的大橙子般的黄色气球，无数流浪的气球在惊恐的燕子间升空，在下午四点水晶般的光芒中飘浮片刻又很快在静默而一致的爆炸中破碎，从城市上空撒下千万张纸页，如同一场宣传单的暴雨，车夫趁势从公共市场的骚乱中溜走了，没有任何人认出最高权力的马车，因为所有人都忙于哄抢气球撒下的纸页，将军阁

下，他们在阳台上吼着，在压抑中背诵着，他们呼喊着，去死吧独裁者，甚至连他的哨兵都在走廊中高声朗读着，不分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以爱国之心统一战线反抗军队的跋扈与腐败，他们呼喊着停止杀戮、停止掠夺，在他进入车行门的那一刻，整个国家从千年的沉睡中苏醒了，他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将军阁下，他们用浸了毒的标枪刺中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他的性命危在旦夕。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他情绪不悦，向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提议玩猜硬币正反面的游戏，如果是正面，就你死，如果是反面，就我死，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对他说这样两人都得死，因为所有钱币的正反面都铸着两人的肖像，于是他又提出在多米诺骨牌桌上决定生死，二十局分胜负，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接受了提议，我非常荣幸，非常乐意将军阁下，只要您能授予我战胜您的特权，他接受了，同意，于是他们就这样玩了一局，玩了两局，一直玩到第二十局，赢的都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他从前能获胜只是因为战胜他是被禁止的，他们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战斗，直到最后一局他都未尝过胜利的滋味，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用衬衫袖子擦干汗，叹息道，实在抱歉，将军阁下，但我不想死，于是他开始把牌拾起来，一边按顺序码放在一个小木盒里，一边像一位正在讲课的教师那样，说着他也没理由就这样死在多米诺骨牌桌上，他将在应该死的时辰和地点在睡梦中自然死去，就像女巫的水盆在他的时代伊始就已预言的那样，甚至那样都不应该，好好想想吧，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让我去理会那些水盆的，而是让我去发号施令的，无论如何，我就是我，而不是你，所以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这不过是个游戏，他笑着对他说道，但那时甚至永远，他都无法料到那个可怕的玩笑在他踏入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房间的那晚变成了现实：他看到他已经生命垂危、无药可救，全然没有战胜剧毒而生还的希望，他站在门口伸出手向他致意，愿上帝拯救你，兄弟，为国而死

是莫大的荣耀。在他漫长的弥留过程中，两人独处一室，他一直陪伴在他身旁，一勺一勺地喂他止痛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喝着药水，毫无感激之意，每喝一口都对他说，我只会离开您的狗屎世界一小会儿，将军阁下，因为我的心告诉我，我们不久后就会在地狱深处再碰面的，因为中毒，我会比一条鳐鱼更加扭曲，至于您，手里提着自己的脑袋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儿，说句大不敬的话将军阁下，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您了，我从来就没有像您想象的那样爱过您，而且自从在海盗猖行安的列斯群岛的时代不幸地被卷到您的多米诺骨牌局中，我就终日祈祷您被杀死，哪怕是被体面地杀死，这样您就能为您带给我的孤苦人生付出代价了，您先用木槌把我的脚掌打扁，让它们变得和您那双梦游人的脚一样，再用鞋匠的锥子穿过我的睾丸，好让我患上疝气，之后安排我喝下松节油，让我忘记怎样读写，那过程就好像当初我母亲教我读写时那样费劲，您总是强迫我去出席那些您不敢出席的公众活动，这并不是因为您所说的国家需要您活着，而是因为在给那些漂亮婊子戴上皇冠时，即使是最坚毅的人，也会夹紧屁股，完全不知道死亡会从何处而来将自己击倒，请恕我不敬，将军阁下，然而他并不在乎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无礼却在意他的忘恩负义，我让你在这宫殿里过得像个国王，我给你的没有别人能给，世上再没有谁能像我这样甚至连自己的女人们都借给了你，咱们还是别谈这个了吧将军阁下，我宁愿被阉了也不想把那些做母亲的推倒在地，好像她们是需要被烙印的小母牛似的，只不过那些没心没肺的可怜荡妇甚至都感觉不到烙铁，她们不会尥蹶子不会挣扎不会像小母牛那样嚎叫，甚至屁股上都不冒烟闻起来都没有烧焦的肉味，好女人的标准她们都达不到，她们只会把自己死母牛一样的身体摆在那儿让人泄欲，同时还要继续削着土豆皮，对别的女人喊着帮我看着点儿锅，我休息一会儿，别让米煮糊了，说句大不敬的话，只有您才会相信这玩意儿是爱，将军阁下，因为这是您唯一知道的，听到这里他怒斥道，闭

嘴，他妈的，闭嘴，不然我要你好看，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不带一丝玩笑口吻地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闭嘴呢，您最多不过就是杀了我，而您此刻已经在杀我了，您最好还是趁现在好好看清真相吧，将军阁下，这样您会知道，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您他的真实想法，所有人告诉您的都是他们认为您想听到的，他们在您面前卑躬屈膝，背着您就冲您比画手枪，能碰到我这个全世界最怜悯您的人您就感谢上天吧，因为我是唯一一个长得像您的人，唯一一个敢如实告诉您人人都在说的话的人，他们说您谁的总统都不是，说您不是凭借自己的大炮登上的王位，说您能坐上宝座全是因为英国人让您坐，那些外国佬用装甲舰上的两门大炮维持着您的王位，当他们叫嚣着我们把你和你的黑人窑子留在这儿，看没了我们你可怎么办时，我看到您急得团团转，害怕得不知该如何发令，后来您并没有从位子上退下来，甚至从来都不曾退下来，那并不是因为您不想而是因为您不能，您就承认吧，因为您知道，当人们在街上看到您一身死人打扮的时候，他们会像狗一样扑上来，挖走这一块，因为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的屠杀，撕走另一块，为了被扔进港口碉堡的池塘里生生喂了鳄鱼的囚犯，揪走又一块，为了被活活剥了皮的人，那些皮还被寄到他们的家里以示警告，他说着，从无尽的迟来的怨恨中拽出一连串他臭名昭著的统治下的凶残罪行，一直说到他不能再说，一直说到一把火耙打下，令他肝肠寸断，他心软了，毫无冒犯之意地几乎是哀号着说了最后几句，我是说真的将军阁下，趁我就要死了和我一起死吧，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指望自己长得像另一个人，更不用说像一位国家政要，我只不过想当一个落寞的吹瓶子的玻璃工，就像我父亲那样，鼓起勇气试一下吧，将军阁下，没有看上去那么疼，他言之凿凿，语气沉着，甚至没能激怒他开口做出回应，他只是试着扶住椅子上的他，因为他开始抽搐，开始用双手抓扯腹部并流着疼痛与羞辱交织的泪水啜泣，将军阁下，真抱歉，我要拉出来了，但他却觉得他只

是在用什么比喻来表达自己怕得要死，然而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说道，不，我想说的是我在拉屎，在拉屎将军阁下，于是他终于开始哀求他说你忍忍，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你再忍忍，咱们是祖国的将军，即使死，也要死得像个男人，但已经晚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一头栽了下去，于是他扑落到他身上，恐惧地蹬着腿，浸在了粪便与泪水中。在与会客厅相邻的办公室里，他用丝瓜瓤和肥皂搓洗才把他身上死亡的恶臭除掉，他为他穿上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为他裹上帆布疝气带，套上军靴，在左脚靴后跟戴上金质马刺，他在这样做的同时感到自己正逐渐变成世上最孤独的人，最后他抹去了所有虚假表象，将自己在预卜水盆中亲眼所见的丝毫不差地还原出来，如此一来，次日清晨府中的清洁女工就会发现他趴在地上死了，事实的确如此，她们看到了伪造的他第一次在睡梦中的自然死亡，看到了他身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穿着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弯着手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与他期盼的相反，那一次消息并没有迅速传开，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谨慎考证、秘密调查，各个法定继承者试图用五花八门、彼此矛盾的说法来澄清死亡谣言，以拖延时间，趁机进行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把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带到商贸大街好让众人看到她未带愁容，主啊，他们让我穿上花衣裳把我打扮得像马里蒙达[3]一样，给我戴上鹦鹉帽让全世界都以为我是幸福的，他们非要我在商店里购物，但我和他们说不，主啊，我说现在不该买东西应该哭，因为甚至连我都相信我儿子死了，他们为我照全身像时还逼着我微笑，那些军人说为了祖国必须这么做，这个时候他则在密室中困惑地自问世界怎么了，怎么没有什么因他虚假的死亡而改变，怎么太阳会照常升起，并且毫无阻碍地一次又一次升起，为什么这礼拜日的空气，母亲，为什么没了我它仍是一样的热，当不合时宜的炮声在港口碉堡响起，当大教堂教益众人的钟声开始报丧，当骚动的人群得悉

世上最大的新闻而从世俗的倦怠中挺直了身躯登上民政大楼，他这样惊恐地问着，他将卧室的门开了条缝，探头望向会客厅，他在那个炽热的房间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比基督教任何一个死去的教皇都死得更加彻底、装饰得更加繁复的自己，他被恐惧和羞耻刺伤了心，因为他那军事巨头的身体周围放满鲜花，因为他的脸上扑了粉，唇上涂了彩，因为他那冷漠的年轻女子的僵硬双手放在了别满功勋奖章的胸前，因为在死后被尊为宇宙大将军的他穿着绣有十个朝阳的华贵制服，因为那把从未使用过的纸牌国王军刀、那戴有一副金质马刺的漆皮军靴，以及被束缚在他那躺卧的娇柔身躯里权力的广大附庸物与武力的阴森荣耀，他妈的，那个人不可能是我，他怒不可遏地自语道，他妈的，这不公平，他一面看着排队围起他尸体的随从一面说道，有那么一刻，他忘记了这出戏的模糊目的，他感到在庄严的权力面前，自己被死亡的无情贬低侮辱了，他看到了没有他的生活，他带着某种怜悯看到了失去他威权庇护的人们是怎样的状态，他带着某种深藏的不安看到了只为来弄清那是否真是他本人的人，他看到了一个以联邦战争期间共济会的方式问候他的老人、一个亲吻他戒指的戴孝男子、一个为他献上花束的女学生，以及一个因无法承受他死去的事实而将鱼筐打翻在地的鱼贩，她抱住喷过香水的尸体哭喊道是他，我的上帝啊，她哭泣着，没了他我们可怎么办啊，所以真的是他，人们叫嚷道，是他，烈日下武器广场上憋闷的人群叫嚷道，于是丧钟停了，大教堂和其他所有教堂的钟声一同宣布这是一个欢乐的礼拜三，于是复活节烟火绽放了，荣耀鞭炮炸开了，自由之鼓敲响了，他看到进攻队伍从窗户钻了进来而卫队在他们面前欣喜又沉默，他看到人头汹涌攒动，他们用棍杖驱散了侍从，又将那个悲戚无助的鱼贩推倒在地，他看到有人向尸体施暴，看到那八个人将尸体从无法追忆的遥远状态中、从百子莲与向日葵的虚幻时光里拽出来，在楼梯上拖扯着，他看到一些人破坏了那个富饶与不幸的天堂的脏腑却自以为永久地毁灭了

它的内核，他们永久地摧毁了那个权力的巢穴，砸烂了纸纤维石膏雕成的多立安式柱头、天鹅绒窗帘以及顶着石膏棕榈树的巴比伦柱，将鸟笼、总督宝座和三角钢琴抛出了窗外，推倒了存放有无名显贵骨灰的骨灰墙，割裂了绣有幻灭的冈多拉船上熟睡的少女的哥白林挂毯和绘有主教、古代军阀以及恢宏海战的巨幅油画，为了不让后代对军人的丑恶血统留有哪怕最轻微的记忆，他们毁灭了那个世界，他从百叶窗的缝隙望向街道，想看看那些从窗口扔出的灾难落到了何方，只消一眼，他就看到了太多的无耻与忘恩负义，比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和为之哭泣的还要多啊母亲，他看到他那些幸福洋溢的寡妇从侧门离开了那座宅院，她们从我的牛棚里牵走了母牛，搬走了政府的家具，卷走了您的蜂房产的瓶装蜂蜜啊母亲，他看到他的七个月的早产儿们用厨具、琉璃工艺品、主教晚宴的餐具奏响喜乐，如街贩般高声喊着我爸爸死啦，自由万岁，他看到武器广场上的火堆里焚烧着自他统治以来便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官方肖像与平版日历，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拖行在大街上，慢慢留下一条散落着勋章、带穗肩章、军服纽扣、金丝银线、结绳盘扣，散落着纸牌国王军刀的流苏和宇宙之王的十个悲凉太阳的痕迹，母亲啊，看看他们是怎样待我的，他一面说，一面感受着切入肉身的耻辱，尸首被向前拖曳着，人们纷纷从阳台上向他啐吐唾液，倾倒病人的粪便，他不寒而栗，生怕自己被人肢解了并在庆祝我的死亡的狂欢节般的烟花爆竹声中、在发狂的嗥叫中沦为狗和兀鹫的吃食。当动乱过去，他仍旧能在无风的午后听到远处的音乐声，仍旧会扑杀蚊虫并试图将耳中阻碍思考的蝉鸣用手掌拍灭，仍旧望着地平线上燃烧的光亮，望着灯塔，任它的光芒每隔三十秒从百叶窗的缝隙中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绿色的虎皮纹，他保持着亘古不变的寻常的自然呼吸，与此同时，他的死亡变成了另一个死亡，仿佛过往那些死亡中的一个，现实不停息的洪流逐渐将他裹挟向被怜悯与被遗忘的无人之境，妈的，让死亡见鬼去吧，他吼道，于是他抛弃了密室，确信

自己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并为之兴奋不已，他在散发着垂死花朵味道的黑暗里，在墓地的烛芯间，在他前生的碎片中拖着幽灵般的粗重双脚，穿过被洗劫的厅堂，推开部长会议大厅的门，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听到了胡桃木长桌周围疲弱的声音，透过烟尘，他看到了他希望在那儿看到的所有人：出卖联邦战争的自由派、把它买下的保守派、最高司令部的将领、他的三个部长、大主教以及施诺特涅大使，所有人都在一个陷阱之中召唤着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好让所有人都能从他的死亡中分一杯羹，他们沉溺于贪婪之渊，竟没有一人觉察到并未下葬的总统的出现，他用手掌一拍桌子，喊道，啊哈！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当他把手从桌上拿开时，惊恐的轰鸣已经散去，空旷的大厅里只剩下灰烬满溢的烟灰缸、咖啡杯、掀翻在地的椅子以及我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他瘦小、冷漠，一身野战军装，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拨开烟雾向他比画着，趴到地上将军阁下，好戏就要开始了，于是两人一同倒在了地上，那一刻，大楼前开始了一场致命弹片的狂欢，一场总统卫队的血肉庆祝仪式，将军阁下，他们会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地听从您强有力的命令，不会让一个人从这场酝酿背叛的非法集会上活着走出去，他们向那些试图从正门逃跑的人扫射雨点般的子弹，将那些悬于窗口的人如鸟雀般击落，朝那些突出重围躲到邻近楼内的人投去手榴弹，而后又向伤者补上致命的枪子儿，因为依据总统的看法，所有幸存者都将是一生的死敌，他继续脸朝下趴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身旁两步远的地方，忍受着每次爆炸从窗口砸进来的玻璃和泥浆，祈祷般不停地喃喃自语，好了，兄弟，好了，好戏结束了，从今往后我会独掌大权，再没有狗冲我叫了，明天早上我们就会看到这破烂摊子里什么是可以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到时万一没有地方坐，就买六个最便宜的皮凳，买几张凉席铺在这儿铺在那儿把窟窿盖上，再买两三样旧家具，不要盘子也不要勺，什么都不要了，那些我从军营里拿就

行，因为我不会再养什么士兵，也不会养官员了，他妈的，他们只会多费牛奶，麻烦临头时，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只会唾弃这只喂养他们的手，现在我只留下总统卫队那些正直勇敢的人，我不会再任命政府内阁，他妈的，只有一个好卫生部长是活下去所需要的，再来一个有学问的把该写的写一下，剩下的部长办公室和军营可以租，省下的银子用来支付佣工，这里缺的不是人而是钱，弄两个仆人，一个打扫做饭，一个洗衣熨烫，等有了奶牛和鸟儿，我自己来管它们，厕所里别再有脱衣服的婊子了，玫瑰树下别再有麻风病人了，别再有什么都知道的哲学博士和什么都能看清的政治家了，说到底这是个总统府而不是黑人窑子，听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和我说外国佬就是这么叫它的，我一个人就够了，继续统治到下次彗星经过简直绰绰有余，它不会只回来一次而是要回来十次，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不想再死了，妈的，让别人去死吧，他不假思索地说着，仿佛在背诵，因为自战争开始他就知道高声思考会赶走撼动大楼的甘油炸药所造成的恐惧，他为明天、为这个日暮途穷的世纪制定着计划，直到街头最后一声恩赐的枪声响起方才停止，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蛇一般地匍匐过去，从窗口命令人们去找垃圾车运走死人，随后从大厅出来向他问候，晚上好，将军阁下，晚上好，老兄，非常感谢，他趴在部长会议厅墓碑般的大理石地板上回应道，而后将右臂弯起放在脸下当作枕头，在那个夜晚，在那一具具冒着烟的身体里、在一汪汪红色的杀戮之月的血泊中，他秋日黄叶飘落的声响开始恒久地流传，他被那响声催了眠，很快睡着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他无须执行任何事先的决定，因为军队被击溃了，部队被解散了，在这座城市的军营中、在祖国其他地区的六个军营中抵抗至最后一刻的个别军官被公民志愿者所帮助的总统卫队消灭了，幸存的部长们在清晨时分逃亡了，只剩下两位最忠诚的，其中一位曾兼任他的私人医生，另一位是全国最出色的书法家，他不用屈从于任何一个外国政权了，因为意外出现的爱国者

捐赠的婚戒和黄金王冠已将政府金库填满，他也不用去买凉席和最便宜的皮凳来遮盖那时物品被扔出窗口造成的惨状，因为甚至在国家平定之前，会客厅就已被重整装修，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富丽堂皇，屋内处处悬挂着鸟笼，里面养着口吐秽语的金刚鹦鹉和在房檐唱着为西班牙不为葡萄牙的黄冠亚马逊鹦鹉，谨慎而勤劳的女人将房间收拾得如一艘纤尘不染、井然有序的航船，窗外仍旧传来同样的悦耳乐曲声、同样的欢快爆竹声和同样的喜乐钟声，它们先前庆祝他的死亡，现在接着庆祝他的永生，武器广场上的游行久久不散，人们呼喊着永远效忠的口号，举着写有上帝保佑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伟大领袖的大型牌板，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节日，他甚至不用像从前那样暗中使用手段来将它延长，国事自会重上正轨，祖国自会运转前行，他一个人就是政府，没有谁能通过言语或行动阻断他意志的源泉，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他对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充满感激，甚至不再为牛奶的消耗而不安，他将足够凶狠有责任感的列兵集合在院中，指着他们，心血来潮地随意提拔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正在整合一支武装力量，一支将会唾弃喂养他们的这只手的武装力量，你，当上尉，你，当少校，你，当上校，我说什么呢，你，当将军，剩下的所有人，都当中尉，朋友，这他妈的就是你的军队啦，他被那些为他的死而悲痛的人深深感动，命人带来了那位向他致以共济会问候的老人以及那名亲吻他戒指的戴孝绅士并给他们颁发了和平奖章，他还差人带来了那个鱼贩并赠予了她所需要的一栋有众多房间可供她与十四个子女共同居住的宅子，他命人带来那名向他的尸体献花的学生，并满足她最大的心愿，让她嫁给了一位海军，但是做完这些纾解心绪的事之后，他仍然不得一刻平静，直到在圣赫洛尼莫基地上，他看到了在总统府烧杀抢掠的突袭队被逮捕并遭人唾弃，他凭着无从回避的仇恨记忆，把他们一一识出又按罪行轻重加以划分，你，指挥袭击的人，站这儿，你们，把

那个无助的鱼贩推倒的人，站那边去，你们，把尸体从棺材里拽出来在楼梯上在泥潭里拖着走的人，站这儿，还有所有这边的人，浑蛋，事实上他对惩罚他们并不感兴趣，他只想向自己证明那出对他身体的亵渎和对总统府的劫掠并不是群众性的自发行为而是受人雇用指使的龌龊勾当，于是他亮开嗓子亲自质问俘虏，希望他们说出他内心需要的那个幻想的事实，然而他没能如愿，他把他们头朝下挂起来，像鹦鹉一样手脚绑在横梁上，一吊就是数个小时，然而他没能如愿，他命人把一名俘虏扔到院中的沟里，让其他人看着他被鳄鱼分尸吞食，然而他没能如愿，他从主力军里挑出一人，当众将他活剥了皮，于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张皮，它又软又黄仿佛分娩后留下的胎盘，所有人都感到鲜肉的滚烫血汤溅到了自己，而那身体还在院中的石地上艰难待死，于是，他们说出了他想听的话，他们说有人付给了他们四百金比索，让他们将尸体拖到市场的垃圾站，他们说自己不想这么做，为情为钱都不想，因为他们对他从无异议，更别说在他亡故之后了，然而在一场有两位最高司令部的将军出席的秘密集会上，他们被人用各种方式胁迫恐吓，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做，将军阁下，我们的话千真万确，于是他舒了一口气，下令给他们食物，让他们休息一晚，明早就把他们扔去喂鳄鱼吧，可怜的小伙子们，被骗了，他叹息着，带着从怀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灵魂回了总统府，嘴里念叨着，都看到了吧，妈的，都看到了吧，这些人是爱我的。他终于驱散了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内斯在他心中种下的不安，连最隐秘的那些都一点不剩，他决定这是他在统治期内最后一次实施酷刑，于是他们杀死了鳄鱼，拆除了刑房，之前在那里他们把人的骨头一根一根打断直到全副骨架都碎裂却不将人杀死，他宣布大赦，在展望未来时有了神奇的想法，这个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民众有太多空闲时间去思考，他琢磨着让人们忙碌起来的方法，恢复了三月诗会和一年一度的选美皇后大赛，建造了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球场并赐予我们球队不胜就死的口号，他下令在各

省建造免费教授清洁打扫的院校，这些学校的女学生在总统的勉励下狂热地打扫完家里又开始打扫街道，之后是城市的公路马路，因此大量的垃圾从一个省被带到另一个，运送它们的游行队伍举着那面旗帜和巨幅牌板，上面写着上帝保佑为民族清洁而操劳的至净者，但却无人知晓该如何处置那些垃圾，而他仿佛一头正在思考的牲畜，拖着迟缓的双脚，寻找着新的娱乐大众的方式，他在伸手向他乞求治病之盐的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之间开出一条道路，以他之名在院中喷泉为他教子的孩子们一一施洗，此时围绕着他们的，是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他们称颂着他的唯一，因为无法再指望与他相貌酷似之人的协助，于是他不得不在那座公共市场般的宫殿中假装能够分身两处，自从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养鸟贩鸟的消息传开，每日都有笼子和千奇百怪的鸟被送到那里，有些是奉承之礼，有些则含讥讽之意，没过多久，屋里便容不下更多的鸟笼了，他还希望在同一时间处理诸多公务，于是在庭院和办公室的熙攘人群中，已经无法分辨谁是仆人而谁又是被服侍的人，他们推倒了许多面墙以增加空间，凿出了许多扇窗以观望大海，从一个厅室走到另一个就如同冒险穿行在秋日侧风中的航船的甲板上一般。那是与往年无异的从窗子吹进府中的三月信风，而现在他们却对他说，这是和平之风，将军阁下，那是他几年之前就有的同样的鼓膜嗡鸣，但连医生都对他说，这是和平的嗡鸣，将军阁下，自从人们第一次发现他死去，天地万物都变成和平之物了，将军阁下，而他信以为真，到十二月时，他甚至回到悬崖上的房屋，在那些怀乡的老独裁兄弟的不幸中放松地玩乐起来，他们会中断多米诺骨牌局对他说，比如说我是一对儿六，再比如说那些保守党的追随者是一对儿三，我只是没发现共济会的人和那些神父暗中结了盟，谁他妈的能想到呢，这个人说着，已然忘记了在盘中渐渐凝固的汤，这时另一个人讲道，比如这个糖罐是总统府，在这里，而敌人剩的最后一门大炮有四百米的顺风射程，在这里，因此诸位看到我落到

今日境地，就是因为那倒霉的八十二厘米，也就是说，甚至连那些心最硬的人都远远望到了地平线上来自他们故乡的航船，他们通过烟气的颜色、通过汽笛的铁锈辨识出它们，他们穿过细雨般的缕缕晨光走到港口，找寻船员们用来卷裹船上外带食物的报纸，他们在垃圾箱里找到它们，翻来覆去地阅读直至最后一行文字，通过谁死了、谁和谁结婚了、生日宴上谁邀请了谁而谁又没邀请谁的消息来预测各自祖国的未来，他们将根据天上大片乌云的走向解析自己的命运，那乌云将在一场末日般的暴雨中经过他的国家，那暴雨将令河水泛滥离道，那河水将使水库堤坝坍塌，那水库之水将把平原淹没、把灾难散播、把瘟疫传至城市，到那时，他们将向我哀求，求我救他们脱离危难与混乱，走着瞧吧，然而在期盼着那重大时刻来临的同时，他们还需向流亡者中年纪最小的那位求助，请他帮我纫上针，好把这条裤子缝好，因为我对它深有感情，不舍得扔，他们会偷偷地洗衣服，会磨快被新来的人用过的刮胡刀，他们会关起门来吃饭，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活着却只剩庸庸残命，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因年老失禁而弄脏裤子的尴尬窘迫，而在一个不经意的礼拜四，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的最后一件衬衣上用别针别上徽章，会用他的那面旗帜将他的身体包裹起来，会为他唱他的国歌，而后他们会将他送到海岸悬崖的深处去掌管那些被遗忘的人，除去他那颗被腐蚀的心外，他再没有其他压载物，除去那把放在视野狭窄的阳台上的浴场椅外，他再没为世界留出什么空位，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摆弄死者的物件，如果他们留下了什么的话，将军阁下，您想想，荣耀过后竟是这般平庸的生活。在另一个遥远的十二月，当这栋房屋落成之时，他曾从那个阳台上看到了别人一点一点指给他看的水平如镜的海面上的安的列斯群岛，看到了它幻象似的一溜岛屿，看到了马提尼克芬芳的火山，看那儿，将军阁下，于是他看到了他的痨病医院，看到了一个正在教堂入口向官员夫人们兜售栀子花的身着蕾丝衬衫的壮硕黑人，看到了帕拉马里博地狱般的市场，看那

儿，将军阁下，于是他看到了大群通过厕所管道离开海洋又爬上冷饮店桌子的螃蟹，看到了正稳稳坐在瓢泼大雨中贩卖印第安人头像和姜根的黑人老妪牙齿上镶嵌的钻石，看到了在塔纳瓜雷纳海滩上沉睡的纯金母牛，将军阁下，他看到了那个来自拉瓜伊拉的花两个里亚尔就能请他用单弦小提琴来驱散死亡召唤的盲眼通灵人，看到了特立尼达的炽热八月，看到了逆行的车辆，看到了那些在自家贩卖真丝衬衫和用整根象牙雕出的柑橘的店铺门口当街大便的年轻印度人，他看到了海地的混乱和它蓝色的狗，看到了清晨时沿街收尸的牛车，看到了库拉索油罐上重生的荷兰郁金香，看到了有防雪屋顶的风车房，看到了经由酒店厨房之间穿过城市中心的神秘的大西洋航船，他看到了西印度卡塔赫纳的石筑围捕鱼场以及它被链条封锁的海湾，看到了停落在阳台的光线，看到了出租马车那望着总督的饲料打哈欠的肮脏马匹，您闻到它的粪臭了吗将军阁下，多美妙啊，告诉我这世界是不是很大，它的确很大，不仅大还阴险狡诈，他嫌恶那些逃犯一如嫌恶不祥之镜中自己的身影，所以他在十二月攀上悬崖之屋并不是为了和他们交谈，而是为了置身于那时节日光初现的奇迹时刻，他可以再一次看到巴巴多斯到韦拉克鲁斯之间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整个世界，于是他忘记了谁握着一对儿三的牌，于是他在观景台探出身去，凝望那一串犹如睡在海洋池塘中的鳄鱼的疯癫岛屿，看着那些岛屿，他回想起那个历史性的十月的礼拜五，仿佛再次身临其境：那日清晨他走出房间，看到总统府里所有人都戴着红帽，新来的妾侍们戴着红帽打扫厅室、为鸟笼换水，牛棚的挤奶员、站岗的哨兵、楼梯上的瘫痪患者、玫瑰丛中的麻风病人戴着礼拜日嘉年华的红帽四处走动，于是他开始仔细调查在他睡着时这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他府中的人和城市的居民都戴上了红帽并拖着一串串铃铛，最终他找到了吐露实情的人，将军阁下，之前来了些外乡人，一直用古卡斯蒂利亚语闲聊，把阳性的

海说成阴性[4]，把金刚鹦鹉称为鹦鹉，把独木船叫作木筏，把鱼叉称为标枪，他们看到我们去迎接他们，在他们的船只周围游水，便爬上了桅杆，相互喊道，你们看哪，他们长得多棒，身材健美，脸蛋俊俏，头发粗得像马鬃，他们看到我们为防晒而涂的油彩，便像一群被打湿的鹦鹉般哄闹叫嚷起来，你们看哪，他们把自己涂成了灰褐色，而他们是金丝雀颜色的，不黑不白，将军阁下，我们不明白，就凭他们的样子，怎么倒这样嘲笑我们，要知道我们像刚离开母亲身体时那样自然，而他们大热天却穿得好像棒花仆侍[5]，说起热这个词像那些荷兰走私犯一样用阴性，虽然个个是男人，却都把头发梳理得像女人一样，可在他们中一个真正的女人都找不到，当他们听不懂我们喊的话时，就用我们听不懂的卡斯蒂利亚语大喊，然后乘着之前提过的他们叫作木筏的独木舟，向我们划来，他们羡慕我们的鱼叉顶端有鲱鱼刺，管它叫鱼齿，我们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换了这些红帽和玻璃串珠，把它们挂在颈子上讨他们开心，还换了这些黄铜串铃，值一马拉维迪币呢，另外还有些饭钵、眼镜和其他佛兰德斯的小玩意儿，都是最便宜的货色，将军阁下，我们看他们是好人，又聪明，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带上了岸，大家换这换那，换来换去，就形成了一家非常棒的旧货商店，最后，所有人都来换他们的鹦鹉、他们的烟、他们的巧克力球、他们的蜥蜴蛋，他们把上帝造的所有东西都拿来了，因为他们对每样东西的交换，无论给予还是获得，都欣喜乐意，最后他们甚至要用一件丝绒紧身衣换我们中的一个人去欧洲展览，您想象一下将军阁下，这太不成体统了，然而他困惑不已，辨别不出这疯狂之事对他的政府而言是不是灾祸，于是他回到卧室，打开面海的窗，希望发现一丝光明线索，好令他读懂人们所述的乱局，他看到了那艘永远被海军陆战队抛弃在码头的装甲舰，而在更远处的晦暗海面上，他看到了停在那里的三艘三桅船。

[1]古巴著名颂乐歌曲《小山曲》中唱道：“妈妈，我想知道那些歌手来自什么地方。”

[2]哥伦比亚俚语，意指男性使女性达到高潮。

[3]由人装扮成的长鼻大耳、色彩鲜艳的形象，是巴兰基亚及其狂欢节的象征。

[4]西班牙语中，名词有阳性、阴性之分，“海”（mar）一般用作阳性，也可用作阴性。

[5]棒花是西班牙扑克牌中的一个花色，仆侍是每个花色的第十张牌，其上绘有人物形象，身穿长袖上衣，头戴红帽。

我们第二次在那间办公室找到被兀鹫啄烂的他时，他还是那身衣服还是在那个位置，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老到可以记起第一次发现他时的情景，但我们知道有关他死亡的任何证据都不能确凿地说明什么，因为真相之后永远都有另一个真相。甚至连我们这些最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被表象说服，因为他分明曾被癫痫击垮，在觐见的人潮前身体抽搐痉挛，口吐胆汁泡沫，从王座上跌落下来，他分明早已因说话过多而丧失了语言能力，是帘后的口技演员在与他作双簧戏，他的周身分明渐渐长满了鲱鱼鱼鳞，仿佛是对他扭曲人格的惩罚，他的疝气分明在十二月的凉爽中对他唱起了水手之歌，于是他走路时只得将肿胀的睾丸放入矫正用的小轮车，也曾分明有军车在午夜时分从偏门塞入一口黄金包角、丝带绛紫的棺材，并且有人看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在雨中花园里泣血，然而他死亡的谣传愈是翔实可信，他愈是威严活跃地在最令人始料不及的场合现身，并为我们的命运强加上难以预料的方向。人们很容易被总统印章戒上转瞬即逝的征兆，被他迈出不平静步伐的超自然尺寸的双脚，抑或被那诡异的证据——他患疝的、兀鹫不敢啄食的睾丸说服，但总有人能记起过去曾有些无足轻重的死者身上也显现出相同的特征。严谨的调查并没有为身份辨别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在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如今我们只模糊记得她被法定为圣徒的故事——的卧室中，我们看到有缺口的鸟笼和被岁月变作化石的鸟骨，看到被母牛啃噬的柳木扶手椅，看到一套水彩颜料和一些笔洗，来自荒漠的鸟贩曾用它们为羽毛黯淡的鸟儿上色，仿冒黄鹂在集市上售卖，我们看到一口被蜜蜂花簇拥的陶瓮，花丛在遗忘中不断生长，枝丫攀墙爬壁，从肖像画上人物的眼中探出，又从

窗口向外爬去，最终与后院的野生枝叶纠结缠绕，但我们未能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曾到过这房间的哪怕最细微的痕迹。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我们对她的印象极为清晰，因为她在距今很近的一段时期统领国家，还因为她一度在公共事务中大出风头——的婚房中，我们看到那张罩着纱帐、适合暴戾欢爱的床已变成了鸡窝，看到蓝狐围脖上的毛毡夜蛾在木箱中残留的痕迹，看到金属丝线扎成的裙撑，看到衬裙上遗留的寒尘，看到镶布鲁塞尔蕾丝花边的紧身背心，男式家用护腿，缎面高跟舞鞋，塑身腰饰，长及脚面配有紫罗兰毛毡花饰的袍服，看到她那第一夫人的华美葬礼所用的塔夫绸带，看到见习修女那绵羊皮般的土灰色粗麻布苦行衣，当初她正是穿着这身衣服被关在一个节日水晶箱中从牙买加绑架而来，而后又作为隐秘总统的夫人被安置在了王位上，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印迹以证明这海盗式的绑架行为是出于爱情。在他度过生命最后岁月大部分时光的总统卧房中，我们只寻到一张未曾用过的行军床和一个文物收藏家会从海军陆战队员抛弃的豪宅中搬出来的那种可移动式马桶，还有一个铁箱，装着他的九十二枚勋章以及与那具尸体所穿无异的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上面有六个大口径子弹的弹孔，自脊背射入从胸膛穿出，破口处已被烧焦，这令我们确定了那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的真实性，据说那颗背叛的子弹虽然射穿了他却没能伤害他，它坚决地射入，在他体内反弹，回射向袭击者，因为只有面对爱他爱到不惜为他去死的人射出的慈爱子弹时，他才是不堪一击的。对那具尸体来说，那两件制服都太小，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断言它们不属于他，因为据说他直到百岁都在发育，一百五十岁时还经历了第三次长牙期，尽管事实上，那具被兀鹫啄食的残破躯体与这个时代普通人的身体大小无异，并有着乳牙般健康小巧不甚锋利的牙齿和布满老年斑且无伤疤的胆汁色皮肤，他周身满是垂坠的包囊，仿佛他一度臃肿发福，那曾经沉默的双眼已经几乎不见，只留下空洞的眼窝，除去肿胀的睾丸，看

上去唯一与他尺寸相符的就是那双方正扁平、趾甲碎裂、因嵌甲而扭曲的巨大的脚。与衣服所呈现的相反，他的历史学家们将他描绘成了一个伟岸的人物，幼儿园的教材上说他是一位身形魁梧的族长，因房门狭小而足不出户，他喜爱儿童与飞燕，通晓数种动物语言，拥有预测自然现象的能力，看人眼便能读人心，熟谙治病之盐的奥秘，能令麻风病人的伤口愈合，令瘫痪患者站立行走。尽管文本中表明他出身的蛛丝马迹都已被删除，大家还是从他毫无节制的权力欲，从他的政权的本性，从他的黑暗的统治，从他将海洋卖给外国政府的叵测居心中猜测出他来自高地荒漠，他的出卖使我们如受刑般居住在这片布满粗糙的月球尘埃并且没有地平线的平原上，它无所归依的落日令我们的灵魂作痛。据传，他一生中有不计其数的无关爱情的情人，她们一个接一个在他的淫窟中等他回来，等他来发泄欲望，他与她们生了五千多个孩子，每一个都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却无人继承他的姓名，只有与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所生之子例外，他自出生那刻起便被任命为拥有司法权和统治权的少将，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是他母亲的孩子，并且只是他母亲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他坚信的这个观点甚至对他本人也同样适用，因为众所周知，和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独裁者一样，他没有父亲，他唯一承认或许也是唯一拥有的亲人就是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学校课本里宣扬着她的神迹，说她无玷受孕有了他，说她在梦中接受他作为救世主的命运的玄机，他言简意赅地立法将她尊为国母，说世上唯一的母亲即是我的母亲，而那是个出身不明、非同寻常的女人，她简单的头脑对于他统治初期那些狂热地维护总统尊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丑闻，他们无法容忍元首母亲在颈上挂着樟脑香包以预防传染、用叉子串起鱼子来吃并且穿着漆皮鞋蹒跚行走，他们无法接受她在乐室的露台养蜂、在公共办公室养火鸡和用水彩上了色的鸟雀，或是在汇报厅的阳台晾晒床单，他们也无法忍受她在外交宴会上说，我已经厌倦了向上帝祈求，祈求让我儿子下

台，因为主啊，生活在总统府简直就像时时刻刻暴露在火光边，她说这句话时非常自然，一如在某个国庆日，她也是这样自然地挎着装满空瓶的篮子穿过荣誉卫士的队伍，赶上了在雷动的欢呼声里、在进行曲中、在花瓣雨下开始特赦游行的总统专车，她把篮子往车窗里一塞，向儿子喊道，既然你要过去，就顺便把瓶子还给街角那家商店吧，可怜的母亲啊。在我们庆祝希金森上将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晚宴上，她的不识大体达到了巅峰：她看到她的儿子穿着佩挂金牌的盛装礼服，戴着余生一直使用的缎面手套，便再也压抑不住呼之欲出的母亲的自豪，当着外交使团全体成员的面高声感叹道，主啊，如果当初知道我儿子能当共和国总统，我就送他去上学啦，那场面实在太过尴尬，随后她便被打发到郊区一栋有十一个房间的宅子里去了，这栋宅子是他在一个愉快的夜晚，在联邦战争的考迪罗[1]们于游戏桌上瓜分流亡保守党的良宅佳苑时得来的，只是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十分厌恶其中皇室风格的装饰，因为那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教皇的老婆，她更喜欢那些用人房，喜欢和派给她的那六个贫苦仆人住在一起，她在闲置的阁楼里架好缝纫机，挂起她那些染色鸟儿的笼子，阁楼里时时阴凉，也容易驱散清晨六点的蚊虫，她坐下来缝缝补补，面前是宽敞院落的闲适阳光和飘着药草味道的罗望子树，母鸡在厅堂中漫步，而卫兵们则在空房间里窥看着女侍应，她会坐下来向仆人们哀叹儿子的不幸，那帮海军陆战队的把我可怜的孩子撂在总统府，离他妈妈那么远，主啊，他半夜要是疼醒了，都没个热心勤快的老婆伺候，他就这么让共和国总统的活计给拴起来了，每个月只能领三百比索的工资，可怜的孩子啊。她对自己所说的情况一清二楚，因为他每天都会趁城市陷入昏沉的午睡时来看望母亲，带来她爱吃的水果软糖，并借机一吐做侵略军傀儡的苦水，他说他得像变魔术似的把蜜橙和甜无花果藏在餐巾中才能带出来，因为当权高层有一众会计，他们连午餐的剩菜

都要记录在案，他哀叹说，有一天装甲舰司令来到总统府，还带着一群什么陆地天文学家，他们什么都量，都没问候我就给我扔来一个卷尺，接着用英语数数算算，还让翻译冲我大呼小叫，你从这儿滚开吧，于是他滚开了，别挡光，他不挡了，哪儿不碍事就到哪儿待着去，他妈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能不碍事，因为连阳台上都有人在测量阳光的尺寸，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母亲，最糟的是他们把他仅剩的两个病恹恹的妾侍轰到了街上，因为海军司令认为对于一位总统来说她们太不体面，而他又实在离不了女人，于是便时不时地在午后假装离开郊区宅子，但母亲察觉到他其实是尾随女仆进了她们的阴暗卧室，她为此备感辛酸，于是将笼里的鸟儿搅得胡乱扑腾以掩饰儿子的窘迫，她拼命令它们鸣唱以防邻居觉察到那突袭的声响、羞辱的挣扎和压抑着的威胁，冷静些将军阁下，不然我会告诉您妈妈的，而她会搅扰拟黄鹂的午睡，强迫它们惊叫不止，以防任何人听到他那没有灵魂的急迫丈夫的喘息、他那不脱衣服的情人的粗暴、他那狗一般的呜咽，以及他的孤独的泪水，那泪水在急迫爱欲所引发的母鸡躁乱的咯咯叫声中，在那间卧室仿佛液体玻璃的空气里，在上帝缺席的八月的午后三点，如夜晚般降临，因悲伤而腐坏，我可怜的儿子。这种窘迫将会持续下去，直到侵略势力因某场瘟疫吓得离弃这个国家，尽管当时他们还远未实现在此登陆的目的，他们将官员府邸拆分成块放入木箱，把蓝色草坪全部铲除仿佛地毯一般裹挟而去，他们卷起为避免吃下我们河水中的蛆虫而从故乡带来的存放无菌水的橡胶蓄水囊，拆除他们的白色医院又炸毁军营以防任何人摸索出它们的建造方法，他们遗弃那艘破旧的装甲登陆舰，把它留在码头，因为一位在风暴中失踪的海军将领的亡魂会在六月的夜晚在它的甲板上行走，但是在用飞驰的列车带走那个移动式的战争天堂之前，他们为他戴上了一枚友邻奖牌并把国家元首的职位交给了他，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他们大声对他嚷道，我们把你和你的黑人窑子留下来了，看看没了我们你可

怎么办，他们居然走了，母亲，他妈的，他们已经走了，于是自卑躬屈膝的沦陷期以来他第一次爬上了台阶，现身于向他悲号哀求的骚动人群之前并大声施令，人们求他恢复斗鸡比赛，他批准了，同意，求他撤销禁止放风筝的命令、重新开放各种被海军陆战队禁止的娱乐活动，他批准了，同意，他确信他是自己全部权力的主宰，于是颠倒了旗帜的色彩，将盾牌上的弗里吉亚猫换成了侵略者被降伏的龙，因为我们终究是自家的狗啊，母亲，瘟疫万岁。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一生都牢记着那些政变以及其他更古老更苦涩的灾难，然而什么都没能令她像那次诈死事件后那般哀痛，她不住地向愿意听的人抱怨着，当总统的妈妈太不值啦，除了这台惨兮兮的缝纫机外，我就再没别的什么了，她抱怨道，你们看到他坐着金丝银线装饰的马车，可我可怜的儿子为祖国卖了这么多年命，都没留个葬身的地方啊，主啊，这不公平，后来她停止了絮叨牢骚，倒不是因为她已经麻木或者不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他不再向她讲述自己的颓丧，不再如往常一样疾奔回来与她分享权力的奥妙，自陆战队占领期以来他已经改变了太多，甚至令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觉得他比她更加衰老且已将她抛落在了时光里，她察觉到他说话结结巴巴，他对现实没有清晰的概念，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流下口水，他带着大包小包来到郊区的宅子，一心想把它们同时打开，在她从缝纫筐里找到剪刀前，他便焦躁得用牙齿去扯咬麻绳，还被铁箍伤了指甲，看到这幅情景，她就会被一种悲悯侵袭，这种悲悯不是母亲对儿子的，而是女儿对父亲的，而他沉溺在对飞翔的渴切中，从破烂儿堆里掏出所有东西，您看这些玩意儿多好啊，母亲，他说道，有水族箱里的活美人鱼，有真人大小会在房间里一边飞一边敲钟报时的绳编天使，还有这个大海螺壳，从它里面听不到海风海浪，却能听到国歌的曲调，多奇妙的东西啊，母亲，您看，人不穷有多好啊，他说，但她并没有迎合儿子的兴奋，而是开始啃咬她画黄鹂的毛笔以遮掩酸楚破碎的心，因为她忆起了唯有她才清楚的过往岁

月，记起了他为保住那把交椅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我说的不是现在，主啊，不是现今这样轻松的光景，现在的权力正像他说的一样，是摸得着又独一无二的实在东西，就像手掌上的一颗玻璃珠，她说的是他被联邦战争中最后一群贪婪的考迪罗追逐迫害的时期，当时他好似一条逃命的鲱鱼，没有神明庇护，在附近一座宫殿里游窜，而那些考迪罗曾帮我扳倒了诗人将军劳乌塔罗·慕纽斯，一个有文化的暴君，他、他的苏埃托尼乌斯拉丁语弥撒和他的四十二匹纯种良驹如今已在上帝的神圣荣光里了，那些考迪罗还以武装援助从被流放的旧主手中换得了农场和庄园，以令人无可辩驳的理由将国家划分为各自治省区，这就是联邦制，将军阁下，我们为之抛洒热血的联邦制，他们在自己的领区完全自治，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国庆日、自主发行的纸币，自己的佩宝石军刀的制服、金穗装饰的军服，以及仿照他之前那些总督的插着孔雀尾翎装饰的旧式三角帽，主啊，他们真是粗野鲁莽又感情用事，他们未经许可就由大门闯入总统府，因为祖国是每个人的祖国，将军阁下，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甘愿牺牲性命的，他们在节日宴会厅中安营扎寨，带着各自的女眷和农场动物，这些动物是以和平贡品之名从各处征收而来，以保证自己永远有的可吃，他们雇来野蛮的卫队，这些人不穿军靴，只用碎烂布头裹着双脚，几乎不会讲西班牙语，却是设置陷阱的高手，操起武器来娴熟而凶残，他们使总统府看起来像吉卜赛人的营寨，主啊，它有一种浓浓的河水涨潮的味道，高层官员已将共和国国有的家具都搬进了各自的庄园，他们在多米诺骨牌桌上用政府特权下注，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哀求无动于衷，她一刻不停地收拾着集市上不绝的垃圾，尝试着在灾乱中规整出哪怕一点秩序，因为在自由派无可逆转地堕落时，她是唯一一个试图挽回局面的人，只有她看到总统府在那些该死的浑蛋手中腐化时，试图用扫帚将他们赶走，她看到他们为最高司令部的席位在牌局上明争暗斗，看到他们在钢琴后面做着鸡奸的勾当，尽管她发出

了警告，却仍旧看到他们往雪花石膏细颈瓶中大便，主啊，那不是可移动式马桶，而是从潘泰莱里亚的海中捞上来的细颈瓶，但他们坚称那是富人的便壶，主啊，没有任何凡人之力能说服他们，也没有任何神力能阻止阿德里亚诺·古斯曼将军来参加我的掌权十周年的外交庆典，尽管他出现在舞会大厅时没有任何人能料想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他身穿特地为这个场合挑选的寒酸的白色亚麻制服，像他以军人之名对我保证的那样没佩武器，只由法国逃犯组成的卫队作陪，这些犯人都是平民打扮，肩上还扛着卡宴的火鹤花，他向大使和部长们行礼以请求许可，然后把花一支一支发给他们的夫人，他这诡异的绅士举动，全因为他雇来的法国人曾告诉他在凡尔赛宫这么做很得体，随后他在角落里坐定，认真看着人们的舞姿并点头称赞，非常好，他说，这些漂亮大方的欧洲年轻人跳得很好，各有各的特色，但安乐椅上的他被忘记了，只有我察觉到他每呷一口，都有一位副官会上前将香槟酒杯满上，几小时过去，他变得比平时更加紧张，面色更透着血红，每回压下去的气嗝直向上反涌到眼睛时，他都解开被汗水浸透的军服的一颗扣子，同时困乏地小声哼哼着，母亲啊，曲间的停顿中，他突然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把军服上的扣子通通解开，又把襟门的扣子也松了，两腿叉开，用萎谢的橡胶水管对着大使与部长的夫人们散着香气的领口一通喷洒，用战场酒鬼的酸臭尿液浇湿了丝棉及膝裙、金丝织锦紧身衣和鸵鸟羽毛的扇面，他在众人的惊恐中无所顾忌地唱着，我是孤独的情人，浇灌着你花园中的玫瑰，哦，玲珑无瑕的玫瑰，他唱着，没有一个人敢制止他，甚至连他也不敢，因为我知道自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权力，却敌不过他们当中任意两个人勾结在一起的力量，那时他还不知晓自己能看透所有人却从来没有人能看出这位花岗岩般的老人深藏不露的思想，他畅行无阻的智慧和无限忍耐的能力与他的冷静相得益彰，那时我们只看到那忧郁的双眼、惊愕的双唇和那羞怯少女的手，在他们带来那个消息的恐怖的中午，

握着剑柄的这只手甚至没有丝毫颤抖，他们说，将军阁下，纳尔西索·洛佩兹将军被绿色大麻和茴芹酒弄得神魂颠倒，把总统卫队的一个见习士兵拽进了厕所，按他的偏好用个野女人给他热了身，之后强迫他说，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来吧，他妈的，这是命令，所有东西，亲爱的，包括你的小金蛋，他痛苦地哭着，愤怒地哭着，直到发现自己四肢着地，脸埋在便池滚滚的恶臭里屈辱地吐着，于是他将那俊美的见习士兵吊了起来，用一根平原地区惯用的长矛把他像只蝴蝶一样钉在了会客厅那块春日风光的织毯上，一连三日都没有人敢将他放下来，可怜的人啊，他并不想干涉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想监视老战友以防他们暗中勾结，他原本以为这些人会自相残杀，直到又一则消息传来，将军阁下，赫苏克里斯托·桑切兹将军被猫咬了一口，染上了狂犬病，他的卫队不得不用椅子把他砸死了，可怜的人啊，之后另一则消息吹到他耳边时他几乎没从多米诺骨牌局中分神，将军阁下，罗达里奥·塞莱诺将军的马在过河时淹死了，他本人也溺水身亡了，可怜的人啊，再之后他们汇报时他甚至连眼都没眨一下，将军阁下，纳尔西索·洛佩兹将军因为克服不了鸡奸情结而羞愧，往肛门里塞上甘油炸药，内脏都被炸飞了，他说着可怜的人啊，仿佛自己同这些不光彩的死亡毫不相干，随后又对死者追加了荣誉，宣布他们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在国家公墓举办了最高规格的隆重葬礼，因为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就好比一栋没有大门的房子，他说，当全国仅剩六位战争将军时，他将他们请到总统府来庆祝他的生日，同来的还有一堆战友，所有人聚在一起，主啊，连最阴险狡猾、曾试图和自己的母亲生个孩子并且只喝掺了火药的木醇酒的哈辛多·阿尔加拉维亚都来了，真像回到了从前的好日子，宴会厅里只有我们没有别人，大家像亲兄弟一样，没有人带武器，虽然邻屋挤着他们各自的卫兵，每个人都为我们当中唯一能理解所有人的那个人带来了上好的礼物，他们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把他想作唯一能摆布他们的人，唯一能把传奇的萨图尔诺

·桑托斯将军从他遥远的荒漠老巢中揪过来的人，这位传奇人物是血统纯正的印第安人，性情飘忽不定，将军阁下，我永远像我的婊子娘把我生下来时那样光脚走路，因为感觉不到土地，我们这些硬汉就没法呼吸，他到来时身体裹在印有色彩浓艳的奇禽异兽的毯子里，如往常一样被一道黯淡的光环笼罩，孤身一人，没带卫队，只在腰间别一把他拒绝卸下的甘蔗砍刀，因为那不是武器而是劳动工具，他送了我一只训练有素的同人一道打仗的老鹰，母亲啊，他还带来了一架竖琴，这神圣乐器的音符可以驱逐风暴，还可加速收割，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真诚的弹拨技艺唤起了我们所有人对那些可怕的战争之夜的怀念，母亲啊，它在我们心里翻搅起战争那狗的疥疮一般的气味，在我们灵魂里撩拨起将指引我们的、他们用灵魂合唱的金船战歌，母亲啊，从桥上回来时我已经哭成了泪人，他们一边唱着，一边就着李子吃着一只火鸡和半头乳猪，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瓶子，每个人都喝着自己的酒，除了他和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们俩一生都没碰过一滴酒，也不曾抽过烟、吃过维持生命所需之外的任何食物，他们为我合唱了那首大卫王曾唱晨曲[2]，他们哭着唱了一遍在赫恩曼领事带来那个新玩意儿——那是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将军阁下，它会滚动着唱生日快乐歌[3]——之前人们传唱的所有生日歌，他们唱得醉生梦死，似乎对那位沉郁的老人并没有真情实意，在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之时，他取下灯盏，依军营的习惯在睡前将宅子巡查了一遍，回来时路过宴会厅，最后看了一眼那六位在地上蜷成一团的将军，看到他们抱在一起，平静而了无生气，被那五支相互监视的卫队保护着，因为即便在睡梦中彼此拥抱，他们仍旧相互惧怕，那种惧意与每个人对他的恐惧几乎无异，也与他对他们当中任意两人勾结起来的畏惧基本相当，他又把灯挂回到门楣上，将卧室的三道门闩、三个插销、三把门环锁好，扑倒在地上，将右臂当作枕头，那一刻，所有卫队的武器同时开

火，密集的爆炸令府内的柱子剧烈摇颤，天哪，片刻之后便不剩一丝响动一声呻吟了，天哪，再一阵之后就结束了，当混乱过去，世界的阒寂中只剩下一缕火药气息，只剩下他，在权力的焦虑中永远安然无恙，他在新一天初生的锦葵色日光里看到了勤务兵正蹚过宴会厅中的血水，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害怕得眩晕颤抖，因为她发现，无论他们怎样用石灰涂抹墙壁，都有鲜血从中渗出，主啊，无论他们怎样用力拧挤地毯，都有鲜血从中滴落，他们越是急着清洗血迹遮掩杀戮的规模，就有越多的血液喷涌出来，沿走廊和办公室奔流而去，而根据官方公告，杀害这战争遗产的最后六名继承者的是他们自己发了疯的卫兵，他们的葬礼规格堪比主教的，他们裹在国旗中的遗体埋入了名人公墓，在那个血腥的圈套中，没有一个卫兵活着离开，一个都没有将军阁下，除了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当时被丁零当啷层层叠叠的披肩武装起来，因为通晓印第安人的意念易形术，他，这浑蛋，可能变成了犰狳或是池塘将军阁下，还可能变成了雷电，他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老练的探子自去年圣诞节起就已遍寻不着他的踪迹，最训练有素的猎豹犬在搜寻他时都会奔向相反的方向，他在他女巫的牌中看到他化身为黑桃K上的国王，依旧活着，白天睡觉，夜晚沿水上和陆上的小道外出，他一点点留下的祷文痕迹扰乱了追踪者的判断，消磨了敌人的意志，但他从未放弃，那些年对他的搜寻日日夜夜一刻未停，直到多年以后，他在总统专列上透过窗户看到了大群男女带着他们的孩子、牲口和厨具，与战时他多次在军队后方看到的场面一样，他看到那么多人在雨中列队前行，用系在棍上的吊床抬着病号，跟随着一个面色惨白、身罩粗麻长袍的男人，将军阁下，那人自称是布道者，于是他一拍脑门说道，原来在这儿，他妈的，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就在这儿用他那把缺了弦的竖琴的魔力乞求朝圣者的施舍呢，他落魄而阴沉，戴一顶破毡帽，披一件烂斗篷，就算是在那般可怜的境地，他也无法如他所料想的那样轻易被

杀，反而用砍刀将他最厉害的三名手下斩了首级，鉴于他面对最凶狠的对手时会勇猛异常又敏捷无比，他命令火车在那布道者传道的荒漠墓园前停下，当手持上膛枪支的总统卫兵从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车厢中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恐地逃开了，于是视野中顿时空无一人，只剩手握砍刀站在那神话色彩的竖琴旁的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好似着了迷地看着在车厢外平台上现身的死敌，后者身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没有携带武器，显得苍老而遥远，我们仿佛已经有一百年没见面了将军阁下，我觉得他看上去孤独疲惫，面色因肝病而发黄，两眼总是要流泪的样子，但他散发着苍白的光芒，那光芒属于那种不但能掌控自己的权力而且能从死于他手下的亡魂身上夺取权力的人，所以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会抵抗，因为对他来说，去对付一个远道而来、除了对指挥权怀有蛮横的渴望之外并无其他动机也无额外行动的老人是徒劳无用的，然而他却向他伸出那只鬼蝠魟样的手掌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孩子，祖国以你为荣，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清楚，想要战胜一个无法战胜的人，唯有将友谊作为武器，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亲吻了一下他方才踩过的土地，随后向他哀求道，我这双手还有耍弄砍刀的能力，将军阁下，所以希望您能赐我为您效力任您使唤的荣幸，将军阁下，于是他接受了，同意，并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保镖，唯一的条件是，你永远不能站在我身后，他把他变成自己在多米诺骨牌桌上的同伙，两人四手联合让多个落难的暴君输得一无所有，他把赤脚的他领上总统马车，带他去参加外交招待会，他的猛兽气息令群狗乱窜，令大使夫人眩晕，当生活变得异常艰涩，艰涩到令他想到自己在梦里的人群中将会形单影只时，他便吓得发抖，并开始害怕睡眠，于是让他横躺在自己卧室门口以减轻恐惧，多年来他一直信任他，让他待在离自己十掌的距离，直到痛风钳制了他舞弄砍刀的才能，他才向他请求您亲手杀了我吧将军阁下，免得杀掉我的幸运机会落在完全没有资格的人手里，他却在送他去死时，在荒漠的小路

上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和一枚感谢奖章，于是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抛开面子，泣不成声地对他说，您也看到了，将军阁下，即使是最勇猛的汉子，也有娘娘腔的时候，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在自己的出生之地，他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因此，当他以孩子气的快乐去补偿艰难的过往时，没有人比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更能理解他的这种快乐，当他为了在晚年拥有年少时亏缺的东西而挥霍权力的所得时，也没有人比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更能了解这样做多么缺乏意义，当他们利用他的天真卖给他那些破烂儿洋货时，她会愤怒异常，因为它们不像她那些高于四块便卖不出去的假鸟一样价廉又物美，去享受是好事，她说，但你得想想你的未来，如果明天或是哪天就算上帝不允许但他们硬是把你从现在的位子上拉下来，我可不想看到你拿着一顶帽子在教堂门口乞讨，你哪怕是会唱歌，或者是个大主教，或者是个水手倒也可以，但你只是将军，你只会命令不会别的，她向他建议说你还是把政府多出来的钱都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只有他能找到的地方，以备哪天需要逃走，就像那些可怜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在海岸悬崖之屋牧养着遗忘祈求着那艘船鸣响汽笛的总统一样，你去照照那面镜子吧，她对他说，但他没有理会，只是用他惯用的奇妙方式压倒了她的不安：别操心了母亲，这些人是爱我的。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将会在对贫穷的抱怨中度过多年，会和仆人因为购物账本而争吵，甚至会为了省钱而不吃午餐，没有任何人胆敢向她挑明她其实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他从政府的生意中积累的钱财全数记在了她的名下，她不仅是无垠的土地无数的牲口的主人，也是本地有轨电车、邮政、电讯系统和国家水资源的拥有者，因此每一艘在亚马逊河或领水上通行的航船都必须付给她一笔她至死都不知晓的租赁费用，正如多年来她始终对另一件事毫不知情，她不知道儿子搬去了乡间宅院并沉溺于老年玩物时，并非如她所想的那样无助无依，因为除了从这个国家饲养的每头牲畜上所征收的个税，除了他的拥戴者为谋求私

利投其所好为他付的钱送的礼，他还在很早以前就发明出一种能让自己万无一失中彩票的体系并一直利用它敛财。这些都发生在他诈死之后的年代，也就是噪音年代，主啊，之所以这样称呼它，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所想，是因为某年在殉道者圣希拉克略的圣徒日夜晚，举国上下都感受到了从地下传来的轰鸣并且对此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而是因为那些在建工程制造的永久轰响，它们在筑起地基时就被宣告为全世界最宏伟的建筑，但永无竣工之日，那是一段和平时期，他会在午休时将政府顾问召到郊区宅邸，他躺在罗望子树甜蜜枝叶下的吊床上，用帽子扇着风，闭眼听着坐在吊床周围的博士们讨论，他们胡须硬挺，言谈松散，在布袍和塑料领子包裹起来的闷热中显得面色苍白，他听着那些他曾百般咒骂却为图方便重新任命的部长讨论国家大事，言语间还能听到庭院中公鸡追逐母鸡的骚乱声、持续的蝉鸣以及邻家的不眠唱机不停播放的苏珊娜来吧苏珊娜，突然间一切都停止了，安静，将军已经睡着了，但他会不睁眼也不停鼾声地咆哮，笨蛋们我没睡着，继续，于是他们接着讨论，直到他从午睡的恍惚中出来，判定在这么多个蠢材里只有我的兄弟卫生部长说得有道理，真他妈见鬼，完事了，在那乱摊子就要收场时，他和私人助理们谈着话，带着他们走来走去，同时一手端盘子一手拿勺子吃着饭，他在楼梯上冷漠地与他们告别，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反正到头来管事的人是我，他妈的，之后他便再也不去问他们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了，他妈的，他为开业剪彩，在公共场合彻底现身，承受权力带来的风险，见鬼了，他在更和平的时期都从未做过这些，他与终生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以及兄弟卫生部长一起无休止地玩着多米诺骨牌，他们二人是绝无仅有的与他足够亲近的人，只有他们敢于向他请求赐予某个囚犯自由或者赦免某人的死罪，也只有他们敢于向他建议在特别召见会上接见穷人选美皇后，她是出自那片赤贫泥沼的不可思议的生灵，我们都称那片街区为斗狗区，因为那里所有的狗自很多年前就

开始打斗，一刻都不曾休战，那里致命的多棱碉堡是国家安保巡警不敢踏足的地方，因为只要有人手掌一拍，他们就会被剥光衣服，他们的汽车则会被拆卸成原始零件，不幸迷路的驴子从巷子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时已化作一袋白骨，他们会把富人的孩子烤着吃掉，或者做成香肠在集市上贩卖，您想想，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她是垃圾堆上的金盏花，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姿色简直是这个国家的惊喜啊将军阁下，他们的讲述令他非常好奇，如果一切都像您二位说的那样，我不但要在特别召见会上接见她，还要和她跳第一曲华尔兹，他妈的把这写在报纸上，他命令道，穷人就喜欢这些。然而在召见会后的夜晚，在多米诺骨牌局上，他带着一丝苦涩对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说，穷人的选美皇后根本不配和我跳舞，她太普通了，和那个区其他的玛努艾拉·桑切兹一样，穿着荷叶边的仙女纱裙，戴着镶假珠宝的皇冠，手里拿一枝玫瑰，被母亲监视着，仿佛她是金子做的一样，于是他满足了她的一切愿望，其实不过是为他们斗狗区装上电灯和自来水，但他警告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满足人们的哀求，妈的，我再也不会跟穷人说话了，他说着，丢下牌局摔门就走，他听到了八点的钟声，在牛棚里给牛添上饲料，命人将牛粪带上楼去，又将整栋建筑巡视了一遍，边走边端着盘子吃着烧肉配菜豆、米饭和青香蕉片，他清点了自大门至卧室的哨兵，他们全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共十四个，他看到了其余私人警卫都在第一庭院的哨位上玩着多米诺骨牌，看到了麻风病人都躺在玫瑰丛中，瘫痪患者都靠在楼梯台阶上，九点了，他把没吃完的饭放在一个窗台上，来到了妾侍那弥漫着沼泽气息的茅屋里，那里拥挤不堪，甚至三个人带着自己七个月的早产儿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他骑到一堆散发着昨天剩菜味道的躯体上，拨开两个脑袋，推走六条腿再挤开三只胳膊，不问谁是谁，不管究竟是哪个女人在没有梦见他的睡梦中给他喂了奶，也不探究是哪个从邻床传来的声音困倦地喃喃道，别这么性急啊将军，会

吓到孩子们的，他回到楼内，检查了二十三扇窗户的插销，点燃了自门厅至私人寝室每五米一个共二十三个牛粪饼，他闻到了那烟气的味道，想起了一个可能属于他却不可能存在的童年，他只在熏烟初起的那刻记起了它，随后就永远地忘记了，他从寝室走回门厅，将灯依次熄灭，将睡着的鸟儿一一清点后又用粗布将鸟笼罩上，共四十八只，他持灯再次将整栋大楼巡查了一遍，他在一面面镜中看到一个个自己，十四位将军提着点亮的灯火走着，十点了，一切都井然有序，他回到了总统警卫的卧室，为他们关了灯，晚安，先生们，他查看了一层的公共办公室、前庭、厕所、窗帘后面、桌子底下，都没有人，他拿出那串他仅凭触摸就能一一分辨的钥匙，锁上所有办公室的门，上了主层，将房间一一检查并上锁，随后从一幅画后拿出他偷藏的一小瓶蜂蜜，在睡前喝了两勺，他想起了他睡在郊区宅院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在蜜蜂花和奥勒冈草间沉睡于离别之中，她那养鸟人的描画黄鹂的手无力地低垂着，仿佛一个侧身躺着死去的母亲，愿您晚安，母亲，他说道，晚安，孩子，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郊区宅院的睡梦中回应，他在将灯盏挂在卧室前大门的挂钩上时，下达了坚决的命令，在他睡觉时谁都不能将这盏灯熄灭，因为它是指引逃命的光亮，十一点了，他摸着黑将宅子最后查看了一遍，以防有人以为他已入眠而潜进来，在灯塔旋转相交又稍纵即逝的缕缕绿色微光中，他那金质马刺在尘灰上留下了一串星星点点的痕迹，他在两闪光亮间看到了一个漫无目的梦游的麻风病人，他挡住了他的去路，没有碰他，只用夜间巡逻灯为他照亮了道路，引他走过黑暗，将他安置在玫瑰丛中，他转而又在黑暗中清点了一遍警卫的人数，然后返回卧室，慢慢走过一扇扇窗，在每一扇中他都看到了一片相同的海洋，四月的加勒比海，他没有停步，一连欣赏了它二十三遍，它仍旧如从前在四月里那样，像一摊金色的沼泽，他听到了十二点的钟声，随着大教堂钟锤的最后一次敲击，他感到疝气发出了纤细扭曲的可怖哨声，于是

世上再没有别的声音，他一个人就是国家，他将卧室的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锁好后，坐上可移动式马桶小便，排出了两滴，四滴，七滴艰涩的尿液，随后扑倒在地，立刻睡着了，没有做梦，他在两点三刻醒了过来，大汗淋漓、战栗不安，因为他能肯定有人在他睡着时看着他，有人能不卸门环就进入房间，是谁，他问道，谁也不是，他闭上双眼，再次感到有人在看着他，他睁开双眼，惊恐地张望，于是看到了，他妈的，是玛努艾拉·桑切兹在房中走动，她没有卸掉门闩，因为她可以凭意念穿墙进出，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穿着纱裙，手中拿着炭火般的玫瑰，喘息中透着甘草味道，告诉我这错乱景象不是真的，他说道，告诉我这不是你，告诉我这致命的眩晕不是来自你那疲惫的甘草味的呼吸，但这是她，是她的玫瑰，是她染香了整个卧房中的滚热气息，仿佛一声比海的喘息更古老强劲的挥之不去的低音，我的灾难玛努艾拉·桑切兹，你没有被写在我的掌心，也没有被写在我杯底的咖啡渣上，甚至没有被写在盆里我的死亡之水中，你不要再耗费我呼吸的空气了，不要再耗费我的睡梦和这个房间中的黑暗空间了，这里从没有进来也不会进来哪怕一个女人，为我熄灭那枝玫瑰吧，他一边哀求一边乱抓着寻找灯的开关，他寻它不着却看到了我的疯狂玛努艾拉·桑切兹，见鬼了，你又没有消失，我为什么要寻找你，如果你想的话，把我的房子带走，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龙都带走吧，但是让我点上灯，我黑夜里的蝎子，我的疝气玛努艾拉·桑切兹，婊子养的，他吼道，心里暗想光明能将他从巫术中解救出来，他大喊着把她拉走，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给她脖子套上铁锚，把她从海边悬崖上扔下去，免得再有人受她玫瑰刺眼光芒的折磨，他在惶恐中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跑到走廊上，把黑暗中的牛粪饼踢得四处飞散，他茫然地自问这世界怎么了，快八点了这邪恶屋子里的人还在睡觉，都起来，一帮浑蛋，他吼叫着，他们应声点亮了灯，在三点钟吹响了起床号，而后港口碉堡、圣赫洛尼莫基地以及全国的军营都响起

了号声，随之传来惊慌失措的武器的轰鸣和结出露水两小时之前玫瑰绽放的轰响，传来梦游的妾侍们在星光下敲打地毯、揭开沉睡鸟雀的罩布、将花瓶中隔夜的花朵换成昨夜花朵的喧嚷，与此同时，一群泥瓦匠正手忙脚乱地建起一堵堵紧急用墙，往窗玻璃上贴一个个金色的纸太阳，令向日葵迷失了方向，只为阻止人们看到天空依旧是夜晚模样、府中是二十五号礼拜日而海上正值四月，中国洗衣匠把最后一批睡梦中的人赶下床卷走了床单，盲人算命师宣称着爱情的来临而爱情却已不在，狡猾的公务员看到母鸡在下礼拜一的蛋而公文抽屉中还留着昨日的蛋，茫然无措的人群骚动不安，紧急召开的委员会议上群狗撕咬打斗，而他，则在坚定地称颂他为黎明的分解者、时间的司令与日光的保管人的谄媚者中间艰难地迈步离开了，走到前庭时，一位最高司令部的官员壮着胆子拦住了他，向他立正行礼报告说，将军阁下，还不到两点零五分，另一个声音插进来，还不到凌晨三点零五分将军阁下，他用手背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战栗的胸腔铆足了劲发出嗥叫，好让全世界都听到是八点，他妈的，八点，我说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看到他走进郊区宅邸时，便问他从哪里过来的，你怎么一副被狼蛛咬了的模样，手放在胸口做什么，她问他，但他没有回答，只是瘫倒在柳木安乐椅上，把手换了个位置，当他再一次把他母亲忘了时，她用描画黄鹂的笔戳了戳他，惊诧地问，他的两眼这样无神还把手放在胸口，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在展示耶稣圣心，他敷衍地回避了，浑蛋母亲，他一摔门走了，在府中来回踱步，把手插入口袋，免得它们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他望着窗外的雨，望着那些为了使下午三点看起来像晚上八点而挂在窗玻璃上的银质月亮和锡箔纸星星，望着水滴从星星上滑落，他看到了院中冻僵的卫兵，看到了悲伤的海洋、玛努艾拉·桑切兹那落在了你的没有她身影的城市里的雨、可怕的空荡荡的厅堂、桌上倒扣的椅子，又一个短暂的礼拜六和它最初的阴影中无从抚慰的孤独，又一个没有她的夜晚，

见鬼，他叹息道，至少让我忘了跳过的舞吧，那是最让我疼痛的东西，他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愧难当，他摸索着自己的身体，想将流浪的手安放在心脏之外的地方，最终把它搁在了受过雨水抚慰的疝气上，它和心脏一样，有着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重量，一样疼，但它更令人不堪承受，犹如在手掌上长出的活生生的心脏，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了之前那么多人曾对他说的，心脏是第三颗睾丸将军阁下，见鬼，他离开了窗口，带着一个永恒总统的无从实现的热望和一根扎穿灵魂的鱼刺在会客厅中往复徘徊，他现身于部长会议，听着但如往常一样听不懂也听不进，他忍受着一篇催眠的财政报告，突然那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于是财政部长沉默了，而其他人都透过因疼痛而崩裂的保护壳的缝隙看着他，身为终身总统却被发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着胸口的他看见自己正手无寸铁地孤身坐在胡桃木长桌的一端，脸颊不断抽搐，他的生命已在我的兄弟卫生部长那金银匠的细小眼睛里的冰冷炭火中被烧焦了，部长一边转着背心上金质怀表的表链，一边用那双眼睛为他做内部检查，小心，有人说，应该是被刺伤了，但他却把他因愤怒而僵硬的美人鱼的手放在胡桃木桌上，脸上恢复了血色，用言语啐出一道致命的威严，你们是盼着我被刺伤吧，混账，继续啊，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然而众人虽在说话却顾不上彼此倾听，他们都认定他出了严重的状况否则不会如此愤怒，人们窃窃私语，于是传闻四起，大家指着他，你们看他有多沮丧，沮丧到在抓自己的心哪，他就要崩溃了，大家嘀咕着，于是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说他紧急召见了卫生部长，部长看到他把右臂搁在胡桃木桌上，仿佛一只将腿放在桌上的羔羊，身为总统的他为自己浸在泪水中的处境备感耻辱，于是他命他给我把这只手砍掉，兄弟，但卫生部长却说，不，将军，即使您枪毙了我我也不能从命，他对他说，这关乎正义，将军，我的命不及您的手臂珍贵。关于他状况的这般那样的流言愈发多样起来，他在牛棚中一边为各个军营称量着鲜奶，一边望着玛努艾拉·桑切兹的圣灰星

期二[4]在天空中升起，他把麻风病人赶出了玫瑰丛，免得他们给你玫瑰的玫瑰染上瘟疫，他在府中寻找着偏僻角落，只为哼唱你当上皇后的第一支华尔兹舞曲而不被别人听见，他唱道，为了你不把我忘记，他唱道，为了你感觉到如果把我忘记你便会死去，他陷入妾侍房间的烂泥中，试图为他所受的折磨寻找些许慰藉，于是他在作为瞬时情人的漫长人生中，第一次放纵了自己的天性，流连于细节，从最冷淡的女人身体中索取着呻吟，一次又一次，他在黑暗中令她们惊喜地笑道，您这把年纪，已经很不简单了，然而他再清楚不过，那种坚持的意志只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的自欺欺人，他的孤独的每一步，他呼吸中的每道藩篱，都不可避免地将他推向那无从逃脱的午后两点的酷热，在这片酷热中，在你的斗狗区那残暴王国的垃圾堆里，他祈求上帝垂爱令他得到玛努艾拉·桑切兹的爱，他扮成平民，没带卫队，坐上一辆燃放着爆竹的公务车，从昏沉午睡的衰败城市的陈旧汽油味中逃走，他躲开了市场那曲折小巷里亚洲商贩的喧嚷，看到了我的毁灭玛努艾拉·桑切兹的壮阔海洋和地平线上一只孤单的鹈鹕，他看到了一条通向你家的破旧电车轨道，于是下令将它们通通换成配有磨砂玻璃与玛努艾拉·桑切兹专享的天鹅绒宝座的黄色电车，他看到了你的萧索的礼拜日海滨浴场，于是下令建起更衣室、竖起一面随天气而变幻色彩的旗帜，再搭一圈钢丝网围出为玛努艾拉·桑切兹预留的私人海滩，他看到了一栋栋属于他当年随意令其致富的十四个家庭的别墅，有着大理石露台以及仿若在沉思的草坪，他看到了一栋更大的别墅，带有旋转喷泉和装彩色玻璃的阳台，我想看到你为了我住在那儿，于是那座宅子迅速被强征了，他在一辆如易拉罐拼起的汽车的后座上一面做白日梦一面决定着世界的运势，直到海风消失了，城市消失了，你的斗狗区的魔鬼喧嚣从窗户上的弹孔中钻进来，他看到了自己正身处何地却难以置信，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我的母亲啊，看

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帮帮我吧，然而在纷乱的骚动中没人能认出那哀伤的双眼、虚弱的双唇和那只捂在胸口的无力的手，还有那犹如曾祖父呓语般的声音，他身着白色亚麻衣，头戴监工帽，正从一块破碎的玻璃中探出身来寻找我的耻辱玛努艾拉·桑切兹的住处，他呓语着，她是穷人的皇后，女士，她手里总拿着一枝玫瑰，他惊恐地问自己你能住在这片骚乱中的哪个地方，在这里，拱起的脊椎关节暴力地冲撞上面布满了血腥犬牙撒旦一般的目光一串嗥叫转瞬即过在泥沼里撕咬得碎烂的两条狗腿之间还垂着尾巴在狗肉店里被挂上，你气息的甘草味道会在这里的哪个地方，在这里，婊子女儿的喇叭聒噪个不停而你将不断磨耗我的生命我会被人从餐厅的屠宰场踢出就像那堆醉鬼一样，你会迷失在哪一处无尽的寻欢作乐中，在这里，充斥着玛兰莞戈水和布隆丹加水和戈登洛沃和大麻和顶端有小洞的巨大香肠还有永远迷乱的黑人亚当[5]以及胡安希托·特鲁库佩伊的神秘天堂里的铜钱小费，见鬼，你的家是这糟乱房屋中的哪一个，在这里，有葫芦黄的斑驳墙壁主教长袍花边般的紫色纹饰鹦鹉绿的窗户地球蓝的隔断以及粉如你手中玫瑰的立柱，你生命的时钟究竟走到了哪一刻，如果在这个看起来像晚上八点的地狱中这些劣等人不知道我下令现在是三点而不是昨晚八点，你究竟是这些女人中的哪一个，她们穿着短裙在空荡房间的摇椅上叉开腿晃着脑袋吹着风呼吸着双腿间的热辣气息，他透过窗户的孔洞询问着我的躁怒玛努艾拉·桑切兹住在哪里，穿着泡泡纱裙、闪着钻石光芒、戴着加冕一周年仪式上他赠予的实心金王冠的她住在哪里，我知道她是谁了，先生，喧杂中有一个人，一个丰乳肥臀自以为是猩猩妈妈的女人应道，她住在那儿，先生，在那儿，在一栋和别家一样的房子里，那房子外墙上胡乱地刷了些颜色，马赛克台阶上还留着方才哪个人踩到狗屎而滑倒的新鲜痕迹，那是栋与坐在总督宝座上的玛努艾拉·桑切兹极不相称的穷人的房子，让人很难

相信就是这一栋，但就是它，我的心肝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给我你的力量让我进去吧，母亲，就是那儿了，他在那个街区转了十圈，恢复了呼吸，他用指节叩了三次房门，仿佛三声哀求，他在建筑物的阴影下等待，不清楚自己正呼吸的空气是因暴晒无风还是因渴望而变得腐臭，他等着，甚至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直到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让他进了飘散着剩鱼味道的宽敞而阴凉的厅室，整间房子昏昏沉沉，在里面看比从外面看要大些，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去叫午睡的她，而他坐在一个矮脚皮凳上审视着这令他失落的空间，他看到被旧时漏雨腐蚀的脏污墙面、一张破沙发、另外两个皮面小凳、角落里一架掉了弦的钢琴，再没有什么了，妈的，就为了这些受了这么多折磨，他哀叹道，当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挎着工具篮回来、开始坐下缝花边时，当玛努艾拉·桑切兹更衣、梳发、为了体面地迎接那位意外到访的老人而穿上她最好的鞋时，他正困惑地自问，你会在哪儿，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我来找你了可在这乞丐屋子里我找不到你，你的甘草味道在哪儿，这里可满是中午剩饭的恶臭，你的玫瑰在哪儿，爱在哪儿，把我从这迷惑人的狗牢笼里救出去吧，他哀叹道，他看到她出现在里屋门口，仿佛一个梦中影像映在另一个梦中的镜面里，她身着一码一夸蒂约的纱罗裙，头发用压发梳随意束起，脚穿一双破旧的鞋子，然而，手持炽热玫瑰的她是世上最美最亭亭玉立的女子，这一幕太过炫目，因而当她抬着头对他说上帝保佑阁下时，他竟几乎不能自己地要去倾身回礼，她在沙发上坐下，就在他面前，不过他汗液的恶臭还飘不到她那儿，这时我才第一次敢从正面看他，同时用两根手指转着玫瑰的光泽，好让他注意不到我的恐惧，我毫不留情地观察了他蝙蝠样的嘴唇和仿佛从水底看着我的喑哑双眼，他没有毛发的皮肤就好像一片和着苦涩油水的土地，他戴着总统印章戒、疲倦地放在膝上的右手皮肤更为紧绷，他的麻布衣裳干瘪细瘦，仿佛其中空空如也，他的死人鞋硕大无比，他有着看不见的思想

和隐蔽的权力，这个世上最老的老人，这个举国最可怕、最遭怨恨、最不被怜悯的老人正用监工帽扇着风，安静地从他那边看着我，我的上帝，他真是个悲伤的人啊，我惊恐地想，而她漠然地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阁下，他庄严地回应说我只请求您一件事，殿下，请您接受我此次的探访。他接连数月不间断地探望她，每天都是趁着他从前去看望母亲的炽热僵死的时段，好让安全部门以为他就在郊区的宅子里，而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的步枪手会埋伏在屋顶平台上保护他，唯有他丝毫没有察觉，他们会阻截交通，用枪托轰走行人，清空他会经过的街道并加以封锁，在下午两点到五点的时段制造出一片空旷，并公布他那当场击毙胆敢在阳台探头者的命令，但哪怕最缺乏好奇心的人也能找到法子窥看那漆成公务车模样的总统专车一闪而过的影子，窥看那伏天里躲在麻布衣裳中乔装成平民的老人，他们看到了他那孤儿的苍白，看到了他那副守望了多个黎明、暗自落泪而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去想他放在胸前的手的面容，这古老沉郁的动物留下了一串幻想与猜疑，看看他，在禁道上闷热的空气里像丢了魂似的，而后关于他染上怪病的谣言开始四处散播，并且越传越疯，最终，流言蜚语撞上了事实：因为他不在母亲的居所，而在玛努艾拉·桑切兹隐蔽小海湾的阴暗厅室中，被她正屏息做针线活的母亲严酷地监视着，他是为她才买的那些让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伤心不已的灵巧机器，想要用玄秘的磁针，用石英镇纸捕住的一月暴风雪，用天文学家和药剂师的小玩意儿，用烙画笔、压力表、节拍器、陀螺吸引住她，他违逆着母亲的意思，违逆着自己对钢铁的贪婪欲望，不断从任何愿意出卖这些物件的人手中将它们买来，只为和玛努艾拉·桑切兹一起愉快地把玩，他会将那个爱国海螺壳放在她耳边，里面响起的不是涛声而是颂赞他的政权的军队进行曲，他点燃火柴凑近温度计，为的是让你看到被我的内心想法所挤压的水银高低涨落，他欣赏着玛努艾拉·桑切兹，却不对她提任何要求，不表

明任何意图，只是将那些痴狂的礼物默默地向她压过去，并借机说出他没有能力说出的话，因为他只知道用他非凡强权的看得见的象征物来表达自己最隐秘的热望，比如玛努艾拉·桑切兹生日那天，他请她把窗户打开，开窗后我被他们在我贫穷的斗狗区所做的事惊呆了，我看到挂着帆布窗帘的白色房屋，阳台上还种着花，看到装有旋转喷水器的蓝色草坪、孔雀、杀虫剂的凉风以及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建起的沦陷期官员住宅的粗糙仿制品，他们屠宰了群狗，把没资格做皇后邻居的老居民一一从家中揪出并赶到另一片低贱场地任其腐灭，他们正是这样在数个夜晚悄悄建起了一个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新区，好让你在以你之名命名的日子里透过窗子看到它，这是给你的，皇后，好让你过很多年幸福的日子，看看权力的施展是否可以软化你礼貌却不可征服的举止，别靠太近，阁下，我妈妈在那儿看护着我的名节，于是他被闷在了自己的渴望中，吞下愤怒，以祖父的迟缓一口一口抿着她为给他解渴而准备的充满怜悯的鲜番石榴汁，他强忍着太阳穴冰冷的刺痛，只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年老的衰残，只是为了让你在他耗尽了一切资源之后，因为爱而爱他而不是因怜悯而爱他，只有与你在一起时他才这般孤独，我甚至几乎没有气力待下去了，我摩挲着她，苟延残喘，直到真人大小的天使长在屋中敲着我的丧钟飞过，在她为避免海蛀虫把那些玩意儿蛀成粉末而将它们放回各自的匣子时，他喝下了这次探访的最后一口饮料，就一分钟，皇后，他的起身耗尽了自现在到明天的时间，耗尽了一生的时间，太糟糕了，几乎没有余下一刻能让他最后瞥一眼那无法触碰的少女，她已随着天使长的来临和他的离去而僵在原地，膝头的玫瑰也已枯萎凋亡，他在夜幕初垂时逃离，试图遮盖流言蜚语带来的羞耻，一首无名歌曲流传起来，除了他，所有人都会唱，甚至园中的鹦鹉也在唱，闪开吧，女人们，痛哭的将军捂着胸口来到这里，看看他吧，怎么已经无法主宰自己的权力，他昏庸地统领，还有一道伤口无法愈合，野生鹦鹉从家养鹦鹉那里学会了它，

小鹦哥和松鸦也学会了它，它们成群结队地将这首歌一直带到他浩瀚的沉重王国的边疆，在祖国的每一片天空中，每到黄昏，便会响起那来自多个游荡群体的齐刷刷的歌声，我爱戴的将军来到这里，他从嘴里排大粪，从屁股排法律，这首歌永无终结，所有人，甚至连鹦鹉都会添枝加叶地嘲弄那些试图阻挠这歌曲传唱的国家安保人员，那些为打仗而全副武装的巡逻队破院门而入，击毙了正立在木棍上捣乱的鹦鹉并将小鹦哥一把把扔去活生生地喂狗，他们宣称国家正在根除反动歌曲，以免任何人发现那尽人皆知的事：正是他，每到黄昏便如逃犯般穿过厨房，从总统府旁门溜出去，消失在私人房间牛粪的烟雾中，直到翌日凌晨四点，皇后，直到每日的同一时刻，他带着无数珍奇的礼物到玛努艾拉·桑切兹家中探访，那些礼物多到需要强占邻居的房屋、打掉隔断墙来摆放，于是原先的客厅变成了一个巨大阴森的棚屋，里面是数不尽的各个时代的钟表和各式各样的留声机，从最原始的蜡筒式到黑胶唱片式应有尽有，还有摇把的、踏板的、电动的五花八门的缝纫机，以及装有各式电表的完整卧室、顺势疗法药店、装满蝴蝶标本的玻璃柜、亚洲草药、理疗室、健身房、天文仪器、矫正术和自然科学设备，以及摆满各处的暗藏机械动能又有人类特质的娃娃、无人进入甚至无人去清扫的密室，所有东西当初如何搬来如今便如何摆在那里，乏人问津，玛努艾拉·桑切兹尤其不愿去过问，因为自那个我倒霉地成了皇后的黑色礼拜六之后，我就再也不愿去了解有关生命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说，世界已经在那个下午终结，她先前的追求者因身体无法遏止的崩溃和不可思议的疾病一个接一个暴亡，她的女性朋友也都销声匿迹，她未出家门就被带到一个尽是陌生人的街区，她形单影只、赤裸裸地被监视着，她沦为了命运陷阱的猎物，对那个可憎的追求者，既无胆量说不，也没勇气说好，他以庇护之爱窥视着她，带着崇敬般的惊愕欣赏着她，他用白帽子扇着风，仍远远出离了自己，于是她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在看她，抑或那只是因惊恐而

生的幻象，她见过他在白日里彷徨，见过他咀嚼水果的汁液，见过他在如铜器震动般的蝉鸣让室内的阴暗更深浓时，手里拿着杯子坐在柳木安乐椅上打着瞌睡，还见过他打鼾，请小心，阁下，她对他说，他于是惊醒，喃喃地说，没有，皇后，我没睡着，只是闭着眼睛而已，他说着，丝毫没察觉她已趁他睡着时将他手中的杯子拿走以免掉落，她狡黠地周旋着，直到那个不可思议的下午，他带着一则消息气喘吁吁地来到她家，我为你带来了全宇宙最大的礼物，一个上天的奇迹将会在今晚十一点零六分经过，只为你能看见，皇后，只是为了你能看见它，一颗彗星。那是最令我们失落的日子之一，因为很早以前就开始流传的众多说法中，有一种认为他的生命时钟与人类的时间法则无关，而与彗星的周期相合，他被孕育出来后，只能亲见它一次，任凭他的那些谄媚者再怎么狂妄地预言他也不会见它第二次，于是在那个百年一遇的十一月夜晚，我们如同企盼新生命诞生的人一般翘首以待，并且备好了喜庆的乐曲、欢快的钟声以及节日的焰火，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将首次不是为称颂他的荣耀而爆发，而是为宣告他时代的终结的十一点那十一声金属鸣响、为他在玛努艾拉·桑切兹家的屋顶平台上等待的天命盛事而爆发，他坐在她和她母亲之间，用力呼吸着，以免暴露出在这满是凶兆的僵冷天空下，他的心脏已衰弱无力，他第一次呼吸到了玛努艾拉·桑切兹夜晚的气息，感受到了她冷酷的力度、她放松的神态，他感觉到天际敲起了驱邪的鼓声，听到了遥远的哀叹和人群那如同火山泥涌动的声响，他们在一个先于他而生又将比他长寿且与他的权力格格不入的造物面前恐惧地屈膝跪拜，他因而感到了时间的重量，有那么一刻，他更是尝到了必有一死的凡人的痛苦，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就在那儿，他说，刚才就在那儿，因为他认识它，在它向宇宙的另一边划去时他曾见过它，就是它，皇后，比世界还老，那天空大小的痛苦的发光水母，在轨迹上每走一拃都向自己的源头追溯了一百万年，她们听到了锡箔纸穗的簌簌声响，看到了

他饱经磨难的面容和被泪水淹没的眼睛，以及彗尾上被太空的风吹得乱蓬蓬的冰冻毒药的痕迹，那阵风留给世界一串星辰残渣的发光尘埃，还有数个因柏油色的月亮、因在地球纪元之前便存在的海洋火山口的灰烬而迟来的黎明，就在那儿呢，皇后，他喃喃道，好好看看它，一个世纪内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了，她因而惊惧地画了个十字，在彗星的磷光光芒下，被星辰的残灰细雨和天空的尘渣染白了头发的她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美，于是事情就发生了，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那个时候玛努艾拉·桑切兹在天空中看到了永恒的深壑，她将手伸向了那缕空洞，想去抓住生命，碰到的却仅仅是那只不被喜欢的戴总统之戒的手，那只燥热、光润、被权力的文火灼烤的掠夺者的手。鲜有人为那圣经记载的发光水母的经过而感动，它惊跑了天上的鹿群，又以星辰残渣的发光尘埃熏燎了国土，即便是我们这些最没有虔诚信仰的人，也都在盼着那场将会摧毁基督教教义、确立第三约书基础的非同寻常的死亡的来临，为此我们白白守到天亮，直到拂晓的清洁女工已在街上打扫彗星留下的天体垃圾，我们回到家时已因等待而精疲力竭，比早先在这些街道上彻夜庆祝更为倦怠，即便那时，我们也不甘于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已经变成新一出历史骗局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机构宣称彗星的经过是体制对恶势力的胜利，他们利用这时机以当权者毋庸置疑的充满活力的行动澄清了他患有怪病的传闻，口号被更新，郑重的信息公之于众，通过它，他表达了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决定，彗星下次回来时，我还要在为国效劳的岗位上，与此同时他听到的却是仿佛不属于他的体制的音乐与焰火声，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武器广场上群众的呼喊，他们举着巨大条幅，上面写着永恒荣耀归于那功勋卓著者，他必将长寿并将此讲述，他不在意政府的阻挠，将权力下放给下属，同时挨受着玛努艾拉·桑切兹手上的炙热留在他手中的记忆的折磨，他梦想着再次经历那幸福的瞬间，哪怕大自然扭曲方向，哪怕宇宙毁灭也在所不惜，他

是如此渴切，甚至前去哀求他的天文学家为他发明一尾焰火彗星、一颗转瞬即逝的启明星、一条火龙，总之任何与星辰有关的可怕创造，只要可怕到能令一位美人迷醉于永恒就好，然而他们唯一能计算出的就是下礼拜三下午四点有一次日全食，将军阁下，他接受了，同意，那是白昼里万分真实的黑夜，真实到星光燃起、花朵凋零、母鸡归巢、预感本能最强的动物皆惊惧畏怯，他则呼吸着玛努艾拉·桑切兹薄暮继而夜晚的呼吸，与此同时她手中的玫瑰也受暗影的欺骗而颓萎，在那儿，皇后，他说，你的日食，玛努艾拉·桑切兹没有回答，没有碰他的手，没有呼吸，她是那般的不真实，令他再也克制不住欲望，于是在黑暗中将手伸出去碰触她的手，然而却没有碰到，他用指腹在方才她的气味停留的地方摸索，却仍旧寻不见，他在那栋巨宅里用双手寻找，在黑暗中睁着梦游人的双眼探求，他苦苦问自己你在哪儿，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你让我在你不祥的日食之夜寻不到你，你无情的手在哪儿，你的玫瑰在哪儿，他仿佛一个迷失在盈满无形之水的池塘中的潜水员，在房间里找到了漂浮着的电流计史前龙虾、音乐钟螃蟹、你的无用机器螯虾，但却没有找到你甘草味道的气息，当短暂黑夜的暗影散去，他灵魂中逐渐燃起真理之光，他在这处荒凉居所下午六点的黎明的晦暗中，感到自己比上帝更加老迈，在这个没有你的世界的永恒孤寂里，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悲伤、更加孤独，我的皇后，在日食之谜中永远消失了的皇后，她将永不再出现，因为在此后漫长的权力生涯中，他再也没有在她家的迷宫里找到我的堕落玛努艾拉·桑切兹，她已在那个日食之夜悄悄离开了，将军阁下，有人告诉他在波多黎各的一场布莱娜舞会上看到了她，他们在那里杀害了艾莱娜，但那不是她，还有人看到她出现在蒙特罗老爹[6]迷狂的舞会上，唉，穷苦的伦巴舞者，但那也不是她，又有人在巴洛温多矿上的破房子里、在阿拉卡塔卡的昆比安巴舞会上、在巴拿马

小鼓漾起的美妙微风中看到了她，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她，将军阁下，她就是他妈的不见了，当时的他没有自暴自弃地屈从于去死的意愿并非因为怒火不够炽烈，而是因为他无可奈何地被注定不会为爱而死，这一点他在帝国初年的某个下午就已知晓，那时他找了一名女巫来解读盆中之水隐含的命运密匙，它们没有被写在他的掌心中、纸牌上，没有被写在咖啡底的沉淀物里或者其他任何可被探察的介质上，只被写在那预卜之水的镜面中，在那里，他看到了自己在与会客厅相连的办公室里于睡梦中自然死亡，他看到自己面朝下趴在地上，与他自出世以来的一生中每个夜晚的睡姿无异，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二岁之间。

---

[1]指以暴力攫取并靠暴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独裁军人。源于拉丁美洲，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

[2]在拉美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墨西哥的庆典活动、生日聚会上，人们会唱一首以“大卫王曾唱晨曲”开头的歌。

[3]“生日快乐歌”原文为英文。

[4]基督教中有圣灰星期三，是教会年历节期大斋期之始。部分教会会在那一天举行涂灰礼，用前一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榈枝烧成灰，涂在教友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象征。

[5]在哥伦比亚指英俊的黑人男子。

[6]古巴传说中的人物，一位热爱音乐和舞蹈的白发黑人。

他们就是这样在他秋日的前夕找到了他，而这具尸体实为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于是多年之后，在一个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年代再次这样找到他时，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那具被兀鹫啄烂了的、布满深海寄生物的朽迈尸体是他本人。在他那只因腐烂而丑陋不堪的手上，没有任何残迹能表明，在噪音年代它曾因一名不太可能存在的少女的断然拒绝而捂在胸口，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他生命的蛛丝马迹来确定他的身份。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年代自然不足为奇，因为即便是在他的鼎盛岁月中，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的存在，要知道连他的心腹们都不知晓他的确切年龄，在某些时期这一问题着实令人困惑：他出现在慈善抽奖会上时看起来已年过八十，在民众接待会上时六十，在公共节日的庆典上甚至不到四十。帕梅斯通大使，最后一批向他呈交国书的外交官之一，在他被查禁的回忆录中谈到，我想象不出比他更年老的人，也想象不出如这里一般废怠混乱的国度，在此国总统府中前行，需从废纸堆、动物粪便以及睡在走廊上的狗的剩饭间探出道路，没有人向我说明贸易税费或公务情况，我只得借助已经侵入到最靠外的几个卧室中的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的指引去往会客厅，在那里，母鸡啄咬着哥白林织毯上它们臆想中的麦田，一头母牛撕扯咀嚼着一幅绘有主教像的画布，我当即便察觉到他比痴傻之人还要耳聋，因为他答非所问，还因为他为鸟雀喑哑无声而烦闷不已，但事实上，走过那里如同穿行于百鸟唧啾、嘈啐不堪的清晨山林，甚至令人感到呼吸困难，突然间，他用一抹明澈的目光中断了国书呈交仪式，将手掌放在耳后，指着窗外曾是汪洋的尘灰平原，以叫醒酣睡人的声音说道，听，有骡群从那边来了，听，亲爱的斯泰特森，是那片海要

回来了。实在难以相信这个无药可救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位救世主，当年，在统治初期，他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农村，没有卫队跟随，只带一个手持甘蔗砍刀的赤脚瓜希拉印第安人和一个他随意用手点到的议员代表，他会去了解庄稼的收成、牲畜的状况和人们的行为举止，他会坐在广场上芒果树荫下的藤编摇椅上，用那时戴的监工帽扇着风，虽然看起来因炎热而困顿，但他在同那些他召集到周围来的男男女女对话时，从不放过任何没有说清道明的细节，他叫着他们的姓名，仿佛头脑中有一份全国居民、统计数字与问题的书面记录，于是他闭着眼叫了我，来这儿，哈辛达·莫拉莱斯，给我讲讲那个小伙子的事，就是前一年那个为了喝一瓶蓖麻油把自己摔了一跤的小伙子，还有你，胡安·布列多，他对我说，你的种牛怎么样了，他曾经亲自为这头害了虫的牛祈祷，好让蛆虫都从它耳朵里掉出来，还有你，玛蒂尔德·贝拉尔塔，我把你那逃跑的丈夫给你完完整整找回来了，你拿什么报答我呀，他就在那儿呢，脖子上套着龙舌兰绳，被拖曳着上前领了他亲赐的警告：如果再敢抛弃他的合法妻子，他就让他烂在那套中国式枷锁中，他又以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命令一名屠夫在某场公开活动上剁下了一个挥霍无度的司库的双手，他会摘下私家菜园里的番茄，一边当着农业专家的面以内行的傲慢架势将它们吃下，一边说着这地里缺很多公驴粪，都给记在政府账上，他命令道，他突然停下在城里的漫步，冲着窗口对我狂笑着喊道，啊哈，罗伦萨·洛佩兹，二十年前我送你的那台缝纫机怎么样啦，我回答他道，它已经去见上帝了，将军，您想想，东西和人都扛不了一辈子啊，他却反驳说世界是永恒的，然后不顾当街等待的随行人员，拿起螺丝刀和润滑油壶就开始拆卸那台机器，人们能不时察觉到他公牛一般的喘息中流露出的绝望，他的脸也蹭上了发动机油，不过将近三个小时后，那机器便焕然一新，又能缝东西了，那个时候，日常生活中再微不足道的问题，都被他视作国家大事般重要，他由衷地相信幸福可以被分配，而死亡可以

被军人的诡计赎买。很难承认，那个无药可救的老人就是那个手掌大权的男人的唯一所剩，他从前的权力大到当他问时间时，人们会回答他，您说几点就是几点，将军阁下，这的确属实，他不仅会将时间按照最利于他行事的方式作调整，还会将法定节日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变更，好让他可以一个节日挨一个节日地跑遍全国，他会带着赤脚的印第安人、愁苦的参议员以及装着在各个广场遭遇劲敌的优秀斗鸡的背篓，他会亲自下赌注，他笑起来可以撼动斗鸡场的地基，因为当他发出一串凌驾于音乐和焰火之上的鼓鸣似的怪异笑声时，我们都感到必须附和赔笑，而当他沉默时，我们便会备受煎熬，当他的鸡杀死了我们那些以失败为目标而训练已久的鸡时，我们会如释重负地欢呼，从没有哪一场失望而归，只有狄奥尼西奥·伊瓜兰的那只倒霉鸡是例外，它以利落精准的袭击杀死了当权者的灰公鸡，他第一个穿过战场握住胜利者的手，你真是条汉子，他愉快地对他说着，心怀感激，因为终于有人让他体会了一场无伤大雅的失败，买你的红鸡要付多少钱，他问道，狄奥尼西奥·伊瓜兰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它是您的了，将军，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在沸腾的乡亲们的掌声中、在音乐和爆竹的轰鸣中回了家，一路上向所有人展示他为了换得常胜红将军而赠予他的六只纯种公鸡，然而当晚，他将自己锁在卧室中，独自饮了一葫芦甘蔗酒，随后用吊床的龙舌兰绳把自己吊死了，可怜的人啊，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欢愉的现身会招致一系列家庭灾难，自己的所到之处会留下一连串令他意外的死亡，他也并不知道，如果自己在殷勤的心腹喽啰面前一时口误叫错了名字，他们便会当作不满的暗示，于是一些不幸的忠诚追随者便会受到无尽的折磨，他蓄着缓慢生长的胡茬，迈着诡异的犰狳步子走遍了全国，在各处留下了浓烈的汗臭，他会随兴走进某户人家的厨房，一副不中用了的爷爷的样子，吓得屋里的人都瑟瑟发抖，他会用加拉巴木瓢从瓮里舀水喝，用手从菜锅里捞出大块的肉吃，那么快乐、那么单纯，全然不顾那个家庭被永远地烙

上了他来访过的印记，而他如此行事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并不像其他时候那样是为了爱情的需要，那就是他当时的自然状态，因为那时的权力还不是他晚秋时期的无边泥塘，而是在我们眼前的从源头喷放的激越洪流，因此他只需用手一指，该结果的树便结果，该成长的牲畜便成长，该致富的人便致富，他下令收起阻碍某个地区收割的雨水，并将之洒向干旱的地区，事情果然发生了，主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在他自信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以前，他的传奇便早已开始流传，彼时他还迷信于各种预兆和对梦魇的解读，他会突然中断刚刚开始的旅程，因为听到了黄头叫隼在他头顶鸣唱，他会更改公开亮相的日期，因为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收获了一枚双黄蛋，他清除了那支由殷勤的议员和代表组成的跟着他各处游历、替他发表他从不敢发表的演讲的随从队伍，因为他做噩梦看到自己在那栋空洞的大宅中被一群面色惨白的灰衣助祭士包围，他们微笑着用切肉刀刺向他，带着熊熊怒火驱赶他，令他无论将视线转向何方，都能看到一把铁器向他的脸和眼直袭过来，他看到自己被团团围住，仿佛一头被杀手困住的野兽，他们安静而面带笑意，争夺着参与献祭和享用他血液的特权，然而他既不愠怒也不惧怕，只感到一种随生命的干涸而愈发辽远深邃的释然，他自觉轻盈纯净，因而在他们杀他时，他也报以微笑，在那栋石灰墙壁已被我的鲜血溅染的梦中屋内，为他们而笑，也为自己而笑，直到一个在梦中是他儿子的人一刀砍在了他的腹股沟上，从那里，我留存的最后一口气被排出，于是他用浸透了自己血液的毯子盖住了脸，这样，在他活着时认不出他的人也不会认出死后的他，在这般逼真的垂死感受中，他因自己的苟延残喘而颤抖崩溃，于是再也按捺不住，将那感受告诉了我的兄弟卫生部长，而他最终也不免令他惊恐，因为他向他揭示在人类历史上，将军阁下，这样的死亡已有过一次，他还为他读了拉乌塔罗·穆纽斯将军某本被熏黑的记事簿中的那段故事，母亲啊，和他的梦境一模一样，在念诵的过程中，

他甚至记起了醒来后一度忘记的细节：在他们杀他的时候，总统府的窗户全部自动打开了，但当时并没刮风，而府上窗户的实际数量正是梦中他伤口的数量，二十三，一个可怖的巧合，于是在那个礼拜，他在他冷漠的军队同谋面前，以海盗袭击的方式，取缔了议会和法院，焚毁了我们从前的显贵们的庄严宅邸，那燃烧的火光直到深夜仍能从总统府的阳台上看到，当有消息说将军阁下，他们连地基石块都没留下时，他丝毫不为所动，向我们承诺将严惩发动袭击的人以儆效尤，然而罪犯从未出现，他向我们承诺完全按原样重建显贵宅邸而那里直至我们的时代仍是一片焦黑的废墟，他从不遮掩自己那套可怕的驱魔手段，并利用这机会将老共和国的立法与司法系统全部铲除，他用名利将议员、代表和法官通通压垮，因为不再需要他们来维持执政初期的表象，他把他们打发到那些安逸而遥远的使馆，身边只剩下那个手持砍刀的印第安人的暗影，他与他形影相随，替他试吃食物和饮料，阻止人与他靠近，他待在我家时，他就去看门，来我家的举动滋长了他是我的秘密情人的流言，而事实上，在那段漫长年月中，他每月最多来两次，向我咨询纸牌的解读方法，当时他还相信自己是必有一死的凡人，还拥有怀疑的品德，还能认识到错误，并且相信纸牌胜过相信自己粗野的直觉，他来时总是像初次坐在我面前时那样惊恐苍老，一言不发地把双手摊开给我看，那对平滑紧实好似蛤蟆肚皮的手掌是我漫长的占卜生涯中不曾看到也不会再看到的，他把双手同时放在桌上，仿佛一个绝症病人无声的哀求，我能觉察到他是那样的急切无助，以至于令我印象更深的不是那荒芜的掌心，而是他无从排解的忧郁、他嘴唇的苍白和他被猜忌腐蚀了的可怜老人的心，他的命运，不仅从他的手上看起来深不可测，用当时已知的任何察探手段来看都是如此，他每一切牌，牌面都立即变成浑水井，他喝完了的咖啡的杯底沉淀也都浑浊不清，与他个人的未来、他的幸福或是财富相关的关键线索全都模糊难辨，然而任何和他有关涉的人的命运都明晰可鉴，于

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为外国名字的鸟雀涂颜料，那时的她年事已高，在因疫病而变得稀薄的空气中几乎辨不清颜色了，可怜的母亲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城市被一场飓风摧毁，那场飓风极其可怕，简直不配它那女性的名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戴绿色面具、持利剑的男人，于是他苦恼地问这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纸牌回答说，他每个礼拜二都离他更近，他便说了声啊哈，随后问他的眼睛什么颜色，纸牌回答说，一只是甘蔗汁在日光下的颜色，另一只是甘蔗汁在黑暗中的颜色，他便说了声啊哈，随后问那个人有什么企图，那是我最后一次向他揭出纸牌的终极真相，因为我回答他，绿面具代表的是不忠和背叛，于是他带着胜券在握的口吻说，啊哈，我知道是谁了，他妈的，他喊道，是纳尔希索·米拉瓦上校，他最亲近的副官之一，两天后他往自己耳朵里灌了一枪，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可怜的人啊，纸牌的占卜就是这样主导着国家的运势、预设着它的历史，直到他听人说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女巫，她能以万无一失的盆中之水破译死亡，于是他偷偷地前去寻她，除了砍刀天使外再没有其他人看见，他们沿着骡道一直走到荒漠中的那间茅屋，她和她的重孙女就住在那里，重孙女已有三个孩子，并且即将诞下上个月死去的那任丈夫的骨肉，他在近乎黑暗无光的卧房深处找到了她，她半失明地瘫在那里，但是当她请他将双手置于盆上方时，盆中之水顿时变得澄明，并散发出轻柔而透彻的光，于是他看到了自己，一模一样的自己，趴在地上，身穿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脚蹬军靴，戴着金质马刺，于是他问这是什么地方，那女人审视着平静的水面，回答说，是一个房间，不比这间屋子大，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好像有一张写字桌，还有一台电风扇，有面海的窗户，白墙上挂着骏马图，还有一面带龙的旗，于是他又说，啊哈，因为他已经识出，那无疑是与会客厅相连的那间办公室，他接着问是否死得很惨或者得了可怕的疾病，她回答说不是，是在睡梦中且没有痛苦，他应道，啊哈，又颤抖着问她

是什么时候，她回答说他可以放心睡觉，因为他死的时候年纪不会比现在的她小，也就是一百零七岁，但也不会比那晚一百二十五年以上，于是他说，啊哈，而后便杀害了那瘫在吊床上的老妇人以免除他之外还有谁知道他死亡时的情景，他是用马刺上的皮带将她勒死的，没有让她痛苦、呻吟，俨然一个老练的刽子手，尽管她是这世上唯一享有被他亲手杀死的荣耀的生物——无论人还是动物，无论在战争里还是在和平中，可怜的女人。在他秋日的夜晚，回忆自己这样阴险卑鄙的过往并没有使他良心不安，它们反而成了范本般的寓言，指明他应该这样做却没这样做的事，特别是在玛努艾拉·桑切兹消失在日食之影中时，他格外希望自己的残暴再次盛放，好以此根除煎熬他五脏六腑的羞辱感所触发的怒气，他会躺在罗望子树风铃下的吊床上，想着玛努艾拉·桑切兹，满怀那股搅扰他梦境的怨恨，而与此同时，陆海空三军都在寻找她，甚至连边境地区尚未开垦的硝石荒漠都没放过，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细微的痕迹，你他妈的躲到哪儿去了，他自言自语道，你以为你他妈的钻到什么地方去就能逃出我的掌控，让你看看到底是谁说了算，他放在胸口的帽子随着心脏的剧烈跳动而不停震颤，他迷醉在盛怒中，丝毫不理会他母亲的坚持，她一直想打探出为什么从日食那天下午开始你就不说话了，怎么变内向了，但他没有回答就走了，狗屎母亲，他拖着那双孤儿的脚，心里不住地滴着苦水，自尊也被那无法补救的痛楚伤害了，这些坏事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因为我变成了这么一个孬种，就是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就是因为进那臭娘儿们的屋还要经过她母亲的同意，当初去弗朗西斯卡·里内洛那个清凉寂静的庄园时就不用这样，那庄园位于桑托斯伊盖隆内斯教区，那时还是他自己而不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代表权力抛头露面，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在摆钟缓缓敲响十一点的钟声时，连门环都不叩就走进去，我在花园露台听到他金质马刺的碰击声，便立即明白那如捣臼木槌发出的声响、那踏在砖地上的威

严步子不可能是别人的只可能是他的，在看到他出现在天井露台的门洞之前，我就感觉已经真切地看到了他整个人，门口的石鸽正在金色天竺葵间歌唱着十一点的到来，而同在唱歌的拟黄鹂则在挂于屋檐下的小香蕉散发出来的丙酮气味中迷离，八月里不祥的礼拜二的日光在院中新长出的香蕉叶和我丈夫蓬修·达萨清晨刚捕猎来的一头小鹿的尸体间休憩，他把鹿腿绑上，挂在了那一把把因为糖分而长出黑斑的小香蕉旁以排干血水，然后我看到了他，比梦中的更高大更阴森，穿着一双满是烂泥的脏靴子和一件被汗浸湿了的军服上衣，皮带上没佩武器，但他仍旧放心，因为那个赤脚印第安人的暗影就一动不动地立在他身后，手中还握着砍刀刀柄，我看到了那双令人无法回避的眼睛和那只睡梦中的少女的手，他就近从一把香蕉中揪下一根，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一根又一根，他渴切地咀嚼着它们，整张嘴中涌动着沼泽地的声响，视线一刻未离开诱人的弗朗西斯卡·里内洛，而她以刚嫁作人妇的羞怯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因为他是来尽兴的，而又没有任何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阻止他，我几乎察觉不到我丈夫畏怯的呼吸了，他在我身旁坐下，我们两人拉着手一动不动，两颗明信片一般的心在那个深不可测的老人黏韧的目光下一同惊惶地跳动着，他就在离门两步远的地方一根接一根地吃着香蕉，将皮往肩膀后的院子里甩，他的目光从开始看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离开过，直到把整串香蕉全部吃完，直到死鹿身旁的香蕉杆变得光秃秃，他才向赤脚印第安人打了个手势，而后命令蓬修·达萨，和我带砍刀的朋友出去一趟吧，他有些事情要和你解决，我几乎要吓晕过去，但仍留有足够的神志，仍然清楚，能解救我的唯一办法就是任他在饭桌上对我随心所欲，甚至在他身上的氨气味儿让我窒息之后，在他一把扯下我的内裤并用手指胡乱摸索之时，我还帮他在衬裙的蕾丝花边之间找到位置，我不知所措地想着，圣体啊，这真是太羞耻了，真是太晦气了，因为那天早上我忙着收拾小鹿，都没有清洗一下自己，就这样，他在数月的烦闷之后

得偿所愿，却做得仓促而糟糕，仿佛比他本人苍老抑或年轻太多，他深陷在恍惚中，我甚至都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尽其所能完的事，他还忍不住呜咽起来，流下了孤独的大个子孤儿如发烫尿液一般的泪水，他哭着，好像受尽了苦难，使我不仅怜悯他，也怜悯起世上所有的男人，于是我开始用指腹抚摩他的脑袋，安慰他说，不至于这样，将军，人生很长，而就在此时，带砍刀的人把蓬修·达萨带到了香蕉园里，将他切成了纤薄的肉片，它们被野猪衔去了各处，再没可能复原，可怜的人啊，但没有别的办法，他说，因为他会成为终生的死敌。这些是他权力的影像记忆，它们远道而来，加深了他的苦楚：他的浓厚权力中究竟被掺了多少水，导致他竟已完全没有能力去驱散那日食造成的巫术伤害了，在砍刀天使的关节因尿酸过高而形成结晶后，他将自己的性命交付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一人手上，面对后者在多米诺骨牌桌上冰冷的控制，他不由得因一丝躁郁而战栗起来，他自问，把这么多的信任和权威独独授予一个人难道不是招致他不幸的根源吗，难道不是我终生的兄弟剃掉了他内陆地区领袖的野性毛发从而把他变成一头阉牛和一个宫殿里的傀儡吗，他让他无力发出哪怕一道未被事先执行的指令，还想出了让别的面孔代替他抛头露面的伎俩，而在从前的好日子里，一个赤脚印第安人就足够了，他会挥舞砍刀在人群中开路，大喊着浑蛋们让开，管事的人来啦，但他无法区分那鱼龙混杂的欢呼队伍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而谁又是投机者，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最居心叵测的就是那些最起劲地喊硬汉万岁的人，他妈的，将军万岁，但现在他却够不着他的军权，无力调兵去寻找那个厄运皇后，那个曾奚落过他老年色欲那无法逾越的围墙的皇后，他妈的，他把骨牌摔在地上，因看不见的缘由扔下残局离去，内心失落不已，因为他突然想到，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人但他除外，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衬衫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已被汗液浸透，第一次察觉到随海洋水汽蒸腾的腐臭味道和因

湿热而扭曲的疝气的温柔笛声，是闷热造成的，他一边没有底气地自言自语，一边在窗口探看，试图看透这静止城市里的奇异光芒，这里仅存的活物似乎是那群正惊恐逃离贫民医院屋檐的兀鹫以及那位武器广场上的盲人，那盲人感觉到了在民政大楼窗口现身的颤巍巍的老人，他急迫地用手杖向他示意并对他喊了些不明所以的话，被后者解读为压抑情绪中的又一个信号，暗示即将有事发生，然而，在这个漫长而沮丧的礼拜一即将结束时，仍旧安然无恙，这种状况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是闷热造成的，他自言自语道，细流轻挠着雾气氤氲的安眠药水瓶滤嘴催他入眠，于是他很快睡着了，却又猛然惊醒，谁在那儿，他吼道，事实上那是他的心脏因黎明时分公鸡一反常态的沉默不打鸣而备感压抑，他感到宇宙的航船在他睡着时已经驶到了某个港口，而他正在一片蒸汽汤中漂浮，天空中、地面上那些比迟钝的预兆和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更能敏锐地预见到死亡的动物都惧怕得噤声，空气已耗尽、时间正改向，他起身后感到每迈一步心脏都会刺痛而鼓膜正在爆裂，一种滚烫的物质从鼻孔流出，是死亡，他想，那军服上衣已被血水浸透，随后他才知晓，不是，将军阁下，是飓风，在把那个古老紧实的加勒比王国撕成一串散乱小岛的种种灾害中，它是最具毁灭性的，但它又太过隐秘莫测，唯有他早在鸡飞狗跳之前就凭预感的本能觉察到了这场灾难，它令人措手不及，惊慌的公务人员甚至都来不及为它起个女性的名字，他们前来向我汇报说，现在确定了，将军阁下，那玩意儿他妈的要把国家卷走啦，他却下令用船骨加固门窗，将哨兵绑在楼道上，把母牛母鸡关在一楼办公室里，将每样东西，从武器广场到他受惊的阴郁王国里最偏远的一块界碑，都钉在原位，整个国家仿佛都被锚固定住了，因为他下达了不容违抗的命令：一旦出现骚乱迹象就鸣枪，前两次向天，第三次就杀人，然而，旋风携着巨型刀刃以不可抗拒之势过了境，它干净利落地一刀斩断了主入口处的钢铁装甲大门并将我的母牛卷上了天，但他并未察觉到这

些，因为他正身处不知从何而来的横冲直撞的暴雨的魔力中，雨水在他周围洒下凶猛冰雹般的阳台碎片以及深海与丛林中的野兽，他也没有清醒的神志去考量这场灾变的规模，只是在滂沱大雨中徘徊着，在怨恨的麝香味道中兀自问着你在哪儿，我的苦水玛努艾拉·桑切兹，他妈的，你到底钻到哪儿去了，让我这场复仇的灾难都够不到你。飓风过后，在一处平静的水洼中，他发现身边只剩几个最亲近的随从，正和他一起在会客厅满目疮痍的水面上坐着划艇漂浮，他们划出车库门，在沙枣树冠和武器广场的锦缎灯笼间畅行，随后进入了大教堂中的一潭死水，有那么一瞬间，他再次因一个深刻的闪念而陷入痛苦，他想到自己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在他仍为这苦涩确凿的讽刺而深感羞耻烦闷时，小船撞进了一个个空间，它们的密度各不相同，在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的照耀下不断变幻，那光线落在了主祭台上纯金的枝叶和祖母绿的花簇上，落在了被活埋的总督和因幻想落空而死去的主教的贴地墓碑上，也落在了海军上将空荡荡的纪念堂那有三艘帆船侧影的花岗岩石刻上，他当初建起这纪念堂是考虑到将来兴许会想让自己的尸骨安息在我们之间，我们通过祭坛的水渠，划向一个已变成明亮鱼池的内院，看到一群群鲷鱼正贴着瓷砖池底在广藿香和向日葵的茎秆间游过，我们穿过比斯开修女修道院天井中的阴暗河道，看到了被遗弃的单人房间，看到了一架漂浮于乐室隐秘水池中的古钢琴，看到了食堂沉睡的水的深处，淹死在已摆好菜肴的长餐桌旁各自座位上的全院修女，从阳台离开时，他看到光亮天空下有一片浩渺湖泊，那里曾是那座城市的所在，直到此刻他才相信，消息属实将军阁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上演的这场灾难只是为了将我从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折磨中解救出来，见鬼了，上帝的做法和我们的比起来简直太粗野了，他一面愉快地想着，一面望着那片曾是城市的浑浊泥潭，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浮着无数溺死的母鸡，兀立在那里的只剩大教堂的尖塔、灯塔的航标灯、总督区灰岩大宅的阳光

露台以及贩卖黑奴的港口所在的零星的丘陵小岛，海上遭遇飓风劫难的人在那些岛屿安营扎寨，我们这批最后的不信教的幸存者看到了那艘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小船在一只只母鸡僵死的尸体上的马尾藻之间安静地驶过，看到了那悲伤的双眼、黯淡的双唇和正为祈求雨过天晴而画着十字的若有所思的手，他命令溺死的母鸡重生又命令水位下降，于是水便退去了。在喜乐的钟声、愉快的节日焰火和荣耀的音乐声中，第一块重建的基石落定，人们聚集在武器广场称颂着赶跑飓风猛龙的功勋卓著者，在众人的呼喊声中，有人拽住他的手臂把他带上阳台，现在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安慰的话语，在得以逃脱之前，他感受到了灌入他五脏六腑的犹如从凶险海洋刮来的风一般整齐划一的呼声，硬汉万岁，从统治的第一天开始，他便体会到一时间暴露于全城民众视野中的不安全感，于是他的言辞石化了，一抹凡人的神志闪过，他顿时明白自己没有勇气也永远不会有勇气将整个身体探向人群的深渊，于是在武器广场上，我们只是隐约察觉到那个一如既往转瞬即逝的身影，那个难以捉摸的穿粗布衣服的老人的鬼魅身影，他从总统阳台上撒下无声的祝福后便立即消失了，然而那个飘忽模糊的画面足以支撑起我们的信心，相信他就在那里，在郊区宅院的那一株株载入史册的罗望子树下，守候着我们清醒与安睡的时光，他悠然躺在柳木安乐椅上，手中握着一杯还没喝的柠檬水，听着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用加拉巴木瓢筛玉米粒的声响，透过午后三点的炽热看着她抓起一只可怜的母鸡，把它夹在胳膊下，不无温柔地拧转它的脖子，她看着我的眼睛用母亲的语气对我说，想的事情那么多，都要得痨病了，还不好好吃饭，今天晚上留下来吃吧，她央求着他，同时用那只被拧得奄奄一息但仍被紧紧抓在手中以防逃脱的鸡引诱着他，于是他说，好，母亲，我留下来，他闭着双眼在柳木安乐椅上待到了傍晚，虽然没有睡着，却也被锅里沸腾的鸡汤那淡淡香味熏得昏昏欲睡，他同时牵挂着我们的生命走向，说起来，地球上唯一能

给我们安全感的就是确信他在那里，瘟疫和飓风伤不着他，玛努艾拉·桑切兹的奚落伤不着他，时间也伤不着他，他全心投入到为我们着想的救世主的喜乐中，知道我们清楚他不会做出任何不顾及我们的决定，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幸存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超群的胆魄和无尽的谨慎，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唯一知晓我们命运的真实样子的人，他甚至到了那里，母亲，他曾在遥远的东陲结束一段艰难旅程时，坐在最后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头上休息，石上刻有最后一名为保卫国土而战死的士兵的姓名和生卒日期，他见过那座阴郁严寒的邻国城市，看到了隽永的细雨、烟油味的晨雾、电车上穿礼服的男士、由头顶羽毛饰物的佩尔切隆白马拉着高贵灵车的贵族葬礼，以及大教堂门廊上裹在报纸里熟睡的孩子，见鬼，这些人太奇怪了，他惊呼，他们好像是诗人，但他们不是将军阁下，他们是当权的哥特佬[1]，他们对他说，那次旅行回来后他兴奋不已，因为他发现这带有一丝腐烂的番石榴味道的风、这喧闹的市场、这悲惨国度在日落时分给人的深重苦闷感都无与伦比，于是此后他将不再跨越国界，这并不是因为如他的敌人所说，他害怕离开身下的交椅，而是因为一个男人就像山上的一棵树，母亲，就像山上的动物，除了去找吃的，不会离开巢穴，他说着，以午休困倦时常人的神志回想起多年前一个昏沉的八月的礼拜四，那天他居然敢坦言知道自己野心的局限，他那番话是对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土地的一名战士说的，他在办公室的炽热阴暗中单独接见了他，那是一个会在倔傲姿态面前茫然失措的年轻人，身上烙着永不合群的孤独印记，他在门口裹足不前，直到双眼适应了那片阴暗，那片在热气中流溢着一簇盛放紫藤的芳香的阴暗，然后才下决心跨过门槛，他认出了他，坐在旋转安乐椅上，一只手握拳静静地放在光秃秃的桌面上，那么平凡、黯淡，与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相去甚远，没有卫队，也未持武器，身上的衬衫被凡人的汗液浸湿，太阳穴

上贴着治疗头痛的鼠尾草，当我确信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确信了那个生锈的老人就是我们童年时期的那位偶像，就是我们荣光梦想最纯粹的化身时，他才走进办公室，以清晰而坚定的声音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期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而被赏识，而他用一只柔美的小手，一只主教的手握了握我的手，出人意料地聆听着那名异乡人的宏伟梦想，为了他的、同样也是您的事业，他需要武器和支援，阁下，为了打一场不分地域、一举扫除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保守统治的仗，他需要后勤补给和政治援助，他为他澎湃的激情所感动，问他为什么要掺和到这破事里，他妈的，你为什么想死，那外乡人不带一丝羞耻地回答说，为祖国而死是至上的荣耀，阁下，而他带着怜悯的微笑回应他，别傻了，孩子，祖国就是活着，他对他说，就是这个，说着打开方才撑在桌上的拳头，向他展示了掌心的小玻璃球，这样东西要么有要么就没有，但是只有有它的人才有，孩子，这就是祖国，他说着，轻拍着他的脊背与他道了别，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哪怕一句敷衍的承诺都没有，当侍从关上门后，他命令道，别去动这个刚走的人了，都不用花工夫去盯他，他说，他的热情还在羽毛里，成不了气候的。这句话我们直到飓风过后才又一次听他说起，当时他再次宣布大赦政治犯，批准几乎所有流放的犯人返乡，只有文人除外，这些人自然永远别想，他说，他们就像正在长毛的良种小公鸡，热情还在羽毛里，成不了气候的，不过他们一旦成熟，就会比政客更糟糕，比教士更麻烦，想象一下吧，但其他人都要回来，不分肤色，让重建国家成为所有人的事业，让所有人都证明他在一众凶猛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又一次成为他全部权力的主宰，这些武装力量得以重拾昔日的忠勇，全仰赖他将存粮、药品以及外国提供的公众生活保障品分配给政府高层，仰赖部长的家属可以用临时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帐篷在海滩上消遣、可以向卫生部贩卖血库中的血浆与成吨落灰的牛奶并由卫生部转卖给贫民医院，国家公务员都将兴趣转向了公共工程合同和与沃仁

大使以其国渔船无限制地在我国的水域捕鱼为条件而发放的紧急贷款相关的重建工作，他妈的，只有有它的人才有，他想着向那个再也没有音信的可怜梦想家展示过的玻璃球，自言自语道，他因重建事业而兴奋难耐，发布了多道口谕，如执政初期那般事必躬亲、巨细靡遗，头戴草帽、脚蹬捕鸭猎人靴在街道的泥沼中蹚着水，生怕人们建起一座与他在憋闷孤独的梦境中为自己的荣耀构想出的城市相异的城池，他命令着工程师，给我把这儿的东西拆掉，放到那边不碍事的地方去，他们便拆掉了那些东西，把那座塔加高两米，让外海的航船都能看见它，他们便加高了那座塔，给我把这条河的流向掉个个儿，他们便没有一处差错也没有一丝不情愿地将流向掉了个个儿，在那场狂热的重建中，他是那样的急不可待那般的全心投入，把次要的国事全然忘却了，因而当某位副官一时失言提起孩子们的问题时，他猛地一下撞上了现实，云里雾里地问道哪些孩子，那些孩子，将军阁下，但是他妈的是哪些啊，因为他仍被蒙在鼓里，尚不知晓军队害怕总统的彩票一直中奖的原因被抽取中奖号码的孩子们泄漏出去而秘密地将他们软禁了起来，一边编造更好的理由，一边搪塞前来抗议的家长，说那不是事实，而是卖国贼的造谣、反对派的中伤，并用迫击炮驱赶那些在军营外造反的人，我们也对您隐瞒了这场公开屠杀，是为了不打扰到您将军阁下，我们还对您隐瞒了一件事，其实那些孩子被关在港口碉堡的地下室，那里条件优渥，他们精神状态极佳、健康状况良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军阁下，因为他们差不多有两千人了。那万无一失的中彩票的方法是他盯着台球上镶嵌的金银数字时无意中想到的，那是一个极为简单却令人琢磨不透的想法，因而在他看到正午时分就挤满了武器广场的渴切人群时，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在炽烈的阳光下展示着各自猜测的一组奇迹号码，感激地呼喊着，举着写有愿与民众分享喜乐的胸襟宽广者永享荣光的条幅，乐手和走钢丝的也来了，快餐、油炸食品、过时的轮盘赌桌以

及褪色的动物彩票，这些其他时空和其他世界的废品都流连在财富的边缘，希冀沾点福运的碎屑，发一笔横财，下午三点露台开放了，他们请上三个不到七岁的孩子，为了证明抽彩方式的公正，这些孩子都是人们随意选出的，他们发给每个孩子一个不同颜色的细长口袋，在此之前，具有资质的公证人员已经证实了每个口袋中都有十个从一到零标号的台球，请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于是大家屏住呼吸，每个已被蒙上眼睛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球，首先是拿蓝口袋的孩子，随后是红口袋的，最后是黄口袋的，他们一一把手伸进各自的袋子，感觉到袋底有九个球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冷冰冰的，于是依我们之前秘密吩咐的，拿出那个冰冷的球向人群展示，随后念出数字，就这样，孩子们取出了那三个在冰块中放置了多天、与他所持的彩票号码相吻合的球，但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那些孩子可能把秘密泄露出去，将军阁下，我们想到时已经太晚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们三个三个地，之后是五个五个，再之后是二十个二十个地藏起来，您想想，将军阁下，他理清这团乱麻时才发现，整个国家的陆海空三军高官都卷入了这场奇迹般的国家彩票的钓号活动中，他得知最初那些孩子登上露台是经过父母同意的，他们甚至接受过家长的训练，掌握了摸出象牙上镶嵌数字的无用技巧，而后来的孩子都是在武力逼迫下被硬拽上去的，因为已有传言说，上去的孩子就再也没有下来过，于是家长们纷纷藏起自己的孩子，甚至在突击巡逻队半夜搜查时将他们活埋，而紧急部队封锁武器广场并非如此前他们告诉他的，是为了平息群众的疯狂情绪，而是为了将他们像畜群一样圈在那里并以死威胁，外交官们请求接见以调停冲突，但却碰上了格外荒唐的事，官员们居然亲自向他们证实他身患怪病的传说，说他不能接见他们，因为他肚子上长出了蛤蟆，脊椎上生出了鬣蜥的背刺，为避免戳伤自己只能站着睡觉，他们向他隐瞒了全世界的抗议与诉求，甚至拦截了来自罗马教皇的电报，它表达了我们的教皇对孩子们命运的担忧，监狱里

已经没有空间关押更多造反的父母了，将军阁下，礼拜一已经没有孩子能来抓球了，他妈的，我们这是惹上了什么麻烦啊。尽管如此，在看到那些孩子之前，在看到那些仿佛将要被屠宰的牲口一样憋在港口碉堡的天井中的孩子之前，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那道深渊究竟有多深，他看到他们在经历数月的恐怖黑夜之后从拱顶地下室出来，被炫目的阳光晃得茫然无措，如疯狂的山羊群一般四下窜开，一眼望去竟有那么多人，以至于他无法把他们当作两千个独立的孩子，而只能将他们看作一头宽广无形的动物，散发着被阳光炙烤过的皮囊的非人臭气，发出深水的汩汩响声，并凭借自己的多面特质拯救自身免于毁灭，因为一下子干掉这么多条性命不可能不留下恐怖的印迹，这种事可是能传遍全世界的，他妈的，什么都干不了，由于坚信这一点，他将最高司令们通通召来，那十四位战栗不安的将领从来不曾这般可怖，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如此惊恐，他不慌不忙地观察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一个挨一个地，继而明了他正以一己之力对抗所有人，他昂起脑袋，绷起嗓子，教导众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军队的名誉，他赦免了他们的一切罪行，同时手握拳头抵着桌面以掩饰他正因犹疑而颤抖，他命令他们要一如既往地用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热情尽各自的本分，因为我不容更改的最高指示是，这里什么都没发生，散会，我会负责的。纯粹为以防万一，他将那些孩子移出港口碉堡并送上了夜间货车，拉到了国境里最荒凉的地区，与此同时他还得面对官方的严正声明引发的间歇性风波，声明中说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没有孩子在当权者手上，而且监狱里都没有任何类型的囚犯，传言中的大规模劫持只不过是叛国者为了扰乱群情而进行的卑鄙挑拨，我国国门为澄清真相而敞开，欢迎大家前来搜寻，于是人们纷至沓来，一个国际联盟委员会甚至将国家最隐蔽的石块都搬开了，还事无巨细地质问了他们想质问的每一个人，惹得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不禁问起，那些穿得像招魂术士的都是什么人啊，一闯进家门就在床底下、针线篮

里、玻璃涮笔缸里找两千个孩子，最终委员会做出了公证，他们只看到关闭的监狱、和平的国家、井然有序的一切，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来证实公众的猜疑，即存在或可能存在对人权有意的抑或事实上的因主动或疏忽所造成的侵犯，安心睡吧，将军，他们走了，他在窗口挥舞着花边手绢向他们道别，如释重负地感到有些事永远了结了，再见了，傻瓜们，祝一路顺风、旅途愉快，他叹了口气道，麻烦过去了，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提醒他说，还没有，麻烦还没过去，因为那些孩子还在，将军阁下，他手掌一拍脑门，他妈的，竟把这事忘光了，我们该拿那些孩子怎么办。他努力摆脱浑噩的思绪，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在他脑中成形了，他让人将孩子们从密林中带出来，又沿着反方向把他们送至终年下雨的省份，那里没有播散他们声音的邪风，陆上的动物都有可能在行走时腐烂，人类的言语上能开出百合，章鱼在林间漫步，为了避免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下令将他们带至安第斯山间永日云雾缭绕的岩洞，为了避免有人知晓他们在某一位置的确切时间，他命他们在一个个潮湿腐臭的十一月到晴朗清爽的二月间迁移，为了避免红十字会的飞机探出他们的身影，他让他们日夜藏身于烂泥没颈的稻田中，当得知他们因此而感冒发烧后又差人送去奎宁药片和羊毛毯，还将日光和星光染成红色以治疗他们的猩红热，并且派人从空中喷洒杀虫剂消毒，以免香蕉园的蚜虫将他们吃掉，他遣人用飞机为他们送去糖果雨和奶油冰棒雪、用降落伞送去圣诞礼物讨他们开心，并争取时间想个绝妙的解决办法，就这样他渐渐摆脱了自己的邪恶记忆，将他们遗忘了，陷入无数个寻常的不变的失眠夜晚的孤独泥沼，他听到九点钟的金属敲击报时声，便把在民政大楼屋檐下睡着的母鸡抓了下来放到鸡笼中去，他还没数完睡在脚手架上的动物，一个收鸡蛋的穆拉托女佣走了进来，他感受到她那个年龄的阳光和她紧身胸衣的声响，于是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军请您小心，她颤抖着低声说，鸡蛋要弄破了，破就破吧，他妈的，他说着一掌把她推倒，没

脱她的衣服，也不解自己的衣衫，他急切地想要逃离这个被睡眠中的动物那绿色粪便覆盖的礼拜二的抓不住的荣耀，却浑浑噩噩地打了个滑，坠入虚幻眩晕的深渊，坠入纵横交织的用来逃避的条条苍白道路、粗壮女人散发的喘息和汗液味道、遗忘的欺诈性威胁之间，在下落中他渐渐留下了金质马刺流星般的叮叮作响而充满渴求的弧线，留下了他的急迫丈夫的一串落石般的喘息痕迹，留下了他狗一般的呜咽与他对自己存在于那一闪光亮中的恐惧，留下了死亡的火星爆燃的刹那发出的一记无声巨响，然而触到深渊之底，周围仍只是覆满粪便的铺地稻草，仍只是不眠而梦的母鸡，仍只是那个痛苦的穆拉托女人，她衣服上满是蛋黄的黄色黏液，正一边起身一边抱怨着，您看我说的没错吧将军，鸡蛋都破了，他压抑着又一次无爱之爱激起的怒火嘟囔，数数有多少个，他对她说，都从你工资里扣，然后他走了，这时是十点，他在牛棚里一个挨一个地检查了母牛的牙床，看到了他的某个女人在自己窝棚的地上痛得几乎要散架，看到了接生婆已从她内脏中拽出一个湿乎乎的婴儿，颈上还缠着脐带，是个男孩，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将军阁下，随便，他答道，这时是十一点，如他统治期内的每一个夜晚，他清点了哨兵，检查了门锁，给鸟笼套上罩子，灭掉灯，这时是十二点，祖国很太平，世界已入眠，他在黑暗的宅子里穿过灯塔旋转交织的光线中一晃而逝的一个个黎明，向卧室走去，他把逃命用的提灯挂起来，把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通通锁上，随后坐在了移动马桶上，一边挤着屈指可数的几滴尿液，一边用手抚慰着患疝的睾丸，抚摸着那个无情的孩子，直到将扭曲的部分扶正，直到它在他手中入睡，疼痛才得以止息，一阵来自边疆硝石荒漠的风从窗口吹进来，一道惊恐划过，疼痛立即复苏了，卧室中有稚嫩人群的歌声碎片弥漫开来，他们问起一位奔赴战场的骑士他们哀叹太痛了太苦了他们爬上高塔盼他回来他们看到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太好了他在罩着天鹅绒的棺材里太痛苦了太哀伤了，这合唱的声音是那么

浩大那么辽远，他甚至要带着那是星星在歌唱的幻觉而入眠，但他在盛怒之下坐起身来，别唱了，他妈的，他吼道，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他吼道，结果是他们，因为破晓之前，他就下令将那些孩子塞进一艘载有水泥的船，把唱着歌的他们带至领海的尽头，他没有给他们留受罪的时间，就用一捆炸药在他们歌唱的时候将他们炸飞了，三位执行该命令的官员在他面前立正报告，将军阁下，您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他将他们晋升了两级又为他们戴上了忠诚奖章，但随后就把他们都枪毙了，一如处置其他不光彩的普通罪犯，因为有些命令可以颁布但不能执行，妈的，可怜的孩子们啊。这样残酷的经历证实了他确信已久的道理：一个人最可怕的敌人就在他发自内心的信任里，恰恰是那些他武装培养起来维持他政权的人，迟早会唾弃喂养他们的这只手，于是他挥手之间将他们消灭殆尽，又随性将另一些无名之辈晋升至高位，你，上尉，你，上校，你，将军，其他人，都是中尉，见鬼了，他看着他们成长直到膨胀得将军服绷裂，直到他再也看不住他们，诸如发现两千个儿童被软禁这类的意外事件让他明白，令他失望的不止一个人，所有最高级别的将领都是如此，他们除了会耗费我更多的牛奶，别的一概干不了，一遇上麻烦，他们就会往刚刚用来吃饭的盘子里拉屎，我生养了所有人，他妈的，是我取出肋骨才成就了他们，他为他们争得了尊严与面包，但却一刻不得闲地打压他们的野心，将最危险的人物留在身边加以最严密的监视，将最软弱的派去戍守边疆，为了他们，他接受了海军陆战队的占领，母亲啊，这不像汤姆森大使在官方声明中所写的，是为了战胜黄热病，也不像那些流亡政客所说的，是为了避免让他卷入公众骚动，而是为了教导我们的军人如何做一个体面人，事实就是这样，母亲，每个人都各有所得，他们教会他们穿鞋走路、用纸洁身、使用安全套，他们教会我要两手养兵，形成对抗，互为牵制，他们为我建立了国家安全办公室、总调查局、国家公共秩序部，还有那么多我自己都记不得名字的玩意儿，他

建立起名目各异而本质相同的组织，以便在风暴中以最轻松的方式取得控制，他令人们相信每个人正被另一些人监视，他在发给军营的弹药里混入海滩沙粒，制造与自己的真实意图截然相反的表象，然而他们还是会谋反，他咀嚼着胆汁泡沫闯入军营，滚开混账，管事的人来了，他在那些用我的肖像做靶子来考核射击的惊慌的军官之中吼叫着卸下武器，他不停地命令着，但仅凭声音中怒不可遏的威严，众人便自觉卸了甲，把那身人皮扒下来，于是众人褪了衣服，圣赫洛尼莫基地起义了将军阁下，他拖着他悲伤老人的巨大双脚进了大门，穿过两列仍将他尊为最高统帅的叛变了的警卫队，出现在起义指挥部，没有带卫队，没有携武器，却以爆燃的力量吼道，都给我趴下，无所不能的人来了，都趴下，杂种们，于是司令部的十九位军官都扑倒在地，他命他们在沿海村落匍匐前行，吃泥嚼土，好让大家看看脱了军服的军人还有什么用，狗娘养的，在混乱军营里的各种叫喊声中，他听到了自己不可违抗的命令：把发动叛乱的人都从背后枪毙了，在他们脚踝系上绳子把尸体倒挂起来日夜示众，让所有人都清楚唾弃上帝的人是什么下场，狡猾的浑蛋，然而祸事并未因这些血腥清洗而停息，因为只要稍不注意，他就会再次受到那长触角的寄生虫的威胁，他本以为已经将它连根拔除，它却又开始在他权力的西北风里繁殖，在各种必要的特权的荫庇下、在权威的面包渣中、在种种有利可图的信任间繁殖，这种信任他必须给予那些最骁勇的将士，哪怕有违他的意志，因为离开他们，他无以为继，而拥有他们，情况也是一样，他注定要永远呼吸那一团令他窒息的空气，他妈的，这不公平，就像他不可能一辈子忍受我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的突然惊吓：他绷着一张死人脸进了我的办公室，迫切地想知道我那两千个大奖儿童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们把他们淹死在了海里，他面不改色地说，别去听信那些卖国贼的造谣，兄弟，那些孩子正在上帝的平安中成长呢，他对他说，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那儿听到他们唱歌，说着，一只手

泛泛地画了个圈，指向宇宙中某个不确定的位置，连伊万斯大使在听到他的回答后也被卷入了一团疑云，因为他冷漠地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些孩子，贵国代表团都在国际联盟面前公证过了，学校里的孩子一个都没少，身体都健康，见鬼了，这破事已经过去了，然而他还是不能阻止半夜的消息将他惊醒，将军阁下，国内最庞大的两支驻军已经叛变，距离总统府两个街区的公爵领区也发生暴动，形势可怕极了，领头的是波尼文多·巴博萨将军，他已经有一千五百名军人的拥戴追随，他们武器精良，供应充足，装备都是从和反对派勾结的外交官那里买来的走私货，所以眼下的情况很是不妙啊将军阁下，咱们真的要完蛋了。如果是在其他时期，火山爆发般的造反一定会激起他冒险的热情，然而此时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的年纪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没有心力去抵抗他隐秘世界的灾难：冬日的夜晚，如若不一边温柔地哼唱睡吧我亲爱的，一边捧起那个孩子，捧起那发出痛苦哨声的睾丸疝气并将之抚慰一番，他便不能入眠，他坐在马桶上一滴一滴挤按灵魂，在仿佛是通过一个已因太多夜晚的孤独排尿而长满绿苔的过滤器进行的艰涩过程中，他的精神渐渐涣散，记忆也散了架，已经不再能精准地猜中谁是谁而又代表谁，他被一段无从避开的命运控制在一栋他曾经想搬离的失落之屋内，他曾想远离这里，搬去任意一处印第安人的居所，那里不会有人知道他曾经是祖国那么多个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的年头里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唯一的总统，然而，当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自告奋勇充当调停人以竭力向造反派争取体面的和解时，发现自己遇到的不是在会客厅中酣睡的痴滞老人，而是那个野牛本性的人，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没门儿，他不走，这不是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都在与咱们作对将军阁下，甚至教会都不例外，但他说不，教会是拥护当权者的，他说，最高司令们四十八小时前就聚集在一起，只是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要紧，他说，当他们明白谁给的钱更多时，你就能立马看到他们的决定了，民众反对派的头目终于

现身了，还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这样更好，他说，在武器广场的每个灯笼上都吊上一个人，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无所不能的，不可能的将军阁下，群众都拥护他们，胡说，群众都拥护我，除非我死，否则任凭什么都别想把我从这儿带走，他就这样决定了，像以往做最后决定时那样用他笨拙的少女之手敲了几下桌子，而后一直睡到挤奶的时间，醒来时他发现会客厅一片狼藉，公爵领区的造反派投掷了石块过来，已将东侧长廊砸得一块完整玻璃都不剩，而从破碎窗户扔进来的火球更是令府中的人整晚都惊恐万状，您是没看到啊将军阁下，我们一刻没合眼地拿着毯子提着水桶跑来跑去，忙着去扑灭不起眼的犄角旮旯的火焰，但他似乎浑不在意，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别管他们，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满是尘灰、碎烂地毯和烧焦的哥白林挂毯的走廊上拖着灵柩一般的双脚走着，但他们不会罢休啊，他们对他说，他们捎来消息说那些火球只是警告，一会儿就要轰炸了将军阁下，但他没有理会任何人就径直穿过了花园，来到最后一片树荫下，感受着初生玫瑰的声响，感受着海风中鸡群的骚动，我们该怎么办啊将军，我已经说了别管他们，他妈的，他如往常一样准时去查看挤奶的情况，于是公爵领区的叛军们如往常一样准时看到了拉着六桶牛奶的总统牛棚的木轮骡车，驾驶座上坐的仍是一直以来的那位车夫，他捎来口信说，即使诸位继续这样忘恩负义，将军阁下还是给诸位送牛奶来，他大声喊着，声音中的无限善意使得波尼文多·巴博萨将军下令收下牛奶，条件是车夫需要试喝以保证牛奶未被投毒，于是铁门打开了，一千五百名叛军将士都从天井阳台探出身来，他们看到了骡车行到墁着石砖的院子中央，看到了一名勤务兵手持罐子和大勺爬上驾驶座向车夫递上试喝的用具，看到了他掀开第一个桶盖，看到了他在炫目爆燃的一瞬滞流中漂浮，那凄郁的黄色泥浆建筑在六桶炸药的可怖爆炸中化作瓦砾，在空中悬留了一刻，他们在那不会再生长任何花朵的地方如火山喷发般的滚烫中，直至时间的尽头都没有再看到别的东西。他在总

统府感叹道，就是这样，那堪比地震引发的冲击气流摧毁了距离领区最近的四栋房子，震碎了城郊婚礼的橱柜玻璃，也让他不由得战栗，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垃圾车从港口碉堡的天井中运走那十八具为了节省弹药而两两一串枪毙的军官尸体时，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在他面前立正报告将军阁下，监狱里又没有地方关押政治犯了，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喜乐的钟声敲响、节庆的焰火燃放、荣耀的音乐奏起，宣告又一个和平世纪的到来时，他感叹道，就是这样，他妈的，麻烦过去了，他说道，他如此确信这点，如此自我放松，又如此疏于保护自身安全，乃至有天早上挤奶回来穿过庭院时，他的预感本能居然失灵了，他竟没能及时发现那个从玫瑰丛中站起身来、在十月的绵缓细雨里截住他去路的假麻风病人，当他看到那把烤蓝左轮手枪一闪而过的光亮时已经太晚，那个食指开始扣动扳机，于是他张开双臂，挺起胸膛对着他喊道，来呀，你这杂种，来呀，心下却困惑这已经到来的一刻怎会与水盆中再清晰不过的预言相悖，你有种就开火啊，他吼道，就在那难以察觉的一瞬踌躇间，一颗苍白的星在刺杀者眼中的天空亮起，他的嘴唇枯萎了，意志颤抖了，于是他趁机紧握双拳朝对方的鼓膜挥去，出其不意地将他放倒，而后又以木槌捣物的方式猛踢他的下颌令他瘫软在地头晕目眩，这时他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嘈杂声响，是卫队听到他的吼叫匆匆赶来了，为了避免活着落入总统卫队可怕的审讯官手里，假麻风病人用左轮手枪朝自己肚子连放了五枪，在一片血泊中扭动挣扎着，他走过那接连发出五声巨响的蓝色火光，在府内的骚乱中听到了自己不可违抗的命令，把他分尸，以示警告，于是他被剁成肉块，被石盐水浸泡的脑袋在武器广场示众，右腿在东陲的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左腿在无限西部的硝石荒漠，一只手臂在荒原，另一只手臂在雨林，躯干切分成块在猪油里炸过后日夜暴露在外，直到白骨一如这黑人窑子里的不安和困苦般袒露无遗，好令每一个人都知道举手反对他们的父亲会

有何下场，他带着仍未平息的怒火穿过玫瑰丛，总统护卫队正在那里用刺刀清除麻风病人，看看他们到底露不露脸，狡猾的浑蛋，他踹开瘫痪患者上到主层，看看最后他们能不能搞清楚是谁让他们的妈生孩子的，婊子养的，他从楼道里张皇失措的办公人员和宣称他不朽的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之中穿过，吼叫着都他妈的让开，管事的人来了，他在府中沿路如抛掷石头般留下了一串仿佛火炉声响的粗重喘息，随后消失在会客厅中，以闪电之势遁向私人寝室，他走进卧室，将三把门环、三个插销、三道门闩一一锁上，而后用指尖将浸满粪便的裤子剥了下来。他一刻不停地在周围嗅探，试图找出那个指使假麻风病人的隐秘敌人，他感觉到他就在自己身旁，是一个极其贴近他的生活、甚至知道他的蜂蜜藏在哪里的人，一个无论何时何地眼睛都盯着门锁、耳朵都贴着墙面好像我的画像似的人，一个在一月的信风里吹着口哨飘忽出现的人，他在一个个炎热的夜晚透过茉莉花丛的炭火认出了他，这个人在失眠的恐惧中拖着幽灵的可怖脚步一个月一个月地在黑暗宅邸最隐秘的房间里尾随着他，直到一个多米诺骨牌之夜，他看到征兆化作了一只若有所思的、用一对儿五结了牌局的手，那时身体里仿佛有个声音向他透露，这只就是背叛之手，他妈的，是他，他困惑地自语道，而后抬起双眼，透过桌子中央吊灯的一束光芒，看到了我的灵魂伴侣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那双美丽的炮兵的眼睛，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啊，他的坚实臂膀、他的神圣同谋，这不可能，他寻思着，然而越是深入辨别那虚假真相中的阴谋，他就越是痛苦不堪，原来多年来他们一直借这些假象转移他的注意，好掩盖那残酷的真相：我终生的兄弟是在替那群有钱的政客效力，而那些政客本是他当年出于利益考虑，从联邦战争最隐晦的角落中挑选出的，他令他们发家致富，赐他们惊人特权，任自己被他们利用，容忍他们借他之势扶摇而上，攀上当初被自由派的旋风扫落的旧时贵族做梦都不敢想的高位，然而他们还想要更多，他妈的，他们想要上帝选定的、他留给自

己的位子，他们想成为我，畜生，他仗着得宠，仗着自己是唯一可以向他提交文件进行签署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积蓄了最多的信任和权威，因为他能提出冷静而睿智的方案，他本人又无比精明谨慎，所以才让他来高声宣读只有我才能签署的紧急命令和部级法律法规，他会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用大拇指画押，再在下方用戒指盖上印章，随后将这枚印章戒收在一个只有他知道密码的保险箱中，祝您健康，兄弟，每次签署完文件交给他时，他都会这么说，给您点儿擦屁股纸，他笑着说，就这样，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在一个膨胀的、硕果累累堪比我的权力的权力中筑起了另一个权力系统，即便这样他仍不满足，进而接受了他逛荷兰窑子的伙伴与剑术老师诺顿大使毫无保留的扶持，与他暗中谋划，一起促成了公爵领区的叛变，正是诺顿大使借着外交豁免权的保护，把军备物资装在运送挪威鳕鱼的木桶内走私进来，同时又在多米诺骨牌桌上香薰蜡烛的芬芳里奉承我说，再也找不到比我的政府更友好、更公正、更模范的政府了，也是他们，将左轮手枪连同五千比索现金的一半交给了那个假麻风病人，后来我们在行刺者的家中找到了这笔被埋在地下的赃款，而另一半酬劳本来要在事后由我终生的兄弟亲自给他的，母亲啊，看看这多让人心酸，然而到了这一步他们仍没有认输，最终酝酿出了不掉一滴血的完美一击，连您都不会流血将军阁下，因为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已经搜集到了无懈可击的证据，证实我整夜不睡，在黑暗里与宅子中的花瓶、与显贵及大主教的画像聊天，证实我为母牛量体温、喂食非那西汀给它们退烧，证实我用仁慈的双眼望到三艘停泊在窗前的帆船时臆想出一个海军司令并为他建造了一座陵墓，证实我因为克制不住邪念，挥霍公款去购买精巧的机器，甚至试图让天文学家扰乱太阳系规律，只为取悦仅存在于他迷妄幻觉中的选美皇后，证实我在一次老年痴呆症犯病时下令将两千个孩子塞入一艘装载水泥的船中并在海里炸掉了它，母亲啊，您想想，真是帮婊子养的，依据那些庄严证词，罗德里

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和总统护卫队的最高司令部一致赞同于接下来这个三月一日的午夜，在一年一度纪念保镖的守护神圣守护天使的晚宴上将他关押到峭壁上的杰出老年人收容所中，也就是说在三天之内，将军阁下，您想想吧，尽管这场大阴谋已是剑拔弩张且来势汹汹，但他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仿佛还不知情，他在预定的时间如往年一样迎接了他的私人卫队，安排他们入席享用开胃菜，同时等待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前来敬酒，他和他们谈笑风生，而军官们则一个个好似漫不经心地偷偷看表，将表放在耳边，又给它们上弦，差五分就十二点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还没有来，这时飘来一阵花香味的船舶锅炉的热气，嗅起来像黄菖蒲和郁金香，像闭塞屋内的鲜活玫瑰，有人开了一扇窗，我们透了口气，看了看表，感受到了一丝来自海洋的、有着婚礼菜肴香柔味道的纤薄气息，我们所有人都在冒汗，只有他除外，我们都挨受着那一刻的憋闷，因为那头老迈的动物正在留存于另一个世代的自己的空间中睁开炯炯的眼睛，释放着纯净的火光，干杯，他说道，那只瘦弱百合一般的不容反抗的手又将酒杯举了起来，他整晚都在敬酒却一口都没喝下，在最后的深渊的静寂中，可以听到手表机械内脏的声响，十二点了，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仍旧没有现身，有人试着站起身来，请，他说着，给了他致命的一瞥，以警告没有我的允许十二点钟声敲完之前谁都不能动、不能呼吸、不能活，于是那人瞬间怔在了那里，然后窗帘拉开了，尊贵的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大将军躺在与他身长相当的银质托盘中被端进了屋，身下还铺着花椰菜与月桂叶组成的配菜，他在调料中腌得瘫软，在烤箱中烤得金黄，身上套着出席庄重场合穿的饰有五颗金杏仁的制服，半袖上佩着一枚枚因无比英勇而被授予的肩章，胸口摆放着十四磅的奖牌，嘴上搁着一小把欧芹，只待切割匠人在这战友们的宴会上，在惊惧得石化了的客人面前将它们切分、装盘，我们屏息见证了这场精致的分尸与分享仪式，当每个盘子中都盛有一份分量相同、有

着松仁与香菜做馅儿的国防部长后，他下达了开饭的命令，祝各位好胃口，先生们。

---

[1]拉丁美洲一些地区对本土西班牙人的蔑称。

他逃过了那么多陆上的劫难，那么多不祥的日月交食，那么多空中的火球，以致在我们的时代里，似乎不可能还有谁去相信纸牌对他命运的预测。然而在收拾尸首、为它涂抹防腐油的过程中，就连我们这些满心猜疑的人都在默默企盼着古老的预言成真，比如像其中一个预言所说的那样，在他死的那天，沼泽烂泥将溯源回流，天将降血雨，母鸡将下五角蛋，死寂与黑暗将再次笼罩宇宙，因为他是世间万物的终结者。人们不可能不信这些，因为少数还在发行的报纸仍然努力用旧时资料宣扬他的永恒，编织他的光辉，于静止的时光里日复一日地在头版中展示他穿着那身脱不掉的、别有他鼎盛时期的五个悲凉太阳徽章的制服的形象，尽管我们早已数算不清他的年龄，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威严、勤勉、健康，在一幅幅惯常的画面中，他又开始参加著名纪念碑或是没人真正见过的公共设施的落成仪式，又开始主持据称是昨日实际上是上世纪举办的盛大活动，然而我们都清楚那不是真的，因为自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暴亡之后，再没有人在公开场合看到过他，他从那时起便独自留在了那座无主之屋，政府的日常工作仅凭他无边权力多年的惯性自行运转，他直到死都将自己封闭在那座乱糟糟的宫殿中，而眼下我们正透过这里最高的窗，心情压抑地望着那个黄昏，那个他必曾千百次地从他的虚幻王位上望见的凄郁黄昏，我们看到灯塔时断时续的光，看到它以慵懒的绿水淹没废墟中的厅堂，我们看到蛋壳般的屋舍中穷人的灯火，这些屋舍从前是各个部委珊瑚礁般的日光玻璃楼，在我们经历的另一场飓风将港口山丘上的彩色棚屋夷为平地后，群起的穷苦人将它们侵占，我们看到在下方铺散开来的雾蒙蒙的城市，在那片已被出卖的遍布覆着尘灰的火山口的

海上，我们看到一道道苍白的闪电划过顷刻即灭的地平线，看到第一个没有他的夜晚、他的如湖泊一般满是带疟疾病原的银莲花的浩瀚帝国、他的泥浆支流三角洲处的炎热村落，以及他的一个个私人省份中围起的贪婪的带刺铁丝网，网中繁育着不计其数的新品种的优质母牛，它们生来就遗传了总统烙铁的印痕。最终，我们不但彻底相信了他注定可以活到第三颗彗星的降临，而且被这种确信灌注了平静与安全感，为了遮掩这种感受，我们想方设法地开起关于老年的玩笑，我们说他拥有乌龟的长寿和大象的习性，我们在饭馆里大谈有人告知国务院他的死讯，所有部长都吓得面面相觑，惊恐地互相询问该由谁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哈，哈，哈，事实上，知不知道这则消息对他来说无所谓，而且他自己都不清楚这街头笑话是真是假，因为当时唯有他知晓，在他记忆的孔洞里只剩下往日散落的残迹碎片了，他在这世上是孤身一人，耳聋如一面镜子，他拖着沉重而老迈的双脚走在阴森的办公室中，在那里，一个穿着浆过领子的长礼服的人用一块白色手帕冲他做了个谜一般的暗号，再见，他对他说，于是一时的误解变成了法令，总统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在他经过时都不得不持白色手帕起立，走廊里的哨兵、玫瑰丛中的麻风病人也持白色手帕向他告别，再见将军阁下，再见，但他听不见，自从那些追悼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傍晚过后，他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只觉得笼中的鸟雀因过度歌唱而失声，于是为了让它们叫得更响亮，他喂它们吃自己的蜂蜜，还用滴管往它们的喙中滴润喉药水，并给它们唱其他时代的歌曲，一月的明亮月光，他会这样唱着，因为没有察觉到并不是鸟雀丧失了歌唱的能力，而是他自己的听力每况愈下，直到一个晚上，他鼓膜的嗡鸣破碎了，结束了，变成了泥浆般的空气，其中只有来自权力暗影的虚幻航船的告别挽歌还会飘过，只有想象中的风还会吹拂，只有内心的鸟雀还会喧闹鸣叫，并最终于现实中鸟雀寂静的深渊里安慰着他。那时，极个别获准进入民政大楼的人会看到他坐在三角梅花廊下的柳木摇椅

上，忍受着午后两点的闷热，他已解开了军服上衣的纽扣，卸下了军刀和祖国色彩的皮带，脱去了靴子，但仍穿着那双紫色长袜，那是当年教皇送给他的，总共十二打，都出自他的私人织袜工之手，而隔壁学校的女孩总会爬上后门防卫稍松懈的土坯，令他从无眠的困倦中惊醒，他面色惨白，太阳穴处贴着草药，身上是透过藤蔓洒落的一道道阳光照出的虎皮纹路，好似池底一只仰面朝天的迷醉的蝠鲼，大老粗，她们会这样冲着他嚷，而他眼中的她们一个个在热气中光的折射下扭曲，他会对她们微笑，挥动没有戴缎面手套的手致意，却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他能感受到海风中虾和泥的恶臭，能感受到母鸡在他脚趾上的啄咬，却感受不到知了清晰的鸣叫，听不见女孩的叫嚷，什么都听不见。那时，他与这现实世界的联系仅剩最恢宏记忆的零星碎片，是它们，在他脱离了政务之后、在他于权力边缘的无知状态里浮游时维系着他的生命，只有凭借它们，他才能于傍晚在这座荒宅里漫步时，直面他过长的岁月吹来的毁灭之风，他会藏身在灭了灯的办公室中，撕下记事本的白边，在上面用他的花体字写下最后记忆的多余渣滓来抵御死亡，一个晚上，他写下了我叫撒迦利亚[1]，然后在灯塔忽闪的光亮中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又念了很多遍，最终那个被重复多次的名字竟让他觉得遥远又陌生，真他妈见鬼，他自言自语着将纸条撕碎，我就是我，他对自己说，接着又在另一张纸条上写他在彗星再次划过时已满百岁，尽管那时他不确定自己是第几次看见它划过了，他凭记忆在另一张更长的纸条上写道，向伤者致敬，向在外国人手里遇害的忠诚战士致敬，有那么几个时期，他会将所想的、所知道的通通写出来，他曾在一张纸板上写不许在侧所里干饿心的事，并用大头针将它钉在厕所的一扇门上，因为有一次他不小心开了那扇门，撞见一位高级将领正蹲在粪坑上自慰，他将自己仍记得的寥寥几件事情写下来，以确保永远不会忘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写道，我

唯一的合法的妻子，她曾在他朽迈的年岁里教他读写，他拼命想忆起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想再一次看到她撑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塔夫绸阳伞，看到她颈裹第一夫人的银狐尾毛领，但他能记起的，却只是午后两点的蚊帐中那粉尘般的朦胧光线下她赤裸的模样，他记起了你温顺而惨白的胴体在电风扇嗡鸣中的和缓宁静，他感受到了你活泼的乳房、你母狗般的味道和你那见习修女的凶残双手发出的侵蚀声响，这双手能让母牛断奶、让黄金氧化、让花朵凋零，但对爱情来说却是上好的，因为只有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脱了你的靴子，别弄脏了我的比利时短纤维亚麻布床单，于是他便脱了下来，摘下你的背带，它的扣襻弄得我心脏直疼，于是他便摘了下来，把你的军刀、疝气袋、绑腿都卸下来，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脱下来吧宝贝，我都感觉不到你，于是他为了你把一切都脱了下来，这是他以前没有做过以后也不会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之外的任何女人面前做的事，我唯一的合法的爱，他叹息道，他将这哀叹写在发黄的记事本纸条上，把它们如烟一样卷起来，藏在屋中最令人料想不到的缝隙中，只有他能找到它们，并在什么都记不起的时候靠它们想起自己是谁，甚至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形象最终都顺着记忆的下水道溜走时，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它们，而那时他所剩的唯有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坚不可摧的记忆，他仍会记得她在郊区宅院那些个离别的午后的样子：他那垂死的母亲为了不让他发觉她正在死去，仍用加拉巴木瓢摇着玉米粒，发出招引鸡群的声响，为了不让他怀疑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仍会把果汁给他送到挂在罗望子树间的吊床边，他这独自怀上他、独自生下他的母亲正在孤独地渐渐腐烂，直到那孤独的痛楚愈演愈烈，终于让她的骄傲不堪承受，她才向儿子请求说，你帮我看看后背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烫，烫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她把罩衫脱下，转过身去，他在喑哑的恐惧中看着那因湿热的溃疡而受尽折磨的脊背，看着那如番石榴果肉般的患处裹着蛆虫的小水疱正在破裂。

那真是段糟糕的日子啊将军阁下，没有任何国家机密不被公众掌握，而且自从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精美的尸体被呈上晚宴餐桌之后，再没有哪项命令会被精准地执行，不过他不在乎，他不在乎那几个苦楚的月份里权力所遭遇的阻挠，因为那时他的母亲正在紧挨他寝室的卧房里受尽煎熬、慢慢腐烂，对亚洲病菌最有研究的医生已经下了诊断，她患的不是鼠疫，不是疥疮，不是热带莓疮，也不是其他任何东方疫病，她是中了印第安人的巫术，只有下咒的人才能治好它，于是他明白了，那是死亡，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以母亲的忘我精神照顾着他的母亲，和她一起腐烂，以免别人看到她正在蛆虫的肉汤里煎煮着自己，他命人将她的母鸡带到民政大楼，他们还带来了孔雀和随后在厅堂与办公室中随意来去的上了色的鸟雀，以免他母亲挂念郊区宅院的农活，他亲自在卧室里点着了胭脂树的树干，以免哪个人嗅到他垂死的母亲临别时的腐臭味道，又亲自用杀菌油抚慰她因红药水而红、因苦味酸而黄、因亚甲蓝而蓝的身体，他不顾憎恶巫术的卫生部长的反对，亲自用土耳其香脂涂抹她湿烂的部位，真他妈见鬼，母亲啊，要是咱们一起死就好了，但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十分清楚，她是唯一正走向死亡的人，于是试着向儿子揭开她不想带入坟墓的家族秘密，向他讲述了他的胎盘怎样被扔去喂猪，主啊，为什么我没法确定郊区那么多个在小路上逃亡的人里谁才是你的父亲，她试着揭开历史，告诉他她怀上他时是站着的，连帽子都没摘，因为在酒馆后屋，在发酵糖浆的酒囊外有无数金属色的苍蝇滋扰，她于八月的一个黎明在一座修道院的门厅中艰难地将他产下，借着穿过天竺葵的仿如悲伤的竖琴琴弦的光线，她仔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的右睾丸大如无花果，吐气时好似一个鼓风袋，呼吸中还伴着风笛般的叹息，她用见习修女送她的破布条将孩子裹起来，带到集市广场上给众人看，希望能找到除了大家唯一推荐的蜂蜜之外，更好、最重要的是更便宜的医治他畸形的方法，大家说着陈词滥调让她宽心，人不该揣测命运，

他们对她说，说到底，这孩子什么都能干，只不过不能吹奏管乐器而已，他们对她说，只有一位马戏团的算命师猛然发现这初生儿竟没有掌纹，这说明他注定是要做一国之君的，事实的确如此，但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只央求她睡觉，别再追究过去，因为对他来说，相信祖国历史中的那些小插曲不过是高烧中的胡话倒会让他更舒服一些，睡吧，母亲，他央求道，然后从一堆他命人做好的麻布床单中拿出一条将她从头到脚裹了起来以免伤到患处，他让她侧身躺下，把她的手放在心上，安慰她说，别去想伤心的破事了，母亲，不管怎样我都是我，您安心地睡吧。公务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却平息不了民众关于族母长正在溃烂中走向死亡的传言，于是便开始散布编造的医学诊断，然而，正是那些发布公告的信使证实了所澄清的谣言就是真相，证实了在那垂死之人的房间里，腐烂的气味浓烈得都令麻风病人恐惧，证实了需要宰杀绵羊用活血为她泡澡，证实了她的床单上会沾满由她的溃烂患处分泌出的能变色的物质，无论怎么清洗都无法还原布面本来的色彩，证实了再也没有人在牛棚中看到过他，也没有人在他妾侍们的房间中看到过他，而想当初，即使在最糟糕的年代，清晨时分也总能在那儿找到他，大主教亲自过来了，希望为弥留之际的她做临终圣事，他却将他拒之门外，没有人要死，神父，别听信谣言，他对他说，尽管在房间内吸着疫病诊所气味的空气，他还是会和她用同一把勺子分享同一个盘中的同一份食物，把她放上床之前还是会用犬类除蚤皂为她沐浴，她用最后的残喘之声发出的指示令他的心脏酸楚得几乎停止跳动，她希望自己死后那些动物可以被妥善照顾，希望孔雀的羽毛不会被人拔下来做帽子，好的母亲，他说着用一只手将克勒奥林液抹遍了她的身体，过节的时候，别逼着那些鸟儿唱歌，好的母亲，他拿起睡觉用的床单把她裹好，要是打雷的话，让他们把母鸡从窝里拿出来，省得它们孵出蛇怪来，好的母亲，他帮她躺好，把她的手摆在她的心上，好的母亲，安心睡吧，他吻了吻她的额头，趴在床边的

地面上睡了仅剩的几个小时，他悬浮在梦的漂流中，悬浮在愈发逼近死亡而愈益盛大的无尽迷妄中，他在夜夜积聚的怒火里学着去承受那个悲痛礼拜一的无边怒火，那天的黎明时分，世界的可怖岑寂将他惊醒，我的生命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停止了呼吸，于是他展开了她令人恶心的身体，伴着第一声鸡鸣时的微弱光线，看到了被画在床单上的另一具一模一样的将手放在心上的身体的侧影，那画就的躯体既无疫病的裂痕亦无衰老的伤损，它坚实而光润，仿佛用油画颜料在裹尸布的两面画出，还透着娇嫩花朵的自然芬芳，净化了这间病房的气息，无论用碎石揉搓还是碱水熬煮，那影像都无法从床单上除去，因为它已经从正反两面渗进了麻布，与织料融为一体，而那块麻布又是永恒的，但他没能静下心来思索这是一个多大的奇迹，而是愤怒地一摔门离开了卧室，那动静仿佛一声枪击回响在整座宅子中，就在那时大教堂敲起了哀悼的钟声，其余教堂紧随其后，举国上下每个教堂都敲响了百日无歇的钟声，被吵醒的人们绝望地明白他又做回了他全部权力的主宰，而他内心被死亡触发的盛怒压抑着的谜团则会借着空前的强劲力量蹿升，与一念间的理性、尊严和宽容针锋相对，因为我的生命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二月二十三日礼拜一的凌晨死了，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混乱而躁动的世纪。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老到见证过那次死亡，但葬礼的喧嚣巨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有可靠消息，他在余生中将不再与以前一样，在百日官方服丧期与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有权搅扰他那孤儿的失眠，也没有人再在那栋弥漫着丧钟无休止的辽远鸣响的伤痛之宅里看到他，他的时间被哀痛占尽，他长吁短叹兀自言语，府中的卫兵只能如他统治初期那般赤脚行走，在这所禁苑内，唯有母鸡可以为所欲为，因为这儿的君主已经隐身，他坐在柳木摇椅上愤怒地流着血，而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躺在一副棺材中，躺在以防她比活着时腐烂得更厉害而铺放的锯末和碎冰间，在那片悲惨炽烈的不毛之地

前行，因为那具躯体被带去进行了一场庄严的游行，直至他王国中最荒芜的边疆，好让所有人都享有追思致敬的殊荣，他们伴着颂歌和飘扬的黑丝带将它送至高地荒漠中的车站，在那里，仍是同样的沉郁人群与同样的哀乐迎接它，一如荣光年代里他们来见识他藏在总统阴暗车厢中的隐蔽权力时的情形，他们于仁爱修道院中展出了那具躯体，在那里，在时间的初始，一位无名养鸟人艰难地产下了一个没有父亲而最终成为皇帝的孩子，一个世纪以来，圣殿的大门第一次打开，骑兵队在村子里圈起印第安人，挟持了他们，挥着枪托把他们驱赶进教堂中庭，冰冷的日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了进来，平添惨淡与落寞之气，有九位主教正唱诵着熄灯礼拜经文歌，在你的荣光中安睡吧，执事和信徒唱道，在你的骨灰中安息吧，他们唱道，教堂外雨水打在天竺葵上，见习修女将甘蔗酒配亡灵饼分发给众人，还在庭院中的石拱廊下贩卖排骨、念珠和小瓶的圣水，路边酒馆中放着音乐，外面放着烟火，门厅里有人跳着舞，从现在直到永远都是礼拜日，那些年人们一直在逃亡的小径和雾气氤氲的隘道上欢庆节日，而我的死亡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生前就是沿着这些地方追随她那沉迷于联邦制风潮的儿子的，她在战火中照顾他，在他裹着毯子瘫在地上时拦住要从他身上踏过去的军方骡队，那时的他因患间日疟发高烧而失去意识，满口胡话，她试着向他念叨自己由来已久的恐惧，她害怕那些阴森的海滨城市里埋伏在荒漠人周围的各种危险，她害怕总督，害怕雕像，害怕喝新生儿眼泪的螃蟹，她透过那个袭击之夜的雨幕，第一次见识到了权力之屋的巍峨并为之战栗，那时她不曾料到这就是她要死在其中的房子，是他要居于其中的孤独宅院，是他怒火中烧趴在地上自问的地方，母亲啊，你他妈的钻到哪儿去了，是哪一丛大萍把你的身子缠起来了，是谁把你脸上的蝴蝶吓跑了，他哀叹着，伤心得跪倒在地，与此同时，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则在香蕉叶的荫翳下穿过令人作呕的泥沼臭气前行，好在郊区的公立学校中、在硝石荒

漠的军营内、在印第安人的院子里被展出，他们将她带到大宅院中展示，旁边配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还年轻、瘦弱、美丽，当年那位欧洲王室御用的威尼斯摄影师为她拍摄第一夫人的官方肖像时，人们给她在前额戴上了王冠，又违背她的意愿给她系上了蕾丝饰领，并且仅此一次往她脸上抹了滑石粉、在她唇上涂了红唇彩，他们往她手里塞了一枝丝绸做的郁金香让她这样拿着，不是这样，女士，是这样，要不经意地放在膝头，这幅与尸体一同展出的肖像当年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压倒了任何有关政权将更迭的猜疑，而现今她的模样与照片上的没有分毫差别，因为不曾留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余地，当化妆品日渐脱落、当龟裂皮肤上涂抹的石蜡在酷热中融化时，会有人暗暗重整这副躯体，雨季里会有人清理她眼睑上的苔藓，军队女裁缝会保养丧服，令它仿佛昨日才穿上的一样，还会打理橙花皇冠和她在世时从未戴过的处女新娘头纱，令它们永放光彩，这样一来，在这个崇拜偶像的下贱地方，没有谁敢再说你和你照片中的样貌不一样了，母亲啊，这样一来，没有谁敢忘记是谁在统治，统治到时间的尽头，统治到雨林中的沙丘和那些最贫困的村落，那里的人被遗忘了多年之后，在一个午夜看到了那艘灯火通明的陈旧的木轮航船，于是敲响了复活节之鼓，以为荣光年代再次到来了，硬汉万岁，他们喊道，以真理之名而来的人万福，他们喊着，带着肥硕的犰狳和大如阉牛的南瓜扑进水里，他们爬上木刻栏杆，向那个无形的权力、向那个其骰子能决定祖国运势的权力恭顺地奉上贡品，当他们看到总统餐厅里数面惊愕的镜子中反复映现的那张铺着碎冰和石盐的灵台时，都屏住了呼吸，风扇扇叶下的灵台就那样暴露着，任人审视，而载着它的破旧愉快的航船月复一月地在一条条赤道支流上、在一座座一晃而过的岛屿间前行，直至迷失在一个噩梦年代中，在那个年代里，栀子花被用作理性判断的依据，鬣蜥在黑暗中飞翔，世界终结了，木轮在黄金沙滩搁浅了断裂了，冰块消融了，盐粒腐坏了，那副肿胀的躯体在铺满锯末的水汤中

随波漂浮却没有腐烂，恰恰相反将军阁下，那时我们看到她睁开了双眼，看到了她的瞳孔澄澈，呈现一月里乌头的颜色，还有乌头月光石般的特质，即便是我们这些最不易轻信的人都看到了灵台的玻璃罩因她呼出的气而朦胧，看到了从她的毛孔渗出的富有生气的清香汗液，看到了她在笑。您都没法想象那场景将军阁下，那真是奇妙啊，我们看见骡子下崽儿，看见硝石荒漠上开出花，看见聋哑人因自己奇迹般的叫喊惊呆，奇迹啊，奇迹啊，为了瓜分圣骸，大家将棺材玻璃砸得粉碎，差点把尸体扯成块，于是我们不得不安排一个营的投弹手来抵挡狂热的人群，因为自从整个加勒比的海岛都被那个消息迷住，就是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灵魂从上帝那里获得了逆自然规律而行的能力的消息，从那之后，人们便蜂拥而至，他们贩卖裹尸布上的线，贩卖披肩，贩卖她身旁的水和印着她皇后肖像的图，那躁动之势异常疯狂，他们就像一群咆哮而来的失控的公牛，所到之处无不被踩烂踏碎、无不震颤轰鸣，甚至只要您仔细听，在这里都能听到那声响，您听听看，他将摊开的手掌放到那时嗡鸣已减弱的耳朵背后，仔细听着，于是听到了，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他听到了无尽的轰响，看到了那一直延伸到海平线的宽广人群形成的沸腾泥沼，看到了正午清晰的明亮中席卷着另一个更加明亮的日子的烛光洪流，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回到了旧时所恐惧的城市，那情形与她随着战争中的骚乱人群、随着战场上的生肉味儿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但后来她永远脱离了世上的危险，因为他下令撕毁了学校课本中所有关系到总督的页面，令他们从未在历史中存在，他还查禁了搅扰你梦境的雕像，母亲，于是现在她被和平的群众扛在肩上归来了，不再怀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她归来了，没有棺材，直面天空，在禁止蝴蝶入内的空气里，隐没于黄金供品的重量之下，那些供奉都是人们在那场从雨林边界出发、穿越他辽阔而躁动的沉痛王国的无止境的巡游中挂在她身上的，于是她淹没在痊愈的瘫痪患者给她挂

上的金质小拐杖中，淹没在海难亲历者给她挂上的金质星星中，淹没在不能生育的女无神论者在灌木丛后紧急分娩完给她挂上的金质婴儿像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将军阁下，她在那场迫使举国上下都进行了一如圣经所记载的迁徙的洪水中心随波逐流，所有国民都找不到地方来安置她的厨具、她的动物和一个除了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秘密祷文之外不再有任何救赎希望的残存的生命，当年在战火中，她曾念着相同的祷文祈求向她儿子射来的子弹扭转方向，他在战乱中头裹血染的绷带，于高烧引发的神志错乱的清醒间隙大喊他妈的自由党万岁，必胜的联邦制万岁，狗屎哥特佬，尽管他投身战斗的实际动力源自他返祖式的好奇心：想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只是抬着他母亲的躯体侵入这座城市的大群贫苦人远比联邦战争的冒险中那些洗劫了整个国家的人更激荡更狂暴，他们比蚁害更贪婪、比动乱更可怖，他们是我的双眼在他掌权的无数年中所见过的最慑人的东西，整个世界啊将军阁下，您看，多么美妙。他被毋庸置疑的证据说服了，终于走出哀痛的迷雾，面色苍白、行动僵硬、臂上戴孝地走出来了，开始不遗余力地施展威权，以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圣徒美德为依据，推举她为圣徒，他派手下的文书部长去罗马，再次邀请教皇使节前来，在三角梅花廊下的一缕缕阳光中吃饼干喝热巧克力，他以惯常的方式接待了他，卧在吊床上，没穿衬衫，用白帽子扇着风，而教皇使节则坐在他对面，手里端一杯滚烫的巧克力，全然不顾他的礼拜日教士袍散发的薰衣草气息里的阵阵热浪与尘埃，不顾热带的颓丧，不顾那死去母亲的鸟雀在棚屋下荡漾的光线里肆意翻飞排便，只小心翼翼地啜饮着香草巧克力，带着新娘般的羞涩咀嚼着饼干，试图拖延上一口巧克力中不可避免的毒药的发作时间，僵直地坐在他从未让别人坐过的柳木安乐椅上，我只让您坐，神父，在荣光年代里一个个锦葵色的午后，另一位天真老迈的使节试图用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谜题来说服他皈依基督，只不过现在请求皈依的人是

我，神父，这是世界运转的方式，现在我相信了，他说道，而后毫不犹豫地重复了一遍，现在我相信了，虽然事实上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或是其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只相信，我的生命他的母亲以她自身的美德，以她的奉献精神和模范式的谦卑，有权领受祭坛上的尊荣，作为要求封圣的依据，他并没有搬出坊间虚张声势的说法，什么北极星在向着送葬队伍行进的方向移动、衣柜中的弦乐器能感觉到那具遗体经过并自动拉奏乐曲，而是把那张床单铺开，将它的奇美呈现在八月的艳阳下，希望教皇使节能够看清他真真切切地看到的印在麻布织物上的图样，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侧身而卧的形象，既无衰老的印迹亦无疫病的伤损，一只手放在心上，他感受到了她手指上永恒的汗液，在鸟雀被奇迹之风鼓动得骚乱不安时呼吸到了馥郁的花香，您看多美妙啊，神父，他一面说着，一面轮番展示着床单正反面，甚至连鸟儿都认识她啊，但教皇使节以犀利的眼光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块麻布，过去，正是凭借这种犀利他才得以辨清那些出自基督教大师之手的作品材料上的火山灰杂质，并依据颜色的深浅识出画师们性格上的瑕疵甚至信仰上的疑惑，他在一个时间不会流逝只是漂浮的虚幻城市中某座小圣堂的拱顶下平躺着经受了地球之圆带来的神迷状态，他这样沉思凝视着，直至鼓足勇气才将目光从床单上移开，并用轻柔却无可挽回的语气对他道出了自己的见解，麻布上所印的身体并不是神圣天父为了证明他的无限仁慈而施下的神迹，它不是，一点儿都不是，它是一个精通技艺也谙熟骗术的画家的作品，他玷污了阁下您的伟大心灵，因为那并不是油画，而是最廉价的装饰画，是用抹窗框的涂料画的，阁下，在已经渗透于画中的天然树脂味儿底下，还残留着松节油的低劣露珠，残留着灰泥干，残留着一种持久的湿润，那不是他们告诉他的死亡前的最后一个寒噤的冷汗，而是将麻布浸入亚麻油里并藏在暗处做出来的，相信我，我也深感遗憾，教皇使节真切而沉重地总结道，他没敢说更多，而那个花岗岩般的老

人在吊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于阴晦的亚洲的安静泥沼中听他说着，他甚至没有开口辩驳，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床单上玄妙奇迹的真相，是我亲手将你裹在里面的啊，母亲，你死后最初的寂静吓到了我，仿佛世界是从海底迎来了黎明，我看到了那个奇迹，他妈的，但即便如此笃定，他也没有去打断使节的论证，他如鬣蜥一般在不闭眼睛的情况下眨了两次眼，只是微笑着，没关系，神父，最后他哀叹道，也许您说得对，但我警告您，您要承担您言论的后果，我再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一遍，这样在漫长的余生里您就不会忘记了，您要承担您言论的后果，神父，我不负责。在那个充满凶兆的礼拜中，整个世界都停滞在了困顿里，他没有下过吊床，甚至连吃饭都不下来，他用扇子驱赶着停落在身上的狡猾的鸟儿，甚至把三角梅枝叶间漏下来的光斑也误认作狡猾的鸟儿驱赶着，他没有接见任何人，没有颁布任何一道命令，然而在受雇的暴民攻入教皇使节官邸时警察却漠然以待，任人洗劫那里的历史文物馆，任人在天井花园露天的柔缓池水中抓住了正在午休的教皇使节，他们把赤裸的他揪到街上，还在他身上拉屎将军阁下，您想象一下，但吊床上的他丝毫不为所动，眼皮都不抬地听他们报告新消息，人们让教皇使节骑着驴在商业街上游街示众，在阳台上朝他泼厨余脏水，冲他喊着漂亮小伙儿、梵蒂冈小姐、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2]，直到大家把半死不活的他抛在公共市场的垃圾堆里时，他才下了吊床，摆手赶走鸟雀，戴着黑纱，带着因缺觉而浮肿的双眼，拨开沉痛的蛛网，出现在了会客厅，他命人把教皇使节和三天的干粮放在一只救生筏上，将他推到通往欧洲的邮轮航线上，以昭告天下外国人举手反对这个国家的王权会有什么下场，甚至连教皇都会明了，在罗马他大可以从今往后永远手戴指环身居宝座做他的教皇，但是在这儿，我才是我，他妈的穿长裙的狗屎家伙。那手段行之有效，那一年年底之前，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封圣事

宜就被提上了日程，她不朽的遗体被安置在了大教堂最宏伟的中庭里受万众敬拜，大家在祭坛前高唱荣耀颂，而他为对抗圣座[3]而宣布的战时状态也被解除，和平万岁，武器广场上的人群喊道，上帝万岁，他们喊道，与此同时，他在庄严的会客厅接见了教廷的礼仪部顾问、信仰检察官兼列圣申请官，人称厄立特里亚人的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他接受委托来调查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生平，不放过任何会对她的神圣性构成怀疑的蛛丝马迹，随便您去哪儿调查，神父，他一面对他说一面握住了他的手，并立刻对这个热爱生活胜过一切的忧郁的阿比西尼亚人产生了信任，他爱吃鬣蜥蛋，将军阁下，还酷爱斗鸡、穆拉托女人的脾气和昆比亚舞，和咱们喜欢的玩意儿一样，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原先戒备森严的大门悉数打开，以保证那位魔鬼代言人畅行无阻地进行视察，在他无节制的沉痛王国里，所有显露出来的和可见的事迹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注定要享有祭坛上的荣耀，国家是您的了，神父，给您，于是整个国家自然都是他的了，军队恢复了教皇使节官邸内的秩序，在那座建筑门口，清晨时分会有一排排不计其数的麻风病康复者争相展示自己糜烂患处新生的皮肤，来自圣维多的昔日的瘫痪病人在质疑者面前捻线穿针，在轮盘赌中发了大财的人展示着财富并宣称是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托梦将号码告诉了他们，此外，得悉失踪者消息的人、找到溺水亲人的人、从前一无所有现在无所不有的人都接踵而至，排队涌入了那间以沃尔特·雷利爵士用于射杀食人族和史前巨龟的大口径火枪作为装饰的炽热办公室，而不知疲倦的厄立特里亚人听着众人的叙述，从不打断、从不开口，他周身浸在汗液里，与室内层层聚积的腐臭的人味保持着距离，并用他的劣质雪茄的烟雾稀释着空气，他将证人的声明详细记录下来并请他们在这里签下全名，或是画个十字，或是像将军阁下您一样按上指纹，怎样都行，但他们都会签

字，下一个进来的和前面的说的大同小异，我从前得过痨病，神父，他说，我从前得过痨病，厄立特里亚人这样写下来，但您看看现在我唱起歌来怎么样，我从前阳痿，神父，但您现在看看我，来个一整天都没问题，我从前阳痿，他这样写下，用的是永不褪色的墨水，以保证他严正的字迹直至人类的终结都不被更改，我肚子里以前有一只活的动物，神父，我肚子里以前有一只活的动物，他漠然地写下，同时因苦咖啡而迷醉，因用烟蒂点燃的雪茄的旧烟丝而中毒，他敞着怀，像个粗人一样将军阁下，这教士可真是条汉子，是啊先生，真是条汉子，真是一个人一个模样，为了节省时间，他什么都不吃，一直工作到深夜，到那时他仍不休息，洗个澡后出现在码头的小酒馆中，穿一身打着方形补丁的粗布教士服，一副快要饿死的样子，坐在长桌前和码头工人一起享用鲤鱼炖菜，他会用手指把鱼肉撕成块，然后用在黑暗里发亮的魔鬼牙齿把它们嚼烂，只剩鱼刺，您是没看见啊，他像搬运工一样直接用嘴挨着盘沿喝汤将军阁下，然后混进那些破船上衣衫褴褛的人渣里，他们的船正起锚，载着马里蒙达和青香蕉、载着一批批雏妓出发，他们要把她们送到库拉索的玻璃酒店，送到关塔那摩，甚至送到走海路无法到达的圣地亚哥，神父，送到那些直至曙光初现我们都还在梦着的最美丽最悲伤的岛屿，神父啊，请记得在三桅船离开后我们变得有多么不同，请记得玛蒂尔德·阿雷纳勒斯家那只会占卜的鹦鹉、从汤碗中爬出的一只只螃蟹、鲨鱼的风、遥远的鼓声、生活，神父啊，这狗日的生活和孩子们，将军阁下，因为他说起话来和我们一样将军阁下，好像他是在斗狗区里出生的一样，他在沙滩上打球，现学的手风琴拉得比本地人还好，歌也唱得比他们好，还学会了水手们花里胡哨的谈吐，并用拉丁语戏称他们为公鸡，他和他们一起醉倒在市场中娘娘腔们的窝棚里，与其中的一个打起架来，因为那个人说了上帝的坏话将军阁下，他们打起来了咱们该怎么办，他便命令道，谁都别管，于是人们纷纷围过去看，赢了，教士赢了将军阁下，

我就知道，他满意地说道，他是条汉子，不是人人想的那样没用，于是，在那些混乱的夜晚他探得了可观的真相，与他在教皇使节官邸中那些精疲力竭的日子里的收获相当，比那天在郊区那栋阴暗的宅子中的发现还要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他自以为逃过了总统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未经允许擅闯了那栋宅子，他被屋顶的漏雨打得湿透，却坚持仔细察看，连最隐秘的缝隙都不放过，不料竟在豪华卧室里被海芋和毒山茶的乱枝绊倒，这些卧室本属于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但她舍弃了它们，将它们分给了女仆而使她们备感幸福，因为她善良，神父，她很谦卑，她让她们睡在细棉布上，自己却睡在只铺着破烂卷席的行军床上，她让她们穿上她那第一夫人的礼拜日正装，她们用她的浴液洗得一身清香，赤身裸体地和勤务兵在白合金的狮腿浴缸里、在彩色泡沫中嬉闹，她们如女王一般生活，而她，却终日忙着为鸟雀上色，忙着烧柴、熬菜豆面糊，忙着种植草药，生怕半夜有邻居叫醒她说我胃痉挛了，女士，她便会拿出水田芥的籽让他们咀嚼，说教子眼睛斜视，她便会给他一副土荆芥制的驱肠虫的药，说我要死了，女士，但是他们不会死，因为她将健康握在掌中，她真是一位活圣人啊，神父，她在自己的纯净空间里穿梭于那栋欢乐之宅中，自从她被迫住到总统府去后这里便一直无情地下着雨，雨水落在钢琴的白莲上，落在华丽餐厅的大理石桌面上，这餐桌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从来没有用过，因为坐在那里吃饭就像在祭坛上进食，您想想，神父，这真是圣人的预感啊，但邻居们的证词再狂热，那魔鬼代言人仍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些痕迹，说明她的羞怯胜于谦卑，他还在漂浮于旧舞厅湿地间的尼普顿乌木像、土著妖魔像的碎块和战争天使像之间发现了证据，说明她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我奉献，而是她精神的贫瘠使然，然而他始终没有发现另一位神明，那位艰深、唯一且三位一体的、将他从阿比西尼亚的燠热平原上派到压根儿没存在过真理的地方来寻找真理的神明的丝毫印迹，他什么都没找到将军阁下，他说什么

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并没有满足于在城中的探察，他跨上骡背，爬上了高地荒漠的冰寒边界，试图找出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神性的种子，在那里，她的形象也许还未因权力的耀眼光芒而扭曲，他身裹劫匪毛毡、脚蹬远足皮靴，如撒旦一般在一片薄雾中渐渐现身，令从未见过这样肤色人种的高原人陡生恐惧，而后是惊诧，最后是好奇，但狡猾的厄立特里亚人鼓励他们来摸他，以此证明自己并不会分泌柏油，他还在黑暗中展示自己的牙齿，与他们一起就着手工奶酪、共用一个加拉巴木瓢喝奇酒直到喝醉，好赢得那些农村教区里一家家幽暗小店中人们的信任，在那里，在某个世纪的头几年，人们曾认得一个引人注目的鸟贩，她被背篓荒唐的重荷压弯了腰，那篓中满是被画成夜莺和金色大嘴鸟的小鸡，还有装扮成孔雀的山鸡，她会在凄凉的礼拜日赶高地集市，拿它们骗高地人，她会坐在那儿，神父，冲着火堆背着风，等待着谁能行行好，在酒馆后屋装糖浆的皮囊边上和她睡一觉，好弄口饭吃，神父，只是为了弄口饭吃，因为没有人傻到去买那些一下雨就掉色、一走路就散架的可笑假货，只有她才这么天真，神父，这个鸟雀的神圣赐福人[4]，或者高地荒漠人的神圣赐福者，随便怎么称呼她，因为没人清楚她那时的真实姓名，也无人知晓她到底从何时开始叫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这应该不是她的本名，因为它不属于这一片而属于海边人，真是一团乱，这惹是生非的撒旦检察官连这一点都发现了，尽管总统安全部门的爪牙用缕缕乱象围住他，以无形障碍加以阻挠，他仍旧将一切都挖掘出来了，您怎么想，将军阁下，可以像捕鹿一样把他逼到某个悬崖，或者将骡子绊倒，但他亲自下令阻止了他们，看住他但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重复一下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给他绝对的自由一切的便利让他完成任务这是发自最高权威的不可违抗的命令务必严格执行，签好了，我，他重复道，我本人，他深知这一决定所冒的巨

大风险，也许他将知道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戒严时期的真实模样，彼时她还年轻、还瘦弱，裹着破布衣裳赤着脚，不得不靠下半身讨口饭吃，但她很美，神父，而且太过天真，她甚至给最廉价的鹦鹉插上漂亮公鸡的羽毛冒充金刚鹦鹉，还给残废的母鸡安上火鸡的羽毛冒充成天堂鸟来贩卖，没人上当，当然没有人单纯到落入那个孤零零的鸟贩的圈套中，她会在一个个礼拜日集市上的雾气中喃喃细语，看看谁会要一只，然后免费把她带走，荒漠上的每个人都记得她的纯真和她的贫穷，然而似乎无从查明她的真实身份，因为为她洗礼的修道院中有关她出生记录的那一页已不复存在，但拜国家历史的作者们所赐，却有三份她儿子的不同的出生证明，每一份上都是不一样的他，在三种场合三次被孕育并三次艰难出世，这些作者令丝丝真相错综纠缠，因而没有人能解开他身世的谜团、参透其中的玄机，只有厄立特里亚人成功地深入追踪，拨开了种种掩人耳目的不实之词，他已经隐约窥见谜底了，将军阁下，他伸手就能碰到它了，这时一记辽远的枪声响起，久久回荡在灰色的山脊和深邃的峡谷间，失足的骡子发出无尽的惊惧嗥叫，它在无底的眩晕中坠落，穿过自然科学图画中渐次变化而又须臾即逝的气候带，自永覆积雪的山巅经过了宽阔可航行的江河那细流潺潺的源头，它经过了陡峭的崖壁，曾有学识渊博的博士携带秘密植物标本骑在印第安人的背上攀爬至此进行植物考察，它经过了开满野玉兰的高原，为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大衣和良好榜样的绒毛柔暖的山羊正在那里吃着牧草，它经过了咖啡种植园中的大宅，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病人与堆放在孤寂阳台上的纸花环，它经过了地理分界处激越的河水永恒的咆哮，天气从那里开始转热，傍晚时分有几阵恶臭飘过，是一位死去的老人，他在可可种植园里被叛徒暗杀，孤独地死在大片的宿存叶、肉色的花朵与种子会成为巧克力主要成分的浆果之间，它还经过了静止的阳光、炽热的灰尘、西葫芦与甜瓜，在经过方圆二百西班牙里内唯一一所慈善学校中一头头干瘦而悲

伤的大西洋省母牛后，尚存一息的骡子在赤道灌木丛和崖底受惊的小母鸡中间肚皮爆裂，仿佛一个鲜美多汁的番石榴炸开，他妈的，他们像捕鹿一样去捕他，将军阁下，他们在孤魂隘口用打虎步枪把他放倒了，哪怕有我的威权作保护，这帮狗娘养的，哪怕我发布了不容更改的电报，他妈的，但现在他就要知道谁是谁了，他一边咆哮一边咀嚼着苦水，主要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而是因为他确信，他们若是胆敢和他权力的电闪雷鸣对着干，就一定有大事瞒着他，他观察着报信人的呼吸，清楚唯有知道真相的人才有勇气来骗他，他探察着高级将领们的密谋，以期分辨出谁是叛徒，你，我把你从一个穷光蛋提拔上来，你，我看见你睡在地上就把你放到金床上去，你，我救了你的命，你，我买你的时候比买谁花的钱都多，你们这帮人，全都是狗娘养的，然而他们中只有一个敢玷污由我签署的、被他权力之戒的火漆封上的电报，于是他亲自担任救援任务的指挥，发布了不容重复的命令，限在四十八小时内找到活着的他给我带回来，如果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也要把他活着给我带回来，如果没找到，也要把他活着给我带回来，这道命令如此明白如此恐怖，以致期限未满就有人来报告，将军阁下，他们在悬崖上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他，他被金色的高山菊划伤了，但比我们每个人都有活力，将军阁下，多亏了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美德他才安然无恙，正是在这个试图损害她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的人身上，再次显示了她的仁慈和权能，他们把他放在吊床里用长棍抬着，沿印第安人的小路下山，后面有投弹手卫队的跟随，前方有骑马的法警开路，他手摇大弥撒所用的铃铛，以告知所有人事关当权者，他们将他安置在总统府的贵宾客房，由卫生部长寸步不离地照看，直到他可以为那份他亲笔所写的可怕文书收尾为止，那份文书共七卷，每卷三百五十页，每一页右侧的空白处都有他姓名首字母的签章，我签下我的名字，留下花押，并盖上我的印章作保证：蒙主恩典，我，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礼仪部顾问、信仰检察官、

列圣申请官，受最高法典之委派，为人间正义之光辉，为天国上帝之无上荣耀，于今年四月十四日，确证此乃唯一真相、完整真相、别无他物的纯粹真相，阁下，给您。它就在那里，真真切切，收在七本封了火漆的权威书卷中，无可回避、生猛粗野，只有对荣耀的魅力免疫、与那个冷漠老人的权力的利害绝缘的人才敢将它活生生地呈现在他面前，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坐在柳木摇椅中扇着风，只在每一条关键的证明被念出后才喘口气，只在每一次看到真理之光燃起时才会说上一句啊哈，他一遍一遍说着，啊哈，一边用帽子轰着四月里闹哄哄地争夺午餐剩饭的苍蝇，他吞咽着完整苦涩的真相，如炭火一般在内心的阴影中不断灼烧的真相，因为一切都是一出戏，阁下，是他决定将母亲的尸体放在冰制灵台上领受万众敬拜后未经思考就排演出的一出虚妄喜剧，只是为了澄清你还在世时就已腐烂的恶毒谣言，当时还远未有人想到你神性的美德，那是一场戏法骗局，自从他们报告说将军阁下，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在创造奇迹，他便不知不觉地陷落其中，命人将那具躯体带去进行盛大的游行，他们走遍了他的没有雕像的广袤国度，连最人迹罕至的角落也不遗漏，为的是在蒙受了如此多年乏味的羞辱之后，在无利可图地为如此多的鸟儿上色之后，母亲啊，在付出了如此多没有回报的爱之后，让所有人都了解你的美德，尽管我绝不会料到，那道命令竟变成了假冒的水肿病人的胡言乱语，他们给了这些人钱，请他们当众上吐下泻，他们还付两百比索让一个人装死，然后从坟墓中爬出来，披着碎烂的裹尸布，口中塞满泥土，膝盖跪地行走在惊惧的人群中，他们还付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八十比索，让她假装当街分娩，生出一个双头怪胎，因为她曾说那些奇迹都是政府的安排，事实就是如此，没有一个证明不是花钱买来的，那是一个可耻的阴谋，然而却并非如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在探察之初设想的那样，是谄媚者单纯为了讨他欢心暗中策划的，不是这样，阁下，那是他新的追随者搞出的肮脏勾当，是在他权力的

荫庇下滋长的各种交易中最卑鄙、最渎神的一个，因为编造奇迹和收买人做伪证的正是他政权的拥戴者，正是他们生产和贩卖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死去新娘的婚纱圣物，啊哈，正是他们印刷铸造有她的女王肖像的卡片和奖章，啊哈，是他们利用她大发横财，利用她的头发，啊哈，利用装着她身旁的水的小瓶，啊哈，利用她的斜纹裹尸布，布料上用刷门漆画着一个睡梦中将手放在心上的少女的侧影，在印度人集市的小店后屋中一码一码地出售，那非同一般的谎言经久不息，是因为大教堂宏伟中庭里的那具遗体在无尽的群众列队贪婪的观望下依旧没有腐烂，然而真相截然不同，阁下，事实上他母亲的躯体之所以得以保存，并不是因为她的美德，也不是因为他出于专横的孝心而安排的凡士林的补救和化妆品的矫饰，而是因为她与那些在科学博物馆中展出的动物尸体一样，被施以最邪恶的技艺而制成了标本，他用我自己的双手验证了这一点，母亲啊，我把水晶棺盖掀起来，它上面的丧葬标识已被呼出的气息腐蚀损毁，我从你发霉的头骨上把橙花王冠取了下来，其上原本如幼马鬃毛般的头发已被一根一根拔起作为圣物卖了出去，我从残损的新娘头纱的丝线中、从干枯的残渣中、从死亡那硝石般的艰涩黄昏里把你抱了出来，而你竟然轻得像个晒干的葫芦，散发出箱底的陈年味道，身体里透着灼热的不安，仿佛你灵魂的声响，那是从内部蛀蚀着你的毛毡夜蛾在扑腾，我想把你抱在怀里，你的四肢却散落了，因为他们已将支撑你鲜活身体的内脏掏空，已将你的手放在心上入睡的幸福母亲的内脏掏空，然后在里面填上废物，于是曾经的你的全部只剩下一片覆满尘土的酥皮，刚一拿起来，便在你骨头周围如萤火虫般闪着磷光的空气中粉碎了，黄昏的教堂里只剩玻璃眼珠的跳蚤在石砖地面跳跃的声音，一切都化为乌有，徒留一摊被摧毁的母亲的废墟，它们被那些法警用铲子铲起来胡乱地抛进了盒子，而目睹着这一幕的暴君表现出的只是巨石般的冷漠，那双如鬣蜥一般的眼睛中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甚至在那辆没有

标识的马车里与那个世上唯一敢让他直面真相之镜的人独处时，他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情感，他们透过迷雾般的薄帘看着燠热的午后待在大门的阴凉里休息的贫苦暴徒，那里本是人们贩卖讲述暴力犯罪、不幸爱情、食人花或者危害意志的异形果的故事书的地方，如今却只感受得到震耳欲聋的喧嚷，大家争相以低价卖着假冒的圣物，卖着假冒的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身体和衣物，此时一个清晰的念头令他苦恼起来，他觉得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已经干涉了他的想法，因为他将目光从骚乱的病人身上移开，轻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他艰苦的调查总算有点好处，那就是，他能肯定那些穷人爱您，阁下，就像爱他们自己的生命一样，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已经窥见了总统府内部的背信弃义，已经看见了那些在权力庇护下发迹的人的阿谀奉承与狡诈奴颜背后的贪婪，不过，他也见识到了一种穷人之中的新式的爱，他们对他不抱有任何指望，因为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抱指望，他们对他怀有一种可以捧在手中的尘世的虔敬和一种如我们对待上帝那样的不抱幻想的忠诚，阁下，换作其他时候，听到那番表白他会惊得连内脏都翻搅痉挛，然而此时他却连眼都不眨、气都不叹，只是内心深处怀着不安兀自想着，别的不差，神父，现在只差没人爱我，您将会在您那虚假世界的金穹顶下享受我的不幸带给您的荣耀，而他则会背负着不应背负的沉重真相，都没有热心的母亲与他分担，在这个国家中，我会比一只左手更孤单，而这个国家并不是我由着自己的性子选的，而是像您所看到的一样是他们定好了塞给我的，从最开始就是这样不现实的感觉，这样的狗屎味道，这样的没有历史、只求苟活的小民，都没人问过我就把这国家强加给我了，神父，在总统房车这四十摄氏度、百分之九十八湿度的阴影里呼吸着尘土，在会客厅里忍受着像咖啡机一样发出微弱哨声的疝气的背叛带来的折磨，在多米诺骨牌局上没有一个人让我输上哪怕一局，也没有一个人让我相信他的真相，神父，您钻到我这副皮囊里看看吧，但他没说出口，只

是叹了口气，飞快地眨了下眼睛，随后向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恳求，那个下午的鲁莽谈话咱们两人知道就可以了，您没对我说什么，神父，我并不知道真相，请向我保证，于是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便向他保证说当然，阁下并不知道真相，此乃君子之言。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封圣申请因证据不足而被搁置，来自罗马的布告经官方许可自讲道台传播开来，政府也决心镇压一切抗议活动和试图扰乱秩序的行为，然而当暴怒的朝圣者在武器广场上用大教堂的木门燃起篝火、用石块将教皇使节官邸的绘有天使和角斗士的彩色玻璃砸毁时，警察们却按兵不动，他们把一切都捣毁了将军阁下，但他在吊床上无动于衷，他们包围了比斯开修女的修道院要把她们活活饿死，他们洗劫了教堂和传教所，毁灭了一切和教士有关的东西将军阁下，但他仍在三角梅清爽阴凉下的吊床上一动不动，直到他的国家最高司令部的全体成员宣布，如果继续按照约定不动武不流血，将无法安抚群情、重整秩序，他才站起身来，在怠惰了数月之后现身于办公室，亲口颁布了一份出自他个人灵感、不曾请武装力量参与、未尝向他的部长们咨询且风险由他本人承担的法令，他亲自担起传达民意的庄严责任，在第一项中，他宣布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做的最高决定，即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具有平民神性，他追认她为国母、病人的神医、养鸟的大师，将她的出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在第二项中，他宣布自本法令发布时起，本国与圣座威权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并依适合该情况的国际公法与现行国际公约行事，在第三项中，他下达了紧急、公开、庄严的驱逐令，要大主教和追随他的主教、教长、神父、修女以及所有和上帝有关系的本地的、外来的人通通离开，无论何等情况什么名目，只要在本国境内与领海五十公里的范围内，都得离开，在第四项即最后一项中，他下令征用教会的资产，包括圣堂、修道院、学校、耕地和农具、牲畜，以及甘蔗园、工厂、作坊，还有所有被登记在第三者名下而事实上属于教会的东西，为了向养鸟人本蒂希翁·阿

尔瓦拉多献上辉煌祭礼与盛大纪念，上述资产都将纳入她的遗产，本法令由口头颁布并盖上无上权力不容违背的至高威严的戒指印章，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务必遵守，务必执行。在喜乐的焰火、荣耀的钟声和愉快的音乐中，人们庆祝着她被封为平民圣徒的盛事，而他亲自上阵监督法令的执行，不容丝毫闪失，以确保自己不会再度沦为新骗局的受害者，他戴着结实的缎面手套，重新抓住现实的缰绳，仿如回到鼎盛的年代，那时，人们会在台阶上拦住他的去路，请求他恢复在马路上赛马，于是他下令恢复，同意，请求他恢复套袋跑比赛，于是他下令恢复，同意，他会出现在最破落的茅屋中教人们如何把母鸡放到鸡窝里如何骟牛犊，他并不满足于亲自监管教会财产的巨细靡遗的清点工作，于是主持了正式的征用仪式，以确保他的意志被天衣无缝地执行，他将现实生活中的欺人真相与纸上的真相核对，他监督了驱逐最大的团体的行动，并诬陷他们企图用复底袋和紧身胸衣偷运走最后一任总督的秘密宝藏，那些宝藏原本埋在穷人的坟墓中，为了找到它们，联邦考迪罗们曾在长年的对战中互相残杀，他不仅要求教会成员一概不能带走除换洗衣物外的任何行李，还下达了不容辩驳的指令，命他们如母亲生下他们时那样裸身登船，最前面的是穿不穿衣都无所谓、只求能换个命途的粗鲁农村教士，而后是被腹泻摧垮的传教区教长、清秀持重的主教，随后是女人，仁爱修道院腼腆的姐妹、已经习惯驯服自然且能在沙漠中种出蔬菜的粗野女传教士、弹奏古钢琴的身材修长的比斯开修女们以及双手细嫩身体清净的慈幼会姐妹，虽然众人都只剩初降世时的皮囊，但在列队经过海关宽广的货棚里那一包包可可、一袋袋腌鲇鱼时，可以看出各人原本的阶层、不同的境况和不等的职位，从那位如石像一般站在风扇扇叶下的老人面前经过时，她们像一群团团转的惊慌羔羊，手臂交叉在胸前，试图用他人的羞耻来遮掩自己的羞耻，他屏息看着她们，紧盯着那个将有一群别无选择的裸体女人如水流般经过的固定空间，他冷漠地望着她们，目不转睛，

直到国境之内一个都不剩，这是最后一批了将军阁下，然而，在那群惊慌的见习修女中，他记住了自己一瞥之下剥离出来的那个，尽管她并不出众，但他还是将她与别人区分开来，她矮小、结实、健壮，臀部丰满，乳房硕大硬挺，双手笨拙，私处荒蛮，头发剪得很短，牙齿稀疏却利如刀斧，塌鼻梁，扁平足，一个不比其他人起眼的普普通通的见习修女，他却觉得她是那群裸女中唯一一个女人，唯一一个在他面前走过时没有看他的女人，她留下一串山野动物的隐秘形迹并将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带走了，令他差点没来得及移开他无法被察觉的目光去看她第二眼、再看她最后一眼，这时核对身份的工作人员按字母顺序在名册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并喊道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而她用男人般的嗓音回答，到！就这样，他在余生拥有了她，到！直至最后的怀念从记忆的罅隙中滴落，直至她的形象只留存在一张张纸条上，他曾在一张上写道，我的灵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看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并且把它藏到保存蜂蜜的墙缝中，每当确定没人看着自己时，他便会拿出纸条来重读然后把它卷起收好，其间会有那么一霎重温那个雨水明亮的久远下午，那个下午，有人突然报告说将军阁下，他们执行了一道他从未下达过的命令，他们带你返回了祖国，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在凝视着最后一艘灰色的运输船沉入地平线时低声念出了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为避免忘记这个名字他又高声重复了一遍，而这足以让总统安全部门将她从牙买加的修道院中劫持出来，他们堵住她的嘴，用拘束衣把她束住，将她放入松木箱，捆上铁箍封上火漆，还用焦油印上易碎标识，请勿抛掷此面朝上[5]，外加一份依据领事豁免权获得的运往总统酒窖的两千八百个天然水晶香槟杯的出口许可证，他们把她装在一艘运煤船的底舱里带了回来，给她灌了迷药，把她裸身安置在贵宾卧室有立柱装饰的床上，他将会记得，午后三点，在蚊帐中尘埃飘浮的光线里，她和其他那些无

条件服侍他的呆滞女人一样，沉在自然的梦境中，恬静安适，他在这个房间里和她们做时，甚至都不会将她们从鲁米那的迷睡中唤醒，同时也饱受着无助溃败的可怕感觉的折磨，但是他没有去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带着一种孩童的惊诧看着安睡的她，因为自上次在港口货棚见过之后，她赤裸的身体竟然变了这么多，他们给她烫卷了头发，除去了体毛，甚至最私密处也不例外，他们给她的手指脚趾染了红甲油，给她涂上了唇彩，擦上了胭脂，在眼皮上抹了麝香，她口吐香甜气息，驱散了你那隐秘的山野动物的味道，天哪，他们把她拆毁了再重组，他们让她变得这般迥异，使他在望着迷醉于鲁米那的她时，都无法看清那拙劣粉饰下的裸颜，他看到她浮上来，看到她醒来，看到她看到了他，母亲啊，是她，我的慌乱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她面对那个正透过蚊帐中的轻薄水汽冷酷地盯着她的岩石般的老人，吓得一动不动，她因他沉默中无从猜测的目的而惶恐，而他，尽管已度过无数岁月，尽管权力无边，却不知如何是好，他比她更惶恐、更孤独、更不知所措，那茫然无助，恰似当年他遇见一个随军妇后初次做男人的情形，那是一个午夜，他撞见她裸着身子在河中洗澡，并通过她每一次浮出水面时那母马般的喘息想象她的力量和身形，他在黑暗中听着她黑暗而孤独的笑声，他在黑暗中感受着她身体的欢愉，却恐惧得瘫在那里，因为他尽管已在第三次内战中做了炮兵中尉却仍是处子，他畏缩不前，直到对失去机会的恐惧占了上风，他才跃入水中，仍带着全身装备，绑腿、背袋、弹药包腰带、砍刀、火门枪，他裹挟在那么多战争的负累和隐秘的恐惧中，让那女人一开始以为是有人骑着马蹚进了河里，但她随即明白那不过是个战战兢兢的可怜男人，于是便将他收留在了自己慈悲的缓流中，牵着他的手，在他眩晕的黑暗中引领着他，因为他在那缓流的黑暗中寻不到路，她在黑暗中用母亲的声音指引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别被水冲倒了，在水中不要蹲下，要用力跪着，慢慢呼吸，调匀气息，他天真顺从地按

她的每个指示做着，心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怎么女人做起事来就好像他妈的在搞发明一样，她们在这点上怎么这么像男人呢，而她已趁这工夫脱下了他身上其他战争的无用用品，那些战争远不如这场在没颈河水中的孤独战役可怕、悲凉，当她松开他两条皮带的扣襻时，他已经在那个松树香皂味的身体的庇护中恐惧得差点死去，解开他襟门的扣子后我便吓得抽搐起来，因为我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只是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睾丸，像一只在黑暗中游水的青蛙，她惊恐地松开了手，她离开了，找你妈去给你换一个吧，她对他说，你不行，而他已被恐惧击溃，那种恐惧让他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裸体面前无动于衷，若是她不发善心，不施以援助，他便不会进入她那流淌着不可预见之水的河流，哪怕他全副武装，他亲手将她裹在被单里，用唱机播放着被父亲的爱毁掉的可怜的黛尔加迪娜[6]的歌直到唱片播完，他在花瓶中插上毛毡做的花朵，免得它们像鲜花那样被他不祥的手一碰就枯萎，他做了所有他想到的能让她幸福的事，却丝毫不放松对她的严密囚禁和裸体的惩罚，好让她知道，她会被好好照顾、好好宠爱，但绝没有可能逃离那个命运，她深知这一点，于是在恐惧第一次有所缓和时便没有请求他而是直接命令道，将军，给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他便去开了窗，再把它关上吧，月光都照在我脸上了，他便去关了，他执行着她的每道命令，仿佛它们皆因爱而生，他愈是顺从和笃信，就愈是接近那个雨水明亮的下午，当时他钻进了蚊帐，和衣躺在了她身边，没有叫醒她，他整夜整夜地独自享受着她身体的隐秘气息，嗅闻着她那随岁月流逝而渐浓的山野母狗的气味，她腹部重新长出了苔藓，她惊惶地尖叫着醒来，走开，将军，于是他沉重地、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却会趁她睡着后躺回她身边，就这样，在软禁她的第一年里，他并没有碰她却享受着她，后来她甚至习惯了在他身旁醒来，但不明白那个捉摸不透的老人的暗流在向何处伸延，因

为他舍弃了权力的奉承和世界的魅惑，一心欣赏她并为她服务，她愈是茫然，就愈是接近那个雨水明亮的下午，当时他趁她睡着趴在了她的身上，仿佛带着全身装备，那没有军衔标志的制服、砍刀腰带、一串钥匙、绑腿、戴金质马刺的靴子，他钻进了水里，她被那可恶的袭击吓醒了，于是竭力想把那匹压在身上的武装齐备的战马推开，无奈他太过坚定，她便决定用最后一招来拖延时间，您把盔甲卸了吧将军，那些铁环硌得我心脏直疼，他便卸了，把马刺脱下来吧将军，那颗金星星弄疼我的脚踝了，把腰上那串钥匙摘了吧，它们顶着我的髋骨了，虽然用了三个月才让他解开令我呼吸困难的砍刀腰带，又用了一个月才让他脱掉用扣襻伤害我灵魂的绑腿，但他最终还是将她的命令一一执行，那是一场缓慢而艰难的斗争，她拖着他却没有让他失去耐心，而他最终让了步来讨她欢心，于是两人没有谁知道那场在她被掳来刚满两周年时的最终的灾难是如何发生的，他那不经意的温热柔嫩的双手偶然触到了那位睡着的新入教的女教徒的隐秘石头，于是她在黯淡的冷汗与死亡的震颤中醒来，没有尝试用巧计或诡计摆脱身上的那头野兽，而仅仅是请求他把靴子脱掉，免得弄脏我的细麻床单，这令他激动万分，竭尽所能地迅速把靴子脱去，把绑腿、裤子、疝气带，把所有东西都脱了吧我的宝贝，不然我都感受不到你，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脱得精光，一如他母亲在穿过天竺葵的如悲伤的竖琴琴弦般的光线中看到的他那样，他已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恣意地变成了一头北美斗牛，它第一次进攻就将所到之处毁灭殆尽，它在静寂的深壑中匍匐前行，那里唯一能听到的只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嘎吱嘎吱如木船一般的磨牙声，到！她用十指抓住了我的头发，以免自己在那片无底的眩晕中孤独死去，而我正在这眩晕中带着与身体所有急迫欲念等同的冲动向死亡走去，然而他还是把她忘记了，独自留在了黑暗中，在他微咸的眼泪里啊将军、在他徐缓而下的阉牛口水间寻索着自己，将军啊，他惊叹道，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我怎

么可能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尝过这种折磨的滋味呢，他在这惊叹间哭泣着，在自己肾脏的渴求与肠子里的一串鞭炮声响中不知所措，而有着温柔触角的死亡伸出爪子将他的内脏连根拔起，把他变成一只被砍了首级的动物，它临死前翻腾的痛苦借着一种酸烫的物质喷溅在了雪白的床单上，扭曲了他记忆中那个雨水明亮的下午蚊帐里如液体玻璃一般的空气，那是屎，将军啊，是他自己的屎。

---

[1]圣经人物，“耶和华已纪念”之意。

[2]出自《新约·路加福音》（18:16），“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3]罗马主教（即教皇）的主教职权。

[4]在西班牙语中，本蒂希翁（Bendición）的意思即为“赐福”。

[5]原文为英语。

[6]墨西哥民歌《黛尔加迪娜》讲述了一个叫黛尔加迪娜的女孩拒绝了想娶她为妻的父亲，悲剧性地死去的故事。

傍晚将至时，我们已把一头头母牛腐烂的皮囊剥落，又将那非同寻常的乱摊子整理了一番，还是无法断定那具尸体与传说中他的形象是否相仿。我们已用去鱼鳞的铁刀把他身上的短印鱼刮除，用克勒奥林和石盐把他清洗干净，把腐烂的疮口补平，我们用麻布打补丁，用石蜡填窟窿，重塑他被垃圾堆的鸟雀啄烂的面孔，而后又把淀粉扑在他脸上来掩饰这些填补物，我们为他擦上胭脂，涂上红唇彩，还予他生命的光彩，但即便是嵌进空洞眼窝中的玻璃眼珠也无法强加给他所需要的、能让他去接受民众注视的威严容貌。与此同时，我们在政务院大厅召开了全体大会来批驳几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并商议如何公平地瓜分他权力的赃物，所有人都是获悉了他那秘而不宣却无法隐瞒的死讯后回来的，有带着被拖延了多年的野心的余烬重归于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有丧失了权力方向的最高司令部的将领们，还有最后三名民事部长和大主教，所有他不会希望在此出现的人都围坐在胡桃木长桌旁，期望能就如何恰当地公布那则天大的死讯达成一致，以避免街上的人群过早地炸开锅：首先，在第一晚发布一号简报，称他偶染微恙，不得不取消公众活动以及平民、军人接见会，随后，发布二号医疗简报，宣布那位尊贵的病人因年事已高造成身体不适，只能待在私人寝室中，最后，无须公告，只要在那个八月炎热的礼拜二耀眼的黎明敲响大教堂宣告他正式死亡的决绝丧钟，敲响那个事实上没有人能确定是不是宣告他死亡的丧钟。我们在这证据面前束手无策，在这具散发恶臭的躯体面前窘迫难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能力替代他，因为他在晚年一直拒绝对他走后国家的命运做出任何决断，在政府搬迁至部长的阳光玻璃楼时，他留在了他绝对权力的荒芜房屋中独

自活着，并从此以老年人不屈的固执否决了种种进言，我们会看到他在梦中行走，在母牛的残骸间挥动手臂，而那时已无人供他支使指挥，除了那些盲人、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而他们正在死去，并非因为疾病，而是因为在那片玫瑰丛中待得太久，不过他仍然无比清醒、执拗，因而我们每每向他提出处理遗产的建议时，得到的都只是他的推托，他说一个人去考虑自己死后的世界和死亡本身一样晦气，真他妈的见鬼，等哪一天我死了，那些政治家都会回来瓜分这个摊子，就和哥特佬的时代一样，走着瞧吧，他说，什么东西都只会让教士、外国佬和有钱人分了，穷人什么都得不到，当然了，他们一向这么浑蛋，要是哪天大便也值钱了，穷人会生下来就没有屁股的，走着瞧吧，他一面说着，一面举出荣光年代的某个人做例子，甚至还会自我打趣地对我们说他只会死三天，没必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去埋葬，说到这里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对于所有事前与事后的矛盾，他都会拿出一个论断：一件事如果现在不是真的，那没关系，他妈的，将来它全部会是真的。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任何人去质疑他的历史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证实它或驳倒它，因为我们甚至都无从确定他尸体的真假，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只有那个依据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它拥有被他的绝对意志的构思改变的空间与被校正的时间，它被他从自己记忆中最模糊的源头重建起来，同时他会茫然游走在那栋臭名昭著、没有住过一个幸福的人的宅子里，他会向在他吊床周围啄食的母鸡撒谷粒，还会向仆从发出反复无常的命令，给我拿一杯有碎冰的柠檬水，却把它扔在手边一口也不喝，给我把这把椅子从这儿拿开，放在那儿，再放回来，他一面以这种渺小的手段维持着对发号施令的酣嗜所保留的温热余烬，一面在院中的木棉树下打着瞌睡，耐心地打捞着一晃而过的遥远童年的时光片段，以打发每日政务之余的闲暇，当捕捉到一段记忆，比如他统治之前的那个祖国无尽拼图中的一块时，他便会猛然醒

来，那是一个虚幻、没有边际的庞大国度，一个热带丛莽的王国，那里有着缓缓而行的竹排和巉岩深涧，那时的人勇猛无比，敢将长棍戳进鳄鱼嘴里并徒手将它们擒捕，就这样，他用食指在上腭比画着演示给我们看，他对我们说，在一个圣日礼拜五，他感受到了躁乱的风，嗅到了风中铜锈的味道，看到大片乌云般的蝗虫搅浑了正午的天空，将所到之处尽数糟蹋，留下一个疮痍满目的世界和一片惨淡的光线，仿若创世前夜，他经历了那场灾难，看到了一排没有脑袋的公鸡，它们被拴着爪子倒挂在一个屋檐下，血一滴一滴往下掉落，那栋房子在一个大而混乱的农村教区，那里刚死了一个女人，他抓着母亲的手往前走，赤着脚跟在要被送去埋掉的那具衣衫褴褛的尸体后面，没有棺材，人们只是用受蝗虫风暴抽打的担架抬着她，这就是那时的祖国，我们连棺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看到有个男人正在村镇广场的一棵树上试着用吊死过一个人的绳子上吊，不料那朽烂的绳子提前断裂，可怜的男人半死不活地摔在了广场上，吓坏了刚刚望完弥撒的女士们，但他没死，大家用棍棒把他敲醒，不过没有费心去弄清他是谁，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在教堂里认识，便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他们用中国式木枷锁锁住他的脚踝，将他和其他有罪的同伴安置在外昼夜示众，这就是那些哥特佬的时代，那个上帝比政府更有权的时代、祖国的倒霉时代，后来他下令把村镇广场上的树都砍掉，以免礼拜日上吊自尽的可怕戏码再三上演，他还禁止了公开枷刑，禁止了无棺下葬，禁止了一切能让人忆起他掌权之前的可耻法例的事物，他修建了直达高地荒漠的铁路，使驮运三角钢琴去咖啡种植园中的化装舞会的骡队从此告别了胆战心惊地攀爬悬崖峭壁的悲惨日子，因为他曾目睹三十架三角钢琴直坠崖底的惨剧，虽然目击者只有他一个人，但这桩事件通过口耳与笔墨相传，沸沸扬扬地甚至散布到了国外，他说他偶然间将头探出了窗口，就在那一刻，一头骡子脚下打了滑，并将其余的也都拽下了山崖，只有他听到了那群失足动物的惊惧嘶鸣以

及随畜群坠落的钢琴在空阔中兀自奏响的无休止的和弦，它们落入了那个祖国的深处，那个与在他之前存在的万物一样浩渺而模糊的祖国，浩渺模糊得甚至无以复加：那些从奥地利进口的钢琴粉碎在深渊中，而在渊面之上的热气薄雾里那永恒的微光中，竟无从分辨白昼与黑夜，他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看到了这样那样的很多东西，尽管他自己都无法把握十足地判断，那一切到底是他真实的记忆还是在战时发着烧的不幸夜晚听来的，抑或源自他趁政局风平浪静时一连数小时迷醉其中的游记插画，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妈的，等着瞧吧，将来它们全部会是真的，他说着，心下清楚自己真正的童年不是那些烂泥般的模糊回忆，不是那些只在牛粪燃起时被记起而后便永远被遗忘的东西，事实上，它是我在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缓流中所经历的，她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都会让他坐在三角梅花廊下的课桌旁教他读写，她把她见习修女的执着都用在了这项英雄的事业上，而他则报之以老年人的可怕耐性、他无边权力的可怕意志和我全部的心，他会全神贯注地朗诵道，仙人掌上开花丁香盆里飘香玻璃糖缸透亮，他在他死去母亲那些被惊扰的鸟雀的聒噪中朗诵着，自己听不见，也没有其他人能听见，印第安人灌油膏进油罐，爸爸装烟丝进烟斗把烟抽，塞西莉亚卖葱头卖蜡油卖啤酒卖樱桃肉卖肉干卖肘片卖大麦，塞西莉亚什么都卖，他会大笑着，在震耳的蝉鸣声中重复着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伴着她见习修女的节拍器的节奏教给他的语句，直到世界因充满你声音的创造物而饱和，直到他辽阔的沉重王国中，除启蒙课本的典范真理之外再无真理，除云中的月亮、皮球和香蕉树、堂埃罗伊的公牛和奥蒂丽娅的漂亮浴袍之外再无他物，他无时无处不在朗诵课文，使得它们如他的画像一般随处出现，甚至与荷兰财政部长会面时也不例外，当时那位阴郁的老人在自己深不可测的权力的黑暗中举起戴缎面手套的手打断了会见，并邀请客人与我共同朗诵，令荷兰人顿时在这场官方会晤中迷失了方向，他高声念道，我妈妈爱

我，伊斯玛艾尔在海岛上待了六天，贵妇吃番茄，他一边念一边用食指模仿着节拍器的指针，他背诵着礼拜二的课文，发音无可挑剔，但却让场面十分难堪，于是会谈最终以他希望的结果告终，欠荷兰的债务拖到时机更成熟了再偿还，到时候再说吧，他这样决定，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清晨时从玫瑰丛中起身，看到了那位阴郁的向人们撒下安静祝福的老人，他在众人的讶异中依大弥撒的样子念诵了三遍我是皇帝我爱法例，他念诵道，算命老头就爱喝酒，他念诵道，灯塔是一种顶端发光、指引夜航人的高塔，他念诵着，心里十分清楚在他年迈的幸福的阴影中，除了与我的生命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在午休时间里一同度过的如翻腾虾汤般令人窒息的嬉闹时光之外，再无其他时光，除了与你赤裸躺在如被缚住的蝙蝠般的电风扇下那浸满汗液的凉席上的欲望之外，再无其他欲望，除了你臀部的光芒之外，再无其他光芒，莱蒂西娅，再没有别的什么，只有你图腾般的乳房、你扁平的脚掌、你药方中的一把芸香，以及遥远的安提瓜岛上压抑的一月时光，你就是在那座岛上，在一个被腐烂沼泽的热风犁过的孤独黎明来到了世上，他们两人将自己锁在那间贵宾卧房里，下令任何人都不得跨入距离房门五米以内的范围，因为我要专心学习读书写字，于是任何人都不敢去打扰他，甚至不去禀明将军阁下黑呕病正在农村地区肆虐，此时的我心跳却因你山野动物的隐形力量而加速，超过了节拍器的节奏，他朗诵道，侏儒单腿跳舞，母骡去上磨，奥蒂丽娅刷浴缸，baca写时要用burro的b，他朗诵着，而此时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正在一旁拨开他患疝的睾丸，清洗方才欢爱后留下的粪便残渣，她把他浸泡在白合金狮腿浴缸里用于净身仪式的水中，给他抹上路透牌香皂，用丝瓜瓤搓洗他的身体，又用草叶煎煮出的汁帮他冲干净，同时与他一起念着用j拼写的词有jengibre、jofaina和jinete，她在他的大腿根部抹上可可脂来抚慰被疝气带磨伤的皮肤，在他臀部凋萎的星星那儿扑上硼酸，又像母亲一样轻拍他的屁股蛋，啪，啪，来惩罚他在荷

兰部长面前的糟糕表现，她希望，作为补赎，他能允许那些不幸的团体回国，来负责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的运行，但他却用他无法平息的怨恨的阴郁气氛将她笼罩，门儿都没有，他叹息道，在这个甚至另外那个世界上，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让他收回成命，在下午两点的爱欲的急迫喘息中，她向他请求，答应我一件事吧，亲爱的，就一件，让那些只游走在风云变幻的权力外围的教区团体回来，但他却在急迫丈夫的渴切呻吟中回答，门儿都没有，亲爱的，我死都不受那帮穿裙装的家伙的侮辱，他们骑在印第安人的背上而不是骡子背上，他们分发彩色玻璃项链换金鼻环和金耳坠，门儿都没有，他回绝着，对我的不幸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哀求置之不理，而她已将双腿并拢交叉，请求他恢复被政府征用了的教会学校，解除对资产的永久性占有，归还已变成军营的榨糖厂和教堂，但他把头扭过去冲着墙，准备拒绝你的迟缓而深邃的爱带给他的贪婪的折磨，以免自己的胳膊肘往外拐，去帮那些在几个世纪里净靠吃祖国的肝脏活命的上帝的强盗们，门儿都没有，他决绝地说，然而他们回来了将军阁下，那些可怜的团体通过最狭窄的缝隙重返国家，按照他的秘密指令在隐蔽的海湾静悄悄地登陆，并且获得巨额赔偿，重获被没收的财产，还加了利息，刚刚颁布的婚姻法、离婚法以及世俗教育法均遭废除，甚至当初在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愿她已在上帝的神圣国度中——封圣过程中举办的可笑的庆祝活动上他盛怒之下亲口颁布的命令也都悉数取消，真他妈的见鬼，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满足，她还想要更多，她让他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听听那个正在里面长大的小东西唱歌，她在半夜被那深邃的声音惊醒，它描绘着你那被锦葵色的傍晚和焦油味的风划过的脏腑以及脏腑间那个水的天堂，那内里的声音与她谈论着你肾脏上的息肉、你肠子中的柔软刀刃和在它的源头你那入眠的尿液的温热琥珀，他于是把嗡鸣声稍小的那只耳朵贴在了她的肚子上，听见了那个出自他的死罪的生灵的翻

腾声，那是我们的淫秽腹部所孕育的孩子，他将叫作厄玛奴耳[1]，其他神灵都是通过这个名字认识了上帝，他的额头上将有象征高贵出身的白色标记，他将继承他母亲的牺牲精神和他父亲的伟大以及他自己的作为无形领导者的命运，然而一旦他决定不在祭坛上将他那么多年来渎神的姘居圣洁化，那孩子便将因其违法本质而成为上天的耻辱、国家的污痕，于是他从旧时婚纱的泡泡袖间冲出一条路，带着从被压抑的可怖怒气深处发出的那航船锅炉般的鼻息咆哮道，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结婚，同时拖着他那双隐匿新郎的大脚，走在一栋陌生房屋的厅室中，那栋房子已经在官方服丧期旷日持久的黑暗之后恢复了往日的富丽堂皇，房檐上朽烂了的圣周绉绸已被扯了下来，房间中有海洋的光亮，阳台上繁花开放，军乐开始奏响，所有这些都是执行了一个他未曾下达但无疑出自于他的命令将军阁下，因为那命令中含有他声音的平静从容和他威权的不可悖逆的架势，他批准了，同意，被关闭的教堂纷纷重开，修道院与墓地也归还给了各自所属的教会，这些依据的是另外一道他没有下达却批准了的命令，同意，古老的瓜尔达尔节和四旬节恢复了，敞着的阳台上传来人群喜悦的颂歌，从前他们唱起它是为了赞美他的荣耀，而今他们在烈日下跪地而歌则是欢庆那则好消息，他们用一艘船把上帝带来了将军阁下，真的，他们听了你的命令把他带来了，莱蒂西娅，因为一条自卧室颁布的法令，那条法令与她未征询任何人就在暗中颁布的众多法令一样，会得到他当众首肯，好在人前掩饰他已丧失了威权的神位，因为你才是那些无止境的游行背后的隐秘力量，而他则会在自己的卧室窗口惊诧地望着那些队伍，直到它们到达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狂热暴徒都不曾涉足的地方，关于后者的记忆已被从人类的时间中抹灭，她嫁衣的烂布和骨骼的粉末已随风消散，她的墓碑被翻转，碑文向下，不让她那安睡的黄鹂画师养鸟人的名号流传到时间尽头，都是因为你的命令，

因为你颁布了它们，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别的女人的记忆给关于你的记忆罩上阴影，我的厄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婊子养的。她改变了他，在他到了人除去死之外不会再有任何改变的年纪，她用床笫间的花招摧毁了他那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结婚的天真坚持，她强迫他戴上新的疝气带，感觉一下，听起来好像黑暗中离群山羊的铃铛声响，从他与皇后跳第一曲华尔兹起，她便强迫他套上你的漆皮靴，并在左脚靴后跟扣上海军上将赠予他的、希望他能至死佩带的象征最高权威的金质马刺，她让他穿上你的镶金丝银线、配亚麻布金银绛带与流苏肩章的军服上衣，自之前那个民众可以隐约窥见总统马车薄帘后的忧伤双眼、若有所思的下颌以及戴缎面手套的沉默的手的时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穿戴过它们，她强迫他佩上你的战刀，喷上你的男士香水，戴上罗马教皇为表彰你将没收的财物归还教会而授予你的那块有圣墓骑士团饰带的奖章，你把我打扮得像个节日的祭坛，黎明时就带我走进昏暗的会客厅，那里飘散着守灵蜡烛的味道，窗口垂着橙花枝条，墙上挂着很多国徽，没有见证人，整个房间像被那位见习修女的牛轭套住了一般，而她的身子僵在粗麻布里，外面还罩了一层棉纱，好遮盖她暗中放纵了七个月的羞耻，凄肃的宴会厅周围隐形的海洋不安地散发着腐臭，在那片海的迷倦中，他们都在出汗，厅室入口则已奉命被封死，窗外也砌上了围墙，府中所有的生命踪迹都被灭绝，为的是不让世界捕捉到这场隐秘的盛大婚礼的哪怕一丝风声，而你，因为那个在你内脏沙丘的幽暗苔藓间游着水的早熟男儿的催促，热得差点喘不上气了，他已经决定了那将是个男孩，于是他便是个男孩，他在低于你的存在的地方唱着歌，那隐匿的泉水般的声音与穿法衣的大主教歌颂天国上帝的声音相同，为的是不让昏昏欲睡的哨兵听见，而他的迷失了的潜水员的恐惧与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了上帝的大主教的恐惧无异，主教向那不可捉摸的老人问了那个不曾有人问过、到世界末日也无人敢再问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娶莱蒂西娅·梅塞德斯·玛丽

娅·纳萨雷诺为妻，他只是眨了眨眼，同意，胸前的战功勋章因心脏的隐隐挤压而轻微作响，然而他的声音太过威严，以至于你腹中的可怖生灵在那稠密液体中的自己的昼夜分割点完全翻转过来，他校正了东之所在并找到了光的方向，于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俯下身子啜泣起来，我的父我的主，怜悯一下你这卑微的仆人吧，她是在触犯了你神圣的律法时得到了许多欢愉，但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可怕的责罚，她撕咬着蕾丝手套，以免脱了臼的髋骨的声响出卖粗布衬裙遮盖下的羞耻，她蹲了下来，身子在自己液体的水洼中散了架，而后从混乱的棉纱里，取出了那个七个月的怪胎，一个初生牛犊大小、有着未经烹煮的动物的无助气息的胎儿，她用双手将他托起，想在临时祭台的浑浊烛光下好好打量他，她看到他是个男孩，就像将军阁下决定的那样，一个脆弱腼腆的男孩，根据计划他将并不光彩地被命名为厄玛奴耳，而自从他将他放在石祭台上用军刀砍断脐带并承认他是我唯一的合法的儿子的那刻起，便任命他为拥有切实的司法权和指挥权的师长，神父，替我给他施洗吧。那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序曲、一段邪恶时期的第一张布告，在那个时期，军队会于拂晓之时封锁街道，命人紧闭阳台窗户，挥舞枪托把市场里的人都轰走，不让任何人看见那道一闪而过的车影，它有耀眼的钢板外壳与总统专车的金质把手，而那些胆敢躲在被封锁的屋顶平台偷窥的人没有像从前一样看到那面旗帜色彩的薄帘后那位老迈的军人和他戴缎面手套的若有所思的手托起来的下巴，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矮胖的昔日的见习修女，她戴着配毛毡花朵的草帽，不顾炎热地围着蓝狐毛领，我们会在礼拜三的清晨看到她在公共市场前下车，在巡逻队战士的护卫下，牵着不到三岁的小师长，他优雅而虚弱，让人无法相信他不是小女孩穿着盛装制服扮成的军人，那制服上的金线仿佛长在他身上一般，因为在他冒出乳牙前，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就为他穿上军服，把他放在婴儿车中让他代表父亲主持官方活动，抱着他检阅军队，在球场把他举

过头顶接受人群的欢呼，于国庆阅兵式上在敞篷车中给他喂奶，丝毫不顾一个佩戴五颗太阳徽章的将军像一头没了爹娘的牛犊般陶醉地吸着母亲乳头的荒诞场景所激起的窃笑，到了可以自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参加外事接待活动，并在制服上别上他从父亲拿给他玩的勋章匣子里随意挑出的战争勋章，他是一个严肃古怪的孩子，从六岁起便能得体地出席公开场合，他举着酒杯，以果汁代香槟，谈起成年人的事务来有一种并非遗传自何人的温文尔雅、自如合宜，只是有大片的乌云不止一次飘进宴会厅，于是时间凝滞了，被赋予了最高权力的面色苍白的王位继承人向困倦投降了，安静，人们窃窃私语，小将军睡着了，他的副官会将他抱起来，穿过被打断了的对话，经过纹丝不动的高级刺客，走过只敢把脸藏在羽毛扇后面憋着笑的羞怯妇人的小声嘟囔，真可怕，要是将军知道了的话，因为他成功地令众人相信他所编织的假象，即世上发生的一切，只要没有上升到关乎他的伟大的高度，他便不闻不问，于是才会有他儿子，那个他在不计其数的孩子中唯一承认的儿子，多次当众的放肆，才会有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毫无节制的僭越，她会在礼拜三的黎明来到市场前，牵着她的玩具将军的手走在喧嚷的军营女仆和突击队的勤务兵当中，这些人在沐浴到加勒比呼之欲出的旭日光辉之前，先感受到一道意念的可见的奇异光芒，于是面貌大变，他们会钻进海湾没腰的臭水中，打劫停泊在古老的黑奴港口、风帆上打着补丁、满载马提尼克岛的鲜花和帕拉马里博的姜根的帆船，他们像战时扫荡那样将活鱼一一掠走，他们在旧时称量奴隶、现在仍在使用的磅秤周围挥舞枪托厮打抢夺猪猡，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他之前的那个祖国的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礼拜三，曾经举办过一场公开拍卖，一笔塞内加尔女俘虏的交易成交了，因为她梦魇般的美貌，购买她的黄金重量甚至超过了她的体重，他们扫光了一切将军阁下，比蝗虫还凶，比飓风还猛，但他仍置若罔闻，任凭丑闻愈演愈烈，任凭莱蒂西娅·纳萨雷诺闯入他本人都

不敢闯入的鸟类和蔬菜市场琳琅满目的展厅，身后还跟着一群会惊恐地朝蓝狐讶异的玻璃眼珠狂吠的躁动野狗，她带着自己权力的淫威，穿梭于纤细的精美铁柱间，柱身上方的铁质树枝中点缀着大片黄色玻璃叶、大个儿粉色玻璃苹果，穿梭于巨大的、开着蓝色玻璃花朵的炫目穹顶下那装满珍馐美馔的丰饶之角[2]，她挑选着最甜美的水果与最鲜嫩的蔬菜，然而她刚一碰到它们，它们便颓萎凋零，她并不知晓自己的双手竟有这般邪力，能令新出炉的面包发霉，令她金质的婚戒变黑，于是她冲着女商贩破口大骂，说她们把最好的货都藏起来了，只给权力之府留下了这些猪才吃的烂芒果，一帮女贼，这个瓜听起来空得跟乐手的葫芦似的，浑蛋，这狗屎肋条上长了虫的污血几里地外就能看见，这根本不是牛肉，是害瘟疫死的驴子的肉，婊子养的，在她声嘶力竭时，她的女仆会挎着篮子，与提着木盆的勤务兵一起，把一路所见的食物都掳个精光，一边打劫一边像海盗般吼叫，声音之尖厉，赛过野狗看到她从爱德华王子岛上活捉回来的蓝狐的尾巴有了雪白的栖身处后的狂吠，用语之刺耳，不输口吐秽语的金刚鹦鹉那血淋淋的模仿，这些鹦鹉在女主人们的暗中调教下学会了她们自己无法随意吼出的强盗莱蒂西娅、婊子修女，它们这样惊叫着飞上了市场穹顶处那些带有颜色陈旧的玻璃树叶的钢铁枝条，它们知道在那里是安全的，可以逃过劫掠般的桑巴帕洛舞的毁灭之风，在玩偶小将军喧杂的童年中，每个礼拜三清晨，这阵风都会刮起，他背起纸牌国王军刀，虽然走路时刀尖仍会拖着地，却愈发地像个男人了，声音也愈发亲切，举止也愈发温柔，他置身于抢劫之中却保持着沉着，保持着冷静、高傲，保持着他母亲反复教导他要保持的不可动摇的体面，好配得上他高贵的血统之花，而她自己却在市场里，在她疯狗般的冲动和酒后的詈骂中，在黑人老妪安然无恙的目光中将这血统之花挥霍，那些裹着鲜亮头巾的老妇人承受着侮辱、观赏着劫掠，她们扇着扇子，

眼睛眨都不眨，带着神像般的深邃平静坐在那里，在凶残的袭击队伍经过时，屏着呼吸，咀嚼着让她们在如此多的不齿行径中得以苟活的烟球、古柯球和镇静药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与她的乌合之军在狂暴野狗高耸的脊背之间破开一条路，和以往一样，在门口大喊着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但她们仍不敢喘息，哦，天哪，要是将军能知道，要是有人把这情况告诉他，她们被幻觉蒙蔽着，以为他至死都将忽略尽人皆知的、他记忆中最为可耻的事，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从印度人的市场中掳走了蹩脚的玻璃天鹅、蜗牛壳做边框的镜子和珊瑚烟灰缸，从叙利亚人的商店中抢走了丧葬用的塔夫绸，从商业街银匠的移动摊位上劫走了一串串金质小鱼和拳头形的护身符，于是他们当面冲她喊，你比那些她围在脖子上的蓝色莱蒂西娅还要像狐狸，她将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只为了满足昔日见习修女的身份留给她的仅有的东西，即糟糕幼稚的品位与不按需索求的恶习，只是这时，蒙上帝之爱，她无须在总督区充满茉莉花香的门庭前乞讨，无须牺牲什么就可以让军用辎重车把她喜欢的东西通通运走，只消说上一句命令般的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便不用再牺牲什么了。这和说跟上帝要钱去吧没有差别，因为那时已没有人确知他是否还存在，他已经隐形了，我们的确在武器广场的小山上看到砌起的高墙，看到权力之屋，它有着做传奇演讲的阳台、挂蕾丝薄帘的窗户以及架在飞檐下的花盆，它每到夜晚看起来就像一艘在天空遨游的蒸汽船，为了迎接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的来访，它被刷成了白色又换上了玻璃球来照明，自那之后，不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且从七西班牙里之外的海上都能看到它，然而这些表象中没有一个能确证他就在那里，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些对生命的炫耀只是为澄清广为流传的谣言而采取的军事策略，传闻说他已经陷进了老年玄思的危机，弃绝了权力的虚荣与奢靡，并强迫自己在一种可怖的颓萎状态中以忏悔苦行的方式度过余生，他身着折磨灵魂的苦行衣，背负各式摧残肉体的铁器

具，除黑面包与井中水外无其他饮食，除比斯开修女修道院禁闭房光秃秃的地板外无任何寝具，直到他偿清了自己违背意志与人发生关系并让一个被封禁的女人怀上男胎的罪过，幸而上帝宽宏大量，她尚未最终宣誓成为正式修女，然而在他广阔的沉重王国中，什么都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掌握了权力之匙，她只需说一句他让把账单拿给政府，那是一个老套的程序，最初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却变得愈来愈恐怖，直到多年之后，一群勇敢的债主带着一个装满欠账单的箱子，壮着胆子出现在了总统府的警卫室，我们很惊讶，因为没人对我们说好，也没人和我们说不，他们只派了一个勤务兵把我们带入了一间中规中矩的等候室，一位海军军官接待了我们，他非常和蔼、年轻，语气徐缓，笑容可掬，他敬了我们每人一杯由总统府出产的咖啡豆制成的寡淡而清香的咖啡，又带我们参观了洁白光亮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窗上都安有铁丝网，简约的天花板下都悬着吊扇，一切都很明净、人性化，让人不禁困惑，那个空气中充斥着药香的政权去哪儿了，那个存在于那些身穿丝绸衬衫、迟缓而沉默地管理各项事务的书记员意识中的权力的吝啬与无情去哪儿了，他带我们参观了天井庭院，里面的玫瑰丛已被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修剪过了，为的是净化晨露，使它们摆脱有着麻风病人、盲人以及瘫痪患者等等已被送到收容所、在被遗忘中等待着死亡的人的记忆，他还带我们参观了妾侍们旧时的棚屋、生锈的缝纫机以及行军床，从前，供他泄欲的女奴甚至需要三人睡在同一张这样的床上，这些充满耻辱的房间就要被推倒，代之以私人圣堂，从窗口向外看去，他向我们介绍了民政大楼内最私密的亭廊三角梅花廊，四点的阳光照在绿绸帷幔上，将整个花廊染上一层金色，他刚与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在那里用过午餐，他们二人是仅有的有资格与他同桌的人，他带我们看了传说中的那株木棉，在它的绿荫下悬挂着那面旗帜色彩的麻布吊床，那是他在燠热的午后休息的场所，他带我们参观了牛棚、乳酪房、蜂房，当我

们顺着他每天清晨去牛棚的小路返回时，他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一般，抬手指出他在烂泥中发现的一个靴印，请看，他说，那是他的足迹，望着那个巨大粗糙的立体靴印，我们都呆若石像，它在宁静中饱含着光辉与权势，同时也散发出一头习惯了孤独的老虎留下的旧时疥疮的腐臭，在那个足迹中，我们看到了权力，感觉到了他的神秘，那揭示的力量竟比我们中的一人被选去见他本人时所能感受到的还要大，因为军方大佬们已经开始谋反，讨伐那个所积蓄的权力已大过最高司令部、大过政府、大过他的女暴徒，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已经戴着她的白色垂耳棉布皇后之冠，走到了这么远，于是总统府最高司令部冒着风险，向诸位中的一人敞开大门，仅此一人，为的是尝试请他出点儿主意，看看国家是怎么背着他运转的啊将军阁下，我就是这样见到他的，他一个人待在白墙上挂着英国骏马版画的闷热的办公室里，坐在吊扇下的弹簧安乐椅上，向后仰着身子，穿着皱巴巴的白色卡其布制服，上面钉有铜扣，没有任何军衔标志，他那戴缎面手套的右手放在木制写字台上，台面上除了三副一模一样的很小的金边眼镜外别无他物，他身后有一个玻璃书柜，一本本书上覆着尘土，看着更像是糊了层人皮的旧账簿，他右手边是一扇敞开的大窗，也安着金属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以及延伸至海另一边的没有云也没有鸟的天空，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看起来他对自己权力的重视程度比不上他的任何一位支持者，并且他本人比照片上要寻常许多，也更值得同情，因为他的一切全是老的、艰辛的，仿佛被一种贪婪的疾病侵蚀了，甚至都没有气力开口让我坐下，只是用缎面手套做了个悲伤的手势来示意，他听着我的论述，眼睛没有看我，呼吸中带着一种纤细而艰难的哨音，那隐秘的哨音在屋里留下了一种木馏油的潮气，他深深地沉浸在翻检我所呈上的账单中，而我用学生的列举方式向他描述着，鉴于他已经无法理解抽象概念，我便开始解释说，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欠钱买的塔夫绸已经有从这儿到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的距离

的两倍那么长了，也就是说有一百九十西班牙里，他说啊哈，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后我向他说明，在为阁下打了特别折扣之后，账目总额相当于一连十年次次彩票中头奖的金额总和的六倍，他又说了一句啊哈，直到那时他才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的眼神是腼腆而宽厚的，直到那时他才用风琴似的诡异声音对我说，我们的理由清楚公道，各人有各人的理，他说，你们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他就是这样，那时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一上来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他从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那儿耳濡目染来的粗蛮，改掉了他边走路边一手拿餐盘一手拿勺子吃饭的习惯，于是他们三人才会在三角梅花廊下的一张小海滩桌上进餐，他与孩子面对面，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则坐在两人之间，教他们用餐时的礼仪与健康规范，教他们把脊柱靠着椅背坐好，叉子在左手，刀子在右手，每吃一口都要在一边嚼十五下，再换到另一边嚼十五下，嘴要闭起来，头要昂起来，他会抗议，这么多条条框框，跟在军营里似的，但她丝毫不予理睬，午饭后她会教他读官方报纸，上面会出现他作为守护者和名誉指挥官的形象，当她看到他在家里的庭院中那棵硕大木棉的树荫下的吊床上躺着时，便会把报纸塞到他手里对他说，堂堂一位国家元首，如果不掌握世界局势，就太不可理喻了，她给他戴上金边眼镜，让他来来回回阅读关于自己的新闻，而她自己则在一旁教孩子把皮球抛出又传回的见习修女的运动，这时他会看到自己出现在那么古旧的照片里，很多张上甚至根本不是他，而是那个为他而死、名字已被他忘记的老替身的，他会发现自己在主持从彗星年代开始他就没再参加过的礼拜二部长会议，他会知晓他的文书部长们用来赞颂他的历史性的词汇，他会在八月下午大片流浪的云朵下的闷热中边读边打瞌睡，一点一点地浸在午休时段黏稠的汗液中，嘴里嘟囔着，这狗屎报纸，他妈的，真不知道人们是怎么忍受它的，他嘟囔道，但那并不愉快的阅读还是为他留下了些什么，因为从短暂轻薄的梦中醒来后，他便已

受新闻的启发想出了某个新主意，他会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替他传令给各个部长，而他们也会请她转达回复，并且试着从她的思想中窥探到他的思想，因为你就是那个我希望来传达我最高思想的人，你就是我的声音、我的道理和我的力量，在那个围困着他而他又无法进入的世界上，她是他在永恒熔岩的喧嚣声中最忠诚最专注的耳朵，然而最终掌控他命运的神明其实是写在仆人厕所墙壁上的匿名词句，从中他可以猜出无人敢向他揭示的隐秘真相，连你也不敢，莱蒂西娅，他会在清晨从牛棚回来的路上，趁负责清洁的勤务兵将它们擦除之前去读上一番，他还命人每天都用石灰把厕所的墙壁抹白，这样一来，便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发泄深藏于心的怨恨的诱惑，在那里他了解了最高司令部的苦闷，知晓了那些在他的庇荫下发迹又在他的背后鄙弃他的人压抑着的企图，当他成功地从那个女恶棍的纸上的显影之镜中参透了人心之谜时，他感觉他就是自己全部权力的主宰，于是在多年之后，他又开始唱着歌，透过雾霭般的蚊帐望着他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搁浅母鲸的晨梦，起床吧，他唱道，我心里已经六点了，海洋已经归位，生活正在继续，莱蒂西娅，在他的那么多个女人中，唯有她的生命是不可预见的，她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几乎一切，只差一项简单的特权：让他在床上与她一同待到天亮，因为他在最后一次做爱后总会离开，会在他的老光棍的卧室门楣上挂起用来逃命的灯，会锁上那三把门环、三个插销、三道门闩，面朝下倒在地上，孤身一人，穿着衣服，与你出现以前他在每个夜晚所做的一样，与没有你以后直到他那孤独溺死者的梦中的最后一晚所做的一样，他会在去过牛棚之后回到你充斥着黑暗之兽味道的房间，继续给你你想要的一切，比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无法计量的遗产还要多得多，比古往今来任何人梦寐以求的还要多得多，而且不仅满足她，也满足她无穷尽的从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无名小岛过来的亲戚，他们除了一身皮囊外一文不名，除了那个相同的纳萨雷诺，别无名号，

那是一个粗俗乖戾的家族，男人鲁莽，女人则因为炽热的贪婪而面红耳赤，他们迅速垄断了盐、烟与饮用水的买卖，那本是他为了打消各兵种的将军们别样的野心而赐予他们的旧时特权，却被莱蒂西娅·纳萨雷诺通过一个个他没有发布却批准了的命令一点点地卷走了，同意，他废除了五马分尸的野蛮刑罚，并用登陆军司令赠予的电椅取而代之，以让我们也能享有文明的杀人方法，他造访了港口碉堡的恐怖实验室，在那里他们挑选最精疲力竭的政治犯来演练如何操控死亡王位，它每一次放电都要耗去全城的发电量，而我们也因此知晓了死亡实验的精确时刻，因为我们的呼吸在那一刹那的黑暗中被恐惧切断了，我们会在港口的妓院里保持一分钟的安静，会为那个受刑的灵魂干杯，不是一杯而是很多杯，因为大部分受难者会带着血肠般的身体和冒着烟的肉挂在椅子的钢带上并且仍在痛苦呻吟，直到几次失败的实验后某个人发善心开枪把他们打死，这都是为了让你高兴，莱蒂西娅，为了你他清空了牢房，再一次批准他的敌人回国，并颁布了一则复活节公告，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因持异见而受到惩罚、因思想问题而受迫害，他在他的深秋中真诚地相信了，哪怕是他最顽固的敌手，也有权享有他在一月迷人的夜晚与那个女人享有的那种欢愉，她是唯一配享有那份荣耀的女人，可以看见他不穿衬衫、只穿长衬裤的模样和那被总统府露台上的月光染成金色的巨大疝气，他们会一同欣赏巴比伦国王王后在那些年的圣诞节前后送来、让他们栽种在雨水庭院中的神秘白柳，会凝视永恒的水上那碎裂的太阳，会仰望被缠进繁茂枝叶的北极星，他们会听落地式收音机的节目探究宇宙，但不时会被一闪而过的星球的嘘声干扰，他们会一起收听每日连播的古巴圣地亚哥的小说，他们的灵魂也因它感染上焦虑情绪，不晓得咱们还能不能活到明天看着这不幸怎么解决，在哄孩子上床睡觉之前，他会陪他玩一会儿，教给他战争武器所有可知的使用和维护之道，关于那门他比任何人都精通的人类科学，他只给了他一个忠告，绝不要下达你不确定能

否被执行的命令，他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放心他不会忘记，一个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人一辈子唯一绝不能犯的错误就是下达他不确定能否被执行的命令，这一忠告与其说来自一位英明的父亲，不如说是出自一位谨小慎微的祖父，那孩子即使与他同样长寿也永生难忘，因为他一边这样教导他一边准备让六岁的他第一次发射后坐力炮，它灾难般的爆炸声让我们错以为是一场干雷暴，伴随着闪电、火山爆发般的轰鸣与来自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的极地狂风，那风将海洋的腑脏翻转，将驻扎在旧时黑奴港口广场上的马戏团的动物席卷上天，于是我们用渔网捞到了大象，发现窒息的小丑和长颈鹿挂在秋千上，然而几小时后到来的运送香蕉的船奇迹般地没有被狂躁的风暴打沉，船上载着年轻的日后将以鲁文·达里奥的名字享誉的诗人菲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幸运的是，海面在四点钟的时候平静了下来，洗涤过的空气里满是飞蚁，他从卧室窗户探出头去，看到了一艘已拆下桅杆的白色小船在港口小丘的庇护中，在被风暴的硫黄净化过的午后，向右舷倾斜着，在缓流中安然行驶，他看到了后甲板上的船长正指挥着繁复的操作以向那位穿深色呢子外套和双排扣马甲的尊贵旅客致敬，他直到这个礼拜日晚上才会听说来客的名字，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向他索求难以想象的恩宠，请他陪她去国家剧院观看诗歌晚会，他眼都没眨就答应了，同意。我们在池座的混浊空气中站着等了三个小时，穿着他们在最后一刻要求众人换上的晚礼服憋闷难耐，当国歌终于奏响、我们鼓着掌转身面向有国徽标识的包厢时，那个矮胖的见习修女出现了，她戴着饰有卷曲羽毛的帽子，身着塔夫绸裙，外披垂坠的夜狐尾巴，她没有行礼便坐在了身穿晚礼服的王子旁边，那孩子捏着缎面手套，用它百合般的空荡的手指向人们的欢呼回了礼，因为他母亲对他说过另一个时代的王子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没在包厢中看到别人，但在两小时的朗诵中，我们内心都承受着他在那里的事实，都感受到了那个监视着我们的命运以免它被诗歌的无序打乱的无形的

存在，在漆黑的包厢角落，他规定着爱、决定着死亡的强度与期限，没有被看到的他在那个角落里看着那头壮实的人身牛头怪，怪物发出如海上霹雳般的声音，将他从他的座位上、从他的时刻里举到空中，未经他允许便让他飘浮在马尔斯与弥涅耳瓦那凯旋门的清亮号角声的金色巨响中，那荣耀不是他的，将军阁下，他看到了扛战旗的骁勇大力士黑色的猎犬钉铁掌的强壮战马戴粗糙羽冠的勇士的长枪长矛，勇士们抓着那面怪异的旗帜，衬托着那些不属于他的武器，他看到了凶猛青年组成的军队顶着赤夏烈日、冒着寒冬风雪，挑战着夜晚、霜寒、仇恨与死亡，为的是那个比他在做赤脚游击队员时于长时间高烧的迷妄中所梦想的那些更为伟大、更为荣耀的不朽祖国的隽永辉煌，在他于阴影中批准的地震般的掌声中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可怜与渺小，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这才叫游行，不是这帮人给我组织的那种狗屎玩意儿，他在倦意中，在长脚蚊、金色劣质漆涂抹的柱子以及尊贵包厢颓萎的天鹅绒间，觉得自己孤独且微不足道，他妈的，那个印第安人怎么可能用擦屁股的手写出这么美的东西，他自言自语道，他因那笔下彰显出的美而兴奋异常，于是拖着他那被俘大象般的腿、和着鼓手击出的战鼓节奏走起来，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会在院中木棉凯旋门的阴影下为他念诵热情合唱团的响亮颂歌，而他会伴着那光辉声音的节奏昏昏欲睡，他会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下诗句，会在牛棚里母牛粪便的温热仙境中试着背下整个诗篇，就在此时，停在车库中总统汽车里的炸弹提前引爆，撼动了大地，太可怕了将军阁下，那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几个月后我们还能在全城范围内找到那辆装甲汽车的扭曲碎片，本来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要在一小时之后坐着它带孩子去礼拜三的市场，所以那袭击是针对她的将军阁下，毫无疑问，于是他一拍脑门，他妈的，我怎么就没早点想到呢，他传奇般的洞察力怎么了，从几个月前开始，厕所涂鸦的矛头就已经不再指向他或偶尔指向他的某些民事部长了，而是对纳萨雷诺家族的肆意

妄为或教会人员的勃勃野心有感而发，前者就要开始啃噬专为最高司令们保留的肥差，而后者则企图从世俗权力中获取不可计量的永恒利益，他发现针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单纯抨击已经变成了鹦鹉口中的辱骂，变成了在厕所中温和的法外之地成熟起来的表达隐秘愤恨的匿名告示，直至最后它们被传到了街上，就像从前各种无伤大雅的丑闻一样，它们是由他自己负责传出去的，只是他从来不曾也无法料到，它们竟能如此凶猛，凶猛到放了两担炸药在总统府的高墙内，这帮阴险的杂种，他怎么可能如此痴迷于那些胜利的青铜，而使他的凶残老虎的敏锐嗅觉放过了散发着古老的甜美气味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紧急召集了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十四位战战兢兢的军人，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平庸工作、发布了这么多年的二手令后，我们又在两寻开外见到了那位不真切的老人，他的真实存在是他的谜团中最没有悬念的，他坐在会客厅中如王位一般的椅子上接待了我们，穿着有臭鼬尿液味道的列兵军服，戴着我们在他最新的肖像中都没见过的精致的纯金边眼镜，比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加苍老与疏离，只有那双没戴缎面手套的虚弱的手除外，它们不像军人应有的手，而像哪个更年轻、心肠更软的人的手，除了它们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压抑阴暗，我们越观察就越能断定，他只剩一口气了，但那一口却是拥有毁灭力量的不可悖逆的威权之气，甚至连他自己都需要使出驯服一匹桀骜野马的力气才能控制住它，当我们尊他为无上的将军领袖并向他敬礼时，他没有开口，甚至连头都没倾一下，直到我们在摆成一圈的安乐椅上面对他坐下后，他才摘下眼镜，开始用那双观察入微的能够发现我们别有用心的负鼠藏身洞般的眼睛端详我们，他毫不留情地观察着他们，一个挨一个，用尽所需要的每一分每一秒来确认自从记忆中那个模糊的下午、那个他随手一指将他们提拔至最高位的下午开始，我们每个人有了多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他愈发深信那场暗杀的始作俑者就在这十四个隐蔽的敌人当中，但他同时又觉得自

己在他们面前是那样孤独而缺乏保护，于是他眨了下眼，微微抬了下头，规劝大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为国家的利益、为军队的荣耀着想，他为他们鼓气，忠告他们要谨慎，而后交给他们一项光荣的任务，毫不手软地揪出暗杀的发动者并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严肃处理，就这些，先生们，他结束了讲话，心里清楚发动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人，或者所有人，他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因为他不可避免地确信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生死并不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智慧，凭借它，他也许能将她从那个早晚会到来并且无法化解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他妈的。他强行取消了她的公开露面，强迫她最蛮横的亲属放弃了所有可能会触及军权阶层利益的特权，将那些最明事理的任命为徒有虚名的领事，而那些最嗜血暴戾的则被我们发现漂浮在市场下水道的烂泥中，他临时出现在部长会议中空了多年的座位上，决定限制教士阶层渗入国家事务，以保证你不受到敌人的伤害，莱蒂西娅，他在做出最初的震撼人心的决定后对最高司令部进行了深入的查探，于是深信，除了总司令这个最老的伙伴外，还有七名将军对他忠心耿耿，然而他仍乏力对付剩下的六个谜团，他们拉长了他的夜晚，让他无可避免地感觉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死期已近，他们正从他双手的空隙钻进来杀她，虽然他严格地检查她的食物，因为之前在面包里发现了一根鱼刺，他测量她呼吸的空气的纯度，害怕他们在杀虫剂中掺杂毒药，他看出她在饭桌上苍白无力，感觉到她在欢爱中声音喑哑，一想到他们可能在她的饮用水里放了黑呕病病菌、在眼药水中投了硫酸，他就备受折磨，精巧的死亡阴谋在那段日子里的每一天都让他苦楚难耐，让他在半夜惊醒，因为在他逼真的梦魇中，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中了印第安人的巫术血流不止，他因为如此多想象中的危险和现实中的威胁而惶惑失措，于是命令她出门时必须带上勇猛而训练有素的可以无条件杀人的总统护卫队，但她走了将军阁下，还带着孩子，他拼命抑制着不祥的预感，看着他们上了新的装甲车，他站在天井阳台上

用驱邪的手势向他们告别，乞求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守护他们吧，让子弹打在她的紧身背心上反弹出去吧，让鸦片瘾平息吧，让扭曲的思想都被矫正吧，他一刻不停地祈祷，直到听见武器广场上传来警笛声，直到看见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沐着灯塔最初的几缕光线穿过庭院，她激动而快乐地回来了，身边的卫队成员背着为圣诞节期间的夜晚准备的活火鸡、恩维加多的兰花与彩色串灯，街上也已有圣诞夜的宣传广告，那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安而命人制作的有闪亮星星的牌板，他在楼梯上迎接她，好在蓝狐尾巴的樟脑丸味的湿气里、在你病人的发绺的酸臭汗液中感受你仍然活着，他帮你把礼物送到卧室，莫名其妙地笃信自己正在享用那场他宁愿未享用的该死欢乐的最后碎片，他越是确信自己为缓解无法承受的焦虑而采取的每项措施、为帮她避灾而走的每一步都将他无情地推向那个逼近的我的不幸的恐怖礼拜三，他便越是绝望，那天他做出了重大决定，不干了，他妈的，该来就快点儿来，他决定了，而那仿佛一个爆破令，还没来得及下达完就有两个副官闯入办公室报告了可怕的消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被市场里的野狗撕碎了，被它们一块块地吃掉了，活活吃掉了将军阁下，但它们不是寻常的街头野狗，而是一群猛兽，有着惊悚的黄眼珠和光滑如鲨鱼的皮，是有人养来对付那些蓝狐的，六十只一模一样的狗，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从蔬菜摊中窜出来扑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身上的，没给我们留一点射击的机会，因为我们怕错杀了他们，因为他们仿佛与那些狗一起憋在了地狱的旋涡中，我们只看见几只手向我们伸来一晃而过，其余的身体则在一块一块地消失，我们看到了几抹转瞬即逝、难以捉摸的表情，时而恐惧、时而悲哀、时而喜悦，它们最终都陷落进了抢夺的旋涡，只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淡紫色毛毡帽还在图腾柱般的女菜贩那冷漠的恐惧前飘浮，她们身上溅上了滚烫的鲜血，都在祷告说我的上帝啊，如果将军不想，或者至少，如果他不知情，这事便不会发生，这将是总

统护卫队永难抹杀的耻辱，因为他们一枪未放，只救回来了散落在鲜血淋漓的蔬菜上的白骨，没有别的了将军阁下，我们唯一找到的是孩子的这些奖章、没了流苏的军刀，以及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羊皮鞋，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市场一西班牙里远的海湾，在水上漂着，还有彩色玻璃项链、钩织钱包，这些我们现在都交到您手上，还有这三把钥匙、这枚发黑了的黄金婚戒，以及这些放在写字台上请他数算的面值十分一共五十分的硬币，没有别的了将军阁下，这是他们留下的全部东西。如果那时候他知道自己不用太多年也不用太艰难就会将那个无法避免的礼拜三的最后一丝记忆彻底抹去，那么他们留下的东西再多一点或再少一点对他来说也便无关紧要了，他愤怒地哭着，因拴在院中过夜的狗的叫声而备受烦扰折磨愤怒地吼叫着醒来，同时琢磨着我们拿它们怎么办将军阁下，他茫然自问，是不是杀了那群狗就相当于把它们肚子里的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再杀一遍，他命人推倒了菜市场的钢铁穹顶并在原地建起了一座玉兰花与鹌鹑的花园，园中安置了一座大理石十字架，它散发的光辉比灯塔的光芒更高更亮，好让后代直至时间的尽头仍记得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女人，一个早在那座纪念碑被一次夜间爆炸摧毁之前便已被他忘怀的女人，纪念碑后来也无人重建，玉兰花都被猪吃了，纪念公园也沦为充斥着恶臭烂泥的垃圾场，对此他一无所知，这不仅因为他命令总统司机哪怕绕世界一个圈也要避免经过从前的菜市场，还因为自从将办公人员送到各部委的阳光玻璃楼后，他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只是和极个别留下来的公务人员生活在那栋破败屋宇内，那里依他的命令，不再留存皇后你的迫切需求的任何痕迹了，莱蒂西娅，他在空洞洞的府中游荡，不处理任何为人所知的事务，只是回复司令部偶尔的问询、为某场艰难的部长会议做最终决断，或是应付威尔逊大使居心不良的来访，大使总是在木棉的繁茂枝叶下陪伴他直至午后许久，给他带来巴尔的摩的糖果和印有女人裸体彩画的杂志，以试图说服他将领水卖给

他作为巨额外债利息的抵偿，他任他一直说着，只随自己的需要装出比实际能听见的更多或更少的样子，他听着隔壁女校的学生合唱着上了色的小鸟停在青柠檬树枝上，借此抵御对方的巧言令色，暮色初降时，他会一直陪他走到楼梯口并试着对他解释，您可以带走任何您想要的，只除了我窗外的这片海，您想想，如果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在这个时间看到它，看到那个火焰的泥塘，我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了十二月从破玻璃窗钻进来的呼呼风声我该怎么办，如果不见了灯塔的绿光我该怎么活，我离开了我雾蒙蒙的高地荒漠去参军，在联邦战争的混乱中发高烧差点丢了性命，您要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字典上说的爱国主义，也不是出于冒险精神，更不是说我会在乎什么上帝在他的天国践行联邦制准则，不是，我亲爱的威尔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看看海，所以您还是想点儿别的吧，他说，他会在楼梯上拍拍他的肩膀与他告别，折回去时把老办公室废弃厅堂的灯都打开，其间有一个下午，他在那里撞见了一头迷路的母牛，于是便往楼梯方向轰赶它，那牲畜被地毯上的补丁绊了一下，一头栽倒滚下去，扭断了脖子，这可为麻风病人提供了乐趣和吃食，他们一哄而上想将它扯碎，这些人是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死后回来的，再一次和盲人及瘫痪患者聚在了院中的野玫瑰丛里，一起企盼着他手中的治病之盐，他会在有星星的夜晚听见他们唱歌，会和他们一起唱起那首他荣光年代的歌曲苏珊娜来吧苏珊娜，他还会在下午五点从谷仓的天窗探出头去看放了学的女孩子，那些蓝色校服裙、齐踝短袜与发辫让他看得入迷，母亲啊，我们会被那双仿佛患了结核病的鬼魅的眼睛吓跑，他就在那些铁条间，用破手套残缺不全的手指招呼着，小姑娘，小姑娘，他会这样叫我们，过来让我摸摸你，他会一边看着她们惊慌逃离，一边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现在的年轻人可真年轻，他会自嘲，不过又会在请私人医生卫生部长来吃午饭时与自己和解，部长每次都会举着放大镜为他检查视网膜，还

会测量他的脉搏，并试着强迫他吃下一勺勺富含钙和维生素的药片好堵住我的记忆的下水道口，真是胡闹，还给我喂药，我这辈子可是除了战争期间的间日疟，还没得过什么灾病，狗屎医生，于是孤独的桌上就只剩下他一人仍在吃，他背朝着世界，因为马里兰来的博学的大使之前告诉过他，摩洛哥的国王王后就是这么吃饭的，他遵守着那个已被遗忘的女老师的严格规定，昂着头手握刀叉，他会跑遍整座房子去找刚藏完几小时便会忘记放在哪儿了的小瓶蜂蜜，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些记事本的空白页边卷成的纸卷，那是他在从前的某个时代写下的，以备日后有一天什么都不记得时仍可以什么都不忘记，他读到一张，明天是礼拜二，他念道，在你的白手绢上有一个词的首字母，一个不是你名字首字母的红色字母，我的主人，他好奇地念道，我的灵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看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他到处都能念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名字，却不能明白一个人要有多么不幸才能写下那串叹息，但这些是我的字迹，是那时厕所墙上独一无二的左手书写的字体，在那里他写下了将军万岁来安慰自己，万岁，他妈的，就为了一个从修道院跑出来的女人而沦为陆海空三军将士中最软弱的一个，他曾因此而愤懑，但这怒气已彻底消散，至于那女人，眼下已如他早先判断的一样，只剩下纸条上用铅笔写下的名字而已，他甚至都不愿再碰副官们放在写字台上的东西，看都不看就命令道，把那双鞋、那些钥匙，把所有能让人想到他们的死亡画面的东西都拿走，把所有曾属于那两人的东西都放到那间他们毫无节制的午休的卧房中去，将门窗封上，他最后下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让进都不许进，他妈的，他认为对那些狗的任何伤害都会再次令他的亡者疼痛，于是几个月来一直把它们拴在院中，夜里它们可怖的叫声令他不寒而栗，但他艰难地活了下来，在吊床上自暴自弃，愤恨得颤抖痉挛，因为他明知谁是杀害他亲人的凶手，却不得不忍气吞声，还要在自己的屋子中与他们见面，因为那时他缺乏对抗他们的力量，他始终反对举

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禁止吊唁性质的探望与服丧，他在那棵木棉的庇佑下，在阴凉中的吊床上躁怒地晃来晃去，等待着他的时刻到来并听我最后一个兄弟表达了最高司令部的得意，因为民众平静有序地承受了这场悲剧，而他微微一笑，别傻了朋友，什么平静什么有序，对这些人来说，这不幸就他妈的不算什么，他将报纸翻来覆去地反复研读，希望在他自己的出版机构杜撰的消息之外，再找到别的什么，他把收音机放在手边，听着从韦拉克鲁斯到里奥班巴的每个电台对同一条新闻的播报，说军队已经掌握了刺杀发动者的可靠线索，于是他喃喃道，当然了，你们这帮狼蛛崽子，他们已经确凿无疑地认定了他们的身份，当然了，还用迫击炮包围了躲在郊区一个地下妓院里的他们，好了，他叹息道，可怜的人啊，他仍旧待在吊床上，没有流露出一丝邪恶的神色，只是哀求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给我生命让我复仇吧，别松开你的手，母亲，给我些启发吧，他深深相信祈祷的力量，因而等我们这些负责维护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最高司令去向他报告时，看到他已经走出了伤痛，我们告诉他已有三名罪犯在与警方的交火中死亡，另外两名被关在圣赫洛尼莫的牢房中待您处置将军阁下，他坐在吊床上说了句啊哈，手中拿着罐果汁给我们每人分了一杯，平心静气得仿佛一名出色的神枪手，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更谨慎殷勤，他甚至猜到了我想抽根烟的渴望，竟然打破不许现役军人抽烟的禁忌，给了我许可，在这棵树下咱们都一样，他说道，而后便开始不带怨愤地听起市场凶案的详细报告，他们从苏格兰分批把八十二只初生的猎犬带来，其中的二十二只在驯养过程中死掉，六十只接受了一个苏格兰驯兽师邪恶的杀人训练，被灌输了一种意在犯罪的仇恨，不仅针对蓝狐，也针对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本人及孩子，借助的是这些他们一点点从民政大楼洗衣房偷出来的衣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这件紧身背心、这块手绢、这些短袜，孩子的这一整套制服，我们把它们展示在他面前让他确认，他却看都没看，只说了句啊哈，

我们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训练那六十只狗，尤其是在不该叫时要保持沉默，他们让它们习惯并喜欢上人肉的滋味，一连进行几年的艰苦训练，将它们关在离首都七西班牙里的中国人的旧农场内，与外界隔绝，那里有穿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衣服的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还有这些原版画像和剪报，用来让那些狗认识他们，我们把它们都贴在了一个相册上，好让您看清这些杂种无懈可击的活计将军阁下，不管其他人怎么样，他竟看都没看，只说了句啊哈，最后，我们对他说，凶手并不是自发行动的，当然了，他们只是一个反动兄弟会的代办人，兄弟会基地在国外，标志是这个刀与鹅毛交叉的图案，啊哈，他们都是有前科的逃犯，犯过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上过军事法庭，我们在相册上给他指出这三个已死的罪犯，图片上的他们脖子上都挂着各自的备案编码，这两个是还活着的，正在监狱里等待您不容更改的判决将军阁下，他们是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三岁，前者是部队逃兵，没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后者是工艺美术学校的陶艺教师，见到他们俩那些狗兴高采烈、十分亲密，这一点就足以作为罪证，将军阁下，而他只说了句啊哈，然后在当天的议事表格中记录下了三名破案的警官，并在一场庄严的仪式上授予他们军功奖章，表彰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就在那场仪式上，他决定速战速决，即刻审判了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并宣布处以死刑，四十八小时之内执行枪决，除非您能开恩将军阁下，您说了算。他一直孤独而出神地待在吊床上，对全世界要求赦免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国际联盟毫无成效的辩论，听到了邻国的谩骂和一些遥远国家的声援，他同样仔细地听了部长们的看法，他们有的委婉地支持网开一面，有的尖锐地陈述应当严惩不贷，他拒绝接见带着罗马教皇私人信函前来的使节，信中表达了教皇对那两只迷途羔羊的命运的关切，他听说全国的秩序因他的沉默而紊乱，他听见了遥远的枪

声，感受到了大地因一艘停泊于海湾的战船无来由的爆炸而震动，十一人死亡将军阁下，八十二人受伤，船只报废，同意，他一面说着，一面从卧室窗口望向海湾燃烧的夜火，与此同时，那两个死刑犯在圣赫洛尼莫基地灼热的圣堂内开始他们的最后一夜，他在照片上看到了他们遗传自同一位母亲的竖立眉形，于是想到了他们，想到了死亡狱室里永远亮着的灯盏下、颈上挂着相连两个号码牌的颤抖而孤独的他们，他感觉他们正想着他，知道他在被需要、被哀求，但惯常地重复了生命中的又一天后，他没有做任何会模糊自己意志方向的微小动作，他与侍从道了别，后者将通宵守在卧室前，时刻准备传达他在鸡鸣前下达的口谕，他经过时向他道了声晚安，上尉，但没有去看他，他将灯挂在门楣上，锁上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趴着沉入了一个警觉的梦，透过它脆弱的薄墙，他仍能听到院中群狗焦渴的叫声、救护车的警笛声、鞭炮声，以及在这个被严酷的判决搅得人心惶惶的城市的空气中飘荡着的一场可疑欢庆会的阵阵乐声，他在大教堂十二点的钟声中醒来，在两点时又一次醒来，在三点前打在窗户铁栅上的噼啪的雨声中再一次醒来，于是他以阉牛的姿势艰难地从地上起身，先抬起臀部，而后是前腿，最后是那颗茫然的、下唇上挂着一线口水的脑袋，随后他下了第一道命令，让安保官员将那群狗带到我听不见它们叫声的地方去，由政府负责照顾，直到它们自然死亡，第二道命令，他赋予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卫队士兵无条件的自由，最后一道命令，一得到我这条不得上诉的最高指示就立即执行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的死刑，但地点不是人们预想的枪决墙前，而是已废弃的五马分尸刑场，两人的肢体将被带到他过去浩瀚的沉重王国里最显眼的地方，曝于公众的激愤和恐惧之中，可怜的小伙子们，他一边拖着自己如受重伤的大象的脚掌般硕大的双脚，一边愤懑地哀求，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帮帮我吧，别松开你的手，母亲啊，让我找到那个能帮我报这无

辜血仇的人吧，一个他在怨恨的谵妄中想象出的上天注定的人，他带着不可遏止的渴求在眼皮底下找寻着他，他试着在声音最纤细的痕迹中、在心脏的搏动中、在回忆里最被忽视的罅隙中发现躲藏着的他，当他已不再指望能找到他时，却发现自己被我亲眼见过的最耀眼最高傲的人吸引住了，母亲啊，他好像从前的那些哥特佬一样，身着亨利·普尔牌上装，扣眼中插一枝栀子花，搭配派克维的裤子，外套一件泛着银光的锦缎马甲，散发着自然的优雅气质，并用皮带牵着一只有人类眼睛和牛犊身形的沉默的杜宾犬，在欧洲最难跻身的沙龙中大放光彩，在下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愿为阁下效劳，他自我介绍道，他是被联邦考迪罗扫除的我们的贵族阶层所遗留的最后子嗣，这一阶层连同他们贫瘠的伟大梦想、他们空阔而忧郁的豪宅与他们的法语口音，都被从这国家的脸面上扫除了，他是这个族群的绚烂尾声，除了三十二岁的年龄、七种语言以及在多维尔保持的四项射鸽比赛的纪录之外，他别无所有，他身形颀长而结实，皮肤呈铁色，混血人的头发梳成中分，其中一绺染成白色，两线薄唇透着永不屈服的毅力，有着天佑之人的果敢眼神，他握着樱桃木手杖在宴会厅田园春色的哥白林织毯前装出打板球的样子，让人为他照彩色相片，在看到他的那一刻，他松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就是他，于是就是他了。他投入了工作，并附以简单的承诺，您先支付我八亿五千万并允许我不用向任何人报账，除阁下您之外，我不再听命于任何人，两年之内我会向您交出杀害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及孩子的真凶的脑袋，他接受了，同意，在将权力之匙交到他手上之前，他让他经历了多场艰难的考验，以观察他精神的险境、他意志的局限、他品性的瑕疵，确证了他的忠诚和效率，在最终考验他的残酷的多米诺骨牌局上，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展示出了无所畏惧地擅自战胜他的魄力，于是他赢了，他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大胆的人，母亲啊，他的耐心没有死角，他什么都知道，懂得七十二种煮咖啡的方法，分得出海

贝的性别，读得懂乐谱和盲文，他会站在那儿盯着我的眼睛，也不说话，而面对他坚毅的脸庞、他懒懒地拄着樱桃木拐杖的双手、他无名指上戴着的晨水石，面对躺在他脚边的那只大狗，那只裹在天鹅绒般的睡着了却有生命的皮肤中警醒而凶狠的狗，面对他那副对柔情与死亡免疫的身体，那副我见过的最俊美最自制的男人的身体所散发出的浴盐香气，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时他鼓足勇气对我说，若不是出于义务，我不会当兵的，因为那些军人都是和您完全相反的人，将军，他们的野心很肤浅，一会儿就没有了，相比权力，他们对管事更感兴趣，他们不为某件事服务只为某个人干活，因此，想利用他们太容易了，他说，尤其是用其中一些人去对付另一些，我知道在那个人面前隐瞒不住自己的想法，于是只好笑了笑，他给了他继我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愿他已安坐于上帝右侧的圣位——之后在他的统治下无人能及的权力，他使他成为他的私人帝国中一个秘密帝国的绝对主人，那是一项执行镇压与灭口任务的隐形工作，不仅没有一个官方身份，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因为无人负责它的行动，它连个名称、连个在这世上的落脚地都没有，然而它的确是一个可怖的事实，在最高司令部确认它的由来与深不可测的性质之前，它便早早地被诉诸恐怖手段并且凌驾于国家的其他镇压机构之上，即便您自己都没有预见到那台恐怖机器的作为，连我自己都不怀疑在他接受协议的那一刻，我便开始任由那个穿得像王子一样的野蛮人不可抗拒的魅力、任由他欲望的触角摆布，他给总统府寄来了一个龙舌兰叶编织袋，像是塞满了椰子，于是他命人将它拿到那边不碍事的地方，放进一个嵌入墙内装满资料的文件柜中，而后就把它忘记了，三天之后，府中便无法住人，牲畜尸体的腐烂味道穿墙而出，散着恶臭的水雾污染了镜面的光泽，我们去厨房寻找那臭气，在牛圈中也闻到了它，我们用薰香驱赶办公室里的味道，但它又散进会客厅去与他们碰面，它满溢着腐烂玫瑰的臭味渗入最隐蔽的缝隙，即便在当年的瘟疫

时期夜晚空气中的种种香味里藏匿的疥疮那最细微的气息都无法钻入那里，事实上它在我们最不会去寻找的那个似乎装着椰子的口袋中，那是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按协议寄来的第一批成果，是六颗分别附有死亡证明的头颅：石器时代的盲人显贵堂内波穆塞诺·埃斯特拉达的头，九十四岁，仅剩的一名经历过大战的老兵、激进党派创始人，据附加证明所述，他于五月十四日死于老年性衰竭，内波穆塞诺·埃斯特拉达·德拉富恩特医生的头，前者之子，五十七岁，顺势疗法医师，据附加证明所述，于他父亲死亡的当天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埃利埃塞尔·卡斯托尔的头，二十一岁，人文科学学生，据附加证明所述，因在食堂里的一场斗殴中被利器刺伤多处，不治身亡，莉蒂瑟·圣地亚哥的头，三十二岁，地下活动家，据附加证明所述，因非法堕胎而亡，洛克·宾松的头，绰号无影者哈辛托，三十八岁，彩球制造者，于前者死亡当天因酒精中毒而亡，最后是纳塔利西奥·路易兹的头，十月十七日秘密运动的秘书，三十岁，据附加证明所述，因情场失意用手枪射穿上腭而亡，共六个，他一边在臭气与惧意的搅扰下火冒三丈地签下相应的收条，一边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这个男人是头野兽，光看他那神秘的气息和扣眼上的花朵，谁能想象得到呢，他命令道，别再给我送肉来了，纳乔[3]，有您的一句话就够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反对说，那是君子之约，将军，如果您没有胆量直面真相，那就拿回您的金子吧，咱们还和从前一样是朋友，这算什么事儿，为了比这少得多的钱，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能枪毙，但他没说出口，这倒不至于，纳乔，他说，尽您的责任去吧，于是一颗颗脑袋就这样被装在那些晦暗的像装了椰子的龙舌兰叶编织袋中滚滚而来，而他则会恶心得反胃，一边命人把它们拿得远远的，一边阅读详细的死亡证明以便签署收据，同意，在签下第九百一十八个他最激进的敌对者头颅的收条的夜晚，他梦见自己

变成了一只仅有一根指头的动物，在潮湿的水泥平原上留下一串指印，他带着苦涩的胆汁醒来，摆脱清晨的不悦，在挤奶棚有酸臭回忆的粪坑中数算着脑袋的数量，他深深地沉浸在他老年人的思绪中，以致混淆了鼓膜的嗡鸣与腐烂草叶上昆虫的叫声，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已经这么多脑袋了，怎么会还不见那些真凶的，但萨恩斯·德拉巴拉让他注意到，每六个脑袋都会制造出六十个敌人，每六十个都会制造出六百个，之后是六千个，再之后是六百万个，整个国家，他妈的，咱们永远都搞不完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无动于衷地回应说，您安心睡吧将军，等他们都完蛋了咱们也就搞完了，真野蛮啊。他从未有一刻犹疑，从不留一丝余地，他倚仗着那只永远待命一旁的杜宾犬的隐秘力量，虽然他在初次会面时便试图将它拒于门外，但它还是成为他们会面的唯一见证者，当时他看到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拽着那只神经躁动的动物，它只听从于那个我的双眼所见过的最潇洒英俊但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人那深微的控制，把狗留在外面，他命令道，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回答他，不，将军，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我能进而科赫尔勋爵不能进的，于是它就进来了，它会一直趴在主人脚边睡觉，而他们二人则会按惯例计算被砍下的脑袋数目，当计算变得艰难时，它会带着令它呼吸困难的焦虑立起身来，它的女性的眼睛搅扰我思考，它的人类的气息让我不寒而栗，当他看到袋中有一颗脑袋是他过去的侍从同时也是多年的多米诺骨牌牌友的，便愤怒地一拍桌子，此时我看到它直起身子，鼻头喷着气，发出高压锅振动的声音，他妈的，这乱摊子就到这儿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每次都能说服他，主要并不在于他有理有据，而是因为他那野狗训练师的温柔的严酷，他斥责自己竟对这世上唯一敢待他如臣子的人这般顺从，那个人可是在以一己之力反抗他的帝国，于是他决定摆脱正在一点一点填满他威权空间的奴性，这乱摊子就到此为止了，他妈的，他说，说到底，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把我生下来不

是要让我领受而是让我发布命令的，然而这夜间所下的决心在萨恩斯·德拉巴拉进入办公室的那一刻就立即崩塌了，他那温和的姿态那天然的栀子花那纯净的声音那芬芳的浴盐那祖母绿的皮带那石蜡般的拳头那宁静的手杖那庄重的美，这属于我的双眼所见过的最令人爱慕又最教人无法容忍的男人的炫目的一切让他屈服，不至于这样，纳乔，他再次向他重申，尽您的责任去吧，然后继续收着那一袋袋的脑袋，继续看都不看就签下收据，他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他权力的流沙，在每个清晨每次路过每片海时都问自己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马上就要十一点了，这栋坟墓似的房子里怎么一点生气都没有，有人吗，他问道，只有他，我在哪儿，为什么找不到自己了，他说道，那群赤脚勤务兵在哪儿，他们会挤在走廊上从驴子身上卸下蔬菜和鸡笼，我的妾侍们的污水坑在哪儿，她们满嘴秽语，会用新鲜花朵换下过夜的花，会清洗鸟笼，会在阳台上伴着枯枝敲打地毯的节奏唱着苏珊娜来吧苏珊娜，我想拥有你的爱，我那些瘦弱的七个月的早产儿在哪儿，他们会在门后大便，会往会客厅的墙上撒尿画骆驼，我的那群喧闹的官员怎么了，他们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母鸡在下蛋，我的妓女和士兵怎么了，他们会在厕所里来来往往，我的躁动的流浪狗怎么了，它们会边跑边向外交人员吼叫，谁又把我的瘫痪患者赶下了楼梯，把我的麻风病人轰出了玫瑰丛，又让我勇敢无畏的谄媚者从所有地方消失，他在重新组建的私人护卫队的紧密包围中隐约瞥见了他最高司令部的最后几位朋友，他们几乎没有给他参与新内阁会议的机会，这些内阁成员是应一个人但不是他的要求重新任命的新部长，有六个穿尖领丧袍的文科博士，他们会比他先有想法，不向我询问就擅自处理政务，可是说到底，我就是政府啊，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无动于衷地向他解释，您不是政府，将军，您是权力，他厌倦了熬夜打多米诺骨牌，因为尽管是和最老练的好手对阵，尽管他费尽心思为自己设下最高明的陷阱，都输不了哪怕一局，他必须屈从于那些在他吃饭前一小时就将

他的食物糟蹋掉的试吃官的计划，他在储藏蜂蜜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它们，他妈的，这不是我想要的权力，他抗议道，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回应他说，没有别的权力，将军，这是死亡的迷睡中唯一可能拥有的权力，那迷睡一度是他的礼拜日市场般的天堂，而此时他已无事可做，只能等着四点一到收听本地电台每日连播的乏味的爱情故事，他会在吊床上听着，手里拿一杯一口未喝的果汁，飘浮在悬吊的空虚中，泪眼朦胧，焦急地想知道那个年轻的女孩会不会死，萨恩斯·德拉巴拉查清楚后说，是的将军，那女孩要死了，让她不要死，他妈的，他命令道，让她活到最后结婚生子然后变老，像所有人一样，于是萨恩斯·德拉巴拉修改了剧本以博他欢心，让他以为自己还大权在握，于是遵照他的命令没有人会死，为了让将军阁下高兴，不相爱的情侣结婚了，前几集中被埋葬的人物复活了，恶棍提前献身了，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命令开心幸福，这样一来，生命对他来说便显得不那么没有意义了，当八点的金属敲击声响起时他会检查一遍宅子，会发现有人抢在他前面将母牛的饲料换过了，总统护卫队营地的灯已经熄了，公务人员入睡了，厨房齐整，地板洁净，用克勒奥林擦得不留一丝血迹的屠宰桌透着股医院的味道，虽然只有他才有那串钥匙，但已经有人将窗户的插销插上了，将办公室的门也都锁上了，从第一门厅直至他的卧室，那一盏一盏灯在他按开关之前就灭掉了，他拖着他那被囚禁的君王的笨重双脚在黑暗中走着，路过一面面晦暗的镜子，唯一的一个马刺上裹着天鹅绒套，以免任何人追踪他那星星点点的金色行迹，他在经过那些窗口时望着同一片海洋，一月的加勒比，他脚不停步地欣赏了二十三遍，在一月里它始终如一片绚烂的沼泽，他向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房间探进身去，想看到她留下的蜜蜂花、死鸟的笼子与族母长在其上度过腐烂晚年的痛苦床榻都还在原来的位置，愿您晚安，他喃喃道，同以往一样，尽管早就没有人回应他，愿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孩子，在上帝的佑护下睡吧，他提着用来逃命的灯向自

己的卧房走去，这时突然感受到了阴影中科赫尔勋爵的瞳孔里那骇人炭火的寒意，他闻到一阵男人的香气，感受到了他的操控力的分量和他的鄙夷中的慑人光辉，是谁，他问道，虽然他知道是谁，是穿着礼服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来提醒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夜晚，八月十二日，将军，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都在庆祝您上台执政的第一个百年纪念日，所以世界各地的宾客都慕名而来，因为哪怕是寿命最长的人，一生也不可能参加类似的盛事超过一次，举国都在庆祝，只有他除外，尽管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坚持让他在他的人民的呼喊与激昂中度过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却比以往都更早地锁上了卧房的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趴在光秃秃的砖面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裹着绑腿，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一如我们将找到的那个被兀鹫啄食、被深海动物和花朵覆盖的他，透过安眠药水瓶滤嘴上的氤氲，他感觉到了没有他的庆典上那遥远的爆竹，感觉到了欢快的音乐、喜乐的钟声和仿如烂泥洪流般的人群，他们都来颂扬一份不属于他的荣耀，而他并不太感伤，只是痴迷地呢喃着，我的命运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一百年了，他妈的，已经一百年了，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啊。

---

[1]即以马内利，意为“天主与我们同在”。

[2]希腊神话中被宙斯赋予了神奇魔力的一只羊角，能生出各种美味佳肴。

[3]伊格纳西奥的昵称。

他就在那里，虽然那也许并不是他，却仿佛就是他，躺在宴会厅长餐桌上的鲜花中，带着死去教皇的女性光彩，这样的光彩让他在他第一次的死亡展示仪式上没有认出自己，那个死了的他比活着的他更可怖，一只填充着棉花的缎面手套放在胸口，胸前别满他无畏的谄媚者杜撰的巧克力战争虚假胜利的勋章，身上是奢华的晚会制服，腿上裹着漆皮绑腿，戴着我们在府中找到的唯一马刺，还有那十枚宇宙将军的悲凉太阳的徽章，那名号是最后一刻强加在他身上的，为了给他一个比死亡更高的级别，以死后新身份出现的他如此切近、清晰，令人终于能对他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虽然事实上没有人比那具玻璃棺中的尸体更不像他、没有人比它更像他的对立面，那尸体直至半夜仍在炽热棺盒的狭小空间内受着慢火煎熬，而在隔壁的政府议会厅内，我们正一字一句地讨论着那则无人敢相信的消息的最终通告，这时一辆辆卡车的噪声唤醒了我们，车上载着全副武装的部队，他们的秘密巡逻队自清晨起就占领了公共建筑，有的匍匐在商业街拱廊下的地面上做好了射击准备，有的藏在门厅中，黎明时分我推开自家的阳台门想找个地方摆放刚从院中剪下的湿漉漉的石竹时，看到他们正在总督区的一个个屋顶平台上架起三脚架机枪，看到阳台下方有一支由中尉指挥的巡逻队正在商业街上逐个命令几家已经营业的商店关门，今天是全国休息日，中尉喊道，这是最高指示，我向他们扔下一枝石竹，问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到处都有这么多士兵这么多枪炮声，那名军官从空中接住石竹，回答说，你自己想吧小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可能那死人又活了吧，他说着大笑起来，没有人敢想发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那是他在多年的淡泊之后重新抓起了他威

权的缰绳，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在玻璃球再次亮起的权力之屋中又一次拖动他那双虚幻君王的大脚，我们认为就是他放出了那些母牛，它们走在武器广场上，踢踏着铺路石的裂缝，广场上垂死棕榈树的绿荫下坐着那位盲人，他因为分辨不清牛蹄与军人靴子的声响，放声背诵着讲述远道而来战胜死亡的幸福骑士的诗句，还将手臂伸向那些习惯了上下楼梯去进食因而爬向音乐亭吃凤仙花花环的母牛，它们在头顶野山茶花冠的缪斯残躯和挂在国家剧院废墟中的里拉琴上的长尾猴间住了下来，因口渴难耐，它们伴着广藿香花盆嘈杂的破碎声闯进了总督区房屋门厅中的阴凉，纷纷把快要冒烟的嘴浸入天井庭院的池塘，但没有人敢打搅它们，因为我们认出了它们与生俱来的总统烙印，母的在臀部，公的在颈部，它们是碰不得的，连那些士兵在商业街的狭窄路段都会为它们让路，那条街昔日那地狱般的摩尔集市的喧嚣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滚烫沼气池中满是碎烂肋条和杂乱桅杆的垃圾堆，当年我们还有海的时候，那里曾是一个公共市场，轻便船会停靠在菜摊旁，余下的一处处空地在荣光年代则是印度人的市集，不过印度人都走了，他们甚至没说声谢谢将军阁下，于是他吼道，他妈的，因暮年最后的怒火而茫然失措，滚蛋，都给英国人擦屁股去吧，他吼道，所有人都走了，在他们原先的地方又冒出卖印第安人护身符和蛇毒解药的摊位以及卖唱片的疯狂小店，小店后屋还出租床位，当士兵用枪托砸毁它们时，大教堂的铁钟敲响了哀痛的讣告，一切都在他消亡前消亡了，我们已在没有希望的守望中耗尽了最后一口气，我们曾希望那一再流传却永远被澄清的说他终于没能抵挡住某一种帝王疾病的传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现实，然而现在，我们却不相信它居然发生了，倒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而是因为我们不再希望它成真，到头来我们已不清楚没了他我们会怎样，不清楚在他死后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无从想象一个没有了那个男人的世界，他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带给我幸福，而且之后再没有谁能带给我那种感觉，那是很

久以前的下午，我们会在五点放学，他则会趴在牛棚的天窗口一边窥看那些穿着蓝色水手服、麻花辫垂在背后的女孩，一边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在我的年纪看来，女人是多么美啊，他会叫我们，我们会看到他颤巍巍的双眼，还有那只手，戴着手指处破了洞的手套，像摇铃铛一般摇着福布斯大使的糖果，试图引诱我们，所有女孩都吓跑了，所有人，但不包括我，我趁着没人看见，独自留在学校外面的街上试着去够糖果，于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仿佛老虎一般给了我温柔一爪，一点都没弄疼我，而后把我举到空中，又从天窗口抱了进去，动作那样小心，没有把我的衣服弄出一丝皱褶，他把我放在被陈年尿液染香的饲草上，试着告诉我一些他那干涸的口说不出的东西，因为他比我还要惊恐，他颤抖着，从他的上衣能看到他心脏的跳动，他面色苍白，眼里满是泪水，在我整个流亡生涯中再没有一个男人为我流过这样的眼泪，他静静地抚摸着我，缓缓地呼吸着，用我永不会再遇到的男人的温柔探索着我，他使我胸脯的花蕾绽放，他的手指从我内裤的边缘探进，沾染上某种味道，他让我闻，闻闻，他对我说，这是你的味道，他无须再借助巴尔德里奇大使的糖果便能让我从牛棚的天窗钻进去，去和那个内心健康而感伤的男人共度我青春岁月的幸福时光，他会带着一袋食物在饲草上等我，会用面包擦去我最初的少女的酱汁，会在吃东西前先把它们放进那里，喂我吃下，会把嫩芦笋放进我那儿，用我咸味的体液腌制，真鲜美，他对我说，你的味道像港口，他会幻想将我的肾脏放在他自己含氨的汤水中烹煮享用，放上你腋下的盐，他幻想着，加上你温热的尿液，他从脚到头将我肢解，用石盐、辣椒、月桂叶为我调味，把我放入我们没有未来的爱情那些瞬息即逝的傍晚的炽烈锦葵色中用慢火炖煮，他会从脚到头舔舐我，怀着热望和老人的慷慨，那是我在那么多男人中再也没有找寻到的，那些人急躁又吝啬，在我那没有他的余生中尝试着爱我却做不到，而他会在爱的缓慢消化中，一边和我一起推开想来舔我们的牛

嘴，一边跟我谈谈他自己，他告诉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全身上下甚至连睾丸都是将军阁下的，他说这话时并不苦楚，也没有来由，仿佛在自言自语，仿佛飘浮在一片唯有惊叫方能打破的内在阒寂里无止歇的嗡鸣声中，没有人比他更殷勤更博学，没有人比他更男人，他变成了我十四岁时活着的唯一理由，那一年，两个最高军衔的军人出现在了我父母家，他们带着满满一箱多卜隆纯金币，在半夜把我和全家人都塞入了一艘外国船，并命令我们不得回国，直到他的死讯在全世界炸开，他死了却不知道我为他耗尽了余生，我为了找寻比他更好的人和街上的陌生人睡觉，我回来了，苍老痛苦，拖着这群孩子，虽然是与不同男人生的，我却幻想都是他的，而他则在没有看见她从牛棚天窗钻入的第二天起就把她遗忘了，此后每天下午，他都会找不同的人来代替她，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太能够分辨那群衣着一样的女学生里谁是谁了，当他用拉姆菲梅耶尔大使的糖果招引她们时，她们会冲他吐舌头，对他嚷大老粗，他叫她们的时候并不加以区分，也不会问今天的这个与昨天的那个是否是同一人，他对她们一视同仁，躺在吊床上想着她们时也仿佛想的是一个人，在这半梦半醒间，他会听着施泰姆伯格大使永远不变的论调，之前他送了他一只听筒，长得和印着那只狗的他主人的声音[1]的听筒一样，附带一个电子扩音装置，为的是让他再听一遍他所坚持的狂妄，要拿走我们的领水作为外债抵押，而他还是重复着原来那句话，门儿都没有，亲爱的史蒂文森，什么都行只有海不行，他关掉助听器，拒绝再听到那电子生物的尖厉声音，因为它像是一张唱片换了面，又一次向他讲解起我自己的专家已经向我直截了当地坦陈过很多遍的情况，咱们已经分文不剩了将军阁下，咱们已经耗费掉了最后的资源，自独立战争以来连续百年为抵押外债而申请的贷款以及用来支付滞纳金利息的借贷已经把咱们榨干了，总是在拿东西去抵啊将军阁下，开始是让英国人垄断金鸡纳

和烟草，而后是让荷兰人垄断橡胶和可可，再之后是让德国人租借高地荒漠铁路和水运通航，按照秘密协议，所有东西都给了外国佬，但直到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愿上帝将他置于地狱深壑，受盆中烈火煎烤——轰然垮台、当众死亡之后他才得知这些协议，咱们什么都不剩了，将军，自艰难时期开始，他就听他每一任财政部长讲过同样的话，那时他宣布延期履行与汉堡银行家签订的协议，致使德国舰队封锁了港口，英国装甲舰发射了一枚警告性炮弹，将大教堂的钟楼炸出了一个窟窿，但是他喊着，我要在伦敦皇帝身上拉屎，宁可死也不能卖，他喊道，去死吧恺撒，最后关头，是他的多米诺骨牌牌友查尔斯·W.特莱克斯勒大使出面调停救了他，后者的政府为这些与欧洲人签的协议进行担保，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我们地下资源的永久开发权，自那时起，我们便连身上的内裤都是欠人家的了将军阁下，但他却始终会在下午五点把大使送至楼梯口，在他肩上拍一下以示告别，门儿都没有亲爱的巴克斯特，我宁愿死也不能没有海，他被这座墓地般的宅子的凄凉压垮了，自邪恶时期之后，自从我错用了那个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而任他砍掉所有人的脑袋却愣是没有砍掉他该砍的主使暗杀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人的脑袋起，人们在这所宅院中便畅行无阻，好似在水下一般，笼中鸟雀也拒绝歌唱，无论他往它们的喙中滴多少润喉剂都无济于事，隔壁学校的女孩也不再于课间休息时唱上了色的小鸟停在青柠檬树枝上，他的生命在焦灼的等待中逝去，等着与你在牛棚中共度的时光，我的孩子，还有你果壳般的乳头和那里的小蛤蜊，他会在三角梅花廊中独自吃饭，会在午后两点地面蒸腾的热气中飘浮，打着瞌睡却抵抗着困意，只为了不错过电视上放的电影的线索，一切都依他的命令进展并与世事完全相悖，因为那无所不知的功勋卓著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打从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的时代开始，我们就专门为他安装了一部播放小说的个人电台发射机，而后是一套闭路电

视系统，放送只有他能看到、依他的喜好编排的电影，其中只有恶棍会死，爱情会战胜死亡，生命短如一瞬，我们用欺骗让他幸福，幸福得堪比他晚年与穿校服的女孩一同度过的那么多个下午，如果他没有不幸地去问其中一个女孩问题，她们本将会一直满足他直至他死去，可他问她在学校他们都教你些什么，于是我回答道，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教，先生，我其实是港口的妓女，他让我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仿佛没读懂我的唇语，于是我从头到尾重复了一遍，我不是学生先生，我是港口的妓女，卫生部门的人用克勒奥林和丝瓜瓤为她洗了澡，让她穿上这身水手制服和这双好女孩的短袜，每天下午五点走过这条街，不光是我，所有我这个年龄的妓女都被负责卫生的警察召去清洗了一遍，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制服和一样的男鞋，扎着一样的马尾麻花辫，您看，把头发散下来再用一个发卡束上去，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那是个可怜的傻老头，他都不会让你们躺下，只会像医生一样用手指给你们检查身体，吸吮你们的乳房，把食物放入私处，总而言之，就是我过来后您对我做的所有事情，我们只需要把眼睛享受地闭起来说着亲爱的亲爱的，就像您喜欢的那样，他们给我们讲了这些，甚至还让我们从头开始彩排了一遍，才付了我们钱，但我觉得这破事儿做得太过分了，要在前面塞那么多的熟香蕉，在后面塞那么多的半熟海芋，就为了扣完卫生税和士官佣金后剩下的那抠抠缩缩的四个比索，他妈的，一个人上面还没的吃呢就把食物糟蹋在下面，这不公平，她在那个深不可测的老人阴郁的目光中说道，他目不转睛地听着，心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惩罚，但他丝毫没有表露出自己的哀伤，只是拼命进行各种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民政大楼隔壁的女校很多年前就被关闭了将军阁下，由教育部部长本人提供资金，依照大主教及家长委员会的建议，在海边修建了一座三层楼的学校，去了那里，豪门千金便可以摆脱那迟暮引诱者的埋伏，后者那仰卧在宴会长桌上的如搁浅鲱鱼般的身体正在我们没有了

他之后的第一缕曙光中、在遍布月球火山口的地平线上那抹黯淡的锦葵色的映衬下显现出来，在雪白的百子莲间，他为万物所庇护，并且终于从他的绝对权力中解脱出来，多年的相互囚禁令人不可能分清在那座活总统们的墓地中，谁是谁的受害者，他们把它的内外墙都涂成了坟墓的白色，也不来问问我的意见，他们都没认出他来，还命令他别从这儿过先生，您会把石灰弄脏的，于是他便不从那儿过了，您留在楼上吧先生小心脚手架从上边掉下来砸到您，于是他便留在了楼上，在木工制造的嘈杂声和泥瓦匠的怒气中不知所措，那些泥瓦匠还会冲他大嚷滚开老笨蛋，你会把混合涂料都毁掉的，于是他便走开了，在那艰难的几个月里未与他商量就进行的装修中，他们新开了几扇迎着海风的窗户，而他则比士兵更顺从，比任何时候都更孤独，有卫队严密地警戒，但仿佛不是在保护他而是在监视他，他们会吃下他一半的食物，以免有人投毒，会转移藏起来的蜂蜜，为他戴上金质马刺，就像给斗鸡戴上那样，免得走路时叮当作响，他妈的，一连串牛仔的伎俩，都能让我的兄弟萨图尔诺·桑托斯笑死，他任凭十一个穿夹克系领带的野蛮人摆布，他们会整日演练日本杂技，移动一台有红绿灯的机器，当五十米内有人携带武器时，灯便会闪烁，而我们像逃犯一样坐着七辆一模一样的车前行，这些车总在相互赶超换位，因此连我都不太清楚自己坐的是哪一辆，他妈的，那真是无用功，就像拿弹药打兀鹫一样，因为当他把薄帘拨开想看看戒严多年之后的街道时，发现没有人会注意总统加长灵车车队正悄然经过，他看到了部长们那如悬崖般耸立的阳光玻璃楼建得比大教堂的钟楼还高，遮住了港口高岗上彩色的黑人棚屋，他看到了一队巡逻兵涂抹着前不久用粗油漆笔刷上的标语，于是问他们原来写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崭新祖国的建立者永享荣光，不过他知道那是谎话，当然是，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抹掉，他妈的，他在原先是泥潭的地方看到了一条宽阔的椰林大道，大约六个车道宽，伴着一排一排延伸至海边的花坛，他看到郊区

有一座座竖着相同的罗马柱廊的别墅，还在从前是公共市场垃圾堆的地方看到了带亚马逊花园的酒店，他看到了市区高速路蜿蜒的迷宫中龟速爬行的汽车，看到了正午的酷热中向阳的人行道上挤挤挨挨的粗俗人群，而另一侧人行道上只有擅自收取在阴凉下行走税却没有生意的税收员，但这一次，没有人因总统加长轿车中冰棺内隐秘权力所预示的东西而震惊，没有人认出那失落的双眼、焦渴的双唇和那只在喧嚷的叫卖中无依无靠、茫茫然缓缓挥别的手，沿街有卖报纸和护身符的，有冰激凌小车、三数彩彩票的旗帜，有街巷世界的日常喧嚣，它离那个孤独军人内心的悲剧很远，他怀着乡愁一边叹息一边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我的城市怎么了，那条净是没有丈夫的女人的悲惨街道在哪儿，她们会在傍晚时裸着身子出去买蓝色的北美乌鱼和粉色的鲷鱼，还会一边和卖菜的妇女争吵骂娘一边把衣服晾在阳台上，那些会在小铺门口大便的印度男人在哪儿，他们那面色苍白、会唱令死亡都动容的哀歌的妻子在哪儿，那个因违抗父母之命而变成南蝎的女人在哪儿，那些雇佣兵的酒馆、他们发酵了的尿液溪流以及街角日复一日不变姿态的白鹈鹕在哪儿，突然间，啊，港口，如果它原来在这儿那它现在在哪儿，那些走私贩的轻便船只去哪儿了，那些载着步兵登陆的破铁船去哪儿了，我的大便味道去哪儿了，母亲啊，这世界发生了什么，怎么不再有人认得这只被遗忘的情人一晃而过的手了，它透过一列首次运行的火车飞速掠过的玻璃窗，沿路留下一串无谓的告别的痕迹，那列车呼啸着穿过一畦畦播撒了香菜种子的土地，那里曾是一片栖居着声音尖厉、患有疟疾的群鸟的水稻田，穿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牧场，惊动了有总统烙印的牛群，在挂着教会天鹅绒、驶向我无可挽回的命运的安魂车厢内，他一直问着自己，我的四只脚的老车在哪儿，他妈的，我的被森蚺缠绕的树枝和毒凤仙、我的喧闹的长尾猴、我的天堂鸟、整个国家与它的蛟龙都在哪儿啊，母亲，如果那些沉默寡言的印第安女人从前在这里，那她们现在

在哪儿呢，当年她们会戴着英国帽子，从车窗口往里面贩卖糖做的小动物，贩卖土豆，母亲啊，贩卖半生不熟的黄油烧鸡，就在那鲜花拼就的功勋卓著者永享荣光的拱形标牌之下，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只要他一抱怨这逃犯的生活还不如死，他们就会回答他不，将军阁下，这是有序的和平，他们这样对他说，他终究会接受，同意，并再一次头晕目眩地折服在让我远离母亲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的人格魅力之下，他曾那么多次在失眠的怒火中辱骂他、唾弃他，然而一旦面对他披着阳光走进办公室时洋溢的魔力，他又会屈从退让，他会牵着那只有着人类眼神的狗，甚至在小便时都不会撇下它，而且它还有个人类的名字，科赫尔勋爵，于是又一次地他背叛了自己，顺从地接受了他的方案，没关系，纳乔，他批准了，尽您的责任去吧，于是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重新全权执掌了刑讯工厂，它设于距离总统府不足五百米的一栋殖民时期的无辜的石砌建筑内，那里此前是一个荷兰人的精神病院，那建筑和您的这栋一样大将军阁下，它隐藏在一片杏树林中，被野生紫罗兰花地围绕，大楼一层用于认证和登记公民身份，其他层则安装了能想象到的最精巧最凶残的骇人刑具，他甚至都不想见识它们，只是建议萨恩斯·德拉巴拉，请您继续尽您的职责，怎样对祖国更有利就怎样做，但有一个条件，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萨恩斯·德拉巴拉向他许诺，很荣幸为您效劳，将军，他兑现了承诺，也执行了他的命令：别再折磨五岁以下的孩子别再用电线去电他们的睾丸迫使他们的父母招供，因为他怕那丑行让彩票时期那么多个夜晚的失眠卷土重来，尽管他不可能忘记那个距他卧室如此之近的恐怖作坊，因为在月色安详的夜晚，他会被布鲁克纳的如惊雷轰鸣的黎明中呼啸而过的列车一般的乐声吵醒，那旋律中夹带着暴雨洪荒的巨响，在荷兰疯子的老楼周围的杏树枝叶间留下身着破烂长衫的死去新娘的哀伤，于是街上听不到那些垂死之人痛苦的哀号了，但即便这

样他都存不下一分钱将军阁下，因为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把薪水都用来购买他王子的衣装、胸口有花押字的真丝衬衫、小羊皮皮鞋、一盒盒装饰领口的栀子花以及标签上印着家族徽章的法国原装润肤露，但他没有为人所知的女人也没人听说他是同性恋，他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自己的居所，什么都没有将军阁下，他过着圣徒般的生活，在刑讯工厂像个奴隶似的一直干活直到累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睡觉的方法很多，但从来不在夜间睡，也绝对不会睡上超过三个小时，门口不设警卫，手边没有武器，只有科赫尔勋爵跃跃欲试的保护，勋爵据传只吃一样东西，那就是被斩首者的热乎乎的肠子，因而它内心的焦渴就要冲破皮囊了，只要它那人类的目光隔着墙感觉到有人接近办公室，它便会发出高压锅那样咕噜咕噜的声响把他叫醒，无论是谁，将军阁下，那男人连镜子都不信，他在听完探员的报告后就会做出决定，不向任何人征询意见，凭借着覆盖全球的无形的检举与贿赂网络，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瞒得住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哪怕一小会儿，甚至连流亡者在世界上任意角落发出一声哀叹他都会知晓，他的钱就花在这些地方，将军阁下，因为那些刑讯官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领着部长级的薪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分文不取自愿而来，以证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母亲大卸八块把碎尸扔去喂猪并且不动声色，为了获得受命于法国施刑者的职位，需要出示的不是推荐信和品行良好的证明，而是凶残的履历，那些法国人都是唯理主义者将军阁下，因而实施酷刑时有条不紊、惨无人道，是他们让有序进步变得可能，是他们早早预见到了民众尚未开始酝酿的阴谋，他们在冷饮店的吊扇扇叶下心不在焉地喝着饮料，他们在中国人的小旅馆中看着报纸，在影院睡觉，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他们在做了半辈子的夜间强盗和拦路劫匪后通过学习成了电工和铅匠，他们是女仆的露水情人，是远洋轮船上和国际酒吧里的妓女，是迈阿密旅行社里推广加勒比天堂景区游的业务员，是比利时外交部

部长的私人秘书、莫斯科国际酒店四层昏暗走廊中的终身清洁女工，是形形色色遍布在地球最偏僻角落的默默无闻的人，但是您可以安心睡觉将军阁下，因为祖国优秀的爱国者们说您完全不知情，这些都没经过您的批准，要是将军阁下知道的话，就会把萨恩斯·德拉巴拉送进港口碉堡的叛徒墓地了，于是当人们一听说又发生了残暴事件，便会默默哀叹，要是将军知道就好了，要是我们能去告诉他就好了，要是有办法见到他就好了，而他则会命令前来报告的人永远不要忘记，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到，也从没和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就这样，他恢复了平静，然而装着脑袋的口袋还是陆续被送来，数量之多，令他不禁觉得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手上沾满了鲜血却没有从中获利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人是傻，但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他还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三军司令们却从不抗议自己听命于人这一点也没道理可言，他们甚至连加薪的要求都没提，什么都没提，于是他派出去一些探子，试图找出军队忍让的原因，查出为什么他们不图谋造反，为什么他们承认了一个平民的权威，于是他问了其中最贪婪的那几个，问他们不觉得现在就该把那个玷污了武装部队美德的嗜血的外人的鸡冠斩下来吗，但他们回答道，当然不将军阁下，不至于这样，于是从那时起我便不知道在这有序进步下的机器里谁是谁、谁联合了谁而谁又与谁为敌，这秩序在我眼里已经开始有陷阱的味道，就仿佛那些我都不愿想起的可怜的彩票儿童的陷阱，但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用他野狗训练师的温柔掌控力抚平他的冲动，安心睡吧将军，他对他说，世界是您的，他让他相信一切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他又把他留在了那栋不属于任何人的宅子的黑暗中，他会在里面从这头跑向那头，大声问自己我他妈是谁，我怎么感觉镜子里的影像颠倒了，我他妈在哪儿，都快上午十一点了可这沙漠里连一只母鸡，一只碰巧路过的母鸡都没有，想想从前是什么样子吧，他哀号着，想想那些乱哄哄和狗打架抢吃食的麻风病人和瘫痪

患者吧，想想楼梯上把人滑倒的动物粪便，还有那些不让我过去的吵吵嚷嚷的爱国者，他们都求我，往我身上撒点儿治病的盐吧将军阁下，帮我给孩子施洗看看他的腹泻能不能治好，因为他们都说我的按手礼比青香蕉疗效更好，请把手放在这里吧，看看能不能平复我的心悸，我都没有力气忍受这永远不停的地震了，请您把目光凝聚在海面上将军阁下，令风暴退却，再抬头望向天空，让日月交食悔悟，再低头看着地面，教瘟疫散去，因为他们说我是那功勋卓著者，我赋予自然谦卑、矫正宇宙秩序、打压上帝神圣意志的傲气，我给予他们向我讨要的一切，买下所有他们向我兜售的东西，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像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说的那样心太软，而是因为拒绝帮助颂赞他的人实在需要一副铁石心肠，而现在，却没有任何人向他讨要任何东西，甚至没有任何人问他早上好将军阁下，您昨晚睡得好吗，他甚至得不到那几声夜间爆炸的安慰，它们曾震得窗玻璃碎成冰雹把他吵醒，震得门框歪歪扭扭，在军队里撒下恐慌，但至少，那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并且不是活在这于我脑中嗡鸣、用轰响将我叫醒的静寂中，我现在只是这栋可怕房子里画在墙上的涂鸦，在这里他不可能下达一道没被事先执行的命令，他仍会于午休时间在吊床上看官方报纸，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连广告都不放过，他会发现自己最隐秘的愿望都已在那上面被满足，他的每一口气息、每一种想法都被用硕大的字体印出来并配上了照片，有他忘了下令修建的桥梁，有教授清洁的学校的奠基仪式，有奶牛和结面包的树，旁边还有一张他在荣光年代里为别的开幕式剪彩的照片，但他却没能找到安宁，他拖着那双老年人的巨大象脚去寻找孤独之屋中他尚未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已经有人赶在他之前用破旧的丧葬布罩上了鸟笼，已经有人赶在他之前在窗口望过了海也数过了牛，一切都完满、有序，他提着油灯回卧房，却听到从总统护卫队的值班室传出他那被扩散开的声音，他从半掩的窗户探进头去，看到了烟雾缭绕的房间中有一群半梦半醒的军官，他们

面前是闪着悲哀光亮的电视机屏幕，他就在那屏幕上，更瘦更紧张，但那就是我，母亲，坐在他会死于其中的办公室里，身后挂着国徽，桌上放着那三副金边眼镜，正用自己往后永远不敢重复的充满智慧的词句背诵着国家的财务分析报告，他妈的，那画面比他在花簇间的尸体更令人不安，因为现在他看到自己活着，听到他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我自己，母亲，我从来都承受不了现身阳台的窘迫，也始终没有克服当众讲话的羞怯，但他在那儿，那样真实平凡，他站在窗口困惑不已，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怎么可能有这样费解的事啊，然而面对他在无数年的统治中鲜少爆发的怒火，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仍旧无动于衷，不至于这样将军，他无比温柔地强调说，咱们得用这种不正当手段来保证这有序进步的航船免于遭殃，这可是个绝妙的想法，将军，多亏了它，我们才在这有血有肉的权力中打消了民众的疑虑，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您都会通过国家广播和电视台来发布您的安抚性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由我来负责的，将军，我把这个花盆放在了这里，盆里有六只摆成向日葵样的话筒，它们记录下您说出来的想法，在礼拜五的接见中，由我提问他来回答，他没有察觉他幼稚的答话就是每月向全国演讲的内容的片段，我从来没有用过一幅冒充是他的画面，也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他没有说过的词，您自己都可以用这张萨恩斯·德拉巴拉放在桌上的唱盘进行验证，还有这卷电影胶片，以及我的这封亲笔信，它是当着您的面写的，将军，为的是让您能依您的意思来决定我的命运，他茫然地看了看他，因为猛然发觉萨恩斯·德拉巴拉头一次没有带狗，手无寸铁、苍白无力，于是他叹了口气，好吧，纳乔，尽您的责任去吧，他一脸疲倦地说着，身子向后仰倒在弹簧椅中，目光直直落在了旧时显贵的肖像里那一双双告密者般的眼睛上，他愈发苍老、阴郁和悲伤了，脸上仍旧挂着一副让人猜不透的表情，两个礼拜后萨恩斯·德拉巴拉临时造访办公室见到的依然是这样一副面孔，这一回他几乎是拽着皮带

把狗拖进来的，他带来了一则紧急消息，发生了一场武装暴乱，只有您的介入才能平息，将军，于是他终于在那面迷人的黑曜岩墙上发现了自己苦寻多年却微不可见的裂缝，我的复仇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可怜的娘娘腔现在吓得要拉裤子了，但他不露声色，只是用一种母性的光辉把萨恩斯·德拉巴拉笼罩起来，别着急纳乔，他叹了口气，没有人会来打扰，咱们有的是时间去想在那个真相自相矛盾并且看起来比假象还假的池沼里真相到底他妈的在哪儿，与此同时，萨恩斯·德拉巴拉看着短链怀表，确认快到晚上七点了，将军，三军司令就要在各自家中与妻儿吃完晚饭了，这样连家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企图，他们会打扮成平民，从仆役的侧门出去，坐上等在那里的通过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想骗过我们的眼线，这些眼线他们自然一个也看不见，虽然他们就在那里，将军，就是那些司机，他只说了声啊哈，微微一笑，不用这么急，纳乔，不如给我讲讲，既然根据您所统计的砍下来的人头数目，咱们的敌人已经比士兵都多了，那咱们现在怎么还能毫发无损地待在这里呢，但萨恩斯·德拉巴拉仅靠短链怀表微弱的跳动支撑着自己，只有不到三小时了，将军，陆军司令正朝公爵领区赶去，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正分别奔往港口碉堡和圣赫洛尼莫基地，现在仍有可能逮住他们，因为一辆装满蔬菜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载重汽车正紧跟着他们，然而他仍不为所动，只觉得萨恩斯·德拉巴拉愈渐强烈的焦虑将他从一种被奴役的惩罚中释放出来，那奴役比他对权力的渴望更难以纾解，冷静些，纳乔，他说，不如给我讲讲为什么您不买栋和轮船一样大的豪宅，为什么您并不在乎银子工作起来却像头驴一样，为什么连那些最矜持的女人都放松下来想钻进您的卧房而您却活得像个修士，您比神父还像神父啊，纳乔，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已浸在冰冷的汗水里喘不过气来了，在焚尸炉般的办公室里，他再也无法端着那副完好的高贵姿态，十一点了，已经太晚了，他说，那时一个关键信号开始沿着电报线路传送给

全国的驻军，起义军司令们正在往阅兵式制服上别勋章，准备拍摄作为新政府委员会成员的肖像照，他们的副官则趁这工夫传达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的最后指令，这场战事唯一的目标仅在于获得对中央媒体与政府机关的控制，这个时候他看见科赫尔勋爵挂着一串无尽泪水般的口水立了起来，蠢蠢欲动，但他连眼都没眨，别害怕，纳乔，不如给我讲讲为什么您这么怕死，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一把扯下被汗水浸软的赛璐珞领子，那男中音歌唱家般的仪容顿时丢魂落魄了，这很正常，他回答道，对死亡的敬畏是给幸福添加的炭火，所以您才感觉不到，将军，他纯粹习惯性地站在那里数着教堂的钟声，十二点了，他说，这世上已经不剩您的人了，将军，我是最后一个，但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也没有察觉到从武器广场地下传来坦克的轰鸣，于是他笑了，您别弄错了，纳乔，我还有人民，他说，如往日一样可怜的人民在受到了那揣测不透的老人的煽动后，于日出前冲上了街道，他以无比蓬勃的历史性的热情通过国家广播和电视台一视同仁地向各方爱国者宣布，三军司令在我个人的领导下，始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愿，他们受体制不容更改的理想所鼓舞，在这个光辉胜利的午夜，终结了一个嗜血平民的恐怖机器，这个人已经接受了群众盲目公正的惩罚，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已经被砸烂了，被拴着脚踝倒挂在武器广场的一只灯笼下，嘴里还塞着他自己的生殖器，正如将军阁下您命令我们封锁使馆区街道阻止他寻求政治避难时所预料的那样，民众已经用乱石制住了他，但首先我们得把那只嗜肉恶狗打成筛子，因为它吞下了四个平民的内脏，还让我们的七位战士受了重伤，当时人们已经突袭了他当作居所的办公室，从窗口扔下了两百多件还带着标签的花缎马甲，扔下了大约三千双从未穿过的意大利皮靴，三千双啊将军阁下，他就这样花政府的钱啊，还有不知多少盒要别在领口的栀子花，以及布鲁克纳的全部唱片和相应的指挥乐谱，上面还有他的亲笔注解，他们把地牢中的囚犯释放了

出来，又点了一把火将从前是荷兰精神病院的刑讯室烧掉，他们大喊着将军万岁，伟人万岁，他终于知道真相了，因为人人都说您什么都不知道将军阁下，说他们滥用您的善心把您排挤到了一边，到现在他们都还像逮老鼠一样四处猎捕国家安全刑讯官，遵照您的命令那些刑讯官已经不再受军队保护，这样一来，民众终于能从郁积的愤怒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了，于是他批准了，同意，他被喜乐的钟声、自由的音乐和武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感恩的呼喊声所感动，他们举着巨大的牌匾，上面写着上帝保佑把我们从恐怖黑暗中解救出来的伟大领袖，在那对荣光年代的倏然即逝的复制中，他召集了协助他摘下权力的苦役枷锁的学校官员来到庭院，随手指点我们去填补他朽迈统治的最后一任最高司令部中由杀害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凶手空出来的位置，那些人是穿着睡衣逃往使馆寻求避难时被捕的，但他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也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他在心中搜寻着本想存留至死的仇恨，却只找到了不值得再留存的受了伤的自尊的残灰，叫他们都滚蛋，他命令道，他们被塞上了首班航船，去往一个不会有人记起他们的地方，可怜的浑蛋，他主持了新政府的第一场委员大会，它给他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从新世纪的新一代中挑选的模范还和从前一样出身平民，这些部长的长袍上满是尘土，内心脆弱不堪，只不过他们爱权力更贪恋荣誉，面对他已卸下防备的沉重王国那无比高昂的外债，他们比以往所有人都更胆小怕事、奴颜媚骨并且一无是处，没有什么可做的将军阁下，高地荒漠上的最后一列火车坠下开满兰花的深崖了，豹子在天鹅绒面的安乐椅上睡着了，轮船在水稻田里搁浅了，消息在邮政袋中腐烂了，有一对受骗的海牛幻想在总统寝舱镜子里那些阴郁的百合丛中产下美人鱼，而唯有他漠视这些，当然，他已经相信了有序进步的存在，因为他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仅限于阅读只为您一人印制的官方报纸将军阁下，那是独一份的完整版本，里面都是您喜闻乐见的消息，有您希望看到的照片，有宣传广告，会让他幻想出一

个世界，不同于他们在午休时段向他提供的那个，甚至连我的绝不轻信的眼睛都能证实，部长们的阳光玻璃楼后那些港口高岗上的黑人的彩色棚屋从未改变，他们修建直通大海的棕榈树大道，就为了不让我看见那些门廊相同的罗马风格的别墅后面被我们的某次飓风摧毁的街区悲惨如故，他们在道路两侧播撒香料的种子，就为了让他能在总统车厢内看到，因为正在出售的我的心肝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画黄鹂的水，世界仿佛变得更加美好，他们骗他并不是为了取悦他，像荣光年代里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做的那样，也不是为了给他省却无谓的烦恼，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更多地出于怜悯而非发乎爱情所做的那般，他们骗他，是为了让他继续被自己的权力抓牢，留在院中木棉下的吊床上他那老年的倦怠中，在那院子里，到他终老时，连隔壁学校的上了色的鸟儿停在青柠檬树枝上的合唱都将是假的，这算怎么回事，然而那愚弄并没有影响到他，他甚至试着去与现实和解，试着立法恢复对金鸡纳和其他重要药材的垄断来换取国泰民安，但现实却再次给了他警告，令他始料不及，世界变了，世事继续游走在他的权力之外，因为已经没有金鸡纳了，将军，没有可可没有靛青了，将军，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他的个人财产例外，它是无法计量的、贫瘠的，受着好逸恶劳的威胁，然而在新的不幸面前他仍旧没有做出改变，只是派人给老大使洛克斯博瑞捎去了口头上的挑战，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多米诺骨牌桌上找到解决办法，但大使借用他的风格回答说门儿都没有阁下，这个国家已经分文不值了，当然了，除了海洋，它明净丰饶，在底下燃一支蜡烛就足够在它自己的火山口熬一锅宇宙海鲜汤了，所以您考虑考虑吧，阁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那笔即使有百代如阁下您一样勤勉的英才都无法偿清的拖欠款项的利息，然而第一次他甚至没有严肃对待，只是一面陪他走向楼梯，一面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看看这些外国佬多野蛮啊，说到海他们怎么能就只知道吃呢，告别时他仍在他肩膀上习惯性地一拍，而后

又回到孤身一人的状态，感觉自己正处在权力的荒漠里一团团虚幻之雾中，当武器广场上军队在欢呼间隙分发食物饮料的激励消耗殆尽时，群众马上纷纷离去，他们带走了内容重复的标语牌，并把租来的口号板放在一旁以待将来在相同的庆典中使用，他们再次留下了荒芜而悲伤的厅堂，尽管他与从前，与这里还不是一栋死人的宅院而是一座比邻的宫殿时一样，下令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门，让想进来的人都进来，但只剩下那些麻风病人了将军阁下，只有那些经年累月待在府前的盲人和瘫痪患者了，这些人与当年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个门口看到的他们一样，沐浴在金色阳光中，被摧毁却不可战胜，他们确信自己早晚会再进去，从他手中接过治病的盐，因为他熬过了所有的逆境、经受住了最无情的热情和最可怕的被遗忘的圈套，他是永恒的，他的确是，他会在从牛棚回去的路上再次遇见他们，看到他们正在院中临时搭起的砖灶上热着厨房里剩下的罐头，看到他们躺在凉席上伸展四肢呈十字状，而那凉席在玫瑰芬芳的影子中已被溃疡处的汗液泡软，他让他们建公用炉灶，为他们买新的凉席，并在院子尽头搭起一个棕榈叶凉棚，让他们不必栖身在楼内，然而没出四天，他不是发现一对在宴会厅的阿拉伯地毯上睡觉的麻风病人，就是撞见一个在办公室中迷了路的盲人，或者一名在楼梯上骨折了的瘫痪患者，他于是将楼门紧闭，以免墙壁上留下鲜活的糜烂印迹，也防止他们身上散发的医疗部门用来消毒的苯酚的气味熏染了空气，然而，他刚把他们从一处清走，他们就在另一处出现，在别人已对那个无用的老头不再抱有任何指望时，他们坚韧不摧地固守着自己的古老渴盼，那个老头会把写下的回忆塞入墙缝里，像梦游者一般摸索着穿过记忆的迷蒙池沼中的风，躺在吊床上度过失眠的时光，自问我他妈的该怎么做才能摆脱新大使费舍尔的诡计呢，他建议我宣布现在黄热病成灾，以便根据互助协定为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提供正当理由，为垂死的祖国注入新的气息需要多少年，这个协定就会有多少年的效力，

他马上答道，门儿都没有，他再次经历了自己统治之初的情形，并且陶醉其中，当年面对平民起义的严重威胁，他便是依靠这种手段得到了游走在军事法律之外的权力，他颁布法令宣告国家进入瘟疫时期，他在灯塔上升起黄色的旗帜，并关闭港口、取缔弥撒、禁止在公开场合哭丧或弹奏会唤起人们追忆死者的歌曲，他命令军队不眠不休地监察法令执行的情况并授权他们随意处置瘟疫病患，于是戴着医疗机构袖标的军人当众处死了健康状况各异的民众，他们如果怀疑哪些民宅不符合他的规定，便会在其门前画上红圈，还会在普通罪犯、娘娘腔与男人婆的额头上烙印，与此同时，一支由米歇尔大使向其政府紧急申请的医疗队伍正致力于防止总统府内的居民受到感染，他们从地上捡起七个月早产儿的粪便拿到放大镜下分析，在大水瓮中撒入消毒药丸，还给他们科学实验室里的动物吃蛆虫，他却笑得要背过气去，并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别犯傻了，先生们，这里除了你们，没有别的瘟疫了，但他们坚持说有，他们有最高命令，上面的人说有，他们准备了一种有预防功效的黏稠的绿色蜜露，并一视同仁地把它涂在所有访客的全身，无论是最普通的平民还是最有声望的显贵，他们要求人们前来谒见时与他保持距离，要站在门槛上，而他则坐在能闻其声而远离其气息的房间深处，和出身高贵却赤身裸体的人喊叫着交谈，这些人用一只手比画着，阁下，另一只手则遮盖着那只被胡乱涂抹的颓萎的鸽子，这么做都是为了防止那个人受到感染，他已在失眠的虚弱中想到了这场虚假灾难的细枝末节，编造了扎根于土地的谣传，散播了末世的预言，因为他认为，人们越不明就里就越会恐惧，所以当他的一位吓得脸色惨白的副官在他面前立正站好报告消息时，他几乎连眼都没眨，瘟疫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于是透过总统四轮马车愁云密布的玻璃窗，他看到了废弃的街道上应他的命令而被打断的时间，看到了黄色旗帜上的惊惧氛围，看到了一扇扇紧锁的大门，甚至连那些画了红圈的被遗弃的房屋也大门紧闭，他看到了阳台上饱食后的兀鹫，看

到了那些死人、死人、死人，到处都有那么多的死人，在泥坑中他们已经难以计数，他们被堆放在露台上的阳光下，摊开在市场里的蔬菜上，都是有血有肉的死人将军阁下，没人知道有多少，比他希望在敌军中看到的死人还要多，都像死狗一样被扔在垃圾箱中、抛在腐烂的尸体上，他闻到街上熟悉的恶臭，那就是瘟疫的疥疮味道，但他不为所动，不在任何哀求前让步，直到他不再感觉自己是他全部权力的绝对主宰，直到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凡人之力或神力可以终结这场大规模的死亡，我们才看到一辆没有标识的四轮马车出现在街上，没有人一眼便从中察觉到王权的冰冷气息，但在包裹着森然天鹅绒的车厢内部，我们看到了那致命的双眼、颤抖的双唇和那只往门口一把把撒着盐粒的新娘手套，看到了攀缘而上的涂成那面旗帜色彩的火车，它从栀子花和惊恐万分的豹子间穿过，直至被迷雾笼罩的最陡峭的省份，我们透过孤独车厢的薄帘看到了那浑浊的双眼、那受尽折磨的面容，以及那只并不优雅的少女的手，它在他童年的阴郁荒漠上渐次留下一串盐粒，我们看到了一艘木轮汽船，它载着播放玛祖卡舞曲纸卷的奇异的自动钢琴，在暗礁、沙石浅滩和春日里巨龙在雨林中漫步时所引发的灾难留下的废墟间跌跌撞撞地航行，我们看到那苍白的双唇，看到那不知所属的手，它正向酷暑中倦怠的村庄抛撒一把把盐粒，那些吃下盐粒还舔了方才撒落之地的人马上恢复了健康，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对肆虐的恶兆和幻觉免疫，因而在他秋日的暮色中，当他们又向他提出一套同样建立在政治性的黄热病的谎言之上的登陆措施时，他不会感到意外，当乏力的部长们呼喊着把海军陆战队召回来吧，将军，让他们带着消毒灭菌的机器回来吧，拿他们想要的和他们换，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白色医院、带着他们的蓝色草坪和旋转喷水器回来吧，因为这些东西让人们健康地度过了很多个闰年，他却一捶桌子，决绝地说不行，他担负最高责任，直到粗鲁的麦昆大使回答他说现在咱们已经不是在商量了，阁下，支撑这制度的不是希望、顺从，

甚至不是恐惧，而是无从挽回的古老幻灭中的纯粹惯性，请您上街去面对真相吧，阁下，咱们已经到最后关头了，要么让海军登陆，要么把大海给我们，没别的路了，阁下，已经没别的路了，母亲啊，于是他们带走了四月的加勒比海，那些厄尔温大使的航海工程师把它分成小块标上号码带走，播散在了远离飓风的亚利桑那的血色曙光里，连同它里面的一切，将军阁下，连同我们城市的倒影、我们胆怯的溺水者和我们癫狂的蛟龙，虽然老谋深算的他已经做出了最大胆的努力，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次抗议掠夺的暴动，但是没有人响应将军阁下，无论好言相劝还是武力相迫，他们都拒绝上街，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他在耍新花招，和从前的那么多回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为了满足他那压抑不住的、甚至超越了极限的永久掌权的热情，我们觉得，即便他们带走了大海，他妈的，即便他们连同蛟龙一起带走了整个国家都无所谓，只要发生些什么就行，我们这样想着，对军人的各种利诱无动于衷，他们化装成平民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以祖国的名义央求我们冲上街去喊外国佬滚蛋，以阻止掠夺行动，他们鼓动我们去抢劫外国人的商店和别墅甚至纵火，他们给我们现金让我们出去与人民并肩抗议侵略，说有军队这坚强后盾做保护，但是没有人出去将军阁下，因为没有人忘记，有一次他们也是以军人的名义这样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的，但他们开火屠杀了他们，理由是人群中混入了冲军队开枪的挑衅者，所以这一次，我们连人民都没有了将军阁下，于是我不得不独自扛起这惩罚的重担，不得不一面独自签字一面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失去海总比让海军陆战队登陆要好些，你想想，就是他们想出那些命令让我签署的，他们把艺术家变成娘娘腔，他们带来了圣经和梅毒，他们让民众以为生活很容易，母亲啊，他们让人觉得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让人觉得黑人有传染病，他们试图说服我们的士兵去相信祖国只不过是笔买卖，而荣誉感则是政府为了让军队免费打仗而发明出来的破玩意儿，我授权他们

享有我们的领海，是为了避免这些祸事重演，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对人类的利益和民族间的和平非常有益，他知道，所谓的转让，不光包括他能在卧房窗口看到的那延伸至天际的物理的水，同时也涵盖最宽泛意义上的与海相关的一切，或者说，涵盖了那海中独特的动植物群、它的风向规律、它变幻莫测的毫巴，它的一切，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做到他们所做的事，将我古老的象棋海洋以标号水闸隔断，然后用庞大的吸扬式挖泥船带走，而在大海被撕裂的火山口，我们看到了瞬息间的光亮，它来自于桑塔玛丽亚德尔达里恩这座极其古老的因蚁害而毁灭的城市那埋于水下的废墟，我们看到了海洋上海军司令上将的旗舰，与我当年从窗口看到的一模一样，母亲啊，它周身布满了丛生的龟足，他还没来得及向那场海难足以载入史册的规模致以崇高的敬意，挖泥机的齿爪便已经将它连根拔起，他们带走了我投身战争的所有动机和他权力的全部动力，只留下那片他走过一扇扇窗时看到的覆满了粗糙月球尘埃的荒凉的平原，他怀着被压抑的心呼喊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请用你最智慧的光芒照亮我吧，因为在暮年的一个个夜晚，他会惊醒，会感觉到祖国的亡者正从墓穴中爬起来要跟他清算那笔大海的账，他觉得墙壁上布满了抓痕，听到他们未被埋葬的声音，感觉那些死后的目光正往锁眼中窥看，窥看他那如垂死恐龙一般的巨大脚掌在黑暗房屋里、在救赎的最后的沼泽烂泥中留下的印迹，他会在姗姗来迟的信风与鼓风机送出的人造西北风的交汇处一刻不停地走着，这台鼓风机是埃伯哈特大使为了让他别总惦记着那笔丑恶的海洋交易而送给他的，他看着悬崖顶端那栋收容独裁者的房子的孤独光亮，我备受煎熬，他们却在那里如坐着的阉牛一样睡觉，一帮浑蛋，他记起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郊区宅子里的告别的鼾声，记起了在被守夜的牛至草照亮的房间中，她那鸟贩的安眠，如果他是她就好了，他叹了口气，幸福地沉睡着的母亲，不曾被瘟疫惊扰，不曾受爱情恐吓，也不曾因死亡而畏

惧，他却恰恰相反，那么的茫然失措，甚至以为那座失却了海洋的灯塔断断续续射入窗口的光束都被死人玷污了，他惊惧万分地逃离这星辰般美妙的萤火虫，因为它正在旋转梦魇的轨道上为死人骨髓的发光粉尘散发出的可怖气息熏蒸消毒，把它灭掉，他吼道，于是他们把它灭掉了，他命人填实房屋里里外外的空隙，以免疥疮的哪怕最微弱的气息在死亡的夜晚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来，哪怕它们裹藏在什么香气中也不许进屋，他留在了黑暗里，反复摸索着，在密不透气的炎热中费力地呼吸着，感觉自己正经过晦暗的镜子，他惊恐地走着，直到听到海洋火山口传来一阵混乱的蹄声，那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月亮正带着它朽迈的白雪升起，把它摘了，他吼道，把星星都灭掉，他妈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呼喊，没有人听见，只除了古老的办公室中被吓醒的瘫痪患者、楼梯上的盲人以及身上沾着晨露的麻风病人，他们在他经过最早绽放的玫瑰时纷纷站起身来，向他乞求手中治病的盐，事情就在那时发生了，全世界不信他的人，狗屎偶像崇拜者们，他边走边摸我们的头，一个挨一个地，用那只光滑智慧的手，用那真理之手摸了我们每个人有缺陷的地方，就在他碰触到我们的那一霎，我们都恢复了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宁静，重获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念，我们看到盲人因玫瑰的光辉而目瞪口呆，看到瘫痪患者在楼梯上磕磕绊绊地走起来，我们看到我自己这新生儿般的皮肤，我要在全世界的市集上展示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神迹，我们闻到我溃疡的疤痕上这早熟百合般的芬芳，我要在整个地球表面撒播它，将它作为对不忠者的侮辱、对不信他的人的惩戒，他们在城市在乡村在方丹戈舞会和游行上大声疾呼，试图往人群中注入因奇迹引发的恐慌，但是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我们觉得那只不过是又一则他们和赤脚医生一起带到村镇上的宫廷消息，为了让我们相信最不需要相信的事：他令麻风病人重生皮肤，使盲人重见光明，让瘫痪患者重获行走能力，我们都觉得那充其量是他的政权使出的最后一招，为的是唤起民众去关

注一位不太可能存在的总统，这位总统的私人护卫系统仅剩下一队新兵，而这与政府委员会众口一词的建议相悖，他们曾坚持说，不，将军阁下，一套严密的护卫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他却固执地认为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渴望杀掉我，想这么做的只有诸位，我没用的部长们，我懒散的司令们，只是诸位不敢并且永远不会敢杀我，因为你们清楚，这之后你们会互相残杀，于是只剩下新兵来守护这栋已被毁灭的房子，在那里，母牛会肆无忌惮地徜徉于第一门厅和会客厅间，它们已经把哥白林毯上开着花的草原啃掉了将军阁下，他们把资料吃掉了，但是他听不到，在十月的一个下午，他头一回看到一头母牛爬上来，因为它受不了外面躁怒的暴雨了，他试着挥手轰它，母牛，母牛，却突然想起拼写母牛vaca的时候要用vaca的v，另一次他看到了它在吃灯罩，那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某个阶段，开始明白不值得为了轰一头牛特地走到楼梯口去，还有一次，他在宴会厅看到了两头被母鸡激怒的母牛，因为母鸡跳到了它们背上想去捉虱子，于是在这些个切近的夜晚中，我们之所以看到航海灯一般的光亮，听到围墙后大型动物灾难般的踩踏声，是因为他正手持油灯与母牛抢夺睡觉的地方，而墙外尽管没有他，他的公共生活却在继续，我们每天都在当局的报纸上看到伪造的他接见平民和军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总是穿戴合宜，这么多年来，每到祖国最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从广播中听到他一再重复的演说，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我们出了家门、进入教堂还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他都在，而人人都知道他拖着乡下人的旅行靴在那栋朽迈的屋中都走不动路了，服侍他的也仅剩三四个勤务兵，他们负责他的饮食，保障储藏地的蜂蜜供应充足，还得赶走那些曾在封禁的办公室里闯祸、打碎了一套总参谋部元帅的陶瓷像的母牛，就是那间某个女巫预卜他将死在其中的办公室，只是他自己已将这预言忘记了，他们随时听候他偶尔发出的命令，直到他将灯挂在门楣上，直到他们听见那间因为没有海洋而变得诡异的卧室里传出三道

门闩、三个插销、三把门环的轰响，才相信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了孤独憋闷的梦境并且会一觉睡到天明，这时他们才会撤回到位于底层的宿舍中，但他会意外地惊醒，会牧养着失眠，拖着他巨大的幽灵的脚行走在黑暗中辽阔的房屋里，他几乎注意不到母牛缓慢的消化和睡在总督衣架上的母鸡的愚钝呼吸，他在漆黑中听到了月球的风声，在漆黑中感到了时间的脚步，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摸黑打扫，握在手中的绿色枝杈的笤帚也曾被她用来清扫先哲们被烧焦的智慧枯叶，其中有康涅利乌斯·尼波斯的原版文字以及塞西利奥·艾斯塔多和利维奥·安德罗尼可的古老辞令，它们都在他第一次踏入这权力的无主之屋的那个血腥夜晚化作了办公室的垃圾，当时，那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劳乌塔罗·慕纽斯将军——愿他已在上帝的天国之中——的最后街垒还在负隅顽抗，而他们已在火光之城的辉映下穿过了庭院、跃过了博学的总统私人保镖的尸体堆，他正因间日疟浑身哆嗦着，而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没有一样武器，只拿着那柄绿色枝杈的笤帚，他们沿楼梯摸黑而上，一路被富丽堂皇的总统马厩中的马匹尸体绊倒多次，这些马就躺在从第一门厅到会客厅的地面上，仍旧血流不止，在那门窗紧闭的宅第中，在掺杂着马血味道的酸涩火药味里，呼吸变得艰难，我们在走廊上看到沾了马血的赤脚脚印，在墙上看到染了马血的手掌印，还在会客厅的血泊中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美丽的弗洛伦西亚女人，一身晚礼服，心脏处插着一把战刀，她是总统夫人，在她身旁我们看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看起来像一个发条玩具舞蹈演员，额头上挨了一枪，那是他九岁的女儿，而后我们也看到了加里波第的恺撒，也就是劳乌塔罗·慕纽斯总统的尸体，他是当时的十四位联邦将军之一，他们在血腥敌对的十一年间不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而他是其中最精干的一位，也只有他敢用母语对英国外交官说不，他就在那里，身体摊开犹如一条鳐鱼，赤着脚，承受着鲁莽行事后的处治，因为他不愿落入英国舰队远征军之手任人惩

罚，便先杀了妻子、女儿以及四十二匹安达卢西亚马，然后吞枪自尽，脑袋都开了花，那时基齐纳司令指着尸体对我说，你看到了吧，将军，这就是那些举起手来反对自己父亲的人的下场，你将来在你的王国里可别忘了这一点，他对他说，而他已经在那里了，经历那么多有所企望的失眠之夜、在长久的忍气吞声与一再的忍辱负重之后，我已经在那里了，母亲，被任命为三军最高统帅以及共和国的总统，任期与重建国家秩序、平衡国家经济需要的时间等长，这是经过参议院与众议院全体成员同意、由最后几位联邦考迪罗一致决定的，并且得到了英国舰队的支持，后者是我经过那么多场与麦克多诺领事的艰苦的多米诺骨牌夜战的成果，只是，无论我还是别人最开始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当然，谁又能在那个惊悚之夜的混乱中相信它呢，因为甚至当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在那张她后来腐烂其上的床上时，都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实啊，她唤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在一片混沌之中，他找不到从哪里着手统治，在那栋大宅之中，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退烧的草药，也没有任何家具，那里已经不存在一样有价值的物品，只剩下风光不再的西班牙总督和主教的被蛀蚀的画像，其余一切都被历任总统据为己有，一点一点带走，甚至连墙上描绘英雄场景的壁画都不见了踪影，卧室中堆满军营垃圾，四处都是一场场历史大屠杀被遗忘的残迹以及一道道一夜之间作废的总统用手指写下的血诏，却没有一张可以让高烧中的他躺下来发汗的席子，于是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扯下一块窗帘把我裹起来，并让他靠在主楼梯上的一个角落里，而她则开始用绿色枝杈的笤帚打扫刚刚被英国人洗掠一空的总统寝室，她将整整一层都扫了一遍，还得用笤帚击退那帮想在门后奸污她的强盗，破晓之前，她在被风寒击垮的儿子身旁坐下来休息，他裹在长毛绒的窗帘中，在那栋被摧毁了的房子的主楼梯最后一级台阶上汗如雨下，她便试图以自己简单的盘算为他退烧，你别怕这乱摊子，孩子，只要买几个最便宜的皮凳就行了，再在上面画上彩色的花

草鸟兽，我自己来画，她说，还需要买些吊床，等有客人的时候用，这个尤其重要，吊床，因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时不时就会有意外上门来的客人，她说，买一张教堂长桌用来吃饭，买些铁餐具和合金盘，好让他们尝尝军旅生活的艰苦滋味，再买一口大瓮来盛饮用水，外加一个炭火炉，这就行了，反正是用政府的钱，她这样安慰着他，但他没有在听，因为当时，最初的几道晨曦将真相被隐匿的那一面有血有肉地照亮了，他因此萎靡沮丧，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坐在楼梯上因发烧而不住哆嗦的可怜老人，心中没有爱的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所以这就是整副乱摊子，他妈的，所以权力就是这栋遇难者的房子，这种像烧焦马匹的人味儿，这片又一个八月十二日、和其他所有八月十二日一样的权力之日的凄凉朝霞，母亲啊，咱们是钻到什么破烂摊子里了，他承受着最原始的不安和返祖似的恐惧，惧怕一个新的黑暗世纪未经他的允许便在世界上耸立起来了，公鸡在海上啼鸣，英国人唱着英语歌抬起庭院中的死尸，而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好结束了愉快的计算，她以结清了债务般的轻松说，那些要买的东西没吓到我，要干的活儿也没吓到我，那些都无关紧要，孩子，吓到我的是这屋里需要洗的床单那么多，于是他倚仗着自己失落中的力量试着安慰她说，您安心睡吧，母亲，这个国家没有做得长的总统，他对她说，您看着吧，不出十五天，他们就会把我扳倒了，他对她说，他不仅在那个时候确信这一点，在之后漫长而稳固的暴君生涯中的每时每刻也如此确信，并且越来越深信不疑，因为生活告诉他，权力的漫长时光中没有哪两个日子是完全相同的，当一名总理在每个礼拜三的例行报告中突然引爆令人目眩的真相时，他的提议里永远另有图谋，所以他只会微微一笑，别告诉我真相，顾问，这很冒险，万一大家都信了，仅凭这么一句，他就毁了政府委员会为了让他问都不问就签下字而精心布置的一整套战略，当他在官方会面上不知不觉尿了裤子的谣言越传越逼真时，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

为清醒，当他穿着无可救药的拖鞋、戴着用线拴住腿的眼镜沉入衰老的缓流中时，我觉得他比以往更为严肃，并且凭借日益暴烈的性情和更为准确的直觉将不合适的撇开，将合适的拿来连读都不读就签署，他妈的，反正说到底，没人理我，他笑道，看看吧，我命人在第一门厅放一排栅栏防止母牛爬上楼梯来，但它又出现在那儿了，母牛，母牛，它把头伸进了办公室的窗户，正在吃国家祭坛上的纸花，但他只是笑着，您看看，我和您说过的，顾问，这国家变得一塌糊涂，原因就在于从来都没人理我，他说，以一种在他的年纪不可能存在的清醒神志说着，然而，凯普陵大使在他被查禁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在那时看到的他已经陷入了令人痛心的老年无意识中了，甚至连幼儿的基本活动都不能自己完成，他还说看到了他周身都浸泡在皮肤不断渗出的一种含盐物质中，并且拥有溺死之人的庞大身躯和溺死之人随波逐流的款缓安详，他解开衬衫向我展示他那在旱地上溺死的人紧实而明亮的身体，它的缝隙间已长满了深海礁石上的寄生物，背上吸附着印鱼，腋下长着珊瑚虫和极小的虾蟹，但他确信这些海岸新生命只是最初的征兆，预示着那片被你们带走的海会自愿回来，我亲爱的约翰逊，因为海就像猫一样，他说，总会回来的，他也确信他腹股沟处的那片龟足秘密地宣告着一个幸福的清晨会来临，到那个时候他打开卧室的窗户，将再一次看到远航舰队司令的那三艘三桅船，他疲惫地在全世界寻找它们，只为了看看他是否像大家说的那般，与他也与很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有着光滑无纹的手掌，他命人把他带来，必要时可以用武力相逼，却听见其他航海者告诉他，他们见过他绘制邻海无数岛屿的地图，看到他用国王和圣人的名字取代岛屿原先的军人的名字，同时还从土著科学中寻找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能治疗他刚刚开始的谢顶的偏方，当我们放弃了再次找到他的希望时，他却坐在总统加长轿车中认出变了装的他，他身着深色苦行衣，腰间系着圣弗朗西斯科的棉绳，在公共市场礼拜日的人群中摇着忏悔木铃，陷落在

反省道德缺失的状态中，这令我们很难相信他正是那个穿着胭脂红制服、戴着金框眼镜在陆地上迈着第一桨手的庄重步伐的人，但当他们想遵照他的命令把他带上加长轿车时，我们连个影儿都没找到啊将军阁下，是大地把他吞下去了，他们说他成了穆斯林，说他在塞内加尔患了蜀黍红斑死了，还说他被埋在三个城市的三座墓中，而事实上他不在其中的任何一处，他因为他征程的扭曲命数，被判罚在墓与墓之间游荡直至时间的尽头，因为他是个会带来厄运的人，将军阁下，他比金子更晦气，但他始终没有相信，直到他晚年的尽头仍旧在盼望他回来，那个时候卫生部长用镊子为他夹除身上的阉牛虱子，他却坚持说那不是虱子，医生，那是大海要回来了，他说，他如此笃信，以至于卫生部长屡次认为，他并没有像他在公众面前表现的那么聋，也没有像他在场面难堪的接见中表现的那样精神涣散，虽然一次彻底的检查表明，他的动脉已经坚硬仿若玻璃，他的肾脏中有海滩沙粒沉积，他的心脏则因缺乏爱而破裂，于是年迈的医生以多年兄弟的信任为挡箭牌对他说，是该安排一下了将军阁下，至少决定一下您要把我们交到谁的手上，他对他说，救救我们，别让我们成为孤儿啊，然而他惊讶地问，谁告诉您我想死的，我亲爱的医生，让别人死去吧，他妈的，最后他很精神地开玩笑说，两个晚上之前我还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呢，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像头斗牛一样，他说着笑得差点背过气去，他确实在恍惚中看到了自己，按照近来的孤独夜晚的习惯，他会脑袋上裹块湿毛巾，在无声的屏幕前打着瞌睡，有时的确比斗牛更果敢，因为看到了法国或者土耳其或者瑞典的大使的迷人夫人，他妈的，这么多长得一样的女人简直令他分辨不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曾待在她们中间，身着晚礼服，手持一杯一口未动的香槟，参加八月十二纪念日庆典，或是一月十四胜利日仪式，还是三月十三复兴日庆祝，我怎么会知道，因为置身于他统治之下那晦涩难懂的历史日期中，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哪个在何时举办，哪个是为了什

么举办，甚至那些他聚精会神、细致严谨地写下后藏于墙缝中的纸卷对他来说也都没用了，因为到头来他忘了自己该记得什么，他会偶然在藏蜂蜜的地方找到那些纸卷，有一次他读到一张，四月七日是马科斯·德莱昂博士的生日，得送他一头老虎作为礼物，他念道，那是他亲笔写下的，但他丝毫记不起那人是谁了，于是觉得再没有什么惩罚比遭受自己的身体的背叛更不光彩、更不应该的了，关于这一点，他早在古老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时期之前就隐约有所感触，那时他的思维还清晰，还能勉强分辨前来谒见的人群中谁是谁，想当年我可是能叫出他过于广袤的沉重王国里最偏远地区的所有民众的姓与名的啊，然而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四轮马车里看到了人群中一个眼熟的男孩但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他，于是惶恐至极，甚至命令护卫队将他逮捕，让我好好想想，那是个可怜的山里人，蹲了二十二年监狱，从被审的第一天起，就一直重复着既定事实，他名叫布拉乌里奥·利纳雷斯·莫斯科特，是淡水水手马科斯·利纳雷斯和猎虎犬饲养员德尔菲娜·莫斯科特非婚生但被承认的孩子，这两人在洛萨尔德尔维雷伊都有固定住所，那是他第一次来王国的都城，因为母亲派他到三月诗会上卖两只狗崽儿，他是骑着一头租来的驴赶过来的，也没有带什么衣服，只除了被逮捕的那个礼拜四清晨他穿着的那一身，当时他正在公共市场的一个摊位前一边喝苦咖啡一边询问卖油炸食品的女商贩知不知道有谁想买两只串种狗崽儿来猎老虎，当她们回答说没有时，鼓声、军号声、鞭炮声乱哄哄地响起来，人们纷纷喊道，那个人来了，他过来了，他于是问别人那个人是谁啊，他们回答他说还能是谁，掌权的人呗，于是他便把狗崽儿塞到箱子里，拜托卖油炸食品的小贩，劳驾帮我照看一下吧，我去去就回，他爬到了一扇窗户的窗框上，好越过人头望一望，于是他看到了那支连马匹都穿着金质华服、戴着羽毛头饰的护卫队，看到了印着祖国蛟龙的马车、那只戴着破手套的正挥动致意的手、那苍白的面孔、那沉郁的不带笑

意的嘴唇，是那个掌权的人，那双哀伤的眼睛突然看到了他，那神色仿佛是在一座针山上发现了一根针，那手指指着他，那个人，爬在窗框上的那个，把他逮起来，等我想想在哪儿见过他，他命令道，就这样，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揪住，用刀面拍得我遍体鳞伤，将我放在篦子上烤，让我坦白掌权的人曾在哪儿见过我，但在港口碉堡的可怖地牢中，他们始终没能从他身上剥下那唯一真相之外的任何真相，他在一遍遍复述真相时是那样肯定又带着那般胆量，令他最终承认是他弄错了，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因为他们对他这么凶，就算他以前不是敌人，现在也是了，可怜的人啊，于是他便在地牢中日渐腐烂，而我则在这栋阴影之屋里一边徘徊一边想着，我的好日子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帮帮我吧，看看没有了你的庇护，我都落到了什么地步，他独自呼喊着，如果无法在回忆时找到乐趣、得到滋养并因此在晚年的泥潭中幸存下去，那么便白白度过了这么长的光辉岁月，因为他那些重要日子里的最强烈的痛楚与最幸福的时刻也都无可奈何地从记忆的孔洞中溜走了，虽然他曾天真地企图用小纸卷将那些小洞堵住，他受到惩罚，将永远不会知晓这个九十六岁的弗朗西斯卡·里内洛是谁，根据亲笔写下的记录，他曾下令用皇后之礼厚葬她，他也被判定要戴着书桌抽屉中的十一副无用的眼镜来盲目地指挥，好掩盖他在和幽灵对话的事实，他甚至没法分辨他们的声音，也仅凭直觉来猜测他们的身份，他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在一次与他的战争部长的会面中这一境况的最大风险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他倒霉地打了一个喷嚏，于是战争部长说愿您健康将军阁下，他又打了一个，于是部长又说了一遍愿您健康将军阁下，再一个，愿您健康将军阁下，但连续九声喷嚏过后，我没有再说愿您健康将军阁下，只觉得自己被他那张因惊愕而扭曲的脸庞的威胁推倒在地，我看到了那双溺在泪水中的眼睛正在垂死的颤动的泥沼中冲我无情地唾骂，我看到了这头老迈的野兽的舌头仿佛被绞死时那样伸在外面，他正在我的臂弯中死

去，而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一个人都没有，那时我唯一能想到的便是趁还来得及赶紧逃离那间办公室，但他随即威严地挥了挥手阻拦我，在两次喷嚏间冲我吼道，不要做懦夫，罗森多·萨克里斯坦准将，不要慌，他妈的，我还没有笨到要死在您跟前，他吼道，而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停地打喷嚏直到抵达死亡的边缘，他飘浮在一个生长着正午萤火虫的无意识的空间里，却仍固执地坚信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不会让他陷于打过一阵喷嚏后死在一名下属面前的耻辱中，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受侮辱，与一群母牛生活也好过与一帮会让人没有尊严地死掉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妈的，他已经不再与教皇使节谈论上帝，以免他察觉自己在用勺子喝热巧克力，也不再玩多米诺骨牌，怕有人敢出于怜悯故意输给他，他不想见到任何人，母亲啊，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些，虽然他缜密地警惕着自己的行为，虽然他碍于虚荣不去拖曳自己终究拖曳了一辈子的扁平足，虽然他在多年的羞耻中一直感觉自己处在最后的独裁者们那个痛心的深渊边缘，那些身陷不幸的最后的独裁者与其说是在受他保护，不如说是被他囚禁在那栋崖顶之屋，以防他们用自己可耻的瘟疫荼毒世界，当他在一个个不祥的早晨泡药浴时，会在私人庭院的水池中睡着，独自承受种种哀痛，并且梦到你，母亲啊，他会梦到是你在现实中盛开的枝枝杏花间制造了我脑袋里那么多噪音中的蝉鸣爆响，他梦到是你用毛刷画出了黄鹂的彩色鸣啭，于是他被腹部意外地在水底发出的声响惊醒了，母亲啊，他在我的尴尬的腐坏水池中醒来时，让怒火烧红了脸，因为水面上漂浮着牛至和锦葵芬芳的花瓣，漂浮着橙树刚刚绽放的花簇，也漂浮着因将军刚在芳香的水中排出的那串金黄松软的粪便而躁动的乌龟，这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挨过了这一幕，以及其他诸多这个年纪的糗事，也已经把侍从减到了最少，只为独自面对这些不让别人撞见，没有人会看见他头上裹着被油浸透的破布在空宅中整日整夜茫然游荡，倚着墙绝望地呻吟，因蜡烛木而反胃，被无法忍受的头痛逼

疯，他甚至都没有对私人医生提起过这疼痛，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他衰老时期那么多无谓疼痛中的一种罢了，他会在大片暴风雨云出现之前便早早地感觉到那疼痛仿佛石块爆裂一般到来，他刚把止血带缠在太阳穴上就发布了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府中，他命令道，在绑第二圈时，他感到头骨在嘎吱作响，连上帝来了都不许进，他命令道，即便我死了也不许进，他妈的，他因那残忍的疼痛而丧失了理智，那痛楚甚至没有留给他一刻思考的余地，直到绝望的数个世纪终结、大雨的祝福倾下，他才呼唤我们，而我们会看到他仿佛刚出生一般坐在备好晚饭的小桌边，面前是喑哑的电视屏幕，我们为他做了烧肉、肥肉配菜豆、椰香米饭和炸香蕉片，那是一顿对他的年纪来说难以负荷的晚餐，他一口都没尝就把菜放凉了，因为他一直在看电视上的同一部关于紧急救援的电影，他知道，如果政府在闭路电视上反复播放同样的节目并且没有察觉到录像带在倒放，那么他们一定有事想瞒着他，真他妈见鬼，他说道，想忘掉他们企图隐瞒他的事，如果是些更糟糕的事，他现在就会知道了，他一边这样说，一边在备好的晚餐前打起鼾来，直到教堂八点的钟声响起，他才拿着一口未动的饭菜站起身，把它们倒入马桶，从很久以前开始他每个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这样做，为的是掩饰他的胃已经拒绝一切食物的耻辱，为的是借助他荣光年代的传说来打消老年疏忽之下的可憎行为所激发的自我怨恨，为的是忘记他还勉强活着，忘记是他而不是别人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下将军万岁、伟人万岁，忘记他曾经偷偷喝过一种巫医开的汤药，以期在一夜间想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甚至和三个不同的女人来三次，他为老年的天真付出了愤怒甚于痛苦的泪水，他紧紧抓住厕所中的挂环哭喊着，我的心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憎恶我吧，用你的火焰之水净化我吧，带着骄傲执行你纯净的惩罚吧，因为他已经再清楚不过那时他所缺少的是什么，他在床上缺少的从来都不是荣耀而是爱情，他需要的不是他的外国部长兄弟为我奉上的那种

贫瘠的女人，她们当初被送来是为了让他在隔壁学校关闭之后依然保持良好的习惯，都是些丰满不见骨的女人，是专门来伺候您的将军阁下，凭借外交豁免权，她们从荷兰的玻璃展窗中、从布达佩斯电影节上、从意大利的大海里被飞机运来，您看多美啊，于是他看到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仿佛歌唱老师一般端坐在他晦暗的办公室中，她们像艺术家一样褪下衣衫，躺在长毛绒的沙发上，温暖的金蜜色肌肤上还印着泳衣条带的印痕，仿佛胶卷底片一样，她们闻起来像薄荷味的牙膏，像玻璃瓶中的花朵，她们在那头不愿脱下军服的庞大的水泥阉牛旁躺下，而我试着用最温存的方式鼓励他，直到他厌倦了承受那死鱼的迷人的美，于是我对她说，这样就行了，姑娘，当修女去吧，他深陷在怠惰中，抑郁至极，于是在那个夜晚，在八点的钟声敲响时，他突袭了其中一个负责清洗士兵衣物的女人，他一把将她推倒在洗衣木槽上，虽然她惊惶地哀求说今天我不可以将军，相信我吧，是吸血鬼在的日子，并想借机逃跑，他却把她翻过身去让她趴在洗衣板上，使出一种圣经般的动力推撞着她，教那可怜的女人感受到了灵魂中死亡的嘎吱声响，她急促喘息着叫道太野蛮了将军，您一定学过怎么当驴吧，他在那痛苦的呻吟声中简直要飘飘然了，比听到那些职业谄媚者最狂热的赞歌还受用，于是他送给那洗衣工终身津贴，以方便她教育孩子，时隔多年在牛棚给母牛喂饲料时，他又重新唱起歌来，一月的月光明亮，他唱道，并没有想到死亡，因为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晚，他也不会允许自己脆弱地想起不合常理的事，他又数了两遍母牛，边数边唱，你是我黑暗小路上的光明，你是我的北斗星，他查出少了四头，而后回到楼内，一路上数着睡在总督衣架上的母鸡，为鸟笼盖上粗布罩时又点了酣睡的鸟雀，四十八只，他点燃了从第一门厅到会客厅之间被一头头母牛在白日里踢散的牛粪，他记起了遥远的童年，脑海中第一次出现了他自己瘫在荒漠冰原上的画面，还有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她从垃圾场的兀鹫口中抢下了一段羊肠当作午

餐，十一点时，他又按反方向走遍了整栋房子，提着灯盏为自己照明，同时将屋子里直到门厅的灯一一熄灭，他在一面面昏暗的镜中看到一个个自己，十四位重复的将军正拿着灯行走，他在镜子的尽头看到一头四仰八叉躺在乐室中的母牛，母牛，母牛，他喊着，它死了，这算什么事儿啊，于是他走过卫兵的卧室想对他们说镜子里有一头死牛，他命令他们明天尽早把它拖走，不得有误，要赶在兀鹫挤满大楼之前，他命令道，他举着灯将底层的老办公室又查了一遍，想找到另外那几头走丢的母牛，有三头，他在厕所中找，在桌子底下找，在每一面镜子中找，而后爬上主层依次检查一个个房间，却只在粉红斑点的蚊帐下找到了一只卧着的母鸡，那挂蚊帐属于另外时代的一位见习修女，她的名字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睡前喝了一勺蜂蜜，然后将小瓶放回储藏处，那里还塞着一个小纸卷，上面写着一个日期，是杰出诗人鲁文·达里奥——愿他已坐在上帝天国的最高位——的某个纪念日，他将纸重新卷起来塞回了老地方，同时开始背诵准确无误的祷文，我们神奇的父与导师，那天才的里拉琴演奏者令飞机飘于天空令船舰浮于海上，他在无可救药的失眠中拖着那双大脚，穿过闪着旋转灯塔绿色朝霞的最后几个一晃而过的黎明，他听着来自那片离开了的海洋的风声，备感惋惜，他听着一支婚礼乐队奏响的灵魂哀乐，因为上帝的一个疏忽，他已在他背后、在那乐声中到了垂死的边缘，他撞见了一头迷路的母牛，于是挡住它的去路但没有去碰它，母牛，母牛，他向卧室走去，在经过的每一扇窗户中都看到了那座没有海的城市亮着光的街区，他感受到了它玄妙的脏腑的热气和它整齐划一的呼吸的秘密，他一连欣赏了它二十三遍，不曾停步，同时也像从前一样永远承受着那片浩瀚而无法参透的海洋、那属于把手放在心上入睡的民众的海洋的飘忽，他知道自己被最爱他的人厌恶，感到自己被圣人的烛光照亮，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人召唤，被唤去矫正分娩中的人的运气、改变濒死者的命数，他感觉自己的记忆被那些在看到他时骂他

母亲的人拨动，而他们看到了那沉默的双眼、悲伤的双唇，以及那只若有所思、在遥远过去的梦游加长轿车上透明钢化玻璃后的新娘的手，我们亲吻他在泥地上留下的靴印，炎热的夜晚从自家庭院中望见民政大楼窗口那没有灵魂的徘徊的光亮时，我们便给他送去神符避免横死，没有人爱我们，他叹息道，探头去看那死了的鸟贩、那黄鹂画家、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房间，她的身体横在一片青苔之上，愿你死得安详，母亲，他对她说，愿你死得非常安详，孩子，她在墓穴中答道，十二点整了，他将灯挂在门楣上，这时可怖的疝气放出了细弱的哨声，他的内脏因为这致命的扭动而受了伤，于是世上除了他疼痛的疆域之外再无其他空间，他最后一次锁上了卧室的三道门闩，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经受了微不足道的排尿的最终燔祭，而后倒在了光秃秃的地板上，穿着自终止了接见活动后他在府中一直穿着的粗俗的保暖裤，以及没有假领的条纹衬衣和一双残疾人的拖鞋，他面朝下趴在地上，右臂弯在头下当作枕头，片刻就睡着了，然而在两点十分，他在搁浅的思绪中醒了过来，衣服已被飓风来临前的暗淡而温热的汗液浸透了，谁在那儿，他战栗着问道，同时确信有人在梦中叫他但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尼卡诺尔，又一遍，尼卡诺尔，有人能够不开门锁就进入他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墙进出，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是死亡将军阁下，您的死亡，它穿着龙舌兰纤维编织的褴褛的忏悔长袍，手中抓着钩杆，头骨上遍布阴森的水藻嫩芽，骨缝中开出陆上的花朵，没了肉的眼窝里眼睛朽迈而惊恐，直到看到它的全身时，他才明白它喊的尼卡诺尔是死亡在我们死的那刻用来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但他说不，死亡，他的时辰还没到呢，应该是在梦里在办公室的阴影里，就像盆中的预卜之水说的那样，但它回答说不，将军，就是这儿，光着脚，穿着您身上的破衣烂衫，不过找到他的那些人为了顺应女巫的预言，仍旧会说他死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左脚靴后跟上戴着金质马刺，在他最不想要它

降临时，它降临了，在如此多年的贫瘠幻想之后，他开始隐隐明白，人不是在生活，真他妈见鬼，而是在苟活，人开始学习时已经太晚，即便是最博大最了不起的生命也仅能达到学习怎么去活的程度，他从自己喑哑手掌的谜团里、从纸牌隐形的密码中，意识到了自己没有能力去爱，于是企图用权力的孤独罪恶的炽烈祭礼去补偿那无耻的命运，却在无尽燔祭的火焰中沦为自己献祭主张的牺牲品，他以诓骗与罪行养肥了自己，以无情与羞辱培育了自己，他克服狂热的贪婪与天生的怯懦只是为了将那颗玻璃球握在掌中直至时间的尽头，却不曾知晓这种罪恶没有尽头，正是它的饱足滋生着它的胃口，循环往复直至所有时间的尽头，将军阁下，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骗他是为了博他欢心，奉承他是为了赚他钱财，他们以武力逼迫民众聚集，要大家在他经过时欢呼雀跃，并高举讨好他的、上书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牌板，那位领袖比他更老迈，但他学会了与这些相处，学会了与所有荣耀衍生的悲惨相处，并在无法数算的岁岁年年中发现，谎言比质疑更舒心、比爱更有用、比真理更持久，他已经并不意外地到达了可耻的臆想境地，无权力却在统治、无荣耀却受赞颂、无威信却被遵从，而此刻，在他秋天的那串飘落的黄叶中，他相信了，他从来就不会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他注定只能颠倒着认识生命，注定无法参透世事，无法在现实中的幻想的哥白林毯上捋直阴谋的线、解开诡计的结，同时丝毫不怀疑，哪怕死到临头也仍不怀疑，唯一可见的生活，就是被展示出来的那一个，我们从这边看到的并不是您的那个将军阁下，在穷苦人的这边，有我们无尽的不幸岁月的黄叶飘零，还有那些抓不住的幸福时刻，还有被死亡的幼芽污染的爱，但它是真真切切的爱啊将军阁下，在这边，您本人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是火车小窗灰蒙蒙的薄帘之后的哀怨眼睛，是那沉默嘴唇的颤抖，是那只戴缎面手套的无主之手一晃而过的挥别，那只手属于那个没有结局的老人，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什么样，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只是一个想象中

的谎言，一个可笑的独裁者，我们从来不知道另一边在哪里、生命的权利在哪里，而我们仍以贪婪的热忱爱着这您不敢去爱的生命，您甚至不敢想象去爱它，因为您害怕知道我们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事实：生命是艰辛又转瞬即逝的，然而再没有另一个生命了，将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他却永远不能知晓，他带着自己年迈死者那疝气的温柔哨声，被死亡一棍击中、连根折断，他在他秋天的最后几片冰冷树叶的阴暗声响中，飞向了被遗忘的真相的黑暗祖国，他惊恐地抓着死亡长袍上的破布烂线，远离了疯狂人群的呼喊，他们冲上街头唱着欢快的颂歌，庆祝他的死亡，他也将永久地远离那自由的音乐、幸福的焰火和那荣耀的钟声，它们正向世界宣告一则好消息，宣告那永恒的无尽时光终于结束了。

---

[1] “他主人的声音”是著名留声机品牌，商标图案上有只狗。


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
爱情和其他魔鬼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爱情和其他魔鬼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爱情和其他魔鬼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陶玉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

ISBN：978754427863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二
三
四
五

献给浸在泪水之中的卡门·巴尔塞伊丝[1]

---

[1] 卡门·巴尔塞伊丝（1930—2015），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

看来，头发的复苏远比身体的其他部位缓慢得多。

——圣托马斯·阿奎纳[1]

《论人体复苏之整体性》（第五章，第八十问）

---

[1] 圣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哲学学派创立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并不是一个有大新闻的日子。在我初涉记者行业的那家日报社，编辑部主任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老师讲了两三句套话就结束了上午的会议。他没有给任何一位编辑下达具体任务。几分钟后，他从电话里得知有人正在挖古老的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墓穴，便不抱希望地给我下了一道命令：

“上那儿转一圈去，看看你能想到点儿什么可写的。”

这家克拉拉会的古老修道院一百年前就变成了一家医院，现在要被出售了，为的是在这个地方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由于房顶逐渐坍塌，它精美的礼拜堂几乎已经成为露天的了，可它的墓穴里还埋葬着三代主教、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和别的一些重要人物。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墓穴腾空，把遗骨交给相关人士，剩下的东西则扔进公墓里去。

他们采用的方法之原始令我震惊。工人们挥动着锄头铁镐打开墓穴，把那些一动就散架的腐朽棺木取出来，再把尸骨从混杂着破布和干枯头发的泥土块中分离出来。亡者的身份越尊贵，清理起来就越费事，因为得在一堆骸骨里扒拉半天，非常仔细地筛查，才能在残渣里找见宝石或是金银饰品什么的。

领班师傅在一个小学生用的本子上抄录下墓碑上的信息，并把骨头整理成小堆。为了不弄混，他在每堆骨头上都放了一张写有名字的纸条。这么一来，我走进殿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长溜的骨头堆，十

月的烈阳成束地从屋顶的豁口透下来，炙烤着它们，用铅笔写在纸条上的名字成了它们唯一的识别标记。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时光流逝的可怕见证带给我的惊愕。

在那些尸骨当中，有一位秘鲁总督和他的秘密情人；有堂托里比奥·德卡塞雷斯－维尔图德斯，他当过这个教区的主教；有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其中一位叫何塞法·米兰达嬷嬷；还有艺术学士堂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拉索，他把半辈子都献给了制造镶板式天花板的事业。有一孔封闭的墓穴，墓碑上刻的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杜埃尼亚斯，可是人们把它打开后发现那是一处未使用的空穴。然而，侯爵夫人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的遗骸却躺在紧挨着的一处墓穴里，且有自己单独的墓碑。领班师傅没把这当回事：一位土生贵族[1]给自己准备了坟墓，最后人们却把他葬在了另一座墓里，这是常有的事。

在主祭坛放《福音书》一侧的第三孔壁龛那里，出了点儿情况。铁镐刚一敲，墓碑便碎成了好几块，一绺古铜色的头发从墓穴里露出来，领班师傅叫了几个工人帮忙，想把头发完整地扯出来，可这头发越拉越长、越拉越多，最后竟然连着一个小女孩的头骨。壁龛里剩下的只有些散乱的细小骨头，石头墓碑被硝土腐蚀得漫漶不清，只能辨认出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那头漂亮的长发在地上铺展开来，一量，有二十二米又十一厘米长。

领班师傅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他告诉我，人的头发每个月长一厘米，死后也是一样，就两百年而言，二十二米在他看来正好是个平均数。可我觉得这事儿并不寻常，因为小时候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侯爵的千金，一头长发拖在身后，就像新娘的纱裙；十二岁

那年她被狗咬了一口，得狂犬病死了；在加勒比地区的村子里，她因为多施奇迹而极有人望。这处墓穴有可能属于她，这想法就是我那天收获的特大新闻，也是我写作此书的源头。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一九九四年

---

[1] 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贵族。

一

十二月的头一个礼拜天，一条脑门上长着块白斑的灰狗在市场里错综的窄道上横冲直撞，先是打翻了卖油炸食品的桌子，接着把印第安人的货摊和卖彩票的棚子撞得稀烂，最后又顺道咬伤了沿路碰上的四个人。三个是黑奴，另一个就是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她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的独生女，那天她带着一个混血女佣去买一串她十二岁生日庆祝会用的铃铛。

虽说事先叮嘱过她们不要走到商街的门廊外面去，可是那女佣被黑奴交易港口的吵闹声吸引住了，那里正在卖最后一批几内亚来的奴隶，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客西马尼城郊的吊桥那儿。近一个礼拜以来，人们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期盼着加的斯黑奴公司的这条船，因为上面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为了掩饰，他们把尸体扔进大海，却连块石头也不绑，清晨海水一退潮，肿胀而变了形的尸体就都漂到了海滩上，泛出一种奇怪的紫色。船在港湾外抛了锚，因为人们担心这是某种非洲瘟疫的苗头，直到后来才弄清楚，那是由于吃了不新鲜的肉而食物中毒。

那条狗穿过市场的时候，剩下的“货物”已经卖完了，由于“货物”的身体状况极差没卖上好价钱，这会儿卖主正试图仅凭一件奇货挽回损失。这是一个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女奴，身高七拃半，身上涂抹的不是惯常的商业用油，而是甘蔗炼成的糖浆。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人见了都心荡神移。她的鼻子又细又长，头圆圆的，两眼微微

斜着，一口牙齿整整齐齐，又阴差阳错地长了一副罗马角斗士的身材。在围场里他们没往她身上打烙印，也没有报出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而是把她当作一件尤物出售。市长没还价，且一次性付清，花的钱是和她等重的黄金。

野狗们或是把猫追得满世界乱跑，或是同秃鹫为了争夺大街上的一块肉而打得不可开交，顺便咬伤个把人，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尤其是在去波托韦罗赶集的帆船队路过此地时人多货杂的日子里。一天当中有四五个人被咬，谁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像谢尔娃·玛利亚这样左脚踝上被咬了一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女佣并没在意。她自己用柠檬和硫黄给小女孩涂了涂伤口，又把她衬裙上的血迹洗干净，接着大家满脑子想的便都是这孩子十二岁生日的喜庆事了。

女孩的母亲贝尔纳达·卡布雷拉，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没有封号的妻子，这天一大早她喝下了一服大剂量泻药：七颗锑片外加一杯玫瑰糖水。她本是一个粗野的梅斯蒂索[1]女人，出身于一个人们所谓的“柜台贵族”家庭；她风流成性，贪得无厌，凡事爱热闹，胃口大得堪比一支军队。然而，不过几年时间，因为贪吃发酵蜂蜜和可可饼，她便美貌不再。一双酷似吉卜赛人的黑眼睛变得黯淡无光，那股机灵劲儿也不见了，下面便血，上面吐胆汁，从前美人鱼般的曼妙身材变得十分臃肿，皮肤蜡黄蜡黄的，活像一具停放了三天的死尸，而且放起屁来又响又臭，连猎犬都会被吓跑。她足不出户，难得走出房间时要么赤身露体，要么披一袭哔叽布长袍，里面什么也不穿，看起来比一丝不挂还要赤裸。

陪谢尔娃·玛利亚出去的女佣回来时，贝尔纳达已经狂泻了七次，女佣没对她提起被狗咬的事情，倒是讲起了港口那儿卖女奴惹的风波。“要是真像大家说的那么美，可能是个阿比西尼亚女人。”贝尔纳达说道。可就算是示巴女王，她觉得也不可能有人会花和她等重的黄金去买。

“他们说的恐怕是金比索吧。”她说。

“不，”他们跟她说得很明白，“是花了和那个黑女人一样重的黄金。”

“一个七拃高的女奴至少得有一百二十磅重吧，”贝尔纳达说，“一个女人，黑的也好白的也罢，怎么也值不了一百二十磅黄金吧，除非她能屙出钻石来。”

论起买卖奴隶，谁也比不上她精明，她知道，如果市长真的买下了那个阿比西尼亚女人，绝不是为了让她做点什么侍奉厨房之类高尚营生。她正这么想着，突然听见了第一阵笛号声和节庆的鞭炮声，紧跟着笼子里的几只猎犬一阵狂吠。她走了出去，来到橘园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一杜埃尼亚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兼达连的领主，此时正在橘园里两棵柑橘树之间的吊床上午睡，也听到了乐声。他长相苦巴巴的，好逞能，因为梦见被蝙蝠吸了血，此刻脸色惨白。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总穿件贝都因人那种带风帽的外衣，头上戴顶托莱多圆帽，更使他显出一副无依无靠的样子。看见太太完全赤裸着身子，他抢先开了口：

“这是什么音乐？”

“不知道，”她答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侯爵也不知道，他应该是真的感到十分不安才会这样问妻子的，而妻子这会儿的苦胆也一定是舒缓了许多，答话时没有丝毫挖苦的口气。侯爵心事重重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这时鞭炮声又响了。

“老天爷，”他大叫一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座府邸旁边是一家叫作“神圣牧者”的女疯人院。关在那里的女病人被乐声和鞭炮声惊动了，纷纷跑上朝向橘园的露台，为每一响鞭炮声鼓掌欢呼。侯爵大声问她们是哪儿这么热闹，她们的回答使他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七号，圣安布罗斯主教日，奴隶们的院子里响起的乐声和鞭炮声是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生的。侯爵用手掌拍了一下脑门。

“没错没错，”他说，“她过几岁生日？”

“十二岁。”贝尔纳达答道。

“她才十二岁吗？”说着侯爵又在吊床上躺了下来，“这日子过得太慢了！”

这座府邸直到本世纪初还一直是本城的骄傲，现在已经破败了，阴森森的，空空荡荡，很多东西胡乱放置着，一副随时要搬家的模样。厅堂里棋盘似的方格大理石地面尚保存完好，几盏水晶灯的吊坠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厚厚的石灰石墙壁和多年的封闭使得那些仍住着人的房间一年四季都凉凉快快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十二月的微风会带着哨音从缝隙里吹进来。如今，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邋遢带来的

压抑和阴暗之中。当年侯爵一世威严高傲的表征如今只剩下五条守夜的凶猛猎犬。

奴隶们的院子里吵吵嚷嚷，正在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祝生日，在老侯爵的年代，这里曾是一个城中之城。到了他的继承人这一代，在贝尔纳达在马阿特斯榨糖厂用一只左手便可以掌控奴隶和面粉这两宗不正当生意的年代，也还大体保持了原样，而现在，这一切的辉煌都成了过去。贝尔纳达因为贪得无度已经日薄西山，这院子也缩小成了两间用棕榈叶铺顶的木板棚，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余晖已消耗殆尽。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一个正派的黑女人，直到去世前夜一直用她的铁腕掌控着这个家，她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思维敏捷、洞察一切，谢尔娃·玛利亚就是她带大的。她早已皈依天主教，却没有放弃对约鲁巴教的信仰，她同时信着两个教，没什么规律和准头。她常说自己的灵魂很安宁，因为在一个宗教里找不到的东西，她会在另一个宗教里找到。她也曾是唯一能够在侯爵和他太太之间斡旋调停的人，他们两个人也都有心讨好她。碰见有奴隶躲在空屋子里鸡奸或是互相交换女人干那种事的时候，也只有她能拿起扫帚把他们赶出来。可是自从她死了以后，奴隶们为了躲避正午的炎热，就都从木板棚里逃了出来，随便找个角落往地上一躺，时不时从大锅里抠下点锅巴什么的吃吃，或是躲在过道里的凉快地方玩玩马库科牌或者响片之类的游戏。在那个受压迫的世界里，谁都没有自由，除了谢尔娃·玛利亚：只有她有，她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自由。于是，那里就成了她庆生的地方，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有她真正的家人。

在如此喧闹的音乐之中，自家的和其他富贵人家的奴隶欢聚在一起，这样的歌舞场面不可能沉闷。女孩玩得很尽兴，她的舞跳得比非

洲人还要欢快潇洒，又能改变嗓音用好几种非洲语言唱歌，模仿鸟鸣和动物的叫声时搞得鸟儿和动物都有点不知所措。按照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去世前的吩咐，最年轻的几个女奴用烟灰给小女孩涂黑了脸，往她受过洗礼的肩上套上了一串又一串萨泰里阿教项链，又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头长发从来没有剪过，要不是每天把辫子盘成好多圈，连走起路来都要碍事。

在相反力量的交叉处，她一点一点长大了。她身上像妈妈的地方极少。相反，她瘦削的身材、无可救药的腼腆、白皙的皮肤、沉郁的蓝眼睛，以及那一头亮闪闪的纯铜色头发，都来自父亲。她一举一动都静悄悄的，无影无形。她的妈妈被她这种奇特的天性吓住了，在她的手腕上挂了串小铃铛，为的是在昏昏暗暗的家里能随时知道她在哪儿。

生日过去两天后，女佣无意间把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了贝尔纳达。贝尔纳达一边用香皂洗她当天第六次热水澡准备上床睡觉，一边把这事想了一下，等走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了：猎狗们无缘无故地一直狂吠到天亮，她有点担心它们是不是得了狂犬病。于是，她拿起烛台来到院子里的木棚中，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躺在油棕榈吊床上睡得正香，那吊床还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留给她的。女佣没告诉她咬在了什么地方，她撩起女孩的袍子，用灯照着，顺着那条麻烦的辫子一点一点地查看女孩的身体，那辫子缠绕在她的身上，活像条狮子的尾巴。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被咬的地方：伤口在左脚踝上，已经结痂，另外，脚后跟上还有几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擦伤。

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狂犬病例既不少有，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最臭名昭著的要数一个小贩那次，他平日里经常带一只养熟了的猴子

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那猴子的行为举止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那畜生在英国人海上围城期间得了狂犬病，往主人脸上咬了一口，逃进附近山里去了。那个倒霉的小贩后来在一次恐怖的发作中被人们乱棒打死，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们还把这事编成里巷小曲，用来吓唬孩子。小贩死后不到两个礼拜，一群恶魔般的野猕猴大白天从山上下来，祸害了猪圈和鸡栏，又闯进了教堂。它们嚎叫着，嘴上沾满了带血的泡沫，当时人们正在那里为庆祝英国军队失败大唱感恩诗。然而，那些最恐怖的场面并没有被载入历史，因为它们发生在黑人群体当中，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野外围个场子，给被咬的人施一些从非洲传来的魔法，算是治疗。

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教训，在那些一经出现便已无可挽回的症状出现之前，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谁都不会往狂犬病那儿去想，也不会往其他潜伏期长的疾病去想。贝尔纳达·卡布雷拉依然故我，她想，奴隶们编起故事来总是比基督徒更快更离奇，而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狗咬人事件都可能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她对自己的推断十分自信，就没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直到下一个礼拜天，女佣一个人去了趟市场，看见巴旦杏树上挂了条死狗，好让大家都知道这条狗是得狂犬病死的，而女佣一眼便认出了那条狗脑门上的白斑，还有那一身的灰毛，正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但是贝尔纳达听说了之后还是不以为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伤口早已经结痂，那几处擦伤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十二月的天气一开始不太好，可过了不久，下午的天空就恢复了紫水晶一般的透亮，夜间也刮起了惬意的微风。因为从西班牙传来了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节也比往年过得快活。但是这座城市已经没了

往昔的模样。主要的奴隶市场已经迁到哈瓦那去了，这边大陆上的矿产主和农场主都更乐意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购买更便宜的走私劳力，这样一来就好像有了两个城市：一个在那些大帆船停泊在港口的六个月里，欢天喜地，熙熙攘攘，另一个在剩下的六个月里，昏昏欲睡，等待着大帆船的归来。

此后再没有听说有狗咬人的事情发生，直到一月初的一天，一个喜欢走街串巷的印第安女人敲响了侯爵家的大门，当时正是神圣的午睡时刻。这女人大家都叫她萨坤达，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棍，赤着脚在大太阳底下行走，一条白床单把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这女人因干些修补处女膜或是打胎之类的营生而臭名远扬，但她也有好名声，那就是她通晓印第安人的各种秘密，能使被宣告不治的人起死回生。

侯爵在门厅里站着接见了她，心里很不高兴，这女人说话慢吞吞的，又爱绕弯子，侯爵费了很大劲儿才弄明白她想要说什么。她兜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还没进入话题，侯爵终于失去了耐心。

“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别再拐弯抹角了。”侯爵说。

“我们正面临一场狂犬病瘟疫的威胁，”萨坤达说，“圣休伯特是猎人的保护神，也是狂犬病的治愈之神，而我是唯一一个握有他的钥匙的人。”

“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瘟疫，”侯爵对她说，“没有什么预兆，既没发现彗星又没看到日食，而且据我所知，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让上帝这么关照我们。”

萨坤达告诉侯爵，三月份会有一次日全食，并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狗咬人事件。其中，两个人已经失踪了，肯定是家里人把他们藏了起来以便对他们施魔法，第三个人在第二个礼拜发狂犬病死了。还有第四个人，并没有被狗咬，只是沾了些那条狗的唾沫，现在也在圣爱医院里等死。这一个月来，警长已经下令毒死了一百来条野狗，再过一个礼拜，大街小巷不会再有一条活着的狗。

“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侯爵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

“第一个被狗咬的就是您的女儿。”萨坤达说。

侯爵回答她的时候无比自信：

“要是真有这事的话，我准会第一个知道。”

他认为女儿平平安安的，假若她身上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他不可能一无所知。所以他果断地结束了会见，回去继续睡他的午觉。

不管怎样，下午他还是去了趟奴仆们的院子找谢尔娃·玛利亚。这孩子脸被抹得漆黑，光着脚，头上缠了条女奴们缠的红头巾，正在帮忙给兔子剥皮。侯爵问她是不是真的被狗咬了，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可这天晚上贝尔纳达向他证实了这事。侯爵有点不知所措，问道：

“那谢尔娃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你就没办法让这孩子说句实话，哪怕是在她大意的时候。”贝尔纳达说。

“看来得做点什么了，”侯爵说，“因为那条狗得了狂犬病。”

“恰恰相反，”贝尔纳达说，“你还不如说，那条狗是因为咬了她才活不了的。出事的时候是十二月，而直到现在这小贱人还活得像一朵花一样。”

他们都继续关注着有关疫情的各种愈演愈烈的议论，两人虽都不大情愿，还是就这个共同的话题又交谈了一次，倒有点像过去他们之间结怨还不太深的时候。对侯爵而言，事情很清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爱这个女儿的，可现在，对狂犬病的恐惧使他不得不承认他为了省心一直在自己骗自己。贝尔纳达正好相反，问都没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她不爱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不爱她，她觉得这样很公平。他们之间会因为这女孩产生怨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身上既有这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影子。不管怎样，只要这女孩死得其所，贝尔纳达已经准备好演一出号啕大哭的好戏，表现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的哀伤，以此维护她自己的名誉。

“她怎么死都可以，”她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要别跟狗的病有关系就成。”

就在这一刻，侯爵仿佛被天火灼痛一样，突然明白了他这一生的意义所在。

“这孩子不会死的，”他坚定地说，“即便真的要死，那也一定是按上帝的意愿死去。”

礼拜二他去了趟位于圣拉匝禄山上的圣爱医院，想去看看萨坤达对他提起过的那个狂犬病人。他没有去想他车上那些吊丧用的皱巴巴的丝绸挽带会给正在孕育中的灾难增添点什么凶兆，因为好多年了，

他没什么大事是不出门的，而好多好多年以来，除了丧事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这座城市浸没在几个世纪之久的荒凉中，尽管如此，影影绰绰地看见这位心神不定的绅士那憔悴的面容和躲闪不定的眼神的人却不在少数；他就这么乘着马车、穿着塔夫绸丧服出了城，穿过田野，朝着圣拉匝禄山驶去。医院里那些躺在砖地上的麻风病人看见他迈着死人一般的步态进来，便上前挡住去路向他讨施舍。就在那间关着长年躁狂的疯子的病房里，一根柱子上拴着那个狂犬病人。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穆拉托人[2]，头发和胡子像棉花一样白。他本来已经半身不遂，可自从得了狂犬病之后，他另外半个身子力量大得出奇，人们不得不把他拴在柱子上，免得他在墙上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他的话没留下丝毫疑问：咬他的正是那条脑门上有白斑的灰狗，也就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实际上那条狗只是舔了他，不过不是舔在好皮肤上，而是舔在他小腿肚子的一处旧伤上。这个细节没能使侯爵放下心来，他离开了医院，因看见那个人垂死的模样而惊恐万分，他觉得谢尔娃·玛利亚一丝希望也没有了。

顺着山坡回城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个相貌非凡的人，那人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身旁是一匹死马。侯爵吩咐停车，那人站起身来，他这才认出原来是阿布雷农肖·德圣佩雷拉·卡乌医生，他是这座城里最有名气也最有争议的医生。他的长相和棒花纸牌里的国王一模一样，头戴一顶遮阳的宽边草帽，脚下踏着马靴，身披一件自由人的黑斗篷。他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向侯爵问好。

“上帝保佑一切正派人。[3]”他说。

他的马上坡时一路小跑，下坡时却没能抗住，心脏爆裂累死了。侯爵的车夫奈普图诺打算把那匹马的鞍子卸下来，却被鞍子的主人劝住了。

“我连马都没有了，还要鞍子做什么呢，”他说道，“就让它和那匹马一块儿烂在这里吧。”

车夫费了挺大劲儿才把他孩子般的肥胖身躯弄上车，侯爵格外照顾，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阿布雷农肖还在想他的马。

“好似我这个人死去了一半一样。”

“这世上没有比办一匹马的后事更容易的了。”侯爵对他说。

阿布雷农肖突然来了精神。“这匹马可不一样，”他说，“要是办得到，我会找块圣地把它埋了。”他看了一眼侯爵，想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然后接着把话说完：

“十月份它刚满一百周岁。”

“没有任何一匹马能活那么大岁数。”侯爵说。

“但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医生说。

他每个礼拜二到圣爱医院来给那些麻风病人看些麻风病以外的疾病。他是胡安·门德斯·涅托医师的得意门生，后者也是葡萄牙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在西班牙的迫害才来到加勒比。阿布雷农肖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是广行妖术和出言不逊的坏名声，可没有人会去怀疑他的学识。别的医生容忍不了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诊断和异乎寻常的疗法，他也经常为这类事和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他发明过一种药

丸，一年只需服一颗，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但这药丸在服用的头三天里会引发智力错乱，以致除了他自己没人敢冒险服用它。他以前还常在病人床头弹奏竖琴，为的是用某些特意创作的曲子使病人镇静下来。他从不做外科手术，因为他一向认为那都是骗子和剃头匠们搞的低劣把戏，而他骇人听闻的本领是预测病人死亡的日期和钟点。然而，好名声也罢，坏名声也罢，都是建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据说，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人出面否认，他曾让一个死人起死回生。

尽管见多识广，阿布雷农肖还是被那个狂犬病人的情况震撼了。“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受这样的罪的。”他说。他这番详尽而富有感情的评论，侯爵没敢漏掉一个字，等到他无话可讲了，侯爵才开了口。

“能为这个可怜人做点什么吗？”他问道。

“只能把他杀了。”阿布雷农肖答道。

侯爵看了他一眼，心中惊恐万分。

“如果是善良的基督徒，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医生无动于衷地继续说道，“您别担心，先生：这世上善良的基督徒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多一些。”

其实，他指的是住在城郊和乡村的各种肤色的贫苦基督徒，他们确实有胆量在得了狂犬病的家人的饭菜里下毒，好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不要太过吓人。上世纪末，发生过一次全家人一块儿喝下毒汤的事件，因为谁都没有勇气单独毒死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人们都以为我们这些当医生的对发生的这一类事情一无所知，”阿布雷农肖总结道，“其实不然，可问题是要支持这样做我们又缺乏道德权威。于是只能反其道而行，对那些垂死之人做一些您刚才看见的那种事。我们把他们交托给圣休伯特，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让他们受更长时间的苦，死得更惨。”

“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吗？”侯爵问道。

“自打狂犬病首次爆发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办法。”医生说。他又谈起一些过于乐观的文章认为狂犬病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并给出了好几种处方：地钱草、朱砂、麝香、水银，以及紫叶花。“净干蠢事儿。”医生说，“事实上是有些人会得这病，另一些人却不会得，于是人们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没得这病的是因为这些药起了作用。”他寻找着侯爵的目光，以确定他仍旧醒着，然后结束了他的谈论：

“您为什么对这事有这么大兴趣？”

“同情而已。”侯爵撒了谎。

他从车窗向外面看去，下午四点，大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发现燕子已经归来，他心头一紧。还没有起风，泥泞的海滩上，一群孩子正用石头追打一只迷途的鹈鹕。侯爵目送鹈鹕躲闪、飞翔，最后消失在城墙内闪闪发亮的穹顶间。

马车从一座被叫作“半个月亮”的土门进入城里，阿布雷农肖给车夫指着路，马车穿过布满作坊的喧闹城区，往他家驶去。这一路可不容易，奈普图诺已经年过七十，做事没一点主意，还是个近视眼，他更习惯的方式是让马自己顺着认识的路走，因为马比他还认路。当

他们终于到了医生家，阿布雷农肖在门口用一句贺拉斯的诗句向他们道别。

“我听不懂拉丁语。”侯爵道歉说。

“您根本就没必要听懂！”医生说。当然，这句话他也是用拉丁语说的。

看样子侯爵是被深深触动了，他回到家中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平生最怪异的举动。他吩咐奈普图诺去圣拉匝禄山把那匹死马收拾好，葬进一块圣地，第二天一大早，又给阿布雷农肖送去了他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

泻药给贝尔纳达带来的轻松转瞬即逝，接着，为了扑灭五脏六腑里燃烧的火焰，她开始了一日三次的安慰性灌肠，或是一天六回的香皂热水澡，好让神经放松下来。刚结婚时的那种劲头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想当年，她也曾以占卜师般的胸有成竹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成果辉煌，直到那个倒霉的下午，她认识了犹达斯·伊斯卡柳特，从此一蹶不振。

她是在某次集市上的一个围场里偶然看见他的，当时他身上几乎一丝不挂，没有任何保护，徒手在和一只公牛格斗。他看上去那么俊美，那么勇猛，她一见不忘。几天后，在狂欢节的昆比亚舞会上她又遇见了他，那一次她戴着面具，化装成一个女乞丐，身边簇拥着一大群装扮成侯爵夫人、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女奴。犹达斯在一个看客围起的场子中央，跟付他钱的女人跳舞，还有人在焦急等待和他跳舞的女人间维持着秩序。贝尔纳达问他要多少钱。犹达斯一边跳一边回答说：

“半个里亚尔。”

贝尔纳达一把揭下了自己的面具。

“我是问买下你的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她说。

犹达斯看出来了，露出的面孔和女乞丐可没多大关系。他推开自己的舞伴，迈着水手般的高傲步伐向她走来，好让她知道他价格不菲。

“五百金比索。”他说。

她用资深评估师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他身材魁梧，皮肤像海豹一样光滑，躯体曲张有致，窄窄的胯部，修长的双腿，两只手温润平和，与他的职业不大相符。贝尔纳达估测道：

“你有八拃高。”

“外加三西班牙寸。”他说。

贝尔纳达让他低下头，以便自己够得着看看他的牙齿，他胳肢窝里的氨气味儿熏得她心荡神移。他的牙齿完整、结实、排列整齐。

“你的主人要是以为会有人出一匹马的价钱把你买下，那他准是疯了。”贝尔纳达说道。

“我是自由之身，我自己卖自己。”他回答道，接着又拿腔拿调地补了一句：“太太。”

“叫侯爵夫人。”她说。

他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式的鞠躬礼，搅得她喘不上气来，最终，她花了要价的一半把他买了下来。“就因为他看上去很舒心。”她是这样解释的。条件是，她尊重他自由人的身份，也给他继续和马戏团的公牛戏耍的时间。她把他安顿在离自己的卧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那儿原来是马夫住的，从第一天晚上起她就脱得一丝不挂，虚掩房门，等候着他的到来，信心满满地以为他一定会不请自来。可是她足足等了两个礼拜，欲火烧身，彻夜难眠。

其实，自打知道了她的身份、看见了府邸内貌，他便立刻保持了仆人的距离。然而，当贝尔纳达不再等候他，插上房门、穿上睡袍睡觉，他却从窗户进了她的房间。他的汗臭味充斥在整个房间里，把她从梦中惊醒。她感到他像人身牛头怪似的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寻找着她。压在她身上的躯体火辣辣的，一双捕猎的手抓住了她的领口，把睡袍撕成两半，耳边是他压低的嗓音：“婊子，婊子。”从这个夜晚开始，贝尔纳达明白了：她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渴求了。

她为他发狂。每晚他们一起到城郊去参加烛光舞会，他一身绅士打扮，长礼服加圆礼帽，都是贝尔纳达按他的喜好买给他的，起初她还把自己装扮成各色人物，后来索性就以本来面目示人。她让他浑身披金戴银：金链子、金戒指、金手镯，还给他牙上镶了钻石。当得知他和遇到的每个女人都上床时，她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可最后她认命了，自甘残羹剩饭。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天里，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以为贝尔纳达在榨糖厂忙碌，午睡时间进了她的房间，撞见他们一丝不挂，在地上做爱。女奴把手停在了门环上，与其说是被吓住了，不如说看得眼花缭乱。

“别像个死人似的待在那里，”贝尔纳达冲着她大吼，“你要么滚开，要么就过来和我们滚在一起。”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走开时用力甩上了房门，贝尔纳达听着就像一记耳光那样响亮。这天晚上，贝尔纳达把她找来，威胁她说，要是她敢把今天看见的事透露半个字，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您别担心，主人，”女奴对她说，“您有权禁止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照办。”然后她又加了一句：

“可糟糕的是，我心里想什么您没法禁止。”

后来侯爵知道了这事，也假装毫不知情。说到底，他和妻子之间仍旧共有的只有谢尔娃·玛利亚，而他并没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而是当成妻子一个人的女儿。贝尔纳达则对女儿根本不上心。她把这个女儿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以至于有一回，她在榨糖厂待的时间有点儿长，女孩长个子了，模样也变了，回来后她竟然把她当成了别的女孩。她把女孩叫过来，打量了老半天，又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过活的，可就是没能从女孩嘴里套出哪怕一个字的回答。

“你和你爸一个样，”贝尔纳达对女孩说，“都是怪物。”

侯爵那天从圣爱医院回家后，两人仍保持着各自先前的态度，侯爵向贝尔纳达宣布，他决定用作战式手段掌控家中大权。他的口气是那样强硬，容不得贝尔纳达反驳。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的祖母——老侯爵夫人——的卧房归还给孩子，当年是贝尔纳达把女儿从这间卧房赶走，让她去和奴仆们住在一起的。虽然到处都蒙上了一层灰土，这间卧房的辉煌气派却不减当年：帝王级别的大床上闪闪发光的黄铜部件一直被女奴们当成纯金的；蚊帐是用新娘才用的纱幔做成的，各式各样的金银丝带让人眼

花缭乱，雪花石洗脸池旁放着数不清的香水瓶，梳妆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色化妆品；尿壶、瓷质痰盂、吐漱口水用的小盅之类物品应有尽有：老太太因患风湿病瘫痪在床，她梦想有朝一日能把这个梦幻般的世界留给自己的女儿，可她从未生育过女儿，又想留给孙女，可到死她也没能见上这个孙女。

女奴们收拾这间卧房的同时，侯爵忙于在家中建立自己的法度。他把躲在拱廊的阴凉里打瞌睡的奴隶们都轰了出去，又吓唬他们说，要是再看见他们在角落里解手，或是关起门来赌钱，就要用鞭子抽他们，还要把他们监禁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在贝尔纳达掌权、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充当执行官的年月里，这些规定执行得比现在严厉得多，当年侯爵也曾当众得意扬扬地宣扬他那句历史性的名言：“在我的家里，我不用发号施令，只须服从。”可是后来，贝尔纳达深陷于可可之中不能自拔，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又死了，奴隶们便悄悄地钻了空子，先是女人们把孩子带过来帮忙做点小事，后来男人们也都偷起懒来，躲在走廊里乘凉。那时，贝尔纳达被破产的幽灵吓得半死，就让奴隶们上街去自己讨饭吃。在一次危急时刻，她甚至决定，只留三到四人照料家务，其余的一律放出去，但侯爵却不讲理地反对道：

“要是他们一定会饿死，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总比死在荒郊野外强。”

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后，侯爵不再墨守这些简单的成式。他找来一个既有威望又值得信赖的奴隶，授予他权力，向他下达的严厉指令连贝尔纳达都为之一惊。当天晚上，这座府邸自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死后第一次显得井然有序，侯爵在女奴的棚屋里找到了谢尔娃·玛

利亚，她和五六个年轻的女黑奴一道睡在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吊床上，侯爵把她们全叫了起来，向她们宣布了新政权的规定。

“从今天起，这个女孩要住在自己家里，”他告诉大家，“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在这个王国里，她只有一个家，那就是白人的家。”

他想把她抱去卧房的时候，女孩一直在反抗，他不得不让她明白这个世界是由男人统治的。到了老祖母的卧房，他给她脱下女奴们穿的粗布衬裙，换上睡衣，女孩始终一言不发。贝尔纳达站在房门口看着他们：侯爵坐在床边，女孩站在他面前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扣眼是新的，侯爵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把扣子扣上。贝尔纳达忍无可忍了。“你们俩怎么不结成两口子呢？”她嘲笑道。侯爵没理她，她又说道：

“到时候产下个土生的女侯爵崽子，长着一双母鸡的脚，卖给马戏团也能挣不少钱呢。”

她也有了些许变化。虽说她的笑声依然疯狂，脸上却少了些尖刻的表情，在她的不知廉耻底下沉淀了些许同情，侯爵却没能察觉。刚觉得她走远了，侯爵便对女孩说道：

“她是个脏女人。”

侯爵觉得女孩闪现了一丝兴趣的火花。“你知道脏女人是什么意思吗？”他问女孩，渴望她能有所回应。谢尔娃·玛利亚没有答话。她听任自己被放倒在床上，听任自己的头被安置在羽毛枕头上，听任还散发着松木箱气味的麻布被单一直拉到她的膝盖处，却看也没看侯爵一眼。侯爵感到心里一阵颤动：

“你睡觉前做祷告吗？”

女孩还是没看侯爵一眼，她蜷起身子——这是在吊床上养成的习惯——连晚安也没说就睡着了。侯爵小心翼翼地把蚊帐拉好，免得蝙蝠在她睡着的时候来吸她的血。已经快十点钟了，因赶走了奴隶而清静了不少的府邸里充斥着女精神病人的吵闹声，让人受不了。

侯爵放出猎犬，它们都像受了惊似的向老祖母的卧房窜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围着门缝嗅来嗅去。侯爵用手指挠了挠它们的头，用一则好消息让它们安静了下来：

“是谢尔娃，从今晚起她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疯人院里的女病人们一直唱到夜里两点，侯爵睡得又少又糟糕。鸡叫头遍，侯爵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女孩的房间去，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而是在女奴们的棚屋里。离她最近的那个女奴被叫醒时吃了一惊。

“是她自己跑来的，老爷，”没等侯爵开口问话，她抢先说道，“我连知都不知道。”

侯爵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他问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时候是谁陪在她身边。她们当中唯一一个穆拉托女奴，叫卡莉达·德尔科布雷的，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是她。侯爵叫她别害怕。

“从今往后，你就把自己当成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像她那样照料她。”

侯爵向她说明了她的职责。他提醒她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女孩，要爱护她，理解她，但不要宠惯她。他说他马上会在奴隶们的院子和府

邸其余的房子之间修一道带刺的篱笆，最要紧的便是不要让她越过这道篱笆。早上醒来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不等他开口询问，就必须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他。

“做什么，怎么去做，都要想仔细了，”侯爵最后说道，“我的命令执行得好坏，就看你了。”

早上七点，侯爵先把猎犬都关进笼子里，之后便去了阿布雷农肖的家。医生亲自给侯爵开的门，因为他既没有奴隶也没有仆人。侯爵一上来就先表达了歉意。

“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一定很唐突。”

医生刚刚收到侯爵相赠的马匹，心存感激，诚心诚意地接待了侯爵。他领着他穿过院子，来到一个棚子下，那里过去是个打铁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破烂不堪的炉子。一匹漂亮的两岁大的枣红马因为离开了旧槽，看上去有点躁动不安。阿布雷农肖拍拍马的脸，安抚着它，一面对着马耳朵用拉丁语嘟囔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许诺。

侯爵告诉他，那匹死了的马已经被埋在了圣爱医院的老果园里，那是霍乱时期埋葬有钱人的墓地。阿布雷农肖对侯爵这一特别的善举深表感谢。他们聊天的时候，他注意到侯爵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侯爵承认自己从来没敢骑过马。

“我害怕马，也害怕鸡。”他说。

“真遗憾，人类正是因为缺乏和马的交流才止步不前的，”阿布雷农肖说道，“如果什么时候消除了这种障碍，我们就可以造出半人

马来。”

屋内，朝向大海开着两扇窗户，十分明亮，房间的布置显出无可救药的单身汉那种过于讲究的风格。空气里飘散着一股药膏的香味，使人不由得对医药产生一种信任感。写字台上整整齐齐，玻璃柜里满满当当地摆着各种小瓷瓶，上面都贴着拉丁文的标签。他那架治病用的竖琴被弃置于房间的一个角落，上面落了一层金黄色的尘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书籍，好多都是拉丁文的，书脊的装饰精致华美。书要么放在玻璃书橱里和敞开的书架上，要么被很小心地摞在地板上，医生在字纸围成的狭窄通道里穿行自如，如同一头犀牛穿行在玫瑰丛中。看到这么多的书，侯爵有些惊诧。

“所有能知道的知识大概都在这间房子里了吧。”他说。

“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阿布雷农肖心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都耗在医治别的医生用他们的药治出的病上了。”

医生从那把专属于他的大安乐椅上赶走了一只睡觉的猫，让侯爵坐下，又在他的炼丹炉上煮了一杯草药茶递给侯爵，然后对侯爵大谈特谈他的从医经历，直到发现侯爵对这些事失去了兴趣。确实如此：侯爵突然站起身来，背对医生，从窗口瞭望空旷的大海。最后，还是那样背对着医生，他找到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大夫。”他嘟囔道。

阿布雷农肖没预料到他会叫自己。

“嗯？”

“在医生严格保守医疗机密的前提下，我只向您一个人坦白：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侯爵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庄重，“那条疯狗也咬过我的女儿。”

说完他看向医生，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灵魂。

“这事我知道，”医生说，“我猜想这就是您一大早到我这里来的原因。”

“正是如此。”侯爵答道。他把先前就医院里那个被狗咬的人提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这回，阿布雷农肖一改头一天那种粗鲁的回答方式，要求见一见谢尔娃·玛利亚。这正中侯爵下怀。意见一致，马车就等在大门口。

到了府邸，侯爵看见贝尔纳达正独自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一副卖弄风骚的样子，很多年以前他们最后一次做爱时他看见过这样子，如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房间里弥漫着她的香皂那春天般的芳香气息。她从镜子里看见了侯爵，不动声色地问了句：“我们是什么人物呀，能这样随随便便把马送给别人？”侯爵避而不答，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捡起一件日常穿的长袍，扔在贝尔纳达身上，毫不留情地说道：

“把衣服穿上，医生来了。”

“还是让上帝来救救我吧。”她说。

“不是来给您看病的，虽说您病得也不轻，”侯爵说，“是给孩子看病。”

“对她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她说，“她要么死要么不死：没别的可能了。”可说完她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请的是谁呀？”

“阿布雷农肖。”侯爵告诉她。

贝尔纳达惊骇不已。她宁愿就这样光着身子孤零零地死掉，也不会把自己的名誉交到这样一个伪善的犹太人手中。这人曾是她父母的医生，他们都恨透了他，因为他常常为了吹嘘自己的诊断泄露病人的病情。侯爵站到了她面前。

“尽管您不愿意，而我更不愿意，但您终究是孩子的母亲，”他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利，我请求您准许这次检查。”

“我无所谓，你们想干吗就干吗吧，”贝尔纳达说，“就当我死了。”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毫不忸怩地接受了对她身体的仔细检查，甚至带着一种观察发条玩具似的好奇。“我们医生看病靠的是两只手。”阿布雷农肖这样对她说。女孩很开心，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容。

女孩的健康状况显然毫无问题，她的神情看着孤苦伶仃，可她的身材十分匀称，布满了若有若无的金黄色茸毛，一副蓓蕾初开的样子。她牙齿齐整，眼睛炯炯有神，两脚沉稳，双手灵巧，每一绺头发都预示着这孩子能长命百岁。她愉快而不容置疑地回答了种种巧妙的问题，不是十分了解她的人根本听不出来她的回答没有一句是实话。直到医生摸到她脚踝下方那处伤口时，她才紧张起来。狡黠的阿布雷农肖抢先问道：

“你跌过跤吗？”

女孩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答：

“从秋千上摔下来过。”

医生自言自语地说起了拉丁语。侯爵打断了他：

“请您讲拉迪诺语。”

“这话不是说给您听的，”阿布雷农肖说，“我这是在用中古的拉丁语思考。”

阿布雷农肖的这套把戏让谢尔娃·玛利亚感到很开心，最后他又把耳朵贴在她胸口听诊。女孩的心脏像是受了惊，怦怦乱跳，皮肤上渗出苍白冰冷的汗珠，隐隐散发出洋葱的气味。医生检查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脸颊。

“你很勇敢。”他说。

等到单独和侯爵在一起时，医生对侯爵说，这孩子其实知道那是条疯狗。侯爵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

“她跟您撒了好多谎，”侯爵说，“但并没有提过这件事啊。”

“不是她告诉我的，先生，”医生说，“是她的心告诉我的：她的心跳得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青蛙。”

侯爵细细回味女儿说过的那些令人吃惊的谎话，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有一种做父亲的骄傲。“说不定这孩子以后会成为诗人。”他说。阿布雷农肖不赞同撒谎是一种艺术天分的想法。

“话说得越透亮，才会越有诗意。”他说。

医生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女孩的汗水为什么会散发出洋葱味。由于对气味和狂犬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无所知，他就认为那算不上是什么病症。后来侯爵从卡莉达·德尔科布雷那里得知，谢尔娃·玛利亚悄悄地试过奴隶们的法子，他们让她嚼一种叫刺藤黄的药膏，又脱光她的衣服把她关在洋葱窖里，说这样能抵抗狗的妖术。

阿布雷农肖直言狂犬病的种种细节。“咬的伤口越深，离脑部越近，最初发作起来就越严重，也越快。”他说。他回忆起他过去的一个病人，那人五年之后才死，但不能确定的是，那人会不会后来受过别的感染而自己毫无察觉。很快就结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一段无法预知长短的时间之后，伤疤可能会肿胀、溃烂、化脓。临死时的痛苦不堪忍受，可谓生不如死。到了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圣爱医院求助，那里有几个训练有素的塞内加尔人专门对付发了疯的异教徒和中了邪的人。否则，侯爵本人就得承担起责任，把女孩用链子拴在床上，直到她死去。

“在人类已经很漫长的历史上，”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论，“还没有哪一个狂犬病患者可以活下来给人讲这些事情。”

侯爵做出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十字架，也不管有多重，他都要扛起来。这女孩要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医生报以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怜悯的眼神。

“从您的角度来说，没有比这更高尚的做法了，先生，”他对侯爵说，“我坚信以您的灵魂所具有的勇气，您一定撑得住。”

他再一次强调说，看上去不是很要紧，受伤部位离危险区域很远，也没有人记得那里出过血。可能性最大的是谢尔娃·玛利亚根本没得狂犬病。

“那这段时间还该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医生说，“为她演奏音乐，给家里放满鲜花，让小鸟唱唱歌，带她去看看大海边的黄昏，为她做一切能使她快乐的事情。”医生告别时在空中挥了挥礼帽，用拉丁语说了句客套话。可这回他出于对侯爵的尊敬把这句话翻译了过来：“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

[1] 指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

[2] 指黑白混血儿。

[3] 原文为拉丁语。

二

没有人知道侯爵是怎么走到如此狼狈的地步的，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维持如此糟糕的婚姻，而未在当年选择过一种鳏夫的平静生活。他本可以凭借父亲的显赫权势畅所欲为，要知道他的父亲侯爵一世曾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骑士、靠绞架和刀剑发家的黑奴贩子、毫无心肝的军团长官，国王陛下曾不吝赐予他各种荣耀和俸禄，亦从未对他的种种劣行加以惩处。

伊格纳西奥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却没能显示任何本领。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无可否认的智力迟缓的迹象，到了该知书达理的时候却仍是一个大字不识，也没爱过任何人。他体验的第一个生命征候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出现，当时他坠入爱河，准备娶被关在神圣牧者疯人院里的一个女病人为妻，她们的歌声和号叫声曾是他童年的摇篮曲。她叫杜尔丝·奥莉维亚，是一个给王室制作皮革用品的家庭的独生女，从小就被迫学做马鞍，以免这个有着近两百年历史的家族手艺在她手里失传。硬着头皮闯入属于男人的行业，这是人们能给出的造成她精神失常的原因，她疯得太厉害，连让她明白不能吃自己身上的虱子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不考虑这点，对一个愚钝的土生侯爵来说，她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婚对象。

杜尔丝·奥利维亚天性活泼，脾气很好，轻易发现不了她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年轻的伊格纳西奥从第一次看见她起，就能从露台上乱哄哄的人群中辨出她来，也就是那一天，他们通过打手势互通心意。

她是个扎风筝的能手，用小纸鸽给他传递信息，而他正是为了与她通信才学会了读书写字，这段正正当当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但注定得不到理解。老侯爵吓坏了，逼迫儿子当众否认。

“首先，这是真事儿，”伊格纳西奥回答道，“而且我已得到她的允许，准备向她求婚。”对于她是精神病人一说，他这样反驳：

“一个疯子，只要有人能接受他的逻辑，他就不能算是疯子。”

父亲以他原本不屑行使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把他赶到了庄园里。伊格纳西奥成了活死人。除了母鸡之外，他什么动物都害怕。然而，在庄园里，他近距离地观察了一只活母鸡，在脑海里把它想象成一头母牛那么大，既而意识到母鸡是一种比水里陆上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可怕得多的怪物。夜色深沉时，他浑身冒冷汗，而破晓时分醒来时又因牧场那吓人的静寂而喘不上气来。一条眼睛眨也不眨地守在他卧房门口的猎犬，反而比其他任何威胁都更令他感到不安。他曾这样说：“我活在自己竟然还活着的恐惧当中。”在流放的日子里，他养成了阴郁的性格，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好沉思冥想，总是无精打采，说话慢吞吞的，从此，他仿佛因身负一项神秘天命而被关进了修道院的单人清修房间一般。

在流放的第一年里，有一回他在睡梦中被巨大的响声惊醒，那声音就像发洪水，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庄园里的牲畜都悄无声息地从过夜的圈栏里跑到了旷野中。它们沿着一条直线，一声不吭，把一切挡道的东西都踩倒在地，穿过牧场和甘蔗田，蹚过湍急的河流和沼泽地。打头阵的是大牲畜群，外加驮马和走马，后面跟着猪羊和各种家禽，它们排成怪异的行列，消失在黑夜中。就连擅长长途飞行的鸟儿们，包括鸽子，也都大摇大摆地步行离去。清晨，留下的唯有那条守

在主人房门口的猎犬，从那时起，侯爵便和那条猎犬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养在府中的其他猎犬结下了近乎人类间的情谊。

年轻的伊格纳西奥心中充满了对荒芜庄园的恐惧，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屈从于父亲。父亲并未满足于儿子在爱情上做出的牺牲，在遗嘱里列下条款，命儿子娶一位西班牙显贵的女儿为妻。就这样，伊格纳西奥在一场豪华铺张的婚礼上迎娶了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这是一个长相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子，可伊格纳西奥碰也没碰过她，根本不给她生孩子的机会。除此之外，他继续过着他有生以来一直在过的生活：一个无用无能的单身汉的生活。

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把他带回了人间。他们一起去望大弥撒，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为了去亮相，她穿着镶了重重叠叠花边的裙子，披肩闪闪发光，头巾上的花边按照卡斯蒂利亚白人女子的法子浆过，身后跟着一群身着绫罗绸缎、披金戴银的女奴。她脚上穿的不是那种连最讲究的女人去教堂时都会穿的居家便鞋，而是一双山羊皮缝制的饰有珍珠的高筒皮靴。其他有钱有势的男人都戴着不合时宜的假发，衣服上的扣子都是用绿宝石做的，侯爵和他们不一样，他身穿棉布衣裳，头戴一顶白色礼帽。不过他都是被迫去参加这些公众活动的，因为他始终无法克服对社交生活的恐惧。

堂娜奥拉娅曾在塞戈维亚拜斯卡尔拉提·多梅尼克为师，而且获得了在学校和修道院教授音乐和唱歌的资格。她从娘家带来了一架拆散了的古钢琴，自己把它组装好，还带来了几件弦乐器，并以卓越的技艺弹奏和教学。她成立了一个见习修女乐团，每到下午，府邸里便飘荡着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新曲调，人们说，这个乐团一定是受圣灵抒情诗的启示而诞生的。

侯爵似乎对音乐一窍不通。按法国人的说法，他是艺术家的手、炮兵的耳。可自打乐器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那一天起，他就迷上了那把意大利古诗琴，它那奇特的双琴头、巨大的指板、众多的琴弦和清澈的声音令他痴醉。为了让他弹得和自己一样出色，堂娜奥拉娅费尽了气力。他们一上午接一上午地在果园里的大树下磕磕巴巴地演奏，她满怀爱意，竭尽耐心，他则像石匠一样执着，直到忏悔的牧曲心悦诚服地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

琴瑟和谐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堂娜奥拉娅鼓足勇气迈出了一直没能迈出的那一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也许是装出了一副害怕的样子，来到了从未亲近过的丈夫的卧室。

“这张大床有一半是我的，”她对他说，“我现在来要回我的那一半。”

侯爵不为所动。她也毫不动摇，满怀信心地认为无论是讲理还是用强，总有打动他的那一天。但是，十一月九号这天，空气纯净，天高云淡，他们正在柑橘树下弹琴，突然一道闪电使他们眼前一黑，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堂娜奥拉娅被闪电击中身亡。

满城的人都被这事震惊了，议论纷纷，说这个悲剧一定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引得天怒爆发所致。侯爵下令举办女王级别的葬礼。在葬礼上，他头一次身穿黑色塔夫绸露面，面色憔悴，这副样子将跟随他一辈子。从墓地回来，他惊异地发现，纷纷扬扬的小纸鸽像雪花似的飘洒下来，落在果园里的柑橘树上。他随手抓住一只，拆了开来，看到上面写着：那道闪电是我发出的。

在九天的祭祀结束之前，侯爵把他继承下来的遗产的重头都捐给了教会：蒙波斯和阿亚佩尔的两处牧场、距离此处只有十来西班牙里的马阿特斯的两千公顷土地、好几群驮马和走马、一座农场以及那座加勒比沿岸最好的榨糖厂。然而，他的财富之所以披上传奇色彩凭借的却是那片闲置的辽阔无垠的庄园，人们早已不记得它的边界，在想象中，它越过了拉瓜里帕沼泽和拉普雷萨低地，直抵乌拉巴丛林。他留下的只有那座庄严的府邸、那个已经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奴隶们住的院子，以及马阿特斯的榨糖厂。他把家中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老迈不堪的奈普图诺从侯爵一世开始就当车夫，侯爵维护了他的尊严，让他照看家中已经所剩无几的马匹。

他第一次孤身一人待在先人留下的阴沉沉的大宅里，夜不能寐，怀着土生贵族与生俱来的恐惧，生怕睡梦中被奴隶杀害。他经常从梦中惊醒，恍然不知那些从天窗偷窥的炽热眼神到底来自阳世还是阴间。他会踮起脚尖走到门口，突然打开房门，让正从锁眼里偷看他的奴隶吃上一惊。他感觉到他们迈着老虎般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在走道里窜来窜去，身上一丝不挂，涂满了椰子油，以免被人捉住。深受种种恐惧的折磨，侯爵下令家里的灯火要一直点到天明，并把逐渐占据了各处空间的奴隶全都赶了出去，又给家里带回了第一批受过格斗训练的猎犬。

大门关上了。法式家具上的天鹅绒因为受潮发出臭味，被整个儿清理掉了，挂毯、瓷器和精美时钟也给卖掉了，被拆空的房间里炎热难当，于是挂上了几张牛蒡草编的吊床。侯爵再也不去望弥撒，也不再静修，宗教游行时也不再举着至圣至灵的华盖，不再过各种宗教节日，也不遵守斋戒，但仍坚持按时向教堂缴纳税金。他把吊床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在昏昏欲睡的八月里睡在卧室，但几乎总是在果园里

的柑橘树下睡午觉。那些疯女人朝他扔厨房的垃圾，喊各种挑逗的脏话，可当有一天政府向他提出要把疯人院迁走的时候，他却因为对这些疯女人心存感激而断然拒绝了。

意中人的冷落使杜尔丝·奥莉维亚感到气馁，她靠回味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获得安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从果园里的小门逃出神圣牧者疯人院。她用满怀善意的食物收服了那些猎犬，用睡觉的时间来照料这座从来也不属于她的大宅，她用罗勒草编成的扫把打扫，以求好运，又在卧室里挂起一串串的蒜辫驱赶蚊虫。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是那种对什么事都要求万无一失的人，她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早上起来走廊里总是比头天晚上干净许多，又为什么她归置好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总会变了次序。直到丧妻快一年的时候，侯爵才第一次在厨房里撞见杜尔丝·奥莉维亚，她正在清洗厨房里的家什，因为她觉得女奴们洗得太马虎。

“我没想到你这么大胆。”侯爵对她说。

“这是因为你一直都是个可怜虫。”她说。

就这样，他们之间被禁的友谊又得以恢复，并且至少一度与爱情相像。他们常常聊到天亮，既无幻想也无怨恨，就像一对注定要回归平淡的老夫老妻。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兴许也真的幸福，直到他或她多说了一句或是少走了一步，于是这一夜就完全变了味儿，成了汪达尔人之间的战场，连猎犬们都会垂头丧气。于是，一切又会回到起点，杜尔丝·奥莉维亚会从这个家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侯爵坦诚地告诉她，他蔑视地产、改变生活态度，并非出于虔诚，而是当他看见妻子的身体被闪电烧焦时，一下子失去了信仰，取

而代之的是恐惧。杜尔丝·奥莉维亚主动安慰他，对他说从今往后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床上都将做他温顺的奴隶，但侯爵还是不为所动。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结婚了。”他对她发誓。

然而，只过了不到一年的光景，侯爵就悄悄地娶了贝尔纳达·卡布雷拉，她父亲曾是老侯爵的总管，后来靠做进口食品生意发了财。他们是在她父亲让她送盐渍鲱鱼和黑橄榄到侯爵家时认识的，这些都是堂娜奥拉娅的至爱，她死后，贝尔纳达继续给侯爵送这些东西。一天下午，贝尔纳达在果园里的吊床上发现了他，并读出了他左手皮肤上的命运符号。她算得很准，侯爵惊叹不已，从此以后一到午睡时间就派人把她叫来，即使他什么也不买。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侯爵一点主动的迹象也没有，于是她就替他做了。在吊床上，她猛然骑在了侯爵身上，用他长袍的下摆堵住他的嘴，几乎让他背过气去。就这样，她以一种侯爵在自慰带来的可怜兮兮的欢愉中想象不到的热情和技巧使他重新焕发了生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的童贞。此时侯爵已经五十二岁，她则只有二十三岁，但相比之下，年龄差异带来的危害算是最微不足道的。

午睡时分，在柑橘树福音般的阴凉下，他们继续这样做爱，无心无肺，匆匆了事。女疯子们在露台上唱着肆无忌惮的歌给他们鼓劲，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爆发出体育场里那种雷鸣般的掌声。不等侯爵对渐渐逼近的危险有所察觉，贝尔纳达便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把他从麻木中惊醒。她提醒侯爵，她不是黑人，她是一个拉迪诺印第安男人和一名卡斯蒂利亚白人女子的女儿，所以，弥补她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举行一场正式的婚礼。侯爵迟迟不作答复，直到有一天她的父亲斜挎着一杆老式火枪，在午睡时分敲响了他家的大门。他

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温和，没有直视侯爵的眼睛，而是把枪递了过去。

“您认识这是什么吗，侯爵先生？”他问道。

侯爵手里拿着火枪，有点不知所措。

“要我说，我觉得这是一杆火枪。”侯爵说，然后带着真诚的好奇问道：“您拿它干什么用呢？”

“保护我不受海盗的欺负，先生，”印第安人说这话时还是没去看侯爵的脸，“我现在把它带来，是希望在我动手杀死阁下之前，您开开恩先把我杀了吧。”

说完他直视侯爵的脸，那双小眼睛悲伤而默然，可侯爵还是读懂了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他把火枪还给了他，邀请他进屋庆祝协议达成。两天后，附近一座教堂的神父主持了婚礼，出席的有贝尔纳达的父母和双方的教父教母。婚礼结束时，萨坤达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给新婚夫妇戴上了象征幸福的花冠。

一天清晨，在一场迟来的暴风雨中，被怀了不足七个月的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在人马座下艰难诞生，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透明无色的小蝌蚪，脐带缠在脖子上，差点把她勒死。

“是个女孩，”接生婆说，“我看她活不了。”

这时，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向她的神灵许愿，说只要让这孩子活下来，她的头发将一直留到新婚之夜再剪。许愿的话声未落，女孩哇地哭出声来。多明伽·德阿德文托高兴地大声唱道：“她会成为一位

圣女！”侯爵并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见到女孩的时候，她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穿好了衣服。

“她会成为一个婊子，”他说，“要是上帝肯赐予她生命与健康的话。”

这个女孩，一个贵族与一个平民结合而生的女儿，像个弃婴一般过完了童年。母亲给她喂了唯一一次奶之后就视她为仇敌，不肯把她带在身边，说是害怕自己会杀了她。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把她喂养长大，给她施了基督教洗礼，同时把她奉献给了奥罗昆，这是约鲁巴族的一位神灵，性别不明，面容据猜测十分可怕，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而且总戴着面具。谢尔娃·玛利亚在女奴们的院子里长大，还不会说话就学会了跳舞，又同时学会了三门非洲语言，学会了在斋戒期间喝公鸡血、在基督徒中间来无影去无踪地穿行，像个无影无形的精灵。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在她周围安排了一大群欢乐的女黑奴、梅斯蒂索女佣和印第安女跟班，她们用据说对她有好处的水给她洗澡，用叶玛雅[1]的马鞭草净化她的心灵，像照看玫瑰园一样照看她那头瀑布似的长发——她五岁的时候已经长到齐腰长。时光流逝，女奴们一串接一串地给她戴上了代表各种各样的神灵的项链，总共有十六串。

就在侯爵整日在果园里消磨时光的时候，贝尔纳达已经用她的铁腕掌握了家里的大权。她的第一项作为就是在老侯爵往日权势的庇护下，把被丈夫散去的家财补回来。当年老侯爵曾获准在八年内卖出五千名奴隶，条件是每进口一名奴隶必须同时进口两桶面粉。经他云山雾罩的一番游说，再给海关人员一些好处，他卖掉了规定量的面粉，但私底下又多卖了三千名奴隶，这使他一举成为他那个世纪最飞黄腾达的个体商贩。

是贝尔纳达意识到，最赚钱的买卖不是奴隶，而是面粉，不过，实际上她的大笔生意主要靠的是她那不可思议的说服人的本领。仅靠在四年内进口一千名奴隶、每个奴隶搭配三桶面粉这样一项许可，她就发了大财：她卖掉了协议规定的一千名奴隶，但她并非只进口了三千桶面粉，而是一万两千桶。这是那个世纪规模最大的走私。

她有一半时间待在马阿特斯榨糖厂，她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办事中心，原因是那里离马格达莱纳河最近，同总督管辖区的内陆交通方便。不时会有关于她发了财的零星消息传到侯爵府来，但她从不向任何人透露账目。而住在府邸里的时候，甚至在她陷入危机之前，她总像是另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猎犬。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说得好：“她的身体已经装不下她的屁股了。”

她的老女奴死后，谢尔娃·玛利亚第一次在这座府邸里有了自己稳定的居所：人们把老侯爵夫人住过的豪华卧室给她收拾了出来。他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她教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也讲点算术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家庭教师竭尽全力想教会她读书写字，她拒绝了。据她自己说，她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些字母。一个从世俗学校来的女教师启发她欣赏音乐，女孩表现出了兴趣和良好的品位，可她对学习任何一种乐器都没有耐心。女教师惊愕之余辞去了工作，告别时对侯爵说：

“与其说这女孩对任何事情都关上了大门，不如说她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贝尔纳达也曾想抚平自己对女孩的怨气，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责任既不在她这边，也不在女孩那边，水火不容的是她们的天性。从自以为发现女儿身上有一种幽灵似的特质开始，她就总是心悬一线。只

要想到自己一回头就可能看见那个郁郁寡欢的女孩——身上穿着薄薄的纱裙，疯长的头发已经披到脚踝，两只眼睛神秘莫测——她就不寒而栗。“丫头！”她大声训斥，“不许这样看着我！”每当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生意当中，她总感觉脖子后面有一条蛇伺机而动，发出嘶嘶的声响，这时她就会吓得跳起来。

“丫头！”她会高声嚷道，“你进来之前出点儿声好不好！”

而女孩总会用一长串约鲁巴语让她更加恐惧。到了夜里情况就更糟糕，因为贝尔纳达常常从梦中惊醒，感到有人触碰她，其实是女孩站在床脚看她睡觉。给她手腕上拴上铃铛也不管用，因为谢尔娃·玛利亚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铃铛根本不会发出响声。“这孩子身上唯一属于白种人的东西就是她皮肤的颜色。”她妈妈这样说。这话一点不错，因为女孩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非洲名字：玛利亚·曼丁加。

一天早晨，潜伏在她们之间的危机爆发了：贝尔纳达因为服用了过多的可可饼，早晨醒来时口渴得要命，却发现水罐底漂浮着谢尔娃·玛利亚的一个洋娃娃。她并不认为这只是漂在水里的一个洋娃娃，而把它想成更恐怖的东西：一个死洋娃娃。

她坚信这一定是谢尔娃·玛利亚在对她施一种非洲巫术，于是狠下决心：这家里有我无她。侯爵怯生生地试图调解，可贝尔纳达干脆地打断了他：“要么留她，要么留我。”就这样，谢尔娃·玛利亚又回到了女奴的棚屋里，就连她妈妈去榨糖厂的时候也不例外。她还是像刚出生时那样静默，也还是一个大字不识。

但贝尔纳达的状况仍不见好转。她一心想留住犹达斯·伊斯卡柳特，不惜让自己变得像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的生意和生活便

都出了问题。她常常把他打扮成努比亚海盗、金杯纸牌里的A或是梅尔基奥王，把他带到郊外，特别是在大帆船停泊在港口、举城狂欢的那半年里。他们随心所欲地光顾城外的酒馆和妓院，那都是为从利马、波托韦罗、哈瓦那和维拉克鲁斯来的商人们开的，这些人为争夺整个新大陆的商品和货物而来。一天晚上，在一家为划船奴开的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犹达斯神秘兮兮地靠近了贝尔纳达。

“张开嘴，闭上眼睛。”他对她说。

她照他说的做了，于是他在她的舌头上放了一片瓦哈卡的神奇巧克力。贝尔纳达尝出了味道，把那玩意儿吐了出去，因为她从小就特别厌恶可可。可犹达斯劝她说，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吃了能愉悦身心、增强体力，还能让人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贝尔纳达爆发出一阵大笑。

“要真是这样的话，”她说，“那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小修女们早都变成斗牛了。”

她吃发酵蜂蜜上了瘾，结婚前她就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吃，而现在，被榨糖厂炎热的空气包围，不光是嘴，她的五种感官都在享用这东西。她跟着犹达斯学会了嚼烟叶和掺了号角树燃烧后的余烬的古柯叶，像内华达山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小酒馆里，她尝过印度大麻、塞浦路斯松节油、里尔－德卡托尔塞的佩奥特掌，也至少尝过一次由菲律宾商人带来的中国鸦片。不过，她对犹达斯为可可做的宣传也并非充耳不闻。把各种东西品了一圈之后，她知道了可可的好处，这玩意儿成了她的最爱。犹达斯最后沦为小偷和皮条客，偶尔也犯一回鸡奸什么的，为了堕落而堕落，因为他什么都不缺。在一个活该他倒霉的

夜晚，他在牌场上跟人起了纠纷，当着贝尔纳达的面，他赤手空拳和三个划船奴打了起来，结果被他们用椅子砸死了。

贝尔纳达躲进了榨糖厂。侯爵的府邸像一艘船似的随波逐流，如果说那时还没有沉没，那全是因为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的老练操控，最终，她按照她那些神灵的愿望把谢尔娃·玛利亚抚养长大。侯爵对妻子的崩溃知之甚少。榨糖厂那边传来消息说，她精神失常了，总是一个人自说自话，还时不时挑一些殷勤卖力的奴隶陪她及她的老同学们共度良宵。钱财流水般来，也流水般去。幸亏她东一点西一点地藏了几皮囊的蜂蜜和几口袋的可可，才不会在瘾头上来的时候耽误时间。当时，她剩下的唯一实在的东西是满满两罐面值一百块和四块的达布隆金币，那是她在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埋在床底下的。她被毁得不成样子，连续三年没有回家，最后一次从马阿特斯回来的时候，连她的丈夫都认不出她了，之后没过多久，谢尔娃·玛利亚就被狗咬了。

到了三月中旬，感染狂犬病的危险似乎消除了。侯爵十分庆幸于自己的好运，决定弥补过去的缺失，用阿布雷农肖开的幸福疗方征服女儿的心。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在了女儿身上。他努力学着给女儿梳头，给她编辫子，努力教她做一个真正的白人女孩，让她重拾一个土生贵族失落的梦想，要她戒除爱吃腌鬣蜥和烧犰狳的毛病。他几乎什么都试过了，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问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使女儿幸福。

阿布雷农肖继续来侯爵府探望。和侯爵交流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侯爵那种超脱于宗教法庭威权之外的糊里糊涂的态度使他颇感兴

趣。炎热的月份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医生在柑橘花盛开的树下自言自语，而侯爵则在离一个从未听见过他名字的国王一千三百西班牙海里远的地方，躺在吊床上自生自灭。就在某一次这样的探访期间，他们突然被贝尔纳达的惨叫声打断。

阿布雷农肖吃了一惊，而侯爵却装作没听见，可接下来的又一声惨叫太凄厉了，侯爵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不管这人是谁，都需要帮助。”阿布雷农肖说。

“是我的第二任妻子。”侯爵说。

“她的肝坏掉了。”阿布雷农肖说道。

“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呻吟时嘴是张着的。”医生说。

医生没得到准许就推开了门，想看看待在黑暗屋子里的贝尔纳达，可她没在床上。他叫了叫她的名字，她也没有答应。接着他打开了窗户，在四点钟刺眼阳光的照射下，她一丝不挂，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致命的胀气使她浑身发亮。她的皮肤因胆汁外溢颜色暗淡。她抬起头来，被突然打开的窗户那儿射进来的光刺得睁不开眼。逆着光，她一下子没认出医生来。而医生只消瞧上一眼就知道了她的结局。

“猫头鹰已经在冲你唱歌了，我的孩子。”他对她说。

医生告诉她，只要她肯接受一次净化血液的紧急治疗，还来得及救她的命。这时，贝尔纳达认出了医生，用力支起身子，发出一阵辱

骂。阿布雷农肖平静地忍受了那些脏话，又关上了窗户。临走时，他在侯爵的吊床前停下脚步，发出再清楚不过的预告：

“侯爵夫人活不过九月十五号，除非她在此之前把自己吊在房梁上。”

侯爵面不改色，说了句：

“唯一不幸的是现在离九月十五号还远着呢。”

他继续在谢尔娃·玛利亚身上施行幸福疗法。站在圣拉匝禄山上，向东望去是一片不祥的沼泽，往西面看，一轮巨大的红日正沉入燃烧着的洋面。女孩问他在大海的那一边有什么，他说：“世界。”他发觉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女儿身上引起出乎他意料的反应。一天下午，他们看见鼓满帆的大帆船队出现在地平线上。

城市一下子变了样。木偶戏、吞火人，无穷无尽的新鲜玩意儿在那个充满好兆头的四月涌向港口集市，令父女俩大为开心。谢尔娃·玛利亚在这两个月里学会的白人的东西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时光。让女儿改头换面的同时，侯爵自己也变了样，而且变得如此彻底，已经不像是性格上的变化，更像是天性发生了改变。

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上发条跳舞的小人儿、各色各样的八音盒以及众多的机械钟表，都是从欧洲货集市上买来的。侯爵掸去那把意大利古诗琴上的灰尘，装上弦，又调好了音，那股不屈不挠的专注劲儿只能用爱来解释。他在伴奏下唱起了当年的歌，他耳朵不行，但嗓子不错，多少年过去了，记忆早已漫漶不清，他这个特点却始终未变。这些天里，女孩问过他，是不是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情能战胜一切。

“没错，”他答道，“可你最好别信。”

好事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侯爵欣喜不已，开始考虑去塞维利亚旅行一趟，好让谢尔娃·玛利亚从她沉默的悲伤中恢复，完成对世界的认知。就在日期和目的地都已经商量好了的时候，他却在睡午觉时被卡莉达·德尔科布雷叫醒，后者带来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

“先生，那可怜的孩子就要变成一条狗啦。”

阿布雷农肖接到紧急召唤，他否认了民间的迷信说法——得了狂犬病的人最后会变得和咬了自己的畜生一模一样。但他证实了女孩稍稍有点发烧，虽说发烧本身也是病，并不一定是别的什么疾病的症状，他还是没有掉以轻心。他提醒被痛苦折磨着的侯爵，女孩得任何病的可能性都存在，因为被狗咬，无论是不是条疯狗，都并不能预防其他疾病。和以往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侯爵问了他一句：

“您最终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吗？”

“科学还没法让我多告诉您点什么，”医生的回答同样酸溜溜的，“不过，如果您不相信我说的，您还有一个办法：指望上帝吧。”

侯爵没听懂他的意思。

“我本认定，您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说道。

医生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那样的人呢，先生。”

侯爵没有指望上帝，而是选择相信一切能给他带来哪怕一点点希望的事物。城里还有三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六位药剂师和十一位会给人放血的理发师，以及数不清的江湖郎中和精通巫术的人，尽管在近五十年里，宗教法庭给一千三百人判了轻重不等的刑罚，还有七个人被处以火刑。一名从萨拉曼卡来的年轻医生揭开谢尔娃·玛利亚已经愈合的伤口，敷上一些发散的药膏，为的是把脓拔出来。另一位医生出于同样的目的用蚂蟥吸她背上的血。一名会放血的理发师用女孩自己的尿液为她清洗伤口，另一位直接让她喝自己的尿。在整整两个礼拜里，她每天洗两次药水澡，每天为软化大便灌两次肠，天然锑熬的汤剂和其他致命的药水把她折腾得奄奄一息。

烧退了，但没人敢宣称躲过了狂犬病的危险。谢尔娃·玛利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开始，她还用她与生俱来的傲气对抗了一阵，可两个礼拜过去了，没有任何效果，她脚踝上溃烂的伤口火烧火燎的，皮肤因敷了各种各样的药膏而疼痛不已，胃像被剥了一层皮。她什么罪都受了：呕吐，抽筋，痉挛，说胡话，大小便失禁，在地上滚来滚去，痛苦而愤怒地号叫。就连那些最胆大的江湖郎中都相信，这孩子要么是疯了，要么是魔鬼缠身，就让她听天由命吧。就在侯爵彻底绝望之时，萨坤达拿着圣休伯特的钥匙出现了。

这算是最后一招了。萨坤达解下自己身上的床单，涂上印第安人的油彩，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在赤身露体的孩子身上蹭来蹭去。女孩虽说极度虚弱，仍拳打脚踢地反抗着，萨坤达强压住她。贝尔纳达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疯狂的喊叫声，跑过去一探究竟，结果看见谢尔娃·玛利亚在地上乱踢乱蹬，萨坤达压在她身上，被女孩一头波浪般的金发缠绕，嘴里吼着圣休伯特的祈祷词。贝尔纳达用吊床的挂绳对着两

人一顿猛抽。一开始她站着抽在地上惊呆了的两人，后来又追着她们跑遍了每一个角落，直到她喘不上气来。

教区主教堂托里比奥·德卡塞雷斯－维尔图德斯，听到有关谢尔娃·玛利亚失常变疯的公众丑闻后很是吃惊，派人去请侯爵，没说原因，也没说日期或时间，这表明十分紧急。侯爵克制住自己的犹豫，未经预先通告，当天就赶了过去。

主教上任的时候，侯爵已经退出了公众生活，他们俩几乎没见过面。此外，主教是一个身体状况极差的人，肥胖到几乎不能自理，还饱受哮喘病的折磨，这考验着他的信仰。他没在太多大场合露过面，尽管他在这些场合的缺席令人难以置信，而在他参加过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中，他总是保持低调，就这样，他渐渐变成了一个虚幻的人。

侯爵在一些公众场合远远看见过他几回，但记得住的只有一次在联合弥撒上，主教由几位政府大员用轿子抬着，头顶上方还撑着华盖。由于身躯庞大、法衣奢华，猛地看上去他就是一位体形肥大的老人，但他的面庞——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棱角分明，长着一双很少见的绿眼睛——却保持着一种不随岁月变化的华美。被抬在轿子上，他身上笼罩着教皇般的神奇光环，凡是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到他周身散发着权力意识和智慧的光芒。

他住的是全城最古老的府邸，两层楼，很宽敞，只是已经破败，而他的活动范围连一层楼的一半都没占满。府邸就在大教堂隔壁，有一道共用的回廊，拱顶已经发黑，院子里有个水池，早已破败不堪，

长满了荒芜的杂草。就连那面有着精美石雕的威风凛凛的正墙，以及那几扇用整块木板做成的大门，也都因为没人照料而残破不堪。

侯爵在大门口受到一位印第安执事的接待。他向那些匍匐在门廊前的乞丐散了些零钱，然后走进了府邸的阴凉之中，这时，大教堂里响起了下午四点的洪亮钟声，侯爵肚子里也一阵回响。中央走廊黑黢黢的，侯爵跟在执事身后却看不见他，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生怕碰倒了那些胡乱放置的雕像或是踩上横在路中间的残砖碎瓦。走廊尽头有一间不大的等候室，因为有扇天窗，里面稍微亮一些。执事停住脚步，对侯爵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等待，自己进了里面一扇门。侯爵没有坐下，而是看着主墙上一幅巨大的肖像油画，那是一个年轻的军人，身穿国王卫队旗手的礼服。侯爵看了看画框上的铜牌才知道，原来是年轻时的主教。

执事打开门，请侯爵进去，侯爵没动身子就又一次看见了主教，只不过比肖像画上老了四十岁。尽管饱受哮喘病和炎热天气的折磨，他还是比人们所形容的要庞大许多，也威严许多。他浑身大汗，在一把菲律宾摇椅上慢慢地摇晃着，手里轻轻摇着一把棕榈叶扇子，身子前倾，这样呼吸能畅快一些。他脚上套着双乡下人穿的凉鞋，身上的粗棉布无袖外袍因为用肥皂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发花。他真的很清贫，这一眼就可以看出。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那双清澈的眼睛，透过它们看到的只有高尚的灵魂。他看见侯爵走到门口，立即停止了摇晃，用扇子打了个亲切的手势。

“请进，伊格纳西奥，”主教对他说，“把我这儿当成你的家。”

侯爵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汗，穿过门，来到一个黄色风铃草和吊蕨覆顶的露台上，所有教堂的塔楼在这里尽收眼底，还可以看见大户人家的红屋顶、在大热天里昏昏欲睡的鸽舍、玻璃似的天空下轮廓清晰的军事碉堡，以及暑气蒸腾的大海。主教特意伸出他那军人的手，侯爵亲吻了他的戒指。

因为哮喘，主教的喘气声又粗又重，说的话也不时被喘息声或急促刺耳的咳嗽声打断，但他的口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立刻轻松地与侯爵交谈起日常琐事。侯爵坐在主教对面，对这样一个东拉西扯的安慰性开场白心存感激，这时，五点的钟声响起。这不只是一串声音，更是一股震颤，下午的光影都抖动了起来，天空飞满了受惊的鸽子。

“太可怕了，”主教说，“每个钟点都像地震一样在我的五脏六腑里回响。”

听了这话侯爵吃了一惊，因为四点的钟声响起时，他脑海中曾浮现同样的想法。主教觉得这种巧合很正常。“想法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说，一面伸出食指在空气中画出一个个连续不断的圆圈，又说：

“它们就像一群小天使，在那儿飞来飞去。”

一个做杂务的修女端来一只双耳瓶，浓浓的葡萄酒里泡着切碎的水果，又端来一个热气腾腾的水盆，空气里顿时弥漫一股草药味。主教闭上双眼吸了会儿蒸汽，从那种迷醉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时，他已与先前判若两人：他成了自己权威的不二主人。

“我们请你过来，”他对侯爵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你需要上帝的帮助，而你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器官的响声，他的双眼恢复了俗世的光亮。为了鼓足勇气，侯爵一口喝下了半杯酒。

“最最尊贵的阁下，您想必知道我正经历人生中所能遭受的最大不幸，”他说道，语气中饱含谦卑，“我已失去信仰。”

“我们知道，我的孩子，”主教毫不吃惊地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主教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兴奋，因为二十岁那年，在摩洛哥的国王卫队做旗手期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也曾失去信仰。“刹那间我觉得上帝已不复存在。”他说，他吓坏了，从此把一生都献给了祈祷和悔罪。

“直到上帝怜悯我，向我指明我的天命之路，”他最后这样说道，“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失去了信仰，而是上帝继续信任你。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正是天主用他无穷无尽的智慧照耀着我们，赐予我们慰藉。”

“我本想默默承受自己的不幸。”侯爵说。

“但看来你根本就做不到。”主教说，“你可怜的女儿在地上滚来滚去，抽搐不已，嘴里狂吠异教徒的黑话，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这些不正是魔鬼附体的明确无误的症候吗？”

侯爵吓得目瞪口呆。

“您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告诉你，魔鬼的诡计数不胜数，其中之一便是披上一种肮脏疾病的外衣，进入无辜的身躯，”他说，“一旦进入，靠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将他们驱除出去的。”

侯爵从医学角度讲了女儿被狗咬的伤口的变化，可主教总能找到一个有利于他的观点的说法。他向侯爵问了一个他无疑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知道阿布雷农肖是谁吗？”

“他是第一个来看我女儿的医生。”侯爵说。

“我想听你亲口说说他。”主教说道。

他摇了摇手边的一个铃铛，一位三十岁左右、衣着整齐的神父应声而至，快得就像从瓶子里放出的精灵。主教只介绍说这是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就让他坐了下来。天太热，德劳拉神父穿着一件长袍，脚上是双和主教穿的一模一样的凉鞋。他神色紧张，面色苍白，目光敏锐，满头乌发里有一绺白发搭在额前。他呼吸急促，两手发烫，似乎不是生活幸福的人。

“关于阿布雷农肖，我们都知道些什么情况？”主教问他。

德劳拉神父想都没想就给出回答。

“阿布雷农肖·德圣佩雷拉·卡乌。”他拼读似的说出医生的名字。随即他转向侯爵：“侯爵先生，您有没有注意到，他姓氏最后那个词[2]在葡萄牙语里是狗的意思？”

严格地说，德劳拉继续说道，大家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根据宗教法庭的档案，他是葡萄牙籍犹太人，被逐出半岛，在这里受到一位对他心存感激的市长的庇护，因为他用取自图尔瓦科的有净化之效的水给他治好了重达两磅的疝气。他又说那人有些神奇的偏方，曾狂妄地宣称自己能预知人的死亡，说他可能有鸡奸癖，什么书都敢看，而且在生活中不信上帝。然而，人们对他唯一的明确指控是他曾使客西马尼一个缝缝补补的小裁缝起死回生。有很可靠的证词表明，当阿布雷农肖命令他站起来时，那人已经被装裹停当入殓了。幸亏那个复活了的裁缝在宗教法庭上声明，其实他一直都没有丧失意识。“这才把阿布雷农肖从火刑柱上救了下来。”德劳拉总结道。最后他又提到一件事，说那匹死在圣拉匝禄山上的马被埋进了圣地。

“他爱那匹马，就像爱一个人一样。”侯爵插了句人情话。

“这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亵渎，侯爵先生，”德劳拉说，“马活百岁可不是上帝要管的事。”

侯爵警觉起来：一句私下里的玩笑话也能进宗教法庭的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辩解道：“阿布雷农肖说话口无遮拦，可以我之愚见，这离异教思想还有很远的距离。”要不是主教把他们从偏离的方向拉回来，这场辩论一定会变得激烈且没完没了。

“医生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主教发话了，“让人得上狂犬病是上帝的敌人惯用的一种鬼花样。”

侯爵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主教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解释，听上去有点像万劫不复的判词的前奏。

“幸运的是，”他总结道，“尽管你女儿的身体治不好了，上帝总还是给了我们办法来拯救她的灵魂。”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侯爵看见绛紫色的天空中亮起了第一颗星星，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脏兮兮的家中，拖着那只被江湖郎中们折腾坏的脚。他带着天生的谦卑问道：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主教逐条向他交代。他准许侯爵在办事的时候提起他的名字，特别是在圣克拉拉修道院，说侯爵应该尽快把女儿送到那里去。

“你把她交到我们手上，”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话，“剩下的事情上帝会处置的。”

告别时侯爵觉得比来的时候更加痛苦。从马车车窗看出去，街道破破烂烂的，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水坑里洗澡，到处散落着秃鹫们丢下的垃圾。在街角拐弯处，他看见了大海。大海一直就在那里，可他心里涌上一阵犹豫不安。

侯爵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敲响了，自从堂娜奥拉娅死后他第一次高声祈祷起来：“主派天使告知玛利亚。”古诗琴的弦声在黑暗中回响，像是从一个水塘底部传来的。侯爵顺着乐声摸索着走到了女儿的房间。女儿就在那里，坐在梳妆凳上，身上披了件白色长袍，头发一直拖到地面，正弹着一首跟他学的入门练习曲。侯爵记得中午他留在家中的是一个被江湖郎中折腾得虚弱不堪的女儿，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除非发生了什么奇迹。但这只是他一时的错觉，谢尔娃·玛利亚察觉到父亲来了，停止了弹琴，又陷入了痛苦之中。

侯爵陪她待了整整一夜。他引导她在卧室里做了晚祷，像个临时借来的爸爸一样笨手笨脚。睡袍也给她穿反了，她不得不脱下来重新穿正。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女儿的裸体，她紧贴着皮的肋骨、小不丁点儿的乳头和柔软的茸毛看得侯爵一阵心痛。一个火红的圈环绕在她发炎的脚踝周围。他帮她躺下的时候，女儿依然独自忍受着痛苦，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呻吟，侯爵惊慌失措，因确信自己是在帮她走向死亡。

自从失去信仰以来，侯爵第一次产生了做祈祷的强烈愿望。他来到祈祷室，竭力想寻回抛弃了自己的上帝，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怀疑比信仰更有耐力，因为全部的感官都在支持前者。清晨，天气凉爽，他听见女儿咳嗽了好几次，便向她的卧室走去。途中他看见贝尔纳达的房门半开着。他想和她谈谈心中的困惑，便推开了房门。贝尔纳达脸朝下睡在地上，呼噜打得震天响。侯爵手放在门闩上，看了看，没去叫醒她。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用你的命换她的命。”随即纠正道：

“用我们俩的贱命换她的命，妈的！”

女儿还在睡觉。侯爵看着她一动不动、虚弱无力的样子，心中不禁自问，是情愿看见她死掉，还是情愿见她受狂犬病的折磨。他担心蝙蝠来吸女儿的血，给她整理好蚊帐，怕她咳嗽，给她盖好被单，然后就这样守候在床边，心中泛起一种新的快意，觉得自己今生今世从未像此刻这般爱过女儿。接着，他既没请示上帝，也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出了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清晨四点钟，谢尔娃·玛利亚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侯爵坐在她的床边。

“咱们该走了。”侯爵对她说。

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就起了床。侯爵帮她装扮起来。他在大木箱里找到了一双丝绒套鞋，这样她的那双小靴子就不会伤到她的脚踝，又顺手取出一条他母亲小时候的礼服裙，时间太久了，裙子皱巴巴的，但是一眼便可看出，只穿了一次就再没上过身。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侯爵把裙子套在了谢尔娃·玛利亚的萨泰里阿教项链和受洗时穿过的无袖衣上。裙子穿上有点紧，但正好突出了它的古韵。他又从大木箱里找出一顶帽子，帽子上飘带的颜色和裙子一点也不配。女孩戴上大小正好。最后，他又为女儿整理出一只小手提箱，里头装了一条睡裙、一把齿密得能篦下虱子来的梳子，以及她祖母的一本小小的祈祷书，那本书的合页是用纯金打造的，封面上还镶嵌着珍珠母螺钿。

这一天是圣周的礼拜日。侯爵带谢尔娃·玛利亚去望了五点钟的弥撒，女孩虽不明就里，还是心绪极佳地接受了抚顶祝福。出来时他们从马车上看见天渐渐亮了。侯爵坐在主位上，膝盖上放着那只小手提箱，女孩漠然地坐在他对面，看着车窗外面的街道，这是十二岁的她最后一次看见这些街道了。她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好奇，来问问一大早把她穿成疯女王胡安娜的模样，给她戴上顶怪模怪样的帽子，究竟是要带她上哪儿去。沉思了许久，侯爵问她道：

“你知道上帝是谁吗？”

女孩摇了摇头。

地平线上电闪雷鸣，天阴沉沉的，大海波澜起伏。转过一个街角，迎面便是圣克拉拉修道院，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白色三层楼房，蓝色的百叶窗正对着海边一个垃圾场。侯爵用食指指了指。“就是那儿，”说着他又向左边指，“你随时都可以从窗户看见大海。”见女

儿没理会他，他做出了唯一的一次解释，关于女儿的命运，他此后再也没多说过半句话：

“你在这里和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一起住几天吧。”

因为是圣周礼拜日，大门口附近的乞丐比平日里要多一些。几个原本在同乞丐争抢厨房的剩饭剩菜的麻风病人跑了过来，向侯爵伸出了手。侯爵掏出自己所有的零钱散给了他们，一人一份。看大门的修女看见了穿黑色塔夫绸衣的侯爵和他穿得像女王一样的女儿，穿过人群来接待他们。侯爵对她解释道，他是遵照主教的意思把女儿带来的。守门人见他话说得诚恳，没有丝毫怀疑。她查看了一下女孩的外表，摘下了她的帽子。

“这个地方是不许戴帽子的。”她说。

她把帽子没收了。侯爵想把小箱子也交给她，可她没有接过去：

“她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

胡乱编起来的辫子松开了，几乎拖到了地面。守门人不相信那是真头发。侯爵试图把女儿的头发再盘起来，却被她一把推开，女孩自己把头发整理好，手法之利索让守门人吃了一惊。

“这头发该剪了。”她说。

“这是在圣母面前许过愿的，要到她结婚那天才能剪。”侯爵解释道。

守门人被这个理由说服了，她牵起女孩的手，连说再见的时间都没给她留，就把她带进了大门。因为走路的时候脚踝还有些疼，女孩

脱下了左脚的套鞋。侯爵看着女儿拖着那只光脚，手上拎着一只套鞋，一瘸一拐地渐渐远去。他期待女儿会有那么一刻的心软，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但是没有。他对女儿的最后记忆就是她拖着一只受伤的脚，穿过花园里的走廊，消失在那座活死人的楼房里。

---

[1] 约鲁巴人敬奉的女海神。

[2] 即卡乌，原文为Cao。

三

圣克拉拉修道院面对大海，是一座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房，窗户很多，都一模一样，一道半圆形拱顶回廊围着中间的花园，花园里杂草丛生，阴沉沉的。芭蕉和野生蕨类植物之间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一株瘦长的棕榈树为了采光，长得高过了楼顶的平台，从另一棵庞然大树的枝条上，垂下一绺绺香荚兰的藤萝和一串串兰花。大树下面是一池死水，池边的铁围栏锈迹斑斑，几只家养的金刚鹦鹉在上面像在马戏团一样走钢丝玩。

花园把这座楼一分为二。右面三层住的是那些活死人，这里的寂静偶尔会被悬崖峭壁下面的海浪声、诵经时的祈祷声和唱赞美诗的声音打破。这一侧有一扇内部的小门与小礼拜堂相通，这样，幽居清修的修女们便可以不经过对公众开放的大堂直接进入唱诗的地方，听弥撒、隔着格子窗吟唱，她们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她们。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华美的镶板式天花板遍布整座修道院，那出自一个西班牙工匠之手，他在这里费尽半生心血，为的是死后能在主祭台旁的壁龛里占一席之地。如今，他就在那里，在大理石石板下，和近两百年来的历任修道院院长、主教以及另外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挤在一起。

谢尔娃·玛利亚进修道院的时候，那里的幽居修女有八十二位是西班牙人，各自都带着各自的仆从，还有三十六位本地修女，出身于总督区的显赫门第。自从选择了安贫恭顺和守贞，她们和外面的唯一接触就是偶尔在会见室接受探望，那里隔着木头百叶窗，听得见声

音，却看不见人。会见室设在大门口，规矩很多，管得很严，而且每次会见都要有监听的人在场。

花园的左面是教室和各种手工作坊，住着人数众多的见习修女和手工艺老师。勤务处设在这儿，一间宽敞的厨房里有几个烧柴的大火炉、一张和肉铺里用的差不多大小的案台，以及一个大面包炉。后面有个院子，住了几户奴隶家庭，地上永远脏水横流，再后面是马厩、羊圈、猪圈、菜园和蜂房，总之，一切能改善生活的东西，该养的该种的，应有尽有。

最后，极远处，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似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有六十八年的时间，这房子被宗教法庭当监狱用，现在仍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关押那些走上歧路的克拉拉会修女。距离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伤已经有九十三天了，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狂犬病的症状，却被关进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最靠后的一间牢房。

守门人牵着女孩的手，走到过道尽头时碰见一个见习修女正要去厨房，便让她把女孩带去见院长。这个见习修女想，带这样一个无精打采、穿着体面的姑娘到乱哄哄的厨房去有点不合适，便让她坐在花园里的一条石凳上，说一会儿再来接她。可回来的时候，她把这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

稍后从这里路过的两个见习修女对女孩的项链和戒指挺感兴趣，问她是什么人。女孩没有回答。她们又问她会不会讲西班牙语，她还是像个死人一样一言不发。

“这是个聋哑人。”年轻一点的修女说道。

“要不就是德国人。”另一个修女说。

年轻的那个开始摆弄女孩，好像后者完全没有知觉一样。她把女孩盘在脖子上的辫子解开，用手量了量。“差不多有四拃长。”说这话时她已经坚信这女孩什么都听不见。她开始把女孩的辫子散开，但这时女孩的一个眼神吓住了她。修女把辫子托在手里，对她吐了吐舌头。

“你有一双魔鬼的眼睛。”她对女孩说。

她摘下女孩的一枚戒指，女孩毫无反抗，可是当另外一个修女想取下她的项链时，女孩像蛇一般扭动起来，又快又准地在她手上咬了一口。那修女飞跑着去清洗手上的血。

谢尔娃·玛利亚站起身来，想到水池边喝口水，这时，午前祷告的歌声响了起来。她吓了一跳，没喝上水就又坐回石凳上。不过，当她听出这是修女们在唱赞美诗，便又走回水池边。她挥手拨开一层烂树叶，连水里的虫子都没赶一赶，便就着水池喝了个饱。接着她蹲在树后撒了泡尿，怕有不知好歹的动物或心怀叵测的男人闯过来，她在手里拿了根棍子，这都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当年教给她的。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黑奴经过，她们认出了萨泰里阿教项链，对女孩说起了约鲁巴语。女孩兴奋起来，用同样的语言答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女孩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女奴们就把她带到了吵吵闹闹的厨房，奴仆们一片欢腾地迎接了她。有人注意到了她脚踝上的伤，想知道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我妈用刀子划伤的。”她说。又有人问起她叫什么，她说出了那个黑人名字：玛利亚·曼丁加。

她一下子变得如鱼得水。有只山羊不肯乖乖就死，她上前去帮忙砍掉了它的头，她挖出山羊的眼睛，割下山羊的睾丸，这些部位是她

的最爱。她在厨房里同大人们一起玩空竹，又在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赢了所有人。她用约鲁巴语、刚果语和曼丁加语唱歌，连那些听不懂歌词的人都听得十分入迷。吃午饭时，她把山羊的睾丸和眼睛用猪油煎熟，撒上热辣辣的调料吞了下去。

这时，整个修道院都知道了女孩在那里，只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女院长何塞法·米兰达。这女人精瘦、干练，至于思想狭隘则得自家传。她在宗教法庭的阴影下，于布尔戈斯接受了教育，可她的领导才能和死板的固执脾气却是与生俱来的。她手下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助理，但她们都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她什么都管，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她对当地主教的敌视几乎从她出生前一百年就开始了。同历史上一些大的纷争一样，起初是因为克拉拉会修女和方济各会主教之间在金钱和管辖权上的一些小矛盾。主教摆出一副毫不让步的架势，而修女们则获得了世俗政府的支持，一场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进展到某个时刻，就成了席卷一切人的大战。

主教在其他一些团体的支持下，把修道院团团围住，想以断粮绝草的方法迫使修道院投降，还颁布了“停止一切圣事”[1]的命令，也就是说，在新秩序建立之前停止全城的一切宗教活动。居民们分裂成彼此对立的派别，世俗和宗教当局互相对抗，各有各的支持者。然而，被围困了六个月后，修女们活了下来，仍抗争不已，直到一条秘密地道被发现，修女们的支持者就是从那里给她们提供给养的。最后，方济各会争取到了一位新任市长的支持，攻破了圣克拉拉修道院，把里面的修女都遣散了。

此后过了二十年，双方情绪才得以平息，克拉拉会修女们被拆的修道院也得到了恢复，可是，一百年过去了，何塞法·米兰达心中仍

留存仇恨的火种。她对新来的修女们反复灌输仇恨思想，要把仇恨刻进她们的心里乃至五脏六腑中，将一切责任都归罪于德卡塞雷斯－维尔图德斯主教以及所有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因此，当她接到来自主教方面的通知，说卡萨尔杜埃洛侯爵已经把他那个魔鬼附体、死态毕露的十二岁女儿送到了修道院，她的反应可想而知。院长只问了一句：“可是，真的有这么一位侯爵吗？”她的这个问题包含双重恶意，一是因为这事情是主教交办的，二是因为她从来不承认土生贵族的合法性，她把他们叫作“漏雨漏下来的贵族”。

午饭时间到了，院长还没在修道院里找到谢尔娃·玛利亚。守门人告诉过一位院长助理，说一大早来了一位穿丧服的男人，把一个装扮得像女王似的金发小姑娘交到了她的手中，但她没去询问女孩的情况，因为当时有一大群乞丐正为抢夺圣周礼拜日的木薯汤闹得不可开交。她把饰有彩色飘带的帽子作为证据交给了助理。在她们寻找女孩的同时，助理把帽子拿给院长看，院长对于谁是帽子的主人十拿九稳。她用指尖捏起帽子，伸直胳膊审视了一番。

“一位货真价实的侯爵小姐，却戴了顶脏兮兮的仆人帽子，”院长说道，“撒旦才知道她想干什么。”

上午九点，院长在去会见室的路上曾路过那个地方，还在花园里停留了一会儿，为一处泥水活和几个泥水匠讨价还价，可她没看见女孩坐在石凳上。另外几个修女也曾几次路过那里，也都没看见她。那两个摘下她戒指的见习修女赌咒发誓，说午前祷告之后，她们又从那里经过，可都没看见她。

院长午觉醒来，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唱歌，那声音传遍了整座修道院。她拉了一下挂在床边的绳子，一个见习修女应声而至，出现在

房间的暗影里。院长问她是谁唱得这样动听。

“是那个女孩。”见习修女说。

院长半睡半醒，嘴里嘟囔了一句：“嗓音真美。”可话音未落她就惊得跳了起来：

“哪个女孩？”

“我也不知道，”见习修女对她说，“就是那个从一大早就让后院吵翻了天的女孩。”

“老天爷啊！”院长惊叫起来。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飞一般地穿过整座修道院，顺着声音来到了奴隶们住的院子。谢尔娃·玛利亚正坐在一个矮凳上唱着歌，她的长发顺着地面铺开，身边围着一群着了迷的奴仆。她一看见院长，便立即停止了歌唱。院长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

“最最纯洁的玛利亚。”院长说。

“无玷成胎的圣母。”人们齐声应和。

院长朝谢尔娃·玛利亚挥舞着手中的十字架，仿佛那是一件武器。“全体退下。”她高声叫道。于是奴仆们都退开了，只剩女孩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原处，她的双眼紧紧盯住院长，十分警惕。

“撒旦的怪胎，”院长高声叫道，“你居然敢用隐身术来迷惑我们。”

谁都没办法让她开口说话。一名见习修女想去牵她的手，但被惊恐万状的院长制止了。“你不要碰她。”院长大声喝道，然后又转向所有在场的人：

“谁都不许碰她。”

最终，她们把她强行带走，塞进了牢房楼最靠后的一间屋子，任凭她乱踢乱蹬，嘴里发出狗一般的撕咬声。抬到半路，她们发现女孩浑身都是她自己拉出来的屎尿，便在马厩里拿水桶给她冲洗了一番。

“城里有那么多家修道院，主教偏把这堆臭狗屎送到我们这儿来。”院长埋怨道。

那间牢房还算宽敞，墙壁粗糙，房顶很高，顶棚上有几处白蚁窝。唯一的一道门旁有扇落地窗，用木板条钉得死死的，窗框也被一根铁栓牢牢固定。牢房尽头的墙上还有一扇高高的窗户，面朝大海，钉着木十字花格。一块泥灰砌成的台子上放着麻布垫子，里头塞了些干草，就是睡觉的床，用的日子长了，脏乎乎的。有一个石凳可以坐，墙上孤零零地钉着个十字架，下面放了张粗木桌子，既当供桌又做洗漱台。谢尔娃·玛利亚被扔在了这间牢房里，浑身上下连辫子都湿透了，害怕得抖作一团。外面守着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立志在抗击魔鬼的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女看守。

她坐在床上，两眼死死盯住那扇包了铁皮的门上的一根根铁条，下午五点钟，当一个女仆来给她送饭时，看见的她就是这副模样。女孩一动不动的。当女仆试图解下她的项链时，她一把抓住了女仆的手腕，迫使她松开了手。从那天晚上开始记录的修道院言行簿上，女仆宣称一股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把自己打倒在地。

门关上了，能听见尖厉的铁链声和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的声音，女孩还是一动不动。她看见了摆在眼前的食物：几粒咸肉丁、一块木薯饼和一小杯巧克力。她尝了一口木薯饼，嚼了两下便吐了出去。她仰面躺下，耳边传来大海的喘息声、饱含雨水的风声和这个季节最初的雷声，一次比一次响得更近。第二天早晨，女仆又给她送来了早饭，发现她睡在一堆干草上，那是她用牙齿和指甲从垫子里面掏出来的。

午饭时，她乖乖地随人去了还无需隐居清修的修女们吃饭的大饭堂。这是一间大屋子，有高高的拱顶和大大的窗户，大海明灿耀眼的光亮和海浪打在峭壁上的巨大声响从窗户涌入。二十个新近入院的修女，大多很年轻，坐在两排粗木桌子旁，她们身穿粗哔叽布长袍，剃了光头，开开心心，没心没肺，一点也不掩饰和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同桌共享军营式份饭的乐趣。

谢尔娃·玛利亚坐在离大门很近的地方，身边一左一右坐着两个女看守，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她们给她穿上了一条和见习修女一样的长袍，她的套鞋还是湿的。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看她，但饭后有好几个修女围住了她，欣赏她的小玻璃珠项链，其中一个还试图把它摘下来。谢尔娃·玛利亚挺直了身子，两个女看守试图按住她，她只一顶便拱开了她们。她爬上桌子，从这头跑到那头，嘴里高声尖叫着，像魔鬼附了体一般横冲直撞。她把一路上遇见的所有东西都打得稀烂，最后从窗户跳了出去，撞坏了院子里的藤萝架，踢翻了蜂箱，碰倒了畜栏。蜜蜂满世界乱飞，受惊的牲畜吓得大叫，到处乱跑，甚至闯进了清修修女们的卧房。

从此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不被归罪于谢尔娃·玛利亚的有害影响。好几个见习修女都在记录簿上写道，这女孩长了对透明

的翅膀，发出奇怪的嗡嗡声，飞来飞去。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和一大帮奴隶才把牲畜关进畜栏，把蜜蜂引回蜂房，让院内恢复了秩序。谣言传开了，说猪中了毒，说水会映出预兆，说一只被吓坏了的母鸡飞过屋顶，消失在海平线上。可是，修女们的恐惧中也带着矛盾：尽管院长有言在先，尽管每个人都战战兢兢，谢尔娃·玛利亚的那间牢房还是成了所有人好奇的焦点。

修道院里从晚上七点做晚祷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望弥散之间实行宵禁。灯火都要熄灭，只有几个经过特许的房间可以点灯。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修道院里的生活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自由，走廊里人影来来往往，随处可闻窃窃私语和压不住的匆忙的脚步声。自从何塞法·米兰达在修道院里明令禁止以来，宵禁时间，在谁都想不到的房间里有赌钱的、玩西班牙纸牌的、掷色子的，还有偷偷喝酒的、悄悄卷烟抽的。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出现在修道院里，足以引发种种新奇的冒险。

宵禁开始以后，就连那些最守清规的修女们都逃出自己的清修场所，三三两两地来和谢尔娃·玛利亚聊天。一开始，女孩用指甲来对付她们，然而她很快就学会了根据来者的秉性和自己当晚的情绪操控她们。最常见的要求是希望她充当魔鬼的差使，向他们讨要些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恩惠。谢尔娃·玛利亚会模仿过世的人的声音、被斩下脑袋的人的声音、魔鬼生下的怪胎的声音，而很多修女都对她的恶作剧坚信不疑，并把这些当成真事登记在了言行簿上。一个邪恶的夜晚，一群乔装打扮的修女袭击了那间牢房，她们堵上谢尔娃·玛利亚的嘴，抢走了她的萨泰里阿教项链。可她们的胜利十分短暂，就在仓皇逃走的路上，领头的修女在漆黑的楼梯上滑了一跤，跌破了脑袋。

她的同伴们也一刻不得安宁，直到把抢来的项链物归原主。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夜里来打搅这间牢房。

对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来说，这些日子就像家里死了人一样难熬。自从把女儿送进去之后，他一直为自己做事仓促而后悔不已。他愁得大病了一场，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他围着修道院转来转去，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一面自己问自己，这修道院有这么多扇窗户，谢尔娃·玛利亚会在哪一扇窗户后面想念自己呢。回到家里，他看见贝尔纳达正在院子里乘夜凉。他浑身打战，生怕她问起谢尔娃·玛利亚，可贝尔纳达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把猎狗放了出来，在卧室里的吊床上躺下，心想最好能一睡不醒。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信风季节已经过去了，夜里酷热难当。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也难耐酷暑，纷纷从沼泽那边飞来，饿蚊成阵。人们不得不点燃牛粪来驱赶蚊虫。一切生物都昏昏沉沉的。一年中这个时节，人们焦切地渴盼着第一场大雨的降临，就像六个月之后，人们又会同样焦切地祈求天气永远晴朗一样。

天刚刚破晓，侯爵就去了阿布雷农肖家里。他刚一落座就预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分担他心中的苦楚了。他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把女儿送进圣克拉拉修道院了。”

阿布雷农肖一时没明白，侯爵趁他迷惑不解，又给了他新的一击。

“给她驱驱魔。”侯爵说。

医生深深吸了口气，以一种常人难有的平静口吻说：

“请您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

于是，侯爵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自己是如何去探访主教的，如何有了祷告的愿望，如何一时冲动做出决定，又如何一夜难眠。这是一个老基督徒的告解，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丝一毫的秘密。

“我坚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总结道。

“您的意思是说，您又恢复信仰了？”阿布雷农肖问道。

“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放弃信仰，”侯爵说，“只要有疑问在。”

阿布雷农肖这回听懂了。他一向认为，一旦放弃信仰，在原来信仰存在之处就会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伤疤，这伤疤使人无法忘却信仰。他唯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怎么可以把女儿送去受那样一种驱魔的惩罚。

“这和黑人的巫术没多大区别，”他说，“恐怕还要更糟糕一些，因为黑人不过是杀几只公鸡作为牺牲奉献给他们的神，而宗教法庭更喜欢把无辜的人放到刑具上肢解，或是当众架在火上活活烧死。”

至于在探访主教期间那位卡耶塔诺·德劳拉阁下的出现，在他看来更是一个灾难性的预兆。“这人就是一个刽子手。”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开始细数过去发生过的把精神病人当成中魔的人或异教徒处死的信仰案例。

“我觉得与其把她这样活活埋葬，不如直接把她杀了，那样还更符合基督的精神。”他这么总结道。

侯爵画了个十字。阿布雷农肖看了侯爵一眼，只见他浑身都在颤抖，身上的塔夫绸丧服使他看上去像个幽灵，他的双眼又闪动着那种与生俱来的犹豫不定的亮点，像萤火虫似的。

“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他对侯爵说。

“这也正是我眼见着她走进那座活死人大楼时心里所想的，”侯爵说，“可问题是我感觉自己没有力量去违背上帝的意志。”

“那请您试着感觉自己有这样的力量吧，”阿布雷农肖说道，“也许哪一天上帝会因此而感谢您的。”

这天晚上，侯爵写了封信请求主教接见。他亲自执笔，行文混乱，笔迹稚嫩，他把信亲手交给了看门人，以确保信能送到收信人手里。

礼拜一这天，主教接到通知，说谢尔娃·玛利亚已经准备停当，可以进行驱魔活动了。他刚刚在他那垂盖黄色风铃草的露台上用完点心，对这则口信并没太在意。他吃得很少，可他那股子慢条斯理的劲儿能让这个仪式持续三个小时。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坐在主教对面，正用纯正平稳的嗓音和有些夸张做作的风格为对方大声朗读，这和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点挑选出来的书很相配。

这座古老的府邸对主教来说太大了，他只需要一个接见厅、一间卧室，再加上那个供他在雨季到来之前睡午觉、吃饭的露台就足够了。对面是官方图书馆，是卡耶塔诺·德劳拉创办并充实起来的，也由他娴熟地管理着，曾是整个西印度群岛最棒的几家图书馆之一。剩

下的十一间房子都关闭着，里面堆满了两个世纪以来废弃不用的东西。

除了在餐桌旁伺候的那个修女之外，卡耶塔诺·德劳拉是唯一能在用餐时间进入主教府的人，并非如人们所说，他有什么个人特权，而是因为他是尊贵的读经师。他没有什么明确的职务，头衔也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因为他是主教身边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实际意义上的助理，谁都知道，没有他在场，主教不会做出任何重要决定。他的私人房间就在和主教府相通的旁边一座楼房里，那里有教区官员们的办公室和卧室，另外还住着半打为主教做家务的修女。然而，卡耶塔诺真正的家却是图书馆，他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工作和读书，还在那里放了张行军床，供困乏时睡觉用。

在那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下午，出了件怪事：德劳拉在朗读的时候结巴了好几次。更不寻常的是，他居然漏掉了一页，并且毫无察觉地念了下去。主教透过他那副小小的炼金术士的眼镜打量他，直到他又翻到下一页，才颇觉好笑地打断了他：

“你在想什么？”

德劳拉吓了一跳。

“大概是天太热了，”他说，“怎么了？”

主教依然直视着他的双眼。“肯定不只是天热的缘故。”主教说，然后用同样的语气又问了一遍：“你刚才在想什么？”

“那个女孩。”德劳拉答道。

他没说是哪个女孩，因为自从侯爵来访之后，他们的世界里就再没有别的女孩了。他们议论了很久那个女孩的事。他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些被魔鬼附体的人的案例，一起回忆那些驱魔圣者。德劳拉叹了口气：

“我梦见她了。”

“你怎么会梦见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主教问道。

“她是一个土生的侯爵小姐，十二岁，长长的头发拖在身后，就像女王的长袍，”他说，“还会是谁呢？”

主教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从未沉迷于奇迹或天谴，他活在当下。只见他不太信服地摇了摇头，继续吃他的饭。德劳拉继续朗读的时候小心了许多，等主教吃完饭，他帮他在摇椅上坐好。主教坐稳之后，又开了口：

“现在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梦吧。”

其实很简单。德劳拉梦见谢尔娃·玛利亚坐在一扇窗前，外面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原野，她怀里兜了一串葡萄，正一颗一颗地摘着吃。每摘下一颗葡萄，枝上马上又长出一颗新的来。在梦里能明显看出，女孩已经在那扇无始无终的窗户前待了很多很多年，一直想把那串葡萄吃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因为她知道，最后一颗葡萄意味着死亡。

“最怪的是，”德劳拉说，“她观看雪原的那扇窗户就是萨拉曼卡的那扇，那年冬天下了三天大雪，小羊羔都在雪地里闷死了。”

主教被触动了。他太了解、太喜爱卡耶塔诺·德劳拉，没怎么在意他梦中的谜团。他才华横溢、品格优良，不管是在教区，还是在主教的心目中，他都有着牢不可破的地位。主教闭上眼睛，黄昏时分他总要打个三分钟的小盹。

与此同时，德劳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接下来他们还要一起做晚祷。他饭还没吃完，只见主教在摇椅上展了展身子，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主教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仍然闭着，随即发出狮子般的鼾声。德劳拉吃完饭，在鲜花盛开的蔓藤架下他常坐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了下来。这时，主教睁开了双眼。

“你还没有答我的话呢。”他对德劳拉说。

“我以为您是在说梦话呢。”德劳拉答道。

“那么我现在醒着再说一遍，”主教说，“我把那个女孩的健康托付给你了。”

“我从来没干过这么奇怪的差事。”德劳拉说。

“那么你的意思是拒绝了？”

“我的神父，我不是驱魔者，”德劳拉说，“我不具备做这件事所需的性格、训练或知识。此外，您和我都知道，上帝已经给我设定了另一条道路。”

这话一点不错。经过主教的斡旋，德劳拉已经成为梵蒂冈图书馆西班牙犹太人基金会监理的三名候选人之一。这件事尽管两人都心知肚明，但在他们之间提起这还是第一次。

“这就更合情合理了，”主教说，“女孩的事如果处理好了，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助力，这正是我们眼下所缺乏的。”

德劳拉有自知之明：他不太擅长和女人打交道。在他看来，女人天生被赋予了某种自成一套的理性，可以让她们在现实世界的种种机缘巧合之间纵横驰骋。一想到要和她们打交道，哪怕只是面对一个像谢尔娃·玛利亚这样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女孩，他手心里就冒出了冷汗。

“不，阁下，”他做出了决定，“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不仅有这个能力，”主教回答他说，“还绰绰有余地拥有别人都没有的东西：灵感。”

这个词牵涉的话题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然而主教并没有强迫他立即接受，而是给了他一段思考的时间，那天起圣周服丧就开始了，他可以在那之后再作答复。

“你先去看看那个女孩，”主教对他说，“深入了解一下她的情况，然后再汇报给我。”

就这样，年满三十六岁的卡耶塔诺·阿尔西诺·德尔埃斯皮里图·桑托·德劳拉－埃斯库德罗步入了谢尔娃·玛利亚的生活，步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当年主教在萨拉曼卡主持著名的神学讲坛时，他曾是他的学生，并以最优秀的成绩从那一级毕业。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直系后裔，他对这位先人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崇拜，逢人必说。他的母亲出生在蒙波斯省圣马丁－德罗巴市的一个西班牙人家庭，后来随父母去了西班牙。德劳拉一直认为自己和母亲没什么关联，直到后来到了新格拉纳达王国，他才意识到自己承袭而来的那份乡愁。

自打第一次在萨拉曼卡同他谈话开始，德卡塞雷斯－维尔图德斯主教就认定他是一个能给基督精神增添荣耀的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是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冰雪覆盖的原野，远处河岸上的白杨树排列成行。这幅冬日图景将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在这位年轻神学家的余生中始终追随他。

他们的谈话理所当然包括了读书这个话题，主教简直不敢相信，德劳拉年纪轻轻就已经看过那么多的书。他对主教谈起加尔西拉索，老师坦率地承认对这位诗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位不信教的诗人，在他全部的作品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不超过两处。

“不止两处。”德劳拉说，“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即便是出色的天主教诗人，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就在他第一次发誓愿那天，老师提议让他陪自己一同前往尤卡坦那个充满未知的王国，说自己刚被任命为那里的主教。德劳拉所了解的生活都是书本上的。对他而言，母亲的辽阔世界只是一个梦，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世界。当他从雪地里往外刨冻得硬邦邦的小羊羔时，他很难想象那令人窒息的炎热、那永远散发着臭气的腐肉和那蒸汽升腾的沼泽。而对在非洲打过仗的主教来说，想象这些就要容易得多。

“我听说我们有些教士在西印度群岛快乐得疯掉了。”德劳拉说道。

“还有好几个上吊的呢，”主教说，“那是一片被鸡奸、偶像崇拜和嗜食人肉威胁着的土地。”

然后他又不带丝毫偏见地加了一句：

“就和摩尔人的土地一样。”

可他同时又认为，这也正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那里需要一批勇士，他们要像在沙漠里传道一样，给那片土地带去基督教的文明。不过，二十三岁的德劳拉认为自己已经确立了通向圣灵精髓的道路，他对圣灵怀有绝对的虔诚。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图书馆馆长。”他说，“这是我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工作。”

他参加过一次录用考试，为的是竞争托莱多的一个将为他开启梦想之门的职位，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获得任命。可是他的老师十分固执。

“在尤卡坦做图书管理员比在托莱多做殉道者更容易成为圣人。”主教说。

德劳拉的回答一点也不客气：

“如果上帝肯降恩于我，我宁愿当个天使，而不当圣人。”

他还没考虑好老师给他的建议，他在托莱多的任命就下来了，但他最终选择了尤卡坦。然而他们两个谁也没能到达那里。在七十天的惊涛骇浪之后，他们在狂风海峡遭遇海难，被一支饱受摧残的护卫队救了上来，然后又被抛弃在达连。他们在此地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切实际地苦盼着大帆船队给他们带来信件，直到这一方土地的主教突然死去，留下了空缺，德卡塞雷斯主教被任命为代理主教。从带他们来新目的地的小船上，德劳拉望见了乌拉巴那无边无垠的热带雨林，明白了在托莱多那些阴沉沉的冬天里，母亲为什么会苦苦思念这里。那迷人的彩霞、梦魇中的小鸟、莽莽丛林中醉人的腐叶气味，一切都像是一段他从未经历过的往昔的珍贵回忆。

“唯有圣灵才能安排得如此妥当，把我带到母亲生活过的土地上来。”他这样说道。

十二年后，主教早已放弃了尤卡坦之梦，他已经七十三岁了，得了要命的哮喘，他心里明白，自己再也看不到萨拉曼卡的雪景了。在谢尔娃·玛利亚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做出决定，只等给自己的学生铺平了通往罗马的道路，他便退休。

第二天，卡耶塔诺·德劳拉去了趟圣克拉拉修道院。虽说天气有点热，他还是穿上了粗羊毛长袍，带着装有圣水的小桶和一只盛圣油的小盒子，这些都是对魔鬼作战的首要武器。院长此前从未见过他，可有关他的聪明才智和本领的传言早已打破了修道院的寂静。院长清晨六点在会见室里接待他的时候，他的青春朝气、他殉道者般的苍白脸色、磁性的声音，以及那谜一样的一绺白发，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他的种种过人之处，并不足以让她忘记这位是奉主教之命前来作战的战士。而对德劳拉来说，那天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公鸡们骚动不安的啼鸣。

“一共就六只公鸡，叫起来却像有一百只，”院长说，“另外，有一头猪突然开始说话了，还有一只山羊产下了三胞胎。”院长又恳切万分地加了句：“自从您那位主教施恩给我们送来那个祸害，一切就都成了这副样子。”

花园里鲜花盛开，旺盛得有点不合时令，这也让院长觉得有点不对劲。穿过花园时，她指给德劳拉看，不少花的大小和颜色都像假的一样，还有一些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在她看来，一切日常事物都披上了某种超自然的色彩。她的每一句话都让德劳拉觉得这女人比他强势得多，于是他抓紧时间磨利自己的刀剑。

“我们并没有说那女孩被魔鬼附体了，”他这样开了口，“我们只是说有理由这样怀疑。”

“我们现在的亲眼所见足以证实这一点。”院长答道。

“请您注意，”德劳拉说，“有时候我们会把某些我们搞不懂的事情归结为魔鬼在作祟，而不去想，会不会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圣托马斯说过，而且我拥护他的说法，”院长说，“对于魔鬼说的话，哪怕是真理，也不要相信。”

二楼安安静静的。一边是一排空着的单人房，白天都上着锁，前方是一排窗户，朝向浩瀚的大海。那些见习修女表面上看都在专心干活，可实际上，当院长和来访者一路走向那座牢房楼时，她们关注着二人的一举一动。

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在走廊尽头，走到那里之前，他们路过马尔蒂娜·拉波尔德的牢房，此人也曾是个修女，因为用刀子捅死两名女伴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她一直不肯吐露动机，已经被关了十一年了，她的名声更多地来自一次次未遂的逃跑而非她的罪行。她从不认为终生被关在这里和在修道院里当修女有什么分别，她的这种想法从未改变，以至于曾主动提出是否可以到活死人的楼里去当女佣来代替服刑。她自打有了这个念头就从未安生过，像对待信仰一样为此投注了无限的热忱，说穿了，她就是想获得自由，哪怕她不得不再次杀人。

德劳拉抑制不住孩童般的好奇心，透过小窗的铁栅栏向牢房里看去。马尔蒂娜背对着他们，觉察到有人在看自己，朝门口转过身来。德劳拉立刻感受到这女人的魔力。院长有些不安，把他从窗前一把拉开。

“您小心点，”院长对他说，“这女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有这么厉害吗？”德劳拉问道。

“就是这么厉害，”院长回答道，“如果这事儿归我管，她早就给放出来了。她是这座修道院里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女看守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牢门，一股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女孩仰躺在没铺垫子的石头床上，手脚被皮带捆着，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可她的眼睛泛出大海的光亮。德劳拉看到她和自己梦境中的女孩一模一样，不禁浑身发抖，冷汗淋漓。他闭上双眼，用尽信仰的全部力量低声祷告了几句，做完这些，他觉得自己恢复了镇定。

“就算这个可怜的人儿没有被任何魔鬼附体，”他说，“她在这里的环境也会将她推向这样的境地。”

院长答道：“我们可没有这般能耐。”她们的确已经尽了全力来把这间牢房维持在最佳状态，可谢尔娃·玛利亚自己弄出了一堆垃圾。

“我们的作战对象不是她，而是附在她身上的魔鬼。”德劳拉说。

他踮起脚，绕过地上的污秽，走进了牢房，一面用小掸子在牢房里洒着圣水，一面按例行程序喃喃祷告。院长被水在墙上浸出的大片水渍惊呆了。

“血！”她尖声叫道。

德劳拉对她的这种轻率判断不以为然。首先，不能因为水是红颜色的就认定那是血，其次，即便是，也不一定就是魔鬼的。“设想这是一个奇迹，而只有上帝才有这般本领可能更合理。”他说。可是，二者皆非，因为石灰墙上的水渍干了以后不再是红颜色，而是显现出一种深绿色。院长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光是克拉拉会修女，在她那个年代，所有女性都被禁止接受任何类别的学校教育，可她生长在一个杰出的神学家和了不起的异教徒相混合的家庭，从年少时起就学会了学院式的辩论。

“可是至少，”她反驳道，“我们不能否定魔鬼也会有改变血的颜色这种简单的本领。”

“能及时提出疑问最好不过，”德劳拉应声答道，两眼直视着院长，“请您读一读圣奥古斯丁吧。”

“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我已读得滚瓜烂熟。”院长说道。

“那就请您再去读一遍。”德劳拉说。

在处理女孩的事情之前，他先好声好气地请那位女看守离开了牢房。然后他又对院长发了话，声音里少了些刚才的温和：

“您也请便吧。”

“这样做您可得负责。”院长说。

“这里权威最高的是主教。”他说。

“这一点用不着您来提醒，”院长语带讥讽，“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是上帝的管家。”

德劳拉没去理睬院长最后那个用词，他在床边坐了下来，带着一种医生的细致神情查看女孩的身体。他还有点发抖，但已经不出冷汗了。

靠近了看，谢尔娃·玛利亚身上有抓挠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被皮带勒破了皮，可她身上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脚踝上的伤口，因为江湖庸医的胡乱治疗，伤口红肿，还化了脓。

德劳拉一边给女孩检查，一边向她解释说，把她送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害死她，而是怀疑有个魔鬼进了她的身体想偷走她的灵魂，说他

需要她的配合才能弄明白真相。可是，德劳拉无法确定女孩是否在听他说话，又是否明白他是真心真意地在请求她配合。

检查完毕之后，德劳拉让人拿来一个药箱，但他没让那个药剂师修女进入牢房。他在女孩的伤口上抹了些药膏，又轻轻吹了吹，以缓解又红又肿的皮肤的灼痛，女孩对疼痛的忍受力令他钦佩不已。谢尔娃·玛利亚没有回答他任何一个问题，对他的布道也未流露出丝毫兴趣，更没有一丁点的抱怨。

这样的一个开端使德劳拉回到图书馆这个宁静港湾后还一直很沮丧。图书馆在主教府里算是最大的一间屋子了，一扇窗户都没有，沿墙满满当当都是红木玻璃柜，书很多很多，放得整整齐齐。屋子正中央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些航海图、一个星盘和其他一些航海仪器，还有一架地球仪，随着世界的不断扩大，上面有历代绘图师手工修修补补的痕迹。房间的一头有一张粗木书案，上有墨水瓶、削笔刀、几根用当地的火鸡羽毛做的笔、吸墨粉和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枝枯萎的康乃馨。整间屋子里光线幽暗，弥漫着一股陈年的书卷味，透着森林里的那种清新与宁静。

房间深处一个很小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书橱，用粗木板封住。被监禁于其中的是神圣宗教法庭清除的禁书，因为“其内容亵渎神明、随意编造，故事虚假”。除了卡耶塔诺·德劳拉以外，谁都不能打开这个书橱，只有他得到了教皇的特别许可，可以去研究那些迷途的文字会把人带进什么样的深渊。

自从认识了谢尔娃·玛利亚，这个多年的宁静港湾却成了他的地狱。他再也不和教会里的或是世俗的朋友们聚会了，这些人曾与他一起分享纯洁思想带来的愉悦，进行学术竞赛，举办文学聚会和音乐晚

会。现在，他的全部激情都投注在识破魔鬼的各种狡诈伎俩上，他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之后才又返回了修道院。礼拜一，主教看见他步履坚定地走了出来，便问他感觉怎么样。

“此刻我就像长出了圣灵的翅膀一样。”德劳拉答道。

他穿上了粗棉布长袍，这赋予他一个樵夫的胆气，他的灵魂披上了对抗气馁的盔甲。这都是必需的。对他的问候，女看守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作为回答，而谢尔娃·玛利亚见到他时一脸阴沉，牢房里满地的剩饭和大小便令人喘不上气来。祭台上，在圣灯旁边放着当天的午餐，动都没动过。德劳拉端起盘子，舀了一勺裹在凝固的油脂里的黑豆喂她。她躲开了。他又试了几次，女孩的反应每次都一样。于是德劳拉自己吃掉了那勺黑豆，在嘴里咂了咂味儿之后，他嚼也没嚼就咽了下去，脸上满满地写着厌恶二字。

“你做得对，”他对女孩说，“这太不像话了。”

女孩根本没理会他的话。德劳拉替她治疗脚踝上的伤口时，她的皮肤抽搐了一下，眼睛也湿润了。德劳拉以为她被打动了，便细声细气地用一个温柔的牧羊人的言语安慰她，最后还壮起胆子松开了她手脚上的皮带，让她缓一缓被勒坏了的身体。女孩把手指蜷了好几次，直到感觉到它们还是自己的，又伸了伸被捆得麻木的双脚，这才头一次看了看德劳拉。她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突然像一头被困的野兽似的一跃而起，准确地扑到了他身上。女看守帮着把女孩制服，又将她绑好。临走之前，德劳拉从衣兜里掏出一串檀香木念珠，挂在了谢尔娃·玛利亚那些萨泰里阿教项链上。

主教看见德劳拉脸上的抓痕和手上被咬的伤口大吃一惊，那伤口光是看一看就让人疼从心起。可是，令主教更为吃惊的是德劳拉的反应，他把他的伤当成战利品一样炫耀，还开玩笑说自己会不会染上狂犬病。不过，主教的医生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处理了伤口，因为医生和另外一些人担心，下礼拜一的日食会是巨大灾祸的预兆。

不过，杀人犯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却没有在谢尔娃·玛利亚那里遭到任何抵抗。她曾踮着脚尖假装碰巧进了那间牢房，看见女孩手脚被绑躺在床上。女孩起初很紧张，两眼警惕地直愣愣盯着她，直到后来马尔蒂娜朝她微微一笑，女孩便也报以微笑，无条件地投降了。就好像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的灵魂一下子塞满了这间牢房。

尽管因为不停申明自己的无辜而哑了嗓子，马尔蒂娜还是告诉了女孩她是谁，又为什么要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当她问谢尔娃·玛利亚因为什么缘故被关在那里时，女孩只能用自己从驱魔师那里听到的那点儿说法回答她：

“我身体里有个魔鬼。”

马尔蒂娜没再追问，她想，要么是女孩本人在撒谎，要么就是有人对女孩撒了谎，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听到女孩吐露实情的少数几个白人之一。她给女孩露了一手她的刺绣手艺，女孩请求她把自己松开，好能跟着她学。马尔蒂娜给她看了看自己长袍衣兜里装着的剪刀，以及其他几件做针线活的家什。

“你想要的不就是让我把你放开吗，”她说，“可是我警告你，如果你对我使什么坏的话，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谢尔娃·玛利亚毫不怀疑这个女人的决断力。松了绑的她学起刺绣来又快又巧，耳朵也好使，就像当初她学古诗琴一样。临走时，马尔蒂娜答应女孩，争取下礼拜一带她一起去看日全食。

礼拜五清晨，燕子要飞走了，它们在天空中围成了一个大圈，令人作呕的蓝色粪便雪花般落在街道和房顶上。人们吃不下、睡不着，直到中午的太阳晒干了发硬的鸟粪，晚风吹净了空气。但惊恐已然蔓延。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成群的燕子一边飞一边屙下粪便，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燕子粪便发出的恶臭能让人难以过活。

自然，在修道院里，谁都不怀疑谢尔娃·玛利亚拥有改变迁徙规律的本领。礼拜天做完弥撒后，德劳拉提着一小篮从外面买来的甜食穿过花园时，甚至从空气中感觉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谢尔娃·玛利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脖子上还戴着那串念珠，可她没有回应德劳拉的问候，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从篮子里取了块奶酪饼，兴致勃勃地嚼起来，嘴里含满了食物对她说：

“这东西吃起来有股天堂的味道。”

他把剩下的一半奶酪饼递到谢尔娃·玛利亚嘴边。她躲开了，但没有像前几次那样转过身去面对着墙，而是向德劳拉指了指：女看守正在监视他们呢。他朝着大门的方向用力挥了挥手。

“走开。”他命令道。

女看守离开后，女孩想用这半块饼垫垫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可刚吃到嘴里就吐了出来。“一股燕子屎的味道。”她说。但她的脾气却改了不少。他给她治疗后背上火辣辣的脱皮伤口时她挺配合，而且

当她发现德劳拉手上包着绷带时，第一次对他投来关注。她带着一种绝非装出来的天真问他怎么了。

“被一条尾巴有一米多长的小疯狗咬了一口。”德劳拉告诉她。

谢尔娃·玛利亚想看看伤口。德劳拉解开绷带，她用食指轻轻碰了碰肿起来的紫红色伤口，仿佛那是一块烧红的炭，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比瘟疫还要讨人嫌吧。”她说。

德劳拉没有引用《福音书》来回答她，而是用了句加尔西拉索的诗：

“只要对方能承受，万事皆可为。”

德劳拉心情激动，预感到某件重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已经开始步入他的人生。出门的时候，女看守以院长的名义提醒他说，外面的食物是不许带入的，怕有人把有毒的食品送进来，过去修道院被围困期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德劳拉对她撒谎说，带这个篮子来是经过主教同意了的，他还正式提出抗议，说在这样一座以厨艺闻名的修道院里，犯人的伙食实在是太糟糕了。

晚饭期间，他为主教读书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像往常一样陪主教做了晚祷，祷告时他一直闭着眼睛，为了能更专心地想念谢尔娃·玛利亚。他回图书馆的时间比往日早了一些，他一直惦念着她，而且越是去想她，思念的渴望就越强烈。他高声诵读加尔西拉索的那些爱的十四行诗，心中惊惶不安，他怀疑每一句诗都是用密码写成的预兆，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他难以入眠。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趴在

书案上睡着了，额头压在那本他只字未读的书上。睡梦深处，他听见隔壁教堂传来三声新一天的晨祷钟声。“万圣护佑的玛利亚，愿上帝保佑你。”他在睡梦中说道。他被自己的声音突然惊醒了，看见谢尔娃·玛利亚穿着囚袍，火焰般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她把桌上花瓶里枯萎的康乃馨扔掉，换上了一束含苞欲放的栀子花。德劳拉用炽热的声音诵出加尔西拉索的诗句：“我为你而生，因为你，我有了生命，我必为你而死，因为你，我奄奄一息。”谢尔娃·玛利亚没有看他，只是莞尔一笑。他闭上双眼，好确定这并不是什么幻影在作怪。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刚才的景象消失了，可整个图书馆里都飘荡着栀子花的香气。

---

[1] 原文为拉丁语。

四

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应主教的邀请到开满黄花的风铃草藤萝架下观看日食，这里是整个府邸里唯一能将海天一览无余的地方。鹈鹕展开双翅，停在高空中一动不动，仿佛飞着飞着突然死去了一般。主教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两头拴在叉形支棍上的船用绞盘上，他刚睡完午觉，正缓缓地摇着扇子。德劳拉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柳条摇椅上晃着。两个人都悠然惬意，一面喝着罗望子水，一面越过屋顶望着万里无云的辽阔天空。两点钟刚过，天空开始暗了下来，母鸡都蜷缩在架上，满天的星星同时亮了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打了个超自然的寒战。主教听见几只迟归的鸽子扑打着翅膀，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鸽舍。

“上帝是伟大的，”他叹息道，“连动物都能感觉得到。”

值班的修女给主教送来一盏灯，以及几片用来看太阳的烟熏玻璃。主教在吊床上坐直了身子，开始透过玻璃片观察太阳。

“得用一只眼睛看才行，”主教说着，一面努力不让自己的呼吸发出哨音，“否则，就有两只眼睛都瞎掉的危险。”

德劳拉用手举着玻璃片，并没有去看日食。在长时间的寂静之后，主教暗中瞄了他一眼，看见他两眼发光，对这个虚假夜晚的魅力无动于衷。

“你在想什么？”主教问他。

德劳拉没有回答。此刻，他看见太阳像一轮越来越小的月亮，尽管隔着熏黑的玻璃片，他的视网膜还是被灼痛了。但他没有停止观看。

“你还在想那个小女孩吧。”主教说。

尽管主教常常料事如神，卡耶塔诺还是吃了一惊。“我刚才在想，老百姓会把他们的厄运同这次日食挂上钩的。”他说。主教摇了摇头，眼睛还是盯着天上。

“谁知道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他说，“天主怎么出牌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的。”

“这种现象早在几千年前就被亚述王国的天文学家们算出来了。”德劳拉说道。

“那是耶稣会教士的说法。”主教说。

卡耶塔诺继续望着太阳，但因为心烦意乱而没有使用玻璃片。两点十二分，太阳变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黑色圆盘，一时间，白天变成了午夜。随后，太阳恢复了它的人间本色，雄鸡也像在清晨一样啼鸣起来。等到不再盯住太阳看的时候，德劳拉的视网膜上仍然闪动着那个火的圆盘。

“这会儿我还能看见日食，”他开心地说，“不管我往哪边看，都能看见它。”

主教认为这项活动已经结束。“过几个小时就会消下去的。”说着，他在吊床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并感谢上帝带来了新的一天。

德劳拉没有丢掉方才的话头。

“我尊敬的神父，”他说，“我不觉得那女孩被魔鬼附了体。”

这回轮到主教大吃一惊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觉得她仅仅是受了惊吓而已。”德劳拉说道。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主教说，“难道你没有看过那些记录吗？”

岂止看过，德劳拉对那些记录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其说这有助于了解谢尔娃·玛利亚的状况，还不如说这有助于了解院长的心思。女孩入院头一天早晨待过的地方、碰过的所有东西都给驱了一遍魔。所有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接受了斋戒和净化。第一天抢了她戒指的那个见习修女被罚在园子里强迫劳动。大家纷纷传言说那女孩徒手杀死了一只山羊，开开心心地肢解了它，又兴高采烈地就着调料吃下了山羊的睾丸和眼睛。她还炫耀自己的语言天分，和非洲各个国家的人都谈笑自如，比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交流还要顺畅，此外她还能与各种动物对话。修道院里养的十一只金刚鹦鹉，二十年来一直装点着花园，女孩来的第二天，一大早，它们无缘无故地死得一只不剩。她还用假嗓音唱魔力十足的歌曲，把奴仆们迷得神魂颠倒。当她知道院长在找她时，她使出只让院长看不见她的隐身法术。

“不管怎么样，”德劳拉说，“我认为所有我们觉得是恶魔作祟的那些东西，都是黑人的习俗，是那女孩在被父母弃之不管的情况下学会的。”

“小心一点吧！”主教警告德劳拉，“比起利用我们的错误，主的敌人更善于利用我们的智慧。”

“这么说，我们能给主的敌人送去的最好礼物就是在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孩身上驱魔喽？”德劳拉反驳道。

主教被激怒了。

“我可以理解为你要造反吗？”

“请您理解，我只是坚持我的疑问，主教大人，”德劳拉说，“可我绝对谦卑地顺从您。”

就这样，他没能说服主教，便又回到了修道院。他的左眼上蒙了块单眼眼罩，那是他的医生让他戴上的，一直要戴到他视网膜上印下的太阳消散为止。在花园和一道道走廊里行走的时候，他始终感到有许多目光在追随着自己，一直追到那间牢房，可是没有一个人对他开口说话。整座修道院似乎正在从日食的惊扰中慢慢恢复。

女看守为他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牢门时，德劳拉只觉得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乱跳，他几乎站不稳。为了探一探她那天早晨情绪如何，德劳拉问女孩看没看日食。实际上，她在露台上看了，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在眼睛上戴这么个罩子，她看的时候也没用任何防护，却什么问题也没有。她告诉他，修女们看日食的时候都跪倒在地，整个修道

院都瘫痪了，一直到后来公鸡啼叫起来。可她一点也没觉得这和另一个世界有什么关系。

“我看到的和我每天晚上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她说。

她身上已经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只是德劳拉一时还拿不准，最明显的是，她有了一丝忧伤的情绪。他没有弄错。他刚开始给她治疗伤口，女孩就满眼急切地盯住了他，声音颤抖着对他说：

“我要死了。”

德劳拉浑身一颤。

“谁跟你说的？”

“马尔蒂娜说的。”女孩告诉他。

“你见过她了？”

女孩告诉他，这女人已经来过她牢房两次，教她刺绣，她们还一起看了日食。她还说，这女人挺好的，脾气温和，院长批准她在露台上教大家刺绣，在那里还能观赏海上的黄昏。

“啊哈，”德劳拉答道，眼睛一眨不眨，“她跟你说过你什么时候死吗？”

女孩咬紧了嘴唇，差点没哭出来。

“日食以后。”她说。

“日食以后，那也可能是一百年以后呀。”德劳拉说道。

不过，他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治疗上，以免女孩看出他嗓子眼发紧。谢尔娃·玛利亚没再说什么。他觉得这沉默有点怪，便又看了女孩一眼，这才发现她的双眼湿润了。

“我害怕。”女孩说。

说完她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他稍稍坐近了点，用告解神父的和缓口吻安慰她。谢尔娃·玛利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卡耶塔诺不是来给她看病的，而是来给她驱魔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疗伤呢？”她问道。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因为我非常爱你。”

她对他的鲁莽没什么反应。

离开时，德劳拉往马尔蒂娜的牢房里看了看。他第一次看清了，她一脸麻子，头上没一根头发，鼻子奇大无比，满嘴的老鼠牙，但从她身上立刻能感觉到一股诱惑力在涌动。德劳拉宁愿站在门口同她说话。

“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有够多的理由担惊受怕了，”他说，“我请求您别再给她添乱了。”

马尔蒂娜愣住了。她从来没想过预言任何人的死期，更不会对一个如此可爱无助的小女孩这样做。她只不过问了问她的状况，女孩刚回答了三四个问题她就明白了这孩子撒谎成性。马尔蒂娜说话时的认

真态度足以使德劳拉明白，原来谢尔娃·玛利亚对他也说了谎话。他为自己的轻率向马尔蒂娜道歉，并请求她不要去找女孩理论。

“至于我要做什么，我自然会知道的。”他最后说道。

马尔蒂娜开始对他施展魔力。“我知道阁下是什么人，”她说，“我也知道您一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这回德劳拉折了一只翅膀，因为他证实了一点，那就是牢房里的孤独足以培育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一点上，谢尔娃·玛利亚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这个礼拜，何塞法·米兰达嬷嬷派人给主教送去一份她亲笔写的备忘录，其中满是抱怨和抗议。她请求免去克拉拉会修女监守谢尔娃·玛利亚的职责，因为她们的罪过早已赎清，而谢尔娃·玛利亚的到来无疑是对她们追加的惩罚。她还列举了记录在案的一连串新的大事件，这些事件只能用女孩无耻地和魔鬼勾结在一起来解释。最后她怒气冲天地控告了卡耶塔诺·德劳拉的傲慢，说他思想放纵，对她本人心怀私怨，还说他违反戒律，擅自带食物进修道院。

德劳拉刚回来，主教就给他看了那份备忘录，他站着读了起来，脸上肌肉纹丝不动。看完，他怒气冲天。

“如果说这世上有谁被所有魔鬼附了体，那这个人就是何塞法·米兰达。”他说，“怨恨的魔鬼，狭隘的魔鬼，愚蠢的魔鬼。这女人该受到诅咒！”

主教对他说出这样恶毒的话感到惊讶，德劳拉注意到了这一点，试图用一种平静的语气为自己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他说道，“她赋予邪恶势力这么大的能耐，让人感觉她似乎更崇拜魔鬼。”

“我的职权不允许我同意你的说法，”主教说道，“可我心里很想表示赞同。”

主教训导他凡事都要有尺度，不可过分，并要求他一定要有耐心，以便对付院长那不幸的坏脾气。“《福音书》里像她这样的女人多了去了，有的比她毛病还多，”他说，“尽管如此，耶稣还是对她们颂扬备至。”主教没能说下去，因为一声惊雷响彻整个府邸，接着轰隆隆地向海面滚去，一场如《圣经》里描述的大雨把他们和余下的世界隔绝开来。主教躺回摇椅上，陷入对故土的怀念。

“我们离得太远了！”他叹了口气。

“离哪儿太远？”

“离我们自己，”主教说，“一个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自己是个孤儿，你觉得这公平吗？”等不来答案，他便坦承自己的思乡之情：“一想到此刻在西班牙，人们已经入睡，我的心就充满恐惧。”

“地球的转动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德劳拉说。

“可是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它在转动，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主教说，“伽利略缺失的不光是信仰，他更缺的是心。”

德劳拉十分清楚是些什么样的危机在一个个淫雨霏霏的夜晚折磨着主教，这从他突然老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从这种分泌黑色胆汁的状态下岔开，直到睡意将他征服。

月底，贴出来一张公告，宣布新任总督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在去圣菲就职途中将在此地停留访问。随行人员有法官、公务人员、仆人和私人医生，还有一支四人弦乐队，这是女王送给他的礼物，以助他打发在西印度群岛的无聊时光。总督夫人和修道院院长有点亲戚关系，便请她安排自己住在修道院里。

到处都弥漫着生石灰刺鼻的气味，沥青冒着蒸汽，榔头叮叮当当地敲得人心烦，各色人等的叫骂声一直传进清修的内院里来，在这样的环境中，谢尔娃·玛利亚被遗忘了。一个脚手架轰然倒下，死了一个泥瓦匠，还有七个工匠受了伤。院长认定这次灾祸是谢尔娃·玛利亚施展妖术所致，并利用这个新的机会再一次要求把她打发到别的修道院去，直到办完这桩大事。这次院长的主要理由是，让总督夫人住在这么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旁边实在太不合适了。主教没有答复她。

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阿斯图里亚斯人氏，英俊老练，得过巴斯克球和射石鸡比赛的冠军，这多少弥补了他比妻子大二十二岁的缺憾。他笑起来浑身都在抖，就连自嘲时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展示自己体魄的机会。刚刚感受到加勒比海夹杂着夜间鼓声和番石榴成熟香气的第一缕微风，他便脱去了春季的华服，袒露着胸膛，在女士们的圈子里走来走去。从船上下来的时候，他身着衬衣，既没有发表演讲，也没有受到鸣炮相迎。尽管主教有禁令，但为了欢迎总督，人们还是被准许跳起了方丹戈舞、奔德舞和昆比亚舞，并在空旷的地方举行了斗牛和斗鸡表演。

总督夫人几乎还是个妙龄少女，活泼好动，还有点任性，像一阵革新的风暴刮进了修道院。没有她搜寻不到的角落，没有她理解不了的问题，也没有她不想改善一下的东西。初来乍到，她在修道院里跑来跑去，想穷尽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到后来，院长认为，还是别让她对监狱这一块留下什么坏印象为好。

“那地方没什么看头，”她对总督夫人说道，“总共只有两个犯人，其中一个还被魔鬼附了体。”

这话足以引起总督夫人的兴趣。这时再说什么牢房还没有准备好呀、犯人也没能事先告诫一番呀，通通没有用处了。牢门刚一打开，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就一头扑倒在总督夫人脚下，请求得到宽恕。

这可不大容易：她已经逃亡过两次，一次失败一次成功。第一次是在六年前，她，还有另外三个因犯了不同罪过被判处不同刑罚的修女，试图从面向大海的那个露台逃跑。一个修女成功逃脱。从那以后，窗户就都封上了，露台下面的院子也设了防。第二年，剩下的三个人捆住了当时睡在楼里的女看守，从一扇供奴仆们进出的小门逃了出去。马尔蒂娜的家人听从了她的告解神父的建议，把她又送回了修道院。在此后漫长的四年里，她始终是那里唯一的犯人，没有权利去会见室见家里人，礼拜天也不能去小教堂望弥撒。这一切都使得宽恕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然而，总督夫人答应替她向丈夫求情。

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里，生石灰和沥青的怪味儿还很刺鼻，但已是面貌一新。女看守一打开牢门，总督夫人就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谢尔娃·玛利亚穿着一件磨破的长袍，脚下一双脏兮兮的套鞋，坐在一个被她自身的光照亮的角落里，慢条斯理地做着针线活。直到总督夫人向她问了声好，她才抬起眼来。总督夫人在她的目光里看见

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启示的力量。“至圣至尊的圣体啊。”她喃喃说道，向牢房里迈了一步。

“您小心点，”院长附在她耳边告诉她，“她就像头母老虎。”

院长抓住了总督夫人的胳膊。总督夫人没再往里走，可只看了谢尔娃·玛利亚一眼，就足以让她决定要救赎这个女孩。

该城的市长是个女里女气的单身汉，他为总督举办了一场只有男人参加的午宴。那支西班牙四人弦乐队和另一支来自圣哈辛托的风笛鼓乐队演奏了乐曲，一队黑人跳起了群舞和化妆舞，拙劣地模仿白人的舞蹈。最后，大厅尽头的帘幕拉开了，市长用等重的黄金买的那个阿比西尼亚女奴现身了。她身着一件几乎透明的长袍，这让她的裸体更具诱惑力。在近距离地向普通观众展示自己之后，她停在了总督面前，长袍也一下子从她身上滑落到脚下。

女奴完美到了惊人的地步。她的肩膀上没有被黑奴贩子打上烙印，后背也没有烙上第一个买主姓氏的首字母。她全身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总督脸色发白，喘了口粗气，挥了挥手，把这个消受不起的场面从脑海里抹去。

“看在主的分上，快把她带走，”他吩咐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

兴许是为了报复市长的轻浮举动，在院长于自己的私人餐厅举办的晚宴上，总督夫人向大家介绍了谢尔娃·玛利亚。马尔蒂娜·拉波尔德警告过他们：“千万别试图取下她的项链和手镯，然后你们就会看到她表现得有多棒。”果然如此。她们给她穿上了她来修道院时穿的那件她祖母的衣服，给她洗了头，又把她散乱的长发梳得整整齐

齐，使其拖在她的身后，总督夫人亲自牵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丈夫桌前。就连院长都被她的优雅、她的光彩照人和那一头非比寻常的长发给震住了。总督夫人在丈夫耳边轻轻说道：

“这个女孩被魔鬼附了体。”

总督不肯相信。他先前在布尔戈斯看见过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人，她一整夜不停地拉屎，最后粪便都从房间里溢了出去。为避免谢尔娃·玛利亚也遭此厄运，总督把她交给了自己的几个医生。他们都肯定地说，这女孩没有一丝一毫狂犬病的症状，和阿布雷农肖一样，他们也认为她已经不可能再染上那病了。可是要说她没有被魔鬼附体，他们谁都没有把握。

主教利用这次盛会的时间仔细想了想院长的那份备忘录，想了想谢尔娃·玛利亚最后的结局。至于卡耶塔诺·德劳拉，则试图在驱魔前做些自我净化的准备，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只带了些木薯饼和水。他没能成功，而是整夜神志昏迷，白天也不能合眼，片刻不停地写着放荡不羁的诗句，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骚动的躯体安静下来。

差不多一百年以后，在拆迁这间图书馆的时候，人们在一札几乎已经无法辨读的文卷中发现了其中几首诗。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可以完整辨读的，写的是他对自己十二岁时的回忆：那一天春雨绵绵，在阿维拉神学院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他坐在一口学生用的木箱上。那时他刚从托莱多骑了几天的骡子来到这里，身上穿着一件用父亲的衣服按他的身材改小了的衣裳，那口木箱足有他身体两倍重，因为母亲把一切可能用得着的东西全都放了进去，好让他体面地过完实习期。守门人帮他把箱子搬到了院子中央，然后就把他扔在了雨地里。

“你自己把它搬到三楼去吧，”守门人对他说，“到了那儿有人会告诉你宿舍里哪一块地方是你的。”

一时间，整个神学院的人都汇聚在面朝院子的阳台上，想看看他怎么搬这口大木箱，这时的他就像是一出戏中的唯一角色，只有他自己浑然不知。当他明白了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忙，便顺着石块砌成的陡峭台阶，用自己的两条臂膀搬起尽可能多的东西上了三楼。新学员的寝室里有两排床，指导老师给他指了指他的地方。卡耶塔诺把东西放在自己的床上，再回到院子里，就这样又跑了四趟才把东西搬完。最后他抓住空木箱的把手，硬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了上去。

他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那些站在阳台上看他的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转回身来看他，但是当他拖着箱子上到三楼时，担任院长的神父在楼梯平台那里等候他，并带头鼓起了掌。其他人也都跟着鼓掌喝彩。于是卡耶塔诺明白了，神学院的第一课就是自己把箱子搬到三楼，不作任何询问，也不向任何人求助，这一关他算是漂漂亮亮地通过了。他思路敏捷、性情温顺、果断坚强，这些都被当成教育新生的典范。

然而，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却是那天晚上在院长办公室的一次谈话。院长叫他去是想跟他谈谈在他箱子里找见的唯一一本书，那书已经散了页，书页不全，又没了封面，是他偶然从他父亲的抽屉里翻出来的。来的路上他已经尽量看了一部分，这会儿正满心想知道结尾如何。院长想听听他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读完我就知道了。”他回答道。

院长面露轻松的微笑，把书锁了起来。

“你再也不会知道了，”院长告诉他，“这是一本禁书。”

二十四年以后，在主教府那间幽暗的图书馆里，他意识到，从他手里经过的每本书他几乎都读了，经过批准的也好，被查禁的也好，就是没读完那本书。他感到，就在那一天，一段完整的人生结束了，另一段不可预知的人生开始了，想到这儿，他不寒而栗。

在他斋戒的第八天，他已经开始做下午的祷告了，这时有人来通知他说，主教在大厅里等他，他们要一起迎接总督。即使对总督本人来讲，这也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访问，他是在城里首次巡游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来访的。他不得不在鲜花盛开的露台上凝视了好一会儿四周的建筑，与此同时，离得近的要员们被紧急召来，大厅也经过了简单收拾。

主教同他智囊团的六名教士一起接待了总督。他让卡耶塔诺·德劳拉坐在他的右手边，介绍他的时候没有说他的头衔，只说了他的全名。谈话开始之前，总督先用怜悯的目光扫视了一番斑驳不堪的墙皮、破破烂烂的窗帘、廉价的手工家具，以及几位身穿寒酸长袍、早已被汗湿透的教士。主教带着一股受伤的自豪说：“我们都是木匠若瑟[1]的儿子。”总督摆出一副理解的姿态，开始回顾自己在第一个礼拜里的印象。他讲到他那不着边际的计划：在医好战争的创伤之后如何增加与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讲到官方在推广教育上的种种功绩；还讲到如何激励艺术和文学，以使这些边缘的殖民地与世界同步。

“这是个革新的时代。”他说。

主教又一次证实了一件事：掌管世俗权力是多么的容易。他伸出一根颤巍巍的手指指向德劳拉，看都没看他一眼，对总督说：

“在这里，最能跟上这些新形势的是卡耶塔诺神父。”

总督顺着主教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遥不可及的面孔和一双紧盯着他、一眨也不眨的惊恐的眼睛。总督怀着真诚的兴趣问德劳拉：

“莱布尼茨的书你读过吗？”

“读过，阁下。”德劳拉答道，还加了句解释：“因为职务的需要。”

直到这次访问接近尾声时，大家才弄清楚总督最关心的其实是谢尔娃·玛利亚的状况。总督解释道，这既是为了她本人，也是为了让修道院院长得到安生，院长的烦恼实在让人同情。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修道院的记录簿告诉我们，这个可怜的女孩确实被魔鬼附体了，”主教说，“关于这一点院长比我们清楚。”

“她认为你们陷入了撒旦布下的一个圈套。”总督说。

“陷入圈套的不光是我们，而是整个西班牙，”主教说道，“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的是推行基督的准则。我们在望弥撒的时候做到了，在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做到了，在各个守护神的节日里也做到了，可就是没能使之浸入人们的灵魂。”

他谈起了尤卡坦，在那里，他们建起了豪华的大教堂来掩蔽异教的金字塔，可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土著去望弥撒，是因为在那些银质祭坛下面，他们自己的神庙依然存在。他还谈到从征服时期就开始了的血统混杂：西班牙人血统和印第安人血统混在一起，这两种血统又

和各种各样的黑人血统甚至曼丁加穆斯林血统混在一起，他自问，这样混来混去，上帝的天国里能装得下吗？尽管呼吸不畅，岁数大了老咳嗽，他还是把话一口气对总督说完：

“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的敌人的圈套，那还能是什么呢？”

总督脸色一变。

“阁下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吧。”他说。

“请阁下不要这么看这个问题，”主教彬彬有礼，“我只是想强调我们需要信仰的力量，这样，这里的人才值得我们做出牺牲。”

总督回到刚才的话题。

“据我所知，院长的忧虑还是很现实的，”他说，“她觉得，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案例而言，也许别的修道院条件更好一些。”

“阁下知道，因为何塞法·米兰达的正直、高效和她的权威性，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圣克拉拉修道院，”主教说道，“上帝知道，我们这样选是有道理的。”

“我会把这一点转达给院长。”总督说。

“这一点她非常清楚，”主教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她为什么不敢相信这一点。”

说着说着，主教感觉自己的哮喘就要发作了，便匆匆结束了这次接待。他说他收到了院长的一份控诉备忘录，他答应，只要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便当全力以赴去解决。总督向他表达了谢意，以一种

私人化的礼仪结束了这次访问。总督也患有哮喘痼疾，他把自己的几个医生推荐给了主教，可主教似乎不以为然。

“我的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他说，“再说我已经活到圣母故去时的年龄了。”

与初见时的问候不同，他们之间的告别进行得缓慢而又充满仪式感。三位教士，包括德劳拉，陪同总督顺着阴暗的走廊走到大门口。总督的卫兵们手持十字戟列成方阵，隔开了成群的乞丐。上马车前，总督朝德劳拉转过身来，不容分说地指着他，说了句：

“不要让我忘记你。”

这句话说得太突然，又不好琢磨，德劳拉只来得及鞠了一躬，作为回答。

总督的马车向修道院驶去，他要把这次访问的结果告诉院长。几个小时以后，就要离开时，他不顾总督夫人的催促，拒绝了对马尔蒂娜·拉波尔德的赦免，因为他觉得这样会给许多他先前在监狱里遇到的触犯人类尊严的罪犯开一个不好的先例。

德劳拉回来时，主教一直向前佝偻着身子，闭着双眼，努力克服呼吸时发出的哨音。侍从们都已踮着脚尖悄悄退下，客厅里一片昏暗。主教四下环顾，看见空空的椅子靠着墙排成了一排，客厅里只剩下卡耶塔诺一个人，便用很低的嗓音问他：

“我们还从未遇见这么好的人，是吗？”

德劳拉摆出模棱两可的姿态，算是回答。主教艰难地抬起身来，手臂支在摇椅扶手上，直到呼吸慢慢平复。他不想吃晚餐了。德劳拉

连忙点亮一盏油灯，照亮主教回卧室的路。

“我们对总督太不友好了，是吗？”主教问道。

“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对他友好呢？”德劳拉反问道，“不预先正式通知，是不能来敲一个主教的大门的。”

主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的口气变得异常严厉。“我的大门就是教会的大门，而他所做的和从前的基督徒没什么两样，”他说道，“失礼的是我，因为我的胸部有问题，我应该做点什么去弥补一下。”走到卧室门口，他话锋一转，改变了语气，还亲切地拍了拍德劳拉的肩膀跟他告别。

“今天晚上为我祷告祷告吧，”他对德劳拉说，“我怕这一夜会很难熬。”

确实如此，在接待来访的时候，他就预感到这次哮喘发作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吐酒石和其他各种虎狼之剂都没能缓解症状，只能给他紧急用上了放血疗法。天亮的时候他恢复了元气。

卡耶塔诺在隔壁图书馆里彻夜未眠，浑然不知这边的情况。他刚要开始做晨祷，有人来通知他说主教在卧室里等他。他看见主教的时候，后者正坐在床上吃早饭，一碗巧克力配面包和奶酪，呼吸时就像是一口新做成的风箱，精神矍铄。卡耶塔诺一看见主教的模样，心里就明白了，主教已经拿定主意。

果然，和院长的请求相悖，谢尔娃·玛利亚将继续留在圣克拉拉修道院，而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将得到主教的完全信任，继续负责她的事情。她将不再像现在这样被迫遵守牢规，而是和修道院里其他

人一样，享有普遍待遇。虽说主教感谢那本记录簿，但那些记录不够严谨，反而会干扰整个过程的清晰度，因此，驱魔师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主教最后授命德劳拉以自己的名义去拜访侯爵，并授予他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利，而主教自己只要时间与身体状况允许，随时可以接见侯爵。

“不会再有别的指示了，”主教这样为自己的话作结，“愿上帝保佑你。”

卡耶塔诺一路小跑来到修道院，心怦怦直跳，但他在牢房里没找见谢尔娃·玛利亚。她在礼堂里，浑身披满了货真价实的珠宝，长发委地，姿态里带着一个女黑奴的优雅端庄：总督随从里的一位著名画师正在为她画像。无论是她的美貌，还是她听从艺术家摆弄时的灵性，都令人惊叹不已。卡耶塔诺深深地陶醉了。他找了个阴凉处坐了下来，他看得见女孩，而女孩却看不见他，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消除心中的任何疑问。

做午后祷的时候，画像画好了。画师远远地瞄了瞄，又加上最后两三笔，在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前，他让谢尔娃·玛利亚先看看画像。画得真像，她站在云端，身旁是一群顺从的魔鬼。她缓缓地观赏画像，认出了正值花样年华的自己，最后说了句：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连魔鬼都像吗？”画师问道。

“他们就是这样的。”她回答道。

姿势摆完了，卡耶塔诺陪她走回牢房。他从未见过她走路的样子，她的步伐和跳舞一样优雅敏捷。他也从未见过她穿囚服以外的衣裳，而她这一身女王装束使她显得成熟华贵，不难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已经长成一个女人了。他们从未并肩而行，这样无忧无虑地走在一起使他很开心。

牢房也变了模样，这是总督夫妇的劝告起了作用，他们在辞行时用主教那些合情合理的理由说动了院长。垫子换了新的，上面有麻布床单和羽毛枕头，还放了些日常的洗漱和洗浴用品。海上的光从没有了十字格的窗户涌进牢房，辉映在刚用石灰粉刷一新的墙上。既然她吃得和修道院里的其他人一样，也就没有必要再从外面带吃食进来了。尽管如此，德劳拉还是一直变着法地偷偷从外面买好吃的东西带进来。

谢尔娃·玛利亚邀请他一起吃午后甜点，德劳拉只尝了一块饼干，那是修女们做的，很有名气。正吃着，女孩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我见过雪。”

卡耶塔诺并不感到惊讶。据说从前有一位总督，想从比利牛斯山带些雪过来，好让这边的土著看看雪是什么样子，殊不知这里其实就有雪，就在临海的内华达山上，在圣马尔塔。兴许这回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搞了什么新花样，实现了这个奇迹。

“不是的，”女孩说，“我是在梦里看见雪的。”

她告诉他：梦里她站在一扇窗户前，窗外下着大雪，她一颗一颗地摘着吃怀里兜着的一串葡萄。德劳拉有种被恐惧用翅膀扇了一下的

感觉。最后的答案近在咫尺，他浑身发抖，壮起胆子问道：

“最后怎么样了？”

“我不敢告诉您。”谢尔娃·玛利亚说。

对他来说，这一句话就足够了。他闭上眼睛为她祈祷。祷告完，他像换了个人一样。

“你别担心，”他对女孩说，“我保证不久你就会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圣灵会保佑你的。”

贝尔纳达一直不知道谢尔娃·玛利亚已经被送进了修道院。她是偶然知道这件事的。一天夜里，她撞见杜尔丝·奥莉维亚在打扫房屋、归置东西，恍惚之中她以为那又是自己的幻觉。为了找到能说服自己的解释，她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搜查，找着找着，她突然觉得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过谢尔娃·玛利亚了。卡莉达·德尔科布雷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侯爵先生通知我们，说她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说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看见丈夫的卧房里还亮着灯，贝尔纳达没敲门就走了进去。

侯爵躺在吊床上，还没睡着，身边用牛马的粪便点着小火，冒出烟来驱赶蚊虫。看见这个被丝绸睡衣衬得怪模怪样的奇怪女人，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就像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侯爵心中也闪过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见了鬼了。贝尔纳达问他谢尔娃·玛利亚上哪儿去了。

“她有好多天没和我们在一起了。”侯爵回答道。

她从最坏的角度来理解侯爵这句话，不得不在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喘口气。

“您的意思是说，阿布雷农肖把该做的事都做了？”她说。

侯爵画了个十字说：

“愿上帝拯救我们！”

侯爵把真相告诉了她。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及时把这件事告诉她，是因为她自己说过，大家就权当她已经死了。贝尔纳达两眼一眨不眨地听着，那股专注劲头是他在他们十二年不幸的共同生活中从未见过的。

“我知道，这样做会要了我的命，”侯爵说道，“但只要能换回她的命就行。”

贝尔纳达叹了口气：“您是想告诉我，现在我们家的耻辱已经路人皆知了。”她看见丈夫的眼圈里有一滴泪花在闪动，一阵战栗自她的五脏六腑里升起。这一次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体悟到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怎么也回避不了。她没有猜错。只见侯爵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从吊床上起身，瘫倒在她跟前，发出一个老人无力回天的号啕大哭。汩汩涌出的男人的眼泪浸透了她的丝绸睡衣，顺着她的大腿根流淌，贝尔纳达投降了。不管她有多恨谢尔娃·玛利亚，她承认，知道她还活着，她总算松了口气。

“我一向对什么都能理解，除了死亡。”她说。

她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陪伴她的只有蜂蜜和可可。两个星期后，她走出房间时活像一具移动的死尸。一大早，侯爵就发觉有人在

忙着做外出旅行的准备，但他没太上心。在阳光开始变暖之前，他看见贝尔纳达骑着一头温顺的骡子出了院子的大门，后面还跟着另外一头，驮着行李。她这样出门是很经常的事，不带骡夫，不跟奴隶，不向任何人告别，也不说出门的理由。可侯爵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除了每次都带的箱子之外，这次她还把多年来埋在床底下的满满两罐黄金也带走了。

侯爵懒懒地躺在吊床上，那种恐惧再次袭上心头：奴隶们会用刀子把自己捅了，于是他下令连白天也不许他们进到府邸里来。所以，当卡耶塔诺奉主教之命来拜见侯爵的时候，不得不自己推开大门，不请而入，因为任他把门环敲得当当响，就是没人应答。猎犬们在笼子里一阵狂吠，可卡耶塔诺继续向里走。在果园里，侯爵身穿撒拉逊人的外衣，头戴托莱多小帽，正躺在吊床上睡午觉，身上落满了朵朵柑橘花。德劳拉看着侯爵，没去叫醒他，觉得就像看见了苍老的、被孤独摧毁了的谢尔娃·玛利亚。侯爵醒了，因为那个眼罩的缘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这人是德劳拉。德劳拉举起手，伸开五指，摆出一副讲和的态势。

“上帝保佑您，侯爵先生，”他开了口，“您好吗？”

“就这样，”侯爵答道，“一点一点烂下去。”

他疲惫地挥了挥手，把午睡的蛛网拨开，在吊床上坐起身来。卡耶塔诺先为自己擅自进了大门表示了歉意。侯爵向他解释说，敲门环是不会有人理睬的，因为这里的人早已不习惯迎接访客了。德劳拉用一种庄重的音调说：“主教大人事务繁忙，并且饱受哮喘的折磨，授命我以他的代表身份前来拜访。”说完这段开场白，他在吊床旁边坐了下来，直奔那件令他五内俱焚的大事。

“我想通知您，我受委托负责您女儿的精神健康问题。”他说。

侯爵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想知道女儿近来如何。

“挺不错的，”德劳拉说，“不过，我想帮她恢复得更好一点。”

他向侯爵介绍了驱魔术的意义和方法，对他讲起了由耶稣传授给门徒的这种把妖魔鬼怪从身体里驱除出去，从而治病扶弱的能力，讲起了《福音书》里提到的群魔以及两千头被其附体的猪的故事。当然，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谢尔娃·玛利亚是不是真的被魔鬼附了体。他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他需要侯爵的帮助来消除任何疑问。首先，他说，他想了解一下在进修道院之前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不知道，”侯爵答道，“我的感觉是，我越多地去了解她，对她的了解就越少。”

侯爵一直心存内疚，被往事折磨：当年，是他把女儿扔在了奴隶们的院子里不管不顾。女儿有时长达数月的沉默、她突然发作的莫名其妙的暴躁、她与母亲斗智斗勇的那份狡黠（把母亲戴在她手腕上的铃铛拴在猫身上），这些被他通通归咎于此。而了解她的最大障碍则是她那以撒谎为乐的毛病。

“就像黑人一样。”德劳拉说。

“黑人也只是对我们撒谎，他们自己之间可不这样。”侯爵说。

在她的卧室里，德劳拉一眼就看出哪些是老祖母的东西，哪些是谢尔娃·玛利亚新添的：能活动的玩偶、上了发条能跳舞的小人、八音盒。床上放着侯爵送女儿去修道院时带的那只小箱子，箱子原封未

动。那把古诗琴上布满灰尘，被随意扔在一个角落。侯爵解释道，那是一种早已无人弹奏的意大利乐器，并称赞说女儿弹这个很有天分。他漫不经心地给琴调了调音，最后，靠着不错的记忆，他不但弹而且唱起了他和谢尔娃·玛利亚一起唱过的歌曲。

这是一个吐露心声的时刻。德劳拉从乐声里听到了侯爵没有对他讲出的那些有关女儿的事情。侯爵情不能自已，没能把歌唱完。他叹息道：

“您可能想象不出那顶帽子戴在她头上有多合适。”

德劳拉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

“我看得出来，您很爱您的女儿。”他对侯爵说。

“您想象不出我有多爱她，”侯爵说道，“只要能见她一面，让我付出我的灵魂我都在所不惜。”

德劳拉又一次感觉到，圣灵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没有比这更好办的了，”他说，“只要我们能证明她并没有被魔鬼附体。”

“您去和阿布雷农肖谈谈吧，”侯爵说，“他从一开始就说过，谢尔娃很健康，可这一点只有他能解释清楚。”

德劳拉拿不定主意。阿布雷农肖可能是天主的安排，可是同他谈话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牵连。侯爵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侯爵说。

德劳拉晃晃头，摆出一副意味深长的姿态。

“我对宗教法庭的那些文件太熟悉了。”他说。

“只要能重新得到女儿，我做出再大的牺牲都不为过。”侯爵坚持道。看到德劳拉没有任何反应，侯爵给自己的话作了结：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您了。”

德劳拉心都要碎了，对侯爵说道：

“我也求求您不要再让我为难了。”

侯爵没有再坚持，他拿起床上的小箱子，请德劳拉帮忙带给女儿。

“至少这样她会知道我在挂念着她。”他对德劳拉说。

德劳拉没有告别就逃走了。大雨倾盆，他用斗篷包住小箱子，再裹住自己。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觉自己正在心里重复着古诗琴演奏的那首歌里不连贯的诗句。被大雨一激，他大声唱了起来，并且凭着记忆唱完了那首歌。在工匠作坊区，他在一座修道院那里向左拐去，嘴里仍唱着歌，敲响了阿布雷农肖的大门。

好半天没人应声，之后才听见一瘸一拐的脚步声，一个半睡半醒的声音问道：

“谁呀？”

“公家人。”德劳拉说。

这是他不想喊出自己的名字时唯一能想到的说法。阿布雷农肖打开大门的时候真的以为来的是政府的人，一下子没认出他来。“我是本教区的图书管理员。”德劳拉对他说。医生把他让进昏暗的门厅，又帮他脱下湿漉漉的斗篷。照着习惯，医生用拉丁语问他：

“请问您是在哪一场战斗中失去那只眼睛的？”

德劳拉用他那一口古典拉丁语给他讲了日食那天的倒霉事，又细细说明这种伤害一时半会儿还消不下去，尽管主教的医生打包票说戴上这个眼罩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阿布雷农肖的注意力全在他那一口纯正的拉丁语上。

“说得太棒了，”他颇为惊讶，“请问府上是？”

“我是阿维拉人。”德劳拉回答道。

“那就更值得赞赏了。”阿布雷农肖说。

他让德劳拉脱下长袍和草鞋，放在一旁晾一晾，还用自己那件自由人的斗篷裹住他的长袜，接着又替他摘下眼罩，扔进了垃圾箱，说：“要说这只眼睛有什么毛病，那就是它看见了许多不该看见的东西。”德劳拉被客厅里堆了一地的浩繁书卷吸引住了，阿布雷农肖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把他领到了药房，那里有更多的书卷，放在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

“圣灵啊！”德劳拉失声叫道，“这简直就是彼特拉克的图书馆呀。”

“比他还多两百来本书呢。”阿布雷农肖告诉他。

他让德劳拉随意翻阅。这里有一些孤本书，在西班牙拥有这些书是要坐牢的。德劳拉认出了这些书，神往地翻了翻，把它们再放回书架上时心中惋惜不已。在最明显的位置，同那本永远的《赫伦迪奥教士》放在一起的是法语版伏尔泰全集和一本翻译成拉丁语的《哲学通信》。

“翻译成拉丁语的伏尔泰，这简直是异教。”他开玩笑说。

阿布雷农肖告诉他，这是科英布拉的一位僧侣翻译的，他很乐于做一些怪书，供朝圣者消遣之用。德劳拉正翻看这本书，医生问他懂不懂法语。

“我不会讲，但能阅读。”德劳拉用拉丁文回答，然后又加了一句，丝毫没有假装客气：“此外，我还会希腊语、英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德语我也懂一点。”

“我问您这话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伏尔泰，”阿布雷农肖说，“他的散文简直无可挑剔。”

“也最让我们心痛，”德劳拉说，“真遗憾，这些是由一个法国人写的。”

“您这么说是因为您是西班牙人。”阿布雷农肖说道。

“到了我这个岁数，又经历了这么多的血统混杂，我已经不能准确地知道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了，”德劳拉答道，“也不知道我是谁。”

“在这边的国度里，谁都不知道，”阿布雷农肖说，“我觉得大家也许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弄清楚这一点。”

德劳拉一边说话一边继续在这个书库里徜徉。突然，就像往常很多时候一样，他记起了他十二岁时被神学院院长没收的那本书，他只记得其中的一个情节，有生之年，只要碰见有可能帮到他的人，他就会对他们重复一遍那个情节。

“您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吗？”阿布雷农肖问道。

“从来都不知道，”德劳拉说，“只要能让我知道那本书的结局，叫我拿什么换都可以。”

医生一句话没说，把一本书放在了他面前，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塞维利亚古版的《四卷本高卢的阿玛迪斯》。德劳拉颤抖着翻了翻，明白了自己差一点就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后，他鼓起勇气问道：

“您了解这是一本禁书吗？”

“就像了解几百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一样，”阿布雷农肖说道，“现在已经不印这样的书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给有学问的人看的专著。那么今天的穷人呢，他们如果不偷偷地看这些骑士小说，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还是有书可看的，”德劳拉说，“初版《堂吉诃德》在开印当年就有一百本在这里被争相阅读。”

“争相阅读谈不上，”阿布雷农肖说，“只是通过了海关，传到了这边各个地区而已。”

德劳拉没去理会他，因为他终于弄清楚了就是这本珍贵的《高卢的阿玛迪斯》。

“这本书九年前从我们图书馆的保密书架上丢失了，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它的踪影。”他说。

“这我可以想象，”阿布雷农肖说道，“但是，它被当作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书，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它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至少十一个人传读，其中至少有三人死亡。我敢肯定他们的死必有奥秘。”

“我有责任向宗教法庭告发你。”德劳拉说。

阿布雷农肖把这当成一句玩笑话：

“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

“我这么说是因为您这儿有一本外面传来的禁书，而您却没有上报。”

“何止这一本，那儿还有好多呢。”说着，阿布雷农肖伸出食指，向着一排排满满当当的书架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可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的话，您恐怕早就来了，而我也就不会为您打开大门了。”他转过身面对着德劳拉，非常愉快地总结道：“从另一方面说，我很高兴您现在来了，能在这里接待您，我深感荣幸。”

“侯爵为她女儿的命运万分担心，是他建议我到您这儿来的。”德劳拉说。

阿布雷农肖让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两个人畅谈起来，这时，一阵可怖的风暴正席卷海面。医生旁征博引，谈到狂犬病自人类起始以来的历史，谈到这种病肆无忌惮的破坏力，以及千百年来医学在防治方面的无能为力。他列举了种种令人惋惜的例子，说明人们如何总是把

这种病同魔鬼附体混为一谈，对待其他的一些疯症和精神失常之疾也是如此。至于谢尔娃·玛利亚，阿布雷农肖总结道，这么多个礼拜过去了，看起来她不大可能染上这种病。对她来说，眼下唯一的危险，是她会像从前许多人一样，死于驱魔用的残忍手段。

在德劳拉听来，这最后一句话不过是中世纪医学特有的一种夸大其词，但他没有争辩，因为这与他从神学出发得出的主张甚是相符，即，女孩并没有被魔鬼附体。他说，谢尔娃·玛利亚会讲的那三种非洲语言，虽说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毫无共同之处，但也并非如修道院里说的那样，是什么撒旦在操纵。有不少证据显示她的力气大得惊人，但没有一条能证明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没有什么能证明她曾升空或预测未来——事实上，这两种现象亦可作为成圣的辅助证明。然而，当德劳拉试图从一些杰出教友和别的一些团体那儿得到支持时，谁都不敢站出来对修道院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言提出质疑。他也清楚地知道，不管是他的还是阿布雷农肖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服任何人，而要是他们俩联手，情况会更糟。

“那将意味着您和我要对付所有人。”他说。

“正因为如此，您到我这里来，我有些吃惊，”阿布雷农肖说，“我只不过是宗教法庭围猎场里一只令人垂涎已久的猎物。”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德劳拉说，“除非那个女孩是圣灵派来考验我的信仰是否坚定的。”

这句话一出口，他就觉得折磨着自己的那个困惑的死结解开了。阿布雷农肖紧盯住他的眼睛，一直看到他的灵魂深处，他看出来，这人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不要这样平白无故地折磨自己，”他用抚慰的语气说，“说不定您来这里只是因为需要找个人说说她的事情。”

德劳拉觉得自己没了遮拦，浑身赤裸。他站起身来，寻找着大门的方向，但他并没能立刻逃走，因为衣服还没有穿好。阿布雷农肖帮他把湿漉漉的外衣穿上，一面想留他再聊一会儿。“和您聊天，我能就这么一刻不停地聊到下个世纪。”他对德劳拉说。为了留住他，医生拿出一小瓶透明洗眼水，说能治好他看日食留下的伤。他还把德劳拉从门口叫回来去拿他落在屋里的小箱子。可德劳拉就像被什么致命的痛苦折磨着一样。他对阿布雷农肖这个下午的接待、对他提供的医疗帮助、对洗眼水表示感谢，可他最后只勉强答应了改天再来多待点儿时间。

他禁不住想尽快见到谢尔娃·玛利亚。他已走到门口，却尚未发现天已经黑了。雨停了，可暴雨过后，下水道泛滥成灾，德劳拉蹚着齐脚踝的雨水，疾步走向街道中部。快到宵禁时间了，修道院的守门人想拦住他，他一把把她推开：

“奉主教大人之命。”

谢尔娃·玛利亚从梦中惊醒，黑暗中没认出他来。德劳拉不知该如何解释为何在如此蹊跷的时间来到这里，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你父亲想见你。”

女孩认出了那口小箱子，怒火一下子冲上了她的脸颊。

“可我不想见他。”她说。

德劳拉不知所措，问她为什么。

“因为不想，”她说，“我宁愿去死。”

德劳拉想松开她那只健康的脚踝上的皮带，以为她会很乐意。

“放手，”她说道，“不许碰我。”

德劳拉没有理会她的话，女孩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他镇定自若，只是把另一边脸转向了她。谢尔娃·玛利亚又朝他吐了口唾沫。他又换了一边脸，一股被压抑的快感自他的五脏六腑升腾而起，使他不禁飘飘然。他闭上双眼，心中暗暗祈祷着，而女孩则一口接一口地不断朝他吐唾沫，她吐得越凶，他就越享受，直到女孩明白，她的怒火毫无用处。德劳拉这才见识了一个真正的中邪者的疯狂表演。谢尔娃·玛利亚的长发突然像活了一样竖立起来，简直和美杜莎头上的蛇一样，嘴里冒出绿色的口水，喷出一连串用偶像崇拜者的各种语言骂出的脏话。德劳拉举起十字架，放到女孩嘴边，惊恐地吼道：

“不管你是谁，快从这里滚开，你这地狱里的畜生。”

他的吼声激起了女孩的尖叫，她仿佛马上就要把皮带扣挣断。女看守被吓得面无人色，冲了进来，想制服她，但最后还是马尔蒂娜用她那一套完美手段制服了女孩。德劳拉仓皇逃走了。

晚餐时间德劳拉没来给他读书，主教心中惴惴不安。德劳拉发觉自己最近飘浮在一朵自己的云彩上，除了被魔鬼拖下地狱的谢尔娃·玛利亚的恐怖形象，这世或者来世的其他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躲进图书馆，却看不进去书；他心不在焉地做祷告，并唱起了那把古诗琴演奏过的歌曲，他哭了，眼泪就像滚烫的油滴，使他五内俱焚。他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小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在桌上。他挨个辨认，带着肉体的贪婪嗅闻它们，抚爱它们，用淫秽

的六韵步诗对它们说话，直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脱光衣服，从工作台的抽屉里取出那把平日里碰都不敢碰的铁戒尺，满腔仇恨地抽打起自己来，狠了心地要把谢尔娃·玛利亚的影子从他的身体里彻底赶出去。主教心里一直牵挂着他，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一摊鲜血和眼泪中打滚。

“是魔鬼，我的神父，”德劳拉对主教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

---

[1] 又译约瑟，为圣母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本书中采用天主教译名。

五

主教传召德劳拉去他的办公室，听他一五一十、不加修饰地忏悔，主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心中清楚，他主持的不是一项圣礼，而是一场司法审讯。在德劳拉这件事上，他唯一的仁慈之举就是对他真正的罪孽保守秘密，但是，在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况下，他剥夺了他的尊贵身份和各项特权，并把他派到圣爱医院去护理那些麻风病人。作为安慰，德劳拉请求主教准许他为麻风病人主持五点钟的弥撒，主教答应了。他感到莫大的解脱，跪了下来，他们一起向天主做了祷告。主教为他祈过福，把他扶了起来。

“愿上帝怜悯你。”主教对他说完这句话，便将他从心头一笔抹去。

就在卡耶塔诺开始履行对他的判决之后，教区里各路头面人物纷纷替他说情，可是主教不为所动。他拒不接受那种理论，说什么驱魔师到头来反而被他们想要驱除的魔鬼附了体。他的最终说法是，德劳拉没有限制自己只用基督不容争议的权威去对付那些魔鬼，而是自负地和他们讨论起信仰的问题。正是这一点，主教说，使他的灵魂遇到麻烦，把他推到了异教的边缘。然而，人们更感到惊奇了：作为主教十分信得过的人，犯下这么一点过失，充其量也就是点几根绿蜡烛忏悔忏悔，主教怎么会表现得如此严厉。

马尔蒂娜带着一种堪为众人表率的虔诚负起了对谢尔娃·玛利亚的责任。她因请求赦免遭到拒绝而痛苦不堪，但女孩一直没有察觉，直到有天下午，在露台上做刺绣活的时候，女孩一抬眼，看见她泪流满面。马尔蒂娜没有掩饰自己的绝望：

“像这样被关在这里一点一点地死去，我还不如干干脆脆地死了算了。”

如今她唯一的愿望，她说，就是弄清楚谢尔娃·玛利亚是怎么同她的那些魔鬼打交道的。她想知道他们都是谁，长什么样，怎么和他们周旋。女孩一气儿给她说出了六个，马尔蒂娜认定其中一个是非洲魔鬼，有一次他曾把她父母的家搅得鸡犬不宁。一个新的幻想使她精神一振。

“我想同他谈谈，”马尔蒂娜说，接着又把话说得更直截了当：“我拿我的灵魂做交换。”

谢尔娃·玛利亚狡猾地开心一笑。“他不会讲话，”她说，“你只要看着他的脸，就知道他讲什么了。”她又一本正经地答应马尔蒂娜，等下次他来访时一定通知她和这魔鬼见上一面。

卡耶塔诺低三下四地忍受着医院里糟得不能再糟的条件。等死的麻风病人睡在棕榈叶窝棚的泥地上。许多人除了在地上爬来爬去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每个礼拜二是集体治疗日，也是最令人吃不消的日子。为了赎罪，卡耶塔诺承担的任务是在马厩的木槽里给那些最严重的病人洗澡。第一个礼拜二，他正在干这样的活——他身为教士的尊严简化为身上的一件粗布护士长袍，这时阿布雷农肖骑着侯爵送给他的那匹枣红马出现了。

“您那只眼睛怎么样了？”他问德劳拉。

卡耶塔诺没给来访者机会谈论他的不幸，或是对他的状况表示同情，他感谢阿布雷农肖给他的洗眼水，那东西确实把日食在他视网膜上留下的痕迹消掉了。

“您不用感谢我，”阿布雷农肖对他说，“我给您的是我们所知治疗太阳灼伤最好的药：几滴雨水而已。”

他邀请德劳拉去他那里做客。德劳拉对他解释说，未经准许他是不能出这个大门的。阿布雷农肖不以为然。“如果您了解我们这些地方的弱点的话，您就会知道，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是能被实施三天以上的。”他说。他告诉德劳拉他的书库随时为他敞开大门，这样他就可以在受罚期间继续他的研究。卡耶塔诺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话，心中却没抱任何幻想。

“我把这个谜团给您留下了，”说完，阿布雷农肖用马刺踢了一下马，“没有哪个神能创造出一个像您这样才智非凡的人，然后又将其浪费在替麻风病人搓澡这件事上。”

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二，他给德劳拉带来一件礼物，就是那本拉丁文版《哲学通信》。卡耶塔诺翻了翻，打开闻了闻，算了算这书的价值。他越是看重这书，就越觉得无法理解阿布雷农肖的做法。

“我想知道您对我这么好是为了什么。”他对阿布雷农肖说。

“因为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没有教士相伴就活不下去，”阿布雷农肖说，“病人托付给我们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而我们就像魔鬼一样，要从上帝那儿把他们的灵魂夺过来。”

“这可不太符合您的信仰。”卡耶塔诺说。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信仰是什么。”阿布雷农肖说道。

“宗教法庭知道。”卡耶塔诺说。

出人意料的是，这句尖酸刻薄的话一下子使阿布雷农肖兴奋起来。“上我家去吧，咱们可以慢慢讨论，”他说，“我一晚上最多能睡两个钟头的觉，还总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走了。

很快，卡耶塔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旦失势，那就是一落千丈。从前他受宠的时候追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现在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仿佛他也是一个麻风病人，他在世俗圈子里的文艺界朋友也因为不想同宗教法庭有什么瓜葛而躲得远远的。可是，对他来说这都无所谓。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谢尔娃·玛利亚身上，即便如此也还嫌不够。他坚信，无论海洋还是高山，无论人间还是天国的法律，乃至地狱里的权势，都无法把他们分开。

一天夜里，他突然心血来潮，从医院逃了出去，他想偷偷钻进修道院里去，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行。修道院有四道门，大门是旋转门，靠海的那一边还有一扇同样大小的门，另外两扇小门是供奴仆们进出用的。想从两道大门通过是不可能的。从海滩上朝牢房楼看过去，卡耶塔诺没费多少工夫就找见了谢尔娃·玛利亚的窗户，因为唯有这扇窗子没有封死。他从街道上一点一点地打量这座楼，却还是一筹莫展，因为连一条能爬上去的小缝都没有。

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在那次“停止一切圣事”[1]的围困期间，居民们是通过一条地道给修道院里送给养的。在

那个年代，不管是兵营还是修道院，都很流行挖地道。城里广为人知的不下六条，还有另外几条随着年岁推移陆续被发现，且每条地道都富有传奇色彩。一个当过掘墓人的麻风病人向卡耶塔诺指明了他要找的那条：一条废弃了的下水道，连接修道院和它旁边的一块空地，那个地方在上个世纪是为最早的一批克拉拉会修女做墓地用的。出口就在牢房楼下，面对着一堵粗石垒成的高墙，看上去难以逾越。然而，卡耶塔诺在失败了很多次之后，终于爬了上去，他心中有数：凭借祈祷的力量，什么事情都办得到。

午夜过后，那座楼静悄悄的。他知道女看守睡在外面，他只须提防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就可以了，那女人的牢门虚掩着，鼾声阵阵。直到此时，他的心因为紧张的冒险一直悬在半空，但一走到牢房门口，看见门环上的锁开着，他的心就像要跳出来一样。他用指尖推开了门，随着铰链吱吱作响，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静止了，他看见了在圣灯的亮光里睡着的谢尔娃·玛利亚。突然，女孩睁开了双眼，可是因为他穿着一件麻风病院的护士长袍，女孩花了好大工夫才认出他来。他把血淋淋的指甲伸到女孩眼前：

“我是爬墙上来的。”他压低嗓音对她说。

谢尔娃·玛利亚无动于衷。

“您这是为了什么呢？”女孩问。

“为了见你。”他说。

他两手发抖，嗓音嘶哑，恍恍惚惚的，不知再说点儿什么好。

“您走吧。”谢尔娃·玛利亚说道。

他怕自己的嗓音会辜负自己，便拼命摇头。“您走吧，”女孩又说了一遍，“不然我就要叫人了。”这时，他已离女孩如此之近，都能感觉到她处女的呼吸。

“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走的。”说完他突然觉得自己无所畏惧起来，随即用坚定的口气加了一句：“你想叫就叫吧。”

女孩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卡耶塔诺在床边坐了下来，详细地给她讲述了自己受罚的事情，只是没告诉她是因为什么受的罚。他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女孩都听懂了。她看着他，目光里不再有怀疑，又问他眼睛上怎么不戴眼罩了。

“我已经不需要戴它了。”他受到了鼓励，说道，“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一头长发，像一条金色的河流。”

两个小时后，他开开心心地离开了，因为女孩答应他，只要从外面给她带些心爱的甜点，就可以再来看她。第二天夜里他早早就到了，修道院里还有人没有睡觉，女孩正在灯下赶着把马尔蒂娜交给她的那点刺绣活做完。第三天夜里，他带去了灯芯和灯油，给那盏油灯添上。第四夜是个礼拜六，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帮她捉在这间牢房里又卷土重来的虱子。当女孩的长发最终干干净净、梳得整整齐齐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受到一种诱惑，冰冷的汗水又流了下来。他在谢尔娃·玛利亚身边躺了下来，呼吸也变得不均匀，女孩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离他的眼睛只有咫尺之遥。一时间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他心中害怕，祷告起来，仍没有移开目光。女孩则鼓起勇气开口说了话：

“您多大岁数了？”

“三月份刚满三十六岁。”他回答道。

女孩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那您已经是个小老头了。”她的话里有一点嘲弄的意味。她盯着他额头上的皱纹，用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全部的无情又加上一句：“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他听了倒很开心。谢尔娃·玛利亚又问他为什么长了一绺白头发。

“那是个记号。”他回答说。

“是人为的吗？”她又问道。

“天生的，”他说，“我母亲当年也有这么一绺白头发。”

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眼睛，她也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他深深叹了口气，念出一句诗来：

“哦，甜蜜的爱人，我生不逢时。”

女孩没听懂。

“这是我曾祖母的爷爷的一句诗，”他向女孩解释道，“他一共写了三首牧歌、两首挽歌、五首歌词和四十首十四行诗。大多数都是写给一位才貌平平的葡萄牙女士的，而这位女士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他，一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结婚了，二是因为她也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且死得比他早。”

“他也是一个教士吗？”

“他是当兵的。”他答道。

谢尔娃·玛利亚的心被什么触动了，她想再听一遍那句诗。他重复了一遍，这一次他一直念了下去，语气热烈，抑扬顿挫，直到念完了那四十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一首，那是爱情和武艺之骑士堂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留下的诗句，血气方刚的他在一场战斗中被石头砸死了。

念完诗，卡耶塔诺抓住谢尔娃·玛利亚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口。她感觉到了他胸膛里狂风暴雨般的轰鸣。

“我总是这样。”他说。

他没有再让自己陷入恐惧之中，而是从那种令他活不下去的混沌状态中脱身而出。他向女孩坦承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能尝出她的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她就是他的生命，一如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在她身旁死去将是他的心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他没有看她，一直往下讲，像他刚才朗诵诗歌一样酣畅淋漓，直到他以为谢尔娃·玛利亚已经睡着了。可她一直醒着，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差一点就没敢问出来：

“那现在呢？”

“现在好了，”他答道，“你知道我的心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寂静中，他泣不成声，把手臂滑到她头下给她当枕头，而她在他的身边蜷成一团。他们就这样躺着，不睡觉也不再说话，直到鸡打起鸣来。他必须赶回去准时参加五点钟的弥撒。他走之前，谢尔娃·玛利亚把那条宝贵的奥杜瓦项链送给了他：那是一条十八西班牙寸长的项链，是用珍珠母贝和珊瑚串成的。

内心的恐惧已被渴望代替。德劳拉再也无法平静，他做起事来随随便便、心不在焉，直到那个幸福时刻降临：逃出医院去见谢尔娃·玛利亚。他每次赶到牢房时都气喘吁吁的，浑身被绵绵不绝的雨浇得精湿，而她每次也都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只有看见他的微笑她才能安下心来。一天夜里，女孩主动念起了那些诗句，听了这么多遍她早已烂熟于胸。“当我停下来凝视自己，回望那条你带我走过的路时——”她背诵道，随后又淘气地问道：

“接下来呢？”

“我到达了我的终点，因为我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那个毁灭我、终结我的人。”他接了下去。

她用同样温柔的语气重复着这些诗句，他们就这样一会儿从这一句跳到另一句，一会儿又一起把那些十四行诗改得面目全非，随心所欲地拿一句句的诗做起游戏，自如得就像他们是这些诗句的作者一样。最后，他们困倦得睡着了。五点钟的时候鸡叫了，女看守进来送早饭，两个人才惊醒过来。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停止了。女看守把早饭放在桌上，举着灯在房间里例行巡视了一番，居然没看见卡耶塔诺也躺在床上，就又走了出去。

“路西法真是个怪物，”卡耶塔诺惊魂稍定，便开起了玩笑，“他把我也变成了隐形人。”

那一天，谢尔娃·玛利亚不得不变得十分机警，为的是不让女看守再到这间牢房里来。夜深了，经过一整天的嬉戏，他们觉得仿佛自己一直都这样彼此相爱。卡耶塔诺半是戏耍半是当真，壮着胆解开了谢尔娃·玛利亚胸衣的带子。她用双手护住胸口，眼里闪过一丝恼

意，额上泛起一道红晕。卡耶塔诺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双手，就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把它们从她的胸前移开。她试图反抗，可他用一种温柔却又坚决的力量阻止了她。

“跟我一起读，”他对她说，“最终我来到了你的手中。”

她顺从了。“我知道自己将在这里死去。”他接着背诵下去，一面用冰冷的手指解开了她的胸衣。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着那些诗句，害怕得浑身发抖：“利剑在降服之躯上能砍多深，尽管来吧，唯我的身躯可供试验。”就在这时，他第一次吻了她的双唇。谢尔娃·玛利亚的身体伴着呻吟颤抖起来，飘散出一丝纤弱的海风，接着就听由命运摆布了。他的指尖掠过她的皮肤，几乎没有触碰到她，他第一次体验到，自己在另一具躯体里，这种感受是何等美妙。他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告诉他，在那些苦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不眠之夜，在深深痴迷于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在禁欲苦修的荒野上，他曾经离魔鬼那么远，而她，却在奴隶们的棚屋里同奔放爱情的全部力量相伴而生。他依从着女孩的指引，在黑暗中试探着，摸索着，可就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在一场道德灾变中坠入深渊。他仰面躺下，两眼紧闭。谢尔娃·玛利亚被他的静默和他死一般的沉寂吓住了，用手指碰了碰他。

“您这是怎么了？”她问道。

“这会儿先别理我，”他喃喃低语，“我正在祷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的平静。他们不知疲倦地互相诉说爱恋之苦，忘情地接吻，流着热泪诵读情诗，依偎在对方的耳畔唱歌，在欲望的泥塘里尽情翻滚，直至精疲

力竭，却都保持着童贞。因为他已决定坚守自己的誓愿，直到接受圣礼的那一天，她也同意了。

在激情稍退的间隙，他们互相做了一些很过头的爱的测验。他对她说，为了她，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谢尔娃·玛利亚带着孩子气的残忍让他为自己把一只蟑螂吃下去。她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捉住了一只，活生生吞了下去。在另一次癫狂的挑战中，他问她能不能为自己把辫子剪掉，她说可以，但随即像是开玩笑又像是一本正经地警告他说，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娶她为妻，以履行先前的那个誓愿。他把一把菜刀带进牢房，对她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她转过身去，好让他能齐根剪掉，嘴里还催促着：“胆子大点儿。”他没敢去剪。几天后，她问他会不会像一只山羊那样任人割断喉咙。他满口答应了。于是她掏出一把刀子打算试一试。他吓得浑身冒冷汗，赶紧闪开，嘴里连声说道：“你不能试，你不能试。”女孩笑得死去活来，想知道为什么，他说了实话：

“因为你真的做得出来。”

当激情渐趋平缓，他们也开始体验日常爱情的琐碎平淡。她把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像等待着丈夫一身轻松地回家一样期盼着他的到来。卡耶塔诺教她看书写字，带她欣赏诗歌、崇信圣灵，盼望着那幸福的一天：他们获得自由，结为夫妻。

四月二十七号那天清晨，卡耶塔诺离开牢房后，谢尔娃·玛利亚刚要入睡，一伙人没有任何预告就闯了进来，驱魔开始了。那分明是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进行的仪式。他们把她拖到牲口圈的饮水槽

那里，往她身上浇了好几桶水，扯下了她的那些项链，给她套上一身异教徒的粗布袍子。一个管理花园的修女用一把修剪树枝的大铁剪咔嚓四下就把她的一头长发齐后脑勺剪断，扔进了院子里熊熊燃烧的火堆。负责剪头发的修女又把剩下的头发剪得只剩半西班牙寸长，那是克拉拉会修女们包在头巾下的发型，一边剪一边往火堆里扔。谢尔娃·玛利亚看见火堆里迸射出金色的火焰，听见原木燃烧时噼啪作响，闻到一股烧焦的牛角的臭味，她那木雕石刻一般的面孔上肌肉纹丝不动。最后，他们给她穿上一件束缚衣，又给她蒙上一块死人用的盖布，两个奴隶用一副军用担架把她抬进了小礼拜堂。

在此之前主教召集了教士会议，由一群最杰出的领俸教士组成，他们从中选出了四个人，陪同主教参加谢尔娃·玛利亚的驱魔仪式。在最终确定此事的会议上，主教从病痛中振作起来，做出安排：这次的仪式将不像其他一些值得纪念的典礼那样，在大教堂里举行，而要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小礼拜堂举行，而且他本人将亲自主持这次驱魔活动。

晨祷还没开始，修女们就在院长带领下齐集唱诗班，并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做了祷告，庄严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她们激动不已。随后进来的是教士会议的几位高级神职人员、三家教会的首脑人物和宗教法庭的长官。除了最后提到的这几位，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世俗人士出席。

主教最后一个到场，他身着参加盛大仪式的华服，坐着由四名奴隶抬着的轿子，笼罩在一种无法劝慰的忧伤氛围里。他面对主祭台，在通常举行盛大葬礼时才用得着的大理石灵柩台旁坐了下来，为了便于挪动身体，他坐在一把高背转椅上。六点整，两个奴隶用担架把谢

尔娃·玛利亚抬了进来，她穿着束缚衣，身上仍盖着那块深紫色的布。

唱弥撒的时候酷热难当。管风琴的低音在天花板上回响，几乎没有给躲在唱诗班格子窗后面的修女们乏味的声音留下一丝空隙。赤裸着上身的两名奴隶用担架把谢尔娃·玛利亚抬进来后，站在她的两旁当起了看守。弥撒结束的时候，他们揭开了盖在她身上的布，把她放在了大理石灵柩台上，仿佛她是位死去的公主。主教的奴隶们把主教连同转椅一起抬到她的身边，然后离去，主祭台前宽阔的空间里只剩他们两人。

接下来的紧张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一片死寂仿佛预示着有什么奇迹要从天而降。一位辅祭把装着圣水的小桶放在了主教手边。主教抓起圣水掸子，就像抓住一柄作战用的大锤，朝谢尔娃·玛利亚俯下身去，向她全身洒满圣水，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他大声喊出一句咒语，整个小礼拜堂的地基都为之震动。

“不管你是谁，”主教高声叫道，“以基督和过去、现在、未来可见与不可见之万物之主上帝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这具经过洗礼得到救赎的躯体，回到黑暗中去。”

惊恐万状的谢尔娃·玛利亚也开始高声叫喊。主教抬高嗓音想盖过她的叫声，可她叫得更凶了。主教深深吸了口气，张开嘴巴，打算接着念出咒语，可那口气卡在了胸膛里没能吐出来。主教脸朝下栽倒在地，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似的喘着气，仪式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

那天夜里，卡耶塔诺见到谢尔娃·玛利亚的时候，她正在束缚衣里发着高烧，浑身发抖。最使他气愤的是她被剪去头发所受的侮辱。

“天主啊，”他一面压抑着自己的怒火，一面给她松开皮带，“您怎么能允许他们犯下这样的罪行。”刚一解脱，谢尔娃·玛利亚就扑上来一把搂住了卡耶塔诺的脖子，两个人相拥着一言不发，女孩还在抽泣。等她稍稍平静下来，他抬起她的脸，对她说：“不要再流泪。”随后配上了一句加尔西拉索的诗：

“我为你流的泪足矣。”

谢尔娃·玛利亚讲述了她在小礼拜堂里的可怕经历。她对他讲起唱诗班如打仗般的喧闹声，讲起主教幻觉般的喊叫声，讲起他那炽热的气息和他那双被激情点燃的美丽的绿眼睛。

“他就像魔鬼一样。”她说。

卡耶塔诺竭力想让她安静下来。他对她说，主教尽管身躯庞大，声如雷鸣，手段严酷，可他是个好人，也是位智者。因此，谢尔娃·玛利亚的害怕可以理解，但她并没有身处危险之中。

“我现在只想死。”她说。

“你感到愤怒、失败，我也是，因为我没法帮你，”他说，“可到了复活的那一天，上帝一定会补偿我们的。”

他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脖子上一根项链都没有了，便解下她送给他的那串奥杜瓦项链，给她戴上。他们紧挨着躺在床上，互相诉说心中的愤恨，世界慢慢静了下来，只有天花板上的白蚁在窸窣作响。女孩的烧退了。黑暗中，卡耶塔诺开了口。

“《默示录》里有一个预言，说是有那么一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他说，“但愿上帝说的就是今天。”

卡耶塔诺离开之后，谢尔娃·玛利亚才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被一种新的声音惊醒了。一位老祭司由院长陪同，站在她面前。他身材高大，皮肤被硝石熏得黝黑，头发像竖立的鬃毛，眉毛粗重，双手粗糙，眼睛里透着可以信赖的神情。不等谢尔娃·玛利亚完全醒来，他就用约鲁巴语对她说道：

“我把你的项链都带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项链，这是在他一再要求之下修道院的女管家还给他的。他一边把项链戴在谢尔娃·玛利亚的脖子上，一边用好几种非洲语言逐条说明它们的含义：红白相间的代表了羌格的爱和鲜血，红色和黑色的是爱勒瓜的生命与死亡，而七颗念珠则象征着叶玛雅的水和淡蓝色。他自如地从约鲁巴语转到刚果语，又从刚果语转到曼丁加语，而她则优雅流利地附和着。最后他转而讲起西班牙语，那也仅仅是因为有院长站在一旁。院长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谢尔娃·玛利亚居然有如此温顺的一面。

这是托马斯·德阿基诺·德纳瓦埃斯神父，他从前在塞维利亚当过宗教法庭的检察官，现在是奴隶区的堂区神父，主教因身体欠佳选中他来接替自己进行驱魔活动。从他的履历看，他是个不容置疑的强硬派，曾经把十一个异教徒送上火刑架，当中有犹太人也有穆斯林。然而，他的威望主要来自他曾经将无数灵魂从安达卢西亚最难对付的魔鬼手中解救了出来。他品位高尚，举止文雅，说起话来有一种加那利群岛居民的甜甜的口音。他是在这边出生的，父亲是国王的一名议院代表，娶了自己的一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奴为妻。在证明了祖上四代白人的血统之后，他在本地的神学院度过了见习期。他成绩优异，在塞维利亚获得了博士学位，五十岁以前一直在那里生活、传教。回到出生地后，他要求到最贫穷的堂区去，他对非洲的宗教和语

言有着极大的热情，就像奴隶群里的又一个奴隶。说到和谢尔娃·玛利亚沟通，合情合理地对付她身上的魔鬼，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谢尔娃·玛利亚立刻就把他当成了救命天使，她也确实没有弄错。他当着她的面逐条批驳了记录簿上的论据，并向院长证明里面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他对院长说，美洲的魔鬼和欧洲的魔鬼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叫法和行事方法有所不同。他向院长解释说，要认清是不是魔鬼附体有四条适用原则，又指出，魔鬼也很容易利用这四条原则来使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谢尔娃·玛利亚告别时，他亲切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放心睡吧，”他对她说，“我遇见过的魔鬼比这厉害多了。”

院长心情极好，邀请他去品尝她们修道院名声远扬、香甜可口的巧克力，还有专为尊贵客人烘制的茴芹饼干和妙不可言的甜点。在院长的私人餐厅里喝着巧克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的几步程序做了指示，院长满心欢喜，一一遵从。

“这个可怜的女孩最后是好是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院长说，“我只恳求上帝让她赶紧离开这座修道院。”

神父答应她用最快的速度，多则几天，少则几个小时，把这件事情办好。在会见室告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此后再也不会见面了。

事实如此。阿基诺神父——他堂区里的教民都是这样称呼他的——徒步朝他的教堂走去，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很少祷告，每天用乡愁折磨自己作为对上帝的补偿。他在拱廊便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卖

杂货的小贩们正等待着太阳落山，好穿过港口的烂泥地，他们的叫卖声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买了点儿最便宜的甜食，以及一张专为穷人发行的彩票，心里一如既往地在想，什么时候能中个奖，好把他那经常丢东西的教堂修理修理。地上铺着几块黄麻编织的席子，席子上陈放着些不值钱的小工艺品，几个黑人大妈如石雕般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他和她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半个钟头。快五点钟的时候，他穿过客西马尼吊桥，那里刚吊起一条肥胖的恶犬尸体，以昭告大家这条狗死于狂犬病。空气里弥漫着玫瑰花的香气，天空无与伦比地透彻清亮。

奴隶区邻近海边的沼泽地，贫困得令人心悸。棚屋都是以土为墙，棕榈叶做屋顶，人们在那里与秃鹫和猪混杂而居，孩子们喝水都是在街边的泥塘里就地解决。然而，这里却是最快乐的街区，色彩最鲜亮，人们说话的声音也最响亮，特别是到了日落时分，人们纷纷把椅子搬到大街上乘凉的时候更是热闹。堂区神父把甜食分给了沼泽地边的孩子，给自己留下三块当晚餐。

这座教堂其实就是一所用土和藤条搭建的农舍，房顶上铺的是苦棕榈叶，屋脊上立了个木头做的十字架。长长的靠背椅是用厚厚的木板钉成的，祭坛只有一个，圣像也只有一尊，布道的讲台用木头搭建，每个礼拜天，神父就在那里用各种非洲语言讲经说法。教堂的祭坛后面伸出去一块，那就是神父的住所，居住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小房间里唯有一张吊床和一把粗木椅子而已。后面还有个小小的院落，乱石丛生，架子上的几串葡萄干瘪瘪的，一排带刺的栅栏隔开了海滨的沼泽地。院子一角有个用灰浆浇成的水池，除此之外再没有能喝水的地方了。

一个年老的教堂司事，一个十四岁的孤女，两人都是曼丁加人，皈依了天主教，他们便是教堂里和家里的助手，可念完玫瑰经之后他

们也就没什么活可干了。关上大门之前，堂区神父就着一杯水吃掉了最后三块甜食，然后照惯例用西班牙语同坐在大街上的邻居们告别：

“在这神圣而美好的夜晚，愿上帝保佑你们。”

清晨四点钟，住在离教堂一个街区远的教堂司事敲响了做联合弥撒的第一阵钟声。快五点钟了，神父还不见踪影，司事便去他的房间找他。神父不在房间里。院子里也没找见。因为神父有时候会一大早就去附近的院子和人聊天，司事又到周围寻找了一番，也没找见。零零星星的几个教民到了教堂，他告诉他们，因为没找到神父，今天的弥撒不做了。八点钟，太阳已然火辣辣的，帮佣的女孩到水池边去打水，这才发现了阿基诺神父，他脸朝上漂在水池里，脚上还穿着睡觉的袜子。他凄惨的死使人们悲痛不已，同时也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修道院院长宣布，这便是魔鬼对她的修道院心怀仇恨的有力证据。

这消息没能传进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她一直怀着一种天真的幻想期盼着阿基诺神父。她不知道怎么向卡耶塔诺解释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因为他把项链还给了她，又答应解救她出去，她告诉卡耶塔诺自己对这位神父心存感激。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都觉得只要拥有爱情就足以使他们幸福了。还是谢尔娃·玛利亚率先从阿基诺神父的话里受到启发，明白了要想获得自由，只能靠他们自己。一天清晨，在长时间的热吻之后，她请求德劳拉不要离她而去。他没把这话当真，又吻了她一下打算告别。女孩从床上一跃而起，张开双臂挡在了门口。

“要么您别走，要么就带我一起走。”

她有一次对卡耶塔诺说起过，真想和他一起逃到帕伦克的圣巴西里奥去躲起来，那是一个逃亡奴隶的村子，离这里只有十二西班牙里的路，那里的人一定会像迎接女王一样迎接她。卡耶塔诺觉得这主意倒不坏，可就是没把它和逃亡联系在一起。他更相信那些正式的、合法的手段，相信在确证女孩并没有被魔鬼附体之后侯爵会把她接回去，相信他自己一定能得到主教的宽恕和允准，融入世俗社会，在那种情况下，教士和修女结婚将变得司空见惯，没有人会为此大惊小怪。因此，当谢尔娃·玛利亚给他出了个到底是留下来别走还是干脆带她一起走的难题时，他想的是怎么把这个话题岔开。女孩吊在他脖子上，威胁说要大声喊叫。天快要大亮了，德劳拉惊恐不已，甩开女孩脱身出来，在晨祷开始的时刻逃走了。

谢尔娃·玛利亚的反应是变得异常疯狂。她先是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抓破了女看守的脸，接着又插上门闩把自己锁在里面，威胁说要是不放她走就放火把这间牢房烧了，把自己烧死在里面。女看守满脸是血，气急败坏地朝她吼道：

“你敢！你这头贝耳则步的畜生。”

谢尔娃·玛利亚唯一的回应是用圣灯点燃了床垫。幸亏马尔蒂娜赶来，用上了她特有的镇静疗法，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不管怎么样，在这天的报告中，女看守还是恳求把女孩转移到内院更保险的牢房里去。

谢尔娃·玛利亚的渴求促使卡耶塔诺也有了这样的愿望，他需要立即找到一种逃亡以外的好法子。他两次去见侯爵，两次却都被散放

在家里的几条猎犬挡住了，主人不在家。实际上，侯爵再也不会住在那里了。他已经被自己心中那无穷无尽的恐惧打倒，曾经想去杜尔丝·奥莉维亚那里寻求庇护，可她让他吃了闭门羹。从感到孤独的那一刻起，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叫她过来，可每次见到的只是嘲弄他的用纸叠成的小鸟。冷不防，在没有叫她的时候，她却不期而至。厨房因为长期闲置已经无法使用，她把它打扫干净，归置整齐，旺旺的炉火上，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她穿得像过礼拜天一样，衣服上镶着花边和各种装饰，还搽了时兴的香脂，唯一能让人看出她是疯子的是那顶宽檐大草帽，上面缀了许多碎布条做成的小鱼和小鸟。

“你能来这里，我感激不尽，”侯爵对她说，“我太孤独了。”他又叹了口气，说：

“我失去了谢尔娃。”

“那是你的错，”她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失去她还不是你一手造成的。”

晚饭吃的是按当地方法烹制的辣椒烧肉，肉有三块，辣椒是从果园里精挑细选摘来的。杜尔丝·奥莉维亚把菜端了上来，完全是一副女主人的派头，这和她那一身华丽的装扮倒很相配。那几条凶猛的猎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跟着她，在她腿边窜来窜去，而她则轻声细语地抚慰着它们。她在侯爵对面坐了下来：早就该这样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对爱情无惧无畏的时候。他们静悄悄地吃着饭，互不相视，一面浑身冒汗，一面像彼此漠然的老夫老妻那样喝着汤。第一道菜吃完之后，杜尔丝·奥莉维亚停下来叹了口气，生出岁月不饶人的感慨。

“我们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她说。

她的直率触动了侯爵。此刻在侯爵眼里，她又胖又老，嘴里掉了两颗牙，眼神也黯淡无光。他们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或许吧，要是他当年有勇气和父亲抗争的话。

“当你脑子好使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她说道，“是你从来就没有看见过我真实的样子。”

“我是在一大群姑娘中间发现你的，那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年轻，很漂亮，我好不容易才挑出了个最好的。”侯爵说。

“是我自己把自己挑出来送给你的，”她说，“不是你挑的。你一辈子都是这个德行：一个可怜鬼。”

“你居然敢在我的家里骂我。”他说。

这样一句接一句的斗嘴让杜尔丝·奥莉维亚兴奋起来。“这个家是你的，也是我的，”她说，“因为那女孩是我的，虽说把她送到这世上来的是一条母狗。”她没等侯爵接话，又继续道：

“最糟糕的是，你把这孩子送到了最不该送的人手中。”

“她在上帝的手中。”他说。

杜尔丝·奥莉维亚近乎疯狂，高声喊道：

“她在主教的儿子手中，他把她变成了婊子，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你再敢这么嚼舌头，迟早自己把自己毒死。”侯爵恼羞成怒。

“萨坤达是喜欢说大话，但她从不说假话，”杜尔丝·奥莉维亚反驳道，“你也别想羞辱我，因为等到你死的那一天，也只剩下我来给你脸上盖土了。”

结局一如既往。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盘子上，像是一滴一滴的汤汁。本来早已睡着的猎犬，此刻又被激烈的争吵声惊醒，纷纷警惕地扬起了头，嗓子里发出吼声。侯爵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来。

“你看见了吧，”他怒声说道，“这就是我们本可以有的生活。”

她没等吃完就站起身来，撤了桌上的家什，带着一股无名火去洗盘子和锅，一边洗一边在洗碗槽里把锅碗瓢盆打得粉碎。侯爵任由她哭泣，哭到最后，她把打碎了的家什像一阵冰雹似的倒进了垃圾桶。她没打招呼就走了。侯爵百思不得其解，恐怕谁都想不出，杜尔丝·奥莉维亚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像从前了，如今，她成了这座宅邸里的一个夜间幽灵。

从前有流言蜚语说主教和卡耶塔诺从在萨拉曼卡的时候起就是情人，现在这则谣言被另一个传闻代替了：卡耶塔诺其实是主教的儿子。杜尔丝·奥莉维亚的版本，经过萨坤达的证实，再被添油加醋，变成了这样：谢尔娃·玛利亚被绑架到了修道院里，用来满足卡耶塔诺魔鬼般的欲望，而且她已经怀上了一个长了两个脑袋的孩子。萨坤达还说，他们的纵欲和淫乱已经带坏了整个修道院里的修女。

侯爵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他摸索着行走在记忆的沼泽之中，想找一处安身之地以躲避心中的恐惧，但他能找到的唯有对贝尔纳达的记

忆，在孤独中，记忆中的她变得高尚起来。侯爵试图用贝尔纳达身上那些最可恶的东西来抵消这些记忆，她身上的恶臭、她粗鲁的举止、她脸上像鸡一样高耸的颧骨，然而，他越是去想她的坏处，记忆里的她就变得越是完美。最后，他抑制不住思念之苦，派人给马阿特斯榨糖厂那边送去了试探性的口信，自从她走后，他一直觉得她会在那里，而她也确实在那里。他传话给她，让她忘掉那些仇恨，回到家里来，这样至少他们俩死的时候还能有个伴。一直没等到回音，侯爵决定亲自去找她。

他不得不沿着回忆的溪流摸索前行。当年在整个总督区数一数二的庄园，现在已经一片荒芜。杂草丛生，想找到一条路难之又难。榨糖厂成了一堆废墟，机器都锈迹斑斑，最后两头牛已经成了骨架，仍然套在压榨机的横杆上，只有加拉巴树下那片长满牵牛花的水池仿佛还有点生机。在透过甘蔗园里烧焦的荆棘丛望见房屋之前，侯爵就先闻见了一股贝尔纳达特有的肥皂味儿——这已然成了她身上固有的气味——他发觉，自己是如此渴望见到她。她坐在门口平台栏杆旁的一把摇椅上，嘴里嚼着可可，目光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远处的地平线。她穿着一条粉色的棉布裙子，刚在水池里洗过澡，头发还湿漉漉的。

在登上门口的三级台阶之前，侯爵先打了声招呼：“下午好。”贝尔纳达回了声好，并没有看他，就好像这声问候来自虚空。侯爵走上了围着栏杆的平台，目光越过荒草，向远处巡望了一周。目光所及之处，唯见荒山野岭和水池那儿长着的几棵加拉巴树。“这儿的人呢？”侯爵问道。贝尔纳达和她父亲当年一样，看也没看侯爵。“人都走光了，”她回答说，“方圆几百里见不到一个活人。”

侯爵走进门去想找把椅子。房子已经破烂不堪，地砖缝里冒出了几丛灌木，开着紫色的小花。餐厅里有一张古老的餐桌和几把餐椅，都被白蚁蛀得不成样子；钟停了摆，谁也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刻停了的；呼吸之间能感觉到，空气里飘浮着一层看不见的灰尘。侯爵给自己搬来一把椅子，挨着贝尔纳达坐下，低声对她说：

“我是专为找您而来的。”

贝尔纳达不动声色，但还是几乎难以觉察地点了一下头。他把自己的现状告诉了她：家里空空荡荡的，奴隶们躲在树丛后面磨刀霍霍，夜晚漫长得没有尽头。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说。

“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过人过的日子。”她回答道。

“说不定能过上呢。”他又说道。

“要是您知道我有多恨您，您就不会跟我说这样的话了。”她说。

“我也一直以为我恨您，”侯爵说，“可现在，我似乎没有那么确定了。”

于是，贝尔纳达向他敞开了心扉，好让他明白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她对他讲了她父亲是如何让她打着送鲱鱼和醋渍菜的幌子来找他的，如何用看手相这样的老伎俩欺骗了他，在他装聋作哑的时候又是如何唆使她强行和他干了那事儿，他们又如何冷静、准确地策划让她怀上了谢尔娃·玛利亚，从而把他一辈子牢牢掌握在手心。侯爵唯一

应该感谢她的，就是她没有去做和她父亲商量好的最后一步：给他的汤里下点鸦片酊，彻底将他摆脱。

“我是自己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她说，“可我并不后悔。让我难以承受的是，在种种折磨之外，我还不得不爱那个可怜的七个月的早产儿，或是爱您，要知道您可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

尽管如此，失去犹达斯·伊斯卡柳特才是她滑向堕落的最后一级台阶。她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着他的踪影，她毫无节制地投身于和榨糖厂的奴隶们通奸，这样的事在她第一次干出来以前想想都觉得恶心。她把奴隶们分成组，排成队，就在香蕉园间的小径上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干那事儿，直到她的魅力被发酵蜂蜜和可可饼消磨殆尽，她变得浑身虚肿，丑陋不堪，这样的身体令奴隶们望而却步，于是她开始用钱说话。刚开始，根据样貌和体格付点铜板，就可以找到年轻力壮的，到后来，随便来个什么人都得付真金白银。过了好久她才发现，为了躲开她那永远不知满足的欲望，奴隶们成群结队地逃到帕伦克的圣巴西里奥村去了。

“这下我才知道，我早该用砍刀把他们都砍死的，”她这么说着，眼中没有一滴眼泪，“不光要砍死他们，还有您，那个女孩，我那一毛不拔的父亲，以及所有那些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可那时，我已经砍不动任何人了。”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看着夕阳照耀在荆棘丛生的峭壁上。地平线那里远远传来成群动物的声响，还有一个女人绝望的声音正挨个呼唤它们的名字，天渐渐黑了。侯爵舒了口气：

“我算是看清了，我真的没什么好感谢您的。”

他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把椅子放回原处，顺着来路走了，没有道别，也没有带上一盏灯。又过去了两个夏天，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上，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只剩下一堆被秃鹫吃剩的白骨。

那天，马尔蒂娜·拉波尔德为了做完一件被耽搁下来的活，整整一上午都在刺绣。中午她在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里吃了午饭，随后回她自己的牢房去睡了个午觉。下午，绣到最后几针时，她带着一种不常见的伤感和谢尔娃·玛利亚说起话来。

“要是哪天你从这里出去了，或者要是我先出去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她说，“这将是我唯一的荣耀。”

谢尔娃·玛利亚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她说这番话的用意，女看守大叫大嚷把她吵醒：早上起床的时候，牢房里不见了马尔蒂娜。她们把修道院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发现她的一丝踪影。有关她的唯一消息，是谢尔娃·玛利亚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花体字写着：我会一天三次为你们祈祷，祝愿你们幸福。

没等谢尔娃·玛丽亚从惊恐之中回过神来，院长就带着副院长和院里的其他几位手段冷酷的大人物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队扛着火枪的卫兵。院长怒不可遏地伸出一只手，按住了谢尔娃·玛利亚，对她大声吼道：

“你是同谋，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女孩抬起那只没被按住的手，那股坚决让院长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他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她说。

院长目瞪口呆。

“她不是一个人？”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谢尔娃·玛利亚说道。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更别说从露台上逃走了，从那里走就必须经过有人看守的院子。“他们长着蝙蝠的翅膀，”谢尔娃·玛利亚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做出飞翔的样子，“他们在露台上张开翅膀，把她带走了，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卫队队长吓得面无人色，画着十字，跪倒在地。

“最最纯洁的玛利亚。”他嘴里念道。

“无玷成胎的圣母。”众人齐声应和。

这是一次完美的逃亡，自从发现卡耶塔诺经常在修道院里过夜，马尔蒂娜就不露声色地谋划着，把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她唯一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说她根本就不在乎的是，理应从里面掩上下水道的入口，以免引起怀疑。调查这次逃亡的人发现下水道敞开着，勘察了一番，弄清了真相，便把下水道两头都砌死了。谢尔娃·玛利亚被强行带到了活死人住的那座楼里，关进了一间上锁的牢房。这天夜里，皓月当空，卡耶塔诺把两只手都挖烂了，也没能打穿封住地道的那堵墙。

他近乎疯狂，跑去找侯爵。他没敲就一把推开了大门，闯进了空空荡荡的侯爵府，府邸里的光线和大街上一样明亮，因为那石灰墙在月光照耀下仿佛透明的一般。被遗弃了的府邸里干净整洁，家具都归置到位，硕大的花盆里鲜花盛开，一切都井井有条。铰链的吱呀声惊

动了那几条猎犬，可杜尔丝·奥莉维亚一声喝令，它们又一下子安静下来。卡耶塔诺看见她站在院落绿色的浓荫里，美丽动人，浑身散发着光芒，身穿侯爵夫人的长袍，鬓间插着颜色鲜艳、气味浓郁的新采的山茶花，他抬起手，用食指和大拇指比画出一个十字。

“以上帝的名义，请问你是哪位？”他问道。

“一个正在接受惩罚的幽魂，”她答道，“您又是哪位呢？”

“我是卡耶塔诺·德劳拉，”他告诉她，“我来这里是为了跪求侯爵先生听我讲两句话。”

杜尔丝·奥莉维亚眼睛里冒出了怒火。

“侯爵先生没时间听一个无赖讲什么废话。”她说。

“那么你究竟是何许人，能有权在这里发号施令？”

“我是这府中的女王。”她说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德劳拉说，“请您告诉侯爵，我是来和他谈他女儿的事情的。”他不再兜圈子，把手放在胸前，说道：

“为了爱她，我可以去死。”

“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放狗了。”杜尔丝·奥利维亚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大门：“从这里滚出去。”

她的口气是如此决然，卡耶塔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一步一步退出了大门。

礼拜二，阿布雷农肖走进麻风病医院里德劳拉的小房间时，看见他因为不要命地熬夜已经垮掉了。德劳拉把一切对他和盘托出，从他受罚的真实原因一直讲到他在那间牢房里度过的每个良宵。阿布雷农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我能想象您干出任何一件蠢事，可像这种疯狂至极的事儿我还真没想到。”

这下卡耶塔诺也吃了一惊，问他道：

“难道您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从来没有，我的孩子，”阿布雷农肖说，“性是一种天赋，而我没有这种天赋。”

他试图劝服卡耶塔诺。他说，爱情是一种违背天性的感情，它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带进一种自私的、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之中，感情越是强烈，就越是短暂。可是卡耶塔诺一点都听不进去。他的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那就是逃离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压迫，逃得越远越好。

“现在只有侯爵能从法律上帮助我们，”他说，“我曾经想去跪着求他，可是没在府中找见他。”

“您永远都找不见他了，”阿布雷农肖说，“传到他那儿的声音是，您一直想欺侮她的女儿。而我现在明白了，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弄错。”说完他直直盯住卡耶塔诺的双眼：

“您就不怕下地狱吗？”

“我觉得我已经在地狱里了，但把我打下地狱的并不是圣灵。”德劳拉回答时无所畏惧，“我一向认为比起信仰来，圣灵更关心的是爱情。”面对这样一个刚刚从理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阿布雷农肖无法掩饰自己的敬仰之情。可他并没有对这个人许下什么虚假的诺言，更何况还有宗教法庭横梗在中间呢。

“你们信仰的是一个崇尚死亡的宗教，它给了你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和乐趣，”他对德劳拉说道，“我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唯一最要紧的，是活着。”

卡耶塔诺又跑到了修道院。他在大白天从奴仆们进出的门走了进去，大模大样地穿过了花园，自以为靠着祈祷的力量，一定不会有人看见他。他登上二楼，穿过一条空无一人的走廊，这条有着低矮的天花板的走廊连接着修道院的两座建筑，他就这样走进了活死人的那个寂静而又冷清的世界。他经过那间新牢房时，谢尔娃·玛利亚正在里面为他哭泣，可他无所察觉。他就要走到那座牢房楼时，身后一声喝令叫住了他：

“站住！”

他转过身来，只见一个脸上蒙着面纱的修女正朝着他高高举起一个十字架。他朝前迈了一步，却被那修女用基督的十字架挡住了。修女大声喝道：“向后退！[2]”

这时他身后又传来另一个声音：“向后退！[3]”接着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向后退！[4]”。他转了好几个圈才弄明白自己被一群修女团团围住了，她们像幽灵一般，脸上都蒙着面纱，手上都举着十字架，高声追逼着他：

“向后退，撒旦！[5]”

卡耶塔诺精疲力竭。他被送上了宗教法庭，在一个公共广场上接受审判，被指控有异教徒的嫌疑，这在教会内部引发了群体的骚乱和争论。由于得到了特殊恩惠，对他的最终处罚是在圣爱医院做护士。他在那里又活了很多年，整日和病人混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在地上睡觉，在病人的木槽里用他们用过的水洗澡，他坦承自己渴望染上麻风病，却一直没能如愿。

谢尔娃·玛利亚空等了他一场。三天后，她起而反抗，开始绝食，这使她更像被魔鬼附体了。主教被卡耶塔诺的堕落和阿基诺神父离奇的死亡所困扰，被公众对超出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范畴的不幸事件的反响弄得昏头昏脑，于是，他爆发出就他的身体状况和年龄而言不可思议的能量，重操驱魔大业。这一次，谢尔娃·玛利亚的头用剃刀剃得精光，又套上了束缚衣，她以一种撒旦的凶猛面对主教，嘴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不时发出地狱里禽鸟的悲鸣。第二天，人们听见受惊的畜群发出一阵阵吼叫，大地都为之震动，这时再说她和地狱里的大小魔鬼没什么牵连已经没人会相信了。带她回牢房的路上，人们用圣水给她灌了肠，这是法国人的法子，为的是把可能残留在她五脏六腑里的魔鬼赶走。

这样的折腾又持续了三天。尽管有一个礼拜没吃东西了，谢尔娃·玛利亚还是把一条腿挣脱了出来，照着主教的小腹就是一脚，把他踢翻在地。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她早就可以挣脱出来，因为她的身体太瘦弱，皮带已经绑不住她了。这一事件提醒人们，驱魔活动可以停一停了，对此教士会议表示赞同，但主教却执意反对。

谢尔娃·玛利亚始终没能弄明白卡耶塔诺·德劳拉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再带着装有精致甜食的篮子来和自己共度良宵。五月二十九号这天，已经气息奄奄的她又一次梦见了那扇窗户，窗外是大雪覆盖的原野，那里没有卡耶塔诺·德劳拉，他永远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了。她的怀里兜着一串金色的葡萄，她每吃掉几颗，葡萄串上就马上长出新的来。可这一次，她不再是一颗一颗，而是两颗两颗地摘，为了把最后一颗吃进嘴中，她几乎喘不上气来。等到女看守进牢房来准备带她去进行第六次驱魔的时候，发现她已经为爱死在了床上，她的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皮肤像初生的婴儿一样。被剃得精光的头皮上，一缕缕的头发像冒泡泡一样涌出来，眼见着越长越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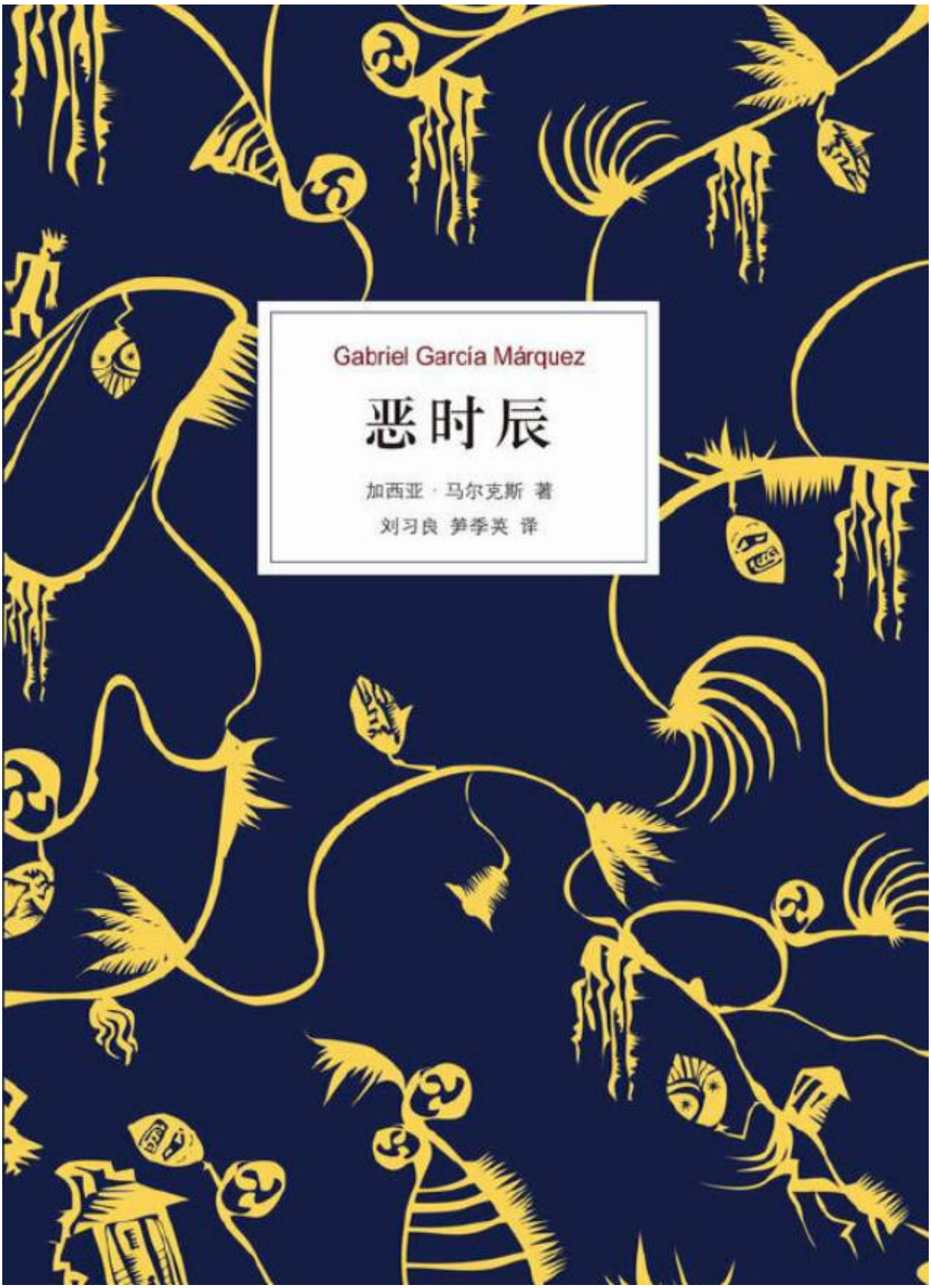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恶时辰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恶时辰

南海出版公司

La mala hora

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时辰/〔哥伦〕马尔克斯著；刘习良，笋季英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442-6393-1

Ⅰ.①恶… Ⅱ.①马…②刘…③笋… Ⅲ.①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81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61

LA MALA HORA, © 1962

©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nd Heirs of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恶时辰

恶时辰

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呢。“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他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像一头温顺的牝牛，而且他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像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头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他系好衣服，拔掉门闩，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随后，他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狭窄的小门前，他再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楼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虫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拍死后颈上的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楼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喑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尽，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敲钟可算是个累活。但他却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她打开第一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老鼠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那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那清晰又有点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地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编的歌。”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像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那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接着是召唤人们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斯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没有什么区别。梦将把我带上你的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她的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答道。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

更妙的事哪。”

神父停住脚步，两只宁静的淡蓝色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

“匿名帖。”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隔着三扇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儿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了过来，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敲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面朝着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提花布做的窗帘上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口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吹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沾上泥，变得硬邦邦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拽了拽靴带，用拳头攥住它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刺，没有找着。昏暗中，他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扣好衣服，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

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他先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时候，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哪，”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

她把蚊帐推到一边，打开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底子像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也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他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像块海绵似的。”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头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好像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儿地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可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那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他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挺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块小女士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他把六发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往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卧室里的闹钟蓦地丁零零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将闹钟按停。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去给骡子备鞍。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路灯熄灭了，挨家挨户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厨房，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取下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了进来。

“等雨停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

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定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到了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流下的雨水落在他的背上，像铅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头顶只有几拃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像肥皂一样滑溜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瞥见自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淡了，好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字母遒劲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嘚嘚嘚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纷纷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

来。塞萨尔·蒙特罗来到镇子边，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住了坐骑。他翻身下骡，取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厉的乐器声，随后便悄然无息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停住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拆卸单簧管的吹嘴。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了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稳脚跟，用胳膊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屋子抖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之前还是枪响之后，塞萨尔·蒙特罗看见门外的巴斯托尔像条虫子似的扭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子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他牙疼得睡不着觉。今天清晨，望弥撒的晨钟第一次敲响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微好了一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嗒嗒声，他渐渐

有了些睡意。入睡时，牙虽不疼了，可还是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吊床旁的一把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他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开始疼了。

镇长有点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了起来。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痛处。嘴巴肿了，一直没法刮脸。蓦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杀死了巴斯托尔。”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这个人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去。人们给他闪出一条路。从台球厅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他边说边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举着它继续走向广场中央。人群纷纷往墙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猛地一跳，扭过身子来对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抹了抹眼皮上的雨水，一步步地朝前走，手指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突然，他止

住脚步，用和蔼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了。”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依然紧张地扣着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站在雨里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家家户户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随着他们聚拢过来。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脱掉雨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了四发子弹，裤子后兜里找到一柄牛角把的匕首，另一个兜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拴着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听任镇长搜身。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将东西和塞萨尔·蒙特罗一起交给他们。

“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可要好好看管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广场上聚集的困惑不解的人群。

镇长目送着他走远，心里像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哄赶小鸡的手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家。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使劲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道：“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女人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让她喘口气。”

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几个男人正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散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回鸽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它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尸体的腰部有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尸体身上的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他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神点，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号叫声和令人窒息的气味让屋里的空气显得越发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

“像头猪似的！”镇长回答道。

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停了，但阴暗的天空仍然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了，”镇长不耐烦地说，“您不用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

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并命令警察撤掉守卫。被挡在外面的人群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台球厅。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

往常这个时候，台球厅是不开门的。今天，还不到七点钟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吧台喝咖啡，他们多半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一边穿上干净衣服，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聆听着周围人的交谈。离开台球厅时，他已经把事件的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扰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沿着石墁的街道走去，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止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受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沿街走着，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色的货物摆出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看不出来，他满头油光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而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牙齿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大夫问。

“一颗倒霉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他走到码头尽头，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有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什么也没穿。

“快收拾收拾，跟我处理尸体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处理尸体的手续吗？”

“当然。”法官答道。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上，看看要填写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他摊开双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中。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条干净毛巾，又裹上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卧室走。

“我给您拿香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边应和边看了看手掌，然后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尽是鸽子毛。”他说。

他坐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浓咖啡，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穿好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

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像平时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待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他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开了灯，蚊虫像一层云雾似的把神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药，呛得他自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累得他热汗淋淋。他脱下黑袍子，换上平时穿的那件打补丁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趁这个工夫把葱头切成细长条。然后，他把食物通通倒在一个盘子里，里面盛着午饭吃剩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冷米饭。他端着盘子来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神父用餐刀把食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起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仔细地咀嚼着，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粒米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堂区档案。屋角放着一把高背藤摇椅，椅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挂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卧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憋闷。他打开一包番石榴做的甜饼，又倒了满满一碗水，一边吃甜饼一边直勾勾地瞧着日历。吃一口，喝一点水，目光始终盯在日历上。最后，他打了个嗝，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书房进餐，每天丝毫不变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他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妥。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了她，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最好还是在奶酪里掺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喑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刺啦声，最后是以尖厉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今晚有电影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答道，“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摆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

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又关了教堂里的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于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他又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片刻之后，神父坐在书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齐胸以上的扣子都解开，把信纸、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兜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叩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座位上的灰

尘，叉开两腿坐下来。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会。”

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以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死了人的小镇上的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啊。”

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都换了人啦。”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以来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上个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很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只是在想，这间书房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

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真拿您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书房。

“简直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门闩，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入沉思。这时候，喇叭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地面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但在这之前，他又重新读了读最后一段，然后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冬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

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女人欢爱的时候，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这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待会儿我来收拾。”

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作一团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前去找一条干净的内裤。等他回来，他的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他的女人咯咯咯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的男人了，呵呵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稣！”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着哪！”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

她咯咯笑着跑进盥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口。他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澄澄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

铺门前，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挠了挠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种药最好？”

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头天晚上别喝酒最好。”

码头上，有几个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匿名帖。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女人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帖子，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牝牛，被人穿上鼻环直往台球厅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台球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拿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边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

“又出事了？”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

“大伙儿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

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账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贴匿名帖？”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疼。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却还没有觉出早晨带给人的不适。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那儿煺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档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煺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饭店的厨娘。虽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前。

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屋，在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公正之神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制的长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办公桌，还有一个书架，书上积满尘土，另外有一台打字机。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秃顶胖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办公桌上的灰尘。“要是不把鼻子遮上点儿，准得咳嗽。”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接着把抽屉一个个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和一红一蓝两支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此时此刻的光线下法官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了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木栅另一边走去，指着打字机继续说。他一面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木栅上，举起掸子当枪一样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像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里面咚咚直跳。秘书解下手帕，把掸子挂在门后，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了口，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蜷缩在办公桌上。

“您不太舒服吗？”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台球厅去要一片止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什么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熄了。”

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熄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双好鞋再来上班。”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跟秘书谈起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个个漫长的礼拜天都是在海滨度过，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不太灵便了，却愈发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秘书显得不太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说道：“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他热得筋疲力竭，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有尽头。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像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勉力支撑着，又提到匿名帖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哪。”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法官听着秘书的讲述，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破解这些案件。“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经典作家们发现了生活的一条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登完记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死在了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浑身的骨节咔吧咔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

“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睨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的树叶。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我发誓把这一切通通忘掉。”

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抓住那个张贴匿名帖的人。他听见房子前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思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还真灵验。罗贝托·阿希斯尽管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

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的事了。

“心里有事最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在这栋宽敞昏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中，他听见隔壁屋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呼呼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待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他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开的水里。他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被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它的心脏恐怕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悚。心底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她一整天都闹着头疼。”

他的房间和母亲的房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相连。从走廊上望去，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个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迹。她嘟嘟囔囔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了。”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

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不值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卧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了。”他说。

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边说边把浓密的铁青色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穿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小鸟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穿过堂屋，送她去上学。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破旧的藤摇椅上。刷过浆的洁白的墙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像阿希斯家的人。”她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上说的正是人们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的人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像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通通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是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教人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儿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伙儿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道，“现在倒好，人们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准备要结婚，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使劲地保守秘密就好了。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寡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

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天气凉快下来。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的啁啾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像人造珍珠一样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道：“你也吃两粒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服下两粒药，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说道：

“这个镇倒霉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斯也经历过这样绝望的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戴过一次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才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用猎枪打死的是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她，一边手淫。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陡峭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呢？”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筋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铁门闩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另外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头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他被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警察最后说。

“你们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铁甲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待在家里。”

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他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得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

“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医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壮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像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他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的，”神父坚持道，“我可以去找牙医说说。”

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下，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忏悔。礼拜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他开始在房间里喷洒杀虫药。神父在口袋里摸着手帕，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他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捋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道：

“咱们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然后他从衣袖里找到手帕，擦了擦被杀虫药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样做等于教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帕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喷药。等镇长喷完，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道。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神父咕咕哝哝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您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说完，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寄信。

“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望着正在下楼的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

邮电局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局长用舌头把邮票洇湿了，又去翻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辞就走了。

局长还在翻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然后，他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霉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了？”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了？”神父说，“这还不明白，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角落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去买砒霜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

书房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书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的事，神父。”

她像给小孩讲神话故事似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情绪。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的事。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心想：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你看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像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时候，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

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天气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放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

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堂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说完，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了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撒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

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冒出来的。在憋闷的房间里，檀香味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于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体力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一只仿佛透明的纤手，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会使您前功尽弃。”

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趁这个空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太有利。”

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接着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

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即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待到最后一分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啊。”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堂区任职。我可不愿意像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堂区里，死鸟像暴雨一样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正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哪。”

几位太太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堂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他整整一百岁了。”

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礼拜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嚼着止痛片。

直到礼拜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把一切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

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1]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而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袋顶上的头发不住地脱落，脖梗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地快。

每到礼拜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了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子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谈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双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呗。”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被堂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霉，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装，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新闻，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名单。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餐厅，屋里显得越发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不停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商人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木头搭的破旧不堪的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前往马孔多谈判停战协议的途中，曾在这个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过来。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过两个小孩，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和其他家什。

镇长走到门口，喝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堂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堂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他点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餐厅，走到大门口，又转身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正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

“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大通。

“你们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早又发现匿名帖了。”

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颧骨高高的中年妇女便嚷嚷着出了牢房。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了！”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们听见，还要让全镇人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水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听到大海的喧嚣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像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出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啼声不断，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到广场上东拉西扯，有的在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周围，有的坐在路旁斑斑驳驳的花

岗岩长凳上。安赫尔神父心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这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但是他想，这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自我辩解一样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的脑袋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

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

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子以后，他的心境大变。他蓦然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把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红色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像是泥泞的乱草堆。他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

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样。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他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张小皮凳，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厘米的地方有一张庞大而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

他把一张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了。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像只猫似的呼呼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

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

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医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道，“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

趁着这阵子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睑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吧。”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样，什么也干不了。”说着，镇长站起身来，打开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礼拜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房间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好睡一觉。可还不到八点，他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他在广场周围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他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他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会儿工夫，堂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越大越好。”

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梗粗壮又红润的家伙准在幸灾乐祸。

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堂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里面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菜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把汁嘬出来。治淤血红肿那是再好不过了。”他把几粒菜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堂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像舅父给外甥叠纸鸟一样。包好纸包，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搭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莫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黏糊糊的，还一个劲儿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蹬上靴子，在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三人当中，第一个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穿着军服，没有系扣，也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队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出来的一刹那，他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唰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医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水，两手插在雨衣兜里，静静地站在那儿。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医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透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医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应该还有一支。”镇长说。

他跟在牙医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都是，又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嘁里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位。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医。“你最好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了，”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医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而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医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牙科专用椅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下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上扣子，只觉得周围都是冷冰冰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医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医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一张纸垫着锅把，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医把锅放下，从水蒸气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医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把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医拧亮灯。被强烈的灯光乍一照，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

牙医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医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膊肘，准备动手拔牙。

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

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医轻轻地说。

镇长在那只握着拔牙钳的手上没有感觉到丝毫挣脱的意思。“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镇长和牙医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医说。

镇长松开了牙医的手腕。“应该有啊。”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医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别怕，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上麻药也不管用。”

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他全身肌肉松弛下来，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不掉。他听到牙医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医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蘸了蘸，放在拔掉牙的牙床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医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窸窣声。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小物什。钟楼里的钟敲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里去。

这工夫，牙医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整个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里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霉鬼！”镇长说。

牙医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走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要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医，“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医，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像个阴谋家一样。”牙医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一面换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为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医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医说。

---

[1]即切佩·蒙铁尔，切佩（Chepe）是何塞（Jos é ）的昵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拿起邮电局的字典查找了一会儿，他自己那本字典缺了几个字母。在Pasquino条下，字典上注着：罗马一个鞋匠的名字，以讽刺挖苦世人而著称于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法官心里想，按照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注释，往人家大门上张贴辱骂人的匿名帖，恐怕可以称作Marforio罪[1]。虽然事情搞得不清不楚，他却并不感到怅然。相反，在翻查字典的两分钟内，他多年来第一次体验到尽职的心情是多么坦然。

报务员看见阿尔卡迪奥法官把字典放回书架上，插在早已被人丢在脑后的邮政电报条例和规定的汇编当中，便停下手中正在传送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走到法官身边，一边洗牌，一边邀他再玩一次时髦的游戏：猜三张。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只是抱歉地说：“我正忙着哪。”说完，法官走到热气蒸人的大街上。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还不到十一点钟，心想这个礼拜二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利用。

镇长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法官，要同他商量一个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最近那次大选当中，警察没收并撕毁了反对党成员的选民证。如今没有办法识别镇上多数居民的身份。

“那些正在搬家的人，”镇长最后摊开两臂说，“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阿尔卡迪奥法官看得出来，镇长这双臂一张是想表示他心里不好受。其实，镇长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申请任命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就行了。秘书提出了一个更省事的办法。

“用不着任命，请他来就是了，”秘书说，“一年前不是任命过了吗？”

镇长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几个月前，有人通知他委派了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当时，他打过一个长途电话，询问应该怎样接待这位官员。上面回答说：“给他几枪算了。”如今命令又变了。镇长两手插在衣兜里，回过头来对秘书说：

“你来起草一封信吧。”

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给办公室增添了一派忙碌的气氛。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应该找点事干，可一时又想不出干什么。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掌里搓了搓，点燃起来。随后，他把椅背朝后一仰，仰到最大限度。坐定以后，他猛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开口之前，他把词句斟酌了一下，说：

“我要是您的话，就再委任一位检察官。”

没料到，镇长没有立即回答。镇长看了看表，没看清是几点钟，反正离午饭时间还早。“不知道委任检察官需要什么手续。”他冷淡地说。

“过去检察官要由镇议会任命。”阿尔卡迪奥法官解释道，“眼下是戒严时期，没有议会，您本人有权任命检察官。”

镇长一边听着，一边在信上签了字，连看也没看，接着发表了一些看法，表示很有兴趣。但是，秘书对他的上司建议的任命手续，从

伦理学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阿尔卡迪奥法官仍然坚持说，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办法。

“说得有理。”镇长说。

镇长摘下军帽，当扇子扇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前额上留下一道帽子印。从镇长扇风的架势来看，他还在琢磨这件事。法官用小指上细长弯曲的指甲掸掉烟灰，又等了一会儿。

“有合适的人选吗？”镇长问。

显然，他这话是对秘书说的。

“人选嘛……”法官闭着眼睛重复道。

“我要是您，就委派一个正直的人。”秘书说。

法官听出了秘书话里有话。“那当然，那当然。”说着，他一会儿看看镇长，一会儿又看看秘书。

“你有没有人选？”镇长问。

“我还没想出来。”法官沉思着说。

镇长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你再想想，”他说，“等水灾过去，咱们再来解决检察官的问题。”秘书俯身在打字机上，听到镇长的脚步声走远才直起腰来。

“简直是个疯子，”秘书说，“一年半以前，他们用枪托把检察官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现在又到处找人，送人官做。”

法官一挺身站了起来。

“我得走啦，”他说，“你这些话，听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可别倒了我的胃口。”

法官离开了办公室。秘书是个迷信的人，他觉得今天中午有点不吉利。就连上锁他也觉得像是干一件什么犯忌的事。锁好门，他连忙逃出来。在邮电局门口，秘书赶上了阿尔卡迪奥法官。法官很想弄清楚，“猜三张”的窍门是不是可以用在打扑克牌上。报务员不肯把秘密说出来。磨到最后，他只同意反复不断地玩几次，看阿尔卡迪奥法官自己能不能瞧出点名堂。秘书也在一旁观看，终于看明白了。最后那三张牌，阿尔卡迪奥法官连看也不看。他知道，随便怎么挑老是那三张，报务员用不着看就还给他，一猜就中。

“跟变戏法一样。”报务员说。

这时，阿尔卡迪奥法官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穿过灼热的大街。最后，他打定主意走过去，一伸手抓住了秘书的胳臂，拉着他一起走。大街上热得像是浸在熔化的玻璃里一样。他们快步躲进人行道的阴凉地里。这时候，秘书把“猜三张”的把戏说给他听。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得让阿尔卡迪奥法官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干脆说吧，”法官突然愤愤道，“你没去调查那些材料。”

秘书迟疑了一阵，心里在琢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啊，太难了，”秘书最后说，“大部分匿名帖在天亮以前就被揭掉了。”

“这又是一出猜不透的鬼把戏，”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我可犯不上为一张没人看过的匿名帖连觉都睡不着。”

“就是，”秘书说着停下脚步，他已经到家了，“让人睡不着觉的倒不是匿名帖，而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贴一张。”

秘书搜集的材料很不齐全，可是阿尔卡迪奥法官还是想看一看。法官记下了案发日期和相关人员的姓名。七天之内案发十一起。十一个人之间毫无关系。看到匿名帖的人都说，帖子是用油漆刷子写的，蓝墨水，印刷体，大小写用得很乱，似乎是小孩子的笔迹，字母乱七八糟，好像故意写错的。匿名帖里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讲的都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法官正在做种种揣测，这时叙利亚人摩西从店里喊道：

“您有一个比索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翻了翻口袋，只有两毛五分钱，还有一枚美国硬币，那是他从大学起带在身边当护身符用的。叙利亚人拿走了那两毛五分钱。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等有了钱再付给我。”说着，他把几枚硬币当当扔进空的收银抽屉里，“快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做祈祷去。”

时钟敲打十二下的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抱着送给他女人的许多礼物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换鞋，他的女人拿起一块印花绸裹在身上，幻想着生完孩子以后穿上新衣服该是什么样子。她吻了一下她男人的鼻子。法官本想躲开，不料她突然向床上扑来，伏在他身上。两

个人谁也没动。阿尔卡迪奥法官搂住他女人的后背，感到她鼓鼓的大肚子热乎乎的，自己的后腰也一个劲儿地跳动。

她抬起头，咬着牙，喃喃地说：

“等一下，我把门关上。”

镇长一直等到最后一家安置完毕。人们花了二十个小时修好一条宽敞光洁的新马路，马路尽头是公墓的墙壁。镇长肩并肩地和居民一起干活，帮他们安放好家具。最后，他气喘吁吁地来到附近一家的厨房里。在地上临时砌起的炉子上，一锅汤哗哗地开着。镇长揭开砂锅盖，闻了闻锅里冒出的热气。炉灶旁边站着一个干瘦的女人，瞪着两只安详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看着镇长。

“做午饭哪。”镇长说。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镇长未经邀请，自己盛了一碗汤。女主人回到屋里，端出一个座位，放在桌子跟前，让镇长坐下。镇长边喝汤边用钦佩又惊讶的目光观察着这家的院子。昨天这里还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今天已经晾上衣服了，还有两头猪在泥水里滚来滚去。

“你们还可以种上点东西。”镇长说。

女主人头也不抬地说：“种什么，猪都会糟蹋光的。”接着，她用盘子盛了一块煮得半熟的肉、两块木薯、半根青香蕉，端到桌子上来。尽管拿出这么多东西，她还是尽量装出不心疼的样子。镇长笑容可掬地看着女主人的眼睛。

“嚯，够大伙儿饱餐一顿的了。”他说。

“愿上帝保佑，你吃的东西都堵在心里。”女主人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对女主人这番诅咒，镇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只顾全神贯注地吃他的饭，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也顾不上擦一擦。吃完以后，女主人收起空盘子，还是没有看他。

“你们这种态度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啊？”镇长问。

女主人态度和蔼地说：

“等到被你们杀害的亲人复活过来的时候。”

“现在情况不同了，”镇长解释说，“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而你们还……”

女主人打断他的话头说：

“换汤不换药……”

“像这么个居民区，二十四小时就建好了，这种事过去可从来没见过。”镇长固执地说，“我们是在设法把这个镇搞得体面些。”

女主人把洗干净的衣服从铁丝上取下来，拿到屋里去。镇长一直用眼睛瞄着她，只听她回答说：

“你们来以前，我们这个镇本来够体面的了。”

镇长没再等着上咖啡就站起身来。“你们可真不知好歹，”他说，“我们把地白白送给你们，你们还一肚子牢骚。”女主人没有回答。镇长穿过厨房，朝大街走去的时候，她俯身在炉灶上，嘟嘟囔囔地说：

“搬到这儿来更糟糕。死人就埋在后边公墓里，我们更忘不了你们造的孽。”

小船来到镇上的时候，镇长正打算睡午觉。天气太热，睡也睡不着。面颊已经开始消肿，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一连两个小时，他侧耳细听着河水悄悄的流动声。屋里有只知了一直叫个不停。镇长头脑里空空的，什么也想不出来。

一听到小船的马达声，他连忙脱下衣服，用毛巾擦了擦汗，换上军装，然后走过去抓知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知了，走到大街上。从等船的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着干净整齐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支塑料机关枪，挡住了镇长的去路。镇长顺手把知了送给这个孩子。

镇长在叙利亚人摩西开的店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小船靠了岸。港口里闹腾了足有十分钟。镇长觉得胃里沉甸甸的，头还有点疼。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主人诅咒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瞧着旅客们纷纷走下木头跳板。一连八个小时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小船上，这会儿都伸胳臂动腿地活动起来。

“还是老一套。”镇长说。

叙利亚人摩西告诉镇长一个消息：镇上来了个马戏团。镇长觉得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兴许是因为他看见小船顶上

放着一堆木棍子和五彩斑斓的布条吧。另外还有两个女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衣服，像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总算来了个马戏团。”镇长嘟嘟哝哝地说。

叙利亚人摩西说马戏团里有驯兽，还有玩杂耍的。镇长对马戏团另有一番想法。他伸直两腿，眼睛瞧着皮靴尖。

“咱们镇真是日新月异啊。”他说。

叙利亚人摩西停下手中的扇子，问道：“您知道，我今天卖了多少钱？”镇长没敢瞎猜，等着摩西自己来回答。

“两毛五。”叙利亚人说。

这时，镇长看到邮递员打开邮包，把信件交给希拉尔多大夫。他叫了一声邮递员。官方邮件装在另一个邮包里。镇长撕开封印一看，全是关于日常工作的通知和政府印的传单。等他看完了，码头已经变了样子，堆满了成包成包的货物、成筐成筐的母鸡以及马戏团的道具。已经是下午了。镇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

“两毛五。”

“两毛五。”叙利亚人有气无力地、一字一顿地重复说。

希拉尔多大夫瞪着两眼看着船上卸货，直到货物全部卸完。他指着一位体态矫健的女人，叫镇长注意看看。她长得真像一位圣女，两只胳臂上戴着几副手镯，躲在一把彩色的阳伞下面，似乎在等着救世主降临。镇长没有多想这位新来的女客是什么人。

“准是个驯兽女郎。”他说。

“您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希拉尔多大夫咬住他那两排像尖利的石头一样的牙齿，一字一顿地说，“她是塞萨尔·蒙特罗的丈母娘。”

镇长扭头走开了。他看看表，差二十五分四点。走到警察局门口，卫兵告诉他安赫尔神父等了他半个小时，还说四点钟再来。

镇长又走到街上，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看见牙医伫立在镶牙铺的窗口，于是走过来，问他借个火。牙医把火儿递给镇长，看了看他那还发肿的面颊。

“已经好了。”镇长说。

他把嘴张开，牙医瞅了瞅说：

“有几颗牙还得镶套。”

镇长扶正了别在腰间的手枪，斩钉截铁地说：“我会到这儿来的。”牙医面不改色地说：

“什么时候想来，就尽管来。我就盼着您把命丢在我家里，能不能如愿以偿，咱们走着瞧吧。”

镇长拍拍牙医的肩膀，快活地说：“你的愿望实现不了。”然后张开两臂说：

“我的牙可不介入党派之争啊。”

“你不打算结婚？”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叉开两条腿。“我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她说，“眼下更不用想了，我快要给他生儿子了。”安赫尔神父转过脸往河上看了看。一条淹死的大母牛从上游漂下来，牛身上落着几只兀鹰。

“这么一来，孩子不成了私生子了吗？”神父说。

“那倒无所谓，”女人说，“阿尔卡迪奥待我很好。要是我逼着他跟我结婚，以后他就会感到受拘束，会跟我闹别扭。”

她脱掉了木屐，说话的时候，两膝左右分开，脚趾踩在小凳的横档上。怀里抱着把扇子，两只胳臂捂住隆起的肚子。她看到安赫尔神父没有吱声，又重复说：“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堂萨瓦斯花了二百比索把我买下来，在我身上榨了三个月的油，然后把我扔到大街上，连根别针也不给。要不是阿尔卡迪奥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说着，她第一次看了看神父。

“也许早就沦为娼妓了。”

六个月来，安赫尔神父一直坚持要她结婚。

“你应该逼着他同你结婚，组织起家庭，”他说，“照目前这样混下去，不光你自己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还会给镇上开个不好的先例。”

“正大光明的，怕什么，”她说，“别人还不是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关了灯干的。您没看过匿名帖吗？”

“那都是胡说八道，”神父说，“你可要规规矩矩地过日子，不要惹得人背后议论。”

“我？”她说，“我可不怕什么背后议论。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公开的。您看，没有人浪费时间给我贴匿名帖，这就是证明。相反，所有住在广场周围的体面人，没有一个不上匿名帖的。”

“你真蠢，”神父说，“不过，上帝让你交好运，找到个疼你的人。为了这个，你也应该结婚，建立一个正式的家庭。”

“这些事我不懂，”她说，“不管怎么说，照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总算有个地方住，也不愁饭吃。”

“假如他把你遗弃了呢？”

她咬咬嘴唇，神秘地笑了笑，回答说：

“他不会遗弃我的，神父，我心里有数。”

安赫尔神父还是不以为然。他劝这个女人至少要去望弥撒。她回答说，最近几天一定去。神父继续朝前溜达着，等着和镇长约会的时间到来。一个叙利亚人对他说：“今天天气真好。”神父没有听见，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戏团的活动。下午阳光明媚，马戏团的人往岸上搬运那几只焦躁不安的驯兽。神父在那儿一直待到四点钟。

镇长看见安赫尔神父朝他走来，就和牙医告别了。“真准时！”说着，他和神父握了握手，“都挺准时的，天倒也没下雨。”神父鼓了把劲儿，爬上了警察局直上直下的楼梯，顺口回了镇长一句：

“天也没塌下来。”

过了两分钟，神父被带进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里面在做忏悔的时候，镇长就坐在走廊上，回忆着马戏团的表演。一个女演员用牙齿咬住一根带子，把身体悬在五米高的空中，一个男演员穿着绣金线的天蓝色衣服，不停地敲着小鼓。半个小时后，安赫尔神父从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里走出来。

“忏悔完了？”镇长问。

安赫尔神父愤愤地看了他一眼。

“你们在犯罪，”他说，“这个人五天没吃饭了。亏了他身子骨结实，才没死。”

“那是他自己乐意。”镇长若无其事地说。

“不对，”神父镇定而有力地说，“是您下令不给他饭吃的。”

镇长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当心点，神父。忏悔可要保密，您别违反了这一条。”

“这不是他在忏悔里说的。”神父说。

镇长一挺身站起来。“您别为这事发火，”他换了副笑脸说，“既然您这么关心他，现在就来补救一下。”镇长叫来一名警察，命令他到饭店去给塞萨尔·蒙特罗打饭。“给他弄一整只肥鸡，一盘土豆，一大盘凉菜。”他回过来又对神父说：

“这顿饭由镇政府出钱，神父。您看见了吧。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

安赫尔神父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打发他走？”

“小船明天走，”镇长说，“只要他今天晚上能够明白过来，明天就可以走。我只想教他明白一件事，我是为他好。”

“您这份好心未免要价太高了吧。”神父说。

“对有钱的人，还能白帮忙？”镇长说，两眼紧紧盯着安赫尔神父那双清澈的蓝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希望您能帮助他弄清这些事理。”

安赫尔神父没有搭腔。他走下楼梯，从楼梯平台上哑着嗓子向镇长告别。这时，镇长穿过走廊，没敲门就进了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牢房很简陋，只有一个脸盆和一张铁床。塞萨尔·蒙特罗躺在床上，蓬头垢面，身上穿的还是上礼拜二离开家时穿的那身衣服。听到镇长进来，他没有动弹，连眼皮也没抬。“你跟上帝已经结完账了，”镇长说，“现在该跟我结结账了。”他把藤椅挪到床边，两腿骑着椅子坐下去，前胸靠在椅背上。塞萨尔·蒙特罗聚精会神地望着屋顶的大梁。他嘴唇翕动着，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半天了。看起来，他一点也不焦急。“你我之间就不必兜圈子了，”塞萨尔·蒙特罗听见镇长这么说，“明天你要走了。碰巧你走运，过两三个月会来一位专案调查员。我们的责任是向他汇报情况。再过一个礼拜，他乘船回去，一定也会认为你干了一件蠢事。”

镇长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塞萨尔·蒙特罗依然是那样无动于衷。

“事过之后，你至少要付给法院和律师两万比索。假如专案调查员告诉他们你是百万富翁的话，兴许你付的还要多。”

塞萨尔·蒙特罗把头转过来冲着镇长。尽管他的动作很小，床上的弹簧还是嘎嘎直响。

“不管怎么样，”镇长用关切的语气说，“顺利的话，公文转来转去，起码得两年。”

镇长觉察出塞萨尔·蒙特罗在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当塞萨尔·蒙特罗把目光落在镇长的眼睛上时，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不过口气变了。

“你的一切全都捏在我的手里，”他说，“上边有命令，叫我们结果了你，叫我们设个埋伏杀死你，把你的牲口全部没收。政府要拿这笔钱支付全州大选的庞大开支。你也知道，别处的镇长可都照办了，只有我们这儿没照命令办事。”

这时候，他开始注意到塞萨尔·蒙特罗在思索什么。他叉开两腿，把胳臂支在椅背上，心想，虽然塞萨尔·蒙特罗没有说出来，但心里一定在骂他。于是，他说：

“你花的那些救命钱，连一个锄子也落不到我手里，所有的钱都将花在选举上。眼下新政府决心让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拼死拼活地干，挣的还是那几个钱。可你呢，躺在钱堆上都不知道怎么花好。你的生意干得挺不错。”

塞萨尔·蒙特罗吃力地慢慢站起来。他一站起来，镇长立即觉得他简直是一头庞大的猛兽，而自己在他面前却成了个可怜虫。镇长的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他看着塞萨尔·蒙特罗走到窗口。

“你这辈子最好的一笔生意……”镇长喃喃地说。

窗户正对着小河。塞萨尔·蒙特罗认不出这条河了。小河变了，镇子也变了。“我愿意帮你的忙，”他听见镇长在背后说，“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是个名誉问题。不过，你把匿名帖撕了，干了件蠢事。再要证明你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可就不大容易了。”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钻进了牢房。

“是死牛味儿。”镇长说，“准是堵在什么地方了。”

塞萨尔·蒙特罗还是站在窗户跟前，似乎没有闻见这股恶臭。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码头上停泊着三条船。船员们在挂吊床，准备睡觉。等到明天早上七点钟，码头上会是另一番景象：人群要闹腾上半个小时，等着看押解犯人上船。塞萨尔·蒙特罗叹了口气。他把两手插进衣兜里，口气坚决又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想法概括为三个字：

“多少钱？”

镇长当即回答说：

“五千比索，用一岁的牛犊来付。”

“我再加五只，”塞萨尔·蒙特罗说，“今天晚上电影散场，你立刻用快艇把我送走。”

[1]“匿名帖”在西班牙语里是Pasquin，该词来自Pasquino。罗马人把一尊雕像称为Pasquino，常在雕像底座上张贴哑谜，而在另一尊称为Marforio的雕像底座上贴出谜底。

小船拉响汽笛，在河中心转了个圈子。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和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妇女们，最后一次目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和她母亲离开小镇。罗莎莉奥坐在一只铁箱上。七年前，她就是带着这只铁箱在小镇下船的。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站在诊所窗前刮脸。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罗莎莉奥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

罗莎莉奥来到小镇的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看见她身穿破旧的师范学校校服，脚上套着一双男式鞋，在码头上逢人便问：谁肯少要几个钱帮她把箱子运到学校去。看样子，她好像要在镇上默默无闻地过上一辈子。据她自己讲，当时有十一个人找工作，可是只有六个职位。他们就在一顶帽子里抓阄。她在纸团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了以后，她住进学校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洗脸盆。空闲时，她一边在煤油炉上煮面糊粥，一边绣台布。那一年的圣诞节，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塞萨尔·蒙特罗。塞萨尔·蒙特罗是一个来历不明、野性未退的单身汉。他靠伐木发了财，住在野狗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才到镇上来一趟。他不修边幅，平时穿着一双后跟挂铁掌的靴子，背着一支双管猎枪。满脸肥皂沫的希拉尔多大夫在想：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中了彩。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扑鼻而来，打断了他的回忆。

小船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一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里。

“他妈的，还在那儿！”镇长从卧室的阳台看到兀鹰朝四下飞开，大声喊道，“倒霉的母牛！”

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卧室，把阳台的门关上。屋里也是臭烘烘的。他把镜子挂在钉子上，帽子也没摘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刮脸。脸颊还有些发肿。过了不大一会儿，马戏团老板叩响了屋门。

镇长刮着脸，从镜子里看到马戏团老板，让他坐下。老板上身穿着一件黑格衬衣，下身是马裤，裹着绑腿，手里拿着马鞭，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膝盖。

“有人告你们的状了，”镇长一边用剃刀刮完闹牙疼那两个礼拜留下来的乱蓬蓬的胡楂儿，一边说，“就在昨天晚上。”

“怎么说的？”

“说你们鼓动孩子们偷猫。”

“没那回事，”老板说，“那些猫是我们花钱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可管不着。狮子老虎，总得喂食呀。”

“喂活的？”

“啊，不，不，”老板连忙说，“喂活的，就会兽性发作的。”

镇长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转过来瞧着马戏团老板。他发现老板几乎每个手指上都带着戒指，上面镶着五光十色的宝石。

“你得另想办法，”他说，“比如，打几条鳄鱼，或者捞点这会儿没有人要的鱼。总之，喂活猫可不行。”

老板耸耸肩，跟在镇长后面来到大街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码头上闲扯。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

“这帮人，没有一点男人气！”镇长高声喊道，“就会像老娘儿们一样，凑到一块儿瞎吵吵。昨天下午就该找几个人把死牛拽出来。”

这时候，有几个人围拢过来。

“谁要是在一小时之内把两只牛角拿到我的办公室，我就给谁五十比索。”镇长出了个价钱。

码头边上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人声。有几个人听完镇长的话，立刻纷纷跳上木船，一边解缆绳，一边大呼小叫地互相挑战。“一百个比索，”镇长也来劲了，把赏钱增加了一倍，“每只牛角五十比索。”他把老板一直带到码头边上。他们俩眼瞅着走在前面的几只船开到了对岸的沙丘。这时，镇长回过头来冲着老板笑了笑。

“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他说。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镇长接着说，“人们没活干，就爱胡思乱想。”一群孩子慢慢地围上来。

“马戏团就在那儿。”老板说。

镇长拉着老板的胳臂来到广场。

“演些什么节目？”他问。

“什么都有，”老板说，“有给孩子看的，有给大人看的，样样俱全。”

“这还不够，”镇长说，“还得让大家能看得起。”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老板说。

他们一起来到电影院后边的空地上。那儿正在搭帐篷。几个神色忧悒的男人和女人正从铜皮镶花的大箱子里往外拿道具和彩带。镇长跟着老板穿过挤作一团的人群和杂乱的物件。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心里觉得仿佛来到难民营似的。一个体魄健壮、举止泼辣、镶着满口金牙的女人和他握完手，又给他看手相。

“你啊，前途未卜啊。”她说。

镇长连忙把手抽回来，感到有些晦气。老板用鞭子轻轻拍打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臂，说：“别打扰中尉了。”他边说边走，护着镇长来到停放驯兽的空地深处。

“您相信这一套吗？”老板问道。

“很难说。”镇长说。

“她们那一套，我可不相信，”老板说，“干我们这行的，干长了就光信人力，不信天命。”

镇长观赏着那几只热得犯困的驯兽。笼子里散发出一股酸不溜丢的热气。驯兽一下一下地喘息着，显得挺憋闷。老板用鞭子抚了抚那只哼哼唧唧撒娇的小豹的鼻子。

“叫什么名字？”镇长问。

“亚里士多德。”

“我问那个女的。”镇长说。

“噢，”老板说，“我们管她叫卡桑德拉，善卜吉凶祸福。”

镇长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和她睡一觉。”他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说。

蒙铁尔寡妇拉开卧室的窗帘，咕咕哝哝地说：“可怜的人啊！”她把床头柜收拾好，把念珠和祈祷书放到抽屉里，又在床对面地上铺的老虎皮上蹭了蹭拖鞋，随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给梳妆台、大衣柜的三个门和放着圣拉法埃尔石膏像的小方柜上好锁。最后，她锁上了屋门。

她从铺着雕花细砖的宽楼梯上走下来，心里想，罗莎莉奥·德蒙特罗真是命苦。刚才她从阳台的缝隙处望出去，看见罗莎莉奥走过码头的拐弯处，走起路来头也不回，还是一副学生模样。当时，她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件什么事，很早以前已经进入尾声，如今终于结束了。

刚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院子里那一派农村集市的景象便映入眼帘。楼梯栏杆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用碧绿的叶子包好的奶酪。

再过去一点，外面的走廊上堆放着装盐的麻包和盛蜂蜜的蜜囊。最里面是牲口圈，有骡子有马，横木上放着马鞍子。满院子都是刺鼻的牲口味，还夹杂着鞣皮厂和榨糖厂的味道。

寡妇来到办公室，向卡米查埃尔先生问声好。卡米查埃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核对账本，把一沓沓的钞票分开。她打开临河的窗户，九点钟的阳光照射进来。屋里到处是廉价的摆设，还有罩着灰布椅套的安乐椅和一张围着黑纱的放大的何塞·蒙铁尔的遗像。寡妇还没看见河对岸沙滩上的小船，先闻到一股腐肉的臭味。

“对岸出什么事了？”她问。

“正在往外拽一头死牛。”卡米查埃尔先生答道。

“敢情是这么回事！”寡妇说，“昨天一夜我连做梦都闻到这股味。”她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工作的卡米查埃尔先生，又接着说：“现在就差来一场洪水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着头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可不是吗，”寡妇表示同意，“现在末日已经到了。咱们得赶快找块安静的向阳的墓地，躺在里面等死吧。”

卡米查埃尔先生洗耳恭听，没有打断她的话。“几年前我们还抱怨说镇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寡妇继续说，“现在悲剧倏地来了，仿佛上帝安排好了，让多少年没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都冒了出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从保险柜那边扭过头来看了看蒙铁尔寡妇，只见她两肘撑在窗台上，眼睛凝视着对岸。她身穿一件长袖黑衫，用嘴咬着手指甲。

“等雨过天晴，事情就会好起来的。”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好不了，”寡妇预言道，“祸不单行。您没看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见着她了。“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他说，“一个人要是听信匿名帖，早晚得发疯。”

“唉！匿名帖呀！”寡妇叹了口气。

“人家也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惊愕地朝办公桌走过来。

“给您贴了？”

“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肯定地说，“上礼拜六，给我贴了一大张匿名帖，内容还挺全，像电影海报一样。”

寡妇把椅子挪到办公桌前。“真卑鄙，”她大声说，“像您那个模范家庭，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点也不吃惊。

“我老婆是白人。我的孩子各种肤色都有，”他解释说，“您想想看，我有十一个孩子哪。”

“这是很自然的啊，”寡妇说。

“那张匿名帖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堂切佩·蒙铁尔也被卷进去了。”

“我丈夫！”

“您的丈夫，还有另外四位太太的丈夫。”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呜咽起来。“幸亏我的女儿离这儿很远，”她说，“她们都说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光天化日屠杀学生的野蛮国家来。我告诉她们说，做得对。让她们永远留在巴黎。”卡米查埃尔先生把椅子转了一下，他知道，每天令人感到棘手的事又开始了。

“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

“刚好相反，”寡妇抽抽搭搭道，“第一个卷铺盖离开镇子的，准得是我。这些土地，这些整天忙不过来的营生都得丢下。要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儿，还不会有眼前这场悲剧。不，卡米查埃尔先生，我可不愿意抱着金盆气得大口吐血呀。”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算宽慰她两句。

“您要把担子担起来，”他说，“这笔财产可不能随便扔掉呀。”

“金钱是魔鬼的臭屎。”寡妇说。

“可是您家的钱也是堂切佩·蒙铁尔艰苦创业的结果啊。”

寡妇咬了咬手指头。

“您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寡妇回答说，“这笔钱不是好来的。为了这点臭钱，何塞·蒙铁尔第一个遭了报应，临死的时候，连忏悔都没来得及做。”

这句话，她说了不止一次了。

“要说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指着镇长高声喊道。这时候镇长正拉着马戏团老板的胳臂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可是赎罪呢，全落到我身上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离开了寡妇。他把用橡皮筋捆好的一沓沓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站在门口，按字母顺序叫着长工们的名字。

每逢礼拜三，长工们领一次工资。蒙铁尔寡妇听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理睬他们的寒暄。她独自一人住在这所有九间房屋的阴森森的宅院里。格兰德大妈就死在这里。何塞·蒙铁尔买下这所宅院时，万万没想到他的遗孀会在这儿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夜深人静的时候，蒙铁尔寡妇到空房里喷洒杀虫药，时常看见格兰德大妈在走廊里捉虱子，于是她就问格兰德大妈：“我什么时候死呢？”同阴间的这种交谈徒然增加了她的不安，因为所有死者的回答都是笨拙而自相矛盾的。

十一点钟刚过，寡妇眼含泪花地望见安赫尔神父穿过广场。“神父，神父。”她喊道，仿佛觉得这样一喊就可以解脱似的。但是，安赫尔神父没有听见。神父敲了敲对面人行道上阿希斯家的大门。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神父迈步走了进去。

走廊上一片小鸟的啁啾声。阿希斯寡妇躺在一把帆布椅上，脸上蒙着一块浸过花露水的手帕。从敲门的动静中，她知道来的是安赫尔

神父。又待了一会儿，直到听见神父的问候，她才把手帕拿下来。由于失眠，她的神情显得十分疲倦。

“请您原谅，神父，”她说，“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

神父忽略了人家是请他来吃午饭的。他十分不安地表示歉意，连说今天早上有些头疼，趁天还不太热赶忙穿过广场来到这里。

“没关系，”寡妇说，“我只想告诉您，您进来的时候，我正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神父从衣兜里掏出一本散了页的每日祈祷书。“要不然您再休息一会儿，我来做做祈祷。”他说。寡妇表示不用了，说道：

“我已经好了。”

她闭着眼睛走到走廊的尽头，回来的时候，很利落地把手帕放在折叠椅的扶手上，等坐到安赫尔神父对面时，她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神父，”她态度诚恳地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安赫尔神父把每日祈祷书装进衣兜里。

“我愿意为您效劳。”

“还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事。”

罗贝托·阿希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匿名帖的事置之脑后。昨天临走的时候，他说礼拜六以前不回来了。可是当天晚上，他突然回到家里，一直待在漆黑的屋子中，坐到天色微明，等着他老婆的“情夫”。后来，他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安赫尔神父惶惑不解地听她诉说着。

“这件事毫无根据。”他说。

“您不太了解阿希斯家的人，神父，”寡妇回答说，“他们都爱想入非非。”

“我对匿名帖的看法，蕾薇卡是知道的，”他说，“您看，我是不是再同罗贝托·阿希斯谈一谈。”

“千万可别谈，”寡妇说，“那等于是火上浇油。不过您要是在礼拜天布道的时候谈一谈匿名帖的事，我想罗贝托·阿希斯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安赫尔神父摊开双臂。

“那怎么行啊，”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不是小题大做吗？”

“防止犯罪比什么都重要。”

“您认为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岂止是这样认为！”寡妇说，“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阻止不了他犯罪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汁。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像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

他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

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待在内院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聆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读着，一点味道都没有，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始终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算是一个长的短篇小说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

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小长篇，”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的短篇。”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个短篇，但写得很长。”

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令她显得比大夫年长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的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他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像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阴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知了的叫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消失散尽，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饭店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邮电局。报务员趁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太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有雨，但在起草完电报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

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的女报务员传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R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这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留出一个小时给堂萨瓦斯看病。堂萨瓦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腰部以上裹着毛巾被。

“糖块好吃吗？”大夫问。

“是天气太热闹的，”堂萨瓦斯抱怨说，把他那像老太婆一样臃肿的身躯转向屋门，“午饭后，我打过一针。”

希拉尔多大夫在窗前的桌子上打开药箱。院子里知了叫个不停，屋里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堂萨瓦斯坐在院子里费劲地挤出一点

尿。大夫用试管取了琥珀色的尿样。病人觉得松快些了，一边看着大夫化验，一边说：

“大夫，您多费心吧，在知道这本小说的结局以前，我还不打算离开人世。”

希拉尔多大夫把一片蓝色的药片放进尿样里。

“什么小说？”

“匿名帖。”

堂萨瓦斯用温顺的目光瞅着大夫把试管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加热。大夫嗅了嗅，病人用混浊无光的眼睛等待着他的答复。

“正常。”大夫说着把尿样倒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问堂萨瓦斯：“您也惦记着这件事？”

“我不惦记着，”病人说，“不过，我跟日本人一样，看见别人害怕就特别开心。”

希拉尔多大夫准备给他做皮下注射。

“还有，”堂萨瓦斯接着说，“前天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还是那些混账话，什么我的孩子啊，什么毛驴的故事啊。”

大夫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堂萨瓦斯的血管。病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毛驴的故事。看来大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得从头至尾讲一讲。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笔贩卖毛驴的生意，”他说，“赶巧到第三天清晨卖出的驴通通死了，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

他伸出肥肥胖胖的胳臂，让大夫抽血。希拉尔多大夫拔出针，用棉花按住针眼，堂萨瓦斯把胳臂缩了回去。

“您猜，人们编了个什么故事？”

大夫摇摇头。

“说我夜里亲自钻进各家的菜园子，用手枪捅进驴屁股里，把驴通通打死了。”

希拉尔多大夫把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里。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挺像真事的。”他说。

“不，其实是蛇咬的。”堂萨瓦斯说。他坐在床上活像一尊东方的神像。“不管怎么说，把众所周知的事写成一张匿名帖，干这种事的人准是个胆小鬼。”

“匿名帖的特点一向就是如此，”大夫说，“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差不多也都是事实。”

堂萨瓦斯蓦地感到一阵不舒服。“是啊！”他喃喃地说，用床单擦了擦肿眼泡上的汗水，旋即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咱们这个地方，谁想发财不得杀上三五头毛驴啊。”

大夫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弯腰洗手。从脸盆的水里，他看到自己的面影，牙齿长得这样整齐，简直不像天生的。他用鄙夷的目光斜睨了病人一眼，说：

“亲爱的堂萨瓦斯，我一向认为，您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

病人一听这话大为兴奋。大夫的詈骂反而使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除此之外，还有旺盛的性欲。”他边说边把胳臂一伸一屈。他大约是要借此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但是在大夫看来，这恰好表现出他的恬不知耻。堂萨瓦斯颠了颠屁股。

“所以一看到那些匿名帖，我简直要笑死了，”堂萨瓦斯接着说，“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这一带糟蹋了多少多少黄花闺女，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希拉尔多大夫临走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些乌七八糟的风流事。

“啊，幸福的青春时代哪，”病人最后喊道，“在那种好年月里，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还顶不上一头小牛犊的价。”

“老想这些，您的血糖还得升高。”大夫说。

堂萨瓦斯吓得目瞪口呆了。

“恰恰相反，”他反驳道，“比起倒霉的胰岛素针来，这要好得多。”

大夫走到大街上，心想堂萨瓦斯动脉血管里的血液一定像粥一样黏稠。不过，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匿名帖。几天前，他在诊所里听到一些传言。今天下午从堂萨瓦斯家出来，他发觉这一个礼拜，耳朵里没听见别的，只有匿名帖这一件事。

接下去，他又去好几户人家出诊。每一家都和他谈起匿名帖的事。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大夫朝诊所走去。安赫尔神父刚从蒙铁尔寡妇家出来，一声喊叫打断了大夫的思路。

“您的病人怎么样，大夫？”安赫尔神父问。

“都还不错，神父，”大夫答道，“您的病人呢？”

安赫尔神父咬了咬嘴唇，拉着大夫的胳臂走进广场。

“您干吗要问这个？”

“不知道，”大夫说，“听说您的病人当中正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安赫尔神父有意把话题岔开，大夫也看出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刚和蒙铁尔寡妇谈完话出来，”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神经紧张得承受不住了。”

“八成是良心发现吧。”大夫像是给病人诊断似的说。

“她整天提心吊胆，要死要活的。”

两个人的家本来在相反的方向，但是安赫尔神父还是陪着大夫向诊所走去。

“说正经的，神父，”大夫接着刚才的话题道，“您对匿名帖怎么看？”

“我没有想这些，”神父说，“要是非说不可，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

“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希拉尔多大夫反驳说。

他们在诊所门前停下脚步。安赫尔神父慢慢地扇着扇子说：“不要小题大做了。”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希拉尔多大夫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有点失望。

“神父，您怎么知道匿名帖上说的没有一点真话呢？”

“我会从别人的忏悔中知道的。”

大夫冷冷地瞅了瞅他的眼睛。

“要是您从忏悔中还了解不到真情，那事情可就更严重了。”他说。

当天下午，安赫尔神父在穷人家里也听到他们议论匿名帖的事，但他们的态度不同，甚至感到挺痛快。做祷告的时候，神父有点头疼，他估计是中午吃肉丸子撑的。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味道。饭后，他找出电影审查目录，一连敲了十二下钟，表示绝对禁止看电影。这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体验到什么是虚荣心。最后，神父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他索性把小凳靠在临街的大门上，拿定主意要当众查明哪些人敢违抗他的告诫进入电影院。

镇长走进电影院。他在池座的一个角落里坐好，电影开演前，他先抽了两支烟。牙床已经完全消肿了。但是他一想起前几天夜里的那番折腾，以及服用大量止痛片的那股难受劲，浑身还是怪不舒服的，抽完烟后觉得有点恶心。

电影院本来是一个空场子，现在四周垒起水泥墙，锌皮屋顶遮住了池座的一半。地上的青草仿佛每天早晨都重新发芽滋长似的，肥料就是观众丢下的香烟头和口香糖。一时间，镇长觉得未经刨光的木凳以及前排座位和走道之间的铁栏杆似乎在眼前不住地浮动。最里边的墙上涂了一片白色权当银幕。那银幕好像也在飘动着，令人头晕目眩。

熄灯后他觉得好了一些。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停止了。放映机旁那间小木房里发电机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

在正片之前，先放了几张宣传性的幻灯片。人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在昏暗中乱哄哄地闹了几分钟。镇长猛然想到，这样偷偷摸摸地到电影院来，不啻是在对抗安赫尔神父的严格规定。

电影院老板从镇长身边走过，单凭那股香水味，镇长也能把他认出来。

“你这个强盗，”他一把拉住老板的胳臂悄悄地说，“你得交一笔特别税。”

老板嘿嘿笑了一声，坐在邻近的座位上。

“这是部好电影。”他说。

“对我来说，”镇长说，“我宁愿所有电影都是坏的。那些道德说教片最让人讨厌。”

前几年，谁也不会认真对待教堂的警告钟声。但每到礼拜天大弥撒时，安赫尔神父就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指出本周有哪些妇女公然违抗他的告诫，并把她们赶出教堂。

“后边的小门是我的救星。”老板说。

镇长正在看那部老掉牙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有意思的地方，他就把话停一停。

“反正是那么回事，”镇长说，“穿短袖衫的妇女，神父一律不给发圣餐。可女人们还是穿短袖衫，只是在进教堂望弥撒之前，套上一副假袖子。”

新闻片之后，放映下周电影的简介。两个人一声不吭地看着。放完了，老板往镇长身边凑了凑。

“中尉，”他低声说，“您出面买下来吧！”

镇长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

“这生意可不好做呀。”

“我是不行，”老板说，“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笔大财。事情明摆着，神父不会用敲钟来找您的麻烦。”

镇长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我看行吧。”

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详谈。镇长把脚伸到前排的凳子上，被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看完之后他心想，冲这种片子，连敲四下钟也不值得。

从电影院出来，镇长在台球厅待了一会儿，那儿正在玩抓彩。天气很热，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蹩脚的乐曲。镇长喝了一瓶矿泉水，回去睡觉了。

他悠闲自在地沿着河岸朝前走，黑暗中察觉出河水在上涨。河水哗哗地流着，散发出一股大牲畜的味道。走到家门口，他忽然朝后一跳，拔出了手枪。

“出来，”他用紧张的声音说，“不然我要开枪了。”

黑暗中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说：

“别紧张，中尉。”

他举起顶着子弹的手枪，直到藏在暗处的人走到明处来。原来是卡桑德拉。

“差点让你跑了。”镇长说。

他把她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好长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一直在拐弯抹角地说话。她坐在吊床上，一边说着一边脱鞋，天真地欣赏着染得通红的脚指甲。

镇长坐在卡桑德拉对面，拿着帽子当扇子扇，规规矩矩地和她闲扯。他抽了几支烟。时钟打过十二点，卡桑德拉趴在吊床上，伸出一只戴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胳臂，捏了一下镇长的鼻子。

“太晚了，宝贝儿，”她说，“关灯吧。”

镇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干这种事。”

她感到莫名其妙。

“你会算命吗？”镇长问。

卡桑德拉在吊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当然会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过来了，连忙把鞋穿上。

“我没带牌来。”她说。

“唱戏的还不带着行头。”镇长微笑道。

镇长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张旧纸牌。卡桑德拉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翻看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缺的那些张是好牌，”她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好在各张还能连得上。”镇长搬过来一张小桌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卡桑德拉把牌摊开。

“问爱情还是问生意？”她问。

镇长擦干了手上的汗。

“问生意。”他说。

一头没主的毛驴躲在农舍的屋檐下避雨。夜里，它老是用蹄子踢屋子的外墙，闹得人整夜不得安宁。天亮时，安赫尔神父才算打了个盹，醒来后似乎觉得满身都是尘土。晚香玉被霏霏细雨淋得无精打采，厕所里臭气熏天，早晨五点的钟声敲过后，教堂里显得阴森森的。好像所有这些都串通一气，和今天早晨过不去。

神父在圣器室里换上做弥撒的衣服，听见特莉妮达在数死了多少只老鼠。这时，和往常一样，妇女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辅祭东一个错西一个错，讲出的拉丁语粗俗不堪，神父越听越有气。最后，他的情绪沮丧极了。他这一生，每逢碰到这种倒霉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沮丧。

神父去吃早饭时，迎面碰上了容光焕发的特莉妮达。“今天逮住六只。”她说着，哗啦哗啦地晃了晃盒子里的死老鼠。安赫尔神父尽力克制住自己的焦灼情绪。

“太好了，”他说，“下一步该找老鼠洞了，来个一网打尽。”

老鼠洞呢，特莉妮达已经找到了。她告诉神父，她在教堂的好几处地方找到了老鼠洞，特别是在钟楼和洗礼堂里，并且用沥青把洞全都堵死了。那天早晨，她看见一只老鼠像疯了一样往墙上撞，大概是夜里找不到窝了。

他们一起走到小院里。院子的地上墁着石子，晚香玉的枝叶开始伸展开来。特莉妮达停下脚步，把死老鼠扔进厕所里。待她来到书房时，安赫尔神父正准备吃早饭。每天早晨，一掀开桌上的罩布，阿希斯寡妇送来的早饭准在下面，就像变戏法似的。

“我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没买到砒霜，”特莉妮达进来时说，“堂拉洛·莫斯科特说，没有医生开的条子，不卖给砒霜。”

“用不着了，”安赫尔神父说，“所有老鼠都会憋死在洞里的。”

他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摆好杯子、盛雪白小面包片的盘子，以及刻有日本龙纹的咖啡壶。特莉妮达打开窗户。“最好还是准备着点，万一老鼠再来呢。”她说。安赫尔神父拿起咖啡壶刚要往杯里倒，突然停了下来，两眼望着特莉妮达朝桌边走过来。只见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工作服，裹着残疾人用的护腿。

“你对这件事过于操心了。”他说。

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安赫尔神父从来没在特莉妮达浓密杂乱的眉宇间发现过什么局促不安的神色。他的手指在轻轻地颤动。他倒完咖啡，放上两小匙白糖，开始在杯子里搅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墙上挂的十字架。

“你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来忏悔了？”

“礼拜五。”特莉妮达答道。

“告诉我，”安赫尔神父说，“你有没有向我隐瞒过自己的罪孽？”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安赫尔神父闭上眼睛。突然他停止搅动，把小匙放在盘子上，抓住特莉妮达的胳臂。

“跪下。”他说。

特莉妮达慌张地把纸盒放在地上，跪在神父面前。“念‘我是罪人’。”安赫尔神父拿出忏悔神父的腔调说。特莉妮达攥紧拳头，放在胸前，嘴里含糊不清地默诵着，直到神父用手按住她的肩头才停下来。神父说：

“好了。”

“我说过谎。”特莉妮达说。

“还有什么？”

“我有过邪念。”

每次做忏悔，都是这个顺序。她总是按这个次序泛泛地忏悔同样的罪孽。这一次，安赫尔神父一定要她进一步谈下去。

“什么样的邪念？”他问。

“不知道，”特莉妮达犹豫了一下，“有时候有不好的念头。”

安赫尔神父站起身来。

“你脑子里从没闪过自杀的念头吗？”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特莉妮达惊叫起来，低着头，用指关节敲打着桌子腿。接着，她回答说：“没有，神父。”

神父叫她抬起头来，他痛苦地发现姑娘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就是说，砒霜真是给老鼠买的。”

“是的，神父。”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特莉妮达又要把头低下去，神父用力托住她的下巴。她的眼泪涌出了眼窝。安赫尔神父觉得泪水像温热的醋一样从他的指缝流过。

“平静些，”他对特莉妮达说，“忏悔还没完呢。”

神父听任她抽抽噎噎地饮泣了一阵子。看到她哭得差不多了，神父轻轻地对她说：

“好了，现在对我讲吧！”

特莉妮达用裙子擤了擤鼻涕，咽下一大口掺着眼泪的发咸的口水。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那是少有的男中音。

“我的叔叔安布罗西奥在追求我。”她说。

“怎么回事？”

“有一天晚上，他硬要在我的床上过夜。”特莉妮达说。

“说下去。”

“没有了，”特莉妮达说，“我向上帝发誓，再没有什么了。”

“不用起誓。”神父告诫道。随后他用忏悔神父的平静语调说：“告诉我，你和谁一起睡觉？”

“我妈妈，还有别的女人，”特莉妮达说，“一共七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他呢？”

“他和男人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特莉妮达说。

“他从来没到过你的房间吗？”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要说实话，”安赫尔神父坚持道，“别害怕。他从来没打算进你的房间里去吗？”

“有过一回。”

“事实经过呢？”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钻进了我的帐子里。他悄悄地对我说，他不想把我怎么样，只想和我一起睡觉，因为他害怕公鸡。”

“怕什么公鸡？”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他就对我说了这些。”

“那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不走，我就喊了，把大家都叫起来。”

“他呢？”

“卡斯杜拉醒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大概是做梦吧。他闷着头不吭气，像个死人似的。等他从帐子里出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出来。”

“他穿着衣服。”神父用肯定的语气说。

“穿着睡觉的衣服，”特莉妮达答道，“只穿着裤子。”

“他没想碰你一下。”

“没有，神父。”

“跟我说实话。”

“是没有，神父，”特莉妮达坚持说，“我向上帝发誓。”

安赫尔神父又把她的脸抬起来，盯着她那双闪烁着悲伤的泪花的眼睛。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害怕。”

“怕什么？”

“不知道，神父。”

安赫尔神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了很长时间劝解她。特莉妮达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最后，神父和特莉妮达一起低声祷告：“耶稣基督、上帝、圣父……”神父深沉地祈祷着，内心感到一阵恐惧。他

一边祷告，一边竭尽所能地回溯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待到向特莉妮达赦罪的时候，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灵。

镇长推开门，高声叫道：“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走进卧室，用裙子擦干了双手。

“他有两天晚上没回来了。”她说。

“这个该死的，”镇长说，“昨天他没到办公室去。我有件急事，到处找他，谁也说不上他在什么地方。你想想他会在哪儿呢？”

“八成到哪个婊子家里去了。”

镇长扭头走了，连门也没关上。他走进台球厅。留声机开到最大的音量，在播放一支伤感的歌曲。镇长径直走到最里边的小房间，喊道：“法官。”老板堂罗克正在把大瓮里的甘蔗酒灌进酒瓶里。一听镇长喊，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说道：“不在，中尉。”镇长走到隔壁另一间屋里，一伙人正在玩牌。谁也没见过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妈的，”镇长说，“按说在这个镇上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可现在我要找法官，却没人知道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去问问贴匿名帖的人吧！”堂罗克说。

“少拿那些破烂纸跟我瞎捣乱。”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也没在办公室里。已经九点了，法院的秘书还在院子的走廊上打瞌睡。镇长回到警察局，命令三名警察穿好衣服，到舞厅和三个尽人皆知的暗娼家去找阿尔卡迪奥法官。然后，他走到大

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最后在理发馆里，他看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两腿劈开，脸上蒙着一条热毛巾。

“我的法官，你可真够行的，”镇长喊道，“我找你找了两天了。”

理发师把毛巾拿下来。镇长看见法官两眼肿胀，下巴黑乎乎的，三天没刮胡子了。

“你女人都要生了。你呢，连影子也找不着。”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

“哎哟，坏事了。”

镇长放声大笑，把法官推到椅子背上。“别害怕，”他说，“我找你有别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又闭上眼躺下去。

“理完发到办公室去一趟，”镇长说，“我等着你。”

说着，他在长条靠背椅上坐下来。

“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这儿。”法官说。

镇长不常来理发馆。有一次，他看见墙上钉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当时，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一次，纸条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瓜迪奥拉。”他叫道。

理发师正在裤子上擦剃刀。听见镇长叫他，他停下手里的活。

“什么事，中尉。”

“谁让你贴这个的？”镇长指着纸条问。

“凭经验办事呗。”理发师说。

镇长把一张小凳子拉到理发室的内墙前，踩着凳子把纸条摘下来。

“咱们这儿，只有政府才有权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他说，“咱们现在讲民主。”

理发师接着干他的活。“谁也不能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镇长继续说着，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纸篓，然后走到梳妆台前洗了洗手。

“看到了吧，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严肃地说，“怀疑上你了。”

镇长对着镜子观察了一下理发师的神色，只见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活。镇长一边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一边擦干了手。

“如今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说，“过去是政治家说了算，现在是政府说了算。”

“听见了吗，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他脸上涂满了肥皂沫。

“当然听见了。”理发师回道。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

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

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医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医的老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显得

有点寒碜。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医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哪。”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妹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医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医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瘦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医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牙医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医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医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

“谁贴的谁知道。”牙医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只有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店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土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估好了地价。临时任命的检察官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没事了。四点钟刚过，他们走进台球厅，两个人好像是为了前程奔波，刚刚长途跋涉归来似的。

“总算完事了。”镇长挥了挥手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搭腔。镇长看到他在柜台那里找凳子，便递给他一片止痛片。

“来杯水。”镇长对堂罗克说。

“来杯冰镇啤酒吧。”阿尔卡迪奥法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完把头耷拉在柜台上。

“那就来一杯冰镇啤酒。”镇长改口道。他把钱撂在柜台上，又说：“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干起活可真像个男子汉。”

阿尔卡迪奥法官喝完啤酒，用手指揉了揉头皮。台球厅里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人们正等着看马戏团打这儿路过。

镇长从台球厅望出去，正好看见马戏团走过来。乐队敲锣打鼓，先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服的姑娘骑着一头矮象走过去，象的耳朵和芋头叶一样。后面是几个小丑和杂技演员。雨过天晴，黄昏像水洗过似的。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天又热起来了。音乐声戛然停止，一个男人踩着高跷出来报幕。全镇居民不声不响地仿佛从地底下一拥而出，走上街头。

安赫尔神父从书房里看见马戏团打门口走过。他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复苏了。从吃晚饭直到入夜时分，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查看了哪些人进入电影院，然后独自回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情绪才消失。晚祷之后，他痴痴地坐在藤摇椅上，甚至没有听到九点的钟声，也不知道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只有一只癞蛤蟆在呱呱鸣叫。他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给镇长写了一个呈文。

应马戏团老板的邀请，镇长在荣誉席上落座观看节目。开始表演的是吊杆，后来出来几个小丑。接着，卡桑德拉出场了。她穿着一件黑丝绒衣服，蒙着眼睛，表演的节目是猜观众在想什么。镇长赶紧溜走了。他在镇上做了例行的巡逻后，十点钟来到警察局。一封字迹工整的信函正在等着他拆阅。这是安赫尔神父的呈文。神父如此正经八百地提出要求，倒叫镇长大吃一惊。

镇长叩门的时候，安赫尔神父正在脱衣服。“好家伙，”这位堂区神父说，“他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镇长还没进门，神父就听出是他来了。

“我很高兴能当面答复您的信件。”镇长笑容满面地说。

他把帽子一甩，扔到藤摇椅上，帽子像唱片似的打了几个滚。柜子下面有几瓶汽水，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冷水冰着。安赫尔神父拿出一瓶。

“喝瓶柠檬汁吗？”

镇长同意了。

“打扰您了，”堂区神父开门见山地说，“您对匿名帖这样漠不关心，我很担忧。”

看见神父讲话的样子，人们或许以为他在开玩笑，但镇长完全当正经话听。他心里想，为什么安赫尔神父对匿名帖竟会担心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您也惦记着这件事，神父，这可有点怪了。”

安赫尔神父在桌子的抽屉里翻腾着，找开瓶的起子。

“我担心的并不是匿名帖本身，”找不到起子，瓶子打不开，神父不知如何是好，“我担心的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某种不公道的东西。”

镇长从神父手里夺过瓶子，用靴子上的马蹄铁起下瓶盖，他左手的动作十分熟练，安赫尔神父不得不佩服。镇长用舌头舔了舔流到瓶颈上的泡沫。

“这种私生活的事，”他开了头，一时又想不出个主意，“说真的，神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哪。”

神父走到写字台旁。“您应该知道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对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道。他暗自鼓了鼓劲，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好像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像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声响了十一下。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强忍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采取点一般的行政措施。”

“不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待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

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连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动用良民百姓呢？”

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毫无滋味地呷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浸满了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吗，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呢，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开始在脑子里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道：

“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堂区神父熬夜了。

军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台球厅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了！”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宵禁，什么时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队，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几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塞进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小纸签，标明是开哪个门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长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

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像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门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

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后脖梗，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

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在镜子里，理发师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发师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台球厅的留声机又在放一支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屋里空无一人，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堂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台球厅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他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了，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镇长轻轻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堂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道，“电影院不是公共事业。”

“在宵禁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被宣布为公共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把折叠椅上悠悠自得，活像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水手烟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自从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宵禁对您来说……”

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宵禁，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儿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了，”老板顶撞道，“我们是穷人哪。”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老板说，“咱先不谈这个事。”

“叫她来，”镇长坚持道，“有事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

“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材高大，头发剪得像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她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墁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

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用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扎着红缎带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肉的香味，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掖进衣领说：“祝你健康。”他拿起勺子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像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向她投去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免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

“这屋里像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风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

每天她都看到奈斯托尔·哈科夫从她门口走过四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有了四个孩子，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模范父亲。近年来，有好几次他带着孩子从她门口走过，但是从来没和他的女人一起来过。她看到他消瘦了，苍老了，面无血色，成了一个陌生人，过去那种恩爱关系已不堪回首。有时候，她独自一人睡午觉，也曾热切地怀念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而是在莫尼卡出世之前的样子。当时他们相爱时间不算长，但是感情却如胶似漆，没有闹过别扭。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睡到正午才起床。他到了办公室才听说告示的事。他的秘书呢，从早晨八点镇长让他起草告示起，就一直惶惶不安。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知道了详情以后，思忖了一下说，“措辞太激烈了。没有这个必要。”

“法令总是这样。”

“那倒是，”法官表示同意，“不过情况变了嘛，措辞也应该改变。说不定会把人们吓坏的。”

后来到台球厅打牌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主要的情绪不是害怕。倒不如说，大家有一种集体的胜利感，因为看到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阿尔卡迪奥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镇长。

“看起来，对付匿名帖不值得这样搞，”他对镇长说，“人们都在看笑话呢。”

镇长抓住他的胳臂说：“我们不是跟老百姓作对。这叫作例行公事。”这样边走边谈，阿尔卡迪奥法官实在有些吃不消。镇长像要办什么急事似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走了半天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呢。

“这种状况不会延续一辈子的，”镇长接着说，“从现在起到礼拜天，我们一定把那个贴匿名帖的小丑关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猜准是个女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以为然。秘书汇报的时候，他吊儿郎当的没用心听，不过大体上也有一个看法：匿名帖不是一个人贴的，也不像有什么统一的计划。最近几天又出现了新花样：在匿名帖上画漫画。

“可能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干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最后说，“八成是几个男人和女人干的，而且是各搞各的。”

“别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法官，”镇长说，“您应该知道，不论什么事，虽然参与的人可能很多，可罪魁祸首只有一个。”

“这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中尉。”阿尔卡迪奥法官回答道。他蛮有把握地加上这么一句：“总而言之，我看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荒唐的。贴匿名帖的人干脆往旁边一躲，等到宵禁一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紧，”镇长说，“说到底，总要维护权威的原则嘛。”

招募来的人开始在警察局集合。小院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当时，监狱里容不下那么多人，犯人只好待在露天的地方。当天下午，那几名被解除武装的警察穿着短裤在走廊里来回闲溜达。

“罗维拉，”镇长在门口叫道，“给小伙子们弄点喝的。”

警察罗维拉穿上衣服。

“甘蔗酒？”他问。

“少跟我装疯卖傻。”镇长大声说道。他一边朝他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说：“弄点冷饮。”

招募来的人坐在院子里吸烟。阿尔卡迪奥法官从二楼的栏杆处看着他们。

“是自愿来的吗？”

“想得倒好，”镇长说，“我从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的，像抓壮丁似的。”

法官看了看，全是熟面孔。

“好像是给反对派招兵买马嘛。”

办公室沉重的铁门一打开，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您是说，他们全是打架斗殴的好手。”镇长打开这座私人碉堡里的电灯之后微笑着说。屋子的一头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放着一个便盆。凳子上有一个玻璃罐，上面扣着一只杯子。几支步枪和冲锋枪斜靠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屋里唯一的通风口是开在高处的几扇窄小的天窗。从天窗可以俯瞰整个港口和两条主要的街道。屋子的另一头是办公桌和保险柜。

这是镇长亲自布置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枪。”

罗维拉尾随着他们走进来。镇长给他几张钞票说：“再发给他们每人两包烟。”等罗维拉出去以后，他又对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您看这事办得怎么样？”

法官心事重重地回答道：

“一次无谓的冒险。”

“老百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镇长说，“另外照我看，这些穷小子拿着枪也不会摆弄。”

“也许一开始他们会不知所措，”法官表示同意，“不过这种情况长不了。”

法官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尽力忍耐。“您要多加小心，中尉，”他边想边说，“别落得个鸡飞蛋打。”镇长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把法官拉出了办公室。

“不必担心，法官，”他伏在法官的耳朵上说，“他们拿到的都是放烟火用的子弹。”

镇长和法官下楼出来，院子里已是灯火通明。招募来的人正在肮脏的电灯下喝汽水，大麻蝇一个劲儿往灯泡上撞。雨后，院子里有几处水洼。镇长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用长者的口吻向大家交代今晚的任务：两人一组在各个主要街角站岗。只要有人走过，不管是男是女，叫三声就得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他要求大家既要勇敢又要慎重。过了半夜，会有人给他们送夜宵。镇长最后表示，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并希望全镇居民体谅政府为保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这番努力。

钟楼上响起八点的钟声，安赫尔神父从桌旁站起来。他关掉院子里的电灯，上好门闩，在经书上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以主的名义”。远处的院子里，石鸽鸟在歌唱。阿希斯寡妇坐在走廊上一边乘凉一边打盹，旁边的鸟笼子全用黑布罩住。听到第二下钟声敲响，她没睁开眼就连忙问道：“罗贝托回来了吗？”一个女仆蜷缩在门洞里回答说，罗贝托七点钟就躺下了。在这之前几分钟，诺拉·德哈科夫把收音机的声音放低，陶醉在一首从某个舒适洁净的地方传来的轻音

乐中，乐声如此遥远，仿佛若有若无地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镇上的狗汪汪叫起来。

牙医还没听完新闻，忽然想起安赫拉仍在院子里的小灯下猜字谜，他连看也没看，就喊道：“关上大门，到屋里来猜。”他的妻子被惊醒了。

罗贝托·阿希斯是在七点钟躺下的。这时候，他站起身来，从半掩着的窗户朝广场张望了一下。广场上只有一片黑黢黢的杏树，蒙铁尔寡妇家阳台上的灯最后也灭了。罗贝托·阿希斯的妻子打开床头灯，压低声音要他赶快躺下。一只孤零零的狗还在叫，直到钟楼响过第五下钟声，它才停下来。

堂拉洛·莫斯科特肚子上摊着一张报纸，前额上架着眼镜，在闷热的房间里呼呼地打鼾。房间里堆满了空铁罐和落满灰尘的小药瓶。他那位瘫痪的妻子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想起过去也曾有像今天一样气氛紧张的夜晚，不禁浑身发抖。远处的人声、狗吠声和悄悄的跑步声消逝了，镇上笼罩着一片沉寂。

“别忘了把可拉明放进去。”希拉尔多大夫嘱咐妻子说。睡觉之前，他的妻子把急救药品放进小药箱里。他们俩还在惦记着蒙铁尔寡妇。服用了最后一剂鲁米那之后，寡妇硬挺挺的像个死人。堂萨瓦斯刚和卡米查埃尔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谈得把时间都忘了。钟声响到第七下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里用天平称第二天的早餐。他的妻子披头散发地从卧室里跑出来。河水停滞不流了。“唉，今天晚上啊……”黑暗中有人低声说。这时候，第八下钟声敲响了，低沉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弥漫开来。十五秒钟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冒火花，现在完全熄灭了。

宵禁的号声响过以后，希拉尔多大夫合上书。他的妻子把小药箱放在床头柜上，脸冲着墙躺下，关了灯。大夫又把书打开，但是没有看下去。夫妻俩有节奏地喘着气。万籁俱寂的小镇似乎缩小了，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仍旧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折起一个角，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橐橐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制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看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

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咕隆咚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

“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待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像小铅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迸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像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消失在迷蒙的雨中。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宵禁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了一群狗的乱吠。后来，只剩下一只狗还在一声一声地叫。这时候，镇长才无精打采地冲着那名招募来的人说：

“有话尽管跟我说，这种事我干了半辈子了。我真有点困啦。”

“有什么用，”理发师说，“这种干法根本不对头。老娘儿们才这么干呢。”

“我也开始琢磨这件事。”镇长叹了口气。

警察回来报告说，等雨一停，马上就送夜宵来，又说，抓住了一个没有通行证的女人，她在警察局等候镇长。

这个女人是卡桑德拉。在阳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屋里显得暗幽幽的。卡桑德拉盖着一块油布躺在折叠椅上睡觉。镇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哼了一声，使劲地摇了摇头，睁开跟睛。

“我正做梦呢。”她说。

镇长打开屋里的灯。卡桑德拉用手捂住眼睛，嘟嘟囔囔地扭过身去。镇长看见她那银白色的指甲和光溜溜的胳肢窝，心中不觉一动。

“您可真沉得住气，”她说，“我十一点就来了。”

“我以为你在我的住处等我呢。”镇长抱歉地说。

“我不是没有通行证吗？”

两天前她的头发是古铜色的，现在变成了银灰色。“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镇长笑了笑，挂好雨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但愿他们没把你当作贴匿名帖的。”这时候，卡桑德拉又变得嘻嘻哈哈了。

“但愿他们这么以为，”她回答说，“我就爱看人一惊一乍的。”

镇长突然显得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把指关节弄得咔咔响，低声下气地说：“我需要你帮个忙。”她察言观色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镇长接着说，“你拿牌算一算，能不能找出谁贴的匿名帖。”

她把脸转向一边。“明白了。”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镇长催促道：

“说来说去，这也是为你们好。”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算过了。”她说。

镇长几乎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这个卦很怪，”卡桑德拉装腔作势地继续说，“卦上说得十分明白。往桌子上一摆，吓了我一大跳。”她连喘气都显得很紧张。

“是谁？”

“不是哪一个人，全镇的人都有份。”

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七个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起重活来像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却只有他成家了。他和几个哥哥唯有一点长得像——鼻梁高高耸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像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堂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像是兔子布莱尔[1]在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以为怎样？”堂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道：“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想只有阿希斯家才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他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兄弟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张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兄弟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起上教堂来。看那一身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像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大家都在公开议论，但却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上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像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有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时候，他猛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布道结束，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时，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飘落。邻家的美洲鸟像吹口哨似的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像有谁把礼拜天像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

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略带点哭腔道，“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一边等着烧开，一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拿

好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像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治。再不注意，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

“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冲待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他走到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于是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快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了。”

“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淤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了。”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礼拜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

医生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银柱，松开了捏住充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了。”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道，“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准是您贴的！”

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待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一辈子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补充了一句：“您今天可真像一朵玫瑰花。”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到靠床边那把软皮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脑溢血后，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于是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堂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应。堂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像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黎明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房间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解闷。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

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镇长正好相反，他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住处，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宵禁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般的口吻解释道：

“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镇长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

法官背过身去，像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的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法官！”阿尔卡迪

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应，只听得法官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让人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哪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霏霏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他洗了个澡，穿上军装，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

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他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兜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台球厅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兜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肝上准保尽是小气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了个嗝。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哦！”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镇长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面色蜡黄，脸上尽是麻子，头戴一顶小棒球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佩佩。”

“还有呢？”

“佩佩·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镇长问。

“就在这儿。”佩佩·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

“好吧，佩佩，”他说，“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朝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兜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警察亲信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

警察提醒镇长道，今晚他要值班。

“别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心血来潮似的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待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的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什么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道，“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三名警察当中，有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有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不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

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但这股奇臭一下子就过去了，神父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

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他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将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张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着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了，”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确实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声称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礼拜六病倒了。”

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

“嗐，白耽误工夫，”瞎老太太插话道，“别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儿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堂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米娜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像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父对她说，“你还干活？”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道，“像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堂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道，“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于是说：“好像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空了两年之后，佩佩·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像是自言自语，“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

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太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道，“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道，“这不是，咱们这儿又宵禁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呢。”瞎老太太说。

“荒唐，”堂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道，“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堂区待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远去，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好大一会儿工夫了。

---

[1]兔子布莱尔是美国作家乔尔·哈里斯创作的儿童文学经典《雷姆斯大叔》中的主要角色。

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寻摸着鞋子。

“再不走，天该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打开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皙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待到明天了。”

她全身裸露着，灯一亮，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暧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像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道，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用内裤拾起地上的避孕套，走到卫生间，扔进马桶。洗手时，他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他回到房间，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待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

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使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无非是辛苦点。”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枪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道，“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涌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卧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到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某些琐碎细节上看出了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礼拜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上过油，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

“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

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

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像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太合适。”

“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

“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放了老鼠夹子，在奶酪里下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像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入睡之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的情绪暗暗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宵禁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的头脑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

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

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船，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由于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

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孩子们白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

小船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

“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婊子养的。”

镇长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兜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迈进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

“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

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咖啡来。

“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一直等到大雨过去，然后去了警察局。他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中的一张小凳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湿透了。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像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头，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

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佩佩·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通通倒出来。照我看，他挺不了多少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待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事了，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办公桌上睡得蒙蒙眬眬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一双鞋泡得囊囊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做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堂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堂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写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医。”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办公桌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

卡·德阿希斯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急促。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待了足有半个小时，那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邮电局时，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局长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

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他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他正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像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汤，黄澄澄的汤上漂着一圈圈的油花，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

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哦，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了，”他说，“我是装糊涂，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店铺后面的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咝声。

“别待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就跟着沾上边了。”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性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状子？”

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道，“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帕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钱了。”

本哈民先生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

“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状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下。

本哈民先生一觉睡到四点钟，到院子里洗脸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许多小虫子在空中飞来飞去。他换上衣服，梳了梳那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然后到邮电局去，买了一张正式的公文纸。

本哈民先生正要回到店里写状子，忽然觉得镇上好像出了什么事。远处传来叫喊声。几个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他忙向他们打听，小伙子们一边跑一边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回到邮电局，退还了公文纸。

“用不着了，”他说，“他们刚把佩佩·阿马多处决了。”

镇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系着军衣扣子，腾腾两下跳下了住所的楼梯，看看天色，弄不清是什么时候。不管有事没事，他总要到警察局去一趟。

一路走来，各家的窗子都关得挺严实。走到街中心时，只见迎面跑过来一个女人，两臂朝左右伸开。几只蚊子在清新的空气中飞来飞去。镇长还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掏出手枪撒腿就跑。

一群妇女正要强行闯进警察局的大门。几个男人拦着，不让她们进去。镇长三拳两脚推开人群，背靠住大门，枪口对准大家。

“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毙了他。”

从里边顶住门的那名警察打开大门，端起上了膛的步枪，吹起警哨。另外两名警察跑到阳台上，朝天放了几枪。人群立即朝大街的两头散开了。这时候，那个女人像只狗似的嗷嗷叫着出现在大街拐角

处。镇长一下子认出了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于是，他连忙跳了一下，躲进警察局里，从楼梯上命令门口那名警察说：

“看住这个女人！”

警察局里像死一般沉寂。其实，究竟出了什么事，镇长并不清楚。他把堵在牢房门口的警察拽开，才看见佩佩·阿马多。阿马多趴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两手夹在大腿中间，脸色煞白，但身上没有血迹。

镇长看了看，确实没有伤痕，他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把死者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系好裤扣，最后又给他系上皮带。

镇长站起来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他站在警察对面，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情。

“谁干的？”

“大伙儿，”那个黄头发大个子说，“他想逃跑。”

镇长心事重重地看看他，一时间好像找不到什么话说。“你这套瞎话，谁也不会相信。”说着，镇长朝大个子走过去，伸出一只手。

“把枪给我。”

警察解下枪带，交给镇长。镇长取出两颗打过的弹壳，换上两发新子弹，把废弹壳放进衣兜里，然后把枪交给另一名警察。黄头发大个子（从近处看，他的脸上还有一股孩子气）被带到旁边的那间牢房里。走进牢房，他把衣服全部脱掉，交给镇长。这些事做得不慌不忙，仿佛举行什么庆典似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最后，镇

长亲自关上死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门，走到院子的平台上。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在板凳上坐着。

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办公室，镇长请他坐下，他没有搭腔。他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又是湿漉漉的。镇长问他看没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几乎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好吧，”镇长说，“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怎么处理。不管怎么说吧，”他继续道，“你要记住，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你已经卷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还是愣怔怔地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贴在身上，皮肤开始发肿，好像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似的。镇长又等了一会儿，看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说，卡米查埃尔，你要识时务，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

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庄重，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但是，这些话似乎没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脑海里掀起任何波澜。他站在办公桌前，身体肿胀，神情忧悒，一动也不动，等到大铁门关上之后，他还是这副神态。

这时候，在警察局门前，两名警察抓住佩佩·阿马多母亲的手腕。三个人争斗了一气，好像正要歇一会儿。那个女人静静地喘着气，眼泪已经哭干了。镇长一出现在门口，她便嘶哑地号叫了一声，猛地一甩，从一名警察手里挣脱出来，另一名警察挥拳把她打翻在地上。

镇长连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叫一名警察陪着他走到大街拐角，来到围观的人群面前。他对着众人说：

“要是大家不愿意看着事情闹大，哪位出个头，把这个女人带到家里去。”

警察陪着镇长穿过人群来到法院。法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镇长又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家里去，连门也没敲，就推开大门，高声喊道：

“法官！”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拖着孕妇特有的腔调在暗影里回答说：

“出去了。”

镇长站在门槛上问：

“上哪儿去了？”

“上他去的地方呗，”女人说，“准是找哪个臭婊子去了。”

镇长示意要警察进去。他们大摇大摆地从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身旁走过，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卧室里搜查了一气，连个人影也没发现，于是他们又回到堂屋。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镇长问。

“前天晚上。”女人说。

镇长沉吟了好大一阵儿。

“婊子养的，”他冷不丁地喊道，“他还能入地五十米！还能又钻进他婊子娘的肚子里去！不管是死是活，一定得把他揪出来。政府的手哪儿都够得着。”

女人叹了口气。

“您这些话，上帝会听见的，中尉。”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街上的人群还被警察拦在警察局的拐角处。有人把佩佩·阿马多的母亲带走了。小镇表面上平静下来。

镇长径直走到死者的牢房。他吩咐人拿来一块帆布，和警察一起给死者带上帽子、眼镜，再用帆布把尸体包裹起来，随后，在警察局里搜罗来一些麻绳和铁丝，把尸体从脖子一直缠到脚腕。收拾停当后，镇长浑身热汗淋淋，但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仿佛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

这时候，他把牢房的灯打开。“找把铁锹、镐头，再带盏灯来，”镇长命令警察说，“叫上冈萨莱斯，你们一块儿到后院，挖个深坑。靠里边挖，那儿比较干松。”他说说停停，仿佛想一句说一句似的。

“你们一辈子都给我记住，”他最后说道，“这个小子没死。”

过了两个小时，坟坑还没有挖好。镇长从平台上望出去，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名值勤的警察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他打开楼梯的灯，躲到大厅最幽暗的一个角落，耳边只听见远处一只石鸟一声一声地啼叫。

安赫尔神父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先是听到神父和值勤警察说话，接着又听见陪他一起来的人说了几句，最后听出了说话的人是谁。他躺在折叠椅上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们边说边走进警察局，旋即听到上楼的脚步声。黑暗中他伸出左手，抓住卡宾枪。

安赫尔神父看见镇长出现在楼梯顶上，当即停下脚步。再下面两级站着希拉尔多大夫。大夫身穿一件浆洗过的白大褂，手里拎着药箱。一见镇长，他露出了两行尖利的牙齿。

“我白等了，中尉，”大夫客客气气地说，“整整一下午我一直等着您叫我来验尸。”

安赫尔神父用明亮而温顺的眼睛盯着大夫，然后又转向镇长。镇长笑了笑。

“验什么尸啊，”他说，“又没死人。”

“我们想看看佩佩·阿马多。”堂区神父说。

镇长把卡宾枪的枪口对着下面，仍旧对大夫说：“我也很想看看他，有什么法子呢？”说罢，板起了面孔。

“他逃跑了。”

安赫尔神父迈上一级楼梯。镇长举起卡宾枪，对准神父。“站住，别动，神父！”他警告说。此时，大夫也登上了一级楼梯。

“听我说，中尉，”大夫还是笑吟吟的，“在咱们镇上没有不透风的事。从下午四点钟起，大家都知道你们把那个小伙子干掉了，和

堂萨瓦斯害死卖出去的驴用的办法一样。”

“他逃跑了。”镇长重复了一遍。

镇长只顾盯住大夫，不料安赫尔神父高举着双臂一下子登上两级楼梯。

镇长咔的一声拉开枪栓，两腿叉开，兀立在那里。

“站住！”他一声断喝。

大夫抓住堂区神父的衣袖。安赫尔神父咳嗽起来。

“打开窗子说亮话，中尉，这个尸非验不可。”大夫说。他说话的口气很硬，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监狱的犯人都爱得晕厥病，这个秘密现在也该揭开了！”

“大夫，”镇长说，“你敢动一动，我就开枪。”他斜着眼瞥了一下神父，又说道：“您也一样，神父。”

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除此之外，”镇长继续对神父说，“您该高兴高兴了，神父。匿名帖就是那个小伙子贴的。”

“为了上帝的爱……”安赫尔神父说。

一阵痉挛性的咳嗽弄得他无法继续说下去。镇长等着他咳完，又说：

“你们听着，我开始数数。一数到三，我就闭上眼，冲着大门开枪。从现在起，你们要永远记住我的厉害。”他毫不含糊地警告大夫道：“少说废话。现在在打仗，大夫。”

大夫拉住堂区神父的衣袖下了楼梯，没再转过身来。蓦地，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喜欢这样，将军，”他说，“现在我们算是知道谁是谁了。”

“一！”镇长开始数数。

他们走了出来，没有听见数“二”。走到警察局拐弯的地方，两个人分了手。神父已经支持不住。他眼里噙着泪水，把脸扭到一边去。希拉尔多大夫面带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大惊小怪的，神父，”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大夫走到家门口拐角的地方，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一刻八点。

神父吃不下饭去。宵禁以后，他坐下来写信，趴在写字台上一直写到半夜。蒙蒙细雨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他写起字来用的劲儿很大，字母都写成了双道，字迹十分清晰。他心潮澎湃，直到钢笔写干了，在纸上划几下写不出字来，才想起蘸蘸墨水。

第二天，做完弥撒，他把信送到邮局，其实要到礼拜五才能送走。上午，空气潮湿，烟雾迷蒙。近中午的时候，天放晴了。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院里，在晚香玉的花丛中一瘸一拐地跳跃了半个时辰。

小鸟的啼声越来越高，每叫一次就提高八度，到后来声音尖厉得用耳朵都听不见了。

黄昏，安赫尔神父出去散步。忽然他发觉整整一下午总有一股秋天的芬芳伴随着他。在特莉妮达家里，他和在家中养病的姑娘谈论起十月里各式各样的疾病，心情十分忧闷。谈着话，神父想起了有一天晚上蕾薇卡·德阿希斯到他书房里来，身上也是散发着那样一种馥郁的香气。

回来的路上，神父到卡米查埃尔先生家看了看。卡米查埃尔先生的妻子和大女儿伤心极了，一提起亲人被捕，她们就痛哭失声。相反，小孩子们看不到爸爸那副严厉的面孔倒都挺高兴的。他们端着一碗水正在喂蒙铁尔寡妇送来的那对小兔。说着说着安赫尔神父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比画着，没头没脑地说：

“啊，我知道了，是乌头。”

哪里是什么乌头。

再没有人提起匿名帖的事了。在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匿名帖不过是一段美丽动人的小插曲。黄昏散步时，安赫尔神父越发相信这一点。晚祷后，他在书房里和几位天主教的女信徒谈了会儿话。

大家走后，神父觉得肚子饿了。他煎了几片青香蕉，煮了点牛奶咖啡，就着一小块奶酪吃下去。吃饱饭，那股香味也就忘掉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蚊帐里，逮住几只没被杀虫药杀死的蚊子，然后准备躺下睡觉。他一口气又打了几个嗝，胃里一个劲儿地泛酸，但心情却很平静。

神父睡得十分香甜。宵禁后四下里静悄悄的。耳边仿佛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清晨的寒霜绷紧琴弦发出的嚓嚓声，最后还听到一阵昔日的歌声。差十分五点，他发现原来自己还活着，费了好大力气欠起身来，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他想：“十月二十一日，礼拜五。”想完了又高声说道：“圣伊拉里翁。”

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扣好长袍上的一串扣子，蹬上平时穿的那双破靴子，鞋底已经开绽了。在晚香玉的芬芳气息中，他打开屋门，忽然想起了一句歌词。

“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他叹了口气。

神父刚要敲钟，米娜推开了教堂的门。她走进洗礼堂一看，奶酪原封未动，老鼠夹子也还是老样子。安赫尔神父打开冲着广场的大门。

“真倒霉！”米娜晃了晃空盒子说，“今天一只老鼠也没抓住。”

安赫尔神父没有理她。朝霞灿烂，空气清新，似乎预示着无论出什么事，今年的十二月也会准时到来。只有巴斯托尔的声音永远消逝了，这一点神父感受得最为深切。

“昨天夜里又有人弹奏小夜曲了吧。”神父说。

“是用枪子儿弹的，”米娜说，“刚才还响枪呢！”

神父第一次看了她一眼。她面色十分苍白，和瞎奶奶一样；腰间也系着一条某个世俗团体使用的淡蓝色的绸带。但是，她和特莉妮达不太一样，特莉妮达有点男孩子气，而她正在变成一个大姑娘。

“在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米娜说，“他们像疯子一样到处搜查秘密传单。听说他们掀开了理发馆的地板，碰巧发现了武器。监狱里关满了人。不过，听说男人们都上山找游击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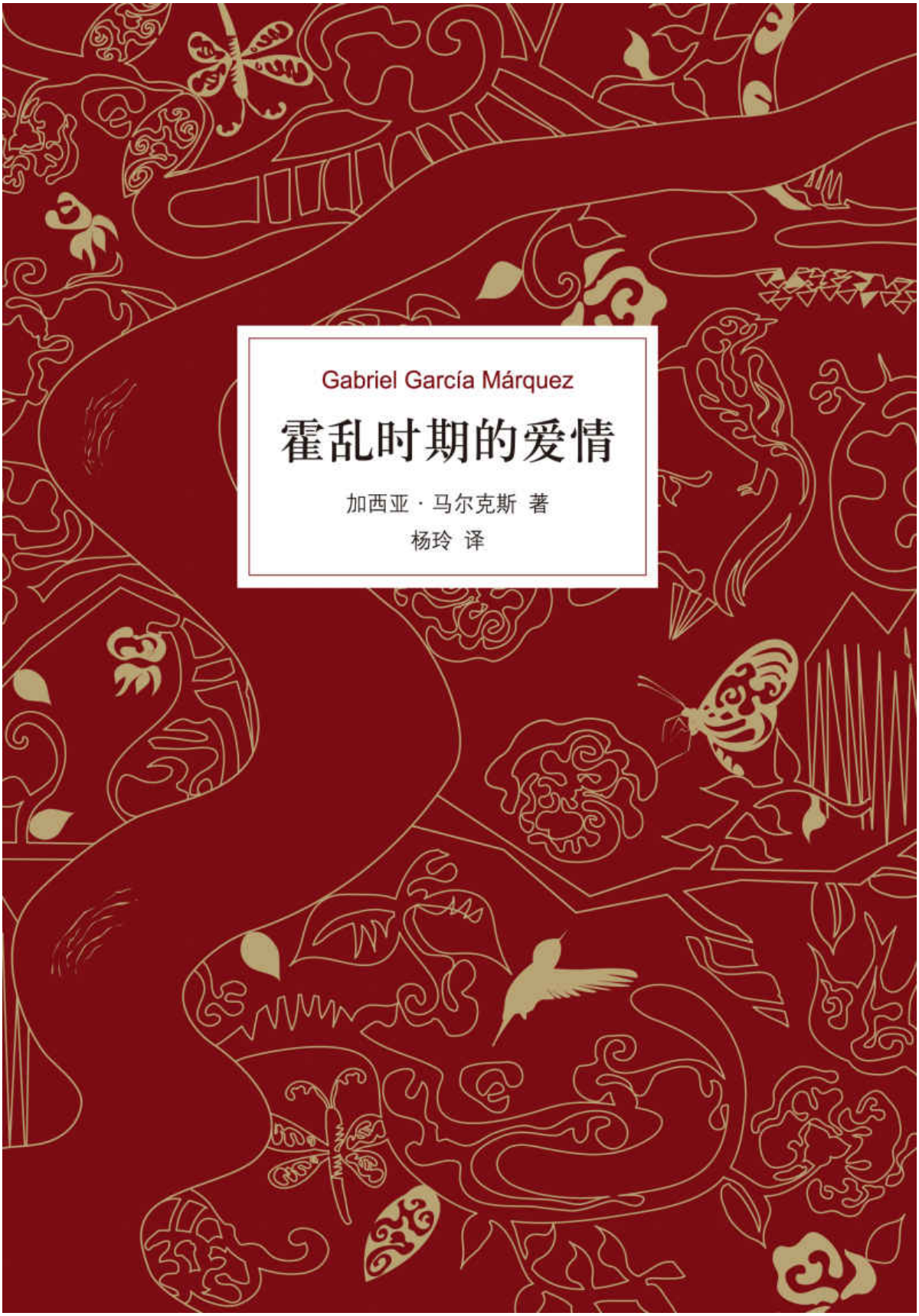
安赫尔神父叹了口气。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

说罢，神父朝教堂深处走去，米娜默默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大祭坛。

“这算不了什么，”米娜说，“尽管昨天晚上宵禁、开枪……”

安赫尔神父停住脚步，扭回头来，用那双庄重的天蓝色眼睛看着她。米娜也停下脚步，腋下夹着空盒子，话没说完，却神经质地笑了笑。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霍乱时期的爱情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霍乱时期的爱情（2020年销量300万纪念版）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杨玲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03

ISBN：978754429705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正文

自然，此书献给梅塞德斯

这些地方走在众人之前，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花冠女神。

——莱昂德罗·迪亚斯[1]

---

[1]莱昂德罗·迪亚斯（1928— ），哥伦比亚盲人音乐家。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就察觉出这种味道。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桩紧急事件，但从很多年前开始，这类事件在他看来就算不上紧急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曾在战争中致残，是儿童摄影师，也是医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

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脚。狗的尸体边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另外几扇窗子和房间的所有缝隙，不是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就是被黑色的纸板封了起来，这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一张大桌上，堆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两只已经掉皮的白小桶，笼在一盏红纸罩的普通聚光灯下。尸体旁边的那第三只桶则是用来装定影液的。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报纸，还有一摞摞夹在两块玻璃片之间的底片，家具也破败不堪，但所有这些都被一双勤劳的手收拾得一尘不染。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一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一名警官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已先行赶到这里。正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窗子通风，并把尸体遮盖起来。两人庄严地向医生致意。这一次，这庄严中的哀悼之意多过崇敬之情，因为无人不知医生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之间的深厚友谊。德高望重的医生和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来，他在每天的普通临床课前都会和每一位学生握手一样。接着，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鲜花似的掀开毯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五十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

“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

他盖上毯子，又恢复了学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刚刚为自己的八十大寿举行了三天的正式庆典。在答谢辞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等我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但这种不虞之变还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当中。”尽管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也尽管他得靠一根银柄手杖来掩饰自己蹒跚的步履，但他的穿着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考究：亚麻套装，怀表的金链挂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胡子是珍珠母色的，头发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缝，这两样是他性格最忠实的体现。对于越来越令他不安的记忆力衰退，他通过随时随地在零散的小纸片上快速记录来做弥补，可最后，各个口袋都装满了混在一起的纸片，难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药瓶以及别的东

西在他那塞得满满的手提箱里乱作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中最年长、声望最高的医生，也是全城最讲究风度的人。然而，他那锋芒毕露的智慧以及过于世故地动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却让他没能得到应有的爱戴。

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对警官的犹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您别忘了，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是我。”年轻的医生非常失望：他还从来没有机会在尸体上研究氰化金的作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竟从未在医学院见过这个学生，但那动不动就脸红的样子和安第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许这年轻人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说：“要不了几天，这里的某个爱情疯子就会给您提供这样的机会。”话一出口，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所记得的数不清的自杀事件中，这还是第一起不是因爱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于是，他一贯的口吻有了一丝改变。

“到时候好好留意，”他对实习生说道，“死者的心脏里通常会有金属颗粒。”

接着，他就像对下属说话似的同警官交谈起来。他命令警官绕过一切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当天下午举行，而且要尽可能秘密地举行。他说：“稍后我会去和市长说。”他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极端俭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艺挣来的钱远远超过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的某个抽屉，想必会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来支付安葬的费用。

“没找到也没关系。”他说，“全部费用由我承担。”

他让警官告诉报界，摄影师是自然死亡，尽管他相信这消息根本不会引起记者们的丝毫兴趣。他说：“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和省长说。”警官是个严肃而谦卑的公务人员，知道医生对公事向来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因此激怒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很惊讶他竟会如此轻率地为了加快安葬进程而跳过法律手续。他唯一不愿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让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葬在圣地。警官对自己的失礼有些后悔，试图做出解释。

“我知道，他是一位圣人。”

“更为罕见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远处，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召集人们去望大弥撒的钟声。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的金丝眼镜，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方形的怀表做工精致，盖子是靠弹簧打开的—再不走就要错过圣神降临节的弥撒了。

客厅里有一架底座带轮子的巨型照相机，就像公园里用的那种。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颜料画着黄昏海景。墙上挂满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次领圣体，戴兔子面具，幸福的生日。年复一年，乌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写字台上，一个装了几支水手烟斗的罐子旁边，是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急于离开，而且心情阴郁，但还是抵不住对这盘残局研究一番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来的，因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每天黄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个不同的人对弈，但他一向都会把棋下完，然后把棋盘和棋子收进盒子，放进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医生知道他惯执白子，而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内必输无疑。“如果真是谋杀，这里面一定有不错的线索。”他自言自语道，“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为何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从不屈服的战士，竟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若不调查清楚，他简直会活不下去。

早晨六点，巡夜人在做最后一圈巡逻时，看见钉在临街大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请进，无需敲门，并请通知警察。很快，警官和实习生就赶来了。两人把房子搜查了一遍，试图在无可置疑的苦杏仁味之外寻找由其他原因致死的证据。就在医生驻足分析那盘未下完的棋局的短短几分钟里，警官在写字台上的纸堆中发现了一封写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被厚厚的火漆封得严严实实，为取出信，不得不撕烂信封。为了让屋里的光线亮一点儿，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先飞快地扫了一眼这沓工工整整写满了正反两面的十一页纸。而当他开始读第一段时，就明白自己肯定赶不上圣神降临弥撒的圣餐了。他读着信，激动得气喘吁吁，时而为找回中断的头绪往回翻上几页。等读完后，他看上去就好像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回来似的。尽管努力克制，但他的沮丧显而易见：嘴唇发蓝，一如尸体的颜色；而把信折起来放进背心口袋时，他也无法控制手指的颤抖。这时，他才又想起身边的警官和年轻的医生来，透过一片沉痛的迷雾，他冲他们笑了笑。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不过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只是一半的真相，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事实的全部接受了，因为他们按医生的指令揭开一块地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账簿，上面记着保险箱的密码。死者的钱虽没有他们想象的多，但也足够应付葬礼并结清一些小额账目。这时，乌尔比诺医生意识到，即便是在神甫宣讲福音之前，自己也无法赶到教堂了。

“自我懂事以来，这还是第三次错过星期日弥撒。”他说，“但上帝会原谅我的。”

尽管他几乎按捺不住想与妻子分享信中秘密的急迫心情，但还是宁愿再耽搁几分钟，把细枝末节安排妥当。他答应去通知城里为数众多的加勒比流亡者，因为或许他们会想向这样一位最受人尊敬、最活跃也最激进的人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很显然，他最终还是向令人绝望的坎坷屈服了。他还会去通知死者的棋友，无论是杰出的专业棋手还是无名小卒，另外，也会通知其他一些和死者交往不那么频繁但也可能想参加葬礼的朋友。在看那封遗书之前，他本决定要做主事的第一人，但读过信后，他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要送一个栀子花的花圈，因为也许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最后一刻表达了悔意。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在炎热的季节，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有事找他，他从中午十二点起就会一直待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他这位爱徒那天将举办豪华午宴以庆祝自己从医二十五周年。

自从度过最初艰苦奋斗的岁月，赢得了全省无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过起了规律的生活，每日的行踪都有律可循。他每早鸡鸣即起，并从那一刻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钾以

提神醒脑，水杨酸盐以缓解阴雨天的骨痛，几滴黑麦角汁以克制眩晕，颠茄以保证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时刻服用不同药物，而且总是背着人偷偷服下，因为在漫长的医生和教师生涯中，他向来反对为人开具延缓衰老的药方：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总是带着一小包樟脑，没人看见时便取出来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带来的恐惧。

他会先在书房里待上一个小时，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点在医学院讲授的普通临床课备课，这门课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学新作的忠实读者，他在巴黎的书商会把书邮寄给他，本地书商也会为他从巴塞罗那订购，尽管他并没有像关注法语文学那样关注西班牙语文学。但不管怎样，他从不在早晨阅读文学，而是在午睡后读上一小时，晚上睡觉前再读一会儿。备完课，他在浴室里对着敞开的窗子做十五分钟呼吸运动，冲着鸡鸣的方向吸进呼出，因为那边空气清新。然后，他洗澡，整理胡子，在正宗法里纳·赫赫努贝古龙水的香味中为胡子上胶，接着，穿上白色亚麻套装，搭配背心和软帽，以及一双鞣制的软山羊皮靴。八十一岁的他仍旧保持着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振奋的精神，一如当年大霍乱后不久他刚从巴黎回来时的样子。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十分整齐，就和年轻时一样，只不过颜色变成了金属色。他在家中用早餐，但食谱是单独的：一杯用以养胃的大苦艾花茶，外加一头大蒜，一瓣一瓣地掰下来，就着面包有意识地细细咀嚼，以预防心脏衰竭。上完课，他很少没有活动，要么去践行市民的参与精神，要么去尽教会中的义务，再不就是忙于他的艺术和社会革新事业。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餐，然后坐在院子的露台上午睡十分钟。睡梦中，他听见女仆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着街上的叫卖

声，以及海湾里燃油机和马达发出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它们排出的废气在整座房中弥漫，就像一个被判腐烂而死的天使在扑腾翅膀。之后，他会花一个小时阅读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书籍。然后，他给家里养的鹦鹉上法语和声乐课，这只鹦鹉从很多年前起就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四点钟，他喝下一大杯加冰柠檬水后，就出门去看望病人。虽然上了年纪，他还是坚持不在诊所接诊，而是继续到病人家里出诊。自从城市建设得越来越方便，人们可以步行到达城中的任何地方以来，他就一直这样做。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是用家中那辆由两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代步。后来车坏了，他便改用一辆单匹马拉的敞篷车。后来，马车开始从世界上消失，城中也仅剩下几辆以供游客观光或在葬礼上运送花圈，他却仍旧带着某种对时尚的轻蔑，继续使用这辆马车。尽管拒绝退休，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人们只在基本上已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才请他前往，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来越不相信特效药，而眼瞅着外科手术得到推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有力证明。”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药物都具有毒性，而百分之七十的日常食物也会加速死亡。“事实上，”他常在课堂上说，“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地死去。”尽管拥有这些极端思想（它们甚至都已成为当地民间医学传说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学生即便已经开了自己的诊所，也还是会来向他请教，因为他们视他为当时人们所谓的那种具有“诊断慧眼”的人。总而言之，他一直是位收费昂贵、出类拔萃的医生，病人都集中在总督区的名门望族。

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所以在下午出诊期间，如果出现什么紧急事件，他的妻子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给他捎口信。年轻时，他回家前总会在教区咖啡馆逗留一会儿，他的象棋技艺就是在那里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几个加勒比流亡者一起精进的。但从新世纪伊始，他便不再去教区咖啡馆了，而是试图组织由社交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来了，那时他双膝已经坏死，还不是儿童摄影师，但不到三个月时间，所有只要会在棋盘上摆弄个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认识了他，因为根本没人能下赢他一盘棋。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相识，因为那时的他已无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却没有几个了。

多亏了医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才成为这里的一员。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无条件的保护人和一切事务的担保者，甚至都没去调查一下他是个怎样的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究竟在怎样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流落成这副残废而茫然的模样。最后，医生借钱给他开了一家照相馆，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从为第一个被镁光灯的闪光吓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来，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

这一切都是因为象棋。起初，他们从晚餐后的七点钟开始下，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棋艺明显更胜一筹，所以他合理地让给医生几步。但让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步不让。后来，加利略·达孔特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成了那里最准时的观众之一，二人的对弈便被挤到没有电影首映的夜晚。那时，他已成为医生的挚友，医生甚至心甘情愿地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从不带妻子，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没有耐心跟随复杂的情节线索，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仅

凭敏锐的嗅觉，便能感觉到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都绝非一个好伙伴。

唯一与平时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会到教堂去望大弥撒，然后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读书。若非极端紧急的情况，安息日他很少出诊，而且从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这个圣神降临节，出于意外巧合，两件罕有的事赶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从医二十五周年纪念。然而，他并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签署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死亡证明后就直接回家，而是听任了好奇心的驱使。

一上马车，他便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遗书。接着，他命令车夫带他前往奴隶老区的一个偏僻地址。这个决定与他平日里的习惯迥然不同，以至于车夫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确实没错：地址很清楚，而且，写下这个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又翻回到遗书的第一页，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并非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那么，尽管到了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有可能因此改变。

从一大早开始，天空就没有好心情，阴云密布，透出阵阵凉意，但好在中午之前还没有下雨的危险。车夫试着抄近道，拐进了这座殖民城市崎岖的石子路。有好几次，为了不让马儿受惊，他们不得不停下车，因为从圣神降临节的庆祝活动中归来的学生和宗教团体造成了一片混乱。街道被纸花环、音乐和鲜花填满了，还有撑着各色阳伞、身穿荷叶边薄纱裙、站在阳台上观礼的姑娘们。在大教堂广场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没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中，几乎已经辨认不出。教堂的出口处堵满了汽车，庄严而又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连

一个空位也没剩下。那里唯一的一辆马车便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数的那几辆剩余的马车区别明显：它的漆皮顶棚总是闪闪发亮，把手等装饰物也都是铜制的，以防被硝腐蚀，轮子和车辕则都漆成了红色，还镶着金边，仿佛在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盛装演出一般。此外，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最喜欢装模作样的家庭都已经允许司机穿上干净的衬衫，可他却仍旧要求自己的车夫身穿软塌塌的丝绒制服，头戴马戏团驯兽师般的礼帽，这种做法不仅让人觉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的酷暑季节，显得尤为缺乏怜悯之心。

尽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近乎疯狂，也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但他很少有机会像那个星期日那样毫无顾忌地来到这片喧嚷的奴隶老区探险。车夫绕了很多圈，打听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乌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泥沼的阴郁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中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却总觉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兀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锌皮屋顶盖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涉上帝，也无涉圣神降临节的诫命[1]。等他们终于找到地方，马车后面已经跟了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哄笑着车夫戏剧式的装扮，迫使他不得不用鞭子吓跑他们。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访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此刻为时过晚地领悟到，没有哪一种天真比他这个年龄的天真更危险了。

这是一座没有门牌号的房子，从外表看，除了镶花边的窗帘和一扇从某座古老教堂里卸下来的大门，其余并没有什么能把它和其他更为破败的房子区别开来。车夫叩了叩门环，确认地址正确后才扶医生下车。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里的昏暗处站着一个妇人，全身上下穿着丧服，耳边别着一枝玫瑰。这是个黑白混血女人，年纪不下四十，但身材依旧高挑，金色的眼睛有些冷酷，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仿佛戴着一个棉制头盔。乌尔比诺医生没能认出她来，尽管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曾在那些云山雾罩的棋局间见过她几次，有一次甚至还给她开过几服医治间日热的奎宁药方。他向她伸出手，而她用双手握住，但与其说是为了向他表示问候，倒不如说是为了扶他走进屋子。客厅里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片看不见的树林，到处是鸟语花香，摆满了精致的家具和器物，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乌尔比诺医生由此毫无感伤地想起了上世纪一个秋日的星期一，他所经过的那爿坐落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二十六号的古董商小店。女人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开始用不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2]和他交谈。

“医生，您把这儿当成家里就行。”她说，“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瞬间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他用心打量了女人一番，注意到她一身素孝，以及她悲痛中的不卑不亢。于是，他明白了，这次拜访早已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对于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遗书中所提到和指明的一切，她比他知道得更多。的确如此。她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前几个小时，一如她半生都怀着仰慕和谦卑的温柔陪伴着他一样。这种情感几乎与爱情无异，但在这座连国家机密都处于众人掌控之中的昏睡省城，竟然无人知晓。他们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医院认识的，她在那里出生，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流亡岁

月。她比他晚一年来到这座城市，声称是短期拜访，但二人心照不宣，都明白她是要永远地留下。她每星期打扫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就连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邻居都混淆了表象与真实，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残疾不仅仅是无法走路。甚至连乌尔比诺医生也从医学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她解释说：“他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之两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

前一晚他们还去了电影院，各付各的账，座位也是分开的。自从那个意大利移民加利略·达孔特在一座十七世纪的修道院废墟上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像这样去两次。那晚，他们看的是《西线无战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本小说乌尔比诺医生也读过，并为书中战争的野蛮悲痛不已。之后，他们在工作室会合，她发现他心事重重，怅然若失，以为是电影中受伤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挣扎的残酷场面所致。她邀他下棋，借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为了让她开心，他答应了，但下得心不在焉，当然，他还是用白子。最终，他比她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输了，于是毫无颜面地投了降。这时，医生才明白，那最后一盘棋局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地嘟囔了一句：

“那盘棋下得真是精妙！”

她坚持说，那并不是她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移动棋子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了爱。对弈中断时大约十一点一刻，因为公共舞会的音乐已经停止。他请求她让他单独静一静。他想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写封信。他一直把医生视作他所认识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说的，尽管能将两人联系起来的不过是象棋这个嗜好，但医生是他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在他和医生看来，下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于是，她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已经走到了解脱的边缘，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过是写一封信的时间。医生对此简直无法相信。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惊呼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十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应该是把这件事通报给大家。”医生说。

“我不能这样做，”她有些震惊，“我太爱他了。”

自认为什么话都听过的乌尔比诺医生，却从未听谁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坦荡。他全神贯注地直视着她，想把这一刻铭记心中：她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无所畏惧地裹在一袭黑衣之中，耳边别着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凉的沙滩上，两人做爱后赤裸地躺在那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突然感叹道：“我永远也不会变老。”她把这句话理解为他要与时间的劫掠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决心，但接下来他说得更为清楚直白：他决定，要在六十岁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他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刚刚年满六十。于是，他把圣神降临节的前一晚定为最后的期限，对于这座将自己奉献给圣神的城市来说，这是最大的节日。昨晚发生的事，没有一个细节是她事先不知道的。他们经常谈起它，一同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痛苦，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阻止这不可逆转的岁月洪流。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以一种毫无意义的热情热爱着生活，他爱大海，爱爱情，爱他的狗，也爱她。随着死期临近，他越来越向绝望屈服，就仿佛他的死并不是当初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无情的命运使然。

“昨晚，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她曾想过把狗带走，但他看了看它在拐杖边瞌睡的样子，用指尖轻抚了它几下，说：“对不起，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写信时，让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脚上，可她却系了个活扣，好让狗能够自己松脱。这是她对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为她希望今后还能从狗那双冰冷的眼睛里忆起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狗最终没有挣脱。她说：“那就是它自己不想了。”随后，她又高兴起来，因为她宁愿如他请求的那样去纪念这位死去的恋人，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笔，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她到家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抽烟，不断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写信，她知道，那一定是封又长又难写的信。快到三点时，街上的狗开始狂吠，她把用来煮咖啡的水放到火炉上，从上到下换上丧服，并在院中剪下清晨绽放的第一枝玫瑰。乌

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厌恶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的回忆，他认为他自有他的理由：只有没有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拜访结束前，她又对医生讲了很多事。她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她答应了自己的情人，尽管乌尔比诺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乐见寡妇做的事情。她打算卖掉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根据遗书上的安排，这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之后，她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这座穷人等死的墓穴中，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她曾体验到幸福。

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耳边回响：“穷人等死的墓穴。”这个评价绝非信口胡言。因为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它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时，也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

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馏酿制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几天，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的集市的躁动：一种新的生活。

先是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取得独立，而后又废除了奴隶制，这些都加速了贵族的衰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显赫家族在他们撤销了守卫的城堡里渐渐归于沉寂。一条条铺着石砖的崎岖街道曾经那么有效地抵御了突然来袭的战争和登陆的海盗，而如今，杂草从阳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块砌成的城墙裂开一道道缝隙，即便是最好的府邸也难逃衰败的厄运。下午两点，唯一有点儿生气的迹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传来的阵阵无精打采的钢琴练习声。府邸里，凉爽的卧室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女人们躲避着阳光，就像躲避某种令人不齿的传染病，就连在清晨的弥撒中，她们也用纱巾遮着脸。她们的爱情迟缓而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生命对她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傍晚，街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

因此，这座殖民城市的所谓独特生活不过是记忆中的一种幻觉，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每每在巴黎心生伤感之时，总是把它美化了。十八世纪，这座城市的商业在加勒比地区最为繁荣，尤其是靠着那项令人厌恶却又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常驻地。总督们喜欢待在这里，面对大洋施行统治，而不是在遥远且天寒地冻的首都，那里的

连绵阴雨会扰乱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在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期，每年，满载着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各地财富的大帆船船队都会在这里的海湾聚集多次。一七〇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圣何塞号大帆船载着当时价值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刚刚起锚开往加的斯，就被英国舰队击沉在港口的入海处，漫长的两世纪后依旧没被打捞上来。这批躺在珊瑚丛中的珍宝，连同侧着身子漂浮在驾驶舱的船长尸体，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提起，作为这座淹没在记忆之中的城市的象征。

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坐落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从门口到厨房，铺的是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之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个人嗜好，却忘了这也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大师们的通病，而在本世纪初，这个地区暴发户的房子都是由他们建造的。大厅很宽敞，天花板像所有其他房间一样很高，还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厅和厨房之间，由一扇装饰繁复的巨大玻璃门隔开，上面雕着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铜制树林里，几个少女正陶醉在农牧神的笛声之中。主客厅中的所有家具，连同大厅里那座像个活岗哨的摆钟，全都是十九世纪末的正宗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塞弗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爱为主题的雪花石膏异教小雕塑也随处可见。不过，这种欧式风格在房子的其余地方就见不到了，那些空间混杂着藤制扶手椅、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凳子。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张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上面用丝线绣着主人的名字，哥特式字体，两边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一侧原本是设计用来举办豪华晚宴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小音乐厅，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来到此地，都会受邀来这里举行

私人音乐会。地砖上铺着从巴黎世博会上买回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让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摆放整齐的唱片架旁是一台最新款的电唱机。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盖着一块马尼拉披肩，乌尔比诺医生已经有很多年没弹琴了。整座房子里，随处可以看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的精明与细心。

然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书房那样尽显庄严与肃穆。在衰老将乌尔比诺医生掳获之前，那里曾是他的圣地。在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带皮制软垫的安乐椅四周，他让人用上釉的隔板架把墙壁连同窗子都挡得严严实实，然后以一种近乎癫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三千册书，每一册都装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缩写。其他房间都不得不忍受着港口的嘈杂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书房却截然相反，永远弥漫着修道院的幽静气息。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炽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便成了拉曼加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先在卧室的昏暗中睡个午觉，然后下午坐在门廊上，望着来自新奥尔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货船和带木制桨轮的内河船来来往往，简直是一种享受。一到黄昏，那些内河船便灯火通明，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将淤积在海湾里的垃圾卷走。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北方的信风会肆意地掀开屋顶，夜里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在房子周围呼啸盘旋，寻找可以钻进来的缝隙。在这种时候，医生的家也是保护得最好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安居在这样一座坚实牢固的房子里的夫妻，会有什么理由不幸福。

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乌尔比诺医生在十点之前回到家时，并没有感到幸福。两次拜访搅得他心烦意乱，还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错过了圣神降临弥撒，而是在这样一个一切似乎都应该尘埃落定的年纪，它们险些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想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豪华午宴前凑合睡上一会儿，却赶上仆人们乱哄哄地在捉鹦鹉。那只鹦鹉趁着人们把它从鸟笼里抓出来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时，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杈上。这是一只毛羽稀疏且性情怪僻的鹦鹉，别人求它开口，它偏不说，而就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说个没完，而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种条理甚至在人类身上都难得一见。它是由乌尔比诺医生亲自训练的，这让它拥有了家中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医生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没有享受过。

它在这个家已待了二十多年，但谁也不知道这之前它还活过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觉醒来，乌尔比诺医生都与它为伴，坐在整个家中最凉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医生怀着教育家的热情，借助了最为艰辛的手段，一直训练到鹦鹉能把法语讲得像个学者一样好。之后，纯粹是出于对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鹦鹉学会了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玛窦福音》[3]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甚至试图机械地向它灌输四则运算法则，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几回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带回了城中第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还有许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让鹦鹉聆听上个世纪风靡一时的依维特·吉尔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鹦鹉最终把这些歌都背了下来。唱那位女歌手的歌，它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它则用男高音，最后，还用一阵放荡的笑声来收场，和女仆们听完它用法语演唱的歌曲后爆发出的哄笑声一模一样，惟妙惟肖。这只鹦鹉美名远扬，常有一些乘内河船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要求一睹它的风采。那时期，有很多英国旅游

者乘坐来自新奥尔良的运输香蕉的船只途经此地。有一次，几个英国佬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把它买走。然而，鹦鹉最为荣耀的时刻还得数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来到这座府邸，想亲眼证实它声誉的那天。他们大约下午三点钟到达，个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长礼服，热得喘不过气来。三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正式会晤，在八月炽热的天空下始终不曾脱去这身装束。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怎么带着好奇心来，还怎么带着好奇心回去，因为在两小时的绝望等待中，不管乌尔比诺医生如何恳求或威胁，鹦鹉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在说“嘴长在我自己身上”，可就连这句话也绝不宣之于口。医生当众出了丑，怪只怪他当初不听妻子明智的提醒，执意发出了这个莽撞的邀请。

在那次历史性的无礼举动之后，鹦鹉仍旧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权，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神圣地位。在这个家，除了它和一只陆龟，不许饲养其他任何动物。那只陆龟曾消失过三四年时间，大家都以为永远地失去它了，可它竟又在厨房里出现。不过，它并不被视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种矿物质，一个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且向来没人能说清它究竟待在什么地方。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这些理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4]。

与此相反，他的妻子费尔明娜·达萨却是个热带花卉和家养动物的盲目热爱者。她如今七十二岁了，早已失去年轻时小母鹿一样的身

姿。刚结婚时，她利用两人间爱情的新鲜劲儿，在家里养了许多动物，远远超出了理性范畴。最先养的是三只达尔马提亚斑点狗，分别给取了三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它们为了在一只母狗面前争宠，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只名叫麦瑟琳娜[5]的母狗也真无愧于它的名字，刚刚产下九只狗崽，就又迅速怀上了十只。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又养了几只集老鹰轮廓和法老风范于一身的阿比西尼亚猫、几只斜眼的暹罗猫和橘黄色眼睛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像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各个卧室里窜来窜去。到了发情期，从它们的妖魔聚会上传来的号叫声搅扰着夜晚的平静。有几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竟还有一只用铁链拴着腰的亚马孙长尾猴，由于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极其丰富的肢体语言都酷似大主教奥布杜利奥一雷依，常常引来人们的某种同情。但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之所以抛弃它，还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它有向女人们献殷勤并自鸣得意的坏毛病。

走廊的鸟笼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危地马拉鸟，此外，家中还有几只未卜先知的石、几只黄腿修长的沼泽草鹭和一只常常从窗外探进头来啃咬花瓶中的火鹤的小鹿。在最后一次内战爆发前不久，当第一次有传言教皇可能会来到此地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当得知教皇来访的传闻不过是政府为了恐吓图谋不轨的自由党人而散布的谣言时，这只鸟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来得还快。还有一次，他们从库拉索岛走私者的帆船上买回六只关在一个金丝鸟笼里的香乌鸦，和费尔明娜·达萨小时候起就在父亲家养的香乌鸦一模一样，她希望嫁人以后还能继续养这种鸟。可它们总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家里充满了它们身上那种殡葬花圈似的气味，谁都无法忍受。他们还曾带回来一条四米长的蟒蛇，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气息吓跑蝙蝠、蝾螈，以及雨季里侵入家中的多种害虫。尽管也达到了目的，可这位不眠猎手嗤嗤的呼吸声扰乱了卧室黑暗里的宁静。当时正怀着职业道德

忙得不可开交，并且醉心于社交和文化事业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虽然身处这样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地区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筋疲力竭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撞进一场将他推回现实的灾难。从客厅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动物的尸体连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都爬到了椅子上，满脸的不知所措，显然，是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是这样的：几只德国獒中的一只突然得了狂犬病，发起疯来，不管见到什么动物都扑上去咬，最后还是邻居家的园丁挺身而出，挥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咬过哪些动物，又或者它嘴里吐出的那些绿色泡沫沾染过哪些，于是，乌尔比诺医生下令杀掉所有幸存的动物，并把尸体带到偏远的旷野焚烧，还请仁爱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那只象征好运的雄性美洲陆龟，因为根本没人想起它来。

费尔明娜·达萨头一次在家庭事务上完全赞同丈夫，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地没再提过动物的事。她用林奈《自然史》中的彩色插图聊以自慰，还叫人把这些图镶上画框，挂在大厅墙上。若不是有天清晨几个小偷打破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五代家传的银制餐具，或许她早已断了念头，以为再也没有希望在家中看到动物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子的铁环上装了双锁，各道门也都用铁闩加固，并把最贵重的物品放进保险箱，还养成了某种迟来的战时习惯：睡觉时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但他反对再买一条烈狗，无论是否注射过疫苗，也无论是散养还是拴着：就算让贼把家里偷个精光，他也绝不同意。

“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

这么说是为了让妻子不再为此事纠缠，因为她又固执地想买一条狗回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自己匆忙说出并且意义过于宽泛的话竟会有朝一日要了他的命。费尔明娜·达萨那桀骜不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立刻抓住丈夫用词轻率的疏漏：失窃案发生几个月后，她又去了一艘来自库拉索岛的帆船，买下一只帕拉马里博皇家鹦鹉。虽然它只会说些水手的粗话，但说得竟和真人一模一样，也算值了十二生太伏的高价。

这只鹦鹉的确品种优良，而且比看上去还要灵巧，长相上唯一区别于热带丛林鹦鹉的地方就是它头黄舌黑，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无法让丛林鹦鹉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向来是个输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了头，并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觉得鹦鹉在女仆们的嬉笑中取得的进步十分逗趣。雨天的下午，这只羽毛被淋透的鹦鹉尤其欢快，放开了舌头，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它不可能在这个家里学到的老话儿，让人觉得它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丝保留终于在某天晚上被彻底瓦解。那天夜里，几个盗贼再次试图从屋顶平台的天窗钻进屋里，而鹦鹉用几声德国獒的狂吠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无法叫得更逼真了，而它一边叫，还一边喊着“有贼”、“有贼”，这两种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这个家学的。自那以后，乌尔比诺医生就亲自接管了它。他命人在芒果树下搭起栖木，上面放两个容器，一个盛水，一个盛熟香蕉，此外，还挂了根吊杆供鹦鹉练习杂耍。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怀疑，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夜晚转凉，当北风使得鹦鹉无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时，它便会被放进一只罩有毯子的笼子里，接进卧室睡觉。多年来，他们总是为它剪短翅膀的羽毛，放它自在地迈着那老骑士般的步伐，曲着腿走来走去。但有一天，它正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耍着杂技，却一下子掉进了炖杂烩的锅里，嘴里还

念叨着它那一串叽里呱啦的水手呼救语。幸而它的运气足够好，厨娘用做饭的大勺把它捞了起来。它被烫得全身通红，羽毛也掉光了，但还活着。从那以后，就连大白天它也被关在笼子里，顾不上民间流传的关于笼中的鹦鹉会忘记所学东西的说法了，只有在凉爽的四点钟，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露台给它上课时，它才会被放出来。谁也没有及时发现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准备给它修剪羽毛，它逃到了芒果树的树冠上。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

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撬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

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

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

“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

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

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而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

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

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

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

“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

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小便不仅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入老龄的

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

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

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习惯；更何况，丈夫自己也曾在某个忘恩负义的时候这样干过；再者，她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帮助他践行死亡的决定，这本身便是令人心碎的爱的明证。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因为如此严肃的理由而决定去死，那我的责任便是做和她同样的事。” 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茫然的十字路口，妻子这种武断的不理解已经让他恼火了整整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里开始噙满瞬间而来的泪水，但她装作没有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么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以及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像曾经那样爱他了。”

她帮他把怀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上，又为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结，扣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为他擦干眼泪，又弄干净胡子上沾着的泪珠，然后把手绢的四角打开，折成一朵洋玉兰的形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时，摆钟敲响的十一下钟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快点。”她边说边挽起了他的手臂，“我们要迟到了。”

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妻子阿敏塔·德昌普斯和他们那七个一个赛一个机敏的女儿已经筹划好一切，志在让这次二十五周年纪

念午宴成为当年的社交大事。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正中心，过去是一座造币厂，经一位佛罗伦萨建筑师的捣鼓而面目全非。这位建筑师像一股革新的邪风途经此处，把不下四处十七世纪的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家有六间卧室和两个用来会客兼用餐的大厅，十分宽敞，而且通风效果极佳，但还是接待不了人数众多的城内来宾，更何况还有一批着意挑选的外埠宾客。至于他家的院子，则如同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落一般，中央有一座石砌的喷泉在低声吟唱。黄昏时，花坛中香水草的芬芳在整幢房子里弥漫。但拱廊下的这片天地仍不足以容纳那些姓氏显赫的贵宾。因此，他们最终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走皇家公路需要十分钟。那里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大院子，种着高大的印度月桂树，缓缓流淌的小河中漂浮着土生土长的睡莲。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在奥利维利亚夫人的带领下，在没有树荫的地方支起彩色的帆布篷，而在月桂树下则用许多张桌子拼起了长长的餐台，全部铺上亚麻桌布，摆了一百二十二套餐具，主宾席上还摆放着一簇当天采下的玫瑰花。他们为乐队搭了一个台子，其中，管乐队只负责演奏对舞舞曲和民族华尔兹，还有一支从艺术学校请来的四人弦乐队，是奥利维利亚夫人专门为丈夫德高望重的老师准备的惊喜—午宴将由老师主持。尽管这天并非医生实际的毕业纪念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为的是突出喜庆的气氛。

准备工作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了，生怕有什么必要的事因为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他们派人从希耶纳加·德奥罗带来了活母鸡。这些鸡在整个沿海地区都很有名，不仅仅因为个大味美，更因为殖民时期，它们在冲积土区域觅食，从它们的砂囊中可以找出纯金的沙粒。奥利维利亚夫人还在几个女儿和仆人的陪伴下，亲自登上豪华的远洋轮船，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丈夫的成就。一切都

在她的预料之中，只除了一点，那就是庆典设在六月的一个星期日，而这一年的雨季姗姗来迟。当天早晨，她出门去望大弥撒时便感到危机四伏。空气中的潮湿让她惶恐，接着又发现天空阴沉，气压很低，甚至连海平线都看不见了。尽管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她在望弥撒时碰见的天象观测台台长却提醒她，在本城多灾多难的历史当中，即便在最严酷的冬天，圣神降临节这天也从来没下过雨。然而，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当很多客人在露天开始品尝开胃酒时，一声孤独的霹雳震颤了大地，一阵从海上席卷而来的恶风掀翻了桌子，把篷布吹到了天上，灾难性的暴雨倾泻而下，天仿佛塌了下来。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在路上碰见的最后一拨客人一起，终于在暴风雨的混乱中艰难到达。他本想和那些客人一样，下车后踩着一块块石头，跳着跃过一片汪洋的院子冲进屋去，但最终还是难堪地被堂桑丘的伙计们遮在一顶黄色帆布的华盖下，用胳膊抱了进去。七零八落的桌子已经被尽可能完善地重新安置在室内，就连卧室也摆满了，而客人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掩饰他们那副落难的模样。屋里热得像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因为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以免雨水被风斜吹进来。在院子里时，桌上每一个位置都摆放着写有宾客姓名的卡片，并且按照习惯，一侧是男士，另一侧是女士。但到了屋里，名签被混在一处，众人只得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这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造成了男女混坐的局面，破天荒头一遭地打破了我们的社交迷信。在这场灾变中，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6]仿佛时时刻刻都无处不在似的。尽管头发被淋得透湿，华美的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但她从容地承受着这场不幸，脸上始终挂着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不可战胜的微笑，不让厄运有片刻得意的机会。她靠着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尽可能地重新安置了主宾席，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坐到正中间，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坐在他的右首。费尔明娜

·达萨则像往常一样紧挨着丈夫落座，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上睡着或是把汤洒在翻领上。对面的位子坐着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他已年过半百，略带女人气，保养得非常好，那股子爱热闹的劲头与他精湛的医术毫不相称。主桌的其余位置都被省市要员占满了，还有一位前一年的选美皇后，省长挽着她的手臂，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尽管当地并没有习惯要求来宾的穿着，更何况这还是一次乡间宴会，但女人们个个都身着晚礼服，佩戴着全套的珠宝首饰，而男人们大部分身穿深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有的还穿上了呢子长礼服。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穿日常的服装，这其中就包括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份烫着金边的法文菜单。

奥利维利亚夫人担心闷热难耐，走遍整个屋子恳求客人们在用餐时脱掉外套，但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大主教提醒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在这里，自独立以来一直把国家弄得血雨腥风的内战双方，头一次抚平创伤，摈弃仇恨，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这种想法颇合那些激情澎湃的自由党人，尤其是年轻党员的意，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自己党派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却不以为然：他完全不觉得一位自由党总统和一位保守党总统有何不同，最多是前者的衣着稍差一点。但他不想反驳大主教，尽管他本想向他指出，午宴中的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并非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后者向来都是凌驾于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会座无虚席。

暴雨骤然停息，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太阳立刻炽热地燃烧起来，万里无云。只是刚才的暴风雨太过猛烈，有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泛滥的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厨房。有几个

烧柴火的炉灶是用砖在后院里露天搭建的，厨师们没来得及把上面的锅从大雨中抢救出来。他们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儿，才把被大水淹了的厨房清理干净，并在后廊上临时架起了几个新炉灶。不过等到下午一点，紧急情况已经解决，只差由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负责的饭后甜点了，她们原本承诺会在十一点之前送达。大家担心皇家公路旁的溪水又漫上来，就像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果真如此，那甜点便不可能在两小时内送来了。雨刚一停，窗子就马上打开，被暴雨中的硫黄清洁过的空气吹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清爽了。随后，乐队奉命在门廊的露台上演奏节目单上的华尔兹舞曲，但他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躁动，因为铜管乐器发出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人们不得不大声叫嚷才能交谈。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已经厌倦了等待，微笑得快要落泪，于是下令立即上菜。

接下来轮到艺术学校的乐队演奏。在为最初的旋律争取来的一阵表面的肃静中，一曲莫扎特的《狩猎》缓缓响起。尽管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也尽管堂桑丘的黑人仆役们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肴在餐桌间挤来挤去、磕磕碰碰，乌尔比诺医生却始终能保持一条畅通的渠道，把所有曲目听完。他集中精力的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都必须把每一步记录在纸上，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然而，他竟仍然能够在进行一场严肃交谈的同时，不错失音乐的旋律，尽管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位挚友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奥地利结交了一名德国管弦乐队的指挥，能够一边听着《唐豪瑟》，一边看《唐璜》的乐谱。

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乌尔比诺医生觉得他们把戏剧性表现得过于肤浅了。他一边透过餐具和盘子发出的新一轮噪音，艰难地听着演奏，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位正向他微微点头致意的面

色微红的年轻人身上。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人名，即便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而对过去听过的某段旋律也常常如此。这给他带去了极大痛苦，某天夜里，他甚至宁愿死掉，也不愿忍受失忆的煎熬直到天亮。正当他又差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这个年轻人去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惊讶于在这里见到他，在这个被拣选者的王国里。可奥利维利亚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儿子，来这里准备法医论文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礼。但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乌尔比诺医生从未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在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家的实习医生。

由于再一次战胜了衰老，他感到轻松了许多，陶醉在最后一支曲子那清澈而流畅的抒情旋律中，虽然他并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后来，乐队中年轻的大提琴手告诉他，那是一首加布里埃尔·福雷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但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他甚至听都没听人说起过。费尔明娜·达萨像往常一样时刻留意着他，特别是看到他当众陷入沉思时。她停止用餐，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将他拉回现实，对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乌尔比诺医生茫然失神地冲她笑了笑，在这时，他才再次想起那件她所担心的事。他想起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仿佛看见他此刻正穿着那身假军装，戴着那些道具勋章，躺在棺材里，暴露在墙上照片里孩子们指责的目光下。他转过身，把自杀事件告诉大主教，可大主教早已经知道了。大弥撒一结束人们就议论纷纷，大主教甚至接到了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的申请，代表所有加勒比流亡者请求把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安葬在圣地。大主教说：“我认为这申请本身就是缺乏敬意的表现。”接着，他又用更具一点儿人情味的口吻问医生，是否有

人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则用一个自认为瞬间发明但准确无误的词回答了他：衰老恐惧症。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身边几位客人身上的奥利维利亚医生，此刻稍稍怠慢了他们，加入到老师的谈话中来。他说：“现在还能碰见不是因爱情而自杀的人，真是遗憾。”乌尔比诺医生见爱徒的想法竟和自己如出一辙，并没有感到惊奇。

“而且，最糟的是，”他说，“他用的是氰化金。”

说这话时，他感到对死者的同情再次战胜了那封信带来的痛苦，对此他并不感谢妻子，而是感谢音乐的奇迹。于是，他向大主教说起这位他在对弈的漫长下午认识的世俗圣人，说起他用自己的艺术为儿童的幸福所做的奉献，说起他对一切世事罕见的博学，以及他那简朴的生活习惯。说着说着，医生自己突然也对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纯洁的灵魂惊讶不已，这种纯洁早已彻底地将他同他的过去割裂开来。随后，医生又向市长提议，应当买下摄影师所有照片的底片，以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或许这代人在照片以外再也无法获得幸福，但这座城市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主教对一位有教养的天主教战士竟会将一个自杀者称为圣徒感到十分恼火，但他赞同留存底片的提议。市长想知道该向谁去购买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着，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把底片的秘密继承人说出来。他说：“我来负责此事。”并为自己对那位女士保持了忠诚而感到释然，因为就在五小时前，他还鄙视过她。费尔明娜·达萨看出了这点，她低声让他保证会去参加葬礼。当然会去，他轻松地说，责无旁贷。

宴会上的讲话简短而浅白。管乐队开始转为通俗风格，演奏起节目单上没有的曲子来。宾客们在露台上散着步，等待着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把院子里的积水排干，然后看谁有兴致跳上一曲。唯有主宾席

的客人们还留在大厅里，正为在最后祝酒时把小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的乌尔比诺医生喝彩。谁也不记得他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平常，只有为了搭配极为特殊的菜肴，他才会偶尔喝上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但那天下午，心情使然，他的懦弱被很好地弥补了：过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有了唱歌的兴致。若不是因为一辆崭新的汽车突然到来，他无疑会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年轻大提琴手的邀请高歌一曲。汽车穿过泥泞的院子，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并用它那鸭子叫似的喇叭声，把围栏里的鸭子惊得一阵乱叫，最终停在了门廊前。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从车上走下来，四只手各端着一个用镂空花边布盖着的托盘。还有很多同样的托盘放在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摆到了司机脚边。原来，这些就是迟来的餐后甜点。在众人的掌声和亲切的哄笑声停息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在下雨之前就请他帮忙把甜点带过来，但他开上皇家公路后又折了回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家中失火了。还没等儿子把话讲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大惊失色。但妻子及时提醒他，是他自己把消防员叫去抓鹦鹉的。尽管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咖啡，但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容光焕发，决定让客人们再去露台上享用餐后甜点。不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没有去，因为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时间能让他在葬礼前睡上他那神圣的午觉了。

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

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幸亏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一并砍倒。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 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入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唯一的一点安慰—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就是性欲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柠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

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

“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7]。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

一的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8]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入，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

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经常有人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在民族于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要胜过她们所有人数倍。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受的

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他们纷纷来到大街上，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采只是一种传说。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金丝”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金丝”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外不会敞开家门。

家里笼罩在一片丧葬的气氛之中。所有贵重物品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墙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幅幅绘画曾挂在那里的痕迹。自家的和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靠墙放着，从客厅一直摆到卧室。大家具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蒙着白布躺在角落里，空旷的房间仿佛没有边际，声音像幽灵似的回荡着。在书房中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遗体躺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没有棺木，脸上凝固着那最后的惊恐，身穿黑色披风，佩戴着圣墓骑士团战斗的长剑。在他旁边，全身孝服、颤颤巍巍、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明娜·达萨接受着吊唁，毫无失态之举，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身子，直到次日上午十一点。那时，她站在门廊上，挥挥手帕，说一声“再见”，送别了丈夫。

自从听见蒂戈娜·帕尔多在院子里的喊叫声，看见心爱的老头儿在泥水里垂死挣扎，到如今她能恢复如此自控的状态实属不易。起初她的第一反应是仍有希望，因为丈夫还睁着眼，而且他眼中那四射的

光芒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恳求上帝能够给她哪怕片刻的时间，好让丈夫在离去之前知道，无论两人间有过什么样的猜疑，她始终是那么爱他。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希望能与他从头再来，重新开始生活，好让两人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对方，把所有过去做错了的事重新做好。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从那时起，她心头没有片刻安宁，但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任何表情泄露出内心的痛苦。唯有那么一瞬间她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那就是星期日晚上十一点钟，人们把那口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抬走的时候。棺木散发出轮船上那种萨波林油漆的味道，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下令立即盖棺，因为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那许许多多鲜花散发出的气味使得整个家里的空气都稀薄了，而且他隐约在父亲脖子上看到了最初的紫色斑痕。沉静之中，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活到这把年纪，人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腐烂一半了。”盖棺前，费尔明娜·达萨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了亡夫手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盖在他手上，就像往常发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时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他说。

隐身在众多社会名流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感到体侧仿佛被刺了一刀。费尔明娜·达萨在第一批吊唁者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在那个慌乱的晚上，没有人比他出现得更及时，也没有人比他更尽力。是他把人满为患的厨房安排得秩序井然，让咖啡供应充足。当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不够用时，是他找来更多的椅子；当屋里的花圈堆得多一个也放不下时，又是他让人把余下的都放在院子里。他忙前忙后，留意不让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家的客人缺少了白

兰地。这些客人在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时听闻噩耗，惊慌失措地赶来，围坐在芒果树下继续他们的欢闹。当逃跑的鹦鹉昂着脑袋，张着翅膀，大半夜出现在客厅中时，全屋人都不寒而栗，认为它是被悔恨所驱使，唯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如何及时应对。他一把抓住鹦鹉脖子，让它来不及叫出任何一句愚蠢的口号，便被关进一个盖着布的笼子，带到了马厩。他就这样打理着一切，那般地谨慎有效，谁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干涉别人的家事，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处于危难的时刻，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帮助。

一如看上去的那样：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且举止稳重的老人。他身体硬朗挺拔，皮肤是褐色的，汗毛稀少，银色金属架的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唇上留着浪漫的小胡须，胡子尖上涂着胶，虽然这种做法已有些过时。他把最后几绺鬓发向上梳起，用发蜡粘在光亮的脑壳中央，以此作为解决完全秃顶的最终办法。他那天生的文质彬彬和忧郁的气质能让他迅速地赢得好感，但在一个顽固的单身汉身上，也往往被视作两种可疑的品质。为了不让人察觉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他已达七十六岁高龄，他花了很多金钱，也费了很多心思，并付出了坚毅的努力。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默默爱得更深。

尽管六月热得如同地狱，但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始终都穿着自己刚刚听到消息时穿的那身衣服。他平时也总是这身打扮：配有背心的深色呢子外套，赛璐珞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带，一顶毡帽，手里一把兼作拐杖的黑绸雨伞。但当天蒙蒙亮时，他从守灵的地方消失了两个小时。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他又神采奕奕地回来了，胡子刮得整整齐齐，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馨香。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呢子长礼服，这样的衣服他平时已经不穿了，只有参加葬礼和复活节圣

周活动时才穿。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翼领上打了一个艺术家式的蝴蝶结，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他仍旧带上了雨伞，但这次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他确定当天十二点以前就会下起雨来。他把可能下雨的事告诉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他是否可以把葬礼提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自航运世家，本人就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可以说对预测天气十分在行，因此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了。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政界、军界、公共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的乐队、各教会学校和宗教团体间进行及时协调，因为大家本已商定在十一点举行葬礼。于是，这场预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葬礼最终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哗啦哗啦地踩着泥泞，最终到达乌尔比诺医生家的墓地。墓地被一株殖民时期的木棉守护着，它那繁茂的枝叶一直延伸到围墙之外。就在这同一片树荫下，在墙外的一小块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土地上，加勒比的流亡者们前一天下午刚刚安葬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且按照他的遗愿，把狗葬在了他身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终到达墓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连内衣都被淋透了，惊恐万分地回到家，担心自己会染上肺炎，让这么多年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保护身体的努力付之东流。他让人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坐在床上用它冲服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裹在羊毛被里出了一身大汗，直到恢复了体力。再次回到守灵处时，他感到精神饱满。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执掌起家务来。家里已经打扫过，准备接待客人。书房的小祭台上摆放了一张已故男主人的画像，是用蜡笔画的，画框上系着黑丝带。晚八点时，宾客满堂，天气就像前一晚一样炎热。念过玫瑰经后，有人四下请求大家早些回去，以便让亡者的遗孀好好歇歇，因为她从星期日下午以来还不曾休息过。

对大部分客人，费尔明娜·达萨站在祭台旁向他们告了别，而对那些留到最后才走的挚友亲朋，她一直送到了街边的大门口，并准备像往常那样，亲自将大门关好。正当她打算用最后一丝力气把门合上时，看见了身穿丧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高兴起来，因为在很多年前，她就已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而此时是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他，看见他的样子从遗忘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可费尔明娜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到访表示感谢，他便颤抖而又庄重地将帽子放到胸口的位置，让许久以来支撑他活下来的相思之苦一股脑儿迸发出来。

“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若不是有理由认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一刻是受到了圣神恩典的启示，费尔明娜准会以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即刻的反应是想咒骂他在自己丈夫尸骨未寒时就来亵渎自己的家庭。但盛怒带来的威严制止了她。“你滚开！”她对他说，“在你的有生之年，都别再让我看见你。”她将正要关闭的大门再次完全敞开，斩钉截铁地说：

“我希望这也没有几年了。”

她听着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渐消失，然后慢慢地关上大门，上了门闩，别好锁头，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刻之前，她从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年仅十八岁时造成的那个悲剧的分量和后果，从未意识到它竟会一路跟随自己直至死亡。从丈夫出事的那个下午以来，她第一次哭了，哭的时候没人在场，这也是唯一能让她哭出来的方式。她为丈夫的死而哭，为自己的孤独和愤怒而哭。走进空荡荡的卧室

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因为自从她不再是处女之身以后，便很少独自睡在那张床上。和丈夫有关的一切都令她触景伤怀：带穗的拖鞋，枕下的睡衣，梳妆台上没有了他身影的镜子，以及他留在她皮肤上的味道。一个莫名的念头使她浑身一颤："当被人爱着的人死去时，真该带上他所有的东西。"她不想让别人搀扶她上床，也不想在睡前吃任何东西。痛苦压得她喘不上气来，她祈求上帝今晚就让她在睡梦中死去。带着这个幻想，她脱掉鞋，和衣躺下，顷刻间便睡着了。她在不知不觉中入睡，但她知道自己仍旧活着，她知道床空出了半边，自己像往常一样躺在左边，却没有了右边的另一个身体来保持平衡。她一边睡，一边想。当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睡觉了，她在睡梦中哭了起来。她一边睡,一边抽泣，却始终没有变过姿势，仍旧躺在床的左边。直到公鸡打鸣，直到这个没有了他的清晨那不受欢迎的阳光惊醒了她。之后，她又躺了许久。到了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睡了很久却并没有死去，而是一直在梦中哭泣；才发现自己边睡边哭，想得更多的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非她那死去的丈夫。

---

[1]圣神降临节是纪念耶稣复活后第五十日圣神降临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日子。

[2]卡斯蒂利亚语，即通常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同时也是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3]《玛窦福音》即《马太福音》，是天主教的通常译法。

[4]据《新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夕，曾预言他的门徒中最忠诚的伯多禄（即圣彼得）会在天亮鸡叫前三次背叛他。结果预言应验，耶稣被抓走后，伯多禄被人问起时，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

[5]麦瑟琳娜，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任妻子，以狠毒和放荡著称。

[6]即前文的阿敏塔·德昌普斯，这是冠夫姓后的名字。

[7]原文为法语。

[8]四月花会，为纪念花神芙洛拉而举办的庆祝活动，起源于古罗马。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从当初费尔明娜·达萨在两人那段长久而受阻的爱情之后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他，便没有一刻不在思念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无需每天在地下室的墙上划条线备忘，因为没有哪一天不发生点什么让他想起她来。决裂那年，他和母亲特兰西多·阿里萨住在窗户街一座租来的普通房子里。母亲从年轻时起就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还拆些旧衬衫和破布，卖给战争中的伤员当药棉用。他是独生子，是母亲和那位鼎鼎有名的船主皮奥第五[1]·罗阿依萨先生一次偶然结合的产物。后者兄弟三人曾共同创建了加勒比河运公司，为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蒸汽机船航行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先生去世的时候，这个儿子只有十岁。虽然他一直暗中承担着儿子的抚养费用，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他，也没有为他的前途做好安排。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用了母亲的姓氏，尽管他真正的出身人人皆知。父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电局当了学徒。在那里，他被安排给邮袋拆封，分发信件，并负责在邮件到达时通知大伙儿，哪个国家的邮件到了，他就要在邮局门口升起哪个国家的国旗。

他的聪明伶俐引起了电报员洛达里奥·图古特的注意。洛达里奥是个德国移民，除了这份报务工作，还在大教堂的重要仪式上弹管风琴，并兼做音乐家教。他教弗洛伦蒂诺摩尔斯电码，教他发电报，还教他拉小提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上了几堂课，就能像一个职业

小提琴手那样，耳听乐曲，跟着旋律拉琴了。他在十八岁认识费尔明娜·达萨时，是他那个圈子中最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最会跳时髦的舞曲，还会朗诵伤感的诗歌，而且随叫随到，用小提琴为朋友的女友献上一曲小夜曲独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骨瘦如柴，印度人似的头发上打着飘香的发蜡，一副近视眼镜更让他显得楚楚可怜。除了视力上的缺陷，他还患有长期便秘，这迫使他一辈子都依靠灌肠剂。他只有一套像样的礼服，是父亲的遗物，但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打理得很好，弗洛伦蒂诺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像新的一样。尽管他身材瘦削，性格内向，衣衫简陋，他那个圈子里的姑娘们却都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一直这样与她们厮混。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费尔明娜·达萨，天真的日子就此结束。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洛达里奥·图古特让他去给一个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一封电报，电报上未写明住址。他最终在福音花园找到了这位洛伦索·达萨。他家是福音花园中最古老的房子，旧得几乎要倒塌下来，里面的院子也像个修道院的内院。花坛里杂草丛生，石砌的喷泉池里一滴水也没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跟着赤脚的女佣走在走廊的拱顶下，没有听见一点儿人声。走廊上堆着尚未打开的搬家箱子，泥瓦匠的工具扔在用剩的石灰和一包包堆起的水泥中间，因为当时那所房子正在进行一次彻底修缮。院子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午睡。男人很胖，鬈曲的络腮胡和嘴上方的胡子连在一起。他的名字正是洛伦索·达萨。这个人在城中并不出名，因为他不到两年前才来到这里，而且不喜欢交际。

他收下电报时的样子就仿佛仍处在一场噩梦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礼貌的同情看着他那双青紫色的眼睛，看着那颤抖的手指费劲地撕开封口处的邮票。这种内心的恐惧弗洛伦蒂诺在很多收信人

身上都看到过，他们始终无法不将电报同死亡的消息联系到一起。但读罢电报，他恢复了情绪，长吁一口气说：“好消息。”他递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实打实的五个里亚尔，并用一个轻松的微笑让他明白，若是坏消息，自己绝不会如此慷慨。接着，他和弗洛伦蒂诺握手道别，这可不是通常和电报邮递员告别的方式。女佣把他送至临街的大门口，但与其说是为给他领路，不如说是为了监视他。他们原路返回，又走过那个带拱顶的走廊。但这一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因为敞亮的院子中回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反复朗读一篇课文。从缝纫室前经过时，弗洛伦蒂诺透过窗子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个少女。两人坐在两把紧挨的椅子上，一起读着一本摊开在妇人裙兜上的书。这一幕看上去颇为奇特：竟然是女儿在教妈妈读书。但弗洛伦蒂诺其实只猜对了一半，这位妇人是女孩的姑妈，并非母亲，虽然一直以来，她就像母亲一样抚养着她。朗读没有中断，但女孩抬眼看了看是谁走过窗前。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

关于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打听到的就是在霍乱后不久，他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这里。当初看见他们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们是来此定居的，因为这家人把一个配备齐全的家所需要的一切都带来了。女儿还很小时，他的妻子就去世了。妹妹名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因为正在还愿，上街时总是身穿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服，回家后则只在腰间系上修士服的腰带。女孩十三岁，和已故的母亲同名，叫费尔明娜。

大家推测洛伦索·达萨是个有钱人，因为没人知道他有什么职业，但他生活却很富足。他用真金白银买下了福音花园的房子，而修缮费用至少是他买房所用的二百个金比索的两倍。女儿在至圣童贞奉

献日学校上学。两个世纪以来，上流社会的小姐们都会到那里去学习相夫教子的艺术和职责。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期，那里只接收名门望族的千金。但后来，那些被独立战争搞垮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向新时代的现实妥协，于是学校向所有付得起学费的人敞开大门，不再忧心她们的门第出身。但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入学的姑娘们必须是天主教家庭合法所生。不管怎样，那都是一所昂贵的学校，仅仅是费尔明娜·达萨在那里上学就表明了她家的经济实力，即便其社会地位未必出众。这些消息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受到鼓舞，因为这一切都表明，这位长着一双杏核眼的美丽少女是他梦寐以求的姑娘。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姑娘父亲的严厉管教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孩们都是结伴或是由一位年长的女佣陪伴上学，而费尔明娜·达萨不同，她的身边总跟着那位独身的姑妈，而且她的言行举止处处表明，她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娱乐活动。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是以这种天真的方式开始了他孤独狩猎者的秘密生涯。从早七点起，他就独自一人坐在花园中一条不易被发现的长椅上，在杏树的树荫下假装读一本诗集，直到看见那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走过。她身着蓝色条纹校服，带吊袜带的长袜一直拉到膝头，脚下一双系着交叉鞋带的男士短靴，一条粗粗的辫子从后背垂至腰间，辫梢上系着一个蝴蝶结。她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步履轻快，鼻翼微收，交叉的双臂紧抱着胸前的书包。她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似的。在她身旁，身穿圣方济各会的褐色修士服、系着修士腰带的姑妈以吃力的步伐紧紧跟随，不给别人留出丝毫靠近她的空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天看着她们来回经过四次，星期日还有一次看着她们望完大弥撒从教堂走出来的机会。只要能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他就心满意足了。慢慢地，他将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中的情

感全都归属于她。两个星期后，除了她，他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决定给她写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两面都被他用书记员般漂亮的字体写得满满当当。但便条在口袋里装了好几天，他却一直不知该如何交给她。就在想法子的过程中，他每晚临睡前又会写上好几页。于是，最初的一封短信变成了一部写满甜言蜜语的宝典。里面词句的灵感都来自在花园等待时因反复阅读而背下来的书籍。

为找到送信途径，他试图认识几个奉献日学校的学生。可是，她们和他的世界相距太远了。而且，反复衡量后，他觉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意图并非明智之举。他还打听到，费尔明娜·达萨刚到这里不久，有人邀请她参加一次星期六舞会，而她的父亲只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就阻止了她："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信已经正反两面写了六十张纸了，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无法承受心事的负担，将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儿地倾诉给了母亲，他唯一可以交心的人。特兰西多·阿里萨被儿子的纯真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她首先说服儿子不要把那沓写满情诗的信纸交给她，因为那样只会吓着他梦中的姑娘。她猜想在有关心灵的事上，姑娘和他一样是个嫩瓜。第一步，她对儿子说，应该首先让她发现他的热情，这样他的表白才不会令她感到唐突，而且也让她有时间考虑。

"但最重要的是，"她对儿子说，"你首先要攻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妈。"

两个忠告无疑都很明智，只是来得晚了点儿。事实上，就在那天，就在费尔明娜·达萨从正在教姑妈阅读的课文中失神，抬头去看是谁经过走廊的那一刹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副无依无靠的可怜样儿已经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饭时父亲谈起电报的事，于是她也就知道了他从事什么职业，来她家干什么。这些信息增

加了她的兴趣，因为同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她觉着电报的发明与魔法有着某种关联。所以当她第一次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的树下看书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若非姑妈告诉她，他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了，她也不会感到心中不安。后来，她们星期日望弥撒出来时又看见了他，姑妈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么多次的相遇绝非偶然。她说：“他肯定不是为了我而如此大费周章。”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姑妈虽然行事严厉，身上还穿着忏悔服，但对生活的敏感和参与热忱是她最大的美德。单单是想到一个男人对自己的侄女感兴趣，她便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然而，费尔明娜·达萨却连对爱情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怀有的是一丝同情，因为她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但姑妈告诉她，要想看清一个男人的真正性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她敢肯定，那个为了看她们经过而坐在花园中的小伙子得的只可能是相思病。

对于这个源自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孤独女孩来说，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是她倾吐心事的对象和情感的避风港。自从母亲死后，是姑妈一手将她带大。而在同洛伦索·达萨的关系上，埃斯科拉斯蒂卡表现得更像是女孩的同谋，而非姑妈。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出现成了她们俩私下里发明的又一种打发沉闷时光的消遣。她们每天经过福音花园四次，每一次两人都用快速的眼神急切地寻找那位清瘦的哨兵。他腼腆害羞，毫不起眼，不管天气有多炎热，始终穿着一身黑衣。他总是坐在树下假装看书。“他在那儿！”两人中最先发现他的那个会这样说，同时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抬眼看她们之前。等他抬起头，看到的则是两个一本正经、与他的世界相距遥远的女人，穿过花园时甚至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可怜的孩子，”姑妈说，“因为我在你旁边，他不敢走过来。但如果他是认真的，总有一天，他会过来交给你一封信。”

预见到将来种种可能的困境，姑妈教女孩如何用手语和人交流，对于受阻的爱情来说，这是必须借助的手段。这种漫不经心、几近幼稚的嬉闹，令费尔明娜·达萨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奇。但几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想到这种好奇心竟会有所发展。不知从哪一刻起，这种消遣竟然变成了渴望。她浑身热血沸腾，急切地想要见到他。一天夜里，她惊醒了，因为她看见他就站在床脚，在黑暗中凝视着她。于是，她一心盼望姑妈的预言能够成真。祈祷时，她甚至祈求上帝赐予他勇气，让他把信交给她，只因她想知道他到底会写些什么。

然而她的祈祷并没有被接纳。事与愿违：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他的母亲倾诉心事之时，而后者正劝他不要交出那封近七十页的情书，于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费尔明娜·达萨只能是等待。随着十二月假期的临近，她的渴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她反复不安地问自己，在不上学的三个月里，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他，并让他见到自己。到了圣诞夜，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至她感觉到他正在子时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她。她浑身战栗，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不敢回头，因为她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她必须极力克制自己，以免让他们察觉出她的慌乱。但当人们在一片混乱之中走出教堂时，她感到他和她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的身影在躁动的人群中显得那般清晰，就在她迈出正殿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回过头，从肩膀上方望去。于是，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她被自己的胆大吓得魂不附体，一把抓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手臂才没有摔倒。透过女孩的蕾丝无指手套，姑妈感觉到她冷汗涔

涔，于是用一个不被人察觉的暗号安慰了她，向她表示自己无条件的支持。在举国上下一片爆竹和鼓乐声中，在家家门口悬挂的彩灯灯光中，在渴望平安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像个梦游者般徘徊到天亮。他透过泪眼打量着眼前的节日景象，被幻觉弄得精神恍惚，仿佛那一夜降生的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

接下来的一周，他的神志更加恍惚。午休时分，他无望地走过费尔明娜·达萨家，看见她和姑妈正坐在门廊旁的杏树下。此情此景正是在露天再现了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在缝纫室见到她时的画面：女孩正在教姑妈读书。但没有穿校服的费尔明娜·达萨变了个样，她穿着一件针织长袍，许许多多的褶皱从肩膀处垂下来，就像古希腊女子穿的袍子。她头上戴着新鲜的栀子花编成的花环，看上去就像一位头顶王冠的女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中，断定她们能看见自己。这次他没有假装看书，只是将书打开，眼睛则始终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可她却连一个怜悯的眼神都没有给他。

起初，他认为她们在杏树下读书只是个偶然变化，或许是因为房子在不断修缮。但接下来的几天，他看出费尔明娜·达萨在三个月的假期里，每天下午的同一时刻都会出现在那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种确信给他注入了新的勇气。在他的印象中，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他，他也从没察觉到她有任何感兴趣或者反感的表现。但是，在她的冷漠中闪烁着某种别样的东西，鼓励着他坚持下去。忽然有一天，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姑妈将手中的活计放在椅子上，把侄女独自留在门廊旁边，留在了那散落一地的黄色杏树叶之间。这也许是一次故意安排好的机会，受到这个鲁莽假设的鼓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穿过大街，来到了费尔明娜·达萨面前。他离她那么近，甚至能听到她每一次的呼吸声，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馨香，在此生余下的岁月中，他正

是靠着这种馨香来辨认她。他扬着头，坚定地对她说了一句话，这种坚定他半个世纪以后才再次拥有，而且为的是同一个缘由。

“我对您唯一的请求，便是请您收下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他的声音与费尔明娜·达萨期待的不同：口齿清晰，透出一股和他那忧郁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的自制力。她的目光没有离开手上的刺绣，回答他说：“没有父亲的允许，我不能收。”她温暖的声音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颤抖，低沉的音色令他终生难忘。但他努力让自己站稳，马上又说：“那就去征得他的同意。”接着，他又将命令的语气转为柔声恳求，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但她的决定却像打开了一道门缝，足以让整个世界通过。

“请您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我换椅子的时刻。”

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弄明白她的意思。那天，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他看到了与以往同样的场景，只有一处改变：在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进屋的时候，费尔明娜·达萨站起身来，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穿长礼服，扣眼上别着一朵白色山茶花。他穿过街道，站到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抬头看他，而是环顾了一下四周。旱季的一片昏沉中，街上空无一人，风席卷着枯叶。

“把信给我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想把自己那读了太多遍、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情书全都带给她，但后来还是决定只给她一封简明扼要的半

页纸的短信。在这半页纸中，他对最为本质的东西做出了承诺，即他那可以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爱。他把信从长礼服的内兜里掏出来，放到备受煎熬的绣花姑娘眼前。直到这时，她都不敢看他一眼。她看见蓝色的信封在他那只因害怕而僵硬的手上颤抖，于是举起绣花绷子，好让他把信放在上面，因为她无法接受让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也在颤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只鸟儿在杏树的枝叶间抖动了一下身子，于是，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掉在绣花布上。费尔明娜·达萨立刻撤回了绣花绷子，将它藏到椅子后面，以免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到这件事。她第一次抬起她那羞得通红的脸颊，瞥了他一眼。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若无其事地用手举着信，说：“这是个好兆头。”她又第一次用微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随后，她几乎可以说是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来，折好塞进紧身背心里。他将扣眼上别着的那朵山茶花献给她。她拒绝了：“这是定情之花。”随即，她意识到时间已到，于是又恢复了原先的姿势。

“现在，您走吧，”她说，“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

自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后，他的母亲其实还没等儿子说起，便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但在他等待姑娘的第一封回信时，焦虑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这一次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教父是一个精通顺势疗法的老头儿，从特兰西多·阿里萨还在当地下情人时起，就一直是她最信赖的人。老人看到病人的情况也吓了一跳，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但经检查后得知，

病人并没有发烧，浑身也没有哪一处疼痛，唯一确切的感觉就是迫切地希望自己死掉。老人随后探询了隐情，先是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后又向他的母亲，于是再一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他开出方子，用椴树花熬水来镇定神经，并且建议病人外出去散散心，希望通过距离让他得到安慰。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愿望却恰恰与之相反：他甘愿享受煎熬。

特兰西多·阿里萨是个随性的黑白混血女人，向往幸福，却为贫穷所累。她对儿子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从中得到满足。儿子神志不清时，她喂他喝椴树花水；儿子浑身发冷时，她为他裹上羊毛毯子。与此同时，她还为他鼓劲，让他在灰心丧气时也能得到安慰。

“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她对儿子说，“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

但邮局里的人当然不这样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甘堕落，成了一个懒汉。他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把通告邮件到达的旗子都搞混了。一个星期三，他升起了德国旗，而到达的船只却是利兰[2]公司的，运来的邮件是利物浦的；还有一天，他升起了美国旗，而来船却是大西洋轮船总局[3]的，运送的是来自圣纳泽尔[4]的邮件。爱情扰得他心神不宁，频频出错，引起了众人的抗议。他没有丢掉工作，完全是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把他留在了电报室，还带他去教堂唱诗班拉小提琴。他们之间的友谊令人费解，毕竟，两人年龄悬殊，几乎是爷孙两辈。但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都相处融洽。港口的小酒馆是那些彻夜不归的人的去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从靠人施舍的酒鬼到衣着考究的少爷，而后者往往是从社交俱乐部的豪华宴会中溜到这里来吃炸梭鱼和椰汁饭的。洛达里奥·图古特常常在电报室值完最后一班后到这里来，一边喝着牙买加甜酒，一边和那

些在安的列斯群岛跑船的疯狂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直到天亮。他身材高大，动作有点像老乌龟，胡子是金黄色的，每次晚上出门，总戴着一顶弗里吉亚帽。就差在头上插一串风铃草，否则他就和圣尼古拉[5]一模一样了。每个星期，他至少要和一只“夜鸟”过上一晚，他就是这么称呼那些在小旅馆里向水手出卖应急爱情的姑娘们的。刚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他以言传身教的喜悦带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领到自己的秘密天堂。他为他挑选自己认为最好的夜鸟，同她们讨价还价，商定方式，还用自己的钱提前付了账。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接受：他还是童男，并且决心除非因为爱情，否则绝不失掉童贞。

这家旅馆是一座殖民时期的贵族府邸，如今辉煌不再。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房间被硬纸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硬纸板上满是大头针刺出的小孔。房间租给来此寻欢作乐的人，同样也租给那些偷窥的人。据说，有些偷窥者被毛衣针戳瞎了一只眼睛，还有的竟发现窥到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有一些出身名门的贵族，化装成淫荡的女人来到这里，为的是寻找途经此地的水手长们发泄一番。此外，还有种种关于偷窥者和被偷窥者不幸遭遇的传说，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单是想到探头去偷看一下隔壁房间，都吓得心惊肉跳。因此，洛达里奥·图古特最终也没能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都是欧洲皇室和贵族的雅好。

与他高大的身材使人产生的联想相反，洛达里奥·图古特有一个只有天使才有的那种小玩意儿，就像玫瑰花的骨朵儿。但这恐怕是一个幸运的缺陷，因为那些最放荡的夜鸟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跟他睡觉。她们像被扼断了喉咙似的叫声震动了整座宫殿的立柱，吓得鬼魂们都直打哆嗦。据说，他是用了一种用蛇毒配制的油膏，能让女人们欲火

焚身，但他发誓说，除了上帝赐予的东西，他没有使用其他任何手段。他大笑着说：“这完全是因为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要经过很多年，才能理解洛达里奥·图古特或许说得不假。而直到他受到更进一步的感情教育，认识了一个同时压榨三个女人、过着皇帝般生活的男人时，才彻底相信了这句话。那三个女人每天清晨都向这个男人交账，跪在他脚边，请求他原谅自己收入之微薄。而她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奖赏就是，他将同她们中给他挣钱最多的那个女人睡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以为只有恐惧才能造成这样的屈辱。然而，其中一个女人的回答却令他大吃一惊。

“这一切，”她对他说，“只可能是因为爱。”

洛达里奥·图古特之所以成为旅馆中讨人喜欢的客人，与其说是因为他床笫间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呢，由于他沉默寡言，且个性难以捉摸，也受到旅馆主人的青睐。在那些最痛苦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旅馆闷热的房间中，朗读催人泪下的诗歌或连载的爱情小说。他的梦幻在阳台上筑起黑燕子的巢穴，在午睡的昏沉中留下亲吻和扇动翅膀的。黄昏时，酷热渐渐退去，他不可避免地听到隔壁传来的谈话声，人们来此借由片刻的欢愉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了许多私下议论，甚至有一些是国家机密，由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甚或地方官员透露给他们一夜情的爱人，却没有想到隔墙有耳。也正是由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索塔文托群岛以北四西班牙海里的地方，躺着一艘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沉船，上面载有五千多亿纯金比索还有宝石。这个故事令他惊诧不已，但要等到几个月后，他才会再次想起这件事。爱情的疯狂魔力激起了他打捞这座沉没宝藏的欲望，为的是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金子池里打滚。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那个被诗歌的魔力理想化了的姑娘原本的模样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将她从昔日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她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在他悄悄地望着她却不让她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她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与洛达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她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但他的出神最终让他丧失了这种愉悦的机会：神秘的宗教音乐对他当时的灵魂来说是那么不痛不痒，于是他试着用爱的华尔兹为它注入激情，最后，洛达里奥·图古特不得不把他从唱诗班中开除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偷食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在院中花坛里种的栀子花。就这样，他知道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偶然间在母亲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一瓶一升装的香水，是汉堡至美国航线的海员的走私品。他禁不住诱惑尝了尝，想从中寻找深爱的女人其他的味道。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细细品味直到天亮，最终醉倒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芬芳之中。他先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喝，然后又来到海边的防波堤上。在那里，无家可归的恋人们通过做爱彼此安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出神地望着大海，最终失去了意识。特兰西多·阿里萨提心吊胆地等他到早晨六点，然后跑遍各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去找他。午后不久，她终于在一个常有人跳海的海湾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一摊散发着香气的呕吐物中翻滚。

她在儿子身体康复期间，训斥了他被动等候回音的消极状态。她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领会了这一课的精神，甚至也许领会得有些过头。当

特兰西多·阿里萨看到儿子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呢帽，赛璐珞衣领上打着富有诗意的蝴蝶结，走出杂货铺的那一刻，她难以掩饰心中的骄傲，内心生出的爱欲甚至多过母亲的慈爱。她戏谑地问儿子是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儿子面红耳赤地说：“差不多。”她注意到他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但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她最后叮嘱了儿子几句，祝福了他，还嬉笑地向他许诺，会再给他弄瓶香水以庆祝他的凯旋。

其实自从一个月前把信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他已经多次违背不再去小花园的承诺，只不过加倍小心不让自己被发现罢了。一切与以往并无不同。费尔明娜·达萨和姑妈在树下读书，到下午两点左右、全城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时结束，然后一起刺绣直到热浪退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等姑妈走进屋，便迈着英姿飒爽的步伐穿过马路，这种步伐帮助他那软软的膝盖支撑住身体。但他没有走向费尔明娜·达萨，而是径直朝姑妈走去。

“请让我单独和小姐待片刻，”他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

“放肆！”姑妈对他说，“她的事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

“那么我就不说了，”他说，“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对此负责。”

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并非如此，但她还是吓得站了起来，因为她生平头一次被这样一个想法震慑住了，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圣神的启示下讲话。于是，她走进屋去换绣花针，把两个年轻人留在门口的杏树下。

事实上，对这位像冬天的燕子一样出现在她生活中的默默追求者，费尔明娜·达萨了解得很少。要不是信上的落款，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以后，她打听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是一位勤劳而正派的独身女人，无奈却被年轻时唯一的一次不检点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她还得知，他并非像她猜想的那样是一个送电报的邮递员，而是电报室出色的副手，而且很受器重。她甚至认为他那天来给父亲送电报，只是一个为了见到她的借口。这个猜测让她感动不已。她还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她从不敢抬眼去证实一下。但一个星期日，她突然发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她一个人拉的。他原本不是她会选择的那种人，但他那过时的眼镜、神甫似的长袍，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神秘感激起了她难以抵抗的好奇心，而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

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收下他的信。她并不为此自责，但越来越急迫的作答需要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负担。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偶然的眼神，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和表情，在她看来都像是为套出她的秘密而设下的陷阱。她惊恐万分，在饭桌上尽量避免讲话，唯恐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她甚至对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也闪烁其词，虽然姑妈像对待自己的心事一样，分担着她压抑在心中的烦恼。她常常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信，试图从中发现某种秘密代码，某种隐藏在那三百一十四个字母、五十八个单词间的神秘暗语，希望这些词句能表达出比它们原本所表达的更多的含义。然而，她并没有发现比她初读时所理解的更多的意思。当初刚拿到信时，她冲进卫生间，把自己锁在里面，心怦怦跳个不停。她撕开信封，幻想这必定是一封感情丰富、热情似火的长信，

但看到的却只是一页散发着芳香的纸，不过信中表露的决心着实吓了她一跳。

起初她都没有认真想过一定要回信，但信上说得清清楚楚，她无法逃避。正是在这时，在她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频繁和深切程度已经超过了原本的意愿。她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他为什么没有在往常的时间出现在小花园，竟忘记了正是自己让他在她思考如何回信的这段日子不要再来。她从未如此这般地思念某个人。他明明没有在那里，她却设想他在；她盼望他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她从梦中惊醒，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睡觉时他就在黑暗之中凝视着自己。如此种种，以至于当她觉察到他坚定的脚步踏在小花园那黄色的落叶中时，费了很大努力才相信这不是幻觉对她的又一次戏弄。但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一种和他的郁郁寡欢极不相称的威严向她索要回信，她终于从惶恐之中回过神来，试图逃避，直言说，她不知道如何答复。然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知难而退。

“既然您收下了信，”他说，“那么，不回信是不礼貌的。”

于是，兜兜转转到此结束。费尔明娜·达萨终于下定了决心，为自己的拖延致歉，并郑重承诺：假期结束前他一定会收到答复。她也的确履行了承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就在学校开学前三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电报室，询问发一封电报到磨盘村需要花多少钱，而这个地名甚至都不在电报服务的区域范围内。她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待了她，装作完全不认识对方。临走时，她假装把一本用蜥蜴皮装裱的弥撒经书落在了柜台上，里面夹着一个烫着金色花纹的亚麻信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幸福弄得神魂颠倒，一边嚼着玫瑰花瓣一边读信，度过了整个下午。他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读着，读

得越多，吃下的玫瑰花瓣也越多，以至于他的母亲不得不像对付小牛犊一样强按着他的头，逼他吞下一剂蓖麻油。

这是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的一年。无论在他还是她的生活中，除了想念对方、梦见对方、焦急地等信并回信，便再没有其他事情。在那个如痴如醉的春天，以及接下来的第二年，他们再没有面对面地讲过话。甚至于，自从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对她重申自己的誓言，在此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单独见过一面，互诉爱语。但在最初的三个月，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给对方写信，有一段时间甚至一天两封。面对自己助燃的这把吞噬一切的烈火，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都有些害怕起来。

自从她带着心中残存的那点儿对自己命运的报复之心，将第一封回信带到电报室起，她便开始允许两人每天看似偶然地在街上相遇，交换信件。但她始终没有勇气为他们安排一次哪怕是平常而又短暂的谈话。就在第三个月末尾的时候，她明白了侄女的所作所为并非像她起初认为的那样是青春期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她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这场爱情之火的威胁。事实上，除了哥哥仁慈的接济，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并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她知道，以哥哥专横的性格，他绝不会原谅自己如此嘲弄他的信任。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她还是不忍心让侄女遭受自己从年轻时起就遭受的那种无可挽回的不幸。于是，她允许侄女采用一种可以给她带来天真幻想的策略。方法很简单：费尔明娜·达萨把信放在每天从家到学校途中某个隐秘的地方，同时在信上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指明她希望在哪里取到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如此照做。就这样，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内心矛盾地看着他们从教堂的圣水池转移到树洞，再到殖民时期城堡废墟的裂缝中。有时候，他们找到信时，它已被雨水淋

湿，沾满泥点，或是不幸被弄烂了。还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信丢了，但他们总有办法重新建立起联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晚都不顾自己身体地拼命写信。在杂货铺的里间，忍受着椰油灯散发出的有损健康的烟雾，他一字一句地写着。他越是努力模仿自己喜爱的“人民图书馆”那几位诗人近八十册的作品，信就写得越长，且越混乱。他的母亲曾那般热情地鼓励他尽情享受痛苦，如今也开始为他的健康忧心。“你把脑子都要耗尽了，”天明鸡叫时，她在卧室对他喊道，“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她从不记得有谁曾如此迷失。但他没有理会母亲的话。有时，他彻夜不眠，为了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上学路上拿到信，他一大早就将信放到约定的秘密地点，然后带着一头因爱情而蓬乱的头发，来到办公室。而费尔明娜·达萨则在父亲的监视和修女们不怀好意的窥探下，把自己关进洗手间，或是在课堂上假装做笔记时，用练习本写上不到半页。但不仅由于时间紧迫和害怕，更由于性格使然，她的信从不触及感情问题，而只是像工工整整的航海日志一样讲讲日常琐事。事实上，这些信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消遣，用来维持炭火不灭，但不必把手伸到火中，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在信中的每一行里把自己燃烧殆尽。他渴望用自己的狂热感染她，用大头针在山茶花的花瓣上为她刻下微型诗句。是他而非她，大胆地将自己的一缕头发夹进信中，却没有收到渴望的回赠—费尔明娜·达萨一根完整的秀发。不过，他至少让她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从那之后，她开始给他寄来用字典夹干的叶脉、蝴蝶的翅膀和奇异的羽毛。在他生日时，她甚至送了他一块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6]曾经穿过的教士服上的布料，那是那个时期人们私下买卖的，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数目。一天晚上，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费尔明娜·达萨被一首小提琴独奏的小夜曲惊醒，曲中不断重复着一段华尔

兹的旋律。她颤抖了，因为她听得分明，每一个音符都表达出感激之情，感激她送的花瓣，感激她占用算术课的时间给他写信，感激她因想他胜过了关心自然科学而造成的对考试的恐惧。但她还是不敢相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会做出如此莽撞的事来。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洛伦索·达萨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是他不知道在小夜曲的语言中，反复演奏同一段旋律有何深意，二是虽然他听得专注，但还是不知道乐曲是为哪户人家而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冷静让侄女恢复了心神。她肯定地说自己透过卧室的纱帘看到那个孤独的小提琴手坐在花园的另一边，还说不管怎样，单曲重复代表的是决裂。在当天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证实了自己就是献上小夜曲的人，那曲华尔兹是他自己写的，曲名代表着费尔明娜·达萨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花冠女神。他再也没有在花园中拉过小提琴，但常常会在有月亮的夜晚，精心选择合适的地方献上一曲，既让她在卧室里就能听到，又不必再提心吊胆。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贫民墓地。它坐落在一座贫瘠的小山上，整日经受着日晒雨淋，很多秃鹫栖息在那里。从那里奏出的音乐有一种空灵的回声。后来，他还学会了分辨风向，以确定他的乐声能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

那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即将再次危及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这个国家。政府施行军事管制，在加勒比沿岸的几个州从下午六点起开始宵禁。虽然已经发生过几次骚乱，军队多次滥用暴行，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仍然迷迷糊糊，对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他正在用他那爱情的呼唤扰乱亡者的宁静时，一支军事巡逻队逮捕了他。他被指控为间谍，以高音谱号的形式向在附近水域游弋的自由党船舰发送暗号，但他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没有被当场处决。

“什么间谍？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恋人。”

他被戴上脚镣，在当地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晚上。但当他被释放时，却为囚禁的时间太短而感到沮丧。甚至在上了年纪以后，那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早已在他的记忆中混淆，他却仍旧在想，他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因爱情而戴上五磅重的镣铐的人。

狂热的通信即将满两年时，在一封只有一段话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费尔明娜·达萨正式求婚了。之前的六个月里，他曾给她寄过好几次白色山茶花，但她都在下一封信中还给了他，为的是既让他不要怀疑她愿意继续给他写信，又不愿背上承诺的重负。事实上，她一直把山茶花的一来一回当作一种调情，而从未视之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当接到正式求婚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仿佛第一次被死神抓伤了。她大惊失色，把这件事告诉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姑妈勇敢而睿智地担起了为侄女答疑解惑的责任，这两种品质是当初二十岁的她被迫决定自己命运时所不曾具有的。

“回答他说你愿意，”她对侄女说，“即便你害怕得要死，即便你以后可能后悔。因为如果你说不，无论如何你都会后悔一辈子。”

然而，费尔明娜·达萨是那么茫然，她请求给她一段时间考虑。先是要求一个月，而后又是一个月，接着再是一个月。四个月过去了，她依旧没有回复，这时她再一次收到了白色山茶花。和前几次不同，这次信封中装着的不只是山茶花，还有一份最后通牒：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这一次，换作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因为当天下午，他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从学校练习本

的边缘撕下来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回答：好吧，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

这个回答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措手不及，但他的母亲却早有准备。自从他六个月前第一次说起结婚的打算，特兰西多·阿里萨就开始着手张罗，把之前一直和两家人合租的房子整幢承租下来。这是一座十七世纪的民用建筑，上下两层，曾是西班牙人治下的烟草专卖商店。它的所有者破产后，无力维持房子的日常开销，只好将它分成几小块空间租出去。房子的一部分临街，是曾经的店面所在；另一部分位于地上铺着方砖的院子深处，是原来的厂房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马厩，如今被房客共用来洗晒衣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租的是临街部分，虽然是最小的，却也是整幢房子中最有用且保持得最好的部分。昔日烟草店大厅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杂货铺，有一扇临街的大门，旁边那间只靠一扇天窗通风的古老库房是特兰西多·阿里萨睡觉的地方。店铺里间是原大厅的一半，是用一道木隔扇隔出来的，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写字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果不写信写到天亮，就会在那里支起一张吊床。对两个人来说，这个空间还不错，但再多一个就有些不够了，特别是对一个就读于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小姐来说。而且，这位小姐的父亲还曾把一座瓦砾中的房子修缮一新，要知道，当时一些头顶七个姓氏的家族，睡觉时都要提心吊胆，生怕房顶塌下来压到他们身上。于是，特兰西多·阿里萨征得房东的同意，占用了院子的走廊，条件是五年内保持房子处于良好状态。

她有资本这样做。杂货铺和拆旧衣做止血药棉所带来的殷实收入已足够维持她节俭的生活，此外，她还把自己的积蓄借给那些新沦落为穷人却爱面子的主顾们。他们为感激她口风严密而愿意接受高额利

息，特兰西多·阿里萨借此让积蓄翻了好几番。在杂货铺门前，那些夫人们像王后一般雍容华贵地从华丽的四轮马车上走下来，身边并不带着碍手碍脚的奶妈和仆人。她们装作来买荷兰的花边和金银绦子的边饰，然后一边抽泣几声，一边把自己那失落的天堂中最后的几件仿金首饰典当掉。特兰西多·阿里萨为她们排忧解难的同时，对她们的家世仍毕恭毕敬，以至于很多人临走时更多地是感激她的尊重而非帮助。不到十年时间，她对那些几次赎回又几次含泪典当的首饰已经熟悉得如同自家的东西一样了。当儿子决定结婚时，她的收益早已变成法定标准的黄金，埋在床下的一只罐子里。她盘算了一下，发现这笔钱不仅够她把别人的这座房子维持五年，而且靠着她的小聪明和再多一点好运气，或许还能在死前把整座房子买下来，留给她满心期盼的十二个孙子孙女。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已被任命为电报室的临时第一助理，如果洛达里奥·图古特能到来年即将成立的电报磁力学校去当校长，他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留下来当电报室的头儿。

因此，结婚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但特兰西多·阿里萨认为慎重起见，还有两个条件需要考虑。第一，要调查一下洛伦索·达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口音无疑表明了他来自哪里，但他的身份、他谋生的手段却没有人准确知道。第二，这对恋人的恋爱期应当更长一些，这样才能让两人通过亲身交往彼此更加了解；同时，他们要对此段恋情严格保密，直到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感情。她建议他们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意绝对保密，因为母亲说得很有道理，也因为他自己向来不愿多言的性格。另外，他也同意延长恋爱时间，但他认为要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是不现实的，因为独立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没有一天是太平的。

“我们会等老的。”他说。

他那位精通顺势疗法的教父偶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什么障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被领主像赶牛一般驱使的穷人跟被政府驱使的赤脚的士兵在打架罢了。

“仗是在山上打的。”他说，“自打我生下来，在城里杀我们的就从来不是子弹，而是法令。”

不管怎样，结婚的细节问题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信中得以商定。费尔明娜·达萨接受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忠告，同意以两年为期，保持绝对贞洁，并建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她完成中学学业的圣诞节假期里向她求婚。届时她将征得父亲的同意，两人可以根据她父亲赞同的程度，决定如何正式订婚。与此同时，他们以一如既往的热情和之前一样频繁通信，但再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担惊受怕，信中的口吻慢慢变得如夫妻一般亲切平和。已经没有什么会扰乱他们的梦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生活变了。得到回报的爱情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力量。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洛达里奥·图古特没费吹灰之力就使他被任命为自己的终身助手。那时，电报磁力学校的计划失败了，于是，这个德国人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献给了他唯一真正喜欢的事情，即到港口去和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喝啤酒，最后再到小旅馆过上一夜。又过了许多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发现，洛达里奥·图古特在那个欢愉场所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已经变成那栋建筑的主人，而且还成了那些港口夜鸟的老板。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把那里一点一点买了下来，但替他出头露面的是一个又瘦又小、头发像刷子一样的独眼人：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格温顺，谁也想不到他会是一位出色的经理。但事实的确如此。至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位经理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告诉他说他在

这里长期拥有一个房间，不仅可以供他在确定有需要时解决下半身的问题，还可以供他安静地阅读和写情书。因此，在等待正式订婚之前的一个个漫长的月份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比在办公室和家里都多。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兰西多·阿里萨只有在他回家换衣服时才能见到他。

阅读是他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一项嗜好。自从教会他认字，母亲便给他买来很多北欧作家写的配有插图的书。它们是作为故事书卖给孩子们看的，但其实里边都是些极其残忍、邪恶的故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看。五岁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能在课堂上或学校的晚会上背诵它们。但对它们的熟悉并没有减少他的恐惧。相反，是更加重了。因此，转向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舒缓。青春期伊始，他就按到手顺序读完了“人民图书馆”的所有诗集。那些书是特兰西多·阿里萨从“代笔人门廊”的二手书商那里买来的，从荷马史诗到当地诗人最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应有尽有。但他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哪本来了，就读哪本，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他阅读的年头还不足以让他在自己读过的众多图书中分辨出好坏。他唯一清楚的，便是在散文和诗歌中，他更喜欢诗歌，而在诗歌中，他又更喜欢爱情诗。凡是爱情诗，他每读到第二遍就能不知不觉地背诵下来，越是讲究格律和用韵，越让人撕心裂肺的诗，他背得越容易。

这就是他写给费尔明娜·达萨的最初几封信的源泉。在那些信中，他曾整段照搬西班牙浪漫主义作家的诗篇，而直到现实迫使他更加关注尘世琐事而非心灵的苦痛，他才朝着当时那些催人泪下的连载小说和一些更为世俗的散文作品靠拢了一步。他学会了跟母亲一起一边落泪一边朗读当地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在广场和各个城门口花两个生太伏就可以买上一册。但同时，他也会背诵黄金世纪最经典的卡

斯蒂利亚语诗歌。总之，他严格按照到手顺序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甚至在他那初恋的艰难岁月过去很久之后，他早已不再年轻，却还会把二十卷《青年宝库》、全套翻译过来的加尔涅尔·诺斯社的经典著作，以及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收在普罗米修斯文丛中的较为简单的作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但不管怎样，他在那所小旅馆中度过的青年时光并非仅限于阅读和书写炽热的情书，还初识了那种没有爱情的爱的秘密。中午过后，旅馆里生机勃勃起来，他的那些夜鸟朋友如降生时一般赤裸着身子起床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班回来，会看到一座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仙女的宫殿。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当事人向他们透露的这座城市里的秘密。其中很多人的裸体上展示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小腹上的刀疤，子弹留下的疤痕，爱情留下的刀痕，以及剖腹产后惨不忍睹的缝合痕迹。有些人白天会把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这些孩子是她们年轻时叛逆或失足带来的不幸果实。孩子刚一进来，她们就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以免他们在这个裸体的天堂里感到与众不同。她们各烧各的饭，所以没有人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得更好，因为她们邀请他时，他总是从每个人那里挑最好的吃。每天都像过节，直到黄昏。到了那时，她们便光着身子，唱着歌，排着队去盥洗室梳洗。她们互相借香皂，借牙膏，借剪刀，互剪头发，互相换衣服穿，再把自己的脸化得跟可怜的小丑似的，出门去捕捉当晚的第一批猎物。从这时起，旅馆里的生活就变得没有人格、无情无义了，没有钱就休想参与其中。

自从认识费尔明娜·达萨以来，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自在了，因为这儿是唯一不让他觉得孤独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最终成了唯一能让他感到仿佛和她待在一起的地方。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位上了年纪、举止优雅、有着一头漂

亮银发的妇人也住在这旅馆里。她从不参与裸体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她们对她则怀有一种神圣的敬意。她年轻时，一位少不更事的恋人把她带到这里，享用了一段时间后便抛弃了她，任她自生自灭。不过，虽然带着这个污点，她还是嫁得不错。成为寡妇时，她已经年纪一大把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争相让她和自己一起生活，可她却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年轻时曾在此放荡过的这个旅馆更合适了。她在这里的房间是她唯一的家，这让她立刻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找到了共鸣。她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朝一日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学者，因为他可以在淫荡的天堂里用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灵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很喜欢她，常帮她去市场买东西，而且经常和她一聊就是一下午。他觉得她在爱情方面是个智者，因为尽管他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的秘密，她却已经多次为他的爱情指点迷津。

如果说在爱上费尔明娜·达萨以前，他都不曾陷入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之中，那么如今费尔明娜·达萨已成为他的正式恋人，他就更不可能如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那些姑娘们共同生活在旅馆里，分享她们的喜悦和愁苦，但无论他还是她们，都没有想过要越雷池一步。一次意外事件证明了他的决心之坚定。一天下午六点，就在姑娘们穿衣准备接待晚间客人的时候，旅馆中负责清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房间。她是一个年轻姑娘，但看上去衰老而憔悴，在那些裸体女人的光芒之中，就像一个穿着忏悔服的罪人。他每天都能看见她，但从没感觉到她也注意到了自己：她走过每个房间，手里拿着几把扫帚，一只装垃圾的桶，还有一块专门用来从地上捡起用过的避孕套的抹布。她走进房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像往常一样在读书。而她也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地扫着地，以免打扰他。突然，她朝床边走过来。他感到她那只温热而柔软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上，在寻找着什

么，接着它找到了，便开始解他的扣子，同时，她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的样子，直到再也装不下去，只好挪开身子。

她害怕了，因为当初他们给她这份清洁工作时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客人上床。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对她说这个，因为她属于那样一类女人，认为当妓女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人上床。她有两个儿子，是和不同的男人生的，并非因为她生性水性杨花，而是因为她从来没能爱上一个三次以后再回来找她的男人。在来这里之前，她并不是一个在那方面有急迫需要的女人。她生性平和，始终耐心等待，并没有绝望。然而，旅馆中的生活比她的美德更强大。她每天下午六点来这里上班，整晚都在房间之间穿梭，用四把扫帚清扫房间，捡避孕套，换床单。很难想象，男人们在爱情过后会留下那么多东西。呕吐物和眼泪是她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还留下了各种隐私的谜团：血污、排泄物、玻璃眼球、金表、假牙、藏着一缕金发的遗物盒、情书、商务信函和吊唁信等各种信件。有些人会回来寻找他们丢失的东西，但绝大部分物品都会被遗忘在这里。洛达里奥·图古特把它们锁起来保存好，认为就算有一天这座宫殿不幸衰落，单靠这数千件被遗忘的私人物品，它也早晚能成为一座爱情博物馆。

她的工作艰苦，酬劳很低，但她做得很好。她不能忍受的是床第之间的抽泣和呻吟，还有床下弹簧嘎吱作响的声音。这一切在她的血液中沉淀堆积，令她热血沸腾，痛苦不堪，天亮时恨不得跟大街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睡上一觉，或者不求其他、不问究竟地找个烂醉如泥的酒鬼助她完成心愿。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一个身边没有女人、年轻而又干净的小伙子出现，对她来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从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一刻起，她就发现他和自己一样，迫切需要爱情

的抚慰。但他却对她的急切渴望毫无察觉。他一直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着童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改变他的决心。

这就是他在两人约好的正式订婚时间的四个月前所过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上七点，洛伦索·达萨突然出现在电报室里，点名要见他。当时他还没到，洛伦索·达萨就坐在长凳上等，一直等到八点十分，不停地把他那只镶嵌着名贵蛋白石的沉甸甸的金戒指从一根手指摘下，又戴到另一根手指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来时，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个曾给他送过电报的小伙子，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年轻人，跟我来。”他对他说，“我们聊五分钟，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脸乌青得像死人一般，跟着他去了。对这次会面，他毫无准备，因为费尔明娜·达萨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他。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六，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世界之本源”课的课堂，从各位女学生的肩膀上方窥探她们，正好抓到费尔明娜·达萨假装在本子上做笔记，实则是在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犯了这种错误的人要被开除。洛伦索·达萨被紧急叫到校长办公室，由此发现自己铁一般的家规出了疏漏，瓦解在即。费尔明娜·达萨带着她骨子里的倔强承认了自己写信的错误，但拒绝说出这位秘密恋人的身份。由于她在教会法庭上再次拒绝说出恋人是谁，法庭批准了将她开除的处罚决定。父亲对她的房间进行了搜查，而在此之前，那里一直被视作不可侵犯的圣地。他在一只箱子的夹层里找到了三年来累积的一摞摞信件，显然，它们用爱写成，同样也被用爱收藏着。信上的签名确凿无疑，但洛伦索·达萨当时及以后永远都无法相信，女儿对她

这位秘密恋人的了解仅仅限于他是个电报员和他喜欢拉小提琴，再无其他。

他确信只有在自己妹妹的同谋下，两人才有可能维持这种艰难的联系。于是，他甚至都没有给妹妹解释的机会，便把她塞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轻便船。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发着高烧的姑妈在门廊上向自己告别的情景。姑妈穿着她那件褐色修士服，脸色苍白而憔悴。她看着姑妈消失在小花园的蒙蒙细雨中，手里拿着生活中仅剩的东西：一包单身女人的铺盖和只够用一个月的钱。钱被她用手绢包着，攥在手中。后来，费尔明娜·达萨一从父亲的淫威下解脱出来，就派人到加勒比各省四处去寻找她，向一切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消息，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三十年后，她才收到一封经多人之手费了很长时间辗转到她手中的信，信上说她的姑妈已经在“上帝之水”麻风病院去世了。洛伦索·达萨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不公的惩罚会造成女儿如此强烈的反应，他让姑妈成了牺牲品，而女儿因对母亲的记忆所剩无几，一直是把姑妈视为母亲的。她将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吃不喝。洛伦索·达萨先是威胁，然后用蹩脚掩饰的恳求。当她终于把房门打开，他看到的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十五岁少女，而是一个受了伤的坚强女人。

他说尽了各种好话来打动她，试图让她明白她这个年龄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厢情愿地希望能说服她退回那些情书，回到学校去，跪下来求得校方原谅。他还许诺说，到时他会第一个为女儿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求婚者，让她得到幸福。但他仿佛就像在对着一个死人说话。他被彻底打败了。于是，星期一午餐的时候，他终于失控了，就在他极力忍住那些就要破口而出的辱骂和诅咒时，费尔明娜·达萨把切肉的刀子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但十分

坚定，呆滞的眼神吓得他不敢再发出挑战。也就是在那时，他决定试试去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与他男人对男人地谈上五分钟。他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个不合时宜地闯进他生活来的小伙子。纯粹是出于习惯，他在出门前带上了左轮手枪，但小心地把它藏在了衬衣下面。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洛伦索·达萨拉着胳膊穿过教堂广场，直走到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并被邀请坐在露台上时，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个钟点还没有其他客人，一个黑女人正在冲洗宽敞大厅的地砖。大厅的彩色磨砂玻璃满是裂痕和灰尘，厅里的椅子四脚朝天地放在大理石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好几次看见洛伦索·达萨在这里跟集市上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一边赌钱，一边喝桶装的红酒，还大声地为连年的战争而争吵，但吵的是其他地方的战争，并不是我们这里的。他相信爱情的宿命，很多时候他都会问自己，迟早有一天他会和洛伦索·达萨见面，那情形将是什么样子。这场会面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够阻止，因为它是两人命中注定的。他设想会有一场不平等的争吵，因为不仅费尔明娜·达萨在信中提醒过他她父亲性格暴躁，他自己也亲眼见识过：即便是在牌桌上大笑的时候，洛伦索·达萨的眼神看起来也像暴怒一般。他全身上下都是粗鲁的明证：丑陋可憎的大肚子，拿腔拿调的说话声，像猞猁一样的络腮胡子，粗糙的双手，以及无名指上那只蛋白石的戒指。他唯一能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他走路时便注意到的，就是他和女儿一样，走起路来像头小母鹿。然而，当他指了指椅子示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下时，他觉得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粗鲁了。当他邀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一杯茴香酒时，后者恢复了平稳的呼吸。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没在早上八点钟喝过酒，但他还是心存感激地接受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正迫切地需要喝上一杯。

事实上，洛伦索·达萨没用五分钟就说明了来意。他放下架子，说得那么诚恳，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时间不知所措。自从妻子死后，他给自己定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而对一个大字不识、靠贩卖骡子为生的商人来说，这条路漫长而且没有把握，更何况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省，他那盗马贼的名声虽没有坐实却流传很广。他点燃了一支脚夫的雪茄，感慨地说：“唯一比坏身体更糟的，就是坏名声。”然而他又说，他变得富有的秘密就在于，在他那众多的骡子中，没有哪一头能像他本人这样勤劳和坚韧，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时期，在村庄一夜间被烧为灰烬，田园荒芜殆尽的时候，他仍旧如此。虽然女儿并不知道父亲对自己前途的高瞻远瞩，但她却一直表现得像一个积极的同谋。她聪明，而且做事有条不紊，甚至刚一学会认字就想到要教父亲识字。十二岁时，她就已经非常懂事，甚至不需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帮忙就能操持家务。洛伦索·达萨感叹道：“这真是一头金骡子啊。”当女儿以门门功课都是五分的成绩小学毕业，并且在毕业典礼上获得荣誉奖状时，他意识到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太狭小了，在那里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于是，他变卖了田地和牲口，怀着全新的热情，揣着七万金比索，来到了这座破败的城市。尽管城市的昔日辉煌已不复存在，但在这里，一个美丽的、受过古典教育的女人尚有机会通过一桩美满的婚事获得新生。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闯入给这个需要全力一搏的计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所以，我是来恳求您的。”洛伦索·达萨说。他把雪茄的烟头在茴香酒中蘸湿，然后又吸了一口已经没有烟雾的烟，用忧伤的口吻最后说道：

“请您别挡我们的路。”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听他说，一边小口呷着茴香酒，完全沉浸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过去生活的勾勒之中，甚至都没有思忖一下轮到自己开口时该说些什么。但到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都会牵动自己的命运。

“您跟她谈过吗？”他问道。

“这您可管不着。”洛伦索·达萨说。

“我这样问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是因为我认为她才是有权决定的人。”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洛伦索·达萨说，“这是男人的事，应该在男人之间解决。”

他的语气变得带有威胁性，邻桌的一位客人回过头看了看他们。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语调却是再温和不过了，但表现出他所能表现的最坚定的决心。

“无论如何，”他说，“如果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无法给您任何回答。否则，那就是背叛。”

洛伦索·达萨朝身后的椅背靠去，眼皮通红而湿润，左眼在眼眶里转了一下，歪向外眼角。他同样也压低了声音，说：

“您别逼我给您一枪。”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腹中充满寒气。但他的声音没有颤抖，因为他觉得自己此刻被圣神之光照亮了。

“您朝我开枪吧。”他把手放在胸膛上说，“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

为了让歪了的眼睛看到他，洛伦索·达萨不得不侧过头来，就像鹦鹉一样。他说出的仿佛不是一个词，而是从他嘴中吐出的一个一个字：

“婊—子—养—的！”

就在那个星期，他带着女儿去旅行了，为了让她忘掉一切。他没有向女儿做出任何解释，而是冲进她的房间，嘴唇上方的胡子沾着因暴怒而嚼碎的雪茄沫，命令女儿收拾行李。她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死。”她被这个听上去过于真实的回答吓了一跳，试图用前几天的勇气面对他，但他解下自己带有实心铜扣的皮带，在拳头上绕了一圈，然后狠狠地在桌子上抽了一下，声音像来复枪的枪声一样响彻整座房子。费尔明娜·达萨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能发挥的限度和时机，于是将两张草席和一个吊床打成铺盖卷，把所有的衣服都装进两个大箱子，她确信这是一次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旅行。穿上衣服之前，她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匆忙地从卫生纸卷上撕下一张，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接着，她用修枝条的剪子从后颈处齐根剪下自己的发辫，将它卷好装在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里，连同那封信一起寄给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那是一次疯狂的旅行。最初，他们同安第斯山的脚夫们组成骡队，同行了十一天。一行人骑在骡背上，在内华达山的悬崖峭壁上前行，一时被炎炎烈日烤得皮肤干裂，一时又被十月的水平雨浇得浑身湿透，几乎每时每刻都被陡峭山峦上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雾气弄得呼吸艰难。上路第三天，一头母骡子被牛虻叮后发了疯，连同背上的骑手

一起摔下了悬崖，还把同它拴在一起的几头骡子也带了下去。骑手和七头畜生的惨叫声在山谷和峭壁间回荡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又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记忆中年复一年地回响着。她的全部行李都同骡子一起坠入了深渊，但在那个仿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永恒瞬间，在从骡子和骑手掉下去，直到他们惊恐的惨叫声消失在深谷中的这段时间里，费尔明娜·达萨心里想的并不是那位摔死的可怜骑手，也不是那队粉身碎骨的骡子，而是遗憾自己骑的骡子没有和它们拴在一起。

那是她第一次骑牲口，但若不是想到肯定再也见不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得不到他的信带来的慰藉，旅途的可怕以及数不清的艰辛原本也不会令她如此痛苦。从旅行一开始，她就再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而他自己也心烦意乱，只在必要时和她说上两句，或者让脚夫给她捎个口信。运气好时，他们会在路边遇到一家客栈，那里提供一些山里的食物，而她却拒绝吃。客栈还租给他们几张铺着麻布的床，上面被发霉的汗渍和尿渍弄得污秽不堪。但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过夜。那里有一些建在路边的露天公共住所，用粗树枝架起围墙，苦棕榈叶搭成屋顶，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在里面睡上一晚，直到天亮。旅途中，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睡过一宿整觉，总是吓得直冒冷汗，在黑暗中感觉到过路的人们悄悄忙碌着，把牲口拴在树干上，并尽可能地找一个地方挂起吊床。

傍晚，当第一批旅行者到达时，这里还空旷安静，但天亮时却已变成热闹的集市。吊床层层叠叠地挂着，从山里来的阿劳科人则蹲着睡了一宿。拴起来的山羊愤怒地叫着，斗鸡在它们那法老式的箱子里扑腾，而山里的野狗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因为它们常年处在战争的危险当中，早已学会了不能乱吠。这些艰苦对于在本地做了半辈子买卖的洛伦索·达萨来说司空见惯，他甚至还总能在天亮时碰见个把老

朋友。可对于他的女儿来说，却是长久的痛苦。摞成堆的咸鲇鱼散发出恶臭，加上她本来就因相思之苦而没有胃口，最终导致她茶饭不思。而如果说她到底没有因绝望而发疯，那是因为她从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回忆中找到了一丝安慰。她毫不怀疑这片地方是遗忘之地。

另一件时常令人恐惧的事就是战争。旅行伊始，大家就说起遭遇散兵游勇的危险。几个脚夫教了他们好几种方法以分辨来者是哪一派别，便于到时见机行事。他们经常会碰到一队执行征兵任务的骑兵，由一名军官带领，像绑牲口似的把新兵绑在一起，拖着他们全速前进。费尔明娜·达萨被这种种恐怖的景象压垮了，甚至忘记了那个对她来说更像是传奇而非近在咫尺的人，直到一天晚上一支不明党派的巡逻队绑架了骡队中的两名旅行者，把他们吊死在距离印第安人村落半里[7]地的一棵树上。洛伦索·达萨与他们非亲非故，却让人把尸体放下来，按照基督教礼节将他们埋葬，并行了感恩礼，感谢上帝没有让自己遭此厄运。他这么做是绝对有道理的。之前，那伙袭击者曾突然闯进来，把枪筒顶在他的肚子上，叫醒了他。一个衣衫褴褛、脸上涂着黑灰的军官用灯照着他，问他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

“我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保守党。”洛伦索·达萨答道，“我是西班牙平民。”

“算你走运！”军官说完，将手臂高高举起，向他告别道：“国王万岁！”

两天以后他们下山，来到明亮的平原，快乐的巴耶杜帕尔镇就坐落在那里。院子里有人在斗鸡，街角回荡着手风琴的乐声，骑手骑在良种马上，四处响着鞭炮声和钟声。一座燃放烟火的高塔正被架起。

费尔明娜·达萨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派欢闹的景象。他们寄宿在她母亲的兄弟利希马科·桑切斯舅舅的家里。舅舅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一队年轻亲戚，骑着全省最好的良种骏马，到皇家公路上来迎接他们，引领他们在烟火的轰鸣声中穿过镇子的一条条街道。舅舅家的房子在大广场区，就在几经修缮的殖民时期的教堂旁边，看上去更像一座庄园工厂，因为各个房间都宽敞而阴暗，走廊对面是一座种满果树的园子，散发出一股热甘蔗酒的味道。

他们在马厩刚一下坐骑，一群陌生的亲戚就从主客厅里涌出来，用他们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情扰得费尔明娜心烦意乱。此刻，她再没有心思去爱这世上的其他什么人，而且骡背上的长途跋涉弄得她浑身灼痛，困得要死，更何况还在闹肚子。她唯一渴望的，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痛快地哭上一场。她的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比她年长两岁，和她一样如女王般傲视一切。唯有她，从看见费尔明娜的第一眼起，就看穿了她的心事，因为她自己也在经受一段莽撞爱情的煎熬。傍晚时，她把费尔明娜带到准备好的卧室，让她同自己住在一起。她不明白，臀部磨出那么多火泡的费尔明娜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母亲是一个极温柔的女人，和丈夫长得很像，就像孪生兄妹—伊尔德布兰达表姐为费尔明娜安排了坐浴，还为她敷上山金车花，以减轻灼烧的痛楚。与此同时，烟火塔的隆隆声震颤着整幢房子的地基。

夜半时分，来访的客人相继离开，庆祝相聚的人群也三三两两地散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借给费尔明娜一件马大普兰亚麻棉织睡袍，让她躺在一张铺着整洁床单的床上，枕着羽毛枕。这一切使得一种幸福而慌乱的感觉顿时传遍费尔明娜的全身。终于，房中只剩下她们两人了。表姐插上门，从床席下取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来，上面盖着国

家电报局的火漆封印。只看了一眼表姐脸上那光芒四射神秘兮兮的表情，一股沁人肺腑的白色栀子花香便在费尔明娜的心头复苏了。她用牙将火漆印章咬得粉碎，泪水淌在那十一封言辞大胆的电报上，就这样，她沉浸在眼泪汇成的汪洋中，直到天明。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洛伦索·达萨在旅行前犯了一个错误，他通过电报把行程告诉了小舅子利希马科·桑切斯，后者又把消息传给了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分布在全省各个村庄和角落里的亲戚们。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路线，还建立起一条长长的电报员兄弟阵线，以便追寻费尔明娜·达萨的踪迹，一直到他们之前落脚的烛头村。而自从费尔明娜来到巴耶杜帕尔镇，弗洛伦蒂诺便得以和她频繁通信。她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动身前往别处，直到旅行的最后一站里奥阿查。在外漂泊了一年半后，洛伦索·达萨认定女儿已经忘记过去，便决定回家。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了警惕，被妻子亲戚的甜言蜜语弄得飘飘然了。这么多年之后，妻子的族人终于放下了家族偏见，张开双臂接纳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次探亲是一次迟来的和解，尽管这并非此行的目的。原来，当初费尔明娜·桑切斯的家庭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她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来者。此人夸夸其谈，举止粗鲁，且四处漂泊，靠贩卖未经驯化的骡子为生，这种生意太过低级，难免有坑蒙拐骗、不干不净的时候。洛伦索·达萨赌得很大，因为他追求的是当地最显赫家庭的掌上明珠。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女人们泼辣豪放，男人们心地仁厚却容易冲动，为了荣誉往往会失去理智甚至癫狂。然而，费尔明娜·桑切斯对这段受阻的爱情盲目而义无反顾地下定了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她嫁得那么匆忙，那么秘密，就好像不是为爱而嫁，而是为了用那块神圣的头纱掩盖某种早熟的过失。

二十五年后，洛伦索·达萨没有意识到，他对女儿恋爱的苛刻态度正是自己那段往事的再现。如今，他向这些曾经反对过自己婚事的大小舅子们倾诉不幸，而正是这同一批人，曾经也因同样的原因向他们的亲戚倾诉苦水。不过，他在自怨自艾中消磨掉的这些时间，却被他的女儿赢去享受自己的爱情了。当他在舅子们的肥沃土地上阉割牛犊、驯服骡子时，女儿正像脱缰的野马，和一群以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为首的表姐妹们一同漫步。这些表姐妹中，数伊尔德布兰达最漂亮，也最乐于助人。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且已有妻室儿女的男人，这种没有未来的炽热爱情只能通过暗送秋波聊以自慰。

在巴耶杜帕尔镇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继续旅行，翻山越岭，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原和梦境般的高原。在所到的每个村庄，他们都受到和第一站同样的欢迎，音乐、鞭炮、新一拨串通一气的表姐妹，以及电报局里准时到达的信件。很快，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他们到达巴耶杜帕尔的那个下午并不是特例，在这个富饶的省份，每一天人们都像在过节。来此地的客人天黑时随处都可睡下，饿了也随时都有饭吃，因为家家户户大门都是敞开的，屋里都挂着吊床，炉子上都炖着一锅热气腾腾的三肉炖杂烩，以防哪位客人在通知来访的电报到达之前就到了，而这是常有的事。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余下的旅程中一路陪伴着表妹，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血脉融合的秘密，一直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费尔明娜·达萨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感觉到被陪伴和被保护，胸中充满自由的气息，这让她恢复了宁静，又有了活下去的愿望。甚至到了暮年，她还会想起那次旅行，而且记忆犹新，越来越历历在目。

一天晚上，她像每日那样散步回来，惊愕地听说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而且与爱情背道而驰也能幸福。这个说法让她惊慌失措，因

为一个表姐妹无意间听到了自己父母和洛伦索·达萨的谈话。洛伦索·达萨提到想把女儿嫁给克莱奥法·莫斯科特万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费尔明娜·达萨认识这个人。她曾经看见他在广场上遛他那些完美无缺的良驹。马身上的披挂令人眼花缭乱，就像祭台上的装饰。他风度翩翩，身手矫健，迷人的眼睫毛甚至会令石头动心。费尔明娜将他和自己记忆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个坐在小花园的杏树下，可怜兮兮、骨瘦如柴、膝头放着诗集的小伙子作了一番对比，心里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犹豫。

那些日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拜访了一位料事如神、令她惊讶不已的女巫后，整日沉浸在胡思乱想中。费尔明娜·达萨被父亲的意图吓坏了，也去向女巫求教。算命的纸牌告诉她，未来没有任何障碍阻挡她享有一段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这个预言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根本没有想到，和自己分享如此美满命运的人可能并不是她此刻爱着的这个人。对未来有了把握之后，她兴奋不已，开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于是，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间的电报往来不再是堆砌着憧憬和虚幻的山盟海誓，而变得有条有理，实实在在，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他们定下了日子，明确了方式，用生命许下诺言，共同决定只要两人再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结为夫妻。费尔明娜·达萨恪守着这份誓言，以至于那天晚上在丰塞卡镇，父亲允许她参加第一次成年舞会，她却认为没有征得未婚夫的同意就出席舞会是不贞的表现。那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小旅馆里和洛达里奥·图古特玩纸牌，有人通知他有一封加急电报。

是丰塞卡的电报员在线上等他。这位电报员联通了七个中转台，只为了帮助费尔明娜·达萨征得参加舞会的许可。但得到许可后，费

尔明娜并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肯定答复，反而进一步要求证明在线路那端操控发报机的确实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受宠若惊的他发出了一句足以证明身份的话：请告诉她我以花冠女神的名义起誓。费尔明娜·达萨认出了这句暗语，便安心去出席了自己的第一次成年舞会。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她才匆匆换下衣服，赶去望弥撒。那个时候，她箱底藏着的信件和电报已远远多于当初父亲抢走的那些，而她也学会了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已婚女人那样成熟稳重。洛伦索·达萨将女儿举止上的改变理解为时间和距离已经治愈了她的青春妄想。但他从未向她提起过自己为她定下的那桩婚事。自从他把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赶走后，女儿如今在表面上都对他客客气气，父女关系也融洽了许多，这让他们得以和睦共处，谁也不会怀疑这种和睦并非出自真心。

正是在这个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决定在信中告诉她，他正准备努力为她打捞那艘沉船里的财宝。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无数条鱼被毒鱼草熏得浮上水面，大海仿佛铺上了一层铝箔，此时他脑中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个主意。空中的鸟儿都被这场屠杀惊扰得乱成一片，渔民们不得不用船桨吓唬它们，免得它们争夺这次违禁捕捞带来的奇迹般的果实。虽然毒鱼草只是把鱼熏得昏睡过去，但自从殖民时期起就被法律禁止使用。可它始终都是加勒比地区的渔民光天化日之下的惯用手段，直到被炸药取代为止。在费尔明娜·达萨外出旅行的这段日子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消遣之一便是在防波堤上看渔民如何将满载着睡鱼的巨大拖网装上他们的独木舟。与此同时，一群像鲨鱼一样水性极好的孩子请求看热闹的人们往海里扔硬币，然后他们再到水底把硬币捞上来。这些孩子还抱着同样的目的，游到海里去迎接远洋轮船。由于他们娴熟的潜水技能，在美国和欧洲已有很多旅游纪实报道描写过他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早以

前就认识他们，甚至比他初识爱情还要早，但他从未想过或许他们可以让沉船的财宝浮出水面。那天下午，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费尔明娜·达萨归来，他的胡思乱想又多了一种动力。

在这群戏水的男孩中有一个叫欧克利德斯的，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和他一样对海底探险兴奋不已。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只是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潜水和航海本领。他问他是否能憋气下沉到海底二十米，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孤身一人驾着打鱼用的独木船出海，不靠任何工具，仅凭本能冒着暴风雨在开阔的海面上行驶，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准确定位距离索塔文托群岛最大岛屿西北方向十六海里的一个地方，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在夜间航行，靠星星分辨方向，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愿意按照他帮渔民打鱼的日工资来完成这项工作，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但星期日要多付五个里亚尔的加班费。他问他是否能在遇到鲨鱼时自卫防身，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因为他会魔术可以吓跑鲨鱼。他问他是否能保守保密，即便被押到宗教裁判所的刑具上拷问，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没有一件事他回答说不行，而且“行”字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让人无从置疑。最后，他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列出了花销清单：独木船的租金，宽叶桨的租金，捕鱼装备的租金，后面这一项是为了让别人不对他出海的真实目的起疑。此外，还需要带上食物，一大罐淡水，一盏油灯，一捆用动物油脂做的蜡烛，以及一只猎人用的牛角号，以便危急时刻求救。

欧克利德斯约莫十二岁，身手敏捷，鬼心眼儿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体就像欧洲鳗鲡，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船舷上的牛眼窗中钻

来钻去的。他的皮肤久经风吹日晒，粗糙得已经想象不出原本的颜色，这让他那双黄色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炯炯有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即认定，他就是自己这次寻宝冒险的完美同谋。于是，两人没有再多耽搁，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行动了。

天刚刚亮，他们便装备齐全、满怀信心地从渔民的港口起锚出发了。欧克利德斯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他平日的那块遮羞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穿着他那件长礼服，头戴黑帽，脚踏漆皮皮靴，脖子上系着诗人式的领结，还随身带着一本书，作为到达群岛之前一路上的消遣。从第一个星期日起，他便发现欧克利德斯不仅是个潜水好手，还是个熟练的水手，对大海的天性以及港湾处的废铜烂铁了如指掌。他可以讲出那里每一条被氧化得锈迹斑斑、只剩下一具空壳的破船的历史，并说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来。他知道每只浮标的年龄，每一片瓦砾的来历，以及西班牙人用来封锁港口的铁链上有多少圈铁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担心他对此次探险的真实目的心知肚明，便拐弯抹角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发现他对那条沉船一无所知。

自从在小旅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个宝藏的故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尽一切可能打听关于沉船的各种信息。他了解到，圣何塞号并非唯一一艘躺在珊瑚丛中的沉船。事实上，它是陆地号船队的旗舰，于一七〇八年五月后到达这里，来自巴拿马波多贝罗那个闻名遐迩的集市。在那里，它装上了第一批财宝：三百只装满秘鲁和维拉克鲁斯白银的箱子，以及一百一十箱在孔塔多拉岛集中并清点好的珍珠。这只舰船在那里逗留长达一个月，人们日夜狂欢，最后装上了足够把西班牙王国从贫穷中拯救出来的其余财宝：一百一十六箱穆索和索蒙多科祖母绿宝石，以及三千万枚金币。

陆地号船队由至少十二艘大小不同的船只组成。它从这个港口起锚出发，一路上由一支法国舰队护航，但这支装备优良的舰队最终没能把远征队伍从英国舰队的精准炮击中拯救出来。那些英国人在卡洛斯·瓦格尔指挥官的带领下，在索塔文托群岛附近海湾的出口处伏击了他们。所以说，圣何塞号并非唯一的沉船，尽管究竟有多少船被击沉、又有多少船从炮火中逃脱，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艘旗舰是最先沉入大海的船之一，和它一起葬身大海的，还有全体船员以及纹丝不动地站在后甲板上的船长，而船上载着船队大部分的货物。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当时的航海图上找到船队的路线，并相信自己已经确定了沉船的位置。两人从博卡奇卡的两座碉堡间驶出海湾，航行四个小时后，进入群岛内部的静止水域，水底珊瑚丛中熟睡的龙虾伸手可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见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仿佛与水中的倒影合而为一。滞流区的尽头，距最大岛屿两小时航程的地方，就是沉船的位置所在。

穿着那身肃穆的黑色礼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仿佛来自地狱的烈日烤得浑身燥热。他让欧克利德斯潜到二十米深的水下，无论找到什么东西都带回来给他。海水很清，他看见欧克利德斯在水下游动着，像一条鲨鱼一样在蓝色的鲨群中穿梭，一条条鲨鱼与他擦身而过，却没有碰他。之后，他看见他消失在珊瑚丛中。正当他认为欧克利德斯的氧气已经耗尽时，听到背后传来喊声。欧克利德斯站在水里，举着双臂，海水才到他的腰间。 于是，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一路向北，从自在的蝠鲼、胆小的鱿鱼和阴暗中的玫瑰丛上方驶过。最后，欧克利德斯明白了他们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您不告诉我您要找的是什么，我就不会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没有告诉他。于是，欧克利德斯建议他脱掉衣服，下去和他一起找，哪怕就只看看珊瑚丛深处处于世界下方的另一片蓝天也好。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总说，上帝造海是为了让人们通过窗子去欣赏，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久，下午的天空中云多了起来，空气变得阴冷潮湿。天黑得很快，他们靠灯塔才找到港口的方向。驶进海湾之前，他们看见法国的远洋轮船从身边驶过。轮船是白色的，体形巨大，船上灯火辉煌，留下一股柔柔的饭香和煮花椰菜的味道。

他们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三个星期日，若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终决定和欧克利德斯分享他的秘密，他们还会继续浪费掉所有的星期日。这之后，欧克利德斯修改了整个寻宝计划。他们沿着大帆船的古老航线行驶，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测的地方往东移了二十西班牙海里。不到两个月，在一个海上飘着雨的下午，欧克利德斯潜到水里很久。在这期间，独木船漂出很远，以至于欧克利德斯游了近半个小时才赶上它，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用桨把船划到他那边去。他终于上船之后，从嘴里取出两件女人的首饰，作为坚持不懈的战利品展示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

接下来他描述的情景是那么令人陶醉，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要学会游泳，潜到尽可能深的地方，只为能亲眼证实一下。欧克利德斯说，在那里，在那个只有十八米深的地方，那么多古老的帆船躺在珊瑚丛中，数都数不清。它们分散得很广，一眼望不到边。他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海湾漂着的那么多散了架的破船中，没有一艘能像海底这些沉船保持得这样完整。他还说，有好多艘三桅帆船甚至连

船帆都完好无损，在海底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它们是连同当日的时空一道沉下去的，照在它们身上的，还是它们沉入大海时那个六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的阳光。他被自己想象力的激情压得喘不上气来，接着说道，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圣何塞号大帆船，它的名字是用金字写在船尾的，看得清清楚楚，但同时，它也是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得损伤最严重的船。他说他看见一只足有三百多岁的大章鱼困在船内，触角从各个炮筒里伸出来，它在厨房里长得太大了，要想把它放出来，得先把船拆掉才行。他说，他还看到了身穿军服的船长，身体侧着漂浮在船首楼甲板变成的水箱里。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下到装财宝的船舱，是因为他肺里的空气不够了。但他带回了证据：一只祖母绿耳环，还有一个链子被硝腐蚀了的圣母圣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封寄往丰塞卡镇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向费尔明娜·达萨提到了财宝的事，而过不了多久她就要回来了。她对这艘沉船的故事并不陌生，因为她曾多次听洛伦索·达萨提起过。洛伦索·达萨为了说服一家德国潜水公司和他合伙打捞沉没的财宝，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要不是历史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说服了他，告诉他沉船的传说不过是某个穷凶极恶的总督为了侵吞王室的财富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他肯定还会对这项事业坚持到底。总之，费尔明娜·达萨知道，大帆船沉在海底两百米的深处，根本没人能够到达，并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说的二十米。但她已经习惯了他那诗意的夸张，所以也就把这次寻找大帆船的冒险当作他的又一次丰功伟绩祝贺了一番。可当她继续收到写满荒唐细节的来信，见他像书写爱情誓言一般严肃地描绘这些细节时，她不得不向伊尔德布兰达袒露了自己的心事，说她担心自己那位浮想联翩的恋人失去了理智。

就在那些日子里，欧克利德斯又捞出了许多件能够证明他所编织的神话的证据，两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为那些散落在珊瑚丛中的耳环和戒指欢呼雀跃了，而是计划要筹钱建立一家大公司，打捞那五十多艘船上的巴比伦宝藏。于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母亲求助，希望她帮助自己完成这项冒险。而母亲只是咬了咬那些首饰上的金属，又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玻璃块，就明白了有人想利用她儿子的天真发财。欧克利德斯跪在地上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说自己没做过任何骗人的勾当。但接下来的星期日，他就没在渔港露面，以后也再没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这次受骗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找到了灯塔这个爱情的避风港。一天晚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遭遇暴风雨，欧克利德斯用独木船将他载到了这里。从那以后，他便常常在下午来和灯塔看守人聊天，听看守人讲他所知道的那些陆地上和大海里数不尽的奇迹。这是一段将要历经沧海桑田的友谊的开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如何维持灯火不熄，先是用柴火，而后又用油罐子，那时电力的使用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他还学会了如何用镜子引导灯火的方向并增加它的亮度。有几次，灯塔看守人有事不能看管灯塔，他便留下来，在塔上整夜注视着大海。他学会了利用声音和船上灯光映在地平线上影子的大小来辨别船只，还学会了在灯塔闪动的光亮中分辨船只给他发回的信号。

白天，特别是星期日，还有另一种乐趣。在老城的富人们居住的总督区，女人使用的海滩和男人的海滩是由一堵石灰墙分开的：女人的在灯塔之右，而男人的在左边。于是，灯塔看守人在塔上架起了一台望远镜，只要花上一个生太伏，就能用望远镜观赏一下女人的海滩。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不知道自己正被人偷窥，只管穿着宽荷叶

边的泳衣，脚踩着拖鞋，头顶着宽檐帽，尽情地展现着身姿。这副装扮将她们的身体遮掩得像上街时穿的衣服一样严实，却又不像那些衣服那样迷人。母亲们则坐在烈日下的藤条摇椅上，穿得和望大弥撒时一样，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羽毛帽子，也打着同样的绢制遮阳伞，在岸边注视着女儿们，生怕隔壁海滩上的男人从水下引诱她们。事实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刺激，但每个星期日赶来这里的客人还是很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望远镜，只为一饱眼福，享受一下围墙那边枯燥乏味的禁果。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与其说他是为了寻找乐子，不如说是因为无聊。但他和灯塔看守人结交，并不是因为这个额外的诱惑。真正的原因是，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对他失去了爱慕，而他开始狂热地寻花问柳以取代她的时候，没有一处地方让他觉得比在灯塔里的分分秒秒更加快乐，或能找到更好的安慰来抚平自己的痛楚。这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甚至花了很多年求母亲，而后又求他的叔叔莱昂十二[8]，求他们帮他买下灯塔。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的灯塔是私人财产，灯塔主人根据船只的体积来收取入港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为那是唯一一种能够靠诗情画意营生的体面方式。可他的母亲和叔叔都不这么看。当他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财富这样做时，灯塔却又成了国家的财产。

但这些幻想并非全是徒劳。无论是沉船的传说，还是后来对灯塔的兴趣，都帮他减轻了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的相思之苦。而就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来了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归来的消息。原来，在里奥阿查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洛伦索·达萨决定回家。十二月正值信风季，并非风平浪静的时节，那艘唯一敢于冒险出海的老旧轻便船，很可能一夜间又被逆风拖回到出发的港口。而事实果真如

此。费尔明娜·达萨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宿，她把自己绑在舱室的床铺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那间舱室简直就像小酒馆的茅厕，不仅因为它狭小压抑的空间，更因为里面的恶臭和闷热。船摇晃得那么厉害，好几次她都觉得床上的皮带就要断裂了。甲板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像遭遇了海难似的惨叫声，而父亲在隔壁床上发出的老虎般的鼾声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近三年来，这还是她第一个片刻也不曾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不眠之夜。而此刻，他正躺在杂货铺里间的吊床上辗转难眠，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她回来前的时间，仿佛每一分钟都是永恒。天亮时，风突然停了，海面又恢复了平静，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尽管饱受晕船之苦，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因为她是被锚链丁零当啷的巨大响声吵醒的。于是，她解开床上的皮带，凑到舷窗前向外张望，幻想着能在港口躁动的人群中发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身影，但她看到的却是被第一缕阳光染成金黄色的棕榈树丛中的海关仓库，以及里奥阿查那用腐朽的木板钉成的码头，而他们的船前一天晚上正是从这里起锚的。

当天余下的时间就如幻觉。她又一次待在一直住到前一天的房子里，接待了同一拨来向她告别的客人，说着同样的话。她恍惚觉得，自己在重复一个已经度过的生活片段。这种重复是那么的彻底，而一想到乘船旅行也将如此重复，费尔明娜·达萨颤抖起来：单是回想一下船上的情景就让她不寒而栗了。但要想回家，唯一一个不同的选择就是骑在骡子上沿着悬崖峭壁走上两个星期，而且情况会比来时更加危险，因为在安第斯山考卡省爆发的一场新内战正在加勒比各省蔓延。于是晚上八点，她又一次被同一拨喧喧嚷嚷的亲戚送至港口。他们挥着同样的告别眼泪，在最后时刻送上了那同一批大包小包七零八碎、舱室里塞都塞不下的礼物。起锚时，家里的男人们朝天开了几枪，为帆船送行。洛伦索·达萨则站在甲板上，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

五枪作为回应。费尔明娜·达萨的忧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整晚都是顺风。大海散发着一股花香，这甚至让她没有系上安全皮带，就恬然入梦了。她梦见自己又见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梦见他竟然摘掉了她一直以来看到的那副面孔，原来那是一只面具，但他真实的面孔又和那面具一模一样。她很早便起床了，因为这个梦中的谜团让她大惑不解。她看见父亲正坐在船长的饭厅里，喝着兑了白兰地的不加糖的浓咖啡。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眼睛又斜了，但没有流露出对这次回家的丝毫顾虑。

他们驶进港来。轻便船在公共市场港湾里停泊的小船组成的迷宫中静静滑行。市场散发的臭味在几里外的海上就能闻到。晨曦在清澈的蒙蒙细雨中显得格外饱满，可小雨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守候在电报室阳台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轻便船驶入灵魂湾的那一刻就认出了它，船帆被雨水打得耷拉下来，船在市场码头下了锚。前一天，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才从一份电报中偶然得知船因为逆风而延误了。于是，他又从第二天的凌晨四点起开始等待。此刻，他的眼睛始终不离那一艘艘运送旅客的小船。它们负责把少数不顾暴风雨而决定上岸的旅客送至岸边，可最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得不在中途走下搁浅的小船，着泥泞攀上码头。船中的客人一直徒劳地等到八点钟，雨还是没有停。一个黑人搬运工着齐腰深的水走到船舷上把费尔明娜·达萨接了下来，一直把她抱到岸上。但她浑身上下湿得就像落汤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她竟成熟了那么多—直到踏入家门的那一刻。她一走进大门紧闭的房子，便立刻在黑人女仆的帮助下，开始了让房屋恢复生气的壮举。黑人女仆名叫加拉·普拉西迪娅，刚一接到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就从她那古老的奴隶住所赶了回

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真正的女主人。如今，只有不可战胜的爱的力量，才能拯救这个王国。她没有气馁，因为她感到自己受到一股升腾的勇气的召唤，足以撼动这个世界。回家当晚，他们在厨房的餐桌上喝热巧克力、吃奶酪饼的时候，父亲把管理家务的大权交给了她，那么郑重其事，就像进行神圣的宗教仪式一般。

“我把你生活的钥匙交给你。”他对她说。

年满十七岁的她坚定地接过这个权力。她知道，她所赢得的每一分自由都是为了爱。这一夜，噩梦连连。第二天，她打开阳台的窗子，又看见小花园中伤感的蒙蒙细雨、那尊被斩首的英雄塑像，还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拿着诗集常坐的那条大理石长凳，她第一次感到回家的惆怅。她已经不再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恋人，而是当作可以托付一切的确定无疑的丈夫来想念。她突然感到，自己走后，二人所虚度的光阴是多么的沉重漫长，活下来又是多么的艰辛不易，而她又该付出多少爱，去按照上帝的旨意爱这个属于她的男人啊。可她惊讶地发现，他并不在小花园，不像以前很多次那样，即使下雨也会出现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接到他的任何信息，甚至一点征兆都没有。突然间，一个念头令她浑身一颤：他死了。但随即，她又排除了这个坏念头，因为在最后几天狂热的电报往来中，他们的确是忘了商定一种她回来以后能继续保持联系的方式。

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地以为她还没有回来，直到里奥阿查的电报员向他证实她星期五就上船了，并且就是那艘前一天因逆风而没有到达的轻便船。于是周末时，他守在她家门口，注视着里面的动静。而星期一，从傍晚开始，他便透过窗子看见一盏灯火

在阳台所在的那间卧室里来回移动，九点刚过就又熄灭了。他一夜没睡，而是受着和恋爱之初的夜晚同样的煎熬，紧张得直想呕吐。特兰西多·阿里萨在早上第一拨公鸡打鸣时就起了床。她被吓慌了，因为儿子自从半夜走进院子就再没回来，而她在家里也没有找到他。原来，他一直在防波堤上徘徊，迎着风背诵爱情诗，高兴得流泪，直到天明。八点钟，他坐在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因彻夜未眠而精神恍惚，正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费尔明娜·达萨表示欢迎。就在这时，他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是她。她正穿过大教堂广场，加拉·普拉西迪娅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她。这是她第一次没有穿校服出门。她比离开时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使她的美更为纯净。她的发辫又长出来了，但不是披在后背，而是斜搭在左肩上，这个简单的变化让她脱去了少女的稚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这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地穿过广场。接着，那股使他浑身酥软动弹不得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跟在她后面追了上去。而这时，她已经拐过教堂边的街角，混入市场喧闹嘈杂的人群中。

他紧跟着她，却不让她发现，一路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举手投足，她的优雅，她的早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无拘无束的样子。他惊讶地看着她自如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而加拉·普拉西迪娅却东碰西撞，手中的篮子钩来刮去，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她。她在混乱的大街上穿梭，自由自在，不曾与任何人相撞，就像在黑暗中飞翔的蝙蝠。她曾多次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市场，但从来只是买一些小玩意儿，因为那时父亲亲自负责家中的采购，不单包括家具

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女人的衣服。所以，这第一次出门采买，对她来说是在童年的梦想中便一再憧憬过的神奇冒险。

她没有理会耍蛇人向她兜售永葆爱情的糖浆时的那番饶舌，也没有理睬躺在别人大门前浑身长癞流脓的乞丐的恳求，更没有搭理试图把一条受过训练的鳄鱼卖给她的假印第安人。她走得很远，逛得很仔细，但漫无目的，每一次停下来，都仅仅是因为她喜欢不慌不忙地欣赏每一件东西的灵魂。只要有点儿东西卖的门廊，她都要走进去看看，而每到一处，她都能找出点儿什么来增添她对生活的渴望。她兴高采烈地闻着大木箱里呢料散发出的香根草的味道；她把印花的丝绸裹在身上；她戴上压发梳，拿起花扇，在“金丝”商店的全身穿衣镜里看着自己扮成马德里妇女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接着，又被自己的笑逗得哈哈大笑。在进口食品店，她打开一桶卤汁鲱鱼，这让她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时，在东北部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度过的那些夜晚。她又尝了尝带甘草味的阿利坎特血肠，买了两根作为星期六的早餐，还买了几片鳕鱼肉和一罐酒浸红醋栗。在调料店，她用两个手掌揉碎了几瓣鼠尾草和牛至叶，纯粹是为了闻味儿，还买了一把丁香和一把大料，一小包姜和一小包刺柏。走出来时，由于被卡宴的胡椒呛得直打喷嚏，她笑得满脸泪水。在法国药店，当她试用路特香皂和安息香液的时候，售货员在她耳后喷了一揿巴黎正流行的香水，还给了她一片吸烟后用的祛味剂。

她是在边买边玩，的确如此，但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她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那股当机立断的劲头让人绝对想不到这是她第一次买东西。她知道，她不只是在为自己买，也是在为他买。她买下了十二码亚麻布，用来为两人做台布；一块细棉布，用来做新婚之夜的床单，天亮时上面会浸染上两人幸福的气息。每一件精美的物品，他

们都将在他们的爱巢共同享用。她讨价还价，且十分在行。她优雅而又不失尊贵地议价，最后总能赢得最大的优惠。她用金币付账，店主们假装检验真伪，其实只是为了听听金币落在大理石柜台上那悦耳的声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惊奇地窥视着她，跟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好几次都撞到了女仆的篮子上，对他的道歉，女仆回以微笑。她和他擦肩而过，距离如此之近，他闻到了她身上的一阵芳香。如果说她那时并没有看到他，可不是因为她无法看到，而实在是因为她那傲视一切的走路方式。他觉得她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与众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为何没有人像他一样，为她的鞋跟踩在路砖上那响板似的美妙声音而神魂颠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被她裙摆的弄得心怦怦乱跳，为何全世界的人没有因她那飘逸的发辫、轻盈的手臂和金子般的笑声而爱得发狂。他没有错过她的一颦一笑，也没有错过她那高贵品行的任何一点展现，但他不敢走近她，害怕扼杀这样如痴如醉的感觉。然而，当她钻进鱼龙混杂的“代笔人门廊”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铤而走险，眼看就要失去几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费尔明娜·达萨赞同她的女同学们的古怪看法，认为“代笔人门廊”是个堕落淫荡、藏污纳垢的地方，自然，是对那些体面的小姐们而言。那是一个有很多拱门的长廊，对面是一个小广场，停着可供出租的马车和驴子拉的大车，老百姓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代笔人门廊”这个名字起源于殖民时期，因为从那时起，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套袖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写就各种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阶段的情书。当然，这个喧闹市场的坏名声并非来自这些代笔先生，而是来自后来出现的小商小贩。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

欧洲船走私来的假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油膏到著名的加泰罗尼亚避孕套，应有尽有。那种避孕套有的装着鬣蜥身上的鬣毛，到时候可以撩动心房；还有的在末端饰有花朵，花瓣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愿张开。费尔明娜·达萨并不熟悉这条街道的风俗，为了找一处阴凉来避一避十一点钟火辣辣的太阳，她走进了门廊，根本没留意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

瞬时间，她被淹没在一片叽里呱啦的火热叫卖声中，有擦鞋匠、卖鸟人、二手书商、江湖郎中，还有卖甜食的女人。其中，卖甜食的女人们的吆喝声力压众人，她们大声叫卖着椰子酥，有姑娘们爱吃的菠萝味的，疯子爱吃的椰子味的和小甜心米卡拉爱吃的红糖的。可她对这些嘈乱的嚷声无动于衷，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吸引住了。那人正在演示各种具有魔力的神奇墨水，有像血一样鲜红的红墨水，有透着一股悲伤的写悼文用的墨水，还有便于在黑暗中阅读的磷光墨水，以及只有灯照下才能看得见的隐形墨水。她本来打算各种墨水都买一点儿，好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闹着玩儿，用自己的天才吓他一跳。但她试了好几种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墨水。随后，她走到那些坐在一排大罐子后面的卖甜食的女人面前，每样买了六块。她用手一一指着玻璃罐中的甜食，因为在嘈杂声中根本无法让她们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六块天使发丝夹心饼，六块炼乳饼，六块芝麻糕，六块木薯夹心饼，六块魔鬼小奶球，六块奶油卷，六块王后乳酪糕，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她用一种令人难以抵御的优雅把这些糕点一一扔进女仆的篮子，全然没有理会叮在糕点上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周围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以及在那要命的酷热中闪烁的腐臭汗珠所发出的蒸蒸热气。一个头上包着花头巾、圆润而漂亮的黑人妇女，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角插在刀上的菠萝块，令她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她取下菠萝块，整个放进嘴里，一边细细品尝着，一边把目光扫

向周围的人群。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将她定在了那里。在她背后，嘈杂之中一个唯有她能够听见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这可不是花冠女神该来的地方。”

她回过头，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他离她那么近，就像在子时弥撒躁动的人群中看到他的那次一样。但与那时不同，此刻她没有感到爱情的震撼，而是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在那一瞬间，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她只想出了一句话：“我的上帝啊！这个可怜的人！”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冲她笑了笑，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想跟她一起走，但她挥了挥手，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

“不，请别这样。”她对他说，“忘了吧。”

那天下午，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女仆还给他带去了他的电报、他的诗和他送的已经风干了的山茶花，并要求他归还她曾送给他的信件和礼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那本弥撒经书，植物叶脉标本，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的教士服布料,几块圣牌，还有她那条系着校服配套丝带的十五岁时的发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濒临疯狂，给她写了无数封绝望的信，缠着女仆带给她。但女仆坚决执行女主人斩钉截铁的指示：不接收除归还的礼物以外的任何物品。在女仆的再三坚持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了她，只除了发辫。他不会归还发辫，除非费尔明娜·达萨亲自来拿，并和他谈上哪怕片刻的时间。但他的愿望没有

达成。特兰西多·阿里萨担心儿子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冲动决定，放下自己的骄傲，去恳求费尔明娜·达萨开恩给她五分钟的时间。费尔明娜·达萨在家中的前厅站着接待了她，只花了一小会儿工夫，甚至没有请她进去，更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过了两天，在同母亲吵了一架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他卧室的墙上取下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玻璃龛，里面像供奉圣人遗物似的供奉着那条发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装进那只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亲自还了回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没有机会单独见过费尔明娜·达萨，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她说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她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

[1]教皇“庇护五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2]利兰，英国西北部城镇。

[3]大西洋轮船总局，法国航运公司。

[4]圣纳泽尔，法国西部城市。

[5]圣尼古拉，天主教圣人，被视为水手的保护神。

[6]圣佩德罗·克拉维尔（1580—1654），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曾在哥伦比亚的黑奴中传教。

[7]本书中的里均指西班牙里。

[8]教皇“利奥十二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二十八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她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乐得与她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那种质朴的魅力迷住了。

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假思索地说，它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躲避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的那种胡子，头发由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她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

“是生活所迫，母亲。”他说，“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

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的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幸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尘土，鬣蜥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板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举办的远近闻名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穿着丧服度过余生，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回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石从没关严的门缝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圣牧羊女[1]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宅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五点，石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他慢慢习惯了十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

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则放进了法国新一派的著作。他摘下那些褪了色的廉价彩画，只留下画着医生和死神争夺一位裸体女病人的那幅，还有那张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在空出的位置上，他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各所学校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各式各样的文凭，紧挨着父亲唯一的那张。

他试图在仁爱医院推行新观念，但这并不像他曾满怀青春的激情所设想的那样。在这座古老的医院里，人们固执地恪守着代代相传的迷信观念。比如，把床腿分别放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以防疾病爬上床来，又或者在手术室中要求穿礼服，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认定优雅是无菌操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们无法忍受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用嘴去尝病人的尿液以检验是否含糖；无法忍受他动不动就提到沙可[2]和特鲁索[3]，好像他们是他的同窗室友；也无法忍受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警告说接种牛痘有致命的危险，但同时又对栓剂这一新发明抱着令人怀疑的信念。他在所有方面都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革新精神，他近乎偏执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身处这片到处是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的土地上，他的幽默感却异常迟钝，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难能可贵的美德，却引起了年长同事的猜忌和年轻同事暗地里的嘲笑。

最令他苦恼的是城里危险的卫生状况。他向最高当局请求填平西班牙人建造的污水沟，因为那里是老鼠的巨大温床。他建议代之以封

闭的下水管道，污水不应像一直以来这样排到市场港湾，而应该输往偏远的垃圾场。殖民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入体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试图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建造自家的厕所。他曾徒劳地斗争，希望人们别把垃圾扔到树林里，几个世纪下来，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片腐烂的池塘。他建议至少一星期收两次垃圾，然后运到无人区烧掉。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鹫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

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4]。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

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过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也不以为意，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腼腆，从未向她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

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死亡。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难以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5]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因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却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瘟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

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市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潺潺的流水声却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就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

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

于是，他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五点钟又来了。洛伦索·达萨亲自为他打开大门，把他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洛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他用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她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她的手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她的皮肤上为她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入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她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在她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洛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

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更轻松的场合。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明娜·达萨正在缝纫室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一下。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意到，她在家中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她号了脉，又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压舌板为她检查了喉咙，还看了看她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拘束，但她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此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他曾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

“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

“谢谢。”

“应该感谢上帝。”他说，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圣多默[6]的名言：“您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源自圣神。您喜欢音乐吗？”

他问话时，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她却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她反问道。

“因为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是真的这样以为的，很快，她便会知道这一点，并将终身都深有体会—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来建立友谊的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带有魔力的方式。而那时，她却把它理解成了一种嘲笑。更何况，他们在窗前谈话时，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伴发出了像老鼠一样的窃笑声，并用画框挡住了脸。这使得费尔明娜·达萨乱了方寸。她气晕了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而医生面对着镶花边的薄纱帘不知所措，试图找到通往大门的路，可是却转了向。慌乱中，他撞上了香乌鸦的笼子，几只鸟惊得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扑扇起翅膀来，顿时，医生的衣服沾染上一股女人的馨香。紧接着，洛伦索·达萨霹雳般的声音把医生钉在了那里：

“医生，请在那里等我一下。”

他从楼上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走下楼梯，脸有些肿胀，且肤色发青，由于刚从午觉的噩梦中醒来，络腮胡还乱蓬蓬的。医生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已经告诉您的女儿了，她健康得就像一朵玫瑰。”

“是啊，”洛伦索·达萨说，“就是刺儿太多。”

他从乌尔比诺医生身边走过去，没有跟他寒暄，而是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子，粗野地冲女儿叫喊，命令她说：

“过来跟医生道歉！”

医生试图劝阻他，但洛伦索·达萨根本不加理会，斩钉截铁地说：“快点！”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默默地请求她们谅解。她反驳父亲说，她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她关上窗子是避免阳光晒进来。乌尔比诺医生竭力想证明她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洛伦索·达萨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再次走到窗前，气得脸色煞白，右脚向前，用指尖提起裙子，向医生戏剧性地躬了一下身子。

“我万分诚恳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幽默地学着她的样子，像火枪手似的拿着他的高顶礼帽鞠躬还礼，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和善微笑。洛伦索·达萨邀请他去办公室喝杯咖啡以示道歉。为了表示自己心里没有留下一点芥蒂，他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除了早餐前会喝上一杯咖啡，其余时间都是不喝的。他也不喝酒，只是偶尔在正式场合喝一杯佐餐的葡萄酒。但这一次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给他端来的咖啡，还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之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茴香酒。接着，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尽管还需要赶去其他几个地方出诊。起初，他还认真地听着洛伦索·达萨以女儿的名义向他致歉，听他说自己的女儿是个聪明端庄的姑娘，配得上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王子，可她唯一的缺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骡子一样的倔脾气。可当第二杯酒下

肚后，医生似乎听见从院子深处传来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他的思绪便随她而去了：他想象着自己跟随她穿行于刚刚被夜幕笼罩的房子里，点上走廊各处的灯，给各间卧室喷上杀虫剂，打开火炉上的汤锅盖子，里面盛着她和父亲当晚要喝的汤。他仿佛看见父女俩单独坐在桌前，都没有抬眼，也没有喝汤，因为谁都不愿打破这种斗气的乐趣，最终，父亲投降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严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非常了解女人，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可能经过这间办公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拖延着离开的时间，因为他明白，下午的这场屈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将不会让他好过。洛伦索·达萨几乎已经醉倒，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心不在焉，只顾自己唠叨个没完。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使劲清着嗓子，竭力在旋转靠背椅上寻找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正面打量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形对不上。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当他在洛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七点多了。一轮满月挂在空中。在茴香酒的作用下，院子变得如梦似幻，仿佛在一个水底世界的深处飘忽不定。一只只罩着布的鸟笼仿似一个个熟睡的幽灵，沐浴在新开的橘树花散发出的暖香里。缝纫室的窗子敞开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作像参加画展似的摆在架子

上。“不在这儿的你，会在哪儿呢？”乌尔比诺医生走过时这样说道。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听到，也无法听到，因为她正趴在卧室的床上愤怒地哭泣，等待着父亲过去，为自己下午所受的屈辱讨回公道。医生没有放弃向她道别的念想，可洛伦索·达萨却并未提议他这样做。他思念着她天真的脉搏、猫一样的舌头和柔软的扁桃体，可一想到她将再也不愿见到自己，甚至不会允许自己尝试与她见面，他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洛伦索·达萨走进前厅时，蒙在布中的乌鸦被惊醒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们会把你的眼睛啄出来。”医生心里想着她，大声说道。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不是我说的，”他说，“是茴香酒。”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到马车前，试图说服他收下这第二次出诊的一个金比索，但他没有接受。他准确无误地向车夫下达指令，让他把自己送到另外两个约好的病人家去，然后，没有靠别人帮忙就上了车。可马车在石子路上的颠簸让他开始感到难受，于是他让车夫掉转了方向。他对着车上的镜子看了好一会儿，发现镜中的自己也依然在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他耸了耸肩，然后打了个嗝，脑袋垂在胸前，睡着了。睡梦中，他听见丧钟敲响了。先是大教堂的钟声，而后，所有的教堂都传来钟声，一处接一处，连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7]修道院那破瓦似的钟声也响了起来。

“见鬼，”他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句，“有人死了。”

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坐在大饭厅的正式餐桌前，喝着牛奶咖啡，吃着奶酪饼。正在此时，只见他带着一副痛苦不堪的面容出现在门口，浑身散发着从乌鸦那里沾染来的淫荡香味。隔壁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宽阔的水池上空回荡。母亲惊慌地问起他究竟去了哪里，因为

大家到处找他去给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看病，将军是哈拉依斯·德拉维拉侯爵的最后一个孙子，那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丧钟就是为他敲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完全没有反应，他抓住门框，转过半个身子，试图走到卧室去，却一头栽倒在从自己嘴里喷吐出来、溅得到处都是的茴香酒中。

“圣母马利亚，”他的母亲喊道，“一定是出了什么怪事，才让你这副模样回到家里。”

然而，最为奇怪的事还没有发生呢。著名钢琴家罗密欧·卢西奇造访本城，城中的民众刚刚从对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的哀悼中恢复过来，他就献上了一组莫扎特的奏鸣曲。趁这个时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叫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搬上了骡车，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了一首划时代的小夜曲。乐曲刚开始演奏，她就醒了。无需从阳台的花边窗帘后探出身子，她就知道谁是这次不同寻常的献礼的策划者。她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她还没有胆量像那些刁钻的姑娘们一样，把尿盆一股脑儿地扣在不受青睐的追求者头上。而洛伦索·达萨呢，小夜曲演奏到一半，他便迅速穿好了衣服，乐曲一结束，他就把身着音乐会礼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钢琴家请进了会客厅，用一杯上好的白兰地对小夜曲表达了谢意。

费尔明娜·达萨很快发现，父亲在试图软化她的心。小夜曲演奏次日，他便看似随意地对她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看上了，她会是什么感觉啊。”她冷冷地反驳道：“她会在棺材里再死一次。”和她一起画画的女友告诉她，洛伦索·达萨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之邀，到社交俱乐部用了一次午餐，为此，医生因违反俱乐部章程而受到了严厉的警告。直到这时，她才知道了父亲曾多次申请加入社交俱乐部，次次都被拒

绝，而每次所收到的反对票之多，已使他彻底地死了这条心。可洛伦索·达萨以桶匠[8]的大度吞下所受的侮辱，继续执著地依靠智慧创造偶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机会，却没有发现其实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付出了更为超常的努力，尽一切可能让两人相遇。有时，他们会在办公室里聊上好几个小时，而这时，家里的一切就像处在时间的边缘停滞了似的，因为只要医生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会让任何事照常进行。于是，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中间港。正是在那里，洛伦索·达萨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了象棋启蒙课。这位学生非常勤奋，象棋成了他无药可救的嗜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就在小夜曲风波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洛伦索·达萨在家中的前厅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火漆上押着J.U.C.几个首字母[9]组成的花押字。从费尔明娜的卧室前走过时，他把信从门下滑了进去。费尔明娜想不通信是如何到她房间里来的，因为她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然会替追求者送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她把信放在床头柜上，不知该如何处理。就这样，信没被拆开，在那里放了好几天，直到一个飘雨的下午，费尔明娜·达萨梦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要把那块曾经用来为她检查喉咙的压舌板送给她。梦中的压舌板并非铝制，而是用一种她曾在别的梦里开心品尝过的美味金属做成，于是，她开心地品尝着它，并把它掰成了大小不等的两段，小的那段给了他。

醒来后，她拆开了信。信写得简洁而得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唯一恳求的，就是请她允许自己征得她父亲的同意前来拜访她。他的简单和认真打动了她，那么多天以来她用心培育出的恨突然平息了。她把信收在一个不用的珠宝盒里，压到箱底。但她忽然又记起来，那里曾经保存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飘散着香味的信，一阵羞愧让

她浑身一颤，于是她把信从珠宝盒里取出来，想换个地方。这时，她所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做法就是权当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于是，她把它放到灯上烧起来，边烧边看着一滴滴火漆在火苗上飞溅，变成了缕缕青烟。她叹息道：“可怜的人。”突然，她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片刻间，她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自己也很惊讶，他已经离她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怜的人。

十月里，伴随着最后几场雨，又来了三封信。同其中的第一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小盒弗拉维格尼修道院的紫罗兰香皂。三封信中前两封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到大门口的，医生还从车窗里向加拉·普拉西迪娅打了个招呼，一来可以让大家确认信就是他写的，二来也让谁都没法否认收到过这些信。此外，这两封信都用押着花押字的火漆封着，费尔明娜·达萨已能辨认出医生那龙飞凤舞、密码似的字迹。两封信都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和此前那封同样的意思，也怀着同样的谦卑，但在那温婉措辞的背后，开始流露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望，这是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含蓄委婉的信中从未显露过的。两封信之间相隔两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每次一收到信便拆开来读，而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就在要烧掉它们的前一刻，她改变了主意。但是，她从未想过要给医生回信。

十月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滑进来的，和之前的几封截然不同。字体像孩子写的一样幼稚，无疑是出自左手。但费尔明娜·达萨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读完了信的内容，才发现这是一封无耻的匿名信。写信的人认定费尔明娜·达萨用迷魂汤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并由这个假设出发得出了恶意的结论。信的结尾是一句威胁：倘若费尔明娜·达萨不放弃借由这个全城最受倾慕的男人飞上枝头的想法，一定会当众出丑。

她感到自己成了严重不公的牺牲品，但她的反应并非报复，而是相反：她想找出这封匿名信的作者，用种种适宜的解释向他证明他错了，因为她非常确定，自己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殷勤打动。接下来的几天，她又收到了两封没有署名的信，和第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信中没有任何两封出自同一人手笔。看来，要么她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关于她私订终身的虚假传闻传得比想象的要远。一想到这一切都可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某个简单的冒失行为造成的后果，她就惶恐不安。她想，或许他的为人与他那庄重的外表差距甚远，或许他在出诊时喜欢信口开河，就像他那个阶层的很多人那样，到处吹嘘自己幻想出来的对她的征服。她想写信给他，指责他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万一这正是他想要的呢。她试图从那几个来缝纫室和她一起学画的女友们那里打听消息，但她们唯一听说的就是关于那次小夜曲独奏的无关痛痒的评论。她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备受屈辱。和最初想找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说服他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完全不同，现在她只想用修枝剪把他碎尸万段。她整晚睡不着觉，分析那些匿名信中的细节和用词，幻想能从中找出一丝安慰。但这是徒劳的：从本性而言，费尔明娜·达萨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一家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对于他们的明枪，她尚有武器可以自保，但对于暗箭，她就束手无策了。

这个信念在黑色洋娃娃带来的惊吓之后变得更加苦涩。娃娃也是那些天里送来的，没有附任何信件，但是其来源似乎显而易见：只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会送她这样的东西。从上面带着的商标来看，娃娃是在马提尼克岛买的，身上穿着精美的衣服，鬈曲的头发用金丝做成，躺下时眼睛还会闭上。费尔明娜·达萨觉得十分好玩，于是便放松了警惕，白天让娃娃躺在她的枕头上，晚上则习惯了和它睡

在一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从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梦中醒来，竟发现洋娃娃正在变大：它来时穿的那身漂亮衣服已遮不住它的大腿，鞋子也被脚撑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曾经听说过非洲的巫术，但都没有像眼前这件事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况且，她也实在无法想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样的男人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来。她是对的：娃娃不是车夫送来的，而是突然冒出的一个卖虾人带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费尔明娜·达萨试图解开这个谜，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想到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那忧郁的气质曾使她害怕，但生活渐渐让她相信，她想错了。这个谜一直悬而未解，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她就不寒而栗，直到婚后很久仍是如此，尽管那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并且相信自己是被命运拣选的宠儿，是最幸福的女人。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最后的尝试是请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为他们撮合。嬷嬷无法拒绝医生的请求，因为自从她所属的修会在美洲建立以来，这个家族就给予了很多赞助。上午九点，她在一个新入会的修女的陪伴下，出现在费尔明娜·达萨家。两人不得不同笼子里的鸟儿逗趣了半个小时，才等到费尔明娜·达萨沐浴完毕。嬷嬷是个男性化的德国女人，说起话来像金属发出的声音一样，目光中带着命令的神色，同她那孩子般幼稚的喜好一点儿也不相符。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以及和她有关的一切更令费尔明娜·达萨痛恨了，只要一想起她那假慈悲的模样，费尔明娜就感觉像五脏六腑里有蝎子在爬一样厌恶。刚一出浴室门，她就认出了她，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虚所毁掉的全部生活。而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恰恰相反，她带着看似由衷的喜悦同费尔明娜打了招呼，对她长高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表示惊喜，夸奖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称赞了院子的高雅品位和

火盆中生长的橘树花。她吩咐新入会的修女在原地等候，并嘱咐她不要和那些乌鸦靠得太近，否则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把她的眼睛啄出来。接着，她想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和费尔明娜单独聊一聊。于是，费尔明娜邀请她来到客厅。

这是一次简短而不愉快的会面。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拐弯抹角上，而是单刀直入地提供给费尔明娜·达萨一次体面复学的机会。当初被开除的原因不仅可以从档案里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中一笔勾销，这样她便可以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的文凭。费尔明娜·达萨一头雾水，想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这是一位值得拥有一切的人的请求，而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让你幸福。”修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她明白了。她心想，一个因为一封纯洁无辜的信而毁掉了她的人生的女人有什么权利充当爱情的使者呢？但她没敢说出口。她只是说，是的，她认识这个人，但同样也知道他无权干涉她的生活。

“他唯一恳求你的，是请你允许他同你谈五分钟。”修女说，“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同意的。”

想到父亲也是这次会面的同谋，费尔明娜·达萨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我们见过两次，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再见面了。”

“只要是有点脑子的女人都明白，这个男人是全能上帝的恩赐。”修女说。

她继续述说着他的种种美德，他的虔诚，还有他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她一边说，一边从袖中掏出一串坠有象牙雕刻的基督像的金念珠来，在费尔明娜·达萨的眼前晃了晃。这是件家族圣物，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一位锡耶纳的金匠雕琢而成，被克莱蒙四世[10]祝福过。

“它是你的了。”她说。

费尔明娜·达萨只觉得自己血管中血液翻涌，胆子一下大了起来。

“我不明白您怎么会干这种事，”她说，“您不是一向认为爱情是罪过吗？”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装作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眼皮却红得冒火。她依旧在她眼前晃着那串念珠。

“你最好放明白些，”她说，“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会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让他来好了。”费尔明娜·达萨说。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把金念珠藏进衣袖，然后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一块很旧的手帕，攒成一个团，紧紧地握在拳头里。她带着同情的微笑，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看着费尔明娜。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口气，“你还在想着那个人。”

费尔明娜·达萨努力咽下了一句无礼的话，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修女，目不转睛，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咬着牙。最终，她满意地看

见修女那男人般的眼睛被泪水淹没。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用手绢团擦掉眼泪，站起身来。

“你父亲说得一点儿不错，你就是一头骡子。”她说。

大主教并没有来。而如果不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来找表妹过圣诞节，让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这件难缠的事情本该在那天就已结束。早晨五点，他们在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上接到了她。在一群因晕船而奄奄一息的混乱的旅客中，她容光焕发地下了船，举手投足尽显女性的妩媚，并为终于告别了昨夜的颠簸而兴奋不已。她背来了几篓子活火鸡，还有她家肥沃庄园里出产的各色水果，为的是在她做客期间谁也不缺吃的。她的父亲利希马科·桑切斯让她问问达萨家复活节时是否需要乐师，他有最好的乐师可以差遣，并许诺过些时候会用船运一些烟火来。他还说，自己三月份之前都不能来接女儿，所以她可以尽情地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

表姐妹俩立即开始享受共度的时光。她们从第一个下午起便一同沐浴，赤身裸体，用浴池里的水互施洗礼。她们互相擦肥皂，捉虱卵，比臀部，比结实的乳房，把对方当作镜子，细细比较自上次两人赤身相见以来，无情的时光如何改变了各自的身体。伊尔德布兰达个头高大，身体结实，皮肤是金黄色的，但全身长着混血女人的毛发，短而鬈曲，如同一层金属丝形成的泡沫。而费尔明娜·达萨则不同，她赤裸的身体有些苍白，线条修长，皮肤光滑，毛发柔顺。加拉·普拉西迪娅为她们在卧室里摆好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可她们有时却睡在一张床上，熄着灯一直聊到天亮。她们还会抽上几支拦路劫匪抽的那种细雪茄，这是伊尔德布兰达藏在箱子里衬带过来的。抽完后，烧上几张亚美尼亚纸，以祛除卧室里茅草房子似的浓烈气味。费尔明娜·达萨第一次抽烟是在巴耶杜帕尔镇，之后又在丰塞卡和里奥阿查抽

过。在里奥阿查时，十几个表姐妹一起关在一间房里，一边谈论男人，一边偷偷抽烟。她还学会了反着吸烟，即把香烟有火的一头放进嘴里，就像战争中的夜晚，男人们为了不让香烟的火光暴露自己所做的那样。但她从未独自抽过烟。伊尔德布兰达住在她家的那段日子，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抽烟，正是那时她养成了烟瘾，不过始终是偷偷抽，甚至背着丈夫和孩子们，不仅因为女人当众抽烟很不雅，还因为偷偷做的事情别有一番乐趣。

伊尔德布兰达的旅行也是父母强迫的，为的是让她远离不可能的爱情，尽管他们想让她相信此行是为了帮费尔明娜拿个主意，定一门好亲事。伊尔德布兰达接受了旅行的建议，并计划像当初表妹所做的一样，再次对遗忘女神加以嘲弄。她已经和丰塞卡的电报员说好了，以最秘密的方式帮她传递消息。因此，当她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不禁大失所望。而更糟的是，伊尔德布兰达抱有一种整体的爱情观，认为每一个人的爱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爱情。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计划，反而以一种令费尔明娜·达萨惊慌失措的胆量，独自一人去了电报室，准备取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帮助。

她起初没能认出他来，因为她根据费尔明娜·达萨的描述想象出来的样子与他本人完全不符。第一眼看到他时，她觉得表妹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职员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他的气质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衣着则像落难的犹太教士，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根本不会让任何人动心。但很快，她就推翻了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不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即使到了最后，他也完全不知情—无条件地为她效劳。没有人像他这样善解人意，既没有要求她证明身份，也没有向她索要地址。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每星期三

下午，她到电报室来，他便会把回复交到她手中，仅此而已。另外，当他读完伊尔德布兰达写好带来的字条后，问她是否接受一点修改，她同意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先是在行与行之间做了一些改动，而后又涂掉，重新写过，写到没有空地儿了，干脆把纸撕掉，重新写了一封和原来完全不同的电文，她觉得新的电文内容感人肺腑。走出电报室的时候，伊尔德布兰达差点掉下眼泪来。

“他很丑，而且可怜兮兮的，”她对费尔明娜·达萨说，“但他身上洋溢着爱。”

最引起伊尔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孤独。她对表妹说，她就像个二十岁的老处女。伊尔德布兰达习惯了在一个人数众多且人员分散的庞杂家庭里生活，谁都无法准确说清家里到底住着多少人，也不知道每餐究竟会有谁来吃饭。她无法想象，一个像表妹这样年龄的姑娘会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修道院般的私人生活中。毫不夸张：每天从清晨六点起床开始，直至熄灭卧室里的灯光，她全然把自己献给流逝的时间。生活是从外部强加给她的。首先，伴随着最后的鸡鸣，送牛奶的男人叩响门环把她吵醒。接着，卖鱼的女人来敲门，带着一箱躺在一层海藻上的半死不活的红鲷鱼，还有那些豪爽的帕伦克女人，带着产自玛利亚·拉巴哈的蔬菜和圣哈辛托的水果。再往后，这一整天里，各色人等都会来敲门：乞丐，卖彩票的女郎，募捐的修女，吹着笛子的磨刀匠，收旧瓶子的，收碎金子的，收报纸的，还有用纸牌、手相、咖啡渣或水盆里的水算命的假吉卜赛女人。加拉·普拉西迪娅的一周都是在开门、关门中度过的，她反复地说着“不”、“请改天再来”，或者气急败坏地从阳台喊道：“别再来烦我们了，该死，该买的我们都买齐了！”她以极大的热情和风趣代替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以至于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把她当成姑妈，甚至喜欢上她了。

她当女仆当上了瘾。只要有一小会儿空闲，就跑到工作间去熨烫白色的衬衣和床单，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再收入放有薰衣草的衣柜中，而且不仅是对刚洗过的衣服熨了又叠，对那些久置不用而褪了色的衣服，她也如此对待。她还同样精心地保管着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服，费尔明娜·桑切斯是费尔明娜的母亲，已经去世十四年了。不过，家里拿主意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她下令该吃什么，该买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这样，她决定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决定什么的家庭的全部生活。每当她清洗完鸟笼，给鸟儿们喂过食，又侍弄过那些其实不需要侍弄的花草后，就没有了方向。被学校开除后，好几次她都睡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绘画课不过是又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

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被赶走后，她同父亲的关系就不再亲热，但两人找到了一种互不干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她起床时，他已经出门去做生意了。他很少不回家吃午饭，尽管几乎从来都吃不下什么，因为教区咖啡馆的开胃酒以及加利西亚的小菜和点心已经把他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她们把他的那份留在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只盘子里，再用另外一只盘子扣在上面，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会吃的，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热过之后拿来当他的早餐。每个星期，他会给女儿一次钱，用于家中的花费。这笔钱他估算得很合适，女儿也精打细算，但每次她提出任何临时性开支，他都从容愉快地接受。他从不少给一分钱，也从不查账，但她却非常自律，就好像要向圣职部的法庭交账似的。他从未对女儿说起自己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没有带她去看过他在港口的那些办公室，因为它们所在的地方是正派小姐们的禁区，即便有父母陪同也不宜前往。洛伦索·达萨晚上十点前不会回家，这个钟点是战争不那么严重时宵禁开始的时间。在这之前，他会一直待在教区咖啡馆里，随便什么都玩，因为他是室内游戏

的行家，样样精通。他总是神志清醒地回到家，从不吵醒女儿，尽管每天一睁开眼，他便喝下了第一杯茴香酒，白天则一直嚼着熄灭的雪茄烟头，时不时地再喝上几杯。然而一天晚上，费尔明娜·达萨感觉到了他进屋的声响。她听见他走在楼梯上那哥萨克人似的脚步声，他在二楼走廊上沉重的喘气声，还有他用手拍打她卧室门的声音。她给他开了门，头一次，他那歪斜的眼睛和笨拙的说话声让她感到害怕。

“我们完了，”他说，“全完了，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这是他所说的全部，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也没有发生什么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但从那晚起，费尔明娜·达萨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竟是孤身一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净界[11]之中。昔日的同学处在一个禁止她入内的天堂里，尤其是她蒙受了被开除的耻辱后，更是如此；而她也没能融入邻里之间，因为他们中没人知道她的过去，他们眼中的她仅仅是那个穿着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校服的姑娘。父亲的世界里只有商人和码头搬运工，以及那些缩在教区咖啡馆里的战争流亡者，全都是些孤独的男人。最近这一年，绘画课稍稍为她减轻了一点幽居的寂寞，因为那位教画画的女老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学生带到缝纫室来。不过，这些姑娘的社会地位参差不齐，三教九流。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她们不过是些借来的朋友，每次课一结束，情意也就随之消散。伊尔德布兰达想敞开房子的大门，让屋里透透气，还想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烟火塔一起弄来，搞一场狂欢舞会，让它的劲风把表妹的沉闷吹得烟消云散。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设想是没有用的。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人会来。

不管怎样，是她把表妹带进了真正的生活。每天下午绘画课后，她都让表妹带她上街，去认识这座城市。费尔明娜·达萨指给她看以前自己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每日走过的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

边假装看书一边等她时所坐的花园里的那条长凳，他们藏信的隐蔽处所，以及过去圣职部监狱所在的阴森宫殿，也就是后来经修缮后变成的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她对它简直恨之入骨。她们登上贫民墓地所在的小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那里根据风向为她拉小提琴，好让她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在那里，她们俯瞰这座历史古城的全貌：破旧的屋顶，断壁残垣，杂草丛中城堡的废墟，海湾里断断续续、大大小小的岛屿，沼泽四周寒酸可怜的窝棚，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

圣诞夜，她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当初可以最好地欣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秘密为她演奏的位置上，带表姐看了自己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他的准确地点，就在与此同样的一个夜晚，她的目光撞上了那双惊慌的眼睛。她们还冒险独自去了“代笔人门廊”，买了一些甜食，又在卖神奇纸的商店玩了一会儿。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向表姐指出了那个她猛然发现自己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地方。她并没有察觉，从家到学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她短暂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因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存在的。伊尔德布兰达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却不肯承认，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她生活中唯一曾发生过的事。

就在那些日子，来了一个比利时照相师，在“代笔人门廊”的楼上开起了照相馆，所有能付得起钱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自己照张相片。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是最先去的一批。她们把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柜翻了个底儿朝天，瓜分了那些最耀眼的衣服、阳伞以及节日里穿的鞋帽，把自己打扮得像世纪中叶的贵妇人似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帮她们束紧身胸衣，教她们如何在裙撑的金属丝架子中扭动

身体，如何戴手套，如何系上高跟靴上的扣子。伊尔德布兰达看中了一顶宽檐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一直垂到后背。费尔明娜则戴了一顶样式更新一些的，上面装饰着彩色石膏做成的水果和马鬃花。最后，她们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就像银版相片中的祖母一样，互相嘲笑起来。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地出门去拍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加拉·普拉西迪娅从阳台上看着她们撑起遮阳伞，穿过花园，一边尽可能地在高高的鞋跟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像孩子拖学步车似的使上全身的劲儿拖着裙撑，她祝福她们，祈求上帝帮她们拍张好照片。

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前人山人海，因为里边正在给近日刚刚赢得了巴拿马拳击冠军的贝尼·森特诺拍照。他穿着比赛时的裤子，戴着拳击手套，头上顶着桂冠。给他照相可不容易，因为他必须保持进攻姿势一分钟，并尽可能地屏住呼吸，可他刚刚抬起手臂，摆出防守的姿势，他的崇拜者们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而他便无法抵制取悦他们的诱惑，将本领尽数抖搂出来。轮到两个表姐妹时，天空已布满了乌云，眼看就要下雨，但两人还是任凭别人在她们脸上涂满淀粉，然后靠在雪花石膏柱上，姿势那么自然，一动不动，甚至超过了所需的时间。那是一张永恒的照片。当伊尔德布兰达活到近百岁，最终在马利亚之花庄园去世的时候，人们在锁着的卧室衣柜中发现了她保存的这张玉照，它被藏在一摞飘着香味的床单之间，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封被岁月磨去了字迹的信，上面负载的情思早已凝成了化石。费尔明娜·达萨则一直把她的那张照片保存在家庭相册的第一页，但后来不知怎的，也不知何时，它突然不翼而飞，经过一番不可思议的巧合，最后竟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手中，而那时两人都已年过花甲了。

当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比利时人的照相馆时，“代笔人门廊”对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连阳台上都站满了。她们忘了自己脸上还涂着白色的淀粉，嘴唇上涂了巧克力色的油膏，而她们的衣服也不合时宜且不属于这个时代。迎接她们的是满街的哄笑和嘘声。她们躲到角落里，试图逃避众人的嘲弄。就在这时，骚动的人群分作两边，一辆被几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着的四轮马车驶了过来。哄笑停止了，不怀好意的人群散开去。伊尔德布兰达肯定永远也忘不了她第一次看见那个站在马车踏板上的男人时的情景：他那高高的缎子礼帽，他的锦缎背心，他的文质彬彬和他双眸的柔情，还有他出现时的威严。

虽然她从未见过他，但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费尔明娜·达萨曾跟她提起过他，只是在不经意间，而且兴味索然。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她死活都不愿从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门前经过，因为那辆金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正停在那里。她告诉表姐马车的主人是谁，并试图向她解释为何反感他，但对于他追求自己的事只字未提。伊尔德布兰达本来早已把他忘到脑后了。但当她在车门前认出他，看见他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放在马车的脚踏板上，像童话般出现在眼前，她不明白表妹为什么不喜欢他。

“请上车，”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她们说，“想去哪儿两位尽管吩咐，我带你们去。”

费尔明娜·达萨正要拒绝，可伊尔德布兰达已经接受了邀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走下来，用指尖扶她上了马车，几乎没有触碰到她。费尔明娜别无选择，跟在她身后也上了车，脸涨得绯红。

她家离那里不过三个街口。表姐妹并没有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向车夫下了什么特别的指令，但想必如此，因为马车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她们坐在主座上，而他坐在对面，背朝着车子前进的方向。费尔明娜把脸转向窗子，陷入一片茫然。伊尔德布兰达则恰恰相反，表现得十分开心，而乌尔比诺医生见她开心，自己更是高兴。车子刚一动起来，伊尔德布兰达就感觉到了座椅的天然皮革散发出的温暖气味，以及包厢内的严实温馨，她说，其实住在这里也挺不错。很快，两人便开始大笑，像老朋友一样互相开起玩笑来，接着又玩上了智力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暗语游戏，就是在每个音节之间都插入一个事先说好的音节。他们假装费尔明娜听不懂，但其实他们知道她不仅听得懂，而且还一直在留心听，而这正是他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他们笑了一阵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她再也受不了脚下那双靴子的折磨了。

“这再简单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说，“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脱掉。”

他开始解靴子上的绑带，伊尔德布兰达也接受了挑战。但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紧身胸衣的架子让她弯不下腰。乌尔比诺医生故意放慢了速度，一直等到她从裙子下面掏出自己的两只靴子，就好像刚刚从池塘里钓上来似的。这时，两人看了一眼费尔明娜，只见在黄昏火红的霞光映衬下，她那黄鹂般的倩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轮廓清晰。她正在为三件事愤怒不已：一是她的尴尬处境，二是伊尔德布兰达的放肆行为，三是她十分确信，为了拖延时间，车子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可伊尔德布兰达却像脱缰的野马。

“现在我发现了，”她说，“让我不舒服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钢丝鸟笼。”

乌尔比诺医生会意她指的是裙撑，于是赶紧抓住了这个良机。“这再简单不过了，”他说，“脱了它。”说着，他以魔术师般的敏捷动作，从兜里掏出一条手帕，绑在自己的眼睛上。

“我不看。”他说。

蒙在眼睛上的手帕一下子让他那圆润下巴上的黑胡子和用胶刷出胡尖的短髭之间的两瓣嘴唇显得分外纯美，伊尔德布兰达突然惊得浑身一颤。她又瞥了费尔明娜一眼，这一次她看见她并没有生气，而是惊恐万状，害怕表姐真的会把裙子脱下来。伊尔德布兰达严肃起来，用手语问她：“我们该怎么办？”费尔明娜·达萨同样也用手势做了回答，告诉她若不直接回家，她就从行驶的马车上跳下去。

“我在等着呢。”医生说。

“已经可以看了。”伊尔德布兰达说。

摘掉手帕，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她变了脸色，于是明白游戏已经结束，而且结束得很糟糕。他做了个手势，车夫掉转方向，在街灯管理人开始点亮一盏盏街灯的时刻，把马车驶进了福音花园。所有的教堂都已念起了《三钟经》。伊尔德布兰达飞快地下了车，想到自己惹得表妹不悦而有些慌张，和医生随意地握了一下手，以示告别。费尔明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可当她想把戴着绸缎手套的手撤回来时，乌尔比诺医生却用力攥住了她的中指。

“我在等您的回答。”他对她说。

费尔明娜更用力地把手一抽，空空的手套挂在了医生的手上，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索回它。这一天，她没吃晚饭便睡下了。可伊尔德布

兰达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同加拉·普拉西迪娅一起在厨房吃过晚饭，这才走进卧室，用她那天生的风趣把下午的事评判了一番。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乌尔比诺医生，对他的优雅和翩翩风度，都充满了兴奋与热情。费尔明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已经从反感中冷静下来。终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蒙上眼睛，她看见他那玫瑰色的双唇间两排闪亮的完美牙齿时，曾泛起过一种想去狂吻他的难以抑制的渴望。费尔明娜·达萨翻过身去，面向墙壁，用一句话结束了她们的谈话，不带丝毫恶意，而是挂着发自肺腑的微笑。

“你真是个小娼妇！”她说。

睡梦中，她惊吓连连，到处都看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见他笑，看见他唱，看见他蒙着眼睛，两排牙齿间迸发出硫黄的火星，看见他坐着一辆和以前不同的马车，驶在通往贫民墓地的山坡上，用一种没有固定规则的暗语嘲笑她。距离天亮还有很久，她就醒了，精疲力竭，清醒地闭着双眼，想着她今后还要活的那无数个年头。之后，趁着伊尔德布兰达洗澡的时候，她飞快地写了一封信，飞快折好，又飞快地装进信封，赶在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浴室之前，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派她送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府上。那是一封具有她独特风格的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只是写着：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嫁给一位门第显赫、家财万贯、在欧洲受过教育而且在同龄人中声誉非比寻常的医生时，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从消沉之中振作起来。看到儿子不说一句话，不吃不喝，整夜不歇地流泪，特兰西多·阿里萨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用尽了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来安慰他，终于在一星期后让他重

新开始进食。之后，她找到莱昂十二·罗阿依萨，也就是那三兄弟中唯一还活着的一个，和他谈了一次话。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请求他在航运公司给侄子找份差事，不论干什么都行，但地点得是在马格达莱纳流域丛林中的某个偏僻的港口，那里既不能通信，也不能发电报，更不能让他看见什么人，打听到这座堕落的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叔叔最终并没能向他提供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哥哥遗孀的尊重—单是丈夫在外有个私生子的事实就让她无法忍受—但他还是给侄子在维拉·德雷伊瓦找了个电报员的职位。维拉·德雷伊瓦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距本地有二十多天的路程，海拔比窗户街高出近三千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那次疗伤之旅一直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他将始终透过一层忧愁的薄雾来回忆这次旅行，就像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样。当他收到委任电报时，甚至都没想接受，但洛达里奥·图古特用德国人的理由说服了他，那就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份光辉的前途在等着他。他说：“电报员这一行大有可为。”他送给他一双带兔皮衬里的手套，一顶草原上用的帽子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冷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莱昂十二叔叔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几双防水靴，都是他父亲的遗物，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寝舱船票。特兰西多·阿里萨按照儿子的身材改小了这些衣服—他不像父亲那样高大，比德国人也矮许多，她还给他买了几双羊毛袜和几条连体裤，好让他不缺少衣物去抵御寒冷荒原上的恶劣天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变得异常冷漠，就像死人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似的，参与着为这次远行所做的工作。他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像当初他只向母亲倾诉了心中悄悄压抑的激情一样。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是故意放纵了内心的最后一丝疯狂，做出了一个很可能断送自己性命的举动。半夜里，他

穿上星期日的礼服，独自站在费尔明娜·达萨的阳台下，拉响了那曲他为她创作的爱的华尔兹。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知道，也是三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挫折的象征。他一边拉，一边低诵着歌词，琴渐渐被泪水打湿。他拉得是那样激情澎湃，刚奏出头几小节，整条街上的狗便开始狂吠，接着，全城的狗都跟着吠叫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在音乐的魔力下，它们又慢慢安静下来，华尔兹最终结束在一片空灵的寂静之中。阳台的窗子没有打开，也没有人向街上探出头来，甚至连那位几乎总是拎着油灯赶来，试图从演奏小夜曲的人身上捞点油水的巡夜人也没有出现。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这次演奏就像一道宽慰的符咒，因为当他把琴收进琴盒，头也不回地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渐行渐远时，心中感到的并不是明天即将远行，而是仿佛多年前就已抱定永不回来的决心离开了此地。

那船是加勒比河运公司所拥有的三条一模一样的船之一，为纪念公司的创建者被重新命名为“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号”。那是座漂浮在水上的双层木屋，建在一个又宽又平的铁壳上，最深吃水五英尺，这让它能够更好地在水深莫测的河流中消灾避祸。最老的一批船是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建造的，依照的是往来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的传奇样式，两侧各有一个桨轮，靠烧柴的锅炉驱动。同这些老船一样，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船的底层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安有蒸汽发动机并设有厨房，还有一大排鸡笼似的舱室，船员们把自己的吊床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挂在里面。顶层则设有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室，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饭厅，身份高贵的旅客至少会被邀请到这里一次，用餐或者打牌。中间层有六间一等舱，设在一段被当作公共餐厅的甬道两侧。船头是一个露天起居室，配有雕花的木头栏杆和铁柱子，很多普通旅客晚上就把吊床挂在这里。但和那些老船不同的是，船的两侧并没有桨轮，而是在船尾有一个装有水平桨叶的

巨轮，就位于旅客甲板上那令人窒息的便池下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七月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上了船，但他并没有像第一次旅行的人几乎出于本能所做的那样，一上船就不厌其烦地四处勘察。黄昏，当船经过卡拉玛尔村时，他到船尾去小便，透过便池洞，他看见巨大的桨轮在他脚下转动，卷起翻腾的泡沫和蒸汽，发出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巨响。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新环境。

他从没出过远门。他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几本他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它与他的不幸关联得实在太紧密，母亲则逼他带上了铺盖卷。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穿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舱室。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上，把整个旅途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对她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里，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它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她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三天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晾在栏杆上的一块块腌肉发出的恶臭。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

此外，由于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中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

即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鳄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瘟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港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徒增烦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他那种令母亲忧伤不已、令朋友痛心疾首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日子在他身上轻而易举地流逝。他坐在栏杆前，看着岸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短吻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捕捉蝴蝶，看着受惊吓的草鹭突然从沼泽中飞起，看着海牛用巨大的乳头喂养幼崽，并发出如女人哭泣般的叫声，令旅客惊诧不已。在同一天，他看见河上漂过三具膨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兀鹫。最先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了头，而后漂过一具只有几岁的女童的尸体，她那美杜莎般的头发在船尾的航迹中上下漂浮。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霍

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令人恶心的强烈气味污染了他心中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

向来如此：每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与她有着一定关联。晚上，船停泊下来，大部分旅客都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他却在餐厅的瓦斯灯—唯一一盏直到天亮都不会熄灭的灯下，复习着那些他几乎可以背下来的连载插图小说。当他用现实中认识的人去代替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时，那些反复读过多遍的情节又恢复了最初的魔力，而他向来把那些坏运气的情侣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明娜·达萨。另外一些夜晚，他会给她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它们的碎片漂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她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之中。就这样，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直到清晨吹来第一缕微风，他才坐到栏杆旁的靠背椅上打起盹来。

一天晚上，他比往常早一些中断了阅读。正当他漫不经心地朝厕所走去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鹰爪般的手抓住了他衬衫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室，随即又关上了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这个不知年龄的裸体女人的样貌，她浑身淌着湿热的汗水，喘着粗气，一把将他仰面朝天地推倒在简易床上。她解开了他的皮带，又解开他裤上的扣子，接着便骑在他身上，毫无光荣可言地夺取了他的童贞。两人恣情陷落一个无底的深渊，四周泛着爬满青虾的咸水沼泽的味道。之后，她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无声无息地喘着气，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您走吧，忘了它。”她对他说，“就当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

这次突袭是如此迅速而成功，令人无法视之为一次无聊时突发奇想的疯狂举动。它必然是从容计划的结果，甚至连细枝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个令人愉悦的信念增加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躁动，因为当他处于欢愉的顶峰时，曾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甚至也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达萨的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于是，他千方百计想找出那个技艺精湛的强奸者，或许在她那豹子般的本能中，他能找到医治自己痛苦的良方。但他没有找到。相反，调查越是深入，他感到自己距离真相越发遥远。

袭击发生在最后的那间舱室中，但这一间和倒数第二间有一扇门相通，所以两间舱室组成了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家庭卧室。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岁但风韵犹存的妇人，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她们是从巴兰哥·德洛巴上的船，自从蒙波斯城因其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蒸汽船的航线上取消后，该城的货物和旅客都是从巴兰哥·德洛巴港上船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前就曾注意到她们，但那只是因为她们把熟睡的孩子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随身携带。

她们穿得仿佛是在时髦的远洋轮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底衬有裙撑，蕾丝饰领，宽檐帽上缀着马鬃花。年龄较小的那两个女人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换好几身华丽衣服，就在其他旅客热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们却仿佛置身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片春光之中。三人灵巧地撑着阳伞，摇着羽毛扇，但就像所有的蒙波斯女人一样，她们的意图令人费解。毫无疑问，她们是一家人，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连她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起初，他认为那个年长的妇人可能是另外两个的母亲。但随后他注意到，她的年纪根本不足以当她们的母亲，而且她戴着半孝[12]，而另两个女人却没有着孝。他无法想象，她们中的一个敢在另外两人睡在旁边的床铺时做出那种事来，唯一合理的假设

就是这个女人利用了偶然的，又或者是安排好的空当，在舱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下手。他观察到有时她们中的两人会出去乘凉，很晚才回来，而第三个人就留下来照看孩子。但在一个更热的晚上，她们三人带着孩子一起出了门，孩子睡在柳条编的鸟笼里，外面还罩着纱幔。

尽管迹象混乱如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很快就排除了年长妇女是那次袭击的罪魁祸首的可能性。接着，又宣布了最小的那位，也是她们中最漂亮、最大胆的那位的清白。他做出如此判断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只因为通过对她们的密切监视，他最终倾向于将自己内心的希望当作真相：他发自肺腑地希望自己那一夜情人是鸟笼孩子的母亲。这种假设是如此地吸引他，以至于他开始想念她胜过了想念费尔明娜·达萨，而忽略了这位新晋的年轻母亲心里只有孩子这一明显事实。她应该还不到二十五岁，身材纤瘦，头发金黄，一双葡萄牙人的眼睛更令她显得遥不可及，她在孩子身上慷慨倾注的无限温柔，任何男人只要能分得一丁半点就会心满意足。从早餐直至入寝，她都在大厅里照顾孩子，而另外两个女人则在玩中国跳棋。等孩子睡着了，她便把柳条鸟笼挂在天花板上，靠近栏杆凉爽的那一侧。即便是孩子睡觉时，她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而是一边摇着鸟笼，一边哼着少女情歌，任由思绪飞离这枯燥的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执著地幻想着她迟早会露出马脚，哪怕只是一个表情。他毫不掩饰地越过假装在读的书看她，甚至借由她挂在细布衬衫上的圣物盒的一起一伏，观察她呼吸的变化，还甘冒无礼之嫌，明目张胆地在餐厅调换座位，只为能与她对面而坐。但最终，他都没有看出哪怕最细微的一点迹象，能够表明她当真就是收藏着他另一半秘密的人。他唯一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因为那位年轻的女伴是这样叫她的：罗萨尔芭。

第八天，船艰难地在水流湍急的狭窄河道里航行，两边是大理石的悬崖峭壁，午饭后，船停靠在纳雷港。那些去往安蒂奥基亚省（受新一轮内战影响最深的省份之一）的旅客要在此地下船港口由六间棕榈屋和一间锌顶的木制仓库组成，几队武器简陋的赤脚士兵在此巡逻守卫，因为有消息说，暴动者正计划抢劫船只。房屋背后，杂草丛生的山峰高耸入云，一块马蹄铁似的岩石为悬崖镶上了飞檐。夜晚，船上没有一个人睡得安稳，但是并没有袭击发生。天亮时，港口摇身变成了一个星期日的集市，印第安人兜售着用植物象牙做成的护身符和爱情药水，夹杂在一群群整装待发、准备用六天的时间攀到中部山区那长满兰科植物的丛林中去的牲口之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黑人们把货物背下船，以此打发时间。他看见他们卸下一箱箱中国瓷器，还有运给恩维加多独身姑娘们的三角钢琴。当他发现下船的旅客中也包括罗萨尔芭一行人时，已经太晚了：她们已经侧坐在马背上，脚踏亚马孙皮靴，手撑厄瓜多尔的彩色阳伞。这时，他迈出了之前这些天都未敢迈出的一步：向罗萨尔芭挥手告别，三个女人也用同样的动作回答了他，那股亲切劲儿让他为自己迟来的大胆痛彻心扉。他看着她们从仓库后面绕过去，身后跟着几头骡子，驮着箱子、帽盒和婴儿的鸟笼。不一会儿，就看见她们像一队搬运东西的小蚂蚁似的，攀行在悬崖上，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而这几日一直在暗中窥视他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突然用它那锋利的爪子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他知道她即将举行隆重的婚礼，而他这个最爱她、且将永远爱她的人却连为她而死的权利都没有。之前一直被压抑在哭泣之中的忌妒，此刻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他祈求上帝，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即

将为爱情宣誓，顺从于那个只为把她当作社交点缀而娶她为妻的男人时，让公正的闪电从天而降，劈在她身上。这位新娘，只能是他的新娘，否则就谁的也不是。他满心狂喜地想象着，她仰面朝天躺在大教堂的石板上，四周满是沾染了死亡露珠的雪白的橘树花，那泡沫般倾泻而下的头纱垂落在主祭台前安葬着十四位主教的大理石棺之上。然而，复仇的幻想刚一结束，他便为自己的邪恶后悔起来，于是他又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虽然于他遥不可及，但却活着，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再睡着过，而如果说他偶尔能坐下来随便吃口东西，那也是因为幻想着费尔明娜·达萨坐在桌前，或者相反，是因为他不愿给予她那种殊荣，不愿让她认为自己是在为她禁食。有时，他会用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在醉人的婚礼中，甚至在火热的蜜月里，费尔明娜·达萨会有那么片刻的心痛，至少有片刻，无论怎样，一定会有那么片刻，她的心里会浮现出这个被嘲弄，被侮辱，被唾弃了的恋人的影子，而她的幸福也将会荡然无存。

到达旅途终点卡拉科利港的前一天晚上，船长举行了传统的告别晚会，船员组成一支吹奏乐队，驾驶室里还放出了五彩的烟花。那位大不列颠公使以堪称典范的克制力忍受了一路的艰辛，用照相机猎获了那些不允许他用猎枪屠杀的动物，并且，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穿着礼服走进餐厅。但在这最后的欢庆活动中，他穿了一身苏格兰麦克塔维什部族的服装， 兴致勃勃地吹起风笛，还教所有想学的人跳他们的民族舞蹈。还没到天亮，大家便不得不半扶半拖地把他搀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被痛苦折磨得垂头丧气，躲在甲板最偏远的角落，完全听不到人们的欢闹声。他把洛达里奥·图古特的大衣裹在身上，努力抵御着发自骨髓的寒意。就像死刑犯在行刑的清晨一样，早晨五点他就醒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想象着费尔明

娜·达萨婚礼的每一步骤。后来，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日期，而且一切都和他想象的不同，他甚至清醒地嘲笑起自己的幻想来。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个受难的星期六，最终他发起了高烧，因为他仿佛看到一对新人正悄悄地从一扇假门溜走，去尽情享受新婚之夜的狂欢。有人看到他烧得发抖，便报告了船长。船长担心这是一起霍乱病例，带着随船医生离开了晚会。医生出于谨慎，把他送进了隔离舱室，还给他用了大剂量的溴化物。然而第二天，当人们远远看见卡拉科利的礁石时，他的烧已经退了，而且精神抖擞，因为在镇静药物所导致的沉滞中，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电报员的光辉前途见鬼去吧，他要乘这同一条船回他的窗户街去。

鉴于之前曾把舱室让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要求随船返航并不是一件难事。船长以电报是一项前途无量的科学为由试图说服他。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安装在船上的电报系统。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为任何理由所动，船长最后只得带他返航，并不是为了舱室的人情，而是因为他知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加勒比河运公司的真正关系。

下水航行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自从他们在凌晨驶入梅塞德斯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捕鱼的独木舟上点点灯火在轮船激起的回头浪中波动起伏，便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家里。当他们在迷失男孩湾靠岸时，天还黑着。在西班牙人的古航道被疏通并投入使用之前，那里是蒸汽船的最后一个港口，距离海湾还有九里。旅客必须等到早晨六点，才能登上租用的小艇，驶往最后的目的地。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归心似箭，提前坐上邮局的小艇走了，因为邮局的职员认出他是自己人。下船之前，他忍不住做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把铺

盖卷扔进水里，目送它穿过那些看不见的渔夫手中的火把，直到离开湖，消失在大海之中。他确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再也不需要它了。永远不，因为他将永远不再离开费尔明娜·达萨的城市。

黎明时分，海湾里风平浪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透过第一缕阳光，在飘浮的大雾上方看见了金色大教堂的拱顶，看见了屋顶上那一座座的鸽子屋，并顺着它们找到了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阳台，想象着在那座房子里，那个带给他不幸的女人还倚在餍足的丈夫肩上贪睡。这个假想令他肝肠寸断，但他并没有制止它，相反，他在痛苦中感到满足。太阳开始升温，邮局小艇在停泊帆船组成的迷宫中穿梭。公共市场的无数种气味裹挟着水底散发出的腐烂味，混合成一股恶臭。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刚刚抵达，一队队搬运工着齐腰深的水去接船上旅客，一直把他们背到岸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个从邮局小艇跳上岸。从那一刻起，他就再没有闻到海湾的臭气，只闻到弥漫在城市中的费尔明娜·达萨特有的气息。一切都散发着她的味道。

他没有回电报室去工作。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连载的爱情小说和“人民图书馆”的书籍，母亲继续给他买，而他则躺在吊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把它们背下来为止。他甚至都没有问小提琴在哪儿。他和最亲近的朋友恢复了来往，有时一起打打台球，或者到大教堂广场拱门下的露天咖啡馆聊聊天。但他再没有去过星期六的舞会：没有她，他无心跳舞。

从那次未完成的旅行回来的当天早上，他就得知费尔明娜·达萨正在欧洲度蜜月。他那颗茫然的心当即认定，她即使不会在那里永远住下去，也会住上很多年。这个信念为他注入了忘记过往的第一线希望。他想念起罗萨尔芭来，随着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慢慢平息，对她的思念变得越来越炽热。正是在那个时期，他蓄起了小胡子，胡子尖还

涂上胶，决意在有生之年都不再剃掉它。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用一段爱情来取代另一段爱情的想法让他误入歧途。渐渐地，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难以闻见，最后只留在了白色的栀子花上。

他随波逐流，不知道生活该从哪里继续。战争时期的一个晚上，那位远近闻名的拿撒勒[13]的寡妇惊慌失措地躲到他家，因为在叛军将军里卡多·加依坦·奥贝索围城的时候，她自己的家被炮弹炸塌了。特兰西多·阿里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借口说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把寡妇安排在了儿子的卧室，实际上，她是盼望用另一段爱情来疗愈那份让儿子痛不欲生的爱。自从在船上的舱室被罗萨尔芭夺去了童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再没有做过爱。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有紧急情况的夜晚，寡妇睡床上，自己睡吊床是很自然的事。可寡妇已经替他做了决定。躺在床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她坐在床沿，开始讲述三年前丈夫的死给她带来的无法慰藉的痛苦，边讲边脱掉外面披着的一层守寡黑纱，把它抛向空中，甚至把结婚戒指也从手上摘了下来。她脱掉镶着小珠子的塔夫绸衬衣，抛到房间另一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又把紧身背心从肩膀上方扔出去，丢到了床的另一头，然后，迅速褪掉了长至脚踝、带荷叶边的百褶裙、绸缎束腹带，还有守寡的黑丝袜。她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都被她那身丧服的零七八碎覆盖了。她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一切，而且间隔恰到好处，仿佛每个动作都有进攻部队那震得城市地基颤抖的炮声为之庆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帮她解开胸衣上的按扣，但她以娴熟的动作抢在前面，因为在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中，她已经学会了做爱的每一个步骤都自给自足，甚至包括前戏，无需任何人帮忙。最后，她脱掉蕾丝花边的内裤，以游泳运动员的敏捷将它从双腿上褪下来，露出自己的玉体。

她二十八岁，生育过三个孩子，但她的裸体还完美地保持着独身时那动人心魄的魅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永远也不会明白，之前那几件忏悔服是如何掩盖住这匹未被驯服的小母马的热情的。她脱光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衣服，被自己的狂热弄得喘不过气来，要知道，她对丈夫都不曾这么做过，怕他认为自己是个淫荡的女人。她带着五年忠贞婚姻生活的迷茫与无知，试图一举满足守丧期间被严酷禁止的欲望。自她从娘胎里生下来的那个美好时刻起，到这个夜晚之前，除了死去的丈夫，她甚至从未跟别的男人共过一张床。

她并没有让内疚扫自己的兴。而是恰恰相反。屋顶上呼啸而过的火球让她睡不着觉，她继续讲述丈夫的种种优点，直到天亮。除了抛下她死去这一点，她没有责怪他的任何不忠。事实上，她感到释然，因为她确信丈夫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完全地属于自己，他已躺在那个钉了十二枚三英寸钉的棺材里，埋在地下两米深的地方。

“我很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十分肯定地知道，他不在家时到底在哪儿。”

那天晚上，她一步到位地脱掉了丧服，没有经过穿灰色小花衬衫的多余的过渡阶段。她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情歌和撩人的衣衫，件件都绘着五彩的鹦鹉和蝴蝶。她开始把身体分给所有向她索取的人。围城六十三天后，加依坦·奥贝索将军的军队被击退了，她重建了被大炮炸穿了底儿的房子，还在防波堤上建起一座漂亮的观海露台，暴风雨来时，可以观赏愤怒咆哮的海浪。这里是她的爱之巢，她毫无讥讽之意地如是说。在这里，她只接待合她胃口的人，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以何种方式就以何种方式，不向任何人收取一分钱，因为她认为，是那些男人施惠于她。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她才接受礼物，而且不能是黄金。她做得如此恰到好处，谁也拿不出她行为不端的确凿

证据。只有一次，她险些在公众中闹出丑闻，当时谣言四起，说大主教但丁·德鲁纳并非死于误食了一盘毒蘑菇，而是有意服毒，因为她威胁他说，如果他再继续亵渎神明地纠缠她，她就抹脖子自尽。但没有人问过她这是不是真的，她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生活毫无变化。确实，正如她自己常常大笑着说的那样，她是全省唯一的自由女人。

对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尔相邀，拿撒勒的寡妇即便在最忙的时候也从不爽约，而且也从不抱着爱上他或被他爱上的假想，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类似爱情却又没有爱情之烦恼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去她家，两人喜欢坐在观海露台上，浑身被硝石味儿的海水泡沫打得湿漉漉的，眺望地平线上即将照亮整个世界的黎明之光。他尽全力地教她那些他从旅馆的小孔里学来的颠鸾倒凤的花样，并实践洛达里奥·图古特在狂欢之夜吹嘘的那些理论成规。他说服她在两人做爱的时候让人观看，并改变常规的传教士体位，代之以“海上自行车”，“烤架上的烤鸡”，又或者“被肢解的天使”等等姿势。当他们试图在吊床上发明出与众不同的花样，吊床的挂绳断了，两人摔下来差点送了命。这些课程的效果微乎其微，因为事实上，她虽然是个无所畏惧的莽撞学徒，却缺乏最起码的天赋，难以消化这些指导。她永远也不理解在床上保持肃穆的乐趣，从未有过灵光乍现的瞬间，性高潮也总是来得不合时宜，且浮于表面：一种乏味的欢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很长时间都受到蒙骗，以为自己是她唯一的男人，而她也乐意让他这样以为，直到有一回她运气不佳，睡着的时候说漏了嘴。渐渐地，通过偷听到的梦话，他把她梦中的航海地图拼凑起来，然后穿梭于那不可计数的秘密岛屿之间。由此，他知道了她并不想嫁给他，但又觉得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她无限感激他让她得以堕落。有好几次，她对他说：

“我崇敬你，因为是你把我变成了娼妇。”

如果换个方式说，其实她不无道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她这里夺走了正常夫妻间所保有的那种贞洁，这比夺走童贞或让寡妇失节更加有破坏力。他让她明白，只要是为了让爱情长久，床上所做的任何事都算不上不道德。另外，还有些东西自此成为她生活的信条：他说服她，一个人在这世上能交欢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不充分利用，那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原因，也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永远失去了这些机会。她的优点就在于一字不差地听从了他的话。然而，正是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认为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他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缺乏情趣、喜欢在床上不停唠叨丈夫之死给她带来的痛苦的女人，会有这么多的追求者。他唯一能想到的不可辩驳的解释，就是拿撒勒的寡妇的温柔弥补了她床上功夫的不足。随着她领地的扩大，而他也开始慢慢探索自己的领地，试图在另外一些支离破碎的心灵中寻找抹平旧日伤痕的慰藉，两人见面越来越少，最后毫无痛苦地忘掉了对方。

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一次床上之爱。但他没有像母亲做梦都盼望的那样和她结成稳固的关系，相反，两人都利用这次机会，投入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明出许多方法，对像他这样一个郁郁寡欢、骨瘦如柴、穿得仿佛另一个时代的老头儿的男人来说，颇不可思议。然而，有两个优势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其一就是他独具慧眼，即便在人群中也能一下子认出哪个女人正期待着他这样的男人，但尽管如此，他献殷勤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遭到拒绝更让人感到羞辱了。他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她们会当即认定他是一个急需爱情抚慰的孤独者，一个流浪街头、丧家犬般的可怜人，这使得她们无条件地投降，没有任何索求，也不期待从他

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只求能够施恩于他，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这是他仅有的两样武器，凭借它们，他展开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绝密战斗，并以公证人的严谨把它们一一记录在一个密码本上。这个本子在众多本子中能一眼辨认出来，因为上面写着一个说明一切的标题：她们。他做的第一个记录就是拿撒勒的寡妇。五十年后，当费尔明娜·达萨从她那通过神圣仪式所领受的判决中解脱出来时，他已经拥有了二十五个本子，里面有六百二十二条较长恋情的记录，这还不包括无数次的短暂艳遇，因为它们甚至都不值得他怜悯地提上一笔。

和拿撒勒的寡妇疯狂而放肆地爱恋了六个月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信已经从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中幸存下来。他不只相信这一点，还在费尔明娜·达萨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新婚旅行期间，多次向特兰西多·阿里萨说起过。他相信自己的感情已经获得了无限制的解放，直到一个灾难的星期日，他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突然看见了她。当时，她刚望完大弥撒，正挽着丈夫的手臂，被她新圈子里的人好奇而又谄媚地包围着。当初，这些门第高贵的夫人们看不起她，嘲笑她家是无名无姓的暴发户，而如今，她用自己的魅力把她们迷得晕头转向，她们殷切地希望她能感觉到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如此驾轻就熟地胜任了尘世中妻子的角色，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必须定睛反应片刻才把她认出来。她变成了另一个人：成年人的装扮，高高的靴子，面纱帽上插着一根东方鸟的彩色羽毛。她身上的一切都变了样，而且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仿佛她天生就是如此。他发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更年轻，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不可及，他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直到看见她真丝长裙下腹部隆起的曲线：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然而，最让他感慨万千的，是她和丈夫组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两人应付裕如地周旋于他们的世界，仿佛超然于现实的艰难险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忌妒，也没有愤怒，而是感

到一种巨大的自卑。他觉得自己可怜，丑陋，低贱，不仅配不上她，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

就这样，她回来了，对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丝毫后悔地回来了。不仅如此，经历了最初几年的坎坷后，她越来越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对于带着天真的懵懂步入新婚之夜的她来说，这种情况可以说尤其值得庆贺。其实，在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省份的那次旅行中，她就已经开始褪去天真。在巴耶杜帕尔，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公鸡要追着母鸡跑，还亲眼目睹了驴子交配的野蛮场面，看见过牛犊出生的情形，甚至听过表姐妹们大大方方地谈论家中的哪些夫妻还在做爱，而哪些尽管生活在一起却已经不做了，是从何时起，又是为什么不做的。正是在那时，她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爱，奇怪地感觉到自己发现了某些本能中一早就知道的事，起先是在床上，屏住呼吸，以免被同屋的六个表姐妹发觉，后来则是放松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用两只手，披头散发，还抽着她最初的几支脚夫的细雪茄。这样做时，她总是带着良心上的疑虑，直到婚后才消除，而且也总是秘密进行，不像那些表姐妹们，不仅炫耀每天能达到多少次高潮，甚至还讨论其形式和程度。然而，尽管享受过这些先导仪式的美妙，她始终还是怀着最初的信念，认为失去童贞定是一项血腥的祭祀。

因此，那场在上世纪末最为轰动的婚礼，对她来说，却仿佛灾难的前夕。比起和一位当时堪称独一无二的绅士缔结婚约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对蜜月的恐惧对她影响更大。自从在大教堂的大弥撒中发布了结婚公告，费尔明娜·达萨又收到了多封匿名信，有些甚至以死相胁，但她也只是草草地看上一眼，因为她将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在自己即将被强奸这件事上了。尽管并非有意，但这样处理匿名信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实那些不敢留名的人所属的阶层，在历史的嘲弄下，早已

习惯了对既成的事实低头。渐渐地，由于知道婚礼势在必行，她们吞下了反对的声音。她从那些被关节炎和忌恨之心折磨得憔悴失色、面色惨白的女人越来越殷勤的态度中，看出了这一点。她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阴谋是徒劳的，于是不请自来地出现在福音花园，就好像那里是她们自己家似的，还带来了菜谱和祝福吉祥的礼物。特兰西多·阿里萨了解那些人的世界，但只有那一次，她为此感到切肤之痛。她知道，主顾们会在重大庆典的前夕出现在她家，求她把罐子从地下挖出来，把典当的首饰借给她们二十四个小时，并额外支付利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形了：罐子全都空了，为的是让那些拥有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走出她们阴暗的圣殿，戴着租来的曾经属于自己的首饰，珠光宝气地出现在那场盛况空前的世纪末婚礼上。婚礼的至高荣耀莫过于由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博士曾三次担任共和国总统，是哲学家、诗人和国歌的词作者，这些都已写入了当时一些新出版的辞典。费尔明娜·达萨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到大教堂的主祭台前。那天，父亲的礼服为他注入了一种模糊的受人尊重的气质。在大教堂的主祭台前，在一台由三位主教共同主持的弥撒中，在圣三主日[14]早上十一时，她永远地结婚了，甚至不曾怜悯地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片刻。而此时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坐在一条风浪之中、最终也没能将他带入忘却之境的船上，烧得直说胡话，几乎为她而死。在整个婚礼仪式以及后来的庆祝活动中，她始终保持着仿佛被铅白定住的微笑，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表情被某些人理解为胜利者的嘲笑，但其实不过是她用来掩饰新婚处女恐惧的一种可怜手段罢了。

幸运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加上丈夫的善解人意，让她顺利度过了前三个晚上，没有丝毫痛苦。真是老天保佑。由于加勒比海天气恶劣，大西洋轮船总局那艘船的航线被打乱，提前三天才通知要提早二十四小时出发，也就是说，船不会像六个月以来一直预计的那样，

于婚礼次日前往拉罗切利，而是当晚就要起航。人人都以为，这个变化是婚礼预先为大家准备的众多华丽而高雅的惊喜之一：庆祝活动改在一艘灯火辉煌的远洋轮船上举行，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支维也纳管弦乐队在席中首次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最新创作的圆舞曲。最后，几个被香槟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是被他们那受不了的妻子拖上岸的，当时他们正到处问侍者船上是否有空舱室好让他们把狂欢一直延续到巴黎去。最后下船的人在港口的酒馆前看见了洛伦索·达萨。他坐在大街上，礼服已经被扯烂，就像阿拉伯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哭丧一样号啕不止。那摊他正坐在其中的几乎汇流成渠的臭水，很可能就是他的一汪眼泪。

无论是海上狂风巨浪的第一夜，还是接下来平缓航行的几天，抑或是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费尔明娜·达萨担心的那种野蛮举动都从没有发生过。尽管船很大，舱室豪华，但第一夜仍旧可怕地重复了里奥阿查那艘轻便船上的经历。她的丈夫充当了殷勤医生的角色，片刻未睡地安慰她，因为这是一位过于杰出的医生所知道的对付晕船唯一可做的事。第三天，过了瓜伊拉港后，风暴平息了，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交谈过很多，彼此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第四天晚上，两人恢复了各自的日常习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年轻的妻子睡觉前竟然不祷告。她坦诚相告：修女们的两面派作风造成了她对宗教仪式的抵触，但她的信仰是完整的，她学会了默默地保持它。她说：“我更愿意直接与上帝沟通。”他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他们就以各自的形式信奉着同一种宗教。两人曾有一段短暂的订婚期，但对那个时代而言是相当不正式的：不过就是医生每日黄昏都到她家去看她，而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在主教祝福之前，她是连手指头也不会允许他碰一下的，而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在海面平静下来之后的第一夜，两人和衣躺在床上，他开始了最初的爱抚，

十分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建议她换上睡衣时，她觉得很自然。她走到盥洗室去换衣服，但先把舱室里的灯熄了，等穿好睡衣出来，她又用几块布塞住门缝，然后才在完完全全的黑暗中回到床上。她一边这样做，一边心情不错地说：

“你想怎么样呢，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睡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觉到她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一样滑到他身边，尽可能地离他远些，但在这样一张简易床上，很难做到谁也不碰谁。他抓住她冰凉、因害怕而有些发抖的手，把两人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几乎耳语般讲起了自己另外几次海上旅行的经历。她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回到床上后，她发现就在自己去盥洗室的时候，他已脱光了所有的衣服，这让她重新萌生了对下一步的恐惧。但这下一步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乌尔比诺医生只是继续缓慢地述说，一边说，一边一毫米一毫米地争取她身体的信任。他说起了巴黎，说起了巴黎的爱情，说起巴黎的情侣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向夏日火热的空气和慵懒的手风琴声敞开大门的咖啡馆那开满鲜花的露台上亲吻，在塞纳河的码头上站着做爱，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他一边在黑暗中呢喃，一边用指肚抚摸她脖颈的曲线，她手臂上如丝般柔软的茸毛，以及她那躲躲闪闪的腹部。当他觉得她的紧张感已经消除时，第一次做出了掀开她睡袍的尝试，但她以性格中特有的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果然，她脱掉了睡袍，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身体在黑暗中发出微光，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片刻之后，他又抓住她的手，这次，她的手变得温暖而放松，但仍旧湿湿的，沁着柔软的汗珠。他们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在伺机进行下一步，而她在等待着，不知他会从何处开始。随

着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房间里变得越来越黑。突然，他松开她的手，一跃而起：用舌头舔湿了中指的指肚，轻轻碰了一下她那毫无防备的乳头，而她感觉到致命一击，仿佛他触到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不会让他看见她那使得全身震颤直至发根的滚烫羞红。“别紧张。”他对她说，语气极为温和，“别忘了，我是见过它们的。”他感觉到她笑了，黑暗中，她的声音甜美而鲜嫩。

“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而且我的气现在还没消呢。”

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绕过了美好希望的海角[15]。他再次拿起她修长而绵软的手，用一个个孤零零的轻吻覆盖了它，从棱角分明的手背，到纤长灵敏的手指、透明的指甲，再到那沁着香汗的手掌上象征命运的掌纹。她不知道自己的手如何到了他的胸膛，碰到了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说：“这是圣衣。”她抚摸着他胸口的软毛，又用五根手指抓住这片草丛，仿佛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再使点儿劲。”他说。她试着加了些力气，直到她确信不至于把他弄疼的程度。之后，竟然是她的手在寻找他那消失在黑暗中的手。但他没有与她十指相扣，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用一种无形、却又恰到好处的力量，引领她的手沿着他的身体游走，直到她感觉到一头赤身猛兽的炽热气息，没有固定的形状，却热切而高昂。与他的想象相反，甚至也与她自己的想象相反，她的手并没有撤回去，也没有停在他把它放下的地方。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了至圣童贞马利亚。她咬着牙，生怕会因这疯狂的举动而笑出声来：她开始通过触摸来认识那个昂首挺立的对手，认识它的体积，它那长茎的力量，它两翼的延伸，既对它的坚决感到害怕，又对它的孤独感到同情。她带着细致入微的好奇，一点一点地将它据为己有，若非丈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准会把她的举动错会成挑逗。他求助于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抵抗着这番致

命探究带来的眩晕，直到她以孩子般的随性放开了它，就像把它丢进垃圾堆似的。

“我从来就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如同上课一般认真地向她解释起来，一边讲一边带着她的手移过他所提到的各个部位，而她则像个模范学生一样，顺从地跟随着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他建议把灯点亮，让一切更清楚些。他正要去点，她却拦住了他的手臂，说：“我用手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她也想把灯点亮，但她想自己点，而不是被别人命令。最后，她得偿所愿。他在突然出现的光亮中看见了她，胎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但他发现她丝毫没有忸怩作态，而是再一次抓住那只让她充满好奇的野兽，把它扭向右又扭向左，带着一种似乎已经超越了科学范畴的兴趣观察它，最后得出结论：“它多丑啊，比女人的更难看。”他表示赞同，并指出它的几种比丑陋更严重的弊端。他说：“它就像人的长子，你工作一辈子都是为了它，为它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它还是只做它想做的事。”她继续探索着，不时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当她认为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就用双手掂了掂它，最终证实，即便是从分量上看，也颇不值得为它费心。她带着轻蔑的表情放开手，让它滑了下去。

“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

他大吃一惊。他毕业论文最初的想法正是这个：简化人类器官的好处。他认为人类的器官体系已经过时，很多功能是无用或者重复的，对于曾经的时代来说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的确，可以更简单些，从而也就少一些脆弱。他总结道：“当然，这是上帝才能做的事，但不管怎样，在理论上明确下来也是好的。”她被

逗笑了，笑得那么自然，他趁机抱住她，第一次吻在了她的唇上。她回应了他，他一边继续轻吻她的脸颊、鼻子、眼皮，一边把手滑到被单下面，抚摸起她那毛发平直的圆润阴阜来：一个日本女人那样的阴阜。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但她自己的手也处在警惕之中，以防他再前进一步。

“我们不要再上医学课啦。”她说。

“不，”他说，“这将是爱之课。”

他掀掉她身上的被单，而她不仅没有反对，还快速而使劲地用双脚把它踢得离床远远的。她的身体凹凸有致，富有弹性，比穿着衣服时要真实得多，并且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山间野兽似的味道，让她能在全世界的女人中被分辨出来。她全然暴露在灯光之下，无处藏身，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颊。她唯一能想到的掩饰羞怯的办法，就是搂住丈夫的脖子，深深地、用力地吻他，直到两人把所有可供呼吸的空气都耗尽在亲吻之中。

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严肃，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但当她第一次吻他时，他确定，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建立一份完美的爱情。在那第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聊了，一直聊到天亮，就是没有谈到爱情，以后也永远不会谈到它。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两个人谁都没有做错。

天亮时，他们睡着了，她还是个处女，但很快就会不是了。果然，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在加勒比海的满天繁星下，他教她跳了维也纳华尔兹，并在她之后去了盥洗室，等他回到舱室时，发现她正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这次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畏惧，毫无痛苦，怀着

在公海中冒险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除了床单上那朵贞洁的玫瑰，没有其他任何血腥仪式的痕迹。两个人都做得很好，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余下的旅途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继续这样做着，而且一次比一次好。到拉罗切利时，两人已经默契得像相识已久的恋人了。

他们在欧洲待了很久，以巴黎为大本营，不时到邻近的国家去短期旅行。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做爱，冬季的每个星期日甚至还不止做一次，在床上一直嬉闹到午饭时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则天生不容许别人占据优势，因此两人在床上不得不平分主导权。三个月火热的恩爱生活过后，他意识到两人中有一个无法生育，于是，他们在他实习过的萨伯特医院接受了严格的检查。那是一次艰苦却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就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借助任何科学手段，奇迹发生了。回家时，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怀孕六个月，她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期待已久的儿子在水瓶座的月份顺利降生，取了死于霍乱的祖父的名字，以示纪念。

说不清究竟是欧洲之行改变了他们，还是爱情改变了他们，因为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起了作用，更深一层说，改变的不仅是他们两人，也是所有人，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他们回来两周后，看见他们望完弥撒从教堂中走出来时所察觉到的那样。他们带着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回来了，满载着世界的新鲜事物，准备以此引领大众。他带回了文学、音乐，尤其是他所学专业的最新发展。为了不和现实脱节，他从巴黎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和诗歌脱节，他又订了一份《两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和自己在法国的书商约定好，把读者最多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寄给他，比如阿

纳托尔·法朗士和彼埃尔·洛蒂，再把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也寄给他，比如雷米·德古尔蒙和保罗·布尔热，但绝不要寄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尽管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勇敢地伸张正义，但他的作品让人无法忍受。那位书商还承诺把黎科迪出版社目录中最吸引人的乐谱篇章一并寄来，特别是室内音乐，如此，他便能保持父亲所赢得的本城音乐会第一倡导者的好名声了。

一向反对追求时尚的费尔明娜·达萨，这次带回了六箱不同时代的衣服，因为那些名牌服装没能让她动心。她曾在严冬去往杜伊勒里宫参加那位锋芒逼人的高级定制服装界霸主沃斯的服装展，唯一的收获就是让她在床上躺了五天的支气管炎。她觉得相比之下拉费里耶尔的服装倒没那么浮华和张扬，但她还是做出英明的决定，到二手商店去将自己喜欢的东西洗劫一空，尽管丈夫惊恐地发誓说那些都是死人的衣服。同样，她还带回了很多没有牌子的意大利鞋，比起名声在外而又稀奇古怪的费利牌鞋，她更喜欢自己买的这些。她还从杜布伊那里买回一把阳伞，红得像地狱之火，为我们那些总爱大惊小怪的社会新闻记者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她只买了一顶瑞邦夫人设计的帽子，却装了满满一箱的人造樱桃枝，能找到的各式毡花束，一把把鸵鸟羽毛、孔雀毛、亚洲公鸡的尾羽，整只的雉鸡、蜂鸟，以及各式各样外国鸟的标本，有正在飞翔的，正在啼鸣的，还有奄奄一息的：所有这些在过去的二十个寒暑里都发挥了用途，让同一顶帽子变换出各种风貌。她还带回一套来自世界各国的扇子，每把都各有特色，适用于不同场合。此外还有一瓶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香水，那是在春风席卷着灰烬将法国慈善集会夷为平地之前，[16]从集会上的众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但她只用过一次，因为换成这种香味后她都认不出自己了。她还带回一个化妆盒，这是诱惑品市场的最新玩意儿，她是第一

个带化妆盒去参加节日聚会的女人，当时，仅仅在公众场合补妆都被视作不正经的表现。

此外，两人还带回了三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霍夫曼的故事》那盛况空前的首演；圣马可广场对面那场几乎烧毁了威尼斯所有贡多拉的触目惊心的大火，他们透过酒店的窗子痛心地亲眼目睹了那一幕；还有一月份的第一场雪时，他们匆匆邂逅奥斯卡·王尔德的情景。但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回忆之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保留着一段他一直遗憾没能与妻子共享的回忆。那是他独自在巴黎上学期间一段关于维克多·雨果的记忆。在我们这里，雨果除了他的作品之外，还享有一份感人的声誉，据说他曾经说—其实并没有人真的听他说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是给人制定的，而是给天使制定的。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崇拜。去法国旅行的同胞很多，其中大部分都热切地盼望能够见到他。曾经有六名学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就是其中之一，有段时间总是守候在埃洛大街他的住所前，以及听说他必去的几家咖啡馆里，但他从未出现过。最后，他们写信向他申请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署名为里奥·内格罗宪法[17]的天使们，也没有收到回音。但有一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偶然从卢森堡花园经过，竟看见雨果从参议院走出来，被一个年轻女人搀扶着。他看上去十分苍老，举步维艰，胡子和头发都不像画像上那样光亮，身上的衣服也好像属于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不想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候毁掉这段回忆：就这样近乎虚幻地看上一眼，已足够令他终身难忘。等他结婚后重返巴黎，有条件更为正式地见上一面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却已经辞世了。

作为安慰，胡维纳尔和费尔明娜拥有这样一段共同回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站在卡布奇诺街上的一家小书

店门前，引起了他们俩的好奇。原来，奥斯卡·王尔德在书店里。终于，他从里面走出来，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自己过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群将他团团围住，请他在书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是想看看，可他冲动的妻子却要穿过大街去，由于没有带书，她想请求王尔德把名字签在她唯一觉得合适的地方：那副美丽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修长、光滑、柔软，与新婚的她的皮肤同样颜色。她确信，一个像他那样高雅的男人定会欣赏她的举动。但丈夫坚决反对，而当她无视劝阻硬是要去时，他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等你回来，就会看见我已经死在这里了。”

这是她本性使然。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到处游逛，就像小时候走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那片死亡之地上一样自如，仿佛这是她天生的本事。她和陌生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令她的丈夫困惑不已。而且，她有一种神秘的才能，可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靠卡斯蒂利亚语进行交流。“语言嘛，如果你是想卖东西，当然得要懂的。”她常常略带嘲笑地说，“但如果是想买东西，那不管怎样，别人总有法儿听得明白。”很难想象有人能像她那样，那么快，那么兴高采烈地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尽管巴黎阴雨连绵，她还是学会了去爱记忆中的它。然而，当她带着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无数经历，带着旅途的疲惫，昏昏欲睡地回到家时，港口的人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欧洲的种种神奇之处有何感受，而她用一句四个字的加勒比俚语就概括了这许多个月的幸福生活：

“浮华而已。”

[1]圣牧羊女，指圣母马利亚。

[2]让－马丁·沙可（1825－1893），十九世纪法国神经学家、心理学家。

[3]阿尔芒·特鲁索（1801－186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医生。

[4]但丁《神曲》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

[5]指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

[6]圣多默，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又译圣多马。

[7]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天主教传说中的圣人，许多旅店主视其为主保圣人。

[8]“桶匠”在西班牙文中有“大肚子的人”之意，转义指气量大的人。

[9]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缩写。

[10]克莱蒙四世（1200－1268），1265至1268年间的天主教教皇。

[11]天堂与地狱的边界，是没有接受洗礼或没有机会认识上帝的义人等待救赎的地方。

[12]根据西方习惯，守丧后期可以穿黑色以外的深色衣服，称为“半孝”。

[13]拿撒勒，位于今天的以色列，传说耶稣在此度过青年时期，故常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

[14]圣三主日，天主教传统节日，旨在纪念三位一体的奥秘，日期依复活节而定，即圣神降临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15]即“好望角”的典故，绕过此海角就意味着好运来临。

[16]1897年，法国慈善集会毁于一场大火。

[17]里奥·内格罗宪法，哥伦比亚于1863至1885年间施行的宪法。

那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大教堂前见到怀有六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得八面玲珑的费尔明娜·达萨，便下定了狠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她。他甚至没去考虑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取决于他似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

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莱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份差事。

这是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的典型决定。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希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鬈发，嘴唇像农牧神那样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中的纵火者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得掉渣的破船—它们还能漂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中日益繁杂的问题以外，他空余的

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一副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却能驾驭令人惊讶的音域。有人告诉他，恩里科·卡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带给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次聚会，好让他达成梦想。他却从没有成功过。然而，他那雷鸣般的歌声中自是闪烁着一丝柔情，让听众的心都碎了，丝毫不亚于伟大的卡鲁索震碎细颈瓶。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葬礼上总是备受尊敬。除了有一次，他灵光一现想要唱《在光荣中醒来》，一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丽而忧伤的挽歌，结果被神甫勒令制止，因为神甫不能允许马丁·路德涉足他的教堂。

就这样，伴随着一首首歌剧曲目和那不勒斯小夜曲，他靠着自己的创造天赋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让他在河运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成了这一领域的显赫人物。像两位已故的兄长一样，他也是白手起家。兄弟三人尽管背负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也没被家族承认过，但却都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他们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柜台贵族”中的佼佼者，商业俱乐部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圣殿。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过得像那位与他样貌相似的罗马皇帝一样的财富，莱昂十二叔叔却为了工作方便仍旧住在老城，生活十分节俭，房子也万般简陋，因此从未摘掉人们不公平地加在他身上的吝啬恶名。而他唯一的奢侈竟然更为简单：一座距离办公室两里地的海边房子，里面的家具不过就是六只手工做的凳子、一个装水瓮的木架柜，以及露台上的一张吊床，星期日，他可以躺在上面思考。有人说他是富人，可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给自己作了定位。

“富人？不，”他说，“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

他的这种奇怪脾性—曾有人在某次演讲中称之为大智若愚—让他立刻就洞悉了此前和此后都未有人发现过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的某种特性。自从那天一脸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年光阴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到他的办公室来申请一份差事，他便用军营里那种足以让最坚强的硬汉折腰的严酷制度来考验他。可最终也没有使侄子胆怯。莱昂十二叔叔从不怀疑，侄子的这种坚韧既非来自生存的需要，也非继承了其父亲粗鲁的冷漠，而是源自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垮。

最艰苦的是最初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的书记员，这个职务就像是特意为他而设的。洛达里奥·图古特曾是莱昂十二叔叔的音乐老师，正是他建议叔叔给侄子安排一个抄写的工作，因为他是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而不知疲倦的人，尽管读的好作品没有坏作品多。莱昂十二叔叔并未理会洛达里奥·图古特对侄子做出的读坏书的评价，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也曾说过他是他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可他还不是能让墓碑也落泪。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在某些他最没有留意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写什么都激情澎湃，以至于公文读上去就像情书。尽管他刻意避免，但出自他笔下的载货清单依然带着韵脚，那些常规商业信函透出的抒情味道更是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一天，叔叔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包他甚至都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件，给了他最后一次拯救灵魂的机会。

“如果你连一封商业信件都写不好，那就去码头扫垃圾吧。”他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学习简单而世俗的商贸文体，就像当初模仿流行诗人一样勤奋地模仿着公证员文件的范本。那个时期，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在“代笔人门廊”度过的，帮助大字不识的恋人们书写香飘四溢的情书，以此释放内心积聚的那些在海关报告中毫无用武之地的绵绵情话。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扭断心中那顽石一般的天鹅脖子[1]。因此，当莱昂十二叔叔第二次训斥他时，他认输了，只是仍旧带着几分倨傲。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他说。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河运就没有爱。”

叔叔把威胁付诸行动，派他去码头清扫垃圾，但同时向他保证，如果干得好，就会一步一步把他提升上去，直到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没有让他垂头丧气；面对上司的傲慢无礼，他也不曾有片刻失去骨子里那无畏的勇气。但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都尝到了苦果，在那副无助的外表之下，有着势不可挡的决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如莱昂十二叔叔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在三十年的勤奋与各种考验的磨炼中，他做过所有职务，也洞悉了公司运作的每一项秘密。他以令人钦佩的能力胜任了每一个岗位，研究了那些与诗歌相通的神秘经络中的每一条丝线，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那枚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写一封说得过去的商业信函，哪怕只有一封。在无意之中，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生活证实了父亲的理论。父亲甚至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说，没有人会比诗人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没有哪个石匠会比诗人更顽固，也没有哪个经理会比诗人更精明、更危险。至少，莱昂十

二叔叔是这样告诉他的。叔叔在心情闲适的时候，会和他讲起他的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与其说父亲是个企业家，毋宁说他是个梦想家。

叔叔告诉他，皮奥第五·罗阿依萨给办公室增添了工作以外的愉快用途。他总是在星期日离家到此休闲，借口要接船或者派船。更有甚者，他还叫人在仓库的院子里架起一只废弃的锅炉，上面安有汽笛，有人会按照航行信号鸣笛，以防他的妻子生疑。莱昂十二叔叔细想了一番，就肯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日下午，在某间门都没关严的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怀上的，而当时，他父亲的妻子正在家里听着一艘永远也不会起航的轮船发出一声声告别的汽笛声。当她发现此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都来不及让丈夫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死了。她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没有孩子的痛苦毁掉了她的生活，她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

父亲的这个形象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困惑不已。母亲曾把父亲说成一个缺乏商业天赋的了不起的男人，他最终从事了河运生意是因为他的大哥与航运先驱、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关系亲密。兄弟三人是一母同胞的私生子，这位母亲是个厨娘，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他们用了母亲的姓氏，而姓氏之前的名字则是她从瞻礼单上教皇们的名字中随便挑选的，只有莱昂十二用了他出生时在位的那位教皇的名字。他们的外公叫弗洛伦蒂诺，于是，这个名字跳过教皇一代，落到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儿子的头上。

弗洛伦蒂诺一直保留着父亲写情诗的一个本子，其中有几首的灵感来自特兰西多·阿里萨，而每一页上都画有破碎的心作为装饰。有两件事让他惊奇。其一是父亲那独特的字体竟与他的一模一样，而他其实是从一本教科书上的众多字体中挑出最喜欢的一种学的。其二是

他找到了一句格言，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声，可父亲在他出生前很久便写下了它：死亡让我感到的唯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

他还看见了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很年轻，就像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父亲的那个年纪，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熊的身体，倚在一座只剩下绑腿的雕像底座上，身边站的少年是莱昂十二叔叔，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另一张照片上，父亲和一队士兵在一起，不知是那么多战争中的哪一场，他手里拿着最长的一杆猎枪，小胡子散发出的火药味都飘到照片外面来了。和两个兄弟一样，他是自由党，也是共济会成员，可他却希望儿子能进神学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觉得自己如人们说的那样和父亲很像，但据莱昂十二叔叔说，皮奥第五也曾被人指摘文件写得具有抒情色彩。不管怎样，他不像照片中的父亲，也不像自己记忆中的父亲，不像母亲因爱而描绘得走了样的父亲，更不像莱昂十二叔叔以其残酷的幽默描绘出的那个褪了色的父亲。然而，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对镜梳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在那时，他明白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

他脑海中没有父亲出现在窗户街的记忆，只隐约知道有段时间他住在那里，就在与特兰西多·阿里萨相爱之初，但自己出生之后，父亲就再没来看过她。在很多年里，洗礼登记是证明我们身份的唯一有效途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洗礼是在圣托利维奥教区登记的，只写着他是一个名叫特兰西多·阿里萨的独身私生女的私生子。登记上没有出现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秘密地供养儿子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社会地位使神学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关上了大门，但也

让他在我们连年战争最为血腥的那个时期逃过了兵役，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女人的独生子。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他都坐在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对面，看一本翻了无数遍、已经散架的动物画册。父亲一眼也不瞧他就走进了办公室，脸上的神情和祭台上的福音圣胡安[2]一模一样，身上穿着一件呢子长礼服，就是后来被特兰西多·阿里萨改了给他的那件。好几个小时后，父亲走出来，趁着连车夫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把一周的生活费递给他。两人都不说话，因为父亲不愿说，也因为他惧怕父亲。有一天，他等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后，父亲把钱交给他，说：

“拿着，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后来他知道，钱由比父亲小十来岁的莱昂十二叔叔继续带给特兰西多·阿里萨。而在皮奥第五死于一次治疗不善的肠绞痛后，也是叔叔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父亲只字未留，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他这个唯一儿子的安排：一个被丢在街上的儿子。

在加勒比河运公司当书记员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抒情体，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费尔明娜·达萨，也永远都学不会在写作时不去想她。后来，他被调到别的岗位，内心的爱依然满溢，他不知如何是好，便把爱送给那些大字不识的恋人们，在“代笔人门廊”为他们免费写情书。下班之后，他就到那里去，从容地脱掉长礼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戴上半截套袖，以免弄脏衬衫袖子，再解开背心扣，以便更好地思考。有时，他一直在那里待到夜深，用一封封令人疯狂的情书鼓舞着那些无助的人。有时，他会遇到一位跟孩子之间出了问题的可怜女人，或是一位坚持申领养老金的退

伍老兵，又或是某个被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可无论他多么尽心竭力，也还是无法让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令人信服的就只有情书。他甚至无需向新来的顾客提问，只消看一眼他们翻起的眼白，便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为他们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情信以倾诉胆大妄为的爱情，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

那个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羞怯的姑娘的，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颤抖着请求他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无法拒绝的信写一封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出那封信正是自己前一天下午写的。于是，他依照姑娘的情感和年龄，回了一封风格迥然不同的信，甚至笔迹也像出自这位姑娘之手，因为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为不同的情况模仿出一种字体来。他写信时，一直幻想着如果费尔明娜·达萨像这个无助的小姑娘爱她的追求者一样爱他，会给他回一封怎样的信。自然，两天后，他又不得不为这位情郎写回信，用他早在第一封信中就定下的笔迹、风格和爱情的类型。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之中。不到一个月，姑娘和小伙子分别来向他道谢，因为他在男孩信中提出的建议在姑娘的回信中被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就要结婚了。

直到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发现，原来两人的信是同一位代笔先生所写。于是，他们头一次一起来到了门廊下，请求他做他们孩子的教父。看到自己梦想的明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极为兴奋，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了一本《恋人指南》，比一直在门廊里卖二十生太伏且已经被半城人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本更富有诗意，内容也更广泛。他把想象中费尔明娜·达萨和他遇到的各种情况

排列成序，为每种情况都写了无数封信件作范例，包含各类他觉得可能的去信和回信。最后，他共写了一千多封，分为三卷，每卷都是科瓦鲁维亚斯的字典那样的大部头。但城中没有一个印刷商肯冒险出版它。他只好将它们束之高阁，和过去的一些手稿堆在一起，因为特兰西多·阿里萨断然拒绝从地下挖出她的罐子，把一生的积蓄浪费在一次出版书稿的疯狂举动上。若干年后，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自己有钱出版这部书时，又费了很大努力才接受了这些情书已经过时的现实。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加勒比河运公司迈出了最初几步并在“代笔人门廊”为人免费写信时，他年轻时的朋友确信他们已在慢慢地失去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的确如此。当初他从河上旅行回来，还去见了一些朋友，希望借此减轻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他和他们一起去打台球，参加了最后几次舞会，偶尔还甘愿做姑娘们争抢的对象，并做所有他觉得有助于让他回到从前的事。后来，莱昂十二叔叔聘他为公司职员，他便开始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在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等到他和他们只聊河运公司里的事，且从不提公司全称，而用缩写字母CFC指代时，他们开始把他视作自己人。他甚至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之前，他对餐桌上的事并不在意，也毫无规律可言，但自那时起，他的饮食开始每日相同，且极为节俭，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早餐是一大杯苦咖啡，午餐是一块炖鱼配白米饭，睡觉前再喝一杯咖啡加牛奶，配一块奶酪。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喝苦咖啡，一天甚至能喝上三十小杯。那是原油似的汤剂，他喜欢亲自煮，总是装在一只保温瓶里，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他抱着坚定的决心，也付出了热切的努力，想回到遭受爱情致命打击前的那个他，但事与愿违。

事实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重新赢得费尔明娜·达萨的芳心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目标。他坚信自己早晚能夺回她，于是说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继续修缮房屋，以便随时在奇迹发生时迎接她的到来。与对出版《恋人指南》这一提议的反应不同，特兰西多·阿里萨在这件事上甚至超前一步：她当即买下房子，开始全面翻新。原来的卧室变成了一间会客厅，又在二层建起了一间供小两口使用的卧室，以及一个为两人将来的孩子准备的房间，两间房都宽敞明亮。在以前烟草厂房的位置，建起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各个品种的玫瑰，全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利用清晨的空闲亲自栽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住的店铺里间永久地保持了原貌，吊床仍旧挂在那儿，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而他却已搬到二层预备做婚房的那个房间去了。那是整座房子中最宽敞、最凉爽的一间，阳台建在了屋内，晚上海风轻拂，空气中飘着玫瑰园的馨香，坐在那里惬意无比，但同时，这间屋也最符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特拉普派修道士式的清苦生活。用生石灰抹的墙壁光秃而粗糙，家具不过是一张苦役犯式的床，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了支插在瓶口的蜡烛，还有一个陈旧的衣柜和一个放着水舀和脸盆的盆架。

房屋修缮持续了将近三年，恰与本城的重建工作步调一致。城市迅速复兴，因为河运和贸易往来正处于鼎盛期，在殖民时期，正是这两个因素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让它在两个多世纪里成为美洲的门户。但也是在这段日子，特兰西多·阿里萨的不治之症表现出最初的征兆。老主顾们每到她的杂货铺来，一次比一次衰老，一次比一次干瘪，也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她跟她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竟然认不出她们来，或者常常把一个人的事和另一个人的搞混了。这种问题对于做她这类生意的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为了维护双方的名誉，她们从不签字据，一句口头承诺即是保证。起先，她以为是自己的耳朵

聋了，但很快便证实是记忆从她年久失修的身体中溜走了。于是，她清算了她的典当生意，罐子里的财富足够完成房屋修缮并添置家具，此外还能剩下很多件全城最贵重的古老首饰，它们的主人根本无力赎回。

那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同时兼顾许多事务，但这并没有减弱他越来越频繁地窃玉偷香的热情。和拿撒勒寡妇那段飘忽不定的经历为他打开了街头爱情之门。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一直在猎捕夜间的孤鸟，幻想能减轻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但到后来，他已说不清这绝望的通奸习惯到底是出于内心需要，还是单纯的身体恶习。他去小旅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不只因为他的兴趣改变了方向，而且他不愿让熟人看到，他已远不是当初那个温顺而纯真的少年了。然而，有三次在情急之下，他借助了一种古远年代惯用的简单手法：把害怕被人认出的女友化装成男人，然后装作打算整晚狂欢的人傲慢地走进小旅馆。但至少有两次都被不少人发现，他和那位所谓的男同伴没有去酒吧间，而是进了一个房间。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本来已经相当糟糕的名声经历了致命一击。最后他干脆就不再去了。只有极少的几次，他又重游故地，并不是为了及时行乐，而是恰恰相反：为了寻找一个避难所，从荒淫无度中恢复过来。

他这么做绝对是有道理的。下午五点左右，刚一离开办公室，他便像鹰捉小鸡一样展开猎捕行动。起初，无论夜晚带给他什么，他都满足。公园中的女仆，市场上的黑女人，海滩上风情万种的淑女，新奥尔良船上的外国妞儿，他照单全收。他把她们带到防波堤上，从日落开始，半城人都在那里做着同样的事。他把她们带到所有能干那种事的地方，有时连没法干的地方也去：有不少次，他都不得不急匆匆地钻进某个漆黑的门洞，躲在门后尽力做着他所要做的事。

灯塔一直是个幸福的避风港。当他刚刚迈入暮年，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安定时，他还时常怀念它，因为那里的确是个让人享受欢愉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偷欢的情景会通过灯塔的每一次闪烁传到航海者那里去。所以，他继续到灯塔去，比去其他任何地方的次数都多。那位看灯塔的朋友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满脸的忠厚老实，这对那些惊慌的小鸟来说是最好的镇定剂。灯塔下面有一座房子，紧挨着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的咆哮的海浪，在那儿做爱，爱欲更加浓烈，因为仿佛遭遇了海难。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更喜欢待在灯塔，破晓时分，从那里可以隐约看见整座城市，海上渔船那一串串的灯火，甚至还有远处的沼泽。

在那段时期，他形成了关于女人的身体和她们爱的能力之间关系的相当粗浅的理论。他不相信外表性感的那类，看上去能生吞一只短吻鳄的女人，通常在床上是最被动的。恰恰相反，他喜欢瘦得皮包骨的小青蛙似的女人，走在街上甚至没有人愿意费力气回头看她们一眼，仿佛脱掉衣服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一碰之下，那骨头还咯吱作响得让人可怜，然而，她们却能让最爱吹嘘床上功夫的男人自愧不如。他记下这些尚不成熟的观点，准备为《恋人指南》写一卷实用增订本，但奥森西娅·桑坦德尔的出现使这个计划遭受了和之前的出版打算同样的命运。这个女人用她那老狗一样的智慧，将他上下左右结结实实地调教了一番，让他彻头彻尾地重生了一次，同时，也击碎了他那些精妙绝伦的理论，给他上了一堂唯一该上的爱之课—谁也别妄图当生活的老师。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曾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普普通通的婚姻，育有三个子女，而后，子女又结婚生了子女，所以她自夸是全城最享清福的祖母。始终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她抛弃了丈夫，还是丈夫抛弃

了她，抑或是两人同时抛弃了对方。总之，他和一直以来的情人住在一起，而她也终于感到了自由，可以大白天从前门，而非以往那样晚上从后门接待内河船长罗森多·德拉罗萨了。正是这位船长，想都没想，就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到了她家。

船长是带他去吃午饭的。此外，还带去了一瓶家酿的烧酒和各种质量上乘的配料，足以做一锅史诗般的炖杂烩—只有用家养的鸡、脆骨肉、垃圾堆里养的猪，以及河边村落里种的菜豆和蔬菜，才能做出这道大菜。然而一开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既没有对美味的菜肴动心，也没有对风韵犹存的女主人表现出多大热情，而是对她家漂亮的房子欣赏有加。他喜欢这幢房子，它明亮凉爽，有四扇大窗面朝大海，还能远眺古城的全貌。他也喜欢那些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陈设，全都是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每次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精美的手工艺品，多得连再放一件的地方也没有了，让客厅看上去既神秘复杂又精致无比。朝海的露台上，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站在只属于自己的铁环上，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带给人无限的思考—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见过的最美的动物。

看见客人兴奋，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也高兴不已，细细讲述了每件东西的来历。他一边讲，一边喝着烧酒，虽是小口小口地啜，却没有停过。他看上去仿佛钢筋水泥做成的：身形巨大，除了脑壳是光的，全身上下都是毛，髭须像把粗刷子，声音像绞盘一样，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嗓音，而他的待客礼节却又是极周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人的身体能顶得住他那种喝酒方式。还没上餐桌，他就已经喝掉半瓶酒了。终于，他趴倒在放杯子和酒瓶的托盘上，发出一声长长的爆炸般的轰响。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只好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忙把这头搁浅的鲸鱼毫无生气的身体拖到床上去，并给睡着

了的他脱去衣服。之后，两人感谢彼此星辰的交会所带来的灵感火花，在隔壁房间脱掉了衣服，没有商量，没有暗示，甚至也没有谁提议，并且在此后的七年里，每当船长出海，两人一有机会便继续如此脱衣服。没有丝毫被发现的危险，因为船长有一个优秀海员的习惯，即到港之时，哪怕是黎明，也要拉响船上的汽笛，先用三声长鸣通知妻子和九个孩子，再用两声短促而忧伤的笛声知会情人。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已年近五十，看起来也绝不会小于这个年纪，但她对爱有一种独特的本能，任何民间或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干扰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通过轮船行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拜访她，他从不事先通知，想去的时候便去，不管白天黑夜，而没一次她不是在等他。每次她给他开门，都是像母亲把她一直养到七岁时的那个样子：全身赤裸，只在头上用薄纱系着一个蝴蝶结。在脱掉他的衣服之前，她不会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往前踏一步，因为她一直认为家里有个穿着衣服的男人是不吉利的。这也是她和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常常发生分歧的原因：船长迷信地认为光着身子抽烟会招致厄运，所以有时宁可推迟做爱，也不愿熄灭他那支不可或缺的古巴雪茄。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十分迷恋裸体的魅力。刚一关上门，甚至都不给他问候的时间，也不等他摘掉帽子和眼镜，她便带着真诚的喜悦，为他脱去衣服，一边脱一边吻他，同时也让他一连串地亲吻她。她为他自下而上解开扣子，先是裤子的门襟，每解一颗扣便吻他一下，然后是腰带上的卡子，最后是背心和衬衫的扣子，直至他看上去就像一条被活生生开了膛的鱼。接着，她让他在客厅里坐下，为他脱掉靴子，从裤腿处将裤子和里面的衬裤一同拉到脚踝，最后，松开他腿肚子上的松紧袜带，为他褪下长袜。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停止吻她，也不让她亲吻自己，而是着手进行这套精准仪式中他所唯一负责的部分：从背心的扣眼上取下怀表，再摘下眼镜，然后把

两样东西一起放进靴子，以确保不会落在这里。在别人家脱光衣服时，他总是这么谨慎行事，从不疏漏。

他刚一做完这些，她便从不给他留下一丁点儿多余的时间，立刻就在她为他脱去裤子的沙发上向他发起进攻，只有很少几次是在床上。她钻到他身子下面，将他完全地占为己有。她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闭着眼在身体内部的绝对黑暗中探寻，一会儿往这边进，一会儿往那边退，不断纠正那看不见的方向，尝试开辟一条更为强烈的途径，寻找另一种方式，以免迷失在腹内流出的黏稠泥沼之中。她用一种难懂的家乡话像牛虻一样发出嗡嗡的声响，自问自答着哪里才是黑暗中只有她自己知晓、也只被她自己所渴求的那个地方。最终，她独自一人先迫不及待地屈服了，坠入自己的深渊，伴随着一声大获全胜的喜悦的爆炸，震动了整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精疲力竭，兴犹未尽，漂浮在两人汗水形成的水洼之中，觉得自己不过是别人享乐的工具而已。他说：“你对我不过就像在众多男人中又加上一个罢了。”她淫荡地放声大笑，说：“恰恰相反：是众多男人中又少了一个。”他顿时觉得她怀着吝啬的贪婪，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于是，一股傲气涌上心头，他从她家走了出来，决心不再回去。但很快，带着午夜孤独中可怕的清醒，他无缘无故地又醒悟过来，回想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那自我陶醉的爱欲，他豁然明白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幸福的陷阱，他既厌恶又渴望，但总之，他逃不掉。

相识两年后的某个星期日，他到她家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他脱衣服，而是摘掉他的眼镜，以更好地亲吻他，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开始爱上他了。尽管从第一次到这所房子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很自在，像喜欢自己家一样喜欢这里，但每次他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也从没有在这里睡过觉，饭只吃过一次，那是

她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事实上，他每次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带一枝孤零零的玫瑰作为唯一的礼物，完事之后便消失，直至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到来。但就在她为了吻他而摘下他眼镜的那个星期日，一方面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人平静地做完爱后睡着了，他们竟赤身裸体地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个下午。从午觉中醒来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它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与它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它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伸出一只探险的手，摸索着那只躺卧的猛兽，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的手移开了。他说：“现在不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她又一次用欢快的笑声惊扰了白鹦鹉。她说：“这个借口就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3]”她当然也不会信，但她承认这是个不坏的说法。于是，两人又静静地温存了许久，没有再做爱。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挂着，她跳下床，一如既往地赤裸着身体，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想去厨房找点儿喝的东西。但她还没有迈出卧室门一步，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家中唯独剩下的就只有几盏吊灯了。其余的，诸如带签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戈博兰挂毯，以及无数件珍贵的石头和金属小摆设，所有那些曾让她的家成为全城最赏心悦目、装饰最精美的家之一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只神圣的白鹦鹉在内，全都不翼而飞了。东西是从观海露台搬走的，丝毫没有惊扰他们的恩爱。现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客厅、四扇敞开的窗子，以及靠里的墙上用粗刷子写下的一行字：这就是淫乱之人的下场。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永远也无法理解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为什么不去报

案，不试图跟那些销赃的商人们联系一下，甚至连提也不让别人再提她这件倒霉事。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家里去看她，如今这里的家具只剩下窃贼忘在厨房的三只皮凳子，以及他们当时所在的卧室里的东西。不过，他去看她的次数不像以往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家当失窃—她曾这样猜想并当面质问过他—而是因为新世纪之初出现了骡子拉的轨道车这种新鲜事物。这种车被他视作盛产零散小鸟的原始巢穴，他每天乘坐四次，两次去办公室，两次回家。有时，倒也当真在车上读点什么，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假装阅读，伺机为日后的幽会建立起最初的联系。后来，莱昂十二叔叔给了他一辆由两头棕色骡子拉的车，骡子身披金色披挂，就跟为拉法埃尔·努涅斯总统拉车的骡子一样，但他仍旧怀念以前乘坐轨道车的日子，认为那是自己猎艳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他是对的：对于秘密的爱情而言，没有什么比等在门口的车子更危险的敌人了。既如此，他便几乎总是把车藏在家里，走着去展开他的新一轮猎捕行动，以免车轮在尘土上留下痕迹。所以，每当他想起那些由毛皮斑驳的瘦骡拉着的老式轨道车时，都无比怀念，在那样的车上，他只需瞟上一眼，就能看出哪儿蕴含着爱情。在无数动人的回忆之中，他最无法忘怀的是与某只无依无靠的小鸟间的一段故事。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半个疯狂的夜晚，但仅仅这半个夜晚就足以让他余生都对狂欢节上无知的混乱心有余悸了。

在轨道车上，她面对游行人群的喧闹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吸引了他。她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若不是装扮成了一个残疾人，真看不出她对狂欢节有丝毫热情。她的长发又亮又滑，自然地披在肩上，身上是一件没有装饰的普通麻布长袍。街上音乐嘈杂，人们互相撒着一把把

大米粉，每当轨道车经过时，人们都往乘客身上泼洒颜料，在那疯狂的三天，轨道车的骡子也用淀粉涂成了白色，还戴上了花环。然而对这一切，她仿佛全然无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趁着混乱，邀请她去吃冰激凌，因为怕她不会接受更多的要求。她看了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说：“我很乐意接受，但我要先提醒您，我是个疯子。”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回答，他笑了，接着便把她带到冰激凌店的阳台去看彩车游行。之后，他穿上租来的斗篷，两人钻进海关广场跳舞的人群。他们在一起陶醉的样子就像一对新结合的恋人，因为她的冷漠在夜晚的喧闹中一扫而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跳得像专业舞者一样，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大胆且富有想象力，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

“你不知道和我搅在一起的麻烦。”在狂欢节的狂热中，她一边笑得要死，一边喊道，“我是疯人院里的疯子。”

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晚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还未遭遇爱情不幸的纯真胡闹之中。然而他知道，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地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夜晚的狂欢将在颁出最佳化装奖后开始消退，在那之前，他向姑娘提议到灯塔去看黎明。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要等到颁奖之后。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肯定，正是她的拖延救了自己一命。当姑娘最终向他示意一起去灯塔的时候，圣牧羊女疯人院的两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一下子扑到了她的身上。自从她下午三点逃跑后，他们就一直在找她，不只是他们，城里所有的警察也都在找。她用一把从园丁那里抢来的砍刀，砍掉了一名守卫的脑袋，又重伤了另外两名，只因为她想出来到狂欢节上跳舞。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大街上，还都以为

她会藏在某幢房子里，他们地毯式地搜查了无数幢房子，甚至连地下雨水池都没放过。

带走她可真不容易。她用一把藏在贴身背心里的修枝剪自卫，六个男人一起才给她穿上了紧身衣，拥挤在海关广场的人群开心地鼓掌哄笑，以为这血腥逮捕的场面是狂欢节刻意上演的无数闹剧之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痛如绞，从圣灰星期三开始就一直徘徊在圣牧羊女大街，手里拿着一盒要送给她的英国巧克力。他看着那些被囚禁的疯女人从窗口向他嚷出各种辱骂或哀求的话，而他向她们晃着手中的巧克力，希望能恰巧碰上她也出现在铁窗前。但他始终没有再见过她。几个月后，他走下骡子轨道车时，一个由父亲领着的小女孩向他索要盒中的一块巧克力。父亲责备了她，并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道歉。可他却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小女孩，期望这个举动能帮他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

“它原本是为一份已经见了鬼的爱情准备的。”他说。

仿佛命运要给他以补偿，同样是在骡子轨道车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识了莱昂娜·卡西亚尼。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人始终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他乘五点钟的轨道车回家，在看见她之前便感觉到了她的存在：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的触动了他。他抬起眼，看见她坐在车子的另一端，在乘客中显得十分出众。她并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恰恰相反，继续无所避忌地盯着他。毫无疑问，他不能不这样想，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女人是个妓女。他决意不去理会她，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花钱买爱情更可耻：他从没有这样做过。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猜到的事：是她。她装扮得和版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脖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他在小旅馆见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只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脖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掉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而她仍旧跟着他，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脚，转过身，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美人儿，你弄错了，”他说，“我是不会就范的。”

“您一定会，”她说，“从您脸上就看得出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

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他知道她知道。

这是他一生的错误：他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她想向他恳求的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她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儿那里。头儿在总务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从创建之日起，CFC的办公室就位于内河码头的对面，那里与海湾另一侧的远洋轮船港口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灵魂湾的市场泊船处。那是一座木制楼房，双坡锌顶，只在正面有一个用石柱支撑的长长的阳台。房子四面都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子，从屋里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的所有船只，与看挂在墙上的图表无异。当初建造房子时，德国先驱们把锌顶漆成了红色，四周的木墙则涂了耀眼的白，为的是让整座楼看上去就像一条内河船。后来，人们又把它整个儿漆成了蓝色，而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进公司时，这座楼已变成了一个落满灰尘、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棚屋，生锈的屋顶上，补丁摞补丁。楼后是一个砂土院子，围着鸡笼用的那种六角网眼铁丝网，里面有两个较新的大仓库，仓库后面则是一条堵死了的下水道，又脏又臭，半个世纪的河运垃圾都在那里腐烂：各种古旧船只的残骸，从西蒙·玻利瓦尔剪彩下水的

原始单烟囱船，到舱室装有电风扇的较新的船。其中大部分已被拆散，零部件用到了其他船上，但也有不少还相当完好，似乎只要动手刷刷漆，便可以下海航行，都用不着吓跑船上的鬣蜥，或除去那些让这一条条旧船看上去更加伤怀的茂盛的大黄花。

楼顶层是管理处，一间间的办公室都很小，但很舒服，设备齐全，就像轮船上的舱室，因为它们并非由城市建筑师而是由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走廊的尽头，莱昂十二叔叔就像一名普通员工，在一间和所有人的办公室相同的屋里办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清早都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种类的芳香四溢的鲜花。底层是旅客接待处，先是一间摆放着粗糙板凳的候船室，以及一个售票和行李托运的柜台。再往里才是混乱的总务处，单是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职能模糊的感觉，那些其余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就送到这里来不了了之。那天，莱昂十二叔叔亲自来此，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想出什么见鬼的办法，好让总务处起点作用，而当时，莱昂娜·卡西亚尼就默默地坐在一张堆满了玉米袋和无法处理的文件的小桌后面。在对满屋子全体职员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理论假设和具体调查后，莱昂十二叔叔懊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一趟不仅确定了那种种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且雪上加霜，又发现了各种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办公室，看见了莱昂娜·卡西亚尼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请求他研究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就转呈他的叔叔。在前一天下午的视察中，她是唯一一个一言未发的人。她心里始终清楚自己是因他人的施舍而受雇，在备忘录中，她表明自己没有发言并非因为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本部门领导的尊重。她的建议之坦率令人惊讶。莱昂十二叔叔本是想将总务处彻底改组，但莱昂娜·

卡西亚尼的想法恰恰相反，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事实上总务处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个垃圾站，收容了其他部门推卸掉的各种麻烦而又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撤销总务处，将问题返回原部门解决。

莱昂十二叔叔完全不知道莱昂娜·卡西亚尼是谁，也记不起前一天下午的会议中见过的哪个人可能是她。但看完备忘录后，他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她闭门交谈了两小时。他们天南地北地什么都聊，这是他了解人的一贯做法。那份备忘录显露了质朴的常识，解决方案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些对莱昂十二叔叔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本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她小学毕业以后，就只在制帽学校学习过。但在此之外，她正用一种速成法在家自学英语，三个月前还开始上夜校学习打字，这可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全新职业，就像从前的电报业和更早时期的蒸汽机行当一样。

等她谈完话走出去时，莱昂十二叔叔已经开始叫她“同名人[4]莱昂娜”了，后来就一直这样称呼她。根据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建议，他决定当机立断撤销使人头疼的总务处，把问题交回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去解决。他为她专门设立了一个既无名称也无具体职能的岗位，实际上就是当他的私人助理。那天下午，总务处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后，莱昂十二叔叔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从什么地方把莱昂娜·卡西亚尼找来的，他据实做了回答。

“那么你就再到轨道车上去，把所有像她一样的姑娘通通给我带回来。”叔叔对他说，“再有两三个这样的，我们就能把你那艘大帆船捞上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为这只是莱昂十二叔叔的一句典型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他便发现六个月前指派给自己的那辆车不见了，就为了让他继续在轨道车上寻找隐藏的人才。至于莱昂娜·卡西亚尼，则很快放下最初的顾忌，把前三年深藏不露的所有本领都拿了出来。又一个三年过后，她已掌控了一切，再过四年，她与总秘书的位置就只一步之遥了，但她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因为那只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她一直都听命于他，她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尽管真相并非如此：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是他在听命于她。事实上，他在董事会中不过是依照她的建议行事，完全是她帮他战胜了隐藏的敌人设下的种种圈套，节节高升。

莱昂娜·卡西亚尼具有一种魔鬼般的才能，能够操控秘密，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她精力充沛，沉默寡言，温柔聪慧。但在必要的时候，尽管要忍受灵魂的痛苦，她也会放任自己施展铁腕。然而，她从不会为了自己这样做。她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别无他法时甚至不惜流血，好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扶摇直上，坐到他自不量力地想要坐到的位置上去。当然，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她无论如何也会这么干，但事实是，她有意识地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之坚定，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一度认不清她的意图。曾有那么一个不幸的时刻，他试图挡她的路，因为他认为是她在挡自己的路。莱昂娜·卡西亚尼让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弄错了，”她对他说，“只要您愿意，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您可要想清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确从未想过，这个时候他尽可能清醒地想了一想，于是向她缴械投降。事实上，在一直危机四伏的公司里那场

肮脏残忍的内斗中，在他战战兢兢却又一发不可收拾的猎捕行动中，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越来越渺茫的幻想中，面对这个勇敢的黑女人所做的壮举，面对她在那白热化的斗争中惹上的一身污秽又一身情爱，表面上无动于衷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不曾有过一刻平静。很多时候他都暗自伤心，只为她当真不是他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女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脑后，哪怕要付出实打实的金疙瘩，也要去和她做爱。莱昂娜·卡西亚尼依旧和那天下午在轨道车上时一模一样，穿着那身叛逃奴隶似的俗丽衣服，裹着疯狂的头巾，戴着骨头耳环和手镯，还有那一大串项链和满手的假宝石戒指：完全是个街头荡妇。岁月没有在她的外表刻下多少痕迹，反而适当地增添了她的姿色。她正值成熟丰润的年龄，散发出的女性魅力比以往更令人躁动，那热情似火的非洲女人的身体也更显丰满结实。十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再向她示过好，以此为他最初犯下的过错赎罪，而她帮他做了一切，却唯独没在这件事上帮他。

一天晚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工作到很晚—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如此—正要回家时，他看见莱昂娜·卡西亚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没有敲便推开了门。她果然在那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神情严肃，陷入沉思，新配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学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惊又喜地发现这座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码头上也空无一人，城市在沉睡，无尽的黑夜笼罩着阴郁的大海，一艘一小时后才能到达的轮船发出悲凄的哀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就像当年在麦仙翁巷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样，只不过现在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膝盖的颤抖。

“请告诉我，我亲爱的母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她没有惊讶，神情自若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头晕目眩。她还从未用“你”称呼过他。

“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问我这句话。”

已经太迟了：机会曾经就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后来也一直在她所坐的这把椅子上，而现在却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为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卑鄙事，为他忍受了那么多肮脏的勾当之后，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尽管他原本比她年长二十岁：她为他衰老了。她是那么地爱他，她愿意继续爱他而非欺骗他，但她不得不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点醒他。

“不，”她对他说，“那样我会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儿子睡觉，虽然这个儿子并不是我生的。”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鲠在喉，因为最终的拒绝竟不是出自自己之口。他一贯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对方的坚持，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事情到她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他不能冒险再犯第二次错误。他很有风度地退了出去，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实属难得的优雅。从那晚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点阴影都不费吹灰之力地消散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明白，不跟女人睡觉，也能成为她的朋友。

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试图向其透露费尔明娜·达萨秘密的唯一一人。由于不可抗力，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人都已经开始淡忘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三个已把它带进了坟墓：一是他的母亲，她在去世前很久就把这件事从记忆中抹掉了；二

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她服侍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女主人，直至善终；三是令人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是她把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一本弥撒经书中带给他，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不可能还活在世上。此外还有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当年为了避免女儿被开除，或许曾将此事透露给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但由此再往外传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所在的遥远省份的十一位电报员，他们发报时是知道他们俩的全名和准确地址的。最后，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和她那帮桀骜不驯的表姐妹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其实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算在其中。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最初几年对本城的频繁拜访中，曾有一次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但她是偶然且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说起的，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不是如她所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而是压根儿就没从任何一个耳朵听进去。原来，伊尔德布兰达是在讲到可能在花会上夺魁的诗人时提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她认为他是被埋没了的诗人之一。乌尔比诺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而她则毫无必要却也没有半点恶意地告诉他，那是费尔明娜·达萨婚前的唯一一位恋人。她告诉他，是因为她相信这件事是那么的纯真而且短暂，以至于它所激发的情绪不过是令人感动罢了。乌尔比诺医生看都没看她就答道：“我倒不知道那家伙还是个诗人。”随即，他便从记忆中将他同其他事情一起抹掉了，因为他的职业早已让他形成了某种道德准则，那就是适时地选择忘记。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这些秘密的保管人中，除了自己的母亲，其余都属于费尔明娜·达萨的世界。他这方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背负着这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包袱，多少次都想与人分担，但至今

还没有人值得他如此信任。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只不过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机会。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正想着这事，可巧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竟爬上了CFC陡峭的楼梯。为了克服三点钟的炎热，他每爬一级便停下来歇一会儿，最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时，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一场飓风就要刮过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好几次，都是来找莱昂十二叔叔的，但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与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

那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职业难关，正像个乞丐一样，手里拿着帽子，挨家挨户地为他的艺术事业寻求资助。一直以来，他最长久也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便是莱昂十二叔叔。而此刻，莱昂十二叔叔正坐在书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开始睡他那每日十分钟的午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这里与莱昂十二叔叔的办公室相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叔叔接待访客的前厅。

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见过，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感到自卑得恶心。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十分钟里，他三次起身，盼望叔叔提前醒来，还喝了整整一保温瓶的苦咖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连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接着便聊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来，根本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法忍受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出众。他用词精准流畅，身上散发出隐隐的樟脑味，魅力独特，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为轻浮的言词，只因从他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突然，医生一下子转换了话题：

“您喜欢音乐吗？”

这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些意外。事实上，城中举办的所有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他都会前往，但他自觉并没有能力进行一番批评式的或全面的讨论。他对流行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伤感的华尔兹，很显然，它们和他年轻时作的曲子以及他那些秘密诗句异曲同工。他只需随意地听上一遍，接下来的整整几夜，就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将旋律从他的脑海中抹掉。但这不是一个对专家提出的严肃问题的严肃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明白了。“嗯，”他说，“他现在正流行。”接着就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自己那许多新计划上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计划将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他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强调，现在能拉来的演出质量低劣，令人泄气，与上世纪能欣赏到的那些节目简直有云泥之别。的确如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售门票，就为了能把柯尔托、卡萨尔斯和蒂博的三重奏搬上喜剧剧院的舞台，可政府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三位是谁，而就在眼下这一个月中，拉蒙·卡拉尔特的侦探剧团，马诺罗·德拉普雷萨先生的小歌剧和说唱剧团，洛斯·圣塔内拉剧团（那些难以形容的、善于模仿和表演幻术的小丑们能借着磷火闪动的瞬间在舞台上换衣服），丹妮塞·达尔泰内（据广告称她是牧羊女游乐园的老牌舞蹈演员），甚至还有那个令人厌恶、敢跟斗牛近身搏斗的巴斯克疯子乌尔苏斯，所有这些人的演出票竟然都销售一空。不过，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又一次做了坏榜样，正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我们倒已经在连绵半世纪的九次内战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仔细算算，其实那九次内战完全可以视作一次：自始至终不过是同一场战争。这场令人陶醉的

演说中，最引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的一点就是花会有可能重开，这曾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活动中最轰动、也最持久的一项。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说出自己曾经是它的执著参与者，那项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不仅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还有来自加勒比其他国家的。

谈话刚刚开始，热腾腾的空气就骤然凉了下来，一阵四处乱窜的狂风把门窗摇晃得噼啪作响。办公室连同房子的地基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他随便提了几句六月肆虐的飓风后，出其不意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视她为最热情的合作者，还把她视作自己一切倡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会一事无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动于衷地听着他的话，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他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害怕声音会背叛自己。但再听了两三句话后，他便明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那么多耗费精力的应酬之余，仍有富裕的时间去仰慕自己的妻子，而且程度几乎与他不相上下。这个事实令他茫然。但他没有做出自己本想做出的反应，因为此时，他的心对他耍了一个只有心才能耍出的婊子花招：他的心告诉他，他和这个他一直视作死敌的男人是同一命运的牺牲品，遭受着同一种激情带来的厄运—是两头套在同一架轭上的牲口。在二十七年无休止的等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头一次无法承受这种内心的刺痛：眼前这个令人钦佩的男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他才能幸福。

飓风终于扬长而去，但这强劲的西北风在十五分钟内已席卷了沼泽附近的好几个街区，毁掉了几乎半座城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对莱昂十二叔叔的慷慨表示满意，没等雨完全停就离开了，还无意中带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给他撑到车前的雨伞。但弗洛

伦蒂诺·阿里萨没有介意。甚至刚好相反：他很高兴地想着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伞的主人是谁时会作何感想。当莱昂娜·卡西亚尼走过他的办公室，他还沉浸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面所带来的恍惚之中。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无需兜圈子便可以向她吐露自己的秘密，就仿佛挑破要命的腋下脓疖似的：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开始问她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这个人怎么看。她几乎想都没想便回答说："他做了许多事，或许做得太多了，但我相信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接着，她思索了片刻，一边想一边用她那只有高大的黑女人才有的又大又锋利的牙齿，把铅笔上的橡皮一块块咬下来，最后，她耸了耸肩，以此结束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做那么多事吧，"她说，"这样可以免得去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留住她。

"让我难过的是，他不得不死。"他说。

"世上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是的，"他说，"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死。"

她一点儿也没听懂，又耸了耸肩，没说话便走了。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晚上，同费尔明娜·达萨躺在一张幸福的床上时，他将会告诉她，他没有把他的爱情秘密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唯一一个赢得了知情权的人也没有说。不：他将永远不会向人吐露这个秘密，即便是对莱昂娜·卡西亚尼，这并非因为他不想向她打开这只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宝箱，而是因为直到开启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已把钥匙弄丢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件事。他沉浸在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当中，一场场花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年的四月十五，喧嚣声都会响彻整个安的列斯群岛，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和在几乎所有其他活动中一样，始终是秘密的主角。自首届诗赛以来，他参加过好几次，可就连末等奖中也从未出现他的名字。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参赛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这项赛事对他来说别具吸引力：第一次比赛中，负责打开火漆封口的信封并宣布获奖名单的人是费尔明娜·达萨，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在此后的每一年都参加比赛了。

那天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躲在前排靠背椅的阴影中，翻领的扣眼上别着一枝娇艳的山茶花，随着他强烈的渴望上下起伏。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三只用火漆封着的信封。他问自己，当她发现金兰花奖的得主是他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能肯定她认得出他的笔迹，在那一瞬间，她定会回想起小花园杏树下刺绣的那一个个下午，想起信中那些干枯的栀子花的芳香，想起清晨风中那曲只属于两人的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这个万人渴望的国家诗歌大奖竟授给了一个中国移民。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引起了公众的骚动，甚至令大赛的严肃性受到质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委会一致认为那首十四行诗精妙绝伦。

没人相信获奖的中国人是那首诗的作者。上个世纪末，为了逃避修建两大洋铁路时席卷巴拿马的黄热病瘟疫，他和其他很多中国人一起来到这里，到死都没有再离开。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起初，一共也没有十个人，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用来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他们和那些入境时未在海关留下丝毫记录的不期而至的中国人，

已经从港口郊外的四条巷子中满溢出来。一些年轻人在匆忙间变成了令人敬仰的族长，谁都无法解释他们哪里来的时间衰老。人们普遍凭直觉把他们分为两类：坏中国人和好中国人。坏的那些都窝在港口阴郁的餐厅里，面对着一盘葵花子炒鼠肉，或者像国王一样大吃大喝，又或者随时准备在桌前暴毙，大家怀疑，那些餐厅不过是在掩人耳目，里面进行的其实是贩娼之类的勾当。好中国人则是那些洗衣店里的人，他们继承了一门神圣的学问，能让交回的衬衫比新的还整洁，领口和袖口都熨烫得像刚出模子的圣体一样。那位在花会上击败了七十二名有备而来的对手的男人，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之中的一个。

当费尔明娜·达萨头晕眼花地读出那个名字时，谁也没有听懂。不仅因为那名字本身就不同寻常，更因为无论如何没人说得准中国人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但也无需劳神，因为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的尽头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中国人早早回家时的那种完美微笑。他显然早已胜券在握，所以还特意为领奖穿上了春节时穿的黄色丝绸衬衣。他接过18K的金兰花，在质疑者震耳欲聋的嘘声中，幸福地亲吻了奖杯。他面不改色，只是在舞台中央静静等着，沉着得就像一位全能上帝的使徒：很明显，他那位上帝的神意远不及我们这位如此富有戏剧性。台下刚一安静下来，他便朗读了获奖的诗作。谁也没有听懂。但新的一阵嘘声过后，费尔明娜·达萨冷静地用她那撩人的沙哑嗓音又读了一遍，从第一句起就震惊了全场。那是一首正宗的帕尔纳斯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瑕，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缕灵感的清风，显露出一位高手的深厚功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位大诗人想出了这个玩笑似的主意，以此捉弄花会，而这个中国人自告奋勇助他一臂之力，并且抱定了至死保守秘密的决心。我们的传统报纸《商业日报》试图挽回市民的荣誉，发表了一篇博学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久远渊源和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参加花会的充分

权利。撰写此文的人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并以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中国人皆是诗人》。即使真有阴谋，阴谋的发起者也早已带着秘密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中国诗人活到了东方人的高寿，死前并没有忏悔。下葬时，棺材里放着那枝金兰花。他多少有些饮恨而终，因为生前没有得到他唯一渴望的东西，即人们对他诗人身份的认可。为纪念他的辞世，报界又回顾了那次已被淡忘的花会事件，再次刊登那首十四行诗，并配上盈润少女手捧丰饶之杯的现代主义插图。而诗歌的守护神也利用此次机会让一切归回原位：新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糟糕透顶，于是谁也不再怀疑它的作者当真是那位已故的中国人了。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中，这场闹剧总是与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体态丰腴的陌生女人联系在一起。典礼一开始他便注意到了她，但之后，由于忐忑的等待，他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一样白皙的皮肤，她身上那种幸福丰盈的女人所特有的芳香，以及她那女高音般的宽大胸脯上别的一枝人造洋玉兰，这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一袭黑色的天鹅绒长裙紧裹着她的身体，黑得就像她那双充满渴望和热情的眼睛。头发更是乌黑，用一把吉卜赛人的发梳别在后颈处。耳坠和项链是同一款式的，好几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而所有的首饰都嵌着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右边的脸颊还用眉笔画了一颗痣。在最后那片混乱的掌声中，她怀着真诚的哀伤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眼。

“请相信我，我真心为您感到遗憾。”她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感动，倒并非因为这份他应得的同情，而是惊讶竟有人知晓他的秘密。她向他道明原委：“我是从开信封时您

翻领上那枝山茶花的起伏中看出来的。”她把手中的长毛绒洋玉兰拿给他看，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所以我才老早就摘下了我这朵。”她说。

她因失败而马上就要落下泪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他那夜间狩猎者的本能改变了她的情绪。

“咱们找个地方去一起哭一场。”他对她说。

他把她送回家。到了门口，几乎已是午夜时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便说服她邀请自己进去喝一杯白兰地，边喝边看看她提到的这十多年来积攒的有关公众大事件的剪报和相册。这个花招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老套了，但这一次却不是他主动出击，而是她在从国家剧院回来的路上就说起她的剪报。他们进了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进客厅的第一眼便注意到，唯一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床宽大而豪华，铺着锦缎床罩，床头饰有铜树枝。这让他有些慌乱。她想必注意到了这一点，上前一步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门。她请他坐在一张印花布的长沙发上，上面有一只猫在睡觉，然后她把收集的几个册子放到了中间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紧不慢地翻着册子，想得更多的是接下来的行为，而非正在看的东西。忽然，他抬起眼，看见她双眼噙满泪花。他劝她想哭就哭，用不着难为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哭泣更能减轻痛苦了，但他建议她先松开紧身背心再哭。他上前去帮她，因为那件紧紧束在身上的背心后面有两根带子来回交叉地系着。他并不需要将带子完全解开，刚解到一半，紧身背心就因内部的压力自己松开了，那对硕大的乳房终于自由地呼吸起来。

即便是在最顺手的场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从未摆脱第一次的紧张。他鼓足勇气用指肚轻抚她的脖颈，而她蜷起身子，像个被娇宠的小姑娘似的呻吟着，但始终没有停止哭泣。于是他又轻吻了一下她的脖子。他没来得及吻第二下，她就将她那贪婪、火热的庞大身躯整个地掉转过来，两人抱滚到地上。沙发上的猫惊醒了，尖叫一声跳到他们身上。两人像窘迫的新手一样忙乱地摸索着对方，但不管怎样总算找着了。他们在散了页的剪报册上翻滚着，身上还穿着衣服，大汗淋漓，比起自己闯下的爱的灾祸，他们更担心猫儿疯狂的抓挠。但从伤口还在流血的第二天晚上起，他们又继续这样做了好几年。

当他发现自己开始爱上她时，她已整整四十岁，而他即将年满三十。她叫萨拉·诺列加，年轻时以一本描写穷人爱情的诗集赢过一次比赛，曾有那么一刻钟出尽风头，但书从未出版过。她是公立学校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老师，靠工资生活，住在鱼龙混杂的赫塞玛尼老区恋人巷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有过几个短暂的情人，但没一个抱有跟她结婚的打算，因为想让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男人跟哪个女人睡过觉就娶哪个女人实在是太难了。自从她的第一个正式未婚夫逃婚以后，她自己也不再让这样的幻想滋生。她以十八岁所能付出的全部疯狂与热情爱着他，而他却在婚礼的前一星期逃避了自己的承诺，将她抛弃在绝境，成了被人耻笑的新娘。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成了被人用过的未婚姑娘。然而，那第一次的恋爱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痛苦，而是让她有了一个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婚姻，有没有上帝，甚至有没有法律，如果床上没有个男人，那日子根本就不值得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在做爱时必须吸吮一个婴儿用的奶嘴才能达到幸福的顶峰。他们把市场上能找到的各种大小、形状和颜色的奶嘴买来了一大串，萨拉·诺列加把它们挂在床头，以便在紧要关头伸手就能够到。

虽然她和他一样都是自由身，或许也并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一开始便把这种关系界定为秘密探险。他几乎总是在深夜才从后门溜进来，天亮前不久再踮着脚逃走。他和她都明白，在这样一所合租的人口众多的房子里，邻居们总是要比他们佯装的知道得多。虽然这只是走走形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非要如此，在有生之年，他和女人交往时也一直如此，从未出过差错，无论是和她，还是和其他女人，都从未被抓住偷情的把柄。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只有一次，他留下了牵连的痕迹，或者说手写的证据，差点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他一直都表现得就像是费尔明娜·达萨彻头彻尾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不停地努力摆脱自己所受的奴役，却又从不让自己的背叛给她带去痛苦。

但如果没有误解，这种秘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地深藏不露。就连特兰西多·阿里萨死前都坚信，她以爱抚养长大的儿子因为年轻时的首战失利，从此对一切形式的爱情都具备了免疫力。不过，他身边很多人的想法就没那么仁慈了，他们了解他诡秘的性格，知道他爱好各种秘教服饰和奇怪的沐浴露，于是都怀疑他并非对爱情，而是对女人具备了免疫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这些揣测，但从来置之不理，并不澄清。萨拉·诺列加也毫不在乎。和无数爱过他的女人一样，甚至也和那些并不爱他却在交往中让彼此都收获了满足的女人一样，她是按照他真实的样子来接受他的：一个过客似的男人。

到了最后，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她家里，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早晨，那一向是最平静的时间。她无论正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来，将整个身体奉献给他，在那张装饰繁复的大床上，尽全力让他幸福。床一直是准备好的，在那里，她从不允许仪式性的做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明白，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独身女子怎么会如此精通男人之

事，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如此轻盈、如此温柔地控制她那鼠海豚似的柔软身体，就仿佛在水底游动一般。她辩解说，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抽搐了一下，对她的过去重新萌生了忌妒。他想，或许她要比她装出来的样子饱经沧桑得多，但他只好咽下这些猜疑，因为就像对其他女人说的一样，他也告诉她，她是他唯一的情人。很多事情他都不十分喜欢，比如不得不忍受那只暴怒的猫待在床上，萨拉·诺列加磨钝了猫的爪子，以防做爱时被它抓得稀烂。

然而，几乎就和喜欢在床上闹到筋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将爱的疲惫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她年轻时代的伤感诗有着惊人的记忆—当年，那些新创作的诗歌会装订成小册子在街上出售，两个生太伏一册—还会用大头针把自己最喜欢的诗钉在墙上，以便随时用生动的嗓音朗读。她还把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课文编成十一音节双行诗，就像正字法双行诗那样，但终究没能得到官方的赞同。她痴迷于朗诵，以至于做爱时还常常扯着嗓子背起诗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把奶嘴硬塞进她嘴里，就像制止孩子哭泣一样。

在两人感情最好的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问自己，究竟哪一种状态是爱情，是床上的颠鸾倒凤，还是星期日下午的平静。萨拉·诺列加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让他平静下来，那就是：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她说：“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萨拉·诺列加觉得这个结论很好，可以用来写一首关于貌合神离的爱情的诗。两人联手把这首诗写了出来，她还拿它去参加了第五届花会，并坚信从未有人以如此具原创性的诗歌参加过比赛。但她又一次失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送她回家时，她怒气冲天。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认定费尔明娜·达萨针对她搞了鬼，为了不让她的诗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理睬她。从颁奖仪式开始，他便心情忧郁，他已许久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了，而那天晚上，他感到她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他头一次一眼便能看出她已身为人母。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因为他早知道她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然而，在那一晚之前，她已到了当母亲的年龄这件事在他看来从未如此明显过，她的腰身粗了，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吁吁，宣读获奖名单时，声音也磕磕绊绊。

他试图理清自己的回忆，在萨拉·诺列加准备饭菜时，又翻起有关花会的剪报和相册。他看见杂志上的彩色画，门廊下作为纪念品出售的泛黄明信片，这一切就仿佛是对他荒谬一生幻影般的回顾。在此之前，一直支撑他的是一个假象，那就是世界在变，习惯在变，风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唯独她不会变。但那个晚上，他第一次头脑清醒地看见生活如何在费尔明娜·达萨身上留下痕迹，又如何在他自己身上留下痕迹，而他却除了等待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他从未和别人说起过她，因为他知道无法在说出她的名字时，不让别人看出他嘴唇的苍白。但那天晚上，正当他像之前无数个乏味的星期日晚上一样，翻看着那些剪报和相册时，萨拉·诺列加突然下了一句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评断。

“真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他身边，看到费尔明娜·达萨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成黑豹的图片时，说出这样一句。无需指名道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知道她在说谁。他担心她将揭穿他的秘密，搅乱他的人生，连忙谨慎地展开自卫。他说，他只是认识费尔明娜·达萨而已，关系很浅，与她

从来只是礼节性的问候，对她的私事也一无所知，但他十分肯定，她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女人，白手起家，凭自己的美德而备受赞扬。

“凭的是她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萨拉·诺列加打断他说，“这是婊子的下下策。”

虽然不像她这样粗鲁，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母亲当初为了安慰他的遭遇，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道德上同样严厉。他惊慌失措得直入骨髓，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她的尖刻，于是试图绕开话题。但萨拉·诺列加还没有发泄完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怒气，不允许他逃避。凭着某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直觉，她认定费尔明娜·达萨就是夺走她奖杯的幕后主使。没有任何理由能让她这样想：她们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见过面，而就算费尔明娜·达萨了解比赛内情，比赛的结果也跟她没有分毫关系。但萨拉·诺列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女人是有直觉的。”说完就结束了这场争论。

从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岁月也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那天生的丰腴悄无声息地枯萎了，她的爱欲总是因抽泣迟迟不来，她的眼皮开始显露饱经风雨的阴影。她已成昨日之花。而且，在失败的愤怒中，她没有在意自己喝下了多少白兰地。那一晚的她变了性情：就在他们吃重新热过的椰子米饭时，她试图算清他们两人在那首落榜诗作中的贡献，好知道各自应当分得多少片金兰花的花瓣。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锱铢必较的拜占庭式竞赛自娱自乐，但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抚平自己刚刚开绽的伤口。两人陷入斤斤计较的争执当中，将近五年来貌合神离的爱情所积累的怨忿浮出了水面。

差十分十二点时，萨拉·诺列加爬到一把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发条，凭记忆调准了时间，或许是想不说话就提醒他该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迫切地感到要彻底斩断这种无爱的关系，于是开始寻找采取主动的机会。他恳求上帝让萨拉·诺列加允许他留下来过夜，好让他有机会说“不”，有机会告诉她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为此，她上完发条后，他让她坐到自己身边来。可她却宁愿和他保持距离，坐在客厅的安乐椅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蘸了白兰地的食指伸过去让她吮吸，以往前戏时，她总喜欢这样。她却避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人。”

自从被费尔明娜·达萨拒绝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学会了始终把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处于如此尴尬的局面，他一定会继续进攻萨拉·诺列加，当晚的结局定是和她滚在床上，因为他坚信，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睡过一觉，那么，只要他想，并且懂得如何打动她，她便会一直和他睡觉。基于这个信念，他什么都曾忍受过，哪怕在最为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能看淡一切，只要不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女人就行，无论哪个女人。然而这一晚，他受到了如此的侮辱。他一口咽下白兰地，尽一切可能表达他的怒火，然后没有告别便扬长而去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同萨拉·诺列加在一起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为持久和稳定的一段关系，虽说并不是他那五年中唯一的关系。他发现自己虽然在她身边感觉也挺不错，尤其是在床上，但她始终无法取代费尔明娜·达萨，于是他夜晚孤独狩猎的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分配得井井有条，以让它们物尽其用。但无论如何，萨拉·诺列加曾一度奇迹般地减轻了他的痛楚。至少现在，他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也能正常生活了，不像从前，常常要随时放下手中的事，凭着自己的猜想

四处去寻找她的踪迹，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些最不可能的街道，以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虚幻之地，只要一刻见不到她，他内心的渴望便一刻不能停歇。如今，与萨拉·诺列加的决裂，让他那沉睡的思念又苏醒了，他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小花园的下午，回到了那永无止境的阅读中去，而且这一次，思念更加浓烈，他迫切地意识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必须死掉。

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他生来就能让寡妇幸福，而寡妇也能让他幸福，对此他从不苦恼。恰恰相反，他时刻待命。在一次又一次孤独的狩猎行动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对她们了如指掌，并最终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曾看见她们在丈夫的尸体前痛苦得发疯，恳求别人把自己也放入同一口棺木，活活埋入地下，以免独自面对前路无法预知的苦难。可随着她们接受了现实，适应了新的境况，人们就会看到她们从尘土中站起来，获得新生。起初她们像阴影中的寄生虫一样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向女仆们倾诉着心声，整日赖在枕头上：当了那么多年无所事事的囚徒，她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为了打发绰绰有余的时间，她们为死者的衣服钉上以前从来没有时间去钉的扣子，把他们的衬衫熨了又熨，还给袖口和领口上蜡，让它们时刻保持完美。她们继续为死去的丈夫在浴室放上香皂，在床上铺好带有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床罩，在餐桌他们的位置上摆好餐具，以防死者说不定什么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就回来了，就像他们生前常做的那样。但当她们独自去望弥撒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为自己意愿的主人，当初，为了换取一种安全感，她们不仅放弃了自己家庭的姓氏，甚至放弃了自我，可那种安全感不过是她们做姑娘时许多幻想中的一个罢了。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男人—尽管他或许也爱着她们—给她们带来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她们不得不照顾他们直到最后一口气，喂他们吃喝，给他们换下脏兮

兮的尿布，用母亲式的巧妙花招哄他们开心，以减轻他们清晨走出家门去直面现实的恐惧。可当看到他们受自己的鼓动离开家门，准备一口去吞掉整个世界时，她们又开始害怕男人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生活。而爱，如果真的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种生活。

然而，在孤独中休养生息时，寡妇们发现，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它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再没有人跟她们争一半的床单、一半的空气和一半的夜晚，甚至身体也终于能尽情做属于自己的梦，能自然而然地独自醒来了。在偷欢过后的清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们望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身上裹着黑纱，厄运的乌鸦从她们肩上飞过。一旦她们在晨曦中隐约看见他的身影，便会迈着小鸟般的碎步，穿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因为单是从一个男人身边走过也会玷污她们的清誉。然而他坚信，一个忧伤的寡妇比其他任何女人心里都更可能藏着幸福的种子。

从拿撒勒的寡妇开始，他一生中结识了太多寡妇，这让他懂得在丈夫死后，一个女人会变得多么幸福。多亏了她们，之前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单纯幻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他可以触摸到的可能性。他想不出费尔明娜·达萨有什么理由不像其他寡妇一样，因生活的锤炼而变得可以欣然接受他，而不必为死去的丈夫感到虚妄的自责。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去发现另一种双重的幸福，怀着一份能将每时每刻都变成生命奇迹的寻常之爱，以及另一份只属于她一个人、因死神的豁免而出淤泥不染的爱。

但事实上，他哪怕只是去怀疑一下费尔明娜·达萨距离他这些如意算盘有多么遥远，或许就不会如此热情高涨了：结婚那时，她才刚

刚隐约望见地平线上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在向她招手致意—除了挫折。在那个年代，富有有很多好处，当然，也有很多坏处，但半个世界的人都对它梦寐以求，认为它是获得永生的最可能的途径。费尔明娜·达萨当初在某种乍现的成熟之光中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很快，她就因遗憾与负疚感到了痛苦，但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那时，她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理智让她做出了那样高瞻远瞩的决定，但多年以后，当她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不知怎的，在一次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然谈话中，她突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有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都知道他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加勒比河运公司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十分肯定曾见过他多次，甚至还和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记得清他是什么模样。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了潜意识中阻碍她爱他的原因。她说：“他就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的确如此：他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的影子。然而，就在她抵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一个恰恰相反的男人的纠缠时，她却感到自己被负罪感的幽灵所折磨：这是她唯一无法承受的感觉。当它来袭时，她整个人都被惊恐笼罩着，只有找到某个能帮她减轻良心谴责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情绪。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她在厨房打破盘子，有人跌倒，或她的手指被门夹到时，她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赶忙指责他：“都是你的错。”虽然事实上她并不在乎到底是谁的错，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无辜—只要把这种无辜从言语上确定下来就足够了。

这个弱点是如此明显，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发现了它对自己家庭的和睦具有何等威胁，所以每当他隐约看见它时，就赶紧对妻子说：“别担心，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没有什么比妻子突如其来的果敢决定更让他害怕了，而且他确信，这种决定的根源往往是某种负罪感。然而，拒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带来的彷徨，绝非几句

安慰就可以解决。有好几个月，费尔明娜·达萨总是在早晨打开阳台的窗子，思念着那个在空荡荡的小花园里窥视她的孤独幽灵。她望着那棵属于他的树，望着那条最不起眼的长凳，他曾坐在那里，一边想她一边读书，为她备受煎熬。接着，她又不得不关上窗，感叹道："可怜的人。"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为时过晚，她甚至还为他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能收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她不得不正视自己嫁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决定时，她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事实上，她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信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像他那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她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她的彷徨，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反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和洛伦索·达萨一心想为女儿选择的理想男人太像了，都不仅仅是酷似—简直如出一辙。不可能不把他看作父亲密谋的同伙，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自从看见他第二次不请自来为她看病，费尔明娜·达萨就认定了他与父亲相勾结。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谈过之后她更加迷茫了。表姐由于自己也是爱情的受害者，于是更倾向于认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忘记了洛伦索·达萨让她来是为了给乌尔比诺医生说好话的。只有上帝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做出了多大努力，才没有在表

姐去电报室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陪她一起去。她的确想再见他一面，与他当面对质以消除疑问，和他单独聊一聊，深入地了解他，以确认她冲动的决定不会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在和父亲单打独斗的战争中俯首投降。但她最终还是投降了，在她人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丝毫没有考虑那位追求者的男性魅力、他传说中的财富、他的年轻有为，以及他那许多实实在在的美德中的任何一项，而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发现二十一岁已迫在眉睫时慌了手脚。二十一岁在她心里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个关键时刻足以让她按照上帝和凡人的戒律做出并承担自己的决定：至死不渝。于是，一切的疑虑都烟消云散，她毫无内疚地做出了理智指示她做的最体面的事：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她唯一允许自己做的是和往日一样的一声深深叹息，最后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是从新婚旅行刚一回来开始的。他们才刚打开箱子，拆开家具包装，掏空她为胜任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女主人和夫人角色而带回来的那十一只盒子，她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这让她险些晕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还和一个没法指望的男人关在一起。她用了六年才逃脱出来。那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六年，婆婆布兰卡夫人的刻薄和小姑子们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而如果说她的小姑子们竟没有活活腐烂在修道院的囚室里，那是因为她们已经把囚室带入自己的内心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甘愿屈从于家族礼教，对她的恳求置若罔闻，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无限的适应能力定会将事情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

念的人注入希望。的确如此：这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在将近四十年中都是她那个社交天堂里的灵魂和主体，然而，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变得懈怠，刻薄，与所有人为敌。对于这种蜕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便是她怨恨丈夫明知故犯地为一群黑人牺牲了性命，而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活下去。不管怎样，费尔明娜·达萨幸福的婚姻生活仅限于新婚旅行的那段日子，而那个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吓得浑身瘫软。是他，费尔明娜·达萨把这个套住她的死亡圈套全部归咎于他，而非那几个愚蠢的小姑子和那位半疯的婆婆。但已经太晚了，她到此时才怀疑，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

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的身体里滑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了某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而当接生婆把活生生、浑身沾满油脂和血污、脐带还缠在脖子上的婴儿抱给她看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感情，这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孤独的侯爵府邸，她学会了认识他，母子俩相互熟识了，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意。最终，在这个给她带来不幸的家里，除了儿子以外，她无法忍受任何事、任何人。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花园，以及整日在那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巨大房间里消磨时间，这一切都让她窒息。在没有尽头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就要被隔壁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击垮了。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作晚餐，这种习惯让她感到羞耻。她诅咒每日下午的玫瑰经祷告，诅咒餐桌上

的矫揉造作，诅咒众人对她无休止的批评：批评她拿刀叉的方式，批评她像街边女人一样卖弄风情地大步走路，批评她穿得像马戏团里的人，甚至还批评她像乡巴佬一样粗鲁地对待丈夫，以及给孩子喂奶时没有用披肩遮住胸口。当她第一次按照英国最新的时髦做法，邀人下午五点来家里喝茶，款以皇家饼干和花香蜜饯时，布兰卡夫人就出来反对在她的家里喝那些发汗时当药用的饮品，认为应该喝巧克力，配烤奶酪和木薯面包圈。甚至连她做的梦也逃不过她的指责。一天早上，费尔明娜·达萨说自己梦见一个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侯爵府邸的大厅里走来走去，还一把一把地撒灰。

“正派女人不会做这种梦。”

除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一是每天的食谱里都有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布兰卡夫人为了尊重死去的丈夫不肯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明娜·达萨则拒绝吃。从小时候起，在还没有尝过之前，她就讨厌茄子，因为她总觉得它的颜色像毒药。只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她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五岁时，她曾在餐桌上说过同样的话，而父亲则强迫她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时她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先是因为她把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接着又因为大家为了医治她而强迫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两样东西，不仅因其味道，更因她对毒药的恐惧，在她记忆中被混作同一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邸令人作呕的午餐中，她不得不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回想起蓖麻油造成的那种令人全身发凉的恶心。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竖琴。一天，布兰卡夫人说：“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这很显然是有的放矢。但这次连她的儿子都表示反对，因为他最好的那段童年岁月就是在苦役

般的钢琴课上度过的，尽管成年后他对此心存感激，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也遭受同样的刑罚，她才二十五岁，而且又个性十足。但他从母亲那里唯一争取到的，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并且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理由，即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他们从维也纳弄来一把精美无比的竖琴，看上去就像金子做的，声音也像。它后来成了城市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直到这座博物馆连同里面的一切被一场大火吞没。费尔明娜·达萨屈从于这项奢侈的刑罚，尽力用最后的牺牲避免与婆婆冲突。她先是师从一位特意从蒙波斯城请来的顶级大师，可十五天后他竟突然去世了。之后，她又跟着神学院最好的乐师学了好几年，这位老师掘墓人般的气质让她的和弦都走了音。

她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虽然内心深处，以及在和丈夫以前用来相爱如今却用来无声地争吵的时间里，她始终都不曾承认这一点，即她已陷入这个新世界里常规与偏见的乱麻之中，比她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她常爱用一句话来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让扇子见鬼去吧，现在已经是微风的季节了。”但后来，她开始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特权，开始惧怕丢脸和别人的嘲弄，于是表现出准备承受一切的样子，甚至包括屈辱。但她心中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上帝最终能怜悯布兰卡夫人，应答她在祈祷中孜孜不倦地恳求上帝赐她一死的要求。

乌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它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

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人结婚时是没有爱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

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她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他的妹妹们疯疯癫癫，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如果她在他洗澡时走进浴室，他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她为他擦香皂。而她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人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心软，无声地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了。”有时，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襟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

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她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主人。她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乌尔比诺医生

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后，女人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祸不单行，费尔明娜·达萨不得不在她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她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召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得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嫁人后，他一直这么叫她—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费尔明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她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她把自己关在浴室中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她是在为父亲而哭。

这对夫妻最为荒谬的是，在那段不幸的岁月里，他们在公众面前却表现得无比幸福。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战胜周围隐藏的敌意，取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人们不甘心接受他们的那副样子：与众不同，行事新派，从而与传统秩序格格不入。不过，这对于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却是手到擒来的事。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她了解之前曾让她有过许多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词，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致互相杀戮。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她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它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自从拖着没有尽头的新娘头纱，步入社交俱乐部宽阔的大厅时，她就突然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厅里弥漫着无数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华尔兹乐曲绕梁飞旋，男人们汗水涔涔，女人们浑身颤抖，他们看着她，不知如何才能清除这个外部世界来的令人眩晕的眼中钉。所有这一切让空气变得稀薄。她刚刚年满二十一岁，除了去学校，几乎没有出过家门，但她仅仅环顾了一眼，便明白她的对手并非因仇恨而生出胆怯，而是因惧怕而茫然无措。她没有继续吓唬她们，而是大发慈悲，帮助她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出乎她的意料，就像她对那些城市的看法一样，她没有觉得哪座更好或哪座更糟，它们只是和她心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比如巴黎，尽管那里阴雨连绵，尽管那里的店主个个贪吝，车夫个个粗鲁，她仍将永远在记忆中把那里当作人间最美的城市，这与它实际是否如此毫不相干，而只是因为它与她最幸福岁月的回忆紧密相连。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手段更为机敏也更加堂皇。没有什么事少得了他们的参与：市民郊游、花会、艺术活动、慈善抽奖、爱国演出，乃至第一次气球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永远是活动的发起者，且永远身先士卒。在他们那些

不幸的岁月里，任谁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比他们更幸福，有哪对夫妻比他们更般配。

父亲留下的房子成了费尔明娜·达萨逃避那座令人窒息的家庭宫殿的避难所。一离开公众视线，她便悄悄躲到福音花园。她在那里接待新朋友，会会学校和图画课的老朋友，以此作为不忠的某种纯洁的替代品。她会像独身母亲似的平静地度过几个小时，细细咀嚼儿时的回忆。她又买了香乌鸦，还从街上捡回了几只猫，把它们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照料。此时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已经年迈，而且因为风湿行动有些不便，却满怀着重建这个家的热情。费尔明娜又重新启用了缝纫室。在这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这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试图窥测她的内心。于是，她把缝纫室当成了回忆过去的圣地。一个冬季的下午，她赶在暴风雨呼啸而至之前去关阳台的窗子，竟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小花园杏树下的那条长凳上，穿着那件改小了的父亲的礼服，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看见的，并非之前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偶遇他时的模样，而是他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多年前的模样。她害怕那是死神送来的通知，伤心不已。她竟对自己说，也许和他在一起她会更加幸福，和他单独待在这所她以爱为他整修的房子里，就像他也以同样的爱为她整修了房子一样。单是这个假想就让她大惊失色，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到了何种程度。于是，她打点起最后一丝力气，逼迫丈夫不再闪烁其词，与她面对面地争吵，并和她一起为失去的天堂痛哭，直到听见最后一次鸡鸣，曙光照进绣花的窗帘，太阳灼烧起来。丈夫因说了太多话而脸庞肿胀，因没有睡觉而筋疲力尽，因哭得太多而心坚意决。他系紧靴带，又扎紧腰带，束紧一个男人所剩下的全部，对她说，行，亲爱的，咱们去寻找在欧洲丢失的爱情：明天就走，不再回来。他决心坚定，和他的资产总代理—财富银行达成了协议，立即清

算丰厚的家产，它们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种生意、投资、神圣债券和长期债券中，只有他自己清楚它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够他们衣食无忧而已。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变卖成刻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转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他和妻子在这片无情的国土上连手掌大的葬身之地都不剩为止。

但与她猜想的不同，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活着。当她和丈夫、儿子乘着金色四轮马车到达法国远洋轮船的码头时，他就在那里看着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与他曾无数次在公共庆典上看见他们的样子分毫不差：依旧是那么完美无瑕。他们带着儿子同行，从那男孩现在的教养便能看出，他成年后将会是什么模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帽致意：“我们要去远征弗兰德。”费尔明娜·达萨向他点了点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下帽子，微微鞠躬。她看着他，对他那过早谢顶的惨状没有半点同情的表示。他就像她所看见的那样，是某个她从不认识的人的影子。

那段日子也不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走运的时期。工作日益繁重，对偷欢之事也日益厌倦，岁月蹉跎。此外，特兰西多·阿里萨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丧失了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有几次，她转向儿子，看着他坐在椅子上看书，吃惊地问道：“你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如实回答，但她又会立刻打断他。

“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她问他说，“我是谁？”

她已经胖得不能动了，整日待在杂货铺里，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她在第一遍鸡叫时便起床，然后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她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涂上口红，在脸上和胳膊上擦上粉，然后逢人就问自己打扮得怎么样。邻

居们都知道她永远只期待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这是从童话里偷借来的身份，却是唯一能让她满意的答复。她继续摇晃着身子，扇着一把粉红色大羽毛做的扇子，直到把一切再从头来过：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涂在眼皮上，涂上口红，脸上擦上一层干硬的铅白粉。她又一次问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我打扮得怎么样？”当她成了邻居们的笑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夜之间拆掉了这间古老杂货铺的柜台和所有带抽屉的柜子，封死了朝街的大门，并按母亲的描述，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从此，她再没问过别人她是谁。

他听从莱昂十二叔叔的建议，找了个上年纪的女人照顾母亲，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睡的时候总是比醒的时候多，有几次她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出办公室便回家，直到把母亲哄睡着为止。他不再去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去见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常会面的老相好，因为自从和奥林皮娅·苏莱塔那段可怕的交往后，他内心深藏的某种东西起了变化。

那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当时正赶上十月那几场让我们休养生息的暴风雨中的一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把莱昂十二叔叔送回家，就从车里看见一个娇小灵巧的姑娘，身上穿着一身满是荷叶边、像极了婚纱的薄纱衣裳，惊慌失措地从马路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因为狂风掀翻了她的雨伞，卷着它在海边飞来飞去。他把她救上车，掉转车头，送她回了家。她家是一座小教堂改建的，依海而立，从街上就能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鸽子屋。路上，她告诉他自己刚刚嫁给一个在市场卖日用品的商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公司的船上见过这个人很多次，见他卸下一箱箱各式各样的旧货来卖，还有一大群鸽子，装在一个藤条编的笼子里，就像那些内河船上的母亲用来放新生儿的笼子一

样。奥林皮娅·苏莱塔看上去就像来自胡蜂家族似的，不只因为她那上翘的屁股和娇小的上半身，而且因为她的全部：如铜丝一般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两只活泼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的都大些，声音尖细，恰好适合她那机智有趣的谈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与其说她诱人，倒不如说她滑稽，送她到家后，他很快就把她忘了。她和丈夫、公公以及其他几个家庭成员一起生活。

几天后，他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一回他正往船上装货，而非卸货。船起锚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清清楚楚地听到耳边响起了魔鬼的声音。那天下午，送莱昂十二叔叔回家后，他佯装偶然路过奥林皮娅·苏莱塔家，从围墙外看见她正在喂那群乱哄哄的鸽子。他隔着墙从车上冲她喊道：“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说：“不卖。”他又问：“那怎么才能得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答道：“在大雨天碰见养鸽子的女人，用车把她送回家。”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回家时，带着一份奥林皮娅·苏莱塔道谢的礼物：一只腿上拴着金属环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同样是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养鸽女看见送出去的鸽子又回到了鸽子屋。她以为是它偷跑回来的。可当她抓住它检查时，发现金属环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求爱信。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留下字迹，却绝非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出于谨慎没有签名。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时，一个街上的小孩把装在笼里的那同一只鸽子交给他，并带口信说，是鸽子夫人让他来的，并让他嘱咐一声，请用笼子把它关好，否则它还会飞走，而这是她最后一次把它送回来了。他不知道对这一切应作何解释；或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或许是养鸽女在装糊涂，又或许她把鸽子送来是

为了让他再送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按理说她应该在送鸽子的同时附上一封回信。

星期六早晨，思来想去之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派鸽子送去了一封没有签名的信。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就由同一个小孩把装在另一只笼子里的鸽子送了回来，并捎来口信说，前天把它送回来是出于礼貌，而这一次是出于遗憾，但如果他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会再送回来了。特兰西多·阿里萨逗鸽子玩到很晚，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臂弯里，冲它咕咕叫，还试图哼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脚上的金属环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接受匿名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狂喜地读完纸条，仿佛回到初次冒险的高潮。那晚，他几乎无法入睡，心情烦躁地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在去办公室之前，他再一次放飞鸽子，它身上带着一封清清楚楚签着他名字的情书，除此之外，他还在金属环上别了一枝他花园中最新鲜、最火红、最芬芳的玫瑰。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纠缠了三个月后，美丽的养鸽女仍旧还是那个回答：“我不是那种女人。”可她从没有拒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来信，也会去赴那些他安排好的貌似偶然的约会。他与以往判若两人：这个从不露面的情人，这个对爱情如饥似渴却又极其悭吝的人，这个从不付出、又想得到一切的人，这个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心里留下足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竟然跑到大街上，狂热地送出了一封封署名的情书，一件件殷勤的礼物，毫不谨慎地一趟趟跑到养鸽女家里去，甚至有两次是在她丈夫既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去市场的时候。从最初猎艳以来，这是他唯一一次感到自己被爱情之箭射穿了。

邂逅六个月后，他们终于在码头边一艘正在重新油漆的内河船的舱室里私会了。奥林皮娅·苏莱塔的爱欢喜愉悦，是活泼的养鸽女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处在一种缓慢的休憩状态之中，这种休憩对她来说就像爱情一样，同样是柔情蜜意的。舱室已被拆得七零八落，油漆才刷了一半，松节油的味道很适合留存在一个幸福下午的回忆之中。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灵机一动，打开一罐从简易床上触手可及的红油漆的盖子，用食指蘸漆，在美丽的养鸽女的小腹上画了一个朝下的箭头，并在肚皮上写下了一行标牌似的字：这小东西是我的。当晚，奥林皮娅·苏莱塔忘了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掉衣服。丈夫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她穿睡衣的时候，到浴室取来刮脸用的刀子，一刀割断了她的喉咙。

很多天以后，在逃的丈夫被捕，向报界讲述了他犯罪的缘由和方式，直到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知道养鸽女被害的事。很多年里，想起那些署了名的信，他都提心吊胆，并且默默地计算着罪犯的刑期。由于船上的生意，那人对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怎么怕他给自己的脖子来上一刀，也不怕传出丑闻，而是怕运气不好，让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他的不忠。就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多·阿里萨的那个女人由于一场不合季节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耽搁得久了些，回来时，发现特兰西多·阿里萨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像往常一样把脸涂得花里胡哨，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挂着坏笑，以至于这位保姆两小时以后才发现她死了。不久前，她把埋在床下的那几个财宝罐里的黄金和宝石分给了街坊四邻的小孩，告诉他们可以当糖果吃，其中几件最值钱的如今已经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葬在了古老的“上帝之

手”庄园，也就是当时的“霍乱墓地”，还在她坟前种下了一丛玫瑰。

头几次去墓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娅·苏莱塔葬在很近的地方，没有墓碑，但有人在坟上的水泥板未干之前，用手指刻下了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不禁毛骨悚然地想，那一定是她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的时候，只要四周无人，他就摘下一枝放在她的墓前。后来，他干脆从母亲的玫瑰丛中挖出一株，种到她的坟前。两丛玫瑰发了疯似的越长越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带一把大剪子和其他园艺工具来修枝剪叶。但玫瑰的长势渐渐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多年以后，两丛玫瑰已如杂草般在一座座坟墓间蔓延开来。从此，这座著名的霍乱墓地改叫“玫瑰墓地”，直到一位不具民间智慧之现实性的市长，一夜间铲除了所有的玫瑰丛，在墓地入口的拱门上挂起一块政府的牌子，上面写着：“普世公墓”。

母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陷入疯狂的困境：到办公室上班；按照严格顺序与各个长期情人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继续阅读爱情小说；星期天到墓地去凭吊。生活规律得仿佛生了锈一般，既让人轻蔑，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让他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然而，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当墓地的玫瑰丛已经战胜了修枝的大剪子，几只燕子停在为通电灯而刚刚架起的电线上时，他蓦然间发现，母亲去世后竟已过去了这么多年，距离奥林皮娅·苏莱塔被杀，则过去了更多年，而距离那个遥远的十二月下午，费尔明娜·达萨给他回信说“可以”，并说“会永远爱他”，更不知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在这之前，他活得就仿佛时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流走，而只是在他人身上留下痕迹似的。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他在街上碰见了因他写的情书而终成眷属的那许多对恋人中的一对，他

甚至没有认出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自己的教子来。他用一句人们惯用的惊呼缓解了尴尬：“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尽管身体已向他发出最初的警告，但他依然故我，因为在容易生病的人堆儿中，他的身体就像是铁打的。特兰西多·阿里萨常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在记忆混乱之前，她就已经把霍乱和相思病混为一谈了。但不管怎样她都错了，因为她的儿子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尽管医生说那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后来都只是因治疗不力又反复发作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腹股沟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疣病和六次股癣，但无论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都绝不会把这些当作疾病，而只会把它们当成战利品。

刚满四十岁，他就不得不因全身上下莫名其妙的疼痛去看医生。做了很多次检查后，医生都只对他说：“年岁不饶人啊。”但他每次回家，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过去唯一的参照点就是与费尔明娜·达萨短暂的爱情，只有和她相关的事才能让他找到岁月的支点。所以，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的那个下午，他从最久远的记忆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回顾了一桩桩猎艳的情事，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曾跃过的无数处暗礁，以及种种数都数不清的往事，而这一切皆由他那刻骨的决心而起：他誓要让费尔明娜·达萨属于他，而他也属于她，这个决心高于一切，所向披靡。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已经过去了。五脏六腑的一阵寒战传遍他的全身，他眼前一黑，不由得松掉了手中的园艺工具，靠在墓地的围墙上，这才没有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

“见鬼，”他惊恐地自言自语道，“都已经三十年了！”

的确如此。当然，对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同样也过了三十年，但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也最舒心的三十年。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那

些可怕日子已被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她住在拉曼加的新房子里，成了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同丈夫和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如果再让她选一次，她还是会从世间所有的男人中选中她的丈夫。儿子在医学院里延续着家族传统，女儿则长得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有时连她都糊涂了，好像自己重生了似的。在那次誓不回来在无尽的惊恐中度日的倒霉旅行之后，她又去过欧洲三次。

上帝一定是听到了某人的祈祷—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刚刚开始从废墟中寻找爱情的碎屑时，一封半夜到达的电报惊醒了他们：布兰卡·乌尔比诺夫人病重。另一封传达死讯的电报接踵而至。他们即刻赶了回来。费尔明娜·达萨身着一袭丧服下了船，宽大的衣服已不足以掩饰她的身形。没错，她又怀孕了。这个消息造就了一首民间歌谣的诞生，歌词并无恶意，只是有些打趣，其中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美人在巴黎究竟有何秘密，每每回来都喜得贵子。虽然歌词鄙陋，但直到很多年后，在社交俱乐部的节日庆典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都会点这首曲子，以示自己的风趣大度。

关于远近闻名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及其家族徽章，向来没有准确的记载。府邸先是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给了市财政厅，而后一位荷兰学者在那里进行了挖掘工作，试图证明那里是哥伦布真正的坟墓—已是迄今发现的第五座了—所在，于是，它又以巨额价格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妹妹们住进了萨勒斯修道院，没有发愿，却过着隐居生活。费尔明娜·达萨一直住在父亲的老房子里，直到拉曼加的别墅修建完毕。她步伐坚定地踏入新宅，一搬进去就开始当家做主。她带去了新婚旅行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以及这次和好之旅后又叫人运来的补充物件。从第一天起，她就在屋子里塞满了自己亲自到

安的列斯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珍禽异兽。她挽着重修旧好的丈夫，带着茁壮成长的儿子和回来四个月后降生、取名为奥菲利娅的女儿，搬进了新居。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自己已无法找回新婚旅行时那个完整的妻子了，因为他希望得到的那部分爱已被她连同她的大好青春一起给了儿女们。但他学会了享受爱的残羹，并从中得到幸福。朝思暮想的琴瑟和谐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实现了。一次晚宴中，侍者端上了一道费尔明娜·达萨认不出是何物的美味佳肴。她吃完了一大份，喜欢之极，又要了同样的一份，正当她感到遗憾，碍于惺惺作态的文明礼仪不便再要第三份时，竟得知自己刚刚怀着毫无顾虑的喜悦吃下去的满满两大盘美食全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认了输：从那时起，在拉曼加别墅，三天两头就端上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频繁程度堪比曾经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而且每个人都脾胃大开。以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的闲暇时光常常津津乐道，说他真希望自己再生一个女儿，为的就是给她取一个定会让全家都开心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到那时，费尔明娜·达萨才明白，私生活跟社会生活恰恰相反，是变化无常、不可预见的。要找出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真正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再三分析后，她还是更喜欢孩子，因为孩子的想法更加真实。她的人生才刚迈入成熟，刚刚摒弃了形形色色的海市蜃楼，便又隐隐伤感起来，因为她始终没有成为自己年轻时住在福音花园里所憧憬的样子，而是成了这副甚至自己都一直不敢承认的模样：一个华贵雍容的女仆。在社交圈里，她最终成了最受爱戴，最心满意足，但也因此最为胆怯的女人。然而，没有什么让她比在治家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也没有什么比这方面更让她对自己的疏忽无法原谅。她一直觉得她的生活是从丈夫那里租借来的：她是这个辽阔的幸福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但这个帝国是丈夫建造的，且仅为他自己

而建。她丈夫爱她胜过一切，胜过世间所有的人，但这也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是他的神圣义务。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她，那就是一日三餐的永久刑罚。因为它们不仅仅必须按时，而且必须完美无瑕，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但同时却又不能去问他。而如果她真的问了—依照着那无数条仪式性的家庭礼节中的一条—他就会看着报纸，连眼皮也不抬地回答说：“随便什么都行。”他说的是真心话，而且和颜悦色，自认为没有哪个丈夫比他更好商量了。可到了吃饭的时候，“随便什么”就不行了，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不能有半点瑕疵：肉不能有肉味儿，鱼不能有鱼味儿，猪肉不能吃出疥疮似的腥味，鸡肉不能吃出鸡毛的味道。即便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惜代价地为他找来，为的是让他能在自己尿液的芬芳气息中怡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中难以安抚的主角。只要稍有怀疑，他就会把桌上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没有用爱来做。”在这方面，他的灵感真是鬼使神差。有一次，他刚尝了一口甘菊茶，便把它推到远处，只说了一句：“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仆们都大吃一惊，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水煮窗户，她们尝了尝那壶茶，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还真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丈夫：从不会捡起地上的任何东西，也从不关灯，不关门。黑暗的清晨，如果他发现衣服上缺了一颗扣子，她便会听见他说：“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每天，当他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冒着热气的汤时，都要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大家对此已经不感到害怕了，接着他会长叹一声：“等我有一天离开了这个家，你们要明白，那是因为这种烫嘴的日子我过够了。”他说，只有在他服用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日子里，她们才

把饭菜做得格外香，格外出色。他坚信这是妻子对他的背叛，以至于最后只要妻子不肯跟他一同吃泻药，他就坚决不吃。

他的不通情理让她十足厌烦，于是在生日那天，她向他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由他掌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果真从天一亮便开始掌权。他张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却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了牛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开始准备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宴，并吩咐收拾屋子。他努力想比她操持得更好，但不到中午就不得不投降了，脸上没有丝毫愧色。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而女仆们也从中取乐，任由他每次为了找一样东西把所有都翻遍。十点钟时，还没决定午餐吃什么，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甚至连卧室都没有收拾完，卫生间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还忘了派司机去接孩子。他把女仆们的职责全搞混了：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床铺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担起了指挥的职责。她笑得要死，但并不像之前期望的那样感觉到胜利的得意，而是为丈夫在管理家务方面一无是处感到同情，这让她自己也很震惊。他为自己所受的重创叹了口气，找了个常用的理由来辩解：“至少，我管家不会比你给人治病差。”不过，这次的教训是有益的，而且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殊途同归地得出了明智的结论，那就是：换一种方式，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下去，换一种方式，他们也无法继续相爱—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

在新生活的全盛时期，费尔明娜·达萨在不同的公众场合见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且见得越是频繁，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已经学会了看见他时表现得自自然然，以至于不止一次因为心不在焉

而忘了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他在CFC公司步步为营而又势不可挡地扶摇直上，这已成了商界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她看到他改善了自己的言行和仪态，他的胆怯被过滤成了一种神秘的清高，微微发福的身材很适合他，岁月只留下了缓慢的痕迹对他很有利，而他也懂得如何体面地去打理他那惨不忍睹的谢顶。唯一挑战时代和潮流的是他阴郁的穿着：过时的礼服外套，始终不变的一顶帽子，母亲杂货铺里卖给诗人的那种窄条领带，还有那把阴沉的雨伞。费尔明娜·达萨逐渐习惯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看他，终于不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花园、在卷着黄色落叶的大风中为她哀叹的忧郁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了。但不管怎样，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慢慢减轻她的罪责。

然而，就在她以为已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掉的时候，他又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成为她怀旧思绪中的一个幽灵。那是衰老刚刚显露征兆的时期，每当听到下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不可弥补的事。那孤独的、石头般冷酷、准时准点的雷声给她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十月里的每天下午三点，雷声在维利亚奴埃瓦山上响起，往日的记忆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历历在目。新的记忆几天后就会在脑海中模糊，而在伊尔德布兰达家乡省份的那次传奇之旅却越来越清晰，一切宛如昨日，怀旧之情将记忆渲染得清晰得邪门。她还记得那个坐落在山上的名叫马纳乌雷的小城，记得城中唯一的那条笔直而翠绿的街道，记得那些象征吉祥的鸟儿，还有那座可怕的房子，在那里，她每天都穿着被佩特拉·莫拉雷斯的泪水浸湿了的睡衣醒来，多年以前，这个女人正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为爱殉情。她还记得当时那番石榴的味道，如今再也找不回来；她记得那预示着山雨欲来的紧密雷声，最后和嘈杂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她还记得在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的那一个个如黄玉般金光闪耀的下午，她和那一群兴高采烈

吵吵闹闹的表姐妹出去散步，走近电报局时，她咬紧牙，生怕自己的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最终还是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少年时代的回忆所带来的痛苦，无法忍受站在阳台上看见那凄凉的小花园，无法忍受炎热的夜晚栀子花散发出的神秘芳香，也无法忍受回忆起那个决定她命运的二月下午，那张古老贵妇的照片所带给她的恐惧。无论她把那时的记忆转向哪里，都会迎头碰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可她始终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分辨出那并非对爱的回忆，也不是对后悔的回忆，而是对一个曾使她泪水涟涟的痛苦形象的回忆。她没有发觉，她正被同情的陷阱威胁，而正是这同样的陷阱，让那么多毫无准备的受害者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里失去了贞洁。

她倚仗着她的丈夫。而此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他不幸比她年长十岁，正独自跌跌撞撞地走在暮年的大雾之中，而更不幸的是，他是个男人，比她更为脆弱。他们终于彻底了解了对方，在结婚将近三十年时，他们变得好似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常常因为对方猜出自己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或者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荒唐事件而感到不悦。他们一起克服日常生活的误解，顷刻结下的怨恨，相互间的无理取闹，以及夫唱妇随的那种神话般的荣耀之光。那是他们相爱得最美好的时期，不慌不忙，适宜得体，对于共同战胜逆境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胜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了然于心，也更心存感激。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更多致命的考验，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到达了彼岸。

---

[1]此处暗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因偏爱运用唯美的天鹅形象，被称为“天鹅诗人”。

[2]圣胡安，即圣若望，传说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又译圣约翰。

[3]典出《旧约·约纳书》。约纳又译约拿。上帝曾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约纳，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说，虚构文学是约纳发明的，因为他迟了三天回家，并且让他老婆相信他的迟归是因为一条鲸鱼把他吞掉了。

[4]莱昂十二叔叔的名字Le ó n和莱昂娜的名字Leona在西班牙语中是同一个名词的阴阳变位，分别代表“公狮”和“母狮”。

为了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大家举办了一系列新颖的公众活动。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第一次气球旅行。这也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那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半城人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滩，观看刷有国旗颜色的巨大塔夫绸气球升空，它将把第一批邮件送往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三十里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曾见识过巴黎世博会上热气球腾空的激动场面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率先登上了藤制悬篮，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机械师和六位贵宾。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市政府的信函，信中极具历史意义地将这次飞行称为第一次空中通邮。《商业日报》的一名记者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如果他在此次探险中不幸罹难，最后的遗言会是什么。乌尔比诺医生没有丝毫迟疑，做出了一个定会为他招致无数骂名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对全世界来说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唯独在我们这里没有。”

气球徐徐上升，人们慷慨激昂地唱起国歌。被淹没在沸腾人群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十分赞同人群中某个人的话，即这种冒险对女人不合适，尤其是已经这把年纪的费尔明娜·达萨。但说到底，这件事也没那么危险。或者说，至少沉闷多过危险。气球在蓝得有些不真实的天空经过一段平静的旅行之后，毫无波澜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风向有利的和风中，他们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峦，然后又从无边无际的大沼泽上飞过。

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

他们从特洛哈斯·德卡塔卡的水上村庄上空飞过，那里的房子涂得五颜六色，到处是饲养食用鬣蜥的小棚，湖边花园里长着成串的凤仙和一簇簇的百合。听到人们的呼喊，几百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乱哄哄地跳入水中，有的是从窗子跳下来，有的是从房顶上，还有的是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他们如鲱鱼般潜入水中，打捞起一包包衣物，一瓶瓶大蜡烛木制成的咳嗽药水，还有救济食品，这些都是那位戴羽毛帽子的美丽夫人从气球的悬篮里抛给他们的。

他们从海洋般阴暗深邃的香蕉种植园上空飞过，园中的宁静像死亡的蒸汽一样上升到他们中间，费尔明娜·达萨想起自己三岁，又或许四岁时，拉着母亲的手在幽暗的树林里漫步的情景。那时的母亲，在一群和她一样穿着麦斯林纱衣、打着白色阳伞、戴着薄纱帽子的女人中间，也仿佛是个小姑娘。飞行机械师一直在透过望远镜观察地面，他对他们说：“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接着便把望远镜递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看到耕地上的牛车、从田野里穿过的铁轨和干涸的水渠，而目之所及，到处都有人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的各个村庄里肆虐。医生一边应答，一边继续用望远镜四处眺望。

“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挨了仁慈的一枪。”

不一会儿，他们飞过一片泛着泡沫的海水，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含硝的土地干裂开来，烫得如烈火一般。政府官员们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雨伞，没有其他任何措施抵挡骄阳。一些小学生随着进行曲的节奏挥舞着小旗；历年的选美皇后头戴金光闪闪的纸王冠，手捧着已被晒焦的鲜花；还有从加勒比沿岸最好的镇子—繁荣的盖拉镇请来的吹奏乐队。费尔明娜·达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自己的故乡看看，和她脑海中最久远的回忆对照一下，但因为霍乱的危险，谁也没有得到去那里的许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呈上了那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函，但它后来被错放到其他文书之中，最终下落不明。接下来，一行人差点在令人瞌睡的演讲中窒息。由于飞行机械师没能再次让气球升空，人们最后只好用骡子把他们送到老村城的渡口，那里是沼泽和大海的会合处。费尔明娜·达萨十分肯定自己很小的时候曾和母亲乘着一辆两头牛拉的木轮大车来过这里。长大后，她好几次向父亲提起，但父亲到死都固执地认为她不可能记得此事。

“那次旅行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的细节也都对，”父亲对她说，“但那至少是你出生前五年的事。”

三天后，气球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的港口。被整整一夜暴风雨摧残得狼狈不堪的他们像英雄一般受到欢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然也淹没在人群中，他从费尔明娜·达萨脸上辨出了惊恐的痕迹。但当天下午，他又在同样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展览上见到了她，此时的她已没有一丝倦容。她骑着一辆与众不同的脚踏车，但那更像是一件马戏团道具，前轮很高，后轮却小得出奇，看上去几乎难以支撑，而她就坐在前轮上，穿一条镶红花边的灯笼短裤，这让很多上了年纪的太太们议论纷纷，也让绅士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对她的车技，人人都由衷叹服。

这一幕，和这许多年来的许多幕一样，总会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面对命运的紧要关头时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然后又突然消失，在他心里留下焦急渴望的种子。它们标记着他人生的轨迹，因为他甚少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时间的残酷，却能在每一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从她身上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中感受到这一点。

一天晚上，他走进堂桑丘这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像往常一样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来。他每次来这里都只是独自坐上一会儿，简单吃些茶点。突然，他在餐厅尽头的大镜子中看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和丈夫以及另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边，从他这个角度正好能在镜中欣赏她那迷人的风姿。她举止自如，优雅地与众人交谈，笑声就像烟火一样，在晶莹的大吊灯下，她的美更加光彩夺目：爱丽丝再次走入了镜中。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屏息凝神，尽情地观察她，看她吃东西，看她抿了一小口酒，看她同第四代堂桑丘打趣。他坐在自己孤独的桌子前，和她共度她人生的片刻。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悄悄地在她贴身的禁区周围走来走去，之后他又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看见她与那群人一起步出餐厅。他们走过时，离他是那样的近，他甚至能从众女眷身上散发的香气中识别出她的味道。

从那晚起，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一直缠着那家餐厅的主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金钱或者人情，又或者这位店主一生最想得到的东西—只求他把那面镜子卖给自己。可这并非易事，因为老堂桑丘相信传说中的故事—这个出自威尼斯工匠之手的精美雕花镜框原是一对，另外那件曾属于玛利亚·安托瓦内特，现已没了踪迹：它们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珍宝。但最终，他还是让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镜子挂

到了自己家中，却并不是因为那镜框的精雕细琢，而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他爱恋的形象曾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她几乎总挽着丈夫的手臂，两人完美和谐地徜徉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之间，像暹罗猫那样惊人地灵活自如。唯有在同他打招呼时，夫妻俩才表现出分歧。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亲切热情，有时甚至会拍拍他的肩膀。而她则相反，对他仅限于彬彬有礼，不带丝毫个人情感，从未流露出任何细微的表情能让他隐约感到她尚记得自己年轻时曾与他相识。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力想要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她绝不会向前迈进一步，而是步步都朝着相反的方向。直到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斗胆设想，那种冷漠也许不过是抵抗恐惧的保护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当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船的命名仪式上突然想到这一点的，那也是他第一次作为CFC的首席副董事长，代表莱昂十二叔叔出席正式场合。这一巧合赋予了这次活动某种特殊的庄严意义。凡本城中稍有头脸的人物都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轮船的主厅忙着接待来宾，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熔化的沥青味。这时，码头上突然爆发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奏起了凯旋曲。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他的年纪一样老迈的颤抖，因为他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 从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间徐徐走来，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风采，如旧时的王后一般。人们从窗口撒下暴风雨般的彩带和花瓣，两人则挥手回应人们的欢呼。她是如此炫目，从脚上精致的高跟鞋，到颈上的狐尾围脖，再到头上的钟形帽，全身上下都闪耀着属于皇室的金色，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出挑。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省府要员一起在舰桥上迎候他们，周围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鞭炮声，轮船鸣了三声浑厚的汽笛，将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风度，向列队接待的人一一致意，令每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亲切有加：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省长夫妇，市长夫妇，然后是一位刚到任的来自安第斯地区的要塞长官。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身着黑色呢子礼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置身于如此众多的显赫人士当中，他几乎微不足道。费尔明娜向要塞长官问好后，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伸过来的手似乎迟疑了一下。长官预备为他们引见，就问她是否与他相识。她既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只是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把手伸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会再次出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向将其视为费尔明娜·达萨个性的表现。但就在那天下午，他发挥了无边的想象力，问自己这种残酷的冷漠会不会是一种掩饰，底下隐藏的其实是一场爱情的风暴？

仅仅是这样一个设想便使他旧梦复苏。他又开始在费尔明娜·达萨的别墅周围徘徊，怀着多年以前盘桓在福音花园时同样的渴望。但他心里盘算的并非是让她看见自己，而只是想看看她，知道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如今他要让自己不被人察觉是很困难的。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小岛上，一条绿色的运河把它同老城隔开。那里到处都是椰李丛，是殖民时期恋人们星期日的藏身之所。近几年，西班牙人建的老石桥已被拆除，新建了一座混合材料的水泥桥，上面还装了球形电灯，以便骡子轨道车通过。起初，拉曼加区的居民不得不忍受设计不周带来的折磨，睡在本市的第一座发电站旁边，那隆隆的震动声就好像地震在持续不断地爆发。就连调动了所有关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让它搬到不扰人的地方去。直到他那已被证明

的和全能上帝之间的同谋关系出面调停，才让事情转向他的一边。一天晚上，电站的锅炉爆炸，威力惊人，竟从一座座新建的房屋上空飞了过去，在空中穿过半座城市，最终摧毁了古老的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回廊。尽管那座破旧的建筑在本年初已被废弃，但锅炉还是造成了四人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当地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

那片宁静的郊区曾有着美妙的爱情传统，但自从它变成奢华的住宅区，对受阻的爱情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到处泥泞，整年都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房子淹没在树木繁茂的花园之后，过去那种伸出屋外的旧式阳台变成了镶嵌工艺的露台，仿佛故意要跟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所幸那个时期流行起午后租马车出游，用的是改装的单匹马拉的老式敞篷车，游览终点往往是一块高地，从那里可以欣赏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观看还要惬意，还可以看到悄悄游过来窥探神学院海滩的鲨鱼，而每星期四，白色的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几乎触手可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办公室忙碌一天后，总会租上一辆马车，但从不像人们在炎热的季节所做的那样折起车篷，而是始终独自躲在座位深处，藏在别人看不到的阴影里，而且为了不让车夫胡乱猜测，总是命令他驶向意想不到的地方。事实上，他在途中唯一感兴趣的，只有那幢掩映在枝繁叶茂的香蕉树和芒果树之间的粉红色大理石帕特农神庙，它仿佛是路易斯安那州棉花种植园的田园别墅走了样的复制品。费尔明娜·达萨的孩子们每天快到五点时回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他们乘着自家马车归来，之后又看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例行出诊。然而，他在那里转悠了将近一年，却没能看见半点自己渴望的征兆。

一天下午，尽管六月的第一场破坏性大雨倾盆而下，但他仍然坚持这种独自出行的习惯。马在泥泞中滑了一下，跌倒在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明娜·达萨家别墅的门前，他顾不上这种惊慌失措可能暴露自己，竟然恳求起车夫来。

“这儿不能停，求您了！”他对他喊道，“别的什么地方都行，就这儿不行！”

车夫被他催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而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急忙下车，忍受着羞愧，站在残忍的大雨中，直到乘别的车路过的人伸出援手，把他带回了家。他等在那里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仆见他浑身湿透，着及膝的泥水跑来跑去，于是给他送来一把雨伞，还请他到露台上去避一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即使在最狂妄的遐想中也从未料到自己能交上这等好运，但那个下午，他宁死也不愿让费尔明娜·达萨看见他那副狼狈的样子。

住在老城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一家每星期日总要步行到大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这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宗教习惯，不如说是社交习惯。搬家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仍旧乘马车去大教堂望弥撒，有时还会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和友人聚上一聚。但自从拉曼加区建起了教会事务神学院的礼拜堂，并拥有自己的海滩和墓地后，他们便除了一些极为隆重的场合，不再到大教堂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个变化毫不知情，在教区咖啡馆的露台上白等了好几个星期日，目送着三台弥撒的人走得一个不剩。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才改到新教堂去。在最近几年之前，新教堂一直都很流行。他在那里见到了带着孩子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八月的四个星期日他们都准时前来，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和他们一起。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日，他去参观教堂附近新落成的墓地，拉曼加区的居民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

奢华的坟墓。当他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发现那座最讲究的坟墓时，他的心抽搐了一下。墓已经建成，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竖立着大理石天使雕像，全家人的墓碑都以金字镌刻而成。自然，其中就有费尔明娜·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夫人的，紧邻她丈夫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一句墓志铭：共眠于上帝的平安中。

那一年的其他时间，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市民活动和社交场合，连圣诞节的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往年的圣诞节，她和丈夫都是耀眼的主角。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她在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开幕式上也缺席了。幕间休息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意外发现有几个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去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看见她登上了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让人看出可耻的疾病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有人问，究竟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敢侵染这样一位权力显赫的夫人，得到的回答则颇为恶毒：

“像她这样高贵的夫人，得的不可能是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他家乡的有钱人从不会生小病，一得就是大病。要么是暴亡，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往往使得节日的欢欣被葬礼冲掉；要么就是在令人生厌的慢性病中油尽灯枯，而个中内情到头来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到巴拿马去隐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之举。他们在基督复临派的医院中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意愿。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棚屋，常年淹没在达连湾史前般的倾盆大雨之中。在那里，病人们忘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粗麻布窗子的孤独病室里，任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的气味代表的是健康还是死亡。康复的人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分发给众人，急切地为自己的苟延残喘祈求原谅。有人回

来时肚子上留下了粗糙的缝合疤痕，就像是用鞋匠的麻绳缝的。他们在前来探望的亲朋面前掀起衬衫，将自己的伤口同那些被过度的幸福窒息而死的人的伤疤进行比较。余生里，他们将反反复复地讲述在三氯甲烷的作用下，他们是如何看见天使降临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什么，其中最悲惨的又莫过于被遗弃在肺结核区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更多是因为雨水的折磨，而非疾病的苦楚。

如果要他选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自己更愿意费尔明娜·达萨生还是死。但首先，他最想知道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真相，可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哪怕一条线索，好让他判断传言的真伪。内河航运是他管辖的领域，对他来说那里不存在任何秘密，甚至连隐私都没有。然而，谁也没听说过戴黑面纱女人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很多事在发生之前就尽人皆知，特别是有关富人的事。唯独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失踪做出过任何解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毫无虔诚地到神学院的礼拜堂去望弥撒，参加一些以往根本不会理会的市民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言变得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一切正常，唯独缺少了母亲。

在四处打听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留意打探的消息，其中就包括洛伦索·达萨已死在他的出生地—坎塔布连的一个小村庄。他想起自己曾有很多年都在教区咖啡馆那如火如荼的象棋比赛中见过他，他的嗓子因说话太多而变得沙哑，而且随着陷入衰老的不幸流沙，他的身形更胖，脾气也更粗暴了。自上世纪那次令人不快的茴香酒早餐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断定，就像他仍对洛伦索·达萨心存怨恨一样，洛伦索·达萨对他也一定还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给女儿找到一门富贵的婚姻—那曾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定决心要得到有关费尔明娜·达萨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于是又来到教区咖啡馆，想从这位父亲那里问出个名堂。那时，咖啡馆里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对决：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独自一人对战四十二名棋手。就这样，他得知洛伦索·达萨已经去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尽管他知道，这份高兴是以仍旧找不到真相为代价的。最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去了绝症患者医院的传言当作事实接受了，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只是一句谚语：女人生病，长生不死。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他只能想，如果费尔明娜·达萨真的死了，那根本不需要打探，消息是无论如何都会传到他这里来的。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收到费尔明娜·达萨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生活在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距离马利亚之花镇半里地。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开的。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关系稳定，这唯一的一次严重危机竟让两个人都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乱了方寸。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发生在他们最为成熟平静的时期，两人自诩已能豁免于命运中任何潜伏的坎坷，孩子们都已长大，而且受到了良好教育，摆在夫妻俩面前的本是一片坦途，可以毫无苦涩地学着慢慢变老。对两个人来说，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不愿像加勒比人常做的那样，靠吵闹、眼泪和调解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靠欧洲人的智慧来解决。但争来争去，既没有采用这里的办法，又没有采用那里的办法，结果陷入了愚蠢的局面，哪儿的法子也不是。费尔明娜·达萨决定离开家，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也不知道离开后要怎么办，她只是被气疯了，而他为良心的谴责所困，也无力去说服她。

费尔明娜·达萨的确是在半夜上船的，而且十分秘密，头上蒙着守孝的黑纱。但她登上的不是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而是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普通小船。那座城市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一直住到青春期。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只带了一个在仆人中长大的十五岁教女同行。不过，她把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她将搭乘的各船的船长和每个港口的官员。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自己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养三个月，可心里已决意要一直留在那里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痛苦万分，但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将它视为上帝对他严重过错的惩罚。然而，船上的灯光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两人就都已在为他们的软弱后悔了。

虽然他们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论孩子们的情况和家里的其他事项，可几乎两年过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因为每条路都被他们的骄傲暗中捣毁。第二年学校放假期间，孩子们到马利亚之花去度假，费尔明娜·达萨尽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竭力表现出对新生活的适应。至少，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那段日子里，里奥阿查的主教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配有金线镶边鞍具的白色骡子，走在华盖之下到那里传教寻访。跟在他后面的，是从其他村子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拉手风琴的乐师，以及四处贩卖食品和护身符的小贩。整整三天，各种身患残疾和不治之症的人云集庄园。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布道或请求全赦的，而是来乞求骡子赐福，据说，这头骡子背着主人创造了种种奇迹。当年主教还是个地位卑微的神甫时，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十分熟识。这天中午，他从布道的地方溜出来，到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吃午饭。其间他们只谈了些世俗的事。而午饭过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她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了，

理由十分明确：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尽管并非有意，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回答将会传到它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

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

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

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

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

就要告别时，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检查，他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病情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说起自己的病，她滔滔不绝，于是，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到这里来，给她做一次更为详细的检查。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知道像他这个级别的医生远远超过她的支付能力。但他请她放心：“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向来都是设法让富人为穷人付账的。”说完，他在自己的袖珍记事本上记下：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明娜·达萨将会读到这页记录，其中还有再详细不过的诊断细节和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那些行为放荡的女艺术家中的一个，可地址又让她想到应该是个牙买加人，那么，就是个黑女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她的嫌疑，认为她不可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

星期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提前十分钟前来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准备迎接他。自从在巴黎参加某场口试以来，他再没有如此紧张过。林奇小姐躺在麻布床上，穿着一件柔软的丝绸衬衣，美到了极致。她浑身上下都丰满而结实：美人鱼般的大腿，仿佛经文火炙烤的皮肤，惊艳的乳房，以及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健康的气息，也就是费尔明娜·达萨在丈夫衣服上嗅到的那种气味。林奇小姐去看门诊是因为一点小毛病，她诙谐地称之为“弯弯曲曲的腹痛”，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症状，因而，他触摸了她各个内脏器官所在的位置，与其说是认真仔细，不如说是别有用心。这样做时，他竟然渐渐忘了自己的医术，惊讶地发现这个天生尤物的内脏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他完全沉浸在愉悦的抚摸中，已不再是加勒比沿岸最优秀的医生，而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折磨得神志混乱的可怜男人。在他严肃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而那一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女病人一把推开他的手，在床上坐了起来，对他说：“您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但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林奇小姐则恰恰相反，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毫不怀疑医生心里所想已不再是科学时，便说道：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大汗淋漓，就像穿着衣服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它把我们医生都想象成了木头。”

她感激地向他伸过一只手。

“我只是这样以为，但并不意味着您不能这样做。”她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竟得到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的垂青。”

“我一刻也无法停止想您。”他说。

他坦白时，声音颤抖得实在让人怜悯。但她用一阵照亮了整个屋子的笑声，让他从一切罪责中得以赦免。

“我在医院见到您时就看出来了，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愚人。”

一切进展得并不容易。林奇小姐注重自己的清誉，她首先要安全，然后要爱情，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而且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些。她给乌尔比诺医生引诱她的机会，但不让他踏足自己的卧室，即便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也不行。她至多允许他重复抚摸和听诊的仪式，以此对伦理道德进行肆意地践踏，但不能脱掉她的衣服。而他呢，一旦上钩便无法松开肉欲的诱饵，几乎每天都去纠缠。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太软弱，无法及时自拔，以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是他的弱点。

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都会骑上骡子出门去，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家来。骡子的背上一边驮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另一边驮着食物。另外一处不便是对面的学校，因为孩子们朗诵课文时，眼睛总是看向窗外的街道，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这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房子的各扇门窗便纷纷敞开，他们看见林奇小姐把鸟笼挂在屋檐下，让小黄鸟学习他们朗诵课文；看见她包着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加勒比的清脆嗓

音也跟着朗诵起来；之后，他们又看见她坐在门廊上，独自用英语唱着下午的赞美诗。

他们必须选一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十二点到两点午餐休息的时候，可这也是医生午餐的时间；其二是傍晚孩子们回家之后。后面这个时间点一向再好不过，可这时医生刚好结束了出诊，距离赶回家去吃晚饭只有几分钟了。第三个形成阻碍的问题，也是对他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可能不坐车去，可他的车子尽人皆知，而且还必须停在门口。他本可以和车夫串通，他在社交俱乐部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这样干的，可这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如此频繁地拜访林奇小姐，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穿着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斗胆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先回去，过后再来接他，以免让车子在门前停得太久。乌尔比诺医生一改往日的温和，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认识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不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我就当你没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前，就休想隐瞒病情。有时如果距离允许，医生情愿自己走路去，或者租一辆马车前往，以免招来恶意的揣测和妄下的结论。然而，这种办法没多少用，因为拿去药店取药的处方会使真相大白。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得在开方时把真真假假的药写在一起，以保证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能带着自己病痛的秘密平静地死去。同样，他也可以找出种种体面的理由为自己的车子出现在林奇小姐家门口做出解释，但那并不可能维持很久，更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维持一辈子。

世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最初的疯狂刚一得到满足，两人就都意识到了危险，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无法下定决心去面对丑闻。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许诺，但过后，所有的事情又都搁置再说了。另一方面，随着想跟她在一起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害怕失去她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艰难。他无法去思考别的事情，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下午来临，忘记了其他责任，忘记了除她以外的一切。可是，每当车子距离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越来越近，他又祈求上帝在最后一刻出点什么岔子，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始终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赴约，有几次，他从街角就看见头发像棉花一般厚软的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正在露台上看书，而他的女儿正在客厅里用歌声向邻家的孩子宣讲福音，他甚至庆幸起来。那时，他便会幸福地往家走，不必继续挑战命运，但过后他又会发狂，渴望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能变成下午五点钟。

所以，当车子停在门口变得过于惹人注目时，他们的爱就难以为继了，到第三个月的末尾，整件事甚至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每次，两人都来不及寒暄，林奇小姐一看见自己的情人慌忙赶来，便迅速钻进卧室。在等他的日子里，她会事先做好准备，穿一条宽大的裙子—一条带荷叶边的精美牙买加裙，荷叶边上还印着红色的花朵—里面不穿内衣，什么都不穿，因为她相信行事便捷能帮助他克服恐惧心理。可她为使他幸福所做的一切却被他白白浪费了。他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走向卧室，大汗淋漓，一进屋就惊天动地地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丢到地上，手杖、医药箱，以及巴拿马草帽，然后便惊慌失措地做起爱来，裤子只褪到膝盖处，而为了避免麻烦，连外衣的扣子都没有解，怀表链放到了背心里，鞋也还穿着，什么都穿着，心里时刻惦记的不是如何尽兴，而是尽早离开。她才刚刚进入孤独的隧道，便落得个被

迫节食禁欲的境地，因为他已经开始重新系上扣子，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好像刚刚在生死线上做了一场绝世之爱，而其实他不过是完成了爱情中生理的那部分仪式罢了。但他很会把握节奏：刚好是一次常规治疗中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为自己的软弱羞愧万分，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请求费尔明娜·达萨脱下他的裤子，把他的屁股放到炭火上去灼烧。他没吃晚饭，念祈祷也心不在焉，上床后，装作继续在读午休时读的书，而此时，他的妻子仍在房子里忙来忙去，要在睡觉前把一切料理妥当。他看着书，渐渐瞌睡起来，然后就一点点陷入林奇小姐那无法回避的湿热丛林，沉溺于她躺卧的那片林中空地的蒸汽，堕入他的死亡之床。此时，他什么也无法想，只想着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时，她将在床上等他，那条疯狂的牙买加裙下面一丝不挂，只露出她深色树丛中的那片高地：地狱之圈。

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了解这些症状。他在书上读到过，也在现实中从上了年纪的患者口中听说过，那些人先前都没有什么严重疾病，但突然就觉得出现了种种不适，描述的竟然和医书上写的如出一辙，而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们的幻觉罢了。在萨伯特医院教授儿童临床医学的老师曾建议他专攻儿科，因为这是最诚实的专业：小孩子们只有在真生病时才生病，和医生交流时也不会说套话，只讲具体的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正好相反，到了一定年龄，要么是只有症状而没有真生病，要么更糟：病得很重，症状却像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病。他通常都用缓和性的药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问题交给时间，让他们在暮年的一团乱麻中与自己的小毛病长期共处，最终学会熟视无睹。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医生，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竟然不能克服明明没病却觉得有病的焦虑。或者更糟：也许是真

的有病，却仅仅凭着科学的偏见，不相信自己有病。四十岁时，他曾在课堂上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我生活中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懂我的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已迷失在林奇小姐的迷宫中时，便不能再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了。

他那些上了年纪的病人所有真实或假想的病症，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肝脏的形状，无须触摸就能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发出像熟睡的猫一样的哼叫；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作响。有时，他像一条喘不上来气的鱼一样醒来，觉得心脏里积满了水。他觉得心脏瞬间乱了步伐，觉得它的脉动延迟了一下，就像当初在学校里参加军训时那样，继而一次又一次地延迟。最后，他又觉得它恢复了正常，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但他没有求助于曾开给病人的那些分散注意力的药物，而是被恐惧折磨得晕头转向。的确，五十八岁时，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依然是一个懂他的人。为此，他求助于费尔明娜·达萨，这个世界上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人，在她这里，他刚刚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平静。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求他看着她的脸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的地狱之圈已经败露。可他不明白她是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仅凭嗅觉就发现了真相。但不管怎样，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不是一座善于保守秘密的城市。第一批家用电话刚装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稳定的夫妻就因为匿名电话里的流言蜚语离了婚。很多因此而害怕的家庭暂停了电话服务，或者好几年都一直拒绝安装。乌尔比诺医生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绝不会允许一通匿名电话就破坏掉自己的信心，这种事连想都别想，而他也无法想象有谁会大胆到用真名向她通报实情。然而，他害怕那种旧式的诡计：一张从门下塞进来、不知出自谁手的纸条，

效果反倒可能立竿见影，不仅因为这么做让发信人和收信人都隐匿了姓名，而且因为这一伎俩古老而神秘，难免使人把它同全能上帝的安排联系在一起。

忌妒从不认识他的家门：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夸耀，他就像瑞典火柴，只能在自己的盒子上擦燃。这话原本也的确是真的。然而，他从没想过，一个像妻子这样高傲、这样自尊、这样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已被证实的不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此，他在如她所要求的那样看着她的脸之后，除了再一次低下头以掩饰自己的慌乱，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他继续假装陶醉于阿尔卡岛那一条条恬美蜿蜒的小河之间，暗自思考着对策。而费尔明娜·达萨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补完袜子，把东西乱七八糟地丢进针线盒，到厨房吩咐开晚饭，之后便回卧室去了。

于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点不再去林奇小姐家。那些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那单独为她找所幽静房子，使他不必担惊受怕地与她相会的梦想，以及两人一起从容地享受幸福直到死亡的向往—所有这些他在爱的火焰中许下的诺言都永远地付之东流。林奇小姐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绿宝石发卡，车夫交给她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捎任何口信，也没有字条。东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外面包着一张药房的纸，就连车夫也以为那是应急药物。他后半生再没有见过她，甚至都没有偶遇过。只有上帝知道，这个英勇的决定给他带去了多少痛苦，而为了能在这场内心的灾难后继续活下去，他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流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五点钟时，他没有和她在一起，而是在神甫面前深深地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破碎的内心领受了圣体，但灵魂终于得到了平静。

做出了断的当晚，他一面脱衣准备就寝，一面对费尔明娜·达萨反复唠叨着他清晨失眠的痛苦，一阵阵突然来袭的针扎似的疼痛，以及黄昏时想痛哭一场的渴望，至于秘密爱情带来的种种苦楚，他也把它们当作衰老的症状讲了出来。为了不至于死掉，并且为了不说出真相，他必须这样向人倾诉一番。终于，他在象征着爱的家庭仪式中祭献了这一股脑儿的苦水。她认真听着，没有看他，又是一言不发，一件一件地接过他脱下来的衣服。她闻着每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愤怒，然后随意揉成一团，扔进装脏衣服的藤条筐里。她没有发现那种味道，但这代表不了什么：明天又是新的考验。跪到卧室的小祭台前准备祈祷时，他伤心而又真诚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对种种苦痛的怨艾："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她眼睛都不眨地回答了他。

"那样最好，"她说，"那样我们就都平静了。"

几年前，在一次病重的危急时刻，他也曾讲过自己可能会死的话，而她当时给出的也是同样残忍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将之归咎于女人天性中的冷酷无情，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旧围绕着太阳转。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恐惧，她总是会抢先竖起一道愤怒的屏障。而那个时候，她所面临的正是她最恐惧的事情—永远地失去他。

这天晚上却相反，她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死去，这种坚决让乌尔比诺医生吓了一跳。之后，他听到她在黑暗中缓缓抽泣，而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让他不知所措，他知道，她不会由于身体或内心的任何痛苦而哭泣，只有在愤怒时才会这样，而如果这种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对自己过失的惧怕，就会哭得更凶，并且越哭越气，因为她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会软弱得哭出来。他不敢安慰她，因为他明白这无异于安慰一只被长矛刺穿的母老虎，他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

哭泣的理由已经在那个下午消失了，已被彻底、永远地从他的记忆中根除了。

有几分钟，困意俘虏了他。当他醒来时，她已点亮她那盏微弱的床头灯，仍旧睁着眼，但没有哭。在他睡着的时候，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多年来积聚在年岁深处的沉渣，此刻因忌妒的搅动浮现出来，她刹那间苍老了。看着她那瞬间出现的皱纹、枯萎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伤怀，冒着风险劝她睡觉：已经两点多了。她没有看他，但声音里也没有愤怒的痕迹，语气几乎是温和的。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她说。

于是，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感觉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量，因为他相信她已经知道真相，不过是想确认一些细节。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所以他讲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不是像起初那样低声抽泣，而是泪如泉涌，咸咸的泪水从脸颊滑落，在她的睡袍里翻滚沸腾，灼烧着她的生命：他竟没有像她提心吊胆地所期待的那样，做出个男人的样子，抵死否认，为自己所受的诽谤大发雷霆，咒骂这个婊子养的社会肆无忌惮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自己不忠的毁灭性证据，仍能临危不乱。之后，当他告诉她已在下午见过忏悔神甫时，她简直怕自己会气瞎了双眼。从上学时起，她就认定教会里的人不具备上帝所启示的任何一种美德。这是他们和谐家庭中的一个本质分歧，两人一直都小心回避这一点，没有发生过什么碰撞。但丈夫竟然允许忏悔神甫掺和到这样一件不仅关乎他个人、也关系到她的隐私中来，实在是出了格。

“你还不如告诉一个在门廊里耍蛇的。”她说。

在她看来，一切全完了。她敢肯定，还没等丈夫做完忏悔，她的荣誉就已成为大街小巷的话题。这给她造成的屈辱感要比丈夫的不忠带来的羞愧、愤怒和不平更加难以忍受。而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他纠正说：“是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此时，再精确的解释也是多余了：她已有了定论。

“一样是贱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一。而星期五晚上七点钟，费尔明娜·达萨就登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常规小船，随身只带了一只箱子，由教女陪伴。为避免旁人发问，也避免有人将来向丈夫问起她来，她在脸上蒙了黑纱。按照两人的约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出现在港口。此前，他们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天、精疲力竭的谈话，最终决定让她到位于马利亚之花镇的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去，以便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不明就里的孩子们把这理解为一次推迟了多次的旅行，很久以来，他们也一直盼望能到那里去。乌尔比诺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为的是让他那个不可信赖的小世界里没有人能做出居心叵测的推测。这一点他做得天衣无缝，所以，如果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找到费尔明娜·达萨消失后的一丁点儿踪迹，那是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无迹可寻，而不是因为他缺乏调查的手段。丈夫毫不怀疑妻子一旦平息愤怒就会马上回家。但她走时却坚信自己的愤怒永远也不会平息。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个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怨恨的果实，不如说是思乡的结果。蜜月旅行之后，她曾多次返回欧洲，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泊十天，却总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幸福。她见过世面，已经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考，可自从那次糟糕的气球之旅后，

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回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太迟，也是一种补救。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倒并非因为婚姻的灾难。单是想到去重温少女情怀，也足以让她慰藉自己的不幸。

她和教女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下了船，凭着那份保留至今的刚强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重游了那座城市。收到消息前来接待她的要塞行政和军事长官请她登上了官家的马车，将护送她直到登上前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火车，她想到那里去，是为了证实解放者临终时睡的那张床是否真如人们所说，小得就像一张孩子的床。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在午后两点的疲倦中再次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故乡。她看到了故乡的街道，但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海滩，到处是覆盖着青苔的水洼；又看到了葡萄牙人的豪华住宅，大门上镌刻着家族徽章，窗前垂着铜制的百叶窗，阴暗的大厅里单调地重复着几首钢琴练习曲，颤颤巍巍，惨惨凄凄。她母亲当年刚结婚时，也曾拿这几首曲子教过富人家的姑娘。她看到广场上空无一人，炙热的石子地上连一棵树都没有；送葬似的带篷马车一字排开，马儿站在那里都睡着了；还有那辆开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黄色火车。在城中最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那所最雄伟、最漂亮的房子，它那青色石头的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卧室的窗子，多年以后，当她已无法记清此段回忆时，阿尔瓦罗将在这间卧室出生。她想起了她无望地寻遍了天上地下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而想到姑妈，便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他那身文人的衣服，他在小花园的杏树下读的那本诗集。她偶尔几次回忆起学校里不愉快的岁月时，也会触动有关他的思绪。可她转了好几圈都没能认出自家的老房子。她认为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除了一个猪舍以外什么都没有。拐角过去是一条妓

院街，全世界来的妓女都在门廊上睡午觉，等待邮车或许会带来什么寄给她们的东西。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刚一上马车，费尔明娜·达萨就用面纱遮住了半张脸，不是害怕被人认出来，毕竟，这里谁也不可能认识她，而是因为从火车站一直到墓地的路上，日光暴晒下的肿胀尸体随处可见。要塞长官对她说："是霍乱。"她早已看出来了，因为那些晒焦的尸体嘴里都泛着白沫，但她同时也注意到，没有一具尸体像她乘坐气球时看见的那些那样，脑后挨了仁慈的一枪。

"的确如此。"长官说，"上帝也在改善自己的方法。"

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到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古老甘蔗园只有九里路，可那列黄色的火车却走了一整天，因为火车司机跟常坐这列车的乘客们是朋友，他们时不时就央求他停下来，以便到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去走走，舒展一下腿脚。男人们还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洗澡，河水从山上倾泻而下，清澈冰凉。他们觉得饿时，就下车去，从牧场放养的奶牛身上挤些奶来喝。被这些情景吓坏了的费尔明娜·达萨终于到站，差点没时间去观赏解放者临死前悬挂吊床的那几棵史诗般的罗望子树，并且证实他当时所睡的床果真如人们所说，不仅对他这样一位荣耀的男人，即使对一个七个月的婴儿来说也极其狭小。不过，另一位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参观者称，那张床是件假文物，事实上，国父是被人扔在地上死去的。费尔明娜·达萨对离家以来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感到万分压抑，以至于在之后的旅途中，再没有心情去回味前半段旅程。于是，尽管曾万般怀念，如今她却避免走过那些她思念的村庄。这样她才能在记忆中留住它们，让自己免受幻灭之苦。当她试图抄捷径以逃离烦恼时，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叫喊声，也听到了或许是战争抑或是庆典的铅炮声。当她别

无他法不得不穿过某个村庄时，便用面纱遮住脸，以继续把它幻想成以前的样子。

逃避了许许多多往事之后，她终于在一天晚上来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而当她看到在门口等她的表姐时，差点昏厥过去：她就仿佛在一面真实之镜中照见了自己。表姐身材发福，年老体衰，身边带着几个不听管教的儿女，孩子们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她仍旧无望地爱着的男人，而是一位靠丰厚的津贴生活的退役军人，当年，她在绝望之下嫁给了他，而他则疯狂地爱恋着她。尽管如此，在那被摧残的身躯里，她依旧是原来那个她。费尔明娜·达萨在乡下住了些日子，回忆起美好往事，渐渐从一开始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她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从来不出庄园。和她同去望弥撒的，是她昔日那些桀骜不驯的闺中密友的孙儿辈，此外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姑娘。她们一路站在牛车上，一如她们的母亲在她们这个年龄时的样子，齐声高唱着歌，直至来到山谷深处的教会教堂。费尔明娜·达萨原本只是路过马利亚之花镇，在昔日的那次旅行中，她自认为不会喜欢这里而没有来，可这次，她一眼就被它完全迷住了。但她的悲哀，抑或是这个镇子的悲哀在于，后来的她永远也想不起它真实的模样，只记得见到它之前她脑海中想象的样子。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接到了里奥阿查主教的消息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的结论是，妻子迟迟不归，并非因为不想回家，而是想为她的傲慢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和伊尔德布兰达通过几封信后，他没有通知妻子便动身了。从信中他清楚地看出，妻子的思乡之情已经颠倒过来：现在她想的只有自己的家。上午十一点，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雇工们的叫喊、马的嘶鸣和朝天放枪的声音，接着，门厅里响起了坚定的脚步声和那个男人的说话声。

“要赶好时辰，就得不请自来。”

她开心得要死，来不及多想，只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道：“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是太好了！”她想到因为这该死的茄子馅饼，自己还没有洗澡，伊尔德布兰达让她做馅饼，却没有告诉她谁要来吃午餐；她想到自己现在又老又丑，脸还被太阳晒脱了皮，如果他看见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真见鬼。可她还是匆忙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带着母亲生她时给予她的全部高傲，理了理纷乱的心绪，前去迎接那个男人。她迈着她那母鹿般优美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熠熠，翘起迎接挑战的鼻子，心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为能回家而感到无限轻松。当然，事情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容易，她确实高高兴兴地跟他回去了，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在余生默默地向他讨还自己所受的痛苦折磨。

于是，差不多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失踪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特兰西多·阿里萨定会将其视作上帝对人生的嘲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莱昂娜·卡西亚尼还是毫不费劲地把他带到了《卡比莉亚》隆重的首映式上，广告中大肆宣传，影片对白是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写的。堂加利略·达孔特的露天大院子里照例坐满了贵宾，但在有些夜晚，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是璀璨的星空，而非银幕中的无声爱情。莱昂娜·卡西亚尼的一颗心始终悬着，跟随着跌宕的故事起伏。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恰恰相反，剧情的死气沉沉让他困得打瞌睡。在他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

“我的上帝，这比疼痛还要长！”

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不由得克制住了。当时，这里尚没有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的习惯，黑暗中的观众只能听着放映机那下雨似的沙沙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会想起上帝，但这一次，他却对上帝充满感激。因为，即使深埋地下二十西班牙寻，他也能立刻认出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自从那天下午，在那个幽静小花园的漫天黄叶中，听见她说出那句“现在，您走吧，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这个声音便留在他的灵魂里。他知道，她就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当然，是在她丈夫旁边。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吸，满怀爱意地吸纳着经她健康的气息净化过的空气。他感受到，她并没有像自己在最近几个月的沮丧中时常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幼虫所侵蚀，而是让人再次回想起她最光彩照人、最幸福的时刻：穿着智慧女神的长衫，隆起的腹中孕育着她的第一个孩子。他没有回头去看，但她却如在眼前，而银幕上演出的那一连串历史性灾难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他陶醉于从他的灵魂深处传来的杏果的芬芳，急切地想知道她认为电影中那一个个女人应该如何去爱，才能让她们的爱情比现实之中少一些痛苦。电影快结束时，他感到一瞬间的狂喜，因为他还从未和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如此贴近地待在一起这么久。

灯亮时，他等着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起身。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看电影时总是敞开的背心扣子扣起来，这时，四人站得如此之近，就算有人不情愿，也无论如何必须打招呼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首先问候了莱昂娜·卡西亚尼，他对她很熟悉，之后，又以其一贯的彬彬有礼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手。费尔明娜·达萨向他们致以礼节性的微笑，只是礼节性的，意思是这个微笑的主人已经见过他们很多次，也知道他们是谁，因而无需再向她做自我介绍。莱昂娜·卡西亚尼以她那混血女人特有的优雅回应了她。可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刚一见到她，他就惊呆了。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可怕的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留下的痕迹。她还保持着豆蔻年华的体重和身段，但很显然，最近两年她经历了仿佛十年的艰辛与严酷。短发很适合她，两侧的鬓角像翅膀似的翘着，但已经不是蜜的颜色，而是铝的银白色。老花镜后，那双美丽的柳叶眼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在散场的人群中远去，惊讶地发现她竟在公共场合披着穷人的头纱，穿着家用的便鞋。但最让他感伤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臂，指引她该从哪里出去，而即便这样，她还是估计错了高度，差点在门口的台阶上跌倒。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年龄所致的步履蹒跚十分敏感。早在年轻时，在花园里，他就常常放下正在阅读的诗集，观察一对对老人互相搀扶着穿过街道的情景。那是生活给他上的课，让他得以隐约窥见自己年老时的境况。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电影那晚的那个年纪，男人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最初的几根白发使他们看上去更为庄重，充满智慧和魅力，尤其是在年轻女子的眼中，而与此同时，他们枯萎憔悴的妻子不得不拽着他们的手臂，才不至于被自己的影子绊倒。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健康便突然一落千丈，身体和灵魂都迅速耻辱地衰老，而那时，妻子们又焕发了第二春，像拉着乞讨的瞎子一样拉着他们的手臂，为了不伤害男性的骄傲，轻声在耳边提醒他们注意脚下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间有一个水坑、横躺在人行道上的那团模糊的东西是个死了的乞丐，然后，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马路，仿佛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条河的唯一渡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无数次在那面生活之镜中照见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从来不及对

那个可耻年龄的恐惧，到那时，他将不得不被一个女人搀扶着。他知道，到了那一天，也只有到了那一天，他终将放弃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渴望。

这次相遇驱走了他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莱昂娜·卡西亚尼，而是陪她步行穿过老城区。他们的脚步踏在砖地上，像马蹄声一样回荡。敞开的阳台上时而飘来零星的说话声，有卧房中的喁喁私语，也有被虚无缥缈的声响和熟睡小巷中茉莉花的热烈芬芳升华了的爱的呜咽。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力克制自己，避免把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吐露给莱昂娜·卡西亚尼。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一起走着，像一对不慌不忙的老情人一样亲昵无间，她想着卡比莉亚的种种美好，而他却想着自己的种种不幸。一个男人在海关广场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四周回荡，连绵不绝：当我穿过大海无尽的浪涛。在石头圣人大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该在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家门前向她道别，而他却请求她邀请自己到她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回答说：“如果你现在上去，那就必须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如果换作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会上去的，即便日后可能不得不食言。然而，这一次莱昂娜·卡西亚尼邀他上去，无需任何承诺。

就这样，他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一座爱情圣殿，而这份爱尚未诞生就已被扑灭。莱昂娜·卡西亚尼的父母已经去世，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岛发了财，如今她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老宅中。若干年前，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放弃让她成为自己情人的希望时，常常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在星期日来拜访她，有时晚上还待到很晚。他对这所房子的修缮做出了很大贡献，以至于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了。然而，

在看完电影的这天晚上，他似乎觉得客厅里有关他的记忆都被清除了。家具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了新的彩画。他想，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刻意的，为的是证明他从未在此地存在过。而就连那只猫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被这种残忍的遗忘吓了一跳，说：“它不记得我了。”可她一边倒白兰地，一边背对着他说，如果他是为此而忧心，那么大可不必，因为猫是从来也不会记着谁的。

两人倚在沙发上，靠得很近，聊着他们自己，说起他们相识前各自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在那个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下午，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相遇之前。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两间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而在此刻之前，他们从未谈过日常工作以外的事情。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聊着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像情场老手一样轻轻抚摸起来。她任由他这样做，但就连礼貌性的颤抖都没有回应给他。当他试图更进一步时，她拉起他那只探险的手，在掌心上吻了一下。

“注意你的举止，”她对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你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强壮、敏捷、但她从未看清长相的男人，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按倒，撕扯剥光了她的衣服，短暂而疯狂地跟她做了一次爱。她躺在石头上，浑身满是伤痕，却真心希望那个男人能永远留下来，直到她在他的怀中带着爱死去。她没有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她相信自己能根据他的体型、身材和做爱的方式，从千万个人中把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便对所有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如果你碰巧听说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在十月十五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钟时，在殉情者的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的黑女人，那么请你告诉他在哪里能找到我。”这句话变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她讲给过无数人听，最后彻底绝望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也多次听她说起过这个故事，就像听到夜晚起航的轮船的告别声一般频繁。凌晨两点的钟敲响时，他们每人已经喝了三杯白兰地。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不是她所等的男人，他很高兴能明白这一点。

“干得不错，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道，“我们总算把猛虎扼杀了。”

那晚终结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关于结核病医院的恶意传言曾打碎了他的梦想，因为那让他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疑虑，即费尔明娜·达萨也是会死的，既如此，那她也就有可能死在丈夫的前头。而当他看见她在电影院的出口险些绊倒时，他又进一步滑向深渊，忽然间意识到先死的人可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她。这是一个预兆，是所有预兆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它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些耐心等待、幸福憧憬的岁月已成为过去，如今，在地平线上隐约望见的，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见的病毒的茫茫大海，失眠的清晨一滴一滴排出的尿液，以及每日下午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曾经，每天的每分每秒都胜似他的盟友，如今却开始算计他。几年前他去赴某个约会时就已经开始提心吊胆，害怕发生意外。他发现门没有上闩，合页刚刚上过油，显然是为了让他进来时不会发出声响，但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担心自己死在她的床上，给一个无辜的热情女人造成无法消除的阴影。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女人，那个他毫无怨言地从一个世纪等到另一个世纪的女人，很可能会来不及挽着他的手臂穿过到处是圆形坟冢和在风中摇曳的罂粟花的漫漫长街，帮助他平安到达死亡的彼岸。

事实上，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岁，认为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因为那都是充满爱的岁月。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他一样勇于面

对因看上去年轻而招来的耻笑，即使他们确实不老，或者心里也自认年轻；也不是所有人都敢于毫无羞愧地承认自己仍在因上世纪的挫折而偷偷哭泣。那个时代对年轻存在偏见：尽管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穿着方式，但老年的衣着在青春期结束后不久便开始穿上身了，而且一直持续到进入坟墓。这种穿戴与其说标志着年龄，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年轻人穿得像自己的祖父，再早早地戴上一副眼镜，便会更加受人尊重；而从三十岁起，手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物件。至于女人，则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二岁；一是永远独身、再也嫁不出去的年龄。而其他女人，那些已婚的、当了母亲的、成为寡妇的、做了祖母的，都属于另外一类，她们不按已经度过的年岁来计算年龄，而是按距离死亡还有多久来计算。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相反，他赤裸裸地大胆对抗着衰老的圈套，尽管心里清楚自己命运奇特，从小就像个老头儿。起初是情势所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他父亲决定扔进垃圾堆的衣服拆开后给他缝成新衣。于是，他不得不穿着礼服去上小学，一坐下，衣服便拖到地上；他头上戴的也是政府官员的那种帽子，尽管为了让它小一点，加了一圈塞满棉花的里衬，但还是连耳朵都盖上了。此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而且头发和母亲一样，是印第安人的那种质地，粗硬得像马鬃，所以，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其实长什么样子。幸运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混乱不堪，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了，在公立学校里，各种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学生都有。尚未长大的孩子们走进课堂，身上却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靠枪子儿得来的叛军制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还明目张胆地别着与他们军衔相符的武器。课间休息时，随便一点争执就会让孩子们拔枪相向。如果老师在考试中给了他们低分，他们甚至用枪来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退伍的民兵上校，就一枪打死

了修会会长胡安·埃雷米塔修士，只因为他在教理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的正式成员。

另一方面，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名门望族的孩子穿得就像古时的亲王，特别穷的孩子则光着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打扮得千奇百怪的学生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如何都要算在最奇怪之列，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十分引人注意。他听到的最难听的话，是街上的人冲他喊："穷光蛋，丑八怪，一切希望全落空。"但不管怎样，那身因生活所迫而穿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及至他整个一生，都是与他那神秘的气质和忧郁的性格最为相配的。当他在CFC第一次被委以重任时，他让人为他量身定做了和父亲那件同样款式的衣服。他像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怀念着死于三十三岁的父亲，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基督罹难时也是这个岁数。所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上去始终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以至于口无遮拦的布里希达·苏莱塔，他的一个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的露水情人，从第一天起便对他说，她更喜欢他脱掉衣服后的样子，因为光着身子的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成别的样子；其次，那个时候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除非把短裤和见习水手帽再次从衣橱里翻出来；再者，他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老年所持的看法。因此，当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在电影院出口险些绊倒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可怕的想法晴天霹雳般击中了他，即在这场血腥的爱情战争中，婊子养的死神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夺去他的胜利。

到那时为止，他经历过的最大战斗是同自己的秃顶进行的，他一直顽强抗争，却最终落得惨败的结局。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最初几根头发开始，他便意识到自己被打入了地狱，这种痛苦是任何一个无此

遭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保住迅速荒芜的头顶的每一寸毛发，没有什么发蜡和生发水他没有试过，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求助过，更没有什么代价他没有付出过。他背下了《布里斯托年鉴》中关于农业的全部条文，因为他听说头发的生长和庄稼的收获周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光顾的理发师，因为这人是个实打实的光头，而换了一个新来的只在新月那几天理发的外乡理发师。可这位新理发师才刚刚证明了自己手艺不错，就被发现是安的列斯群岛好几家警察局通缉的强奸幼女犯，被戴上镣铐拖走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那个时期加勒比地区所有报纸上关于医治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那些报纸通常刊登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第一张上，头秃得像个甜瓜，而第二张上头发比雄狮还浓密：这便是使用某种安全可靠的药水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六年里，他试验了一百七十二种药物，并践行了药瓶商标上写的所有其他辅助方法，而唯一的收获，是其中的一种药使他患上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提尼克岛的教外苦行僧们称之为北极光癣，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求助于在公共市场上售卖的所有印第安草药和在“代笔人门廊”出售的一切神奇特效药，包括东方汤药，可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头顶已经和一个削发僧人无异了。新世纪元年，千日战争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个意大利人，他会按照尺寸用真头发制作假发套，价格不菲，但只保质三个月，逾期概不负责。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谢顶者都愿意前往一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头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头发极为相似的假发套，以至于担心在自己情绪变化时那头发会竖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对这个把死人头发戴在活人头上的想法无法苟同。他唯一的安慰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一天，内河码头上一个欢快的醉汉看见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上

前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拥抱了他，并在码头工人的起哄声中摘掉他的帽子，给他的脑袋来了响亮的一吻。

“神圣的秃头！”他喊道。

那天晚上，四十八岁的他让人把自己两鬓和后脑勺上仅剩的几根毛发全部剃掉，彻彻底底接受了全秃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之前，把下巴和脸上所有长出胡楂的地方都涂满肥皂沫，用一把剃刀把它们刮得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光滑。以前，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从不摘掉帽子，因为秃顶给他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让他觉得有失体面。但当他彻底接受秃头后，便把它归为男性的美德之一，其实他早就听人这样说过，却一直视其为秃头们的自欺欺人而予以蔑视。再后来，他又养成了新习惯，把右侧仅有的几根头发留长，让它跨过整个头顶，从此，他一直沿用这个办法。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戴那个参加葬礼似的款式，即便当地已流行起一种被称为“塔尔塔里塔帽”的窄边草帽，他也依然不改旧貌。

然而，他失去牙齿却并非因为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一个江湖牙医试图根治一次普通感染时的鲁莽举动。对脚踏牙钻的恐惧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不敢去看牙医，尽管他常常牙痛，甚至有时无法忍受。听到他在隔壁房间整夜无助地呻吟，母亲吓坏了，因为她觉得这声音跟儿子昔日某时的呻吟声如出一辙，而那原本早已消散在她记忆的迷雾之中了。但当她让儿子张开嘴，好看看爱情究竟伤到了他哪个地方时，却发现他是因牙龈化脓而痛苦不堪。

莱昂十二叔叔让他去找弗朗西斯·阿多奈医生。这是个打着绑腿、穿着马裤的高大黑人。他把一整套牙医器械都放在工头用的褡裢里，随身背着，穿梭于内河船之间，看上去倒更像一个令沿岸村镇都

害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嘴里看了一眼，就认定他的牙齿全部要拔光，甚至包括那几颗好牙，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再次遭罪。与对秃顶的忧心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没有产生任何顾虑，除了很自然地略微担心不用麻醉难免会有些血腥。装假牙的主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这首先是因为他童年的一段难忘回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将满口牙齿取下，让它们自己在桌子上说话。其次，这可以结束从小就折磨他的牙痛，说起来，那种滋味就和爱情的痛苦一样强烈残忍。在他看来，这和秃顶不一样，并不是衰老的一次狡猾袭击，因为他相信，虽然如此一来他的呼吸会有一股硫化橡胶的辛辣味，但矫形后的微笑会让他的外表看上去更有光彩。因此，他毫无抵抗地向阿多奈医生那把烧红的钳子屈服了，并以负重耐劳的驴子的坚韧意志经受了恢复期的考验。

莱昂十二叔叔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好像是要给他动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他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最初几年，也可以说是他对美声唱法[2]的痴迷所造成的苦果。一个满月的夜晚，当船驶入加马拉港时，他和一位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只要站在船长室的栏杆处唱上一首那不勒斯浪漫曲，就能把森林里的动物都惊醒。他好险才赢了这一注。在河上漆黑的夜色中，只听见草鹭在沼泽里扇动着翅膀，鳄鱼甩着尾巴，鲱鱼惊恐地跳到陆地上。然而，当他唱到最高的一个音符，大家正担心曲调之高亢会让歌手的动脉迸裂时，他的假牙随着最后吐出的一口气飞了出去，沉入水中。

为了给他另配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内里费港耽搁了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极了。可返航时，莱昂十二叔叔又试图向船长解释他的上一副假牙是如何弄丢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中灼热的

空气，放开嗓子唱出了他所能唱的最高音，并把这个音尽可能地延长，试图把那些一边晒太阳一边不眨眼地看着轮船驶过的鳄鱼吓跑。结果，新的假牙又沉入了河水。那以后，他配了很多副假牙，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以及办公桌的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也各有一副。此外，他在外用餐时也会带上一副备用，就放在衣兜里一个装咳嗽药片的小盒中，因为他曾经在某天中午野餐时，为了吃煎猪皮而把假牙弄坏了。由于担心侄子也会有类似遭遇，莱昂十二叔叔让阿多奈医生一次性给他做了两副假牙：一副材质便宜，平时在办公室里用；另一副则是为星期日和节日准备的，在微笑时总会露出的那第一颗槽牙上还薄薄地涂了点儿金子，看上去更为逼真。终于，在一个圣枝主日[3]，当节日的钟声带来一片喧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了街上，那完美无瑕的微笑几乎让他觉得是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这件事发生在他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他孤身一人的时期。他的家是一个绝佳的爱巢，尤其适合他的爱情方式，因为虽然街道名为窗户街，让人联想到一扇扇窗子的薄纱帘后藏着无数双眼睛，但其实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可问题是，这房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费尔明娜·达萨幸福，也只为让她幸福。因此，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斩获最丰的那些年月，他宁可失掉很多机会，也不愿用其他爱情来玷污他的家。幸运的是，他在CFC每向上爬一级，就意味着获得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特权。对他来说，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与门房串通好后，能够在晚上、星期日以及节日里使用办公室。有一次，就在他已当上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时，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匆忙做爱—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姑娘骑在他身上—门突然开了，莱昂十二叔叔伸进头来，像走错了办公室似的，从眼镜上方看着惊呆了的侄

儿。“见鬼！”叔叔毫无异色地说，“跟你爸真是一路货色！”在重新把门关上之前，他把目光落在空处，说：

“您，小姐，不必担心，请继续。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件事，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变得无法工作了。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式吊扇。锁匠们也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了，吵吵闹闹像打仗似的，在门上装了把锁，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却没有说要做什么。窗帘装饰工带来印花装饰布，看看是否与墙壁的颜色匹配。再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从窗户外塞进来一个印着酒神节花色的双人大沙发，因为从门口实在搬不进来。这些人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干起活来，但又并非肆意捣乱，对任何人提出的抗议，他们只有一句回答：“这是董事会的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干涉行动究竟是叔叔出于对他的好意关心，还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让他检讨自己的胡作非为。他始终没能看出真相，事实上，莱昂十二叔叔是在鼓励他，因为已经有一些传言传到他那里，说他侄子的兴趣有别于大部分男人，这让他烦恼无比，担心会妨碍侄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维持了六十年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从不工作，并以此为荣。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想把他们每一个都培养成自己帝国的接班人，但生活却将一系列意外摆在他面前，这些偶然在当时的小说里司空见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步步高升，竟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而女儿则对河运事业毫无兴趣，宁愿从五十米高的窗子里看着哈德逊河上的船了此余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不乏有人把传言当

真，认为外表阴郁、手里拿着吸血鬼雨伞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肯定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件件意外发生。

当叔叔遵照医嘱不情愿地退休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甘愿牺牲他的星期日爱情，乘坐城中最早的一辆汽车，到叔叔的乡间别墅去陪他。汽车的起动摇柄反弹时力量很大，竟然打断了第一个司机的整条胳臂。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老头儿躺在用丝线绣着他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对大海。那是一座古老的奴隶庄园，每天下午，从种满百合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叔叔的谈话向来难以脱离河运的话题，在那些漫长的下午也不例外，而死神一直是一位冷眼旁观的隐形客人。长久以来，莱昂十二叔叔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河运公司落到一些同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内陆企业主手中。“这一向是门粗人的生意，”他说，“要是被那些纨绔子弟拿去，他们会拱手奉还给德国人。”他的担心与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信条连贯一致，有时即使场合不合适，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信条。

“我就快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一切都在变，就连宇宙中星辰的位置都在变，可就是没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他说，“这里每隔三个月就会有新的宪法，新的法律，新的战争，但我们仍旧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共济会成员，将一切罪恶归因于联邦制的失败，对此，他总是反驳他们说：“千日战争在二十三年前，也就是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于政治几乎冷漠到极致，听叔叔越来越频繁的长篇大论，就像听大海的涛声。但对于公司政策，他是叔叔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河运事业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要想根治它的落后，只有主动放弃对蒸汽船的垄断，虽然这

项垄断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河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叔叔抗议说：“这些思想肯定都是我那位满脑子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同名人莱昂娜塞到你脑瓜里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以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为前车之鉴，此人无节制的野心毁掉了他出众的智慧。可叔叔却认为埃尔勃斯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同时做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好像要把全国土地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他包揽了河流的通航、港口设施、陆地的交通枢纽和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叔叔接着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强烈反对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

大部分股东把这种争论视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老头儿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倒不是因为像大家随口常说的那样，衰老使他不如当初那么高瞻远瞩了，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无异于把他的兄弟们在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中缴获来的战利品扔进垃圾堆，那可是他们在英雄时代赤手空拳跟整个世界的强大对手作战得来的。因此，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谁都没有反对过，而且他握得那么紧，谁也不可能在它们合法消亡前触动它们。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预备在庄园下午的讨论中缴械投降时，莱昂十二叔叔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一个有关荣誉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在他死前这样做。

这是他对公司最后的指示。他从此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甚至不允许别人向他求教。他那头具有皇家风范的漂亮鬈发没有掉下一绺，他的睿智也没有减弱分毫，但他竭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可能同情他的人见到他。他坐在露台上那把缓缓摇动的维也纳摇椅中，看着山顶终年的积雪，打发时日。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女仆随时为他更替的一壶热黑咖啡和一杯小苏打水，里面浸着两副假牙，他在接待客人时才戴

上。他只见很少的几位朋友，而且只和他们谈内河航运开始以前很久的遥远往事。不过，他也有一个新的话题：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结婚。他对他说起过好几次，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

“如果我年轻五十岁，”他说，“我就和我的同名人莱昂娜结婚。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她更好的妻子。”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很可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不禁浑身发抖。他宁愿放弃一切、丢开一切，宁愿死，也不愿有负于费尔明娜·达萨。幸而莱昂十二叔叔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岁时，他指定侄子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进而最终退出了公司。

六个月后，经股东们一致同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就职那天，喝过香槟酒之后，引退的老雄狮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说话，然后即兴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但与其说那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曲为自己写的挽歌。他说，他这一生由两件上天安排的事开始和结束。一是解放者在奔赴死亡的不幸旅途中，曾在图尔瓦科镇将他抱在怀中。二是他扫清了命运给他设置的所有障碍，终于找到一个配得上他公司的继承人。最后，为了使这幕剧少一点戏剧性，他总结说：

“我这一生唯一的憾事，就是我在那么多葬礼上唱过歌，却不能为自己的葬礼唱一回。”

典礼结束时，他理所当然地高歌了一曲，唱的是《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向生命告别》。清唱，没有伴奏，就像他最喜欢的那样，而他的声音依旧坚定有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感动，但只在他道

谢时微微颤抖的声音中显露出这一点。他已经完成了生活中所有能想和能做的事，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刻骨铭心的决心，那就是要活着，健康地活着，直到自己的命运得到费尔明娜·达萨庇护的那一刻。

尽管如此，在莱昂娜·卡西亚尼为他举办的晚会上，陪伴他的并不只是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回忆，而是对所有女人的回忆：既有那些已经在墓地里长眠的女人，她们透过他种在她们坟上的玫瑰思念着他；也有那些仍和丈夫同枕共眠的女人，她们丈夫头上的犄角[4]在月光下闪着金光。只因缺少那一个女人，他便希望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事实是，每当他感到恐惧惊慌，他便格外地需要她们。因此，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期，最糟糕的时刻，他也始终和这许多年来数不清的情人们保持着哪怕最微弱的联系：他始终追随着她们的踪迹。

就这样，那天晚上他想起了罗萨尔芭，他最早的情人，那个把他的童贞当作战利品带走的女人。对她的记忆依旧像当初第一天那样让他痛心。他只要一合上眼，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纱裙，戴着长绸带的帽子，在甲板上摇着装孩子的鸟笼。多年来，他曾好几次收拾好一切准备去找她，尽管既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甚至不知道要找的人究竟是不是她，但他确信能在兰花丛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她。每一次，都是在船即将撤掉踏板的最后一刻，由于某种现实原因，或是他一念间的动摇，旅行又被推迟了：永远都是某个与费尔明娜·达萨有关的理由。

他想起了拿撒勒的寡妇，唯一亵渎过他母亲在窗户街的家的女人，虽然当初并不是他，而是特兰西多·阿里萨自己敞开门让她进去的。尽管她在床笫间表现不佳，但他对她的理解比对其他任何女人都多，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温柔得可与费尔明娜·达萨相比的人。但她那

难以驯服的野猫秉性，更甚于她那股温柔的力量，这使得他们注定无法忠于对方。然而，他们仍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这还得感谢他们信守的那句火枪手的座右铭：可以不忠，但不可背信弃义。此外，她还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他得知她已去世，需要靠施舍下葬时，他出钱安葬了她，并独自出席了葬礼。

他也想起了他爱过的其他寡妇。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他的情人中尚活在世上最老的一位，人们都叫她“二夫寡妇”，因为她曾两次守寡。还有另一个普鲁登西娅，阿雷利亚诺的遗孀，一个多情的女人。她扯下他衣服上的扣子，只为了让他在她家里多留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还想起了何塞法，苏尼加的遗孀，她疯狂地爱他，即便不能让他属于自己，也不愿让他属于别人，差点儿在他睡梦中用修枝的大剪刀把他那陀螺似的玩意儿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莱斯·阿尔法洛。她的出现虽然短暂，却是所有女人中最让他喜欢的。她来本市是为了在音乐学校教六个月的弦乐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她像初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和他一起坐在她家的屋顶天台上，用大提琴拉起一组最美的旋律，琴声在她金色的大腿间变成了男人的声音。从第一个月夜开始，他们就像如狼似虎的新手一般做爱，撕心裂肺。但是，安赫莱斯·阿尔法洛终于像来时一样走了，带着她女性的温柔和那把淫荡的大提琴，乘一艘挂着遗忘之旗的远洋轮船一去不返。在月光下的天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挥着白手绢告别的姿势，那手绢仿似一只地平线上的孤凄白鸽，如花会上的诗句中描写的一样。和她在一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一件他其实已在无意中多次体验过的事：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并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她们所有人，不背叛其中任何一个。他孤身一

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告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然而，轮船才刚消失在地平线上，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娅·瓦隆。上一个星期他都是在她家门前度过的，但浴室窗子里透出的橙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进去：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有人，但不知是男是女，因为安德雷娅·瓦隆的爱混乱不堪，她并不在意这类细枝末节。在他名单上的所有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但她随心所欲地掌管着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老鸨。在最好的年景里，她曾做出一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事业，无愧于她在战时获得的封号：大众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为之倾倒，也曾有些军界要人和文化名流趴在她肩头哭泣，他们个个都自认为卓荦不凡，有些的确如此，但有些却名不副实。不过，有一件事倒千真万确，拉法埃尔·雷耶斯总统曾在访问本城期间，利用两场会晤的间歇，用匆匆半小时授予了她一份终身抚恤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虽然她并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欢愉当作礼品分发给众人。她的不检点行为确实众所周知，但谁也无法拿出不利于她的确凿证据来，因为她那些身份显赫的同谋们像保护自己性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丑闻，损失最为惨重的将是他们，而不是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亵渎了自己不付钱的神圣原则，她也为他破了自己连丈夫也不免费的老规矩。他们以象征性的价钱成交，一次只收一比索，但她不亲手接，他也不亲手给，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存钱罐里，攒够一定数量后，就拿到“代笔人门廊”去随便买一件别致的外国小玩意儿。正是她使得他在便秘时期使用灌肠剂时有了不同的快感，并说服了他与她分享灌肠剂，在他们疯狂的下午时光一起使用，试图在爱之中创造出更多的爱来。

在这许许多多的冒险幽会中，他认为唯有一个女人让他幸运地尝到了一滴苦涩的滋味，那就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萨拉·诺列加。她在圣牧羊女疯人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整日不停地背诵淫秽的旧诗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让其他疯女人更疯。然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管了CFC的全部重任后，就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心情去找人代替费尔明娜·达萨了：他知道，她是不可取代的。渐渐地，他落入了常规，只去看那些他已经结交的女人，只要她们还能为他提供欢愉，只要他还有能力，只要她们还活着，他就和她们做爱。而到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一个情妇了，只有一个。她刚刚年满十四岁，具备一切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得发狂的特质，这是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都没能做到的。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从父亲港的海滨来到这里。她的家人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她的校外监护人，并称二人间有亲戚关系。家里人送她来时，她身上带着一份供她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政府奖学金，还有铺盖卷和一只像洋娃娃用的马口铁皮小箱。从她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色辫子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无数个星期日午后的小憩时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还是个孩子，锯齿般的牙齿，膝盖像小学生的那样光滑，但他即刻就隐约地预见到她将很快成为哪一种女人。在漫长的一年中，他为自己精心地培育着她，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日带她去公园，吃冰激凌，伴她度过一个个童年般纯真的黄昏，赢得了她的信任和喜爱。他以慈祥祖父般的温和，狡诈地牵着她的手，逐渐把她领向自己的地下屠场。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天堂的大门为她敞开了。花蕾瞬时绽放，令她漂浮于幸福的净界之中。这对她的学业是一种有效激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

机会，她始终保持着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而对他来说，这是他暮年港湾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这么多年一次次精心算计的爱情之后，天真无邪的生涩味道别有一番新鲜的堕落的快乐。

两人契合之极。她表现的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一个在一位饱经风霜、对一切司空见惯的可敬男人的引领下，准备好去了解生活的姑娘；而他则有意识地扮演起他原本最怕成为的角色：一位年老的恋人。他从没有把她和费尔明娜·达萨比较过，尽管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不止是年龄、校服、发辫和欢快奔放的走路方式，就连那高傲任性的性格都十分相像。更有甚者，曾经爱情于他最大的诱惑便是找到一个费尔明娜·达萨的替代品，可如今这想法竟被彻底地抹掉了。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而且最终，他怀着一份人到暮年的狂热欢欣，爱上了她本来的样子。她是唯一一个他倍加小心地防止其受孕的女人。幽会了六次以后，对两人来说，都再没有任何美梦可以和星期日的下午相比。

他是唯一有权把她从寄宿学校里接出来的人。他坐着CFC的六缸哈德逊汽车去找她。有时，在没有太阳的下午，他便降下车篷带她去海滩兜风。他戴着他那顶忧郁的帽子，她则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护住与校服配套的水手帽，以免它被风吹跑。有人跟她说，除非必要，否则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走在一起，不要吃他尝过的任何东西，也不要离他的呼吸太近，因为衰老是会传染的。可她毫不在乎。两人全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毕竟，他们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更何况年龄相差甚远，这让他们避免了一切猜疑。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做完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制内心的惊慌。在他年轻的时候，丧钟仪式是包含在葬礼的价格中的，只有那些一贫如洗的

人才会负担不起。但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保守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巩固了殖民时期的习俗，葬礼变得极其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付得起费用。大主教但丁·德鲁纳死的时候，全省的钟没有停歇地敲了整整九天九夜，公众惊恐万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把丧钟仪式从葬礼中单列出来，只有最显赫的死者才有权享受。所以，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圣神降临节的下午四点听见大教堂响起丧钟时，他仿佛觉得早已逝去的青年时期的幽灵又来拜访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自从在大弥撒的出口处看见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费尔明娜·达萨的那个星期日起，多年以来他一直满心期待的丧钟。

“见鬼！”他在昏暗中说道，“肯定是哪条大鱼，才会让大教堂敲起丧钟来。”

全身赤裸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刚刚醒来。

“应该是因为圣神降临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教堂的事务丝毫也不在行，自从跟一个教他拉小提琴的德国人一起在唱诗班拉过一段时间琴之后，他便再也没去望过弥撒。那个德国人还教给他发电报的学问，但关于他的去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不过，他确信无疑，这钟声不是为圣神降临而敲响的。他知道，城中确实有一场葬礼。那天早上，一个加勒比流亡者委员会的代表到他家，通知他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清晨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虽然与他交情不深，却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流亡者是朋友，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公共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的，他是个不信教的军人，还是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何况，他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可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照进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苍白的身体上映出一道道虎皮似的斑纹。她还远没有到能够想到死亡的年龄。午饭后，他们做了爱，此时正处在午睡后似醒非醒的昏沉中，两人赤裸着身体，躺在叶式吊扇下，吊扇的嗡嗡声并不足以掩盖那一只只在晒得滚烫的锌皮屋顶上走动的兀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她，就像爱其他偶然出现在他漫长生命中的女人，但对她的爱却带有更多的辛酸，因为他确信，等她从高等学校毕业，他早已衰老而死。

这个房间更像船上的一个舱室，墙壁上嵌的木板条也给人轮船的感觉，一层层地刷过很多次漆。尽管床上方挂着吊扇，但下午四点时，由于金属屋顶的反射，这里比河道上的船舱要热得多。与其说这是间正式的卧室，不如说是间陆地舱室，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命人在他的CFC办公室后面建的，没有别的目的和借口，不过就是为了给他的暮年爱情提供一个不错的巢穴。平日里，码头工人吵吵闹闹，河道港口的吊车震耳欲聋，轮船的汽笛声也响彻云霄，在这里很难睡得着觉。但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说，这里是星期日的天堂。

圣神降临节那天，他们本想一起待到她必须回寄宿学校的时候，也就是《三钟经》祈祷前的五分钟，但丧钟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想起他许诺过去参加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于是他比平时更快地穿好衣服。而在此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先给女孩编好做爱前他亲手散开的辫子，然后把她抱到桌上，为她系上校鞋的鞋带，她自己总是系不好。他毫无邪念地帮她，而她也配合他完成这些事，就好像是一种义务：从最早的幽会起，两人便都失去了对年龄的意识，互

相信任，就像一对一生中互相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彼此间已无话可说的夫妻。

因为是假日，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锅炉已经熄灭的船。天气闷热，预示着今年的又一场雨就要降临，然而，此刻空气纯净，加之星期日的港口格外宁静，这一切又似乎使人觉得这是个温和的月份。比起昏暗的舱室，这外部的世界更加酷热难耐，丧钟也更让人悲伤，虽然还是不知它为谁而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孩走下台阶，来到遍地硝石的院中，这里原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仍留有磅秤的残件，以及现已生锈的曾在奴隶交易中使用的各种铁器。汽车正在仓库的阴凉处候着，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车从鸡笼式铁丝网围着的仓库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穿过灵魂湾老市场的空地。那里有几个几乎全裸的成年人在玩球。在一阵飞扬的灼热尘土中，汽车驶出了内河港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但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他心中疑惑。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在他耳边大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

“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可当司机告诉他医生是怎么死的，他瞬间涌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是真的。通常，一个人的死法最能彰显其为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法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起来荒唐，但那的确就是他：本城最高寿、医术也最高明的医生，此外，还由于其他诸多功绩，位列本城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八十一岁，试图去捉一只鹦鹉，结果从芒果树杈上摔下来，跌断脊椎而亡。

从费尔明娜·达萨结婚时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基于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并不像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预见的那样，因胜利的激动而颤抖万分，相反，他颤抖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感所包围：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敲。

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坐在他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坏了，问他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自己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我得再活五十年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你听。”

他忘记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他把女孩放在了寄宿学校的大门口，匆忙向她允诺说下星期六再来接她。接着，他便命令司机送他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去。他在附近的街道上看到蜂拥而至的汽车和出租马车，房前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宾客们在庆祝宴会的高潮时忽闻噩耗，乱哄哄地赶了过来。家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愣是挤出了一条道来，走到主卧室门前。他踮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一群人的头顶望去，只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躺在双人床上，正在过屈辱的死亡之潭，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第一次听说他起，就希望看到的样子。木匠刚刚为棺材量过尺寸。在他身旁，费尔明娜·达萨还穿着为参加午宴而换上的如同新婚老妇似的衣服，若有所思，神色黯然。

自从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这项胆大妄为的爱情事业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这一刻最微小的细节都预想到了。为了她，他不太计较手段地得到了名誉和财富，为了她，他细心保护着自己的健康和外表，其严谨程度会让同时代的其他男人觉得缺乏男子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了什么人或事物像他这样等待：片刻也不曾气馁。终于证实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这为他注入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明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她重申了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心里并不否认，那是个轻率的举动，丝毫没有顾及时间和方式，但他如此匆忙是因为害怕机会失去就永不再来。他真心希望能以一种不这么莽撞的方式，而且他也的确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命运不容他有别的选择。他从那个服丧的家里走出来，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把她留在了和自己一样的激动状态之中。但同时他又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因为他感觉到，这个残酷的夜晚是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两人命运之中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他不断绝望地问自己，没有他在身边的费尔明娜·达萨会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交到她手中，在余下的岁月里她会怎么做。他遭受了便秘的折磨，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不得不求助于缓和剂，这可并不比灌肠剂舒服。和新的疾病相比，他更能忍受这些老毛病，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就了解它们了。可此时，所有的老毛病却一齐向他袭来。休息一周之后，星期三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莱昂娜·卡西亚尼看到他竟苍白和邋遢到如此地步，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让她平静下来：不过是像平时一样，又失眠了。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才没有让真相从他伤痕累累的心中滑落出来。大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好让他静心思

考。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

---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意大利语。

[3]圣枝主日，天主教节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标志着复活节圣周的开始。

[4]西班牙语中，称一个男人头上长犄角，暗指其妻子不忠。

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想到，她在一股无名邪火的驱使下写的那封信，竟会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视作情书。信中，她倾泻了所有她能倾泻的愤怒，说了最残忍的话，以及最伤人乃至不公的诋毁。然而，在她看来，这些跟她所受的巨大侮辱相比，仍旧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痛苦地驱除心中魔鬼的最后努力，试图以此适应她的新处境。她想找回自我，重获半个世纪奴仆般生活中被迫放弃的一切。那种生活无疑曾使她幸福，然而丈夫一死，她甚至无法找到自我的一点点痕迹。她像是别人家中的一个幽灵，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一夜之间变得空阔而孤寂的房子里，不断痛苦地自问，究竟谁是亡者：是死去的丈夫，还是她这个留下来的人。

她无法摆脱隐藏在心底的怨恨，怨丈夫将她孤零零地遗弃在这汪洋大海之中。他的一切都会让她潸然落泪：枕头下的睡衣；那双在她看来只有病人才会穿的平底拖鞋；记忆里，她在床边梳头准备睡觉时，镜子深处的他脱掉衣服的情景；还有他皮肤的气味，在他死后还久久地留在她的皮肤上。无论正在做什么，她都可能会中途停下来，拍拍自己的额头，因为突然想起有什么事忘记告诉他了。她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出无数个日常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他曾经说过一件令她匪夷所思的事情：截肢后，患者仍能感受到已不存在的那条腿上的疼痛、痉挛和瘙痒。这正如她失去他以后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她却仍觉得他就在那里。

当她在成为寡妇后的第一个早晨醒来，闭着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想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睡下去，就在这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他死了。也只有在这时，她才察觉到，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另一个触动她的情境是在餐桌前，但不是因为感到孤单，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她奇怪地相信，自己正在同某个已不存在的人一起用餐。直到她女儿奥菲利娅跟丈夫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一起从新奥尔良来了以后，她才再次来到餐桌前吃饭，但也没用以前一直用的那张桌子，而是换了一张她让人放在走廊里、小一些的临时餐桌。在此之前，她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饿的时候，她就随时走进厨房，把叉子伸进锅里，有什么就吃点什么，也并不用盘子，而是站在火炉前，边吃边同女佣们说说话，她们是唯一能让她感到轻松一些、好过一些的人。然而，无论怎样努力，她死去的丈夫都仿佛无处不在：不论她去哪儿，从哪里走过，也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碰到某件他的东西，让她又想起他来。尽管在她看来，悲痛是忠贞的，也是合理的，但她还是希望尽一切可能不在痛苦中沉迷下去。于是，她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将所有能让她想起亡夫的东西全部清出家门，这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唯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活下去。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清理仪式。儿子同意将书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好让她把这里改成缝纫室，自结婚以来，她还从没有过一间缝纫室。女儿则会带走一些家具和许多件她觉得适合在新奥尔良的古董行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都让费尔明娜·达萨轻松了许多，尽管当她了解到自己在新婚旅行中买回来的东西已变成了古董商的文物时，心中有些不快。她不顾佣人、邻居以及那些日子赶来陪她的女友们沉默的惊愕，让人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篝火，一股脑儿地烧掉了所有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上世纪以来城中所能见到的最昂贵、最

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鞋子，比照片更具他本人风格的帽子，他临死前从上面起身的午睡摇椅，以及无数件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他本人一部分的物品。她做这些时没有一丝犹豫，完全确信丈夫也会同意这样做，还不仅仅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他曾多次表达过死后火化的愿望，不愿被囚禁在那黑暗的、没有一丝缝隙的雪松木盒子里。当然，他信奉的宗教禁止他这样做：他曾大着胆子探问过大主教的看法，但大主教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这纯属妄想，教会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墓地上设置火葬炉，即便是专供非天主教徒使用也不行。事实上，除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谁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但费尔明娜·达萨深深记得丈夫的恐惧，即便是在最初那几个小时的恍惚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能透光的缝隙，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但不管怎样，那次焚烧行动是徒劳的。费尔明娜·达萨很快便发现，对亡夫的记忆不仅经得住火烧，而且似乎也经得住时间的流逝。更糟的是，当衣物化成灰烬，她不但依然十分怀念丈夫惹人喜欢的地方，而且也怀念起他令她心烦之处，比如每日起床时他弄出的声响。这些回忆帮助她走出了痛苦的丛林。于是，她再次下定决心，要带着对丈夫的回忆继续生活下去，就好像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依旧会很痛苦，但慢慢会好起来的。

果然，三个星期以后，她开始看到曙光。可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幽灵，让她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福音花园偷偷窥视她的让人可怜的幽灵，不是那个她进入暮年以后还时常怀着某种柔情想起的幽灵，而是那个穿着刽子手的长礼服、把帽子拿在胸前的令人厌恶的幽灵。他愚蠢的无礼行为让她心烦不已，以至于总是挥之不去。

自从十八岁那年拒绝他以后，她一直觉得自己在他身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时间将使这种子生根发芽。她时刻都感觉到这种仇恨，每当这个幽灵离她很近，她都能在空气中闻到仇恨的味道，单是看他一眼，就使她心慌意乱。她是那么怕他，以至于在他面前，她始终找不到一种自然的方式让自己举止得体。那天晚上，当他向她重申爱情时，纪念亡夫的鲜花所散发的芳香还在房子里弥漫，她不能不把这种无礼的言行视作他报复行为的第一步，谁又知道这之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阴险的企图呢。

他固执地占据着她的脑海，这让她怒火中烧。葬礼的第二天，她一醒来就想起了他，但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她又成功地把他从头脑中清除出去了。但怒火总是会不断回来，她很快就发现，想忘掉他的极大渴望便是最强烈的诱因，迫使她不得不想起他来。于是，她第一次被怀旧的情绪笼罩，壮着胆子回想起那段缥缈爱情的虚幻时光。她试着细细回想那时的小花园，干枯的杏树，以及他坐的那条长凳，试着回想这一切原本都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全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一切都已改变。那些树，连同满地的黄色落叶都不见了。在那个被斩首的英雄塑像的位置，人们树起了另一尊穿着华丽制服的雕像，没有姓名，没有日期，也没有说明建造缘由，但它有一个很气派的墩座，里边安着该地区的电力控制装置。她家的房子早在多年前就已卖掉，如今在省政府的手里破败得快散了架。要想象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时的样子，对她来说已殊非易事，而要把那个站在雨中的沉默寡言、无依无靠的小伙子，和现在这个体弱多病的腐朽老头儿认作同一个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老头儿完全不顾她的处境，对她的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就那么站到她的面前，用烈火般的侮辱灼烧着她的灵魂，至今都让她心烦得喘不过气来。

当初，她为了从林奇小姐那桩倒霉事中恢复过来，到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表姐的马利亚之花庄园住了段日子，之后不久，表姐也来看望过她。表姐来的时候，又老又胖，但很幸福，由大儿子陪着。像父亲一样，她的大儿子已当上了陆军上校，但由于不光彩地参与了对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香蕉园工人的屠杀，曾被父亲拒之门外。两姐妹多次相见，每次都把时光消磨在回忆之中，回忆着她们初识的那个年代。最后一次来访时，伊尔德布兰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念古老的好时光，并为眼下的年老体衰感慨万千。为了更好地沉浸在往事中，她带来了那张她们打扮得像古老贵妇似的照片，是那个比利时摄影师拍的，也正是在那个下午，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优雅地刺中了任性的费尔明娜·达萨的心房。费尔明娜·达萨自己的那张照片已经丢了，而伊尔德布兰达的这张也几乎快看不清了，但两人还是在那令人伤怀的模糊影像中认出了自己：那样的年轻、漂亮，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

要想让伊尔德布兰达不提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一直认为他的命运与自己的十分相似。她回想起她第一次发电报那天看到他的样子，那个注定被恋人遗忘的可怜小鸟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她心中抹去。而费尔明娜·达萨呢，她后来见过他很多次，当然，并没有跟他说话，但她无法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初恋爱人。总是有关于他的消息传到她这里，就像城中所有那些稍有点影响的人物只要有消息迟早都会传到她耳中一样。人们说他从未结过婚，因为他的兴趣与众不同。但这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她从不理会传言，另一方面则因为人们对很多无可指摘的男人也会有类似的议论。但她觉得奇怪的，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始终穿着他那身古怪的衣服，使用奇怪的沐浴露，而且，在他以如此引人注目和值得尊重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了道路之后，却仍然神秘得像个谜一样。她无法

相信他就是当初那个人，每当伊尔德布兰达感叹“可怜的人，他受了多少苦啊”的时候，她总是惊讶不已。因为从很久以前开始，她看到他时就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他已是一个从她心里被抹去的影子。

然而，在电影院遇到他的那个晚上—那也是她从马利亚之花回来后不久的事—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身边有个女人，而且是个黑女人，她并不感到惊讶。她诧异的是他竟保养得那么好，举止甚至比以前更加洒脱自如。她没有意识到，当林奇小姐令人烦恼地闯入她的私生活后，发生改变的自然应该是她，而不是他。从那时起，二十多年里，她带着更为同情的眼光看他。在为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她不仅认为他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认为他对她的怨恨已自然地结束了：他的现身是原谅与遗忘的象征。所以，他竟然戏剧性地向她重申了在她看来从未存在过的爱情，实在出乎她的意料，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无论他还是她都只能安于天命的年纪。

在为丈夫举行了象征性的火葬仪式后，第一次冲击给她带来的不可遏制的愤怒不但丝毫没有削减，而且越来越无法控制，甚至节外生枝起来。更有甚者，她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死者的回忆，记忆的空间却被那片罂粟花缓慢而无情地占据，那里埋葬的是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一切。就这样，她不情愿地想着他，越想越愤怒，而越愤怒就越想，直到最终无法忍受，几乎要发起疯来。于是，她坐到亡夫的写字台前，丧失理智地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满是侮辱和恶毒的挑衅。如此主动地做了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不体面的一件事后，她内心感到安慰。

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几个星期也是极其痛苦的。向费尔明娜·达萨重申爱情的那天晚上，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被下午的大雨破坏殆尽的街道上，惊恐地自问，他刚刚杀死了围困自己半个多

世纪的老虎，接下来该拿虎皮怎么办。由于暴雨肆虐，城市处于危急状态。一些房子里，半裸着身体的男女正试图依上帝的旨意从洪水中抢救出点儿什么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这场众人的灾难仿佛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此刻，风平浪静，加勒比的星星也静静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忽然，在一片寂静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一个男人的歌声，那正是许多年前他和莱昂娜·卡西亚尼在同一时刻、同一个街角听到的歌声：我从桥上回来，泪流满面。那样的一首歌，那样的旋律，那样的夜晚，仿佛只为他而存在，且与死亡有着某种关联。

他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想念特兰西多·阿里萨，想念她睿智的话语，想念她用纸花装扮起来的可笑的女王发式。无可避免，每当处在灾难的边缘时，他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庇护。于是，他一路寻着可以找到女人的方向，来到师范学校，看见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宿舍的一长排窗户上有一盏灯光。他做出了很大努力，才没让自己陷入老祖父的疯狂，在凌晨两点钟，把正在温暖的襁褓里安眠、还散发着摇篮的哭泣味道的孙女带走。

在城市的另一端，莱昂娜·卡西亚尼孤独而自由，毫无疑问，她愿意在凌晨两点、三点，或是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为他提供他需要的同情。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失眠的荒原中去敲她的门，但他知道，她太聪明，他们彼此又爱得太深，他不可能只伏在她膝上哭泣而不告诉她原因。想了许久，也像梦游一样在荒凉的城市中徘徊了许久，他终于想起找哪个女人都不如找普鲁登西娅·皮特雷，那个“二夫寡妇”。她比他岁数小。他们上世纪就已相识，后来不再见面，是因为她坚持不愿让人看见她那时的样子：眼睛半瞎，已到了苍老的边缘。一想到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立刻回到窗户街，在一个购物

袋里装上了两瓶波尔多葡萄酒和一小瓶腌菜，然后便去看她，尽管他都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是否一个人，甚至是否还活着。

普鲁登西娅·皮特雷没有忘记他挠门的暗号，问都没问便给他开了门。在他们还自以为年轻其实不然的时候，他一直用这个暗号来表明身份。他穿着黑呢子衣服，戴着硬礼帽，胳膊上挂着一把蝙蝠似的雨伞，在漆黑一片的街上几乎辨不出身形。她的眼神不好，光线又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但借着路灯照在他眼镜的金属框上反射出的光亮，她认出了他。他看上去就像个双手还沾满着鲜血的杀人凶手。

“请收留一个可怜的孤儿吧。”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话，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他很惊讶，自从上一次见面以来，她竟衰老了这么多，而且他很清楚，她心里一定也是这样看他的。但他又自我安慰地想，等过上片刻，当两个人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过来之后，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在对方身上留下的伤痕并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就又会觉得彼此依然像当初认识时那样年轻了。

“你的样子就像是要去参加葬礼。”她说。

确实如此。而她也像几乎全城的人一样，从十一点钟起就守在窗前，观看自大主教德鲁纳死后出席人数最多也最豪华的送葬队伍。震撼大地的隆隆炮声、军乐队吹奏出的不和谐乐声，以及盖过了所有教堂自前一天起就敲个不停的丧钟的哀歌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把她从午睡中惊醒。她自阳台上看见穿着仪仗队制服骑在马上的军人、宗教团体、学校学生、政府要员乘坐的黑色长轿车、葬礼马车（拉车的马匹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的盔帽，身上披着金色披挂），以及一辆历史

悠久的炮车，上面载着盖有国旗的黄色棺木，走在最后的是一列至今仍用来运送花圈的老式敞篷马车。午后不久，送葬队伍刚从普鲁登西娅·皮特雷的阳台前经过，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人群惊慌散开。

“这样的死法真是荒唐啊！”她说。

“死是不会有滑稽之意的。”他说，又感伤地补了一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他们坐在露台上，面对广阔的大海，望着光晕几乎占据了半个天空的月亮，欣赏着地平线上一条条轮船的五彩灯光，享受着暴风雨后温和芳香的微风。他们一边喝着波尔多葡萄酒，一边就着腌菜吃着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从厨房的一个乡村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她无儿无女，自从守寡后，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遇见她时，正是她可以接待任何愿意陪她的男人的时候，即便那男人是按小时租来的。但两人最终却建立起一种比表面看上去更严肃、也更长久的关系。

尽管她从没有暗示过，但如果能与他一起再次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即便是让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她也会心甘情愿。她知道，要适应他的吝啬，他早熟外表下不谙世事的执拗，他古怪的性情，他只知索取、不愿付出的渴望，这一切都不容易，但尽管如此，却没有哪个男人是比他更好的伴侣了，因为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需要爱。但同时，也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油滑，因此，他们的爱从不会超越他所掌控的界线：一切以不干扰他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自由之身的决心为准则。不过，他们的爱情还是持续了很多年，即便是在他安排好一切，让她嫁给了一个商业代理人后依旧如此。那个代理人每次在家

里待三个月，然后便要四处跑三个月，她和他有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据她发誓说，其中一个儿子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

他们不顾时间地交谈着，因为自年轻时起两人就习惯了分享失眠之夜，老了以后，失眠就更不会让他们失去什么了。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酒几乎从不超过两杯，可这回，三杯下肚后，他仍旧没缓过气来。他汗如雨下，于是“二夫寡妇”让他脱掉外套、背心和长裤，如果愿意，全部脱掉也可以，这他妈的又算什么，说到底，比起穿着衣服，他们赤身裸体时更加了解对方。他说，如果她脱，他就脱。可她不愿意：很久以前，她就在衣橱的镜子里照过，立刻明白，她不会再有勇气让他或者任何人看见自己的裸体。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处于兴奋之中，喝了四杯波尔多还是静不下来。他继续回忆往事，述说着美好的过去，从很久以前开始，这就是他唯一的话题了。事实上，他迫切希望的，是从对往昔的回忆中找到一条秘密之路，以让自己得到发泄。因为这就是他急需的：把灵魂从嘴中释放出来。当他看到地平线上最初的几道光亮时，尝试着旁敲侧击地接近目标。他用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问道：“比如像你这样，身为寡妇，又到了这把年纪，如果有人向你求婚，你会怎么办？”她笑了，笑出一脸老太婆的皱纹，反问道：

“你是在说乌尔比诺的寡妇吧？”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在最不该忘记的时候忘记这一点：女人们对问题中隐含的意思比对问题本身想得更多，而普鲁登西娅·皮特雷尤其如此。她一针见血得令人心惊胆寒，他惊慌失措，想赶紧找一扇假门溜走：“我是说你。”她又笑了：“去逗你的婊子娘吧。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她催他把想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无论是

他，还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在久别多年之后，仅仅为了喝波尔多、吃乡村面包就腌菜而在凌晨三点把她叫醒。她说：“只有当一个人想找人大哭一场时，才会这样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败下阵来。

“这回你可错了。”他说，“我今晚来其实是为了唱歌。”

“那咱们唱吧。”她说。

他用动听的嗓音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曲：拉蒙娜，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这一夜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不敢再和这个已反复证明了她了解月亮的另一面的女人玩这种禁忌游戏。他走出门去，仿佛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六月里最后的大丽花香飘四溢，而他仿佛走在年轻时的街道上，又一次见到一个接一个的寡妇在黑暗中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但如今，是他，而不是她们，不得不走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去，为了不让人看到他止不住的泪水。这眼泪并非他以为的那样，是从半夜开始抑制不住的，而是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以来，他一直强压在心头的泪水。

当他在一扇耀眼的窗前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和女佣们在花园里玩球的声音把他带回了现实：他躺在母亲的床上，这间卧室始终保持着原样，在少有的孤独让他不安的时候，他常常睡在这里，以减少一点寂寞。床对面是堂桑丘餐厅那面大镜子，每每醒来时就能看见它，看见镜子深处反射出的费尔明娜·达萨的身影，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了。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因为每到这一天，司机便会从寄宿学校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接出来，送到他家。他意识到之前他一边梦见自己无法入睡，一边却不知不觉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被费尔明娜·达萨愤怒的

脸庞扰得心神不宁。他一边洗澡，一边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慌不忙地穿上最好的衣服，喷了香水，给那两撇尖尖的白胡子上胶。刚走出卧室，他便从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了那个穿校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跃起身子接住空中的皮球，那迷人的身姿曾在那么多个星期六让他战栗不止，但这天早上，却没有在他心中激起丝毫涟漪。他示意她跟他走。上汽车前，他毫无必要地对她说：“今天我们不玩小游戏。”他带她来到美洲冷饮店，那里挤满了和孩子一起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好几层的冰激凌，装在一只巨大的杯子里，每一层的颜色都不同。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这里卖得最好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一言不发地看着女孩，她用一把很长的勺子吃着冰激凌，一直够到杯底。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说道：

“我要结婚了。”

她拿着勺子的手停在空中，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她看着他的眼睛，随即又镇静下来，笑了笑。

“撒谎，”她说，“老头儿是不会结婚的。”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去看了公园里的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代笔人门廊”那儿买了准备带回寄宿学校的各种甜食，又乘着敞篷汽车在城中转了几圈，这都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一点，即他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人。之后，在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中，刚好赶在《三钟经》祈祷之前，他把她送回了学校。星期日，他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伴们外出散心，但他不想见她，因为从上星期起，他

已完全意识到了两人年龄上的差距。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要给费尔明娜·达萨写一封请求原谅的信，哪怕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放弃，但最后又决定第二天再写。星期一，就在饱受煎熬整整三个星期的时候，被大雨淋得湿透的他走进家门，发现了她的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睡下，她们留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好照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卧室。他知道，他那简单乏味的晚餐就摆在饭厅的桌子上，很多天以来，他都只是随便吃两口东西，而此刻，好容易累积下来的一丝饿意又因为激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由于双手颤抖，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卧室的大灯点亮。他把湿漉漉的信放在床上，点亮床头柜上的小灯，故作镇定—这是他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一贯做法。他脱掉湿透的外套，把它挂在椅背上，又脱掉背心，折好放在外套上，然后，他解下黑色的丝质领结，摘下如今已经过时的赛璐珞衣领，把衬衫的扣子解至腰间，松开皮带，以便更好地呼吸，最后，他摘下帽子，把它晾在窗边。突然，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忘记把信放到哪里去了，这让他紧张万分，以至于最后找到信时大吃一惊：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把它放到床上了。打开之前，他用手绢擦干信封，小心翼翼不让写着自己名字的墨水洇开。这样做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秘密已非他们两人独享，而是至少有第三人知晓，因为不管送信人是谁，那人必会注意到乌尔比诺的遗孀在丈夫死后仅三个星期便写信给一个她圈子以外的人，而且如此急迫，没有通过邮寄，还如此神秘，嘱咐他不能交到对方手中，而是要像匿名字条一样，从门下塞进来。他无需撕坏信封，因为胶水已被水浸开了。但信还是干的：密密麻麻的三页纸，没有抬头，末尾签名是她婚后姓名的首字母。

他坐在床上，先飞快地读了一遍。比起内容来，信的语气更让他好奇。还没读到第二页，他就已经知道这正是一封他一直在等的辱骂信。他把信展开，放在床头灯的光亮下，然后脱下湿漉漉的鞋袜，走到门口熄了大灯，戴上岩羚羊皮的护须罩，没脱裤子和衬衫就躺了下来，头倚在他阅读时常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又读了一遍，这次是一字一句，逐字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隐藏的含义。之后，他又读了四遍，直到脑中充满了那些字句，而它们开始失去原本的意义。最后，他把没套信封的信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两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那面她曾出现在其中的空镜子，几乎没有了呼吸，比死人还像死人。午夜十二点整，他来到厨房，煮了一壶浓得像原油似的咖啡，拿到房间里，然后将假牙放进床头柜上一直为他准备好的硼酸水中。之后，他又恢复了刚才那种大理石像似的躺卧姿势，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呷一口咖啡，只在这片刻才动弹一下，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女佣又送来满满一壶咖啡。

这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做了。事实上，那些侮辱并没有让他心痛，他也无意去澄清那些不公的罪名，他了解费尔明娜·达萨的性格，也清楚她此番义正词严的理由，她的言词原可以更锋利些的。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甚至是承认了他有权回复。进一步说，她其实是在要求他做出答复。这样一来，生活此刻正处于他期望中的转捩点。剩下的一切就看他的了，他十分确信，自己那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私人地狱还会将很多生死考验摆到他面前，而他也准备好了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痛苦和爱去面对它们，因为这将是最后的考验。

接到费尔明娜·达萨的信五天以后，他来到办公室时，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某种突如其来而又不同寻常的打字机真空之中，那机器平日里雨点般的声音反而让它的寂静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原来，是它暂时停了下来。当声音重新响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身子探进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办公室，看见她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而那台机器像有灵气似的在她的指尖下听从着指挥。她发觉有人在窥视她，便带着她那令人生畏的灿烂微笑朝门口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直到把那段文字打完。

“告诉我一件事，我亲爱的母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如果你收到一封用这玩意儿写的情书，你会有何感觉？”

早已处事不惊的她听了这话，也露出惊诧的表情。

“天哪！”她惊呼道，“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因此，她也就无法做出其他回答。而在此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他决定冒险到底。他将办公室的一台打字机搬回家，引来下属一片友好的嘲笑：“老鹦鹉是学不会说话的啦。”莱昂娜·卡西亚尼对任何新鲜事都抱有热情，自告奋勇到家中去给他上打字课。可是，自从洛达里奥·图古特想教他按照乐谱拉小提琴的时候起，他就反对系统学习。洛达里奥·图古特吓唬他说，入门至少需要一年，要想得到专业管弦乐队的认可，需要五年，而若想真真正正拉好琴，则需要一生的时间，而且每天都要练习六个钟头。可他最终说服母亲给他买了一把盲人小提琴，按照洛达里奥·图古特教给他的五条基本规则练了不到一年，就敢去大教堂的唱诗班里演奏，还能从贫民墓地根据风向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一首首小夜曲。

如果说能在二十岁学会像拉小提琴那样困难的事，他想不出自己为何就不能在七十六岁学会像打字这样只需要动用一根手指的活计。

他想得没错。他用了三天时间来记住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又花了六天时间学会如何一边打字一边思考，最后用三天时间，在撕碎了半令纸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他用了一个庄严的抬头：夫人，落款则是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像年轻时那一封封飘香的信一样。他把信邮寄出去，用的是绘有哀悼纹饰的信封，这是给新近孀居的寡妇写信的规矩，并且，信封背面没有署寄信人的姓名。

这是一封六页的信，和过去他写过的任何一封信都大相径庭。没有了初恋时的语气、文风和飘逸修辞，论述得如此合情合理，而且恰如其分，以至于若配上栀子花的香气都会显得唐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写得最接近商业信函的信，尽管他从来也没写好过这类信件。多年以后，一封用机器打出的私人信件几乎会被视作一种侮辱，但在当时，打字机还是办公室里的一头猛兽，尚没有自己的伦理特征，礼仪教科书也还没预见到它将被驯化用于私人用途。这更像是一种大胆的现代主义行为，至少费尔明娜·达萨定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就在她写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二封信中，一开头就请求他原谅她潦草的字体，因为她没有比钢笔更先进的书写工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信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寄给他的那封可怕的信，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诱导她，对过去的爱情只字不提，连带过去的一切都不再提起：所有往事一笔勾销，一切重新开始。他写下的更像是对人生的一种广泛性的思考，依据的是多年来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和经验，他曾一度想把这些作为《恋人指南》的增订本写出来，只不过此时，他把这种思考隐藏在一种家长式的淳朴文风之下，如同一个老者的回忆，为的就是不那么明

显地被人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封倾诉爱情的书信。他原本也按照旧时的文风写了很多份草稿，但以冷静的头脑一读再读之后，最终在一瞬间把它们付诸一炬。他知道，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疏忽，或者哪怕轻率流露出的一点点怀旧之情，都可能搅起她对往事的反感。虽然他预料到她有可能在鼓足勇气打开第一封信之前先退上个上百封信，但还是盼望这样的事一次也不要发生。所以，他像筹划最后一场决战那样，对每个细枝末节都思虑周详：一切都要与众不同，如此方能在一个于巅峰上过完一生的女人心中激起新的好奇、新的兴致和新的希望。这封信应该要提供一种蠢蠢欲动的幻想，并且给予她足够的勇气，把某个阶层的不公偏见扔进垃圾堆里去。她原本并不出身于那个阶层，可那个阶层最终却变得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像她的出身之处。这封信应该教会她把爱情想成一种美好的状态，而非达到任何目的的途径，爱情自有其本身的起点和终点。

他清楚地知道不能期待立刻得到答复，其实只要信不退回，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果然没有退回来，以后的每一封也都没有退回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焦虑与日俱增。越久不见退信，他就越希望得到一封回信。一开始，他写信的频率取决于他手指的灵活程度：先是每星期一封，后来每星期两封，最后是每天一封。对于邮电事业从他当旗手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步，他备感欣慰，因为他不必再冒被人发现每天到邮局去给同一个人寄信的风险，也不必冒险找人送信，因为这人有可能把事情说出去。相反，只要派一个职员买回能用上一个月的邮票，再把信塞进分布在老城区的三个邮筒中的任何一个，这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他把这个习惯纳入了他的生活常规：他利用不眠的夜晚写信，然后在第二天去办公室的路上，让司机在街角的邮筒前停一分钟，自己下车亲自把信放进去。他从不让司机代他投信，尽管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司机曾想帮他这样做。还有时，

他小心谨慎，不止带一封信，而是同时带上好几封，为了显得更加自然。司机当然不知道，那些凑数的信件不过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寄给自己的几张白纸，因为他从不与任何人互通私人信件，除了每个月末会写信给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汇报一下他对姑娘的行为、精神状态、健康情况以及她在学习上取得的好成绩的个人感受。

从第一个月起，他就开始给信编号，像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一样，在每封信的开头对上一封信做一小结，生怕费尔明娜·达萨看不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此外，自从信的频率变成每日一封后，他把带有哀悼纹饰的信封换成白色的长信封，这样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千篇一律的商业信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从一开始，他就准备好让自己的耐心经受更大的考验，至少，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在用所能想出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方法浪费时间，就要坚持下去。的确，他等待着，不像年轻时那样带有种种苦痛烦忧，而是以一个坚如磐石的老人的固执等待。反正，这个老人在一家已经一帆风顺、只身前进的河运公司里也别无他事可想，别无他事可做。他坚信自己能活下去，并能完美地保持他的男性机能，一直等到明天、后天，或者永远等下去。费尔明娜·达萨最终会说服自己，她那孤独寡妇的焦虑与痛苦没有其他出路，唯有向他放下吊桥。

与此同时，他仍旧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由于预见自己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他对房子进行了第二次整修，以使它配得上那个自它被买下来那天起，就该来当女主人的人。他遵守承诺，又去看了几次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以向她证明尽管年岁不饶人，他还是爱她的，而且不只是在孤苦无依的夜晚，有几次还是在大白天，从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他仍旧从安德雷娅·瓦隆的家门前经过，直到有一天看见

浴室的灯熄着，便进去在她的床上粗野地尝试各种疯狂的举动，尽管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失去爱的习惯，其依据是他的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被证伪的迷信，即一个人只要坚持做爱，身体就会一直管用。

唯一的障碍是他与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关系。他继续让司机每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寄宿学校去接她，但他不知道周末该拿她怎么办。他第一次没有亲自陪她，她对这一变化十分不悦。他将她托付给女佣，让她们带她去看下午场的电影，听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会，参加慈善抽奖；又或者为她安排好星期日的活动，让她和同学一起玩，为的就是不必再把她带进办公室后面那座隐秘的天堂—她第一次去过之后，就总想再去那里。他沉浸于对未来的崭新幻想之中，竟没有注意到，女人其实可以在三天内就变得成熟，而自从他到父亲港的机动帆船上把她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不管他如何想让这一变化进展温和，对她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而且她无法明白这其中的缘由。那天在冷饮店里，他告诉她真相，说自己就要结婚了，她霎时间被吓坏了，可随后又觉得这种可能性近乎荒谬，便又把它抛在脑后。然而，她很快看出来，他表现得就像真的一样，总是莫名其妙地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就好像他不是比她大六十岁，而是比她小六十岁似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在他的卧室里试着用打字机打字。她打得相当不错，因为在学校学过这门功课。她已经打了多半页纸，全都是不假思索自动打出来的，但时不时就很容易从某个词中瞧出她的心境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弯下身子，趴在她肩上读着她写的话。他那男人的热气、断断续续的呼吸，以及衣服上散发出的和枕头上一样的香水味，使得她一阵慌乱。她已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了。那时，他得一件一件地为她脱掉衣服，像哄骗

婴儿似的哄她说：先脱掉小鞋子，给小熊穿，再把小衬衫脱下来给小狗穿，再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兔子穿，现在，亲亲爸爸香喷喷的小鸟。不，她如今已成了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女人，喜欢享有主动权。她继续用右手的一个指头打字，左手却在摸索他的大腿，探寻着它，找到了它，感觉到它又复活了、生长了、急促地喘着气，他那老人的呼吸变得磕磕绊绊，艰难无比。她了解他：从这一刻起，他就会失去控制，抛开理智，屈服于她的意志，在一切结束之前，无法再找到回头的路。她拉着他的手，慢慢把他带到床上，就像牵着一个走在街上的可怜的盲人。她带着居心不良的温柔，一块块地把他肢解，按照她的喜好撒上盐、胡椒，再放上一瓣蒜、一片月桂叶，倒进切碎的洋葱和柠檬汁，在盘中腌至恰到好处，而炉子早已调到合适温度，一切都准备妥当。家中没有别人。女佣们出门了，负责修缮房子的泥瓦匠和木匠星期六不干活—整个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但在深渊的边缘，他竟步出了销魂的仙境，推开她的手，坐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小心，我们没有小橡胶套了。”

她仰面朝天地在床上躺了许久，一直在想。当她提前一小时返回寄宿学校时，已经完全不再有想哭的欲望了。她调整好嗅觉，磨尖了爪子，定要找出那只躲在背后搅乱她生活的狡兔的踪迹。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犯了一个男人的错误：他以为她在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已经决定忘记一切了。

他忙着自己的事情。六个月过去了，完全没有一点回音。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明，迷失在一种新的失眠的荒漠之中。他想，费尔明娜·达萨一定由于那淡雅的信封打开了第一封信，也一定看到了那在往日的信中熟识的首字母，她一定是把它扔进了烧垃圾的火堆，

甚至都不愿费事去撕碎它。此后的信，她也定是一看到信封便连拆也不拆地做出了同样处理，直到时间的尽头，而最终，他也文思枯竭，再写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他不相信这世上有女人能抵制住这样的好奇，对半年来每天收到的信是用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都不关心。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女人，那也只可能是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他的智慧渐渐枯竭。在拉曼加的那座别墅周围转悠了几天之后，他意识到，用年轻时的手段终究难以敲开被葬礼封死的大门。一天早上，他在电话簿上寻找某个号码时，偶然找到了她的号码。他拨通了电话。铃声响了好几遍，终于，他听到并辨出她的声音，声音严肃而微弱：“喂？”他没有说话，挂上了话筒，那个虚无缥缈的声音感觉无限遥远，削弱了他的意志。

就在那几天前后，莱昂娜·卡西亚尼庆祝自己的生日，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邀请到她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不在焉，把鸡肉的酱汁洒在了身上。她把餐巾的一角在水杯中蘸湿，为他擦净衣服的翻领，接着又给他戴上围嘴，以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故：这样一来，他简直就像一个老婴儿。她发现，用餐时他好几次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拭，因为他的眼睛不停地流泪。喝咖啡时，他竟然手拿着杯子睡着了，她想不吵醒他，悄悄地把杯子接过来，可是他却惊醒了，尴尬地掩饰道：“我只是在休息眼睛。”莱昂娜·卡西亚尼上床睡觉时，吃惊地想着，他竟已老得这般明显。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一周年时，他的家人送出请柬，邀请大家出席大教堂举行的纪念弥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此时仍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促使他大胆决定，尽管没受到邀请，也要去参加弥

撒。这是一次奢华多过伤感的社交活动。前几排的座位是终身及世袭的荣誉席位，椅背的铜牌上刻着主人的名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早到达的客人之一，为的是能坐在一个费尔明娜·达萨必然会经过并且看见的位置上。他想，最佳位置应该是正殿，在那些保留座位的后面。但出席的人太多了，那里根本找不到空位子。于是，他不得不坐到了穷亲戚们所在的中殿。从那里，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挽着儿子的手臂走进来，穿着一袭黑色天鹅绒裙子，袖子长及手腕，没有佩戴任何首饰，一长排扣子从脖子直到脚尖，就像主教的长袍。她肩上搭着一块卡斯蒂利亚手工编织的窄披肩，而没有像其他寡妇，甚至许多渴望成为寡妇的女人那样头戴面纱帽。她那未施粉黛的脸颊发出一种雪花石膏般的光芒，柳叶形的眼睛在正殿巨大的吊灯下显现出特有的勃勃生机。她走路的时候，腰板是那样的笔直，神情是那样的高傲，姿态是那样的从容，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儿子年龄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那里，用指尖撑着前排座椅的靠背，直到一阵眩晕的感觉过去，他感到自己和她不止七步之遥，而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

费尔明娜·达萨在几乎整个仪式期间都站在正对主祭台的家族座位那儿，像看歌剧一样神态优雅。但最后，她打破礼拜仪式的常规，没有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原地接受人们向她重表哀悼之情，而是走了出来，向每一位来宾表示谢意：这是一个革新举动，与她的为人十分相配。她逐一向大家问候，最终来到穷亲戚的座位跟前。然后，她又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保没有漏掉一位相识的客人。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有一股超自然的风将他从众人中推了出来：她看见了他。费尔明娜·达萨以她在社交场合一贯的敏捷自如离开陪伴在她身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带着极为甜美的微笑对他说：

“感谢您的到来。”

这是因为，她不仅仅收到了他的信，还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并在其中发现了严肃而发人深省的理由让她活下去。收到第一封信时，她正坐在餐桌前，和女儿一起吃早餐。因为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她好奇地拆开了。认出签名的首字母时，她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烧着了一般。但她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神态，将信收进围裙的口袋里，说：“是政府的吊唁信。”她的女儿很惊讶：“所有的吊唁信都已经到了呀。”她泰然自若：“这是另一封。”她本打算等过后女儿不再追问的时候将信烧掉，可最终还是没能抵制住先看上一眼的诱惑。她以为信中是对她那封辱骂信应有的回应，事实上，那封信她刚一送出去便后悔了。可是，从庄重的称谓和第一段的主题，她便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如此好奇，于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以便在烧掉之前能从容地读上一读。结果，她一口气读了三遍。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想法曾无数次像夜间的鸟儿一般扑扇着翅膀掠过她的头顶，可每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就惊飞四散，只剩下散落的片片羽毛。而如今，它们就在这里，清晰明了，正如她自己原本想表达的那样。她又一次感到难过，丈夫已经不在了，无法再和他一起讨论这些，就像每晚睡前他们都会讨论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由此，她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的真知灼见和他年轻时那些炽热的情书不相符，也和他一生阴郁的举止不相符。他的话更像是出自一个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所认为的受到圣神启示的男人之口。这个想法又让她像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那样害怕起来。但无论如何，最令她安心的是，她确信这封由一个睿智老人所写的信并非试图重申葬礼那天的无礼言语，而是意在抹掉过去，可谓高尚之举。

接下来的那些信最终使她平静下来。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读过之后，便把它们烧掉了，尽管随着信一封封地被烧掉，她的心底渐渐沉积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于是，当她开始收到有编号的信时，她终于找到了一直期待的不毁掉这些信的道德依据。无论如何，她最初的意图并非是为自己保留它们，而是想等待机会将它们还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免这些在她看来对人类如此有用的东西被白白扔掉。但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流逝，信件一如既往地到达，整整一年里每隔三四天便收到一封，她却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归还，才能既不让他难堪，因为她已不想再如此，又无需写一封信前去解释，因为她的骄傲不会允许她这样做。

这最初的一年已足够她适应寡妇的生活。对丈夫的纯净回忆不再妨碍她的日常行动，不再妨碍她的内心思考，也不再妨碍她的一些最简单的意图了，而是变成一种时时注视着她的存在：指引她，但并不烦扰她。有时，她会看到他，并不是看到一个幽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出现在当真需要他的场合。确信他就在那里，她感到鼓舞。他还活着，但没有了男人的任性，没有了家长式的命令，也没有了那些令她精疲力竭的需求：时时要求她以他爱她的那些方式来爱他，比如不合时宜的亲吻，以及时时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她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加理解他了，理解他对爱的渴望，理解他迫切地需要在她身上找到足以支撑起他的社交生活的安全感，而事实上，这种安全感他从未得到过。曾有一天，她绝望之极，冲他喊道：“你就没有发现我一点也不幸福吗？”而他以他特有的姿势摘下眼镜，不温不火，用他那孩童般天真的眼睛中的一汪清水淹没了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她体会到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智慧的全部分量：“你要永远记住，对于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从守寡最初的寂寞时光

开始，她便明白，这句话中隐藏的并不是她当初所认为的卑劣威胁，而是一块为两人带来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月亮宝石。

在多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费尔明娜·达萨买回所有因新奇而引起她注意的东西。她想要得到它们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但丈夫却乐于为她的冲动找出合适的理由。这些东西摆在它们原来的环境中，都是美丽且有用的，比如在罗马、巴黎、伦敦的玻璃橱窗里，或是在正因查尔斯顿舞而抖动不止、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纽约的橱窗里。然而，它们经不起配着煎猪皮的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在四十度的高温下找个阴凉处举行节日庆典的考验。她每次回来都带着五六个巨大的立式箱子，由上过漆的金属制成，锁和包角都是铜的，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棺材。带回来的东西让她成为世界最新奇迹的代言人，可实际上，除了他们本地的圈中人看见这些东西的第一瞬间，其余时候，它们根本不值那高昂的价格。不过，它们本来也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一次才买的。她在步入老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公众形象的虚荣，因而常常能听见她在家里说：“得弄走这些破烂才行，都没有住的地方了。”乌尔比诺医生嘲笑她的这种想法徒劳无益，因为他知道，腾出的地方只会被重新填满。但是她坚持要这样做，因为多一件东西确实也放不下了，更何况所有地方没有一件东西是真正能派上点用场的，比如挂在门把手上的那些衬衫，还有压了又压才塞进厨房柜子的欧洲冬衣。于是，一天早晨，她情绪高涨地爬起床来，翻箱倒柜，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发动了一场战争般的扫荡，清理了一堆堆过时已久的衣服、一顶顶在流行时都没有机会戴的帽子，以及欧洲设计师们依据女王们加冕时穿的式样设计的鞋子—它们在本地被那些门第高贵的小姐们鄙视，因为款式和黑女人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居家便鞋一模一样。整个早上，内阳台一直处于一片忙乱之中，樟脑球散发出的一阵阵刺鼻气味让家里的人呼吸困难。但几小时后，家中又恢

复了平静，因为她最终心软了，那么多的丝绸衣物被扔在地上，那么多的锦缎、废弃的金银丝带、蓝狐尾，竟通通要被扔进火堆。

“烧掉这些东西真是罪过，”她说，“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

就这样，焚烧活动被推迟了，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东西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从特权的位置挪到已变成废旧物品仓库的旧马厩里，而腾出来的空间，正如他所言，又重新被塞进新的东西，满得几乎要溢出来。这些东西都只为一刻而活，注定要死在衣橱里，直到下一次清理焚烧。她说：“真该发明个办法，好处理那些既派不上用场又不能扔掉的东西。”正是如此：物品的贪婪使费尔明娜·达萨害怕，它们逐渐侵占着空间，代替了人，把人挤到角落里去生活，直到她把它们放进看不见的地方去。她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有条理，但她有自己的办法，一个绝望中的办法：把混乱的东西藏起来。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去世那天，大家不得不腾出半间书房，把东西都堆到几间卧室里去，以便有个地方为他守灵。

死神的来访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烧掉了丈夫的衣服后，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的手并没有颤抖。于是，她以同样的动力继续每隔一段时间就点起火堆，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去，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也不顾忌富人的忌妒和饿得要死的穷人的报复。最后，她让人把芒果树连根砍倒，让这场不幸彻底不留一点痕迹，又将活着的鹦鹉赠给了新建的城市博物馆。直到这时，她才得以在这个家里畅快地呼吸，像她一直梦想的那样：一个宽敞、自由、只属于她的家。

女儿奥菲利娅陪伴她三个月后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儿子每星期日都带着家人过来吃午餐，其他日子，只要有可能也会来。服丧期一

过，费尔明娜·达萨最亲近的女友们便开始来看望她，面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玩牌，试验新菜谱，还把她缺席的这些日子里这个依旧运转的贪婪世界中的种种秘闻讲给她听，以让她跟上潮流。最常来的女友之一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一个老派贵族，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和她很要好，自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死后，她和她更加亲近。被关节炎折磨得身体僵硬并对自己昔日的放荡生活感到懊悔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不仅是她最好的女伴，还常常会向她询问城中正在酝酿什么爱国举动或世俗活动。这让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而不是仅仅因着丈夫的荫庇才有价值。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她同丈夫视为一体，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她做姑娘时的名字，而是开始称呼她乌尔比诺的寡妇。

这让她无法理解。但随着丈夫去世一周年的临近，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自己渐渐进入一种阴凉、清爽、安静的环境之中：无法避免的必然之境。但她还不十分清楚，之后的很多个月里她也没有意识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笔下的见解对她重获精神的平静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她将他的思考付诸实践，这才渐渐懂得了自己的生活，平静地等待着暮年的种种安排。周年弥撒上的相遇是上天赐予的一次机会，她借此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多亏了他那些令人鼓舞的信，她也正准备忘掉过去。

两天以后，她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与往日截然不同的信，是手写的，用的是一张亚麻纸，信封背面清晰地署了寄信人的全名。和早年的那些信一样，同样的花体字，同样的情真意切，但内容就只有一段简短的感激之言，感谢费尔明娜·达萨在大教堂里对他与众不同的问候。读过之后的好几天里，费尔明娜·达萨都怀着一种躁动不断地想起这封信。她胸怀坦荡，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她突兀地问

起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问她是否凑巧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河航运公司的老板。卢克雷西娅回答说认识："好像是个放荡的魔鬼。"她重复了那个流行的说法，说他从不结识女人，但为人很大方，还说他有一间秘密办公室，专为把夜晚在码头上弄到手的男孩带去。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自打有记忆以来就听到这种传言，她从来不信，也不放在心上。但当她听到就连同样曾一度被认为有些怪异嗜好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也言之凿凿地说起此事时，忍不住要即刻把事情解释清楚。她告诉她，自己从小就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还说，记得他的母亲在窗户街有一家杂货铺，除此之外，还在内战时期收购旧衬衫和床单，拆开后当作急救药棉出售。最后，她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他是个正经人，全凭双手养活自己。"见她说得如此激动，卢克雷西娅收回了自己的话："说到底，别人也是这样说我的。"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好奇地自问，为何她会如此热切地维护一个不过是她生活中的影子的男人。她继续想着他，特别是当邮差到来却没有带来他的新信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两个星期，直到这天，一个女佣用慌张的口吻小声地在她耳边把她从午睡中叫醒。

"夫人，"女佣对她说，"弗洛伦蒂诺先生来了。"

他真的来了。费尔明娜·达萨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她甚至想，不行，让他改日找个合适的时间再来吧，她现在无法接待来访，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但她马上镇定下来，吩咐女佣把他带到客厅，给他送上一杯咖啡，她收拾好就去见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在临街的大门前，在下午三点地狱般的烈日下炙烤着自己，但自信十足。他已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尽管她的借口很可能是和善的。确信了这一点反倒使他非常平静。但她传来的口信之坚决让他颤至骨髓。走进阴凉的

客厅中时，他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奇迹，因为他的腹部突然胀起来，像要爆炸一般，充满了疼痛的气泡。他屏住呼吸坐下来，被该死的回忆纠缠着，想起他的第一封情书落上鸟粪的情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阴凉处，第一阵寒战过去之后，他决心在此时接受任何不幸，只要不让那件不公平的倒霉事重演就行。

他非常了解自己：虽然患有先天性便秘，但这么多年来，肚子还是有三四次当众背叛了他，而每一次他都不得不投降。只有在那几次，以及另外几次紧急情况中，他才发现自己开玩笑时常说的一句话千真万确：“我不信上帝，但我怕上帝。”他来不及去怀疑，试图找出任何一句所能记得的祈祷词来祷告，却一句也找不到。小时候，另一个小孩曾教过他一句用石头打鸟儿的神奇咒语：“打中，打中，若打不中，就把你变。”他第一次上山时，用一把新弹弓试验了这句咒语，鸟儿果然被击中，掉下来死了。他迷茫地想，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总有些关联，便带着祈祷的热情重复了这句咒语，但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肠子像根螺旋轴似的绞动着，使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肚子里的气泡越来越密，越来越疼，最后发出了一声呻吟，他则出了一身冷汗。给他送咖啡的女仆看见他死人般的脸色，吓了一跳。他叹了一口气：“是因为热。”她打开窗，以为这样会使他满意，可下午的太阳正好照到他脸上，她不得不又把窗户关上。他心里明白，再多一分钟自己也忍不了了。正在此时，费尔明娜·达萨出现了，她的身影在阴暗之中几乎看不清楚。看到他这副样子，她也吓坏了。

“您可以脱掉外套。”她对他说。

比起要命的绞痛，若是让她听见自己肚子里叽里咕噜的声音，他会更加痛苦。他尽全力要多忍片刻，说了一声“不”，并说自己此次前来是为了问她何时能接受他的拜访。她站在那儿，困惑地说：“可

您已经在这里了呀。”她请他随她到院子里的露台上去，那里会凉快些。他拒绝了，声音在她听来更像一声遗憾的叹息。

“我恳求您，明天吧。”

她想起明天是星期四，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定时来访的日子，但她还是给了他一个不容申辩的解决办法：“后天下午五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表示了感谢，拿着帽子匆忙地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一口咖啡也没喝就走了。她困惑地站在大厅中央，不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汽车的声音消失在街道尽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车后座上找了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姿势，闭上双眼，放松肌肉，让自己屈从于身体的意愿。他仿佛得到了重生。司机为他开了那么多年车，早已见怪不怪，对此泰然处之。但在家门口为他打开车门时，司机对他说：

“您要当心啊，弗洛伦先生，这可有点像霍乱。”

幸好，这不过是老毛病。星期五下午五点整，当女仆领他穿过阴凉的客厅，来到院子里的露台上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此感谢了上帝。在那里，他见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正坐在为两人准备好的小桌前。她问他要茶、巧克力，还是咖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了咖啡，那种很热很浓的咖啡，她则吩咐女仆说：“我还是老样子。”所谓老样子，就是好几种东方茶叶混合在一起的茶，可以在午睡后为她提神。她喝完一壶茶的时候，他也喝完了一壶咖啡。他们已经试着开始并又中断了好几个话题，并非因为真的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想避开另外一些无论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些胆怯，都不知道在距离年轻岁月已如此遥远的时候，在一座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在用来下象棋的露台上，在还飘着墓地花香的地方，究竟

要做些什么。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距离是如此之近，并且有充足的时间静静地看着对方。他们看得如此清楚：这两个被死神窥视的老人，没有旁的什么共同之处，一起享有的只是对那个短暂过去的回忆，然而那个回忆早已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两个消失了的年轻人，那两个人足可以做他们的孙子了。她想，他最终会说服自己，会看到这梦想是多么的不现实，从而把他自己从荒唐中解救出来。

为避免尴尬的沉默或不愿触及的话题，她问了一些有关内河船的浅显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作为船主，只做过一次河上旅行，还是在多年以前，那时他和这家公司还没有任何关系。她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而如果能够告诉她，他真愿为此付出灵魂。而且她也不了解河道，她丈夫厌恶安第斯山地区的空气，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高山对心脏有危险呀，有得肺炎的可能呀，那里的人虚伪狡诈呀，集权主义的不公正呀，等等。所以，他们走遍半个世界，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现在，有一种容克斯水上飞机，能沿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从一个村镇飞到另一个村镇，就像铝做的蚱蜢一样，上面载着两名飞行员、六名乘客，还有一袋袋的邮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评价道：“就像一具空中棺材。”她参加过首次气球旅行，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害怕，但如今她几乎难以置信，那个敢于如此冒险的人是她自己。她说：“一切都变了。”她是指她变了，而不是旅行的方式变了。

有时，飞机的声音让她吃惊。她在解放者逝世一百周年时看过飞行特技表演，它们飞得低极了，其中一架，黑得就像一只巨大的兀鹫，擦着拉曼加的房顶飞了过去，在邻居家的一棵树上碰掉一块翅膀，最后挂在了电线上。即便这样，费尔明娜·达萨还是没有接受飞

机这种东西的存在。最近几年，她也完全没有兴趣到曼萨尼略湾去看看：自从警卫艇把渔民的独木舟和数量越来越多的游艇都赶走后，水上飞机就降落在那里。她都这么老了，人们还选她带着一束玫瑰花去迎接兴致勃勃开着飞机前来的查尔斯·林白，她不理解，一个那么英俊魁梧、头发金黄的男人，怎么会坐在那样一个皱巴巴的马口铁家伙里升到空中去呢，还得有两名机械师推着尾巴帮助那玩意儿起飞。而一些飞机看上去也不比那一架大多少，竟可以同时装下八个人，这个想法更是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她脑袋里。相反，她倒听说，乘坐内河船旅行是很惬意的，因为不会像海轮那么摇晃，但也有另一些更严重的威胁，比如浅滩和强盗的袭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解释说，那都是些过去的传奇：现在的船上有舞厅，有像饭店房间一样宽敞、豪华的客舱，里面有私人卫生间，还装有电风扇。而最后一次内战结束之后，武装抢劫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他还得意地告诉她，这些进步多要归功于他所倡导的航运自由，由此鼓励了竞争：原来的独家经营被取代，如今有了三家活跃、繁荣的公司。然而，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所有航运公司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她试图安慰他，轮船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愿意钻进那个看上去违反自然的玩意儿的人并不多。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到邮政的发展，既包括运输也包括投递，试图引导她提起他写的那些信。但他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不一会儿，机会自己来了。就在他们远离这个话题时，女仆打断了他们，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一封刚刚由城市特殊邮政送来的信，这是新开创的业务，和电报使用的是同一个分发系统。像往常一样，她又找不到看信的眼镜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了平静。

“没必要找了，”他说，“这信是我写的。”

的确如此。这封信是他前一天写的，当时他还无法摆脱第一次见面失败的羞愧，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在信里，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事先征得允许就冒昧拜访的无礼行为，并且放弃了再次上门的打算。他没有再想第二遍，就把信投进了信筒，等到细想时已经太迟，信已经拿不回来了。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解释这些，只是请求费尔明娜·达萨不要再看这封信了。

“当然。”她说，“归根到底，信是属于写信人的。不是吗？”

他往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正是，”他说，“所以，当关系破裂时，首先退还的就是信件。”

她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把信还给了他，说：“不能读这封信真令人遗憾，因为之前的信让我获益良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说得那么自然，远超他的期待，令他惊诧不已。他对她说：“您想象不到，能听到您这样说，我有多么幸福。”但是她改变了话题，下午余下的时光里，他都没能让她继续说起这件事。

六点过后，屋里四处亮起灯来，他起身告辞。他感到信心更加充足，却也不敢抱过多幻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费尔明娜·达萨二十岁时反复无常的性格和令人无法预知的反应，他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她已经改变了。因此，他怀着真诚的谦卑，鼓起勇气问她自己日后能否再来。她的回答又让他大吃一惊。

“您可以在任何想来的时候来，”她说，“我几乎总是一个人。”

四天后的星期二，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又来了。没等仆人端上茶，她就对他讲起他那些信令她多么受益。他说，严格来讲，那些并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零散篇章。而她也正是这样看的。因此，如果他不会把这当作一种轻视的话，她很想把信还给他，以便让它们有更好的用途。她继续讲着那些信在她最艰难的紧要关头给她带来的教益，说得那么热情激动，充满感激，甚至或许还满怀着深情，以至于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起了胆子，不只是又往前迈了一步，而是拼死向前一跃。

“从前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他说。

这是个禁忌的词：从前。她仿佛看到曾经的那个空想天使又从身边经过，于是试图逃避。但他又深入一步：“我是说，在我们从前的信里。”她有些不悦，不得不做出极大努力来掩饰这一点。但他还是发现了，于是明白自己应该更加小心地摸索前进。虽然这个挫折向他表明，她仍和年轻时一样难以接近，但她毕竟已经学会让自己表现得温和一些了。

“我的意思是，”他说，“这些信已经完全不同了。”

“世界上的一切都变了。”她说。

“我没有变，”他说，“您呢？”

她的第二杯茶停在了半途，一双毫不留情的眼睛指责着他。

“已经无所谓了。”她说，“我都七十二岁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里受到一击。他本想像箭一般快速地凭借本能做出反驳，但年龄的重负战胜了他：他从未在这样短暂的谈话中

感到如此筋疲力竭，他觉得心脏在隐隐作痛，每跳一下，便在动脉中产生一声金属般的回响。他感到自己衰老、凄凉、无用，有一种想哭出来的急切渴望，以至于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在被各种预感犁出一道道沟壑的沉默之中，他们喝完了第二杯茶。她再开口时，不过是为了让女仆把收着信件的夹子取来。他差点就想请求她将信留下，因为他已用复写纸存下了副本，但又想到这种谨慎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高尚。于是，已经无话可说。告辞前，他请她允许自己在下一个星期二的同一时间再来。她暗自思忖是否应该如此迁就他。

“我看不出，见这么多次面有什么意义。”

“我没想过见面要有什么意义。”他说。

于是，星期二下午五点他又来了。并且，以后的每个星期二都例行如此，从不按惯例事先通知，因为到了第二个月的月末，每星期的见面已纳入了两人的日常习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会带来喝茶时吃的英国饼干、糖渍栗子、希腊橄榄，以及远洋轮船上各种聚会时吃的精致美味。有一个星期二，他给她带来了她和伊尔德布兰达的照片，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比利时摄影师拍的那张，他在“代笔人门廊”的一次明信片拍卖中花了十五生太伏买下来。费尔明娜·达萨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到了那里，他也不明白，但他把这看作爱情的奇迹。一天早上，在花园中修剪玫瑰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禁不住诱惑，想在下次拜访时为费尔明娜·达萨带去一枝。但给新寡的女人送花，花语成了难题。红玫瑰象征着火一般的激情，对守丧的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而黄玫瑰呢，有时象征着好运，但更普遍的时候表达的是忌妒。他曾听人说起土耳其黑玫瑰，或许那是最合适的，但他一直没能让它们适应自己院子里的气候。想来想去，他决定冒险带一枝白玫瑰，他从不像喜欢其他玫瑰那样喜欢它，就因为它平淡无奇，无声无

息：什么也不能表达。在最后时刻，为避免精明的费尔明娜·达萨赋予它什么含义，他剪掉了玫瑰上的刺。

作为一件没有任何隐藏含义的礼物，玫瑰被欣然接受了。就这样，星期二的例行仪式得以丰富，以至于每当他手持白玫瑰到来时，茶几上都已准备好了盛着水的花瓶。一个星期二，把玫瑰插在花瓶中时，他看似随意地说：

“在我们那个时代，送的可不是玫瑰，而是山茶花。”

“的确，”她说，“但用意不一样，这您是知道的。”

总是如此：他试图前进，而她却堵住他的去路。不过这一次，虽然她回答得恰到好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发现自己已经击中了目标，因为她不得不转过脸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红晕。那一片燃烧着的、青春萌动的红晕，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似的，搅起费尔明娜·达萨心中的不悦：她为这种失态而怨恨起自己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小心翼翼地把谈话转向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的彬彬有礼是如此明显，她知道自己已被识破，而这更增加了她的愤怒。两人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星期二。她差点就让他不要再来，但想到两人竟在如此年纪和如此境况，像恋人一般吵架，她又觉得荒唐不已，险些笑出声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玫瑰花插到花瓶里时，她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不悦没有留下哪怕最微小的一丝痕迹。

这种拜访很快便尴尬地扩展到家庭范围，因为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常常意外地出现，而且还会留下来玩纸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来不会玩牌，费尔明娜·达萨在某次见面时教会了他，于

是两人给乌尔比诺·达萨夫妇发出了下星期二一决高下的书面挑战。那几局牌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很快，牌局便像拜访一样被正式确定下来，并规定好每人需为此做出的贡献。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家贡献出每次都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蛋糕，因为他的妻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糕点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带来在欧洲船上找到的新奇玩意儿。费尔明娜·达萨则每星期都绞尽脑汁搞出些令人惊喜的花样。纸牌比赛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举行，赌注并不是钱，而是输者必须在下一次的牌局中做出点特别的贡献。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本人与他的公众形象并无差别：头脑贫乏，行事笨拙，不论喜怒都爱一惊一乍，动不动就脸红更是让人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毫无疑问，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怕别人这样评价自己。医生的妻子却正好相反。她活跃，有一股小老百姓的机灵劲儿，一切都能做得合乎时宜且恰到好处，这使她在优雅之外更添了一点儿人情味。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牌局对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爱的贪婪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他幻想自己是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

一天晚上，他们一同走出家门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邀请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十二点半，在社交俱乐部。”这就像是给一顿美味佳肴配上有毒的葡萄酒：出于种种考虑，社交俱乐部保留拒绝客人进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拒绝私生子入内。叔叔莱昂十二就有过这类令人恼火的经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曾在已就座的情况下受此侮辱。当时，邀请他的是俱乐部的一位合伙创始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河运生意中帮过他很大的忙。最后，这位合伙人不得不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我们这些制定规则的人，更有责任身体力行。”他对他说。

尽管如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结果，虽然没有人邀请他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调的气氛中进行。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竟然为他撒了谎。她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她识字读书，因此，她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里萨的杂货铺里和她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后来，她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

在没有深入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步伐最慢者的速度前进的。”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时，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六十岁。但在社会达到那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他说：“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中，很好地陪伴了她，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

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如释重负。“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而且不只现在如此，从很久以前，在您出生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

“在未来的社会里，”他总结道，“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

直到这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他匆忙钻进解释的峡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他走了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自己迟早要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有这样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这顿午餐很是振奋人心，不仅由于它的初衷，更是因为它向他表明，他那势在必行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同意，那么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在形式上求得允许已显得多余了。

还年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上下楼梯就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在所有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然而，在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

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他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他是对的。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当医生命令他六十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幸。

“请别这样对我，医生。”他哀求道，“我的两个月就如同您的十年啊。”

他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经减弱，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望费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四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她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他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她的同情。两天后，她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她写的那些信一样。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第二次回信后，他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星期二那打哑谜似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

个他从第一次拨过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因她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两天后，他收到一封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她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她认识所有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逸事，而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她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她那高效工作的回报，便是她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得最好的动人故事。有时，她甚至会介入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抨击拥有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入社交俱乐部。费尔明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她仍然采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床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之中，整日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上。

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信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她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她。两天以后，他收到她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费尔明娜·达萨无法不这么做，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尤其是当弗洛伦蒂诺·

阿里萨坚持回忆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她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她更是如此以为。她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评论中的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让自己老去。在她看来，这就是他常常堕入并迷失在回忆之中的原因。她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以其思考让她获益良多，帮她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入一团乱麻之中。于是，两人的角色颠倒过来。此时，反而是她尽力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他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她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具有悲剧性。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死亡的现实。

莱昂娜·卡西亚尼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次澡，更换睡衣。她为他灌肠，为他放好尿壶，为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上山金车花药膏，还遵照医生的嘱咐给他按摩，以免缺少活动让他患上其他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这年的十二月，她就能获得教师学位了。他答应她，由河运公司出钱，送她到阿拉巴马州的高等学府去。这样做，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她尚没有找到方式提出的指责以及他欠她的一个解释。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没有他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痛苦，因为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有多么爱他。从学校寄来的官方信件中，他得知她由原来一贯的第一名

跌至最后一名，在期末考试中还险些没有及格。然而，他逃避了监护人的责任：他试图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没有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她本人谈过此事，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她会把他和自己学业上的失败牵连在一起。于是，他对一切听之任之。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拖延自己的种种问题，期盼死亡能解决一切。

不仅这两个照顾他的女人，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也对自己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不到十年前，他还在家中的主楼梯后面突袭了一个女仆。她当时穿着衣服站在那儿，而他竟以比菲律宾斗鸡还短暂的时间迅速让她受了孕。他不得不赠给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让她发誓说使她失去贞洁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每逢星期日才见上一面、连吻都没吻过她、顶多算半个情人的男人。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好手，强迫那小伙子跟她结了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两个在几个月前还令他爱得颤抖的女人，如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把他翻过来又掉过去，给他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为他擦干身体，给他做全身按摩，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她尚未琢磨清楚。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她们照顾着他，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她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仅仅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明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拜访。她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她们也相处

得越来越愉快。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一个月后她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费尔明娜·达萨是她的朋友中最能忍受她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她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她家里。但费尔明娜·达萨无法用任何人来取代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度过的那一个个平静的下午。

并不像他坚持相信的那样，回忆并不能拯救未来。恰恰相反，对过去的记忆更加坚定了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念，那就是二十岁时的火热躁动是某种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但绝不是爱情。尽管她率真到有些刻薄的地步，却也不愿亲自向他揭示这一点，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认识到他笔下的那些思考多么具有抚慰心灵的奇迹作用之后，他信中那些伤感主义的言语听上去有多么虚伪，那些抒情诗似的谎言又会多么贬损他的价值，那样发了疯似的要回到过去的坚持更会多么损毁他的事业。不，他往昔的信中没有一行字，她自己那百无聊赖的青春中也没有片刻像此时这样，让她感受到没有他的星期二下午竟会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不堪忍受，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有一次，她曾在单纯的冲动之下，把丈夫在某个结婚纪念日送给她的立式收音机发配到马厩里去。她也想过要把它捐赠给博物馆，因为这毕竟是本城的第一台收音机。在服丧的灰暗日子里，她决定不再使用它，因为像她这样姓氏高贵的寡妇，听任何一种音乐都有辱对死者的哀思，即便在私下里也不行。可是，在度过了第三个孤独的星期二以后，她命人把收音机搬回了客厅。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像以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电台的伤感歌曲，而是想用古巴圣地亚哥电台催人泪

下的小说连播打发一潭死水的时间。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自从女儿出生后，她便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起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阅读习惯。随着视力的逐渐衰退，她最终完全放弃了这个习惯，以至于好几个月里都不知道眼镜放到哪儿去了。

她迷恋上了古巴圣地亚哥电台的小说广播，每天都焦急地等待收听新的章节。她偶尔也听听新闻，以便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极少数单独在家的时候，她也会把声音调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一听圣多明哥的美瑞格舞曲和波多黎各的普莱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电台，声音洪亮清晰，就像从邻居家里传来的。通过这个电台，她听到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十四美元。当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把刊登在本地一份报纸上的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她听时，她的感触更深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听小说连播时从未落过泪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却不得不强忍住哽在喉头的泪水。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这则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这并不是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一次必须强忍住的泪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完成六十天的幽禁，《正义报》就在头版以最大的篇幅披露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之间可能存在的私情，还刊登了两位当事人的照片。报纸推测了他们私通的种种细节、频繁程度和方式等等，还提到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更热衷于鸡奸自己蔗糖厂中的黑人。用血红色的特大号印刷字体刊登出来的这篇报道，像一

声灾难性的轰雷，震撼了本地早已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事实上，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单身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结婚后依旧如此，但他们从不是情人。无论如何，这篇报道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玷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名誉，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致是充满敬意的，而是为了毁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他在上周刚刚被选为社交俱乐部的主席。没过几个小时，丑闻就被平息了。但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此却再没去拜访过费尔明娜·达萨。费尔明娜·达萨把此举视作她默认了自己的过错。

然而，接下来的事很快就表明，费尔明娜·达萨也没能逃脱她这个阶层所要面临的危险。《正义报》残忍地攻击了她唯一脆弱的一面：她父亲的生意。当初父亲被迫远走他乡时，她只了解到他那龌龊生意中的一小段插曲，还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告诉她的。后来，乌尔比诺医生在和省长会面后向她证实了此事，但她仍然坚信，父亲是某桩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警探带着搜查令出现在福音花园的家中，从上到下搜了个遍，都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明娜·达萨原来那间卧室中那个门上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加拉·普拉西迪娅一个人在家，而她又无法通知任何人，于是就借口没有钥匙，拒绝打开衣柜。这时，其中一个警探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打碎了柜门上的镜子，结果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的空隙里塞满了一百美元的假钞。这是他们原先发现的一连串线索的终点，最终指向洛伦索·达萨，表明他是一桩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环。假钞做得很高明，居然带有真钞的水印：他们通过魔法般的化学手段抹掉了一美元纸币的票面，再将其印成一百美元的面值。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回来的，假钞应该是买来时就已经藏在里边了。可警察却证实衣柜从费尔明娜·达萨上学时起

就已经在那里，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假钞藏到镜子后面去。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当时告诉妻子的所有情况，他向省长许诺，会把岳父送回老家，以遮盖丑闻。但这一次，报纸上讲的要多得多。

报上说，在上个世纪那无数次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是自由党总统阿吉莱奥·帕拉政府和一个名叫约瑟夫·科·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这个波兰人混在挂法国旗的商船圣安东尼号的船员中间，在本地逗留了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清不楚的军火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康拉德之名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联系上了。后者用政府的钱向他买下了这船武器，手中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法定纯金支付的。之后，据报上的说法，洛伦索·达萨声称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而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以实打实的双倍价格把武器卖给了正在与政府作战的保守党人。

《正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曾以很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一船多余的靴子，那时正值拉法埃尔·雷耶斯将军组建海军的时期，单凭这一笔买卖，他就在六个月里把自己的财富翻了一番。据报上说，这批货物到港时，洛伦索·达萨拒绝接收，因为运来的全都是右脚靴子。可当海关按照当时的法律将货物拍卖时，他却又是唯一的参加者，于是，他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货物。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也在相同条件下买了一船进入里奥阿查港海关的左脚靴子。两批靴子配成对后，洛伦索·达萨利用自己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把它们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正义报》最后说道，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之所以离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并非像他常常爱说的那样，是要为女儿的未来寻找

更好的天空，而是因为他在进口烟中掺杂碎纸屑的勾当被逮了个正着。他的手段极其精巧，就连最讲究的吸烟者也不会察觉到其中的骗局，他的生意因此十分兴隆。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公司之间的联系。这家公司在上世纪末利润最大的买卖便是从巴拿马非法引渡中国移民。看起来，曾最令他名誉受损的可疑的骡子生意反倒成了他唯一做过的诚实买卖。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仍在灼烧的后背走下床来，第一次用雨豆树做的硬木拐杖代替雨伞出门时，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费尔明娜·达萨的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备受摧残的陌生老妇，忿恨夺走了她活下去的欲望。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放逐于世外般的养伤期间，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去看望过他两次，还把《正义报》的两篇文章给母亲带来的沮丧与绝望告诉了他。第一篇文章几乎使她丧失理智，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怒之极，甚至放弃了每月都找某个星期日去家庭墓地祭奠的习惯，因为只要一想到他在那只盒子里根本听不见她的大声咒骂，她就不禁怒火中烧：她是在和死人吵架。她找愿意带话的人告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在和她上过床的那么多人中间，至少有一个男人，她也算有个安慰了。至于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报道，她不知道究竟哪一点最让她难过，是文章本身，还是自己这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正身份。但这两者之一，或是两者一起，把她彻底击垮了。那曾将她的面容衬得高贵无比、有着纯净的钢铁颜色的头发，此时变成了黄色的玉米须，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也已失去昔日的光芒。不愿再活下去的决心表现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很久之前，她就已放弃了抽烟的习惯，无论是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可如今，她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刚开始，她仍像从前喜欢的那样，抽自己卷的烟，但随后竟抽起从市场上买的最普通的烟来，因为她已没时

间，也没耐心去卷了。事实上，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见此情景都一定会自问，像他这样一个跛着腿、后背像被磨破了皮的驴子一样火辣辣疼的老人，像她那样一个除了死亡已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一种幸福的女人，未来究竟还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但阿里萨不这样想。他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因为他觉得，费尔明娜·达萨的不幸使她得到升华，愤怒使她更加美丽，对世界的怨恨使她恢复了二十岁时那桀骜的个性。

而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感激刚刚又多了一个新理由，因为就在那两篇卑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给《正义报》发去了一封堪称典范的信，谈论报纸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以及对别人应有的尊重。该信未能得到发表，但他又把信的副本寄给了加勒比沿岸历史最悠久、态度也最严肃的一家报纸—《商业日报》。他们把信醒目地刊登到头版上。信上署的笔名是朱庇特，整封信文采斐然，有理有据，一针见血，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定是出自本省最杰出的某位作家之手。那是汪洋大海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的深邃，一直传到遥远的地方。无需别人指明，费尔明娜·达萨也知道信的作者是谁，因为她看出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见解，甚至看到了一句有关道德思考的原话。因此，在她自暴自弃、心乱如麻的时候，还是怀着一种复苏的亲切接待了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独自一人在窗户街的卧室中，纯属偶然地发现了那些记录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思考的打字机信件的副本，以及费尔明娜·达萨手写的信件，就在一个没上锁的衣柜里。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很高兴地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重新登门极大地鼓舞了母亲。可他妹妹奥菲利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刚一听说费尔明娜·达萨与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男人保持着一种奇怪

的友谊，便立刻搭乘最早一班运送水果的轮船从新奥尔良赶了回来。从第一周起，她的惊恐就变成了一种危机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她家大门时对一切都很熟悉，随意自如，并且拜访一直持续到天黑后很久，其间不断传来两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有像情人一样的短暂争吵。在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来，两位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件有益健康的好事，可她却认为，那是一种无异于秘密姘居的丑陋行为。奥菲利娅一向是这个样子，她更像她的祖母布兰卡夫人，简直就像祖母的亲生女儿，甚至比女儿还像。她和她一样出类拔萃，和她一样自命不凡，也和她一样依靠偏见生活。她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就连五岁时都不可能，更何况八十岁。在与哥哥的一次激烈争论中，她嚷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差和母亲一起钻到她那张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没有勇气和她对峙，从来如此。但他的妻子为他解了围，平静地辩解道，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菲利娅失去了控制。

“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属荒唐，”她叫喊道，“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

她义无反顾，坚持要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最终，她的话传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耳朵里。她把她叫进卧室—当她想说一些不让女仆听见的话时就会这样做—让她把那些指责再说一遍。奥菲利娅没有减缓语气，声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堕落行径尽人皆知，她敢肯定，他试图得到一种可疑的关系，而这会比洛伦索·达萨的胡作非为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加有损家庭清誉。费尔明娜·达萨一言不发地听着，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但等女儿一说完，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

“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礼兼恶毒。”她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她收回成命。奥菲利娅只好搬到哥哥家去住，并且从那里派来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说客，转达了各种恳求。但无济于事。儿子的调停和女友们的介入都没能使她心软。最后，她用她最好岁月里的精妙口才，对一直以来与她保持着某种庸俗默契的儿媳道出了心里话：“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伎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她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将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气彻底呼出体外。

“让他们见鬼去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再也没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奥菲利娅最终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徒劳无用时，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她从母亲那里唯一得到的，是允许跟她道别。这是她再三恳求后，费尔明娜·达萨才答应的，但不允许她踏进家门：她已向母亲的尸骨发了誓，对她来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初的几次拜访中，说起自己的轮船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向费尔明娜·达萨发出过正式邀请，请她沿河去做一次散心旅行。而如果她愿意再坐一天火车，就可以到达共和国的首都，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他们仍旧使用着首都在上世纪的旧名：圣菲。但她心中还保留着丈夫的偏见，不想去认识那座冰冷阴暗的城市。她

曾被告知，那里的女人除了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从不走出家门，既不能进冷饮店，也不能进公共事务场所；那里的街道每时每刻都挤满了送葬的队伍，而且从钉马掌的骡子[1]的年代起，就一直下着绵绵细雨，简直比巴黎还要糟糕。不过，她对河流有着强烈的兴趣，很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短吻鳄，还想在半夜被海牛那女人哭泣般的叫声惊醒。但想到自己这把年纪，又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她便觉得如此艰难的旅行并不现实。

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丈夫也要继续活下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重提了他的邀请，她觉得可能性似乎大了一些。再后来，由于跟女儿大吵一架，再加上父亲所受的侮辱、对死去丈夫的怨恨，以及对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虚伪恭维的愤怒—多年来，她一直视她为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让她痛心不已，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已是个多余的人。一天下午，她喝着那种用世界各地的叶子泡出的茶，望了一眼院中的泥塘，那棵带给她不幸的树再也不会长出新芽了。

“我真想离开这个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永远不再回来。”她说。

“乘船去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费尔明娜·达萨沉思地看了他一眼。

“嗯，这是有可能的。”她说。

在说出这句话的前一刻，她其实还从未这样想过，但一旦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她就足以视其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儿子和儿媳听了很高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忙保证，费尔明娜·达萨将在他的船上被奉为上宾，她会拥有一间专为她准备的舱室，让她感觉像在家里一

样，还会享受到完美的服务，船长将亲自负责她的安全和起居。为了振奋她的精神，他给她带来了路线图，绚丽的黄昏景色明信片，还有歌颂马格达莱纳河畔原始天堂的诗篇，这些诗出自几位著名的旅行家之手，又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诗，他们才成了著名的旅行家。她心情好时，会把这些东西翻上一翻。

“你不必像哄小孩子那样哄我。”她说，“我去旅行，是因为我决定了要去，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

当儿子建议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去时，她断然拒绝了：“我这么大个人，不需要别人照顾。”她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想到那八天上行、五天下行的旅程，除了一些必需品什么都不用带，她就感到无比轻松。半打棉制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她一生的梦想。

一八二四年一月，海军准将、内河航运的创始人胡安·贝尔纳多·埃尔勃斯，注册了第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的蒸汽轮船，那是一艘四十马力的原始家伙，取名“忠诚号”。而一个多世纪以后，某个七月七日的下午六点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陪伴着费尔明娜·达萨登上了将载她进行第一次河上旅行的航船。这是当地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轮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纪念光荣的前辈，将它命名为“新忠诚号”。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无法相信，这个对他们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名字的确是历史的巧合，而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旷日持久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花样。

不管怎样，与其他老式与现代的内河船都不同，“新忠诚号”在船长室旁设有一个宽敞舒适的加舱，包含一间摆着色彩喜庆的竹制家

具的客厅，一间全部用中国图案装饰的双人卧室，一个同时装了浴缸和淋浴设施的卫生间，一个十分宽阔的吊着蕨类植物的封闭望台（从那里可以完整地看到船的前方和两侧），还有一套安静的制冷系统，使整个环境免受外界的干扰，而且始终保持春天的气候。这套豪华的舱室被称为“总统舱”，因为到那时为止，已有三位共和国总统在此度过航程。它并不用于商业目的，而是留给高级官员和一些极为特殊的客人使用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被任命为CFC的董事长，就以树立公共形象为由，下令建造这个舱室，但他内心确信，迟早有一天，这里会成为他和费尔明娜·达萨新婚旅行中幸福的世外桃源。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份占据了总统舱。船长迭戈·萨马利塔诺用香槟和烟熏鲑鱼款待登船的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夫妇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身穿白色亚麻制服，从靴子尖一直到用金线绣着CFC徽章的帽子，浑身上下完美无缺。和所有内河船长一样，他拥有木棉树般的魁梧身材、坚定果决的声音和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般的气派。

晚上七点，鸣响了第一声起航的汽笛。费尔明娜·达萨感到那回荡的汽笛声给自己的左耳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前一晚，她的梦中出现了好些不祥的预兆，她甚至不敢去分析其中的意思。一大早，她便让人把她带到离家不远的神学院墓地去，那里当时叫拉曼加墓地。她站在丈夫的墓前，自言自语地把从前压在心中的合理的斥责一股脑儿倾诉出来，最终原谅了这个死去的男人。之后，她对丈夫讲起这次旅行的细节，向他暂时告别。就像每次去欧洲旅行一样，她不想把自己出门的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以避免令人疲惫的送别。虽然她已有过很多次旅行，却感觉这仿佛是第一次。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她的忧虑

不断增加。刚一登船，她便凄楚地感到自己被遗弃了，真想独自痛哭一场。

最后一声警示的汽笛响起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程式化地与她道了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陪他们走到下船舷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为他让路，让他跟在妻子后面，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去旅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顿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手足无措。

“您没跟我们说过呀。”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自己舱室的钥匙拿给他看，意思很明确：他住的只是公共甲板上的一间普通舱室。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觉得这个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像遭遇了海难一般向妻子投去求助的一瞥，想为自己的彷徨无助寻找支点，但遇到的却是一双冰冷的眼睛。她严厉地低声说：“难道你也一样？”是的，他也一样，同他的妹妹奥菲利娅一样，认为爱情到一定年龄就变得不体面了。但他善于及时做出反应，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握手以示告别，心中的无奈多过感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大厅栏杆处看着他们走下船去，正如他所等待与希望的那样，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在上汽车前，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于是，他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也朝他挥挥手。他继续站在栏杆前，直到汽车消失在货场的尘土之中，他才回到自己的舱室，换上一套更适合在船长的私人餐厅里享用登船后第一顿晚餐的衣服。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迭戈·萨马利塔诺船长用其四十年河运生涯的多彩故事为它增添了调料，可费尔明娜·达萨费了好大劲儿才装出开心的样子。虽然八点钟就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送行的人被请下船，舷梯也被升起，但直到船长用完晚餐，走上指挥台开始指挥，船才起锚。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公共大厅的栏杆旁，混在那些极力辨认着城中每一处灯火的嘈杂旅客中间，探身远眺，直到轮船驶出港湾，进入看不清的河道和散布着起伏的渔船灯火的沼泽之中，最后，它终于在马格达莱纳大河自由的空气里顺畅地呼吸起来。这时，乐队奏起了一首流行的民间乐曲，旅客中爆发出一阵欢腾，舞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

费尔明娜·达萨更愿意躲到自己的舱室里去。整个晚上她都没说一句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任由她迷失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只是在舱室前向她道了一声晚安。但她没有困意，只觉得有点冷。她建议两人一起坐上一会儿，在私人望台上看一看河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两把靠背藤椅拖到栏杆前，关了灯，拿一条羊毛毯子披在她肩上，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从他送的一个小烟盒里取出烟丝，卷了一支，手法熟练得让人吃惊。她把点着的一端放进嘴里，慢慢地吸着，一言不发，接着又连卷了两支，续着抽完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一口接一口地喝下了两保温瓶的浓咖啡。

城市的灯火已消失在地平线上。从漆黑的望台上看去，平缓而沉寂的河水和一轮满月下两岸的草丛，都变成了一片泛着磷光的平原。偶尔可以看到一间间茅屋，旁边点着熊熊的篝火，示意人们那里出售供轮船锅炉使用的木柴。对年轻时的那次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保留着模糊的记忆，但河上的景象使那些回忆复活了，一幕幕争抢着闪现在眼前，宛如昨日。他给费尔明娜·达萨讲了当时的一些情

景，以为可以使她振奋起来，可她只是抽烟，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放弃了讲述，让她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她不断卷着烟，一支接一支抽着，直到盒里的烟丝全都抽光了。午夜过后，音乐停下来，旅客的喧闹声也消散了，变成了枕边的窃窃私语。只剩下两颗孤独的心留在黑暗中的望台上，随着轮船急促的喘息声跳动。

过了好一会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她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雕塑般的侧影在微微的蓝色光芒下显得柔和甜蜜。他发现她竟在默默地哭泣。他没有安慰她，也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在旁边耐心地等她眼泪流尽，而是有些惊慌失措。

“你是想独自待着吗？”他问。

“如果是，我就不会叫你进来了。”她说。

于是，他伸出冰冷的手指，摸索着黑暗中的另一只手，找到它时，他发现它正在等待着。一瞬间，两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两只苍老的手都不是他们在互相触碰之前所想象的样子。但片刻过后，它们就变成他们想象中的样子了。她开始讲起已故的丈夫，用的是现在时，好像他仍然活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是到了一个自省的时刻，她将带着尊严、带着高傲、带着无法抑制的活下去的渴望自问，她要如何对待心中这份无主的爱情。

为了把手留在他的手中，费尔明娜·达萨停止了抽烟。她迫切地渴望能理解自己。她不能想象有哪个丈夫会比她曾经的丈夫更好，然而，回忆起他们的一生，她想到更多的是挫折，而非满足，他们之间

曾有太多的误解，太多无谓的争执，以及太多没有释然的怨恨。突然，她叹了口气：“真无法相信，经历了那么多的吵闹与厌烦，这许多年竟还能感到幸福，见鬼，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爱情。”正当她把心里话一吐为快时，有人把月光熄灭了。轮船稳健地缓缓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仿佛一只伺机而动的巨大猛兽。费尔明娜·达萨从热切的渴望中清醒了过来。

“现在，你走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紧了她的手，俯下身去，想亲吻她的面颊。她却躲开了，用沙哑而温柔的声音拒绝了他。

“已经不行了，”她对他说，“我闻起来尽是老太婆的味道。”

费尔明娜·达萨听见他在黑暗中走了出去，听见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他渐渐消失，第二天之前将不再出现。她又点燃了一支烟。正抽着，她看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穿着他那身完美无瑕的亚麻衣服，带着他那职业性的严肃，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翩翩风度，以及那彬彬有礼的爱情，站在一艘往昔的船上，挥动着他白色的帽子向她告别。“我们男人都是偏见的可怜奴隶。”有一次他对她说，“相反，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跃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费尔明娜·达萨继续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天亮。她在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但不是福音花园中那个忧郁的哨兵，那个人已无法在她心中激起丝毫思念的涟漪，她想的是此时的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却如此真实：这人一直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她却从未认出他真实的样子。当轮船喘着

粗气，拖着她驶向第一缕玫瑰色的霞光时，她唯一祈求上帝的，是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第二天应从何处重新开始。

他的确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吩咐侍者不要叫醒她，让她尽情地睡上一觉。她醒来时，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枝新鲜的白玫瑰，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旁边是一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信，厚厚的一沓，他一定是从她这里回去后就开始写，才能写出这么多页来。这是一封平静的信，仅仅为了表达他昨晚以来的心境：它和以往的信一样抒情，也和他所有的信一样字斟句酌，但却立足于现实。费尔明娜·达萨读完信，为自己那毫无顾忌的心跳感到有些害羞。在信的末尾，他请求她准备好之后通知侍者，因为船长正在指挥台上等着他们，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轮船是如何运转的。

十一点钟时，她已准备停当，洗过澡，浑身散发着花一般的香皂气味，身着一套极为朴素的灰色纱罗寡妇服，已完全从夜晚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她向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制服、专为船长服务的侍者要了份简单的早餐，但没有让他捎口信叫谁来接她。她独自走到指挥台上，天空万里无云，有些晃眼。她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与船长交谈。她觉得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是因为她此时已对他另眼相看，而是因为他真的变了模样。他没有穿他那身穿了一辈子的参加葬礼似的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一双舒适的白皮鞋，亚麻长裤，亚麻开领短袖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他姓名首字母的花押字。此外，他头上还戴了顶苏格兰帽，也是白色的，那副他始终戴着的近视镜上则夹了一副可拆卸的深色镜片。显然，这些东西他都是第一次穿戴，而且是专为这次旅行才买的。只除了那条早已过旧的棕色皮带，费尔明娜·达萨一眼就看见了它，仿佛发现了汤中的苍蝇一般。看到他如此明显地为自己着意打扮，她的脸颊不禁泛起一抹火辣辣的红晕。跟他打招

呼时，她心慌意乱。见她如此，他也慌乱起来。当两人意识到他们的举止竟像情侣一般，便越发不知所措，而当他们又意识到自己的窘态时，更是慌乱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萨马利塔诺船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中不禁同情地为之一颤。他把他们从尴尬中解救出来，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他们讲解如何指挥轮船以及轮船的机械构造。他们缓慢地航行在一段看不见两岸的河道上，河水在荒芜的河滩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与交汇处的浑浊水流不同，这里的河水平缓而清澈，在无情的烈日下闪烁着金属的光芒。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这里就像一片被沙岛包围的三角洲。

“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片河水了。”船长对她说。

的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河道的变化感到诧异。第二天，当航行变得更加艰难时，他就更是惊讶了。他发现，世界大河之一，他的父亲河马格达莱纳河，如今已成记忆中的幻影。萨马利塔诺船长向他们解释了毫无理性的滥伐森林如何在五十年里毁掉了河流：轮船的锅炉将茂密的雨林消耗殆尽，想当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还曾因那些参天的大树感到压抑呢。费尔明娜·达萨也不会看到她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杀光了在河岸峭壁上一连几小时张着大嘴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短吻鳄；随着枝繁叶茂的森林的消亡，叽里呱啦叫个不停的鹦鹉和像疯子一般吵嚷的长尾猴也逐渐销声匿迹；而用硕大的乳房在河滩上给幼畜喂奶、像悲伤的女人一样哭泣的海牛，也被寻开心的猎人用穿甲子弹灭绝了。

萨马利塔诺船长对海牛有着一种近乎母性的爱，因为他觉得它们就像是因某种误入歧途的爱情而被判罪的夫人们，而且，他相信传说，即海牛是动物王国中唯一一个只有雌性而没有雄性的物种。他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但尽管有法律明令禁止这一行为，人们

还是会习惯性地举枪。曾经有一个带着合法证件的北卡罗来纳猎人，违背船长的命令，用他那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枪打爆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海牛痛苦得发了疯，趴在母海牛的尸体上哭号。船长命人把孤零零的小海牛弄上船，亲自照料，而把猎人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河滩上，就在被他射杀的海牛妈妈的尸体旁。由于来自外交方面的抗议，船长坐了六个月牢，差点丢掉航海执照。但出狱后，他仍准备坚持己见—类似的事见一次就管一次。不过，这次事件已被载入历史：那只海牛孤儿后来在巴兰卡斯的圣尼古拉斯稀有物种动物园里长大，并且生活了许多年，它是人们在这条河上见过的最后一只海牛。

“每次经过这段河滩时，”船长说，“我都恳求上帝让那个美国佬再来坐我的船，我好再次把他扔在这里。”

起初对船长并没有什么好感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被这个充满柔情的彪形大汉深深打动，从这天早晨起，她就把他摆在了自己心里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她是对的，旅行才刚刚开始，日后她将有更多机会发现自己做得没有错。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待到午饭时间，那时船刚刚经过卡拉玛尔村。这个村庄在几年前还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喜庆，如今，街道上却满目荒凉，成了一个废墟港口。从船上能看到的唯一生命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正挥动手绢打着手势。费尔明娜·达萨不明白，她那么可怜，为何不把她接上船来。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溺水而死的女人的灵魂，做出欺骗的手势，为的是把船错误地引向对岸危险的旋涡。他们从离她很近的地方驶过，阳光下，费尔明娜·达萨真切地看清了所有的细节，毫不怀疑那个女人事实上并不存在，可她的脸却让费尔明娜·达萨觉得似曾相识。

那是漫长而炎热的一天。费尔明娜·达萨吃过午饭，便回到舱室去睡她那必不可少的午觉。但因为耳朵痛，她没能睡好。在“老峡谷”上游几里处，他们的船和另一艘CFC的船相遇，按规矩互相鸣笛致意，这让她的耳痛更严重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大厅里打了个盹儿。和夜里一样，大部分没有舱室的旅客此刻都在那里睡觉。在离他当初看见罗萨尔芭上船的地方不远处，他在梦中见到了她。她在独自旅行，还穿着那身上世纪蒙波斯的衣服。但这一次是她，而不是那个婴儿，在那只挂在廊檐下的柳条鸟笼里午睡。这是一个既令人费解又十分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都一边和船长及两名旅客朋友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回味着这个梦。

太阳落山时，炎热消退，船上又恢复了生气。旅客们像刚从冬眠中苏醒一般，洗好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纷纷露面，占据了大厅的藤椅，等待开晚饭。五点钟整，一名侍者从甲板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响教堂司事的铃铛，宣布晚餐开始。用餐时，乐队奏起方丹戈舞曲，舞会将一直持续到半夜。

费尔明娜·达萨由于耳痛的烦扰，不想吃晚饭。她看见了航船首次加装锅炉木柴的情景。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峭壁旁，除了成堆的木头，以及照顾这项生意的一个年迈的老头儿之外，周围什么也没有，甚至方圆几里都空无一人。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一次如此漫长而枯燥的临时停靠，在欧洲的远洋轮船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装有冷气的望台里，她依旧感到酷热难耐。但当轮船重新起锚后，一阵清风吹来，仿佛让人闻到了森林内心的芬芳，船上的音乐也变得更欢快了。在希蒂奥·诺埃沃镇，只有一所房子中的一扇窗里亮着一盏孤灯，港口办公室也没有发出有货物或乘客登船的信号，因此，轮船没有鸣笛致意便开了过去。

整个下午，费尔明娜·达萨都在问自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会用什么办法在不敲开她舱门的情况下见到她。快到八点时，她再也按捺不住想跟他在一起的渴望。她来到走廊上，希望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遇见他。事实上，她不需要走多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坐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上，像在福音花园中一样沉默而忧伤，从两小时前，他就在问自己如何才能见到她。两人都露出同样吃惊的表情，但心里都清楚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漫步在一等舱的甲板上。那里挤满了年轻人，大部分是吵闹的学生，他们正急切地享受假期的最后狂欢，筋疲力尽地欢闹着。在小酒吧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明娜·达萨也像学生一样，坐在吧台前各自喝下了一瓶冷饮。她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怖的境地，不禁说道：“多可怕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她在想什么，是什么带给她这样的感觉。

“我在想那对可怜的老人。”她说，“就是在小艇上被人用桨打死的那两个。”

他们在昏暗的望台上畅快地长谈起来，直到音乐停歇，才回去睡觉。这晚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地平线上划过一道道无声的闪电，时而在一瞬间将他们照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卷好一支支香烟，但她被耳痛折磨着，只抽了四支。疼痛偶尔会减轻一些，但每当他们的船与其他船只相遇，或是从某个熟睡的村庄前经过，又或是为了试探水深而缓慢前行时，它那汽笛的鸣叫声便会加剧她的痛楚。他告诉她，每当他在花会上，在热气球飞行时，在杂技脚踏车的展览中看见她，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一年又一年里，他又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公众节日的到来，只为了能够看见她。她也曾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过他出现在那里仅仅是为了与她相遇。然而，不到一年前，当读到他的信时，她曾突然问自己，他怎么可能从未参加过花会的诗赛。毫无

疑问，如果他参加了，一定会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说了谎：他只为她写作，所有的诗句都是献给她的，而只有他自己是那些诗句的读者。这时，换成她在黑暗中主动搜寻他的手，当她找到时，它并不像前一晚她的手那样在等待，而是在被抓住时惊慌失措。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仿佛凝固了。

“女人多奇怪啊！”他说。

她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像年轻的小鸽子一般，但随即又想起小艇上的那对老人。命中注定，那影子将会一直跟随着她，但这天晚上，她承受住了，因为她觉得平静安详，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时刻：一身清白，毫无负罪感。她真想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什么也不说，只把他那汗涔涔的冰冷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但无奈，她忍受不了耳痛的折磨。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纷纷挂起吊床之后，她感到自己耳痛的程度超过了想和他在一起的愿望。其实她知道，单是把疼痛告诉他就能减轻自己的痛楚，但她没有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因为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已对他了然于心，就仿佛和他共度了一生似的，她相信，只要能让她减轻疼痛，他会下令让船开回港口。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料到这一晚事情会如此发展，于是起身告退。走到舱室门口时，他试图亲吻告别，但她向他侧过了左脸。他一再坚持，呼吸急促起来。于是，她又凑过右边的脸颊，那妩媚的娇态甚至在她上学时他也不曾见过。他再次坚持，终于，她用双唇迎接了他。她发自内心地颤抖着，试图用自新婚之夜起就已经忘记的笑声压制住自己的颤抖。

“我的上帝！”她说，“在船上我多疯狂啊！”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战栗了一下：的确，如她先前所说，她身上有一股上了年纪的酸味。然而，当他在熟睡的旅客那一张张吊床组成的迷宫中辟出道路向舱室走去时，还是自我安慰地想，他身上肯定也有同样的味道，而且还要再老上四岁，而她一定也怀着同样的激情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人发酵后的气味，他曾在那些最老的情人身上察觉到过，而她们也在他身上闻到过。拿撒勒的寡妇向来毫无顾忌，说的话更为刻薄："我们闻上去已经有股兀鹫的味儿了。"两人互相忍受，是因为彼此半斤八两：我的味儿正好与你的味儿相当。然而，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他很多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她身上那股襁褓中婴儿的味道时常唤起他内心母性的本能，可一想到她一定无法忍受他那股老色鬼的气味，他便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重要的是，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将弥撒经书放在电报室的柜台上的那个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未像今晚这样幸福过：这种幸福如此强烈，他甚至惶恐起来。

五点钟时，他才刚刚睡着，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把他叫醒，为的是交给他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署名是莱昂娜·卡西亚尼，于前一天发出。全部的惊恐集中于一行文字：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他通过电报与莱昂娜·卡西亚尼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事情的细节。他亲自操作发报设备，自从他不再当电报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美利加·维库尼亚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喝下了一瓶从学校医务室偷出来的阿片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深知，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但是，不，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能让人们将她的决定归咎于什么人。她的家人此刻正从父亲港赶来，是莱昂娜·卡西亚尼通知了他们，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点举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吸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个回忆折磨他。他把它从记忆中

抹掉了，尽管在余下的岁月里，他时常会不合时宜地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事故，就像旧日的伤疤带来的那种瞬间的刺痛。

接下来的几天炎热而没有尽头。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河道也越来越窄，初次旅行中曾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吃一惊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参天大树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烧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耗尽的整片森林的残骸，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庄的瓦砾—如今，这些村庄的街道，即使在最为干旱的时期也会洪水泛滥。夜晚，让他们醒来的不是河滩上的海牛那塞壬般的歌声，而是漂向大海的尸体恶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瘟疫也不再流行，但一具具肿胀的尸体还是源源不断地漂过。船长第一次欲言又止：“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些人都是意外溺水而亡。”昔日里，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会加剧午间的闷热，而此时，只剩下荒芜的大地上无边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且间隔很远，旅行的第四天，“新忠诚号”就断了燃料。船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分批深入到四处漂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零星分散的最后几棵树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樵夫们已离开了林间小路，以逃避大地之神的暴虐惩罚，逃避看不见的霍乱，以及政府借转移视线的法令试图掩盖的隐秘战争。这段时间，百无聊赖的旅客搞起了游泳比赛，还组织了狩猎探险队。他们带回一只只活鬣蜥，从上而下剖开它们的肚子，取出一串串半透明、软乎乎的蛋，然后用打背包的针把肚子缝上，将那一串串蛋挂在栏杆上晒干。附近村庄的穷妓女们追随着探险队的足迹，在岸边的峭壁上搭起临时帐篷，带来音乐和酒桶，在停泊不前的轮船对面狂欢起来。

早在还没当上CFC的董事长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多次接到过有关河流状况的警示性报告，但他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他让股东们

安心：“诸位别担心，等木柴烧光的时候，就已经有烧油的船了。”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激情使他晕头转向，从未为此事操过心，待到发现实情时，已经无计可施，除非能开辟一条新的河流。晚上，即使在河水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才能睡觉。此时，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十九世纪初，一个英国旅行者在提及某次可能持续了五十天之久的驾独木舟与骑骡相结合的旅行时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糟糕、最难耐的长途跋涉。”在蒸汽船开航后的前八十年，情况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当短吻鳄吞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被赶尽杀绝，鹦鹉、长尾猴和村庄销声匿迹，所有都不见了踪影的时候，一切就又回到了老样子，而且将永远持续下去。

“没关系。”船长笑着说，“几年后我们再来时，将开着豪华汽车跑在干枯的河床上。”

旅行的前三天，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保护在望台柔和的春光里。但自从木柴定量配给、冷气系统无法运行，总统舱就变成了一只蒸汽咖啡壶。她借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河风，才得以熬过夜晚的难关，还得不停地用毛巾驱赶蚊子，因为船停泊时，杀虫剂喷筒已毫无用处。耳痛变得无法忍受。可一天早上她醒来时，疼痛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唱破了肚皮的知了，歌声戛然而止。直到晚上，她才发现左耳已失去听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左边跟她说话时，她不得不转过头才能听见。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顺从地忍受着，这不过是在年龄带来的那许多无法挽回的缺陷上再加一条罢了。

不管怎样，轮船的延误对他们来说是天意的磨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而高尚。”总统舱里的潮湿使他们沉浸在一种超乎现实的昏睡之中，这种环境更容易使人毫无异议地相爱。在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栏杆前的靠背椅上，手拉着手，缓慢地亲吻，陶醉于爱抚之中，从不会因失去耐心而扫兴。第三个昏沉的夜晚，她准备了一瓶茴香酒等他到来。她曾同伊尔德布兰达那群表姐妹们一起偷偷喝过这种酒，结婚生子之后，她又和那些本不属于她的世界的女友们一起关起房门来喝过。此刻，她需要让自己糊涂一点，为的是不必太清醒地去思索命运。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鼓起勇气迈出最后一步。在这种幻想的驱使下，他大起胆子，用手指肚探索着她那干瘪的脖颈，她那仿佛装着金属骨架的胸部，骨骼已被销蚀的臀部，以及那老母鹿般的大腿。她闭着眼，心满意足地任他抚摸，但并没有颤抖，只是抽着烟，时不时地呷一口酒。最后，当他的爱抚滑至她的小腹时，她的心里已经充满了足够的茴香酒。

“如果我们一定要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就干吧。”她说，“不过要像成年人那样。”

她把他带到卧室，亮着灯，开始毫不扭捏地脱起衣服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仰躺在床上，努力控制着自己，他又一次在杀死老虎后不知该如何处置虎皮了。她对他说：“你别看。”他问为什么，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天花板。

“因为你不会喜欢的。”她说。

于是，他瞥了她一眼，看见她赤裸的上身，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的肩膀布满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被包在一层青蛙皮似的苍

白而冰凉的皮肤里。她用刚刚脱下来的衬衫挡在胸前，关掉了灯。这时，他坐起身来，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每脱一件就扔到她身上，而她又把它们扔回去，笑得前仰后合。

两人仰面朝天地躺了好一阵子。随着醉意退去，他越来越不知所措。她却很平静，几乎失去了意志力，但她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就像每次喝多了茴香酒时那样。他们交谈着，为的是消磨时间。他们谈起自己，谈起各自不同的生活，谈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就在应该去思考时间对他们来说已所剩无几、只能用来等死的时候，他们却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艘停泊轮船的漆黑舱室里。在他们的城市，一切甚至在发生之前就会尽人皆知，可她却从未听说过他有女人，一次也没有。她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提及此事，而他立刻做出了回答，声音中没有一丝颤抖：

“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贞。”

即便这是真的，她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里也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准确的含义，而在于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力量。但她喜欢他说这话时的勇气。而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突然问了自己一个从未敢问过的问题：她在婚姻之外，还有过怎样不为人知的生活。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在秘密冒险这方面，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的狡诈伎俩，同样的心血来潮，同样的没有丝毫愧疚的背叛。但他没有张口问她，这是对的。曾经，在她和教会的关系相当不愉快的那段时期，忏悔神甫竟出其不意地问她是否对丈夫有过不忠。她直接站了起来，没有回答，没有做完忏悔，甚至没有向神甫告别。此后，她再也没有做过忏悔，无论是向这位神甫，还是向其他任何一位神甫。此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谨慎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她在黑

暗中伸出手去，抚摸着他的小腹，他身体的两侧，以及他那几乎已经没有毛发的耻骨。她说：“你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接着，她迈出了最后一步：她寻找着它，发现它并不在那里，她继续无望地找着，终于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

“它死了。”他说。

这种事在他身上常常发生，他已学会了和这个幽灵共处：只是每一次他都像第一次似的，要重新去学习面对之法。他拿起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那颗不知疲倦的老人之心正以年轻人的力量、速度和慌乱跳动着。他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但他说这话时并没有信心，事实上，他羞愧难当，正和自己怄气，渴望找个理由把失败归咎于她。她看出了这一点，开始用嘲弄似的爱抚挑逗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身体，就像一只残忍地幸灾乐祸的温柔小猫。终于，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起身回自己的舱室去了。她一直想着他，直到天亮，终于确认了自己对他的爱。随着茴香酒带来的醉意散去，她独自漂浮在缓慢的海浪中，忧郁渐渐袭上心头，她担心他生她的气，不会再来了。

然而，他当天就来了，在上午十一点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还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他带着某种炫耀的神情，当着她的面脱光了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她高兴地看到他和自己在黑暗之中想象的一模一样：一个没有年龄的男人，皮肤很黑，像撑开的伞一样光亮、紧绷，除了腋下和耻骨处几根稀疏而平直的毛发，浑身再无其他茸毛。他的侍卫昂首挺立，她发现他并非偶然让她看见他的武器，而是像炫耀战利品一样有意地展示，以鼓舞自己的士气。他甚至没给她时间脱掉她在清晨吹起微风时穿上的睡衣，这种新手般的仓促慌乱使她因感到同情而浑身一颤。但这并没有令她不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很

难分清自己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情。然而，做完之后，她却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做爱。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好奇而恍惚出神，体会着停歇了这么久之后，又在这样一个年龄，再做这件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他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让她想清楚自己的身体是否也同样爱他。一切迅速而可悲。她想：“现在可好，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但她错了。尽管他们都有些失望，尽管他为自己的笨拙而后悔，尽管她因茴香酒带来的疯狂而内疚，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却片刻也没有再分开过，甚至连吃饭都几乎没再走出过舱室。萨马利塔诺船长凭借着本能，向来能够洞悉他的船上任何一个试图隐藏的秘密。他每天早上派人给他们送来白玫瑰，夜晚为他们演奏他们那个时代的华尔兹小夜曲，还打趣似的吩咐厨师为他们准备添加了催情佐料的食物。此后很久，他们才又一次尝试了做爱—等到灵感自然而然地找上门来，而非他们刻意去寻找灵感。能够待在一起，这种简单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

他们从未想过要走出舱室，直到船长用一张纸条通知他们，经过十一天的航行，船在午餐后就将到达此行的最后一个港口：黄金港。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舱室中看见，山冈上的房子在苍白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便自以为理解了港口名字的由来，但当他们感到空气蒸得像在锅炉里一样，看见街道上的沥青都已沸腾时，又觉得那个名字没那么贴切了。他们的船并没有停靠在港口这边，而是停到了对岸，那里是开往圣菲的火车的起点站。

旅客们一下船，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避难所。费尔明娜·达萨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呼吸着未受污染的新鲜空气。两人从船舷上望向一群喧嚷躁动的游客，他们正在一列玩具一样的火车车厢里寻找自己的行

李。他们很可能来自欧洲，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身上罩着的北欧式的大衣和上世纪的帽子同这里尘土飞扬的夏日气候格格不入。一些女人的头发上还装饰着的美丽的土豆花，已经开始在炎热中枯萎。他们坐了一天的火车，穿过梦幻般的大草原，刚刚从安第斯平原来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换上适合加勒比的衣服。

在喧闹的市场中，一位看上去很可怜的老人正从乞丐外衣的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只小鸡来。他是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的，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大衣显然曾属于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人。他摘下帽子，口朝上放到码头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往里面扔一枚硬币。接着，他从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一只稚嫩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小鸡来，仿佛是从他的指间繁殖出来的。一时间，码头上像铺了一层小鸡地毯，它们惊慌失措地啾啾叫着，到处乱跑，有些匆忙的旅客把它们踩在脚下都全然不知。费尔明娜·达萨被眼前神奇的景象迷住了，她觉得这仿佛是在欢迎她的到来，因为只有她看到了这一切。她看得出神，甚至没有注意到返程的旅客是何时开始上船的。她的节日狂欢结束了：在陆续登船的人中，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是她的朋友，前不久还曾在服丧期间陪伴过她。她仓皇地躲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万分沮丧：她宁愿死，也不愿被那个圈子中的人发现她在丈夫刚去世不久就愉快地出门旅行。她的垂头丧气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疼不已，他发誓要想出办法来保护她，而不是让她像坐牢似的待在舱室里。

当他们在私人餐厅用晚餐时，他突然想出了主意。船长一直在为某个问题烦恼，好久以前就想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讨论一下，但阿里萨总是以他那一贯的理由避而不谈：“这些琐事，莱昂娜·卡西亚尼比我处理得更好。”然而，这一次他仔细听了船长的话。事情是这

样的，船上行时载着货物，回程却是空的，而载客情况却正好相反。“载货是有利的，付的钱多，而且货物还不用吃饭。”他说。费尔明娜·达萨的这顿晚餐吃得索然无味，两个男人就设立不同票价制度的好处进行的冗长讨论让她感到无聊。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到最后，才提出了一个在船长看来可能是拯救方案之前奏的问题：

“我们来假设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做一次直航，既不载货，也不运送旅客，不在任何港口停靠，总之就是，途中什么都不做？”

船长说，这只在假设中成立。CFC有各种劳务协议，这一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比谁都清楚，关于载货、载客、邮件运输以及其他很多项义务都签有合同，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推卸的。唯有一种情况可以跳过一切条款，那就是船上发生瘟疫。轮船宣布进入隔离检疫，升起黄旗，在紧急状态下航行。由于沿河出现过很多次霍乱，萨马利塔诺船长曾有好几次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后来卫生部门强迫医生签署了死者死于普通痢疾的证明。此外，在这条河流的历史上，很多时候轮船升起代表瘟疫的黄旗是为了逃避税收，或是不愿搭载某个乘客，又或是躲避不合时宜的检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桌下找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手。

“那么好，”他说，“我们就这么办。”

船长大吃一惊，但很快，他就凭着自己老狐狸的本能洞察了一切。

“我指挥这条船，而您指挥我们所有人。”他说，“因此，如果您是认真的，就请给我一份书面命令，我们马上开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然是认真的。他签署了命令。不管怎么说，谁都知道，尽管卫生部门对形势估计乐观，但霍乱时期远未结束。至于船本身，并不是问题。已经装船的货物本就不多，它们被转移到了别的船上，旅客则被告知轮船的机器出了故障，当天清晨已被安排搭乘其他公司的一艘轮船。如果说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道德，甚至有些令人不齿，但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来，既然都是为了爱，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不合法的。船长唯一的请求是在纳雷港停一下，把一个陪他旅行的人接上船来：他也有自己隐秘的心思。

于是，“新忠诚号”在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就起锚了。没有货物，也没有旅客，主桅杆上一面标志着霍乱的黄旗欢快地飘荡。傍晚时，他们在纳雷港把一个比船长还要高大结实的女人接上了船。她的美与众不同，只差一把胡子就可以被马戏团聘用了。她叫塞娜依达·内维斯，可船长却称呼她“我的魔女”。她是船长的老情人，他常常把她从一个港口接上船，再在另一个港口放下，而且每次她一登船，便会带来一股幸福的劲风。在这个令人伤心的死亡之地，看着恩维加多的火车在昔日骡子走过的飞檐般的峭壁上吃力爬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中不由泛起对罗萨尔芭的思念。正在此时，亚马孙的暴雨倾盆而下，在余下的旅途中几乎没有停歇过。但谁都没有在意：旅行中的狂欢自有其避风挡雨的屋檐。那天晚上，作为个人对狂欢的贡献，费尔明娜·达萨在船员们的欢呼声中下了厨房，为大家做了一道她自创的菜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其命名为“爱情茄子”。

白天，他们玩牌，吃到肚皮要爆炸，午觉也睡得酣畅淋漓，以至于醒来时精疲力尽。太阳刚一下山，乐队便开始演奏，他们饮茴香酒吃鲑鱼，直到餍足还不罢休。这是一次快速旅行，船轻水顺：那个星期乃及整个旅途中都在下雨，上游涨起的水滚滚而下，改善了河流的

状况。一些村镇怀着同情为他们鸣炮驱赶霍乱，他们则用汽笛的哀鸣表示谢意。途中，无论哪家公司的船与他们相遇，都向他们发出致哀的信号。在马冈盖镇，梅塞德斯出生的地方，他们备足了余下旅程所需的所有木柴。

当费尔明娜·达萨那只好使的耳朵又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时，她吓了一跳，但在畅饮茴香酒的第二天，她的两只耳朵就都听得比以往更清楚了。她发现玫瑰花比从前更香，鸟儿黎明时的歌声也更动听了。她还发现，上帝又造了一头海牛，把它放到了塔玛拉梅克的河滩上，目的就是把她唤醒。船长也听到了海牛的叫声，命令改变航向。于是，他们看见了这个体形巨大、刚刚分娩的母亲，它正把幼子抱在怀中喂奶。无论是弗洛伦蒂诺还是费尔明娜，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彼此间是多么情投意合：她帮他灌肠，在他之前起床为他刷净他睡觉前放在杯中的假牙；她总找不着眼镜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她看书和缝补时可以戴上他的眼镜。一天早上她醒来，见他正在昏暗中钉衬衫上的纽扣。在他说出那句“男人需要两个妻子”的仪式性话语之前，她赶忙把活儿抢到自己手中。而她唯一需要他做的，只是给她拔火罐消除背痛。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开始用乐队的小提琴来抒发旧情。只练了半天，他便能为她演奏“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他几小时不间断地拉着这首曲子，直到大家不得不强迫他停下来。一天夜里，费尔明娜·达萨平生第一次在痛苦而非愤怒的哭泣中因窒息醒来，由于她又想起了那两个在船上被桨活活打死的老人。一直下个不停的雨反倒没有在她心中激起波澜，她为时已晚地想着，或许巴黎并不像自己感觉的那样阴郁，圣菲的街道上或许也并没有那么多葬礼。未来再同弗

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起出游的梦想在天边浮现：那将是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旅行，不带箱子，没有应酬：纯粹的爱之旅。

到港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四处挂起纸花环和彩灯。黄昏时，雨停了。船长和塞娜依达搂得紧紧地跳了几曲波莱罗舞，在那年月，这种舞正开始迷醉人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着胆子向费尔明娜·达萨提议，他们也伴着那首只属于两人的华尔兹跳上一曲，但她拒绝了。不过整个晚上，她都在用脑袋和鞋跟打着拍子，甚至有那么片刻，当船长和他那温柔的魔女在昏暗中如胶似漆地跳着波莱罗时，她竟不知不觉地在椅子上舞动起来。她喝了那么多茴香酒，以至于最后大家不得不扶着她走上楼梯。她突然一边哭一边笑起来，让所有人都慌了手脚。但在舱室里那凝滞的香气中，她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他们平静而健康地做了爱。这是满脸皱纹的祖父祖母之间的爱，它将作为这次疯狂旅行中最美好的回忆，铭刻在两个人的记忆之中。同船长和塞娜依达猜想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感觉并不像新婚燕尔的夫妇，更不像相聚恨晚的情人。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

六点钟，他们醒了。她的头因昨晚的茴香酒还剧烈地疼着，而且心慌意乱，因为她仿佛觉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回来了，比从树上摔下去时更胖了一些，也更年轻了，正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等着她。然而，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这并非茴香酒产生的作用，而是对马上就要到家的恐惧。

“这就像要死了一样。”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了一惊，因为她的话道破了自返程起就时刻折磨着他的一个想法。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想象自己在舱室以外的另一个家里，吃着与船上不同的饭菜，投身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将永远陌生的生活中去—那真的像死一样。他再也睡不着，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片刻之后，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回忆刺痛了他，他蜷起身子，再也无法逃避真相。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痛痛快快、从容不迫地大哭了一场，直至哭尽最后一滴眼泪。也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勇气向自己承认他曾多么爱她。

当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准备下船时，轮船已把昔日西班牙人关口的狭窄水道和沼泽抛到身后，行驶在海湾破旧的船骸和废弃的油罐之间。一个灿烂的星期四从这座总督之城的金色穹顶上徐徐升起。然而，站在栏杆前的费尔明娜·达萨已无法忍受它那腐臭的荣耀，以及那些早已被鬣蜥亵渎的城堡的高傲：可怕的现实生活。两人都没有说话，但无论他，还是她，都感到自己无法如此轻易地屈服投降。

他们在餐厅里找到了船长。他那副狼狈的样子与平日里的干净利落判若两人：胡子没刮，双眼因失眠而布满血丝，衣服上还浸着昨晚的汗水，说话颠三倒四，不时地打着茴香酒嗝。塞娜依达还在睡着。当他们开始默默地吃早餐时，港口卫生局的汽油快艇命令他们把船停下来。

船长从指挥台上大声叫嚷着回答了武装巡逻队的问话。他们想知道船上染的是什么瘟疫，有多少旅客，又有多少病人，传染的可能性有多大。船长回答说，只有三名旅客，得的全是霍乱，但一直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无论是那些本应在黄金港上船的旅客，还是二十七名

船员，都没和他们有过任何接触。但巡逻队队长并不满意这个回答，命令他们离开海湾，在为船办理隔离手续期间，他们要在拉斯·梅塞德斯沼泽等候到下午两点。船长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做了个手势，命令领航员掉头回沼泽去。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餐桌前听到了这一切，船长却好像满不在乎。他继续默不作声地吃着饭，糟糕的心情一目了然，已顾不上保持内河船长在礼仪和修养方面一贯的好名声。他用刀尖剖开盘子里的四只煎鸡蛋，把它们同整块整块的油炸青香蕉卷在一起塞进嘴里，带着野蛮的喜悦大嚼起来。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就像坐在学校板凳上等待宣读期末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船长和卫生局的武装巡逻队对话时，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今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心中一点主意也没有。但两个人都清楚，船长正在为他们打算：从他太阳穴的跳动就可以看出。

就在船长打发掉那盘煎鸡蛋和油炸香蕉块，喝光一罐牛奶咖啡时，轮船带着安安静静的锅炉，驶出了海港，穿过狭窄的水道，在一层厚厚的凤眼莲、深紫色的莲花和心形的大荷叶中间开出一条路来，返回沼泽地去了。水面上闪着银光，到处都漂浮着横陈的死鱼，全是被偷偷捕鱼的渔民用炸药炸死的。陆地和水上的鸟儿在它们的上空盘旋，发出金属般刺耳的叫声。加勒比的海风伴随着鸟儿的喧闹从窗户飘了进来。费尔明娜·达萨感到自己血液中的自由意志一阵沸腾。右边，马格达莱纳大河潮淹区的河水，浑浊而缓慢地向世界的另一边延伸。

当盘子里再没有东西可吃时，船长用桌布的一角抹了抹嘴，放肆无礼地大骂了一通黑话，彻底毁掉了内河船长言行文雅的美誉。他不

是冲他们，也不是冲着任何人说的，只是想要发泄心中的怒火。在一连串粗鲁的咒骂之后，他的结论是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霍乱黄旗带来的困境。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他说完。然后，他透过窗子看了看航海罗盘上那一整圈刻度表，又望了望清晰的地平线，望了望十二月万里无云的天空和可以永远航行下去的一望无际的水面，说：

“我们走，一直走，一直走，重回黄金港！”

费尔明娜·达萨浑身一震，因为她听出了昔日那个被圣神恩典照亮的声音。她看了看船长：他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者。但船长没有看她，他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灵感的巨大力量震慑住了。

“您此话当真？”他问他道。

“从我出生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就没说过一件不当真的事。”

船长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在她睫毛上看到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的是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这份迟来的顿悟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他问。

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

[1]钉马掌的骡子，典出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的一个传说。西班牙殖民时期，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嫁给一个西班牙贵族青年后，忘了本，最后受到上天的惩罚，变成一头钉马掌的骡子。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67

Cien años de soledad

献给

赫米·加西亚·阿斯科特

玛利亚·路易莎·艾里奥

一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前后，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会来到村边扎下帐篷，击鼓鸣笛，在喧闹欢腾中介绍新近的发明。最初他们带来了磁石。一个身形肥大的吉卜赛人，胡须蓬乱，手如雀爪，自称梅尔基亚德斯，当众进行了一场可惊可怖的展示，号称是出自马其顿诸位炼金大师之手的第八大奇迹。他拖着两块金属锭走家串户，引发的景象使所有人目瞪口呆：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跌落，木板因钉子绝望挣扎、螺丝奋力挣脱而吱嘎作响，甚至连那些丢失多日的物件也在久寻不见的地方出现，一窝蜂似的追随在梅尔基亚德斯的魔铁后面。“万物皆有灵，”吉卜赛人用嘶哑的嗓音宣告，“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天马行空的想象一向超出大自然的创造，甚至超越了奇迹和魔法，他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无用的发明来挖掘地下黄金。梅尔基亚德斯是个诚实的人，当时就提醒他：“干不了这个。”然而那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吉卜赛人的诚实尚缺乏信任，仍然拿一头骡子和一对山羊换了那两块磁铁。他的妻子乌尔苏拉·伊瓜兰本指望着靠这些牲口扩展微薄的家业，却没能拦住他。“很快我们的金子就会多到能铺地了。”她丈夫回答。此后的几个月他费尽心力想要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拖着两块铁锭，口中念着梅尔基亚德斯的咒语，勘测那片地区的每一寸土地，连河床底也不曾放过。唯一的挖掘成果是一副十五世纪锈迹斑斑的盔甲，敲击之下发出空洞的回声，好像塞满石块

的大葫芦。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一起探险的四个男人将盔甲成功拆卸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具已经钙化的骷髅，骷髅的颈子上挂着铜质的圣物盒，盒里有一缕女人的头发。

三月里，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带来一架望远镜和一台足有鼓面大小的放大镜，展出时声称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让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村子一头，将望远镜安在帐篷入口。花上五个里亚尔，人们就可以凑到望远镜后，看到那个吉卜赛女人在眼前出现，仿佛触手可及。“科学消除了距离，”梅尔基亚德斯说，“用不了多久，人们不出家门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他们用那台巨型放大镜作了一次惊人的演示：把一堆干草铺在街道中央，然后通过聚焦阳光点燃。尚未从磁铁实验的失利中平复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又萌生了将这一发明应用于战争的想法。梅尔基亚德斯再次试图让他打消念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两块磁铁加三枚殖民地金币，将放大镜换给了他。乌尔苏拉难过地哭了。那些钱是从她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一匣金币中拿出来的，她本来一直埋在床下，想等待合适的机会做本钱。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暇安慰她，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全心投入战术实验，甚至不惜以身犯险。为了验证放大镜对敌军产生的效果，他亲自待到阳光的焦点下，结果身体被灼伤后溃烂，挨了很长时间才痊愈。妻子对如此危险的发明心生恐惧而提出抗议，但他全然不顾，险些把家里的房子点燃。他久久待在房间里，计算新武器的战略威力，写出了一本解说无比清晰、说服力无可抗拒的手册。他把该手册连同多种实验记录和多幅示意图一起寄给当局，承担这一使命的信使翻越山脉，迷失于无边的沼泽，蹚过湍急的河水，遭受猛兽的袭击、绝望情绪和瘟疫的打击险些丧命，最后终于找到了邮政骡队途经的驿道。虽然当时远赴首都不太可能，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仍然表示，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立刻出发，为军方实地演示他的发明，并亲自传授阳光战的精密战术。他等待回复多年，最终厌倦了等待，到梅尔基亚德斯面

前哀叹自己的挫折。于是那个吉卜赛人做出了足以显明其诚实的举动：收回放大镜，把那三枚多卜隆[①]还给他，还留下一些葡萄牙人的地图和多种航海仪器。梅尔基亚德斯亲笔写了一份赫尔曼修士[②]的研究成果提要给他，教他如何使用星盘、罗盘和六分仪。为了确保不受打扰地进行实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宅院深处盖了一间小屋，整个漫长的雨季都把自己关在屋中。他把家庭职责完全抛在脑后，整夜待在院子里观测星体的运行，为了寻找精确测定正午的方法险些患上日晒病。掌握了那些仪器的用法并操作自如后，对空间的认知使他无须离开小屋就能遨游未知的海洋，寻访荒凉的地域，并与神奇的生灵交流。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旁若无人地在家中踱步，与此同时乌尔苏拉和孩子们却在菜园里累得直不起腰来，照料香蕉、海芋、木薯、山药、南瓜和茄子。然而，没有任何征兆，他疯狂的活动猝然中断，整个人陷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连续好几天像是着了魔，喃喃自语，说出一连串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惊人设想。最终，在十二月一个星期二的午饭时分，他从所有的折磨中一下解脱了。孩子们终其一生都将记得父亲如何在桌首庄严入座，被长期熬夜和苦思冥想折磨得形销骨立，因激动而颤抖着，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就像个橙子。”

乌尔苏拉再也无法忍耐。“如果你非发疯不可，就一个人疯好了，”她喊道，“别想用你那套吉卜赛人的胡话教坏孩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动于衷，妻子在狂怒之下把星盘扔到地上摔得粉碎，他也没有被吓着。他又造了一台，还召集村里的男人到自己的小屋，用无人能懂的理论向他们证明，一直向东航行就有可能回到出发点。全村人都确信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已经失去理智，这时梅尔基亚德斯来到，澄清了真相。他当众赞许这个男人的聪明才智，说他仅凭天文观测就建立起的理论尽管在马孔多尚不为人所知，

但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为了表示敬佩，他特别馈赠了一样将对村子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礼物：一间炼金实验室。

那一时期，梅尔基亚德斯正以惊人的速度衰老。他头几回来访时看上去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岁数相仿，但当后者仍然力气过人，揪住马耳朵就能将马掀翻的时候，吉卜赛人却好像已被某种顽疾击垮。实际上，那是他无数次周游世界时染上多种罕见疾病的结果。他在帮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搭建实验室时亲口说过，死神一直追随他的脚步，嗅闻他的行踪，但尚未下定决心给他最后一击。他经历了危害人类的各种疾病和灾难幸存下来。他在波斯得过蜀黍红斑病，在马来群岛患上坏血病，在亚历山大生过麻风病，在日本染上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腺鼠疫，在西西里碰上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遇重大海难，却都大难不死。这个天赋异禀，自称掌握了诺查丹玛斯[③]之钥的人是个阴沉的男子，裹在一团愁云惨雾里，谜一般的目光仿佛能看透一切。他总戴着一顶黑色大礼帽，活像乌鸦展开的翅膀，身穿一件天鹅绒坎肩，染着沧桑岁月的苔印。他智慧无边又神秘莫测，但还是有着凡人的一面，未能摆脱日常生活中琐碎问题的烦扰。他抱怨着衰老和病痛，为经济上微不足道的困窘而难过；他很久以前就不再展露笑容，因为坏血病夺去了他所有的牙齿。在一个闷热的正午，他吐露了心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确信那是一段伟大友情的开始。孩子们听着他的神奇故事，目瞪口呆。奥雷里亚诺那时只有五岁，他一生都将记得，那个下午吉卜赛人如何坐在窗前金属的反光中，用管风琴般深沉的声音揭示最幽暗的想象地域，热得沿太阳穴流下油腻的汗水。他的哥哥 何塞·阿尔卡蒂奥，将会把这奇妙的形象作为记忆遗产，传给所有后世子孙。乌尔苏拉却对这次来访印象恶劣，因为她走进房间的时候，正赶上梅尔基亚德斯一分神，打破了一个装有二氯化汞的小瓶。

“这是魔鬼的气味。”她说。

“绝不是。”梅尔基亚德斯纠正道，“魔鬼已被证明具有硫化物的属性，而这不过是一点儿氯化汞。”

一向诲人不倦的梅尔基亚德斯详细讲解了朱砂与魔鬼相关的效用，但乌尔苏拉却未加理睬，径自带孩子们出去祈祷。那种刺鼻的味道将与对梅尔基亚德斯的记忆一起，永远铭刻在她心里。

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除了大量的小锅、漏斗、蒸馏瓶、滤器和滤网，还备有一座简陋的炼金炉，一个仿照“哲学之卵”制成的长颈烧瓶，以及一套由吉卜赛人按照犹太人玛利亚对三臂蒸馏器的现代描述制作的蒸馏过滤设备。梅尔基亚德斯还留下了对应七大行星的七种金属的若干样品，摩西和索希莫[④]的倍金配方，以及“超绝之精”[⑤]系列笔记和草图，如果参悟成功就能炼出点金石。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见倍金配方很简单便着了迷，接连几个星期都央求乌尔苏拉挖出她的殖民地金币，说水银能分割多少次，金子就能翻上多少倍。乌尔苏拉像往常一样，在丈夫无可动摇的决心前让了步。于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三十枚多卜隆金币投入一口坩埚，与铜屑、雌黄、硫黄和铅一起熔化，然后倒入盛满麻油的锅里用旺火煮沸，直到熬出一摊发出恶臭的浓浆，看起来更像是劣质的糖浆而非美妙的黄金。在令人忐忑和绝望的蒸馏过程中，经过与七种行星金属冶合，再放入玄妙的水银和塞浦路斯的硫酸盐中炮制，又用猪油替代萝卜油回锅熬炼，乌尔苏拉宝贵的遗产最后变成一坨碳化的油渣，死死粘在锅底。

当吉卜赛人再来的时候，乌尔苏拉已经发动全村的人加以抵制。但好奇心胜过了恐惧，因为这一次吉卜赛人走遍全村，利用各式乐器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叫卖人还声称将要展出纳西安索人最神奇的发明。因此全村人都去了帐篷，付上一个生太伏就看到了青春焕发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痊愈，皱纹平复，全新的牙齿闪闪发亮。凡是还记得他的牙龈如何毁于坏血病、脸颊如何松弛、嘴唇如何干瘪的人，面对这一无可置疑的明证，都不禁为吉卜赛人的魔力而惊栗。梅尔基

亚德斯将镶在牙床上的牙齿完好无损地摘下并向观众展示—那一瞬间他变回了往昔的老朽模样—随后又戴上牙齿展露出重获青春的微笑，这时惊慌变成了恐惧。即便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觉得梅尔基亚德斯的知识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不过当后者私下里给他讲解了假牙的原理后，他随即感到一阵畅然。他觉得这一切如此简单而神奇，一夜之间又对炼金研究完全失去了兴趣，陷入新的情绪危机，无心饮食，整天在家中踱步。“世上正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对乌尔苏拉说，“就在那边，在河的另一边，各种魔法机器应有尽有，而我们却还像驴子一样生活。”从马孔多创建之初就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于他在梅尔基亚德斯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当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那种年轻的族长式人物，他指导人们怎样播种，建议怎样教育孩子、饲养牲畜，为村社的繁荣与所有人通力合作，在体力劳动上也不例外。从一开始他家的房子就是村里最好的，成为他人仿效的对象。他家有一间敞亮的小厅，一间鲜花盛开、颜色喜人的露台餐厅，两间卧室，一座栽着一棵大栗树的庭院，一片精心打理的菜园，还有一个畜栏，山羊、母鸡和猪在其间和谐相处。在家里乃至整个村子，斗鸡是唯一禁养的动物。

乌尔苏拉的勤劳比起丈夫毫不逊色。她身材娇小，活力充沛，严肃不苟，是个意志坚定的女人，从未有人听她唱过歌。她似乎无处不在，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伴随着细棉布裙柔和的窸窣声一直四处忙碌。全亏了她，那泥土夯平的地面、未经粉刷的泥墙和自制的粗木家具才永远一尘不染，旧箱子里存放的衣服才永远散发着罗勒的淡淡香气。

像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这样富于进取心的男人，村里再没有第二个。他排定了各家房屋的位置，确保每一户都临近河边，取水同样便捷；还规划了街道，确保炎热时任何一户都不会比别家多晒到太阳。短短几年里，三百名居民的马孔多成为当时已知村镇中最勤勉有序的典范。它的确是一处乐土，没人超过三十岁，也没人死去。

从村庄初建时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就制作了捕鸟机关和鸟笼。很快，不光在家里，整个村庄到处都是拟黄鹂、金丝雀、蓝鸽和知更鸟。种类纷繁、数目众多的鸟儿一起鸣唱，令人心烦意乱，乌尔苏拉不得不用蜂蜡堵住耳朵才能保持神志清醒。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第一次来贩卖治头痛的玻璃珠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竟能找到这个迷失在沼泽雾瘴中的村庄，而吉卜赛人承认他们正是循着鸟鸣而来。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初建功立业的雄心，迅速在磁铁迷狂、天文演算、炼金幻梦以及见识世上奇观的热望中消磨殆尽，曾经勇于开拓、仪表整洁的他，变成一个外表懒散、不修边幅的男人。他那野蛮人一样的胡须，乌尔苏拉费尽力气才能勉强用菜刀收拾干净。甚至有人将他视为某种诡异巫术的牺牲品。然而当他将开荒的工具扛上肩头，倡议全体村民共同开辟一条将马孔多与新兴发明相连的捷径时，即使是那些深信他已发疯的人也丢下活计与家人而去跟随他。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向东是无法逾越的山脉，山脉的另一侧是古老的城市里奥阿查，据他的祖父即第一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所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6]曾在那里以大炮猎杀鳄鱼为乐，修补后填上稻草送给伊丽莎白女王。年轻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领着一群同伴，携带妻儿、牲口及所有生活用品，翻越山脉去寻找入海口。他们经过二十六个月的跋涉后决定放弃，为了避免原路返回便建立了马孔多。他对那条路不感兴趣，因为它只能将他带回到过去。向南是永远覆着绿色植被的泥塘和广阔的大沼泽,吉卜赛人都说没见过它的边界。大沼泽西边毗邻的是广袤无垠的水面，那里有皮肤娇嫩的鲸类，它们长着女人的头颅和身体，凭借巨大乳房的魔力让航行者迷失心智。吉卜赛人沿着这条水路航行了六个月，才找到邮政骡队经过的陆地。根据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估计，与文明世界唯一可能的连接

是北方的道路。于是他将当年和自己一起创建马孔多的同一群人用开荒装备和狩猎器械武装起来，把导向工具和地图塞进背包，开始了这场可怕的冒险。

最初几日，没有遇到什么值得一提的阻碍。他们沿着乱石遍布的河岸下到数年前找到盔甲的地方，从那里经野生橘林中的一条小径进入森林。走了快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们打了一头鹿来烤熟，决定只吃一半，把另一半腌好留待后日，希望借此尽量推迟拿金刚鹦鹉充饥的日子，因为那蓝色的鸟肉有股浓烈的麝香味。此后的十多天，他们从未见到太阳。地面变得柔软潮湿如火山灰，林莽日益险恶，鸟儿的啼叫和猿猴的喧闹渐行渐远，天地间一片永恒的幽暗。在这潮湿静寂、远在原罪之先就已存在的天堂里，远征队的人们被最古老的回忆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靴子陷进雾气腾腾的油窟，砍刀斩碎猩红的百合与金黄的蝾螈。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只借着某些昆虫发出的微弱光亮，像梦游人一般穿过阴惨的世界，肺叶间满溢令人窒息的鲜血味道。他们无法返回，因为辟出的道路转瞬就被新生的植物再次封闭，其生长速度几乎肉眼可见。“不要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重要的是别迷失方向。”他始终拿着罗盘，带着队伍走向看不见的北方，直到走出这片着了魔的土地。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星光，但黑暗中充盈着清新的空气。人们被漫长的跋涉折磨得精疲力竭，纷纷挂起吊床，两个星期以来第一回安心入眠。醒来时已是日头高照，人们无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在蕨类和棕榈科植物中间，静静的晨光下，赫然停着一艘覆满尘埃的白色西班牙大帆船。船向右侧微倾，完好无损的桅杆上还残留着肮脏零落的船帆，缆索上有兰花开放点缀其间。船身覆盖着一层由石化的鱼和柔软的苔藓构成的光润护甲，牢牢地嵌在乱石地里。整艘船仿佛占据着一个独特的空间，属于孤独和遗忘的空间，远离时光的侵蚀，避开飞鸟的骚扰。远征者们在船内仔细探查，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只见一座鲜花丛林密密层层地盛开。

大帆船的发现意味着大海就在近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他将此视为顽皮的命运对自己的嘲弄：曾经作出巨大牺牲、历经无数苦难寻找大海而不得，如今无心寻找它却送上门来，横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曾穿越这片土地，那时这里已经成为常规驿道，而他见到的唯有烧焦的龙骨矗立在一片罂粟花地上。直到那时他才相信这段历史不是父亲的想象，不禁为大帆船如何深入陆地至此而困惑不解。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曾为这个问题困扰，他又走了四天，来到距大帆船十二公里的海边。面对大海，他的梦想破灭，这灰白肮脏、泡沫翻腾的大海，不值得为之冒险和牺牲。

“见鬼！”他喊了起来，“马孔多周围全是水！”

很长时间内，马孔多处在一个半岛上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这源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远征归来后武断绘出的地图。他绘图时满怀怒气，故意夸大交通的艰难，以此来惩罚自己竟如此荒唐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一辈子哪儿也去不了，”他向乌尔苏拉抱怨道，“我们注定要在这里活活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他在实验室小屋里思来想去，脑海中全是这个念头，几个月后终于酝酿出一个方案，要将马孔多迁移到更合宜的地点。但这一次，乌尔苏拉抢在了他那狂热计划的前头。凭借一番百折不挠的努力，她暗中与村里所有女人联合起来，反对男人们的突发奇想—他们已经在准备搬家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怎样的力量从中作梗，他的计划陷入由种种借口、托辞和阻力形成的罗网，最终彻底沦为幻想。这天早上他在庭院尽头的小屋里一边念叨着搬家梦想，一边把实验器具装回原来的箱子，乌尔苏拉带着无辜的神情关注着这一切，甚至对他感到些许怜悯。她任凭他装完，任凭他钉好箱笼、用刷子漆上自己名字的缩写，没有责怪他一句，心里却知道他已经明白—因为听见他这么低声自言自语—村里的人不会随他上路。只是当他开始拆卸小屋的房门时，乌尔苏拉才鼓起勇气询问为什么要这

样做，他不无苦涩地回答：“既然没人肯走，那我们自己走。”乌尔苏拉没有动摇。

“我们不走，”她说，“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还没有死人，”他说，“只要没有死人埋在地下，你就不属于这个地方。”

乌尔苏拉反驳了他，温和而坚定：

“如果非要我死了才能留下，那我就去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法相信妻子竟会如此意志坚决。他试图用自己的幻梦诱惑她，许诺带她去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只需往地里洒一点儿魔水就能让作物按照自己的愿望结实，在那里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止痛器械。但乌尔苏拉对他预言的景象毫不动心。

“忘了你那些疯狂的新鲜玩意儿，还是管管你的孩子吧。”她回答，“瞧瞧他们，自生自灭没人管，和驴子一样。”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照妻子的话做了。他往窗外望去，只见两个孩子赤脚待在阳光暴晒的菜园里，他感觉从那一刻起他们才开始存在，从乌尔苏拉的咒语中诞生出来。随即他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神秘而明晰的力量将他从当下拉扯出来，带往记忆中从未涉足的所在。乌尔苏拉继续打扫，此刻她已经确信有生之年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家园，而他一直凝视着孩子们，直到双眼湿润。他用手背擦干眼睛，深深地叹息一声，接受了现实。

“好吧，”他说，“让他们帮我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

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经十四岁，脑袋四方，头发粗硬，和父亲一样固执任性。他发育迅速，体格健壮也像父亲，不过从那时就可以明显看出他缺乏想象力。他在马孔多建立前翻越山脉的路上孕育和诞生，当时父母在证实他身上没有任何动物器官之后曾一起感谢上天。奥雷里亚诺是在马孔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到三月就满六岁了。

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在母亲腹中就会哭泣，来到人世时大睁着双眼。剪脐带的时候，他四下打量房间里的东西，好奇却毫无惊惧地观察人们的脸庞。随后，他任凭人们凑过来看，自己却无动于衷，专注地望着棕榈叶铺成的屋顶，那屋顶在雨水的巨大压力下似乎即将坍塌。乌尔苏拉没再想起他那全神贯注的目光，直到有一天，三岁的小奥雷里亚诺走进厨房，正赶上她从灶台端下一口滚烫的汤锅放到桌上。孩子在门口一脸困惑，说：“要掉下来了。”汤锅本来好好地摆在桌子中央，但孩子话音刚落，它便像受到某种内在力量的驱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桌边移动，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警觉的乌尔苏拉将此事告诉丈夫，但丈夫却将其解释为自然现象。他一向如此，对孩子们不闻不问，一方面因为他认为童年是智力尚未发育健全的时期，另一方面因为他总是沉浸于自己虚无缥缈的玄想中。

然而自从那个下午叫孩子们帮忙取出实验器具，他便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他们。在僻静的小屋里，墙壁上渐渐挂满荒唐的地图和奇异的图画。他教他们读写和算术，向他们讲起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不光涉及自己已知的事物，还充分发挥想象力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极致。就这样，孩子们得知在非洲的最南端有平和而智慧的人民，他们唯一的消遣是坐下来沉思；得知爱琴海可以徒步穿越，只需从一个岛屿跳上另一个直到萨洛尼卡港。那些光怪陆离的课程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记忆中，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政府军军官向行刑队下令开枪的前一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又回想起三月里那个温暖的下午：父亲在物理课上倏然顿住，一脸着迷的神情，手停在半空中，眼神凝固，倾听着远远传来的高音笛、串铃和鼓的声音。吉卜赛人又来到了村里，推销孟菲斯城的智者们最新最惊人的发明。

那是一批新的吉卜赛人，男男女女都很年轻，只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个个容貌俊美，皮肤油亮，双手灵巧。他们在街上载歌载舞引来喧声笑语，激起惊诧不断：染成各种颜色的鹦鹉吟唱着意大利浪漫曲，母鸡伴着手鼓的节奏下出一百个金蛋，训练有素的猴子能猜出人

的所思所想，多功能机器既能缝扣子又能退烧，还有用来忘却不快回忆的仪器、用来浪费时间的药膏以及其他上千种异想天开、闻所未闻的发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恨不得发明一台记忆机器来记录下这一切。村子瞬间变了样。马孔多的居民在自己村子的街道间迷失了方向，置身于喧嚷的集市中不知所措。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手拉住一个孩子，免得他们在混乱中走失。他从镀金牙的卖药人和六条胳膊的杂耍艺人身旁跌跌撞撞地走过，在人群散发出的粪便和檀香气味中艰难地呼吸，发疯似的四处寻找梅尔基亚德斯，想请他解开这场神奇梦魇中的无尽奥秘。他问了好几个吉卜赛人，但他们都听不懂他的语言。最后他来到梅尔基亚德斯惯常扎帐篷的地方，遇见一个神情郁郁的亚美尼亚人在用卡斯蒂利亚语⑦介绍一种用来隐形的糖浆。那人喝下一整杯琥珀色的液体，正好此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挤进入神观看的人群向他询问。吉卜赛人惊讶地回望了他一眼，随即变成一摊热气腾腾散发恶臭的柏油，而他的回答犹自在空中回荡：“梅尔基亚德斯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惊呆了，他竭力抑制悲恸，而人群渐渐被别处的机巧吸引过去，那一摊亚美尼亚人的遗存物也彻底消失。后来，别的吉卜赛人向他证实梅尔基亚德斯的确在新加坡的沙洲上死于热病，被丢到了爪哇海的最深处。孩子们对这个消息不感兴趣，坚持要父亲带他们去见识孟菲斯智者们创造的最新奇观，据帐篷入口处招揽生意的吉卜赛人说，那曾经是所罗门王的宝藏。孩子们非去不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只好付了三十里亚尔，领他们走到帐篷中央，那里有一个遍体生毛的光头巨人，鼻上穿着铜环，脚踝间绕着沉重的铁链，正看守着一个海盗藏宝箱。巨人刚打开箱子，立刻冒出一股寒气。箱中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里面含有无数针芒，薄暮的光线在其间破碎，化作彩色的星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茫然无措，但他知道孩子们在期待他马上给出解释，只好鼓起勇气咕哝了一句：

“这是世上最大的钻石。”

“不是。”吉卜赛人纠正道，“是冰块。”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能领会，伸出手去触摸，却被巨人拦在一旁。“再付五个里亚尔才能摸。”巨人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付了钱，把手放在冰块上，就这样停了好几分钟，心中充满了体验神秘的恐惧和喜悦。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又另付了十个里亚尔，让儿子们也体验一下这神奇的感觉。小何塞·阿尔卡蒂奥不肯摸，奥雷里亚诺却上前一步，把手放上去又立刻缩了回来。“它在烧。”他吓得叫了起来。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有理睬，他正为这无可置疑的奇迹而迷醉，那一刻忘却了自己荒唐事业的挫败，忘却了梅尔基亚德斯的尸体已成为乌贼的美餐。他又付了五个里亚尔，把手放在冰块上，仿佛凭圣书作证般庄严宣告：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

①多卜隆（doblón），西班牙古金币名。

②赫尔曼修士（monje Hermann，1013—1054），即 Hermann von Reichenau，德国本笃会修士，著有多种星相学著作。

③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1503 — 1566），法国预言家，所著《诸世纪》中载预言诗千首，据说在后世多有应验。

④索希莫（Zósimo），公元 3 世纪的希腊炼金术士。

⑤“超绝之精”（Gran Magisterio），炼制点金石的程序指南，象征着灵魂臻于至善的进程。

⑥弗朗西斯 • 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 — 1596），英国航海家、海盗，多次劫掠西班牙殖民地。

⑦卡斯蒂利亚语（castellano），即西班牙语，今日的西班牙语起源于卡斯蒂利亚地区。

二

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十六世纪袭击里奥阿查的时候，乌尔苏拉·伊瓜兰的曾祖母被警钟长鸣和隆隆炮声吓得惊慌失措，一下坐到了炉火上。烫伤使她终其一生再不能履行妻子的义务。她只能侧着坐，还得借助靠垫，此外走路应该也出了问题，因为她从此再没有当众行走过。她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体散发出焦味，因而拒绝一切社交活动。她不敢入睡，在院子里直待到天亮，因为她总是梦见英国人带着凶猛的劫掠犬从卧室的窗户进来，用烧红的烙铁对她施加令人羞耻的折磨。她丈夫是一位阿拉贡商人，和她育有两个子女。为了缓解妻子的恐惧，他在医药和娱乐上耗光了半个商铺。最后他清点了生意，带着家人远离海边，在山中一处平和的印第安人村落定居，并在那里为妻子盖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确保她梦魇中的海盗无隙可入。

在这个隐蔽的小村落里，很早就住着一个种植烟草的克里奥约人[①]堂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乌尔苏拉的曾祖父和他合作经营，短短几年就积累下大笔资产。几个世纪后，克里奥约人的玄孙和阿拉贡人的玄孙女结成夫妇。为此，每当乌尔苏拉因丈夫的荒唐而光火时，总要越过三百年的因缘巧合，诅咒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的那个时刻。这不过是一种发泄，因为事实上他们俩至死都没有分开，联结他们的是比爱情更坚固的东西：共同的良心谴责。他们是表兄妹。两人一同在那古老的村落长大，各自的先辈凭着辛劳和良好的习惯把那村落变成了全省最好的村庄之一。尽管从一降生他们的婚姻就在意料之中，但当他们表示出要结合的愿望，家长们还是试图阻止。他们害怕这两个数百年交好的家族这一代健康的后裔会遭受生出鬣蜥的耻辱。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可怕的先例。乌尔苏拉的一位姑妈嫁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一位叔父，生出的儿子终其一生

都穿着肥大宽松的裤子，在保持了四十二年最纯洁的童贞后失血而死。那都是因为他自出生到长大一直拖着一条拔塞器形状的软骨尾巴，末端还带有一撮毛发。最终，一位屠夫朋友用肉斧帮他砍掉了这条从未让任何女人见过的猪尾巴，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凭着十九岁的轻狂，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不在乎生下猪崽儿来，只要会说话就行。”就这样他们在吹吹打打、爆竹齐鸣中成婚，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如果不是乌尔苏拉的母亲用各种关于后代的险恶预言吓住了女儿，让她甚至拒绝发生夫妻关系，他们本可以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担心魁梧而任性的丈夫趁熟睡时强暴自己，乌尔苏拉睡前会穿上母亲为她缝制的帆布衬裤，衬裤上还有缠绕的皮条加固，前面用粗大的铁扣锁住。如是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白天，他放养斗鸡，她和母亲一起在绷子上绣花；晚上，两人展开几个小时的激烈对抗，似乎以此替代了夫妻生活。人们嗅出事情有几分奇怪，于是村里开始谣传乌尔苏拉婚后一年仍然是处子之身，因为她丈夫没有本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最后一个听到流言的人。

“乌尔苏拉，人家在说什么你可都听见了。”他非常平静地对妻子说。

“让他们说去吧。”她回答，“咱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

就这样又过了六个月，直到那个悲惨的星期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斗鸡比赛中赢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失利者看着自家斗鸡的鲜血勃然大怒，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身边走开几步，好让整个斗鸡场都听见自己要说的话。

“祝贺你，”他喊道，“看看这只鸡能不能帮上你女人的忙。”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为所动，抱起他的斗鸡。“我马上回来。”他对大家说。然后，又对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说：

“你呢，赶紧回家拿上家伙，因为我要杀了你。”

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手持祖父嗜血的长矛。村里一半的人都聚集在斗鸡场门口，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正在那里等着。他还没来得及反抗，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就以公牛般的力气投出了长矛，以第一代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当年猎杀本地老虎的准头，刺穿了他的咽喉。那天晚上，人们在斗鸡场守灵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走进卧室，他妻子正在穿贞节裤。他用长矛指着她，命令道：“脱了它。”乌尔苏拉并未质疑丈夫的决定。“你得为以后的事负责。”她嘟囔了一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长矛插到地上。

“如果你非生鬣蜥不可，那咱们就养鬣蜥。”他说，“起码这个村里不会再有人为你的过错丧命了。”

那是六月里一个美好的夜晚，天气清凉，月光明亮。两人一夜不眠，在床上嬉闹直到破晓，任凭夜风吹过卧室，吹来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亲属的哭号。

这一事件被视作公平决斗，却给两人留下良心上的烦扰。一个失眠的夜晚，乌尔苏拉到院子里喝水，就看见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待在大瓮边。他浑身青紫，神情忧伤，正努力用芦草团堵住咽喉上的空洞。她不觉害怕，只有同情。回到房间后她把所见告诉丈夫，但丈夫没有在意。“死人是不会出现的，”他说，“只不过我们自己受不了良心上的负担。”两晚之后，乌尔苏拉再一次在浴室里看见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正用芦草擦洗脖子上凝结的血痂。另一天晚上，她又看见他在雨中徘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终于无法忍受妻子的幻觉，抄起长矛冲进院子。死人就在那里，神情忧伤。

“见鬼去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冲他喊道，“你来一次我就再杀你一次。”

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没走，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长矛也没敢出手。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安睡。死人在雨中望着他时流露出的无尽伤痛，对活人的深沉眷恋，在家中遍寻清水来润湿芦草的

焦灼神情，总在他脑海里浮现，令他饱受折磨。“他一定很痛苦，”他对乌尔苏拉说，“看得出他非常孤独。”她很受感动，再看到死人一一掀开灶台上的锅盖时，明白了他要找什么，从此便在家中各处摆上盛着清水的大碗。一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自己房间里遇见死人在洗伤口，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好吧，普鲁邓希奥，”他说，“我们会离开这个村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永远不回来。现在你安心走吧。”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翻越山脉之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有许多像他一样年轻的朋友，他们因要探险而欢欣鼓舞，都拆掉自家房子，带上女人孩子上路，朝着没有人向他们应许过的土地进发。出发之前，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长矛埋在院子里，又把自己那些出色的斗鸡一只只砍下脑袋，深信这样能够给予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些许安慰。乌尔苏拉只带了一箱嫁衣、少许家用物品以及那个小匣子，匣里装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金币。他们没有预定的路线，只想朝着与里奥阿查相反的方向进发，为的是不留下任何踪迹，不碰见任何熟人。那是一场荒唐的旅行。走了十四个月后，吃猴肉喝蟒蛇汤坏了胃口的乌尔苏拉生下一个健全的男婴。她的腿肿得变了形，静脉曲张得像水泡鼓起，因此一半的路程都躺在吊床上，由两个男人用一根棍子抬着走。孩子们虽然肚皮干瘪、眼神倦怠，看起来很可怜，实际上倒比父母更能适应旅行，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愉快。经过将近两年的跋涉，一天早上，他们成为第一批见到山脉西坡的人。从云雾弥漫的山顶望去，大沼泽无边无际的水面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边。然而，他们从未找到大海。在沼泽间盲目行进了几个月之后，一天晚上，他们远离了路上遇见的最后一拨土著，在一条乱石累累的河流岸边扎了营，那河水仿佛冰冷的玻璃在流动。若干年后，在第二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曾试图走同一条路奇袭里奥阿查，行进了六天后他意识到这完全是疯狂之举。在沿河驻营的那天晚上，他父亲的追随者们看起来像是身处绝境的遇难者，但人丁倒比旅行前

更为兴旺，并且所有人都期望能老死善终，而后来也都如愿以偿。那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见那个地方耸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家家户户以镜子为墙。他询问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他从未听说、也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那名字却在梦中神秘地回响：马孔多。第二天，他说服众人相信永远也找不到大海了。他又下令在河边最凉爽的地方砍伐树木辟出空地，就在那里建起了村庄。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能解开镜屋之梦，直到见识冰块的那一刻。于是他相信自己理解了梦境的深意。他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利用水这种寻常材料大规模生产冰块，并用它们建造村庄的新居。马孔多将不再是一个连合页和插销都因高温而变形的酷热之地，而会变成一个寒冬之城。他没有坚持建立制冰厂的尝试，只因那时他正热衷教育儿子们，特别是奥雷里亚诺，这孩子起初就显露出炼金方面的罕见天赋。实验室已经收拾干净。他们重新查阅梅尔基亚德斯的笔记，如今已心情平静，不再有因新奇而生的兴奋。他们长时间耐心实验，试图将乌尔苏拉的金子从粘在锅底的废料中分离出来。年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几乎从不参与。当他父亲全身心摆弄炼金炉的时候，这位冲动任性、发育一向超出实际年龄的长子，已经长成一个体格魁伟的小伙子。他变了声，上唇布满初生的茸毛。一天晚上乌尔苏拉走进房间，正赶上他脱衣服准备睡觉。一种混杂了羞耻和怜悯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这是除丈夫外她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的裸体，发育得如此完好，在她看来甚至有些异常。已经第三次怀孕的乌尔苏拉，又经历了新婚时的恐惧。

那段时期有个女人常来家里帮忙做家务，她神情欢快，言语无忌，举止诱人，还会用纸牌算命。乌尔苏拉对她说起自己的儿子，认为他惊人的尺寸和表兄的猪尾巴一样不正常。那女人爆出一阵直率的笑声，仿佛一条玻璃溪流在整个家中荡漾。“正相反，”她说，“他会幸福。”为了证实这一预言，没过几天她就把纸牌带了来，与何塞·阿尔卡蒂奥一起反锁在厨房旁边的谷仓里。她镇静自若地把纸牌摊

开在一张旧木工桌上，随意闲扯着，而那年轻人等在她身旁，厌烦多过好奇。突然，她伸手摸了他一下。“好家伙。”她实实被吓到，说不出别的话来。何塞·阿尔卡蒂奥感到骨头里充满了泡沫，并伴随着一种无力的恐惧，以及哭泣的强烈欲望。女人没有给他任何暗示，但何塞·阿尔卡蒂奥整夜都在烟味中寻找她，那气味本是从她腋下逸出，也渗入到他的皮肤里面。他想一直和她在一起，想让她做自己的母亲，想永远待在谷仓里，想听她说“好家伙”，想让她再一次摸自己并对自己说“好家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她家找她。那是一次莫名其妙的礼节性拜访，他坐在客厅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那个时候他失去了欲望。他觉得她变了，与她的气味在自己心中幻化出的那个形象完全不同，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喝过咖啡，他沮丧地离开。当天晚上，在失眠的惊恐中，他恢复了强烈的欲望，只是此刻渴望的不是谷仓里的她，而是下午见到的她。

几天后，那女人不合时宜地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只有她母亲在家，她借口教一套牌戏，把他带进自己的卧室。然后她尽情地摸他，而他在最初的震颤后却感到失落，心头的恐惧压过了愉悦。她让他晚上去找她。他为脱身答应了，心里知道自己做不到。但到了晚上，在火热的床上，他意识到不能不去，即使自己不可能做到。他摸索着穿上衣服，听见黑暗里弟弟安稳的呼吸声，父亲在隔壁房间里的干咳声，院子里母鸡的咕咕声，蚊子的嗡嗡声，自己心脏的怦怦跳动，以及天地间他此前从未察觉的喧嚣，走向沉睡的街巷。他满心希望门是闩着的，而不是像她许诺的那样仅仅虚掩着。结果门开着。他用指尖一推，合页发出清晰的悲鸣，引发一阵直达他心底的寒意。从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闻到了那气味。他侧着身子，尽量不发出声响。小客厅里，女人三个兄弟的吊床支在那里，而他不知道吊床的位置，在黑暗中又无法确定。他需要摸索着穿过小客厅，推开卧室的门，找准方向以免上错床。他做到了，只是被吊床挂绳绊了一下—吊床挂得比他预想的要低。一直在打鼾的男人在梦中翻了个身，带着些许失望嘀咕

了一句：“那是星期三。”他推门的时候，门无可避免地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发出了声音。置身于一团漆黑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彻底迷失了方向，但已后悔莫及。这狭小的房间里睡着她的母亲、她的姐妹及其丈夫和两个儿女，而她自己或许并没在等他。他本可以借助气味来寻找，只是整个家中都充斥着那味道，令人迷惑但同时又像一直在他皮肤里面那样清晰。他一动不动地待了许久，惊奇中自问怎么会陷入这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这时一只五指伸开在黑暗中摸索的手碰到了他的脸。他不觉吃惊，因为下意识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他疲惫到了极点，把自己交付给这只手，跟随它到了一个形状莫辨的地方。他被脱去衣裳，像一袋土豆似的被摆布、被翻来翻去。在这神秘的黑暗中，他不再需要手臂，不再闻到女人的气味，而只有氨水的气味。他试图回想起她的脸庞，然而脑中却浮现出乌尔苏拉的面容，便隐约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只是此前从未想过真的可以做到；他也不知道现在是如何在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脚在哪里头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是谁的脚谁的头；他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腰间冰冷的声响和腹内的气流，无法忍受恐惧和迷乱的渴望，渴望逃走，又渴望永远留在这恼人的静寂和可怖的孤独中。

她叫庇拉尔·特尔内拉。她参加过以建立马孔多告终的远征，是被她的家人所强迫，为了离开那个在她十四岁时强暴她的男人。那人一直爱着她，直到她二十二岁，但从未下决心公开关系，因为他是个外来户。他许诺追随她到天涯海角，但要等他处理完自己的事情，而她已经厌倦了等待，在或高或矮，或金发或黑肤的男人中辨认他，纸牌许诺说他三天、三个月或三年后会从陆上或海上来。在等待中，她的大腿不再有力，乳房不再坚挺，性情不再温和，但心灵的狂野依然如故。何塞·阿尔卡蒂奥被这个神奇的玩物迷得神魂颠倒，天天晚上穿过房间的迷宫去寻找她的踪迹。有一回门闩着，他就反复叩敲，心想既然有勇气敲第一下，就要坚持到最后一下。最终，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等来了她开门。白天，他昏昏欲睡，暗自享受前夜的回忆。当

她走进家门，还是那样欢快、言语无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也无须费力掩饰紧张，因为这个轰然大笑惊飞鸽群的女人和那无形的力量毫不相干—那力量教会他朝内呼吸和控制心跳，使他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惧怕死亡。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至于当他父亲和弟弟的好消息使全家沸腾时，他还不知道是他们终于熔开了那个金属块，分离出了乌尔苏拉的金子。

经过多日繁难而艰巨的工作，他们的确做到了。乌尔苏拉欣喜万分，甚至为炼金术的发明赞美上帝。实验室里挤满了村民，主人端出番石榴甜点加小饼干款待他们，来庆祝这一奇迹。与此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隆重展示了坩埚中失而复得的黄金，仿佛那是他刚刚创造出来的。他让所有人一一看过，最后来到近来极少在实验室露面的长子跟前。他把发黄的干硬块摆到儿子眼前，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何塞·阿尔卡蒂奥直率地回答：

“像狗屎。”

父亲反手给了他一巴掌，打得他直流出血和泪来。那天晚上庇拉尔·特尔内拉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药瓶和棉布，用山金车酊给他敷肿，还让他尽情享受而不用费神，爱怜他而不弄疼他。他们如此心心相印，片刻之后不知不觉开始窃窃私语。

“我想和你单独在一起。”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告诉所有人，用不着再躲躲藏藏。”

她不想扫他的兴。

“那太好了。”她说，“要是单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点亮灯，互相能看见，而且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不用管别人，你在我耳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一场谈话，伴以对父亲的切齿怨恨，对纵情相爱的迫切憧憬，在他身上激发出一种沉着的勇气。他事先未作任何铺垫，直接把一切都告诉了弟弟。

一开始小奥雷里亚诺只意识到风险，觉得哥哥的冒险极有可能引来祸端，却没能理解其中的魅力所在。后来哥哥的渴望渐渐感染了他。他听他讲述种种波折的细节，分享他的痛苦和喜悦，与他一起担惊受怕，一起体验幸福。他整夜不睡，一个人躺在床上好像睡在炭火席上，直等到天亮哥哥回来，然后两人毫无睡意地交谈到起床的时候。很快两人都变得委靡不振，都对父亲的炼金术和智慧失去了敬意，都躲藏到孤独之中。“这两个孩子呆呆的，”乌尔苏拉说，“一定是肚子里有虫子。”她用土荆芥研末熬制了一剂难喝的汤药，不料两人都以意想不到的坚忍喝了下去，并且一天之内同时坐到便盆上达十一次之多，排出了几条粉红色的寄生虫。他们兴高采烈地向所有人展示，为的是避免乌尔苏拉追究他们神不守舍和倦怠消沉的真实原因。那时奥雷里亚诺不仅能理解，还能对哥哥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有一次当哥哥详尽无遗地向他描述情爱的奥妙，他插话问道：“那是什么感觉？”何塞·阿尔卡蒂奥当即回答：

“好像地震。”

一月里一个星期四的凌晨两点，阿玛兰妲出生了。在其他人进入房间之前，乌尔苏拉先把她浑身上下细细检查了一遍。她又轻又湿像条蜥蜴，不过身体所有部位都属于人类无疑。奥雷里亚诺发现家里挤满了人，才知道这一新闻。他趁着混乱溜出去找哥哥，因为哥哥从十一点就不在床上了。这一决定如此仓促，他甚至没时间考虑要如何把哥哥从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卧室里拉出来。他围着房子转了几个小时，吹口哨打暗号，快天亮时才不得不回去。在母亲的房间里，他看到何塞·阿尔卡蒂奥正在逗弄初生的小妹妹，脸上挂着天真无辜的笑容。

乌尔苏拉安稳休息了四十天不到，吉卜赛人又来了，是带来过冰块的同一拨江湖艺人和杂耍演员。与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不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自己并非传播进步的使者，而是贩卖娱乐的商人。包括他们带来的冰块，也不是为了推广应用到生活中，而是纯

粹当作马戏团的奇物。这次的奇巧物件中有一块飞毯，他们同样没有将其视为交通发展上的重大贡献，而仅仅当作用于消遣的玩物来介绍。毫不奇怪，人们挖出了自家埋藏的最后几枚金币，想换取一次从村里房顶飞过的短暂经历。借着纷乱人潮的掩护，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庇拉尔享受了一段惬意的独处时光。他们成为人群中一对幸福的情侣，甚至开始怀疑，爱情或许可以是一种比夜晚幽会中疯狂而短暂的快乐更平和深沉的感觉。然而，庇拉尔打破了美梦。她受身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激情感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时机，一句话就使他的世界地覆天翻。“现在你是真正的男人了。”见他没听懂自己的意思，她又明明白白地解释了一遍：

“你就要有儿子了。”

连续几天何塞·阿尔卡蒂奥都不敢走出家门一步。一听到厨房里传来庇拉尔声震屋瓦的笑声，他就立刻逃到实验室。那里的炼金器械在乌尔苏拉的祝福下都已重获新生，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兴高采烈地接纳了迷途知返的儿子，并且带他入门，参与自己终于启动的点金石探寻工作。一天下午，飞毯载着吉卜赛驭手和几个村里的孩子从实验室窗前迅捷掠过，他们在飞毯上兴奋地挥手致意，两个儿子都被吸引过去，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都不看一眼。“让他们做梦去吧，”他说，“将来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式比他们靠一条可怜的床罩飞得更高。”尽管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其实从未理解“哲学之卵”的魔力，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做坏了的瓶子。他无法抛开自己的心事。他吃不下睡不着，脾气变坏，就像父亲工作受挫时一个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见他举止失常，以为他对炼金术太过投入，便免去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奥雷里亚诺当然知道哥哥所受的折磨与寻找点金石毫无关系，但也无法令他吐露真情。往日的推心置腹已经一去不返，同谋和交流变成敌意与缄默。他渴望孤独，对整个世界的怨恨咬噬着他的心。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下了床，不过不是去庇拉尔·特尔内拉家，而是混迹于集市的喧嚷人

潮中。他走过各样花巧的玩意儿，没有一样能引起他的兴趣。最后他的注意力落在一样非展品上：一个非常年轻的吉卜赛女郎，几乎还是个孩子，被身上的玻璃珠链压弯了腰。这是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正在人群中观看一个人因为忤逆父母而变成蟒蛇的惨剧。

何塞·阿尔卡蒂奥无心观看眼前的场景。针对蛇人的悲惨审问还在进行，他已经挤进人群，来到吉卜赛女郎所在的第一排，在她身后停下。他紧贴着她的后背。女郎想躲开，但何塞·阿尔卡蒂奥更用力地挤上去。于是她感觉到了。她靠着他一动不动，又惊又惧地战栗着，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最终她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一个颤抖的微笑。这一刻两个吉卜赛人将蛇人装回笼子，送到帐篷里面。主持节目的吉卜赛人宣布：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上演可怕的场景：一个女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作为惩罚，一百五十年里每天晚上的这一时刻她都要被砍头。”

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女郎没有观看砍头表演。他们去了她的帐篷，一边脱衣服一边急不可耐地亲吻。女郎卸下玻璃珠链，脱去浆过花边的层层衬裙和重重背心，以及无用的紧身胸甲，最后露出的身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个瘦弱的小家伙，乳房刚刚发育，双腿还没有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手臂粗，但她的坚定和热情弥补了身体的单薄。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无法回应她，因为他们身处公用帐篷，吉卜赛人拿着马戏道具走来走去忙着各自的事情，甚至会在床边停下掷上一把骰子。挂在帐篷中央木杆上的油灯照得四下通明。在爱抚的间歇，何塞·阿尔卡蒂奥赤着身子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知如何是好，而女郎还在努力诱导他。没过多久进来一个体态丰腴的吉卜赛女人，陪伴她的男人不属于马戏团，也不是村里的人。两人开始在床前脱衣服。那女人无意中看了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眼，以狂热的目光打量着他那休憩中的壮观野兽。

“小伙子，”她嚷道，“愿上帝替你保守它。”

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女伴请他们别来打扰，于是那一对就地躺下，紧靠他们的床边。他人的激情唤醒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欲望。刚一触碰，女郎的骨头像是散了架，仿佛一盒多米诺骨牌哗啦啦一阵混响，她的肌肤在苍白的汗水中融化，她的眼睛盈满泪水，她的整个身体发出悲惨的哀叹，散逸淡淡的淤泥气味。但她以坚强的性格和可敬的勇气承受住了冲击。何塞·阿尔卡蒂奥感觉身体悬空，飞向极乐之境，心灵融化在柔情色欲的泉源里，那情欲涌入女郎的耳朵，又从她的口中变成语言涌出。那天是星期四。到星期六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往头上缠了块红布，跟着吉卜赛人走了。

乌尔苏拉发现他失踪后找遍了整个村子。吉卜赛人搭帐篷的地方篝火已经熄灭，只剩灰烬仍在冒烟，一堆堆垃圾散落其间。一个在垃圾中寻找玻璃珠的人告诉她，前一晚曾见到她儿子混在马戏团的人群里，用独轮车推着装蛇人的笼子。“他跟吉卜赛人跑了！”她向丈夫喊道，而丈夫对儿子的失踪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

“是真的就好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一边在研钵里捣碎那无数次被捣碎又熔合再捣碎的材料，“那样他就能长大成人了。”

乌尔苏拉出去打听吉卜赛人是从哪里走的，按照别人的指引边走边问，相信还来得及追上。她离村子越来越远，等发觉时已经走出太远，便索性不再回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直到晚上八点听到小阿玛兰妲哭得声音沙哑，把材料留在粪床上加热，过去一看才发现妻子失踪了。几小时后他聚集起一支整装待发的队伍，把阿玛兰妲托付给一位自愿喂奶的妇女，随后上路四处追寻乌尔苏拉的踪迹。奥雷里亚诺也跟了去。黎明时分，几个操着陌生语言的土著渔夫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不曾见到有人经过。徒劳寻索三天之后，他们回了村。

此后几个星期，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陷入沮丧当中。他担负起母亲的职责照料小阿玛兰妲，给她洗澡换衣服，一天四次送去

哺乳，晚上甚至为她唱起乌尔苏拉从来不会唱的摇篮曲。有一次，庇拉尔·特尔内拉自告奋勇要在乌尔苏拉回来之前帮忙料理家务。奥雷里亚诺凭着对厄运格外敏感的神秘直觉，在看见她进门的瞬间灵光一闪。他意识到哥哥的逃走以及随后母亲的失踪都与她有关，尽管这无法解释，于是以一种沉默而强烈的敌意相待。她没有再来。

时间使一切恢复了原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儿子不知从何时起又回到了实验室，他们抖落尘埃，点起炉灶，拾起已经在粪床上沉睡了数月的材料，又一次耐心地操作起来。连躺在柳条小筐里的阿玛兰妲，也好奇地观看父兄在水银蒸气弥漫的小屋里入神地工作。架子上被遗忘多日的一个空瓶忽然重得挪不动。工作台上的一锅水未经加热便沸腾了半个小时，直到完全蒸发。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儿子看着这一切又恐惧又欢喜，他们无法解释，只是将其视作新材料要诞生的预兆。一天阿玛兰妲的小筐自行移动起来，在房间里兜了个圈。奥雷里亚诺大吃一惊，连忙去拦下它。做父亲的却没有惊慌，他把小筐放回去，固定在桌腿上，坚信期待已久的事情即将发生。就在那时，奥雷里亚诺听见他说：

“就算你不敬畏上帝，也该敬畏金属。”

失踪近五个月后，乌尔苏拉突然归来。她异常兴奋,青春再现，衣着打扮都是村里人从未见过的款式。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几乎无法承受这一惊喜。“没错！”他喊道，“我就知道会这样。”他的确相信，因为在漫长的幽闭时光里，在操作实验的同时，他内心深处祈求的奇迹不是发现点金石，不是赋予金属生命的气息，也不是将家中的合页和门锁变成黄金，而是此时此刻的情景：乌尔苏拉归来。但她没有被丈夫的欢喜打动，只是例行公事般吻了他一下，仿佛自己不过离开了一个小时。她对他说：

“你出去看看。”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出门看见一片喧嚷景象，好半天才从困惑中恢复过来。那不是吉卜赛人，而是和他们一样的男男女女，

直发棕肤，说的是同样的语言，抱怨的是同样的痛苦。他们的骡子驮着食品，牛车满载着家具、家居用品，都纯粹是些普通的人间物事，毫无噱头地出售；他们贩卖的乃是日常现实。这些人来自大沼泽的另一边，距此只有两天路程。那些村镇里的人们每月都能收到邮件，见惯了各样改善生活的机器。乌尔苏拉没有追上吉卜赛人，却找到了丈夫在失败的远征中没能发现的通向伟大发明的道路。

---

①克里奥约人（criollo），在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后裔。

三

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出生两星期后就被送到祖父母家。乌尔苏拉拗不过丈夫的顽固—他无法容忍家中新生的一星血脉流落在外—只好不情不愿地接受，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向孩子透露真实身份。孩子继承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名字，后来大家为了避免混淆只叫他阿尔卡蒂奥。那一时期村里活动频繁，家中活计不断，孩子的照料退居其次，被托付给一个叫比西塔西翁的瓜希拉印第安女人。她和兄弟为逃避部落中肆虐多年的失眠症来到这里，两人温顺又勤快，乌尔苏拉便收留了他们帮忙做家务。就这样，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在学会卡斯蒂利亚语之前先学会了瓜希拉语，还学会了喝蜥蜴汤吃蜘蛛卵，乌尔苏拉则忙于大有前途的糖果小动物生意，对此一无所知。马孔多变了样。跟着乌尔苏拉一起来的人四处宣扬它土地肥美、位置又比大泽区优越，于是昔日僻静的小村落很快变成繁华的城镇，有了手工作坊和店铺，还开通了一条永久商道。第一批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人就沿商道而来，用玻璃珠链交换金刚鹦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刻也不能平静。他着迷于眼前的现实，认为这比自己广袤的幻想世界更为神奇，因而对炼金实验完全丧失了兴趣。他将漫长时日中饱受锤炼的材料搁置一旁，又变回了创业之初那个富于进取心的男子，那时他忙于设计街道规划新居，以保证人人享有平等权益。他在新落户的居民中赢得极大尊重，任何人铺设地基或修造围栏都要先咨询他的意见，大家还一致决定由他掌管土地的分配。走江湖的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把流动游艺会变成了大型赌场。人们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相信何塞·阿尔卡蒂奥会一道归来。但他并没有出现，吉卜赛人也没有带蛇人来，在乌尔苏拉看来有关儿子的唯一线索也没了着落。镇上因此拒绝吉卜赛人扎营，并将他们视为贪欲与堕落的传播者，不

许他们以后再踏上这片土地。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也明确表示，梅尔基亚德斯以他悠远的智慧和神奇的发明对村子的发展壮大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孔多的大门将永远对他古老的部落敞开。然而据那些周游各地的旅人说，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由于逾越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已从大地上被抹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至少暂时从幻想的种种煎熬中解脱出来，很快便营造出一种井然有序的实干氛围，其中只批准一项自由：释放从建村伊始就以歌声欢快报时的群鸟，代之以家家户户各备一台音乐钟。这些雕刻精美的木钟是用金刚鹦鹉从阿拉伯人那里换来的，由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统一校准。每隔半小时镇上便响起同一乐曲的欢快和弦，一到正午更是蔚为壮观，所有时钟分秒不差地同时奏响整曲华尔兹。那些年间，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决定在街上种植巴旦杏代替金合欢，并且发现了能使树木经久不衰的方法，但一直秘不示人。多年以后，马孔多已经遍布锌顶木屋，那些最古老的街道上却依然可见巴旦杏树蒙尘的断枝残干，然而已无人知晓出自谁人手植。当父亲忙于整治市镇，母亲一心扩展家业，每天两次用树枝穿着糖制的小鸡小鱼出门销售，奥雷里亚诺则从早到晚待在被遗弃的实验室里，完全凭自己的探索掌握了金银器工艺。他身量大长，哥哥留下的衣服很快都不合身了，便开始穿父亲的衣服，只是得让比西塔西翁收紧衬衣修剪裤子，因为奥雷里亚诺没有他们那样魁伟的身材。青春期的他失去了甜美的童音，变得沉默寡言孤独入骨，但却恢复了呱呱坠地时流露出的执著眼神。他全神贯注于金银艺实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担心他过于专注，认为他或许需要一个女人，便给了他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零钱。奥雷里亚诺却用钱买来盐酸配制王水，还把钥匙镀了层金。不过他的古怪之处与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相比又算不得什么，那两个孩子早就开始换牙，却依然整天跟在印第安女人后面，顽固地不肯说卡斯蒂利亚语而只说瓜希拉土语。“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乌尔苏拉对

丈夫说，“有发疯的父母就有发疯的儿女。”正当她哀叹自己命不好，认定儿女们的怪癖与猪尾巴同样可怕时，奥雷里亚诺眼神定定地望着她，令她感到一阵茫然。

“有人要来了。”他说。

和往常一样，乌尔苏拉听到他发表预言又试图用家庭主妇的常识来解释。有人来再正常不过。每天都有数十个外乡人经过马孔多，从未引发混乱，更无须事先神秘预告。然而，奥雷里亚诺对一切逻辑解说浑不在意，对自己的预感确信不疑。

“我不知道是谁，”他坚持道，“但不管是谁，人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到了星期天，丽贝卡来了。此时她只有十一岁。几位皮草商人带着她从马纳乌雷辛苦跋涉而来，受人之托将她连同一封信送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却又说不清楚托付他们的人究竟是谁。她的所有行李包括一个小衣箱、一把绘有彩色小花的小摇椅和一个帆布口袋，袋里装着她父母的骨殖，一刻不停地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那封带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信中充满温情的话语，可见纵然岁月蹉跎天各一方，写信人依然对他深情不改，并且出于基本的人道精神将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送来这里。孩子算乌尔苏拉的远房表妹，因而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亲人，尽管关系上要更远些。她是难忘的挚友尼卡诺尔·乌略亚和他可敬的妻子丽贝卡·蒙铁尔的女儿，愿他们在天国安息，一并送来他们的骨殖，盼以基督徒的礼仪安葬云云。信中提到的名字和末尾的签名都清晰可辨，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都不记得有这些亲戚，也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写信人，更不用提还是在遥远的马纳乌雷。从女孩那里也无法获得更多信息。从来到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坐在摇椅上吮手指，一双受惊的大眼睛打量着所有人，不曾流露出能听懂别人提问的迹象。她穿着已显破旧的黑色斜纹布衣裳，脚上是漆皮脱落的短靴。头发拢到耳后，用黑带子束住两个发髻。披肩上的图案沁染

汗渍已无法辨认，一颗食肉动物的犬牙配上铜托系在右手腕上当作抵抗“邪眼”的护身符。青绿色的皮肤，圆滚紧绷如一面鼓的肚子，都显示出她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的历史甚至要比自身的年龄更久远，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大家几乎要相信她是个聋哑儿，直到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语言问她要不要喝点儿水的时候，她才眼神一动仿佛认出了他们，点了点头。

家人没有办法，只得把她收留下来。奥雷里亚诺耐心地在她面前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圣徒节期表，但她对所有名字都没有反应，家人只好根据信中她母亲的名字叫她丽贝卡。那时马孔多还没死过人，自然没有墓地，他们只得暂时将骨殖袋收藏起来，等将来有合宜的地方再下葬。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遗骨在家中到处碍事，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像母鸡抱窝似的咯咯作响。丽贝卡过了很久才融入家庭生活。她总是缩到家中最偏僻的角落，坐在摇椅上吮吸手指。什么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除了那些钟表奏出的音乐，她每过半小时就会瞪着受惊的眼睛四下寻找，仿佛想在空中某个位置找到那乐声。数天过去，她什么也不肯吃。谁都无法理解她居然没有饿死，后来印第安人——他们一刻不停、悄无声息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发现她只喜欢吃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显然她父母或是其他抚养人曾斥责过这一恶习，因为她总是心有愧疚暗中行事，藏起口粮来等没人时再享用。从那以后，家里开始对她严加监视。他们在院子里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相信用这些方法可以遏制她的恶习。然而她找寻泥土时显得异常狡黠机智，乌尔苏拉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乌尔苏拉在小锅里放入橘汁，兑上大黄晾了一整夜，次日让她空腹喝下。没人说过这就是治疗食土怪癖的特效药，但乌尔苏拉却相信任何苦味的食物进入空腹都会令肝脏产生反应。丽贝卡拼命反抗，力气之大与瘦小身量根本不符，他们不得不像扳倒一头小牛犊似的逼她服药，却难以制止她的乱踢乱踹，无法忍受她在撕咬和吐口水之余古怪难解的呼号。印第安人听得目瞪口呆，说

那是他们语言中最污秽的辱骂。乌尔苏拉知道后，在药物治疗之外又加上了皮带抽打。永远无从确知，究竟是大黄或毒打，还是二者一起最终发挥了效用，总之几个星期后丽贝卡显出康复的迹象。她加入到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的游戏中，他们把她当姐姐看待。她胃口颇佳，刀叉也用得不错。不久家人又发现她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和印第安土语一样流利，手头活计也干得出色，还会哼唱音乐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配上滑稽的自编歌词。大家很快就接纳她为家庭新成员。她和乌尔苏拉最亲，连乌尔苏拉的亲生儿女都比不上。她管阿玛兰妲和阿尔卡蒂奥叫小妹妹小弟弟，称奥雷里亚诺为叔叔，呼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为爷爷。于是，她和其他家人一样名正言顺地用上了丽贝卡·布恩迪亚的姓名，那也是她一生用过的唯一姓名，直到去世从未玷污。

丽贝卡改掉食土的恶习后，被安排到其他孩子的房间睡觉。一天夜里，和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突然醒来，听见一种奇怪的响声在角落里时断时续。她以为有动物溜进房间，警觉起来，却发现丽贝卡坐在摇椅上吮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比西塔西翁心中充满恐惧和难逃宿命的凄苦，她在那双眼睛里认出了威胁他们的疫病，正是这种疫病逼得她和兄弟背井离乡，永远抛下了他们古老的王国，抛下了公主与王子的尊贵身份。这就是失眠症。

天亮的时候，印第安人卡塔乌雷失去了踪影。他姐姐比西塔西翁留了下来，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没有人理会她的惊恐。“要是不用睡觉，那再好不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那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但印第安女人向他们解释，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笑得喘不过气来，认为这

不过是又一种印第安人杜撰的疾病。乌尔苏拉为防万一，还是将丽贝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几个星期后，比西塔西翁的恐惧似乎平息了下去。有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乌尔苏拉也醒着，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又想起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们一刻也没睡着，但到了第二天感觉疲劳尽去，便把不眠之夜抛在了脑后。午饭时候，奥雷里亚诺惊异地讲起他如何一整夜都在实验室忙着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尔苏拉的生日送给她，但此刻却仍然感觉良好。到了第三天，大家在该入睡的时刻还是毫无睡意，这才意识到已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终于警觉起来。

“孩子们也都醒着。”印第安女人的话里带着宿命意味，“这病一旦进了家门，谁也逃不了。”

他们果然染上了失眠症。乌尔苏拉从母亲那里学过各种草药的效用，熬制了乌头汤让所有人服下去，可他们仍然睡不着，整天醒着做梦。在这种清醒的梦幻中，他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看到别人梦见的景象，一时间家里仿佛满是访客。丽贝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和自己相貌极其相似的男人，他身着白色亚麻衣裳，衬衫领口别着一粒金扣，给她带来一束玫瑰。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女士，用纤细的手指拣出一枝玫瑰簪在她发间。乌尔苏拉知道那男人和女人是丽贝卡的父母，但一番努力辨认之后，还是确信从未与他们谋面。与此同时，由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家中出品的糖果小动物仍源源不断地在镇上出售。大人小孩都津津有味地吮咂着可口的绿色失眠小公鸡、美味的粉红失眠小鱼和柔软的黄色失眠小马，于是到了星期一凌晨整个镇子都醒着。一开始没人在意。恰恰相反，人们都因不用睡觉而兴高采烈，因为那时候马孔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间总不够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活儿都干完了，凌晨三点便无所事事，听着音乐钟数华尔兹的音符。那些想睡觉的人，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

念，试遍了各种消磨精力的方法。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聊天，一连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笑话，甚至把阉鸡的故事演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那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讲故事的人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说“要”，他就说没让大家说“要”，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说“不要”，他就说没让大家说“不要”，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他就说没让大家不说话，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而且谁也不许走，因为他没让人走，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就这样继续下去，整夜整夜重复这一恶性循环。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意识到失眠症已经侵入镇子，便召集起各家家长，把自己所知的失眠症情形讲给他们听。众人决定采取措施防止灾难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村镇。他们把用金刚鹦鹉跟阿拉伯人换来的小铃铛从山羊脖子上摘下，放在镇子入口，供那些不顾岗哨的劝告和恳求坚持进镇的来客使用。那时节走在马孔多街道上的所有外乡人都要摇动小铃铛，好让病人知道自己是健康人。他们在镇上逗留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因为疫病无疑只经入口之物传播，而所有食品饮料都已沾染失眠症。这项举措成功地将疫病控制在村镇之内。隔离卓有成效，后来人们就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生活恢复秩序，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再为睡眠这一无用的习惯担忧。

还是奥雷里亚诺想出了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帮助人们抵御失忆。这发现本出于偶然。他属于第一批病人，已是老练的失眠者，并借此掌握了高超的金银器工艺。一天他在寻找用来捶打金属箔片的小铁砧时，却想不起它的名称。父亲告诉他：“砧子。”奥雷里亚诺把名称写在纸上，用树胶贴在小铁砧底部：砧子。这样，他相信今后就不会再忘记。当时他还没想到这便是失忆开始的症状，因为那东西的名称本不好记。没过几天，他发现自己对实验室里几乎所有器物都叫不出名来。于是他依次注明，这样只需看一下标签就可以辨认。当父亲不安地告诉他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都已消失时，奥雷里亚诺向

他传授了这一方法。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先在家中实行，而后推广到全镇。他用小刷子蘸上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平锅。他又到畜栏为动物和植物标上名称：奶牛，山羊，猪，母鸡，木薯，海芋，香蕉。随着对失忆各种可能症状的研究不断深入，他意识到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即使能通过标签认出每样事物，仍会记不起它的功用。于是他又逐一详加解释。奶牛颈后所挂的名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体现出马孔多居民与失忆作斗争的决心：这是奶牛，每天早晨都应挤奶，可得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可得牛奶咖啡。就这样，人们继续在捉摸不定的现实中生活，只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这般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通往大泽区的路口立起一块牌子，上写马孔多；中心大道立有一块更大的牌子，上书上帝存在。各家各户都已写好用来记住物品和情感的简要说明。这套做法需要高度的警醒和坚强的毅力，因而很多人选择了向虚拟现实的魅力屈服，寄情于自我幻想，这纵然不切实际却更能与人安慰。庇拉尔·特尔内拉在这场造梦运动中出力最多，她成功地将纸牌算命从推演未来应用到追溯过往。借助这一方法，失眠者开始生活在由纸牌萌生的模棱两可的世界中。在模糊的追忆中，父亲是四月初到来的肤色黝黑的男人，母亲是左手戴金戒指肌肤呈麦色的女人，出生日期则简化为最近一个有云雀在月桂树上啼叫的星期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这些寻求慰藉的方式深感无奈，决定制造当初曾想用来记录吉卜赛人神奇发明的记忆机器。该装置的设计基于以下原理：每天清晨将一生获得的知识从头至尾复习一遍。他把它想象为一种旋转辞典，人坐在中轴位置用摇把操纵，在几小时内令生活中最必要的知识都从眼前经过。当他做好大约一万四千张卡片的时候，通往大泽区的路上出现了一位衣衫不整的老人，他用小铃铛摇出悲凉的声响以表示未染上失眠症，拖着一件绳索紧系的鼓囊囊的行

李，拉着一辆黑布蒙住的小车。他径直来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门前。

比西塔西翁开了门，但并不认识他，以为他想要兜售什么，还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深陷失忆泥沼的村镇任何物品都没有市场。这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声音也因犹疑时断时续，双手颤抖仿佛质疑着事物的真实存在，但仍可以明显看出，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人们可以安睡并拥有记忆的世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见他坐在客厅里，一边用几经补缀的黑色礼帽扇风，一边带着同情的神色认真阅读贴在墙上的一个个标签。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分外殷勤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担心他是曾经相识而现在已不记得的故人。但来访者看出了他的做作，感觉到自己已被遗忘，那并不是心中暂时的尚可补救的遗忘，而是另一种更残酷且不可逆转的遗忘，他对此绝不陌生，因为那正是死亡的遗忘。于是他都明白了。他打开塞满稀奇物件的行李，掏出一个小手提包，里面满是瓶瓶罐罐。他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喝下一种淡色液体，重新燃起了他的记忆之光。泪水濡湿了他的双眼，随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间各种物品都贴着标签的荒唐屋子里，为墙上煞有介事的蠢话而惭愧。他随即又认出了来人，脸上顿时焕发出欢喜的光彩。那人是梅尔基亚德斯。

马孔多欢庆重获记忆的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梅尔基亚德斯正在重温往昔的友情。老吉卜赛人准备就此留在镇上。他的确一度死去，但难以忍受孤独又重返人世。他因执著于生命受到惩罚，被剥夺了一切超自然能力，又被逐出了部落，便决定到这个死神尚未光顾的偏远角落栖身，专心创立一家银版照相术工作室。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从未听说过这一发明，他看到自己和全家人的形象在一块闪光的金属版上凝固成永恒，顿时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在当时拍下的一张老照片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硬挺的衬衫领子用一粒铜扣扣上，神情庄严中藏着惊诧，乌尔苏拉乐不可支地说他像“一位受惊的将军”。何塞·阿尔卡蒂奥

· 布恩迪亚在那个晴朗的十二月上午的确受惊不小，他以为人的形象一旦被摄到金属版上，生命就会随之日渐销蚀。有趣的是，乌尔苏拉一反常态，消除了丈夫的疑虑，并且抛下往日的怨气，决定让梅尔基亚德斯留下一起生活，只是她一直拒绝拍照，因为——按她自己的原话——不愿意将来让儿孙笑话。那天上午她给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裳，在他们脸上都搽了粉，还让每人喝下一勺骨髓糖浆，好让他们面对梅尔基亚德斯壮观的机器保持近两分钟的安分。在这张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上，奥雷里亚诺身穿黑色天鹅绒正装，夹在阿玛兰妲和丽贝卡中间，那倦怠的模样和深邃的眼神与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时一般无二。但那时他尚未感觉到命运的预示。他已是熟练的金银匠，凭着精湛的手艺在整个大泽区享有盛名。他的作坊与梅尔基亚德斯杂乱的实验室合在一起，屋里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他父亲和老吉卜赛人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大声争论，瓶子和托盘撞击作响，酸液不时在磕磕碰碰中打翻，溴化银白白浪费，而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他全神投入工作，加上经营有道，不久赚取的收入就超过了乌尔苏拉的美味糖果小动物生意。但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他明明已是个十足的男子汉，竟然还没有结识女人。事实上他的确没有。

数月后，好汉弗朗西斯科回来了，他是个将近两百岁的江湖艺人，常来马孔多吟唱自编的歌谣。他通过这些歌谣不厌其详地讲述旅行途中的各地见闻，从马孔多直讲到大泽区的边界。如果有人要捎带口信或发布消息，就付两个生太伏请他加到曲目中。乌尔苏拉便是这样偶然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那天晚上她听着歌谣，本来还期望听到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下落。人们称他为好汉弗朗西斯科，是因为他曾在一次即兴赛歌会上击败魔鬼，至于其真名实姓则无人知晓。他在失眠症肆虐期间一度从马孔多消失，一天晚上又突然出现在卡塔利诺的店里。全镇人都去听他唱歌，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次和他同来的有个肥胖无比的女人，需要四个印第安人用摇椅抬着；还有一个黑白混血姑娘，一副孤单无助的神情，打着伞遮挡阳光。这天晚

上奥雷里亚诺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看见好汉弗朗西斯科像一条巨石雕成的变色龙端坐在好奇的听众中间。他用苍老走调的声音唱出世事变迁，以当年罗利爵士[①]在圭亚那相赠的那架古老手风琴伴奏，那双四方走遍、踩踏硝石而皴裂的大脚还打着拍子。院子深处的一扇门内不时有男人进出，门前鸨母坐在摇椅上静静地扇着扇子。卡塔利诺耳上别了一朵毡绒玫瑰，向听众兜售碗盛的甘蔗酒，并不失时机地靠近那些男人，将手放到不该放的地方。将近夜半时分，酷热难当，奥雷里亚诺已从头听到尾，没有听出什么与自家有关的消息。他正准备起身回家，鸨母挥手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要二十生太伏。”

奥雷里亚诺向鸨母腿上的钱罐里投了一枚硬币，走进房间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混血姑娘露着母狗那样的乳头，赤着身子躺在床上。在奥雷里亚诺之前，这天晚上已有六十三个男人光顾过这里。经过这么多人进进出出，房间里的空气中混合了汗水和喘息的气味，变得污浊不堪。姑娘掀起湿透的床单，请奥雷里亚诺抓着另一侧。床单沉得像粗麻布一样。他们俩抓住两头拧水，直到恢复正常重量。他们又翻过席子，汗水从另一面往下淌。奥雷里亚诺盼着这活儿永不停息。他在理论上了解情爱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双膝发软站立不稳，皮肤滚烫毛发悚然，仍忍不住要立刻排出腹中的重负。那姑娘收拾好床铺，要他脱掉衣服时，他慌忙解释：“是他们让我进来的。要我往钱罐里投二十生太伏，还得动作快点儿。”姑娘明白了他的困惑。“如果你出去的时候再放二十生太伏，就可以多待一会儿。”她温柔地说。奥雷里亚诺脱了衣服，羞惭至极，总想着自己的裸体没法和哥哥相比。不管那姑娘怎样努力，他都愈加没有反应，愈觉孤独异常。“我会再放二十生太伏。”他绝望地说。姑娘默默地向他谢过。她的背上都已磨破。她瘦得皮包骨，呼吸间流露出无尽的疲惫。两年前，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她睡前没有熄灭蜡烛，醒来已经身处火海。她和抚养她长大的祖母一起居住的房子化作灰烬。从此，祖母带着她走遍各个村

镇，让她以二十生太伏的价钱卖身，以挣回烧毁的房屋。根据姑娘自己估算，按每夜接待七十个男人计还需要干十几年，因为她还需另付二人的旅费、饮食费以及抬摇椅的印第安人的工钱。鸨母第二次敲房门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离开了房间，什么也没做，惶惶然只想哭泣。当天夜里他想着那姑娘无法入睡，有欲望也有怜悯。他感到无可抑制的冲动，要去爱她和保护她。到天亮的时候，他已被失眠和狂热折磨得疲惫不堪，终于作出庄严的决定，要与她成婚并把她从所欠祖母的债务中解救出来，夜夜享受她给予七十个男人的满足。但上午十点他赶到卡塔利诺店里的时候，姑娘已经离开镇子。

时间平复了他一时的冲动，却加深了挫败感。他一心在工作中逃避。他决定认命，终生远离女人来遮掩自己无能带来的羞耻。与此同时，梅尔基亚德斯已经把马孔多所有可照的都照在金属版上，然后把银版照相术工作室让给了臆想联翩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后者要用它来获取上帝存在的科学依据。他运用一套复杂的程序在家中各处采集影像叠加曝光，确信只要上帝存在，迟早会被他拍下银版照片，不然就可以一举推翻其存在的假设。梅尔基亚德斯在破解诺查丹玛斯预言方面取得了深入进展。他每每研究到深夜，缩在退色的天鹅绒坎肩里艰难喘息，用雀爪般的小手在纸上胡乱涂写，手上的戒指都已失去曾经的光彩。一天夜里，他相信已破译出一则有关马孔多未来的预言。它会变成一座光明的城市，矗立着玻璃建造的高楼大厦，却再没有布恩迪亚家的丝毫血脉存留。“一定弄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大发雷霆，“不是玻璃房子，是冰房子，像我梦见的那样。而且不管到什么时候，总会有布恩迪亚家的人，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个古怪的家里，乌尔苏拉尽力保持正常，她扩大了糖果小动物生意，整夜不歇地开着烤炉，产出一篮篮面包以及品种丰富的布丁、蛋白酥和小饼干，几个小时内就在通往大泽区的小路上全部售出。明明已到可以安享生活的岁数，她反倒越来越活跃。她一直忙于自己兴隆的事业，一天下午，当印第安女人帮她往面团里加糖，她无

意中向院子望去，竟看见两位陌生的美丽少女在暮色中绣花。那是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她们为外祖母严格守孝三年，那时刚刚脱去孝服，鲜艳的衣裳仿佛使她们在世上获得了新的地位。谁也不曾想到，丽贝卡会是两人中更漂亮的那个。她面容白皙明净，眼睛大而沉静，一双有魔力的手仿佛在将无形的丝线绣成花样。年龄小些的阿玛兰妲虽然魅力稍逊，但遗传了过世外祖母自然的气质和内心的高傲。待在她们身边的阿尔卡蒂奥已显露出父亲当年迅猛的成长势头，但看起来还像个孩子。他开始跟奥雷里亚诺学习金银器工艺，同时也学习读写。乌尔苏拉忽然意识到家里已人满为患，儿女们即将成婚并生儿育女，到时势必会因为屋子拥挤而离开家门。于是她取出长年辛劳攒下的积蓄，又从顾客那里预支货款，着手扩建家宅。她准备修建一间正式的客厅，一间更舒适通风的起居室，一间能摆下十二个座位的餐桌、容纳全家人和所有宾客进餐的饭厅，九间窗户都朝向院子的卧室，以及一条带扶栏的长廊，扶栏上有盆栽的欧洲蕨和秋海棠，能借着玫瑰花园遮挡正午的阳光。她准备扩建厨房，砌起两座炉灶；拆掉庇拉尔·特尔内拉曾在里面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算命的那座旧谷仓，盖一座比原来大上两倍的新仓，保证家里永远不会缺粮。她准备在院子里的栗树荫下分建男女浴室，在院子深处建一座大马厩、一间铁丝网鸡舍、一个奶牛棚和一处四面开放供迷途鸟儿自由栖息的鸟舍。乌尔苏拉仿佛染上了丈夫的狂热，在十几个木匠和泥瓦匠的簇拥下发号施令，决定采光与通风事宜，随意分配空间而不受任何限制。村庄初建时的简陋房舍里堆满了工具和建筑材料，挤满了挥汗如雨的工人。工人们不时请求大家不要妨碍干活，殊不知碍事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被骨殖袋发出的沉闷咯啦声所烦扰，走到哪儿都难得安宁。在这种恼人的环境中呼吸着生石灰和焦油的气味，谁也说不清镇上这幢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子，大泽区这处最友善好客最舒适清凉的寓所，究竟是如何从地下冒了出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这场大变革期间一直忙于捕捉上帝的踪迹，对此更加难以理解。新家即将落成的时候，乌

尔苏拉把他从狂想世界里拉了出来，告诉他已经接到命令，必须把房子立面涂成蓝色而不是他们想要的白色。她把那份官方法令拿给他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有明白妻子的话，却辨认出了法令上的签名。

“这家伙是什么人？”他问。

“里正。”乌尔苏拉难过地回答，“人家说是政府派来管事的。”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那位里正，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马孔多。他下榻在雅各酒店—店主是最早来这儿用小玩意儿换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中的一个—次日便租了一间临街的小屋，距布恩迪亚家两个街区。他摆上从雅各酒店买来的一桌一椅，把随身带来的共和国国徽钉在墙上，又在门上标明“里正”字样。他发布的第一条法令便是所有房屋都要漆成蓝色，以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手拿这一纸命令的副本找到他时，他正在那间狭小办公室内搭起的吊床上午睡。“这是您写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问道。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位老成持重、性情腼腆、脸色红润的男子，回答说是。“凭什么？”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再次问道。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份文件给他看。“我已被任命为本镇的里正。”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都没看那任命书一眼。

“在这个镇上我们不用纸片发布命令。”他镇定自若地说，“另外希望您弄清楚，我们不需要里正，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纠正的。②”

面对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的漠然，他仍未提高声音，详细追述了当年如何草建村庄，如何划分土地和开辟道路，又如何根据需要予以改进，却从未麻烦过任何政府，也不见有人来找过麻烦。“我们和平相处，连自然死亡的人都没有。”他说，“您也看见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墓地。”人们并未因政府没来帮助而难过。正相反，他们都

为一直以来政府的放任自流而高兴。他希望保持现状，因为他们建起村镇并不是为了让随便哪个外来人到此发号施令。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已经穿上和裤子一样雪白的卡其布上装，时时刻刻保持举止庄重。

“所以，如果您想留在这里，和其他普通居民一样，我们非常欢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总结道，“但如果您是来制造混乱，强迫大家把房子漆成蓝色，那么您可以收拾起家什，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因为我的家一定要像鸽子一样雪白。”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脸色苍白。他后退了一步，咬紧牙关不无痛苦地挤出一句：

“我得警告您，我带了武器。”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自己也不知道双手何时又恢复了年轻时掀翻一匹马的力气。他抓住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的衣领，把他拎起来举到与自己双眼平齐。

“我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宁愿掂起一个活人，也不愿后半辈子都惦着一个死人。”

他就这样抓住衣领拎着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走过半条街，直到通往大泽区的路上才放他双脚着地。一星期后，里正带着六名赤着双脚、衣衫褴褛、手持猎枪的士兵回来了，另有一辆牛车上坐着他妻子和七个女儿。晚些时候又来了两辆车，载着家具、衣箱和日常用具。他在雅各酒店安顿下家人，同时开始找房子，并在士兵的保护下重开办公室。马孔多的创建者决定驱逐入侵者，带着他们的长子来听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调遣。但他并不同意，说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次回来带上了妻子和女儿，而当着家眷的面羞辱一个人不是男子汉所为。因此，他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

奥雷里亚诺陪父亲同去。此时他已经蓄起翘尖角的黑髭须，声音日渐洪亮，日后的战争中这将成为他的特征。他们没带武器，对卫兵视而不见，径直走进里正的办公室。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并不慌

张，向他们介绍正巧在那里的两个女儿。安帕萝，十六岁，和母亲一样肤色黝黑；蕾梅黛丝，只有九岁，是个肤色如百合、眼睛碧绿的漂亮女孩。她们姿态优美，教养有素，一见父子俩进门，不等介绍就已搬过椅子请他们就坐。但两人都站着不动。

“很好，朋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您可以留下，不过不是因为您门前那几个拿猎枪的土匪，而是看在您夫人和女儿的面子上。”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一阵茫然，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给他反驳的机会。“只有两个条件，”他补充道，“第一，各家的房子想漆什么颜色就漆什么颜色；第二，士兵得立刻离开。我们负责维持秩序。”里正举起右手，五指伸直。

“以荣誉担保？”

“以敌人担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回答，随即带着几分苦涩补充道，“因为有件事我要跟您说明白：您和我还是敌人。”

当天下午士兵就离开了。没过几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为里正找到一处房子。一切都恢复平静，只有奥雷里亚诺例外。里正最小的女儿蕾梅黛丝，论年龄足可当他的女儿，但她的影子正折磨着他身体的某个部位。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几乎在他行走时构成障碍，就像鞋里进了一粒小石子。

---

①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 — 1618），英国探险家，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②在西班牙语中，“里正”（corregidor）源于“纠正”（corregir）一词。

四

雪白如鸽子的新家落成时，举办了一场庆祝舞会。乌尔苏拉是在那天下午发现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已出落成婷婷少女的一刻萌生这个想法的，甚至可以说，扩建计划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让姑娘们有一处体面的地方接待访客。为了完美无缺地实现这一愿望，她在扩建进程中像苦役犯一般劳作，在竣工前就已订购了昂贵的装饰品和生活用具，还添置了一样必将震惊全镇、引发年轻人欢呼的神奇发明—自动钢琴。钢琴分部件装箱运来，一同到货的还有维也纳的家具，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西印度公司的餐具，荷兰的桌布，以及各式各样的灯具、烛台、花瓶、帷幔和壁毯。进口公司自费派来一名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负责安装和调试自动钢琴，指导顾客使用，并教授如何伴着印满六卷纸带[①]的时兴乐曲跳舞。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是个金发的年轻人，马孔多的居民还从未见过这样英俊又有教养的男子。他非常注重仪表，酷暑天气仍身着花缎紧身马甲和厚厚的深色呢料上装。他出于礼貌与主人保持适当距离，好几个星期关在客厅里汗流浃背地工作，心无旁骛的状态足可与金银器作坊里的奥雷里亚诺媲美。一天上午，他没有开门，也没有招呼任何人来见证奇迹，就在自动钢琴上装好第一卷纸带，于是烦人的捶打声和板条持续的轰鸣戛然而止，只有明净谐和的乐声开始荡漾。所有人都赶到了客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大吃一惊，倒不是因为优美的旋律，而是因为自动钢琴琴键的自行弹奏。他立刻把梅尔基亚德斯的照相机架设在客厅里，期望能够拍到那看不见的演奏者。那天意大利人和他们共进午餐。这个天使般的男子未戴戒指的苍白手指使用起刀叉来如行云流水，令负责斟酒上菜的丽贝卡和阿玛兰妲惊诧不已。在客厅旁的起居室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教她们跳舞。他用

节拍器打着拍子指导舞步，但不触及她们的身体。这一切都受到乌尔苏拉礼貌的监视，她在女儿们上课的过程中一刻不曾离开房间。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这些日子脚踏舞鞋，身穿富于弹性又极其贴身的舞蹈长裤。“你用不着这么担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妻子说，“这人是个娘娘腔。”但她不肯放松警惕，直到课程结束，意大利人离开马孔多才罢休。接着他们开始筹备舞会。乌尔苏拉开列出一张经过严格筛选的宾客名单，入选的都是村庄创建者的后代—除去庇拉尔·特尔内拉一家不算，那女人又生了两个父亲不明的孩子。实际上这是门第之选，只不过以友情作为选择标准。那些入选者早在背井离乡创建马孔多之前就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的常客，而且他们的儿孙也是跟奥雷里亚诺和阿尔卡蒂奥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的女儿则是唯一可以来家里与丽贝卡和阿玛兰妲一同绣花的姐妹。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位仁慈的地方官不过是个摆设，其职责仅限于用微薄的经费供养两名木棒武装起来的警察。为了贴补家用，他的女儿们开了一家缝纫店，业务从制作毡绒花到出售番石榴甜食再到代写情书，不一而足。她们端庄而勤劳，是镇上最美的姑娘，新式舞也跳得最好，却根本没被考虑纳入受邀之列。

乌尔苏拉和姑娘们拆包取出家具，擦亮餐具，挂起玫瑰花舟少女图，泥瓦匠刚砌成的房子空空荡荡，到这时才有了一缕新生的气息。与此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再追寻上帝的形象，确信其并不存在，转而将自动钢琴开膛破肚，探寻其中蕴藏的秘密魔法。在舞会开始两天前，他面对一堆多出来的弦轴和木槌一筹莫展，刚把一团乱麻似的琴弦从一端捋顺，另一端又卷了起来，最后总算胡乱拼凑复原。那些日子家中空前忙乱，但崭新的煤油灯终究在预定的日期和时刻点燃。家门洞开，空气中树脂和灰浆的气味还未散去，建村元老的儿孙们依次参观了摆放有欧洲蕨和秋海棠的长廊，各个安静的房间，弥漫着玫瑰芬芳的花园，最后来到客厅，簇拥在覆盖着雪白床单的新奇发明周围。自动钢琴在大泽区一些镇子已经流行开来，在别处

见识过的人不免有些扫兴，然而最失望的人还是乌尔苏拉。她放好第一卷纸带让阿玛兰妲和丽贝卡领先起舞，但机器却毫无动静。老态龙钟的梅尔基亚德斯几乎已经失明，但仍试图乞灵于自己古老的智慧来修复钢琴。最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误打误撞，移动了一处卡住的部件，音符开始断断续续地冒出，随即又以颠倒的顺序涌泻。琴槌敲击在散乱无序又过分绷紧的琴弦上，纷纷脱臼错位。然而，那二十一位当年深入山林西行寻找大海的无畏勇士的后人，执著地绕过错乱乐声的暗礁，翩翩起舞直到天明。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重新把自动钢琴组装起来。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帮他理顺琴弦，听到那颠倒的华尔兹乐曲时跟他一起连连大笑。见他那样可亲又可靠，乌尔苏拉便取消了监视。在他告别的前夜，家里用修复的自动钢琴临时举行了一场舞会，他和丽贝卡联袂表演了一场美妙的现代舞。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的舞姿舞技也并不逊色。但表演被迫中断，挤在门口围观人群中的庇拉尔·特尔内拉和另外一个女人又撕又咬打了起来，只因后者胆敢妄言年轻的阿尔卡蒂奥长着女人的屁股。将近午夜时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满怀感情地发表了简短致辞，并许诺会很快回来。丽贝卡一直送他到门口，随即关闭家门，熄灭灯火，她回到自己房间里恸哭起来。那是一种难以安慰的哭泣，持续了好几天，连阿玛兰妲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她的守口如瓶并不奇怪。她虽然表面热情坦诚，实际秉性孤僻，从不敞开心扉。她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身材修长结实，但仍旧喜欢坐在那把和她一起到来的小木头摇椅上，那椅子加固过多次，扶手已经不见了。没人留意她到了这个年龄还是喜欢吸吮手指，她一有机会便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并养成了面朝墙壁睡觉的习惯。雨天的下午，她和女友们待在秋海棠长廊里刺绣，每当看到潮湿的土层和蚯蚓在花园里堆起的小丘，她常常会从交谈中走神，怀念的泪水带着咸味涌上舌尖。她一开始哭泣，当年那些被橘汁和大黄压服的秘密嗜好顿时化为无法抑制的渴望爆发。她又开始吃土。第一次几乎是出于好奇，她确信那糟糕的

味道将是摆脱诱惑的最佳药方。她果然无法忍受泥土在嘴里的感觉，但她没有放弃，而是受制于不断增强的渴望，渐渐恢复了旧日的胃口，恢复了对原生矿物的喜爱以及原始食物带来的满足。她将一把把泥土藏进口袋，一边传授女友们最繁难的针法，谈论其他不值得自己为之吃下石灰墙皮的男人，一边趁人不注意一点点吃掉，心中涌起既幸福又愤怒的迷乱感觉。这一把把泥土使那唯一值得她自卑自贱的男人不再遥远也更加真切，仿佛从他脚上精巧的漆皮靴在世界另一处所踏的土地传来矿物的味道，她从中品出了他鲜血的重量和温度，这感觉在她口中猛烈烧灼，在她心里留下安慰。一天下午，安帕萝·摩斯科特无缘无故请求参观新家。阿玛兰妲和丽贝卡对这突如其来的到访不明所以，礼貌而生硬地接待了她。她们向她展示扩建后的家宅，请她听自动钢琴的演奏，为她端上橘子水和小饼干。安帕萝给她们上了一课，诸如什么是端庄大方，什么是仪态可亲，什么是举止得体，给在场不过短短一会儿的乌尔苏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小时后，谈话渐渐无味，安帕萝趁阿玛兰妲分神的瞬间将一封信塞给丽贝卡。她只来得及看见“可敬的丽贝卡·布恩迪亚小姐”字样，与自动钢琴说明书上的字体同样工整，以同样的绿色墨水写就，使用同样的绮丽措辞。她立刻用指尖将信折起藏进胸衣，望着安帕萝·摩斯科特的眼神中充满无尽感激，还有结下生死之盟的无声承诺。

安帕萝·摩斯科特与丽贝卡·布恩迪亚之间突然萌生的友情燃起了奥雷里亚诺心中的希望。他一直想着蕾梅黛丝，深受折磨，却总找不到机会见面。当他跟最亲密的朋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建村元老们的儿子，名字与父亲相同—在镇上散步时，曾无数次用渴望的目光在缝纫店中寻找，但看见的只是她的姐姐们。安帕萝·摩斯科特在家中的出现对他而言不啻一个预兆。“她一定会一起来，”奥雷里亚诺低声对自己说，“她一定会来。”他重复了无数次，如此坚信不疑，终于一天下午，他在作坊里组装一条黄金小鱼的时候，感到她回应了自己的呼唤。不一会儿，他果然听到一个

童稚的声音，于是抬起头来一看，心脏因惊恐而停止了跳动：小女孩穿着粉红薄纱裙和白色小靴子站在门前。

“这里不能进，蕾梅黛丝。”走廊里传来安帕萝·摩斯科特的声音，“人家在干活。”

但奥雷里亚诺没等她听从姐姐的话，就举起口中穿着细链的小金鱼，对她说：

“进来。”

蕾梅黛丝走近问了几个关于小金鱼的问题，奥雷里亚诺无法回答，因为他猝然间喘不过气来。他想永远这样待下去，守着她百合般的肌肤，伴着她翡翠色的眼睛，听她以对待父亲的尊敬，每问一个问题都叫一声“先生”。梅尔基亚德斯坐在角落里的书桌前，画着难以索解的符号。奥雷里亚诺恨他。他做不了别的，只能对蕾梅黛丝说要把小金鱼送给她，结果吓得她飞快地逃出了作坊。那天下午奥雷里亚诺失去了隐藏于心底的耐性，此前他正是靠这种耐性等待见面的机会。他无心干活。他竭力集中精神无数次呼唤，但蕾梅黛丝没有回应。他到她姐姐们的缝纫店寻找她，在她家窗前寻找她，去她父亲的办公室寻找她，但她的身影只出现在他心中，填满了他可怕的孤独。他和丽贝卡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着自动钢琴弹奏华尔兹。丽贝卡这样做是因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曾教她如何伴着那音乐跳舞，奥雷里亚诺这样做则是因为一切，包括音乐在内，都能让他想起蕾梅黛丝。

家里充满爱情的气息。奥雷里亚诺寄情于无头无尾的诗行。他把诗句写在梅尔基亚德斯送他的粗糙羊皮纸上，写在浴室的墙壁上，写在自己的手臂上，而所有诗句中都有蕾梅黛丝幻化的身影：蕾梅黛丝在下午两点令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中，蕾梅黛丝在玫瑰无声的呼吸中，蕾梅黛丝在蠹虫如沙漏般的暗地蛀蚀中，蕾梅黛丝在清晨面包的热气中，蕾梅黛丝无所不在，蕾梅黛丝无时或缺。丽贝卡每天下午四点待在窗边绣花，等待情书的到来。明明知道运送邮件的骡子每十五天才

来一次，她依然天天等候，相信他们会算错时间，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到来。然而事与愿违，有一次到了预定的日期，骡子却没有出现。丽贝卡绝望得发疯，半夜爬起来，自戕般饥渴地吞下一把把花园里的泥土。她又痛苦又愤怒地哭泣，咀嚼着柔软的蚯蚓，咬碎蜗牛的硬壳崩裂牙齿，又呕吐直到天亮。她陷入一种迷狂的衰弱状态，失去意识，在毫不知耻的呓语中吐露心声。乌尔苏拉惊诧之下撬开她的衣箱，在箱底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系好的十六封香气四溢的信件，夹在旧书里的枯叶和花瓣，以及一碰就化为粉末的蝴蝶标本。

只有奥雷里亚诺能理解这样的创痛。那天下午，当乌尔苏拉试图将丽贝卡从迷狂中拯救出来时，他跟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那里扩建了一排木板房，里面所住的单身女人散发出萎谢花朵的气味。一支由手风琴和鼓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歌谣，他已有好几年没在马孔多出现。三位好友喝着甘蔗酒。马格尼菲科和赫里内勒多同奥雷里亚诺年纪相仿，但比他更通晓世事，轮流和坐在大腿上的女人喝酒。其中一个镶着金牙、神色憔悴的女人的爱抚令他浑身震颤，但他拒绝了她。他发现喝得越多就越发想念蕾梅黛丝，不过也更能忍耐思念带来的折磨。他不知自己从何时开始飘了起来。他看见朋友们和那些女人在耀眼的闪光中浮游，没有体积没有重量，他们所说的言语未经双唇，他们神秘的手势与表情彼此疏离。卡塔利诺一只手搭在他背上，对他说：“快十一点啦。”奥雷里亚诺回过头去，就看到了那张畸形的大脸，耳边还插着一朵毡绒花。他随即失去了记忆，好像当初得了失忆症那样，直到另一个早晨才恢复，他身处完全陌生的房间，一旁站着穿着衬裙、赤着双脚、蓬头散发的庇拉尔·特尔内拉，她拿着一盏灯照着他，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

“奥雷里亚诺！”

奥雷里亚诺站稳脚，抬起头。他不知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但知道目的为何，因为那正是他从童年起一直深藏心底的隐秘。

“我是来跟您睡觉的。”他说。

他的衣服上满是污泥和呕吐的痕迹。庇拉尔·特尔内拉那时候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她没有问他什么，把他引到床前。她用打湿的丝瓜瓤给他擦脸，为他脱了衣服，自己也赤裸身体，然后放下蚊帐，免得孩子们万一醒来看到。她已经厌倦了等待留下的男人，离开的男人，无数因纸牌的模糊指引迷了路没能赶到她家的男人。在等待中她的皮肤起了皱褶，乳房被掏空，心里的余烬熄灭。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奥雷里亚诺，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带着母性的温柔亲吻他的脖子。“我可怜的小宝宝。”她喃喃道。奥雷里亚诺颤抖起来。他平稳老练、毫无滞碍地越过痛苦的峭壁，发现蕾梅黛丝变成了无边的沼泽，闻起来好像幼兽和新熨好的衣服。渡过难关之后，他哭了起来。一开始是几声不由自主、断断续续的抽泣，随后泪如泉涌，他感觉心中苦痛的块垒迸裂了。她等待着，用指肚摩挲他的头发，直到他的身体倾空那令他无法活下去的黑暗。然后庇拉尔·特尔内拉问他：“她是谁？”奥雷里亚诺告诉了她。她笑了，只是昔日足以惊飞鸽群的笑声如今甚至不会把孩子们吵醒。“你得先把她养大。”她开玩笑说。但在玩笑背后，奥雷里亚诺感受到了理解。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不仅抛下了不解人事时的惶惑，也卸下了几个月来折磨内心的重负。庇拉尔·特尔内拉当下给了他一个承诺。

“我去跟那女孩说。”她说，“等着我把她端在盘子里送给你。”

她做到了。只是时机不对，因为家里已经失去往日的平静。丽贝卡那般喊叫已经无法保守秘密，阿玛兰妲发现了她的痴恋后开始发烧。她也在为没有回应的爱情而饱受折磨。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写下一封封狂热的信，以摆脱没有希望的激情带来的折磨，然后把信深藏在衣箱内。乌尔苏拉同时照顾两个病人，几乎忙不过来。她费尽心机长时间询问，也没能问出阿玛兰妲委靡的缘由。最终，她又灵机一动，撬开衣箱，便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系好的信，信内塞满新鲜的百

合花瓣，信上泪痕未干，封封都写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但从未寄出。乌尔苏拉眼含愤怒的泪水，诅咒自己动念购买自动钢琴的那个时刻，并取消了刺绣课程，下令进入没有死人的丧期，直到女儿们死心断念为止。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已经改变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最初的看法，十分欣赏他对音乐器械的灵活掌握，于是试图干预，却无济于事。庇拉尔·特尔内拉告诉奥雷里亚诺，蕾梅黛丝已经作好结婚的准备，他意识到这个消息会给父母带来新的痛苦。但他还是选择面对现实。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被郑重其事地请到客厅，漠然听着儿子的宣告。但听到那未婚妻的名字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气红了脸。“爱情是瘟疫！”他咆哮着，“有那么多漂亮又正派的女孩，你偏偏要娶敌人的女儿。”乌尔苏拉却赞成儿子的选择。她坦承自己对摩斯科特家七姐妹的好感，说她们漂亮、能干、端庄又有教养，称赞儿子有眼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面对妻子的热情让了步，但提出一个条件：作为交换，丽贝卡要嫁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乌尔苏拉等到能腾出时间时，会带阿玛兰妲去省城观光，让她多和外人接触以淡忘自己的失落。丽贝卡听到这个结果，立时恢复了健康，给未婚夫写了一封欢喜万分的信，经父母过目后亲自送到邮局投递。阿玛兰妲假意接受了这一决定，渐渐退了烧，但在心中暗暗发誓，丽贝卡想要结婚除非从她的尸体上跨过去。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身着舞会那晚才穿过一次的深色呢料正装，系上赛璐珞硬领，套上岩羚皮靴，去蕾梅黛丝·摩斯科特家提亲。里正和他妻子半是欣喜半是困惑地接待了他，不知道他这次突然来访的目的，稍后又都认为他记错了提亲的对象。为了澄清误会，做母亲的叫醒蕾梅黛丝，把她抱进客厅，那孩子还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父母问她是否已作出嫁人的决定，她哭哭啼啼地回答只想继续睡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理解了摩斯科特夫妇的困惑，便去找奥雷里亚诺确认。等他回来的时候，摩斯科

特夫妇已经换上正装，重新布置了家具，在花瓶里插上鲜花，六个大女儿也陪在一旁等待。尽管场面尴尬，硬领也让他很不舒服，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是肯定，蕾梅黛丝就是儿子选中的人。“这没有道理，”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有些不快，“我们还有六个女儿，都是单身，年龄也合适，非常愿意成为您儿子这样正派又勤劳的男士的伴侣，可奥雷里亚诺偏偏相中了还在尿床的那一个。”他妻子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从眼神到姿态都带着悲伤，她责备了丈夫的无礼。喝过果汁后，他们欣然接受了奥雷里亚诺的决定。不过摩斯科特太太请求单独与乌尔苏拉谈一次。乌尔苏拉很吃惊，抱怨让自己搅进了男人们的事情，但实际上又兴奋又害怕，次日便登门拜访。半小时后，她带回了蕾梅黛丝还没到青春期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他已经等了那么久，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等下去，直到未婚妻达到生育的年龄。

恢复不久的平静又被打破，这一次是梅尔基亚德斯的死。尽管这结果已在意料之中，但他死亡的情形却是人们事先所想象不到的。他归来后没几个月，便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老的过程，很快就被归为那类无用的老翁，他们像幽灵般在卧室间步履蹒跚地游荡，高声追怀美好岁月却无人理睬，直到某天清晨死在床上才被人想起。起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出于对新奇的银版照相术和诺查丹玛斯预言的热情，还常常帮他的忙。但随着时间流逝，两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困难，他最终被丢下孤独一人。他的视力和听力都在衰退，似乎把对话者混同于他在人类历史早期所结识的人物，回答他人问题时混乱使用多种语言。一天他忘了戴上夜里放在床边水杯里的假牙，从此索性不戴。乌尔苏拉着手扩建家宅的时候，特意为他盖了一个房间，紧挨着奥雷里亚诺的作坊，远离家中的忙乱喧闹，有一扇阳光充沛的窗子和一个书架。她亲自把尘侵蛾蛀几近损毁的书籍、写满难解符号的脆薄纸张和装假牙的杯子一一摆上书架，那杯子里已经长出水生植物，开着纤小的黄花。梅尔基亚德斯似乎很喜欢这个新居，因为从此再没见

他出屋，甚至在饭厅也不见他的踪影。他只去奥雷里亚诺的作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随身携带的羊皮纸上涂写谜一般的文字，那纸好像由某种干燥的材料所制，像千层饼似的裂开。他就在那里吃下比西塔西翁每天两次送去的食物，但最后那段日子他没了胃口，只吃蔬菜过活。很快他就显出素食者特有的孤清模样。他的皮肤上覆着一层柔软的苔藓，与那件不分季节永不离身的坎肩上滋生的相仿，他的呼吸间散发出熟睡动物的臭气。奥雷里亚诺最终忘了他的存在，沉浸在自己的诗行里，但有一次感觉听懂了他低沉独白中的只言片语，便留了心。实际上，他滔滔不绝说出的艰深话语中唯一能够辨别出来的，只是像锤击般不断重复的一个词“二分点二分点二分点”[②]，还有一个名字“亚历山大·冯·洪堡”[③]。阿尔卡蒂奥开始帮奥雷里亚诺做金银器活计的时候，曾尝试稍稍接近他。梅尔基亚德斯回应了这一沟通努力，不时吐出几个和现实毫不相干的卡斯蒂利亚语句子。然而一天下午，他好像突然间激情骤至，神采焕发。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将回想起梅尔基亚德斯为他朗读那一页页不可理解的文字时的颤抖，他自然是听不懂，但那铿锵的音调听起来仿佛教皇通谕的吟唱。随后，他很久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用西班牙语说道：“等我死的时候，请在我房间里烧上三天水银。”阿尔卡蒂奥告诉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后者试图获取更具体的信息，却只得到一句回答：“我已经达到永生。”每当梅尔基亚德斯的呼气发臭，阿尔卡蒂奥便在星期四的上午带他去河里洗澡。他看来好了些。他脱下衣服，和年轻人一起没到水里，凭着神秘的方向感绕过深凹和危险地带。“我们是水做的。”他有一次这么说道。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没人在家里见过他，除了那天晚上他令人感动地努力修理自动钢琴，以及他腋下夹着用毛巾包好的加拉巴木果壳瓢和油椰肥皂跟阿尔卡蒂奥去河里洗澡的时候。一个星期四，在叫他去河边之前，奥雷里亚诺听见他说：“我已经发热病死在新加坡的沙洲上。”那天他下水时弄错了路线，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被找到，尸身搁浅

在一处明晃晃的河湾里，一只孤零零的秃鹫落在他肚子上。乌尔苏拉哭得比自己父亲去世时还伤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顾她的惊诧和反对，拒绝为他下葬。“他永生不死，”他说，“他自己给出了复活的配方。”他重新燃起遗忘多时的炼金炉，放上一锅水银煮沸，一旁的尸体渐渐充满蓝色的泡沫。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鼓起勇气提醒他，溺死者不安葬的话会危害公共卫生。“哪儿的话，他根本没死。”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如此回答。熏香一般的水银烧煮已经持续七十二小时，尸体上开始迸裂出青紫色的花朵，伴随着轻微的爆响，家里充满恶臭。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同意下葬，但拒绝草率行事，而要用隆重的礼仪对待这位马孔多最大的恩人。这是镇上第一次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葬礼，一个世纪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或可与之媲美。他们将他葬在为公墓预留的空地中央，筑起一座坟墓，墓碑上铭刻着他们对他的唯一所知：梅尔基亚德斯。他们为他守灵九个夜晚。大家聚在庭院里喝咖啡、讲笑话、玩纸牌，阿玛兰妲趁着这混乱找到一个机会向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表白自己的爱情，后者几个星期前刚与丽贝卡正式订下婚约，并且开办了一家乐器和发条玩具店，就在当年阿拉伯人常常流连并用廉价的小玩意儿交换金刚鹦鹉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土耳其人大街。意大利人那一头闪亮的鬈发常引得女人们情不自禁地赞叹，他觉得阿玛兰妲不过是个任性的小姑娘，没有把她的话当真。

“我有个弟弟，”他对她说，“他很快会来店里给我帮忙。”

阿玛兰妲感到受了侮辱，带着刻骨的怨恨告诉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她下定决心要阻止姐姐的婚礼，就算横尸门前也在所不惜。意大利人对如此骇人的威胁大感震惊，忍不住告诉了丽贝卡。于是，因乌尔苏拉的繁忙一再推迟的旅行，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安排妥当。阿玛兰妲没有反对，但在与丽贝卡吻别的一刻，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你别做梦了。就算把我赶到天边，我也能想办法让你结不成婚，哪怕要杀了你也不在乎。”

乌尔苏拉的离开，以及梅尔基亚德斯无形的存在——他继续悄无声息地在房间里游荡——使家里显得分外空旷。丽贝卡接管了日常家务，印第安女人负责照管面包房。每到傍晚，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就在一阵薰衣草的香风中到来，总带上一件玩具做礼物，他的未婚妻则在客厅里接待他，并敞开所有门窗以免引起风言风语。这种谨慎不免显得多余，因为意大利人已充分表明他的正派可靠，他甚至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碰过，尽管她年内就将成为他的妻子。这样的来访很快使家里摆满了神奇的玩具。上了弦就能翩翩起舞的跳舞女郎，八音盒，奔跑的马儿，耍杂技的猴子，敲鼓的小丑，各种令人惊异的机械动物，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带来的这些玩具驱散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心头悼念梅尔基亚德斯去世的悲痛，他又回到了过去那个钻研炼金术的时期。他生活在满是开膛破肚的动物、大卸八块的机件的天堂里，试图利用钟摆原理设计一套永动系统，使这些玩具趋于完善。奥雷里亚诺已经无心干活，专门教导小蕾梅黛丝读写。起初小女孩宁愿和自己的娃娃一起玩，全怪那个天天下午都来的男人，家里人总要她放下游戏，给她洗澡更衣，然后让她坐在客厅里接待他。但奥雷里亚诺的耐心和诚意最终赢得了她的好感，她甘愿好几个小时和他待在一起学习词语的含义，用彩色铅笔在本子上画小房子、畜栏里的奶牛、散发黄色光芒落到山背后的圆太阳。

只有丽贝卡受了阿玛兰妲的威胁一直闷闷不乐。她了解妹妹的性格，了解她的高傲，因她刻毒的怨恨而担惊受怕。她连续几个小时躲在浴室里吸吮手指，竭尽全力抗拒吃土的诱惑。为了摆脱心头的忧虑，她请庇拉尔·特尔内拉为自己推算未来。说了些模棱两可的套话之后，庇拉尔·特尔内拉给出了预言：

“只有等你父母入土为安，你才会幸福。”

丽贝卡一阵颤抖。她记起好像在梦里，看见还是小女孩的自己走进家门，带着衣箱、小木头摇椅和一个口袋，而她一直不知道口袋里面装的什么。她记起一位秃顶的先生，他身着亚麻衣裳，领口别着一

粒金扣，但与金杯国王[4]毫无相似之处。她记起一位非常年轻美貌的女士，双手温和芬芳，与金元仆侍那双似乎患了风湿病的手相去甚远，那女士曾在她发间簪上鲜花，下午带她在一个绿色街巷的城镇中散步。

“我不明白。”她说。

庇拉尔·特尔内拉同样困惑。

“我也不明白，但牌上就是这么说的。”

丽贝卡被这解不开的谜团搅得忧心忡忡，便告诉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责怪她竟然相信纸牌的预言，自己却在暗中翻遍衣柜和衣箱，挪开家具，掀起床板和地板，四处寻找那个骨殖袋。他想起自从房子扩建以后就再没见过，便偷偷找来那些泥瓦匠，其中一个承认，当时嫌那袋子碍事就把它砌在了夹壁里。他们耳朵贴在墙上四处侦听，听了好几天终于听到了低沉的咯啦咯啦声，于是凿开墙壁，发现骨殖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袋中。当天他们便把骨殖安葬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坟茔里，就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坟墓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回到家，心里卸下了如同对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回忆一样的良心重负。经过厨房的时候，他吻了一下丽贝卡的额头。

“别胡思乱想了，”他说，“你会幸福的。”

与丽贝卡结下的友谊为庇拉尔·特尔内拉重新敞开了家门，而那扇门自从阿尔卡蒂奥出生后乌尔苏拉就不曾为她打开过。她随时随刻都会登门，闹出的动静活像一群山羊，并以狂热的干劲做着最繁重的家务。有时她会走进作坊帮阿尔卡蒂奥敏化照相版，手脚利落，温情脉脉，却给他造成困惑。这女人令他不知所措。她肌肤的热度，她身上的烟味，她在暗室里无拘无束的笑声，都令他心神不定脚下磕绊。

有一次，奥雷里亚诺正在打造金银器，庇拉尔·特尔内拉就倚在桌上观赏他耐心地干活。事情发生在突然之间。奥雷里亚诺确认阿尔卡蒂奥在暗室里，才抬起头迎上庇拉尔·特尔内拉的视线，她的想法毫无掩饰，仿佛暴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好吧，”奥雷里亚诺说，“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庇拉尔·特尔内拉咬着嘴唇，露出一丝悲伤的笑容。

“你适合打仗，”她说，“百发百中呢。”

预感得到了证实，奥雷里亚诺心下一阵轻松。他继续埋头干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声音里多了几分安稳和镇定。

“我认了，”他说，“就叫我的名字。”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终于如愿以偿：他把钟表的机件安在上弦的跳舞女郎身上，于是那个玩具在自己的音乐伴奏中一刻不歇地跳了三天。这一发明带给他的兴奋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疯狂举动。他不再吃饭，不再睡觉。少了乌尔苏拉的照料和监督，他任凭想象将自己带到一种永恒的谵妄状态，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他整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高声自语，寻找方法将钟摆原理应用到牛车上，应用到犁铧上，推广到一切有用的运动物体上。失眠引起的狂热令他筋疲力尽，以至于一天凌晨，当那个头发花白、行动迟缓的老人走进他的卧室，他一时竟没认出来。那是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最终，他还是想了起来，惊讶于死人也会变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禁怀念起往昔，一阵心潮澎湃。“普鲁邓希奥，”他高声喊道，“你怎么跑这么远来这儿了！”死去多年以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对活人的怀念如此强烈，对友伴的需求如此迫切，对存在于死亡之中的另一种死亡的迫近又是如此惧怕，最终对他最大的冤家对头萌生出眷恋。他找了很久。他向里奥阿查的死人们问起他，向从巴耶杜帕尔、从大泽区来的死人们问起他，但没人知道。马孔多对亡灵来说是一处未知之地，直到梅尔基亚德斯死后，在五颜六色的死亡地图上用一个黑点标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一直聊到天亮。没过几小时，他在熬夜后的疲惫不堪中走进奥雷里亚诺的作坊，问道：“今天星期几？”奥雷里亚诺告诉他是星期二。“我想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可我忽然又觉得还是星期一，跟昨天一样。你看那天，看那墙，看那秋海棠。今天还是星期

一。”奥雷里亚诺已经习惯他的种种古怪，没有理会。第二天，星期三，他又来到作坊。“真糟糕，”他说，“你看那风，听那太阳嗡嗡响，跟昨天前天都一样。今天还是星期一。”那天晚上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在长廊里碰见他，见他正以老人那种毫不雅观的方式哭号，为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为梅尔基亚德斯，为丽贝卡的父母，为他自己的父母，为所有他能想起在死亡中孤独无依的人哭号。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送给他一只上了弦就能用两脚走钢丝的小熊，但没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又问他前些日子提出的利用钟摆原理建造机器载人飞行的计划进展如何，他回答说那不可能，因为钟摆能让任何东西飞起来，却无法使自己腾空。星期四他又出现在作坊里，一副大祸临头的痛苦神情。“时间这个机器散架了，”他几乎哭了出来，“而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还在那么远的地方！”奥雷里亚诺像对待小孩一样训斥了他，他显出顺从的样子。他花了六个小时观察各种事物，试图找出一分一毫与前一天的不同之处，期待发现某种变化能证明时间的流逝。他整夜睁着眼躺在床上，呼唤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梅尔基亚德斯以及所有的死人来分担他的忧虑。但没人出现。星期五，他在谁都还没起床时又去观察外界的状况，最后彻底确认了仍是星期一。于是他抽出一根门闩，以超常的力量和野蛮的劲头将所有炼金设备、银版照相装置、金银器作坊都砸个稀烂，像中了邪似的高喊着一种流利高亢却无人能懂的语言。他准备将家里其他地方也如此捣毁，这时奥雷里亚诺向邻居求助。将他按倒在地用了十个人，捆绑起来用了十四个人，拖到院中的栗树那里用了二十个人。他被绑在树上，用奇怪的语言喊叫着，嘴里吐出绿色的泡沫。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返家的时候，他的手脚仍被捆在栗树树干上，全身被雨水淋透，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她们和他说话，他看着却认不出对面是谁，说了些没人能懂的话。乌尔苏拉为他松开被绳索勒伤已经溃烂的手腕脚踝，只在腰上留下捆绳。后来又用棕榈叶搭了顶棚，为他遮阳蔽雨。

---

①自动钢琴上用于控制琴键的穿孔纸带。

②二分点（equinoccio），昼夜平分点，黄道与天赤道的交点。

③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

④“金杯”（copa）与后文中的“金元”（oro）、“宝剑”（espada）都是西班牙纸牌中的花色；“国王”、“骑士”、“仆侍”分别为每种花色中的第十二、第十一、第十张牌。

五

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和蕾梅黛丝·摩斯科特在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于客厅里搭起的祭坛前结为夫妇。摩斯科特家四个星期以来的担惊受怕至此达到顶点，因为小蕾梅黛丝虽已进入青春期，却尚未摆脱童年的习惯。母亲已经给她讲授过青春期的变化，但二月的一个下午她仍然惊叫着冲进房间，打断了姐姐们和奥雷里亚诺的谈话，向他们展示内裤上一块巧克力色的污迹。于是婚礼定在一个月后举行。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教会她自己洗澡穿衣，让她懂得最基本的家庭事务。他们让她在烧热的砖上小便，好摆脱尿床的习惯。他们还费了不少工夫才说服她相信夫妻间的秘密绝不可外传，因为她听说以后既惊惶又兴奋，恨不得和遇见的每一个人讨论新婚之夜的种种细节。这项工作颇费心神，但当预定的佳期到来，小女孩熟谙人情世故已经不逊于任何一位姐姐。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挽着她的手臂，在鞭炮声和数家乐队的乐声中走过鲜花与花环装点一新的街道。新娘挥手致意，并向在窗口为她祝福的人们表示感谢。奥雷里亚诺身着黑呢正装，脚穿带金属搭扣的漆皮靴，数年后面对行刑队时他穿的也是这一双。他在家门前迎接新娘，随后带她走向祭坛，整个过程中脸色极其苍白，喉咙里像有个硬球堵着。新娘却表现得自然得体，即使在奥雷里亚诺为她戴戒指却失手落地时也没有丝毫失态。四周一片耳语，宾客开始骚动，而她仍抬起戴着花边手套的手，无名指兀自不动，直到新郎赶在戒指滚到门口之前伸脚挡住，又面红耳赤地回到祭坛前。她母亲和姐姐们提心吊胆，生怕小女孩在仪式上有不得体的举动，结果倒是她们自己失态，冲上去吻她。从那天起，她就展示出责任感、大方的仪态，以及面对逆境仍波澜不惊的控制力。她还想到留下结婚蛋糕最好的部分，盛在盘里配上叉子端到何塞·阿尔卡

蒂奥·布恩迪亚面前。身形魁梧的老人被绑在栗树树干上，蜷缩于棕榈叶顶棚下的一张小木凳上，饱经日晒雨淋已失去血色。他冲她感激地笑了笑，一边用手指抓蛋糕吃，一边哼着一首难以理解的圣诗。喧闹的庆典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上，其间唯一不幸的人是丽贝卡·布恩迪亚。这本该也是她的喜事。乌尔苏拉已同意在同一天为她举行婚礼，不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星期五接到的一封信带来了他母亲病危的消息。婚礼推迟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接到信后一个小时即起程前往省城，在路上错过了与母亲的相遇，他母亲星期六晚上准时抵达马孔多，并在奥雷里亚诺的婚礼上献唱了本是为自己儿子婚礼准备的悲伤咏叹调。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为了及时赶回自己的婚礼，一路跑瘫了五匹马，但当他星期天午夜时分赶到的时候，能做的只剩下打扫喜事的残烛余烬。从未查出究竟是谁写了那封信。在乌尔苏拉的拷问下，阿玛兰妲气得哭了起来，对着木匠们尚未拆除的祭坛赌咒发誓以证明自己的无辜。

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是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大泽区请来主持婚礼的，这位老人因清苦的职业而变得刻板。他肤色阴沉，瘦得皮包骨，肚子却浑圆凸出，一副老好人的表情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天真。他本打算婚礼结束后就回自己的教区，但马孔多居民的灵性贫瘠状态令他大吃一惊，他们按本性行事，肆无忌惮地繁衍生息，不给儿女施洗，不为节庆祝圣。考虑到世上没有别的地方更需要上帝的种子，他决定再待一个星期来教化犹太人和外邦人，使同居的合法化，让濒死的领圣礼。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他们回答说这里很多年来没有神甫，大家一向都是直接和上帝解决灵魂问题，已经摆脱了致死之罪的污染。尼卡诺尔神甫厌倦了在旷野讲道，决心建造一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要有真人大小的圣徒群像和彩绘玻璃窗，要让人们从罗马来到这个不敬神的中心敬拜上帝。他托着一个小铜盘四处募捐。人们给了他不少捐资，但他想要更多，因为教堂得有一口声音能震得溺水者浮出水面的大钟。他苦苦恳求，直到声音嘶哑，浑身骨头开始

咯咯作响。到一个星期六，他连造门的钱都没募齐，不由陷入绝望。他临时在广场搭起一个祭坛，星期天就像失眠症时期一样摇着铃铛，召唤居民参加露天弥撒。一些人出于好奇，另一些人出于怀旧，还有些人唯恐上帝将他们对其代理人的轻慢视为对其本身的冒犯，都应邀而来。就这样，早上八点的时候半个镇子的人都聚集在广场上，听尼卡诺尔神甫用因乞讨变得嘶哑的嗓音咏唱福音书。最后，当人群开始散去，他举手提请大家注意。

“稍等，”他说，“现在我们要亲眼观看上帝神力无穷的明证。”

方才助祭的男孩递过一杯热气腾腾的浓巧克力，他一口喝了下去。然后他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擦嘴，闭上眼睛大张双臂。随即，尼卡诺尔神甫从地面凭空升起足足十二厘米。这一举动很有说服力。一连几天他走街串巷，凭借巧克力的助力一再重现升空的明证，施舍源源不断地被祭童收到口袋里。不到一个月，教堂便得以开工建造。没有人怀疑这一演示的神圣源起，除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天上午人们聚集在栗树周围想再次见证神迹，他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尼卡诺尔神甫连同身下的凳子一起离地腾空，他只在小木凳上挺了挺身，耸耸肩膀。

“Hoc est simplicisimum,”[①]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homo iste statum quartum materiae invenit.”[②]

尼卡诺尔神甫一抬手，凳子的四条腿同时落了地。

“Nego,”他说，“Factum hoc existentiam Dei probat sine dubio.”[③]

就这样，人们知道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口中的鬼话其实是拉丁语。尼卡诺尔神甫利用自己是唯一能与他交流的人这一优势，试图将信仰灌输到他错乱的头脑中。他天天下午坐到栗树下用拉丁语传教，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拒不相信繁复的证明和巧克力的效验，单单要求拿上帝的照片作为凭证。尼卡诺尔神甫给他带去各式圣牌圣像，甚至包括一件维罗妮卡手帕[④]的复制品，但何塞·

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这些通通视作缺乏科学依据的人工制品概不承认。面对他的冥顽不灵，尼卡诺尔神甫放弃了向他传福音的念头，但出于慈悲心怀仍旧每天来探望他。这时就轮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转守为攻，试图用他理性主义者的种种策略动摇神甫的信仰。有一回，尼卡诺尔神甫带上棋盘和棋子来到树下邀他下西洋跳棋，他没有答应，理由是既然都同意遵守规则，他无法理解两个对手如何还能争斗。尼卡诺尔神甫从未自这个角度思考，但此后再也没有摸过跳棋。他越来越惊叹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睿智，便问他怎么会被绑在树上。

“Hoc est simplicisimum,”他回答，“因为我疯了。”

从那以后，神甫担心自己的信念会动摇，就不再去探望他，全心投入教堂的建造以加快进程。丽贝卡重新燃起了希望。她的未来全系于教堂的竣工，因为有个星期天尼卡诺尔神甫来家里吃午饭时，全家人都在席间谈论教堂建成后举行的宗教仪式将是何等庄重堂皇。“最幸运的人是丽贝卡。”阿玛兰妲说。丽贝卡没有听懂她的意思，于是她带着天真的笑容解释：

“因为你的婚礼将是教堂落成后举行的第一个仪式。”

丽贝卡试图抢先作出评论。以现在的施工速度来看，教堂竣工起码要等十年。但尼卡诺尔神甫看法不同：鉴于信徒们捐赠日益慷慨，完全可以作出更乐观的估计。尽管丽贝卡暗暗生气，连饭都没有吃完，乌尔苏拉还是赞同阿玛兰妲的主意，并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以加速施工。尼卡诺尔神甫认为再有一笔相同数额的捐赠，教堂就能在三年内竣工。从此，丽贝卡不再和阿玛兰妲说话，确信她的用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单纯无辜。“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在当晚的激烈争吵中阿玛兰妲回答道，“这三年我都用不着杀你了。”丽贝卡接受了挑战。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得知婚礼再次推迟，失望之极，但丽贝卡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忠贞不渝。“等你准备好，咱们就私奔。”她对他说。然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并不是敢于冒险的人，他不像未婚妻那

样性情冲动，视对承诺的尊重为不容挥霍的资本。于是丽贝卡采取了更大胆的举措。一阵神秘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乌尔苏拉随即发现这对情侣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窘迫地向她解释说这要归咎于新式煤油灯的质量问题，甚至帮她在客厅里安上了更可靠的照明设施。但又一次不知是灯油出了问题还是灯芯被阻断，乌尔苏拉发现丽贝卡坐在未婚夫的腿上。她不再接受任何借口。她把面包房托付给印第安女人比西塔西翁打理，亲自坐到摇椅上监视情侣的相会，免得那些在自己的青春年代就已过时的花招得逞。“可怜的妈妈，”丽贝卡看着乌尔苏拉在一旁打着哈欠昏昏欲睡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到死也要在这把摇椅上受罪。”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天天去察看施工，在过了三个月受监视的爱情生活后终于厌烦了缓慢的工程进度，决定自己出钱给尼卡诺尔神甫补足完工所需的资金。阿玛兰妲并没有慌张。她每天和女友们在长廊里绣花或做编织活计，一边聊天一边酝酿新的计策。她自以为最有效的一招，即取走丽贝卡将嫁衣收入卧室衣柜之前就放好的樟脑丸，却因为估算失误落了空。她是在离教堂完工不到两个月时采取的行动，但随着婚期临近丽贝卡迫不及待地要试穿嫁衣，比阿玛兰妲预计的时间提前了许多。丽贝卡打开衣柜，依次取下包装纸和护衬布，发现从锦缎礼服、织绣纱巾直到橘花头冠都被蛾子蛀成了粉末。她确信当初在包装里放过两把樟脑丸，但这一悲剧似乎纯粹出于偶然，她不敢责怪到阿玛兰妲身上。离婚礼已不到一个月，安帕萝·摩斯科特竟慨然答允在一个星期内为她做出一身新嫁衣。那个阴雨绵绵的中午，当安帕萝抱着一堆泡沫般的织物走进家门让丽贝卡最后一次试衣时，阿玛兰妲几乎要昏厥过去。她瞬间失声，一道冷汗沿脊背下流。漫长的数月里，她一直在恐惧的战栗中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她深信，如果最终找不到阻挠丽贝卡婚礼的办法，到了一切手段用尽的最后时刻，她不会缺乏下毒的胆量。那天下午，安帕萝以无穷无尽的耐心在丽贝卡周身上下别了千万枚别针，丽贝卡则裹在那甲胄般的缎料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与此同时，阿玛兰妲多次乱了

针脚，扎了手指，但仍以可怕的冷静作出决定：日期定在婚礼前最后一个星期五，方式是在咖啡中加一剂鸦片酊。

不料一个更大的障碍突然出现，并且无法挽救，迫使婚礼再次无限期延迟。婚期前一个星期，小蕾梅黛丝半夜醒来，内脏打嗝般撕裂，火热的汁液爆涌浸透全身。三天后她被自己的血毒死，一对双胞胎也横死腹中。阿玛兰妲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曾切切祈求上帝，希望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免得自己向丽贝卡下毒，因此对蕾梅黛丝的死怀有负罪感。那并不是她日夜祈祷所期盼的障碍。蕾梅黛丝为这个家带来了欢快气息。她和丈夫在作坊旁收拾出一间小屋，用刚刚告别的童年时代的娃娃和玩具装饰一新。她欢快的活力溢出房间四壁，像生机盎然的和风吹过秋海棠长廊。她从清晨便开始唱歌。她是唯一敢在丽贝卡与阿玛兰妲争吵时从中斡旋的人。她担负起照顾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繁重任务。她为他送去食物，每日伺候他大小便，用肥皂和丝瓜瓤给他擦洗，为他除去头发胡须里的跳蚤和虱子，还让棕榈叶顶棚保持完好并在暴风雨天气用防水帆布加固。最后几个月，她已经能够用简单的拉丁语与他沟通。当奥雷里亚诺和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出生后被送到家里，并在家中举行仪式命名为奥雷里亚诺·何塞，蕾梅黛丝决定把他认作自己的长子。她这种母性本能令乌尔苏拉惊讶不已。就奥雷里亚诺而言，他在她这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他整日在作坊干活，蕾梅黛丝会在上午送去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夫妇俩每天晚上都去摩斯科特家。奥雷里亚诺和岳父一局接一局地玩多米诺骨牌，蕾梅黛丝则与姐姐们聊天，或和母亲商量大人的事情。与布恩迪亚家的联姻稳固了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在镇上的权威。他频繁前往省城，结果成功让政府在镇上建立一所学校，便交由继承了祖父教学热忱的阿尔卡蒂奥掌管。他说服了大多数人家将房子漆成蓝色以纪念国家独立日。应尼卡诺尔神甫之请，他将卡塔利诺的店铺迁往一条偏僻的街道，还关闭了镇中心多处生意兴隆却有伤风化的场所。他带回六名荷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时却没人想起当初镇上不准有武装

人员的协议。奥雷里亚诺对岳父的工作效率颇为欣赏。“你也会变得像他一样胖。”他的朋友们对他说。但长久端坐着干活，令他颧骨线条更明显，使他眼神更锐利，却没有增加他的体重，也不曾影响他的冷静性格，相反还加深了他唇间的笔直线条，那代表着孤独的沉思和无情的决断。他和妻子在双方家里都成功唤醒了深厚的亲情，因而当蕾梅黛丝宣告怀孕的时候，甚至连丽贝卡和阿玛兰妲都暂时休战，忙着编织蓝毛衣—如果生的是男孩；还有红毛衣—如果生的是女孩。几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最后想到的人也是她。

乌尔苏拉吩咐关闭门窗守丧，如非绝对必要不许任何人出入。她还要求一年之内不得高声说话，并将一张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摆在停放遗体守灵的地方，照片上斜系着一根黑色饰带，前面点起一盏长明灯。此后子孙们一直保持灯火不熄，他们面对着照片上这个身着百褶裙、脚踏白色小靴子、头系蝉翼纱蝴蝶结的小女孩却不免困惑，难以将其与曾祖母的标准像联系起来。阿玛兰妲担负起照顾奥雷里亚诺·何塞的职责。她当作儿子抚养的这个孩子，将会分担她的孤独，缓解她的内疚—由于她向上帝疯狂祈求，鸦片酊误落在蕾梅黛丝的咖啡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戴着系了黑纱的帽子轻手轻脚走进家门，与一袭黑衣长袖及手、心中仿佛暗暗淌血的丽贝卡默默相会。此时此刻连重议婚期的念头也会被视为大不敬，恋人关系就此永远停滞不前，沦为无人再去理会的倦怠爱情，仿佛昔日为了亲吻而熄灭灯火的情侣已被抛弃，屈从于死神的淫威。方向迷失，希望破灭，丽贝卡又开始吃土。

居丧多日后十字绣活动已经恢复，一天下午两点，酷热的死寂中突然有人推开大门。房柱震颤不已，长廊里刺绣的阿玛兰妲及其女友，卧室里吸吮手指的丽贝卡，厨房里的乌尔苏拉，作坊里的奥雷里亚诺，甚至栗树下孤零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感到房子在大地的震动中摇摇欲坠。来人是一个身材过人的大汉。他粗壮的胸背几乎挤不进门。他野牛似的脖子上挂着救难圣母像，双臂和胸前

覆满神秘的刺青，右手腕上紧紧缠着“十字架婴孩”[5]护符铜手链。他的身体经风吹日晒变成棕褐色，短发竖起好像骡子的鬃毛，下颌坚毅，眼神悲伤。他的腰带比马肚带宽两倍，靴子带护腿和马刺，靴跟钉了铁掌，走到哪里都给人以地震般的战栗感。他拎着几个破旧的褡裢穿过客厅和起居室，像一阵风暴般出现在秋海棠长廊，惊得阿玛兰妲和女友们一动不动，绣花针停在空中。“嗨。”他用疲倦的声音说道，随手将褡裢往缝纫桌上一丢，径直走向家中深处。“嗨。”他向丽贝卡打了个招呼，她看着他从自己卧室门前经过，吓得呆了。“嗨。”他对奥雷里亚诺说道，后者正在作坊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干活。他没在任何人身边停留，直接走向厨房，在那里才第一次停住脚步，结束了从世界另一端起程的旅行。“嗨。”他说。乌尔苏拉瞬间愣住，看着他的眼睛，随即发出一声惊呼，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得又哭又叫。他是何塞·阿尔卡蒂奥。他像离开时一样赤贫，乌尔苏拉还得给他两个比索付雇马的钱。他说的西班牙语掺杂着水手的黑话。家人问他都去了哪里，他回答：“那边。”他把吊床支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吃了十六个生鸡蛋，便直接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那超常的身材在女人当中引发了好奇和恐慌。他要求奏乐并请所有人喝甘蔗酒。他打赌说能同时和五个男人掰腕子。“这不可能。”那些人确信无法撼动他的手臂后，不禁发出感慨，“他有‘十字架婴孩’。”卡塔利诺不相信这类角力花样，押上十二比索赌他挪不动柜台。何塞·阿尔卡蒂奥将柜台从原地搬起，举过头顶，又放到大街上。结果出动了十一个男人才把它搬回去。在节庆般的狂热气氛中，他在柜台上展示了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阳物，上面红蓝两色纵横交错，覆满多种语言的刺青。那些女人饥渴地围在他身边，他问谁肯出最高价。最有钱的一个愿出二十比索。他又提议所有女人一起抽签，十比索一个签号。这是个夸张的价格，最红的姑娘一夜也不过挣八比索，然而所有女人都表示同意。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写

在十四张纸条上，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每人抽出一张。最后抽到只剩两张了，中奖者将在其中产生。

“每人再出五比索，”何塞·阿尔卡蒂奥建议，“我就让你们两个分享。”

他以此为生。他曾与一群无国籍的水手一起周游世界六十五次。当晚与他在卡塔利诺店里同床的女人将他赤身裸体带到舞厅，让大家观赏他从前额到后背、从脖颈到脚趾，通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皮肤没文刺青。他没能融入家庭。他白天睡觉，晚上就去烟花巷赌赛力气。难得几次乌尔苏拉把他拉到餐桌前，他表现得迷人又可亲，特别是当他讲述异国冒险的时候。他曾经遭遇海难，在日本海漂流了两个星期，以死于日晒病的同伴尸体为食，那一次次用海水腌制，又经阳光烤熟的肉质有种甜美的味道。在孟加拉湾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他们的船杀死了一条海龙，他们还在龙腹中发现了一名十字军战士的头盔、搭扣和武器。他在加勒比海见过维克多·休斯[6]的海盗幽灵船，船帆被死亡的阴风扯得七零八落，桅杆被海蠊蛀蚀，它再也找不到瓜德罗普岛的方向。乌尔苏拉坐在桌边哭个不停，仿佛在阅读一封封从未抵达的家书，阅读何塞·阿尔卡蒂奥讲述的英雄业绩和不幸际遇。“家里有这么多房间，我的儿子啊，”她抽泣道，“有那么多吃的都喂了猪！”但在内心深处，她无法把那个被吉卜赛人带走的男孩和这个吃午饭能吃掉半扇乳猪、放屁能令花儿枯萎的巨汉联系起来。其他家人的感觉也是如此。阿玛兰妲听到他在席间如野兽般打嗝，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尔卡蒂奥从未得悉自己的身世秘密，对他刻意博取好感的问长问短，几乎不加理睬。奥雷里亚诺试图重温两人共宿一室的旧日时光，重拾少年时代的默契，但何塞·阿尔卡蒂奥都已忘却，因为海上生涯里有太多事情塞满了记忆。只有丽贝卡一见面就被他征服。那天下午看见他从自己卧室门前经过，她就觉得比起这个呼气好像火山爆发、全家都为之震颤的阳刚化身，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不过是个好赶时髦的文弱小子。她寻找一切借口接近他。有一次，何塞·

阿尔卡蒂奥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她，对她说：“你很有女人味，小妹妹。”丽贝卡失去了自制力，又开始以往日的狂热吃泥土和墙皮，饥渴地吸吮手指，拇指上甚至都结出了茧子。她呕出混杂有死水蛭的绿色液体。她夜夜不眠，烧热得颤抖，在谵妄中挣扎，直等到凌晨时分整栋房子因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归来而震颤。一天下午全家人都在午睡，她再也无法忍受，去了他的房间。她发现他穿着短裤，醒着躺在用缆绳绑在柱子上的吊床里。她盯着那花饰繁复的巨大身躯大感震惊，不禁想要退回去。“对不起，”她辩解道，“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惊醒旁人。“到这儿来。”他说。丽贝卡照做了。她站在吊床前，流出冷汗，感到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一起，而阿尔卡蒂奥用指肚抚摸她的脚踝，然后是小腿肚，然后是大腿，嘴里喃喃地说：“小妹妹，啊，小妹妹。”一股强似龙卷风却又惊人精准的力量将她拦腰举起，三两下扯去内衣，像撕裂一只小鸟一般，她得努力支撑着才不至于死在当场。她感谢上帝让自己拥有生命，随即失去神志，沉浸在由无法承受的痛苦生出的不可思议的快感中，扑腾挣扎于吊床这热气腾腾的泥沼间，喷出的血液被泥沼像吸墨纸一般吸收了。

三天后，他们在五点钟的弥撒上结为夫妇。何塞·阿尔卡蒂奥前一天去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商店，看见他正在给学生上古弦琴课，但并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回避学生。“我要和丽贝卡结婚了。”他说。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顿时脸色煞白，把琴交给学生，宣布课程结束。等到堆满乐器和上弦玩具的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说：

“她是您的妹妹。”

“我无所谓。”何塞·阿尔卡蒂奥回答。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用散发出薰衣草气味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这违背天理，”他解释道，“另外，法律也不允许。”

何塞·阿尔卡蒂奥失去了耐性，倒不是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所讲的道理，而是他那副苍白的脸色更让人恼火。

“去他的天理，”他说，“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不要再费心去问丽贝卡什么。”

但当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眼眶湿润，他粗暴的态度软了下来。

“好吧，”他换了一副腔调，“如果您真喜欢我们家，那还有阿玛兰妲呢。”

尼卡诺尔神甫在星期天的讲道中申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不是兄妹。乌尔苏拉视此事为不可想象的失礼，永远不肯原谅。当他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禁止这对新人再迈进家门。对她来说，他们就等于死了一样。因此他们到公墓对面租了一间小屋，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吊床。新婚之夜一只蝎子钻进拖鞋蜇了丽贝卡的脚，她的舌头为此都麻痹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度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蜜月。邻居们因惊醒整个街区的叫声而恐慌—每夜八次，连午睡时段也有三次—祈祷那种肆无忌惮的激情不要侵扰死人的安眠。

奥雷里亚诺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他给他们买了一些家具，并送钱过去，直到何塞·阿尔卡蒂奥恢复常态，开始耕种与家中院子相邻的无主土地。阿玛兰妲却永远无法摆脱对丽贝卡的怨恨，尽管生活为她带来了超出梦想的满足：乌尔苏拉不知如何洗刷耻辱，她主动提出让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每个星期二仍来家中共进午餐，后者平和而不失尊严地战胜了挫折。出于对这一家人的尊敬，他在帽子上仍然系着黑纱，并很乐意亲近乌尔苏拉，为她带来异国礼物：葡萄牙沙丁鱼，土耳其玫瑰果酱，还有一次是一条精美的马尼拉大披巾。阿玛兰妲总是亲切殷勤地款待他。她揣测他的喜好，为他扯掉衬衫袖口的脱线，在他过生日时送上一打绣着他姓名缩写的手帕。每个星期二吃过午饭，她在长廊里绣花，他陪伴一旁，其乐融融。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而言，这个他一向当小女孩对待的姑娘不啻全新的发现。她虽然外

表缺乏魅力，却拥有罕见的感受力，能体会世间万物的美好，还蕴含一种不为人知的柔情。一个星期二，发生了众人意料中早晚会发生的事：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等耳边火热的红潮退去才开口，镇静的声音显出老成持重。

“当然可以，克雷斯皮，”她回答，“但要等了解更深的时候。太着急总是不好。”

乌尔苏拉困惑不已。尽管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抱有好感，她仍然无法确定他经历了与丽贝卡风波重重的漫长恋爱后作出这一决定，从道德角度来看究竟是好是坏。其他人没有这样的顾虑，最后她只好将此事当作无从判断的事实接受下来。奥雷里亚诺是家中的主心骨，他的意见神秘难解却又不容置疑，更为乌尔苏拉平添一重困惑。

“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乌尔苏拉几个月后才明白，但那已是奥雷里亚诺当时所能给出的最坦诚的意见，不光涉及婚嫁，也适用于战争以外的所有事项。他自己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仍将无法理解一系列微妙又无可抗拒的偶然事件是如何将他引向那个结论的。蕾梅黛丝的死并未引起他所担心的震惊，而更像是一种沉郁的愤怒，渐渐转化为寂寞消极的挫败感，与当初他认命选择独身时的感受相仿。他重新沉浸到工作中，但保留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那个因守丧而陷于沉寂的家里，晚间的交谈加深了两个男人的友谊。“再结婚吧，奥雷里托[⑦]，”岳父对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选。”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频繁出行，有一次归来后为国家的政局忧心忡忡。自由派已决意开战。奥雷里亚诺那时还完全不明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区别，岳父为他作了简要介绍。自由派，他说道，都是些共济会分子，心术不正，主张绞死教士，实行世俗婚姻并允许离婚，承认私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试图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当局的权力。而保守派不同，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天赋权柄，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家庭道德为己任；他们是基督信仰和当局权威的捍卫者，决不

允许国家分裂搞自治。出于人道方面的情感，奥雷里亚诺对自由派关于私生子的主张颇有好感，但他难以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竟会闹到发动战争的地步。在他看来，岳父为了选举请求调来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由一名士官率领进驻这个没有丝毫政治热情的小镇，实在有些小题大做。士兵不仅进驻了镇子，还挨家挨户收缴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才给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分发写有保守派候选人名字的蓝色选票和写有自由派候选人名字的红色选票。选举前夜，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亲自宣读了一份公告：从星期六午夜开始四十八小时内禁止贩卖酒精饮料，禁止非同一家庭的三人以上聚会。选举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星期天早上八点广场上安放了一个木箱，由六个士兵看守。投票完全自由，这一点奥雷里亚诺可以作证，他几乎一整天都和岳父一起监督，确保每人只投一次。下午四点，广场上响起一阵军鼓声宣告投票结束，堂阿波利纳尔用带有自己签名的标签封住票箱。当晚，他和奥雷里亚诺玩多米诺骨牌时，命令士官打开票箱计票。红色选票与蓝色选票的数目不相上下，但士官只留下十张红色选票，其余用蓝色选票补足。然后他们用新标签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送去省城。“自由派一定会开战。”奥雷里亚诺说。堂阿波利纳尔没将视线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上移开。“如果你是指换票的事，那他们不会。”他说，“已经留下一些红的，免得他们有意见。”奥雷里亚诺明白了反对派的不利地位。“如果我是自由派，我就要为选票的事开战。”岳父从眼镜上方瞟了他一眼。

“哈，奥雷里托，”他说，“如果你是自由派，就算你是我女婿也看不着换票的事。”

真正在镇上激起民愤的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士兵们没有归还查收的武器。一群妇女找到奥雷里亚诺，请求他向岳父要回那些菜刀。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非常含蓄地向他解释，士兵们已经把查没的武器运走，作为自由派准备开战的证据。奥雷里亚诺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但有天晚上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跟其

他朋友谈论菜刀事件，他们问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没有犹豫。

“如果一定要当什么，我当自由派，”他答道，“因为保守派净是些骗子。”

第二天，应朋友之请，他去拜访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求治并不存在的肝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几年前来到马孔多，带着一药箱无味的药丸和一块无法令人信服的行医招牌：“一钉入，一钉出。”[8]其实那只是伪装。那副平庸医生的无辜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恐怖分子，借着及膝的高筒靴遮住相伴五年的脚镣在踝部留下的疤痕。他是在参加联邦派的第一次起事时被捕的，后乔装改扮逃往库拉索，被迫披上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憎恶的衣服—教士袍。漫长的逃亡岁月过去，从加勒比海各地来到库拉索的流亡者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大受鼓舞登上走私贩的帆船，随身带着一瓶瓶纯由白糖制成的药丸和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随即失望得痛哭起来。联邦派的激情在流亡者口中被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其实早已沦为对选举的渺茫幻想。怀着受挫的苦涩，以及寻找一处安稳地方养老的渴望，这位冒牌的顺势疗法医生逃到了马孔多。他在广场一侧租下间小屋，在这摆满空药瓶的斗室里过了几年，生计全仰仗那些已经试遍所有医药，最后只靠糖丸聊作安慰的病人。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有名无实的统治期间，他那煽动者的天性一直无用武之地。追忆往昔，与哮喘作斗争，他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选的临近使他重新找到了起事的机会。他与镇上缺乏政治素养的年轻人建立联系，暗暗展开教唆工作。票箱中出现大量红色选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归因于年轻人的追新猎奇，但其实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强迫自己的门徒投票，好让他们认清选举不过是一场骗人的闹剧。“唯一有效的，”他说，“就是暴力。”奥雷里亚诺的大多数朋友都为铲除保守秩序的念头所鼓舞，但没人敢拉他下水，这不仅因为他与里正的关系，也和他孤僻遁世的性

格有关。另外众所周知，他在岳父的授意下投了蓝色选票。因此他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纯属偶然，为不存在的病痛去求诊更是完全出于一时的好奇心。猪圈般的陋室里蛛网横斜，樟脑味扑鼻，他见到的是一个浑身灰尘颇似蜥蜴的人，喘息间肺里呼啸作响。医生一言不发，先把他领到窗前，检查下眼睑。“不是这里。”奥雷里亚诺按照人家事先所教的说道。他用指尖按住肝部，加了一句：“是这里疼得让我睡不着觉。”于是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推说阳光太强，关上了窗，随即向他简洁地解说为什么刺杀保守派是一种爱国行为。连续几天奥雷里亚诺都在衬衣兜里揣着小药瓶，每两个小时取出一次，倒出三粒药丸在手上，然后放进嘴里慢慢含服。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嘲笑他竟信任顺势疗法，但那些知情人都把他当成又一个加入的同伴。几乎所有建村元老的儿子都参与其中，但没人知晓他们所酝酿的行动的具体内容。然而有一天医生向奥雷里亚诺吐露了秘密，他终于弄清了密谋的详情。虽然当时他确信铲除保守党政权刻不容缓，但这一计划仍令他不寒而栗。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是个信奉个人暗杀的狂热分子，他的方案可归纳如下：将一系列个人行动汇成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总攻，铲除当局官员及其亲属，特别是孩子，以达到将保守主义斩草除根的目的。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自然全在目标之列。

“您不是什么自由派，您什么派也不是，”奥雷里亚诺波澜不惊地对他说道，“您就是一个屠夫。”

“这样的话，”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把药瓶还给我。你不再需要了。”

六个月后，奥雷里亚诺才得知医生当时曾宣布他已无可救药，说他性格被动、生性孤僻，是个感情用事、没有前途的家伙。他们担心他会泄密，试图困住他。奥雷里亚诺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他不会说出一个字，但在刺杀摩斯科特一家的晚上，他们将会看见他守在门口。他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决心，那计划只得无限期推延。就在这段日子

里，乌尔苏拉询问他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和阿玛兰妲成亲的意见，他于是回答说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从一个星期前开始，他就在衬衣下藏着一把老式手枪，并监视着自己的朋友们。每天下午他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喝咖啡—他们的家开始有些样子了—从七点起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午饭时他会与阿尔卡蒂奥聊天，后者已经长成一个身材魁伟的少年，因战争的迫近越来越兴奋。在学校里，比阿尔卡蒂奥还要年长的学生跟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混在一起，自由派的激情在那里传播开来。他们谈论着枪毙尼卡诺尔神甫，将教堂改成学校，实现自由恋爱。奥雷里亚诺试图抑制他的狂热，劝他要小心谨慎。阿尔卡蒂奥听不进他冷静的说理和对现实的客观估计，当众斥责他性格软弱。奥雷里亚诺等待着。终于，在十二月初，乌尔苏拉惊慌失措地冲进作坊。

“开战了！”

实际上，战争三个月前就开始了。整个国家都进入戒严状态。唯一及时获悉情况的人是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但他连自己妻子都没告诉，直到一支小部队突然赶到控制了镇子。他们用骡子拖着两门轻型炮，在拂晓前悄无声息地入驻，把军营扎在学校。下午六点开始实施戒严。这次搜查比前次更加严格，挨家挨户连农具也没收了。他们把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拖出来，绑在广场上的一棵树上，未经审判就地枪毙。尼卡诺尔神甫试图凭借腾空的神迹令军方折服，结果一个士兵用枪托给了他一下，打破了他的脑袋。自由派的群情汹涌在无声的恐惧中沉寂。奥雷里亚诺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继续和岳父玩牌戏。他明白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尽管还拥有镇上军政首领的头衔，实际上又一次沦为傀儡。所有决策都由一位上尉作出，他的部队每天都要征收一笔特殊的治安税。在他的命令下，四个士兵把一个被疯狗咬过的女人从家中强拖出来，当街用枪托活活打死。军事占领两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走进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家，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要了杯不加糖的咖啡。只剩下他们两人在厨房里时，

奥雷里亚诺的声音里平添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权威。“叫小伙子们准备好，”他说，“我们要开战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无法相信。

“用什么武器呢？”他问。

“用他们的。”奥雷里亚诺回答。

星期二午夜，在一次近乎疯狂的行动中，二十一个不到三十岁、用餐刀和尖铁棍武装起来的男子由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率领，奇袭军营，缴获武器，并在院中将上尉和四个杀害那女人的凶手枪毙。

当夜，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阿尔卡蒂奥被任命为镇上的军政首领。那些已成家的起义者甚至没有时间与妻子告别，只能任由她们从此自生自灭。黎明时，在摆脱了恐惧的镇民的欢呼声中，他们出发去投奔革命军将领维多利奥·梅迪纳，据最新消息说他的队伍正在马纳乌雷一带活动。出发前，奥雷里亚诺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衣柜里请了出来。“您不用紧张，岳父，”他说，“新政府会保证您本人和您家人的安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很难将眼前脚踏高筒靴、肩挎步枪的阴谋家与晚上和他玩多米诺骨牌到九点的那个人联系起来。

“这真荒唐，奥雷里托！”他喊道。

“一点儿也不荒唐，”奥雷里亚诺回答，“这是战争。另外请不要再叫我奥雷里托，我现在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

①拉丁语：“简单之极”。

②拉丁语：“此人洞悉物质之第四态耳”。

③拉丁语：“非也，此乃上帝存在之明证无疑”。

④维罗妮卡（Ver ó nica）为公元 1 世纪的一名犹太妇女，据传她在耶稣受难路上曾为其擦去脸上的血污，后手帕上即留下耶稣圣容。

⑤“十字架婴孩”（niños-en-cruz），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护身符，未必与圣婴（el Niño）有关，据说贴身携带并以自身鲜血饲喂后

能令主人力大无穷，刀枪不入。

⑥维克多 • 休斯（Víctor Hugues），古巴作家阿莱霍 • 卡彭铁尔的小说《光明世纪》中的人物。

⑦“奥雷里托”（Aurelito），“奥雷里亚诺”（Aureliano）的昵称。

⑧顺势疗法中“以毒攻毒”的原则。

六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无一成功。他与十七个女人生下十七个儿子，一夜之间都被逐个除掉，其中最年长的不到三十五岁。他逃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他有一次被人在咖啡里投毒，投入的马钱子碱足够毒死一匹马，但他仍大难不死。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勋章。他官至革命军总司令，从南到北、自西至东都在他的统辖之下，他也成为最令政府恐惧的人物，但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拍照。他放弃了战后的退休金，到晚年一直靠在马孔多的作坊中制作小金鱼维持生计。他一向身先士卒，却只受过一次伤，那是他在签署尼兰迪亚协定为长达近二十年的内战画上句号后自戕的结果。他用手枪朝胸部开了一枪，子弹从背部穿出却没有损及任何要害部位。经过这一切，留下来的只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孔多街道。然而据他寿终正寝前几年的自述，那天清晨他带着二十一个人投奔维多利奥·梅迪纳将军的时候，甚至连这事也没期望过。

“我们就把马孔多交给你了。”这便是他临行前对阿尔卡蒂奥的全部嘱托，“我们好好地交给你，你争取让它变得更好吧。”

阿尔卡蒂奥对这一托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从梅尔基亚德斯一本书的插图获得灵感，发明了一套带饰带和元帅肩章的制服穿上，腰间还挎着那位被处决的上尉的金穗马刀。他将两门火炮设在镇子入口，让他昔日的学生统一着装，他们听了他的演讲群情激奋，全副武装四处巡逻，给外人以坚不可摧的印象。这一策略有利有弊，政府的确在十个月内都没敢进攻，可一旦行动就派出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半个小时内消灭了抵抗。从掌权的第一天起，阿尔卡蒂奥便显露出发号施令的嗜好。他有时一天颁布四份公告，想到什么立即宣布实施。他

推行针对十八岁以上男子的义务兵役制，将下午六点以后还在街上行走的牲畜都征作公用，还强迫成年男子佩戴红袖章。他将尼卡诺尔神甫幽禁在神甫寓所，并以枪决相威胁，禁止他主持弥撒或敲钟，除非是庆祝自由派的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不容置疑，他下令让一支行刑队在广场上练习射击稻草人。起初没人当真。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些还上学的孩子在扮大人。然而一天晚上，阿尔卡蒂奥走进卡塔利诺的店里，乐队的小号手吹出夸张的调子跟他打招呼，引得客人笑声连连，他当即以藐视当局的罪名下令将小号手枪决。凡是抗议的人，一律关进他在学校设立的一间牢房，戴上脚镣，只给面包和水。“你是个杀人犯！”乌尔苏拉每次听到他任意妄为的消息都会向他大吼，“等奥雷里亚诺知道了，会把你给毙了，我第一个去放鞭炮。”但这些都无济于事。阿尔卡蒂奥继续强化他那毫无必要的铁腕手段，成为马孔多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统治者。“现在尝到不同滋味了吧，”一次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么评论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天堂。”话传到了阿尔卡蒂奥那里。他领着巡逻队闯进屋门，砸烂家具，殴打女眷，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拖走了。乌尔苏拉一边满心羞耻地哀号，一边挥舞着涂过柏油的马鞭，穿过镇子冲进军营的院中，这时阿尔卡蒂奥已准备就绪，正要下令执行枪决。

“我看你敢，杂种！”乌尔苏拉喊道。

阿尔卡蒂奥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第一记鞭子就抽了过去。“我看你敢，杀人犯！”她喊道，“婊子养的，你把我也杀了算了，省得我丢人，养了你这么一个怪物。”她毫不留情地鞭打，一直把他逼到院子深处，像蜗牛似的缩成一团。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被绑在柱子上，昏迷不醒，原先立在同一位置的稻草人经受演习的弹雨早已支离破碎。行刑队的小伙子们四散奔逃，害怕乌尔苏拉拿他们出气，但她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她任凭身上制服破烂的阿尔卡蒂奥在一旁又疼又怒地吼叫，解开绳索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带回了家。离开军营前，她还释放了那些囚犯。

从那时起镇上的事便由她做主。她恢复星期天的弥撒，停用红袖章，废除那些轻率无理的条令。她固然性格坚强，仍不禁为自己的不幸命运哀恸。她感觉如此孤单，只好到被人遗忘在栗树下的丈夫那里徒劳地寻求陪伴。“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她向他倾诉着，头上的棕榈叶顶棚在六月的雨水中摇摇欲坠，“你看看家里都空了，孩子们四散在外，又只剩下咱们两个，跟当初一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深陷于无意识的深渊，对她的哀怨无动于衷。刚发疯那会儿，他还能用半吊子的拉丁语急切地表达日常需要。在偶尔恢复理智的短暂时刻，阿玛兰妲送来食物时，他还会诉说最令他烦扰的痛苦，顺从地让她拔火罐和敷芥子泥。但当乌尔苏拉来他身边诉苦时，他已经完全脱离现实。她给坐在小木凳上的他一点一点擦身，同时把家里的近况讲给他听。“奥雷里亚诺去打仗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她一面说，一面用蘸了肥皂的丝瓜瓤给他擦背，“何塞·阿尔卡蒂奥回来了，变成比你还高的大个儿，浑身都是刺青，但他回来就给这个家丢脸。”她随即发觉，听了这些坏消息丈夫似乎很难过，于是决定说谎。“别信我跟你说的话，”她说着往丈夫的便溺上撒灰土以便铲走，“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结婚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现在挺幸福。”谎言说得越来越真诚，最后连她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安慰。“阿尔卡蒂奥已经是个稳稳当当的大人了，”她说，“而且非常勇敢，穿上制服挎上马刀可精神了。”这好像在跟一个死人说话，因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会再为任何事操心。但她仍旧说个没停。在她眼里，他是那么温顺那么超然，就决定给他松开绳索。可他甚至都没离开小木凳一步，任凭日晒雨淋一如往昔，仿佛那些绳索毫无必要，实际上是某种比任何有形捆绑更加强大的束缚将他禁锢在栗树树干上。将近八月，漫长的冬天初始，乌尔苏拉终于可以告诉他一个近乎事实的消息。

“你瞧，好运还没离开我们，”她说，“阿玛兰妲和摆弄自动钢琴的意大利人要结婚了。”

阿玛兰妲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得到了乌尔苏拉的信任，友情日深，这一回她认为没有必要再监视他们的见面。这是一段暮色恋情。意大利人每天傍晚登门，扣眼里别着一枝栀子花，把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译给阿玛兰妲听。他们待在弥漫着牛至和玫瑰香气的长廊里，他朗读，而她编织袖口花边，对战争中的种种动乱和噩耗都毫不关心，直到不堪蚊子的烦扰才躲进客厅。阿玛兰妲的善解人意，以及不失分寸又包容一切的温柔，织起一幅无形的网罗把男友围在其中，他不得不用自己未戴戒指的苍白手指生生拨开，才能在八点时告辞离去。他们用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收到的意大利明信片做成一本精美的图册，里面的图画都是幽静园林中的恋人，配以中箭的红心和鸽子衔起的金色缎带。“我知道佛罗伦萨的这个公园，”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边浏览明信片边说，“你一伸手，鸽子就落下来吃食。”有时看着一幅威尼斯的水彩画，思乡之情使运河中污泥和腐败水产的气味升华成了花朵的幽香。阿玛兰妲一时叹息，一时欢笑，幻想着第二故乡，在那里容貌俊美的男男女女说着孩童的语言，古老的城市昔日荣光不再，只剩下出没于瓦砾间的猫儿。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曾经穿过大洋上下寻索，曾经在丽贝卡冲动的纠缠中错生激情，最终找到了真爱。爱情的幸福带来了生意的兴隆。他的商店那时几乎占据了整个街区，堪称幻想的温床，里面有能以钟琴报时的佛罗伦萨钟楼仿制品，有索伦托的八音盒，有一开盖便奏起五音曲的中国香粉盒，以及一切所能想象的乐器和一切所能构想的上弦装置。他的弟弟布鲁诺·克雷斯皮负责商店的业务，因为他自己单单照管音乐学校就忙不过来。多亏了他那五光十色的玩物博览，土耳其人大街变成了一方和谐的绿洲，令人淡忘了阿尔卡蒂奥的种种专横和遥远的战争梦魇。乌尔苏拉恢复星期天弥撒的时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捐赠给教堂一架德国簧风琴，组织了一个儿童唱诗班，教他们唱格列高利圣诗，为尼卡诺尔神甫沉郁的仪式平添了几许亮丽色彩。没有人怀疑阿玛兰妲会是一位幸福的妻子。他们不刻意推进恋情，任凭心中的感情自然发展，最后只差定下婚

期。他们没遇到什么阻碍。乌尔苏拉为当初反复推迟丽贝卡的婚期这一失误暗中自责不已，不愿重蹈覆辙增添懊悔。战争的戕害，奥雷里亚诺的远走，阿尔卡蒂奥的暴行，以及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的被逐，都令为蕾梅黛丝的服丧退居其次，不再那么严格。婚期在望，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暗示将收养奥雷里亚诺·何塞为长子，他一直待他以父亲般的亲切。一切都预示着阿玛兰妲将一帆风顺地走向幸福。然而与丽贝卡相反，她丝毫不显急切。一如染桌布、织绦带、绣孔雀那样，她耐心等待着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内心的煎熬屈服。她盼望的时刻与十月不祥的阴雨一同到来。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拿过她膝上的绣筐，双手紧握她的手。“我不能再等了，”他对她说，“我们下个月就结婚。”阿玛兰妲触碰到他冰冷的双手时没有颤抖。她像只抓不住的小动物似的缩回手去，继续自己的活计。

“别天真了，克雷斯皮，”她微笑着，“我死也不会和你结婚的。”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瞬时崩溃，他不顾羞耻地哭泣，绝望得几乎扭断手指，但无法令她改变主意。“别浪费时间了，”这便是阿玛兰妲的全部回应，“如果你真那么爱我，就请不要再进这个家。”乌尔苏拉觉得自己羞愧得要发疯。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百般哀求，卑躬屈膝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在乌尔苏拉的怀里哭了一个下午，而她恨不得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对他的安慰。雨夜里常可见到他的身影，擎着一把绸伞在屋子附近游荡，期望看到阿玛兰妲卧室里的一点儿灯光。他的衣着打扮从未像那段时间那样考究。他那受难君王一般的庄严头颅，显出一种奇异的伟大风姿。他去哀求阿玛兰妲的女友，就是那些和她一同在长廊里刺绣的女郎，请她们从中说项。他抛下生意，整日待在店后写下狂热的短笺，连同花朵薄瓣与蝴蝶标本寄给阿玛兰妲，又都被她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关在屋里无休无止地弹古弦琴。一天晚上，他唱了起来。马孔多在睡梦中惊醒，心神俱醉，那琴声不似这个世界所有，那饱含爱意的歌声也不会再现人间。一时间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看见镇上所有的灯火都亮了，唯独阿玛兰妲的窗前依旧黑暗。十一月二日，亡灵节，他弟弟打开店门，发现所有的灯都亮着，所有的八音盒都在奏乐，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一个永恒的时刻。在这纷乱的合奏中，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伏在店后的写字台上，双腕用剃刀割破，双手浸没在一盆安息香水里。

乌尔苏拉决定在家中为他守灵。尼卡诺尔神甫反对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同意将他葬在公墓里。乌尔苏拉顶撞了他。“尽管您和我都理解不了，但这个男人是一位圣徒，”她说，“所以我要违背您的意思，把他安葬，就葬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墓旁边。”她得到了整个镇子的支持，葬礼极其隆重。阿玛兰妲没有离开卧室，她在床上听见乌尔苏拉的哭声，涌进家中的人群的脚步声和低语声，然后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带有被践踏花朵的气味。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她依然会闻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身上的薰衣草余香，但她还能克制住不至于陷入谵妄。乌尔苏拉抛弃了她。那天下午当阿玛兰妲走进厨房，把手伸到炉子的炭火中，她甚至没有抬头表示同情。阿玛兰妲在剧痛中失去了痛感，只闻到自己皮肉烧灼的焦味。这是治疗悔恨的一剂猛药。很多天来，她在家里的时候都把手浸在一个盛着蛋清的碗里。当烧伤痊愈时，那些蛋清似乎也使她心中的创伤愈合。这场悲剧为她留下的唯一外在痕迹便是裹在伤手上的黑纱，她到死也没摘下。

阿尔卡蒂奥显出少见的慷慨，下令全镇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守丧。乌尔苏拉将此视为羔羊迷途知返。但她错了。她已经失去阿尔卡蒂奥，不是从他穿上制服的时候，而是从一开始。她自认为把他当儿子养育成人，就像抚育丽贝卡那样，既无优待也无歧视。然而，当阿尔卡蒂奥还是个孤独的孩子时，时常担惊受怕，他经历了失眠症的肆虐，见证了乌尔苏拉的实干热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疯癫，奥雷里亚诺的高深莫测，以及阿玛兰妲和丽贝卡之间的殊死对抗。奥雷里亚诺教他读写，但同时总想着别的事，仿佛一个陌生人。奥雷里亚诺的衣服小了，就送给他，让比西塔西翁裁改。阿尔卡蒂奥

为着过大的鞋子、改小的裤子，以及自己女人般的臀部而深深苦恼。他从来没有像与比西塔西翁和卡塔乌雷用他们的语言交谈那样，与其他人自由地交流过。实际上梅尔基亚德斯是唯一关心他的人，给他念那些难以理解的手稿，教他银版照相技术。没有人想到他暗地里如何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死哀哭，又以怎样的疯狂徒劳地钻研他留下的手稿，试图使他重返人间。学校里获得的关注和尊敬，掌权后的发号施令和荣耀四射的制服，使他从苦涩过往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一天晚上在卡塔利诺的店里，有人放胆说了他一句：“你不配姓这个姓。”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并没有下令将那人枪决。

“我很荣幸，”他说，“我不是布恩迪亚家的人。”

了解他身世秘密的人从这句反驳推想他自己也已知情，其实他一直蒙在鼓里。庇拉尔·特尔内拉，他的母亲，曾经在照相暗室里令他热血沸腾，对他而言，她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就像对当初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和随后的奥雷里亚诺一样。尽管她已失去迷人的风采和笑声的魅力，他仍然循着她的烟味四处寻找她，找到她。开战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她比平时晚了些来学校接她的小儿子，阿尔卡蒂奥就在他用来午休、后来增设了锁镣的房间里等她。孩子在院中玩耍，他则躺在吊床上等待，焦渴得浑身颤抖，他知道庇拉尔·特尔内拉一定会从这里经过。她来了。阿尔卡蒂奥抓住她的手腕，想把她拉到吊床上。“我不能，不能，”庇拉尔·特尔内拉惊恐地说，“你不知道我多想让你高兴，但是老天在上，我不能这样。”阿尔卡蒂奥以家传的超凡力气揽住她的腰，肌肤相触让他感觉世界在融化。“别装圣女了，”他说，“说到底，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婊子。”可悲的命运令庇拉尔一阵恶心，她只得强行忍住。

“孩子们会知道的，”她低声说，“最好是你今晚别闩门。”

当天夜晚，阿尔卡蒂奥躺在吊床上等待，狂热得发抖。他没有睡觉，凌晨听着蟋蟀无休无止的纷乱鸣叫和石鸽准确无误的报时，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骗。正当焦虑变为怒气的时候，门突然开了。几个月

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将会回想起此时发生的一切：教室里迷离的脚步声，板凳的磕绊声，最后是黑暗中的躯体以及另一颗心脏的搏动引起的空气悸动。他伸出手，碰到了另一只即将在黑暗中沉溺的手，摸到有两枚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他感觉到她手上的筋脉、她厄运的搏动，感觉到她湿润的手掌上生命线在拇指根部被死亡的魔爪掐断。他知道这不是他等待的女人，因为她散发出的不是烟味，而是发蜡的芳香气味，而且她双乳鼓胀，乳头如男人的一样，阴部坚实浑圆像榛子，并且她的兴奋显出生涩，她的温存不无慌乱。她是处女之身，名字居然叫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①]。庇拉尔·特尔内拉付了她五十比索，毕生积蓄的一半，让她来做如今她正在做的事。阿尔卡蒂奥多次看见她在父母开的日用品小店里看店，但从未留意过，因为她拥有一种罕见的美德，只在适当的时机现身，平时都无人察觉。但从那天起，她便缠上了他，就像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她每到午休时间就来学校—她父母收了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另一半积蓄，也不加阻拦。晚些时候，政府军将他们赶出了学校，两人便在店后的黄油罐头与玉米袋中间恩爱。到阿尔卡蒂奥被任命为军政首领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亲戚中只有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知情，那时候他们与阿尔卡蒂奥的亲密关系与其说是出于亲情，倒不如说是源于同谋间的戚戚。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然低头负起婚姻的重轭。丽贝卡凭着不屈的性格、贪婪的情欲和执著的野心，吸纳了丈夫超常的精力，使他从一个游手好闲、寻花问柳的男人变成一头干活的巨大牲口。他们的家清洁整齐。每天清晨丽贝卡都打开门窗，墓地的风从窗子进自院门出，裹挟着尸骨析出的硝石，在家中的墙壁和家具上都覆了一层泛白的粉末。想吃泥土的饥渴，父母骨殖的咯啦咯啦响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优柔寡断激起的厌烦心绪，这些都被抛在了记忆的角落。她不受战乱的影响，从早到晚都在窗边刺绣，等到陶瓷的锅碗瓢盆开始在碗橱里颤抖就起身热饭。过了很久才会出现那几只邋遢的猎犬，然后是

脚踏带马刺的高筒靴，肩挎双铳猎枪的巨人，他有时会带回一头鹿，更多的时候是一串兔子或野鸭。一天下午，上任不久的阿尔卡蒂奥突然登门。自从离家后，他们再没见过他，但他表现得那样亲热，他们便邀他共享野味。

直到喝咖啡的时候，阿尔卡蒂奥才说明来意：他收到一份针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起诉。起诉人说他开始时在自家院子里耕地，后来扩展到四周相邻的土地，赶着牛推倒篱笆掀翻棚屋，甚至强行占据了周边最好的田地。有些农民的土地他不感兴趣没有霸占，但却向他们强行征租，每个星期六扛着猎枪带着猎犬前去收取。他对此并不否认。他的理由是抢占的这些土地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建村时分掉的，而他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的父亲从那时起就失去了理智，因为他处理的实际上是自家的财产。这一申辩其实毫无必要，阿尔卡蒂奥并非来此主持公道。他仅仅是来建议设立一个财产登记处，使何塞·阿尔卡蒂奥能合法拥有抢占的土地，条件是后者委托当地政府来行使征租的权利。他们达成了协议。数年以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审核地契时，发现从院落所在的小丘直到视野尽头所有的土地，包括公墓在内，都在他哥哥名下，而阿尔卡蒂奥在任职的十一个月内不仅收取地租，还向丧家索要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土地上下葬亲人的费用。

乌尔苏拉几个月后才知道这个已经众所周知的消息，因为人们不愿增添她的痛苦，有意隐瞒。她一开始就有些怀疑。“阿尔卡蒂奥在盖房子。”她装出自豪的样子告诉丈夫，同时试着往他嘴里灌进一勺加拉巴木糖浆。但她随即下意识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晚些时候她得知阿尔卡蒂奥不仅盖好了房子，还订购了一套维也纳家具，由此怀疑得到证实：他果然在滥用公款。一个星期天，弥撒结束后她看见他正在新家和手下玩牌，就朝他喊道：“你是我们家的败类！”阿尔卡蒂奥没有理睬她。直到那时，乌尔苏拉才知道他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而和他未婚同居的桑塔索菲

亚·德拉·彼达又怀孕了。她决定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信，不管他在哪里，告诉他这里的情形。然而那段日子里接连发生的事件使她没能实现想法，甚至让她后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战争，从那时起不再是遥远模糊的字眼，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严峻的现实。二月末的时候，马孔多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老妇人，骑着一头驮着扫帚的驴子。她一副人畜无伤的样子，巡逻队未加盘问就放了进来，把她当成了从大泽区那些村庄常来的小贩中的一个。她径直来到军营，阿尔卡蒂奥在曾经的教室、如今的后方基地接待了她。四围的吊床或卷起或系在铁环上，角落里堆着棕席，步枪、卡宾枪和猎枪散置一地。老妇人先立正行了个军礼，然后才自报身份：

“我是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坏消息。据他说，自由派的最后几个抵抗据点都危在旦夕。奥雷里亚诺上校正边战斗边向里奥阿查一侧撤退，他是受上校委派来向阿尔卡蒂奥报信的。阿尔卡蒂奥应当放弃抵抗投降，以换取敌人保证自由派生命财产安全的允诺。阿尔卡蒂奥用怜悯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奇怪的信使，他看起来与一个逃难的老妇人没什么两样。

“您自然是带来什么书面证明了。”他说。

“自然是没带，”信使回答，“这不难理解，当前形势下不能带任何会连累别人的东西。”

他说着从内衣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放在桌上。“我想有这个就足够了。”他说。阿尔卡蒂奥确信那小金鱼出自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手，但也可能是别人在战前购买抑或偷抢得来，因而不足为凭。信使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惜泄露一项军事秘密。他透露自己即将赶赴库拉索，招募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筹集武器装备，计划在年底登陆杀回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支持这一计划，不同意当下再作无谓的牺牲。但阿尔卡蒂奥没有动摇，他下令将信使关押起来直到弄清他的身份，并决心誓死守卫辖地。

他无须等上很久，因为自由派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而且越发确切。三月末，提前到来的雨季的一个清晨，几星期以来紧张的平静被尖厉的军号声猝然打破。随后一声炮响，教堂的尖塔轰然倒塌。阿尔卡蒂奥的抵抗决心与疯狂无异。他手下不过五十来人，装备低劣，每人至多能分到二十发子弹。但这些人，他旧日的学生，受他那慷慨激昂的宣言所鼓动变得热血沸腾，时刻准备着为一项无望的事业献出生命。纷乱的军靴声，互相矛盾的号令声，令大地震颤的炮火声，慌乱的射击声，无谓的军号声—在这片混乱中，自称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的男人设法与阿尔卡蒂奥对上了话。“请不要让我蒙受羞耻，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破烂死掉，”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请让我战斗而死。”他说服了他。阿尔卡蒂奥下令给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带着五个人保卫军营，他自己则领着参谋部冲向抵抗前线。他没能到达通往大泽区的路。街垒都已被清除，守军在无遮无挡的街道上作战，他们先用步枪直到子弹耗尽，然后用手枪对步枪，最后展开肉搏战。在镇子失守前，一些用棍棒和菜刀武装起来的妇女冲到街上。阿尔卡蒂奥在混乱中发现阿玛兰妲正像个疯子一样四处找他，身上还穿着睡衣，手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两把老式手枪。他把步枪交给一位在战斗中弄丢了武器的军官，拉上阿玛兰妲逃向邻近的街巷带她回家。乌尔苏拉等在门口，纷飞的流弹已在邻居家墙上打出一个窟窿，她却全不在乎。雨停了，街面变得像泡化的肥皂又软又滑，而且黑暗中辨不出远近距离。阿尔卡蒂奥把阿玛兰妲交给乌尔苏拉，想去对付两个从街角胡乱开枪的士兵，但老手枪在衣柜里收藏多年之后失去了效用。乌尔苏拉用身体护住阿尔卡蒂奥，想把他拉进家门。

“快进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喊着，“别再发疯了！”

士兵们瞄准了他们。

“放开那个男人，女士，”其中一个士兵喊道，“不然后果自负！”

阿尔卡蒂奥把乌尔苏拉推向家门，随即投降了。很快枪声停息，钟声敲响。不到半个小时，抵抗被彻底粉碎。阿尔卡蒂奥的人一个也没活下来，但在战死前拉上了三百个士兵陪葬。最后被攻占的堡垒是军营。那个自称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的人释放了囚犯，命令他的人上街战斗。他身形灵活，弹无虚发，将二十发子弹从不同窗口射出，给人以此地有重兵把守的印象。于是进攻者开炮将军营轰为平地。指挥进攻的上尉惊奇地发现，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男人死在那里，没有子弹的步枪仍被炸离身体的手臂紧紧抓着。他那头像女人一样的浓密头发用发梳绾在颈后，脖子上的披巾上挂着一条小金鱼。上尉用靴尖翻过尸体，照亮这男人的脸，顿时愣住。“见鬼！”他喊了一声。其他军官围了上来。

“瞧瞧这家伙都跑到哪儿来了，”上尉对他们说，“是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

天亮的时候，经过军事法庭的即时审判，阿尔卡蒂奥被判处枪决，在公墓的墙前执行。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童年时代起一直折磨他的恐惧感消失了。他无动于衷地听着冗长的指控，甚至没想去展现自己刚刚获得的勇气。他想着乌尔苏拉，她这会儿应该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喝咖啡。他想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还没有名字，想着即将在八月出生的孩子。他想着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昨天晚上他还给她留了一头鹿腌起来准备星期六中午吃；他想念她披散在肩头的发丝和她仿佛出自人工的睫毛。他想着他的亲人，并无感伤，只是在严格盘点过往时发现，实际上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些曾经恨得最深的人。军事法庭的庭长开始宣读最后的判决，阿尔卡蒂奥这才意识到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尽管业已证实的指控不足以构成宣判依据，”庭长说，“然而被告人犯下了可怕的渎职罪行，导致其下属作出无谓的牺牲，仅此已足够被处以极刑。”置身于满目疮痍的学校，他曾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他曾在一旁几米开外的房间里初尝情爱的滋味，阿尔卡蒂奥感到

这样煞有介事的死亡不免可笑。其实他在意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因此听到死刑判决时他心中没有恐惧只有留恋。直到被问及最后的愿望，他才开口。

“告诉我女人，”他声音非常平静，“给女儿起名乌尔苏拉。”他顿了一下，重复道，“乌尔苏拉，跟她祖母一样。再告诉她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何塞·阿尔卡蒂奥，但不是随他伯父的名字，而是随他祖父。”

行刑前，尼卡诺尔神甫想要引他作忏悔。“我没什么可忏悔的。”阿尔卡蒂奥喝过一杯黑咖啡，便听候行刑队处置。行刑队的首领是个擅长紧急枪决的老手，他拥有罗格·卡尔尼塞罗[②]这样的姓名绝非偶然。走向墓地的路上，细雨绵绵不绝，阿尔卡蒂奥望见星期三的曙光闪现在地平线上。留恋之情随着晨雾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好奇感。当行刑队命令他靠墙站好的时候，他才看见丽贝卡。她头发濡湿，身穿带玫瑰色花朵图案的外衣，正打开屋门。他努力想让她认出自己。实际上丽贝卡只是偶然向墙边瞟了一眼，立时惊呆，而后才勉强反应过来向他挥挥手以示告别。阿尔卡蒂奥也同样挥挥手。在被一排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的瞬间，他听见梅尔基亚德斯仿佛教皇通谕的吟唱，听见还是处女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在教室里迷离的足音，同时鼻中感受到曾在蕾梅黛丝尸体鼻腔内发觉的冰块般的坚冷。“啊，糟糕！”他想起来了，“我忘了说，如果生女儿，就叫她蕾梅黛丝。”一时间，随着撕心裂肺的剧痛，折磨他一生的全部恐惧重又涌上心头。上尉下令开枪。阿尔卡蒂奥几乎来不及挺胸抬头，就感到不知从哪里流出的滚烫液体在大腿间烧灼。

“浑蛋！”他喊道，“自由党万岁！”

---

①在西班牙语中，“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Santa Sofía de la Piedad）有“慈悲圣女索菲亚”之义，“索菲亚”一名本身亦有“智慧”之义。

②“卡尔尼塞罗”（Carnicer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屠夫”。

七

战争在五月结束。政府发布正式通告，言辞夸张地宣称将毫不留情地严惩发动叛乱的首恶分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通告发布两个星期前被捕，那时他化装成土著巫医，与西部边境相距咫尺。追随他上战场的二十一人中，十四人阵亡，六人受伤，只有一人陪伴他直到最后的失败时刻—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被捕的消息经一份特别通告传到马孔多。“他还活着，”乌尔苏拉告诉丈夫，“我们祈求上帝让他的敌人发发慈悲吧。”哀恸了三日，那天下午她正在厨房搅拌奶味甜食，耳边忽然清晰无比地响起儿子的声音。“是奥雷里亚诺，”她喊了起来，飞跑到栗树下告诉丈夫，“我不知道这神迹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还活着，我们马上就能见着他了。”她对此深信不疑。她把家里的地板擦洗一新，又重新摆放了家具。一个星期后，虽然政府通告里没有提及，却有来源不明的传言戏剧性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奥雷里亚诺上校已被判处死刑，行刑地点定在马孔多，以儆效尤。星期一上午十点二十分，正在为奥雷里亚诺·何塞穿衣服的阿玛兰妲听到远处人声喧哗、军号嘹亮，一秒钟后乌尔苏拉就冲进房间，大喊道：“他被押来了。”押解队伍挥动枪托竭力抵御蜂拥而至的人群。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一路挤到街角，看见了他。他俨然一副乞丐模样，衣衫褴褛，须发乱成一团，还赤着脚。他走在滚烫的地面上却浑不在意，双手捆在背后，绳索的另一头系在一位军官骑着的战马颈上。在他身旁，是同样蓬头垢面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们俩并未显出悲伤，面对那些百般谩骂士兵的人群反倒有些困惑。

“我的孩子！”乌尔苏拉在喧嚷中喊道，一巴掌打向试图拦堵自己的士兵。军官的坐骑前蹄腾空，直立起来，于是奥雷里亚诺·布恩

迪亚上校停住脚步。他颤抖着，避开母亲的双臂，目光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

“回家吧，妈妈，”他说，“您去找当局批准，来监狱里看我。”

他看了阿玛兰妲一眼，她离乌尔苏拉两步远，正不知所措。他微笑着问道：“你的手怎么了？”阿玛兰妲举起缠着黑纱的手。“烧伤。”她回答，同时一把拉开乌尔苏拉免得被马践踏。军队朝天开枪示警。一支特别小队将囚犯围在中间，一路小跑赶到监狱。

黄昏时分，乌尔苏拉来到监狱探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她曾试着通过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获得批准，但这位里正在专权横蛮的军人面前毫无权威可言。尼卡诺尔神甫得了肝病，发烧卧床不起。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没被判处死刑，但他的父母去探监时仍被枪托轰了出来。眼看不可能找到任何传话的人，又确信儿子明天一早会被枪毙，乌尔苏拉便把要带给他的东西包成一包，独自去了军营。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报家门。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无论如何我要进去，”乌尔苏拉表示决心已定，“如果你们得到了命令，那就开枪吧。”她推开一个卫兵，闯进当年的教室，里面一群赤身露体的士兵正在给武器上油。一位身穿野战服、戴着厚眼镜、脸色红润、举止庄重的军官，做了个手势要卫兵们退下。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乌尔苏拉重复了一遍。

“您的意思是，”军官脸露和蔼的微笑纠正她，“您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先生的母亲。”

乌尔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出了内地人特有的慵懒腔调。

“随您怎么说，先生，”她承认道，“只要能让我见他就行。”

上级下令不允许探视死刑犯，但那位军官自行做主允了她十五分钟的会面时间。乌尔苏拉让他检查了自己的包袱：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儿子结婚时穿过的靴子，她从预感儿子要归来的那天存留至今的奶味甜食。她在牢房里见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躺在行军床上，大张双臂，因为腋下长满了疖子。他们允许他刮了胡子，浓密的短髭尖角上翘，衬得颧骨线条分外突出。在乌尔苏拉眼中，他比离开时更苍白，但略高了些，也愈显孤单。他对家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自杀，阿尔卡蒂奥任意妄为后被枪决，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昏沉度日。他也知道阿玛兰妲把近似孀居的独身时光全部花在了奥雷里亚诺·何塞的抚养上，这孩子已显露出聪慧的头脑，学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读写。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乌尔苏拉就被儿子老成持重的神情、生杀予夺的气概和通身放射出的威严光彩所震慑。她奇怪他消息如此灵通。“您别忘了，我能未卜先知。”他开玩笑道，随即又严肃地补充一句，“今天早上他们押我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已发生过。”实际上，当喧嚣的人群拦住去路，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惊讶于短短一年间镇子就衰老如斯。巴旦杏树枝叶凋零；漆成蓝色的房子时而改漆红色，时而又改回蓝色，最后那颜色都变得难以辨别了。

“你还能指望什么？”乌尔苏拉叹了口气，“时间过得很快。”

“话是没错，”奥雷里亚诺附和道，“可也没那么快。”

这本是期望已久的探视，双方也都准备好了问题甚至预先想好了答案，可就这样又变成了家常聊天。卫兵通知时间已到，奥雷里亚诺从床席下取出一卷汗湿的纸张。那是他写的诗，有他离开时随身携带的为蕾梅黛丝而作的，还有后来在危机四伏的战时间歇写的。“答应我别给任何人看，”他说，“今天晚上就用这些生炉子。”乌尔苏拉答应了，站起身来与他吻别。

“我给你带了把左轮手枪。”她低声说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确认了他们不在卫兵的视线之内。“我用不着，”他压低声音答道，“不过还是给我，免得您出去的时候被搜出来。”乌尔苏拉从胸衣里掏出左轮手枪，他接过去藏在床席下面。“现在不要告别。”他镇静地结束了谈话，“不要乞求任何人，也不要向任何人低头。您就当我早被枪毙了。”乌尔苏拉咬着嘴唇没哭出来。

“找热石头贴到疖子上。”她说。

她转身，离开牢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直到牢门关闭。他回到床上，仍旧大张双臂。自从少年时代开始对自己的预感有所意识，他就想死亡的来临会由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改变的明确征兆来预告，但如今还剩几个小时就要上刑场，那征兆仍未出现。有一次，一个极其美貌的姑娘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请求卫兵放她进去见他。卫兵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些狂热的母亲会把女儿送进最出名的勇士的卧室，据她们自己说是为了改良血统。姑娘走进房间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人的诗。他背对着她，把诗页收进存放诗作的带锁小箱子。他感觉到了。他抓起箱子里的手枪，却没有回头。

“请不要开枪。”他说。

他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看见那姑娘已放下自己的枪，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伏击中的四次。相反，一个至今未被抓获的凶手一天晚上潜入革命军在马纳乌雷的军营，刺死了他的好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而他是为了让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发热退烧才把自己的行军床让出来的。他就睡在同一房间内几米外的吊床上，却毫无察觉。他试图摸清预感的规律，却是徒然。预感总是倏然来临，灵光一现，好像一种确凿无疑的信念在瞬间萌生却无从捕捉。有些时候来得如此自然，直到应验之后才有所察觉。也有些时候非常明确却没有应验。还有许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的迷

信而已。然而在被判处死刑并被问及有何愿望的那一刻，他毫无困难地认清了预感，据此作出回答：

“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他说。

庭长有些不快。

“别耍滑头，布恩迪亚，”他说，“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同意与否，悉听尊便，”上校说，“但这就是我的最后愿望。”

从那时起预感不再光临。乌尔苏拉来探监的这一天，他反复思考，终于得出结论：或许这次死亡不会给出预告，因为它并非由运气决定，而是取决于刽子手的意愿。他被疖子折磨得整夜不眠。黎明将近，走道上传来脚步声。“来了。”他对自己说，不知为什么还想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而那老人这时也正在栗树下晦暗的晨曦中想着他。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留恋，只有深深的怒气，愤怒于这人为的死亡害得他看不到那么多未竟的事情如何收场。门开了，卫兵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还是一样，为腋下的疼痛而恼火，发生的事情也一般无二。星期四，他和卫兵们分享了奶味甜点，换上了穿着略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靴。到了星期五，仍未行刑。

实际上，他们不敢执行判决。镇上人的桀骜不驯使军人们想到，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马孔多甚至整个大泽区都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向省政府请求指示。星期六晚上等待命令的同时，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几乎出于胁迫，才勉强答应和他同房。“没人愿意和一个要死的人上床，”她向他承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官，包括行刑队的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早晚都会被干掉，就算躲到天边也没用。”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告诉了其他军官，那些军官又告诉了自己的上司。星期天，尽管没人明确透露，尽管没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日子透

着紧张的平静，整个镇子却都已知道军官们在寻找各种托辞逃避行刑的任务。星期一，邮差带来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当晚军官们把七张写着各自名字的小纸条放进一顶帽子，残酷的命运令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中了彩。“霉运逃也逃不掉，”他满心苦涩地说，“我生下来就不走运，到死也是倒霉鬼。”早上五点，他抽签选出行刑队，在院中排好，随后一句话叫醒了死刑犯，也预告了他的命运。

“上路吧，布恩迪亚，”他告诉他，“时候到了。”

“原来是指这个，”上校回答，“我正梦见疖子都破了。”

丽贝卡·布恩迪亚听说了奥雷里亚诺将被枪决的消息，凌晨三点就起床。她待在卧室里，摸黑透过半开的窗户盯着墓地的墙，身下坐着的床铺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鼾声中颤抖着。整整一个星期，她都执著地在暗中等待，就像当年等待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来信。“不会在这儿枪毙他。”何塞·阿尔卡蒂奥对她说，“他们会半夜在军营里枪毙他，然后就在原地埋掉，免得让人知道谁参加了行刑。”丽贝卡继续等待。“他们那么蠢，一定会在这儿枪毙他。”她说。她对此确信不疑，甚至连开门挥手告别的方式都预先想好了。“就凭那六个吓破胆的士兵，他们才不会从街上押他过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坚持道，“他们知道镇上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尽管丈夫说得头头是道，丽贝卡仍然守在窗前。

“你看着吧，他们就是那么蠢。”她说。

星期二早上五点，何塞·阿尔卡蒂奥已喝过咖啡，放出狗去。这时丽贝卡关上窗户，猛地抓住床头，险些摔倒。“他们押他过来了，”她叹了口气，“他真精神。”何塞·阿尔卡蒂奥往窗外望去，看见了他，穿着年轻时穿的裤子，在晨曦中颤抖。他已背朝墙站好，两手叉在腰间，因为腋下烧灼的疖块令他无法垂下手臂。“忍来忍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嘀咕着，“忍来忍去就为了让六个软蛋干掉你，你还什么都做不了。”他气恼地反复念叨，看起来几近

狂热，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还以为他在祈祷，不禁为之感动。当行刑队瞄准他的时候，怒气凝成黏稠苦涩的东西，麻痹了他的舌头又迫使他闭上眼睛。那一瞬间晨曦的银白色光芒隐没，他又看见了小时候穿着短裤系着领结的自己，看见了父亲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带他走进帐篷见到了冰块。他听见喊叫声，以为那是最后的行刑命令。他出于好奇颤抖着睁开眼，准备迎接子弹白热的轨迹，却只看见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高举双手，何塞·阿尔卡蒂奥穿过街道，手中端着可怖的猎枪随时准备开火。

“请别开枪，”上尉对何塞·阿尔卡蒂奥说，“您一定是上帝派来的。”

由此，又一场战争爆发。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带着手下的六个士兵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起去里奥阿查，解救在那里被判处死刑的革命军将军维多利奥·梅迪纳。他们为了争取时间，本想沿着当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创建马孔多时走过的道路穿越山区，但不到一个星期就确信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行动。因此他们被迫取道危险的盘山路，随身装备除了行刑队配备的弹药再无其他。他们常常在村镇附近扎营，派出一个人乔装改扮一番，带着一条小金鱼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村子和潜伏的自由党人接头，次日清早那些人便出门打猎一去不回。当他们从一处山脊遥遥望见里奥阿查的时候，维多利奥·梅迪纳将军却已被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手下人推举他为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统帅，挂将军衔。他接受了职务，但拒绝升衔，并发誓一天不推翻保守党政权就一天不变军衔。三个月后，他们成功武装起一千多人，但随即被打垮，幸存者逃到了东部边境。下一次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安的列斯群岛，在贝拉角登陆。一份政府公告通过电文传遍全国，欢天喜地地宣布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死讯。但是两天后，另一封通电几乎紧随前一封的余波，带来南方平原爆发起义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所不在的神话由此而生。相互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说他在比亚努埃瓦获

胜，说他在瓜卡马亚勒被击败，说他被莫蒂隆印第安人生吃，说他死在大泽区的一个小镇，说他又在乌鲁米达起义。自由党的领导人那时正忙于谈判争取国会席位，称他为冒险主义者，完全不代表本党立场。国民政府将他归于土匪一类，悬赏五千比索买他的人头。经过十六次失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率领两千名武装精良的土著从瓜希拉出发，里奥阿查的守军在梦中惊醒，弃城而去。他在那里建立总部，对政府全面宣战。他从政府方面收到的第一份通告，以枪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相威胁，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带人撤到东部边境。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当时是驻地负责人，沮丧地将电文呈送到他面前，但他看过之后却出人意料的高兴。

“太好了！”他喊道，“我们马孔多已经有电报了。”

他的答复很干脆。他会在三个月内将总部设到马孔多，如果到时看不到活着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将不经审判，先从将军们开始直接枪决俘虏的所有军官，并将下达命令让所有部属照办直到战争结束。三个月后，他胜利进入马孔多，在通向大泽区的路上接受的第一个拥抱便来自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

家里到处都是孩子。乌尔苏拉收留了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和她的长女，以及阿尔卡蒂奥被处决五个月后出生的一对双胞胎。她没有遵照死者的遗愿，而是用蕾梅黛丝的名字给女孩命了名。“我相信这才是阿尔卡蒂奥的意思。”她解释道，“我们别叫她乌尔苏拉，取这名字的人吃了太多的苦。”她给双胞胎取名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阿玛兰妲负责照顾所有的孩子。她在屋里摆上小木椅，还接纳了邻居的孩子，开设了一个幼儿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归来时，爆竹与时钟齐鸣，一个儿童合唱团唱起歌来欢迎他。长得像祖父一样高大的奥雷里亚诺·何塞身着革命军军服，向他行军礼致敬。

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好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逃走一年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搬进了阿尔卡蒂奥建起的房子。没人

知道他阻止行刑的事。新家坐落在广场最好的一角，掩映在一棵巴旦杏树的浓荫里，树上足有三个知更鸟的鸟巢。一扇大门迎送访客，四扇明窗承接阳光，他们就在这房子里安下热情好客的新家。丽贝卡旧日的女伴，包括摩斯科特家四个尚未出嫁的女儿，重新聚在一起刺绣，就像数年前在秋海棠长廊里一样。何塞·阿尔卡蒂奥继续享受掠夺来的土地收益，他的所有权已得到保守党政府的承认。每天下午都可以看见他骑马归来，扛着双铳猎枪，带着猎狗，一串兔子挂在马鞍上。九月的一天下午，眼看暴风雨迫近，他比平时提前回了家。他到饭厅和丽贝卡打过招呼，把狗拴在院中，又将兔子挂在厨房准备晚些时候腌起来，随后去卧室换衣服。丽贝卡事后声称丈夫进卧室时自己正在浴室，丝毫没有察觉。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但又没有更可信的其他说法，另外谁也想不出丽贝卡会有什么动机谋杀令她幸福的男人。这也许是马孔多唯一从未解开的谜团。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关上卧室的门，一声枪响震彻全屋。一道血线从门下涌出，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起伏不平的便道径直向前，经台阶下行，爬上路栏，绕过土耳其人大街，右拐又左拐，九十度转向直奔布恩迪亚家，从紧闭的大门下面潜入，紧贴墙边穿过客厅以免弄脏地毯，经过另一个房间，划出一道大弧线绕开餐桌，沿秋海棠长廊继续前行，无声无息地从正给奥雷里亚诺·何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妲的椅子下经过而没被察觉，钻进谷仓，最后出现在厨房，乌尔苏拉在那里正准备打上三十六个鸡蛋做面包。

“圣母在上！”乌尔苏拉喊了起来。

她沿着血流溯源而上，穿过谷仓，经过秋海棠长廊—奥雷里亚诺·何塞正在那里念诵三加三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又穿过饭厅和一个个房间，径直走到街上，先右拐再左拐到了土耳其人大街，忘了自己还穿着烤面包的围裙和家居拖鞋，来到广场，走进一户从未登过门的人家，推开卧室的门，险些被火药燃烧的气味呛死，发现何塞·阿尔卡蒂奥趴在地上，身下压着刚脱下来的靴子，这就看到了血流的源

头，而血已不再从他右耳流出。没发现他身上有任何伤口，也没找到凶器何在。另外也无法除去尸体上呛人的火药味。最初用丝瓜瓤蘸肥皂洗过三遍，然后先用盐和醋、后用草木灰和柠檬汁擦拭，最后浸到一桶碱水里泡了六个小时。经过反复揉搓擦洗，他身上的刺青花纹开始退色。他们不得已想出一个极端的方案，加入胡椒、莳萝和月桂叶用小火煮上一整天，但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不得不即刻下葬。他们用一口长两米三、宽一米一，内部以铁板与钢栓加固的特制棺材将他密封下葬，但仍然在一路经过的街道上留下了气味。尼卡诺尔神甫的肝部肿胀紧绷如鼓，他只能在床上为死者祈福。此后数月，虽然为坟墓砌起层层护板，在其间撒上压实的灰土、锯末和生石灰，墓园依然飘荡着火药味，直到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的工程师在坟上浇了一层水泥，那气味才消失。从尸体被抬出的那一刻起，丽贝卡就紧闭家门，过上了活死人的生活。她将自己包覆在高傲的厚壳里，尘世间的一切诱惑都无法将其打破。她出过一次家门，那时她已进入晚年，脚下一双古银色鞋子，头上一顶缀有小花的女帽。那时正值传言中“流浪的犹太人”经过村庄带来酷暑，飞鸟都热得撞破纱窗死在卧室里。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她的时候，她一枪命中，当场击毙一个企图撬门入室的小偷。除了阿尔赫尼妲，她的女仆和心腹，再也没人与她有过联系。人们一度听说她给被她视作表兄的主教写过信，但从未听说她收到过回音。她已被镇上的人遗忘。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凯旋归来，但他并没有为事情的这种表象而兴奋。政府军未作抵抗便放弃许多村镇，这在自由派民众当中激发的胜利憧憬不宜打破，然而革命者了解真相，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更是如此。此时他手下士兵超过五千，控制着沿海两个州，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背海受困，并陷入了混乱的政治环境之中，无怪乎当他下令重建毁于政府军炮火的教堂尖塔时，尼卡诺尔神甫在病榻上不禁感慨：“这实在荒唐，基督信仰的卫士摧毁教堂，共济会的人却下令重建。”为了寻找一条出路，他在电报室一待就是几个小

时，与其他城镇的首领商谈，他日益确信战争已陷入僵局。每当自由派的捷报传来，就会有通报大肆庆贺，但他会在地图上标出实际进展，进而发现他们的队伍正在深入雨林，与疟疾和蚊虫作战，与现实背道而驰。“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向他的军官们抱怨，“只要党内那些混账东西还在乞讨国会的位子，我们就得接着浪费。”失眠的夜里，就在当死囚犯时待过的同一个房间，他仰面躺在吊床上，眼前浮现出那些身着黑衣的律师的形象，他们在黎明的寒意中离开总统府邸，竖起大衣领子遮住耳朵，搓手御寒，窃窃私语，庇身于凌晨时分昏暗的小咖啡馆，细细揣摩总统说“是”的时候真正想说什么，说“不”的时候又想说什么，甚至还推测总统心口不一的时候究竟想的是什么—而他此时在三十五度的高温中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迫近，到时他就只能下令让自己的人跳进海里。

一个疑虑重重的夜晚，庇拉尔·特尔内拉正在院中和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请她用纸牌为自己推算将来。“当心嘴巴，”这是庇拉尔·特尔内拉推算三次后得出的全部结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预示非常清楚：当心嘴巴。”两天后，有人递给勤务兵一大杯没加糖的浓咖啡，勤务兵给了别人，这人又给了另一人，传来传去最后送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办公室里。上校并没有要过咖啡，但既然端到面前，他便喝了下去。咖啡里下了足够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他被送回家的时候，身体已经僵成弓形，舌头伸在齿间。乌尔苏拉与死神搏斗抢夺他的生命，她用催吐剂给他洗胃后，拿一床床热毯子将他裹紧，又喂了他两天蛋清，直到受损的身体恢复正常温度。到第四天，他脱离了危险。在乌尔苏拉和军官们的坚持下，他无奈地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时他才知道他的诗稿并没有烧掉。“我想不用那么急。”乌尔苏拉向他解释，“那天晚上，我准备生火，就跟自己说最好还是等尸体送来了再说。”在身体初愈的恍惚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边摆满了蕾梅黛丝落满尘灰的娃娃，他读起自己的诗来，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一一浮现。他又开始写诗。一个小时又一个小

时，他远离这场徒劳战争中的惊涛骇浪，将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化作押上韵脚的诗行。他的想法由此变得分外清晰，经得起反复思索。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

“告诉我，老兄：你打仗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了什么，老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回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知道为了什么，算是有福，”他答道，“我呢，现在刚发现我打仗是为了自尊。”

“这可不好。”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他的警觉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到好笑。“当然，”他说，“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总比不知道为了什么打仗强。”他看着他的眼睛，笑着加上一句：

“也比你强，你是为了一样对谁都没用的东西打仗。”

他的自尊曾令他放弃与内陆武装组织的联系，除非党的领导人公开更正称他为强盗的说法。然而，他知道只要放下这些顾忌，就能立刻打破战争的恶性循环。休养身体给了他反思的契机。他说服乌尔苏拉挖出剩余的遗产，连同她可观的积蓄都交给自己，又任命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孔多的军政首领，随后便起程去与内陆的反抗武装建立联系。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最信任的人，还被乌尔苏拉当作家中的一员。他体质虚弱，性格腼腆，生来文质彬彬，却更适合打仗，不适合从政，他的政治顾问们毫不费力就将他绕进了理论迷宫。不过他还是在马孔多实现了奥雷里亚诺上校梦寐以求的乡土平安，后者希望可以在此安心打造小金鱼以终老。他住在父母家里，但每星期总有两三次到乌尔苏拉这里吃午饭。他开始教奥雷里亚诺·何塞使用火器，对他提前进行军事训练，还在征得乌尔苏拉的同意后带他去军营生活了几个月，使他成长为男子汉。多年以前，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几乎还是个孩子，就表白过对阿玛兰

妲的爱意。她那时正沉浸在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单相思中，因而还嘲笑过他。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在等待。有一回他从狱中给阿玛兰妲捎来一张小纸条，请她在一打细棉布手帕上绣上自己父亲的名字缩写，还捎去了工钱。一个星期后，阿玛兰妲去监狱给他送那一打绣好的手帕，钱也还了他，两人谈了几个小时的往事。“等我出去就和你结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在告别时说道。阿玛兰妲笑了，但教孩子们读写的时候仍然想着他，希望为他寻回年轻时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燃起的激情。每个星期六是探监的日子，她都去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父母家，陪他们一同去监狱。其中一个星期六，乌尔苏拉看见她在厨房里等蛋糕出炉，要挑出最好的裹在专为此绣出的餐巾里。

“嫁给他吧，”乌尔苏拉对她说，“你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的男人。”

阿玛兰妲装出生气的样子。

“我不需要追着男人嫁，”她回答，“我给赫里内勒多带蛋糕，是觉得他可怜，迟早会被枪毙。”

她本是随口一说，却赶上政府公开威胁，如果叛军不交出里奥阿查就要枪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探监被取消。阿玛兰妲关起门来痛哭，与当初蕾梅黛丝死时相仿的罪疚感折磨着她，仿佛是她出于无心的话语又一次引来死亡。母亲安慰她，让她相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有所举动制止枪决，并许诺一等战争结束就亲自把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结果她提前兑现了承诺。当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以军政首领的显赫身份再次登门时，她像对待儿子一般接待他，百般恭维以取悦他，全心祈求以唤起他迎娶阿玛兰妲的初衷。她的祈求看来灵验了。每次吃过午饭，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都会留下，在秋海棠长廊里和阿玛兰妲下跳棋。乌尔苏拉给他们送上牛奶咖啡和蛋糕，并照顾好孩子，免得他们被打扰。阿玛兰妲在奋力重燃心中已被遗忘的青春激情的余烬。她无法忍受心头的焦虑，

期盼着共进午餐的日子，期盼着下跳棋的午后。有这位勇士的陪伴时间流逝得飞快，他的名字带有怀旧色彩，他的手指移动棋子时的轻微颤抖不易觉察。但那天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再次提出结婚的请求时，她拒绝了。

“我谁也不嫁，”她告诉他，“尤其不嫁给你。你太爱奥雷里亚诺才想跟我结婚，因为你没法跟他结婚。”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是个有耐性的人。“我会再提出来，”他说，“我迟早要说服你。”他继续登门造访。阿玛兰妲关在卧室里强忍悲声，捂住耳朵，免得听见那位追求者向乌尔苏拉谈论最新战况的声音。尽管心里无比渴望，她仍能克制着不出去见面。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还能抽出时间，每两个星期发一份详细的通报到马孔多。只有一回，就在离开近八个月后，他直接写信给乌尔苏拉。一位特使把一封火漆封口的信送到家里，里面的一张纸上是上校工整的字迹：好好照顾爸爸，他就要死了。乌尔苏拉吃了一惊。“既然奥雷里亚诺这么说，奥雷里亚诺就有把握。”她说。她去请人帮忙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回卧室。他一如往昔身子沉重，而且栗树下的漫长岁月助长了他随意增重的本事，结果七个人协力都搬不动他，只能勉强把他拖到床上。身量巨硕的老人饱受淫雨骄阳的折磨，他一呼气，屋里的空气中便充溢着幼蘑、鸡蛋花以及经年凝聚的风雨的味道。次日清晨，床上不见了他的踪影。各个房间找过一遍之后，乌尔苏拉发现他又回到了栗树下。于是把他绑在床上。尽管气力仍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却无意反抗。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他回到栗树下也不是出于本人意志，只不过源于身体的习惯。乌尔苏拉照顾他，喂他进食，给他讲奥雷里亚诺的消息。然而实际上，他很久以来还保持交流的对象只有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死后衰老已极，几近归于尘土，但仍每天两次找他聊天。他们谈起斗鸡。他们约好建立一个饲养优异品种的养殖场，倒不是为了享受他们已不再需要的胜利，而是为了在阴间沉闷

的星期天聊作消遣。正是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为他擦洗，给他喂食，向他讲述一个陌生人的光辉业绩，那人名叫奥雷里亚诺，是战时的一名上校。一个人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一个有无穷房间的梦中得到慰藉。他梦见自己从床上起来，打开房门，走进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里面有同样铸铁床头的床、同样的藤椅和后墙上同样的救难圣母像。从这一间又进入另一间一模一样的，如此循环，无穷无尽。他喜欢从一间走到另一间，仿佛漫步在镜廊中，直到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轻拍他的肩头。于是，他一间间回溯，渐渐苏醒，他原路折返，在现实的房间里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相会。然而一天晚上，就在他被拖回床上两个星期之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在居中的房间里拍了他的肩膀，他便永远留在了那里，认为那才是现实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乌尔苏拉给他送饭的时候，看见一个男人从长廊走近。他个子矮小敦实，身穿黑呢大衣，一顶同样漆黑的巨大帽子直压至忧郁的眼际。“上帝啊，”乌尔苏拉想，“简直就是梅尔基亚德斯。”那是卡塔乌雷，比西塔西翁的兄弟，当年为了逃避失眠症而出走，一去再没有消息。当比西塔西翁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用他们庄重的语言答道:

“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于是他们走进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房间，用尽全身力气摇晃他，冲他耳边叫喊，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前，但都无法将他唤醒。不多时，木匠开始为他量身打造棺材，他们透过窗户看见无数小黄花如细雨缤纷飘落。花雨在镇上落了一整夜，这静寂的风暴覆盖了屋顶，堵住了房门，令露宿的动物窒息而死。如此多的花朵自天而降，天亮时大街小巷都覆上了一层绵密的花毯，人们得用铲子耙子清理出通道才能出殡。

八

阿玛兰妲坐在藤摇椅上，将手中活计搁在膝头，看着奥雷里亚诺·何塞往下巴上涂满泡沫，在皮条上刮着剃刀，准备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他试着把上唇棕黄的茸毛理成髭须时不慎割破皮肤，粉刺流出血来，而到最后他也没理成个样子，但这番艰苦的努力却让阿玛兰妲觉得自己从这时起便开始老了。

“你和你这个年龄时的奥雷里亚诺一模一样，”她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其实他早就是了，这可以追溯到已然遥远的一天，阿玛兰妲仍把他当作孩子，在浴室里当着他的面脱下衣服。自从庇拉尔·特尔内拉把孩子托付给她抚养，她一向这样做，已经习惯了。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唯一注意到的是乳房间的深沟。他天真地问这是怎么了，阿玛兰妲装作用指尖在胸前掏挖的样子回答：“挖呀挖呀挖呀就成这样了。”后来，当她从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自杀事件中恢复，又和奥雷里亚诺·何塞一起洗澡，他已经不再注意那深沟，而注目于那紫色乳头和丰硕双峰，感到一阵奇怪的战栗。他继续观察，一点一点发现她隐秘处的神奇，窥看时感到皮肤上汗毛倒竖，就像她的皮肤碰到水时一样。很小的时候他就习惯天亮前离开自己的吊床睡到阿玛兰妲的床上，觉得和她在一起就不会惧怕黑暗。然而从意识到她的裸体那天起，驱使他钻进她蚊帐的不再是对黑暗的恐惧，而是对天明时感受她温暖呼吸的渴望。一天凌晨，就在阿玛兰妲拒绝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那段日子，奥雷里亚诺·何塞在几近窒息中惊醒，感觉她的手指像滚烫的虫子在焦灼地向他的腹部蠕动。他装作熟睡未醒，调整姿势为她除去一切障碍，随即感到那只未缠黑纱的手宛如失明的软体动物在他饥渴的水藻间潜游。两人都装作不知道双方心知肚明的事

实，都装作不知道对方已知情，自那天晚上起被一种不容侵犯的默契紧紧联结在一处。奥雷里亚诺·何塞不听到客厅里时钟午夜报时的华尔兹就无法安眠，而那位容颜开始枯萎的盛年处女没等到梦游人钻进蚊帐也一刻不得安宁。她亲手将他抚养大，未曾想到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宽慰自己孤独的良药。他们不仅赤身露体睡在一起，彼此爱抚到精疲力竭，还在家中各个角落互相追逐，随时随刻关在卧室里，沉浸于持久的兴奋中。他们差点儿被乌尔苏拉发现，那天下午她走进谷仓，正撞见他们准备接吻。“你很爱你姑妈？”她毫不知情地问奥雷里亚诺·何塞。他回答说是。“你做得对。”乌尔苏拉评判道，称好做面包的面粉就回了厨房。这一幕让阿玛兰妲从狂热中惊醒。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不是在和孩子玩亲嘴游戏，而是在挑动人过中年危险无望的情火，便决然断绝了关系。奥雷里亚诺·何塞那时快要完成军训，最终接受了现实，搬到军营去睡。每个星期六他都和士兵们去卡塔利诺的店里。他突如其来的孤独，早熟的青春，都在散发着残花味道的女人们身上得到了慰藉。他在黑暗中展开幻想，竭力将她们想象成阿玛兰妲。

没过多久，开始传来互相矛盾的战局消息。政府承认叛乱在扩大，但马孔多的军官们却得到内部消息称和议即将达成。四月初，一位特使出现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面前。特使向他证实，党的领导人确实已经与内陆的起义军取得联系，即将议定停战协定，以此为自由党换取三个部长职位、国会里的少数席位以及对所有放下武器的起义者的大赦。特使同时带来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绝密命令，他在命令中表明不赞同停战协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应当选出五名最好的手下，作好准备带他们离开国境。命令执行得极其隐秘。协定公布一个星期前，正当彼此矛盾的传言四起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带领包括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在内的十名亲信军官，夜半时分暗中潜入马孔多，遣散驻军，埋掉武器，毁去文件。天亮时，他们已经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及其手下五名军

官一起离开镇子。这次行动迅速又隐秘，连乌尔苏拉都直到最后一刻才知情，那时有人轻轻敲响她卧室的窗户，低声道：“如果您想看一眼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现在就去门口。”乌尔苏拉跳下床，穿着睡衣出了门，只隐隐望见一小队骑手在无声的尘烟中离开镇子。到了第二天，她才知道奥雷里亚诺·何塞也随他父亲去了。

政府与反对党发布联合声明宣告停战，十天后传来消息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西部边境发动了第一场武装起义。他那支人员不足、装备低劣的部队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击溃。但在这一年，当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试图使国人相信和解已经达成，他又组织了另外七次起义。一晚，他从一条纵帆船上炮轰里奥阿查，守军将当地最知名的十四个自由党人从床上拖出来枪决以示报复。他曾占领一处边界关卡半个多月，从那里通电全国宣告发动全面战争。他曾在一次远征中迷失于雨林三个月，异想天开地试图穿越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原始森林直捣首都近郊。还有一次，他距马孔多不到二十公里，却在政府军巡逻队的威逼下退到山区，趋近他父亲多年前发现西班牙大帆船残骸的着魔之地。

比西塔西翁在那段时间去世。她因为对失眠症的恐惧放弃王位，最后得偿所愿，安详离世。她的遗愿是起出埋藏在她床下二十多年的积蓄，寄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继续战斗。乌尔苏拉并未取出这笔钱，因为那时四处传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已经死于一次在省城附近的登陆行动中。人们相信了官方通告—那已是不到两年内的第四份—因为六个月里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当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旧丧未除又添新丧，意料之外的消息突然传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还活着，但似乎已放弃对本国政府的侵扰，加入了加勒比海其他共和国胜利在望的联邦派军队。他以不同的名字活动，离祖国日益遥远。日后人们将会知道，当时的他一心想要联合中美洲各地的联邦派力量，横扫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一切保守党政权。他

离去几年后，乌尔苏拉第一次收到他的亲笔信，那封信寄自古巴的圣地亚哥，经过多人辗转传递已经皱皱巴巴、字迹模糊。

“我们永远失去他了，”乌尔苏拉感叹道，“这样下去他就得在世界尽头过圣诞了。”

听她说这话的人，也是她对其出示信件的第一个人，是保守党将军何塞·拉克尔·蒙卡达，战后马孔多的市长。“这个奥雷里亚诺，”蒙卡达将军说，“真可惜他不是保守党。”他的敬佩出自真心。像许多保守党人一样，何塞·拉克尔·蒙卡达为了捍卫自己的党派才参战，并在战场上获得了将军的头衔，但他无意成为职业军人。恰恰相反，他和党内许多同道一样，是反军事主义者。在他看来，军人都是些没有原则的懒虫、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惯于欺压平民乱中牟利。他聪明和善，性格开朗，胃口好，爱斗鸡，一度成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最可怕的对手。他在沿海广阔区域内的职业军人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曾有一次，他出于战略考虑被迫放弃一座据点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队占领，同时留下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很长，他在信中邀请对手共同努力促使战争更人道。另一封写给他身陷自由派占领区的妻子，他请求将信送给她。从那以后，即使在战事最激烈的时期，两位指挥官仍会达成暂时休战的协定来互换战俘。那些战事间歇期洋溢着节庆气息，蒙卡达将军有了机会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下象棋。他们成了好友。他们甚至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团结两党的民众力量，肃清军人和职业政客的流毒，建立一个汲取了两党理论思想精华的人道主义政府。战争结束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铤而走险，不断起事，而蒙卡达将军被任命为马孔多的里正。他脱下军装，以不带武器的警察取代士兵，实行大赦法令，并救助一些阵亡自由党人的家属。他成功让马孔多提升为市，也因此当了第一任市长。他营造出安定的氛围，令战争成为昔日荒诞的噩梦。尼卡诺尔神甫被肝病高热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由科罗奈尔神甫取代，后者被人称作“新手”，是第一次联邦战争中的老兵。布鲁诺·克雷斯

皮与安帕萝·摩斯科特结了婚，他的玩具乐器店生意蒸蒸日上。他盖了一座剧院，成为许多西班牙剧团的巡演站点。那是一座宏伟的露天大厅，配有木制靠背椅，饰以古希腊面具的天鹅绒大幕。三个售票窗造成狮头形状，从大张的狮口出售戏票。学校也在那一时期重建，由堂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负责。他是一位从大泽区派来的老教师，让不用功的学生在院中石灰地面上跪着行走，让言语放肆的学生吃辣椒，家长们对此十分满意。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这对任性的双胞胎儿子，是第一批带着小黑板、粉笔和标有名字的小铝壶坐到教室里的学生。蕾梅黛丝遗传了母亲的美貌，开始被称为美人儿蕾梅黛丝。尽管时光流逝，丧事接二连三，苦痛不断增添，乌尔苏拉却并不显衰老。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帮助下，她将自己的甜食生意推上新的高峰，不仅在短短几年内挣回了儿子消耗于战争中的资财，还用纯金塞满了一个个葫芦埋在卧室里。“只要上帝还让我活着，”她时常这样说，“这个净出疯子的家里就缺不了钱。”就在这时候，奥雷里亚诺·何塞从尼加拉瓜联邦派军队里开了小差，跑到一艘德国船上当水手，最后出现在家中的厨房里。他壮实如马，肤色黝黑，头发浓密，像个印第安人。他怀着秘密的目的回来，一心要和阿玛兰妲结婚。

阿玛兰妲见他进来，没等他开口，便明白了他回来的原因。在饭桌上，他们不敢对视。但两个星期后，他当着乌尔苏拉的面盯着她的双眼说：“我一直在想你。”阿玛兰妲躲着他，竭力避免碰面的机会，尽量不与美人儿蕾梅黛丝分开。那天当侄子问她手上的黑纱要戴到什么时候，她脸红了，并因自己脸红而气恼，因为她觉得那问题在影射她的童贞。自从他回来后，她就闩上了卧室的门，但许多个夜晚过去，听着隔壁房间他那平稳的鼾声，她放松了警惕。在他归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察觉到他进了卧室。那一刻，她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逃走或叫喊，心头反而涌上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她感觉到他钻进蚊帐，就像他孩提时代常做的那样，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

她意识到他寸丝不挂，不禁冷汗直流，牙齿咯咯打战。“你走，”她低声道，惊得喘不过气来，“不走我就喊了。”但奥雷里亚诺·何塞知道此刻该做些什么，他已经不再是怕黑的孩子，而是出自军营的猛兽。自那天晚上起，没有结果的无声战斗又开始了，每每持续到黎明。“我是你姑妈，”精疲力竭的阿玛兰妲低声道，“差不多就等于你母亲，这不光因为年纪，我还把你养大，就差没给你喂过奶。”奥雷里亚诺·何塞黎明时离开，第二天凌晨又回来，每次发现房门并未闩上就愈加兴奋。他没有一刻不想她。在那些被攻陷村镇的阴暗卧室里，特别是在那些最下贱的地方，找到她的影子；在伤员绷带上干涸血迹的味道中，觅见她的身形；在致命危险所激发的恐惧中，随时随地与她相遇。他曾经从她身边逃开，试图在记忆中将她抹去，为此不仅远走他方，还表现出被战友们归为莽撞的凶悍冒进。他越是在战争的粪坑里摔打她的形象，战争本身就越像阿玛兰妲。他就这样在流亡中忍受煎熬，寻求以自己的死亡来消灭她，直到听见有人讲起那个古老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和既是自己姑妈又是自己表姐的女人结婚，结果生出的儿子成了自己的祖父。

“一个人能娶自己的姑妈吗？”他惊异地问。

“不光可以娶姑妈，”一个士兵回答，“我们现在跟教士打这场仗，就是为了让人连亲娘都能娶。”

十五天后他开了小差。他发现阿玛兰妲比记忆中更憔悴，也更忧伤、更端庄；她岁月的航船正在绕过盛年的最后一个岬角，但在卧室的幽暗中她却显出从未有过的狂热，激烈的反抗也从未显得这样富于挑战。“你是头野兽。”受他追逼的阿玛兰妲说，“不能对一个可怜的姑妈干这种事，除非有教皇的特许。”奥雷里亚诺·何塞答应去罗马，答应膝行整个欧洲去亲吻教皇的鞋子，只要她肯放下悬着的吊桥。

“不光是这个，”阿玛兰妲反驳道，“会生出猪尾巴孩子的。”

奥雷里亚诺·何塞对一切道理都充耳不闻。

“就算生出犰狳也不要紧。”他恳求道。

一天凌晨，他再也无法压抑欲望和忍受痛苦，便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找到一个乳房干瘪、亲切又廉价的女人，暂时平息了欲火。他试图对阿玛兰妲采取蔑视的态度，见到她在长廊里做缝纫活计，已经能将手摇式缝纫机应用自如时，一句话都不对她说。阿玛兰妲感觉卸去了重担，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想起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为什么怀念下跳棋的午后，甚至渴望他成为卧室中的情人。奥雷里亚诺·何塞还不知道自己已丧失多少领地，一天晚上他无法再忍受伪装的漠然，又回到阿玛兰妲的房间。她以无可动摇的决心拒绝了他，从此永远闩上了卧室的房门。

奥雷里亚诺·何塞回来后没几个月，家里来了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浑身散发出茉莉香，带着一个五岁多的男孩。她声称那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她带来请乌尔苏拉起名。没有人怀疑那个无名男孩的血脉：他和被领去看冰块时的上校长得分毫不差。女人说孩子一出生就大睁双眼，用大人的方式打量众人，他那种眼睫不眨看东西的样子令人害怕。“一模一样，”乌尔苏拉说，“就差用眼神翻倒椅子了。”他们给他起名为奥雷里亚诺，用了母亲的姓氏，因为法律不允许在生父尚未承认前使用父姓。蒙卡达将军做了教父。阿玛兰妲坚持要把孩子留下来抚养，但他母亲拒不同意。

乌尔苏拉那时还不知道将少女送进军人卧室的习俗，那就像把母鸡赶到良种公鸡那里去。但在这一年她有了充分的了解：又有九个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孩子被送到家里起名。其中最大的已过十岁，长相奇特，肤色黝黑，眼睛碧绿，与父家没有丝毫相似。送来的孩子有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但都是男孩，都带着落落寡合的神情，显示出毋庸置疑的血缘归属。其中有两个格外突出。一个身材魁伟与年龄不符，打碎了许多花瓶和餐具，双手仿佛拥有损坏一切所碰东西的特性。另一个一头金发，长着母亲那样的蓝眼睛，留着女人一样的长鬈发。他走进家里，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仿佛就在这里长大。他

径直来到乌尔苏拉卧室里的一个箱子前，说：“我要上弦的跳舞女郎。”乌尔苏拉吓了一跳。她打开箱子，在梅尔基亚德斯时期落满尘灰的旧物中翻寻，找到了包裹在一双长袜中的上弦跳舞女郎，这东西是当初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带到家里的，此后被人遗忘了。不到两年内，他们为上校在战场上一路播撒的儿子命了名，都叫奥雷里亚诺，姓氏则随母亲：共计十七个。起初，乌尔苏拉还往孩子的口袋里塞满钱，阿玛兰妲则努力争取把他们留下来抚养，但后来她们只是送一份礼物，并担当教母。“我们起了名就行了。”乌尔苏拉一边说，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下母亲的姓名地址及孩子出生的时间地点，“奥雷里亚诺一定算得清楚，等他回来自己拿主意吧。”吃午饭时，她对蒙卡达将军谈起这意外的人丁兴旺，希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能回来一次，和所有儿子在家中团聚。

“不用担心，大姐，”蒙卡达将军不无神秘地说，“他会比您预料中回来得早。”

蒙卡达将军知晓这事却不愿在午饭时明说，其实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发动一场迄今为止他所领导的最漫长、最激烈也最残酷的起义。

时局又变得像第一次战争爆发前的数月里那般紧张，一度获得市长本人支持的斗鸡比赛都被取消了。市政大权实际落在驻军首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手中，自由党人将他视作挑衅分子。“要出大事，”乌尔苏拉对奥雷里亚诺·何塞说，“下午六点以后不要上街。”这些劝告都归于徒然。奥雷里亚诺·何塞和当年的阿尔卡蒂奥一样，已经脱离她的怀抱。他回到家里，仿佛就可以不再为日常需要操心，这在他身上唤醒了伯父何塞·阿尔卡蒂奥那种放浪懒散的习性。他对阿玛兰妲的激情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四处游荡，打打台球，拈花惹草排解孤独，翻出各个角落里乌尔苏拉藏起又忘记的钱财。到后来他只为换衣服回家。“都一个样。”乌尔苏拉哀叹道，“一开始好好的，又听话又体面连只苍蝇都舍不得打，结果刚长出胡子就都变

坏了。”与阿尔卡蒂奥不同，他知道自己是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她在家里支起一张吊床供他午睡。两人是母子，却更像是孤独中的同伙。庇拉尔·特尔内拉已经无所期盼。她的微笑带上风琴那般的低音，她的乳房经过无数爱抚耷垂下来，她的小腹和大腿成为无可挽回的尤物生涯的牺牲品，但她的心在衰老中不觉苦涩。她肥胖，饶舌，散发出落难主妇的傲气，摒弃了纸牌营造的乏味幻梦，却在旁人的爱情中找到了慰藉。就在奥雷里亚诺·何塞午睡的屋子里，邻家的姑娘们带着露水情郎来幽会。“把房间借给我，庇拉尔。”他们就这么简单说一句，人已经在屋里。“没问题。”庇拉尔回答。如果还有旁人在场，她会这样解释：

“人家在床上快活，我也快活。”

她从未为此收钱。她从未拒绝帮忙，就像她从未拒绝不计其数的男人，而直到她盛年的尾声还有人找上门来。他们既没有付出钱财也没有献上爱情，连愉悦也不过奉上寥寥几次。她的五个女儿遗传了她火热的天性，少女时代就迷失在人生的歧路上。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个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部队里战死，另一个十四岁时在大泽区某村偷一篓母鸡受伤被抓。在某种意义上，奥雷里亚诺·何塞就是半个世纪以来金杯国王向她允诺的那个高大黝黑的男人，他也像所有纸牌召唤来的男人一样，走进她内心时已经死星照命。她在牌上看到了。

“今晚你别出门，”她对他说，“你在这儿睡，卡梅莉塔·蒙铁尔求了我不知多少次，让我把她带进你屋里。”

奥雷里亚诺·何塞没能理解这一恳求的深意。

“告诉她半夜等我。”他回答。

他去了剧院。一家西班牙剧团将上演《狐狸的匕首》，那实际上是索里利亚的戏，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下令改了名字，因为自由派把保守派称作哥特人。[①]到入口验票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何塞才发现阿基莱斯·里卡多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搜查过往人流。

“留神，上尉，”奥雷里亚诺·何塞提醒道，“敢对我动手动脚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上尉试图强行搜查，奥雷里亚诺·何塞因为没带武器，撒腿便跑。士兵们没有听从开枪的命令。“他是布恩迪亚家的人。”一个士兵解释道。上尉气急败坏，一把抢过步枪，跨到街心，瞄准了目标。

“胆小鬼！”他喊了起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本人才好呢。”

二十岁的处女卡梅莉塔·蒙铁尔，刚用橘花水沐浴完毕，正在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床上撒迷迭香叶子，枪声就在这时响起。奥雷里亚诺·何塞本来注定要在她身上享受阿玛兰妲拒绝给予的幸福，生下七个儿女，最后老死在她怀里，然而一发步枪子弹被纸牌算命的失误导引，从他背后穿入在胸前开花。而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本是这天夜晚注定要死的人，确实比奥雷里亚诺·何塞早死了四个小时。枪声刚响，他就被两发至今未明来源的子弹同时击中，人群的呐喊随即响彻夜空。

“自由党万岁！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万岁！”

十二点时，奥雷里亚诺·何塞血已流尽，卡梅莉塔·蒙铁尔发现纸牌指引的前途落了空。四百多人列队从剧院门口经过，用左轮手枪向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被遗弃的尸体开火。填满铅弹的尸体像泡了水的面包支离破碎，动用了一个小队推着独轮车才运走。

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对政府军的过分举动深感恼火，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重又穿上军装，掌握了马孔多的军政大权。但他并不指望凭自己息事宁人的态度改变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态。九月间传来各种消息，彼此矛盾。政府一再宣称仍掌握着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而自由党人接连收到内陆武装起义的秘密消息。在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并判处其死刑之后，政府才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任何部队一旦抓到他必须立即执行枪决。“这就是说，他

回来了。”乌尔苏拉在蒙卡达将军面前喜形于色，但将军自己并没有得到这一消息。

实际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回国。人还未到，互相矛盾的传言就已传来，说他同一时间在相隔千里的不同地方出现，因此蒙卡达将军起初并不相信他已归来，直到官方正式宣布他占领了沿海两州。“祝贺您，大姐，”蒙卡达将军对乌尔苏拉说，同时把电报拿给她看，“您很快就能见着他了。”乌尔苏拉从那时起担心起来。“那您怎么办，老弟？”她问道。这个问题，蒙卡达将军已经问过自己很多次。

“和他一样，大姐，”他回答，“尽我的职责。”

十月一日黎明时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率领装备精良的一千人进攻马孔多，守军接到命令要抵抗到底。到中午蒙卡达将军与乌尔苏拉一起吃饭的时候，起义军的一声炮击响彻全市，将市政府金库的大门炸为齑粉。“他们的装备不比我们差，”蒙卡达将军感叹道，“而且他们士气更高。”下午两点，大地在双方的炮声中颤抖。他向乌尔苏拉道别，确信自己在打一场无望的仗。

“我祈求上帝让您今晚不会在家里看到奥雷里亚诺，”他说，“如果真是那样，请代我拥抱他，因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当晚，他试图逃离马孔多时被捕，临行前他还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了一封长信，追缅当年想让战争更人道的共同理想，并祝愿他在对抗两党军人腐败和政客野心的战斗中获得最终胜利。次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他在乌尔苏拉那儿共进午餐，他就被囚禁在那里等待革命军事法庭决定他的命运。这是一次家庭聚会。然而就在敌对双方忘却战事一起缅怀往昔的同时，乌尔苏拉心头却蒙上一层阴影，感觉自己的儿子才是外来的侵入者。她从看到他进门起就有这种感觉，那时一群喧嚣的军人护卫着他进来，搜遍各个房间确信没有危险才罢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仅允许他们这样做，还颁下严令不准任何人走进他周围三米以内，甚至连乌尔苏拉也

不例外，与此同时他的卫队在房子附近忙着设置岗哨。他身穿寻常粗布军装，没佩任何军衔标志，带马刺的长靴上沾满泥土和干血迹。他腰间佩戴手枪，枪套未扣，手永远按在枪柄上，与眼神一样显出高度的警觉与果断。他的前额如今分外开阔，像是被文火烤过。他的脸庞因加勒比海的盐分而皴裂，带着几分金属般的坚厉。他凭着某种活力胜过了迫近的衰老，只是这活力与内心的冷漠不无关联。他比离家时更高，更苍白嶙峋，开始表露不念旧情的迹象。“上帝啊，”乌尔苏拉心想，“他现在看起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的确成了这样的人。他带给阿玛兰妲的阿兹台克头巾，他在午饭时的怀旧，他口中的趣闻逸事，都不过是昔日性情的残余。将死尸掩埋到公墓里的命令刚被执行，他就指派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去敦促建立军事法庭展开审判，他自己则担负起推行激进改革的艰巨任务，决心将江河日下的保守党政权摧毁殆尽。“我们要赶在党内政客前面。”他对自己的顾问说，“等他们睁眼面对现实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既成事实。”就在此时，他决定审查百年来的地契，便发现了他哥哥何塞·阿尔卡蒂奥强占土地又将其合法化的行径。他将那些文书一笔勾销。最后出于礼貌，他搁下手头的事务，抽出一个小时去见丽贝卡通知他的决定。

在屋内的阴影中，那位曾经见证他被压抑的爱情，并以自己的执拗救过他性命的孤零孀妇已变成往昔的幽灵。她遍体着黑直到指节，心如死灰，对战事几乎一无所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觉她骨头的磷光从皮肤透出，感觉她在重重鬼火间行走，而凝滞的空气中还能隐隐闻到火药的味道。他开始劝说她节哀除丧，改善屋内通风，不要再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死迁怒整个世间。然而丽贝卡已经看破一切浮华。她曾经在泥土的味道中，在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芬芳的书信里，在丈夫如狂风暴雨的床榻上徒劳地寻寻觅觅，最终却在这个家中找到了安宁。在这里，记忆因思绪无情的力量化为实体，如同活人一般在幽闭的房间里游荡。她躺在藤摇椅里，望着奥雷里亚诺·布恩

迪亚上校，仿佛他才是一个往昔的幽灵。甚至听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强夺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她也不显丝毫激动。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奥雷里亚诺。”她叹息道，“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无情的人，现在更确定了。”

审查地契的同时即决审判也在进行，由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负责，以枪决所有被革命军俘虏的政府军军官告终。最后受审的是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乌尔苏拉出面干预。“他是我们马孔多有史以来最好的长官。”她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他心肠有多好，待我们多亲切，就更不用我跟你说了，因为你比谁都清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满地盯着她。

“我不能越权执法，”他回答，“如果您有话要说，请到军事法庭上去说。”

乌尔苏拉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叫上了所有生活在马孔多的革命军军官的母亲。这些建村元老都已年迈，其中不少人参加过当年翻越山脉的可怕远征，她们一个接一个颂扬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的种种恩德。乌尔苏拉最后登场。她庄严的哀伤、她显赫的姓氏，以及她令人信服的慷慨陈词一度打破法庭的平静。“诸位把这场可怕的游戏玩得很认真，你们做得不错，因为你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对法庭成员说，“但是请别忘了，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还是母亲；不管你们有多么革命，只要没规矩，我们就有权脱了你们的裤子打一顿。”法官们退庭讨论，她那铿锵的话语仍在已变为军营的学校里回响。午夜时分，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被判处死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顾乌尔苏拉激烈的责骂，拒绝改判。快天亮的时候，他去牢房探望死囚。

“你记住，老兄，”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是革命要枪毙你。”

看见他走进来，蒙卡达将军甚至没从床上起来。

“见鬼去吧，老兄。”他回答。

直到此刻，归来以后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有机会与他真诚相对。上校惊讶于他的猝然衰老、他双手的颤抖、他等候死亡时多少出于惯性的逆来顺受，于是感到一阵对自己的深深蔑视，却将其误认为同情心萌发的表现。

“你比我更清楚，”他说，“所有的军事法庭都是闹剧。实际上你是在为别人的罪行受过，因为这次我们不惜代价要赢得胜利。换了是你，难道不会这样做？”

蒙卡达将军站起身来，用衬衫衣角擦拭玳瑁框眼镜的厚镜片。“也许吧，”他说，“不过我担心的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说到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就算是自然死亡了。”他把眼镜放在床上，又摘下怀表。“我担心的是，”他补充道，“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他摘下结婚戒指和救难圣母徽章，与眼镜和怀表放在一处。

“这样一来，”他总结道，“你不仅会变成我们历史上最专制最残忍的独裁者，而且还得枪毙我的乌尔苏拉大姐来抚慰你的良心。”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蒙卡达将军将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递给他，换了副口气。

“不过我让你来不是为了指责你，”他说，“我想拜托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妻子。”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东西收进兜里。

“她还在马纳乌雷吗？”

“还在马纳乌雷，”蒙卡达将军确认道，“还在教堂后面你送过信的同一幢房子里。”

“很乐意效劳，何塞·拉克尔。”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

当他走入蓝色的晨雾，脸庞像当年另一个清晨那般湿润，他才明白为什么要下令在院中行刑，而不是在墓地的墙前。行刑队在门前列

开，向他致以对国家元首的敬礼。

“可以把他带来了。”他下了命令。

---

①此处剧目为西班牙剧作家何塞·索里利亚的《哥特人的匕首》。西班牙语中“索里利亚”（Zorrilla）字面上有“狐狸”的意思。

九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第一个感觉到战争的虚无。身为马孔多的军政首领，他每星期两次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互通电报。起初，这种通话决定着一场血肉战争的进程，那清晰的局势让他们任何时刻都能确认所处位置并预见未来走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虽然从未与人推心置腹，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但那时尚保持着亲切的口吻，能让线路另一端的人辨认出来。很多次他都延长谈话超出预计，扯开话题拉起家常来。然而随着战事吃紧战火绵延，他的形象渐渐黯淡，消逝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代表他声音的点横越来越遥远模糊，汇聚组合而成的词语逐渐失去意义。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只是倾听，心中却感惶惑，觉得仿佛在和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通电。

“明白，奥雷里亚诺，”他总是按下发报键这样作结，“自由党万岁！”

他最终失去了与战争的一切关联。曾几何时一段真实的经历，一股青春年代不可抗拒的激情，如今对他而言已成为遥远的注脚：虚无而已。他在阿玛兰妲的缝纫间里找到了唯一的慰藉。他每天下午都去看她。他喜欢看着她的双手为细麻布上褶，美人儿蕾梅黛丝则在一旁摇着缝纫机的摇柄。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度过几个小时，享受彼此的陪伴。但当阿玛兰妲因他衷情不改而暗自欣喜的时候，他却猜不透她那无法捉摸的秘密思绪。刚听到他归来的消息，阿玛兰妲心中就无比焦灼。但当看见他混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卫队中进门，看见他被严酷的流亡生活折磨得脱了形，因岁月流逝和遭人遗忘而愈显衰老，因汗水和尘土而污秽不堪，左臂悬着绷带模样丑陋，甚至还闻到他散发出牲畜的气味，她险些因幻灭而晕倒。“上帝啊，”她想，

“这可不是我盼的那个人。”但第二天他再次登门时，已经剃须沐浴，髭髯散发出薰衣草的香气，臂上染血的绷带也不见了。他给她带来一本散发着珍珠光泽的精装祈祷书。

“男人真是奇怪，”她这样说，因为想不出别的话来，“反对教士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还送人祈祷书。”

从那以后，即使是战事最激烈的时日，他仍然每天下午来看她。有很多次美人儿蕾梅黛丝不在，他就负责转动缝纫机的摇柄。阿玛兰妲面对这个男人表现出的恒心、忠诚和温顺不知所措—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总是将所有武器留在客厅，寸铁不带地走进缝纫间。四年间他多次求爱，她总能找到办法拒绝却不伤害他，因为她虽然不再爱他，却也离不开他。美人儿蕾梅黛丝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且被认为智力发育迟缓，却为这痴情感动，自愿帮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项。阿玛兰妲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手抚养成人的小女孩刚刚步入花季，就已出落成马孔多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女子。她感到当年对丽贝卡的那种仇怨在心中苏醒，于是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走上极端盼望她死去，同时将她赶出了缝纫间。就在这个时期，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开始厌倦战争。他对阿玛兰妲百般劝说，表露出深沉蕴藉的无限柔情，甚至不惜为她牺牲自己用锦绣年华换来的荣光，但却没能说服她。八月的一个下午，阿玛兰妲在彻底拒绝了这位坚毅的追求者后，再也无法忍受执拗性情的重压，锁在房间里为自己孤独到死的命运痛哭起来。

“你我都忘掉对方吧，”她对他说，“我们已经老得不适合谈这种事了。”

那天下午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收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电报。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谈话，没有为胶着的战局带来任何突破。谈话即将结束时，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荒凉的街道、巴旦杏树上凝结的水珠，感觉自己在孤独中迷失了。

“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机器上跳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赫里内勒多，”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两人时隔太久没有见面，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猝然间收到这样粗暴的回答，不由一阵茫然。两个月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回到马孔多，这茫然变作了惊愕。连乌尔苏拉都惊讶于他的改变。他回来时没有声张没带卫队，不顾天热裹着斗篷，和三个情人住在同一间屋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吊床上。他几乎不怎么看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文。有一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向他请示如何从边境上的一处地方撤离，以免引发国际纠纷。

“别拿这种小事来烦我，”他下令道，“去问上帝吧。”

那或许是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已经与保守派地主签订秘密协定，以阻挠地产审查。在流亡中借战争渔利的政客已经公开指责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激进行为，但即使是这样的群起反对也没能令他萦怀。他写下的五卷多诗歌再也没有读过，被遗忘在箱底。到晚上或午睡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女人中叫一个上吊床，从她身上获得欢愉，随即沉沉睡去，不曾流露丝毫忧虑。这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惶惑的心灵永远失去了平静。起初他陶醉于凯旋的荣光、不可思议的频频得胜，濒临显赫声名的深渊。他将马尔伯勒公爵置于座右，此人是教授他战争艺术的导师，以一身虎皮虎爪的华服让大人起敬、令小儿惊悚。正是那时他作出决定，任何人，包括乌尔苏拉在内，都不得靠近他身旁三米以内。他走到哪里都待在副官们用粉笔画出且只有他一人能进入的圆圈中心，从那里发出简短却不容置疑的命令，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他处决蒙卡达将军后第一次到马纳乌雷时，一刻也没延误，就去完成死于己手的受害者的遗愿。将军遗孀接过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却不允许他进门一步。

“请别进来，上校。”她对他说，“在您的战争里您说了算，但在我家里我说了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没有显出丝毫不快，但在私人卫队将那位寡妇的家舍夷为平地化为灰烬之后，他的心才恢复平静。“留神你的心，奥雷里亚诺，”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正在活活腐烂。”那一时期，他召集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各色人等群集，有理想主义者、野心家、冒险者、愤世嫉俗者，还有普通的罪犯。甚至一位前保守党官员也在其中，他贪污公款后托身于起义军以逃避法律制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他们彼此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几乎要酿成一场内讧，就在这鱼龙混杂中一位居心叵测的强权人物脱颖而出—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他是纯印第安人，出身山野，大字不识，却暗藏祸心，同时拥有救世主般的感召力，引得手下狂热地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召集会议是为了统一起义军的指挥，以抵制政客的操纵。但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抢在了他前面：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让最优秀的将领组成的联盟土崩瓦解，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狡诈的野兽，需要小心提防，”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手下的军官们说，“对我们来说，这人比国防部长更危险。”这时，一位一向极其腼腆的年轻上尉小心翼翼地竖起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提议道，“得杀了他。”

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吃惊的并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而是竟有人一瞬间抢先一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别指望我下这个命令。”他说。

他没下命令，的确没有。但十五天后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遇伏，在乱刀下被剁成肉酱，大权落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手中。就在他的权威被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当天夜里，他猝然惊醒，叫喊着要毯子。一种内在的寒冷直入骨髓，即使烈日当空也让他不堪其苦，好几个月都难以安眠，到最后成了习惯。权力带来的陶醉消失

于阵阵烦恼之中。他试图找到抵御寒意的方法，就下令枪毙了提议暗杀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上尉。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甚至早在他动念之前，就已被执行，而且总会执行得超出他事先所敢想望的范围。他大权独揽却在孤独中陷入迷途，开始失去方向。被占领市镇中人们的欢呼令他厌烦，因为他们也曾向他的敌人发出同样的欢呼。每到一处，他总能见到那些少年用和他一模一样的眼睛望着他，用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同他说话，向他致意时的警惕神色和他回应时的神色一般无二，并且都自称是他的儿子。他感觉自己被分裂，被重复，从未这般孤独。他确信手下的军官对自己撒谎。他对马尔伯勒公爵也产生了敌视。“最好的朋友，”那时他常这样说，“是刚死去的朋友。”他厌倦了战事无常，身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中总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一次比一次越发老迈，越发衰朽，越发不知道为何而战、如何而战、要战到何时。总有人待在粉笔圈外，手头拮据的人，儿子得了百日咳的人，因为受不了嘴里粪便一样的战争味道而想一睡不醒、但仍鼓足最后的气力报告的人：“一切正常，我的上校。”正常恰恰是这场无尽的战争最可怕的地方：什么都不曾发生。他深陷孤独，不再感知到预兆，他为了逃避必将陪伴他终生的寒意回到了马孔多，在最久远的回忆中寻求最后的慰藉。他如此懒怠，当听说党组织派来一个代表团商议如何打破战争的僵局时，也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有完全醒转。

“带他们去逛窑子。”他说。

来的是六位身着礼服头戴礼帽的律师，在十一月的烈日下以极大的坚忍耐着酷暑。乌尔苏拉把他们安顿在家里。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关在卧室里密谋，到了晚上就请来卫兵和手风琴乐队，自费去卡塔利诺的店里消遣。“别打扰他们，”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下令，“总之，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十二月初，期待已久的会谈开始，很多人事先预计将会极其漫长，实际上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覆着如裹尸布般白床单的自动钢琴透出几分鬼气，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就坐在钢琴旁，这回他周围没有副官用粉笔画的圆圈。他由自己的政治顾问们簇拥着坐在椅子上，裹在羊毛毯里，安静地倾听使者们简要的建议。他们首先请求放弃审核地产以重新换取自由派地主的支持，其次请求放弃对抗教会势力来获取信众的拥护，最后请求放弃争取私生子与婚生子的同等权利以维护家庭完整。

“你们的意思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听罢微笑道，“我们只是为了权力而战。”

“这只是暂时的调整。”一位代表回答，“当下，最重要的是扩大战争的群众基础，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迫不及待地插入谈话。

“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说，“如果这些调整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保守党政府是正确的。如果靠这些调整就能扩大战争的群众基础，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政府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总而言之，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和全国人民作对。”

他还想继续，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用一个手势打断了他。“不用浪费时间，博士。”他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我们只为权力而战。”他仍微笑着，接过代表们递上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是这样，”他总结道，“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他的手下面面相觑，迷惑不解。

“抱歉，上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轻声说道，“这是背叛。”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半空停下蘸了墨水的笔，将全部威权都压到他身上。

“交出你的武器。”他命令道。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站起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去军营报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下令道，“听候革命军事法庭发落。”

随即他签署了声明，交给使者，说道：

“先生们，拿好你们的文件。好好利用吧。”

两天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吊床高卧，对一切求情置若罔闻。行刑前夜，乌尔苏拉不顾禁止打扰的命令，到卧室去见他。她一身黑衣，带着罕见的肃穆神情，在会面的三分钟内一直保持站姿。“我知道你要枪毙赫里内勒多，”她庄严宣告，“我怎么做也拦不住。但是我告诉你：我以我父亲和我母亲的骨头发誓，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名义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只要一看见他的尸体，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立刻把你揪出来，亲手杀了你。”没等他回答，她转头就走了，最后又丢下一句话：

“就跟你出生时如果长着猪尾巴一样处理。”

那个漫无尽头的夜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追忆着在阿玛兰妲缝纫间里度过的那些一去不返的午后时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则苦苦挣扎了数小时，试图抓裂自己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午后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在金银器作坊里打造小金鱼的时刻。他被迫发动三十二场战争，打破与死亡之间的所有协定，并像猪一样在荣誉的猪圈里打滚，最后耽搁了将近四十年才发现纯真的可贵。

天亮的时候，离行刑还有一个小时，他来到牢房里，因整夜未眠备受煎熬而显得精疲力竭。“闹剧结束了，老兄，”他对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我们离开这儿，不然蚊子就先把你枪毙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无法掩饰对这一态度的蔑视。

“不，奥雷里亚诺，”他回答，“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你变成一个屠夫。”

“不会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穿上鞋，帮我结束这场狗屁战争。”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结束一场战争要比发动它艰难得多。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以血腥手段强迫政府同意对起义军有利的和平条件，又用了一年时间说服自己党派的人接受这些条件。他甚至不惜运用超出想象的铁腕手段来镇压手下那些不肯出售胜利果实的军官的反叛，最终还是借助敌人的力量才令他们屈服。

他从未像那时一样骁勇善战。他终于能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不再为抽象的概念，不再为政客见风使舵、翻云覆雨的口号而战，这样的信念令他激情满怀、斗志昂扬。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一如以往坚定忠诚，当初怎样为胜利而战，如今便怎样为失败而战。他曾责备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谓的鲁莽。“别担心，”上校微笑着回答，“死亡远比想象的要难。”就他而言，的确如此。他坚信自己的大限早已注定，这信念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免疫力和一定期限的永生，使他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最终赢得一场比胜利更艰难、更血腥、代价更高昂的失败。

在将近二十年的沙场生涯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多次回家，但由于总是身处紧急状态，总有军队随员簇拥身旁，总有传奇光环笼罩四周—那光芒连乌尔苏拉也无法视而不见—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最近一次回马孔多，是和三位情妇单住一处，只在家里出现过两三次，还是有空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美人儿蕾梅黛丝和战时出生的那对孪生子，几乎都不认识他。阿玛兰妲也无法将少年时代制作小金鱼的兄长，与这个用三米隔离线把自己和其他人隔开的传奇军人联系起来。然而当停战的日子临近，家人想到他会变成正常人回归家庭，长久沉睡的亲情便以前所未有的劲头复苏了。

“终于，”乌尔苏拉说，“我们家又有男人了。”

阿玛兰妲第一个怀疑家里人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前一星期，他没带卫队而只让两个赤脚的勤务兵走在前面，进家后把骡子上的鞍

和收藏诗稿的箱子卸在长廊里，那是他当年帝王般行装仅存的部分。她看见他从缝纫间门口经过，便叫了一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似乎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我是阿玛兰妲呀。”她为他的归来感到欣喜，高兴地说，又向他举起缠着黑纱的手，“你看。”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微微一笑，一如那个遥远的清晨他被判死刑回到马孔多，第一次看见她缠着黑纱的时候。

“真可怕，”他说，“时间过得真快！”

政府军必须将房子保护起来。他在回来的一路上遭人唾骂，被指责加剧战事只为了卖上更好的价钱。他发烧畏寒，浑身颤抖，腋下又一次生满疖子。六个月前，乌尔苏拉听说了停战的消息，便打开他的婚房清扫一新，又在各个角落点起没药熏香，想着他这次回来应该会在蕾梅黛丝发霉的娃娃间安心养老。然而，最近两年他已耗尽对生命的全部眷恋，连安度晚年也已与他无缘。他从乌尔苏拉格外用心拾掇过的金银器作坊门口走过，甚至没发觉门上的锁眼里已插好钥匙。他对时光在家中侵蚀出的种种令人心碎的细微创痕毫无察觉，而任何一个还保有鲜活记忆的人，像他这样长久离家后归来都本该有触目惊心之感。壁上石灰墙皮剥落，角落里肮脏蛛网絮结，秋海棠落灰蒙尘，房梁上白蚁蛀痕纵横，门后青苔累累，然而乡愁的精巧陷阱徒然虚设，这一切都没能勾起他的忆旧伤怀。他在长廊里坐下，裹着毯子，连靴子也没换，仿佛只想等待雨停。整个下午，他都在观看落在秋海棠上的雨水。乌尔苏拉这才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家里待得长久。“如果不是战争，”她想，“那就是死亡把他带走。”这推测如此清晰可信，她当作是一种预兆。

当天晚饭席间，那个应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第二的孩子用右手掰面包，左手喝汤，而他的孪生兄弟，应该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用左手掰面包，右手喝汤。他们动作整齐划一，不像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更像是照镜子的游戏。孪生兄弟自从意识到彼此的相

像便发明出这一游戏，这次为了给他接风又特意上演。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毫无察觉。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都没注意到美人儿蕾梅黛丝赤着身子走向卧室。只有乌尔苏拉敢于打断他的出神。

“如果你注定还要走，”她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说，“至少要记住我们今晚的样子。”

这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意识到—却毫不意外—乌尔苏拉是唯一能够看透自己不幸的人。多年来，他第一次鼓起勇气正视她的脸庞。她皮肤皴裂，满口蛀牙，头发枯白，眼神惊慌。他唤起心中尚存的最久远的记忆，那个他曾预感滚烫的汤锅将从桌上掉落的下午，相比那时如今的她已是面目全非。一瞬间，他意识到半个多世纪的操持给她留下了种种创伤与疤痕，也证实了这些磨难并不能在自己心里激起分毫怜悯。于是他作出最后的努力，在心中寻找情感腐蚀殆尽的所在，却没能找到。曾几何时，他在自己的皮肤上嗅到乌尔苏拉的体味，至少还隐约感到羞赧，他也不止一次感到自己的思想受她干扰。然而这一切都已被战争抹去。就连蕾梅黛丝，他的妻子，此刻也不过是某个足可做他女儿的人的模糊形象。他在爱的荒漠中结识的无数女人，把他的血脉播撒在整个沿海地区，却不曾在他的情感中留下任何痕迹。她们大多摸黑进房，黎明前离去，次日给他留下的只是肉体的些许厌倦感。唯一经受了时间和战争考验的，只有孩提时代他对哥哥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感情，但那却不是基于友爱，而是源于同谋。

“对不起，”他找借口推脱乌尔苏拉的请求，“这场战争把一切都毁了。”

此后的日子，他忙于毁去在世上留下的一切痕迹。他清理金银器作坊，只留下不带任何个人标记的用具；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勤务兵；怀着父亲当年埋葬刺死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长矛时的忏悔心情，把武器埋在院子里。他只留下一把手枪，一发子弹。乌尔苏拉没有干涉他。她只是在他想要毁掉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时，才上前劝阻。那

照片保存在客厅里，由一盏长明灯照亮。“这张照片早就不属于你了，”她说，“这是留给全家的遗物。”到停战前夜，家里一件与他有关联的物事都没剩下。他带上装诗稿的箱子来到面包房，遇上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正准备点炉子。

“用这个点火，”他对她说，递过第一卷发黄的纸张，“更好烧，都是很旧的东西。”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一向寡言温顺，连对自己的儿子都从未拂逆，这时却觉得不能遵命行事。

“这是很重要的文件。”她说。

“哪儿的话，”上校说，“是自己写给自己的玩意儿。”

“那么，”她说，“您自己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样做了，还用小斧子把箱子劈了，将木片丢入火中。几个小时前，庇拉尔·特尔内拉来看他。多年未见，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惊讶于她已如此衰老，如此肥硕，同时纸牌算命术又如此精进。“当心嘴巴。”她告诉他。他不禁暗自思忖，她在他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也这样说过，莫非那是对他命运的预见，只是惊人地提前了而已？不久，私人医生为他除去疖子的时候，他不经意地问起心脏的确切位置。医生用听诊器听罢，拿蘸了碘酒的棉团在他胸前画了个圈。

星期二停战日的清晨天气温和，细雨绵绵。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到五点就走进厨房，喝他惯常喝的不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出生的，”乌尔苏拉对他说，“所有人都被你睁开的眼睛吓坏了。”他没有理会，因为他正专心倾听部队的集合声、军号声和打破黎明寂静的颁令声。尽管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他对这些已是司空见惯，但这回却仍像年轻时面对一个女人的胴体一样感到双膝发软浑身震颤。他最终还是陷入了怀旧的罗网，隐约想着自己如果娶了她，或许会远离战争和荣耀，做一个无名的匠人、一头幸福的动物。这迟来的震颤并不在他的预料当中，给早饭添了几许苦涩。早上

七点，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军官来找他，发现他变得更加沉默、孤独、阴郁。乌尔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毯子。“政府会怎么想呢，”她对他说，“人家还以为你是因为连买毯子的钱都没有才投降的。”但他没有接下毯子。直走到门口，看见雨还在下，他才答应戴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一顶旧毡帽。

“奥雷里亚诺，”这时乌尔苏拉对他说，“答应我，你如果在那边碰上难缠的事，就想想你母亲。”

他冲她淡淡一笑，伸直五指举起手来，一言不发走出门去，迎上一路的叫喊、谩骂和诅咒直到市镇出口。乌尔苏拉挂上门闩，决定有生之年不再摘下。“我们就在家里烂掉吧，”她想，“就在这没有男人的家里化成灰。绝不能让这个可耻的市镇看见我们流泪。”她整个上午找遍最隐秘的角落，却没能找到任何能拿来怀想儿子的物事。

仪式在距马孔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巨大木棉树的浓荫下举行，日后将围绕这棵树建起尼兰迪亚镇。负责接待政府与两党代表，以及起义军缴械代表团的是一群身着白衣、唧唧喳喳的见习修女，她们活像风雨中盘旋飞舞的受惊鸽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骑着一头泥迹斑斑的骡子到来。他没有刮胡子。既然已抵达一切希望的终点，丧失了全部荣光以及对荣光的怀念，比起梦想的破灭来倒是疖子的烦扰更令他痛苦。按照他的要求，现场没有音乐，没有爆竹，没有庆典钟声，没有欢呼喝彩，没有任何可能破坏停战悲凉气氛的程序。一位旅行摄影师为他拍了唯一一张本可能流传后世的照片，却被迫在显影前毁掉了底版。

仪式仅仅持续了签署文件所需的一段时间。各方代表在补丁重重的马戏团帐篷正中一张简陋的桌前就坐，忠心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到底的军官围在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特使准备高声朗读降书，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表示反对。“我们不要在形式上浪费时间了。”他说，看也不看就要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手下的一位军官打破了帐篷里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默。

“上校，”他说，“拜托您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同意了。现场一片寂静，仿佛能从清晰可辨的笔尖落纸声中听出签的是谁的名字。文件在桌上整整转了一圈，最前面的位置依然空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准备填上这一空白。

“上校，”他手下的另一位军官说，“现在挽回还来得及。”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在第一份文件上签了名。最后一份还没签完，一位起义军上校牵着骡子出现在帐篷门口，骡背上驮着两个箱子。来人非常年轻，却显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他是马孔多地区革命军金库的保管人。他拽着饥肠辘辘的骡子艰难跋涉了六天，终于在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及时赶到。他万分谨慎地卸下箱子，打开，一块接一块共取出七十二块金砖摆在桌上。没人记得有这笔财富存在。最近一年的混乱中，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沦为各部首领之间的血腥混战，再无任何职责可言。革命军的黄金被熔铸成砖锭，后来又裹上一层陶土，却落得无人监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这七十二块金砖列入上缴清单，不容多说当下就结束了仪式。瘦削的年轻人仍站在他面前，一双糖浆色的眸子肃然望着他的双眼。

“还有事吗？”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问道。年轻的上校从牙缝间挤出两个字。

“收据。”他回答。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了张收据给他。随后他喝了杯见习修女分发的柠檬水，吃了块饼干，就退到事先备好供他休息的野战帐篷里。他脱下衬衣，坐在行军床边，于下午三点一刻拿起手枪朝胸前私人医生画圈的地方开了一枪。同一时刻在马孔多，乌尔苏拉见灶上的奶锅久烧不开，便掀开锅盖，发现里面满是蛆虫。

“他们杀了奥雷里亚诺！”她喊道。

她出于孤独时养成的习惯往院中望去，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雨中淋得浑身湿透，神情哀伤，比死的时候衰老许多。“他们背信弃义杀了他，”乌尔苏拉对此确信无疑，“没有人会好心为他合上眼睛。”到傍晚的时候，她透过泪水看见发光的橙色圆盘如闪电般急速飞过天空，便相信这就是死亡的兆头。当她还在栗树下伏在丈夫膝上啜泣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已被人送回家来，他裹在结着血迹变得硬挺的毯子里，愤怒地圆睁双眼。

他没有生命危险。子弹的轨迹完美无缺，医生能够将一根浸过碘酒的丝带从他胸前塞进又从后背拉出。“这是我平生的杰作。”医生得意地对他说，“这个点是唯一一处子弹可以穿过而不伤及重要器官的地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现身边围满了慈悲的见习修女，正绝望地念诵圣诗祈求他的灵魂安息。于是他深深悔恨仅仅为了嘲弄庇拉尔·特尔内拉的预言，没有按当初的计划在腭部开枪。

“如果我现在还掌权，”他对医生说，“我就会不经审判直接枪毙你。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让我成为笑柄。”

短短几个小时里，自杀未遂使他恢复了失去的荣誉。那些编造谣言说他出卖革命换来一间金砖砌墙的卧室的人，现在都将他的自杀举动誉为悲壮之举，视他为烈士大肆颂扬。后来当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勋章，连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也陆续来到家中，请求他推翻停战协定，发动新的战争。屋里堆满了赔情道歉的礼品。晚些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被旧日同袍的广泛支持所触动，并没有排除顺应众意的可能。不仅如此，有时他还显得很热衷想再发动一场战争，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觉得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理由出现了：共和国总统表示，在特别委员会一一审查以及国会批准抚恤金申请之前，不会给自由派或保守派的老兵发放抚恤金。“这是在践踏协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怒吼道，“他们会等邮件等到死。”他第一次从乌尔苏拉买来给他养伤的摇椅上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口述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

从未公开的电文中，他严词谴责这第一次罔顾尼兰迪亚协定的行径，威胁说养老抚恤金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十五天内解决，他将再次发起战争，不死不休。他自觉态度磊落无私，还期望保守派的老兵支持。然而政府的唯一答复便是以保护为名加强了部署在他家门口的武装力量，并禁止一切探访。相似的措施也应用到了其他需要监视的军事首领身上。这场行动雷厉风行，及时有效，到停战两个月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伤势痊愈时，当初极为坚决鼓动他起事的手下不是被杀便是被驱逐出境，或是死心塌地融入到政府机关中。

十二月，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出了房间，往长廊里只看了一眼便彻底打消了开战的念头。乌尔苏拉迸发出与年龄全然不符的活力，令家中焕然一新。“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人，”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大碍便说，“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人家。”她请人清扫和油漆房屋，更换家具，重整花园，播下新花种，大开门窗让夏日的明净阳光照进卧室。她宣布一次次累加的丧期结束，自己也脱下死气沉沉的旧衣，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新衫。自动钢琴再次奏响，为家里带来欢乐。听到钢琴声，阿玛兰妲想起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想起了黄昏时分他佩戴的栀子花、他身上的薰衣草香气，她枯萎的内心深处萌生出经岁月淘洗后的纯净幽怨。一天下午整理客厅的时候，乌尔苏拉向看守住宅的士兵请求帮忙。年轻的警卫队队长批准了这一请求。渐渐地，乌尔苏拉不断委派他们新的任务。她请他们吃饭，送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写。当政府撤除监视时，有一个士兵还留下来，为家里服务了许多年。新年那天，年轻的警卫队队长受不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冷落而失去理智，天亮前在她窗前殉情而死。

十

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榻上，奥雷里亚诺第二将会回想起那个阴雨绵绵的六月午后，他走进卧室去看自己的头生子。那孩子孱弱又爱哭，没有丝毫布恩迪亚家人的样子，但他未作多想便给他取好了名字。

“叫他何塞·阿尔卡蒂奥。”他说。

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他一年前娶来的美丽妻子，表示同意。但乌尔苏拉无法掩饰那隐隐的不祥预感。她从家族漫长历史上重复命名的传统中得出了在她看来无可争辩的结论：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都性格孤僻，但头脑敏锐，富于洞察力；所有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都性格冲动，富于事业心，但命中注定带有悲剧色彩。唯一无法归类的特例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他们在童年时如此相似又顽皮，连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也分不清。洗礼那天，阿玛兰妲给他们戴上写有各自名字的手环，穿上颜色不同并标有名字缩写的衣服。可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决定互换衣服和手环，管自己叫对方的名字。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老师已经习惯管穿绿色衬衣的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因此当发现后者戴着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手环，而另一个虽然穿着白色衬衣戴着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手环，也自称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时候，不禁大为光火。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确定无误地分辨两人。他们渐渐长大，不再彼此酷似，但乌尔苏拉仍暗自寻思，他们会不会在玩复杂换名游戏的某一时刻混淆，从此永远对换了身份。直到青春期初始，他们仍是按同一节奏生活。他们同时醒来，同时想去浴室，同样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做同样的梦。家人一向以为他们动作划一只是为了让人混淆，直到有一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发现了真相：她给兄弟俩中的一个一杯柠檬水，他刚尝了

一口，另一个就抢先说里面没放糖。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想起来的确忘了放糖，随后把事情讲给乌尔苏拉听。“全都一个样，”她毫不惊奇，“天生的疯子。”随着时间流逝，事情都乱了套。在换名游戏中保留下奥雷里亚诺第二这名字的男孩变成和祖父一样的彪形大汉，而那个叫作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却长得像上校一样瘦骨嶙峋，两人之间仅存的共同点就是家传的孤独气质。或许正是这种体魄、姓名与性格的交错，才使得乌尔苏拉怀疑他们从童年时起就互换了身份。

两人之间的差异在战争最酣时显露无遗，那时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请求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看枪决犯人。尽管有乌尔苏拉反对，他的愿望还是得到了满足。但对奥雷里亚诺第二来说，光是去看行刑这念头就足以让他胆战心惊。他宁愿待在家里。十二岁那年，他问乌尔苏拉那个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纸，”她回答，“是梅尔基亚德斯的书和他最后几年写的古怪东西。”这回答不但没令他满意，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反复恳求，并保证不破坏任何东西，最后乌尔苏拉给了他钥匙。自从梅尔基亚德斯的尸体被搬出之后，再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门上的锁都已锈住。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窗子，一道光线施施然射入，仿佛是这房间的常客，天天造访从未间断，而且屋内没有丝毫灰尘或蛛网，一切整洁如经清扫，甚至比梅尔基亚德斯下葬那天还要干净几分。墨水瓶里没有干涸，金属材料上不见锈迹，连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烧煮水银的炉火也不曾熄灭。隔板上摆放着用一种色泽苍白、硬如纸板，仿佛鞣制人皮的材料做衬面的书籍，还有保存完好的手稿。虽然幽闭多年，房间里的空气却似乎比家中别处还要纯净。一切都如此整洁，几个星期后乌尔苏拉提着水桶拿着扫帚走进房间想要打扫的时候，竟发现无事可做。奥雷里亚诺第二沉浸在一本书里。这书缺了封面，哪儿都找不到书名，那孩子仍读得津津有味，诸如一个女人坐在桌旁用大头针专挑饭粒吃，一位渔夫向邻居借压渔网用的铅坠，后来作为报偿送的鱼腹中

含有一颗钻石，此外还有能满足一切愿望的神灯的故事和飞毯的传奇。他惊奇地询问乌尔苏拉这些可都是真的，她回答说是，多年前吉卜赛人就曾给马孔多带来神灯和飞毯。

“只不过，”她叹了口气，“世界一天不如一天，那些东西也不见了。”

看完这本很多故事因为缺页没有结束的书，奥雷里亚诺第二开始破译手稿，只是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手稿上的字迹仿佛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比起文字来更像是音符。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正在钻研手稿，忽然感觉自己并非单独待在房间里。背对窗口的光线，梅尔基亚德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不到四十岁，穿着同一件不合时宜的坎肩，戴着同一顶鸦翼状礼帽，发间的油脂因炎热而融化，沿着苍白的鬓角流淌，与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孩童时所见一模一样。奥雷里亚诺第二立时认出了他，因为这份记忆代代相传，从祖父遗传到了他这里。

“你好。”奥雷里亚诺第二说。

“你好，年轻人。”梅尔基亚德斯说。

从那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梅尔基亚德斯为他讲起世上万事，想把古老的智慧传授给他，却不肯译出手稿。“不到一百年，就不该有人知道其中的含义。”他解释道。对于这些交谈，奥雷里亚诺第二终生持守秘密。有一次，他感觉自己的世界瞬时崩塌了，因为乌尔苏拉在梅尔基亚德斯出现时进了房间。但她看不见他。

“你在和谁说话？”她问。

“没和谁。”奥雷里亚诺第二回答。

“你曾祖父也是这样，”乌尔苏拉说，“他也老自言自语。”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实现了观看枪决的愿望。他毕生都将记得六个枪口同时冒出的青色焰光、回响于山间直至消失的枪声，以及死刑犯凄惨的微笑和迷茫的眼神。那人保持直立，鲜血浸透衬衫，从柱

子上被解下到被塞进装满石灰的棺材一直微笑着。“他还活着，”他想，“他们要把他活埋。”这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厌恶军事演练和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行刑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活埋死刑犯的做法。没人知道他从何时起开始到钟楼上敲钟，帮助“新手”的继任者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做弥撒，还负责喂养神甫住处院里的斗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得知后，严厉批评他竟去学习这些被自由派唾弃的行径。“问题是，”他回答，“我觉得我天生是保守派。”在他看来，这是命中注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大为光火，忙去告诉乌尔苏拉。

“这更好。”她表示赞成，“但愿他当个神甫，这样上帝就终于能进这个家门了。”

很快便听说，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为他准备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他一边为斗鸡修剪颈羽，一边跟神甫学习教理问答。在他安置母鸡抱窝的时候，神甫用简明的例子为他解释上帝如何在创世第二日想到让鸡在蛋中孕育。从那时起神甫表现出老年谵语的最初症状，数年后甚至妄言或许魔鬼已在对上帝的反叛中获胜，如今是它坐在天国的宝座上，隐藏自己的身份来引人受骗上当。经过导师的大胆锤炼，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足以迷惑魔鬼的神学诀窍，不亚于他在斗鸡方面的百般花招。阿玛兰妲给他做了身亚麻正装，配上硬领和领带，又给他买了一双雪白的鞋子，还用金字把他的姓名印在大蜡烛的丝带上。领圣体前两天，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把两人关在圣器室里听他告解，手捧一本罪孽大全作为参照。那份罪孽清单那么长，神甫上了年纪，平时又习惯六点就寝，终于没等结束就在扶手椅上睡了过去。这场问讯令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眼界大开。神甫问他有没有和女人做坏事，他并不吃惊，当下如实回答没有，但被问到有没有和动物做过的时候，他不禁一阵惶然。五月第一个星期五，他在好奇心的煎熬中领了圣体。后来他去向佩特洛尼奥请教，这个疾病缠身的圣器保管人住在钟楼上，据说以蝙蝠为食，他这

样回答：“是有些堕落的基督徒和母驴干那种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仍很好奇，缠着问个不停，佩特洛尼奥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每星期二晚上去，”他透露了秘密，“如果你保证谁也不告诉，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到了星期二，佩特洛尼奥果然拎着一张此前无人知晓其用途的小木凳，下了钟楼，带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走进附近的一处菜园。男孩迷上了这样的夜间出游，很长一段时间后卡塔利诺的店里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他一心扑在斗鸡上。“把你的这些畜生拿到别处去，”乌尔苏拉第一次看见他带着漂亮的斗鸡回来，便下了命令，“斗鸡让这个家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你现在还给我们往回带。”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没有争辩就照办了，带到他祖母庇拉尔·特尔内拉那里继续养，后者只要他肯来，愿意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很快他在斗鸡上显露出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传授的智慧，挣的钱不仅够他扩大养殖，也可以满足他作为男人的需要。那时候乌尔苏拉拿他与他兄弟相比，难以理解童年时相似如一个人的兄弟俩最后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迥异。她无须困惑太久，因为奥雷里亚诺第二也开始表现出懒散放荡的倾向。关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时，他是个孤僻内向的人，就像年轻时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样。但就在尼兰迪亚协定签订前不久，一桩偶然事件令他走出自己的天地，回到现实世界。他遇上一个让人买彩票赢手风琴的年轻女人，她非常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奥雷里亚诺第二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常有人将他错认作他的兄弟。那女人哭闹着想让他心软，最终把他领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却一直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这次邂逅之后，她对他爱恋有加，甚至在彩票上做手脚让他赢得了手风琴。两个星期后，奥雷里亚诺第二意识到女人在轮换着与他们兄弟俩睡觉且满心以为是同一个人，他却没有挑明事实，反而想方设法继续下去。他再没有回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下午他待在院子里，凭着听来的印象自学手风琴。乌尔苏拉对此提出反对，因为当时正值丧期，何况她也鄙视手风琴，把它看作是好汉弗朗西斯科的徒

子徒孙那路流浪汉才用的乐器。但奥雷里亚诺第二未加理会，终于成为一名手风琴高手，他直到结婚生子，跻身马孔多最受尊敬的人物之列，依然保持着这一爱好。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兄弟共享一个女人。他监视他的行踪，打乱他的安排，一经确认他当晚不会去找他们共同的情人，就去和她睡觉。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得病了。两天后，他撞见他兄弟抱着浴室的柱子，浑身大汗，痛哭流涕，便立刻明白了缘故。他兄弟向他坦承，自己使那女人染上了被她称作花柳病的恶疾，被赶了出来。他还说庇拉尔·特尔内拉曾设法给他医治。奥雷里亚诺第二暗中用滚热的高锰酸洗液擦洗，服用利尿剂。暗暗忍耐三个月的折磨后，两人分别痊愈。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再没找过这个女人。奥雷里亚诺第二获得了她的原谅，和她一起生活到死。

她叫佩特拉·科特斯。她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和一个卖彩票的露水情人一起来到马孔多，那男人死后她便接过这桩生意。她是个年轻整洁的黑白混血女人，一双黄色的杏眼使她的脸庞带上几分美洲豹般的凶悍，但她却有着慷慨的心灵和绝妙的情爱天赋。当乌尔苏拉终于知道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成了斗鸡人，而奥雷里亚诺第二则忙于为自己情人喧闹的聚会拉手风琴时，她觉得自己混乱得要发疯。这两人身上好像都集中了家族的缺点，却没有继承任何美德。于是她决定谁也不能再叫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这两个名字。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头生子出生时，她却没敢违抗他的意愿。

“好吧，”乌尔苏拉说，“但有个条件，孩子由我来养。”

尽管她已年逾百岁，患白内障几近失明，却仍然活力不减，性格不变，头脑清醒。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培养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才来重振家声，他将远离战争、斗鸡、放荡女人和疯狂举动，这四样灾难在乌尔苏拉看来正是造成家族衰落的罪魁祸首。“他将成为神甫。”她神情庄重地许诺，“如果上帝让我活得够长，我一定能看见他当上教皇。”所有人，不仅卧室里的，还有整幢房子里聚集的奥雷里亚诺第

二的狐朋狗友，听了都忍俊不禁。战争成为糟糕的记忆已被人遗忘，但此时一瓶瓶香槟的瓶塞轰然迸脱，倒像是瞬间回到了枪炮隆隆的日子。

“为教皇的健康干杯。”奥雷里亚诺第二打趣道。

客人们齐声响应。随后，主人拉起手风琴，爆竹噼啪燃响，市镇上敲起欢快的鼓声。清晨，淋透香槟的客人宰掉六头牛拿到街上任人随取。没人对此大惊小怪。自从奥雷里亚诺第二主持家务以来，这类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尽管通常并没有庆祝一位教皇的诞生这样名正言顺的借口。短短几年间，他不靠努力，全凭运气，因所饲养牲畜的神奇繁殖力挣下了在大泽区数一数二的巨大财富。他的母马一胎生三驹，他的母鸡一天下两次蛋，他的猪飞速长膘。没人能解释这种荒唐的繁殖力，只能归结为魔法。“你现在得省着点儿，”乌尔苏拉对她那毫无长远打算的曾孙说道，“这种运气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你。”但奥雷里亚诺第二未加理会。他越是大开香槟供朋友畅饮，他的牲畜就越发疯狂地繁衍，而他也就越发确信好运与自己的行为无关，而是来自于佩特拉·科特斯，他的情妇，她的爱具有催化自然的能力。他认定这就是财富的源头，坚信不疑，因此从未让佩特拉·科特斯远离自己的牲畜，即使结婚生子后仍征得费尔南达的同意和她生活在一起。奥雷里亚诺第二和祖辈一样身材壮硕，但却有着享乐的活力和令人无法抗拒的亲切感，这是前人身上所没有的。他几乎没时间去照管畜群。他只需带上佩特拉·科特斯去养殖场，和她一起骑马在自己的土地上绕一圈，就足以令所有带着自己标记的牲畜无可救药地染上多产症。

就像他漫长一生中所有的好事一样，这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出于偶然。直到战争末期，佩特拉·科特斯还在靠卖彩票糊口，奥雷里亚诺第二则不时洗劫乌尔苏拉的储钱罐来过活。他们成了轻浮的一对，只知道夜夜睡在一起，即使在禁止寻欢的日子也不例外，在床上嬉闹直到天明。“这女人非毁了你不可，”乌尔苏拉看着曾孙梦游般走进家

门，朝他大喊起来，“她把你变傻了，过不了两天你肚子里就会生只癞蛤蟆，疼得直不起腰。”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过了很久才发现他冒名顶替自己，很难理解兄弟的痴狂。在他的印象中，佩特拉·科特斯是个很平常的女人，在床上甚至有些慵懒，完全不具备勾人情愫的魅力。对乌尔苏拉的呼号和兄弟的嘲弄，奥雷里亚诺第二一概充耳不闻，他那时只想着找个营生养活佩特拉·科特斯，在某个狂欢之夜与她死在一起，死在她身上，死在她身下。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终于抵不住安享晚年的诱惑，重开作坊，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制作小金鱼是桩不错的生意。他在那间酷热的小屋里待了很久，看着上校在大彻大悟后生发出难以想象的耐心，让坚硬的金属片在手中渐渐变成金色的鱼鳞。他觉得这活计太过费力，而他又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佩特拉·科特斯，因此三个星期后便彻底从作坊消失了。正是在那段时间，佩特拉·科特斯忽然想到卖彩票抽兔子的主意。她的兔子不断繁殖生长，速度之快甚至没等彩票卖完就已发育成熟。开始的时候，这种惊人的繁衍并没有引起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注意，直到后来市镇上的人都厌烦了兔子彩票，一天晚上他听到隔着院墙传来阵阵喧闹声。“别担心，”佩特拉·科特斯说，“是兔子。”两人再没睡着，被兔子的忙碌声吵了一夜。天亮时，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房门，看见院里满是兔子，在晨光中一片青蓝。佩特拉·科特斯笑弯了腰，忍不住跟他开个玩笑。

“这些都是昨晚生的。”她说。

“太可怕了！”他说，“你干吗不试试养牛？”

几天后，为了在院子里腾出地方，佩特拉·科特斯用兔子换了一头奶牛。两个月后这奶牛就生了三胞胎。事情便是这样开始的。一夜之间，奥雷里亚诺第二拥有了土地和畜群，几乎来不及扩建拥挤的畜栏和猪圈。这种匪夷所思的兴旺令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他只好选择荒唐的方式来抒发大好心情。“让一让，母牛们，生命短暂啊。”他喊叫道。乌尔苏拉纳闷他究竟在搞什么鬼，想着牲畜会不会是偷来的，

他是不是变成了偷牛贼。每次看到他打开香槟仅仅是为了往头上喷泡沫寻找乐趣，她都要大声斥责他挥霍浪费。他对此十分厌烦，一天清早心血来潮，拿起一箱钞票、一罐糨糊和一把刷子，哼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老歌把家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贴满了一比索的纸币。从自动钢琴运抵时就漆成白色的老宅，现在变得像清真寺一样。家人乱作一团，乌尔苏拉大惊失色，市镇上的人都挤在街上观看这挥霍豪举，这时奥雷里亚诺第二已经从立面到厨房全部裱糊完毕，连浴室和卧室都没放过，最后把剩下的钞票抛到了院子里。

“好了，”他最后宣告，“我希望在这个家里再没有人跟我提钱的事。”

的确如此。乌尔苏拉命人把钞票揭下来，连带着还揭下大片大片的石灰墙皮，又重新把房子刷白。“上帝啊，”她恳求道，“让我们和当初建村时一样穷吧，免得下辈子你为这样的浪费惩罚我们。”她的祈求得蒙垂听，但结果却与她期待的相反。一个揭钞票的工人不小心碰倒了一尊战争末期别人寄存在家里的圣约瑟石膏雕像，那空心雕像跌在地上摔碎了。里面满是金币。没人记得是谁送来这尊真人大小的雕像。“是三个人带来的，”阿玛兰妲解释道，“请我们保存到雨季过去，我对他们说就放在这儿，谁也不会碰到。他们就非常小心地把它放在这儿，一直搁到现在，再也没人回来要过。”最近一段时间，乌尔苏拉在雕像前点上蜡烛，跪地膜拜，从未想过她所敬拜的不是一尊圣徒像，而是将近两百公斤的黄金。想到自己无意中犯下异教行径却迟迟不自知，她更加痛苦。她朝着壮观的金币小山啐了一口，把它们装进三个帆布袋，埋在一处秘密的地方，等待那三个陌生人早晚来讨要。很久以后，她已进入行动不便的暮年，还常常加入许多流连于家中的旅人的谈话，询问他们有没有在战争期间寄存过一尊圣约瑟石膏雕像，等雨季过后来取。

这种事情给乌尔苏拉带来巨大烦扰，在那段时间却时常发生。马孔多沉浸在一派奇迹般的繁荣景象中。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已经被

配有木制百叶窗和水泥地面的砖石建筑所替代，后者更有利于散去午后两点令人窒息的酷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时代的旧村庄唯一的残留，就是那些覆满灰尘的巴旦杏树，它们忍耐得了最恶劣的环境，而清澈见底的河里那些史前巨石都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疯狂的长柄锤砸成了粉末，为的是清理河道开发航路。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不比当初他曾祖父的诸多狂想逊色，因为布满石块的河床和险阻重重的湍流使马孔多无法通航到海。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出人预料地心血来潮，顽固地要实施这一计划。到那时为止，他还从未表现出什么想象力。除了与佩特拉·科特斯的露水情缘，他并没有别的女人。乌尔苏拉认为他是整个家族史上最没出息的子孙，觉得他一无可取，甚至在斗鸡场上也没出多少风头。就在这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给他讲起离大海十二公里处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上校战时曾亲眼见过它烧焦的龙骨。这一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被很多人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可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听来却不啻一个启示。他拍卖了所有的斗鸡，然后招募人手，购买工具，展开一系列砸碎石块、挖掘河道、铲除暗礁甚至填平瀑布的宏伟工程。“这些我太熟悉了。”乌尔苏拉喊道，“时间好像倒转了，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预计河道可以通航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向兄弟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奥雷里亚诺第二为他提供了所缺的资金。此后，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人们已经在议论他买船的计划不过是卷走兄弟钱财的骗局时，却有消息传来说一艘奇怪的船正向市镇驶来。已经淡忘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丰功伟业的马孔多居民，争先恐后地奔向河滨，难以置信地看着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造访该市的船。那不过是一条树干扎成的木筏，靠着岸上的二十个男人用粗索牵引前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站立船头，眼里闪着志得意满的神色，正在指挥这项艰巨的作业。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群风情万种的女郎，她们撑起鲜艳的阳伞抵御灼热的日光，肩上是精美的丝绸披巾，脸上是彩色的脂粉，发间插着鲜花，臂上佩着金蛇，齿间镶着钻石。这条用

树干扎成的木筏是唯一能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航行到马孔多的船只，也仅此一次，然而他却从未承认失败，反而将自己的成就当成一次意志的胜利。他将记录得一丝不苟的账目交给兄弟，很快又回到与斗鸡相伴的生活中。这场不走运的冒险的唯一遗泽，就是来自法国的女郎们带来的新潮流。她们的精湛技艺令传统的风月套路彻底改观，她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将过气的卡塔利诺店远远抛在后面，使整条街变成一座市场，其间日式灯笼灯影摇曳，手摇风琴琴声忧伤。正是她们发起了那场血腥狂欢节，使马孔多陷入三日的疯狂，唯一长久的成果就是奥雷里亚诺第二获得了认识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机会。

美人儿蕾梅黛丝被选为狂欢节女王。乌尔苏拉为曾孙女惊心动魄的美貌感到恐惧，却无法阻止她当选。此前，乌尔苏拉禁止她出门，除非是和阿玛兰妲一起去望弥撒，但是也要她用一块黑色头巾蒙住脸庞。那些并不虔敬的男人，那些在卡塔利诺店里化装成神甫主持渎神弥撒的男人，都涌向教堂，只为一窥美人儿蕾梅黛丝的脸庞，哪怕看上一眼也好。她的美貌传说伴着人们惊人的狂热在整个大泽区流传。他们等了很久才如愿以偿，事实上等不到那机会才是真正的幸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再也无法安眠。让她露出面容的男人，那个外来者，尊严尽失，陷入自轻自贱的泥潭，数年后睡在枕木上被一辆夜行列车轧死。从他身着绿色丝绒上装和绣花马甲出现在教堂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怀疑他必定是受美人儿蕾梅黛丝的魔力所吸引，从远方而来，或许是从域外某个遥远的城市而来。他如此英俊，如此优雅沉静，如此风度翩翩，和他比起来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不过是个充大人的毛头小子。不少女人笑容中含着不满，嘟囔说他才配得上黑纱蒙面。他在马孔多不曾与任何人交谈。星期天清晨他如同神话中的王子一般现身，骑着配有银马镫和天鹅绒鞍褥的骏马，弥撒结束后便离开市镇。

他的风采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第一次在教堂里看见他，所有人都认定美人儿蕾梅黛丝与他之间已然存在一桩秘密约定，一场紧张的无声对决，一次势不可免的争霸，不仅会以爱情告终，还要加上死亡方能了结。到了第六个星期天，这位绅士现身时手中拿着一枝黄玫瑰。他和往常一样站着望弥撒，弥撒结束时拦住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去路，献上那枝孤独的玫瑰。她再自然不过地接过去，仿佛对这一馈赠早有准备，并在一瞬间掀开头巾，嫣然一笑表示感谢。仅此而已。然而对于那位绅士，对于所有不幸一睹风采的男人来说，那一刻便是永恒。

从那时起，那位绅士夜夜带着乐队在美人儿蕾梅黛丝窗前流连，有时候直待到黎明时分。奥雷里亚诺第二是唯一对他产生真切同情的人，曾试图打破他执著的幻想。“别浪费时间了，”一天晚上他劝道，“这家里的女人比骡子还糟糕。”他伸出友谊之手，邀请他畅饮香槟，试图使他明白自己家里的女人个个铁石心肠，但却没能稍减他的决心。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受够了夜夜无休无止的乐声，威胁要用手枪子弹来治疗他的相思病。但真正令他放弃努力的是他自己可悲的绝望。曾经衣着考究、毫无瑕疵的人物沦为衣衫褴褛、龌龊卑下的渣滓。有传言说他抛下了在远方国度的权势与财富，但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从何处来。他整日惹是生非，在酒馆寻衅滋事，在卡塔利诺的店里待到天亮，滚在自己的排泄物里。他的最大悲剧在于，美人儿蕾梅黛丝从未注意过他，即使在他如王子般盛装出现于教堂时也不例外。她接受那枝黄玫瑰并没有任何恶意，只不过觉得他的夸张表现有趣；她掀开头巾也是为了看清他的脸，而非有意展示自己的容颜。

事实上，美人儿蕾梅黛丝不属于这个世界。进入青春期后很久，她还要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为她洗澡穿衣；等到她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仍得有人留神她，防止她用自己的一撅儿粪便在墙上画小动物。她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学会读写，不会使用餐具，赤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天生拒斥一切常规。当年轻的警卫队队长向她表白

爱意时，她被这冒失的举动吓了一跳，当下拒绝了。“你看他好傻，”她对阿玛兰妲说，“他说他因为我难受得要死，好像我是绞肠痧似的。”当那年轻人果真死在她的窗下，美人儿蕾梅黛丝便证实了自己最初的印象。

“你们看，”她评论道，“他就是太傻了。”

她仿佛拥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一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至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美人儿蕾梅黛丝根本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弱智，恰恰相反。“她就好像是打了二十年仗回来的人。”他常这样说。至于乌尔苏拉，她常常感谢上帝赐予这家里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但同时也为其美貌而惶惶不安。她觉得那是与美德相冲突的优点，是隐藏在纯真之中的邪恶圈套。为此乌尔苏拉决定让她远离尘世，避开凡间一切引诱，殊不知她早在母亲腹中就注定永不受玷染。她从未想过在一场群魔乱舞的狂欢节上成为选美女王。然而一心想化装成老虎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把神甫安东尼奥·伊莎贝尔请到家中，说服乌尔苏拉相信狂欢节并非像她认为的那样是异教节日，其实出自天主教传统。最终她被说服，勉强同意了举行女王加冕礼。

蕾梅黛丝·布恩迪亚将成为狂欢节女王的消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飞越大泽区的边界，传至遥远到从未听说过她超凡美貌的地方，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在他们眼中，这一姓氏仍与反叛作乱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如果那个时期还有谁能做到与世无争，那便是日渐衰老、归于平凡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渐渐失去了与家国现世的一切联系。他待在作坊里足不出户，小金鱼生意是联结他与外界的唯一纽带。停战初期被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有一个负责将成品拿到大泽区的村镇去贩卖，又带着金币和最近的消息回来。他说保守党政府获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正在修改历书使每任总统可以在任一百年。他说政府终于与教廷达成协定，还有一位红衣主教从罗马被派来，头戴钻石冠冕，端坐在实心的黄金宝座上，而自由党的部

长们都跪下来亲吻他的戒指并摄影存照。他说一家西班牙剧团经过首都时，女主唱在化妆室里被一群戴面具的人绑架，到了星期天却出现在共和国总统的消夏别墅里跳裸体舞。“别跟我谈政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他说，“咱们只管卖小金鱼。”坊间有流言说他对国家现状不闻不问是因为靠着作坊发了财，但传到乌尔苏拉耳中时只引发了她的讥笑。从她纯粹的实用主义观念出发，她实在难以理解上校的生意意义何在：用小金鱼换来金币，随即把金币变成小金鱼，如此反复，卖得越多活计越辛苦，却只是为了维持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实际上上校在乎的不是生意，而是干活本身。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投入，嵌上片片鱼鳞，用红宝石微粒镶鱼眼，锤出鱼鳃，添上尾鳍，再没有余暇为战后的失落而烦恼。这门精密的手艺极其耗费心神，令他在短短时间内比在整个战争年代衰老得更甚。不变的坐姿令他脊柱变形，精确到毫米的工艺使他视力受损，但不容丝毫分心的专注让他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一群来自两个党派的老兵寻求他的支持，希望解决养老抚恤金的问题，因为政府一直许诺却从未落实，那是他最后一次涉入与战争相关的事务。“忘了这回事吧，”他劝道，“你们看我早就放弃了养老金，免得傻等到死受罪。”开始的时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每到傍晚都来拜访，两人坐在大门口追忆过往。但阿玛兰妲无法忍受这个疲累的男人勾起自己的回忆，他的秃顶正将他引向未老先衰的深渊。于是她无理地令他处处难堪，终于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登门，最后因瘫痪而彻底消失。沉默寡言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家中重新焕发的活力视若无睹，约略懂得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独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每天浅睡一觉后五点起床，照例到厨房喝上一杯不加糖的咖啡，然后一整天关在作坊里，到下午四点才拖着一张矮凳走过长廊，如火如荼的玫瑰、明媚耀眼的暮色、阿玛兰妲的漠然—每到黄昏时分她的忧郁就发出开锅般清晰可闻的声响—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他在临街的门口坐下，直到蚊虫开始肆虐才回到家中。一次，有人鼓起勇气打扰了他的独处。

“您近来可好，上校？”那人走过时问道。

“就在这儿待着，”他回答，“等着给我下葬。”

由此可见，因美人儿蕾梅黛丝被封为女王，他的姓氏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而引发的担忧实际上缺乏事实根据。然而很多人并不这样想。市镇上的人们对迫近的悲剧一无所知，广场上人声鼎沸，一派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狂欢节达到疯狂的最高潮，奥雷里亚诺第二实现了扮成老虎的愿望，快乐地在狂热的人群中奔跑，因长久吼叫而嗓音嘶哑。就在此时，通往大泽区的路上出现了一队庞大的化装人群，他们抬着一座金光耀眼的花台，上面是一位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迷人的女子。一时间，马孔多本来心境平和的居民都摘下面具好看清这位神奇的美人，她头戴翡翠王冠，身披白鼬皮斗篷，俨然拥有货真价实的权柄，而不仅是闪光的缀片和皱纹纸打扮起来的女王。不乏目光敏锐的人觉察到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但奥雷里亚诺第二马上摆脱了困惑，宣布将新来者视作贵宾，并很聪明地让美人儿蕾梅黛丝和外来的女王在同一高台上就座。直到午夜时分，那些化装成贝都因人的外来者仍在热闹狂欢，并用绚丽的烟火和精彩的杂耍助兴，让人想起当年吉卜赛人的本领。突然间，就在节日的最高潮，有人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

“自由党万岁！”他喊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万岁！”

步枪倾泻的弹雨压倒了烟火的光彩，惊恐的喊叫盖过了乐声，欢乐被恐慌所取代。多年以后，人们仍确信外来女王的亲卫队实际上是一个中队的政府军，每人的外袍下都暗藏着军用枪械。政府在一份特别通告中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许诺将彻底清查这场血案。然而真相从未澄清，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女王卫队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根据指挥官的暗示进入战斗状态，毫无怜悯地向人群开火。当一切恢复平静，那些假贝都因人都不见了。广场上有死有伤，倒下了九个小丑、四个科隆比纳[①]、十七个纸牌大王、一个魔鬼、三个音乐家、两

个法国贵族和三个日本皇后。在惊惶困惑中，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救出了美人儿蕾梅黛丝，而奥雷里亚诺第二把外来女王抱在怀里带回了家，她的衣服被撕扯成碎片，白鼬皮斗篷上满是血迹。她名叫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她在全国最美丽的五千名女性中力拔头筹，他们领她到马孔多来，答应封她为马达加斯加女王。乌尔苏拉把她当作女儿对待。人们不但没有质疑她的无辜，反而都同情她的天真。屠杀发生六个月后，当伤者都已痊愈，公墓上最后的花朵全部凋落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远赴她和父亲生活的城市找她。后来在马孔多与她成婚，喧闹的欢庆活动持续了二十天。

---

①科隆比纳（Colombina，亦作 Columbine），起源于意大利喜剧的固定角色，多以活泼伶俐的年轻女仆形象出现。

十一

婚姻险些在第二个月破裂，原因在于奥雷里亚诺第二为了向佩特拉·科特斯赔礼，给她拍了一张身着马达加斯加女王盛装的照片。费尔南达知道后收拾起嫁妆箱笼，不辞而别离开了马孔多。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去往大泽区的路上追上了她。他苦苦劝说并一再表示要痛改前非，终于将她接回家去。从此，他与情人断绝了来往。

佩特拉·科特斯了解自己的能耐，并没流露出忧愁的迹象。是她令他成为男人。当初她把他从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引出来时，他还是个孩子，一脑袋荒唐的念头，对现实一无所知，是她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位置。他天生内向，落落寡合，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她赋予他截然相反的性格：充满活力，豪爽开朗，无拘无束；是她教会他享受生命和狂欢挥霍的乐趣，最终将他由内到外塑造成自己从少女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男人。他结婚了，就像儿女们或早或晚都会成家一样。他不敢事先告诉她这个消息。在这种情形下，他采取了非常幼稚的做法，不是无端发火便是凭空抱怨，总之想让佩特拉·科特斯主动提出分手。一天，奥雷里亚诺第二又无理取闹，她避开了圈套，并将事情挑明。

“说白了，”她说，“你就是想和女王结婚。”

奥雷里亚诺第二羞愧不已，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声称这是对自己的曲解和侮辱，于是一去再没回来。佩特拉·科特斯听着婚礼的音乐和爆竹声、宾客狂欢的喧闹声，一刻也不曾失去休憩中猛兽的那种镇定自若，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又一场淘气。有人向她表示同情，她却报之以微笑。“不用担心，”她说，“连女王都得听我的。”一位女邻居给她带来烛台好在失去的情人像前点亮，她的言语中带着神秘的自信：

“唯一一根能让他回来的蜡烛一直亮着。”

不出所料，蜜月一结束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回到了她这里。他带来了那群狐朋狗友，以及一位旅行摄影师，还拿来了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在狂欢节上穿过并沾染了血迹的外装和白鼬皮斗篷。当天下午趁着欢闹的气氛，他让佩特拉·科特斯穿上女王的盛装，封她为马达加斯加至高无上的终身统治者，并在朋友当中大肆分发记录盛况的照片。她积极配合这场游戏，内心满怀对他的怜悯，认为他想出这样荒唐的举动来跟自己和好一定没少担惊受怕。到晚上七点，她仍穿着女王的盛装，在床上款待他。他结婚已近两个月，她却立刻觉察出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心中因实现报复而涌出甜美的快意。然而两天后他没敢再来，而是请别人居间解决分手的善后事宜，她便明白自己得比预期更具耐心，因为他看起来已决心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婚姻。但她也并不慌张。她仍然逆来顺受，这更证实了人们的印象：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品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一双漆皮靴，他自己曾说过要穿着这双靴子睡到棺材里去。她用布把靴子包好收在衣箱深处，准备开始一场耐心的等待。

“他早晚会回来的，”她想，“哪怕只是为了穿这双靴子。”

她等待的时间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久。实际上，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新婚之夜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必等到穿漆皮靴的时候就会回到佩特拉·科特斯家里：费尔南达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女人。她出生和成长在距大海一千公里的一座阴风惨惨的城市，阴森的夜里城中的石板小巷仍然有总督时代的马车辚辚驶过。每到下午六点，全城三十二座钟楼齐声敲响丧钟。那座以墓园长砖铺地的领主深宅，终年不见阳光。庭院中柏树枝叶不惊，卧室里苍白的帷幔暗淡无光，晚香玉花园的拱廊上水渍蔓延，到处一派死气沉沉。直到进入青春期，费尔南达对外界的认识都只是邻家传来的忧伤钢琴练习曲，那弹奏者甘愿放弃午休，经年累月练习不止。在母亲的房中—母亲生着病，她的脸在蒙尘的彩色玻璃窗下显出青黄色—她听着那刻板、重复、消沉的音

阶，心想这乐声在世上自由飘荡，自己却在编织棕榈花圈中年华老去。母亲患五点钟热病汗流不止，对她讲起往日的辉煌。费尔南达还很小的时候，一个月夜，她看见一位身着白衣的美貌女子穿过花园向祈祷室走去。在这惊鸿一瞥中，最令她不安的是那女子长得与自己一模一样，仿佛就是二十年后的自己。“那是你曾祖母，她当过女王。”母亲在咳嗽的间歇对她说，“她折下一枝晚香玉时染了风寒，后来因此而死。”多年以后，费尔南达发觉自己与曾祖母模样酷似的时候，不禁对童年时所见的情景产生怀疑，但母亲责备了她的这种疑惑。

“我们家权势无比，财富无边，”她说道，“你也会成为女王的。”

她信以为真，尽管家里将亚麻布铺上长桌又摆上银餐具，只是为了喝一杯掺水的巧克力、吃一块甜面包而已。直到婚礼那天，她还梦想着成为一个传奇国度的女王，尽管她父亲堂费尔南多为置办嫁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这并非幼稚无知或是野心谵妄。她就是这样被培养成人的。从记事时起，她记得自己都是在刻有家族纹章的黄金溺盆里大小便。十二岁时第一次出家门，她去的不过是两个街区外的修道院，仍需乘坐马车前往。她的同学惊奇地发现她被单独隔开，坐在一把高背椅上，即使在休息时间也不和旁人混在一处。“她可不一般，”修女们解释道，“将来是要做女王的。”她的同学深信不疑，因为那时的她就已出落成她们从未见过的美貌、高贵又端庄的姑娘。八年之后，她学会了用拉丁语作诗，学会了弹奏古钢琴，学会了与绅士谈鹰猎术、和主教论护教学，学会了向外邦君主阐述人间政务、为教皇诠释天国事宜，却还是回到父母家中又编起花圈来。她发现屋里已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必需的家具、烛台和银餐具，其他家居物品都已一件件卖掉以负担她的学费。母亲因五点钟热病去世了。父亲堂费尔南多一身黑衣，戴着硬领，怀表的金链绕过胸前，他每星期一给她一枚银币作为家用，同时取走前一个星期编好的花圈。他一天大部

分时间都关在书房里，少有的几回出门上街也都会在六点前回家，陪她一起念玫瑰经。她从未和任何人结下亲密的友情。她从未听说过令整个国家流血败落的频繁战事。她从未间断过每天下午三点倾听钢琴练习曲。她那做女王的梦想开始破灭时，大门上传来了两下急迫的门环敲击声。她打开门，面前是一位衣着得体的军人，举止庄重有礼，脸颊上有一道伤疤，胸前佩戴着一枚金质勋章。他和她父亲走进书房密谈。两个小时后，父亲来缝纫间找她。“请准备好行李，”他对她说，“你要长途旅行了。”她就这样被带到了马孔多。仅仅一天之内，生活粗暴地打碎了幻梦，将父母多年来极力向她隐藏的现实赤裸裸地全盘呈现。回家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毫不理睬堂费尔南多的哀求和解释，试图借此消抹这场耸人听闻的嘲弄造成的创伤。就在她下定决心终生不再走出卧室一步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赶来找她了。这一转机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她当初又惊又怒、又羞又恼，便撒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奥雷里亚诺第二出门来找她的时候，所掌握的真实线索只有两条：内地人的独特口音和编棕榈花圈的职业。他豁出一切寻找她。他凭着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翻越山脉创立马孔多那样的蛮勇，凭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次次徒劳发动战争那样的盲目骄傲，凭着乌尔苏拉一心延续家族血脉那样的疯狂执拗，寻找费尔南达时不曾有片刻气馁。当他问起何处出售棕榈花圈时，人们带他一家一家挑选。当他问起哪里有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女儿带到他面前。在雾气弥漫的隘道间，在注定被遗忘的时光中，在幻灭的迷宫里，他一度迷失方向。他穿过一片黄色荒原，在那里回声重复着人的所思所想，焦虑引出预示未来的蜃景。徒劳寻找数星期后，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城里所有的钟楼同时敲响丧钟。尽管从未见过，也从没听人描述过，他还是立即认出了被尸骨析出的石灰质侵蚀的外墙，被菌类蛀空木头的衰败凉台，以及钉在大门上，被雨水冲刷得模糊难辨，堪称世上最悲凉的纸板：出售棕榈花圈。从那一刻起到费尔南达将家里托付给女修道院院长照看后

出发的那个寒冷早晨，修女们几乎来不及缝好嫁衣，并将烛台、银餐具、金溺盆，以及两百年间家业衰败后余下的无数无用的家什装进六个箱子。堂费尔南多婉拒了同去的邀请。他答应晚些时候等处理完手头的事务再去。他为女儿送上祝福后，又关在书房里，用印有惨淡花饰和家族纹章的信笺给她写信，那是父女俩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人情味的交流。对费尔南达而言，这才是生活的真正开始。对奥雷里亚诺第二而言，这几乎同时是幸福的开端和结束。

费尔南达有一册配有金色小钥匙的精美历书，她的灵修导师在上面用紫色墨水标出了需要禁欲的日期。除去圣周、主日、守节日、每月第一个星期五、静修日、弥撒日以及月事周期，她一年中可行房的日子只剩四十二天，分散在密密麻麻的紫色小叉之间。奥雷里亚诺第二确信时间会摧毁这面凶恶的铁网，同时大大延长了预定的喜宴天数。乌尔苏拉忙于将白兰地和香槟的空瓶丢进垃圾桶，以免家中无处落脚，她在精疲力竭之余惊奇地发现，爆竹声和音乐声在继续，一头头牛被屠宰，但新婚夫妇却在不同时间就寝且睡在不同的房间。她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暗中疑惑费尔南达是否也贴身穿着一条贞节裤，迟早会引发人们的嘲笑，酿成又一场悲剧。然而费尔南达向她坦承，自己仅仅是需要两个星期的预备期才能和丈夫有肌肤之亲。期限过去，她果然打开卧室房门，表现出赎罪祭品一般的自我牺牲气概。世上最美的女人出现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眼前，她光彩诱人的眸子好像受惊的动物，长长的黄铜色发丝散满枕上。目醉神驰之下，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费尔南达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睡衣，衣角直垂至脚踝，袖口遮住双手，小腹位置一个圆洞掩映于精美花边中。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禁放声大笑。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淫秽的，”他大叫道，笑声在整个家中回荡，“我娶了个慈悲的修女回家。”

一个月后，他仍然没能让妻子脱下睡衣，便去为佩特拉·科特斯照女王相。晚些时候当他把费尔南达劝回家，趁着和好的热度百般纠

缠，她终于让步了，却无法给予他当初远赴三十二座钟楼之城寻找她时所梦想的满足。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身上找到的只有深深的痛苦。在他们第一个孩子降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费尔南达发觉丈夫又偷偷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床上。

“是这样。”他承认了，以无可奈何的语气解释道，“为了让牲口继续繁殖，我不得不这么做。”

他花了些时间使费尔南达相信这离奇的理由，但当他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将她说服，她却只要他保证一件事：最后不要让人撞见他死在情妇的床上。于是三个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奥雷里亚诺第二对两人一般亲热。佩特拉·科特斯为情人的回归而扬扬自得，费尔南达则装作毫不知情。

这种默契并未令费尔南达融入这个家庭。乌尔苏拉多次要求她丢掉行房后起床时必戴的羊毛皱衬领，那已经引起邻居的窃窃私语，但她没有理会。乌尔苏拉也没能说服她改上厕所或是改用夜壶，而将金溺盆卖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做成小金鱼。阿玛兰妲对她矫揉造作的用词、谈起任何事情都要拐弯抹角的说话习惯十分不满，在她面前说起自创的黑话。

“这非是非，”她说，“非那发种发连非自非己非拉非的非屎非都夫恶发心夫的发女非人非。”

终于有一天，费尔南达再也无法忍受嘲弄，想知道阿玛兰妲究竟说了些什么。她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毫不拐弯抹角。

“我是说，”她答道，“你就是那种把屁股说成斋戒日的女人。”

从那天开始两人不再说话。实在迫不得已，她们会互留便条，或者对着空气传话。费尔南达感觉得到自己在家中不受欢迎，但并未因此稍减推行祖上规矩的决心。她取缔了家中谁饿了就自行去厨房吃饭的习惯，强制家人准时准点在饭厅的大桌上就餐，并铺好亚麻桌布，配上枝状烛台和银餐具。乌尔苏拉一向视为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

变成庄严的仪式，由此形成了一种紧张气氛，沉默寡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首先对此表示反对。但这一仪式仍被固定下来，再加上晚饭前念诵玫瑰经的程序，都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很快就有风言风语传出，说布恩迪亚家的人不像一般人家那样坐在桌旁，而是把就餐变成了一场大弥撒。甚至乌尔苏拉的迷信也和费尔南达的迷信之间产生了冲突，前者更多源于个人的灵光一现，与传统关系不大，而后者则继承自父母，清晰明确，分门别类适用于不同场合。在乌尔苏拉耳聪目明的时候，她的意愿在家中还有一定影响，往日的一些习惯尚能勉强保留，但当她视力大减，被岁月的重负逼入角落，从费尔南达到来的那一刻启动的严酷变革便彻底完成，家庭的发展走向完全取决于她一人的决定。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按照乌尔苏拉的吩咐接手经营甜食和糖果小动物生意，这在费尔南达眼中有失体面，立刻被取消了。往日从清晨到入睡一直敞开的屋门，在午睡时段以阳光晒热了卧室为理由关闭，到后来也就不再打开。从村庄创建时起就挂在房梁上的芦荟枝和面包，被一座耶稣圣心神龛代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察觉到这些变化并对后果作出预言。“我们正在变成贵族老爷，”他抗议道，“这样下去，我们又得跟保守党政府开战了，不过这一次是要把国王推上台。”费尔南达极有分寸，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但他的特立独行、他对一切社会成规的排斥，都令她在内心深处十分反感。他清晨五点必喝的咖啡，作坊里的杂乱无序，身上脱线的毛毯以及傍晚坐在门口的习惯都让她恼火。但她不得不忍受家里的这一不和谐音，因为她确信年老的上校是一头猛兽，只是因岁月消磨和理想幻灭而暂时平静下来，而一旦老人脾气失控就足以令家里天翻地覆。当丈夫决定用曾祖父的名字为他们的长子命名时，她没敢提出异议，因为她来到这个家不过一年。到第一个女儿出生时，她便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决定，要用她母亲的名字取名—雷纳塔。那时乌尔苏拉已经想好要叫她蕾梅黛丝。经过一番紧张的争执，并由奥雷里亚诺第二笑吟吟地居中调停，新生儿以雷纳塔·蕾梅黛丝的名字受洗。但费尔

南达仍叫她雷纳塔，而她丈夫一家及市镇上的人都叫她梅梅，即蕾梅黛丝的昵称。

最初，费尔南达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营造父亲的神话。她在饭桌上谈起他，经她描述他俨然是摒弃世间虚荣的超凡者，甚至渐渐荣升为圣徒。奥雷里亚诺第二为妻子这样出格地美化岳父而惊奇，忍不住在她背后小小嘲弄一番。家里其他人也仿效他。就连乌尔苏拉，一向极力维护家庭和睦、暗自为家中冲突而痛苦的人，有一次也不禁说了一句，她的小玄孙必定能当上教皇，因为他是“圣徒的外孙，女王的儿子，还有个偷牲口的父亲”。尽管有这样的暗中戏谑，但孩子们已经习惯将外祖父当作传奇人物。他在给他们的信中抄录虔敬的诗行，每个圣诞节寄来一大箱礼物，箱子送到的时候险些把家里的大门撑坏。其实那些礼物都是昔日显赫家业的最后遗存。他们用礼物在孩子们的卧室里建起一座祭坛，上面的圣徒像有真人大小，玻璃珠眼睛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神采和生机，精美的绣花呢绒外衣用的是马孔多任何居民都不曾穿过的好衣料。那栋古老冰冷的深宅中如殡葬品般的堂皇陈设，一件件转移到了布恩迪亚家敞亮的房子里。“已经把整个家族墓地都给咱们搬来了，”有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评论道，“就差那些柳树和墓地砖了。”虽然箱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适合孩子们玩耍的东西，但他们每年仍然期待十二月的到来，因为那些永远无从预知的古董礼物终归是家里的新鲜事物。到第十个圣诞，小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经准备上神学院，外祖父的大箱子比往年来得格外早，钉合严密且涂了沥青防水，并用一贯的哥特体上书“无比尊敬的堂娜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德·布恩迪亚女士收”。她在卧室读信时，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打开箱子。和往年一样，他们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帮助下，先刮去沥青封印，起出钉子开盖，再清除保护用的锯末，这才看到一个带铜螺栓的密封铅匣。奥雷里亚诺第二起出八枚螺栓，孩子们已等得不耐烦，但当他掀开铅板，立刻发出一声惊呼，随即将孩子们赶到一边。他看见堂费尔南多

躺在匣子里，身着黑衣，胸前挂着耶稣受难像，皮肤寸寸迸裂溢出臭气，浑身浸泡在文火熬煮的汤里，翻滚的泡沫宛如珍珠。

就在梅梅出生后不久传来意外的消息，政府将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举行纪念特典以庆祝当年尼兰迪亚协定的签订。这一举动与当局的施政方针大相径庭，上校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反对，并拒绝参加纪念活动。“我平生第一次听说特典这个词，”他说，“但不管是什么意思，这只能是个笑话。”局促的作坊里挤满了使者。当年像乌鸦一般围着上校转的那几位黑衣律师再次登门，一个个更加衰老却也更加庄严。看着这些人像当年斡旋停战时一样出现在眼前，为自己唱起赞歌，上校实在无法容忍他们的厚颜无耻。他下令不许他们打扰，坚称自己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开国元勋，而只是个没有回忆的手工匠，剩下的唯一梦想就是被人遗忘，清贫度日，制作小金鱼劳累而死。共和国总统要来马孔多参加仪式并亲自为他授勋的消息，最令他恼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派人一字不差地传话给总统，说自己非常期待这个迟到的机会好给他应得的一枪，倒不是为了惩罚他治下政府的任意妄为和倒行逆施，而是因为他没有尊重一个已经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危险的老人。这一有力威胁促使总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派一名代表送来勋章。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迫于各界压力，离开病床抱着瘫痪之躯来劝说他的老战友。上校看见从青年时代起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伙伴倚着厚厚的靠垫坐在四人抬着的摇椅上进来，一刻也没有犹疑，认定他辛苦赶来是为了支持自己。当他发现了来访者的真实意图，便立刻叫人把他从作坊里抬了出去。

“我明白得太晚了，”上校对他说，“当初让他们枪毙你才是帮了你的大忙。”

于是纪念特典在没有任何布恩迪亚家成员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庆祝活动碰巧赶上狂欢节，但没有人能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消因此而产生的顽固念头，他认定这一巧合也是政府有意为之，为的就是加剧其中残酷的讽刺意味。他在孤寂的作坊里听见军乐声声，

礼炮齐鸣，钟声敲响感恩赞，以及家门口飘来演说的只言片语，他们正宣布用他的名字为街道命名。他愤怒得眼眶湿润，恨自己的软弱，自战败后头一回因为再没有年轻时的勇气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将保守党政府消灭干净而深感痛苦。活动的余响尚未沉寂，乌尔苏拉敲响了作坊的房门。

“别打扰我，”他说，“我没空。”

“开门，”乌尔苏拉用平常的语调坚持道，“这事和庆典没什么关系。”

于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拉开门闩，看见门口聚集着十七个形貌迥异的男子，他们体型肤色各不相同，但都带着落落寡合的气质，在任何地方都能被分辨出来。他们是他的儿子。他们事先未经协商，甚至彼此互不相识，都是风闻纪念特典的消息从沿海地区的各个角落赶来。他们都自豪地取了奥雷里亚诺这个名字，用的母亲的姓氏。他们在家中逗留了三日，弄得像战场一样混乱，乌尔苏拉心满意足，费尔南达又惊又怒。阿玛兰妲从故纸堆里找出乌尔苏拉当年记录姓名、出生日期和受洗日期的小本子，在对应每个名字的空白中添上现在的住址。这份表格可以看作是二十年战争的缩影，凭着它足以重绘上校夜间的行军路线，从那天凌晨他带着二十一个人离开马孔多加入一场荒唐的起义，直到最后一次他裹在沾了血迹而硬结的毯子里归来。奥雷里亚诺第二没有放过款待堂兄弟们的机会，他打开香槟，拉起手风琴，大肆庆祝，算是补回了因纪念特典而未能尽兴的狂欢节。他们打碎了家里一半的餐具，为了追赶一头公牛并将它兜在毯子里抛耍而将花园里的玫瑰践踏殆尽；他们开枪射杀母鸡，强迫阿玛兰妲跳起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所教的悲伤华尔兹，怂恿美人儿蕾梅黛丝穿上男人的裤子参加爬竿游戏；他们在饭厅里放出一头涂满油脂的猪，结果将费尔南达撞翻在地，但没有人抱怨这些意外，欢快的气氛席卷全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开始时还有所顾虑，甚至对其中几人的血脉心存怀疑，但他渐渐被他们的疯狂感染，临行前还送了每人一

条小金鱼。连冷漠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为他们准备了一场斗鸡，但险些以悲剧结束，因为好几个奥雷里亚诺都是此中老手，一眼就看穿了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传授的花招。奥雷里亚诺第二从这些为数众多的亲戚身上看到了大肆欢宴的无限可能，决定让所有人都留下来跟他一起干活。唯一接受邀请的人是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一个身形高大的黑白混血儿，有着祖父的冲劲儿和开拓精神，他已经周游半个世界寻找机会，留在哪里都一样。其他人尽管尚未成家，但都已认准自己的前途，个个都是灵巧的工匠，家中的支柱，性情平和的男人。到了圣灰星期三，在众人四散回到沿海各地之前，阿玛兰妲让他们穿上主日正装，陪他们去了教堂。他们更多是感到有趣而非出于虔诚，被领到祭坛围栏前，由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用圣灰在前额上画上十字。回到家后，最小的奥雷里亚诺想要清洗前额，却发现那痕迹无法消除，他的兄弟们也是如此。他们试过清水与肥皂，试过泥土和瓜瓤，最后用上了浮石和碱液，仍然无法除去那痕迹。但阿玛兰妲和其他去望弥撒的人都轻而易举地洗掉了。“这样更好，”乌尔苏拉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从今往后谁都不会把你们认错。”他们在乐队演奏声和爆竹声中胡乱散去，给市镇上的人留下的印象是布恩迪亚家的血脉将绵延不绝。额上印着十字的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市郊建起一座制冰厂，那正是昔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痴迷于发明变得癫狂时所梦想的事。

数月过去，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已为人们所熟识和喜爱，开始四处寻找房屋准备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不是上校的女儿—接来。他看上了广场一角那座似已废弃的破败宅子，便打听主人是谁。有人告诉他那房子没有主人，过去曾经住过一位以泥土和墙皮为食的孤单寡妇，她晚年时别人在街上只见过她两次。她头戴缀有细小假花的女帽，脚穿古银色的鞋子，穿过广场到邮局寄信给主教。他们说陪伴她的只有一个残忍的女仆，那女人杀死猫狗及其他一切闯入家中的动物，并把尸体抛到街上，让市镇上的人都闻得到腐烂的恶臭味。自从

最后一只动物的尸体在阳光下晒干后，又过了很久，所有人都确信那女主人和她的女仆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去世，房子迄今未倒不过是因为近年来没赶上严酷的冬季，也没遇上能使房倒屋塌的暴风。铰链因锈蚀而断裂，门板靠成团的蛛网勉强支撑，窗框受潮卡死，地面长满杂草野花，其间裂缝成为蜥蜴和各种爬虫的巢穴，一切似乎都证明这里至少有半个世纪没人居住过。对冲动的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而言，并不需要见到这些迹象才会采取行动。他用肩膀撞了下大门，蛀蚀的木板便寂然倒塌，灰尘四溢，白蚁巢碎屑飞扬。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伫立在门口不动，等到尘雾落定，立时看见了客厅中央那位瘦骨嶙峋的女人。她穿着上个世纪的衣服，光秃的头顶上稀疏几根黄发，一双大眼睛仍残存着昔日的美丽，只是最后的希望之光已在其间熄灭，脸上的皮肤因孤寂而干裂。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被眼前非人间所有的景象震慑，险些没有察觉到那女人正用一把老旧的军用手枪指着他。

“抱歉。”他含糊地低声道。

她在堆满破烂的客厅中央一动不动，一点点仔细打量这肩宽背厚、额头有灰烬刺青的大汉。她透过尘雾看到他站在往昔的薄雾中，背上斜挎着双铳猎枪，手里拎着一串兔子。

“慈悲的上帝啊，”她低声惊叹道，“这不公平，现在又让我想起这些！”

“我想租房。”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说。

那女人举起手枪，稳稳瞄准他额间的灰烬十字，毅然决然地扣紧扳机。

“请出去。”她下令道。

当天晚上吃饭时，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向家人讲起自己的遭遇，乌尔苏拉难过地哭了起来。“神圣的上帝啊，”她双手抱头喊道，“她还活着！”时光流逝，战事频仍，加上平日里无数的不幸，她都把丽贝卡给忘了。自始至终清楚地知道她还活着并在蛆虫窝里腐

烂的人，只有日渐衰老却毫不心软的阿玛兰妲。当天亮时心中的寒意将她从孤枕上唤醒，她会想起她；当她用肥皂擦洗自己凋零的乳房和枯萎的腹部，当她穿上老年人雪白的细棉布裙和胸衣，当她更换手上缠裹赎罪伤痕的黑纱，都会想起她。无论何时，或睡或醒，从最庄重到最卑下的时刻，她都会想起丽贝卡，因为孤独已经为她筛选记忆，将生活在她心中累积的无数垃圾尽行焚毁，并净化、升华了其他记忆，即那些最苦涩的记忆，使其永远存留。从她那里美人儿蕾梅黛丝知道了丽贝卡的存在。每当她们路过那幢破败的房子，她都会讲起丽贝卡一桩负心的事件，一个出丑的故事，想借此让侄女分享自己日渐衰竭的怨尤，并使积怨在她死后延续。但她没能成功，因为蕾梅黛丝对一切激烈的情感都具有免疫力，遑论他人恩怨。乌尔苏拉经历了与阿玛兰妲截然相反的过程，她记忆中的丽贝卡已经被净化，那个和父母的骨殖袋一起被送来的小女孩令人怜惜的形象已经掩盖了大逆不道脱离家庭的那段过往。奥雷里亚诺第二决定接她回家好生照料，但他的好意遭到丽贝卡的断然拒绝。她辛苦多年忍受折磨好不容易赢得的孤独特权，绝不肯用来换取一个被虚假迷人的怜悯打扰的晚年。

二月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十六个儿子归来时额上仍带着灰烬十字的印记。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欢闹中提起丽贝卡，于是他们在半天内就修复了房子外观：更换门窗，给立面漆上欢快的颜色，加固墙壁，重铺水泥地面。但他们没能得到许可进行室内装修。丽贝卡甚至没在门口露面。她任凭他们七手八脚完成了工程，随后估算了花销，让一直陪伴自己的老女仆阿尔赫尼妲送去一把在最后一场战事结束后就不再流通，而她以为还通用的硬币。这时人们才明白她与世隔绝到了何种程度，也知道只要她一息尚存，便不可能将她从顽固的自闭中解救出来。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们第二次造访马孔多时，其中的另一个，奥雷里亚诺·森特诺，也留下来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一起干活。他属于最早一批来到家里受洗的人，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

都清楚地记得他，因为短短几个小时内所有经过他手的易碎物品全被打个粉碎。时间的流逝遏制住当初的成长势头，他长成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天花疤痕十分醒目，但手上惊人的毁灭力量却丝毫未减。他甚至碰都没碰就已打碎无数盘子，费尔南达只得赶在自己仅存的昂贵餐具损失殆尽之前为他买来一套白餐具，但这些耐用的金属盘碟也很快釉彩剥落、扭曲变形。这种不可救药的能力令他本人也很恼火，不过他同时还拥有热忱可亲的气质，一见面就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干活也十分出色。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大幅提高了冰块的产量，超出了本地市场的需求，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将生意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市镇。就在这时他突发奇想，这一设想不仅对工厂的现代化，甚至对市镇与外界的沟通都具有决定意义。

“应当把铁路修过来。”他说。

这是马孔多人第一次听说铁路这个词。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桌上画出的图样，分明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为太阳战方案所绘制的草图一脉相承，乌尔苏拉见此情形便确认了自己的感觉：时光倒流了。然而与祖父不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既不失眠也没影响胃口，更没乱发脾气迁怒旁人。再荒唐的设想他都视为近在眼前的可能，他合理地计算成本和工期，有条不紊地实施计划。而奥雷里亚诺第二—如果说他从曾祖父身上继承了某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所不具备的气质，那就是从不汲取过往的教训—掏出大把的钱来资助修建铁路，就像过去资助他兄弟荒唐的航运事业一样。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查过日历后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三出发了，预计雨季过后返程。但从此就没有了他的音讯。鉴于生产过剩，奥雷里亚诺·森特诺已经开始用果汁代替水制冰，无意中为冰激凌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他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厂子的产品多样化。由于雨季已过而他兄弟整整一个夏天都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返回的迹象，他已将这厂子视为己有。然而到了下一年初冬，有个女人在最炎热的时候去河边洗衣，忽然她喊叫着跑过市镇中心的大街，神情紧张而兴奋。

“朝这边来了，”她竭力解释道，“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

那一刻，市镇上的人都在一阵可怖的汽笛声和急促的喷气轰响中惊愕不已。之前几个星期，他们曾看见一队工人铺设枕木和铁轨，但没有人在意，都认为是吉卜赛人带着新花样归来，还是吹笛子打铃鼓那老一套，吹嘘耶路撒冷的天才们发明的鬼知道什么药水。人们从汽笛和喷气引发的骚乱中回过神来之后，都涌上街头，看见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正在火车头上向他们招手。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用鲜花装扮的火车在晚点八个月后首次开到。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注定要为马孔多带来无数疑窦与明证，无数甜蜜与不幸，无数变化、灾难与怀念。

十二

马孔多人被诸多神奇发明弄得眼花缭乱，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惊叹。他们彻夜观看发出惨白光芒的电灯泡，电力是由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第二次坐火车带来的发电机所提供，机器发出的无休无止的嗡嗡声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习惯。生意兴隆的堂布鲁诺·克雷斯皮在他那狮头状售票窗的剧院里放映的活动人影戏，引发了市民的愤慨，因为他们刚刚为一个人物不幸死亡并被下葬而抛洒伤心之泪，转眼间那人又变成阿拉伯人，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下一部影片里。付过两个生太伏来与剧中人共悲欢的观众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遂将坐椅砸个稀烂。市长应堂布鲁诺·克雷斯皮之请，特意发布公告解释，称电影不过是一种造梦机器，不值得观众如此激情投入。听到这一令人沮丧的解释，不少人认为自己成了吉卜赛人又一新奇发明的牺牲品，决定再也不来剧院，因为自家已经有够多烦恼，不必再为那些虚幻人物装出来的不幸落泪。手摇唱机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那些法国卖笑女郎带来唱机取代了过时的手摇风琴，令乐队的收入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开始的时候，好奇心使光顾花街柳巷的寻欢作乐者人数激增，据说连一些可敬的女士也化装成乡民男子，特意跑去就近观看新奇的唱机，但经过反复的近距离观察，她们很快得出结论：那并不是所有人想象的，或是那些女郎宣传的什么魔法音乐轮，而不过是个机器把戏，远不如乐队那样富于感染力、人性化又充满日常真实感。人们深感失望，因此到后来唱机变得普遍，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的时候，也没有用来供成人消遣，而是当作给儿童拆卸的玩具。然而，当市镇上有人在火车站亲身体验了电话这一惊人事物—因为也有手柄，一度被视为简易唱机—连最不肯轻信的人也陷入了困惑。上帝仿佛决心要试验人类惊奇的极限，令马孔多人时时摇摆于欢乐与失望、疑惑与明

了之间，结果再没有人能确切分清何处是现实的界限。真实与幻景错综纠结，引得栗树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鬼魂也按捺不住，大白天在家中四处游荡。铁路正式开通之后，火车于每个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定时抵达，于是一座简易的木屋小站盖起来了，配有一张写字台、一部电话和一个售票窗口。从那以后，马孔多的街巷间出现了许多男男女女，他们装作平常人模样，其实却像马戏团的演员。这些走街串巷、巧舌如簧的商贩以同等泛滥的热情推销高压锅和宣扬第七日使灵魂得救的修行法则，按说他们在这个受过吉卜赛人愚弄的市镇上前景并不乐观，但仍从那些耐不住反复游说以及容易上当的人身上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在这些夸夸其谈的演员中，有一位身穿马裤加护腿，头戴软木帽，鼻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眼睛呈黄玉色，皮肤如斗鸡的人物，在一个星期三来到马孔多并在布恩迪亚家用了午饭。他就是身材矮胖、一脸笑容的赫伯特先生。

他吃完第一把香蕉之前，并没有引起桌上任何人的注意。奥雷里亚诺第二只是偶然遇见了他，当时雅各酒店已客满，他正费劲地用西班牙语抗议。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像平常对待陌生人那样，将他带回家里。他经营系留气球生意，已经游遍半个世界，一向收入可观，但在马孔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乘坐气球升空，因为人们曾经见识并坐过吉卜赛人的飞毯，不免把这项发明视为一种倒退。他正打算赶下一趟火车离开。午饭时，平日挂在饭厅里的虎纹香蕉端上了桌，他心不在焉地掰下一根。他边说边吃，慢慢品尝，细细咀嚼，不像是食客在享受美味，倒像是学者在借此消遣。他吃完一把又要了一把。这时他从一直带在身边的工具箱里取出一套精密仪器，以丝毫不逊于钻石买家的谨慎专注态度仔细检查了一根香蕉，又用专门的探针切割，再用药剂师的天平称重，用军械师的卡尺测长。随后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一系列仪器，依次测量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面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仪式，没有人还能安心吃饭，都在等待赫伯特先生最后发布重大结论，但他却守口如瓶，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意图。

此后的日子里，人们看见他带着网罩和小筐在市镇周边捕捉蝴蝶。星期三的时候来了一群人，有工程师、农艺师、水文专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他们在几星期内将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都考察了一遍。晚些时候，杰克·布朗先生乘坐挂在黄色火车后面的专用车厢来到，那车厢整体包银，配有紫色天鹅绒安乐椅和蓝色玻璃车顶。乘坐专用车厢一道赶来的还有神情肃穆的黑衣律师，当年他们曾四处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脚步，如今又簇拥在布朗先生左右。人们不禁由此猜想，那些农艺师、水文专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包括赫伯特先生和他的系留气球、彩色蝴蝶，以及布朗先生和他带轮子的陵墓、凶猛的德国犬，都与战争不无关联。然而疑心重重的马孔多人根本来不及思忖，他们刚开始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市镇已经变成一片锌顶木屋的营地，住满了从世界各地乘火车—不光有坐在座位和平台上的，还有坐在车顶上的—赶来的外乡人。美国佬带来了他们身披麦斯林纱、头戴薄纱大礼帽、神情慵懒的女人，在铁路另一侧建起一座城镇。街道上棕榈树荫掩映，家家户户装有金属纱窗，阳台上摆着白色小桌，天花板上挂着吊扇，宽广的绿草地上有孔雀和鹌鹑漫步。整个城区被一圈金属网环绕，仿佛电网保护下的巨大鸡笼。在夏天凉爽的清晨，网上缀满烧焦的燕子，远远望去黝黑一片。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目的何在，或者真的只是些慈善家，然而这些人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令当初吉卜赛人造成的混乱相形见绌，而且更持久也更难以索解。他们掌握了往昔唯有造物主才拥有的力量，能调节降水量，加速收获周期，令河流从亘古不变的路线改道，将河中巨大的白石连同冰冷的激流都移到了市镇另一端的墓地后面。就是这一次，他们在何塞·阿尔卡蒂奥退色的墓上加筑了一层混凝土，以免尸体散发的火药味污染水源。为那些缺乏爱情滋润的外乡人考虑，他们将柔情万种的法国女郎们所在的街道扩建成大得多的集镇，并在一个值得铭记的星期三运来一火车不可思议的妓女大军。这些淫靡放荡的风月高手，古老技艺无一不精，药膏器具无所不备，能够使无能

者受振奋，腼腆者获激励，贪婪者得餍足，节制者生欲望，纵欲者遭惩戒，孤僻者变性情。灯火辉煌的舶来品商号取代了五色杂陈的破旧店铺，令土耳其人大街愈加繁华。每到星期六夜晚街上人声鼎沸，众多冒险者在赌桌上、打靶摊前、专营算命解梦的小巷里、摆着油炸食品和饮料的餐桌间互相推搡拥挤。到星期天清早一片狼藉，四下横躺的常有快乐的酒鬼，但总少不了斗殴时被子弹、拳头、刀子、酒瓶殃及的围观者。外来人潮不合时宜地涌入，最初街上几乎无法行走，堆满了家具和箱笼。有人未经批准就随便在空地上自行盖房，大张旗鼓地干起木工活。也有人在巴旦杏树林间拉起吊床，支起遮阳篷，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寻欢做爱。唯一保持安宁的角落是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生性平和的黑人的居住区，他们把木屋搭在桩子上，在市郊建成一条街道。每到傍晚，他们便坐在家门口，用含混的帕皮亚门托语唱起忧伤的赞美诗。短短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在赫伯特先生来访后八个月，马孔多的老居民每天都要早早起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瞧瞧我们自找的麻烦，”那阵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常常说，“就因为请个美国佬吃香蕉。”

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对外乡人的潮涌而至兴奋不已。家里突然间挤满了陌生的来宾、世界各地的酒肉豪客，不得不在院中加盖卧室，扩建饭厅，换上一张可供十六人就餐的新餐桌，并配上成套的新餐具，即使如此仍需排出班次轮流进餐。费尔南达压下疑虑，像款待国王一样招待最卑劣的客人，但他们却穿靴踩脏长廊地板，在花园里随地小便，到处铺席子午睡，言语间全然不顾女士的感受，毫无绅士风度可言。阿玛兰妲对入侵家中的人潮愤慨不已，恢复了旧时习惯回到厨房吃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认定大多数人来作坊探访他并非出自善意或敬意，而是抱着瞻仰历史遗迹、观赏博物馆化石的猎奇心态，因此决定紧闭房门，此后便很少再见他坐在大门口。乌尔苏拉却不同，即使在步履蹒跚扶墙行走的日子里，每当火车驶来仍像孩童般兴奋。“鱼和肉都得做。”她下令给四个厨娘，她们在桑塔索菲亚·

德拉·彼达的沉着指挥下忙碌着将一切准备到位。“什么都得做一些，”她说，“你永远不知道外乡人爱吃什么。”火车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到达。午饭时，整个家在集市般的喧闹中震颤。那些汗流浃背的客人甚至不知道主人是谁，你推我搡地抢占餐桌上的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厨娘们忙不迭端上大锅大锅的汤、一罐罐炖肉、一瓢瓢蔬菜、一盘盘米饭，并用长柄勺不停地将整桶整桶的柠檬水舀进杯里。家里乱成一片，费尔南达一想到不少人吃了两回便气恼不已，而且不止一次恨不得用市井小贩才说的粗话来发泄怒火，因为竟有昏了头的客人要找她结账。赫伯特先生来到马孔多已经一年多，人们只知道美国佬想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带人寻找伟大发明时穿越的着魔之地上种植香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另外两个儿子，额头上仍带着灰烬十字的印记，也被这热潮吸引而来。他们说明来意的一句话或许能代表所有人的心声。

“大家都来，”他们说，“我们也来了。”

美人儿蕾梅黛丝是唯一不为香蕉热潮所动的人。岁月流逝，她却永远停留在天真烂漫的童年，对各样人情世故越发排斥，对一切恶意与猜疑越发无动于衷，幸福地生活在自己单纯的现实世界里。她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费事穿胸衣和衬裙，便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麻布长袍，往头上一套就简单解决了穿衣服的麻烦，并且感觉上仍像没穿一样。按照她的想法，在家里赤身露体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她本有一头瀑布般垂至腿肚的长发，但她厌烦了家人总要她修剪，还要用发卡束成发髻，或用彩色绳圈编出辫子，便索性剃了个光头，拿头发去给圣徒像做假发。她简化事物的本性有个惊人之处：她越是抛开时髦只求舒适，越是罔顾成规仅凭感觉行事，她那不可思议的美貌就越发动人心魄，对男人也越有诱惑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孔多时，乌尔苏拉一想到他们和曾孙女的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立刻因久远的恐惧而战栗。“你得睁大眼睛，”她提醒蕾梅黛丝，“跟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搞上，都会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

她毫不理会这提醒，穿上男人的衣服，在沙地上打了个滚就去爬竿。十七个堂兄弟见此景象都难以自持，险些酿成一场悲剧。正因如此，他们逗留期间都没住在家里，其中四人留下后也都按乌尔苏拉的安排租房另住。如果美人儿蕾梅黛丝得知这样小心防范的理由，一定会觉得十分好笑。直到羁留尘世的最后一刻，她都丝毫不曾察觉自己红颜祸水的宿命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灾难。每一次她不顾乌尔苏拉的命令出现在饭厅，总会在外乡人中激起惊恐和骚乱。显而易见，她在肥大的外袍下全然赤裸，而且所有人都会把她线条完美的光头当作挑逗，把她天热时肆无忌惮露出的大腿、用手吃饭后吸吮手指的习惯视为罪恶的诱惑。家里从没人注意，外乡人却很快发觉，美人儿蕾梅黛丝能散发撩人心魄的气息、扬起令人断肠的微风，所过之处几小时后仍然余香袅袅。在世界各地历经沧桑的情场老手一致认定，像美人儿蕾梅黛丝天生香气所催发出的这般强烈的渴望，他们平生从未体验过。凭着这种气息，他们在秋海棠长廊、在客厅、在家中任何一处，都能判断出她驻足的确切位置以及她离开了多长时间。这是一种特征明显、不易混淆的踪迹，很久以前就已融入家中其他气味因而家里人无从察觉，但外乡人却能立刻辨认出来。因此，只有他们能理解那位年轻的警卫队队长为何殉情，另一位来自远方的绅士为何陷入绝望。美人儿蕾梅黛丝对身边的紧张氛围毫无察觉，对自己在所到之处引发的可怕的情感灾难一无所知。她对男人没有丝毫恶意，可最终她那无辜的和善态度却使他们陷入狂乱。乌尔苏拉为了让她不被外乡人看到，强迫她和阿玛兰妲在厨房里吃饭，她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终于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她对在哪儿吃饭无所谓，也没有固定时间，而是视自己的胃口而定。有时她凌晨三点起床吃午饭，然后睡上一整天，如此日夜颠倒过上几月，直到某个偶然事件让她恢复正常。情形好的时候，她上午十一点起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赤身露体关在浴室里杀蝎子，慢慢从漫长而昏沉的梦境里清醒过来。然后她用加拉巴木果壳瓢从池里舀水沐浴。沐浴过程漫长且细致，充满仪式感，不了解

她的人会以为她在专注地欣赏自己的胴体，而那胴体也的确值得这样欣赏。其实对她而言，这一独自进行的仪式毫无肉欲的意味，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直到自己有了吃饭的胃口。一天，她刚开始沐浴，有个外乡人掀开屋瓦偷窥，看到她惊人的裸体顿时透不过气来。她从屋瓦的缝隙间发现了那双凄楚的眼睛，但并没有害羞，只是惊慌。

“当心，”她喊道，“会掉下来的。”

“我只想看看你。”外乡人嗫嚅道。

“好吧，”她说，“不过要当心，瓦片都烂了。”

外乡人的脸上浮现出惊愕又痛苦的表情，似乎正在与自己的本能冲动展开无声斗争，不愿打破眼前的幻梦。美人儿蕾梅黛丝以为他害怕压碎屋瓦，于是比平时洗得更快，想让他尽早脱离险境。她一边从水池里舀水冲洗身子，一边告诉他屋顶的状况是个问题，想必是铺的落叶淋雨腐烂才招来满浴室的蝎子。外乡人把这样的闲谈当作了纵容，终于在她开始打肥皂的时候没能抵制住诱惑，迈进一步。

“让我给你打肥皂吧。”他嗫嚅道。

“谢谢你的好意，”她回答，“我用自己的手就够了。”

“哪怕只是背上也行。”外乡人恳求道。

“没那个必要，”她说，“从没见过谁往背上打肥皂。”

后来，她擦干身子的时候，外乡人双眼含泪地恳求她嫁给自己。她直截了当地答道，自己绝不会嫁给就为了看女人洗澡而浪费将近一小时，甚至错过了午饭的傻男人。最后，当她穿上外袍，他证实了她里面的确什么也没穿，就像所有人猜测的那样。他再也无法忍受，感觉这秘密像灼热的铁已经在自己身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于是他又揭去两片屋瓦，准备跳进浴室。

“这很高，”她吓坏了，赶忙提醒他，“你会摔死的！”

腐坏的屋顶在巨响中四分五裂，那男人来不及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就已摔得头破血流，当即死在水泥地面上。从饭厅闻声赶来的外乡人匆忙抬走尸体，他们在死者的皮肤上闻到了美人儿蕾梅黛丝那令

人窒息的气息。那气息深深渗入尸体，连头颅裂缝里涌出的都不是鲜血，而是一种饱含那神秘香气的琥珀色液体。于是他们明白美人儿蕾梅黛丝的气息仍在折磨死者，直到尸骨成灰也不放过。然而，他们并没有将这桩恐怖的事件与其他两个为美人儿蕾梅黛丝而死的男人联系起来。要等到另一个牺牲者出现，外乡人以及马孔多的许多老住户才会相信关于美人儿蕾梅黛丝的传说，即她发出的不是爱情的气息，而是死亡的召唤。证实这一点的机会出现在几个月后，那天下午美人儿蕾梅黛丝和一群女友一起去见识那些新奇的种植园。对马孔多的居民来说，这是一种新兴的消遣：在香蕉林中弥漫着湿润气息又杳无尽头的小径间漫步，那里的寂静仿佛刚刚从别处迁来，崭新未用，因此还不能正常传递声音。有时候在半米的距离内听不清别人说话，但在种植园另一头却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新游戏为马孔多的少女带来欢笑和惊奇，引发惊恐与戏嘲，直到晚上她们还会谈起恍如梦境的散步经历。那里的寂静如此出名，乌尔苏拉也不忍剥夺美人儿蕾梅黛丝的乐趣，便同意她那天下午出门，但要衣着得体并戴上帽子。从少女们走进种植园的那一刻起，空气中便有致命的芳香满溢。在沟垄间劳作的男人感到自己被奇异的魔力所控制，面临着无形的危险，很多人甚至忍不住想要痛哭一场。美人儿蕾梅黛丝和她受惊的女友们险些落入一群凶暴的男人手中，好不容易才躲进附近的一户人家。没过多久四个奥雷里亚诺将她们救出，他们额上的灰烬十字引发某种对神明的敬意，仿佛那是门第等级的标志、免受伤害的印记。美人儿蕾梅黛丝没跟任何人说起有个男人趁着混乱在她腹部摸了一把，那只手更像是攫在悬崖边缘的鹰爪。那一瞬她惊愕地望着袭击者，那双绝望的眼睛像灼人的炭火印在她的心里。当晚，那男人在土耳其人大街吹嘘自己的勇气，炫耀自己的幸运，可几分钟后一匹马就从他胸前踏过，众多外乡人看着他在街上垂死挣扎，直到在自己吐出的鲜血里窒息。

四桩无可置疑的事例证实了美人儿蕾梅黛丝拥有致命力量这一猜测。尽管不乏言语轻薄的男人乐于宣称与这样令人心动的女人过上一

夜死了也值，可实际上没人敢去尝试。或许想要征服她乃至祛除她带来的危险，只需一种最自然最简单、被称为“爱”的情感，但从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乌尔苏拉不再为她费心。曾几何时，她尚未放弃挽救她令她融入现实的努力，试图让她对家务产生兴趣。“男人比你想的要求更多。”她故作神秘地说道，“有很多饭要做、很多地要扫，还有很多小事要忍耐，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乌尔苏拉试图训练她为家庭幸福作准备的想法不过是自我欺骗，因为她早已确信一旦欲望得到满足，没有任何男人能忍受哪怕一天她这种不可思议的懒散。最后一个何塞·阿尔卡蒂奥降生后，她一心要将他培养成教皇，也就不再为曾孙女操心。她任由她自生自灭，相信早晚会有奇迹发生，在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耐性足够的男人能接受她。很早以前，阿玛兰妲就放弃了将她改造成贤妻良母的一切努力。在缝纫间里那些被遗忘的午后，她这个侄女连对帮忙摇缝纫机摇柄都不大感兴趣，那时她便得出明确的结论：她脑子有问题。阿玛兰妲奇怪她竟会对男人的甜言蜜语完全无动于衷，便对她说：“看来我们得卖彩票才能把你推销出去。”后来，乌尔苏拉坚持要美人儿蕾梅黛丝用头巾蒙脸去望弥撒，阿玛兰妲认为这样平添了神秘感，很快就能吸引某个好奇的男人耐下性子来寻索她内心的弱点。然而当阿玛兰妲看到对那个在各方面都胜过一位王子的追求者她竟愚蠢地不屑一顾，便不再抱任何希望。费尔南达从未试图去理解她。她在血腥狂欢节上见到美人儿蕾梅黛丝一身女王打扮，觉得她真是个出众的美人。可看到她用手抓饭吃，说出的话没有一句不显天真，费尔南达只有在心里哀叹，家里这些傻子都活得太久了。尽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依然相信并再三宣扬，美人儿蕾梅黛丝实际上是他平生见过最有智慧的人，这一点从她不时嘲弄众人的惊人能力上就可以看出，但他们还是对她不闻不问，任其自然。美人儿蕾梅黛丝独自留在孤独的荒漠中，一无牵绊。她在没有恶魇的梦境中，在费时良久的沐浴中，在毫无规律的进餐中，在没有回忆的漫长而深沉的寂静中，渐渐成熟，直到三月的一

个下午，费尔南达想在花园里叠起她的亚麻床单，请来家里其他女人帮忙。她们刚刚动手，阿玛兰妲就发现美人儿蕾梅黛丝变得极其苍白，几近透明。

“你不舒服吗？”她问道。

美人儿蕾梅黛丝正攥着床单的另一侧，露出一个怜悯的笑容。

“正相反，”她说，“我从来没这么好过。”

她话音刚落，费尔南达就感到一阵明亮的微风吹过，床单从手里挣脱并在风中完全展开。阿玛兰妲感到从裙裾花边传来一阵神秘的震颤，不得不抓紧床单免得跌倒。就在这时美人儿蕾梅黛丝开始离开地面。乌尔苏拉那时几近失明，却只有她能镇定自若地看出那阵不可阻挡的微风因何而来，便任凭床单随光芒而去，看着美人儿蕾梅黛丝挥手告别，身边鼓荡放光的床单和她一起冉冉上升，和她一起离开金龟子和大丽花的空间，和她一起穿过下午四点结束时的空间，和她一起永远消失在连飞得最高的回忆之鸟也无法企及的高邈空间。

外乡人想当然地认为美人儿蕾梅黛丝终于屈从于成为蜂后的宿命，而她的家人不过是编出升天的鬼话来挽救名誉。费尔南达尽管妒火中烧，最终还是承认了这一奇迹，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恳求上帝归还那些床单。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奇迹，甚至点起蜡烛念诵经文，举行九日祭。如果不是奥雷里亚诺兄弟惨遭屠杀使恐怖代替了惊诧，或许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其他的话题。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从未认为自己事先感知过预兆，但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早料到了儿子们的悲惨结局。当随着人潮赶来的奥雷里亚诺·塞拉多和奥雷里亚诺·阿卡亚表示愿意留在马孔多，父亲曾试图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他看不出他们留在这个一夜之间就变为危险地带的市镇上有什么可做。但奥雷里亚诺·森特诺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得到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支持，在自己的厂子里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出于尚说不清楚的理由反对这一决定。自从见到布朗先生坐着马孔多的第一辆汽车登场—那是辆橙色的翻篷轿车，喇叭声把市镇

上的狗吓得不轻—这位老军人就对众人大惊小怪的样子气恼不已，他意识到人性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再是那个抛下妻儿肩扛猎枪上战场的时代。自从尼兰迪亚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先后上任的都是些从马孔多温和乏味的保守派中选出的庸庸碌碌的市长、沦为摆设的法官。“这是一帮可怜虫的政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着配有警棍的赤足警察走过时评论道，“我们打了那么多仗，就争取到没让人把房子漆成蓝色。”但自从香蕉公司到来，当地官员被外来势力取代，布朗先生还把他们接进电网鸡笼里生活，据他说是去那里享受与他们地位相称的待遇，不用再忍受酷热、蚊虫以及市镇上各种不便和匮乏。昔日的警察换成了手持砍刀的雇佣兵。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关在作坊里，思考着这些变化，在沉寂的孤独岁月中第一次痛苦地确信没将战争进行到底是个错误。就在那些天里，已被遗忘的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的兄弟带着他七岁的孙子去广场买饮料，孩子不小心撞上一个警察小头目，把饮料洒到了他的制服上，那个暴徒就挥起砍刀将他剁成肉酱。孩子的爷爷试图上前阻止，也被一刀砍下脑袋。市镇上所有人都看见一群人如何将无头的尸体送回家里，看见那脑袋被一个女人揪住头发拎着，还看见鲜血模糊的袋子里装着孩子的碎尸。

这一事件结束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赎罪心境。蓦然间他内心又充满了年轻时的愤怒，当年他面对那个因被疯狗咬伤就惨遭乱棍打死的女人的尸体时也曾这般怒火中烧。他望着家门口好奇围观的人群，因着对自己的深深蔑视又恢复了当年的洪亮嗓音，向他们发泄胸中再也无法忍受的愤恨。

“等着瞧，”他喊道，“我要领着我的人拿起武器，干掉这些该死的美国佬！”

那个星期里，在沿海各地，他的十七个儿子像兔子般被暗藏的凶手瞄准额间的灰烬十字一一猎杀。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晚上七点从母亲家出来，被黑暗中射出的一发子弹打穿了脑门。奥雷里亚诺·森

特诺被发现死在工厂中他时常挂起的吊床上，眉间插着一把冰锥没至手柄。奥雷里亚诺·塞拉多看完电影把女友送回她父母家，归来时走在灯火通明的土耳其人大街上，被人群中一个永远无法确知身份的凶手用左轮手枪一枪放倒，跌进一锅沸腾的黄油里。几分钟后，正和一个女人待在房间里的奥雷里亚诺·阿卡亚听见有人敲响紧闭的房门并喊道：“快，有人在杀你的兄弟。”据那女人事后讲述，他从床上跳起来，打开门，迎面一发毛瑟枪子弹爆开了他的脑袋。在那个死亡之夜，家里准备为四具尸体守灵的同时，费尔南达发疯似的跑遍整个市镇寻找奥雷里亚诺第二。而他已被佩特拉·科特斯藏在衣柜里，她以为屠杀的目标包括所有与上校同名的人。直到第四天他才被放出来，那时来自沿海各地的电报已经证实，暗藏的敌人只针对带有灰烬十字的兄弟下手。阿玛兰妲找出记录侄子们信息的小本，收到一封电报就划去一个姓名，到最后只剩下最年长的那个。他们都清楚地记得他，因为他黝黑的皮肤和碧色的大眼睛形成了强烈反差。他叫奥雷里亚诺·阿玛多，是个木匠，生活在深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等了两个星期仍没收到告知他死讯的电报，奥雷里亚诺第二想到他或许还不知道死亡的威胁，便派出一名信差去提醒他。信差带回消息，说奥雷里亚诺·阿玛多还活着。在暗杀之夜，有两个男人去了他家，用手枪向他射击，但没打中额间的灰烬十字。奥雷里亚诺·阿玛多翻出院墙，消失在雨林的迷宫里。他曾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做过木材生意并结下友谊，因而对那里了如指掌。他从此没有了消息。

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言，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共和国总统向他发来唁电，承诺会彻底调查，并为死者表示哀悼。在总统的授意下，市长为葬礼送来四个花圈，想摆在棺材上，却被上校拦在街头。葬礼之后，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给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去发送，但电报员拒绝办理。于是他添上更多火药味十足的字句，装进信封寄了出去。就像妻子去世或战争中好友接连战死时一样，他心里没有悲痛，只有无处发泄的盲目愤怒，以及徒耗精力的无奈。他甚

至指控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参与了暗杀，因为神甫曾给他的儿子们留下无法消除的印记便于敌人辨认。衰朽不堪的神甫那时已头脑糊涂，在布道坛上的荒唐布道开始吓走教区的信众。一天下午他拿着圣灰星期三的灰罐来到家里，要为全家画十字来证明那灰烬完全可以用水洗掉。然而惨剧已造成深深的恐惧，连费尔南达也不愿参与实验，并且从此再没有布恩迪亚家的人在圣灰星期三跪在祭坛围栏前。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很久都未能恢复平静。他不再制作小金鱼，吃不下东西，拖着毯子像梦游者一般在家中游荡，口中咀嚼着默然的怒火。三个月过去，他的头发变得灰白，往日里修剪齐整的髭须耷垂在苍白的唇边，但他的双眼重又变成两团火炭，这双眼睛曾吓住看到他出生的人，曾仅仅一瞥就让椅子打转。忍受着怒火的折磨，他试图唤起青年时代曾引导自己走上危险道路直至荣耀的荒原的预兆，却都归于徒然。他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家中，这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引发他丝毫的感怀。一次他打开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想寻找战前岁月的痕迹，却只看见废料、垃圾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污物。在没人再翻动的残破书页间，在被潮气侵蚀的羊皮卷上，生出繁密的紫苔；曾经是家中空气最洁净的房间，却充斥着腐朽记忆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一天早上，他看见乌尔苏拉趴在栗树下已故丈夫的膝上哭泣。家里只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不见那位经历半个世纪风吹雨打的健硕老人。“跟你父亲打个招呼吧。”乌尔苏拉对他说。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又一次确认了那片空旷的空间同样无法触动他的情感。

“他说什么？”他问。

“他很难过，”乌尔苏拉回答，“因为他认为你快死了。”

“请告诉他，”上校笑了，“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

亡父的预感拨动了他心中残存的最后一分高傲的余烬，但他却错以为陡然间重获了力量。因此他纠缠着乌尔苏拉要她说出院中何处埋

藏着圣约瑟石膏雕像里的金币。“你永远不会知道。”她回答道，那坚定的态度源于往日的教训。“早晚有一天，”她补充道，“这笔财富的主人会出现，只有他能挖出来。”没人知道一向慷慨大方的人怎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开始聚敛金钱。那并非足够救急的小钱，而是提一下就能让奥雷里亚诺第二咋舌的惊人巨款。他登门求助时，那些旧日的党内同僚都躲起来不见他。就在这个时期他听到人们说：“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然而他如此坚持，四处奔走恳求，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东拼西凑，暗中不懈努力，结果在八个月里筹到的款项超过了乌尔苏拉埋藏的金币数目。于是他去拜访病中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要他协助自己掀起一场全面战争。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尽管瘫痪在摇椅上，但在一段时期内的确是唯一能够联络到起义军旧部的人物。自从尼兰迪亚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寄身于打造小金鱼的作坊，他却与直到战败仍忠心耿耿的部下保持着联系。他和他们一起打着一场屈辱的日常战争，其中充满恳求与申请：“请您明天再来”，“就快了”，“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您的问题”；打着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败给了那些“您忠实恭顺的仆人”，他们应该签发但从未签发养老抚恤金。另一场血腥的战争延续了二十年，却不曾像这场无限拖延、日日消磨的战争带给他们如此多伤害。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曾躲过三次暗杀，五次受伤大难不死，身经百战安然无恙，却败给了无尽的等待，屈服于凄凉的晚景，在一间借来的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想着阿玛兰妲。最后一批他知晓下落的老兵出现在报纸上的照片里，卑顺地仰着面孔，身旁站着不知名的共和国总统。他赏赐他们铸有自己头像的金扣子别在衣领上，又归还给他们一面染着鲜血和硝烟污痕的战旗，以备日后覆在棺材上。另一些人更有骨气，在社会救济的荫庇下仍苦苦等待回音，他们或因饥饿而死，或怀着一腔怒火苟活，或在精致的荣誉粪堆中衰老腐烂。因此，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邀请

他发动一场殊死决战，彻底铲除外国入侵者扶植的腐败可耻的政府，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不禁因同情而颤抖起来。

“噢，奥雷里亚诺，”他叹气道，“我知道你老了，可现在才明白你比看起来的样子还要老得多。”

十三

在最后惶惑的几年，乌尔苏拉几乎无暇顾及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教皇培养，一转眼就到了他该收拾行装去上神学院的时候。他的妹妹梅梅，夹在费尔南达的严厉和阿玛兰妲的幽怨之间，几乎同时到了预定的年龄，该送到修女开办的学校，她将在那里被培养成古钢琴大师。乌尔苏拉十分苦恼，她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竟调教出这样一位倦怠的见习教皇，但她没有归咎于自己老年蹒跚的步履、视物模糊的翳障，而是怪罪于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只能模糊地想象为时代的逐渐衰败。“如今的日子不比从前了。”她常这么说，感到失去了对日常现实的把握。以前，她觉得孩子们很久也长不大。只要想想，过了多长时间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才跟着吉卜赛人离开，又过了多久之后他才刺了一身蟒蛇似的花纹，带着满口占星术士的腔调回家，而在阿玛兰妲和阿尔卡蒂奥忘掉印第安人的语言学会卡斯蒂利亚语之前家里又发生了多少事。再想想可怜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经历了多少天烈日与寒露，她为他的去世又哭过多少回，然后是经历无数战事、为家人带来无数忧愁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奄奄一息中被抬回家来，当时他还不满五十岁。过去，她做了整整一天的糖果小动物仍有时间照顾孩子，检查他们的眼白看是否需要一剂麻油。而现在，她无事可做，驮着何塞·阿尔卡蒂奥从早到晚游逛，这分外匆忙的时光流逝却使得她做起事来全都半途而废。事实上乌尔苏拉虽然连自己的年岁都已忘记却仍不服老。她四处碍事却又想事事插手，连外乡人也厌烦了她不停的询问，问他们在战争时期可曾寄存一尊圣约瑟石膏雕像，等过了雨季再取走。没人确切知道她从何时开始丧失视力。最后几年她已经卧床不起，但仍表现得仿佛只是衰老所致，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失明。她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出生之前便

意识到了这一异常。一开始她以为只是暂时的视力衰退，偷偷服用骨髓糖浆并往眼睛里滴蜂蜜，但不久便渐渐确认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黑暗，以至于对电灯这一新发明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第一批电灯泡装上时她只能隐约感受到那光亮。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那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用。她暗中用心记下东西的位置、人们的声音，继续凭记忆“观看”患白内障后看不到的事物。到后来她意外地发现了气味的助益，在黑暗中据此分辨东西远比凭借体积和颜色更为有效，她由此终于免去了认输的羞耻。在黑暗的房间里，她能穿针缝扣，还知道牛奶何时会煮沸。她对所有东西的位置了如指掌，有时连她自己都忘记她已失明。有一次，费尔南达因丢失了结婚戒指把家里搅得地覆天翻，最后还是乌尔苏拉在孩子们房间的壁架上找到。其实很简单，当其他人漫不经心地四下走动时，乌尔苏拉用剩余的四种感官关注着他们，免得被他们不小心撞到；一段时间后她发现家里的每个人每天都在无意中重复同样的路线，做同样的事，甚至在同一时刻说同样的话。只有当他们偏离这些刻板的常规时，才会有丢东西的危险。因此乌尔苏拉听见费尔南达为丢了戒指而沮丧，立刻想起她当天所做唯一与往日不同的事就是晾晒孩子们的床席，因为前一天夜里梅梅发现了一只跳蚤。那时孩子们也帮忙干活，由此乌尔苏拉想到费尔南达一定是将戒指放在了他们唯一够不着的地方—壁架上。而费尔南达只在她平常经过的路线上寻找，殊不知寻找失物会受到日常习惯的妨碍，因此总是难以找到。

乌尔苏拉竭力跟上家里的一切细微变化，而抚养何塞·阿尔卡蒂奥正帮了她的忙。她注意到阿玛兰妲在为卧室里的圣徒像换衣服，便装作要教孩子辨别颜色。

“来，”她对他说，“告诉我天使长圣拉斐尔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就这样，孩子提供了她双眼无法获得的信息，而早在他离家去神学院学习之前，她就已经能够凭着圣徒像衣服的质地来分辨不同的颜

色。但有时也会发生意外。一天下午，阿玛兰妲在秋海棠长廊里绣花，乌尔苏拉一下撞在她身上。

“上帝啊，”阿玛兰妲抱怨道，“请您走路看着点儿。”

“这得怪你，”乌尔苏拉说，“你坐在不该坐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是对的。但从那天起，她意识到从没有人发现过的一件事，即一年中太阳的位置不断发生细微的变化，坐在长廊里的人也会不知不觉随之挪动。从那以后，乌尔苏拉只需记得日期，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阿玛兰妲所坐的位置。尽管双手颤抖得越来越明显，双脚越来越沉重，她瘦小的身影却从未那样活跃，同时在无数地方出现。她几乎像当年操持整个家时一样忙碌。然而，在晚年无法穿透的孤独中，她获得了非凡的洞察力，能察觉到家中任何不起眼的小事，也第一次看清了过去因忙碌而忽略的真相。在培养何塞·阿尔卡蒂奥为上神学院作准备的那段时期，她细细回顾了马孔多创建以来家中的大事小情，彻底改变了对子孙的一贯看法。她意识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并非像她想的那样，由于战争的摧残而丧失对家人的情感，实际上他从未爱过任何人，包括妻子蕾梅黛丝和一夜风流后随即从他生命中消失的无数女人，更不必提他的儿子们。她猜到他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为着某种理想发动那些战争，也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因为疲倦而放弃了近在眼前的胜利，实际上他成功和失败都因为同一个原因，即纯粹、罪恶的自大。她最终得出结论，自己不惜为他付出生命的这个儿子，不过是个无力去爱的人。他还在她腹中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听见他哭泣。那清晰可辨的哭声惊醒了身边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高兴地认定儿子拥有腹语能力。其他人则预测他会成为一个预言家。而她却浑身颤抖，确信这深沉的哭号正是那可怕的猪尾巴的最初征兆，恳求上帝让他死在腹中。然而晚年的洞察力使她明白—这一点她也多次向人提起—胎儿在母腹中的哭泣不是腹语或预言能力的先兆，而是缺乏爱的能力的明显信号。儿子身上的光环剥落，反而在她心里激起所有他应得的同情。至于阿玛兰妲，那孩子

的铁石心肠曾令她恐惧，她刻骨的痛苦曾令她痛苦，但现在她终于发现阿玛兰妲才是世上从未有过的最温柔的女人。她怀着惋惜的心情弄明白了，阿玛兰妲令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遭受那些不公平的折磨，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是出于报复心理；令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日夜煎熬徒劳等待，也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是出于痛苦的怨毒。实际上，这两样行为都属于无穷的爱意与无法战胜的胆怯之间的殊死较量，最终胜出的是阿玛兰妲毫无理由的恐惧，恐惧的对象是她自己饱受折磨的心灵。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乌尔苏拉开始呼唤丽贝卡的名字。迟来的悔恨和突如其来的敬意激发了旧日的亲情，她明白只有丽贝卡，从未喝过自己的奶水只以地上的泥土和墙上的石灰为食的丽贝卡，血管中流淌的不是自己的血液而是陌生人的陌生血液—他们的骨殖仍在坟墓里咯咯作响—拥有冲动心性和炽热情欲的丽贝卡，才拥有无畏的勇气，而那正是乌尔苏拉希望自己的后代具备的品质。

“丽贝卡，”她说着，手在墙壁上摸索，“我们对你太不公平！”

家里人以为她失去了理智，自从她走路时像天使长加百列一样高举右手，人们便认定了这一判断。但费尔南达却发现她失常的阴影中隐藏着明察秋毫的光亮，因为她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家中上一年的开销。阿玛兰妲也持相似的看法。一天，她母亲在厨房搅拌着一锅汤，并不知道有人在一旁，却突然说起当初从第一拨吉卜赛人那里买来的玉米磨早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六十五次周游世界之前就已丢失，可它其实还在庇拉尔·特尔内拉家里。庇拉尔·特尔内拉也将近百岁，依然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只是出奇肥胖，到了能吓跑小孩的地步，就像当年她的笑声能惊飞鸽群一样。她对乌尔苏拉的本领毫不奇怪，因为她凭自己的经验开始明白，老年人的清醒判断会比纸牌算命更精准。

然而，当乌尔苏拉意识到她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来坚定志向，立时因沮丧而陷入迷惘。她试图用眼睛去看那些本

可以靠直觉看得更清楚的东西，于是开始频频出错。一天早上，她把一瓶墨水误当作花露水倒在孩子头上。她执意四处插手却造成无数麻烦，弄得自己也情绪恶劣，烦躁不安，一心想要挣脱如蛛网般缠着自己的黑暗。这时她并未将自己的笨拙视作衰老与黑暗的最初胜利，而是归咎于时光的错误。她想起以前，上帝还没让岁月缩水如同土耳其商人丈量花布时偷减尺寸，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如今不仅孩子们长得更快，连人的情感也变了样。美人儿蕾梅黛丝连身体带灵魂才升天，凉薄的费尔南达就在角落里踱来踱去，为那些被卷走的床单愤愤不平。奥雷里亚诺们在坟墓里尸骨未寒，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又点亮家中的灯火，聚上一群醉汉拉起手风琴，浑身浇透香槟酒，仿佛被害的不是基督徒而只是几条狗，仿佛用无数的操劳和无数的糖果小动物换来的这个疯人之家注定要沦为堕落的垃圾场。她想到这些的时候，家人正为何塞·阿尔卡蒂奥准备行李。乌尔苏拉又不禁自问是否应当索性躺进坟墓让人埋土，并毫无顾忌地质询上帝是否真的认为人心如铁足以经受这许多痛苦的折磨。她问了又问，愈加惶惑，并感到无可抑制的强烈欲望涌上心头，想要像外乡人一样破口大骂，想要让自己最终能放任片刻，那是她渴求已久却反复拖延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她不再逆来顺受，而要痛骂一场，把整整一个世纪忍气吞声压在心底的无数污言秽语一吐为快。

“妈的！”她叫了一声。

阿玛兰妲正要把衣服收进箱子，以为她被蝎子蜇了。

“在哪儿？”她警觉地问道。

“什么？”

“虫子！”阿玛兰妲解释道。

乌尔苏拉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心脏部位。

“这儿。”她回答。

星期四下午两点，何塞·阿尔卡蒂奥离家去了神学院。乌尔苏拉将会永远记得想象中他告别时的样子：无精打采而又神情严肃，像她

教导过的那样没流一滴泪；身穿配铜扣的绿呢正装，颈系浆过的领结，热得透不过气来。饭厅里满是她为了掌握他的行踪而洒在他头上的花露水气味。在饯行午宴上，家人用欢快的表情掩饰内心的不安，以夸张的热情回应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的妙语。当天鹅绒包面、四角镶银的箱子被搬出时，活像是从家里抬出一口棺材。唯一拒绝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就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这下麻烦事全齐了，”他愤愤道，“一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和费尔南达把梅梅送到学校，带回一架击弦古钢琴代替了原先的自动钢琴。正是在这个时候阿玛兰妲开始织起自己的寿衣。香蕉引发的狂热已经平息下去。马孔多的老住户被外乡人挤到边缘，勉强守住旧日的营生，但仍深感庆幸仿佛遭遇了一场海难劫后余生。家里依旧招待客人吃午饭，一直要等到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离开时，昔日的生活才得以恢复。然而好客的传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现在是费尔南达发号施令。乌尔苏拉被遗忘在黑暗中，阿玛兰妲只顾织寿衣，旧日的见习女王终于掌控了选择宾客的权力，并将承袭自父母的森严规矩强加给他们。在这样一个外乡人胡乱挥霍轻易得来的财富，闹得四处乌烟瘴气的市镇上，她的严厉举措却将家里变成旧习俗的堡垒。对她而言，只有和香蕉公司无涉的人才是体面人，就此毫无通融余地。连小叔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成为她歧视之下的牺牲品，因为他早在第一波狂潮中就将自己优异的斗鸡全部出手，当上了香蕉公司的庄园监工。

“只要他还长着外乡人的疖子，”费尔南达说，“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家中限制如此之严，相形之下奥雷里亚诺第二更体会到在佩特拉·科特斯那里的舒适。起初，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将宴会转移过去。后来，又借口牲畜的繁殖力下降，将牛棚和马厩移走。最后，借口情妇家更凉快，将打理生意的小办公室也移了去。等费尔南达发觉丈夫还在世自己就成了寡妇，已经错过了挽救的时机。奥雷里亚诺第

二几乎不在家里吃饭，虽然还陪妻子过夜，但这些表面维持的假象已经无法瞒过任何人。一天晚上，他由于疏忽在佩特拉·科特斯的床上过了一夜。出乎他的意料，费尔南达既无一句斥责也无一声幽怨，只是在次日把他的两箱衣物送到他情妇家里。她有意挑选大白天，又命人抬着箱子走在街道中央，好让所有人看到，以为这样做能使迷途的丈夫羞愧难当，低头回归正道。然而这一英勇壮举只是再次证明费尔南达不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而且也不了解这个与她父母所处完全不同的社区，因为所有看到衣箱经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必然结局，奥雷里亚诺第二则连续三天大摆筵席庆祝获得自由。对他妻子尤为不利的是，当她因颜色阴郁垂至脚踵的长袍、散发陈腐气息的诸多圣牌和不合时宜的高傲显得未老先衰，那位情妇却身裹华丽的真丝衣裙，眼中因旧情重燃漾出虎纹一样的光彩，像是再度焕发青春。奥雷里亚诺第二对她重又萌发了年轻时的激情，那时佩特拉·科特斯将他错认为他的孪生兄弟而爱他，同时与两人睡觉，并相信是上帝赐予好运让自己拥有这样的男人，做起爱来好像两个不同的人。这重拾的激情如此炽烈，两人不止一次正要吃饭，只因眼波交错，无需只言片语就立刻盖上饭菜，忍着饥饿去卧室里极尽欢爱。奥雷里亚诺第二从偷偷拜访法国女郎的几次经历中受到启发，为佩特拉·科特斯买了一张带主教式华盖的床，在窗前挂起天鹅绒窗帘，在天花板和墙壁上镶满水晶镜面。他从未像那时一般喜爱欢宴，大肆挥霍。每天十一点抵达的火车为他运来一箱又一箱的香槟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像跳昆比安巴舞时即兴邀请舞伴一样将所有碰见的人拉去赴宴，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认识的还是即将认识的，一概都在邀请之列。连只会说外语的布朗先生那样难以捉摸的人物，也被奥雷里亚诺第二诱人的表情和手势招引来，一次次在佩特拉·科特斯家烂醉如泥，甚至在手风琴的乐声中胡乱哼唱得克萨斯民歌，让一直跟在身边的德国猛犬伴着歌声跳舞。

“让一让，母牛们，”奥雷里亚诺第二在狂欢的高潮时分喊道，“让一让，生命短暂啊。”

他气色从未那样好过，他本人从未像那样广受爱戴，他的畜群也从未像那样疯狂地繁殖。那么多的猪、牛、鸡在无休无止的宴席中被屠宰，院中泥土在无数鲜血的浇灌下变得淤软乌黑。那里成了永久垃圾场，骨骸内脏遍地，残羹剩饭成堆，人们不得不一直燃放炸药吓走秃鹫，以免它们啄出宾客的眼珠来。奥雷里亚诺第二变得肥硕臃肿，面色红中透紫，走路像乌龟般迟缓。这都要归因于他奇佳的胃口，只有周游世界归来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才能比得上。耸人听闻的贪食，一掷千金的豪气，无人可比的好客，他的名声越出大泽区的边界，吸引了沿海一带最知名的老饕。神奇的饭桌精英从四面八方赶到，参加在佩特拉·科特斯家举行的疯狂的饕餮大赛。奥雷里亚诺第二保持常胜不败，直到那个不祥的星期六卡米拉·萨迦丝杜梅出现，这个图腾般的女人以“母象”的美名享誉全国。比赛一直持续到星期二清晨。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奥雷里亚诺第二就着木薯、山药和烤香蕉吃掉一头牛，喝下一箱半香槟，对胜利充满信心。比起波澜不惊的对手，他看起来兴奋活跃得多。对手明显更具专业风范，但也正因如此在挤满屋子的各路观众眼中显得缺乏激情。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求胜欲望驱使下张口大嚼的同时，“母象”施展外科医生般的技艺将肉细细分解，慢慢享用，甚至带有几分愉悦。她体形巨大敦实，但壮硕的身架掩不住女性的温情。她脸庞秀美，纤细的双手保养得当，浑身散发出不可抗拒的个人魅力，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进门时低声说，自己宁愿和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比赛。后来看到她吃下整整一扇牛肉仍保持着淑女的最佳仪态，他严肃地评价道，这头娇柔迷人而又胃口奇佳的长鼻动物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理想的女人类型。他说得不错。得名“母象”之前，她一度被称为“兀鹫”，这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她不像流言所说是杀牛碎骨的屠夫，也不是希腊马戏团里长胡子的悍妇，而是一所声乐学校的校长。她开始学习进食技巧时已是一位

可敬的母亲，她这么做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方式让自己的儿女吃得更好，即不靠人为刺激，而是凭借精神的绝对平静。她那已被实践证明的理论基于以下原则：一个人只要能完全拥有良心上的安宁，就可以不断进食直到疲惫无力为止。因此，她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非竞技方面的兴趣才离开学校和家庭，来与这个以无所顾忌的大胃王之名享誉全国的男人比试。她第一眼看到奥雷里亚诺第二，就意识到他不会输在胃上，却会输在性格上。第一个夜晚过去，“母象”依然不动声色，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因为说笑太多而渐渐困乏。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每人喝下五十个橙子榨出的果汁、八升咖啡，吃了三十个生鸡蛋。到第二个早上，两人都许久未眠，又吃下两头猪、一把香蕉和四箱香槟。“母象”怀疑奥雷里亚诺第二也在无意中发现了同样的进食诀窍，但区别在于他是从彻底放纵的荒唐之道中领悟的。这样他就比她预想的更为危险。然而在佩特拉·科特斯端上两只烤火鸡时，奥雷里亚诺第二的肚子已快撑到极限。

“如果吃不了，就别再吃了，”“母象”说，“我们算打成平手。”

她说这话是出于真心，知道自己眼看要将对手逼死，在懊悔中再无法咽下任何食物。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将这话错当成新的挑战而猛吞火鸡，结果连他惊人的巨胃也无法承受。他失去了知觉，一头扎在盛残骨的盘子里，像狗一样口吐白沫，发出窒息垂死时的嘶嘶声。他感觉在黑暗中被人从一座塔的顶端扔下，坠向无底的深渊，并在最后一线清醒的光亮中意识到在这没完没了的下落尽头等待他的是死亡。

“带我去费尔南达那里。”他挤出了这句话。

朋友们把他送回家，认为他算是履行了对妻子的承诺，没有死在情妇的床上。佩特拉·科特斯把他想要穿到棺材里去的那双漆皮靴打好鞋油，正四处找人要给他送去，这时却有人来告诉她说奥雷里亚诺第二已脱离危险。实际上他不到一个星期就康复了，十五天后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筵席庆祝大难不死。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斯家里，但

每天都去看望费尔南达，有时还会留下来和家人吃饭，仿佛命运颠倒了事物，使他变成了情人的丈夫、妻子的情人。

这对费尔南达而言是一种宽慰。遭冷落时，她排解烦闷的方法只剩下在午休时间弹奏古钢琴和阅读儿女的来信。在半月一封寄给他们的信中，她没写一句真话。她对儿女避而不言自己的痛苦，刻意隐去家中的悲哀。尽管阳光仍照耀在秋海棠上，午后两点依然炎热难耐，欢闹声还不时从街上传来，这个家却越来越像她父母那座殖民时代的深宅。费尔南达游荡于三个活着的鬼魂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死去的鬼魂之间，后者在她弹奏古钢琴时，偶尔会坐在客厅的阴影里，露出探询的目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恍如一个影子。自从上次出门去找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要发动一场无望的战争之后，他除了到栗树下小便几乎从未离开作坊。他只允许理发师每三个星期登门一次，旁人一概不见。乌尔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便吃什么。他制作小金鱼的热情未减，但自从听说人们买去不是当作首饰而是当作历史遗物，就不再出售。他把蕾梅黛丝那些从成婚时起就装饰在卧室里的娃娃拿到院里付之一炬。警觉的乌尔苏拉发现了儿子的举动，却没能制止。

“你心肠硬得像石头。”她对他说。

“这不是心肠的问题。”他回答，“房间里全是蛀虫。”

阿玛兰妲在织她的寿衣。费尔南达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时给梅梅写信，还寄去礼物，但对何塞·阿尔卡蒂奥却提都不愿提起。“你们到死也不会明白。”当她通过乌尔苏拉询问原因时，阿玛兰妲这样回答，而这一回答在她心中种下的疑问，永远也没有得到解答。身材高挑瘦削，神情高傲，总穿着宽松的泡泡纱裙，顽强地抗拒岁月流逝以及苦痛记忆的侵蚀，阿玛兰妲仿佛在前额上刻着代表贞洁的灰烬十字。其实真正的记号在她手上，在她睡觉时也不摘下并且总是亲手清洗熨平的黑纱上。时间在她织绣寿衣的指缝间流逝。在人们的印象

中，她似乎白天织晚上拆，却不是为了借此击败孤独，恰恰相反，为的是持守孤独。

在被遗弃的岁月里，费尔南达最担心的是梅梅放假回家却见不到奥雷里亚诺第二。那次暴食晕厥事件结束了她的担忧。梅梅回来的时候，她父母已经商定，不仅要让女儿相信奥雷里亚诺第二仍是个顾家的丈夫，还要避免让她察觉到家里的悲凉气息。每年的那两个月，奥雷里亚诺第二扮演起模范丈夫的角色，举办有冰激凌和小饼干的聚会，其间由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学生弹奏古钢琴助兴。从那时就可明显看出，她没有继承母亲的性格。她更像是阿玛兰妲的缩影，仿如十二三岁时的她，还浑然不知伤心的滋味，走起路来仿佛踩着舞步，为家里平添生机，直到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秘密激情永远扭曲了她的心灵。但与阿玛兰妲不同，与所有家人都不同，梅梅尚未表现出继承自家族的孤独宿命，看上去完全与外界融成一片，只是到了下午两点会雷打不动地关在客厅里练习古钢琴。很明显她喜欢这个家，一整年都期盼着回家后在年轻人中引发的那种欢腾。她喜爱聚会和殷勤好客的性情与父亲相去不远。这一灾难性遗传的最初征兆显露于第三个假期，梅梅事先没打招呼，自作主张邀请了四位修女和六十八个同学来家里度假一周。

“太不幸了！”费尔南达哀叹道，“这孩子和她父亲一样荒唐！”

家里不得不向邻居借床及吊床，让她们分成九组就餐，排定沐浴时刻，并借来四十张凳子好让这些穿着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姑娘安稳片刻。这是一次失败的邀请，因为这些唧唧喳喳的女学生刚刚吃完早饭，不一会儿又得开始排队吃午饭，然后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只来得及去种植园散了一次步。到了晚上，修女们个个精疲力竭，无法动弹也无力再下达命令，而不知疲惫的女学生们仍在院中高唱乏味的校歌。一天，她们险些踩到乌尔苏拉身上，因为她总是坚持要帮忙，结果越帮越忙。另一天，修女们一阵大乱，因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

亚上校在栗树下小便，毫不顾及院中有女学生在场。阿玛兰妲也险些制造出恐慌，当时一位修女走进厨房看见她正往汤里放盐，一时觉得没话可说，便问她那白色粉末是什么。

“砒霜。”阿玛兰妲答道。

到达的当天晚上，女学生们为了在睡前如厕乱成一团，直到凌晨一点还有人没轮到。于是费尔南达买来七十二个便盆，但结果只是把夜里的难题推迟到早上，因为一清早女学生们就在厕所门前排起长队，每人手持自己的便盆等着刷洗。尽管有人发烧，不少人身上因蚊虫叮咬而发炎，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不屈的耐力，能战胜最艰巨的困难，甚至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还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等她们终于离开时，家里鲜花萎地，家具破损，墙壁上满是涂鸦，但费尔南达因她们的离开而备感轻松，也就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她将借来的床和凳子归还，把七十二个便盆收进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那个紧锁的房间，一度指引过家中精神生活的方向，从此以后遂被称为“便盆室”。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来，这才是最合适的名字，因为在家里其他人惊讶于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历经岁月侵蚀仍一尘不染的时候，他就已看出里面垃圾成堆。说到底他本不在乎究竟谁看到的才是真相，他得知那房间的归宿也只是因为整整一下午费尔南达都在摆放便盆，进进出出打扰了他的工作。

那些天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又在家中出现。他穿过长廊，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头钻进作坊与上校交谈起来。尽管眼不能见，乌尔苏拉却听出了他那代表监工身份的皮靴声，惊讶于他与家人之间，包括与他的孪生兄弟之间无法消弭的隔阂，他们童年时曾一起上演奇妙的换名游戏，现在却已不剩任何相似之处。他瘦削，严肃，总带着一副沉思的神态和几分撒拉逊人的忧郁，暮色沉沉的脸上闪烁着凄凉的光亮。他最像他们的母亲，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乌尔苏拉在说起家人的时候常忘掉他，并因此而自责。但当她感觉到他又在家中出现，而且注意到上校是在干活的时候允许他进了作坊，不由再

次检视往日的记忆，从而确认了在童年的某个时刻他一定与孪生兄弟换了身份，应该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叫奥雷里亚诺这个名字。没人了解他的生活细节。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固定住所，在庇拉尔·特尔内拉家里养斗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一般都会在法国女郎的房间里过夜。他胡乱度日，不动感情，毫无志气，仿佛乌尔苏拉星系中的一颗流星。

事实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不属于这个家，也从未属于任何一个，这都要追溯到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军营观看枪决的那个遥远的清晨。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那个死刑犯悲伤而略带嘲弄的笑容。那是他最早也是唯一的童年记忆。另一段记忆，关于一个身穿不合时宜的坎肩、头戴鸦翼状礼帽，在明亮的窗前谈玄说异的老人的记忆，他却不知道该归于哪一时期。那是一段模糊的记忆，毫无教益也不令人怀念，而对死刑犯的记忆则截然不同，不仅实际确定了他一生的走向，而且随着年纪渐长反而愈加清晰，仿佛流逝的时光使他与往事日益接近。乌尔苏拉想托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帮忙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走出幽闭。“劝他去看看电影，”她对他说，“就算他不喜欢看电影，起码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发现他与上校一样对自己的恳求充耳不闻，两人都是铁石心肠，不为情所动。尽管她无从得知，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两人关在作坊里长谈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但她却明白家里只有这两人是因相似而走到一起。

事实上，即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无法将上校从幽闭中拉出来。女学生的侵扰已经耗尽他的耐心。尽管烧毁了蕾梅黛丝可爱的娃娃，他仍以卧室里蛀虫太多为借口，在作坊里支起吊床，除了去院中大小便以外再不离开。乌尔苏拉连跟他随便聊天都做不到。她知道他只顾着打制小金鱼，对盘里的食物看也不看就推到桌角，不在乎汤里油渐凝肉已冷。自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帮助他在晚年发动一场战争，他一天天变得愈加冷酷。他紧紧封闭起自己的内心，家人最后就权当他已不在人世。他再没有表现出任何人性的反应，直到

有一年的十月十一日他出门去看马戏团游行。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来说，那一天与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没什么两样。清晨五点，他被墙外蟾蜍和蟋蟀的齐鸣惊醒。绵绵细雨从星期六开始就没有停歇，他即使不曾听到花园枝叶上的淅沥声，也能从自己骨头中的寒意里察觉到。他与往常一样裹着羊毛毯，穿着粗棉布衬裤。他还沿用旧年间的过时名谓称这裤子为“哥特佬衬裤”，但图舒适一直穿着。他套上紧身裤，但没有系上带子，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在衬衣领口别上金纽扣，因为他准备马上洗澡。随后他把毯子披到头上好像兜帽，用手指捋捋脏污的髭须，就去院中小便。离太阳出来还有好些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在泡了雨水而腐烂的棕榈棚下打盹。上校像往常一样没看见他，也没听见他的鬼魂因热尿溅在靴子上被惊醒时所说的难解的言语。他决定晚些时候洗澡，不是因为寒冷和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里沉闷的雾气。回作坊的路上，他闻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用来点燃炉灶的火捻的气味，便到厨房里等待咖啡煮开，好取走自己不加糖的那一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像每天清晨那样问他那天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星期二、十月十一日。他望着眼前这个被火光映成金色的沉稳女人，这个无论此时还是其他时刻都仿佛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女人，忽然想起战事激烈时的另一个十月十一日，他因确信与他过夜的女人已死而突然惊醒。她的确死了，而他没有忘记那个日期，因为那女人在死前一小时曾问过他那天是星期几。在回忆中，这一次他仍未意识到往日的预感早已弃他而去。咖啡在沸腾，他纯粹出于好奇，不带丝毫怀旧的风险，想着那个他从未知晓姓名，从未见过她生前模样的女人，因为她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摸上他的吊床。然而，有太多女人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他的生活，在他脑海中成为茫然一片，他记不起是否就是她在初会的狂热中几乎淹没在自己的眼泪里，并且在死前不到一小时还信誓旦旦要爱他到死。他不再想她，也不再想其他女人，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进作坊，打开灯来数点存在铁皮罐里的小金鱼。有十七条。自从决定不再出售，他仍然每

天做两条，等凑够二十五条就放到坩埚里熔化重做。他干了一上午活计，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没有察觉到十点的时候雨下大了，有人在作坊前叫喊着关门别让水淹到家里；他甚至忘掉了自我，直到乌尔苏拉端着午饭进来并关了灯。

“这雨下的！”乌尔苏拉说。

“十月嘛。”他回答。

说话的时候，他并未从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金鱼上移开视线，他正往鱼眼里镶嵌红宝石。直到做完小金鱼丢进罐子，他才开始喝汤。然后他不急不慌，慢慢吃下盛在同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炖肉、白米饭和炸香蕉片。他的胃口不受环境好坏的影响。午饭后，他感到一阵闲下来的空虚。出于一种科学的迷信，他在饭后消化的两小时内不干活、不阅读、不洗澡也不做爱。这种信念如此根深蒂固，早在战时他就曾为了避免士兵们消化不良而多次推迟行动。他躺在吊床上，用折叠小刀掏着耳朵，不到几分钟便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一幢空空的房子，墙壁雪白，还因为自己是第一个走进这房子的人而深感不安。在梦中，他记起前一夜以及近年来无数个夜晚自己都做过同样的梦，知道醒来时就会遗忘，因为这个不断重复的梦只能在梦中想起。果然，片刻后当理发师敲响作坊的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醒来，只觉得自己无意中睡了短短几秒钟，还来不及做梦。

“今天不用理了，”他对理发师说，“星期五见。”

他的胡须三天没刮，夹杂着白茸毛，但他觉得没必要刮，反正星期五可以在理发时一并解决。糟糕的小睡后，黏糊的汗水令他腋下疖子的旧疾又隐隐发作了。雨停了，但还没出太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了个响亮的嗝，嘴里泛起汤的酸味，仿佛是身体在下达命令，要他披上毯子去上厕所。他蹲在那里超出了必要的时间，脚下木箱中发酵的臭气直往上腾，最后还是习惯提醒他该回去干活了。在刚才等待的时间里，他又想到今天是星期二，香蕉公司的庄园里发工资的日子，所以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没来作坊。这一记忆和近年来所

有的记忆一样，总会让他不知不觉想起战争。他记得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为他找一匹额间带白斑的马，此后却再没谈起这个话题。随后他又想起其他纷杂的事情，却无意评判，因为既然无法引开思绪，他便学会了冷静地回想过往，不让那些无法删除的记忆勾起自己的情感。在回作坊的路上，他见空气开始变得干爽，觉得是洗澡的好时候，却被阿玛兰妲抢了先，于是便去制作当天的第二条小金鱼。在他嵌鱼尾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射出炽烈的光芒如帆船破浪般吱嘎作响。空气经过三天细雨的洗涤，漫天都是飞蚁。这时他觉得想要小便，但一直拖到把小金鱼做完才去。四点十分，他向院子走去，忽然听见远处铜管奏乐、大鼓轰鸣、孩童欢呼。从年轻时代起，他第一次有意落入怀旧的陷阱，仿佛回到了吉卜赛人到来时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神奇下午。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丢下厨房里的活计，向门口跑去。

“是马戏团。”她喊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没有去栗树下，也走出门外，混在好奇的人群里观看游行。他看见一个女人穿得金光闪闪骑在大象的脖子上。他看见哀伤的单峰驼。他看见打扮成荷兰姑娘的熊用炒勺和菜锅敲出音乐节奏。他看见小丑在游行队尾表演杂耍。最后当队伍全部走过，街上只剩下空荡荡一片，空中满是飞蚁，几个好奇的人还在茫然观望时，他又一次看见了自己那可悲的孤独的脸。于是他向栗树走去，心里想着马戏团。小便的同时，他仍努力想着马戏团，却已经失去记忆。他像只小鸡一样把头缩在双肩里，额头抵上树干便一动不动了。家里人毫无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去后院倒垃圾，忽然发现秃鹫正纷纷从天而降。

十四

梅梅的最后一个假期正赶上家人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守丧。家里大门紧闭，一切聚会取消。他们低声说话，安静进餐，每天三次念诵玫瑰经，连炎热的午休时分古钢琴练习都流露出举哀的悲音。费尔南达曾暗中对上校不满，但正是她严格规定以上守丧礼仪，同时惊讶于政府对死去的敌手大肆追缅。奥雷里亚诺第二照例在女儿休假期间睡在家里。费尔南达想必作出了某些努力来恢复合法妻子的权利，转过年来梅梅就多了一个新生的小妹妹，家人不顾做母亲的意愿，给她起名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梅梅结束了学业。在专为庆祝她结业而举行，同时也代表服丧期结束的聚会上，她以精湛的技艺演奏十七世纪的流行曲目，证明她获得古钢琴琴师的证书是实至名归。比起她的技艺，她的双重性格更令宾客们惊叹。她举止浮泛，甚至有些幼稚，本不适合从事任何严肃的活动，但只要她在古钢琴前就座，立刻变成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少女，那份出人意表的沉稳给人以老成的印象。她一向如此。实际上她没有任何明显的天赋，但她为了不令母亲失望，通过严格的训练获得了最优异的成绩。如果当初强迫她学习的是其他技能，结果也会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厌恶费尔南达的严苛以及为别人作决定的习惯，但仅仅为了不拂逆母亲的苛求，她完全能作出比上古钢琴课程更大的牺牲。在结业仪式上，她以为有了那张印着华丽的哥特体大写字母的羊皮纸，自己就能从责任中解脱出来，而当初她担起这份责任与其说是出于顺从，倒不如说是为了求个清静。她相信即使固执如费尔南达，也不会再为这样一种古旧的乐器费心，毕竟连修女们都将其视作博物馆里的化石。最初几年她以为自己的打算有误，因为在她走遍半个城市的各家客厅，并在马孔多举行的所有慈善晚会、学校会演、爱

国主义纪念活动上展露身手令人昏昏欲睡之后，她母亲仍在向所有看上去能欣赏女儿才华的新来者发出邀请。只有到阿玛兰妲死后，家中再次闭门服丧，梅梅才能锁起古钢琴，把钥匙落在某个衣柜里，连费尔南达也懒得查问遗失于何时又是出于谁的过错。梅梅四处表演时的坚韧不比刻苦学琴时逊色，这是她获得自由的代价。费尔南达对她的顺服极其满意，对她的琴艺引发的赞赏无比自豪，因而从不反对她往家里带来众多女友，在种植园度过午后时光，和奥雷里亚诺第二或可信任的女士去看电影，只要所看的片子是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布道坛上允准的。在那些娱乐时间里梅梅才显露出自己的真正爱好。她的快乐正与自律相悖，她爱的是聚会的喧闹、情爱的八卦，以及和女友长时间关在房里学习抽烟和谈论男人。有一次，她们分喝了三瓶朗姆酒，最后脱光衣服相互测量和比较身体的各个部位。梅梅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她嚼着甘草根走进家门，坐到桌前，费尔南达和阿玛兰妲正吃着晚饭，互不理睬，都没有觉察到她的反常。她在一位女友的卧室里度过了疯狂的两个小时，又笑又怕哭个不停。在这场危机过去后，她获得了不寻常的勇气，想要逃离学校还要坦然告诉母亲不如拿古钢琴当作灌肠器。梅梅坐在桌首，喝着鸡汤，那汤在胃里仿佛令人重生的灵药。她看见费尔南达和阿玛兰妲周身笼罩在无视现实的可笑光晕中，极力克制才压下冲动，没去揭穿她们的做作、心灵的空虚以及自大的幻觉。从第二个假期起，她就知道父亲只是为了面子才住在家里。她对母亲一向了解，后来又设法认识了佩特拉·科特斯，就觉得父亲的选择不无道理。她也更愿意让父亲那个情妇做自己的母亲。梅梅仍带着酒意头脑昏沉，快乐地想象着如果这时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会引发怎样的热闹。她正为这促狭的念头暗暗得意，费尔南达已有所察觉。

“你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梅梅回答，“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多爱你们俩。”

阿玛兰妲听出了这宣告中明显的怨恨，吓了一跳。费尔南达却感动不已，但后来当梅梅在半夜醒来，头痛欲裂，胆汁吐了一身的时候，她险些疯了。她给梅梅服下一小瓶河狸油，往腹部敷上药泥，在额头放上冰袋，还强迫她遵照新来的古怪法国医生的要求，五天内节制饮食并足不出户。那位医生给梅梅检查两个多小时后得出一个含糊的结论，说她患上了某种妇科失调症。梅梅丧失了勇气，彻底陷入消沉，对这一切只有忍受。乌尔苏拉尽管已完全失明，依然活跃而清醒，只有她猜到了真正的病因。“照我看，”她心想，“这和醉鬼的表现没什么两样。”但她不仅摒弃了这念头，还为自己轻率的想法而自责。奥雷里亚诺第二看着梅梅委靡不振不由心中一阵绞痛，下定决心以后要多关心她。父女间愉快的伙伴关系就这样诞生，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摆脱了盛宴中的孤独，也使她摆脱了费尔南达的监护，又不至于激发看起来势不可免的家庭冲突。奥雷里亚诺第二推开一切活动和梅梅在一起，带她去看电影或马戏，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她身上。近年来，他已过度肥胖，甚至无法弯腰系鞋带，再加上过于放纵各种欲望，性格也变得恶劣。女儿使他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和女儿在一起的快乐令他渐渐远离放浪的生活。梅梅正当花季，她算不上美貌，就像阿玛兰妲一样，却单纯可亲，初次见面就能赢得别人的好感。她那现代派的性格与费尔南达陈腐的矜持做派以及遮掩不住的狭隘心胸格格不入，却得到了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喜爱与维护。正是他让女儿搬出从小居住的那间卧室，摆脱了屋里从童年时代起就令她一直恐惧的圣徒像的惊悚眼神。他为她的新房间配备了豪华的卧床、大梳妆台和天鹅绒窗帘，丝毫没有意识到布置成了佩特拉·科特斯卧室的翻版。他对女儿慷慨大方，自己都不知道给了她多少钱，因为他总让她从兜里随意取用。他还给女儿买来香蕉公司商店里的所有美容新品，她的房间里摆满了磨甲的浮石垫、烫发的发夹、洁齿的牙膏、令眼神迷离的眼液，以及其他五光十色的新奇化妆品和美容用具。费尔南达每次走进女儿的房间都大为震惊，感觉她的梳妆台和那些法国女

郎的简直没什么两样。然而那个时期有两件事令费尔南达无暇分心，她在照料多病又任性的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之外，还要忙于与隐身的医生们进行激动人心的通信。因此当她察觉到丈夫与女儿之间的亲密后，只能让奥雷里亚诺第二承诺永远不带梅梅去佩特拉·科特斯家。这一警告其实毫无必要，因为那个女人正为情人和他女儿的亲密无间吃醋，根本不愿与梅梅产生任何瓜葛。一种莫名的恐惧折磨着佩特拉·科特斯，仿佛直觉在告诉自己只要梅梅愿意就可以做到费尔南达做不到的事：夺走那份她自以为至死不渝的爱情。奥雷里亚诺第二第一次遭到情妇的冷落和讥嘲，不禁担心自己搬来运去的衣箱又要回到妻子身边。这种担心并未变成现实。没有谁像佩特拉·科特斯了解自己的情人那样了解一个男人，她明白衣箱会一直留下，因为说起来奥雷里亚诺第二如果有什么厌烦之事，那就是一切变动对生活造成的麻烦。衣箱仍待在原来的地方，佩特拉·科特斯则奋力运用做女儿的无法与之相争的唯一手段来夺回爱人。这同样是毫无必要的努力，因为梅梅根本不愿介入父亲的私事，而即使她愿意，也很可能会站在父亲的情妇这一边。她也没有时间为别人找麻烦。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就像修女们教导的那样。上午她忙着打理自己的衣服，或者在长廊里刺绣，或者用阿玛兰妲那台古老的手摇式缝纫机做活计。到别人午休的时候，她练上两个小时古钢琴，知道每日作出这样一点儿牺牲能使费尔南达心情平静。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继续在教会慈善义卖会和学校晚会上演奏，尽管邀请已日渐减少。到了傍晚，她化妆完毕就穿上简便的衣服和硬挺的高筒靴，不是和父亲出门就是去女友家，直待到晚饭时分。这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多半会带她去看电影。

梅梅的女友中有三个美国姑娘，她们钻出电网鸡笼和马孔多的少女们建立了友谊。其中一个叫帕特里夏·布朗。出于对奥雷里亚诺第二慷慨招待的感谢，布朗先生也为梅梅敞开了自家的大门，邀请她参加星期六的舞会，那是美国佬和本地人共同参与的唯一活动。费尔南

达知道后，暂时撇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隐身的医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你想想，”她对梅梅说，“上校在坟墓里会怎么看呢？”显然，她是在寻求乌尔苏拉的支持。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失明的老妇人认为梅梅参加舞会并和同龄美国姑娘交友没什么不妥，只要她立场坚定不改信新教就好。梅梅很好地领会了高祖母的意思，舞会后第二天都会提早起床去望弥撒。费尔南达依然反对，直到有一天梅梅告诉她美国人想听自己弹奏古钢琴。古钢琴再次从家中运出，送到布朗先生家中，在那里年轻的演奏家赢得了最真诚的掌声和最热烈的祝贺。从此以后，他们邀请她参加舞会、星期天去泳池游泳，还每星期请她吃一次午饭。梅梅学会了游泳且游得相当专业，还学会了打网球和吃弗吉尼亚火腿配菠萝片。从舞会、泳池到网球场，她很快发现英语对她不再是难题。奥雷里亚诺第二因女儿的进步兴奋不已，于是从一个游商手中买下配有许多彩图的六卷本英语百科全书送给她，她就在空闲时阅读。读书取代了以前的情爱八卦、和女友一起进行的密室探险，这倒不是因为有人强迫，而是因为她不再有兴趣讨论已经众所周知的所谓秘密。回想起醉酒的经历，她只当作幼稚的冒险，并兴致盎然地讲给父亲听，结果奥雷里亚诺第二比当事人更觉有趣。他笑得喘不过气来，“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每当她透露一个秘密他都会这样评论。他曾经让女儿答应以同样的信任告诉他初恋的进展，而梅梅也向他倾诉过自己对一个随父母来度假的美国红发男孩的好感。“好家伙，”奥雷里亚诺第二笑道，“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但梅梅又告诉他那男孩已经回国，再也没有消息。她周全的考虑确保了家中的和睦。奥雷里亚诺第二有了更多时间花在佩特拉·科特斯那里，尽管身心都不允许他再像当年那般大宴宾客，但他仍不放过宴饮作乐的机会，再次拿出自己的手风琴，那琴上已经有些按键松动要用鞋带系住。在家里，阿玛兰妲织着那永远织不完的寿衣，乌尔苏拉则任凭自己被衰老引向幽暗深处，那里唯一可见的就是栗树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鬼魂。费尔南达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在每月寄给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信里没再写一句谎言，只是略去了自己和隐身的医生通信一节。他们诊断出她的大肠里有个良性肿瘤，正准备运用通灵术实施治疗。

如果不是阿玛兰妲不合时宜的死亡引发新的动荡，布恩迪亚家衰颓宅院中安静恬和的日子或许能持续很久。这一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虽然衰老又孤僻离群，但看起来依然结实挺拔，一如往常健康得好像磐石。自从那个下午她彻底拒绝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并关在房中痛哭，再没有人能窥见她的内心。她在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已经耗尽所有的眼泪。从此再没见她哭过，不管是在美人儿蕾梅黛丝升天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们遇害的时候，还是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去世的时候。上校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尽管直到他的尸体在栗树下被发现时她才表现出这一点。她去帮忙抬运尸体。她为他穿上军装，刮胡子，梳头发，给髭须上蜡，比他自己在光荣岁月中做得还好。没有人觉察到其中的爱意，因为他们都已见惯阿玛兰妲熟练地处理丧葬事宜。费尔南达惊诧于她对天主教与生活的关系一无所知，只懂得天主教与死亡的关联，仿佛那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套丧葬习俗的手册。阿玛兰妲太过沉浸于自己的回忆，无法理解那些精微的教理。她人老了，心中的往事却依然鲜活。她听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华尔兹舞曲时，想哭的欲望一如年轻时涌上心来，仿佛流逝的时间和往日的教训都没留下痕迹。那些她借口受潮发霉而亲手扔进垃圾桶的乐谱纸带，依然在记忆中转动令琴槌敲击不停。她曾经试图在与侄子奥雷里亚诺·何塞窘迫的激情中将记忆淹没，试图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稳重阳刚的庇护下藏身，但都是枉然，连她老年时最绝望的举措也归于徒劳。还在小何塞·阿尔卡蒂奥被送去神学院之前三年，她为他洗澡时用的爱抚方式就不像是老祖母对待孙儿，更像是女人对待男人，如同传言中法国女郎们所做的那样，也如同十二岁和十四岁的她看见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穿着紧身舞蹈长裤随着节拍器的拍子舞动魔杖时想要对他做的那样。她有时为自己没能阻止这一悲惨

的暗流而痛苦，有时愤怒得甚至用针扎手指，然而最令她痛苦最令她愤怒最令她心酸的却是爱情这棵芳香四溢却暗遭虫蛀的番石榴树正渐渐走向死亡。就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总想起战争一样，她不可避免地想起丽贝卡。她兄长可以看淡记忆，她却只能让它越发灼烫。多年间她对上帝的唯一祈求，就是不要让自己遭受惩罚死在丽贝卡之前。每次路过丽贝卡的家，看着房子日渐破败，她便心满意足地以为上帝垂听了她的祈求。一天下午，她在长廊里缝纫，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确信自己会坐在这里，以同样的姿势并在同一束阳光下听见丽贝卡的死讯传来。她坐下等待，仿佛在等一封信。一段时间里，她拆下扣子又缝上，让等待变得不那么漫长难耐。家里没人注意到阿玛兰妲在为丽贝卡缝制一件精美的寿衣。后来，当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说看见丽贝卡形如鬼魂，皮肤遍布裂纹，头顶黄发稀疏，阿玛兰妲丝毫不觉惊奇，因为他描述的鬼魂和她很久以来想象的一模一样。她已作好决定要为丽贝卡的尸身装殓整容，用石蜡掩盖脸上的裂纹，再用圣徒像的头发为她做一顶假发。她将装扮出一具美丽的尸体，让它身着亚麻寿衣，并为棺材套上带紫色花边的丝绒衬面，还要举行最体面的仪式下葬到蛆虫的所在。她满怀怨恨地制定了计划，但心中一个念头令她战惊：纵然出于爱意，她也无法做得比这更好。但她没受困惑搅扰，继续完善各种细节，最后超越了丧葬专家的水准，不啻精通死亡仪轨的大师。在这可怖的计划中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她尽管曾向上帝祈求，仍有可能死在丽贝卡之前。事实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而在最后的时刻，阿玛兰妲毫无受挫感，相反感到摆脱一切苦痛获得了自由，因为死神格外开恩，提前几年预先给出了通知。那是在梅梅上学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她正在长廊里缝纫时看见了死神。她当下认了出来，没有丝毫恐惧，因为她面前是一位穿蓝衫的长发女人，外表有些老气，与昔日帮忙下厨的庇拉尔·特尔内拉有几分相似。费尔南达很多次也在场，却没有看见她，尽管她是那样真实，那样有血有肉，好几回还请阿玛兰妲帮忙穿针。死神并未说到她何时

会死，也没告知她是否会死在丽贝卡之前，只是让她从四月六日起开始为自己缝制寿衣。死神应许她尽可以做得精美复杂，但要像为丽贝卡缝制时一样认真，还说她会死在完工的当天傍晚，死时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也没有烦恼。为了尽可能拖延时间，阿玛兰妲订购了优等麻纱，亲手织布。她织得极其仔细，光做这项活计就耗费了四年时间。然后她开始绣花。随着完工日期不可避免地临近，她意识到除非发生奇迹，才能将活计拖到丽贝卡死后，但干活时的专注令她得以保持必要的镇静来接受失败。也就在那时，她理解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制成小金鱼随即又销毁的举动。世界不过是身外之物，她的内心不再为任何苦痛而波动。她深深遗憾没能在多年前获得这样的领悟，那时还来得及净化记忆，在崭新的光芒下重建世界，平静地唤回傍晚时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身上的薰衣草味道，并且将丽贝卡救出悲惨的境地，而这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深切理解。那天晚上梅梅言语中的怨恨令她惊讶，并非因为她在情感上受到触动，而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经历在另一个少女身上重演，她表面看来纯洁无瑕，实际上却已遭到怨恨的玷污。但那时她已完全接受命运，明知纠正的一切可能都不复存在，也并不觉得失落。做完寿衣成了她的唯一目标。她非但没像当初那样借助不必要的精工细作来拖延时间，反而加快了进度。一个星期前，她估计将在二月四日晚间缝上最后一针，便向梅梅提议将预定在次日举行的古钢琴音乐会提前。她没有说明原因，结果建议没被采纳。于是，阿玛兰妲开始设法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后来她甚至觉得死神也在助她一臂之力，因为二月四日晚上风雨大作破坏了发电厂。但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她还是在任何女人都不曾完成过的精美作品上添上了最后一针，并以最平常的口气宣告自己将死于当晚。她不仅告诉了家人，还通知了整个市镇，因为她相信可以通过最后一次造福世人的举动来补救自己卑微的一生，而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给逝者带信更好。

正午之前，阿玛兰妲·布恩迪亚将在傍晚起程捎带冥信的消息就在马孔多传开，到下午三点客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箱信件。不愿写信的人托阿玛兰妲带个口信，她就在小本子上一一记下收信人的姓名和去世日期。“放心，”她安慰委托人，“我一到那边就去打听他的下落，把口信带给他。”一切仿佛一场闹剧。阿玛兰妲没显出丝毫慌乱，也没露出任何痛苦的迹象，甚至因为履行了义务而显得更加年轻。她身形挺拔修长一如平常。如果不是颧骨凸出和牙齿略有缺残，她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亲自吩咐将信件放进涂了柏油的箱子，并指定安放在坟墓中的位置，以尽量做到防潮。上午她请来一位木匠，站在客厅里让他量尺寸做棺材，就像是要做一件礼服。她在最后几小时迸发出无穷活力，费尔南达认为她是在拿所有人寻开心。乌尔苏拉知道布恩迪亚家的人都是无疾而终，并不怀疑阿玛兰妲的死亡预感，但仍害怕昏了头的寄信人希望信件早些送达而将她活着下葬。于是她拼命在家中清场，喊叫着与侵入者争吵，到下午四点时终于达到目的。这时，阿玛兰妲刚刚将自己的物品分发给穷人，只留下死后要穿的一套换洗内衣和一双普通的灯芯绒便鞋放在简陋的粗木棺材板上。她没有忽略这个细节，因为她还记得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死的时候只剩下在作坊里穿的拖鞋，自己不得不给他买一双新鞋。快五点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来接梅梅去参加音乐会，惊讶地发现家里正在筹备丧事。那时看上去生机勃勃的活人就只有阿玛兰妲，她甚至还好整以暇地修了鸡眼。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梅梅开玩笑似的与她告别，还约好下个星期六举办复活宴席。听说阿玛兰妲·布恩迪亚将给死人带信，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五点钟赶来准备施行临终仪式，但等了一刻多钟才看到濒死的女士从浴室出来。一见她穿着马达普兰白细布睡衣、披散着头发出现，老迈的神甫便认定这是一个玩笑，随即遣走了祭童。但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阿玛兰妲作出一次延宕了二十年的忏悔。阿玛兰妲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她不需要任何宗教仪式的帮助，因为她的良心是清白的。费尔南达大惊失

色，她不顾别人会听见，高声自问阿玛兰妲究竟犯下了怎样可怕的罪行，以至于宁可亵渎神明而死也不愿丢脸地忏悔。于是阿玛兰妲躺下，逼迫乌尔苏拉当众检查自己的贞洁。

“谁也不用乱猜，”她喊道，好让费尔南达听见，“阿玛兰妲·布恩迪亚怎样来到这世上就怎样离开。”

她没再站起来。她靠在厚垫子上仿佛真的病了，编起长辫子在耳边盘好，根据死神的教导她应该这样躺进棺材。然后，她向乌尔苏拉要来一面镜子，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自己饱经岁月摧残与苦痛煎熬的面容，惊讶于所见竟然与想象中的形象分毫不差。乌尔苏拉从房间里的寂静知道天色已暗了下来。

“跟费尔南达告别吧，”她恳求道，“一分钟的和好抵得过一辈子的友谊。”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阿玛兰妲回答。

当临时搭起的舞台上灯光亮起，演出的第二部分开始时，梅梅不禁想到了她。曲子弹奏到一半时，有人到她耳边告知了消息，演出当即中止。奥雷里亚诺第二赶到家中的时候，不得不推开人群挤进去，看到了那位老处女的尸体。她面容丑陋惨淡，手缠黑纱，身穿精美的寿衣。棺材安置在客厅里，旁边是一箱信件。

为阿玛兰妲守灵九天后，乌尔苏拉再没有起床。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负责照顾她。她每天往卧室里送饭和用来洗漱的胭脂果水，将马孔多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奥雷里亚诺第二时常来探望，给她送来衣服。她把衣服和日常必需品一起放在床边，很快就建起一个触手可及的小天地。她还赢得了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亲近，教这个与她酷似的孩子认字。她神志清醒，生活能够自理，给人的印象只是历经百年沧桑而自然衰老。虽然她明显视物困难，却没有人怀疑她已彻底失明。她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和平和的心境来关注家人的一举一动，也是她首先发觉了梅梅的隐忧。

“过来，”她对梅梅说，“现在只有我们俩，告诉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到底出了什么事。”

梅梅挤出几声笑，避开了谈话。乌尔苏拉没有勉强，此后见梅梅不再来看她便确认了心里的猜测。她知道梅梅比平日里更早开始打扮，等待出门时一刻不能安宁，整夜在隔壁卧室辗转反侧，看见一只蝴蝶蹁跹就痛苦难耐。有一次梅梅说要去找奥雷里亚诺第二，但奥雷里亚诺第二不久就来家里找女儿，乌尔苏拉惊诧于此时的费尔南达竟如此缺乏联想毫不生疑。梅梅那诡异的举动、迫切的约会、压抑的渴望都再明显不过，而费尔南达却要到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才发现她在剧院里和一个男人接吻，回到家里掀起轩然大波。

那时梅梅太过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还责怪乌尔苏拉出卖了她。实际上是她出卖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她处处留下蛛丝马迹，连最迟钝的人也会察觉，而费尔南达那么晚才发现是因为她自己正沉迷于与隐身医生的秘密交往中。尽管如此，她最后还是注意到了女儿的缄默寡言、莫名惊恐、情绪无常和行为乖张。她开始不动声色地严密监视。她任凭女儿和平日的女友出门，帮她为星期六的聚会打扮，从未提出任何可能引起她戒心的问题。她已掌握证据能充分证明梅梅言行不一，但从不流露自己的怀疑，以等待决定性的机会。一天晚上，梅梅对她说要和父亲去看电影。没过多久，费尔南达就听见宴会的鞭炮声和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手风琴声从佩特拉·科特斯家的方向传来。于是，她穿好衣服，赶到剧院，在坐椅上的背影中认出了自己的女儿。由于猜测得到证实，她一时激动没能看清与梅梅接吻的男人，但她还是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嘘声与大笑声中听出了他颤抖的声音。“对不起，亲爱的。”她听见他这么说，一言不发就将梅梅拉出剧院，为了羞辱她还特意经过人声鼎沸的土耳其人大街回家，随后将她锁在卧室里。

第二天下午六点，费尔南达听出了那个登门拜访者的声音。他年轻，脸色青黄，若是她以前见过吉卜赛人便不会为他那双悲伤的深色

眼睛而吃惊，若是其他任何心肠不这样冷酷的女人见了他那梦幻般的神情都会理解女儿的心思。他身穿旧亚麻衣裳，鞋上奋力涂过层层锌白，手里拿着上星期六新买的窄边草帽。在一生中，他此前没有过而此后也不会有现在这般恐惧，但他的自尊和稳重使他不显卑屈，只是因干活而变得粗糙的双手和开裂的指甲有损他不凡的风度。然而费尔南达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他是个工匠。她还知道他身上穿的是唯一一套周末正装，衬衫下面的皮肤上生着从香蕉公司染上的疖子。她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她甚至没让他进屋，片刻后就不得不将门关闭，因为家里已经到处飞舞着黄蝴蝶。

“请走开，”她对他说，“我们正派人家里没有您要找的人。”

他叫马乌里肖·巴比伦。他在马孔多出生成长，是香蕉公司汽修厂里的学徒。梅梅是偶然与他结识的。一天下午，她和帕特里夏·布朗想找一辆汽车到种植园里兜风，当时司机病了，他便被派来开车。梅梅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副驾驶位置，可以近距离观察驾驶操作。和那位正式司机不同，马乌里肖·巴比伦为她作了操作示范。那还是梅梅刚开始来布朗先生家串门的时候，女士开车在马孔多仍被视为有失体统，因此她得到些理论知识便心满意足，此后几个月都没再见到马乌里肖·巴比伦。后来她想起兜风时，除了那双粗糙的手，他的男性美也曾引起自己的注意，但事后她又曾向帕特里夏抱怨过他那不无高傲的自信令人厌烦。她第一次和父亲星期六去看电影的时候，又见到了马乌里肖·巴比伦，他穿着亚麻正装，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她发觉他不看电影却总是回头看她，其实那也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梅梅很厌恶这种粗俗的把戏。最后，马乌里肖·巴比伦过来和奥雷里亚诺第二打招呼，这时梅梅才知道他曾在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简陋的发电厂工作过，因而在她父亲面前也像对待上级一样恭敬。这一幕减轻了她对他高傲的反感。他们没有单独见过面，除了打招呼没有谈过一句话，但那天夜里她却梦见他在一场海难中救了自己，而她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还大为光火。这看起来像是自己给了他一

个他所渴求的机会，而那却是她不希望发生的，不仅对马乌里肖·巴比伦，对所有属意于她的男人都是如此。故此她在梦醒后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不但没有对他产生厌恶，反而感到一种无法压抑的冲动想要见他。一个星期以来，这冲动日益强烈，到星期六更达到顶点，她得极力控制才能在打招呼时不让他看出自己的一颗心快要跳出来。她在愉悦与愤怒交杂的感觉中昏了头，第一次伸出手去，而直到此刻马乌里肖·巴比伦才握上她的手。梅梅在刹那间又为自己的冲动而悔恨，可发现他的手也同样冰凉汗湿，心中的悔恨旋即化作残酷的满足感。当天晚上，她明白如果不让马乌里肖·巴比伦意识到他只是痴心妄想，自己就不会有片刻安宁，于是整个星期都在为此奔忙。她耍尽一切花招想让帕特里夏·布朗陪自己去要车，却没能成功。最后，她利用了那个正在马孔多度假的美国红发男孩，借口想见识新型号汽车让他带自己来到厂里。在看见马乌里肖·巴比伦的那一刻，梅梅便无法再欺骗自己，明白事实上是自己无法抵抗与他单独见面的欲望。她也确信对方一见自己来到便明白了这一点，不由又是一阵气恼。

“我来看看新型号汽车。”她说。

“这是很好的借口。”他回答。

梅梅意识到自己正被他傲慢的光芒灼伤，拼命想打压他的气焰。但他没给她留时间。“不用怕，”他低声对她说，“女人爱上男人，这不是头一回。”她感觉如此无助，连新型号汽车也没看就离开了。她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愤怒得哭泣。她最初的确对那个美国红发男孩有兴趣，但他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就在那时，她发觉在马乌里肖·巴比伦出现之前总会见到那些黄蝴蝶。她以前见过，特别是在汽修厂里，当时还以为它们是迷上了油漆的气味。有一次在昏暗的剧院里，她也感觉到蝴蝶在头顶盘旋。直到马乌里肖·巴比伦开始追求她，混在人群里像个只有她才能认出的幽灵，她才明白黄蝴蝶与他有关。在音乐会的听众中，在剧院的观众中，在大弥撒的人群中，都时时有马乌里肖·巴比伦的身影，她无须见到就能发现，因为

蝴蝶已经指明他在场。有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被蝴蝶令人窒息的扑腾搅得不胜其烦，她险些忍不住像当初答应的那样向他透露秘密，但直觉告诉她这一次他不会像往常那般笑起来：“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一天早上，费尔南达正在给玫瑰修枝，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一把拽过梅梅，因为她刚才正站在美人儿蕾梅黛丝升天的地方。那一瞬间，她感到神迹将再次发生在女儿身上，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振翅声让她慌了神。那是蝴蝶在盘旋。梅梅看见它们仿佛从光芒中凭空出现，心里顿时一惊。这时马乌里肖·巴比伦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说是帕特里夏·布朗送的礼物。梅梅按捺下羞赧，掩饰起不安，甚至努力装出自然的微笑，请他把东西放在扶栏上，因为自己的手上满是泥污。几个月后费尔南达把这个男人赶出门去时完全不记得这次见面，而此时她也仅仅注意到他那患了胆病般的黄暗肤色。

“这男人很奇怪，”费尔南达说，“一副快要死的样子。”

梅梅以为是蝴蝶令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修剪完玫瑰，她洗了手把包裹拿进卧室打开。那是一套中国玩具，由五个盒子层层相套，最里面的那个装有一张卡片，上面的字迹写得很吃力，仿佛出自不大会写字的人之手：我们星期六剧院见。 盒子那么长时间一直放在扶栏上，费尔南达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打开，梅梅此时一阵后怕，同时也为马乌里肖·巴比伦的大胆机智而欢喜，并惊讶于他认定自己必然赴约的天真信念。梅梅已经知道奥雷里亚诺第二星期六晚上有约会，但渴望的烈焰炙烤了她一个星期，到星期六她终于说服父亲把她一个人留在剧院，等电影散场再来接她。灯光还亮着的时候，就有一只夜间活动的蝴蝶在她头顶盘旋。时候到了。灯光熄灭，马乌里肖·巴比伦坐到了她身边。梅梅感觉自己在惶然不安的沼泽中挣扎，而且就像她梦到的那样，只有那个身上带着机油味、黑暗中几乎看不见的男人才能拯救她。

“你要是不来，”他说，“以后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梅梅感到他的手重重压在自己的膝盖上，明白那一刻两人都已抵达孤独的彼岸。

“我就不喜欢你这一点，”她微笑着说，“你总是说最不该说的话。”

她疯狂地爱上了他。她辗转难眠，茶饭不思，深深沉浸在孤独里，连自己的父亲都成了障碍。她利用约会的借口编织出错综复杂的迷网令费尔南达无从捉摸，她不再去看女友，打破常规在任意时间和地点与马乌里肖·巴比伦见面。开始的时候她不喜欢他的粗鲁。他们在汽修厂后面荒凉的草地上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他毫不怜惜地带着她进入野兽般的状态，令她精疲力竭。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也是柔情的表现，便失去了平静，再也离不开他，一心渴望沉醉在他那混杂着去污剂和机油气味的迷人气息中。阿玛兰妲死前不久，梅梅在疯狂中突然显出一线清醒，开始为未卜的前途恐慌。这时她听说有个女人会用纸牌算命，便暗中登门拜访。那是庇拉尔·特尔内拉。一见梅梅进门，她就猜出了她的心思。“坐吧，”她说，“不用纸牌我也能猜出布恩迪亚家人的未来。”梅梅那时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年过百岁的算命老妪是自己的曾祖母。即使她知道也不会相信，尤其老人还毫不掩饰地告诉她热恋中的焦灼只能在床上平息。马乌里肖·巴比伦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梅梅不肯相信，她在内心深处怀疑那只不过是匠人的错误想法。她当时认为爱情的一种方式能够击败另一种方式，这与胃口得到满足就不觉饥饿是同样的道理。庇拉尔·特尔内拉不仅纠正了她的错误，还将那张铺着麻布的旧床慷慨出借，她在那上面孕育了梅梅的祖父阿尔卡蒂奥，后来又怀上了奥雷里亚诺·何塞。她还教她如何用芥末泥蒸气来避孕，并传授她药水配方，好在意外发生时消除麻烦，甚至摆脱“良心的挣扎”。这次会面令梅梅获得了与那天下午醉酒后同样的勇气。然而，阿玛兰妲的死迫使她推迟了行动。在守灵的九天里，她片刻不曾离开混在家中吊唁人群里的马乌里肖·巴比伦。后来是漫长的服丧和必不可免的闭门幽居，他们分开

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她内心受尽煎熬，焦急不安，难忍冲动，因此在能够脱身出门的第一个下午便径直来到庇拉尔·特尔内拉家里。她献身给马乌里肖·巴比伦，不抗拒、不扭捏也不羞赧，显出优异的天赋和过人的敏锐，若换一个比她的情人更多疑的男人或许要怀疑她熟稔此道。三个多月中他们每星期幽会两次，蒙在鼓里的奥雷里亚诺第二还一直提供庇护，天真地为女儿的借口作保，只为帮她摆脱她母亲的严厉管束。

费尔南达在剧院抓到两人的当天晚上，奥雷里亚诺第二无法忍受良心的重负，便去费尔南达把梅梅关禁闭的卧室找她，相信她会对自己倾诉一切隐情。但梅梅断然拒绝。她那样自信，那样紧守着自己的孤独，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两人之间的一切关联都不复存在，父女情谊和默契已成往昔的幻梦。他想和马乌里肖·巴比伦谈谈，认为凭着旧主人的权威能够让他打消念头，但又被佩特拉·科特斯说服那是女人的事，一时犹豫不定，并对禁闭结束女儿的苦难几乎不抱希望。

梅梅没有显出丝毫痛苦的迹象。恰恰相反，乌尔苏拉察觉到她在隔壁卧室入睡安稳，起居正常，饮食按时，消化良好。唯一令乌尔苏拉不解的是，近两个月的惩罚期间梅梅不像其他家人一样在早上洗澡，而是改在晚上七点。有一次她曾想提醒梅梅小心蝎子，但考虑到梅梅坚信是自己告密而避之不及，她也就不愿去打扰，免得被当成唆烦人的高祖母。每到傍晚，黄蝴蝶便飞进家来。每天晚上从浴室出来，梅梅都能见到费尔南达用杀虫剂拼命扑杀蝴蝶。“这太糟糕了，”她说，“别人一直告诉我夜里的蝴蝶会带来厄运。”一天晚上，梅梅还在洗澡，费尔南达偶然走进她的卧室，屋内群集盘旋的蝴蝶几乎让她无法呼吸。她随手抓起一块布来驱赶，而当她将女儿晚间洗澡的习惯与洒满一地的芥末泥联系起来，一颗心立时恐惧得冻结了。她没像第一次那样再去等候合适的机会，第二天便邀请同她一样来自内地的新任市长共进午餐，请求他在后院安排一个守夜人，因为她感觉有人不时潜入家中偷鸡。那天晚上，守夜人将马乌里肖·巴比

伦一枪放倒，当时他正揭开屋瓦准备钻进浴室，而梅梅则赤身裸体正为爱情而浑身颤抖，在蝎子与蝴蝶的环绕中等他，就像近几个月来几乎夜夜所做的那样。一颗嵌在脊柱里的子弹令马乌里肖·巴比伦从此卧床不起。他在孤独中老死，没有一句抱怨、一声抗议，也没有一丝吐露真相的企图；他忍受着往事的折磨，忍受着不容他安生片刻的黄蝴蝶，一直被当成偷鸡贼遭人唾弃。

十五

梅梅·布恩迪亚的儿子被送到家中时，行将给马孔多带来致命打击的各种事件已经渐露端倪。当时局势很不明朗，人们无心关注私人丑闻，费尔南达借着这有利的环境将孩子藏匿起来，只当他从未存在。她不得不收留他，因为他被送来时的情形不容她拒绝。她不得不在余生中违心地忍受他，因为真要下手时她又缺乏勇气将他溺死在浴室的水池里。她把孩子关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旧日的作坊里，并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相信这孩子是她在一个漂来的篮子里捡到的。乌尔苏拉到死也不会知道孩子的真实来历。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次去作坊时撞见费尔南达给孩子喂食，也相信了篮中漂来这一说法。奥雷里亚诺第二因妻子以荒唐的方式处理梅梅的悲剧而彻底与她疏远，直到孩子被送来三年后他才知道外孙的存在，这还是因为费尔南达一时不慎让孩子从禁闭中跑了出来，在长廊里停留了片刻。他浑身赤裸，头发蓬松，惊人的生殖器好像火鸡垂肉，不似人类的后代倒像地道的野人。

费尔南达不曾料到自己无可更改的宿命中会出现这样的变数。她本以为已经彻底消除的耻辱，随着那孩子又回到了家中。当初被子弹击断脊柱的马乌里肖·巴比伦刚被抬走，费尔南达就已制定出全盘计划来洗濯耻辱。她没和丈夫商量，第二天收拾好行装，往小行李箱里放进女儿的三套换洗衣服，在火车抵达半小时前来卧室找她。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她没作任何解释。梅梅没指望也无心听她解释。她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哪怕是被送到屠宰场也不在乎。自从听见后院的枪声和马乌里肖·巴比伦同时发出的痛号，她再没说过一句话，至死不曾开口。母亲命她离开房间时，她没梳头也没洗脸。她像个梦游者般登上火车，

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黄蝴蝶仍然陪伴着她。费尔南达从未知道，也不曾费心去探究，女儿岩石般的沉默究竟是出于意志还是因为惨遭打击后丧失了言语能力。梅梅对穿越昔日着魔之地的旅行几乎毫无意识。她不曾看见铁路两侧遮天蔽日的香蕉种植园。她不曾看见美国佬的白房子，因尘土和酷热变得荒芜的花园，身穿短裤和蓝条衬衫在门厅里玩牌的女人。她不曾看见尘雾飞扬的路上满载着香蕉的牛车。她不曾看见如同鲱鱼般跃入清澈河水的少女，她们高耸的酥胸令火车上的乘客饱受折磨。她不曾看见工人居住的杂乱破烂的棚屋，马乌里肖·巴比伦的黄蝴蝶在那里盘旋，脸色青绿、瘦骨嶙峋的孩子坐在门口的便盆上，怀孕的女人们朝开过的火车高喊着污言秽语。这些飞速闪过的情景，当初在离校回家的路上曾令她兴奋不已，如今却无法在她心里激起一丝涟漪。种植园热烘烘的湿气消失了，火车穿过开满罂粟花，还矗立着西班牙大帆船烧焦的龙骨的原野，迎上与将近一个世纪前同样清凉的空气，驶向泡沫泛涌的肮脏大海边，驶向当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想破灭的地方，而梅梅却不曾往窗外看过一眼。

下午五点，当她们到达大泽区的终点站，费尔南达要她下车她便下了车。她们坐上一辆好像大蝙蝠似的小车，由一匹喘着粗气的马拉着，穿过凄凉的城市。在遭硝石侵蚀开裂的无尽长街上空回响着钢琴练习曲的旋律，与费尔南达少女时代在午休时段听到的一模一样。她们登上一艘内河航船，船上的木头螺旋桨发出可怕的响声，锈迹斑斑的铁板活像火炉口一般映出红光。梅梅把自己关在舱室里。费尔南达每天两次在床边给她留下一份食物，又每天两次原封不动地拿走。梅梅倒不是决意要绝食而死，她只是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恶心，甚至连喝清水都会反胃。那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芥末泥蒸气没能生效，费尔南达更是要到近一年后孩子被送来时才知晓。在令人窒息的舱室里，在铁皮舱壁的摇晃和桨轮搅起的淤泥臭气中，梅梅昏昏沉沉，不辨日期。很长时间后，她看见最后一只黄蝴蝶在风扇扇叶间撞得粉碎，便认定是马乌里肖·巴比伦已死的明证。然而她没有放弃。她继

续想念他，这期间她们骑在骡背上艰辛地跨越了幻象丛生的荒原，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寻找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曾经在此迷路，又沿着印第安人的道路翻过山脉进入那个阴风惨惨的城市，那里的石板路上回响着三十二座教堂的丧钟齐鸣。那天晚上，她们在被遗弃的殖民风格的深宅中过夜。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间里，费尔南达把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又拽下残存的窗帘裹在身上御寒，那窗帘在她们稍一翻身时便化为了碎片。梅梅知道了身在何处，因为她在失眠的惊恐中看见了一位黑衣绅士，正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前夕被装进铅棺送到家里的那位。第二天望过弥撒，费尔南达带她走进一座阴暗的建筑，她立刻认出了是母亲常常提及接受女王培训的修道院，便明白旅程已到终点。费尔南达去一旁的房间里与人交谈，留下她在星罗棋布地挂满殖民地时期历代主教油画肖像的大厅里。她冷得直抖，因为仍穿着印有黑色细花的单纱衣和经过荒原时冻得变了形的高帮皮鞋。她站在大厅中央想念着马乌里肖·巴比伦，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来的黄色光线洒在她身上。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位十分美丽的见习修女，手里提着装有她那三套换洗衣服的小行李箱。她走到梅梅身边伸出手，并没有停下脚步。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梅梅握住她的手，跟了上去。那是费尔南达最后一次看见她，她正努力跟上修女的脚步，最后消失在修道院的铁栅后面。她仍在想念马乌里肖·巴比伦，想念他身上的机油味和身边的蝴蝶。她每一天都在想念他，直到多年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克拉科夫一家阴森的医院里衰老而死，那时的她已改名换姓，终生一言未发。

费尔南达乘坐一列由武装警察保护的火车回到马孔多。一路上她注意到了旅客们的紧张，沿线村镇驻军的戒备状态，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不祥气氛，但她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事，直到抵达马孔多，听说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在鼓动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这下全齐了，”费尔南达心想，“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者。”罢工

在两个星期后爆发，但并未造成事先所担心的严重后果。工人希望星期天可以不用去采收和运送香蕉，这一要求听起来合情合理，连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都认为正符合上帝的准则，因此出面支持。这次行动以及此后几个月中其他行动的成功，使默默无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名声大噪，而以前人们还常说他唯一干成的事情就是让法国妓女挤满了整个市镇。他以当年拍卖斗鸡去发展荒唐的航运事业的那种冲动，辞去香蕉公司的监工职务，加入到工人一边。没过多久，他就被指控为企图扰乱公共秩序的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在流言四起的那个星期，一天夜里他参加秘密会议后遭到陌生人袭击，却在四发手枪子弹下奇迹般逃脱。接下来的几个月，连隅居在自己黑暗角落里的乌尔苏拉都觉察到了外界的紧张气氛，感觉回到了儿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怀揣顺势疗法药丸暗中策划起义的那个危险年代。她曾试图以前车之鉴劝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告诉她在那个暗杀之夜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兄弟的消息。

“和奥雷里亚诺一个样，”乌尔苏拉感叹道，“世界好像在原地转圈。”

费尔南达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安之若素。丈夫因她未经自己同意就决定了梅梅的命运而与她大吵一通，从那以后她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奥雷里亚诺第二曾想去搭救女儿，必要的话甚至会报警，但费尔南达给他出示了文件，上面写明女儿进修道院是出于自愿。实际上，梅梅签字时已经置身于铁栅的另一边，仍像被人领入时一样浑不在意。在内心里，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相信那些证据的合法性，就像他不相信马乌里肖·巴比伦进院子是为了偷鸡，但这两个说法安抚了他的良心，使他没有歉疚地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护庇下，继续摆宴欢闹、大吃大喝。费尔南达对市镇上的动荡漠不关心，对乌尔苏拉的预言充耳不闻，实施了自己的最后一步计划。她给将要成为初阶神职人员的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说他姐姐雷纳塔因患黄热病已安息在天主的怀抱里。后来，她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交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照顾，专心与隐身的医生通信。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几经推迟的通灵手术定下最终日期。然而隐身的医生答复说鉴于马孔多的局势不稳定，暂时不宜做手术。她急不可耐同时又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居然在另一封信里向他们解释不存在什么时局不稳，一切都是自己小叔子胡闹的结果，说他最近心血来潮搞什么工会，就像以前开河通航时一样疯狂。到了炎热的星期三，他们还没达成共识，这时有人敲响家门，是一位老修女挎着一个篮子。为她开门的时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以为是一件礼物，想接过那个用绣花台巾盖着的篮子。但修女没让她拿过去，声称自己受命要严守秘密，亲手交与堂娜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德·布恩迪亚本人。那是梅梅的儿子。费尔南达以前的灵修导师在信中告诉她孩子出生于两个月前，由于他母亲不愿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只好用他外祖父的名字奥雷里亚诺为他命名施洗。费尔南达对命运的这一嘲弄愤怒不已，但在修女面前仍不动声色。

“我们就说是从漂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她微笑道。

“没人会相信。”修女说。

“既然大家都相信《圣经》，”费尔南达反驳道，“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话。”

修女留下吃午饭，等待返程的火车。她谨守严训没有再提婴儿一个字，但费尔南达仍然将她视为自家耻辱的一个知情者，暗自惋惜中世纪绞死通报噩耗的使者的习俗没能流传至今。就在那时，她决定等修女一走就在水池里溺死婴儿，但良心阻止了她，她只好选择耐心地等待，等着上帝以无限慈悲来帮自己摆脱这个累赘。

新来的奥雷里亚诺满一岁时，市镇上的紧张局势毫无预兆地被激化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其他一直隐藏于地下的工会领导人在一个周末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香蕉种植区的各村镇发动游行。警察只是出来维持秩序。但到星期一晚上，领导人被逐个拖出家来，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关进省监狱。这其中有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洛伦

索·加比兰，后者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上校，流亡到了马孔多，他常说自己曾亲眼见证战友阿尔特米奥·克鲁斯[1]的英雄事迹。不到三个月他们就获释了，因为政府与香蕉公司没能就哪一方应当负担囚犯在狱中的伙食达成协议。这一次工人的不满在于居住区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服务纯属欺骗，工作条件太过恶劣。另外他们还提出，公司从未支付现钞，总以代用券顶替，而那只能用来在公司的货栈购买弗吉尼亚火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入狱，是因为他揭露了公司利用代用券制度来降低果品的海运成本。假如不为公司货栈供货，那些从新奥尔良回到装载香蕉的港口的船只能白白空驶。其他的指责尽人皆知。公司的医生从不为患者作检查，仅仅让他们在医疗站前排成一队，由一位护士依序在舌头上放置一颗胆矾色小药丸，不管他们患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这种千篇一律的疗法引得许多孩子一次又一次排队，领来药丸却并不吞下，都带回家去在玩彩票游戏时作筹码。公司的工人挤在简陋的宿舍里。工程师们没有设计厕所，只是在圣诞节时去营地给每五十人提供一间移动厕所，并当众示范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一度簇拥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边的那些黑衣律师如今已经老迈，改为香蕉公司效力，他们以魔法般的手段将那些控诉变为无效。工人们拟出一份联合请愿书，但过了很久也未能正式通报到香蕉公司那里。一听说请愿的消息，布朗先生就把自己玻璃车顶的车厢挂上火车，与公司里最知名的代表们一起从马孔多消失。然而，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一些工人在妓院里捉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让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名。当时他正赤身露体，和自愿引他入彀的女人待在一起。阴郁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那人与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为防止他人质疑，他们还把那人当作骗子关进监狱。晚些时候，布朗先生微服出行时在三等车厢里被捉获，他们让他签了另一份请愿书副本。次日出庭时，来到法官们面前的是一个皮肤染成黑色、满口流利西班牙语的人。律师们证明这人不是杰克·布朗，生于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的香蕉公司总管，而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药草贩子，生于马

孔多并在本地以达格贝尔多·丰塞卡的名字受洗。不久，面对工人们新的努力，律师们在多处公开展示布朗先生的死亡证明书，该文件经领事和外长们认证，证明当事人已于六月九日在芝加哥被救火车轧死。工人们厌倦了这些荒诞的诡辩，越过马孔多当局，直接上诉于最高法院。在那里操纵法律的魔术师们证明所有的指控都毫无效力，因为香蕉公司没有，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一直以来都是招募临时工。由此，关于弗吉尼亚火腿、神奇药丸和移动厕所的谎言彻底破灭，法庭作出最终判决，颁布公告严正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工人。

大罢工爆发了。耕作在田间停滞，香蕉在枝头腐烂，一百二十节车厢的火车纷纷瘫痪在支线上。悠闲的工人挤满各村镇。土耳其人大街迎来漫长的喧嚣周末，雅各酒店的台球厅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分场开放。军队宣布受命重建公共秩序的那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待在台球厅里。尽管没有未卜先知的才能，他仍觉得这一消息不啻一个死亡宣告，自从那个遥远的清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观看行刑以来他等待已久。不祥之兆并未扰乱他的镇静。他照旧打球，连击也没有失误。不一会儿，鼓声大作，号角长鸣，人潮喧嚷，他便知道不论这一局台球，还是从那个观看行刑的清晨起他与自己玩的孤单沉默的一局游戏都已告终。于是他向街上张望，就看见了军队。三个团的士兵踏着苦役犯划桨的鼓点行进，大地在他们脚下震颤。他们仿佛多头巨龙一般，在正午的阳光中呼出臭气。他们矮小，结实，粗鲁。他们像马一样流汗，发出太阳暴晒下的兽皮气味，带着内地人寡言的漠然和难以捉摸的神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几个小队来回转圈，因为所有人都很相似，仿佛一个母亲生出的儿子，并且都同样呆滞地承受着背囊和水壶的重负、上了刺刀的步枪带来的耻辱、盲目服从与荣誉感之间的矛盾。乌尔苏拉在自己床榻上的黑暗中也听到军队经过，交叠两指[②]举起手来。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一瞬间显出形迹，趴在刚熨好的绣花桌布上，想着儿子何塞

·阿尔卡蒂奥第二，而他正不动声色地看着最后一队士兵从雅各酒店门前走过。

根据军事管制法，军队负有处理争端的职责，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争取和解。刚在马孔多露面，士兵们就放下步枪，采摘香蕉，装上火车起运。迄今为止一直安于等待的工人们没有其他武器，便带上干活用的砍刀钻进山林，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烧毁种植园和货栈，破坏铁轨阻止用机枪开路的火车通过，剪断电报电话线。水渠被鲜血染红。依然健在的布朗先生，连同家人及其他同胞被送出电网鸡笼，抵达军队保护下的安全区。眼看一场血腥恶战一触即发，当局发出通告，呼吁工人们到马孔多集合。通告中宣布，省军政主席将于下星期五前来调解争端。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混在从星期五一早就向车站集中的人群里。他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层的会议，与加比兰上校一起被指派混进人群，见机行事引导群众。当发觉军队在小广场周围布下多处机枪掩体，电网内的香蕉公司所在地也被炮兵保护起来，他便感觉不妙，口中涌上一阵苦涩。快十二点的时候，等待的火车仍未到达，包括工人、妇女和孩子在内的三千多人挤满了站前的空地，又挤进一旁已被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的街道。那场面不像是欢迎会，更像是欢闹的集市。土耳其人大街的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小店都移了过来，人们在烈日下等待却仍心情愉快。将近三点时有传言说专列要等明天才到，疲倦的人群发出沮丧的叹息。这时，一位中尉登上车站屋顶，站在四个瞄准人群的机枪掩体之间，要求人群肃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身旁是一个十分肥胖的赤足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她并不认识他，自己抱起小的那个孩子，请他抱起另一个好让他听清下面要说些什么。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年以后，尽管无人相信，这个孩子还会传讲，他曾亲眼看到中尉拿着喊话筒宣读省军政主席四号令。政令由卡洛斯·科尔特斯·巴

尔加斯将军及其书记官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查少校签发，全文共三条八十字，宣布罢工者实为“一伙不法分子”，授命军队予以枪决。

政令念完后，一位上尉在震耳欲聋的嘘声和抗议声中接替了站在屋顶上的中尉，拿起喊话筒示意有话要说。人群恢复了平静。

“女士们，先生们，”上尉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些许疲倦，“各位有五分钟的时间撤离。”

嘘声和高声喊叫淹没了计时开始的军号声。没有人挪动。

“五分钟过去了，”上尉声调不变，“再有一分钟就开枪了。”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流着冷汗，把孩子放下来交给他母亲。“这些浑蛋真会开枪的。”她喃喃道。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来不及说话，因为他随即听到加比兰上校用沙哑的嗓音叫喊着重复那女人的话。现场紧张的形势、奇异的沉寂令他心醉神迷，并且确信任何事都无法赶走这些沉浸在死亡诱惑中的人。他踮起脚尖，越过前方人群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抬高了音量。

“浑蛋！”他高喊道，“这一分钟你们自己留着吧。”

他喊叫后发生的事情并未令他产生恐惧，而是恍如幻觉。上尉下令开火，十四处机枪掩体立时响应。但一切宛似一场闹剧，仿佛机枪正在喷射的只是骗人的烟火，因为能听见急迫的枪声嗒嗒，能看见白炽的烈焰喷吐，却感受不到任何轻微的反应，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一声叹息。密集的人群仿佛瞬间石化，刀枪不入。突然，在车站一侧，一声垂死的呼号打破了着魔般的状态：“啊啊，妈妈呀。”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一种火山爆发的气流，一阵大难临头的咆哮，在人群中以无比凶猛的势头猝然爆发。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几乎来不及抱起孩子，而他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已经被四下奔逃的惊惶人群所吞没。

多年以后，尽管仍被邻居们当作胡言乱语，那孩子还会传讲，自己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举过头顶随他奔走，几乎腾空，飘荡在人

潮的恐惧之上，冲向附近的街道。他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到失控的人群冲到街角，一排机枪开始扫射。许多个声音同时叫喊：

“趴到地上！趴到地上！”

第一拨人已经这样做了，被弹雨横扫在地。幸存者们没有趴到地上，反而试图冲回广场，却在恐慌中仿佛被巨龙摆尾一击而退，密集的人潮撞上反向而来的另一波密集人潮，后者已被对面街上的龙尾击溃，那里的机枪也在一刻不停地开火。人们走投无路，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渐渐向中心缩拢，因为机枪子弹仿佛不知餍足又条理分明的剪刀，正像剥洋葱似的将周边有条不紊地逐一剪除。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臂呈十字平伸，跪在一片神奇地未遭践踏的空地上。满脸鲜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倒地的一刻将他推到那里，随后蜂拥而至的人潮淹没了空地，淹没了跪着的女人，淹没了旱季高远天空中的光线，淹没了乌尔苏拉·伊瓜兰曾售出无数糖果小动物的这个该死的世界。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面躺在黑暗中。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列长得望不见头的沉寂火车上，头发因凝固的鲜血而硬结，全身骨头都在疼痛。他感到困意难忍。他准备抛开恐惧大睡一场，便换成侧身姿势以减轻痛楚，这时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身上。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没有一处空地方。大屠杀应该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因为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把尸体排好码齐。为了逃出梦魇，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匍匐着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当火车驶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借着板条间映进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他只认出一个在广场上卖饮料的女人和加比兰上校，上校手里还握着卷成一团、带莫雷利亚银搭扣的皮带，曾试图用来在恐慌中开路。到达第一节车厢后，他跃入黑暗之中，卧在水沟里直到火车过去。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

将近两百节运货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夹着一个。火车悄无声息地在夜间滑行，车上没有任何光亮，连定位的红绿灯光也没有。车厢顶上依稀可见一挺挺机枪旁士兵的黑影。

午夜过后突降暴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却知道只要与火车反向而行就能回到马孔多。三个多小时后，他已浑身湿透，头痛欲裂，在拂晓的晨光里远远看见了第一排房舍。他循着咖啡的香气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正向火炉弯下腰去。

“您好，”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布恩迪亚。”

他逐字说出全名，向她证明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做很明智，因为那女人乍见他那副憔悴、阴郁、头上衣间都沾满血迹的模样出现在门口，还以为是鬼魂显现。她认得他。她给他拿来一条毯子御寒，好等着脱下来的衣服在火上烘干，为他烧水清洗伤口—好在只是皮肤上的一道划伤—又给他一片干净的尿布把头包住。然后，她按照传言中布恩迪亚家人的习惯煮了杯不加糖的咖啡给他，把衣服在火边摊开。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喝完咖啡才开口说话。

“应该有三千人的样子。”他喃喃道。

“什么？”

“死人。”他解释道，“所有在车站的人都死了。”

那女人用同情的眼神打量着他。“这儿没有死人。”她说，“从你伯父，也就是上校那时候起，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到家前一路逗留过的三家厨房里都听到同样的回答：“没有死人。”他走过车站广场，看见油炸食品摊子的桌子已被码起，那里也没留下任何屠杀的痕迹。雨下个不停，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大门紧闭，看不出里面有丝毫生命的迹象。直到第一声弥撒钟声响起，才有了一丝人间气象。他敲开了加比兰上校家的门。一个他以前见过多次的孕妇，当面把门紧紧关闭。“他走了，”她惊恐地说道，

“回他的老家了。”电网鸡笼的正门和往常一样，由两名地方警察守卫，他们身着雨衣，头戴橡胶头盔，在雨中仿佛石像。在偏僻的小巷里，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齐声唱着安息日的赞美诗。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翻过院墙，从厨房进了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几乎没有提高声音。“别让费尔南达看见你，”她说，“她刚起床。”仿佛在完成一项早已领会的使命，她把他引到“便盆室”，收拾出梅尔基亚德斯快要散架的行军床，还在下午两点趁费尔南达午睡的时候从窗子递进一盘食物。

奥雷里亚诺第二被暴雨拦住只好睡在家里，下午三点还在等待天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暗中告诉了他，他便在这时去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同样无法相信大屠杀的发生，更不相信满载尸体的火车驶向大海的梦魇。前一天晚上，他已读过政府特别通告，通告称工人们已经听从命令撤离车站，平静地各自回家了。通告还称工会领导人本着高度的爱国精神，已将要求减为两条：改善医疗服务和在居住区设置厕所。晚些时候传来消息，称军队首脑与工人达成协议后，立即与布朗先生沟通，布朗先生不仅接受了新条件，而且主动提议出资举行三天的公众娱乐活动来庆祝争端的解决。只是当军方问及何时可以宣布签署协议，他望了望窗外闪电纵横的天空，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估计要等到天晴。”他说，“只要雨还在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取消。”

此前三个月没有下过雨，正值旱季。但在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后，整个香蕉种植区暴雨大作，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回马孔多的路上正赶上这场暴雨。一个星期后雨仍未停。政府利用所掌控的一切传播渠道在全国千百遍反复宣传，官方说法最终成为定论：没有死人，心满意足的工人们已回到家中，香蕉公司在降雨期间取消一切活动。军事管制法继续施行，以备在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处理持续降雨造成的社会危害，但军队已撤回军营。白天，士兵们高高挽起裤腿，

在街上的激流中和孩子们玩溺水者游戏。晚上宵禁之后，他们用枪托砸开房门，把嫌疑人从床上拖出来，送他们踏上没有归途的旅程。根据四号令对不法分子、杀人犯、纵火犯和反叛分子实施的搜捕及剿灭仍在继续，但军方面对挤满司令部办公室的受害者亲属的询问，却一概矢口否认。“您一定是在做梦，”军官们坚持道，“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座幸福的小城。”就这样，工会领导人被消灭殆尽。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是唯一的幸存者。二月的一天晚上，响起枪托砸门特有的声音。仍在等待雨停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门，看见一位军官带着六名士兵。他们浑身淋得湿透，一言不发，从厅堂到谷仓逐一搜查，不放过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衣柜。乌尔苏拉被屋里亮起的灯光惊醒，但在搜查的过程中没吭一声，只是将手指交叠，指向士兵们活动的位置。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急忙去通知睡在梅尔基亚德斯房间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走。于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又把门锁上。他在屋里穿上衬衣和鞋子，坐在行军床上等待他们到来。那时他们正在搜查金银器作坊。军官命人打开门锁，借着提灯的光亮扫视一周，看到了工作台和玻璃柜，柜中的酸液瓶罐和各式器具都按当初主人留下的原样放着。他看出来没有人住在这房间里，却仍狡诈地向奥雷里亚诺第二询问他是不是金银匠。奥雷里亚诺第二向他解释这作坊属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啊哈。”军官恍然大悟，打开灯下令仔细搜查，连收在瓶子后面铁皮罐里的十八条未被熔化的小金鱼也被找了出来。军官将小金鱼摆在工作台上一条一条检查了一遍，神色和缓下来，忽然间变得有人情味了。“我想要一条，如果您允许的话。”他说，“过去是叛乱的信物，现在可成了文物。”他很年轻，几乎还未成年，但丝毫不显腼腆，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只是直到此时才流露出来。奥雷里亚诺第二送了他一条小金鱼，军官收在衬衣口袋里，眼中闪烁着孩子般的光彩，又把余下的倒进罐里放回原处。

“这是无价的纪念品，”他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可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物。”

然而，他的人情味并不妨碍他严格履行职责。在重新锁好的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口，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这间屋子一百年没有住人了。”她说。军官仍下令开门，拎起提灯扫视一圈。光线照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脸上的瞬间，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了他那双阿拉伯人似的眼睛，心下便明白这是一段焦虑的结束，又是另一段焦虑的开始，而只有彻底放弃才能安心。军官仍拎着提灯四下检视，直到发现堆放在衣柜里的那七十二个便盆才表现出兴趣。他打开了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坐在行军床边，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从未显得如此庄严深沉。房间深处的隔板上放着书页散落的书籍和羊皮卷，整洁的工作台一尘不染，墨水瓶中的墨水仍未干涸。空气纯净明澈，一切不染尘埃，清新如故，与奥雷里亚诺第二童年记忆中的景象丝毫不差，只有当初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觉不到。但军官只对便盆感兴趣。

“这家住了几口人？”他问道。

“五口。”

军官显然无法理解。他的视线停留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地方，但连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意识到他对自己视而不见。随后他熄了灯，关上门。听着他对士兵们说的话，奥雷里亚诺第二明白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当年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象。

“这间屋子确实至少有一百年没住人了，”军官对士兵们说，“说不定都有蛇。”

门一关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就确信自己的战争已经结束。数年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曾对他讲起战争的魅力，并试图用个人经历中的无数实例来证明。他信以为真。但就在军人们对他视

而不见的这个晚上，他回想起过去几个月的紧张局势，狱中的苦难，车站里的恐慌，以及满载死尸的火车，得出一个结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过是个伪君子或懦夫。他不理解上校何必用那么多言辞来解释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受，其实用一个词便足够：恐惧。相反，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被神奇的光线、落雨的声音、隐身的感觉所保护，他找到了此前生命中一刻不曾有过的安宁，余下的唯一恐惧就是自己有可能会被活埋。他告诉了每天前来送饭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她答应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让他先死后葬。摆脱了所有恐惧，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得以专心钻研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愈难索解兴致愈高。他习惯了雨声，两个月之后那已经无异于另一种静谧，唯一打扰他独处的就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进进出出。因此他恳求她把饭留在窗台上，再次关门上锁。家人已将他遗忘，包括费尔南达，她得悉军人们对他视而不见，便不觉得留他在那里有什么不妥。六个月的幽闭过去，军队已撤离马孔多，奥雷里亚诺第二想找人聊天打发等待雨停的时间，便打开门锁。门一开，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气味散发自屋里满地的便盆，每一个都已用过多次。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须发蓬乱形容难辨，对令人作呕的气味恍若不知，仍在反复研读天书般的羊皮卷。他身上闪耀着天使般的光芒。门开的时候，他只是微微抬了下头，但就在那一瞥中，他的兄弟分明看到了曾祖父那种无可挽回的宿命在重演。

“有三千多人，”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能确定车站里所有的人都死了。”

---

①洛伦索·加比兰（Lorenzo Gavilán）与阿尔特米奥·克鲁斯（Artemio Cruz）皆为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的人物。

②此处指将中指半搭在食指上，借以消灾避祸，类似“触木祛灾”的迷信。

十六

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间或有细雨绵绵的日子，一开始人人都还身着盛装，带着久病初愈的神情预备庆祝天晴，但很快便习惯了将这些间歇当作滂沱重现的前奏。暴雨倾盆破空而降，飓风自北方而来，掀瓴破瓦，推墙倒垣，将种植园里的残株连根拔起。就像乌尔苏拉在这些日子里常会想起的失眠症蔓延时一样，灾难本身能激发人们找出对抗烦闷的方法。奥雷里亚诺第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不甘心向无所事事的日子屈服。布朗先生引发暴雨的当晚，他碰巧为一件小事回到家里，费尔南达从柜中找出一把快要散架的雨伞给他。“用不着，”他说，“我等雨停了再走。”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无法更改的承诺，但他却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衣服都放在佩特拉·科特斯家里，因此他每三天脱下身上的脏衣服，只穿着衬裤等候衣服洗净。为了不觉无聊，他投入到家里各处的修缮活计中。他把合页调好，给锁孔上油，拧紧门环，校正插销。一连几个月，只见他带着工具箱四处奔忙，那箱子恐怕还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时代吉卜赛人落下的。没人知道是无意的锻炼、越冬的烦闷，抑或是被迫的节欲，令他的肚子像皮袋泄气似的渐渐瘪了下去，快活的乌龟脸不再那么赤红，颏下的垂肉也不再那么鼓突，最后整个人都不再那么臃肿，又能够自己系鞋带了。看着他装门锁，修钟表，费尔南达不禁暗自担心他会不会也染上了且造且毁、且毁且造的恶习，就如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做小金鱼、阿玛兰妲缝扣子做寿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读羊皮卷、乌尔苏拉追忆往事那样。然而实情并非如此。问题就出在搅乱一切的连绵大雨上，如果三天不上一次油连最干燥的机械也会从齿轮间绽放出花朵，而锦缎中的金银线长了锈，潮湿的衣服上则生出橙红色的水藻。环境如此湿润，仿佛鱼儿可以从门窗游进游出，在各个

房间的空气中畅泳。一天早上乌尔苏拉醒来，觉得自己陷入一种恬静的恍惚中，叫人哪怕用担架也要将自己送到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那里。就在此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发现她后背上密密麻麻全是水蛭。赶在乌尔苏拉的鲜血被吸干之前，她用未熄的木炭烫灼把水蛭一条条揭下来。家里不得不开沟排水，清除蟾蜍和蜗牛，这样才能晾干地面，撤去垫在床脚的砖块，重新穿鞋走路。奥雷里亚诺第二忙着应付各样需要处理的琐事，直到一天下午坐在摇椅上望着早至的暮色，想起佩特拉·科特斯却毫不动情，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衰老。他大可顺势重拾费尔南达乏味的爱情，步入盛年的她仍美貌不减，但雨水已经令他远离一切情欲的冲动，代之以清心寡欲的平和。他兴致盎然地想象，换了以前在这样将近一年的雨天里自己能做出什么事来。他第一个将锌板引进马孔多，远在香蕉公司将其引为时尚之先，不过他单单是为了给佩特拉·科特斯的卧室盖屋顶，享受雨声淅沥带来的私密感。但即使是这些年轻时的荒唐回忆也没能触发他的激情，仿佛最后一场欢宴已经耗尽他所有的欲望，只为他留下一项奇妙的奖励，即可以纵情回忆过往而不带半点儿苦涩与悔恨。或许有人会想，是暴雨给了他安静沉思的机会，是钳子加油壶的忙碌活计唤醒了他迟来的感怀，让他想到一生有许多有益的事情可做却从未实行。但这两者都不正确，因为他安于家室的渴望既不是反复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痛改前非的产物，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往昔，那时他还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读着飞毯和巨鲸吞食水手与航船的神奇故事，到如今这愿望又因暴雨连绵而重新浮现。在这段日子里，由于费尔南达偶一疏忽，小奥雷里亚诺跑到了走廊上，被外祖父发现了身世的秘密。他给孩子理发，穿好衣服，让他不再怕人。这孩子凸出的颧骨、惊奇的眼神和孤僻的神态，很快显出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这对费尔南达而言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一段时间以来，她已经在克制自己的傲慢，却不知该如何补救，因为她越是思索解决的办法，越发觉得不可行。若早知道奥雷里亚诺第二会这样处理问题，这样乐于做外

祖父，她本不必绕那么多圈子拖那么长时间，在一年前就能摆脱煎熬。对已经开始换牙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来说，小外甥就像是一件难以掌控的玩具，成为无聊雨天里的消遣。奥雷里亚诺第二想起了那套丢在梅梅以前的卧室里再也没人动过的英语百科全书，他开始把书上的插图，特别是动物插图翻给孩子们看，然后是地图、异国风景和知名人物的照片。由于不懂英语，只能勉强认出那些最出名的城市和最常见的人物，他就编造出人名和传说来满足孩子们无穷的好奇心。

费尔南达真的相信丈夫在等待天晴回到情妇那里。下雨的最初几个月，她担心丈夫会溜进自己的卧室，那样她只得不顾羞赧地坦诚，自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出生以后她就失去了过夫妻生活的能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急切地与隐身的医生通信，但总因频频发生的邮政事故而中断。最初几个月，常有消息说火车在暴风雨中出轨，隐身的医生也来信告知没有收到她的信件。晚些时候，她与从未谋面的医生失去联系后，已然在认真考虑戴上丈夫参加血腥狂欢节时用过的老虎面具，化名去找香蕉公司的医生作检查。但那时常有人带来有关暴雨的不幸消息，其中一个告诉她公司已经撤走医疗站，搬到了没下雨的地区。因此她的指望化为泡影。她只能一边期待雨天过去邮路恢复，一边自行设法缓解身上的暗疾，因为她宁死也不愿落在马孔多所剩唯一的医生，那个以驴草为食的古怪的法国人手里。她去找乌尔苏拉，相信她会知道某种可以缓解自己不适的方子。但她出于拐弯抹角的说话习惯，从不直接叫出事物的名称，不惜前后颠倒以减轻羞耻感，将分娩说成排出，将血漏唤作胃热，结果乌尔苏拉合乎情理地得出结论，认为她的病与子宫无关而属于肠胃问题，建议空腹服用甘汞。对于其他不这样过分正经的人来说，这病症其实并非难言之隐。如果不是身染暗疾，不是遗失信件，费尔南达才不会在乎下雨，因为她的一生中本就阴雨不停。她不曾改变作息时间，也不曾稍减繁文缛节。当桌子四脚还立在砖块上，椅子下还垫着木板以免吃饭时弄湿双脚，她依然不忘铺上亚麻桌布，摆设中国瓷器，吃晚饭时点亮烛台，

因为她认为灾难不能成为不守规矩的借口。家里没有人再向街上张望。要是依着费尔南达，她一定会永远禁止这种行为，而且远在雨天开始前她就有此想法，因为在她看来门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关闭，对街上动静的好奇则只属于青楼女子。然而，当听说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送葬队伍正经过时，她自己首先向外张望，结果透过半掩的窗户所见的景象令她痛苦不已，很长时间都为自己的软弱而悔恨。

她想不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送葬队伍。棺材由一辆牛车拉着，车上用香蕉叶搭了个遮篷，但在雨水暴烈击打下，地面一片泥泞中，车轮每走一步都不住下陷，遮篷也摇摇欲坠。一道道凄凉的水柱倾泻在棺材上，浸透了覆在上面的旗帜。那是一面染着鲜血和硝烟污痕的战旗，被最有骨气的老兵们所唾弃。棺材上还摆着一把饰有丝穗铜缨的军刀，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当年寸铁不带地进入阿玛兰妲的缝纫间之前，总是把它挂在客厅的衣架上。牛车后面是尼兰迪亚协定签订后硕果仅存的老兵，全把裤腿挽起半截，有几人还赤着脚，他们都在泥泞中扑腾着，一只手拄着白坚木手杖，另一只手拿着被雨淋得退色的纸花圈。他们仿佛幻象出现在仍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上，所有人在经过时都不忘向那幢房子望上一望。到广场的街角拐弯时，他们不得不请人帮忙拉出深陷的车轮。乌尔苏拉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把自己搀到门口。她关注着送葬的每一个细节，没人怀疑她都能看到，尤其当她像报讯天使般高举手臂随着牛车的摇摆而晃动的时候。

“永别了，赫里内勒多，我的孩子，”她喊道，“替我向我的家人问好，告诉他们雨停了我们就能见面。”

奥雷里亚诺第二扶她回到床上，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问她那句告别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她说，“我等雨停了就死。”

街上的情形令奥雷里亚诺第二警醒起来。他终于开始为牲畜的命运担忧，便披上一块油布，赶去佩特拉·科特斯家里。他看见她站在

院中齐腰深的水里，正设法使一匹死马漂起来。奥雷里亚诺第二捡起一根木棒上前帮忙，肿胀的庞大尸骸翻了个身遂被奔涌的泥流卷走。自下雨以来，佩特拉·科特斯所做的就是将牲畜尸体清出院子。最初几个星期，她托人带信给奥雷里亚诺第二，请他赶紧应对，而他回复说不用着急，情况没那么糟，等雨停再作计较。她托人告诉他牧场正被水淹，畜群在逃往没有食物的高地，那里等待它们的只有美洲虎和瘟疫。“没什么办法，”奥雷里亚诺第二回答，“反正雨停了还会再下崽。”佩特拉·科特斯看着牲口接二连三地死掉，甚至顾不上将陷在泥潭里的牲口宰杀。她眼睁睁看着暴雨无情地毁掉这份当初在马孔多人眼中最稳固、最雄厚的家业，剩下的只有冲天臭气。当奥雷里亚诺第二决心来探看情况时，他眼前就只剩那匹死马，以及马厩的瓦砾间一头瘦骨嶙峋的母骡。佩特拉·科特斯见他来了，没有惊奇、没有喜悦也没有怨恨，仅仅露出一丝嘲弄的笑容。

“来得真是时候！”她说。

她老了，瘦得皮包骨，那双活像食肉动物的尖锐眸子由于整日看雨已变得悲凉而温顺。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那里待了三个多月，倒不是因为他感觉比家里更好，而是因为他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下决心再次披上油布出门。“不着急，”他说，就像在另一个家里所说的一样，“再待几个小时等天晴吧。”第一个星期，他逐步适应了时光和雨天在情妇身上留下的痕迹，眼中的她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他便回想起两人的纵情享乐，回想起两人的欢好激发牲畜疯狂繁殖的景象。到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夜里，半是出于爱意半是出于兴致，他用急迫的爱抚将佩特拉·科特斯唤醒，但她没有回应。“老实睡吧，”她嘟囔道，“现在已经不是干那些事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天花板上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佩特拉·科特斯的脊柱仿佛枯萎的神经穿起的一串线轴，于是明白她说得不错，不过那与什么时候无关，而是他们自己已不再适合干那些事。

奥雷里亚诺第二带着自己的衣箱回到家里，心中确信不仅是乌尔苏拉，马孔多所有的居民都在等待雨停后死去。一路上，他看见他们坐在厅堂里，眼神迷茫，抱手胸前，感受着浑然一体、未经分割的时光在流逝。既然除了看雨再无事可做，那么将时光分为年月、将日子分为钟点都终归是徒劳。孩子们嬉闹着迎接奥雷里亚诺第二，他又为他们拉起呼呼作喘的手风琴。但比起手风琴演奏，还是百科全书更受欢迎，因此他们又回到梅梅的房间，奥雷里亚诺第二又发挥想象，将飞艇说成在云朵中寻找卧床的飞象。有一回，他发现了一名骑手的插图，那人身上的异国服饰也掩不住熟悉的气息。仔细观察之后，他得出结论：那是一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肖像。他拿去给费尔南达看，她也看出了相似之处，认为那骑手不仅与上校一个人，甚至与家中所有成员都很相像，尽管那其实是一名鞑靼武士。时间就这样在罗德岛巨像和弄蛇人之间流逝，直到妻子提醒他，谷仓里只剩下六公斤咸肉和一袋米。

“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样？”他问。

“我不知道，”费尔南达回答，“这是男人的事。”

“好吧，”奥雷里亚诺第二说，“等雨停了总会有办法。”

他对百科全书的兴趣多过家庭用度，尽管午饭时只有一小块肉和少许米饭将就。“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他常说，“雨总不会下一辈子。”随着谷仓存粮日渐匮乏，费尔南达的怨气也日益增长，偶尔的牢骚、少见的怨言终于爆发为势不可当的洪涛，在一个早上以仿佛吉他叠句的单调起始，一天里音调渐渐升高，音色越发丰富，韵律益显激越。奥雷里亚诺第二起初并未留心这反复的唠叨，直到次日早饭后才察觉那比雨声更流畅高昂的嗡鸣声，吵得他头昏脑涨。费尔南达在整个家中游走，痛诉满腹的哀怨，说自己原是照着女王的模子受的培养，结果却沦落成一个疯人院的女佣，有个游手好闲、崇拜偶像、放荡不羁、整天仰面躺着等天上掉面包的丈夫，而她却要累折了腰靠几个小钱维持这个用大头针撑起的家，从上帝开启新的一天到她晚上眼

睛疼得像进了玻璃碴才上床睡觉，总有那么多事要做，总有那么多事要忍耐要纠正，却从没有人说一句“早上好，费尔南达”或“晚上睡得怎么样，费尔南达”，也从没有人哪怕是出于礼貌问一声她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或为什么早上起来眼圈发紫，当然她也从未期待这些话能够从这家人的口中说出来，归根结底他们都一直把她当作障碍，当作端锅用的抹布，当作画在墙上的丑八怪，总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叫她假圣女，叫她法利赛人，叫她刁女人，而阿玛兰妲，愿她安息，甚至公然说她是那种分不清直肠和斋戒日的女人，上帝啊，这叫什么话，而她还顺从圣父的旨意忍受了这一切，可她实在忍受不了那可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说什么家道衰落就是因为娶进了一个内地女人，听听，一个好发号施令的内地女人，上帝啊，一个恶毒的内地女人，跟政府派来屠杀工人的内地佬是一路货色，你说说，他指的不是别人就是她嘛，阿尔瓦公爵的教女，出身于连总统夫人都艳羡不已的名门望族、有着高贵血统的她有权在签名中列出十一个源自半岛的古老姓氏，是这个私生子横行的市镇里唯一能自如运用十六件套餐具的人，而她那通奸的丈夫却狂笑着嘲讽，说那么多刀叉、那么多汤匙，比起基督徒来百足虫用着更适合，只有她闭着眼睛都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一侧、用哪种酒杯上白葡萄酒，以及什么时候、从哪一侧、用哪种酒杯上红葡萄酒，不像粗俗的阿玛兰妲，愿她安息，竟然以为白天就喝白葡萄酒，晚上就喝红葡萄酒，整个沿海地区只有她有资格夸口自己是只在金溺盆里方便的人，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愿他安息，竟然以他共济会会员的恶毒，放肆地质问她从哪儿来的这种特权，莫非她拉的不是粪便而是香草，你想想，这是什么话，而雷纳塔，她的亲生女儿，也趁她不备到卧室去看她的大便，出去说溺盆的确是金的也的确刻着家族纹章，但里面盛的是纯粹的粪便，实实在在的粪便，甚至比别人的更糟，因为那是内地女人的粪便，你想想，那还是她的亲生女儿，因此她从未对家里其他人抱有幻想，但无论如何她有权期盼从丈夫那里得到些许尊重，不管怎样他是她经过婚姻圣礼

结下的伴侣，她的主宰，她的合法郎君，他出于自由而崇高的意愿担起重任将她领出父家，她在那里本来一无所缺，无忧无虑，编织花圈只为消遣，因为她的教父曾专门寄来一封用戒指盖印火漆封缄的信件，特意叮嘱教女的双手除弹奏古钢琴以外不可从事任何尘世俗务，然而她疯狂的丈夫领她出门时对一切劝诫和嘱托都满口应承，却将她带到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的低洼地狱，没等她结束圣灵降临节斋戒就径自拿着他的流动衣箱和浪荡子的手风琴去跟那个灾星女人姘居，只要看看她的胯，哦，是的，只要看看她小母马似的扭胯模样，就能猜出那是一个……一个和她截然不同的女人，无论在宫殿还是猪圈，在桌上还是床上，她都是堂堂的名媛，天生的贵妇，她敬畏上帝，遵从上帝的律法，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和她在一起当然不能像和那个女人一样玩那些放荡的花样，那女人当然来者不拒，就像那些法国女郎，甚至更糟，想想看，那些女郎起码还会诚实地在门前亮起红灯，这些下流行径，难以想象竟然要扯上堂娜雷纳塔·阿尔戈特与堂费尔南多·德尔·卡皮奥的独生爱女，特别是她父亲，毫无疑问，一位圣洁的男子，伟大的基督徒，圣墓骑士团的骑士，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死后肉身不朽的恩典，皮肤柔滑似新娘的锦缎，眼眸生动清亮如翡翠。

“这可不是真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打断了她的话，“他被送来的时候都臭了。”

耐着性子听了一整天，终于让他抓到一处错误。费尔南达未加理睬，但声音却低了下去。当天晚饭时分，气急败坏的唠叨声压过了窗外的雨声。奥雷里亚诺第二低着头，吃得很少，早早回了卧室。第二天早饭时，费尔南达浑身颤抖，一副没有睡好的样子，似乎完全被自己的怨气击垮了。然而，当丈夫问起能不能吃一个水煮溏心蛋，她没有直接回答上星期鸡蛋就已经吃完，而是炮制出一通恶毒的言语，抨击男人整日只知道观赏自己的肚脐，还觊颜要求饭桌上有云雀肝。奥雷里亚诺第二像往常一样带孩子们去读百科全书，费尔南达则装作要收拾梅梅的卧室，其实只为了让他听见自己的嘟囔。当然了，一个人

脸皮要足够厚，才能欺骗天真的孩子们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肖像收在百科全书里。午后，孩子们正在午睡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坐在长廊里，费尔南达也追到那里，刺激他，折磨他，没完没了地围着他嗡嗡叫，说家里能吃的只剩下石头，而她的丈夫还理所当然地在那里稳坐，俨然一位波斯苏丹在看雨，因为他就是一个懒汉，一个吃闲饭的，一个废物，比粉扑棉还要松垮几分，习惯了靠女人养活，自以为娶的是约拿的妻子，当她听了鲸鱼的故事就会心满意足[①]。奥雷里亚诺第二不动声色地连听了两个多小时，仿佛耳聋似的。他一直没有打断她，但那聒噪的轰响令他头痛不已，到黄昏时再也无法忍受。

“拜托你别说了。”他恳求道。

费尔南达反而抬高了嗓门。“我为什么不说，”她说，“谁不愿意听谁就走。”这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按捺不住了。他缓缓站起身，仿佛只想舒舒筋骨，然后开始有条有理地发泄怒火，抓起一盆盆秋海棠、欧洲蕨、牛至砸在地上摔碎。费尔南达吓呆了，实际上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唠叨所蕴含的可怕力量，但事到如今怎样努力弥补都已太迟。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他打破玻璃柜，不慌不忙地一件接一件取出里面的器皿摔在地板上砸个粉碎。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就像当初用钞票贴满房子时那样从容，将波希米亚水晶器具、手绘花瓶、玫瑰花舟少女图、金框镜子，总之从客厅到谷仓一切可以打碎的东西，都掷在墙上打碎，最后以一声巨响在院子中央摔碎厨房里的大瓮告终。随后他将手洗净，披上油布出了门，直到午夜前才回来，带着几串硬邦邦的咸肉、几袋生了虫的大米和玉米，以及几把干瘪的香蕉。从那以后，家里再没缺过食物。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小奥雷里亚诺后来追忆起下大雨的日子，都会觉得那是一段美好时光。尽管有费尔南达的严厉管束，他们仍常常在院中的泥坑里玩水，捉住蜥蜴解剖，趁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备往汤里撒蝴蝶翅膀上的粉末玩下毒游戏。乌尔苏拉是他们最喜爱

的玩具。他们把她当作一个陈旧的玩偶在角落里拖来拖去，给她披上花布条，往她脸上涂满油烟和胭脂。有一次，他们险些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就像用修枝剪对蟾蜍所做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她的呓语更能令孩子们快活。实际上，在雨下到第三年的时候，她的头脑中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她从那时起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意识，把当下错认为久远的往昔，有一次甚至为了她曾祖母佩德罗妮拉·伊瓜兰的去世接连痛哭三天，而那老人下葬都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她沉浸在极其荒唐的混乱状态中，甚至以为小奥雷里亚诺是上校，是被领去见识冰块时的小儿子，还把正在神学院学习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当作跟着吉卜赛人出走的长子。她一次次说起家人，于是孩子们便学会了为她安排想象中的造访，只是这些访客不仅早就不在人世，而且还是不同时代的人。她坐在床上，发间满是灰尘，脸上蒙着一块红手帕，在虚拟亲友的环绕中十分幸福。孩子们把客人描述得活灵活现，仿佛他们真的相识似的。乌尔苏拉与祖先谈论自己出生前的往事，为他们带来的消息高兴，并一道为那些比他们更晚离世的逝者难过。孩子们不久就发现，乌尔苏拉在与亡灵的交谈中总会问起有谁在战时寄存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圣约瑟石膏雕像，等待雨季过后来取。就这样，奥雷里亚诺第二想起了这笔只有乌尔苏拉知晓埋藏地点的财富，但他的一切探问和狡计都没能得逞，因为在她谵妄的迷宫里仿佛还留有一线清醒来保守这个只能向宝藏主人透露的秘密。她如此机智而缜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找来一位酒肉朋友假冒财宝的主人时，面对她细细追究、步步设陷的盘问那人旋即败下阵来。

奥雷里亚诺第二认定乌尔苏拉会把秘密带进坟墓，便借口要在前后院子开挖排水渠，雇来一队人手进行挖掘，他自己则拿着铁镐和各式金属探测器在地上查探，可经过三个月的仔细勘察却没找到任何类似金子的东西。后来他又去找庇拉尔·特尔内拉，希望纸牌能比挖掘工看得更清楚。但她向他解释，除非由乌尔苏拉亲自切牌，否则任何努力都是徒劳。不过她证实了财宝的存在，并算出了精确的数目，说

共有七千二百一十四枚金币，装在三个用铜丝绳束口的帆布袋里，埋藏在以乌尔苏拉的床为中心、半径为一百二十二米的圆圈内。她同时又提醒，必须等到雨过天晴，连续三个六月的阳光将泥潭晒为尘土才能找到。这样虚无缥缈又不乏细节的预言让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好似巫师的神话，因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努力，全然不顾当时已是八月，还要等上至少三年才能达到预言所说的条件。首先令他吃惊又困惑的是，经证实从乌尔苏拉的床到后院院墙的距离不多不少正是一百二十二米。费尔南达见他四下测量，不由担心他会变得像他的孪生兄弟一样疯狂，后来见他向挖掘工下令将排水渠再深挖一米时担心更甚。奥雷里亚诺第二完全沉浸在一种可与曾祖父当初寻找伟大发明之路时相媲美的探索激情中，耗尽了身上残存的脂肪，渐渐恢复了昔日与孪生兄弟的酷似，不光是瘦削的外表，还有那漠然孤僻的神态。他不再照管孩子，吃饭没个定时，常常不顾从头到脚一身泥污在厨房匆匆吃完，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时的问话勉强答上几句。费尔南达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如此卖力，见他这样投入地干活，就将他的冒进当作勤勉，贪婪当作忘我，固执当作坚毅，内心深深悔恨不该用那样恶毒的言语来攻讦他的懒散。然而，奥雷里亚诺第二此刻无暇理会出于怜悯的和好。他翻遍了前后院子的土地后，又一头钻进满是枯枝败叶残花腐蕾的齐颈深泥坑中，把花园的土地捣弄了一遍。他在家中东侧的地基上凿出深洞，结果一天夜里家人在大难临头的恐惧中惊醒，感觉房子在颤动，地下还传来可怕的吱吱声。三间屋子正摇摇欲坠，更有一道骇人的大裂缝从长廊直延伸到费尔南达的卧室。奥雷里亚诺第二并未因此放弃探索。尽管最后的希望都已破灭，唯一似乎还有意义的就是纸牌的预言，他也只是加固松动的地基，用灰浆抹平裂缝，又继续到西边挖掘。直到次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雨水开始减弱，云层渐渐消散，看上去随时会雨霁天晴。果然如此。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一轮砖红色的太阳照亮世界，那阳光如砖末般粗粝，又几乎如水般清凉。此后十年中滴雨未降。

马孔多满目疮痍。街巷间的泥潭中残留着破烂家具，被红色百合覆盖的动物骨架，都是外来人潮留下的最后遗物，他们一拥而至又一哄而散。香蕉热潮期间匆忙盖起的房子都已废弃。香蕉公司撤走了一切设施。当初电网包围的城市只剩下一地瓦砾。那些木屋，那些午后常有轻松牌戏的清凉露台，都被飓风刮走，仿佛是多年后马孔多必将从世间被抹去的预演。这场狂野风暴过后留下的人迹，只有帕特里夏·布朗的一只手套，落在已被九重葛淹没的汽车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创业时探索过的着魔之地，后来变成繁盛的香蕉种植区，此时却沦为腐烂根系的沼泽，多年以后从这里仍能遥遥望见远方大海无声的泡沫。雨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第二穿上干衣服出门，故园面目全非的景象令他心痛不已。那些灾难幸存者，那些早在香蕉公司的风暴席卷之前就生活在马孔多的老住户，都坐在街头享受雨后初晴的阳光。他们皮肤上仍残存着绿色的水藻，身上雨水留下的墙角霉味犹未散去，但在内心深处正为收复了自己出生于此的市镇而欣慰不已。土耳其人大街又恢复了昔日景象，就像当年阿拉伯人到来时一样。那些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人走遍世界用小玩意儿交换金刚鹦鹉，最终在马孔多找到安身之处，结束了千年流浪生涯。市集上的商品破败不堪，店门口的货物苔藓满布，柜台被白蚁蛀坏，墙壁受潮气侵蚀，然而第三代阿拉伯人仍坐在同样的地方，带着和祖辈父辈同样的神态。他们沉默寡言，镇静自若，不受时光与灾难的影响，就像失眠症肆虐之后以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三十二场战争之后那样生死莫测。面对破烂不堪的赌桌、油炸食品摊子、打靶屋、已成一片废墟的算命解梦的小巷，他们表现出的镇定着实令人惊诧。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禁以一贯的随便态度，问他们凭借了怎样的神奇方法从暴风雨中幸存，怎么会见鬼似的没被淹死，而家家户户都报以狡狯的微笑和梦幻般的眼神，人人都不谋而合地给出同样的答案：

“游泳。”

佩特拉·科特斯或许是本地唯一拥有阿拉伯人那般心气的人。她眼见暴雨卷走牛棚与马厩最后的残迹，仍努力撑起门户。最近一年，她托人给奥雷里亚诺第二带去紧迫的消息，而他回答说还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回她家去，但无论如何都会为她带去一箱金币铺满卧室的地面。于是她遍寻自己的内心，寻找能够助她战胜不幸的力量，找到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理有据的怒气。她怀着这怒气，发誓要重新挣出被情人挥霍、被暴雨吞噬的财富。她的决心不可动摇，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最后一次接到口信八个月后回到她家时，就看见她脸色青绿，蓬头散发，眼窝深陷，皮肤遍布疥疮，却仍忙着在小纸片上写数字，准备经营彩票生意。奥雷里亚诺第二愣在原地，那瘦削严肃的样子让佩特拉·科特斯难以相信回来找她的是陪伴一生的情人，而不是他的孪生兄弟。

“你疯了，”他说，“除非你想用骨头当奖品。”

这时，她让他去卧室看一眼，他便看到了那头母骡。它和主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但也和她一样精神抖擞，神情坚定。佩特拉·科特斯用自己的怒气培育它，没有草料、没有玉米也没有树根时便把它安置在卧室，喂它棉布床单、波斯地毯、长毛绒床罩、天鹅绒窗帘，以及主教式大床上用金线刺绣、带真丝流苏的华盖。

---

①此处指《旧约·约拿记》中的情节，先知约拿被大鱼所吞，在鱼腹中待了三昼夜。

十七

乌尔苏拉颇费了一番工夫，才兑现雨停就死去的诺言。雨天里她难得神智清明，八月后却频显清醒，那时开始刮起干燥的热风，令玫瑰萎谢泥沼枯涸，在马孔多遍撒滚烫的尘沙，将生锈的锌皮屋顶和百年的巴旦杏树永远覆盖。乌尔苏拉发现自己整整三年都被当作孩子们的玩具，不禁难过地哭了一场。她洗去脸上的涂鸦，拿掉挂满一身的花布条、蜥蜴和蟾蜍干尸、念珠和阿拉伯人的古旧项链，自阿玛兰妲死后第一次不用人搀扶离开了床榻，重新投入家庭生活。她那不可战胜的心气成为她在黑暗中的引导。每当有人注意到她磕磕绊绊，不小心撞到她那天使长般高举过头的手臂，都会认为她身体状况堪忧，却未曾料到她其实已经失明。她无需双眼就发现，早在第一次扩建家宅时精心培育的花圃都已毁于大雨和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大肆挖掘。她还发现，从墙壁到地基处处开裂，家具退色散架，房门脱轴，家中弥漫着一种在她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听天由命的悲戚氛围。她摸索着走过一间间空荡荡的卧室，听到白蚁蛀蚀木头低鸣不止、蠹虫在衣柜中沙沙大嚼，听到暴雨期间大肆繁殖的红色巨蚁挖掘地基时的毁灭之声。一天，她打开装圣像的箱子，里面跳出的蟑螂当即爬上身来，她不得不向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求助才得以脱身。箱里的衣服早已被咬噬成灰。“这日子没法过，”她说，“照这样下去我们非让虫子吃了不可。”她没有一刻的空闲。她天不亮就起床，谁有空就找谁帮忙，哪怕是孩子也一样。她把不多几件还能穿的衣服拿出来晒太阳，喷洒杀虫剂驱赶蟑螂，刮去门窗上的白蚁蚁路，撒下生石灰将蚂蚁毒死在巢窝里。最终，她受重振家业的热情驱使，来到那些被遗忘的房间门前。她清理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绞尽脑汁研制点金石的屋子，除去了瓦砾和蛛网，又把被士兵翻得一片狼藉的金银器作坊收拾

整齐，最后要来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钥匙，打算看看里面的样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曾说过除非他确实已不在人世，否则谢绝一切打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为尊重他的意愿想出无数托辞来搪塞乌尔苏拉。但她的决心不容动摇，绝不肯将任何隐蔽的角落留给虫子，为此她消除了一切障碍，经过三天不懈的坚持终于让人打开房门。她不得不扶住门枢才没被臭气熏倒，但只用了两秒钟便想起这里存放着女学生们用过的七十二个便盆，还想起雨天伊始的一天夜里一队士兵为捉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曾来家中搜查，却没能找到他。

“上帝啊！”她喊了出来，仿佛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费了那么大力气培养你的好习惯，结果你倒活得像猪一样。”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仍在研读羊皮卷，在他那蓬乱成团的须发间只能隐约辨出长着绿色苔藓的牙齿和木然的双眼。听出是曾祖母的声音，他转头往门口望去，努力挤出笑容，却在无意中重复了乌尔苏拉当年的一句话。

“您还能指望什么？”他喃喃道，“时间过得很快。”

“话是没错，”乌尔苏拉说，“可也没那么快。”

话一出口，她便意识到正在重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死囚房里对自己说的话，再次在战惊中证实了时间并没有像她刚承认的那样过去，而是在原地转圈。但即使到了此时她也没向命运妥协。她像训斥孩子似的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教训了一顿，坚持要他洗澡剃须，并来帮助自己重振家园。一听说要离开让自己得到安宁的房间，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顿时惊恐不已。他喊道，没有人能让他迈出半步，因为他不愿看到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死人，每天傍晚从马孔多出发驶向大海。“车站里所有的人都在上面，”他嚷道，“三千四百零八人。”乌尔苏拉这时才明白他生活在一个比自己眼前更幽深的黑暗世界，和他曾祖父的世界一样牢不可破、孤寂无伴。她同意他留在房间里，但征得他的许可不再让房门上锁，并且每天打扫，还丢掉所有便盆只留下一个，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像当初在栗树下囚

禁多年的曾祖父一样保持清洁体面。开始时，费尔南达把她的忙碌只当作老来发狂，勉强压下怒火。就在那时，她收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寄自罗马的来信，说他想在誓发永愿之前回一趟马孔多。这个好消息令她兴奋不已，她一天之内浇四次花，一心想让儿子对家里有个好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她更频繁地与隐身的医生通信，在长廊里重新摆放一盆盆欧洲蕨、牛至和秋海棠，而乌尔苏拉要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之前的那些已经毁于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怒火。不久，她又卖掉银餐具，买来陶瓷盘碟、白汤盆汤勺和镍银刀叉，使得那一向摆放西印度公司瓷器和波希米亚玻璃器皿的碗橱从此寒碜了许多。乌尔苏拉仍未满意。“把门窗都打开，”她叫道，“要做鱼做肉，要买最大个儿的乌龟，要让外乡人在角落里铺满席子，往玫瑰花里撒尿，上桌想吃多少回就吃多少回，让他们随便打嗝胡扯穿靴子乱踩一气，爱怎样就怎样，只有这么着才能赶走衰气。”但这理想难以实现。她已经太老，活得太久，无力重现糖果小动物时代的奇迹，而且她的后代中没有一个继承了她的坚毅与活力。家里按费尔南达的吩咐依然大门紧闭。

奥雷里亚诺第二又把衣箱搬回了佩特拉·科特斯家，他此时只能勉强维持不致让家人饿死。用卖骡子彩票挣的钱，佩特拉·科特斯和他又买了别的牲畜，由此起家经营起彩票生意。奥雷里亚诺第二走街串户兜售彩票，那些彩票都是他自己用彩笔所画，以求更吸引人也更有说服力，但他或许没有觉察到有些人购买是出于感激，大多数人是出于怜悯。不过，即使是最富于同情心的购买者，也不会放弃花二十生太伏得一头猪或三十二生太伏得一头小牛的机会，每到星期二晚上都满怀希望，挤满佩特拉·科特斯家的院子，等待那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从袋子里抽出中奖号码。不久这里就变为每星期一次的集市，一到星期二傍晚院中便支起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台，很多中奖者只要有人奏乐和上酒就当场杀掉牲畜，而奥雷里亚诺第二也不曾想到自己又拉起手风琴，加入因陋就简的饕餮比赛。这些宴席仿佛昔日盛况的寒酸翻版，也令奥雷里亚诺第二发现自己当年的活力荡然无存，昔日的昆

比安巴舞高手雄风不再。他已然变了一个人。当年遭遇“母象”挑战时高达一百二十公斤的体重如今已减至七十八公斤，当年快活圆鼓的乌龟脸变成了鬣蜥脸，总是带着无聊和疲惫。然而对佩特拉·科特斯来说，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她或许是将他在自己心中激起的同情，以及贫困引发的患难与共当作了爱情。光秃秃的大床不再是纵情欢愉的地方，而变成私密的避难所。天花板上的照影镜已被卖掉换来做奖品的牲畜，引人绮念的锦缎和天鹅绒也已被骡子啃光，他们好像一对欲望全无的老夫老妻，直到夜深仍不能成眠，便将以前白白浪费的时间用在算账和摆弄零钱上。有时他们一直忙到听见第一声鸡叫，把一堆堆零钱搬来弄去，这里减一点儿那里加一点儿：这些用来哄费尔南达开心，那些用来给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买鞋，还有这些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她自从混乱时期起就再没穿过新衣服，这些用来给乌尔苏拉预备寿材，那些用来购买隔三个月每磅就涨上一生太伏的咖啡，这些用来买越来越没甜味的白糖，这些用来买暴雨过后还没干透的木柴，那些用来买画彩票用的纸和彩墨，剩下的补上四月份那头小牛造成的亏损，它在彩票卖光的时候突然患上红斑症，最后只侥幸落下一张牛皮。在这些无私的贫寒弥撒中，他们总把最多的一部分留给费尔南达，倒不是出于愧疚或善心，而是因为比起自己来他们更在乎她能否过得舒适。尽管两人都没察觉，他们其实都把费尔南达当成了求之不得的女儿，甚至有一次甘心情愿连喝三天玉米糊，只为了能让她买下一块荷兰桌布。然而，他们拼命劳作，努力省钱，想出无数花样，守护天使却依然在疲倦中沉睡，任他们怎样把硬币挪来移去也仅仅勉强糊口而已。因入不敷出而彻夜难眠时，他们不禁自问这世界是怎么了，为什么牲畜不再像当年那样疯狂繁殖，为什么钱从手中溜走，为什么不久前人们还肯为昆比安巴舞花上大沓钞票，现今却认为能得六只母鸡的彩票定价十二生太伏就是抢劫。奥雷里亚诺第二嘴上没有说，心里却相信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佩特拉·科特斯神秘心灵的某个隐秘角落在暴雨期间出了毛病，使牲畜不再多产，令钱财滑

不留手。他带着这个谜团，深入她的心灵反复探究，想要找寻利益却找到了爱情，他本想让她爱自己结果自己却爱上了她。而佩特拉·科特斯见他越发亲热也就越发爱他，于是在暮年将至时又重拾青春时代的迷信，相信贫穷是爱情的奴仆。想起往昔，两人都把荒唐的欢宴、离奇的财富和毫无节制的私情当作妨碍，一同感慨浪掷了多少时光才找到共享孤独的天堂。两人在无儿无女的多年相伴之后疯狂相爱，奇迹般从桌上到床上都如胶似漆无比幸福，直到年老体衰时仍像小兔一样嬉戏，像狗一般打闹。

彩票生意一直没能兴旺起来。开始时，奥雷里亚诺第二每星期都抽出三天关在过去的牧场办公室里，一张一张绘制彩票，根据每次抽奖的牲畜，颇具神采地画上一头红色小奶牛、一只绿色小猪或是一群蓝色小母鸡，还娴熟地模仿印刷体题上“天赐彩票”几个字。佩特拉·科特斯觉得这名字起得很好。但时间一长，他每星期要画两千张彩票而深感疲倦，便请人把牲畜图案、彩票名字和号码刻在橡皮章上，这样只需在不同颜色的印泥里蘸色盖章即可。最后几年，他曾想到用谜语代替数字，让所有猜中者平分奖品，但这一规则太过复杂且令人生疑，他就没有再继续尝试。

奥雷里亚诺第二忙于经营彩票生意，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孩子。费尔南达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送到一所只收六名学生的私立学校，但连公立学校也不许奥雷里亚诺上。在她看来，任由他走出房间已经是莫大的让步。另外，当时的学校只接收天主教婚姻中诞生的合法子女，而奥雷里亚诺被送来时，外罩衣上用别针系着的出生证书注明他是弃婴。因此他被关起来，全靠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好心看护和乌尔苏拉间或清醒时的照管，通过老祖母们的解说逐渐认识了家中的狭小世界。他面容清秀，身材修长，好奇心之强常常将大人们惹恼，但他那闪烁的眼神却与上校在他这个年龄时刨根问底、有时洞察一切的目光不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花园里寻捉蚯蚓折磨虫子。有一次，他把蝎子装进盒

子准备放到乌尔苏拉的床席上，被费尔南达当场抓到，关进以前梅梅的卧室，他便在那里翻看百科全书里的插图打发孤寂的时光。一天下午，乌尔苏拉拿着荨麻枝在家中四处洒过夜的凉水。她明明已经见过多次，这时仍问他是谁。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说。

“没错，”她回答，“现在你该去学金银匠手艺了。”

她又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暴雨过后的热风曾吹得乌尔苏拉头脑间或清醒，但那情形已一去不返。她再没恢复过理智。当她走进卧室，会遇见佩德罗妮拉·伊瓜兰，她穿着碍事的撑裙和缀有小玻璃珠的收腰外套，一身出门赴约的打扮；遇见她的外祖母特兰奇丽娜·玛利亚·米尼亚达·阿洛科克·布恩迪亚，她瘫痪在摇椅上，晃着一根孔雀翎毛扇风，还有她的曾外祖父奥雷里亚诺·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身穿仿制的总督卫兵制服，还有她的父亲奥雷里亚诺·伊瓜兰，他曾发明咒语，能让奶牛身上的虫子干瘪自行脱落，还有她胆小怯懦的母亲，长猪尾巴的表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他们死去的子女。所有人都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像是来造访，倒像是在守灵。她眉飞色舞地谈天说地，所讲述的事件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每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从学校回来或奥雷里亚诺翻厌了百科全书，总会看到她坐在床上喃喃自语，迷失在亡灵的迷宫里。“着火了！”有一次她突然惊恐地大喊，当即在家中造成恐慌，实际上她是在说自己四岁时马厩发生的火灾。她将过去与现在完全混淆，即使在她死前的两三次清醒时刻，家人也无法判断她说的是当下的感受还是过去的回忆。她日渐一日越发瘦小，变成胎儿，变成木乃伊，到最后几个月仿佛裹着睡衣的李子干，那永远高举的手臂活像蜘蛛猴的爪子。她一连几天一动不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得不时常摇晃她的身体看她是否还活着，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用小勺喂她糖水。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老妪。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奥雷里亚诺在卧室里把她挪来移去，让她躺在祭坛上，看看是不是比圣婴大一点儿，一天下午还把她

藏进谷仓的柜子险些被老鼠吃掉。棕榈主日费尔南达去望弥撒的时候，他们来到卧室，一个抓脖子一个抄脚踝把乌尔苏拉抬了起来。

“可怜的老老祖母，”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说，“她老死了。”

乌尔苏拉大吃一惊。

“我还活着！”她说。

“你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说着，强忍住笑，“都不喘气了。”

“我在说话呢！”乌尔苏拉叫道。

“连话也说不出，”奥雷里亚诺说，“像只小蟋蟀似的死了。”

于是乌尔苏拉在事实面前屈服了。“上帝啊，”她低声叫道，“原来死就是这个样子。”她开始一场漫长、急迫、深切的祈祷，足足持续了两天多，到星期二的时候那祷词已经沦为诚心祈求与实用忠告的混合：不要让红蚂蚁毁掉房子，不要让蕾梅黛丝照片前的长明灯熄灭，不要让布恩迪亚家的人近亲结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奥雷里亚诺第二试图利用她呓语的当儿求她说出藏金币的地方，但恳求再一次落空。“等主人出现的时候，”乌尔苏拉说，“上帝必然会带领他找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猜到她随时会离开人世，因为这些天来已经观察到自然事物的异常：玫瑰发出土荆芥的气味；一个加拉巴木果壳杯失手掉落，鹰嘴豆和谷粒洒落在地排列出完美的几何图形，组成海星形状；一天晚上她还看见夜空中有一排发光的橙色圆盘飞过。

她死在圣星期四一早。人们最后一次帮她数算年龄是在香蕉公司时期，当时得出的结果在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二岁之间。她被放进一口比当年装奥雷里亚诺的篮子略大的小棺材，只有很少的人出席葬礼，一方面是因为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另一方面因为那天中午极其炎热，连飞鸟都昏头昏脑像霰弹一般纷纷撞向墙壁，撞破铁窗纱死在卧室里。

最初人们以为是瘟疫。家庭主妇们为清扫死鸟累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在午休时段，男人们则用小车推着倒进河里。复活主日，年过百岁的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布道坛上断定是“流浪的犹太人”作祟造成飞鸟的死亡，说那个怪物他前一晚亲眼见到了。他将其描述成公山羊和女巫杂交的产物，口中呼气能化作焚空热浪，所到之处新娘会暗结怪胎。他启示录般的预言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市镇上的人都确信这位教区神甫已经老迈昏聩。但星期三一早一个女人将所有人叫醒，她发现了一行偶蹄双足动物的脚印。面对这确凿无疑的证据，所有目击者都不再怀疑存在着与神甫所说相似的可怕生物，齐心协力在各家院中设下陷阱。于是它就这样遭擒。乌尔苏拉去世两个星期后，佩特拉·科特斯和奥雷里亚诺第二被邻家传来的一阵格外刺耳的小牛哀鸣惊醒。等他们起床，已经有一群人在把那怪兽从枯叶覆盖的深洞里的尖木桩上拔下来，它已然停止哀鸣。尽管身形不过未成年人大小，它却有一头牛那么重，伤口流淌着碧绿滑腻的血液。它一身粗硬的毛发上遍生小扁虱，皮肤上覆盖着鱼般的硬壳，但与神甫的描述不同，它人形的部分更像是娇弱的天使，双手光润灵巧，眼睛大而朦胧，肩胛上强壮的翅膀只剩下已经结痂的残根，应当是被樵夫的斧子所砍伤。它被捆住脚踝倒吊在广场的巴旦杏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它开始腐烂的时候，人们无法确定应该把它当作动物丢进河里还是当作人类下葬，便点起一堆火焚化了。永远无从得知它是否就是导致飞鸟暴死的元凶，新娘们倒是不曾生出预言中的怪胎，但炎热的天气也未得到缓解。

丽贝卡死于那年年底。毕生服侍她的女仆阿尔赫尼妲请求当局强行打开卧室的房门，她的主人已经在里面关了三天。人们看到她躺在孤寂的床榻上，像虾米般缩成一团，头发因生癣而落尽，大拇指含在嘴里。奥雷里亚诺第二负责料理了丧事，并打算把房子修葺好卖掉。然而那房子已破败得无可挽救，墙皮刚抹好即纷纷脱落，刷上再厚的灰浆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看着杂草穿透地面、蔓藤侵蚀椽柱。

暴雨过后的情形便是如此。人们一派懈怠，而遗忘却日益贪婪，无情地吞噬一点一滴的记忆。就在尼兰迪亚协定签订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日，共和国总统特使赶来颁发曾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多次拒绝的勋章，他们足足花了一个下午四处打听，发现竟无人知晓在哪里能找到上校的后人。奥雷里亚诺第二想到那是一枚纯金奖章，一度禁不住诱惑，但最终被佩特拉·科特斯说服，为了尊严而拒领，尽管那时使者们已然张贴公告并准备好仪式上的讲演。吉卜赛人也在那个时期再次到来，这最后一批继承梅尔基亚德斯学问的人发现市镇满目颓唐、居民与世隔绝，于是又一次拖着磁铁走街串户，仿佛那真是巴比伦智者的最新发明，并又一次用巨型放大镜聚焦阳光。一见水壶坠地炒锅翻滚就目瞪口呆的不乏其人，愿意破费五十生太伏观看吉卜赛女人装卸假牙并为之惊叹的也大有人在。当年满载旅客的火车曾拖来布朗先生配备玻璃车顶和天鹅绒安乐椅的车厢，还有一百二十节车厢的香蕉运送车一过便是一下午，到如今只剩下一列破旧不堪的黄色火车，而且因为无人搭乘几乎不在荒废的站台停留。教廷派代表团赶来核查关于飞鸟暴亡和“流浪的犹太人”被杀的报告，他们发现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和孩子们玩捉迷藏，认定他的报告乃是老年癫狂的产物，随即将他送进养老院。不久，又派来奥古斯都·安赫尔神甫，一个干劲十足的当代卫道士，为人苛刻又大胆莽撞，每天多次亲自敲钟催人警醒，挨家挨户叫起贪睡的人去望弥撒。但不出一年，他便被空气里弥漫的惰性所感染，被能令一切衰朽、停滞的炙烈尘埃所降服，被午饭中的肉丸在酷热难熬的午休时刻搅得昏昏欲睡，最终彻底妥协。

乌尔苏拉一死，家里重又陷入荒废状态，连果断坚定、雷厉风行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也没法扭转，多年以后她将出落成一位开明、欢快又新潮的女性，在世上稳稳占据一席之地。那时她打开门窗驱散颓气，修整花园，杀灭大白天就在长廊猖獗活动的红蚂蚁，努力恢复遗忘已久的好客氛围，可一切仍归于徒劳。费尔南达闭门幽居的执著

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遏阻住乌尔苏拉积蕴百年的洪流。她不仅拒绝在热风经过时开门，还命人用十字木条钉死窗户，严格遵循娘家教导过着活死人的生活。她与隐身医生频繁的通信以失败告终。经过无数次拖延后，她在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把自己关进卧室，头向北躺着，周身上下只裹了条白床单。到凌晨一点，她感到有人用浸过冰凉液体的手帕盖上自己的脸。等她醒来，阳光在窗前闪耀，她身上多了一道可怕的弧形伤口，从腹股沟一直延伸到胸前。但还没等静养期结束，她便收到隐身的医生表达迷惑的来信，信中称经过六个小时的检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她反复详尽描述的症状相符的疾病。实际上，这是她不按本来名称称呼事物的恶习造成的又一次混乱，通过心灵感应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们只查出她子宫下垂，建议用子宫托加以矫正。失落的费尔南达还希望得到更清晰的说明，但从未谋面的医生们不再回信。那个陌生的词语成了她心头的重负，她最终决定按下羞赧去询问究竟什么是子宫托，到这时才得知那位法国医生已在三个月前悬梁自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位旧日同袍不顾全市镇人的反对将他下了葬。于是她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也从罗马给她寄来了几个子宫托。她把附带的说明书背熟后立即丢进厕所，以免让人知晓自己隐痛的根源。这一防范未免多余，因为家中仅剩的几个活人对她根本未加在意。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浑浑噩噩地度过孤独的晚年时光，每日给家人准备所需的少许食物，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照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继承了几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魅力，她把以前折磨乌尔苏拉的时间都用于做家庭作业，并开始在学业上显出聪颖和专注，令奥雷里亚诺第二重新燃起当年寄托在梅梅身上的希望。他答应按照香蕉公司时期形成的惯例，送女儿到布鲁塞尔完成学业，并在这一期望的激励下试图令毁于暴雨的土地重获生机。那时节在家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他出现也只是为了看望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时间已经把他变成费尔南达眼中的陌生人。小奥雷里亚诺渐渐步入青春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变得难以捉摸。奥雷里亚诺第二曾寄希望于费尔南达人到老年会心肠变软，允许孩子踏入市镇上的生活，而那时不会再有人费心猜测他的出身。但奥雷里亚诺似乎甘守被囚的孤独，从未动念要去见识大门外的世界。乌尔苏拉命人打开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时候，他常去门前走动，往半掩的房门内张望。没人知道从何时起他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成了朋友。奥雷里亚诺第二直到很久以后听男孩说起车站的屠杀，才发觉这段友情。那天有人在餐桌上感叹香蕉公司的撤离造成了市镇的败落，奥雷里亚诺当下予以反驳，言语间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成熟。他的观点与常见的解释不同，他认为马孔多本是一个欣欣向荣、前程远大的地方，却被香蕉公司所扰乱、败坏、压榨，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还引来暴雨，借此逃避履行对工人的承诺。他说得头头是道，在费尔南达眼中不啻对少年耶稣辩倒文士的渎神戏仿。他还以令人信服的精确细节描述了军队如何向被包围在车站的三千多工人开枪射击，如何将尸体装上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抛进大海。像大多数人一样，费尔南达接受的是官方说法，相信在车站没有发生任何事，因此一见孩子承袭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便大为惊骇，立即命令他闭嘴。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听出了那是自己孪生兄弟的说法。事实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尽管被当作疯子，却是家里最清醒的人。他教小奥雷里亚诺读写，领他入门研究羊皮卷，就香蕉公司对马孔多的影响灌输给他与众不同的看法，而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时，将会意识到那种说法显得荒谬不经，因为与历史学家在教科书中奉为圭臬的错误观点大相径庭。偏居一隅的小屋，无论热风、灰尘还是酷暑都无法侵及，两人身处其中，眼前都浮现出祖辈遗传的一幕记忆：远在他们出生以前，一位头戴鸦翼状礼帽的老人背对着窗户侃侃而谈。两人同时发觉屋内永远是三月，永远是星期一，于是明白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并不像家人说的那样昏聩，实际上只有他足够清醒能洞察真相：原来时间也会失误和出现意外，并因此迸裂，在某个房间里留下永恒的断片。何塞·阿尔卡

蒂奥第二把羊皮卷上费解的字母一一归类。这些字母单独看起来好像蛛爬虱走，以梅尔基亚德斯细密的字迹呈现出来则像挂在铁丝上的衣物，但他确信它们属于一个字母总数在四十七到五十三之间的字母表。奥雷里亚诺想起在英语百科全书上见过类似的图表，便拿到房间里与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成果对照。结果完全相同。

想要发行谜语彩票的那段时期，奥雷里亚诺第二每天醒来都觉得喉咙里打了个结，就像想哭又强忍住的哽咽感。佩特拉·科特斯认为这是艰辛生活引发的又一麻烦，连续一年多每天用小刷子蘸了蜂蜜为他擦拭上颚，给他喝萝卜糖浆。喉咙里的硬结大到妨碍呼吸的地步了，奥雷里亚诺第二去找庇拉尔·特尔内拉，看她有没有什么缓解病痛的草药。这位年逾百岁、老而弥坚的妇人经营着一家地下妓院，她并不相信那些迷信的偏方，而是乞灵于纸牌的引导。她看到金元骑士的咽喉被宝剑仆侍的利刃所伤，由此推断出费尔南达在试图用大头针扎刺丈夫照片的拙劣手法引他回家，但由于巫术不精使他体内长了肿瘤。奥雷里亚诺第二除了结婚照再无其他照片，而那些都收在家庭相册里，他便趁妻子不备在家中四处寻找，结果在衣柜深处发现了半打未拆封的子宫托。他认为这些红色小橡胶圈必定是巫术用具，就揣了一个在兜里拿给庇拉尔·特尔内拉看。她判断不出它具体是什么，但感觉十分可疑，便让他把半打全部拿来，在院中付之一炬。为了对抗预想中费尔南达的巫术，她指点奥雷里亚诺第二将一只抱窝的母鸡浸湿后活埋在栗树下，他满怀信心地依计而行，用枯叶掩上新土的一瞬间便感觉呼吸顺畅了许多。而费尔南达那边，则把失窃当作隐身医生们的报复，她在内衣里面加缝了一个衣袋，将儿子新寄来的子宫托藏在其中。

埋下母鸡六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半夜在咳嗽中醒来，感觉像有一对蟹螯正扼住自己的咽喉。这时他明白无论销毁多少魔法子宫托，浸湿多少驱邪的母鸡，都没法改变一个简单而悲哀的事实：他快要死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满心担忧死前不能送阿玛兰妲·乌尔

苏拉去布鲁塞尔，于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卖力地干活，把彩票销售从每星期一次增加到三次。每天一早就能看见他在市镇上奔走，连最偏僻最穷苦的街区也不放过，那种迫不及待的势头只能在垂死之人身上看到。“天赐彩票到了，”他吆喝着，“大好机会别错过，一百年就这一次。”他竭力装出快活、亲切又健谈的样子，但只要看看他的冷汗和苍白脸色就知道他是在勉强支撑。有时他躲到无人看见的荒地上，坐下来忍着体内魔爪带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喘息片刻。直到半夜他还在花街柳巷游走，向那些伴着唱机抽泣的孤独女郎努力兜售好运。“这个号已经四个月没出啦，”他边说边展示手中的彩票，“别错过机会，人生比你想象的要短。”后来人们对他失去了敬意，开始取笑他，最后几个月都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称他堂奥雷里亚诺，而是当面叫他堂“天赐”先生。他喉间杂音日增，说话渐渐走调，最后喑哑嘶叫如狗，但仍努力使人们对佩特拉·科特斯院中的开彩保持兴趣。然而彻底失声时，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剧痛压垮，同时也明白靠猪羊彩票无法将女儿送去布鲁塞尔，因此突发奇想，要拿被暴雨毁坏的土地来举行一场豪华抽彩，那些土地只要有资金投入就能重新派上用场。这一想法手笔之大，甚至惊动了市长亲自颁发公告。人们合伙购买面额一百比索的彩票，一个星期之内就抢购一空。开彩当晚，中彩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庆会，堪与香蕉公司黄金时代的聚会相媲美。奥雷里亚诺第二最后一次拉起手风琴，演奏好汉弗朗西斯科已被人遗忘的歌曲，只是他再也无法伴唱。

两个月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去了布鲁塞尔。奥雷里亚诺第二把这次卖豪华彩票所得的钱，加上此前几个月攒下的积蓄，以及出售自动钢琴、古钢琴和其他破烂家什的微薄收入都给了她。根据他的计算，这些钱足够支付她的学业开支，只剩下回家的旅费没有着落。费尔南达考虑到布鲁塞尔毗邻堕落的巴黎，一直反对女儿远行，后来安赫尔神甫写了推荐信给一家修女开办的天主教膳宿公寓，她才放下心来，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也保证会在那里待到学业结束。另外，神甫

还安排她和一群去托莱多的方济各会修女同行，到了那里她们会托可靠的人送她去比利时。在通过书信往来加紧联络以上接送事宜的同时，奥雷里亚诺第二在佩特拉·科特斯的帮助下忙着准备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行李。他们在费尔南达的一个陪嫁衣箱里把衣物摆放整齐，这个女学生当晚就已一一记住，哪些是穿越大西洋期间要穿的衣服和灯芯绒便鞋，哪些是下船登岸时要换上的铜扣蓝呢外套和山羊皮鞋子。她还记住了上船后要怎样走才不至于落水，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修女们分开，除非吃饭不要走出舱室，旅程中遇见陌生人无论男女提问题都不要回答。她带上一小瓶防晕船的滴剂和一个本子，本子里有安赫尔神甫亲手写下的六句抵御风暴的祷词。费尔南达为她缝制了一条藏钱的帆布腰带，教她怎样贴身使用，睡觉时也不必摘下。她还把金溺盆用碱水洗净又拿酒精消毒，想让女儿带上，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害怕同学取笑没有接受。几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在临终时将会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那时在二等车厢里的她为了听清费尔南达最后的叮咛，想把满是灰尘的车窗摇下却没能做到。她穿着粉色的丝裙，左肩搭扣上别着一束小小的假三色堇，脚上是平跟系绊山羊皮鞋，配吊带丝光长袜。她个子娇小，长发披肩，双眼灵动一如乌尔苏拉当年，告别时不哭也不笑，流露出同样的坚毅性情。奥雷里亚诺第二追着渐渐加速的火车，同时挽着费尔南达免得她摔倒，女儿用指尖送来飞吻时他几乎来不及挥手回应。夫妻俩在烈日下一动不动，看着火车变作地平线上的黑点，这是自从婚礼那天后两人第一次挽臂并肩。

八月九日，在寄自布鲁塞尔的第一封信到达之前，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与奥雷里亚诺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交谈，突然说道：

“你要永远记住那是三千多人，都被扔进了海里。”

说完他一头扑在羊皮卷上，死的时候还睁着眼睛。同一时刻，在费尔南达的床上，他的孪生兄弟也不用再忍受铁蟹噬咬喉咙的漫长又可怕的煎熬。一星期前他回到家里，彻底失声，呼吸困难，只剩一把

骨头，还带着他的流动衣箱和浪荡子的手风琴，只为履行死在妻子身边的承诺。佩特拉·科特斯帮他收拾好衣服，告别时没洒下一滴眼泪，但却忘了给他带上那双想穿到棺材里去的漆皮靴。因此听到死讯时，她穿上黑衣，用报纸包好靴子，登门请求费尔南达让她看一眼遗体。费尔南达没让她进门。

“你站在我的位置想想，”佩特拉·科特斯恳求道，“想想我是多么爱他才甘心受这种羞辱。”

“对一个姘头来说什么羞辱都是应得的，”费尔南达反驳道，“反正你有的是男人，把这靴子留给下一个死的时候穿吧。”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履行了诺言，用菜刀砍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头，以保证他没有被活埋。两具尸体被放进同样的棺材，他们在死亡中重新变得酷似，就像童年时一样。奥雷里亚诺第二旧日的酒肉朋友在棺材上摆放了花圈，花圈的紫色缎带上写着一句悼词：让一让，母牛们，生命短暂啊。费尔南达对这一不敬举动大为光火，让人把花圈丢进了垃圾堆。在最后一刻的慌乱中，悲伤的醉汉们抬棺材出家门时弄混了，把两人各自下葬在对方的坟墓里。

十八

奥雷里亚诺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他将那些散页书中的传奇怪谈，瘫子赫尔曼的研究大要，鬼魔学的笔记，点金术的关钥，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及其疫病研究，都一一烂熟于心，故此当他步入青年时期虽然仍对所处时代一无所知，但已具备一个中世纪人的基本学识。不论何时走进房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总看见他在专心阅读。她早上给他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中午则是一盘炸香蕉片配米饭，自从奥雷里亚诺第二死后家中餐餐如是。她整日为他操心，给他理发、除虱，把已被遗忘的衣箱里的旧衣服拿出来按他的身材修改，在他开始长胡须时送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剃刀和盛在加拉巴木果壳杯里的剃须膏。上校所有的儿子，包括奥雷里亚诺·何塞在内，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上校酷似，特别是那凸起的颧骨，以及唇际那坚毅又略带冷酷的线条。正像当年乌尔苏拉见到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房间里研读时的感觉那样，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也以为他在自言自语。实际上他正和梅尔基亚德斯交谈。那对孪生兄弟死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在窗前光线的明灭中看见一位头戴鸦翼状礼帽的阴郁老者，仿佛远在出生前就扎根于他脑海的一段回忆已化身成人。奥雷里亚诺已经整理出羊皮卷中的字母表，所以当梅尔基亚德斯问他可曾看出那是以何种文字书写的，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答。

“梵文。”他答道。

梅尔基亚德斯向他透露自己回到这个房间的机会已经屈指可数，但他能够安心走向最终死亡的大牧场，因为羊皮卷须历时百年才可破译，在那之前奥雷里亚诺还有多年时间学习梵文。他告知奥雷里亚诺在通往河边的小巷里，即香蕉公司时期算命解梦的地方，一位加泰罗

尼亚智者开了家书店，店里有一本《梵文入门》，如果他不赶紧买下，六年后那书将被蛀虫啃食殆尽。奥雷里亚诺托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去书店把第二排书架最右端，放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和《弥尔顿诗集》之间的那本书买回来。她在漫长的人生中第一次流露出情绪波动，那是一副惊愕的神情。她不识字，便硬记下这一长串指引；她还卖掉一条小金鱼得到了购书钱，只有她和奥雷里亚诺知道那天晚上士兵搜查作坊后所剩十七条小金鱼的藏处。

奥雷里亚诺学习梵文不断进步，梅尔基亚德斯却日渐生疏遥远，身影消融在正午的阳光中。奥雷里亚诺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几乎只剩下模糊的影子，还在喃喃自语：“我已经在新加坡的沙洲上死于热病。”从此，房间再无法幸免于灰尘、热浪、白蚁、红蚂蚁的侵蚀，蠹虫注定要将书本和羊皮卷中的智慧化为粉末。

家里并不缺少食物。奥雷里亚诺第二死后次日，曾经写下不敬悼词献上花圈的朋友中有一个向费尔南达提出要偿还欠她丈夫的债务。从那以后，每个星期三都会有跑腿的人送来一筐食物，足够家里吃一个星期。没有人知道，这些食物是佩特拉·科特斯让人送去的，她想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善行来羞辱那羞辱过自己的人。然而怨恨远比想象中消失得快，但她仍出于骄傲继续送去食物，到最后变成出于怜悯。很多次她没有精力去兜售彩票，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但她为了让费尔南达有的吃宁可自己挨饿。她坚持履行对自己的承诺，直到看见对方下葬为止。

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来说，家里人口的减少理应成为她喘息的机会，这是她操劳半个多世纪后应得的。从未听见她有过一声怨言，这个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女人在家中留下了美人儿蕾梅黛丝这样天使般的后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这样带着神秘的庄严气息的子嗣，她把孤独而沉寂的一生都用来抚养孩子，却几乎记不清他们是自己的子辈还是孙辈。她照料奥雷里亚诺如同己出，却不知道自己正是他的曾祖母。只有在这样一个家里才能想象这种情形，她竟然一直

以来都铺席子睡在谷仓地板上，夜间忍受着老鼠的喧闹。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黑暗中有人盯着自己，吓醒过来才发现是一条毒蛇从肚子上滑过。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心里清楚假若让乌尔苏拉知道，一定会让自己睡她的床。那段时间，除非你到长廊里喊叫，家里人对任何事都浑然不觉，面包房里的忙碌，战争的惊扰，照料孩子的操劳，让人无暇再顾及他人的福祉。从未谋面的佩特拉·科特斯是唯一顾念她的人。她一直关心她是否有一双穿着出门的好鞋，会不会缺衣服穿，即使在靠彩票收入创造奇迹的时期依然如此。费尔南达进这个家门时有充分理由认为她只是一名终身女仆，她虽然不止一次听说那是丈夫的母亲，却实在难以置信，转眼就抛在脑后。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对这种低人一等的待遇并未流露出任何不满。相反，她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很爱在角落里忙碌，一刻不停、一声不吭，把她从年轻时起一直居住的这座大宅打理得整洁有序。特别是在香蕉公司时期，家里更像一座热闹的军营，全亏了她才能运转正常。但在乌尔苏拉死后，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身上渐渐不见了往日非凡的勤劳、惊人的能干。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已年迈力竭，还因为整个家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暮年。柔嫩的苔藓在墙上蔓延。杂草荆棘占满庭院之后又顶穿长廊的水泥地如同击碎一面玻璃，那裂缝间还涌出小黄花，与一个世纪前乌尔苏拉在梅尔基亚德斯放假牙的杯中发现的花朵一般无二。面对自然界的疯狂，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无暇也无力对抗，她整天往来于各卧室之间，好不容易赶走那些蜥蜴，可一到夜间它们又将泛滥。一天清早，她看到红蚂蚁离开千疮百孔的地基，穿过花园，沿着扶栏爬过已蒙上土色的秋海棠，一直侵入到家中深处。她起初试图用扫帚杀灭，后来换成除虫剂，最后用上石灰，但第二天它们又在原地出现，杀不尽灭不绝。费尔南达忙于给儿女写信，对势不可当的毁灭大潮毫无察觉。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继续孤身作战，奋力抗击不让杂草侵入厨房，扯下墙上短短几小时内就会重生的蛛网，刮去白蚁蚁路。但当她看到连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也覆满灰尘和蛛网，看到纵然自己

一天清理三遍拼了命地打扫，房间仍难逃荒凉破落的命运，呈现出当年只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那个年轻军官预见到的残败景象，便明白自己已然失败。于是她穿上多处磨损的主日正装、乌尔苏拉的一双旧鞋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送她的长棉袜，把两三套换洗衣服打了个小包。

“我不行了，”她对奥雷里亚诺说，“我这把老骨头管不了这么大一个家了。”

奥雷里亚诺问她要去哪儿，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似乎对自己的归宿没有任何打算。但她也试图说明白要去投奔里奥阿查的一个表妹，在那里度过晚年，只是这说法不太可信。自从父母双亡，她从未和市镇上的人有过接触，从未收到过邮件或口信，也从未说起过哪个亲戚。奥雷里亚诺给了她十四条小金鱼，因为她上路前只打算带走自己的那点儿财产：一比索二十五生太伏。透过房间的窗户，他看着她拿着衣物小包，弓着衰老的腰背，脚步蹒跚地穿过院子，看着她出门后把手伸进门洞带上门闩。从此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得知她的离去，费尔南达不停不休地骂了一整天，还翻箱倒柜挨个检查，确认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没有卷走什么东西。她平生第一次试着生火却烫到了手指，不得不请奥雷里亚诺教她煮咖啡。时间一长，便由他承担起厨房的活计。每天费尔南达起床时早饭已做好，她只需走出卧室，取走余火上奥雷里亚诺盖好留给她的食物，放到铺着亚麻桌布的桌上，坐到上首，在烛台环绕中面对着十五把空椅子独自用餐。即使到了这步田地，奥雷里亚诺和费尔南达也从未分享孤独，仍然各行其是，各自打扫房间，任凭蛛网落雪般笼在玫瑰枝头，又在梁上垂丝，绕四壁飘絮。那个时期，费尔南达感觉家中到处都是鬼怪精灵。各样物品，特别是日常用具，仿佛都有了自由移动的能力。费尔南达找了很长时间明明放在床上的剪刀，在家中四处翻遍后，结果在厨房里的隔板上找到，而她却认定自己已经有四天不曾迈进厨房一步。叉子从装餐具的抽屉里不翼而飞，她却在祭坛上找到六

把，洗衣盆里也有三把。她坐下来写信，这种现象更令她绝望。一向放在右手边的墨水瓶跑到左手边；吸墨垫突然消失，两天后又在枕下现身；写给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信与给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弄混，她总是为装错信封而烦恼，这种事也确实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一回她丢了钢笔，十五天后邮差送了回来，他是在自己的邮袋里发现的，挨家挨户问了一圈才找到失主。开始的时候，她以为这和子宫托的消失一样是隐身的医生们所为，准备写信央求他们放过自己，但写信中途为别的事走开了一会儿，结果回来的时候不仅找不到已经开了头的信，甚至想不起写信的初衷。有一段时间她怀疑奥雷里亚诺，就开始监视他，故意把东西放在他经过的地方，想等他挪动时一举抓获，但很快她便证实奥雷里亚诺除了去厨房和厕所之外从不离开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而且他也不是爱开玩笑的人。最终她相信是精灵们在淘气，于是决定把每样东西都固定在要用的地方。她拿一根龙舌兰线绳把剪刀拴在床头。她把钢笔和吸墨垫绑在桌腿上，又用胶水将墨水瓶粘在桌面右手边的位置。事情并未立竿见影地解决，她才做了几个小时的针线活儿，拴剪刀的线绳便已不够长，仿佛精灵们正暗中将它裁短。钢笔上的线绳也是一样，她没写多久手就已经够不着墨水瓶。但无论是远在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还是罗马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对这些琐碎的不幸都毫不知情。费尔南达总告诉他们自己很幸福，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她感觉卸去了一切重担，仿佛生活又把她带回到她父母的天地里，那里没有日常生活的困扰，一切都已在幻想中解决。无休无止的通信使她丧失了时间概念，特别是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走后。她本来已习惯根据儿女们预定的归期来数算日日月月、岁岁年年，但他们一再推迟归期，使她混淆了日子，颠倒了年月，何况每一天都如此相似，简直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但她并未失去耐心，反而对拖延深感欣慰。何塞·阿尔卡蒂奥多年前就宣称即将誓发永愿，但仍在推说结束高等神学的课业后还需转攻外交。费尔南达未觉不安，她理解通往圣彼得宝座之路任重道远，绝非一帆风顺。

与此相反，一些在旁人看来无关紧要的消息却能令她兴奋不已，譬如儿子亲眼见到教皇。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告诉她，自己由于成绩优异，赢得了当初父亲未曾预料的奖励而得以继续学业，她也同样为之欣喜。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买来语法书三年多后，奥雷里亚诺译出了第一张羊皮卷。这工作并非没有意义，但也不过是无法预计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因为译出来的卡斯蒂利亚语看不出什么含义，仍是有待破解的神秘诗行。奥雷里亚诺手头缺乏可供深入研究的资料，但好在梅尔基亚德斯说过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有能助他破译羊皮卷内容的书籍，于是他决定去找费尔南达，请她允许自己出去找书。在那个被日益加增的垃圾所吞噬的房间里，他考虑着如何以最合宜的方式提出请求，预想各种情形，等候恰当时机，但事到临头看见正从余火上取下食物的费尔南达，他却错过了与她搭讪的唯一机会，事先周密酝酿的请求噎在喉中，一时发不出声音。那是他唯一一次窥看她。她在卧室中的脚步声牵动着他的注意力。他凝神聆听她走到门口收取儿女的来信，同时把写好的信交给邮差，到深夜还在倾听她用笔尖划过纸张时那急迫有力的沙沙声，然后是关灯的声音，黑暗中的喃喃祈祷。这时候他才睡下，相信第二天期待的机会便会到来。他满心以为不会遭到拒绝，因此一天早上剪短垂到肩膀的长发，刮净杂乱的胡须，穿上不知是谁传下的紧身裤和假领衬衣，在厨房等待费尔南达来吃早饭。出现在眼前的不是每日里那个头颈高昂、步伐刻板的女人，而是一位美貌超凡的老妪，她身披已经泛黄的白鼬皮斗篷，头戴金色纸板制成的王冠，举手投足带着几分倦怠，好像刚在暗中哭过。事实上，自从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的衣箱里发现了这套蛀痕斑斑的女王行头，费尔南达已经穿戴多次。若是有人看到她站在镜子前，满心陶醉地摆出女王模样，必定会认为她已陷入癫狂。然而并非如此。她不过是把女王盛装当成追忆时光的机器。她第一次穿上时不禁心结暗生，双眼含泪，她又闻到了当年来家里接她去做女王的军官的鞋油气味，

追忆起破灭的梦想时心头一阵激荡。她觉得自己如此老迈、衰弱，离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已如此遥远，竟开始怀念那些最不如意的时刻，而直到此时她才发现自己多么需要长廊里飘来的牛至香气、黄昏时的玫瑰芬芳，甚至渴望外乡人带来的野蛮生机。她本已心如死灰，在日常忧患的痛切打击下若无其事，却在怀旧伊始被击溃了防线。随着岁月的摧残，她对自怜自伤的需求渐渐沦为一种恶习。她在孤独中变得更有人情味。然而那天早上走进厨房，见一个瘦骨嶙峋、面色苍白的年轻人递上一杯咖啡，眼中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她立时因尴尬而痛苦万分。她不仅拒绝了请求，从那以后还把家里的钥匙藏在存放待用子宫托的衣袋里。这一防范并无必要，因为奥雷里亚诺若是愿意，早就能够偷偷自由出入。然而漫长的囚禁、对外界的陌生，以及顺从的习惯，早已使他心中反抗的种子干枯。于是他又回到自己的囚室，把羊皮卷读了又读，聆听费尔南达在卧室里抽泣直到深夜。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生火，发现前一天留给她的饭菜仍在已熄灭的炉火上。于是他朝她的卧室里张望，只见她躺在床上，白鼬皮斗篷遮身，皮肤显出象牙般的质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四个月后，何塞·阿尔卡蒂奥赶回家时，眼前的她仍保持着这个样子。

很难想象有谁比他更像他母亲。他穿着阴沉的塔夫绸外套、硬圆领衬衣，没打领带只系着打花结的细缎带。面容苍白，神情怠惰，眼神中透出惊愕，嘴唇流露出软弱。头发乌黑锃亮又平直，在正中间分出笔直稀疏的缝来，与圣徒像头上的假发一样。胡须齐齐拔去，在石蜡般的脸庞上留下阴影仿佛流露出良心的重负。苍白的双手青筋毕现，手指仿佛蠕动的绦虫，一枚镶着圆形蛋白石的纯金戒指戴在左手食指上。奥雷里亚诺为他开门时，无须听他自报身份就能看出他是远道而来。随着他一路走过，花露水的气味在家里弥漫开来，当年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乌尔苏拉曾洒在他头上好在黑暗中找到他。在某种无法说清的意义上，离家多年后何塞·阿尔卡蒂奥仍然是个孩子，悒郁孤独入骨。他径直走进母亲的卧室，奥雷里亚诺已经用祖父的祖父那

个炼金炉在屋内连烧了四个月水银，靠梅尔基亚德斯传下的这一方法保存尸体。何塞·阿尔卡蒂奥什么话都没问，他在死者额头吻了一下，从她的裙下衣袋里取出三个还未开封的子宫托以及衣柜的钥匙。他做这些时干脆决绝，一反平日的怠惰。他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带有家族纹章的金银嵌花小匣，在里面找到一封散发出檀香气味的长信，信中费尔南达倾诉了对他隐瞒的一切真相。他站着读信，贪婪而不失耐心，读到第三页时停下来，将奥雷里亚诺重新审视一番。

“看来，”他的声音里有种剃刀般的锐利，“你就是那个野种了。”

“我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

“回你屋去。”何塞·阿尔卡蒂奥说。

奥雷里亚诺走了，甚至在听见那冷清葬礼上的声响时也没有好奇地出来。有几回，他从厨房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在家中游荡，急切地喘息，并且午夜过后还能听到他在破败的卧室间踱步。好几个月过去，他从未听到何塞·阿尔卡蒂奥的说话声，这不仅仅因为何塞·阿尔卡蒂奥不和他交谈，还因为他自己毫无交流的愿望，也没有时间花在羊皮卷以外的事上。费尔南达一死，他便从仅存的两条小金鱼中取出一条，赶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寻找所需的书籍。一路上不曾有任何事物引发他的兴趣，或许是因为他缺乏相关记忆可以比对，而且那些荒凉的街道、残破的房屋都与他过去的想象一模一样，那时的他为看到这些情愿付出一切。当初被费尔南达拒绝，这次他自己批准自己出门，不过仅此一次，也只有一个目的，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于是他没有停留片刻，穿过十一个街区来到当年算命解梦的小巷，气喘吁吁地走进杂乱阴暗的店铺。那里面连转身都很难，与其说是书店，倒更像是旧书回收店，旧书胡乱堆在白蚁蛀坏的书架上，堆在蛛网横结的角落里，甚至堆在本应留出的过道上。一张同样堆满厚书的长桌上，店主正在写一篇奇长无比的文字，紫色的笔迹带着几分谵妄，布满了学生练习本松散的纸页。他那一头漂亮的银发遮住了额

头活像白鹦鹉的羽冠，蓝色的眼睛细长灵动，流露出遍览群书后的温润气质。他穿着短裤，满身大汗，只顾写作甚至看都没看来人一眼。奥雷里亚诺毫不费力地从惊人的混乱中拯救出所需的五本书，因为它们都放在梅尔基亚德斯告知的地方。他一言不发，把书和小金鱼递给那位加泰罗尼亚智者，他接过去检视，眼皮又如贝壳般合拢。“你一定是疯了。”他用自己的语言说道，耸了耸肩，然后把五本书和小金鱼一起还给了奥雷里亚诺。

“你拿走吧，”他用卡斯蒂利亚语说，“最后一次读这些书的人应该是瞎子伊萨克[①]，所以你想想自己在干的事吧。”

何塞·阿尔卡蒂奥将梅梅的卧室修整一新，找人清洗缝补天鹅绒窗帘和总督式大床上的织锦华盖，重新启用荒废已久的浴室，那水泥池中已结上一层黑黝黝的硬壳。他将这两处地方变成充塞着次等品、异域旧货、伪劣香水和廉价宝石的王国。家中其他地方只有祭坛上的圣徒像让他觉得碍眼，于是一天下午他在院里生起火来把它们烧成灰烬。他每天睡到十一点之后才起床，然后穿着磨损的金龙图案长袍、缀有黄色穗子的拖鞋走进浴室，随后所践行的仪式其节奏之从容、用时之长久不禁令人想起美人儿蕾梅黛丝。入浴前，他先用三只仿雪花石膏小瓶里的浴盐为池水增香。他不拿加拉巴木果壳瓢舀水洗浴，而是全身泡在芳香的水中，仰面漂上两个钟头，在池水的清凉和对阿玛兰妲的回忆中获得慰藉。到家没几天，他就脱下了塔夫绸外套，因为天气太热，而且他也只有这么一件。他换上与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当年在舞蹈课上所穿非常相似的紧身裤，胸前绣有姓名首字母的真丝衬衣。他每星期两次脱下全套衣服在水池里洗净，披上睡袍等候晾干，因为再没有别的可穿。他从不在家吃饭。他在午后热气渐消时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之后继续焦灼地踱步，像猫一般喘息，想念着阿玛兰妲。她和夜晚灯下圣徒像的骇人眼神，是他对这个家存留的两样记忆。许多次，在罗马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他在梦中醒来看见阿玛兰妲从杂色大理石浴池中浮现，身穿花边裙，手缠黑纱，在他那久居异

乡后产生的幻梦中显得分外美丽。与奥雷里亚诺·何塞试图将这形象扼杀在战争的血腥泥潭里不同，他努力在淫乱的沼泽中维持它的鲜活，同时用杳无尽头的教皇之路来骗取母亲的欢心。无论他还是费尔南达都未曾想到，两人之间的通信是一场幻梦的交换。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到罗马便抛弃了神学学业，但仍不断编造研习神学和教会法的神话，以免失去母亲在狂热的字里行间不断提及的惊天遗产，那笔财富必能将他从特拉斯特维雷区与两个朋友合住的小屋，从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费尔南达在最末一封信中已透露对死期将近的预感，他接信后立即收拾起虚假荣光的最后遗存塞进行李箱，登上轮船，在底舱和移民们像屠宰场的牲口似的挤在一起，吃着冰冷的通心粉和生虫的奶酪越洋归来。费尔南达的遗嘱不过是一份迟到的不幸的清单，未读之前他就已经从散架的家具、长廊里的荒草看出自己陷入了永难摆脱的圈套，再也见不到罗马春天那钻石般璀璨的阳光，闻不到那亘古不变的气息。在哮喘发作的难眠夜晚，他反复思量自己的不幸，在幽暗的家中游荡，当初年迈昏聩的乌尔苏拉便是在这里用唬人的胡话向他灌输对世界的恐惧。为了在黑暗中找得到他，她给他指定卧室里的一个角落，说傍晚过后亡灵就在家中徘徊，而那里是唯一不受惊扰的地方。“你做了什么坏事，”乌尔苏拉对他说，“圣徒们都会告诉我。”他童年时的恐怖之夜都集中在那个角落，他在爱告密的圣徒冰冷目光的监视下，坐在凳子上冷汗直流，一动不动待到上床睡觉为止。这种处罚本无必要，因为那时他就害怕周边的一切，日后也会为生活中所遇的一切而惊恐：街上的女人会使人流血，家里的女人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斗鸡会让男人丧命、终生内疚，枪弹一沾手便会引发二十年的战争，冒失的事业只会将人导向失落和疯狂—总之，一切，上帝以无边美意所创造，又被魔鬼所败坏的一切，都是他恐惧的对象。当他从噩梦的轮番折磨中醒来，窗前的光亮，水池中阿玛兰妲的爱抚，她用丝绸香包在他两腿间搽粉时的舒服感觉，都令他从恐惧中解脱出来。连乌尔苏拉在花园的灿烂阳光中也显得不同了，

因为她不再说起那些可怕的事物，只是用炭灰擦拭他的牙齿，让他显露出一位教皇应有的灿烂笑容；为他修剪指甲，让从世界各地赶到罗马的朝圣者在接受祝福时惊叹于教皇的美手；又为他梳起教皇的发型，将花露水洒遍他的身体和衣裳，让他散发出教皇的馨香之气。他在冈多菲堡的院中看见教皇站在阳台上，面对无数朝圣者用七种语言发表同一内容的演讲，那时唯一引起他注意的便是教皇那仿佛用碱水洗过的双手的白皙，那夏装的煌煌光彩，以及那古龙水的氤氲。

回家将近一年，何塞·阿尔卡蒂奥为糊口已经卖掉银烛台和刻有纹章的溺盆——这时才发现只有纹章部分是金的——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招聚市镇上的孩子来家里玩。午睡时间他和他们待在一起，让他们在花园中跳绳，在长廊里唱歌，在客厅的家具间玩杂耍，他自己则在孩子当中巡视，教导他们良好的仪态。那时他已经没有紧身裤和真丝衬衣可穿，换上了在阿拉伯人店里买来的寻常衣衫，但仍保持着慵懒的尊贵和教皇的风范。孩子们像当初梅梅的同学一样占领了屋子。直到入夜还能听见他们的唧唧喳喳和歌声舞步，家里变成一个缺乏管束的寄宿学校。奥雷里亚诺对这种侵犯并不在意，只要他们不来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打扰。一天上午，两个孩子推开房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周身腌的男人正伏案研读羊皮卷，立刻被这景象吓住了。他们不敢进去，却仍围着房间打转。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从罅隙间向内张望，又从气窗扔进活蹦乱跳的动物，有一次还从外边把门窗钉死，奥雷里亚诺费了半天时间才强行打开。看到淘气行为并未招来惩罚，他们越发兴致高涨，一天有四个孩子趁奥雷里亚诺在厨房的时候闯进房间，准备把羊皮卷毁掉。但泛黄的羊皮卷刚到手，一股神力就将他们平地托起，悬在半空，直到奥雷里亚诺回来夺下羊皮卷。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来捣乱。

其中四个最大的孩子，快进入青春期却仍穿着短裤，他们负责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仪容修饰。他们比旁人来得更早，整个上午为他剃须，用热毛巾按摩，修剪手脚指甲，洒花露水。他们不时也跳进水

池，为他从头到脚打上肥皂，他自己则仰面漂在水上，想着阿玛兰妲。随后他们为他擦干身体，搽粉，穿衣。其中有个孩子长着金黄色鬈发，一双玻璃球似的红眼睛活像兔子，他时常在家里过夜。这孩子与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在他患哮喘失眠时也陪伴一旁，默默跟随他在漆黑一片的家中游荡。一天晚上，他们在乌尔苏拉的卧室中看到一片金光自水泥地下映出，仿佛地下有一轮太阳把卧室地板变成了彩色玻璃窗。屋里亮得不用开灯，他们只是掀开断裂的石板，就在昔日放置乌尔苏拉卧床的角落、光芒最盛的地方，发现了奥雷里亚诺第二曾经疯狂挖掘却未能寻获的秘密地窖。里面藏着那三个用铜丝绳束口的帆布袋，袋中是七千二百一十四枚面值为四多卜拉的多卜隆金币，[②]在黑暗中仿佛炭火般艳艳放光。

财宝的发现仿佛燎原之火迅速显出影响。何塞·阿尔卡蒂奥并未像贫贱时朝思暮想的那般，凭借飞来的横财回罗马去，而是把家里变成了一座浪荡乐园。他把窗帘和床上的华盖换成崭新的天鹅绒，浴室石板铺地，墙面贴上瓷砖。饭厅的食橱里塞满了蜜饯、火腿和醋腌菜；废弃的谷仓再次打开，堆满何塞·阿尔卡蒂奥亲自去车站取来的葡萄酒和烧酒，一箱箱都写着他的名字。一天晚上，他和四个大孩子狂欢到天明。早上六点，他们赤身露体冲出卧室，放干水池然后用香槟灌满。他们扎进池里，仿佛飞鸟在充盈着芬芳泡沫的金色天空中翱翔，而何塞·阿尔卡蒂奥没有欢闹，只是仰面漂着，大睁双眼想着阿玛兰妲。他这样待了许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咀嚼着不伦之情的苦涩，直到孩子们玩腻了，一个个回到卧室，扯下天鹅绒窗帘擦干身体，混乱中打碎了水晶镜面，吵闹着躺下时弄塌了华盖。何塞·阿尔卡蒂奥从浴室回来，看见他们赤身裸体挤成一团睡着，俨然躺在溺水者的睡房里。比起家具的损坏，更令他怒火中烧的是在狂欢后的空虚中对自己的厌恶和怜悯。他从收着苦行衣及其他忏悔赎罪用的铁器的箱子底层抽出教堂赶狗人的鞭子，像个疯子似的叫吼着，以无情的鞭打将孩子们从家中赶了出去，下手比面对一群野狼还要狠毒。随后他

就瘫倒了，哮喘持续发作了好几天，显出濒死的模样。到备受折磨的第三天晚上，他已几近窒息，只得找奥雷里亚诺帮忙到附近的药房买些止喘的嗅粉来。奥雷里亚诺因此第二次出门上街。他只走了两个街区便来到了那间逼仄的药房，落满灰尘的橱窗里摆着带拉丁语标签的瓷瓶，一个宛似尼罗河水蛇般沉静美艳的姑娘按照何塞·阿尔卡蒂奥写在纸条上的药名给他拿了药。第二次看到的荒芜城镇在泛黄的街灯下犹显昏暗，仍像第一次那样并未唤起奥雷里亚诺的好奇。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开始怀疑他会逃走，他就拖着在长久的幽闭生活中缺乏运动、虚弱笨拙的双腿，重新出现在眼前，因匆忙赶路而嘘嘘带喘。见他对外界的确漠不关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几天后违背了对母亲的承诺，允许他自由出入。

“我没有什么事要上街。”奥雷里亚诺这般答道。

他仍关在房间里，全神贯注读着羊皮卷，只是羊皮卷的研究虽渐渐深入，却仍未成功解读。何塞·阿尔卡蒂奥到房间给他送来火腿片，能在舌间留下春天滋味的百花蜜饯，有两回还送来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他对羊皮卷不感兴趣，认为那不过是晦涩的游戏，但这位孤寂的亲戚罕见的智慧和难以理解的博学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发现，奥雷里亚诺能够阅读英语，在攻读羊皮卷的间歇从头到尾读完了六卷本百科全书，就好像读一本小说。他见奥雷里亚诺谈起罗马头头是道，仿佛在那里居住多年，开始时还归于以上缘故，但很快就意识到他拥有许多百科全书未载的知识，比如物品的价钱。“凡事皆可知。”他问起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却只从奥雷里亚诺那里得到这句回答。奥雷里亚诺这边，也惊讶于从近处看到的何塞·阿尔卡蒂奥与此前远远望见他在家中游荡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会笑，会偶尔怀念家中的过往，会为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衰颓担忧。同一血脉的两个孤独者之间的接近与友谊无涉，却有助于他们承受将两人分离又联合的神秘孤独。何塞·阿尔卡蒂奥可以拿烦扰自己的日常难题向奥雷里亚诺求助，而奥雷里亚诺也可以坐在长廊里读书，收取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一贯准时寄来的信件，使用何塞·阿尔卡蒂奥归来后曾禁止他入内的浴室。

一个闷热的清晨，两人被大门口急迫的敲门声惊醒。那是一个肤色黝黑的老人，一双碧色的大眼睛在脸上平添了几分磷火般的鬼气，额头上赫然一个灰烬十字。他衣衫褴褛，鞋子破烂，唯一的行李就是肩头的旧背包，完全像个乞丐，但举止中自有一种与外表迥然不同的尊严。只需向他扫上一眼，即使是在客厅的阴暗中也不难发现，驱使他活下来的隐秘力量并非求生的本能而是恐惧的习惯。他是奥雷里亚诺·阿玛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十七个儿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在危机四伏的漫长逃亡生涯中寻找着片刻安宁。他说明了身份，恳求栖身家中，他在遭世界遗弃的黑夜中一直把这里当作此生最后的避难所。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奥雷里亚诺对他毫无印象。他们以为是个流浪汉，连推带搡把他赶到街上。这时候，两人从门口看到了远在何塞·阿尔卡蒂奥懂事之前就已开场的一场大戏的落幕。两个多年来追踪奥雷里亚诺·阿玛多的警察，已经像狗一般循着他的踪迹跑遍半个世界，此时突然出现在人行道上的巴旦杏树之间，射出两发毛瑟枪子弹干净利落地将他前额的灰烬十字洞穿。

自从把孩子们赶出家门，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直在等候圣诞节前开往那不勒斯的远洋船的消息。他和奥雷里亚诺说过此事，还制定了计划，准备给他张罗起一桩足以糊口的生意，因为费尔南达死后就再没有食物筐送上门。然而这最后的梦想未能实现。九月的一天上午，何塞·阿尔卡蒂奥在厨房里与奥雷里亚诺喝过咖啡，快要沐浴完毕时，被他逐出门去的四个孩子突然从屋瓦的豁口中钻进来。没等他反抗，他们就穿着衣服跳进水池，抓着头发将他按进水中，直到垂死挣扎时的气泡不再涌出水面，海豚般苍白的身体静静滑向芬芳池水的深处。随后孩子们从只有被害者和他们知晓的地方将三袋金币掳走。这场行动迅捷、有序而残忍，不亚于一次军事奇袭。奥雷里亚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无所知。当天下午，他在厨房里想起何塞·阿尔卡蒂

奥，在家中找了一圈后才发现他漂在平滑如镜的芬芳池水中，身躯硕大肿胀，仍在想着阿玛兰妲。到这时奥雷里亚诺才明白自己多么爱他。

---

①瞎子伊萨克（Isaac el Ciego，1160 — 1235），犹太拉比，犹太神秘宗大哲。

②西班牙古金币多卜隆有不同面值，此处为相当于四枚多卜拉金币（dobla）的一种。

十九

伴着十二月最初的登登足音，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牵着绕在丈夫颈间的丝带，一路顺风回到家乡。她事先没作通知突然现身，身穿象牙色外装，手戴翡翠和黄玉戒指，珍珠项链几近垂膝，平直的头发梳作浑圆的发型，用燕尾形别针拢在耳旁。她六个月前下嫁的男子是个气质成熟、身材匀称的佛兰德人，一副海员的模样。她一推开客厅房门便意识到，自己离家的时间远比想象中长久，造成的后果也比预料中更严重。

“上帝啊，”她喊道，兴奋大于惊讶，“一看就知道这家里没有女人！”

长廊里放不下她的行李。除了上学时带去的费尔南达的古老衣箱，她还运回两个立式衣柜，四件大行李箱，一整袋阳伞，八盒礼帽，一只关有五十只金丝雀的巨大鸟笼，还有丈夫的自行车，拆卸开来装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可以像大提琴一样拎着。尽管刚结束长途跋涉，她却一天也没休息。她从丈夫骑摩托的行头里拣出一件旧粗布工装穿上，开始着手重整家宅。她把占据长廊的红蚂蚁赶走，使玫瑰复活，将杂草拔除，在扶栏上挂的花盆里重新栽下欧洲蕨、牛至和秋海棠。她率领一队木匠、锁匠和泥瓦匠补上地面裂缝，修好门窗合页，又将家具翻新，把里外墙壁刷得雪白。在她回来三个月后，屋里又充满了自动钢琴时代那种青春欢快的气息。家里从未有谁像她这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乐观，永远歌声不断舞步不歇，随时准备将陈腐的事物和习俗丢进垃圾堆。她扫帚一挥便抹去了守丧的惨淡记忆，将堆积在犄角旮旯里的一堆堆无用破烂和迷信物品扫地出门，仅仅出于对乌尔苏拉的感激才留下客厅里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真厉害，”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十四岁的老祖母！”一个泥瓦匠告

诉她家中到处都有鬼魂出没，只有去发掘他们埋藏的财宝才能将其吓走，她却大笑着回答说自己根本不相信男人们的迷信。她如此天真率直、无拘无束，一派现代自由女性的风范，奥雷里亚诺在见到她进门的一瞬间竟手足无措。“好家伙！”她快乐地叫着，同时大张双臂，“瞧瞧我亲爱的小野人都长多大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在随身携带的手提唱机里放上唱片，要传授他时髦的舞步。她又逼他换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传下来的邋遢裤子，送给他年轻款式的衬衣和双色皮鞋，并且一见他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待得太久就把他推上街去。

她像乌尔苏拉一样身材娇小却活力十足、不受拘束，拥有与美人儿蕾梅黛丝相近的美貌和诱惑力，生来就具备预见时尚的罕见天赋。邮寄来的最新时装图样的唯一功用就是验证她的先见之明，都与她用阿玛兰妲留下的手摇式缝纫机缝制出的样式一般无二。她订阅许多欧洲出版的时装、艺术和流行音乐方面的杂志，但只需扫上一眼就能发觉世界风潮的发展和她想象的一丝不差。实实难以理解，这样引领风尚的女人竟会回到一个死气沉沉、饱受酷热扬尘之苦的市镇，更不用提她丈夫的钱财足够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都绰绰有余，并且他又爱她到了甘愿被一根丝带牵着走的地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她留下定居的意愿越发明显，她制定的计划无不立足长远，作出的决定都是为了在马孔多安度晚年。从那一笼金丝雀便可看出，她的这些想法并非心血来潮。她记得母亲曾在信中提到飞鸟的暴亡，因此特地将行程推迟几个月，搭上一艘中途在幸福群岛停靠的航船，在岛上精心选购了二十五对最好的金丝雀，准备用来重新装点马孔多的天空。这后来成了她众多失败举措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项。随着鸟儿不断繁殖，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对对放生，但它们乍出樊笼便立刻从市镇上飞走。她试图利用乌尔苏拉第一次扩建家宅时制作的巨大鸟舍吸引它们入住，却没能奏效。她用针茅草在巴旦杏树上搭鸟窝，又在屋顶撒草籽，还逗引笼中的鸟儿放声啼叫来挽留那些已出笼的同伴，却都归于

徒劳，因为那些鸟儿全都毫不迟疑地振翅高飞，在空中打个转，只一辨出方位就立刻奔向飞往幸福群岛的归途。

归来一年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没能与任何人结下友谊也没能举办一场聚会，但她依然确信能将这个受厄运青睐的城镇拯救出来。她的丈夫加斯通一向不拂逆她的意愿，但他在那个可怕的中午一走下火车就已经明白，妻子作此决定完全出于对某种虚无蜃景的怀恋。他确信现实很快会打破她的幻想，于是连自行车都没费心组装，只忙于在泥瓦匠扯下的蛛网间寻找最光亮的蛛卵，用指甲剖开，一连几个小时拿放大镜观察爬出来的小蜘蛛。过了些日子，他见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意孤行继续在家中实行变革，终于下决心装配起那辆前轮比后轮大出许多、分外引人注目的自行车，专心在附近捕捉本地各种昆虫，并制成标本装在果酱瓶里寄给他以前在列日大学的自然史老师。尽管他的主业是飞行驾驶，但也曾在那里深入学习过昆虫学。他骑车时身着杂技演员长裤，脚穿风笛手长袜，头戴侦探遮阳帽，步行时则是一身无可挑剔的天然亚麻外装，脚下白鞋子，颈间真丝蝴蝶领结，头上窄边草帽，手中柳木手杖。他那浅色的眸子尤显海员的神采，唇边留着松鼠毛似的小髭须。他比妻子至少大了十五岁，但论兴趣爱好更像年轻人，并时刻留意哄她开心，拥有好情人的各种优点，这些都弥补了年龄差异。实际上，任谁看到这个四十多岁、举止谨慎的男人，还有他颈上的丝带、所骑的马戏团自行车，都不会想到他和年轻的妻子之间富有默契的疯狂激情，兴之所至还会在最不相宜的地方释放彼此的冲动。他们从最初相识以来一直如此，而随着时间流逝、场所越发奇异，激情也越发深沉澎湃。加斯通不仅是一位火热的情人，拥有无尽的智慧和想象力，而且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仅仅为了和女友在一片紫罗兰原野上做爱而紧急着陆，险些双双丧命的人。

他们在结婚三年前相识，当时他驾驶着双翼运动机在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读书的学校上空翻滚腾跃，正要大胆操作避开旗杆，由帆布和铝箔构成的粗陋机身尾部却挂在了电线上。从那时起，他不顾腿上

还绑着夹板，每到周末都去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直居住的修女膳宿公寓接她—显然那里的规定没有费尔南达期待的那般严厉—随后带她去自己的竞赛俱乐部。他们星期天在野地上五百米的高空相爱，看着地上的人影愈变愈小，愈觉彼此心意相通。她时常和他说起马孔多，仿佛那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恬静的市镇；说起一座满溢牛至芬芳的大宅，她愿与一位忠贞的丈夫在那里相伴终老，生下两个野性十足的儿子分别叫作罗德里戈和贡萨洛，绝不叫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还要养育一个女儿名叫维吉尼娅，绝不叫蕾梅黛丝。她思乡情切，念念不忘被回忆美化的市镇，加斯通便明白若想娶她必须带她去马孔多生活。他表示同意，后来也同样接受了颈上的丝带，因为他相信那不过是一时的任性，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但在马孔多待了两年，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像第一天那样快活，他不禁警惕起来。这时他已经把本地所有能制成标本的昆虫都制成了标本，卡斯蒂利亚语也说得像本地人一样流利，还做完了杂志中所有的填字游戏。他无法拿气候当作归返的借口，因为他天生一副殖民者的体格，能毫无困难地忍受闷热天气里的午睡和含蛆虫的水质。他酷爱美洲食物，有一次连吃下八十二个鬣蜥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反而只吃火车用冰柜运来的鱼虾海鲜、罐头肉和蜜饯，穿衣打扮依然按照欧洲时尚并继续订阅时装图样，尽管她在这里无处可去也无人可拜访，并且这时她丈夫也没有心思欣赏她的清凉短装、斜戴的毡帽和环绕七转的项链。她的秘密似乎在于永远保持忙碌，处理自己一手造成的家务问题，时常出错以备次日纠正，费尔南达若是有知，一定会把这种有害的勤勉归咎于且做且毁的祖传恶习。她天性未改依然喜好玩乐，每当收到新寄来的唱片，都会叫上加斯通去客厅演练同学为她画在纸上的舞步，一练练到很晚，通常会以维也纳摇椅中或光地板上的做爱告终。对她来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尚未有儿女诞生，但她依然尊重当初和丈夫的约定，婚后五年内不生孩子。

为了打发空闲时间，加斯通常常去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一上午都和难以捉摸的奥雷里亚诺待在一起。他很喜欢和他一起追忆自己故乡最不为人知的角落，奥雷里亚诺都了如指掌，仿佛曾经在那里居住多年。加斯通问他是如何获知百科全书上没有的信息，得到的回答与当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听到的一模一样：“凡事皆可知。”除梵文外，奥雷里亚诺还学会了英语和法语，以及一点儿拉丁语和希腊语。那时候他每天下午都出门，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又每星期给他零用钱，很快他的房间成了加泰罗尼亚智者书店的分部。他贪婪地阅读到深夜，但从他所提及的阅读方式来看，加斯通认为他买书并非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验证自己已有的知识。没有任何书籍能比羊皮卷更有吸引力，他总是把上午最宝贵的时光用来研读那些手稿。加斯通和妻子都希望奥雷里亚诺能融入家庭生活，但他已献身于奥义研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笼罩在他周围的神秘迷雾也越发浓重。这种障碍无法打破，加斯通想与他深交的努力宣告失败，只得寻求其他消遣方式来打发时间。就在那时候，他产生了建立航空邮政服务的设想。

那算不上什么新计划。实际上，他早在结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之时就已考虑得相当成熟，只不过当初设想的不是马孔多而是比属刚果，他的家族在那里投资了棕榈油产业。婚后为了取悦妻子，他决定到马孔多过上几个月，因此推迟了计划的实施。但当他发觉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已经在努力组织公共事业委员会，对他回国的暗示加以嘲弄，便明白事情需要从长计议。考虑到成为先行者是在加勒比海还是在非洲并不重要，他又开始与自己已遗忘的布鲁塞尔合伙人联系。推行计划的同时，他在旧日的着魔之地，如今布满破碎燧石的平原上清理出一个停机坪，并着手研究风向、沿海地理状况，设计最合宜的航线，却没想到自己的忙碌与当年的赫伯特先生颇为相像，以至于在市镇上引起警觉，让人怀疑他不是要开航线而是要种香蕉。他终于为自己在马孔多的定居找到了理由，兴奋不已，因此多次奔赴省城与当局洽谈，获得许可并签下了独家运营权。与此同时，他与布鲁塞尔的合

伙人保持着一如当初费尔南达与隐身医生之间的通信联系，最终说服他们派一位熟练技师乘船带第一架飞机来，技师到了最近的港口会组装好飞机驾驶到马孔多。在初步的气象预测工作完成一年后，他对合伙人信中的多次应承深信不疑，养成了在街上散步时仰望天空的习惯，随时留心风中的响动，期待飞机的出现。

尽管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自己毫无察觉，她的归来却给奥雷里亚诺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变。自从何塞·阿尔卡蒂奥死后，他成了加泰罗尼亚智者书店的忠实主顾。他那时自由自在，时间充裕，不禁对市镇产生了些许好奇心，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惊喜。他走在覆满灰尘的孤寂街巷，怀着科学考察般的兴趣不带感情地审视几成废墟的房舍内部，观看因锈蚀和飞鸟的垂死撞击而变得破烂不堪的铁窗纱，打量在往事中消沉下去的居民。他试图以想象重建昔日香蕉公司已荡然无存的辉煌，可视线所及却是当初的泳池里堆满男人的鞋子女人的拖鞋直至池沿；遭到毒麦毁坏的房屋里残留着一具德国犬的骨架，依然被一根钢链拴在铁环上；一部电话响了又响，奥雷里亚诺只得拿起话筒，他听见一个焦虑的女声遥遥传来，说的是英语，便回答说是的，罢工已经结束，三千个死人已经被扔进海里，香蕉公司已经撤走，马孔多最终获得了久违多年的平静。他又走到业已败落的花街柳巷，曾几何时这里大捆大捆的钞票被烧掉只为给昆比安巴舞助兴，如今却已成为分外凄凉冷落、起伏不平的窄巷，几盏红灯尚未熄灭，无人光顾的舞厅只剩些残破的花环点缀，苍白臃肿的无主孀妇、年老色衰的法国女郎和巴比伦女族长还守在唱机旁等待主顾上门。除了安的列斯群岛黑人中最年迈的那个，奥雷里亚诺不曾遇到一个还记得他家族的人，连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无人知晓。那黑人一头棉花似的白发给人以照片底片的印象，他一如以往在家门口唱着傍晚时凄恻的圣诗。奥雷里亚诺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学会了复杂的帕皮亚门托语用来和他交谈，有时还一起享用他曾孙女烹制的鸡头汤。那是个高大的黑人姑娘，长着结实的骨架、母马般的臀部和活甜瓜似的乳房，浑圆美丽的

头颅上密密覆了一层铁丝般的头发，仿佛戴着中世纪武士的帽盔。她名叫尼格罗曼妲。那时奥雷里亚诺还在靠变卖家里的餐具、烛台和其他小物件过活。他时常落到囊空如洗的地步，便去市场的小吃摊上讨些人家准备丢进垃圾桶的鸡头，请尼格罗曼妲添上马齿苋做汤，又加进薄荷调味。她曾祖父死后，奥雷里亚诺不再去她家，但常在广场上巴旦杏树幽暗的树荫下遇见她用粗野的呼哨声吸引稀少的夜游者。很多次他都去陪她，用帕皮亚门托语和她谈起鸡头汤及其他贫寒生活中的美味。若不是她表示他待在一边吓走了潜在的主顾，他还会和她这样聊下去。尽管他有几次感受到了诱惑，尽管尼格罗曼妲也会将那看作共享怀旧之情的自然结果，他却没有和她睡觉。因此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回到马孔多那天送出一个令他窒息的友爱拥抱时，奥雷里亚诺仍然是未经人事的处男。每次看到她，特别是在她传授最新舞步的时候，他总会感到骨头里充满无助的泡沫，跟当年高祖父与借口玩纸牌带他钻进谷仓的庇拉尔·特尔内拉独处时的感觉一般无二。他试图强压下痛苦，更加投入地研究羊皮卷，尽量避开那位姨妈天真烂漫的讨好，避开她身上散发出的令他夜夜饱受荼毒的气息，然而他越是逃避，越是渴望听见她咯咯的笑声、牝猫般快活的尖叫和欢畅的歌声，她随时随刻在家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享受情爱的欢娱声。一天夜里，距离他床铺十米远处，在金银器工作台上，那夫妻俩肆意欢爱间将玻璃瓶打碎，最后在盐酸横流中成其好事。奥雷里亚诺一分钟都没能合眼，而且次日整天都在发热，在愤怒中抽泣。他在巴旦杏树荫下等待尼格罗曼妲的第一个夜晚无比漫长，惴惴不安的感觉仿佛冰针穿心，手中紧紧握着那一比索五十生太伏。他向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要来这钱固然因为需要，但更多地是为了让她也以某种形式卷入自己的冒险，从而折辱她，占有她。尼格罗曼妲把他引向诱人的烛火映照下的卧室，引向那张因反复接客而脏污不堪的折叠床，引向她冷酷无情、精壮如母狗般的身体，她本打算像安慰受惊的孩子似的将他打发，不

料遇上的却是一个勇猛异常的男人，搅得她五脏六腑都在巨震中错位。

他们成了情人。奥雷里亚诺上午钻研羊皮卷，午睡时分赶去尼格罗曼妲的卧室，在她的引领下花样百出，一开始像蠕虫，然后像蜗牛，最后像螃蟹，直到她不得不出门去追踪误入歧途的猎物。几星期后，奥雷里亚诺才发现她腰间有一圈饰带，宛如大提琴的琴弦，却像钢铁般坚硬，不分首尾无始无终，伴她出生成长。他们几乎总在欢爱的间歇，在令人迷乱的酷热中，在锌皮屋顶的斑斑锈孔透出的白日星辰下，赤着身子在床上吃饭。奥雷里亚诺是尼格罗曼妲头一个固定的男人，一个床上伙伴—她每次这样称呼都会笑得半死。就在她开始产生幻想时，奥雷里亚诺向她倾诉了自己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暗中相思，说找人代替不但没有缓解煎熬，反而随着情爱经验渐增越发痛苦。从此，尼格罗曼妲仍然热情不改地接待他，却执意要他为服务付费，遇到他没钱时便记账，不写数字只用大拇指指甲在门后划出道道。每到傍晚，当尼格罗曼妲在广场的阴影里徘徊，奥雷里亚诺就像陌生人一般穿过长廊，勉强与通常在此时吃晚饭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加斯通打个招呼，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他无心阅读写作，甚至无法思考，心潮如沸，耳边则不断传来朗朗笑声，窃窃低语，开场的嬉闹和随后激情爆发时响彻家中的喊叫。他在加斯通开始等候飞机之前的两年都是如此度过，那天下午也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遇见四个胡言乱语的年轻人，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中世纪是如何杀灭蟑螂的。老店主知道奥雷里亚诺喜爱那些只有“可敬的比德”[①]读过的冷僻典籍，便怀着父亲捉弄儿子似的心态逼他加入论争，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开始解说，蟑螂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有翅昆虫早在《旧约》时代就已成为人们用拖鞋击打的重点对象，但这一物种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从蘸硼砂的番茄片到拌糖的面粉等一切杀灭方式，以其一千六百零三个变种抵抗住人类最古老、最执著也最残酷的迫害，人类自起源以来对其他物种包括自身在内都没施展过这样

的手段，故而杀灭蟑螂可称为人类除繁衍后代之外更明确、更迫切的本能，而蟑螂之所以能逃过人类凶狠的捕杀，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躲入黑暗，利用了人类与生俱来对黑暗的恐惧，但同时它们也变得对正午的阳光十分敏感，故此，无论在中世纪、在如今还是在将来的世代，有效杀灭蟑螂的方式唯有光照而已。

这段旁征博引的宿命论讲谈成为一段深厚友谊的开端，从此奥雷里亚诺每天下午与四位论争者聚会，他们分别是阿尔瓦罗、赫尔曼、阿尔丰索和加夫列尔，他一生最初也是最后的朋友。对于像他这样耽溺在书本世界中的人来说，那些下午六点在书店开始，凌晨在妓院结束的激烈讨论，不啻一种全新的启示。他此前从未想过文学可以成为世上最佳的嘲讽工具，就像阿尔瓦罗一天晚上在欢宴席间所说的那样。过了一段时间，奥雷里亚诺才发觉许多惊世骇俗的高论都来源于加泰罗尼亚智者作出的榜样，据他说智慧如果不能用来创造出一种烹制鹰嘴豆的新方法，就根本一文不值。

奥雷里亚诺发表蟑螂宏论的那天下午，讨论最后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女孩们家里结束，那是一家充满假象的妓院，位于马孔多郊区。老鸨是个笑容可掬的好心妈妈，有着喜欢开门关门的怪癖。她不变的微笑仿佛在嘲弄那些信以为真的主顾，他们真的把只在想象中存在的一切当作了实在，因为这里连可触可感的物品也同属虚假：家具坐上去便散架，唱机的空膛里藏了一只抱窝的母鸡，花园里全是纸花，日历上还是香蕉公司到来之前的年份，画框里的版画剪自从未出版过的杂志。连那些一听到老鸨招呼接客便从四邻赶来的羞怯小妓女，也同样当不得真。她们出现时并不打招呼，穿着五年前的印花小衣裳，怎样天真无邪地穿上也怎样脱下，在情爱的高潮则大声惊呼“好家伙，你看房顶都要塌了”，而一拿到那一比索五十生太伏就立即去老鸨那里买面包和干酪。每到这时老鸨的笑容更加欢畅，因为只有她知道那些食物同样并非真实。奥雷里亚诺那时的世界始于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终于尼格罗曼妲的床铺，他却在这家小妓院里找到了医治腼腆的

猛药。最初他毫无进展，因为老鸨常在正销魂时走进，对双方的情爱魅力大加评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对这世上的种种扫兴习以为常，甚至在一个最疯狂的夜里到待客的小厅中脱个精光，用他那难以想见的阳具托着个啤酒瓶逛遍整幢房子。他还创造出许多荒唐的花样，老鸨只是带着不变的微笑旁观，从未抗议，从未当真，一如赫尔曼试图点燃房子来证明其不存在，阿尔丰索拧断鹦鹉的脖子丢进刚开锅的香蕉木薯炖鸡里的时候。

奥雷里亚诺与四位朋友同样亲密友好，甚至在想起的时候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但他还是与加夫列尔走得更近些。这一关系诞生于一个夜晚，当时他偶然谈起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只有加夫列尔一个人没有把他的话当成玩笑。那晚连通常不参与谈话的老鸨也以长舌妇般的热情异常兴奋地加入讨论，说她的确听人说起过几次，但仍认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其人只是政府编造的人物，用来作为屠杀自由派的借口。相反，加夫列尔却毫不怀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存在，因为他祖上就是上校的同袍和密友，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们谈起对工人的大屠杀，记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每当奥雷里亚诺触及这个话题，不仅老鸨一人，一些比她年长的老人都会驳斥所谓工人被包围在广场、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死尸之类的谣言，并且坚决捍卫已然在法庭案卷和小学教科书中根深蒂固的说法：根本没有过什么香蕉公司。因此奥雷里亚诺和加夫列尔因着一种建立在无人相信的事实基础上的默契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被这些事实深深改变，他们在只余怀缅的末日世界的退潮中漂泊。加夫列尔一向想睡便睡，随处过夜，很多次奥雷里亚诺把他安置在金银器作坊，他却被卧室间游荡的亡灵搅得彻夜不眠。后来奥雷里亚诺又把他托付给尼格罗曼妲，她空闲下来就将他带回自己常有客人光顾的房间，在门后刻满奥雷里亚诺债务所余的少许空处划上竖道记账。

尽管生活方面混乱不堪，这群年轻人仍试图创出一些不朽的业绩，这要感谢那位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敦促。正是他，凭着旧日当过古

典文学教师的资历以及珍本书籍的收藏，使他们得以在一个居民既无兴趣也无条件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的市镇，整夜探讨第三十七种戏剧情境。奥雷里亚诺为友情的发现而迷醉，为新世界的魅力而惶惑，而他以前由于费尔南达的怪吝从未有机会认识这个世界。就在那些用密码写就的预言诗行向他初显端倪之时，他却中断了对羊皮卷的研究。但后来事实证明时间足够，并不妨碍他在妓院流连，他重受鼓舞又回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决心继续努力直至揭开最后的秘密。正是从那时起，加斯通开始等待飞机的到来，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觉得寂寥孤单，一天上午她出现在房间里。

“你好，野人，”她说，“又回到洞穴里啦。”

她身着自己设计的服装，戴着自己制作的鲱鱼椎骨项链，魅力无可抗拒。出于对丈夫忠贞的信任，她不再使用那根丝带，自回乡后第一次拥有了片刻空闲。奥雷里亚诺无须抬眼便察觉到她的到来。她双肘抵在工作台上，触手可及，毫无戒备，奥雷里亚诺感觉到自己骨节的深沉耸动声，而她却将全部兴趣落在羊皮卷上。他试图克服慌乱，追回逃逸的声音、渐远的生机、正在化作珊瑚石的记忆，便跟她谈论梵文的神圣功用，谈论如同逆光观看纸背字迹一般在时间中洞彻未来的科学可能性，谈论将预言编成密码以防其自行毁灭的必要性，以及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和圣米扬关于坎塔布里亚毁灭的预言。突然间，奥雷里亚诺被自出生时起便沉睡于内心深处的冲动所驱使，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以为这最后的决定将结束自己的不安。不料她一下握住他的食指，在他继续回答问题时一直没有松开，那天真无邪的亲昵就像她童年时常有的样子。两人就这样由并未传达任何意义的冰凉食指联结在一起，直到她从这瞬间的梦幻中惊醒，拍了下额头。“蚂蚁！”她叫了一声。随后她丢下手稿，翩然一步到了门口，从指尖向奥雷里亚诺递出一个飞吻，当年那个下午他们送她去布鲁塞尔时她曾用同样的飞吻与父亲告别。

“以后再给我讲吧，”她说，“我忘了今天是往蚂蚁洞里撒石灰的日子。”

她有事经过时偶尔还来他的房间逗留片刻，而她丈夫仍继续仰望天空。这一转机给奥雷里亚诺带来了希望，他于是留在家里吃饭，而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回来后的头几个月起他从未这样做过。加斯通为此而高兴。在往往超出一个小时的饭后谈天中，他诉说着被合伙人欺骗的痛苦。他们通知他飞机已装船，只是尚未到达，而他在海运公司的代理人则认为永远不会到达，因为那船根本没有出现在加勒比海的船只清单上。他的合伙人坚称已经发货，甚至暗示加斯通可能在信中撒谎。通信时彼此间的怀疑达到如此程度，加斯通决定不再写信，开始筹划布鲁塞尔之行，准备速战速决弄清事情原委，并带飞机回来。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再次表明她的决定，宁可独自留下也不愿离开马孔多一步，这一计划立即告吹。最初，奥雷里亚诺和旁人一样把加斯通当作骑自行车的傻瓜，并隐约抱有怜悯之情。后来，他在花街柳巷中对男人的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便想到加斯通的温顺实际源于内心不羁的情欲。但当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才发觉加斯通真实的个性正与表面的顺服相反，因此不无恶意地怀疑他连等待飞机都是在做戏。他觉得加斯通并不像表面那样愚蠢，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拥有无限坚忍、能力与耐心的男人，打算以无穷尽的讨好、无止境的迁就、永不说“不”，令妻子感到厌倦，陷入自己织下的罗网，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幻梦沦为庸常，主动收拾行李返回欧洲。奥雷里亚诺曾经的怜悯化作强烈的敌意。他发觉加斯通的计划如此险恶又如此有效，不禁鼓起勇气提醒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但她却把他的疑虑当作笑柄，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中蕴含着撕心裂肺的爱意、犹疑和忌妒。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奥雷里亚诺身上引发手足之情以外的情愫，直到有一天他见她开桃罐头时刺伤了手指，立刻冲过去吮吸鲜血，那贪婪和狂热的样子令她感到皮肤上传来一阵寒意。

“奥雷里亚诺！”她神情不安地笑着，“你太坏了，当不了一只好蝙蝠。”

于是奥雷里亚诺的激情爆发了，他像个被抛弃的孩子似的在她受伤的手上吻了又吻，敞开内心所有最隐秘的甬道，倾吐百转愁肠，释放煎熬中孕育出的寄生怪兽。向她诉说自己如何在深夜起来，扑在她晾在浴室的内衣上因无助和愤怒而哭泣。向她诉说自己如何热切要求尼格罗曼妲像牝猫般尖叫并在他耳边呜咽“加斯通，加斯通，加斯通”，如何费尽心机搜罗她的香水瓶好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女孩颈项上闻到她的香味。这激情四溢的倾诉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吓得不轻，她渐渐蜷起手指像软体动物般缩了回去，那受伤的手不再感到疼痛也不再有分毫的怜悯，化作一团翡翠、黄玉以及僵硬麻木的骨头拧成的死结。

“真过分！”她说话的样子像在啐出什么东西，“我这就坐第一班船回比利时去。”

这些天里的一个下午，阿尔瓦罗来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扯着嗓门宣告他的最新发现：万牲妓院。该处名叫“金童”，是一座豪敞的露天大厅，至少有两百只石鸽徜徉其间，报时的嘶鸣震耳欲聋。在环绕舞池的铁丝围栏中，大株亚马逊山茶的掩映下，有缤纷五色的草鹭、猪一般肥硕的鳄鱼、十二节尾环的响尾蛇，还有一只金背龟在小小的人工海洋中潜游。另有一条温顺的白色大狗，常与同性来往，但也为妓女们提供保护来换取食物。四周弥漫着混沌初开的气息，仿佛这里刚刚被创造出来。黑白混血的姑娘们在血红的花瓣和过时的唱片中间无所期盼地等待，对这尘世乐园中被人遗忘的风月行当熟稔于心。在那群年轻人光顾这家幻觉温室的头一夜，入口处藤摇椅上沉默肃穆的看门老妪从五人当中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神情忧郁、颧骨如鞑靼人，带着从创世之初直到永远的孤独印记的男子，顿时感到时光倒流回到了最初的源头。

“啊，”她惊叹道，“奥雷里亚诺！”

她又一次看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就像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在他荣誉扫地失意退隐之前的那个遥远的清晨，她在一盏灯光下看见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发布平生第一道命令：命令给予他以爱情。她是庇拉尔·特尔内拉。多年前，当她过了一百四十五岁的生日，便放弃了计算年龄的恶习，继续在摆脱了记忆的静态时光中生活，在清晰可见确定无疑的未来中生活，不再被纸牌占卜中那些叵测的猜度和潜伏的陷阱所烦扰。

从那夜起，奥雷里亚诺在高祖母的温情和理解中找到了安慰和庇护，尽管他并不知道两人之间的血脉关联。她端坐在藤摇椅上追溯过往，讲述家族的伟业与不幸，马孔多已消逝的辉煌，与此同时阿尔瓦罗以响亮的大笑惊散鳄鱼，阿尔丰索编造石鸨的恐怖故事，说上星期有四位行为不端的客人被啄出了眼珠，而加夫列尔待在一个满腹心事的混血姑娘屋里，她不收费只求代写情书寄给她在奥里诺科河另一侧坐牢的走私贩男友，他被边防警察灌下泻药后又被勒令坐在小便盆上，盆里很快就盛满了粪便与钻石。这家真正的妓院，连同慈祥的老鸨，是奥雷里亚诺在漫长的囚禁中梦寐以求的世界。他在这种近乎完美的陪伴中感觉无比惬意，因此那天下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让他梦想破灭后，他立即来到这里寻求慰藉。他本想一吐为快，让人帮他解开重重心结，结果却只能扑在庇拉尔·特尔内拉怀里热泪滚滚尽情宣泄。她用指肚爱抚着他的头，静静等他哭完，没听他说出哭泣的缘由便已认出人类历史上这最古老的哀恸。

“好吧，孩子，”她安慰他说，“现在告诉我她是谁。”

奥雷里亚诺说罢，庇拉尔·特尔内拉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这古老而豁达的笑声最后几近鸽子的呢喃。对她而言，布恩迪亚家男人的心里没有看不穿的秘密，因为一个世纪的牌戏与阅历已经教会她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若不是车轴在进程中必不可免地磨损，这旋转的车轮将永远滚动下去。

“不用担心，”她微笑道，“无论她现在在哪儿，她都在等你。”

那是下午四点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走出浴室。奥雷里亚诺看见她从房门外走过，身上披着一件细褶浴衣，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他几乎是踮着脚尖跟在她后面，酒醉般颤抖着走进新房，那时她正解开浴衣，吓得立刻重新裹上。她打个手势指向隔壁半掩着门的房间，奥雷里亚诺知道加斯通正在那里开始写信。

“你走。”她压低声音说。

奥雷里亚诺笑了，双手将她拦腰抱起好像托着一盆秋海棠，仰面丢在床上。没等她反抗，他粗鲁地一把剥去浴衣，新浴后的胴体令他震撼不已，每一寸肌肤、每一丝茸毛，甚至连最隐秘处的痣斑他都在别处房间的幽暗中想象过。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奋力反抗，凭着训练有素的雌兽般的狡黠，如鼬鼠般扭动光滑、柔韧而芬芳的身体，同时试图用膝盖顶住他的腰，似蝎子般抓挠他的脸。但两人发出的声响极小，至多好像有人在敞开的窗户前观赏四月凝远的暮色时发出的轻叹。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斗，一场殊死的恶战，却好像与暴力无涉，因为其中只见似是而非的进攻，恍如幽灵的闪躲，缓慢、谨慎而庄重。于是在进攻间歇便有足够的时间让牵牛花再次绽放，让隔壁房间里的加斯通忘却关于飞机的梦想，他们俩就仿佛一双敌对的情侣在清澈的水塘深处寻求和解。在激烈而富于仪式感的争斗中，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想到刻意保持静寂更为反常，这比他们努力抑制的打斗声更容易引起隔壁丈夫的怀疑。她便抿着嘴笑出声来，同时并未放弃搏斗，不过防御时只是装模作样地撕咬，也渐渐不再扭动身体，最后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既是对手又是同谋，由此争斗沦为惯常的嬉闹，攻击变作爱抚。突然间，近乎玩耍或又一次恶作剧，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放松了防御，但当她被自己造成的后果吓住并试图应对的时候已经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震撼将她定在原处动弹不得，她的反抗意志被不可抵御的热切欲望压倒，她想要知道那些在死亡彼岸等待她的橙色呼啸和隐

形球体究竟是什么。她只来得及伸出手臂摸索到毛巾用牙齿咬住，以免传出那撕心裂肺的牝猫尖叫。

---

①“可敬的比德”（Beda el Venerable，672 / 673 — 735），即 Saint Bede，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神学家、历史学家，以博学多闻著称。

二十

庇拉尔·特尔内拉死在藤摇椅上，那是在一个欢宴的夜晚，她当时仍在自己的乐园入口看门。根据她的遗愿，人们没有将她入棺，而是让她坐在藤摇椅上，由八条大汉用龙舌兰粗绳缒到舞池中央挖出的大坑里。那些混血姑娘身着黑衣，哭得脸色苍白，按她们即兴想出的告别仪式纷纷摘下耳坠、胸针和戒指扔到墓穴中，随后用一块全无姓名日期的墓碑封住，在上面用亚马逊山茶堆成小丘。而后她们将动物全部毒死，用砖头和灰泥封牢门窗，这才带着自己的木衣箱各奔他乡，箱内贴满了圣徒像、杂志彩画，以及那些遥远而神奇的露水情人的肖像，他们或屙钻石，或吃人肉，或在公海上被尊为纸牌之王。

这便是结束。在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墓前，在妓女们的圣诗唱诵和念珠拨动中，旧日世界最后的零星残余也销蚀殆尽，而在此之前加泰罗尼亚智者已耐不住对四季长春的故乡的思念，将书店清仓，回到了他出生的地中海村庄。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香蕉公司全盛时期逃避连绵不断的战乱来到马孔多，异想天开地创办了这间书店经营古籍和各种文字的原版书。偶尔有等着去对面屋里解梦的人走进来，不无疑虑地翻上几页，仿佛那些书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半生都在闷热的书店后堂度过，用紫色墨水在撕下来的学生练习本散页上胡乱涂写细密的字迹，没人知道其中的确切内容。奥雷里亚诺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攒下两大箱文稿，让人想起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到临走时他又装满了第三箱，由此可见他在马孔多期间没做别的事。与他来往的只有那四个朋友，他在他们还在上小学时就用书籍跟他们交换陀螺和风筝，又带他们读塞内加和奥维德。他谈起那些古典作家就像在说自家人，仿佛历代先贤都曾当过他的室友。他还知道一些本不该知道的隐秘，譬如圣奥古斯丁在法袍内穿了件紧身羊毛坎肩

十四年不曾离身，巫师阿尔纳多·德·比拉诺瓦幼年被蝎子蜇咬便从此不举。他对文字的狂热中既有崇高敬意又有冷嘲热讽，对自己的手稿同样采取这种双重态度。阿尔丰索为翻译这些手稿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常把一卷稿子揣在兜里—里面总满满塞着各色剪报和奇特行业的手册—结果一天晚上在卖身糊口的女孩们家里丢失了。老智者得悉后，居然没有大动肝火，反而大笑不已，说那正是文学的自然归宿。到他返乡时情形却与此相反，他不顾一切劝说执意要带上那三大箱文稿，甚至操着卡塔赫纳方言对建议托运的列车员恶言相向，最终他争得许可带着箱子一起登上了旅客车厢。“等到人类坐一等车厢而文学只能挤货运车厢的那一天，”他那时说道，“这个世界也就完蛋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话。他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可谓苦不堪言，随着行期渐近他脾气越发恶劣，越发想不起该做的事情，明明把东西放在某处却在另一处发现，仿佛被当初折磨费尔南达的精灵所包围。

“见鬼[①]，”他恶狠狠地说道，“去他的伦敦教务会议第二十七条！”

赫尔曼和奥雷里亚诺负责帮他准备行程。他们像是对待一个孩子，把车票和护照放进他的兜里用安全别针别好，为他开列出从马孔多出发直到抵达巴塞罗那一路应做事项的详细清单，但他还是在无意中将一条装着一半家财的裤子丢进了垃圾堆。出发前夜，他钉上文稿箱，把所有衣物塞进来时带的行李箱，然后揉了揉贝壳似的眼皮，指着一堆陪他度过流亡岁月的书本，以粗鄙无礼的祝福口吻宣布：

“这些破烂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后，他们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二十九封信和五十多张照片，都是他在海上的空闲中攒下来的。尽管没有标明日期，但并不难看出写信的前后顺序。在最初的信件中，他以一贯的幽默谈起旅途中的种种风波：他是如何渴望将那个不许他把三个箱子搬进舱室的监运员扔进大海；一位女士如何愚蠢至极地对数字“13”怀有恐惧，

但并非出于迷信，而是因为她感觉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数字；他如何在吃第一顿晚饭时，尝出船上的饮用水有莱里达泉水仿佛夜间甜菜的味道，为此打赌取胜。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对船上的现实生活渐渐失去兴趣，而马孔多的一切，连晚近的琐碎事件也成为他怀恋的对象，因为随着航船渐行渐远，记忆也染上愈来愈浓烈的悲凉色彩。怀念的加深在照片里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最初的照片里，他身穿运动衫，额前银发飘飞，背衬十月加勒比海的浪花飞溅，一副快活的模样。最后一批照片里，他站在甲板上裹着暗色大衣，系着丝围巾，脸色苍白，神不守舍，脚下沉郁的航船开始在秋天的大洋上梦游般前行。赫尔曼和奥雷里亚诺给他回了信。最初几个月他频繁来信，让人觉得比他在马孔多时与他更为接近，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痛苦。一开始，他在信中说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他出生的家里仍有粉色的蜗牛，夹在面包里的鲱鱼干仍是当年的味道，村里的瀑布黄昏时仍弥散出芬芳的气息。练习本的散页上重又布满紫色的字迹，其中还有分别献给他们四人的段落。然而尽管他自己表面上并未察觉，那些在心绪转好后写下的热情洋溢的信件，却渐渐变成了灰心丧气的牧函。冬夜，汤锅在炉上沸滚，他却在怀念书店后堂的闷热，烈日照在蒙尘的巴旦杏树上的嗡响，午休的昏恹中响起的火车汽笛，正如他在马孔多时怀念冬天炉上的热汤，咖啡小贩的叫卖，以及春天里疾飞的云雀。两种怀念如同双镜对立，他夹在其间不知所措，无法再保持高妙的超脱，最后甚至劝说他们全都离开马孔多，忘掉他传授的一切世道人心知识，让贺拉斯见鬼去，还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著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

阿尔瓦罗第一个听从忠告离开了马孔多。他变卖一切，包括家中院里吓唬路人的老虎，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他从路经的车站寄来明信片，兴高采烈地描述车窗外瞬间闪过的世间万象，仿佛将一首飞逝的长诗撕成碎片向着遗忘之乡一路抛洒：

路易斯安那棉田里奇怪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丛中疾驰的骏马，亚利桑那地狱般暮色里的希腊情侣，密歇根湖畔画水彩画的红衫少女—她举起画笔向他致意，不是为了告别而是盼望再见，因为她并不知道眼前所见的火车没有归路。随后，阿尔丰索和赫尔曼在一个星期六离开，计划下星期一回来，却从此再无音讯。加泰罗尼亚智者走后一年，只有加夫列尔还留在马孔多，仍然一事无成，靠尼格罗曼妲不稳定的周济过活。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的有奖问答，头奖是一次巴黎之旅。订阅杂志的人其实是奥雷里亚诺，他帮加夫列尔填写答案，有时在家里，更多的时候在马孔多仅存的一家药房中，在瓷瓶和缬草气息的环绕间，加夫列尔沉静的女友梅尔塞德斯所住的地方。这是往昔的最后遗存，这往昔日渐衰落却不会彻底消亡，因为它是在自身之中无休无止地败落下去，每过一刻便向彻底灭亡更近一步，却永远无法抵达最后的终结。整个市镇如此死气沉沉、与世隔绝，当加夫列尔赢了大奖，带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鞋和一套拉伯雷全集要去巴黎的时候，不得不向司机挥手致意才让火车停下将他接上。昔日的土耳其人大街已沦为被遗忘的角落，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沿袭千年传统端坐在门口等待死亡的到来，尽管最后一码斜纹布早已售出，幽暗的橱窗里只剩下一个个无头的模特。至于香蕉公司的城镇，或许帕特里夏·布朗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难耐的长夜里会就着醋拌黄瓜对儿孙们说起，但此时它已沦为一片野草丛生的平原。安赫尔神甫的继任者是一位老神甫，没人愿意费心打听他的名姓。他为关节炎及疑虑引发的失眠所苦，懒懒地躺在吊床上等待上帝的慈悲，任凭蜥蜴和老鼠在隔壁的教堂里争夺领地。在那个连飞鸟也厌弃，长久的扬尘与酷热令人呼吸艰难的马孔多，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被爱情、被孤独、被爱情的孤独幽禁在因红蚂蚁疯狂啃噬的轰响而难以入睡的家里，他们是唯一幸福的生灵，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

加斯通已经回到布鲁塞尔。他厌倦了苦苦望天的等待，有一天把往来信件和生活必需品塞进一只小箱子，抱着乘飞机归来的希望离

去。他一心想要赶在一群德国机师前面，因为他们已经向省府当局提交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从第一次欢爱的那天下午起，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直在利用她丈夫难得的疏忽冒着风险幽会，紧张地避免发出响动，却几乎总被她丈夫无从预料的返家打断。然而一旦有机会在家中独处，他们便彻底沉浸在迟来的爱情狂潮中。那是一种癫狂失常的激情，令费尔南达的骨骸在墓中惊恐地颤抖，令双方耽溺于持久不衰的亢奋中。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尖叫、高潮时的歌唱响彻家中，或在下午两点的餐桌上，或在凌晨两点的谷仓里。“最让我难过的是，”她笑着说道，“我们竟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意乱神迷间，她看见蚂蚁横扫花园，受远古的饥饿驱使啃食家中的一切木制品获得餍足，看见有生命的岩浆洪流再次席卷长廊，却只是在卧室里发现敌踪时才去费心抵挡。奥雷里亚诺丢下羊皮卷，不再出门一步，对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也胡乱答复。他们丧失了现实意识、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节奏。他们重又紧闭门窗，为的是省下宽衣解带的工夫，就像当初美人儿蕾梅黛丝期待的那样在家中赤身来去，在院中泥地里一丝不挂地嬉闹，一天下午在水池中欢爱时还险些双双溺死。短短时间内他们造成了比蚁灾更大的破坏：客厅里的家具四分五裂，曾经承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军旅生涯中哀伤情爱的吊床被疯狂撕裂，床垫的芯子被剖出洒满地板，扬起满屋飞絮几令人窒息。奥雷里亚诺这位狂野的情人比起对方并不逊色，但却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凭借自己荒唐的才华和饥渴的柔情统治着这座灾难的乐园，仿佛在爱情中秉承和凝聚了高祖母制作糖果小动物时的无穷精力。当她为自己的新花样欢快歌唱或纵情大笑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却变得越发沉默入神，因为他的激情是在内敛中暗自烧灼。他们的情爱技艺登峰造极，在高潮后的疲惫中也能另辟佳境。他们全心膜拜对方的肉体，发现情爱的低潮里存在着未开发的领域，那比欲望的空间更丰饶幽美。他蘸着蛋清揉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挺立的乳峰，或用椰子脂润滑她充满弹性的大腿和仙桃般甜蜜的小腹，而她则把奥雷里亚

诺超群的阳物当作玩偶摆弄，用口红给它画上小丑眼圈，用眉笔给它描出土耳其人胡子，为它戴上透明的硬纱细领带和锡纸小帽。一天晚上，他们互相用桃子糖浆从头到脚涂满全身，像狗一般彼此舔舐，像疯子一样在长廊地板上欢爱，直到被蚂蚁的洪流唤醒，险些被活活吞噬。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迷狂的间歇回复加斯通的来信。她感觉他是那样遥远又那样忙碌，似乎不可能再回来。在最早的一封来信中，他提到合伙人的确已将飞机发出，但布鲁塞尔的海运公司错运到了坦噶尼喀，交付与当地散居的马空多人村社。这一失误导致诸多耽延，仅将飞机讨回就可能拖上两年时间。于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不再担心丈夫会不合时宜地归来。至于奥雷里亚诺，他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以及那位沉静的药房少女梅尔塞德斯转达的加夫列尔的消息。开始的时候这些联系还很真实。加夫列尔退掉了返程票留在巴黎，把多芬尼大街上一家阴森旅馆的女招待扔出来的过期报纸和空酒瓶拿去换钱来度日。奥雷里亚诺能够想象他整日穿着高领红绒衫的样子，只在春天来临，蒙帕尔纳斯的路边咖啡馆坐满一对对情侣时才脱下；白天睡觉、晚上在弥漫着煮花椰菜气味的房间里写作以转移饥饿感，而日后罗卡玛杜[②]将在同一房间离开人世。然而，他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含糊，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信件也越来越稀少，愈显颓伤，奥雷里亚诺慢慢习惯了这种疏远，一如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对丈夫的感觉。两人飘荡在一方空渺的天地，在那里日复一日、永恒不变的现实只有爱情。

突然间，这个幸福的梦幻世界中响起一声晴天霹雳，传来了加斯通返家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睁开眼睛，审视各自的灵魂，手抚胸口相对而视，心下明白两人已连成一体，宁可死也不愿分开。于是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信中饱含真情又自相矛盾，重申了对他的爱意和想见到他的渴望，同时也坦承由于命运的捉弄，自己无法与奥雷里亚诺分离。出乎两人的预料，加斯通的回复十分平

和，甚至显出父辈的温情，那满满两张信纸都在提醒他们提防激情的起伏无常，最后一段更明明白白祝他们幸福，就像他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经历的那样。这态度太过出人意表，令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有蒙羞的感觉，仿佛主动给了丈夫期望的借口抛弃自己。六个月后她的愤恨更加强烈，因为加斯通从利奥波德维尔写信来说，他终于在那里等到了飞机，请求将自行车寄过去，称那是他在马孔多唯一割舍不下的东西。奥雷里亚诺耐心地承受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怨气，努力向她证明无论顺境逆境自己都能成为一位好丈夫。加斯通留下的钱财用尽了，迫在眉睫的窘困在两人之间促生出一种新的紧密关联，虽然不像激情那样令人迷醉，但仍能使他们与情欲泛滥的日子里一般的相爱、同样的幸福。庇拉尔·特尔内拉去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期待新生命的降生。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孕期的昏倦中试图经营鱼脊骨项链生意，但除了梅尔塞德斯买了一打，再无他人光顾。奥雷里亚诺第一次发觉自己的语言天赋、百科全书般的博学，以及不需实地了解便能对远方事物了如指掌的罕见能力，都像自己女人的那匣珠宝一样毫无用处，尽管那时马孔多所有剩余居民的全部家资加在一起才抵得上那些珠宝的价值。他们奇迹般地勉强度日。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能保持良好心态，继续制造情趣花样，但她也养成了午饭后坐在长廊里的习惯，似睡非睡，若有所思。奥雷里亚诺则在一旁陪伴。有时两人会一直默默坐到傍晚，面对着面，彼此凝视，在静谧中相爱，并不比当初在癫狂中相爱减色。未来的不确定使他们的心绪回到了过去。他们看见自己置身暴雨时期失落的乐园，在院中的泥坑里玩水，捕杀蜥蜴挂到乌尔苏拉身上，拿她玩活埋游戏。这些回忆令他们恍然觉察，两人自从记事以来共度的时光总是十分幸福。追忆往事时，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记起一天下午她走进金银器作坊，母亲告诉她那个小奥雷里亚诺不是任何人的孩子，因为他是躺在一个篮子里顺水漂来的。这一说法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却没有任何真实的信息可以取代。在研究过所有

可能性之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费尔南达不是奥雷里亚诺的母亲。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倾向于认为他是佩特拉·科特斯的儿子，尽管她只是记得那女人的一些丑闻。这一推测使两人内心因恐惧而纠结。

想到妻子竟是自己的姐妹，奥雷里亚诺心悸不已，便去了一趟神甫的住所，期望在那些潮湿又遭虫蛀的档案中找到有关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最久远的受洗记录可以追溯到阿玛兰妲·布恩迪亚那里，她是在年轻时由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施洗的，那也正是神甫凭借巧克力戏法四处证明上帝存在的时期。他甚至幻想自己可能是十七个奥雷里亚诺之一，在四册洗礼簿中遍查他们的出生记录，但受洗时间与他的年龄相比都太过久远。患关节炎的神甫躺在吊床上一直观察，见他迷失在血脉的迷宫，因犹疑而颤抖，不禁同情地问起他的名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回答。

“这样的话你不必拼命找了，”神甫以确信无疑的口吻说道，“多年以前有条街叫这个名字，那时人们就形成了习惯，用街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奥雷里亚诺愤怒得浑身颤抖。

“哈！”他说，“这么说您也是不相信了。”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了三十二场内战但全部失利，”奥雷里亚诺回答，“不相信军队包围人群并开枪杀掉三千工人，然后把死尸装上两百节车厢的火车丢进大海。”

神甫用怜悯的目光打量着他。

“噢，孩子，”他叹息道，“对我来说，只要能确定你我在这一刻的存在就够了。”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接受了篮中弃婴的说法，并非因为相信，而是因为能够借此脱离恐惧。随着产期的临近，两人渐渐变得仿佛一人，不分彼此，在那幢吹口气就会倒塌的房子里的孤寂中融为一体。他们退到一个仅能栖身的空间，从费尔南达的卧室，在那

里他们得以享受情爱的静谧之美，到长廊的起点，在那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坐下来为即将降生的孩子缝制小靴子和小帽子，奥雷里亚诺则在一旁回复加泰罗尼亚智者偶尔的来信。家中其他地方已在毁灭的重围中沦降。金银器作坊，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当年料理之下的原始而沉寂的王国，都已沉陷在一片家居密林的深处，没人胆敢涉险探入。在大自然吞噬之力的重围中，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然栽种牛至与秋海棠，保卫自己用石灰圈出的领地，为永恒的人蚁之战挖出最后的战壕。长发久未梳理，清晨起来脸庞生出淤斑，腿上出现浮肿，当初饱含爱意如鼬鼠般的胴体也脱了形，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已不复当年带着一笼不幸的金丝雀和俯首帖耳的丈夫回家时的青春模样，但她依旧未改欢快的心境。“见鬼，”她常常笑着说，“谁能想到我们最后真变成野人啦！”她怀孕六个月时，一封明显不是加泰罗尼亚智者写来的信斩断了他们与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信从巴塞罗那寄出，但信封上是用常规的蓝色墨水写就的公文字体，带着不祥邮件特有的无辜而漠然的气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正要拆开，奥雷里亚诺一把从她手中抢了过来。

“这一封不看了，”他说，“我不想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就像他预感的那样，加泰罗尼亚智者再没来过信。那封陌生人的信件无人拆阅，丢在费尔南达曾经遗忘结婚戒指的壁架上任凭蠹虫吞噬，被信中噩耗燃出的火焰焚烧渐渐成灰，与此同时那对孤独的情侣顶着末后的时光之潮逆流而上，这顽固的不祥时光枉费力气，未能将他们引向幻灭与遗忘的荒漠。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觉察到了危险，最后几个月手挽着手，让那源自癫狂私情的小生命在忠贞爱情中孕育而成。夜里，两人相拥在床上，蚂蚁在月光下激增的响动，蠹虫搞破坏的轰鸣，杂草在邻近房间里持续而清晰的生长之声都无法令他们产生惧意。许多次两人被鬼魂的忙碌声吵醒。他们听到乌尔苏拉为了使血脉流传与造化法则抗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探索伟大发明的神奇原理，费尔南达忙于祈祷，奥雷里亚诺·布

恩迪亚上校在战争的幻象和打制小金鱼的辛劳中日渐木然，奥雷里亚诺第二在狂乱的欢宴中深感孤独苦苦挣扎，便明白生前的执念能够战胜死亡，于是重又欢欣鼓舞，确信他们变成鬼魂后还会继续相爱，确信即使有朝一日蚂蚁从人类手中夺取的这座破败乐园又被其他物种夺走，那时他们仍会一直相爱下去。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迎来了产前的阵痛。那位一脸微笑、为卖身糊口的女孩们接生的产婆，让她躺上饭厅的餐桌，跨坐在她的腹部，粗暴地摆弄直到她的尖叫被一个巨大男婴的洪亮哭声压过。透过朦胧泪眼，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看到又一个真正的布恩迪亚，如同所有的何塞·阿尔卡蒂奥一般粗壮任性，如同所有的奥雷里亚诺一般大睁着洞察一切的双眼，注定要从头更新家族的血脉，涤除其中顽固的恶习和孤独的天性，因为他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

“完全是个野人样，”她说，“叫他罗德里戈吧。”

“不，”她丈夫表示反对，“要叫他奥雷里亚诺，他会打赢三十二场战争。”

剪断脐带后，由奥雷里亚诺举着灯，产婆用布擦去孩子身上的淡蓝色黏浆。直到把他翻过身来，他们才发现他比其他人多了些什么，于是弯下腰去仔细查看。那是条猪尾巴。

他们并没有慌乱。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未曾听闻家族中的先例，也没能想起乌尔苏拉可怕的警告，产婆最后还安慰他们，估计等孩子换牙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条多余的尾巴顺便切掉。后来他们便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因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下身血如泉涌，无法止住。他们试图用蛛网和厚厚的尘土敷上止血，却像用手捂住喷泉一样徒劳。最初的几个小时，她努力保持乐观。她握着惊恐的奥雷里亚诺的手，请他不要担心，说像她这样的人只有想死的时候才会死去，同时还为产婆各种耸人听闻的止血方法大笑不已。然而随着希望一点一滴弃奥雷里亚诺而去，眼前的她渐渐模糊仿佛在光线中慢慢消

失，最终陷入昏睡。星期一清晨，他们请来一个女人在床前念诵对人类和动物一向灵验的止血咒，但爱情之外的任何方法面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激情澎湃的血液都无能为力。经过绝望的二十四小时，当天下午当那泉源无助地耗尽，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亡。她的侧影更加线条分明，脸上淤肿散尽显出雪花石膏般的光晕，并且重又露出了笑容。

奥雷里亚诺这时才明白自己多么爱他的朋友，多么需要他们，多么想在此时此刻有他们的陪伴。他把孩子放进他母亲预备好的篮子，用毯子盖住死者的脸庞，然后跑到市镇上漫无方向地游荡，寻找回到往昔的途径。他来到最近一阵未曾拜访的药房前叫门，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家木匠作坊。提灯为他开门的老妇人对他的胡言乱语表示同情，但同时一口咬定，这里从没有过什么药房，她也从不认识一个脖颈纤细、眼神迷离，名叫梅尔塞德斯的姑娘。他来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旧址，一头抵在门上放声痛哭，心中明白这迟来的眼泪是为那桩死丧而流，当时没有哭泣是不愿破坏相爱的美好。他捶打着“金童”乐园的灰泥墙直到双手俱裂，呼唤着庇拉尔·特尔内拉。空中有发光的橙色圆盘飞过，他在过去无数个欢闹的夜晚曾经从养着石鸽的院中像孩子般着迷地仰头观看，此时却无动于衷。花街柳巷最后一家营业的舞厅里，手风琴乐队弹唱起主教的侄子，好汉弗朗西斯科的绝艺传人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的歌曲。店主曾对自己的母亲不敬，出手向她动粗，结果落得一只手臂萎缩，他邀请奥雷里亚诺喝了瓶烧酒，奥雷里亚诺也请他喝了一瓶。店主对他讲起自己手臂的不幸遭遇，奥雷里亚诺对他讲起自己心灵的不幸遭遇：因为对自己的姐妹倾心而落得枯焦。最后，两人齐声痛哭起来，奥雷里亚诺一时间感到痛苦已经结束。然而，当他在马孔多的最后一个清晨再次变成独身一人，他站在广场中央大张双臂，仿佛要唤醒整个世界一样声嘶力竭地吼道：

“什么朋友，都是婊子养的！”

尼格罗曼妲把他从一摊泪水与呕吐物当中救了出来。她将他带回自己的房间，为他清洗干净，让他喝下热汤。她又用炭条涂掉了他到

如今一直欠着的无数爱情债务，认为这能让他开心些，还主动追忆起自己最孤单时的悲伤，以免他独自哀恸。天亮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从短暂的沉睡中醒来，重又感到头痛欲裂。他睁开眼睛，想起了孩子。

孩子不在篮子里。最初一瞬喜悦的火花在他心头闪过，他以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死而复活来照料孩子了。但尸体分明仍在毯子下隆起如一堆石头。奥雷里亚诺想起进家时卧室门正敞开着，便穿过弥漫着清晨牛至芳香的长廊，探身向饭厅里望去，那里仍是分娩时的一片狼藉：大锅，染血的床单，灰盆，留在桌上摊开的尿布里萎缩的脐带，剪刀和渔线丢在一旁。产婆夜间过来抱走了孩子，这想法使他终于能够喘口气思考片刻。他倒在摇椅上，在家族早年的日子里丽贝卡曾坐在上面传授刺绣技法，阿玛兰妲曾坐在上面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下跳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曾坐在上面缝制婴儿衣物。在一道清醒的电光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承载不起这么多往事的重负。他被自己和他人的回忆纠缠如同致命的长矛刺穿心房，不禁羡慕凋零玫瑰间横斜的蛛网如此沉着，杂草毒麦如此坚忍，二月清晨的明亮空气如此从容。这时他看见了孩子。那孩子只剩下一张肿胀干瘪的皮，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路努力把他拖回巢去。奥雷里亚诺僵在原地，不仅仅因为惊恐而动弹不得，更因为在那神奇的一瞬梅尔基亚德斯终极的密码向他显明了意义。他看到羊皮卷卷首的提要在尘世时空中完美显现：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奥雷里亚诺平生从未像此刻一般清醒，他忘却了家中的死者，忘却了死者的痛苦，用费尔南达留下的十字木条再次钉死门窗，远离世间一切干扰，因为他知道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上记载着自己的命运。他发现史前的植物、湿气蒸腾的水洼、发光的昆虫已将房间内一切人类踪迹消除净尽，但羊皮卷仍安然无恙。他顾不得拿到光亮处，就站在原地，仿佛那是用卡斯蒂利亚语写就，仿佛他正站在正午明亮的光线下阅读，开始毫不费力地大声破译。那是他家族的历史，连最

琐碎的细节也无一遗漏，百年前由梅尔基亚德斯预先写出。他以自己的母语梵文书写，偶数行套用奥古斯都大帝的私人密码，奇数行择取斯巴达的军用密码。而最后一道防线，奥雷里亚诺在迷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时就已隐隐猜到，那便是梅尔基亚德斯并未按照世人的惯常时间来叙述，而是将一个世纪的日常琐碎集中在一起，令所有事件在同一瞬间发生。奥雷里亚诺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逐字逐句高声朗读教皇谕令般的诗行，当年阿尔卡蒂奥曾从梅尔基亚德斯口中听闻，却不知道那是关于自己死亡的预告。他读到羊皮卷中预言世上最美的女人的诞生，她的灵魂与肉身正一起向天飞升；他读到那对遗腹孪生子的来历，他们放弃破译羊皮卷不仅因为缺乏才能和毅力，更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读到这里，奥雷里亚诺急于知道自己的身世，跳过几页。此时微风初起，风中充盈着过往的群声嘁喳，旧日天竺葵的呢喃，无法排遣的怀念来临之前的失望叹息。他对此毫无察觉，因为他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初步线索。他读到一位好色的祖父一时迷了心窍穿越幻象丛生的荒野，寻找一个不会令他幸福的美女。奥雷里亚诺认出了他，沿着亲缘的隐秘小径追寻下去，找到了自己被赋予生命的一刻，那是在一间昏暗的浴室里，蝎子和黄蝴蝶的环绕间，一个工匠在一个因反叛家庭而委身于他的少女身上满足了欲望。他读得如此入神，仍未发觉风势又起，飓风刮落了门窗，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拔出了房屋的地基。到这时，他才发现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姨妈，而当年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不过是为了促成他们俩在繁复错综的血脉迷宫中彼此寻找，直到孕育出那个注定要终结整个家族的神话般的生物。当马孔多在《圣经》所载那种龙卷风的怒号中化作可怕的瓦砾与尘埃旋涡时，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

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

①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

②罗卡玛杜（Rocamadour），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笔下的人物，见《跳房子》第28章。